

【Panel 3-1】 經驗世界的 共有와 認識의 變化

- 安重根与中國 王元周 (WANG Yuanzhou) 5
- 近代东亚的朝鮮因素与日本軍制变化 徐勇 (XU Yong) 41
- 중일전쟁 직후 식민지 조선인의 만주와 중국에 관한 인식
..... 柳時賢 (RYU Sihyun) 71
- 竞争和合作：冷战时期香港电影界的左派和右派 李培德 (LEE Puitak) 93
- 从近年来主流媒体报道看中国国际观的发展变化 柴璠 (CHAI Fan, 中國傳媒大) 137

【Panel 3-2】 近世에서의 海外情報

- 近世日本の朝鮮認識－壬辰倭亂の記憶を中心に 宮嶋博史 (MIYAJIMA Hiroshi) 181
- かわら版(木版印刷物)にみる江戸庶民にとってのペリー来航
..... 田中葉子 (TANAKA Yoko) 205
- キリシタンから西洋近代へ 松方冬子 (MATSUKATA Fuyuko) · 237
- 漢訳洋学書と19世紀日本の出版文化 八耳俊文 (YATSUMIMI Toshifumi) · 261
- 개화초기(1876~1881) 遣日使節의 일본인식 許東賢 (HUH Donghyun) 291

【Panel 4-1】 教育, 文化의 結節과 波及

- 佛教东传过程中的文化互动与选择 宋成有 (SONG Chengyou) 311
- 근대 초기 동아시아 대학에서 ‘文科’ 제도의 성립과 학과 편제
..... 柳浚弼 (RYU Junpil) 351
- 日治末期台灣的教育政策 許佩賢 (HSU Peih sien) 379
- 文化徵用与战时良心 柳書琴 (LIU Shuchin) 423

【Panel 4-2】 留學生과 知의 流通

- 近代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楊寧一 (YANG Ningyi) 463
- 1930년대 이후 독일유학생과 민족운동 朴贊勝 (PARK Chanseung) 489
-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對中國留日軍事學生政策研究 徐志民 (XU Zhimin) 511

• Panel 3-1 經驗世界的 共有와 認識의 變化

Moderator 尹炳男 (YOON Byungnam, 西江大)

Panelist-1 王元周 (WANG Yuanzhou, 北京大)
：安重根与中國 - 以程涓《安重根》一書爲中心
(안중근과 중국 - 청위의 『안중근』을 중심으로)

Panelist-2 徐勇 (XU Yong, 北京大)
：近代東亞的朝鮮因素与日本軍制變化
(근대 동아시아에서의 조선 요소와 일본 군제의 변화)

Panelist-3 柳時賢 (RYU Sihyun, 高麗大)
：中日戰爭 直後 植民地 朝鮮人の 滿洲와 中國에 關한 認識
- 崔南善의 旅行文을 中心으로

Panelist-4 李培德 (LEE Puitak, 香港大)
：競爭和合作 - 冷戰時期香港電影界的左派和右派
(경쟁과 합작 - 냉전 시대 홍콩 영화계의 좌파와 우파)

Panelist-5 柴璠 (CHAI Fan, 中國傳媒大)
：從近年來主流媒体報道看中國國際觀的發展變化
- 以亞洲的聲音呼喚和諧 世界的新秩序
(근대 주류 언론 보도에 나타난 중국의 세계관 변천 과정
- ‘조화로운 세계’라는 신질서를 외치는 아시아의 목소리)

Discussant 尹海東 (YUN Haedong, 成均館大)
朴薰(PARK Hun, 國民大)

安重根与中国

— 以程涓《安重根》一书为中心 —

■ 王 元 周 (北京大學校) ■

安重根与中国

— 以程涪《安重根》一书为中心 —

王元周(北京大學校)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行动在东北亚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中国人的韩国认识起到很大的影响。¹⁾ 正因为如此，不仅当时在中国的朴殷植和金泽荣等人著有安重根传记，在中国广为传播。中国人也出版了类似的传记，还以话剧等形式宣传安重根的事迹。然而，中国人对安重根事迹的认识过程其实也是在不同时期根据特定历史背景不断加以重新阐释的过程。

一种通常的阐释方式是通过赞扬安重根的义举而鼓舞国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勇气。然而在五四前后“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时代要求下，也产生了另外一种阐释方式，那就是从安重根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结局中觉悟出，除国贼比抗外敌更为重要。有一本程涪²⁾所编的小册子《安重根》就是这种阐释方式的代表。

程涪所编《安重根》虽然分量不大，只有四十多页，但是收录了很多社会名流的诗文，有的甚至不见于其文集。例如其中所收录的蔡元培的诗，1997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蔡元培研究会所编《蔡元培全集》就未曾收录，可见该书长期以来并未受重视。韩国独立纪念馆“韩国独立运动史情报系统”介绍了此书，³⁾但是误将为该书题签的郑沅⁴⁾当成编撰者，可见对书的内容也没有加以仔细研读。⁵⁾该书还被收入尹炳奭所编《安重根传记全集》⁶⁾之中，但是在注释中也同样将作者当成郑沅。即使在研究论文中，对于该书也缺乏详细的考订。韩国学者韩诗俊《中国人看安重根——以朴殷植与郑沅的〈安重根〉为中心》⁷⁾一文认为此书为郑沅编撰、出版，书中中篇的安重根《略史》等部分为郑沅所撰。中国学者金春善在《中国人对安重根义举的认识》一文中，也认为此书编撰者为郑沅。⁸⁾

鉴于上述情况，有必要对此书的编撰者和出版情况略加考证。而且，程涪(1870-1940)在《安重根》一书中所表达的主旨是通过朝鲜亡国一事劝告国人，以激烈手段对付国内的卖国贼和误国贼比对付

1) 参见拙著：《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径路与特征》，《东方学志》第132辑，2005年12月。

2) 程涪(1870-1940)，字白葭，号葭深居士，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早年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1900年沈仲力到山西主持洋务，程涪和李提摩太随行入晋，任山西报局总办，创办《晋报》和《山西白话报》。程涪喜藏书画，自己也擅长书法，还能刻印，有《程涪印存》一册传世。也喜作诗，与赵熙、易顺鼎多有唱和。晚年提倡孔教，1933年5月编辑《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由上海道德会出版。1934年程涪发表《读经救国论》上册，1935年又写成中册和下册，主张各级学校应首列经科。1940年程涪病歿于上海。

3) 据韩诗俊介绍，此书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孙科志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后，提供给尹炳奭，遂为韩国学者所知，其实此书不仅上海图书馆有收藏，北京的国家图书馆等处也有收藏。韩诗俊：《中国人看安重根——以朴殷植与郑沅的〈安重根〉为中心》，《忠北史学》第11·12合辑。

4) 郑沅，湖南长沙人，为晚清湖南名流之一。郑沅出生于名医世家，也是书香世家，光绪二十年(1894)一甲三名进士，曾任四川学政等职，辛亥革命时任南书房翰林。郑沅熟稔医理，还擅长书画，精鉴赏，书法为慈禧太后所赏识。

5) 在独立运动纪念馆网站的“韩国独立运动史情报系统”中，对于该书是这样介绍的：“中文，长沙郑沅所编，现藏上海图书馆。”

6) 尹炳奭编：《安重根传记全集》，(韩)国家褒勋处1999年版。

7) 韩诗俊：《中国人看安重根》《庆北史学》第11·12合辑。

8) 金春善：《中国人对安重根义举的认识》，《韩国近现代史研究》2005年夏季号(第33辑)。

外国侵略者更为要紧。程涪的这种认识得到不少人的响应，对于程涪等人的这种认识，也很有必要联系他们的生平和编书前后的中国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I

首先看一下《安重根》一书的编撰者到底是谁？这其实本不是问题，因为有上述各家学者误认为郑沅是编撰者，所以这里只好略加辨证。

其实程涪在后序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说：“余既辑安重根事略，为传而序之，同人多制文诗，以咏叹其事，都为一册，将付梓，又于中外报章，见重根弟定根所著血泪语。”⁹⁾而且《安重根》一书上篇中的序、《安重根传》和《后序》皆署名程涪，是为程涪的作品，当没有异议。上篇的各家题词，不仅上述引文足以证明也是程涪属人所作。王树枏所题诗的题目就是《题白菴居士韩义士安重根传后四十韵》，吴传绮题诗的题目是《侠烈行白菴居士属作》，都说明了与程涪的关系。易顺鼎的题诗以《题安重根传后》为题，昭陵僧的题诗以《次韵一厂居士题安重根传后》为题，唐桂有题为《白菴居士所作安重根传引荆卿留侯故事，其实二人亦人杰也，又赋二绝》的诗二首，也都说明为程涪所著《安重根传》所题。而且从后面的分析中也能够看出，各家所题诗文也多是针对程涪所主张的杀内奸胜于杀外敌的主旨。所以各家所题诗文也是程涪嘱托他们写的，是程涪收集整理的。根据《后序》，该书下篇附录中的安定根《血泪语》也是程涪“录之以附于传后”¹⁰⁾。

那么，中篇的内容是否像韩诗俊所认为的那样，是郑沅所整理的呢？其实从上面所引述的，程涪在《后序》中所说的“余既辑安重根事略，为传而序之”一语已经可以得知，这些也是程涪所辑录的。程涪在《序》中也说“余辄刺取中外报章，论次为传”¹¹⁾，也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上引《后序》中的一段话，也明确说明是程涪将他所辑录的安重根事略，自己所作《安重根传》和《序》，以及各家题词汇为一册，准备送去印刷的。唐桂在题诗中也有“矫矫程侯古君子，大推扶轮今莫比。昨宵示我一纸书，云是韩国男儿安氏重根之传记”¹²⁾的说法。这都说明《安重根》是程涪编撰和送去印刷的，郑沅除了为该书题写书名外，跟该书没有什么关系。程涪擅长书法，也喜欢收藏书画，结识不少书画名家。郑沅作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程涪请其题写书名本是情理中的事情。

要想弄清楚程涪编撰该书的背景，确定该书的出版时间甚为关键。由于该书没有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我们只能根据一些线索来加以推断。

对于该书的出版时间，韩诗俊推断为1920年左右。这是根据《新韩青年》创刊号的出版时间来确定的，因为该书收录了《新韩青年》上所登载的安定根的文章，而且在按语中明确说明该文最早发表于《新韩青年》创刊号。《新韩青年》创刊号共出版过两种，一种是1919年12月1日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一种是1920年3月1日在上海出版发行的。在1919年出版的《新韩青年》创刊号中没有安定根的文章，1920年3月1日出版的《新韩青年》创刊号中有安定根的《余之来华后感想》一文，内容与《血泪语》一致，只有个别文字上的不同。所以，推测此书出版于1920年3月1日以后。¹³⁾

韩诗俊的说法论据比较确凿，而金春善则忽视了《新韩青年》创刊号出版于1920年3月1日的事

9) 程涪：《后序》，《安重根》上篇，第4页。

10) 程涪：《后序》，《安重根》上篇，第5页。

11) 程涪：《序》，《安重根》上篇，第1页。

12) 程涪：《安重根》上篇，第8页，唐桂所题诗。

13) 韩诗俊：《中国人看安重根》，《忠北史学》第11·12合辑。

实,仅根据安定根文章中有“况且前年韩人在吉林省延吉县地方,呼独立万岁,秩序整然,毫无纷扰,而乃中国军队出而射之,当场即毙者十九人”之语,所说之事乃指1919年3月13日中国军警镇压龙井韩人示威一事,因此推断该书出版于1920年之后,20世纪20年代初。¹⁴⁾也就是说,金春善的估计至少比韩诗俊的估计要晚一年。然而金春善的结论仅仅根据“前年”这一用词来做依据,显得说服力不前,因为在韩国语中,“前年”也可以理解为“前一年”,也就是“去年”的意思。如果理解为“去年”,那么正好说明安定根的文章写于1920年初至3月1日之间。而且安定根在文章中也说,“余于十年后(据安重根死后十年后——笔者),因吾韩之独立运动,对于中国,不禁感想之流露,故达此悃款”¹⁵⁾,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1920年。我们只能肯定《安重根》一书出版于1920年3月1日以后,而不能肯定出版于1921年3月1日以后。

另外,书中所收录的一些人题诗,也可以反映出本书内容形成的时间。从前面所引《后序》中“将付梓,又于中外报章,见重根弟定根所著血泪语”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大体上得出结论说,该书所收其余内容大约在1920年3月1日以前已经形成了。

书中所收王树枏(1851-1936)《题白菰居士韩义士安重根传后四十韵》,又以《题程伯葭韩义士安重根传后四十韵》为题,收入王树枏《陶庐诗续集》卷十《斜街花市集》(陶庐丛刻二十,丁巳二月刊行)。《斜街花市集》为王树枏“戊午(1918)至己未(1919)”两年间所作,而咏安重根的诗编在了戊午年,即1918年。费树蔚(1883-1935)的诗中有“此事今十年”之句,指距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已经十年,所以大体上可以判断他的诗作于1919年。从排列顺序来看,王树枏的诗在《题词》中放在第一,而费树蔚的诗放在倒数第二。各家题词的排列顺序很可能是根据程洵收到题词的先后来排列的。

这里,梁启超的《秋风断藤曲》或是特例。梁启超的《秋风断藤曲》曾作为题词载于上海醒社出版的《朝鲜灭亡史》一书,该书虽然也没有表明出版年,但是书中注明《秋风断藤曲》作于庚戌年(1910)。此外,朴殷植所著《安重根传》¹⁶⁾在“选录”中也收入了梁启超的《秋风断藤曲》,该书最早于1914年在上海出版。由此可知,梁启超的《秋风断藤曲》与其他各篇不同,不是梁启超专为程洵《安重根传》所作,而是程洵将梁启超的旧作收入书中,所以置诸题词的末尾。

综上所述,大体上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程洵的《安重根传》和《序》作于1918年。除梁启超《秋风断藤曲》外,各家题词当作于1918年至1919年之间。程洵《后序》作于读到安定根《血泪语》之后,《安重根》一书付印也应该在1920年3月1日之后。书中之所以未表明出版社,应是因为此书本来是程洵自己出资印行的。程洵在1933年出版《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虽然是以上海道德会名义出版的,实际上是由社会各方面人士出资承揽印制的。

II

《安重根》一书分为上篇、中篇和下篇。上篇的主要内容是程洵所撰《安重根传》、《序》和《后序》,陶毅的《书安重根传后》,以及各家的《题词》,计有王树枏¹⁷⁾、吴传绮¹⁸⁾、易顺鼎¹⁹⁾、

14) 金春善:《中国人对安重根义举的认识》,《韩国近现代史研究》2005年夏季号(第33辑)。

15) 安定根:《血泪语》,程洵《安重根》下篇,附录二,第11页。

16) 沧海老纺室(朴殷植):《安重根传》,上海大同编辑局1914年版。

17) 王树枏(1851-1936),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人。光绪丙戌科进士,授户部主事,改任四川青神县知县、四川学政,累官至新疆布政使。辛亥革命后隐居北京,被赵尔巽聘为清史馆总纂。1936年2月卒于

昭陵僧、贾恩献、陶镛²⁰⁾、唐桂、蔡元培、狄郁²¹⁾、王照²²⁾、闵尔昌²³⁾、江亢虎²⁴⁾、姚季英、查士端²⁵⁾、汪洋²⁶⁾、王焘、陈锡麒、罗伽陵²⁷⁾、陈鸳鸯²⁸⁾、叶舟、程善之²⁹⁾、程美之、费树蔚³⁰⁾、梁启

北京西直门内寓所。著述甚多，除《畿辅通志》、《清史稿》外，有《文莫室诗集》、《陶庐文集》、《陶庐文内集》、《陶庐诗续集》等数十种。（王树枏：《陶庐老人随年录》，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姚渔湘、李满康：《王树枏传略》，《大陆杂志》24卷9期）

- 18) 吴传琦(1858-1934)，字季白，安徽怀宁人，后定居安庆。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历任国子监学录助教、湖南永绥厅同知、署湖南永宁府知府，后因患足疾辞官，返安庆定居。宣统元年(1909)在安庆风节井旁创办安庆女子师范学堂，并附设幼稚园，继而于大弓箭巷创设私立图书馆。曾任怀宁中学堂监督。民国八年(1919)担任《安徽商报》主笔。民国十二年(1923)冬担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并首创通俗教育馆。民国十七年(1928)离任。1934年病逝南京，著有《说文偶义》数十卷。
- 19) 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或石甫，一字中实，又字实父、中硕、硕甫、仲硕、易硕等称，自署忤斋，又自号眉伽，晚署哭庵，后改一庵，别署眉伽、龙阳才子、忤斋斋主人、湘南汉寿龙阳人、碧湖秋梦词人等，人多称其易五。湖南龙阳(汉寿县)城关镇人，父易佩绅曾任贵州按察使，是清朝著名儒将。五岁时即以神童闻名，著名诗人。光绪元年乙亥(1875)恩科举人。1888年后任三省河图总办等职。在甲午战争时因主战斥和而闻名，参与刘坤一军幕，作有《讨日本檄文》。甲午战争后，悲愤交集，入庐山，于三峡洞上筑琴志楼隐居。两湖总督张之洞招人幕府，任两湖书院分教。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被委任督办江阴江防，寻调驻陕西，督办江楚转运。二十八年，调任广西右江道。三十四年，授云南临安开广道，旋调任广东钦廉道。次年秋，署广东肇罗道，后移高雷阳道。辛亥革命后闲居北京，1915年9月曾与湖南官绅及立宪派人士61人联名上书。要求参事院要求恢复帝制，因此于1916年2月得以出任印铸局代局长、局长。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易顺鼎失意，漂泊京师，出入舞榭歌台，纵情声色。1920年逝于北京寓所。著有诗集《丁戊之间行卷》，《四魂集》等20多种，大都收入《琴志楼丛书》。（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7年版，第6页）
- 20) 陶镛(1895—1985)，名善镛，字咏韶，号镛，又号宏斋，别署冷月，陶渊明后人，江苏苏州人。祖父陶芑孙，叔祖陶珣孙均为吴中名画家。少从罗树敏习画，中西皆工，后与颜文梁切磋画艺，尤善写雪画月。1918年后担任长沙、南京、开封等大学教授，被蔡元培称为新中国画的开创者。建国后任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
- 21) 狄郁，河南才子，民初提倡孔教，著《孔教评议》。
- 22) 王照(1859-1933)，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河北宁河(今属天津)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曾参与戊戌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后又向清廷投案。此后以提倡官话合声字母而闻名于世，1913年袁世凯请他担任读音统一会副议长，该会根据他的《官话合声字母》提出拼音方案，1917年北洋政府批准实施。
- 23) 闵尔昌(1872-1948)，字葆之，清末曾入袁世凯幕，民初又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1927年后任教于辅仁大学。著有《云海楼诗存》、《雷塘词》等，并穷十年之力而编成的《碑传集补》六十卷。（金毓黻：《闵尔昌传》，《国史馆馆刊》1967年2卷1期）
- 24) 江亢虎(1883-1954)，名绍铨，别署无文、抗斧、康瓠，斋名无我庐、素宪堂，江西弋阳人，南社成员。清末任编译局总办、《北洋官报》总纂、刑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法部员外郎等职。1901年起多次到日本和欧洲留学、游历。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1910年提出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1911年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版《社会星》杂志。1911年11月组织中国社会党。1913年在中国社会党被解散后去美国，1921年去苏俄。1922年9月，江亢虎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1924年重组中国社会党，1925年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1926年解散。1927年夏，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学院院长及汉学主任教授。1939年参与汪伪政权，1946年以汉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著有《无我庐文存》、《无我庐诗存》、《江亢虎文存初编》等。
- 25) 查士端(1877-1961)，即查忠礼，浙江海宁袁花镇人，十二岁起寄养南京姑母家中，由姑母供其上学读书。辛亥时响应革命，参与创办学生军。1926年转入新闻界，在上海编《小日报》（查良安：《愿世界永远和平——父亲查忠礼逝世四十年祭》，《苏州杂志》2001年第6期）。
- 26) 汪洋(1878-1921)，字子实，别署影庐、影生、破园、石皮、听歌人，安徽旌德人，幼年起寄寓扬州，尝为小学教员，后投身报界，先在奉天(沈阳)主持《东三省日报》，鼓吹反清革命，1911年赴上海任《中华民报》总编辑。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后力主讨袁，频频发表激烈演说。二次革命失败后，无可谋置，于是应许世英(1872-1964)之邀北上，不久跟随许世英到福建，任教育科科长。后来许世英反对帝制，传说为汪洋所建议。段祺瑞组阁后，许世英入总交通，汪洋到上海任电政局监督。许世英退，汪洋也为人所攘。汪洋工诗文，为南社成员。也喜游历，曾到过西伯利亚，经贝加尔湖，过乌拉尔山，至彼得堡，还到过台湾和日本。1921年患病，误于庸医，四十三岁而卒。著有《息影枝谈》、《影生杂记

超等24人的题词，其中罗伽陵、陈鸳春、叶舟、程善之和程美之标明为女士。这是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些人背景差异很大，但是因为程涓早年即喜行走江湖，收藏名家书画作品，结识不少文人。后来又作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而李提摩太广泛结交中国权贵，程涓的交际面必然很广，能网络这些人为其《安重根传》题词也就不足为奇。

中篇程涓所辑录的有安重根生平、义举和公判的报章资料，分为《略史》、《行刺》和《公判》三部分。下篇为附录，附录一是《韩人杀卖国奴之历史》和《日本明治时代暗杀表》，前者主要是各报关于李在明行刺李完用的报道，以及李在明的有关情况。还特别列出《日本明治时代暗杀表》，以说明当时朝鲜人的行动与日本维新志士相似。附录二是从《新韩青年》上转录的安定根《血泪语》。

纵观上篇《安重根传》和中篇的内容，程涓所根据的大概是当时中外报章的报道，他自己也说：“余辄刺取中外报章，论次为传。”³¹⁾各报所报道的内容并非一致，所以对有些情况程涓也莫衷一是。例如关于安重根的出生地，《安重根传》中说安重根为韩国平安道镇南浦人。在中篇安重根《略史》中又称，有人说安重根和他的父亲都生于平安道州，还有人说生于中和，“现尚不能确知，要之为该处附近一带之产儿，可母疑也”³²⁾。实际上安重根出生于黄海道海州邑东门外，后来迁到黄

》、《台湾》等。(据郑逸梅《南社丛谈》之《南社社友事略·汪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152页；邵迎武：《南社人物吟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沃丘仲子著：《当代名人小传》，汪洋，崇文书局，1926，第148-149页)

27) 罗伽陵(1864-1932)，姓罗诗，后来简称姓罗，原名俪穗，亦作俪蕤，号伽陵。出生于上海，父亲路易是法国人，母亲是福建闽县人，幼年时父亲回法国，母亲病故，由母舅等人抚养成人，1886年与上海的英籍犹太人富商哈同结婚，居于旧上海知名的哈同花园——爱俪园。罗伽陵并不识字，但是也发表文章，应为人代撰。

28) 陈鸳春，同盟会成员。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北四川路湖州会馆成立，为了便于公开活动，陈鸳春与朱少屏、马相伯、陈其美等人于英租界汉口路之娉嫫里组成中国国民总会，公开招募志愿者组织“模范体操团”，以合法的身份倡导尚武精神，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29) 程涓在书中表明程善之为女士，不知是否有误。否南社成员中有名程善之者，但为男士，其生平如下：程善之(1880-1942)，名庆余，号小斋，别署一粟，斋名沅和室，祖籍安徽歙县，侨寓江苏扬州，南社成员。父程桓生曾两任两淮盐运使，三兄程锦武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文艺书法，名噪一时。程善之早年在父亲督责下非经书不读，非史册莫睹，后应试，寄宿业师家，始得私窥《红楼梦》、《花月痕》等书，颇涉遐想，便私效为稗官家言，成《骈枝余话》、《倦云忆语》、《清代割地谈》、《女革命吴淑卿》等。1896年补博士弟子员后，弃帖括之艺而留心当世之务。旋邀约同人，结社讲学，研究历代政治沿革。1908年至1912年任教于扬州府中学堂。期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执笔于《中华民报》，二次革命时参与孙中山戎幕，任簿书之劳，多所献替。二次革命失败后归隐扬州，杜门事母，不闻外事。三十岁以后皈依禅悦，结束风华，慎守绮语戒，较少写作，与胡朴安颇多质疑问难。1928年包明叔在镇江创办《新江苏报》，聘其为总主笔。1932年应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35年与陈含光、陈赐卿等一起任教于蒋太华办的扬州国学专科学校。1937年镇江陷落，随《新江苏报》社迁到泰州，后渡江到上海避难。在《新江苏报》服务期间积极宣传抗战，1938年在武进遭日伪“清乡”搜检，深受刺激。1942年4月12日由上海迁宜兴张渚，于常州途次因脑溢血病故。著有《沅和室文存》、《沅和室诗存》、《印度宗教史论略》、《四十年闻见录》。(据郑逸梅《南社丛谈》之《南社社友事略·程善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256页；邵迎武：《南社人物吟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80-281页；《肖维琪、顾一平：《南社中的扬州人》，1991年，第15-18页)不仅为程涓的《安重根》内有程善之的题诗，朴殷植所著《安重根传》选录里程善之的题诗。

30) 费树蔚(1883-1935)，字仲深，号韦斋，意取西门豹性急佩韦自缓之义。又因服膺明黄梨洲而号愿梨，又号左梨，左癖、迂琐，江苏吴江同里镇人，柳亚子表舅，19岁中秀才。吴大澂奇其才，将女儿吴本静嫁给他。民国4年(1915年)7月，费树蔚入北京政府肃政史，因与袁世凯长子克定同为吴大澂女婿，很得宠信。袁世凯僭号称帝，树蔚直言劝谏，未采纳。11月，拂袖而归，隐居苏州，与章太炎、金松岑、张仲仁等人诗文相质，与张仲仁被称为“苏州二仲”。16年5月8日，国民党军警密捕柳亚子，误将亚子妹夫凌诵益捕去，经费树蔚活动得营救。费树蔚曾任信孚银行董事长，吴江红十字会会长。1951年在柳亚子倡议下编印的《费韦斋集》，收集费氏诗词3000余首。(张仲仁：《费君仲深家传》，《制言》1935年5月，收入《心太平室集》卷四。傅增湘：《吴江费君墓志铭》，《国史馆馆刊》1948年1卷3期。)

31) 程涓：《序》，《安重根》上篇，第1页。

海道信川清溪洞，又迁到平安道三和鎮南浦。

除此之外，程涇《安重根传》中史实错误还有不少。程涇在《安重根传》中将安重根父亲的名字泰勋写成了“泰混”。程涇说安泰勋“信仰天主教，曾为庆尚南道镇海郡守，因大院君事，首倡排日主义，下狱论死”³³⁾。其实安泰勋是儒生，为进士，并没有做郡守。安泰勋信奉天主教，也是1895年以后的事情。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当时安泰勋组织乡勇保卫家乡，安重根也参与其事，身穿红衣，作战勇敢，被称为“天降红衣将军”³⁴⁾。事后，因某宰相要安泰勋归还被其挪用军饷的公谷，安泰勋不得已入法国人天主教堂，安重根在此时加入天主教。³⁵⁾此事跟大院君没有什么关系，更没有因此被处死。

既然安泰勋不曾被处死，程涇在《安重根传》中形容在父亲死后，“重根伶仃孤苦，窜伏平壤农家”³⁶⁾，在中篇《略史·刺客之家世》中说“安际家门破灭之后，生长于穷困中，少失怙恃，流离颠覆，备极艰辛，其艰苦卓绝之思，殆得于操心虑患之助者深矣”³⁷⁾，也就不符合事实。安重根家本来饶有家财，人口众多，只是在1895年之后安重根无心治产，一心提倡尚武精神，用家产购置枪械，组织乡里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又到各地寻访志同道合之士，组织团体，周济同仁，才导致家产荡尽，生计渐绌。³⁸⁾

类似的史实错误还有不少。例如程涇说，“金玉均、禹范善、朴镛和、李完用之被刺，重根皆左右其间”³⁹⁾，而其实金玉均在甲午战争之前为朝鲜朝廷派遣的洪鍾宇所刺杀，与安重根没有关系。相比之下，在史实方面尚不及1917年出版的杨南邨编撰的《世界亡国稗史》⁴⁰⁾一书中《韩国义士小传》的安重根传部分。由此看来程涇大概很少参考当时已经出版的朴殷植的《安重根传》或其他中国人的有关著述。

总体说来，程涇所编撰的《安重根》一书对研究安重根的史料价值不大。其实程涇的主旨亦不在于研究安重根的生平事迹或思想，除了辑录的资料外，程涇所撰《安重根传》其实不足千字，只占一页多的篇幅。他编撰此书的旨趣大概是借安重根的义举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各家所题诗文也表达了类似的倾向。这些内容，对了解中国人对韩国和安重根的认识，以及对了解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人对时局的认识与主张，倒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⁴¹⁾

III

对于编撰此书的目的，程涇在该书的扉页上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这本书，是说朝鲜的安重根，应当在没有亡国的时候刺杀李完用和李容九那班卖国贼，那就朝鲜不至于灭亡(在国里头捣乱的人是误国贼，他的罪与卖国贼一样)，等亡国后刺杀伊藤博文，那就来不及了，徒然叫朝鲜亡的更快。孟子

32) 程涇：《安重根》中篇，略史，刺客之家世，第1页。

33) 程涇：《安重根》上篇，安重根传，第1-2页。

34) 朴殷植：《安重根传》，《朴殷植全书》中，第569页。

35) 朴殷植：《安重根传》，《朴殷植全书》中，第569页。

36) 程涇：《安重根传》，《安重根》上篇，第2页。

37) 程涇：《安重根》中篇，略史，刺客之家世，第1页。

38) 朴殷植：《安重根传》，《朴殷植全书》中，第571页。

39) 程涇：《安重根》上篇，安重根传，第2页。

40) 上海交通图书馆1917年初版，1928年上海进益学社将此书改名为《亡国痛史》再版。

41) 上述金春善的论文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他把整本书的内容都视为五四运动以后的产物，所以在分析时不免出现偏差。

不是说的么，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自己有取灭亡之道，与伊藤博文有什么相干呢？爱国男儿，不可不早注意。”

从书中各家序跋和题词来看，同意程涓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首先陶毅就在《书安重根传后》中就表明自己对于程涓所撰《安重根传》，“尤喜其发端弁言，与余心不谋而合”⁴²⁾。陶毅也认为安重根的成绩胜过刺杀秦始皇的荆轲，而见识不及刺杀秦桧的施全。施全认为，“与其舍身以毙外敌，而无数之外敌不可歼也。毋宁舍身以毙内奸，而足令同时倚附内奸，后此接踵内奸，恃卖国媚敌为营业者，有所惩儆畏忌，顾生命而不敢效尤。然后可以鼓奋全国民心，期其协力同仇，抵御强邻，无忧掣肘，亡国之祸，庶可少纾乎。”⁴³⁾而对于安重根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毙一伊藤，足以抒忿，不足以救亡，且适以速朝鲜之亡，则视荆轲之劫刺秦王不成，徒捐躯以速燕之亡者，所胜几何？”⁴⁴⁾所以陶毅也是主张像安重根这样的义烈之士，应像施全那样“不仇外敌而仇内奸”。陶毅甚至设想，“然使安重根而具有施全之见地，挟其便利之械，命中之技，先时内向以毙李完用、李容九诸奸，忠义既倡，群情激发，廓清积弊，国犹可为，岂不胜于击杀日本统监，以身殉兼以国殉哉！”

吴传绮也在《侠烈行白菴居士属作》也对程涓的上述看法评论说，“程侯伟论进一解，感慨兴亡心怆怆。”⁴⁵⁾吴传绮也觉得，“安重根如有大志，自强对外早陈情。暗杀只可以对内剪除奸党免危倾”。对于李容九、李完用一班卖国贼，如能“未亡之时能一击，斯真电射雷霆碎。朝鲜人心全震动，无力犹可强支撑。今毙伊藤敌无损，徒死似乎失重轻。”⁴⁶⁾

贾恩馥也在诗中强调卖国贼的祸害大于外敌，所以也接受程涓的看法。他感叹道：“所惜重根计太拙，当时若先除内患，无多头颅数寸铁。鬻国发身身辄碎，诸贼错愕争改节。虎绝侏兮鸟无囿，大好金瓯何由缺？惜哉但知杀伊藤，家贼毫发伤不曾。”⁴⁷⁾

此外唐桂、姚季英、陈锡麒也同意程涓的主张。唐桂以为“鸩媒虎侏尽驱除，强邻欲攫攫不得”⁴⁸⁾。姚季英在诗中也有“志决身歼亦可悲，亡羊毕竟补牢迟”之句。陈锡麒在诗中也说：“巨奸袞袞尸高位，忠义空存侠烈年，三十六人皆壮士，早应歃血洗贪泉。”⁴⁹⁾蔡元培在诗中也强调国必自伐而人伐之，感叹安重根之义举终无法挽救韩国之覆亡，似乎也同意程涓的看法。蔡元培在诗中谴责当权的卖国贼说：“痛彼秉钧，金壬是倚。政教既丧，邦社绝纪。利害之间，毫厘千里。或以自灭，争权相倚。譬诸物腐，来攘者蚁。”又对安重根之义举感叹道：“哀我多默，伤心切齿。发兹孤愤，终莫延祀。吁嗟乎烈士！”⁵⁰⁾

陶镛虽在原则上同意程涓杀卖国贼的主张，但在诗中也同时感叹杀卖国贼亦非易事，因而感叹：“我闻此语长太息，拔山去奸佞堪难论。”⁵¹⁾狄郁则明确反对因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而导致韩国速亡的主张，“韩国遂亡或咎君，斯言奇谬吾弗录”。但是也称赞程涓“谓当移锋毙内奸，词挟风霜义尤足。百世奋兴来轸迺，英雄感力良堪卜”⁵²⁾。只有费树蔚表达了与程涓不同的看法，认为杀李完用等卖国

42) 陶毅：《书安重根传后》，程涓《安重根》上篇，第4页。

43) 陶毅：《书安重根传后》，程涓《安重根》上篇，第3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下同)，可见陶毅或程涓有意加以强调。

44) 陶毅：《书安重根传后》，程涓《安重根》上篇，第3页。

45) 吴传绮：《侠烈行白菴居士属作》，程涓《安重根》上篇，第6页。

46) 吴传绮：《侠烈行白菴居士属作》，程涓《安重根》上篇，第6页。

47) 程涓：《安重根》上篇，第7页。

48) 程涓：《安重根》上篇，第9页。

49) 程涓：《安重根》上篇，第12页。

50) 程涓：《安重根》上篇，第10页。

51) 程涓：《安重根》上篇，第8页。

52) 程涓：《安重根》上篇，第10页。

贼不如杀伊藤博文，因为卖国贼也是在外敌的引诱下而出现的，即“谁悬利禄招，使我人心死？擒贼当擒王，在彼不在此”⁵³⁾。但是费树蔚也认为，“斩佞犹可为，讐邻可以已，事与安氏殊，未须轻比拟，危哉苞桑系，在此不在彼，正虑朝野间，唾为迂谈耳。”⁵⁴⁾

程涪之所以主张杀内奸、卖国贼，其实是针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的。他的这种意图，在序言中表述得很清楚。他强调自己所以为文表扬安重根，“意在示天下后世凡不忍自亡其国者，当先推刃于敢于自己亡其国之人，而敢于自亡其国者，亦当憬然于国中或亦有安重根其人者在，乌乎，可以惧矣！”⁵⁵⁾

其他为程涪的《安重根传》题词的人也很清楚程涪的意图，如吴传绮在诗中说：“我闻是语长太息，相对无言心欲醒。请君大呼震聋聩，水上钟鼓声噌吰。无那沉迷多不醒，我为同胞忧惓惓。”⁵⁶⁾ 贾恩馥也说：“程侯此传意有在，世人熟视唤不应。我更疾呼诏天下，弱者可劝强者惩。请书万本诵万遍，定卜一言邦可兴。”⁵⁷⁾ 易顺鼎在诗中也说明程涪作《安重根传》并不仅仅是为了表扬侠烈，而是要借此警告国内的卖国贼。他说：“程侯作传用意别，用意不止重侠烈。乃借侠烈警奸慝。如修春秋惧乱贼，更为侠士留楷则。”⁵⁸⁾ 昭陵僧在《次韵一厂居士题安重根传后》中说：“程侯华袞乃特别，惟恐岁久湮忠烈，词挟风霜警邪慝，万古唾骂卖国贼。”⁵⁹⁾ 并进而希望中国能出安重根这样的侠烈之士来惩治卖国贼。他说：“支那陆沉非一日，欲觅斯人绣未得，使我歔歔长叹息。”唐桂甚至感叹“中原狐鼠何其多，殛狐殛鼠手无斧柯。呜呼，手无斧柯兮奈若何？中原狐鼠何其多！”⁶⁰⁾ 陈锡麒在诗中也发如此感叹：“一回索句一回首，霸气消沉望九州。安得先生千万万，各拼身手碎仇讐。”⁶¹⁾

那么，程涪、陶毅所称的中国国内的卖国贼指的是哪些人呢？安定根在《血泪语》中批评中国人“勇于排除满清而怯于对外人”，“今中国之伟人，鲜有不罹畏日病者”，主张以武力反抗日本之侵略。安定根大声疾呼：“呜呼，欲救今日之中国，必激励民志，培养民气，以四万万人之热血，对付岛族而后可。苟非然者，诸般政策，皆虚文空谈，无济于事，而其究也陷于自灭而已，所谓一言而兴邦者，其流血之谓乎。”⁶²⁾ 对于安定根的这篇文章，程涪在《安重根传·后序》中说，此文“读之令人凄绝，若真有殷然血泪浣映楮墨间”⁶³⁾。在按语中也称此文“言言金石，字字血泪，读之真足令国人返省也”⁶⁴⁾。并明确说明：“抑血泪语非第勗励韩人，且谆谆以媚强凌弱不啻自残之义告诫华人。吾华人岂竟无人与安氏同其志行，同抱义愤者乎？如有之，能不闻其风而兴起乎？顾起视吾国衮衮台省，扰扰封疆，鲜不畏媚强邻，如鼠如狐。残虐邦众，竞攘公殄，索我民于枯肆，既竭泽而犹渔。内讧竞起，外患乘虚，举国已殷覆亡之忧，而彼且死守其宁致亡国不让权利之意，以视朝鲜李完用、李容九卖国之徒，曾不少异。舆论无如之何，官箴无如之何，国法亦无如之何，惟望有爱国义侠之士，相与流血五步，或可稍微凶顽耳。假令安氏生于吾华今日，其不屑语之以血，而毅然饮之以铁也必矣；其不暇以铁血向伊藤而先移以内怨变本加厉之李完用、李容九辈也，又不待言矣。”⁶⁵⁾

联系到1918-1919年前后的中国现实，很明显程涪所说的中国的卖国贼、误国贼指的是北洋军阀和

53) 程涪：《安重根》上篇，第13页。

54) 程涪：《安重根》上篇，第13页。

55) 程涪：《安重根》上篇，序，第1页。

56) 吴传绮：《侠烈行白菴居士属作》，程涪《安重根》上篇，第6页。

57) 程涪：《安重根》上篇，第7-8页。

58) 易顺鼎：《题安重根传后》，程涪《安重根》上篇，第7页。

59) 昭陵僧：《次韵一厂居士题安重根传后》，程涪《安重根》上篇，第7页。

60) 程涪：《安重根》上篇，第9页。

61) 程涪：《安重根》上篇，第12页。

62) 安定根：《血泪语》，程涪《安重根》下篇，第10-11页。

63) 程涪：《后序》，《安重根》上篇，第4页。

64) 程涪：《安重根》下篇，第8页。

65) 程涪：《后序》，《安重根》上篇，第4-5页。

地方军阀，尤其是其中的亲日派。1918年5月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日本侵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引起了留日学生的罢学归国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亲日派被国人指为卖国贼，中国舆论普遍声讨卖国贼，在这期间也常常拿朝鲜作例证。⁶⁶⁾而程潜作为一位保守文人，在1918年即号召以激烈手段对付亲日的卖国贼，并得到不少文人的响应，则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气氛的变化，人们普遍希望以直接行动、非常手段对抗北洋军阀。从这里出发来看五四运动当时示威学生烧火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也就更容易理解。

在大革命兴起之前，一般人对于中国的政治前途并不清楚，作为程潜这样的保守文人更是不会想到国民革命的，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侠烈之士。王树枬在诗中说明“程君喜任侠”⁶⁷⁾。这样，程潜自然会想到中国人普遍视为侠士的安重根，程潜作《安重根传》的动机大概在于此。

不仅程潜崇尚侠义，为程潜《安重根传》题词者也皆如此，不少人本身就有义侠之气。易顺鼎感叹“文儒武侠古并列，儒不如侠非一日”⁶⁸⁾。易顺鼎本人也颇有侠气。甲午战争时愿率军乘木筏飘海踏平东京，后来又到台湾抗击日军。他曾评价自己说：“综其生平二十餘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处，其师友谑之，称为‘神龙’。其操行无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⁶⁹⁾程善之也曾在《春日杂感诗》中自述其早年经历：“我生始束发，便思万里行。富贵非所恋，抗怀在功名。十岁学书史，耻以文章鸣。十四学击剑，十六能谈兵。二十负奇节(奇气)，目空一世人。尔来十年余，踟蹰终无成。材力日苦弱，意气徒纵横。优游幸卒岁，已有妻孥情。生不五鼎食，死不五鼎烹。吁嗟明镜中，搔首令人惊。”⁷⁰⁾可见易顺鼎、程善之少年时皆颇有侠义之气概。抗战时期闵尔昌隐居北京，几年间足不出户，连到中央公园也认为是失节。他幻想着美国飞机来轰炸，就是把自己炸死也在所不惜，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民族气节。⁷¹⁾

蔡元培早年更是热衷暗杀，觉得革命只有暴动和暗杀两条路，“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⁷²⁾1904年夏秋间蔡元培自己也曾参加暗杀团，秘密试制炸弹。⁷³⁾实际上，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支持学生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爱国热诚。⁷⁴⁾

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程潜等人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如前所述，他们对侠义之士的呼唤，大概

66) 例如北大学生曾向北京市民讲演《李完用与朝鲜》(《五四爱国运动》附录，宣言，北京学生界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2页)，1919年5月6日《晨报》发表了《高丽与中国的比较》一文，指出卖国派为亡国之罪魁祸首。声讨卖国贼时想到朝鲜自然也会想到安重根。五四运动时期各地学生演出的话剧就有《安重根》、《高丽亡国史》、《朝鲜亡国恨》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83-785页)。

67) 王树枬：《题白菽居士韩义士安重根传后四十韵》，程潜《安重根》上篇，第5页。

68) 易顺鼎：《题安重根传后》，程潜《安重根》上篇，第6-7页。

69) 易顺鼎：《哭庵传》，王文濡选编，程大琬、马美著校注：《续古文观止》，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19页。

70) 肖维琪、顾一平：《南社中的扬州人》，1991年，第112页；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

71) 郑振铎：《吴佩孚的生与死》，《郑振铎全集》第二卷，蛰居散记，补遗，五，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72)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73) 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4页。

74) 据何思源回忆，1919年5月2日蔡元培校长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讲述巴黎和会将对不利，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叶景莘、梁敬簪、郑天挺、唐伟等人回忆，是蔡元培将北洋政府训令陆征祥等专使签约之事告诉北大学生，由此引发了五四运动(参见高平叔在《蔡元培年谱长编》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197页)。

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大革命兴起之前，一般文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又找不到政治出路者所能想到的斗争手段。易白沙⁷⁵⁾在1921年只身到北京伺机行刺北洋军阀头目，也可以说是程涓等所期望出现的义士之一。

IV. 结语

安重根的义举对中国人震动颇大，程涓和为程涓《安重根》一书题词的二十多人都高度赞扬安重根的侠义行为，人们将他与荆轲、张良相比，“而安重根之姓氏，则视荆卿留侯而尤显”⁷⁶⁾。安重根的义举也改变了中国人对韩国人的印象。吴传绮在诗中说：“安重根万世名，朝鲜出此侠烈士，朝鲜虽亡亦有荣。”⁷⁷⁾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的艳羡之情，皆希望中国也能有安重根这样的侠烈之士出现，王照感叹：“怜我中原黯无色，故为荆聂泣归魂。”⁷⁸⁾然而结合中国当时形势，他们对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效果也有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杀内奸比杀外敌更重要，所以希望中国能有侠烈之士出来剪除卖国贼，以为这才是挽救民族危亡之急务。这些人经历和思想背景差别很大，所以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他们对铁血主义的呼唤，显示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国内政治气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预示着一场新的大革命即将兴起。

75) 易白沙(1886-1921)，原名坤，字越村，湖南长沙人。曾应吴传绮之邀到安徽主持怀宁中学，继为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堂校长。辛亥革命后参与组织青年军，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与章士钊编《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1915年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选出民主与科学。后来任南开、复旦等大学教授。因不满于军阀混战，1919年归湘，于麓山僻处独居，意气沉郁。1921年孙中山函邀共事，亦未遽应。后只身赴京，伺机行刺北洋军阀头目，未果。遂于是年端午节蹈海自尽。

76) 程涓：《序》，《安重根传》上篇，第1页。

77) 吴传绮：《侠烈行白菴居士属作》，程涓《安重根》上篇，第6页。

78) 程涓：《安重根》上篇，第10页。

안중근과 중국

- 청위(程滄)의 저서 『안중근(安重根)』을 중심으로 -

王元周 (北京大學校)

안중근의 이토 히로부미(伊藤博文) 저격은 동북아 근대사에서 중대한 의미를 갖는 사건으로, 특히 한국에 대한 중국인들의 인식에 큰 영향을 끼쳤다.¹⁾ 바로 이 때문에 당시 중국에 있던 박은식(朴殷植)과 김택영(金澤榮) 등이 펴낸 안중근 전기(傳記)가 중국에서 널리 읽혔다. 중국인들 역시 유사한 전기를 출판하였으며, 연극 등 다양한 형태로 안중근의 의거를 널리 알렸다. 하지만 안중근의 의거에 대한 중국인의 실질적인 인식 과정을 살펴보면, 시기별로 중국의 특수한 역사적 배경 속에서 끊임없이 재해석되는 과정을 보여준다.

가장 일반적인 해석은 안중근의 의거를 높이 평가하면서 이를 통해 외세 침략에 대한 민중의 저항 의지를 북돋는 방식이었다. 하지만 5·4운동을 전후하여 “안으로 매국노를 처단하고, 밖으로 열강에 항거한다”는 시대적 요청에 따라 새로운 해석 방식이 나타났다. 그것은 바로 안중근만으로는 (조선) 민족을 멸망의 위기에서 구할 수 없었다는 사실을 통해, 외세에 대한 저항보다 내부의 매국노 처단이 더 중요하다는 깨달음이었다. 청위(程滄)²⁾이 펴낸 『安重根』이라는 제목의 소책자가 바로 이러한 해석 방식을 대표적으로 보여준다.

청위가 편찬한 『安重根』은 비록 분량은 많지 않아 겨우 40여 페이지에 불과하며, 수많은 사회 명사들의 시문을 헌사로 수록하였지만 그 가운데 일부는 심지어 자신의 문집에도 실리지 않은 경우도 있다. 일례로 수록된 헌사 가운데 채원배의 시는 1997년 절강교육출판사(浙江教育出版社)에서 출판한 중국채원배연구회(中國蔡元培研究會)에서 펴낸 『채원배전집』에는 수록되어 있지 않아, 이 책이 오랫동안 주목받지 못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한국 독립기념관의 ‘한국 독립 운동사 정보 시스템’은 이 책을 소개하였지만,³⁾ 이 책의 제목을 쓴 정원(鄭沅)⁴⁾을 편저자로 잘못 기록하였다. 따라서 이 책의 내용에 대해서 세심하게 읽고

1) 줄고 「近代中國人的韓國認識：徑路與特征」, 『東方學誌』 제132집, 2005년 12월 참고.

2) 청위(程滄, 1870~1940)의 자는 백가(白藹)이고 호는 가심거사(葛深居士)로, 강소(江蘇) 양호(陽湖, 지금은 武進縣) 사람이다. 젊어서 영국 선교사인 리차드 티모시(Richard Timothy)의 중국어 비서로 일한 적이 있으며 1900년 심충력(沈仲力)이 산서(山西)에서 양무운동(洋務運動)을 전개할 때 티모시와 함께 이에 합세한 청위는 산서보국(山西報局) 총판(總辦)을 맡아 『晉報』와 『山西白話報』를 창간하였다. 서화를 즐겨 수집하였던 청위는 스스로도 서예에 조예가 깊었으며, 각인(刻印)에도 능하여 『程滄印存』이 대대로 전해지고 있다. 또한 시를 즐겨 지었던 그는 조희(趙熙) 및 이순정(易順鼎) 등과 함께 시를 주고 받기도 하였다. 만년에 공교(孔教: 19세기말 유교 개혁 운동-역자주)에 심취한 청위는 1933년 5월 『歷代尊孔記孔教外論合刻』을 상해도덕회(上海道德會)에서 출판하였다. 1934년 청위는 『讀經救國論』 상권을 출판하고, 이어 1935년 중권과 하권까지 펴낸 후 각급 학교에서 최우선 과목으로 삼아 가르쳐야 한다고 주장하였다. 1940년 청위는 상해(上海)에서 병으로 생을 마감하였다.

3) 한시준의 소개에 따르면, 이 책을 복단대학(復旦大學) 사학과 손과지(孫科誌)가 상해도서관(上海圖書館)에서 발견한 이후, 윤병로(尹炳奭)에게 보여주면서 한국학자들에게 점차 알려지기 시작하였다. 그러나 이 책은 상해도서관뿐 아니라 북경의 국가도서관(國家圖書館) 등에서도 소장하고 있었다. 韓詩俊, 「중국인이 본 안중근~박은식과 정원의 『安重根』을 중심으로」, 『忠北史學』, 제11·12집 합본.

연구하지 않았다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다.⁵⁾ 이 책에 대해 윤병로(尹炳瑯)가 펴낸 『안중근 전기 전집』⁶⁾도 역시 역주에서 저자를 정원으로 보고 있다. 연구 논문조차도 이 책에 대해 상세한 고증이 결여되어 있다. 한국학자 한시준(韓詩俊)의 논문 「중국인이 본 안중근-박은식과 정원의 ‘安重根’을 중심으로」⁷⁾에서는 이 책을 정원이 모아서 출판한 것으로 보고, 이 책의 중간 부분인 안중근 「略史」 등도 정원이 쓴 것으로 보고 있다. 중국학자 김춘선(金春善) 역시 「안중근 의거에 대한 중국인의 인식」에서 이 책의 편저자를 정원으로 보고 있다.⁸⁾

이상과 같은 상황을 감안하여, 이 책의 편저자와 출판 상황에 대해 약간의 고증이 필요할 것이다. 게다가 청위(1870-1940)이 『安重根』을 통해 보여준 취지는 조선 망국이라는 사건을 통해 중국인에게 보다 격렬한 방법으로 국내의 매국노를 처단하는 것이 외국 침략자에 대한 저항보다 더 긴급하다는 점을 알리고자 하는 데 있었다. 청위의 이러한 인식은 많은 이들의 호응을 받았으며, 청위 등의 이러한 인식은 또한 그들의 발자취와 이 책을 펴내던 시기를 전후한 중국 국내 정치적 상황과도 연관해 간략하게나마 분석할 필요가 있다.

I

먼저 『安重根』을 편찬한 이가 과연 누구인가를 살펴보기로 하자. 사실 이는 문제조차 되지 않는다. 하지만 상술한 많은 학자들이 정원을 편저자로 잘못 알고 있어, 먼저 간단히 이 부분을 짚고 넘어가기로 하자.

청위는 후기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분명하게 밝히고 있다. “내가 안중근 사략을 모아 전기의 머리말로 삼고 동인들과 시를 지어 그 일을 읊어 한 권의 책으로 모아 발간하고자 하는데, 또한 국내외의 신문 잡지에서 안중근의 아우 정근이 쓴 ‘혈루어’를 발견하였다.”⁹⁾ 또한 『安重根』의 상권의 서문과 「安重根傳」 및 후기에 모두 ‘청위’ 이라고 서명이 되어 있으므로, 그의 작품이라는 데에는 이견이 있을 수 없다. 상권에 실린 전문가들의 헌사 역시 상술한 인용문에서 증명된 바와 같이 청위와 관계된 사람들의 작품이다. 왕수남(王樹栢)의 헌사 「題白菴居士韓義士安重根傳後四十韻」과 오전기(吳傳綺)의 헌사 「俠烈行白菴居士屬作」는 모두 청위의 자(字)인 ‘백가거사’를 직접적으로 언급하여 청위와의 관계를 설명하고 있다. 역순정(易順鼎)의 헌사 역시 「題安重根傳后」를 제목으로 삼고 있고, 소릉승(昭陵僧)의 헌사 역시 「次韻一庵居士題安重根傳后」가 제목이며, 唐桂有는 「白菴居士所作安重根傳引荆卿留侯

4) 정원(鄭元), 호남(湖南) 장사(長沙) 사람으로, 청나라 말기 호남 지역의 명사. 정원의 집안은 대대로 명의(名醫)와 학자를 배출하였다. 광서(光緒) 20년(1894) 진사(進士)에 오르고 사천학정(四川學政) 등을 역임하였다. 신해혁명(辛亥革命) 당시 남서방(南書房) 한림(翰林)을 맡고 있었다. 정원은 의학을 깊이 연구하였을 뿐 아니라 서화에도 능하여, 서태후가 그의 글씨를 좋아했다고 한다.

5) 독립기념관 홈페이지의 ‘한국 독립운동사 정보 시스템’에서 이 책에 대해서 “중국어, 장사(長沙) 정원(鄭元) 편찬, 현재 상해도서관(上海圖書館) 소장”이라고 소개하고 있다.

6) 尹炳瑯 편, 『安重根傳記全集』, (한국) 국가보훈처 1999년 판.

7) 韓詩俊, 「중국인이 본 안중근」, 『慶北史學』, 제11·12 합본.

8) 金春善, 「안중근 의거에 대한 중국인의 인식」, 『韓國近現代史研究』, 2005년 夏季號(제33집).

9) 程涓, 「后序」, 『安重根』上篇, 4쪽.

故事, 其實二人亦人杰也, 又賦二絕」을 제목으로 시 두 수를 지었다. 모두 제목에 청위가 지은 「安重根傳」이 들어가 있다. 또한 뒷 부분의 분석을 통해 알 수 있듯이, 여러 명사들의 헌사는 대부분 외부의 적 살해보다는 내부의 매국노 살해가 시급하다는 청위의 주장에 대한 내용이었다. 이들이 헌사를 지은 것도 청위의 부탁에 따른 것이며, 이를 청위가 수집하여 정리하였다. 후기의 언급을 보면, 이 책의 하권에 수록한 안정근의 「血淚語」 역시 청위가 “安重根傳의 후기로 수록한”¹⁰⁾ 것이다.

그렇다면 「安重根傳」의 내용은 한시준(韓詩俊)의 해석처럼 정원이 정리한 것일까? 사실 이미 상술한 바와 같이, “내가 안중근 사략을 모아 전기의 머리말로 삼고” 라고 밝히고 있는 청위의 후기에서 역시 청위가 편집하고 수록한 것임을 알 수 있다. 또한 청위가 서문에서 “내가 국내외 신문과 잡지를 두루 섭렵하고 주석을 달아 전기로 펴냈다.”¹¹⁾고 밝힌 부분 역시 이를 뒷받침하고 있다. 또한 위에서 인용한 후기의 일부 표현을 보면, 청위는 자신이 편집 수록한 안중근 사략을 자신이 지은 「安重根傳」과 서문 및 여러 사람들의 헌사를 하나로 묶어서 인쇄소에 보낼 준비를 하였다. 당계(唐桂)는 헌사에서 “청위는 지금 누구도 따를 수 없을 정도로 용감하게 역사의 수레바퀴를 돌리고 있다. 어제 밤에 나에게 책 한 묶음을 보여주면서 한국 대장부인 안중근의 전기라고 하지 않는가.”¹²⁾라고 말하고 있다. 이는 『安重根』을 직접 청위가 편찬하고 인쇄소에 보냈으며, 정원은 단지 제목을 붓글씨로 썼을 뿐 이 책과는 별다른 관계가 없음을 보여준다. 청위는 서예에 능하고 서화 수집에 조예가 있어 많은 서예가와 화가와 교류가 있었다. 정원은 당시 유명한 서예가였기 때문에, 청위가 그에게 책의 제목을 부탁한 것은 이상할 것이 없었다.

청위가 이 책을 펴낸 배경을 보다 명확히 하기 위해서는, 이 책의 출판 시기 파악이 매우 결정적일 것이다. 청위가 펴낸 『安重根』에는 출판사와 출판연도 등이 나타나 있지 않아, 우리는 여러 실마리를 통해 추정할 수 밖에 없다.

이 책의 출판 시기를 한시준은 1920년 경으로 추정하고 있다. 이는 『新韓青年』 창간호의 출판 시기를 근거로 추정한 것인데, 『安重根』에 『新韓青年』에 실었던 안정근의 글이 수록되어 있고, 안정근의 글에 그 글이 『新韓青年』 창간호에 최초로 실렸다고 분명하게 밝히고 있기 때문이다. 『新韓青年』 창간호는 모두 두 종이 출판되었다. 한 종은 1919년 12월 1일 상해에서 출판된 것이고, 다른 한 종은 1920년 3월 1일 상해에서 출판된 것이다. 1919년 출판된 『新韓青年』 창간호에는 안정근의 글이 없으며, 1920년 3월 1일 출판된 『新韓青年』 창간호에는 안정근의 「余之來華后感想」이 실려 있는데, 그 내용이 단지 몇 글자만 다를 뿐 「血淚語」와 일치한다. 따라서 『安重根』의 출판 시기를 1920년 3월 1일 이후로 추정한다는 것이다.¹³⁾

한시준의 설명에는 근거가 명확한 편이지만, 김춘선은 『新韓青年』 창간호가 1920년 3월 1일에 출판되었다는 사실을 간과한 채, 단지 안정근의 글에서 “게다가 전년(前年) 조선인이 길림성(吉林省) 연길현(延吉縣)에서 질서 정연하게 독립 만세를 외쳤을 뿐 결코 소동을 일

10) 程滄, 「后序」, 『安重根』上篇, 5쪽.

11) 程滄, 「后序」, 『安重根』上篇, 1쪽.

12) 程滄, 『安重根』上篇, 8쪽, 당계(唐桂)의 헌시

13) 韓詩俊, 「중국인이 본 안중근」, 『慶北史學』, 제11·12 합본.

으키지 않았는데도 중국 군대가 출동하여 이들에게 총을 쏘아 현장에서 즉사한 자가 19명이었다.” 라는 구절을 보고, 여기서 설명하고 있는 사건을 1919년 3월 13일 중국 군경이 용정 조선인 시위를 진압한 일로 보고, 이 책의 출판을 1920년을 넘긴 시기 즉 1920년대 초로 추정한 것이다.¹⁴⁾ 다시 말해 김춘선이 추정하는 출판 시기는 한시준의 추정보다 최소한 1년 이후인 것이다. 하지만 김춘선의 결론은 ‘전년(前年: 중국어로는 재작년의 뜻-역자주)’이라는 단어 하나를 근거로 삼고 있어 설득력이 부족하다는 사실이 드러난다. 한국어에서 ‘前年’은 ‘그 전 해’ 즉 ‘작년’의 의미로도 해석될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만약에 ‘작년’으로 해석한다면, 안정근의 글이 1920년 초부터 3월 1일 사이에 작성되었다는 사실을 설명하는 셈이다. 게다가 안정근은 이 글에서 “나는 10년 후(안중근 사후 10년 후-필자), 우리 조선의 독립 운동이 중국에게 감회어린 눈물이 흐르는 것을 막을 길이 없는 고로 이에 다다르기를 간절히 바란다”¹⁵⁾고 말하고 있어, 글자 그대로 해석해 1920년으로 보아야 한다. 따라서 우리는 『安重根』의 출판 시기를 1920년 3월 1일 이후로 추정할 수 있을 뿐, 1921년 3월 1일 이후로는 볼 수 없다.

이 밖에도 이 책에 수록한 여러 명사들의 헌사에 이 책의 내용이 작성된 시기를 보여주는 부분이 있다. 앞에서 인용한 후기에서 “한 권의 책으로 모아 발간하고자 하는데, 또한 국내외의 신문 잡지에서 안중근의 아우 정근이 쓴 ‘혈루어’를 발견하였다.”는 부분을 통해 우리는 이 책에 수록된 나머지 내용은 1920년 3월 1일 이전에 이미 작성되었다고 추정할 수 있다.

이 책에 수록된 왕수남(王樹柟, 1851-1936)의 「題白菴居士韓義士安重根傳後四十韻」은 「題程伯菴韓義士安重根傳後四十韻」라고도 하는데, 그의 『도려시속집(陶廬詩續集)』 권10 「사가화시집(斜街花市集)」(陶廬叢刻二十, 丁巳년 二月 간행)에도 수록되어 있다. 「사가화시집」은 왕수남이 “무오(戊午, 1918)년에서 기미(己未, 1919)년”의 2년간 지은 것으로, 안중근에 대한 헌사는 무오년, 즉 1918년에 지어졌다. 비수울(費樹蔚, 1883-1935)의 헌사 가운데 “이 일이 올해로 10년이다”라는 구절은 안중근의 이토 히로부미 저격 사건이 일어난 지 벌써 10년이라고 말하고 있어, 대략 그의 헌사가 1919년쯤 지어졌음을 알 수 있다. 배열 순서로 볼 때 왕수남의 시는 「題詞」에서 첫 번째에 배치되어 있고, 비수울의 시는 뒤에서 두 번째에 배치되어 있다. 각 명사들의 헌사를 배열한 순서는 아마도 청위가 헌사를 받은 순서일 가능성이 높다.

여기서 양계초(梁啓超)의 「추풍단등곡(秋風斷藤曲)」은 예외적인 경우이다. 「추풍단등곡」은 한 때 헌사로서 상해성사(上海醒社)에서 출판한 『조선망국사』에 실렸다. 이 책은 출판 년도를 표기하지 않고 있지만, 그 내용을 보면 「추풍단등곡」을 경술년(庚戌年, 1910)에 썼다고 밝히고 있다. 이 밖에 박은식(朴殷植)이 지은 『안중근전』¹⁶⁾의 ‘선록(選錄)’에서도 양계초의 「추풍단등곡」을 싣고 있는데, 이 책의 초판은 1914년 상해에서 출판되었다. 이를 통해서 다른 명사들의 헌사와는 달리 양계초의 「추풍단등곡」은 청위의 「安重根傳」을 위해서 지은 것이 아니고, 청위가 양계초의 기존 작품을 이 책에 수록한 것이기 때문에, 가장 마지

14) 金春善, 「안중근 의거에 대한 중국인의 인식」, 『韓國近現代史研究』, 2005년 夏季號(제33집).

15) 安定根, 「血淚語」, 程洵 『安重根』下篇, 부록二, 11쪽.

16) 滄海老紡室(朴殷植), 『安重根傳』, 上海大同編輯局 1914년 판.

막에 두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상과 같은 사실을 통해 대략적으로 청위의 「安重根傳」과 「序」는 1918년에 작성되었고 양계초의 「추풍단등곡」을 제외한 각 명사들의 현사는 1918년에서 1919년 사이에 지어졌다고 추정 가능하다. 또한 청위의 「后序」는 안중근의 「血淚語」를 읽은 이후에 작성되었으므로, 『安重根』이 인쇄에 들어간 것은 당연히 1920년 3월 1일 이후일 것이다. 이 책에서 출판사를 밝히지 않은 것은 이 책이 본래 청위 자신의 자산을 털어 인쇄되었기 때문일 것이다. 일례로 청위가 1933년에 상해도덕회(上海道德會) 명의로 출판한 『역대존공기공교외론합각(歷代尊孔記孔教外論合刻)』 역시 실제로는 각계 각층의 인사들이 각출하여 인쇄 비용을 마련하였다.

II

『安重根』은 상, 중, 하 세 부분으로 나뉜다. 상권의 주요 내용은 청위가 쓴 「安重根傳」, 「序」, 「后序」, 도의(陶毅)의 「書安重根傳后」 및 각 명사의 「題詞」로서, 왕수남,¹⁷⁾ 오전기,¹⁸⁾ 역순정,¹⁹⁾ 소릉승, 가은불(賈恩黻), 도용,²⁰⁾ 당계, 채원배, 적옥,²¹⁾ 왕조,²²⁾ 민이

17) 왕수남(王樹柟, 1851~1936): 자는 진경(晉卿), 호는 도려노인(陶廬老人), 하북(河北) 신성(新城) 사람이다. 광서 병술과(丙戌科) 진사(進士)에 올라 호부(戶部) 주사(主事)에 제수되고, 나중에 사천(四川) 청신현(淸神縣) 지현(知縣), 사천(四川) 학정(學政)을 지냈으며 관직이 신강(新疆) 포정사(布政使)에 이르렀다. 신해 혁명 이후에는 북경에 은거하다가, 조이손(趙爾巽)의 초빙으로 청사관(淸史館) 총찬(總纂)을 지냈다. 1936년 2월 북경 서직문(西直門) 안 자택에서 사망하였다. 수많은 저술이 있으며, 『畿輔通誌』, 『淸史稿』 외에도 『文莫室詩集』, 『陶廬文集』, 『陶廬文內集』, 『陶廬詩續集』 등 수십 편의 문집을 펴냈다. (王樹柟, 「陶廬老人隨年錄」, 張伯鋒&顧亞主 著, 『近代淸海』 제12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년, 姚漁相&李滿康, 「王樹柟傳略」, 『大陸雜誌』 24권 9기.)

18) 오전기(吳傳綺, 1858~1934): 자는 이백(季白). 안휘(安徽) 회녕(懷寧) 사람으로 후에 안경(安慶)에 살았다. 청나라 광서 12년(1889) 거인(舉人)에 올라, 국자감(國子監) 학예조교(學錄助教), 호남(湖南) 영수청(永綏廳) 동지(同知), 호남(湖南) 영녕부(永寧府) 지부(知府) 등을 역임하였으나, 후에 병으로 관직을 사직하고 안경(安慶)으로 가서 살았다. 선통(宣統) 원년(1909) 안경(安慶) 풍절정(風節井) 옆에 안경여자사범학당을 열고 부설 유아원을 두었으며, 이어 대궁전항(大弓箭巷)에 사립도서관을 설립하였다. 회녕중학당(懷寧中學堂) 감독(監督)을 지냈다. 중화민국 8년(1919) 『安徽商報』 주필을 맡았다. 중화민국 12년(1923) 겨울 안휘성립도서관(安徽省立圖書館) 관장을 맡고, 통속교육관(通俗教育館)을 처음으로 설립하였으며, 중화민국 17년(1928) 이임하였다. 1934년 병으로 남경(南京)에서 사망하였으며, 저서로는 『說文偶義』 수십 권이 있다.

19) 역순정(易順鼎, 1858~1920): 자는 실보(實甫) 또는 석보(石甫), 중실(中實), 실부(實父), 중석(中碩), 석보(碩甫), 중석(仲碩), 이석(易碩) 등이 있다. 스스로 천기재(忤綺齋)라 하였고, 또한 스스로 미가(眉伽)로 호를 삼았으며, 만년에 곡암(哭庵)이라고 하다가 나중에 일암(一庵)으로 고쳤으며, 이 밖에 미가(眉伽), 용양재자(龍陽才子), 천기재주인(忤綺齋主人), 상남한수용양인(湘南漢壽龍陽人), 벽호수몽사인(碧湖秋夢詞人) 등이 있으며, 사람들은 대부분 역오(易五)라 불렀다. 호남(湖南) 용양(龍陽, 漢壽縣) 성관진(城關鎮) 사람이다. 부친인 역패신(易佩紳)은 귀주(貴州) 안찰사(按察使)를 지낸 청나라의 유명한 학자였다. 다섯 살부터 신동으로 이름을 날린 저명한 시인이다. 광서 원년(1875) 과거에 급제하고, 1888년 이후 삼성(三省) 하도(河圖) 총판(總辦) 등을 역임하였다. 청일 전쟁 당시 화친에 반대하고 계속 싸울 것을 주장하여 이름을 떨쳤으며, 유곤(劉坤)의 휘하에 들어가 「討日本檄文」을 지었다. 청일 전쟁 이후 울분에 차 노산(廬山)에 칩거한 그는 금지루(琴誌樓)를 짓고 은거하였다. 양호총독(兩湖總督) 장지동(張之洞)이 그를 초빙하여 양호서원(兩湖書院) 분교(分教)를 맡아 보았다. 광서 26년(1900) 8개국 연합군이 중국을 침략하자, 강양(江陽) 강방(江防) 독판(督辦)을 맡았다가 협서(陝西)

창,²³⁾ 강항호,²⁴⁾ 요계영(姚季英), 사사단,²⁵⁾ 왕양,²⁶⁾ 왕도(王燾), 진석기(陳錫麒), 나가

로 이임되었으며, 광서 28년 광서(廣西) 우강도(右江道)로 이임하였다. 광서 34년 운남(雲南) 임안(臨安) 개광도(開廣道)를 맡았다가 광동(廣東) 흠렴도(欽廉道)로 전임하였다. 이듬해 가을 광동(廣東) 조라도(肇羅道)에 제수되었다가 후에 고뢰(高雷) 양도(陽道)로 이임하였다. 신해혁명 이후 북경에 한거하다가, 1915년 9월 한 때 호남(湖南)의 관료 및 입헌파 인사 61명과 함께 참사원(參事院)에 제정 회복을 요구하는 상소를 올렸다. 이에 따라 1916년 2월 인주국(印鑄局) 대리 국장 및 국장(局長)이 되었다. 청나라 말기 광서(廣西), 운남(雲南), 광동(廣東) 등지에서 도대(道臺)를 역임하였다. 신해 혁명이 일어나자 북경에 머물면서 원세개(袁世凱) 복벽에 참여하였다. 원세개의 제정이 실패로 돌아가자 실의에 빠진 이순정은 이후 북경을 떠돌며 가무와 여색에 탐닉하였다. 1920년 북경의 자택에서 별세하였다. 저서로는 시집 『丁戊之間行卷』, 『四魂集』 등 20여 권이 있으며, 대부분 『琴誌樓叢書』에 수록되어 있다. (賈逸君 著, 『中華民國名人傳』, 北平文化學社, 1937년, 제6쪽)

- 20) 도옹(陶鏞, 1895—1985): 이름은 선옹(善鏞). 자는 영소(咏韶). 호는 용(鏞) 또는 광재(宏齋)이며 별명은 냉월(冷月)로 도연명(陶淵明)의 후손이다. 강소(江蘇) 소주(蘇州) 사람이다. 조부 도기손(陶芑孫)과 도이손(陶怡孫)은 모두 유명한 화가였다. 어려서 나수민(羅樹敏)에게 그림을 배우고 동서양의 학문을 함께 공부했으며, 나중에 안문량(顏文梁)과 그림을 논하였고, 눈과 달을 특히 잘 그렸다. 1918년 이후 장사(長沙), 남경(南京), 개봉(開封) 등 대학 교수를 역임했다. 채원배(蔡元培)는 그를 새로운 중국화(中國畫)의 선구자로 칭송하였다. 중화인민공화국 출범 이후 중국미술협회 상해 분회 회원 및 상해 문서관(文史館) 직원으로 일했다.
- 21) 적옥(狄郁): 하남(河南) 지역의 재사로서, 중화민국 초기 공교(孔教)를 제창하였으며, 저서로는 『孔教評議』가 있다.
- 22) 왕조(王照, 1859~1933): 자는 소항(小航). 호는 호중궁사(芦中窮士) 또는 수동(水東)이라 한다. 하북(河北) 영하(寧河, 지금은 天津에 속함) 사람이다. 광서(光緒) 20년(1894)진사에 급제하여 한때 무술변법(戊戌變法)에 참여하였으나 실패로 돌아간 후에 일본으로 망명하였다. 나중에 청나라 조정에 다시 투항하였다. 이후 관화합성자모(官話合聲字母)를 제창하여 세상에 널리 이름을 떨쳤다. 1913년 원세개가 그에게 독음통일회(讀音統一會) 부의장을 맡겼다. 독음통일회는 그의 관화합성자모를 기반으로 병음(拼音) 방식을 고안해 내었고, 1917년 북양(北洋) 정부가 이를 비준하여 실시하였다.
- 23) 민이창(閔爾昌, 1872~1948): 자는 보지(葆之)로 원세개의 막료였으며, 중화민국 초기 북양정부(北洋政府) 총통부(總統府) 비서를 지냈다. 1927년 이후 보인대학(輔仁大學) 교수를 역임하였다. 저서로는 『雲海樓詩存』, 『雷塘詞』 등이 있으며, 10년 동안 고생한 끝에 완성한 『碑傳集補』 60권을 편찬하였다. (金毓黻, 『閔爾昌傳』, 『國史館館刊』, 1967년 2권 1기)
- 24) 강항호(江亢虎, 1883~1954): 이름은 소전(紹鈐). 별호는 무문(無文), 항부(抗斧), 강호(康瓠), 별명으로 무아로(無我廬), 소헌당(素憲堂)이 있다. 강서(江西) 익양(弋陽) 사람으로, 남사(南社) 회원이었다. 청나라 말기 편역국(編譯局) 총판(總辦), 북양관보(北洋官報) 총찬(總纂), 형부(刑部) 주사(主事), 경사대학당(京師大學堂) 교습(教習), 법부(法部) 원외랑(員外郎) 등을 지냈다. 1901년부터 여러 차례 일본과 유럽에서 유학하면서 떠돌았다. 중국의 초기 사회주의자의 하나이다. 1910년 무종교, 무국가, 무가정의 삼무주의(三無主義)를 제창하였다. 1911년 상해에서 사회주의 연구회를 조직하고, ‘사회성(社會星)’을 창간하였다. 1911년 11월 중국 사회당(社會黨)을 조직하였다. 1913년 중국 사회당이 해산된 후에 미국으로 건너 갔다가, 1921년 소비에트 러시아로 갔다. 1922년 9월 강항호는 상해에 남방대학(南方大學)을 설립하고 스스로 교장을 맡았다. 1924년 다시 중국 사회당을 조직하고 1925년 중국 신사회 민주당으로 개명하였으며 1926년 해산하였다. 1927년 여름, 캐나다대학 중국문학원 원장 겸 한학 주임 교수를 맡았다. 1939년 왕위(汪偽) 정권에 참여하여, 1946년 간첩죄로 무기 징역을 선고 받았다. 저서로는 『無我廬文存』, 『無我廬詩存』, 『江亢虎文存初編』 등이 있다.
- 25) 사사단(查士端, 1877~1961): 사충례(查忠禮)를 가리킨다. 절강(浙江) 해녕(海寧) 원화진(袁花鎮) 사람이다. 12세부터 남경의 고모집에 맡겨 길러졌으며, 고모가 그를 학교에 보내 공부를 시켰다. 신해년에 혁명에 호응하여 학생군을 조직하였다. 1926년 방향을 전환하여 언론계로 투신하면서 상해에서 『小日報』를 간행하였다. (查良安, 『愿世界永遠和平——父亲查忠禮逝世四十年祭』, 『蘇州條記』, 2001년 제 6기)
- 26) 왕양(汪洋, 1878~1921): 자는 자실(子實). 별호는 영로(影廬), 영생(影生), 파원(破園), 석피(石皮), 청가인(听歌人). 안휘(安徽) 정덕(旌德) 사람이다. 어려서부터 양주(揚州)에 살았다. 한 때 초등학교에서 교사로 일하다가 나중에 언론계에 투신하였으며, 그 전에 봉천(奉天, 지금의 沈陽)에서 ‘東三省日報’를 간행하여 반청(反清) 혁명을 고취하였다. 1911년 상해로 건너가 ‘中華民報’의 편집장을 맡아 보았다. 신해혁명 이후 국민당(國民黨)에 가입하였다. 1913년 3월 송교인(宋教仁) 사건이 일어나자 원세

릉,²⁷⁾ 진원춘,²⁸⁾ 엽주(葉舟), 정선지,²⁹⁾ 정미지(程美之), 비수울³⁰⁾ 등 24명이며, 이 가운

개 토벌을 주장하면서 격렬한 논조의 연설을 발표하곤 하였다. 2차 혁명이 실패한 후에 의탁할 곳이 없어진 그는 허세영(許世英, 1872~1964)의 요청으로 북상하였으며, 얼마 후 그를 따라 복건(福建)으로 가 교육과(教育科) 과장을 맡았다. 나중에 허세영은 제정에 반대해야 한다고 왕양에게 제안했다고 한다. 단기서(段祺瑞) 내각이 조직된 이후 허세영이 총교통(總交通)으로 들어가자, 왕양은 상해로 가 전정국(電政局) 감독(監督)을 맡았다. 허세영이 퇴임하자 왕양 역시 같이 물러났다. 시문(詩文)을 즐겨 남사(南社)의 회원으로 활약하였고, 또한 여행을 좋아하여 한 때 시베리아까지 가서 바이칼 호를 거쳐 우랄 산맥을 넘어 페테르스부르크까지 여행한 경험이 있으며 또한 대만과 일본에도 갔었다. 1921년 병이 들었는데 돌팔이를 찾아가는 통에 43세를 일기로 생을 마감하였다. 저서로는 『息影枝談』, 『影生雜記』, 『臺灣』 등이 있다. (鄭逸梅의 『南社叢談』 가운데 「南社社友事略·汪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년 판, 151~152쪽. 邵迎武, 『南社人物吟評』,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4년, 106쪽. 沃丘仲子, 『當代名人小傳』, 「汪洋」, 崇文書局, 1926년, 148~149쪽 참고)

27) 나가릉(羅伽陵, 1864~1932): 성이 나시(羅詩)였으나 나중에 나(羅)로 줄여 부르게 되었다. 본명은 여수(儺穗)이며 여유(儺葵)라고도 한다. 호는 가릉(伽陵). 상해에서 태어났으며, 부친 루이는 프랑스 사람이고, 모친은 복건(福建) 민현(閩縣) 사람이다. 어려서 부친이 프랑스로 돌아가고 모친도 병사하자 외숙부 등이 성인이 될 때까지 부양하였다. 1886년 상해의 영국 국적 유대인 거부인 하둔(Silas Aaron Hardoon)과 결혼하고, 옛날 상해에서 유명했던 하둔 가든, 즉 애려원(愛麗園)에서 생활하였다. 나가릉은 글을 알지 못했지만 남에게 대필을 시켜 글을 발표하였다

28) 진원춘(陳駕春). 동맹회(同盟會) 회원 1911년 7월 31일, 동맹회 중부 본부가 상해(上海) 북사천로(北四川路) 호주회관(湖州會館)에서 출범하였다. 공개 활동의 편의를 위해 진원춘은 주소병(朱少屏), 마상백(馬相伯), 진기미(陳其美) 등과 같이 영국 조계인 한구로(漢口路)의 양현리(娘孃里)에서 중국국민총회(中國國民總會)를 조직하고, 공개적으로 지원자를 모집하여 '모범체조단(模範體操團)'을 조직하여, 합법적인 신분으로 상무정신(尚武精神)을 제창하면서 무장 봉기를 위한 준비를 하였다.

29) 청위(程涓)은 저서에서 정선지(程善之)가 여성이라고 명기했지만, 오류가 있는지는 알수 없다. 부남사(否南社) 회원 가운데 이름이 정선지(程善之)인 자가 있으나 남자이며, 그 약력은 다음과 같다. 정선지(程善之, 1880~1942): 이름은 경여(慶余), 호는 소재(小齋), 별칭은 일숙(一粟), 재명(齋名)은 구화실(滙和室). 조상 본적은 안휘(安徽) 흡현(歙縣)이고, 임시 거주한 곳은 강소(江蘇) 양주(揚州)이며 남사(南社) 회원이다. 부친 정환생(程桓生)은 한 때 두 차례 양준(兩淮) 염운사(鹽運使)를 지냈고, 형인 정금무(程錦武)는 진사에 합격하여 한림원(翰林院) 편수(編修)에 제수되었고, 글과 서예로 당시 이름 높았다. 정선지는 어려서 부친의 밑에서 경서가 아니면 읽지 못했으며, 사책이 아니면 눈길도 주지 못했다. 후에 과거에 응시하기 위해 스승의 집에 기숙하면서부터 몰래 홍루몽, 화월혼 등의 책을 보기 시작하였다. 이 때부터 허구에 심취한 그는 몰래 소설가들을 모방하여 변지여화(駢枝余話), 권운억어(倦雲憶語), 청대할지담(清代割地談), 여혁명오숙경(女革命吳淑卿) 등을 지었다. 1896년 박사제자원(博士弟子員) 후보가 된 후 과거에 뜻을 접고 당시 정세에 관심을 기울이게 된 그는 널리 동인을 모아 결사하여 강학하면서 역대 정치 변혁을 연구하였다. 1908년부터 1912년까지 양주부(揚州府) 중학당(中學堂)에서 가르쳤다. 이 때 동맹회(同盟會)에 가입하여, 신해혁명 당시 '중화민보(中華民報)'를 집필하고, 2차 혁명 당시 손중산(孫中山)에 가담하여, 글을 통해 많은 공헌을 하였다. 2차 혁명이 실패로 돌아간 후 양주에 은거하여 두문불출하면서 바깥일에 관심을 끊었다. 30세 이후 참선의 즐거움에 빠져 교언영색을 경계하며 글쓰기를 삼가하였으며, 호박안(胡朴安)과 토론을 즐겼다. 1928년 포명숙(包明叔)이 진강(鎮江)에서 '신강소보(新江蘇報)'를 창간하면서 그를 편집장으로 초빙하였다. 1932년 국난회의(國難會議) 회원으로 초빙되었다. 1935년 진함광(陳含光), 진사경(陳賜卿) 등과 같이 장태화(蔣太華)가 설립한 양주국학전문학교의 교수를 지냈다. 1937년 진강(鎮江)이 함락되자, 그는 '신강소보'사와 함께 태주(泰州)로 갔다가 나중에 다시 강을 건너 상해로 피신하였다. '신강소보'에서 일하는 동안 항전을 위한 선전에 적극 나서, 1938년 무진(武進)에서 일본 괴뢰의 소위 청향(淸鄉) 검색을 겪고 크게 자극을 받았다. 1942년 4월 12일 상해에서 의흥(宜興) 장저(張渚)로 옮겨다가, 상주(常州)로 가는 길에 뇌일혈로 사망하였다. 저서로는 『滙和室文存』, 『滙和室詩存』, 『印度宗教史論略』, 『四十年間見錄』 등이 있다. (鄭逸梅 『南社叢談』 가운데 「南社社友事略·程善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년판, 255~256쪽. 邵迎武, 『南社人物吟評』,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4년, 280~281쪽. 肖維琪, 顧一平, 『南社中的揚州人』, 1991년, 15~18쪽 참고) 청위의 『安重根』 뿐 아니라 박은식(朴殷植)이 지은 『安重根傳』 선록에도 정선지의 현사가 실려 있다.

30) 비수울(費樹蔚, 1883~1935): 자는 중심(仲深), 호는 위재(韋齋). 서문표(西門豹)가 성격이 급하여 무두

데 나가릉, 진원춘, 엽주, 정선지, 정미지는 여성으로 명기되어 있다. 이는 이 책에서 가장 가치 있는 부분이다. 이들은 모두 배경이 다양했지만, 청위가 젊어서 강호를 누비면서 명사들의 서화를 수집하여 소장하면서 많은 문인들을 사귀었기 때문이었다. 나중에 리차드 티모시의 중국어 비서를 할 때에도, 티모시가 중국의 귀족 계층과 광범위하게 교류하였기 때문에 청위의 교제 범위도 매우 넓어졌으므로, 이렇게 많은 이들이 「安重根傳」에 현사를 쓴 것도 이상할 것이 없다.

중편에 청위가 편집하여 수록한 안중근의 생애와 의거 및 공판에 대한 보도 자료는 「略史」, 「行刺」, 「公判」의 세 부분으로 나뉘어 있다. 하편은 부록으로, 수록한 내용은 「매국노를 처단한 한인 역사韓人殺賣國奴之歷史」와 「일본 메이지 시대 암살 리스트[日本明治時代暗殺表]」이다. 전자는 주로 이완용을 습격한 이재명(李在明)에 관한 각종 보도 및 이재명에 관한 내용이다. 이 밖에도 일본 메이지 시대 암살 리스트」를 통해 당시 조선인의 행동과 일본 유신파의 유사성을 설명하였다. 부록2는 『新韓靑年』에서 전제한 안중근의 「血淚語」이다.

상편 「安重根傳」과 중편의 내용을 전반적으로 살펴보면, 청위가 근거로 삼은 것은 대체로 당시 국내외 신문 잡지의 보도로서, 그 자신도 “내가 국내외 신문과 잡지를 두루 섭렵하고 주석을 달아 전기로 펴냈다.”³¹⁾고 말하고 있다. 각종 보도 내용이 모두 일치하지는 않았기 때문에, 일부 내용에서 청위 역시 일관성을 지키지 못하고 있다. 예를 들어 안중근의 출생지에 대해 「安重根傳」에서는 안중근이 한국 평안도(平安道) 진남포(鎭南浦) 사람이라고 했다가, 중편의 안중근 「略史」에서는 다시 안중근과 그의 부친이 모두 평안도주(平安道州)에서 태어났다고 말하는 이도 있고 중화(中和)에서 태어났다고 하는 이도 있는데, “지금은 정확히 알 수 없으며, 그 부근 일대에서 태어났다는 것에는 의심할 여지가 없다.”³²⁾고 적고 있다. 실질적으로 안중근은 황해도(黃海道) 해주읍(海州邑) 동문밖에서 태어나 나중에 황해도 신천(信川) 청계동(淸溪洞)으로 이주하였다가 다시 평안도 삼화진(三和鎭) 남포(南浦)로 이주하였다.

이 밖에도 청위의 「安重根傳」에는 오류가 많은 편이다. 청위는 「安重根傳」에서 안중근의 부친의 이름인 태훈(泰勛)을 태혼(泰混)으로 적고 있다. 청위는 안태훈이 “천주교를 믿었고, 한 때 경상남도 진해(鎭海) 군수(郡守)를 지냈으나 대원군의 일로 가장 먼저 배일(排

질 가족을 허리에 차고 다닌 뜻에서 이름하였다. 또한 명나라 황리주(黃梨洲)를 마음에 새기기 위해 호를 원리(愿梨)라 하였다. 다른 호로 좌리(左梨), 좌벽(左癖), 우쇄(迂瑣) 등이 있다. 강소(江蘇) 오강(吳江) 동리진(同里鎭) 사람으로, 유아자(柳亞子)의 외숙부이며, 19세에 수재로 급제하였다. 오대징(吳大澂)은 그의 재주를 보고 딸인 오본정(吳本靜)을 그에게 시집보냈다. 중화민국 4년(1915년) 7월, 비수울은 북경정부(北京政府) 숙정사(肅政史)로 들어갔다. 원세개의 큰아들 극정(克定)도 오대징의 사위였으므로 큰 신임을 받았다. 원세개가 황제를 참칭하자, 수울은 직언으로 간언하였으나 받아들여지지 않았다. 11월 관직을 벗고 귀향하여 소주(蘇州)에 은거하면서, 장태염(章太炎), 김송잠(金松岑), 장중인(張仲仁) 등과 시문으로 교류하였고, 장중인과 함께 ‘소주이중(蘇州二仲)’으로 불렸다. 중화민국 16년 5월 8일 국민당 군경이 비밀리에 유아자를 체포하려다 그 매부인 능송익(凌誦益)을 잘못 알고 잡아가지, 비수울이 힘을 써 구출하였다. 한 때 신부은행(信孚銀行) 이사장과 오강(吳江) 적십자사 회장을 지냈다. 1951년 유아자가 제안하여 펴낸 『費韋齋集』에는 3000여 수의 비수울의 시가 수록되었다.(張仲仁, 「費君仲深家傳」, 『制言』, 1935년 5월, 『心太平室集』卷四. 傳增湘, 「吳江費君墓誌銘」, 『國史館館刊』, 1948년 1권 3기)

31) 程滄, 「序」, 『安重根』上篇, 1쪽.

32) 程滄, 『安重根』中篇, 略史, 刺客之家世, 1쪽.

日)을 주장하다가 하옥되어 죽었다.”³³⁾고 적고 있다. 하지만 사실 안태훈은 유생으로 진사가 되었지만 군수를 지낸 적은 없다. 안태훈이 천주교를 믿게 된 것 역시 1895년 이후의 일이다. 1894년 조선에 동학당(東學黨)의 기의가 일어나자, 당시 안태훈은 향용(鄉勇)을 조직하여 고향을 지켰고, 안중근 역시 이 일에 참여하여 붉은 옷을 입고 용감하게 싸워 ‘천강홍의장군(天降紅衣將軍)’으로 불리웠다.³⁴⁾ 이후 어떤 재상(宰相)이 군량미를 사사로이 착복하였다는 죄로 안태훈을 소환하려 하자 어쩔 수 없이 프랑스인의 천주교당에 들어가게 되었으며, 안중근은 이 때 천주교에 귀의하게 되었다.³⁵⁾ 이 일은 대원군과는 관계가 없으며 그 때문에 죽은 것은 더욱 아니다.

안태훈이 사형을 당한 적이 없는데도, 청위는 「安重根傳」에서 부친 사후 “중근은 의탁할 곳이 없어 평양 농가에 숨어 들었다.”³⁶⁾고 적고 있으며, 중편의 「略史·刺客之家世」에서는 “안 씨 가문이 멸문지화를 당한 후 빈곤하게 자라, 어려서 의지를 굳고 정처 없이 떠돌아 다니며 지극한 고생을 하였다. 그 탁월한 사상은 대개 미리 고난을 우려하는 데서 얻은 것이 많았다.”³⁷⁾고 하고 있으니 이 역시 사실과는 다르다. 안중근의 집안은 본래 가산이 풍부하고 번성하였으나, 단지 1895년 이후 안중근이 가산 관리에는 관심을 두지 않고 상무(尙武) 정신 진작에만 전념하여, 가산으로 무기를 구매하고 고향 청년들을 조직하여 군사 훈련을 하였으며, 또 각지를 돌면서 뜻이 맞는 자들을 규합하여 조직을 만들고 비용을 대다보니 가산을 탕진하기에 이르러 생계가 막막해졌을 뿐이다.³⁸⁾

이와 비슷한 오류가 많은데, 예를 들어 청위는 “김옥균(金玉均), 우범선(禹範善), 박용화(朴鏞和), 이완용(李完用) 피습에 안중근이 모두 관여하였다.”³⁹⁾고 하였으나, 사실 김옥균은 청일 전쟁 이전에 조선 조정에서 보낸 홍종우(洪鍾宇)에 의해 피습당했을 뿐 안중근과는 무관하다. 비교해 보면 사실의 정확성 측면에서는 1917년 양남촌(楊南邨)이 편찬한 『세계망국비사(世界亡國稗史)』⁴⁰⁾ 가운데 「한국의사소전(韓國義士小傳)」의 안중근전 부분에도 못 미친다. 이를 통해 볼 때 청위는 아마도 당시 이미 출판된 박은식의 『安重根傳』이나 다른 중국인의 관련 저술을 그다지 참고하지 않은 듯하다.

전반적으로 청위의 편찬한 『安重根』은 안중근 연구 자료로서의 가치는 크지 않다. 사실 청위의 편찬 취지는 안중근의 업적이나 사상 연구에 있지 않았으며, 수록한 자료를 제외하면 청위가 쓴 「安重根傳」은 채 1000자도 되지 않아 겨우 한 페이지를 약간 넘을 뿐이다. 그가 이 책을 편찬한 취지는 대략 안중근의 의거를 빌어 자신의 사상을 표현하기 위한 것이다. 여러 명사들의 헌사 역시 비슷한 경향을 보여주고 있다. 오히려 그 내용은 한국과 안중근에 대한 중국인의 인식을 이해하기 위해서, 또는 5·4 운동을 전후한 시기 시국에 대한 중국 문인들의 인식과 주장을 살펴보기 위해서 참고할 만한 가치가 있다.⁴¹⁾

33) 程滄, 『安重根』上篇, 安重根傳, 1~2쪽.

34) 朴殷植, 「安重根傳」, 『朴殷植全書』中, 569쪽.

35) 朴殷植, 「安重根傳」, 『朴殷植全書』中, 569쪽.

36) 程滄, 「安重根傳」, 『安重根』上篇, 2쪽.

37) 程滄, 『安重根』中篇, 略史, 刺客之家世, 1쪽.

38) 朴殷植, 「安重根傳」, 『朴殷植全書』中, 571쪽.

39) 程滄, 『安重根』上篇, 安重根傳, 2쪽.

40) 上海交通圖書館 1917년 초판, 1928년 상해 진익학사(進益學社)는 이 책을 『亡國痛史』로 이름을 바꾸어 재판하였다.

III

이 책의 편찬 목적에 대해 청위는 이 책의 속표지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독자들의 주의를 환기시키고 있다. “이 책은 조선의 안중근이 아직 망국에 이르지 않았던 시기에 이완용과 이용구 등의 매국노를 처단하였더라면 조선이 멸망에는 이르지 않았을 것이며(나라 안을 어지럽게 만드는 자들의 죄는 매국노와 마찬가지로), 망국 이후에야 이토 히로부미를 격살한 것은 이미 때늦은 일로서 오히려 조선의 멸망을 앞당기는 결과를 가져왔다는 사실을 설명하고 있다. 맹자가 일찍이 이르기를 나라는 스스로 무너진 이후에 다른 나라가 그 나라를 정복하는 법[國必自伐, 然後人伐之]이라고 하였다. 스스로 멸망의 길을 취했는데 이토 히로부미와 무슨 상관이 있단 말인가? 나라를 사랑하는 대장부라면 하루 속히 이를 깨닫지 않으면 안 된다.”

이 책에 실린 명사들의 발문과 헌사를 통해서 우리는 청위의 이러한 생각에 동의하는 이들이 적지 않았음을 알 수 있다. 먼저 도의는 「書安重根傳后」에서 청위가 펴낸 「安重根傳」에 대해 “특히 발문을 아끼는데, 그 내용이 나의 마음과 같았기 때문이다.”⁴²⁾라고 밝히고 있다. 그 역시 안중근의 업적이 진시황을 격살하려했던 형가(荊軻)를 넘어서나, 그 식견만은 진회(秦桧)를 격살하려했던 시전(施全)에 못 미친다고 여겼다. 시전은 “이 한 몸 바쳐 외적을 죽인다면, 무수한 외적을 다 섬멸할 수 없다. 차라리 이 한 몸 바쳐 매국노를 죽인다면 동시에 그들에게 빌붙거나 나중에 그 뒤를 쫓아 나라를 팔아먹을 적들을 두렵게 만들어 자신의 목숨이 아까워 감히 나라를 팔지 못할 것이니 효과가 크다. 또한 전국의 민심을 불러 일으켜 함께 힘을 합쳐 외적에 대항한다면 망국의 가능성도 줄어들 것이다.”⁴³⁾고 하였다. 안중근에 대해서도 마찬가지로 “이토 히로부미를 죽여 울분은 풀었으나 나라를 구하기에는 부족하고 오히려 조선의 망국을 재촉하였으며, 형가의 진시황 격살은 성공하지 못하고 오히려 연(燕)의 망국을 재촉하였으니, 과연 누가 더 낫단 말인가?”⁴⁴⁾ 따라서 도의는 안중근과 같은 열사가 “외적이 아닌 내부의 적에 원한을 갚은” 시전을 닮아야 할 것이라고 주장하였다. 그는 심지어 “안중근에게 시전의 식견을 주어 그의 사격술로 먼저 이완용, 이용구와 같은 간신배들을 처단하여 충의(忠義)를 부르짖는다면, 민중을 분발시켜 폐단을 일소하여 나라를 진작시킨다면, 일본 총감 격살보다 어찌 낫지 않겠는가. 생명도 없고 나라도 잃었도다!” 라고까지 상상하고 있다.

오전기 역시 「俠烈行白菴居士屬作」에서 청위의 견해에 대해서 “정 선생의 위대한 이론을 깊이 이해하게 되면서 흥망에 감개무량하여 가슴이 뛰었다.”⁴⁵⁾고 평가하고 있다. 그 역시 “안중근에게 큰 뜻이 있었다면 대외에 자강하여 조속히 진정해야 했다. 암살은 단지 대내적으로 간신배 무리를 일소하여야 위기를 면한다.” 이용구나 이완용 같은 매국노에 대해서

41) 상술한 김춘선(金春善)의 논문에서 이 내용을 다루고 있다. 그러나 그는 이 책의 전체 내용을 5·4 운동 이후의 결과물로 보았기 때문에 분석에 있어 편차를 피할 수 없었다.

42) 陶毅, 「書安重根傳后」, 程滄 『安重根』 上篇, 4쪽.

43) 陶毅, 「書安重根傳后」, 程滄 『安重根』 上篇, 3쪽. 방점은 원문에서 넣은 것으로(이하 동일), 도의나 청위가 의식적으로 강조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44) 陶毅, 「書安重根傳后」, 程滄 『安重根』 上篇, 3쪽.

45) 吳傳綺, 「俠烈行白菴居士屬作」, 程滄 『安重根』 上篇, 6쪽.

는 만약 “망국 이전에 능히 일격한다면, 실로 번개로 힘찬 천둥 소리를 울리는 격이다. 조선의 모든 인심을 움직여, 힘 없는 자도 분발하여 지킬 것이다. 지금 이토 히로부미를 죽여도 적에는 손실이 없으니, 헛된 죽음은 마치 경중을 잃은 듯 하도다.”⁴⁶⁾라고 말하고 있다.

가은불(賈恩黻) 역시 잇구에서 매국노로 인한 화가 외적보다 크다고 강조하고 있어, 청위의 견해를 받아들이고 있다. 그는 탄식하면서 “안타깝게도 안중근의 제책이 너무 졸렬하니, 당시 만약 내환(內患)을 먼저 제거했다면 우두머리도 무장도 몇 되지 않았을 것을. 나라를 팔아 몸을 일으킨들 목숨이 위태롭다면, 여러 도적들이 놀라서 앞다투어 마음을 바꾸었을 것이다. 호랑이에 빌붙는 여우가 없다면, 금수강산을 어찌 보전하지 못 하겠는가! 안타깝게도 이토 히로부미 살해만 알고 집안의 도적들에게는 아무런 타격을 주지 못 했다.”⁴⁷⁾라고 말했다.

이 밖에도 당계, 요계영, 진석기 역시 청위의 주장에 동의하고 있다. 당계는 “호랑이에 빌붙는 여우가 모두 제거했다면, 강력한 외세의 호시탐탐 야욕도 좌절되었을 것”⁴⁸⁾ 이라고 말했고, 요계영도 잇구를 통해 “드높은 뜻으로 고귀한 생명을 바쳤으나 슬프도다, 이미 양을 잃고나서 우리를 고치는 것은 필시 늦은 것을” 이라고 했다. 진석기 역시 “간신배 무리들이 높은 자리를 차지하고 충의가 사라진 협열의 세월, 36명이 모두 장사였으나 일찍이 피로 탐욕의 샘을 씻었어야 하는 것을.”⁴⁹⁾이라고 하고 있으며, 채원배 역시 시를 통해 나라는 스스로 무너진 이후에 다른 나라가 그 나라를 정복하는 법이라고 강조하면서 안중근의 의거가 결국 조선의 멸망을 구할 수는 없었다고 탄식하여, 청위의 견해에 동의하는 듯이 보인다. 그는 동시에 권력을 잡았던 매국노에 대해 “원망스럽게도 그 정권을 잡은 이들에 모두 아첨하고 기대도다. 정치와 교육이 이미 사라지고 나라의 사직이 끊기니, 이익과 손해가 처음에는 작아도 나중에는 천지차이다. 혹은 자멸하고 권력을 다투며 서로 이끌기도 하여, 희생된 만물이 부패하고 몰려들어 파멸하는 이들이 개미같구나.” 라고 비난하는 동시에 안중근에 의거에 대해서도 “슬픔에 침묵하고, 상심하여 이를 악물었다. 홀로 분연히 나섰으나 결국 사직을 연장하지 못했으니, 열사여, 애재라!”⁵⁰⁾라고 탄식하고 있다.

도용은 원칙적으로는 매국노를 처단해야 한다는 청위의 주장에 동의하면서도, 시에서는 매국노 처단이 쉬운 일이 아니라고 감탄하면서 “내 이 말을 듣고 긴 한숨을 쉬네, 역발산의 기개로 간적을 없애기가 실로 어렵구나.”⁵¹⁾라고 탄식하고 있다. 적옥은 “조선의 멸망을 혹자는 그의 탓을 하나, 그 말은 궤변일 뿐 나는 아니라고 적는다.” 고 하여, 안중근의 이토 히로부미 암살로 조선이 멸망이 가속화되었다는 주장에 분명하게 반대하고 있다. 하지만 그는 동시에 청위가 “이르기를 당시 예봉을 내부의 간신배에게 돌렸으면 고초를 겪어도 큰 뜻이 족하다며, 백세에 진작시켜 슬퍼하며 강건하니 영웅의 감화력을 능히 점칠 수 있었다.”⁵²⁾고 격찬하였다. 비수울(費樹蔚)은 청위와 다른 견해를 보이고 있다. 그는 이완용 등

46) 吳傳綺, 「俠烈行白菴居士屬作」, 程洵『安重根』上篇, 6쪽.

47) 程洵, 『安重根』上篇, 7쪽.

48) 程洵, 『安重根』上篇, 9쪽.

49) 程洵, 『安重根』上篇, 12쪽.

50) 程洵, 『安重根』上篇, 10쪽.

51) 程洵, 『安重根』上篇, 8쪽.

52) 程洵, 『安重根』上篇, 10쪽.

매국노 처단보다는 이토 히로부미 처단이 옳았다는 주장을 버리지 않고 있다. 외부의 적을 처단하지 않는다면, 그들의 흥계에 따라 움직이는 매국노가 끊임 없이 나타나기 마련이라고 보았기 때문이다. 즉, “누가 이익과 지위로 유혹하는데도 단념하도록 만들 수 있단 말인가? 도둑을 잡을 때는 마땅히 도둑의 왕을 잡아야 하니, 문제는 여기가 아닌 거기에 있기 때문이다.”⁵³⁾ 하지만 비수율 역시 “간신배 처단이 특히 할 만한 일이고, 이웃한 원수는 여전하였다. 가볍게 비교해서는 안 되지만 결과는 안중근의 뜻과는 달랐다. 뿌리 깊은 나무의 위태로움이 여기에 있지 거기에 있지 않았기 때문이다.”⁵⁴⁾라고 여기고 있었다.

청위가 내부의 간신들, 즉 매국노를 처단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한 것은 사실상 당시 중국 상황을 겨냥한 말이었다. 그의 이러한 의도는 서언에서 분명하게 표현되어 있다. 그는 자신이 안중근을 기리는 글을 쓰게 된 분명하게 기술되어 있다. 그는 자신이 이 글을 통해 안중근을 칭송하는 이유는 “모든 후손들에게 무릇 망국을 견딜 수 없는 자라면 나라를 망치려는 자들에게 먼저 칼을 뽑아 들어야 하고, 감히 스스로 나라를 망치려는 자들에게는 나라 안에 안중근과 같은 자가 있음을 깨닫게 하여 두려움에 떨게 만들고자 함이다!”⁵⁵⁾라고 강조하고 있다.

청위의 「安重根傳」에 헌사를 쓴 다른 명사들도 청위의 의도를 알고 있었다. 예를 들어 오전기는 시를 통해 “그 말을 듣고 장탄식을 하며, 말은 없었지만 마음이 깨어나네. 그대의 일갈로 귀머거리를 일깨우니, 물 위에서 울린 종소리가 쇠북소리같구나. 거기에 빠지지 않고 깨어나지 않은 자들이 많으니, 내 동포를 생각하며 외롭게 근심하네.”⁵⁶⁾라고 하였고, 가은불 역시 “청위의 이 전기에 뜻이 있으니, 세인에게 알려 일으키고자 하나 대답이 없네. 내 더욱 천하를 질타하노니, 약자도 강자를 벌하고 권할 수 있도다. 이 책이 거듭 널리 읽힌다면, 반드시 우리 나라가 흥할 날이 있을 것이다.”⁵⁷⁾고 언급하고 있다. 역순정도 청위의 「安重根傳」은 결코 그의 의협심을 칭송하기 위해서가 아니라 이를 빌어 국내의 매국노에게 경고하기 위해서라고 설명하고 있다. 그는 “청위가 전기를 쓴 뜻은 다른 데 있으니, 결코 협열지사를 강조하는 데 그치지 않고, 그 의거를 빌어 내부의 간신배에게 경고하는 데 있다. 춘추 편찬이 난적을 경계하는 데 뜻이 있듯이, 협의지사는 더욱 따라야 할 모범을 남긴다.”⁵⁸⁾라고 하였다. 소릉승(昭陵僧)은 「次韵一庵居士題安重根傳后」에서 “청위의 뜻은 각별했으니, 세월이 흘러 충렬이 희미해지는 것을 경계하고, 고초를 빌어 간신배에게 경고하며, 만고에 매국노를 꾸짖기 위함이라.”⁵⁹⁾고 언급하면서, 중국에도 안중근 같은 열사가 나타나 매국노를 처단하기를 희망하였다. 그는 “중국의 침몰은 하루밤 사이의 일이 아니고, 이 사람을 엿보고자 하나 얻지는 못 하니, 우리로 하여금 장탄식하게 만드는 구나.” 고 직접 말했다. 당계는 심지어 “중원에 여우와 쥐가 실로 많으니, 여우와 쥐를 죽일 자들의 손에 도끼가 없도다. 오호라, 손에 도끼가 없으니 어찌하랴! 중원에 여우와 쥐가 실로 많구나!”⁶⁰⁾라

53) 程涓, 『安重根』 上篇, 13쪽.

54) 程涓, 『安重根』 上篇, 13쪽.

55) 程涓, 『安重根』 上篇, 序, 1쪽.

56) 吳傳綺, 「俠烈行白菴居士屬作」, 程涓 『安重根』 上篇, 6쪽.

57) 程涓, 『安重根』 上篇, 7~8쪽.

58) 易順鼎, 「題安重根傳后」, 程涓 『安重根』 上篇, 7쪽.

59) 昭陵僧, 「次韵一庵居士題安重根傳后」, 程涓 『安重根』 上篇, 7쪽.

고 했으며, 진석기는 시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감탄하고 있다. “한 구절씩 찾아 시 한 수를 지으며, 패기가 사라진 구주(九州)에 바라노니, 수천 수만이 안중근 선생을 좇아 한 몸을 바쳐 적을 쳐부수기를.”⁶¹⁾

그렇다면 청위와 도의가 지적하고 있는 중국 국내의 매국노란 과연 어떤 이들인가? 안정근은 「血淚語」에서 중국인이 “만청(滿淸) 배척에는 용감하나 외국인은 겁낸다”고 비난하고, “오늘날 중국에 위인 가운데 일본을 겁내지 않는 자가 드물다”고 하면서 무력으로 일본의 침략에 항거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하였다. 안정근은 “오호라, 오늘의 중국을 구하고자 하면, 백성의 뜻을 불러 일으켜 그 기운을 빌어 수만의 뜨거운 피로 섬나라 민족에 대항해야만 가능하다. 그렇지 못하다면 수많은 정책이 모두 헛되고 쓸모가 없으며, 결국은 자멸의 길로 빠질 것이다. 소위 한 마디 말로 나라를 일으키고자 하는 자는, 자신의 흐르는 피로 말해야 할 것이다.”⁶²⁾라고 소리 높여 질타하고 있다. 안정근의 이러한 글에 대해 청위는 「安重根傳·后序」에서 이 글은 “읽으면 처절함을 느끼게 만든다. 진정 행간의 피눈물이 시문에 비치는 듯하다.”⁶³⁾고 말하고 있다. 또한 그는 이 글을 “구절 구절 금과옥조이고 한 글자 한 글자 피눈물이니, 읽으면 진정 우리 나라 사람들로 하여금 반성하게 하기에 충분하다.”⁶⁴⁾고 평가하고 있다. 나아가 “혈루어를 보매 조선인에게만 권한이 있는 바가 아니고, 게다가 중국인에게도 강함에 빌붙어 약자를 짓밟아 스스로 자멸해서는 안 된다고 경계하고 있다. 우리 중국이 어찌 안중근과 같은 지사의 길을 함께 할 사람이 없을 수 있단 말인가, 의분에 찬 동포가 없단 말인가? 만약 있다면 그 소리를 듣지 않고는 일어날 수 없는가? 우리나라 조정 어르신들은 혼란한 국내는 아랑곳 없이 강한 이웃 나라에 빌붙고자 하지 않는 자가 없으니, 쥐와 여우의 꼴이구나. 백성을 못살게 굴면서 서로 뒤질세라 기름진 배를 불리고 있으니, 뼈만 앙상하도록 피를 빨린 우리 백성들은 물이 말라 버린 연못의 물고기 꼴이구나. 안으로는 내분이 끊이지 않고 밖으로는 이를 틈타 호시탐탐 노리고 있어 온 나라가 위기를 걱정하는데도, 영욕을 위해 망국에는 아랑곳 없이 자신들의 권력만을 지키려는, 조선의 이완용이나 이용구와 같은 매국의 무리가 적지 않다. 여론이 방법이 없고, 관료들도 방법이 없으며, 국법조차 방법이 없으니, 오로지 희망은 애국의 열혈지사에 있도다. 서로 함께 다섯 걸음 피를 흘리면, 혹은 다소 원흉을 경계하게 만들 것이다. 만약 안중근이 우리 중국의 오늘에 태어났다면, 말할 것도 없이 피로써 행하고 의연히 무기를 들고 나설 것이 필연적이라. 그가 무기를 이토 히로부미에게 향하지 않고 먼저 내부에 더 악한 무리인 이완용과 이용구 등을 향했다면 더욱 말할 것도 없을 것이다.”⁶⁵⁾라고 하고 있다.

1918년에서 1919년을 전후한 중국의 현실과 연결지어 생각해 본다면, 청위가 지적하고 있는 중국의 매국노는 곧 북양군벌(北洋軍閥)과 지방군벌(地方軍閥), 특히 그들 가운데 친일파를 가리키고 있다고 볼 수 있다. 1918년 5월 북경 정부는 일본과 ‘중일 육군 공동 방어 협정’과 ‘중일 해군 공동 방어 협정’을 맺음으로서 중국을 침략하려는 일본에게 문을 활

60) 程滄, 『安重根』上篇, 9쪽.

61) 程滄, 『安重根』上篇, 12쪽.

62) 安定根, 「血淚語」, 程滄 『安重根』下篇, 10~11쪽.

63) 程滄, 「后序」, 『安重根』上篇, 4쪽.

64) 程滄, 『安重根』下篇, 8쪽.

65) 程滄, 「后序」, 『安重根』上篇, 4~5쪽.

짜 열어 주었다. 이는 중국 민중의 항거를 불러 일으켜, 재일 중국 유학생들이 학업을 접고 귀국하는 사태를 초래하는 등 5·4운동의 전주곡이 되었다. 5·4운동이 일어난 후 조여림(曹汝霖), 육종여(陸宗輿), 장종상(章宗祥) 등 친일파는 매국노로 손가락질 받게 되었고, 중국의 국내 여론은 대부분 이들 매국노를 성토하면서 당시 조선을 자주 예로 들곤 하였다.⁶⁶⁾ 당시 보수적인 문인에 속했던 청위는 1918년 친일 매국노에 대해 단호한 조치를 취해야 한다고 호소하여 많은 문인들의 호응을 받았다. 이는 당시 중국의 정치적 분위기의 변화를 반영하는 것으로, 당시의 비상 시국에서 직접적인 행동으로 북양 군벌에 항거하기를 사람들은 보편적으로 바라고 있었던 것이다. 이러한 시각에서 본다면 5·4운동 당시 시위 학생들이 조가루(趙家樓: 당시 친일파 관료 조여림의 집-역자주)에 불을 지르고 장종상에게 못매를 가한 행위를 이해하기가 더 쉬워진다.

대혁명(1927년 남창봉기로 시작된 공산주의 혁명-역자주)이 일어나기 이전에 일반인들에게 있어 중국의 정치 전망을 가늠하기란 어려운 상황이었다. 게다가 국민 혁명(1925~1928년 국공합작에 의한 북벌-역자주)은 상상조차 못 했던 보수 문인으로서 청위는 협의지사(俠義之士)에게 희망을 걸 수 밖에 없었다. 왕수남은 헌시에서 “청위는 기꺼이 협의지사가 되고자 하였다.”⁶⁷⁾고 설명하고 있다. 이렇게 청위는 중국인들이 일반적으로 협의지사로 보았던 안중근을 떠올리게 되었던 것이다. 그러므로 청위가 「安重根傳」을 지은 동기는 대체적으로 여기에 있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청위만이 협의를 숭상했던 것이 아니라 청위의 「安重根傳」에 헌사를 지은 이들도 마찬가지로, 스스로도 의협심에 찬 이들이 많았다. 역순정은 “문인과 무인이 예로부터 함께 했으며, 문인이 무인만 못한 것은 하루 아침의 일은 아니다.”⁶⁸⁾라고 했는데, 그 자신도 의협심이 강했다. 청일전쟁 당시 그는 스스로 군대를 이끌고 뗏목을 타고 바다를 건너 동경으로 갔고, 나중에는 대만으로 가서 일본군에 맞서 싸웠다. 그는 스스로를 평가하여 “평생 20여년을 돌아보면, 처음에는 신동으로 재자(才子)가 되었다가, 다시 술꾼과 떠돌이 무사가 되었다. 어려서는 명사(名士), 유생, 학자, 고관이었으나 결국 은사(隱士)가 되었다. 동에 번쩍 서에 번쩍하다가 침거하기도 하니, 스승과 벗들이 빗대어 ‘신룡(神龍)’이라 불렀다. 그 행적에 정함이 없고 유가갈기도 묵가갈기도 하고, 오랑캐갈기도 지혜로운 것 같기도 하니, 하나로 부르기 어렵구나.”⁶⁹⁾라고 말했다. 정선지 역시 ‘春日雜感詩’에서 스스로 과거의 경력을 진술하면서 “태어나 배움을 시작하며 만리행을 생각했네. 부귀에 연연하지 않고 공명을 품지도 않았네. 10세에 서사를 배우니 글로 읊기를 부끄러워 하네. 14세에 무공을 배우고 16세에 능히 병법을 논했네. 20세에 굳은 절개를 좇아지고 세상 사람은 안중에 없었네. 최근 10년여는 머뭇거리다 결국 아무 성과가 없으니, 재능도 힘도 날로 미약해지며 의기로

66) 일례로 북경대 학생이 베이징 시민을 대상으로 ‘이완용과 조선(李完用與朝鮮)’이라는 강연을 하였다. (『五四愛國運動』부록, 선언, 북경 학생 선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79년, 322쪽) 1919년 5월 6일 『晨報』는 ‘고려와 중국의 비교(高麗與中國的比較)’라는 글을 통해, 매국노들이 망국의 원흉이라고 지적하였다. 이렇게 매국노들을 성토하는 과정에서 자연스럽게 안중근을 떠올리게 되었을 것이다. 5·4운동 당시 전국 각지의 학생들이 공연한 연극으로 ‘안중근’, ‘고려 망국사’, ‘조선 망국의 한’ 등이 있었다.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 『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79, 783~785쪽)

67) 王樹枏, 「題白霞居士韓義士安重根傳后四十韻」, 程潛『安重根』上篇, 5쪽.

68) 易順鼎, 「題安重根傳后」, 程潛『安重根』上篇, 6~7쪽.

69) 易順鼎, 「哭庵傳」, 王文濡 편찬, 程大琥&馬美著 주해, 『續古文觀止』, 岳麓書社 2003년, 319쪽.

헛되이 종횡하네. 유량을 끝마친 늑그막에 다행히 처자의 정이 있네. 살아 다섯 술에 먹지 못하니, 죽어 다섯 술에 삶기지 않으리. 명경 속에 탄식하니, 걱정으로 머리를 긁어 슬프게 하네.”⁷⁰⁾ 이를 통해 역순정과 정선지가 소년 시절 의협심이 강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일본과의 항전 당시 민이창(閔爾昌)은 북경에 은거하여 몇 년 동안 집박을 나서지 않았다. 그는 공원에 나가는 것조차 절개를 잃는 것이라 여겼다. 그는 미국 비행기가 폭격하러 날아온다면 자신이 그 폭탄에 죽어도 애석하지 않다고 상상하여, 높은 민족적 기개를 표현하였다.⁷¹⁾

채원배는 일찍이 더욱 암살에 열중하여, 혁명은 폭동과 암살의 두 가지 길만이 있다고 생각하였으며, “또한 암살에는 여성이 더 적절하니, 애국 여학생은 암살의 씨앗을 준비하라.”⁷²⁾고 하였다. 1904년 여름에서 가을 즈음 채원배는 스스로 암살단에 참가하여 비밀리에 폭탄을 시험 제작하였다.⁷³⁾ 실질적으로 5·4운동의 시작은 채원배와 직접적인 관계가 있었으며, 그는 학생들이 실질적인 행동으로 스스로의 애국 열정을 표출하도록 지지하였다.⁷⁴⁾

그러나 더 근본적인 원인은 청위 등이 당시 처한 시대적 배경에 있었다. 앞에서 설명한 바와 같이, 협의지사에 대한 청위 등의 호소는 5·4운동을 전후하여 대혁명이 일어나기 이전까지 현실에 불만을 가졌으나 정치적 활로를 찾지 못한 평범한 문인들이 생각해 낼 수 있었던 투쟁 방법이었던 것이다. 이백사(易白沙)⁷⁵⁾는 1921년 혈혈 단신으로 북경에 가서 북양군벌의 수뇌를 저격하였다. 그가 바로 청위 등이 출현하기를 기대했던 협의지사라고 할 수 있다.

IV. 글을 마치며

안중근의 의거는 중국인들을 크게 흔들어 놓았다. 청위와 청위의 저서 『安重根』을 위해

70) 肖維琪&顧一平, 「南社中的揚州人」, 1991년, 112쪽. 鄭逸梅, 『南社叢談』,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년, 255쪽.

71) 鄭振鐸, 「吳佩孚的生與死」, 『鄭振鐸全集』 제2권, 蟄居散記, 補遺, 五, 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8년, 487쪽.

72) 蔡元培,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蔡元培全集』 제8권,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년, 507쪽.

73) 周天度, 『蔡元培傳』, 人民出版社, 1984년, 30~34쪽.

74) 하사원(何思源)의 기억에 따르면, 1919년 5월 2일 채원배(蔡元培) 교장이 학생 반장과 대표 백 여 명을 소집해 회의를 열어 파리 평화 조약이 중국에 불리하다고 설명하고, 이는 국가 존망이 달린 결정적 시기라고 지적하면서 모두 일어나 나라를 구하자고 호소하였다.(何思源, 「五四運動回憶」, 北京市政協, 『文史資料選編』 제4집, 北京出版社, 1979년, 67쪽) 엽경신(葉景莘), 양경순(梁敬鎔), 정천정(鄭天挺), 당위(唐偉) 등의 기억에 따르면, 북양 정부가 육정상(陸征祥) 등 전권대사에게 훈령을 내려 서명하였다고 채원배가 북경대 학생들에게 알려, 이로 인해 5·4 운동이 일어났다.(高平叔의 『蔡元培年譜長編』 중,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년, 196~197쪽 참고)

75) 이백사(易白沙, 1886~1921): 본명은 명곤(名坤), 자는 월촌(越村). 호남(湖南) 장사(長沙) 사람이다. 한때 오전기(吳傳綺)의 요청에 따라 안휘(安徽)에서 회녕중학(懷寧中學)을 열고, 이어 사범학당(師範學堂), 여환호남중학당(旅皖湖南中學堂) 교장을 맡아 보았다. 신해혁명 이후 청년군 조직에 참여하였고, 2차 혁명 실패 이후 일본에 망명하여, 장사교(章士釗)와 함께 ‘甲寅’ 잡지를 창간하여 원세개를 공격하였다. 1915년부터 ‘新青年’에 글을 발표하여 민주와 과학을 주장하였다. 나중에 남개(南開), 복단(復旦) 등의 대학 교수를 지냈다. 군벌의 혼란상에 불만을 느껴 1919년 호남으로 돌아가 녹산(麓山)에 홀로 은거하며 침울하게 지냈다. 1921년 손중산이 편지로 함께 일을 도모하자고 요청했으나 응하지 않았다. 나중에 홀로 북경으로 가서 북양군벌의 수뇌를 습격할 기회를 엿보았으나 성과가 없자, 단오절에 바다에 뛰어들어 자살하였다.

헌사를 쓴 20여 명은 모두 안중근의 의협심을 칭송하였고, 사람들은 그를 형가나 장량(張良)에 비견하여, “안중근은 형가에 비추어도 더 뛰어나다.”⁷⁶⁾고 하였다. 안중근의 의거는 또한 한국인에 대한 중국인의 인상을 바꾸어 놓았다. 오전기는 시 속에서 “안중근의 이름이 만세에 전하니, 조선에 이러한 협의지사가 나타남으로 해서 조선은 비록 멸망했으나 영광스럽도다.”⁷⁷⁾라고 하였다. 동시에 중국인의 흠모의 정을 불러 일으켜, 중국에도 안중근과 같은 열사가 출현하기를 모두 희망하였다. 왕조(王照)는 “가련하게도 우리 중원은 암담하기에, 형가의 혼이 돌아오기를 읍소한다.”⁷⁸⁾고 하였다. 그러나 그들은 중국의 당시 상황과 결부시켜, 안중근의 이토 히로부미 암살의 효과에 대해서는 서로 다른 견해를 보이기도 하였다. 대다수는 내부의 적 처단이 외부의 적 암살보다 더 중요하다고 여겨, 중국에도 열사가 나타나 매국노를 처단하기를 희망하였으며, 이것이 민족을 멸망에서 구하기 위한 급선무라고 보았다. 이들의 경력과 사상적 배경은 매우 다양하기 때문에, 광범위한 대표성을 가지고 있었다. 철혈주의(鐵血主義)에 대한 그들의 호소는 5·4운동을 전후한 중국 국내의 정치적인 분위기에 큰 변화를 불러 일으켰으며, 새로운 대혁명이 곧 일어날 것임을 예고하는 것이었다.

76) 程涓, 「序」, 「安重根傳」上篇, 1쪽.

77) 吳傳綺, 「俠烈行白霞居士屬作」, 程涓 『安重根』上篇, 6쪽.

78) 程涓, 『安重根』上篇, 10쪽.

【Abstract】

Ahn Jung-geun and China — based on *An Zhong Gen* by Zheng Yu (程涓) —

WANG Yuanzhou

Korean independence fighter Ahn Jung-geun's assassination of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Ito Hirobumi (伊藤博文) was a tremendously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Northeast Asia, one that huge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Korea. Biographies of Ahn, written by the likes of Park Eun-sik and Kim Taek-young living in China at the time, were widely read among the Chinese public. Chinese authors also wrote biographies of Ahn, and his act of bravery was communicated through other media as well, such as stage plays. But Chinese perception on Ahn and the event was not consistent over time, continuously being reinterpreted depending on China's own historic trajectory.

The most commonly accepted interpretation is one that highly regards his act of bravery, using it to instill a sense of patriotism and resistance to outside aggression. But around the time of May 4 Movement, a new interpretive approach emerged, following the call of the time: "Punish the traitors inside, fight the foreign powers outside." It came from the realization that Ahn alone could not have freed the (Joseon) people from aggression — identifying and punishing the traitors inside was as important as fighting outside aggressors, if not more. The biography *An Zhong Gen* (Ahn Jung-geun 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written by a Chinese author provides a good illustration of such new interpretation.

The book was subject to some academic attention but did not get the recognition it deserved. A good example of that is the misunderstanding that it was edited by Zheng Yuan (鄭沅), a calligrapher who wrote the title. Thus this paper will take a close look into Zheng Yu's thoughts expressed through the Ahn event an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ituation surrounding the book.

Who is the Editor?

First, let us look at who the editor of *An Zhong Gen* really i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Zheng Yu is the editor, but because most of the scholars discussing the book thought it was Zheng Yuan,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is question at this point.

Zheng Yu explicitly states in the epilogue: "I collected Ahn's historic records and used it as the introduction, and wanted to publish a book of poems about the event written together with my contemporaries. I also discovered the "Words in Bloody Tears" written by Jeong-geun, younger brother of Ahn Jung-geun."¹⁾

1) Zheng Yu (程涓), Epilogue, *An Zhong Gen* (安重根) Book 1, page 4.

In addi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An Zhong Gen* Book 1, “An Zhong Gen Biography” and the epilogue are all signed by Zheng Yu, leaving no doubt as to who the author is.

And the tributes in Book 1, as evidenced by the above-quoted epilogue, are written by experts related to Zheng Yu. Wang Shu Nan’s (王树楠) tribute 題白菴居士韓義士安重根傳後四十韻 and Wu Chuan Qi’s (吴传琦) 俠烈行白菴居士屬作 all directly mention “Bai jia ju shi (白菴居士),” Zheng Yu’s pen-name, clearly indicating the association. They wrote the tributes at the behest of Zheng Yu, and he himself collected and edited them. The epilogue also indicates that Ahn Jeong-geun’s “Words in Bloody Tears” in Book 2 is included by Zheng Yu as an “appendix to Ahn Jung-geun’s biography.”²⁾

Then was the content of *An Zhong Gen* Biography collected by Zheng Yuan, as believed by Han Shi Jun (韩诗俊)? As explained above, Zheng Yu wrote in the epilogue “I collected Ahn’s historic records and used it in the introduction,” showing that it is Zheng Yu who edited and included it. It is also supported by what Zheng Yu wrote in the introduction: “I widely review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dded footnotes and published it as a biography.”³⁾

In addition, looking at some of the statements in the epilogue quoted above, Zheng Yu put together the records (which he edited), “An Zhong Gen Biography” (which he wrote),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tributes, and was getting ready to send them to a print shop. Tang Ji (唐桂) in his tribute wrote, “Zheng Yu is turning the wheels of history so boldly that no one else can come close. He sent me a pile of documents last night saying it’s the biography of the great hero, Ahn Jung-geun of Korea.”⁴⁾ The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show that Zheng Yu personally edited *An Zhong Gen* and sent it to the print shop, while Zheng Yuan only wrote the title with his brush and otherwise has no association with the book. Zheng Yu was also an accomplished calligrapher as well as an avid collector of Chinese paintings, and widely networked with calligraphers and painters. Zheng Yuan was a well-known calligrapher at the time, which makes it hardly surprising that Zheng Yu requested that he pen the book title.

Timing of Authorship by Content

Zheng Yu’s *An Zhong Gen* comes without any indication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or year, but it is generally estimated to be later than March 1, 1920, based on the Ahn Jeong-geun’s “Words in Bloody Tears” included at the end of the book. But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it was published later than 1920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n “Words in Bloody Tears,” Ahn Jeong-geun writes “two years before (前年)” when indicating the Chinese military’s crackdown of Koreans’ protest in Longjing (龍井) in March 13, 1919. But these inferences are groundless. In Korean “前年” sometimes means “the year before” and Ahn Jeong-geun’s writing specifically says that it was written 10 years after his brother’s death and published in the inaugural issue of *New Korean Youth*, launched in March 1920. Thus, it is impossible to conclude that “Words in Bloody Tears” was written in or after 1921: 1920 is the likeliest.⁵⁾

2) Zheng Yu (程涓), Epilogue, *An Zhong Gen* (安重根) Book 1, page 5.

3) Zheng Yu (程涓), Epilogue, *An Zhong Gen* (安重根) Book 1, page 1.

4) Zheng Yu (程涓), *An Zhong Gen* (安重根) Book 1, page 8, Tang Ji’s tribute.

Then when was each part of the book written?

First, it can be assumed that the main part of the book was written before March 1, 1920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epilogue, which stated that Zheong Yu “wanted to publish a book...I also discovered the ‘Words in Bloody Tears’ written by Jeong-geun, younger brother of Ahn Jung-geun, in periodicals in and outside of China.”

Second, the tributes also give hints at the timing of writing. Wang Shu Nan’s (王树楠, 1851-1936) 「题白菰居士韩义士安重根传後四十韵」 is also published in Book 10 of 『陶廬詩續集』(『斜街花市集』), where it states that it was written in 1918. This shows that Zheng Yu’s “An Zhong Geun Biography” was written at the latest in 1918, and that he started to ask for tributes to others around this time. Most tributes, except Yang Qi Chao’s (梁启超) 秋風斷藤曲, were written between 1918 and 1919.

Who is Zheng Yu?

Then who was the author, Zheng Yu?

Zheng Yu (程涓, 1870~1940), was born in Yanghu (阳湖, today’s Wujinxian (武进县)), Jiang Su Province, and was given the alias Bai Jia (白菰) and pen name Jia Shen Ju Shi (菰深居士). He served as a Chinese assistant to the English missionary Richard Timothy when young. In 1900, upon learning of the Yang Wu Movement by Shen Zhong Li (沈仲力) in Shan Xi, he joined them with Timothy and was put in charge of Shan Xi publishing bureau and launched Jin newsletter (晋报) and Shanxi newsletter (山西白话报).

An enthusiastic collector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Zheng Yu himself was an accomplished calligrapher. He was also quite skillful in stamp etching, and “Zheng Yu prints (程涓印存)” have been passed down for a long time. He also enjoyed writing poems, trading them with the likes of Zhao Xi (赵熙) and Yi Shun Ding (易顺鼎).

In his later years Zheng became deeply interested in Gong Jiao (孔教: a reformist Confucianist movemen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published “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 in May 1933 through Shanghai Morality Society. In 1934, Zheng published the first part of “读经救国论,” followed by the second and the last books in 1935, and insisted that each school teach them as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He died of an illness in 1940 in Shanghai.

Tributes by the Luminaries of the Time

This small book by Zheng Yu is worthy of attention for another reason: all of the writers contributing tributes were luminaries of the time. The book includes 24 tributes written by: Wang Shu Nan (王树楠), Wu Chuan Qi (吴传琦), Yi Shun Ding (易顺鼎), Zhao Ling Seng (昭陵僧), Jia En Fu (贾恩馥), Tao Yong

5) Kim Chun-seon, “Chinese Views on Ahn Jung-geun’s Act”, Study of Korean Modern History, summer edition, 2005 (book no. 33).

(陶镛), Tang Ji (唐桂), Cai Yuan Pei (蔡元培), Di Yu (狄郁), Wang Zhao (王照), Min Er Chang (闵尔昌), Jiang Kang Hu (江亢虎), Yao Ji Ying (姚季英), Cha Shi Duan (查士端), Wang Yang (汪洋), Wang Dao (王焘), Chen Xi Qi (陈锡麒), Luo Jia Ling (罗伽陵), Chen Yuan Chun (陈鸳春), Ye Zhou (叶舟), Cheng Shan Zhi (程善之), Cheng Mei Zhi (程美之), Bi Shu Wei (费树蔚), and Liang Qi Chao (梁启超).

Of these, Cai Yuan Pei and Liang Qi Chao are familiar even to the Chinese public and need no additional introduction.

Wang Shu Nan (王树楠, 1851~1936): Alias Jin Qing (晋卿), penname Tao Lu Lao Ren (陶庐老人). Born in Xincheng, Hebei Province. Before the Xinhai revolution, he served as the administrator of Xinjiang (新疆),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was the head of the Qing history administration, and left dozens of writings such as 『文莫室诗集』, 『陶庐文集』, 『陶庐文内集』, 『陶庐诗续集』.

Wu Chuan Qi (吴传琦, 1858-1934): Alias Ji Bai (季白). Born in Huaining, Anhui Province. Later lived in Anjing (安庆). Served in the Yongning administr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n the later years of Qing Dynasty. Later resigned from government posts and opened a modern school in Anjing, founded a private library. After the Chinese republic was founded, he served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Anhui Commercial Journal and the head of Anhui Provincial library. He also founded the Anhui common education center. He also wrote dozens of books including 『說文偶義』.

Yi Shun Ding (易顺鼎, 1858-1920): Alias Shi Pu (实甫). Born in Chengguanzhen, Longyang, Hunan Province. A prominent poet who was largely acknowledged as a child prodigy from the age of five. Became well-known for his call to keep fighting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Qing-Japan war. In the later years of Qing Dynasty, he served as the circuit intendant (道台) in such regions as Guangxi, Yunnan and Guangdong. Dur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he stayed in Beijing and joined Yuan Shi Kai's (袁世凯) forces. When Yuan failed, he roamed around Beijing, whiling away in partying and women. He wrote 『琴志楼丛书』.

Jiang Kang Hu (江亢虎, 1883-1954): Name is Shao Quan (绍铨). Born in Yiyang, Jiangxi Province. Served in the ministry of punishment and Jingshi university during the later years of Qing Dynasty. Visited Japan and Europe several times since 1901 for academic pursuits. One of the earliest socialists of China. Founded the Chinese Socialist Party in November 1911. Joined the Wang Wei government in 1939, and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1946 for espionage. His books include: 『无我庐文存』, 『无我庐诗存』, 『江亢虎文存初編』. Was a member of Nanshe (南社).

Tao Yong (陶镛, 1895—1985): Name Shan Yong (善镛), alias Yong Shao (咏韶). Born in Suzhou, Jiangxi Province. Served as a professor since 1918 in cities such as Changshao, Nanjing and Kaifeng. Cai Yuan Pei praised him as the pioneer of new style of Chinese painting.

Di Yu (狄郁): Born in Henan Province. Called for a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Wrote 『孔教评议』.

Wang Zhao (王照, 1859-1933): Alias Xiaohang (小航). Born in Ninghe (today's Tianjin), Hebei Province. Took part in the intellectuals movement in 1898 (戊戌变法) but went on exile in Japan after its failure. Later became famous for "Letters for Combining the Sounds of Mandarin (官话合声字母)".

Min Er Chang (闵尔昌, 1872-1948): Alias Bao Zhi (葆之). Was a confidant of Yuan Shi Kai. Became

professor of Furen University in 1927. Wrote 『云海楼诗存』 and 『雷塘词』, and compiled or edited 60 publications including 『碑传集补』.

Cha Shi Duan (查士端, 1877-1961): Indicates Cha Zhong Li (查忠礼). Born in Yuanhuazhen, Haining, Zhejiang Province. Joined the Xinhai revolution by forming a students' militia. Changed course in 1926 to work for the press, founding the Xiao daily (小日报) in Shanghai.

Wang Yang (汪洋, 1878-1921): Alias Zishi (子实). Born in Jingde, Anhui Province, but grew up in Yangzhou (扬州). Served as a teacher in primary school, later went to work for the press. Joined the People's Party (国民党)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Was a poem enthusiast and member of Nanshe. Wrote 『息影枝谈』, 『影生杂记』, 『台湾』.

Bi Shu Wei (費樹蔚, 1883-1935): Alias Zhong Shen (仲深), penname Wei Zhai (韦斋). Born in Donglizhen, Wujiang, Jiangsu Province. Daughter of Wu Da Cheng (吳大澂). Lived in seclusion in Suzhou since 1916, exchanged poems with Zhang Tai Yan (章太炎), Jin Song Cen (金松岑) and Zhang Zhong Ren (张仲仁). Along with Zhang Zhong Ren, known as the "two Zhong's of Suzhou (苏州二仲)." Once served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Xinfu Bank and president of the Red Cross in Wujiang. Wrote 『费韦斋集』.

Luo Jia Ling (罗伽陵, 1864-1932): Born in Shanghai. In 1886, married the Jewish English tycoon Silas Aaron Hardoon in Shanghai, and lived in the then famous Hardoon Garden, or Ai Li Yuan (爱俪园). Luo was not able to read and write, but published her works through dictation.

As can be seen by the short biographies of the tribute contributors, they came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Thus, the tributes also came to reflect the different thoughts of the people with vastly different backgrounds.

Zheng Yu's Ideologies

Perhaps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Zheng Yu's *An Zhong Gen* is "An Zhong Gen Biography" written by himself, and the tributes.

A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Zheng informs the readers in the inner cover: "This book explains that if Joseon's Ahn Jung-geun had dealt with traitors like Lee Wan-yong and Lee Yong-gu before his country collapsed, Joseon would not have fallen (those who disrupt the country from inside have sinned as gravely as the traitors), and that his assassination of Ito Hirobumi after his country's fall was too late, and rather hastened its final collapse. Mengzi once said, 'A country fells itself first, then gets conquered by another (國必自伐, 然後人伐之).' Joseon chose the path of demise, what did it have to do with Ito Hirobumi? A patriot who loves his country should realize this first and foremost."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book's postscript and tributes that most of the luminaries of the time agreed with Zheng Yu. But Bi Shu Wei stuck to the belief that it was better to assassinate Ito Hirobumi than punish traitors like Lee Wan-yong, under the argument that unless you deal with the outside enemy, there will always be traitors inside who are manipulated by such enemy.

When Zheng Yu called for punishment of the enemy within, or the traitors, he actually meant the situation within China at the time. Such intent is clearly stated in the introduction. As to why he was writing in memory of Ahn Jung-geun, he specified: "To urge our future generation, who will not tolerate the fall of our nation, to wield their sword first to those who are driving the nation to the brink, and to let

those who wish to drive the nation to the brink, know of such heroes as Ahn and to make them tremble in fear!”⁶⁾

Then who are the “traitors” as pointed out Zheng Yu and Tao Yi (陶毅)? Regarding the state of China, Zheng gave the following scathing criticism: “Of the elders in our nation’s court, none makes it secret their desire to ingratiate themselves to the surrounding powers, with utter disregard for the internal confusion, just like a herd of mice and foxes. They suck the life out of the commoners to fatten their greasy stomachs, leaving our bone-dry people like fish in a dried-up pond. Infighting never ceases, enemies outside look on for the smallest chance, the whole nation is in despair, but there are those, like Joseon’s traitorous Lee Wan-yong and Lee Yong-gu, who only seek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and hold onto their power with no regard for the future of their nation.”⁷⁾

Considering China’s situation in 1918 and 1919, the traitors according to Zheng are likely to be the north China army (北洋军阀) and provincial army (地方军阀), especially the pro-Japanese faction among them. In May 1918, the government of Beijing signed the “Sino-Japan Army Joint Defense Agreement” and “Sino-Japan Navy Joint Defense Agreement,” essentially opening wide the doors for Japan who was just looking for a chance to attack China. The agreements led to people’s uprising, prompting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to return to their mother country, and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May 4 movement. After the May 4 movement, Japan sympathizers such as Cao Ru Lin (曹汝霖), Lu Zong Yu (陆宗輿), Zhang Zong Xiang (章宗祥) were labeled as traitors. The public opinion was harsh against them, and Joseon was often cited as the example of the damage they could do.⁸⁾ In 1918, Zheng, considered a conservative writer, called for decisive actions against traitors, supported by many other literary figures. This was a reflec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the time, when people generally wished to fight the north China army with direct action. This makes it easier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 protestors of May 4 movement setting fire to Cao Ru Lin’s house and beating Zhang Zong Xiang.

Before the 1927 Communist revolution, for most people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predict the future of China’s politics. As a conservative writer who could not even imagine such a thing as the people’s revolution (the joint northern attack by the G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y in 1925-1928), Zheng Yu had no choice but to pin his hopes on righteous heroes. Wang Shu Nan wrote in his tribute, “Zheng Yu would have gladly become a patriotic hero.”⁹⁾ And this is how Zheng Yu was reminded of Ahn Jung-

6) Zheng Yu, Introduction, *An Zhong Gen*, Book 1, page 1.

7) Zheng Yu, Epilogue, *An Zhong Gen*, Book 1, page 4~5.

8) For example, a Beijing University student gave a speech entitled, “Lee Wan-yong and Joseon” to the citizens. (“May 4 Patriotic Movement (五四愛國運動)” appendix, declaration, Beijing students’ declar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er, 1979, page 322) On May 6, 1919, the Morning Daily (晨報), in a report titled, “Comparison of Goryeo and China” concluded that traitors are the culprits of a nation’s downfall. It was in the course of denouncing traitors that they thought of Ahn Jung-geun. During the May 4 movement, there were stage plays by students nationwide titled, “Ahn Jung-geun,” “History of Goryeo’s Downfall,” “Tragedy of Joseon’s Downfall.”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Modern History Institute, “May 4 Patriotic Movement “ book 2,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er, 1979, page 783~785.)

geun, widely regarded by the Chinese public as a patriotic hero. This seems to be the motivation for Zheng Yu to write An Zhong Gen Biography.

Appeal to patriotic heroes by Zheng Yu and others was the most feasible way of struggle that could be thought of by the literati who were disgruntled with reality but could not find a political breakthrough, at least until the May 4 movement. In 1921, Yi Bai Sha (易白沙) traveled alone to Beijing and shot one of the key leaders of the north China army. He was the kind of patriotic hero that Zheng Yu and fellow writers were waiting for.

Thus, Zheng Yu's thoughts expressed through An Zhong Gen reveal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Ahn's act was re-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China.

9) Wang Shu Nan, 「题白葭居士韓父士安重根传后四十韵」, Zheng Yu, "An Zhong Gen" Book 1, page 5.

近代东亚的朝鲜因素与日本 军制变化

■ 徐 勇 (北京大學校) ■

近代东亚的朝鲜因素与日本军制变化

徐 勇 (北京大學校)

〈目 次〉

- I. 朝鲜战略地位与东亚国家近代关系的展开
- II. 朝鲜半岛危机与中日对立
- III. 日本 “外征型军队” 之扩军体制整建
- IV. 日本新军制的实战及朝鲜的沦陷

摘 要：在近代中、朝、日、俄等国家关系的互动过程中，朝鲜半岛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及地缘战略位置，成为了当时东亚国家关系的矛盾焦点。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虽然试图维护东亚地域的和平关系，但被日军的武力政策所打破。明治政府颁布《参谋本部条例》等条例，强化了日军的中央指挥体系；同时为遂行境外大规模战争任务，1888年以师团制取代安内守备型的“镇台”制，“外征型军队”正式成军。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军制变革及其军队力量的强化，是利用其新建外征型军队，在侵略中国、对俄作战争以及吞并朝鲜半岛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关键词：近代东亚；朝鲜；因素；日本军制；外征；

近代东亚是一个充满着激烈冲突与深刻变动的地域。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制订并实际地推行海、陆两方面的扩张政策，其间木户孝允等强硬派提出了“征韩论”，在日本朝野愈演愈烈。日本的对外扩张受到朝鲜的抵抗，清政府也采取了以援助朝鲜、维护传统华夷秩序为中心的对日外交政策。于是，中、朝、日、俄诸国在政治外交军事诸领域的互动，使朝鲜半岛成为了当时东亚国家关系的矛盾焦点。

日本的扩张以武力为后盾，而其武力的整建过程，又是在扩张行动中完成的。期间，日本实施征兵制，大力扩张武力，军政当局以中朝两国为假想敌，将戊辰战争、西南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安内守备的镇台制，改建为在朝鲜半岛和大陆用兵为目标的师团制，随即付之实战发动侵略中朝两国的甲午战争。该时期日本军制变化的根本特点，是为遂行境外大规模战争任务，决定了其外征型军队基本性质的形成。本文拟对日本制定对外侵略政策并整建外征型军队的过程、特别是因应朝鲜等国家关系而出现变化的史实，作一初步分析。

I. 朝鲜战略地位与东亚国家近代关系的展开

19世纪中后期，东亚国际关系进入了动荡的转变过程。1871年7月在天津，清廷以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李鸿章担任全权大臣，同日本议约专使大藏卿伊达宗臣、副使柳原前光开始了订约通商的谈判。同年9月13日缔结了清日《修好条规》(共18条)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33条)。

双方的谈判曲折复杂, 条约内容也遭受到外界的关注或压力。其第二条所定“彼此相助”, 曾被指为对付西方的“攻守同盟”。美国率先照会日本外务卿, 法德等国随之, 对日施加压力。日本国内也有反对与改约的意见, 认为条约未能满足日方有关治外法权等要求。但清廷在改约谈判中没有让步。清廷以“断不能尽同”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攀比于西方列强的特权要求, 同时也表达了具有变通意义的、视日本为非属国的对等立场。日方大体接受了中方的议案, 故滨下武志指出清廷把握着谈判订约的“主导性”。¹⁾

清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日两国成立的第一个较为平等的邦交条约, 条约不仅直接规定了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 也必然要极大影响到东亚国家关系。该条规开章强调: “大清国、大日本国素敦友谊, 历有年所, 兹欲同修旧好, 益固邦交”。确认了两国“素敦友谊”历史关系, 规定了今后继续以和平友好为邦交原则。

条约第一条规定双方对于“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 不可稍有侵越, 俾获永久安全。”按此规定, 中日两国应在和平安全的原则下, 承认东亚旧有格局, 维护传统的国家关系的安定因素, 包括维持既有上千年的朝鲜的自主地位。条约的谈判与表述方式, 较东亚传统的礼仪型邦交关系有甚大区别, 有评论说“可以将这一条约看成东亚国际关系进入近代标志的条约的嚆矢”。²⁾

但在双方换约之后, 日本即使用当时尚不完善的武力, 南下出兵台湾, 进行“琉球处分”, 随即集中力量与北方继续“征韩”, 大规模向朝鲜半岛和大陆方向扩张, 使条规所规定的“倍敦和谊”及礼待“两国所属邦土”等原则受到了严重冲击。因此, 位居中日两国领土之间的朝鲜半岛, 由于其特殊的地缘及历史传统因素, 终于成为了当时中日对立、及东亚地区的焦点问题。

作为焦点问题的朝鲜因素, 其实包含了传统关系中的中、朝、日三国关系的互动问题。对于东亚传统华夷秩序中的最后一个史例——中韩关系问题, 其间确实包含了清廷自居为上国、对朝鲜以属国的不对等的礼仪关系, 但就主权及德义的角度而言, 双方的共存互助关系也是长期存在的。黄遵宪在1880年间加以描述: “字小以德, 事大以礼。”黄遵宪特别强调: “朝鲜为我藩属, 已历千年。中国绥之以德、怀之以恩, 未尝有土地人民之心, 此天下之所信者也”。³⁾按驻日公使何如璋指令, 黄遵宪起草《朝鲜策略》, 向朝鲜建议应该“亲清”、“结日”、“连美”, 直接表达了中方对朝鲜的不干涉其自主地位的态度。

按冈本隆司等新近成果, 传统清韩关系集中表现于“属国自主”的概念阐释之中, 目前学界各有看法, 即令当时马建中、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 于“属国”与“自主”二者轻重比例亦有不同解释, 但两国在“属国”前提之下, 宗主国没有否定属国主权、亦未干涉其内政的史实是存在的, 而且这是与以暴力为后盾的统治与占领为特征的“近代西洋国际秩序”的具有不同性质。⁴⁾

但和平意义的东亚传统国家关系, 很快就为新崛起的日本武力政策所打破。日军出兵台湾, 随即实施“琉球处分”, 存在上千年的琉球国灭亡。朝鲜半岛随之受到冲击, 且形势不断恶化。清廷不得不努力采取对策, 按李鸿章的说法: “琉球既为所废, 朝鲜有厝火积薪之势, 西洋各国又将环视而起, 自不能不为借箸代筹。”⁵⁾冈本隆司的结论大体相同: “陆奥外交固执强求已经是残存的微弱的自主,

1) (日)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49页。

2) (日)滨下武志著, 朱荫贵等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49页。

3) 黄遵宪《朝鲜策略》, 见《日本外交文书》第13卷, (东京)日本国际连合协会, 昭和38年再版, 第390页。

4) 参考(日)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绪论第二章及结论,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4年10月; 另参考川岛真、服部龙二等:《东アジア国际政治史》,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 第23页。

5) 李鸿章:《论劝导朝鲜通商》, 光绪五年七月十二日,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9, 第34页。

将从清朝脱离进行独立的要求强加于朝鲜之时，就已经演变成了日清战争不可避免的局势。”并由此而“导致东亚局势之大变”。⁶⁾

II. 朝鲜半岛危机与中日对立

日本在推行其大陆侵略政策过程中，清、韩两国成为被侵略的主要对象。朝鲜半岛由于其独特的地缘位置，更是首先遭受日本侵略势力的冲击。1869年1月23日，明治政府遣使朝鲜，通告日本实行王政复古，其国书使用了“我皇即位，重整纲纪”等字样，不符合前有两国交往文书格式，被朝方拒绝接受。

于是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由木户孝允等强硬派首倡“征韩论”，以作为“他日大兴帝国”之机。⁷⁾强硬的“征韩论”在日本朝野愈演愈烈，1870年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在《朝鲜论稿》中提出了夺取朝鲜乃日后经营世界的基地的设想。⁸⁾1872年9月，外务大丞花房义质率军舰春日号侵入朝鲜，接管釜山的草梁倭馆，1875年日本军舰再度侵犯汉江口的江华岛及釜山等地。这一系列行动，迫使朝鲜于1876年2月26日订立不平等的《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规》(通称江华岛条约)，否定朝鲜同清国的宗属关系，规定日本在汉城设立使馆，强迫开放釜山、元山、仁川诸港，日本向各港口派遣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等；作为开港权益的延长，翌年又在釜山等地相继开辟了租借地。⁹⁾

1879年“琉球处分”得手，进入80年代日本加速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行动。1882年7月汉城发生军人暴动，日本出兵干涉，是为壬午事变。8月30日，日本迫朝鲜于订立日本可以驻兵使馆及赔款等事项的《济物浦条约》。朝鲜地位遭受严重削弱，清日两国也在朝鲜京城形成对峙局势。

1884年11月，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制定甲、乙两案，后来实施了“发动内乱”的甲案，指使金玉均等开化党发动了“甲申事变”，杀害了主政的闵妃派要人。面对事变清廷亦迅速派兵，联合朝军击败了日军支持的叛军。但日本却充分施加外交压力，迫朝鲜于1885年1月9日签订了《汉城条约》，朝鲜再度向日本道歉并支付赔款。

在此不断恶化的形势期间，清廷按旧例加强发展对朝鲜的贸易，提供低息或无息借款，兴办汉城至釜山、仁川、宜州等地等多项电线工程，改善防务通讯，发展朝鲜版的洋务运动。“支援朝鲜政府渡过难关，也对密切中朝友好关系有利”。¹⁰⁾1882年10月1日(光绪八年八月二十日)，在天津缔结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规定：“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¹¹⁾再有1883年9月《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专条规定：“应遵照体制，朝鲜必须尊称‘天朝’或称‘上国’字样…。至吉省边界官员，则称‘朝鲜国’或称‘贵国’字样，以示优待”。¹²⁾以法权形式，一度加强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但清廷的基本方针是维持朝鲜的自主地位，并否定了当时国内以及来自境外的划朝鲜为行省的建议。

6) (日)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10月，第383页。

7)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1页。

8)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外务省，1978年，第149页。

9)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9、162页。

10) 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3页。

11) 本章程见“光绪条约”，卷59；又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5-466页。

12) 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7页。

甲申事变使中日双方在半岛上的对立尖锐化。其时，中法战争前途未卜，清政府命密探日本方面的消息动向¹³⁾。但清政府对日本战略意图并不明了，指示处理朝事方针是“以定乱弭衅为主”。¹⁴⁾ 1885年3月24及29日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并攻克谅山，但战争尚未结束。为避免两线吃紧，清政府采取了处理台事专约那样的息事宁人方针。

李鸿章与日本国特派全权大使伊藤博文的谈判，自二月十八日在天津开谈，双方共举行6次会谈。李鸿章基于与朝鲜传统的宗藩关系，强调应朝王之请，中国可随时向朝鲜派兵，且与日本“无涉”。但日方蓄意否定中国在朝鲜的传统的宗主权，要求以条约形式确立日本在朝鲜拥有与中国同等的权利。伊藤的目标出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预想，但清政府最终妥协。谕令李鸿章：“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该督务当力与辩论，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述‘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亦不在前条之例’数语，尚属可行。”¹⁵⁾ 由于清廷的妥协，双方终就撤兵、聘请教练及派兵问题达成协议。三月初四(1885年4月18日)签署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或称“朝鲜撤兵条约”。条约规定：

“一、议定中国撤驻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

一、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主事。嗣后中日两国均无派员在朝鲜教练。

一、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¹⁶⁾

同时由全权大臣致日本大使照会：

“照得上年十月朝鲜汉城之变，中国官兵与日本官兵在朝鲜王宫争鬪一节，实出两国国家意料之外，本大臣殊为惋惜。惟念中日两国和好年久，中国兵官等虽一时情急，不得已而争鬪，究未能小心将事，应由本大臣行文戒饬。至贵大使送阅日本民人多奴之辅妻等供状，谓汉城内有华兵入屋掠夺、戕毙人命情事，但中国并无的确证据，自应由本大臣派员访查明确，取具供证，如果当日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杀掠日民确有见证，定照中国军法从严拿办。”¹⁷⁾

共同派兵权的规定是否导致战争，关键决定于是否具有并吞朝鲜之意愿。李鸿章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多次表示中国没有侵占朝鲜之心，同时再三要求日本表明态度不要侵犯朝鲜。第6次会谈就撤兵的具体条款达成协议，李鸿章再次提到伊藤所谓丝毫没有并吞朝鲜之意的保证。¹⁸⁾

甲申事变后，6月日本罢免竹添公使，表示承认政变责任。7月两国军队撤离。由于中方轻易让步，使共同派兵的条约第3款成立。但是，对于刻意寻机出兵以达成扩张目标的日军来说，该条约不仅没能约束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扩张反而得到了法理保障。日本完全达到了既定的目标，而清政府制定的交涉方针被打破，遭受了战略与外交的严重挫折。

当时担任外相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得意地作出评价：“该约确为表示两国在朝鲜权力均

13) 《军机处电寄黎庶昌徐承祖谕旨》(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第24页。

14) 参阅戴东阳《徐承祖与中日〈天津条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5)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8，第6页。

16) 本专条及照会见“光绪条约”，卷19；又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5-466页。

17) 本专条及照会见“光绪条约”，卷19；又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5-466页。

18) 《天津談判筆記(第六)》(1885年4月15日)，《明治文化全集·外交篇》第11卷，第310页。

等之唯一明文，除此则中日两国间并无任何保障存在。……该政府订结有如此条款之约，殆受一大打击。而从来中国所唱属邦论之理论，亦因之大灭杀其效力，则已无丝毫可疑之点矣。”¹⁹⁾

天津会议专条的缔结，丝毫没有减缓两国对立与冲突。如同中法陆上战争一样，清廷没能充分利用在汉城有限的军事胜利以巩固或扩充外交成果，致使日军80年代在汉城两次战斗失利之后，不仅迫使朝鲜订立有利于日本的条约，更积聚能量重整军备，于90年代卷土重来。于是以朝鲜问题为焦点，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清日战争。日本通过战争手段，终将朝鲜控制在手，清廷则割地赔款遭受空前巨创。

III. 日本 “外征型军队” 之扩军体制整建

在明治政府诸项维新政策中，“富国强兵” 位居 “殖产兴业”、“文明开化” 政策之前。1868 年，尚无直辖军队的明治政府宣布向各藩征兵，至1871 年 2 月，由萨摩、长 州、土佐三藩藩兵编成 “御亲兵” 约 1 万人。明治逐步将军权收归中央。首先设置东山道(本部设在石卷)和西海道(本部设在小仓)两个镇台，在这两个镇台的基础上，明治四年八月重新改组设置东京、大阪、镇西(熊本)、东北(仙台)四个镇台，随后又增设了名古屋、广岛两个镇台。

镇台一词在幕末既有 “江户镇台”、“大阪镇台” 之用。四镇台制将原各藩的常备兵解散，重组为政府的常备兵。明治政府于此完成了军队国家化、中央化课题，政府常备军数量也大幅度上升到近四万人(以上均不包括海军)。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12)下达 《征兵诏书》 和 《征兵谕告》，实行全民皆兵制度，扩建陆军常备军。镇台制体制下的日本军队，其主体性质尚属安内守备型军队。

明治政府为强化军队力量而不断推进军制变革。1886年(明治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日皇裁可的 《敕令参谋本部条例》 颁布，规定本部长由皇族一人依敕担任，担任平时的陆海军之定制节度、及战时有关军令之参划裁决，在参谋本部重大繁多的权力事项中，其第十一条规定，设置 “陆军部第二局担任详尽洞悉外国的兵制、地理、政制诸事项，主掌作战计划之辟划”。这一系列措施完善了日军的中央指挥体系。

为充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又一次全面调整了陆军的序列编成。1888年(明治廿一年五月十二日)经日皇裁可，颁布废止镇台条例、组建师团司令部部的敕令、即 《师团司令部条例》。其第一条规定：“授师团长以中将直隶于皇帝陛下统率师管之内军队总理相关军事之诸件事项”。第二条规定：“师团长整理师管内军队之出师准备，统辖征兵事项”。

上述参谋本部条例与师团司令部条例的颁布，标志着近代日本陆军正式成军。上述条例消除了维新后新建陆军的地域性、地方治安性格，使新建陆军在日皇的名义之下，形成在国内政治中最为强大的势力集团，在对外用兵之际不再遭受1885年建立的内阁政府的制肘。

1888年5月师团制条令颁布，以新式师团取代原有 “镇台” 制。师团是为遂行境外大规模战争任务的日军战略单位，新建师团能够适应境外大规模野战环境，以之取代安内守备型的 “镇台” 制，标志着日本 “外征型军队”、亦即其近代陆军正式成军。

师团制确立之政治意义还有，近代日军建军之初，对其内外职能的设计便有巨大认识分歧。曾有三浦梧楼倡导 “护乡军”，以及 “月耀会” 等强调建立 “国土防卫” 型而非 “外征型军队” 等等主张，而山

19) 陆奥宗光著、龚德柏译：《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原名 《蹇蹇录》)，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初版，第7-8页。

县有朋、大山岩等主张军扩，要求实行三年制普遍兵役、按西方军队战略单位军团的任务标准，组建日军的师团制并以之为战略单位，进入战时可以在师团之上编组更大的作战集团。山县等人的强化军国主义主张取得支配地位，由明治18年(1885)实施的十年军备计划确定实行师团制。师团制的组建“是为外征所必需的近代军备的大幅度强化，”着眼点为出兵朝鲜、清国之用，具备有迅速实施外向攻击。²⁰⁾ 1888年师团制的确立及其实行，标志着山县等人的组建强大“外征型军队”的主张被正式推行。

在组建国家军队之同时，明治政府强化了对外扩张性的对外政策。1868年4月6日，以天皇名义发布了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御笔信)，规定日本对外总方针是：“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²¹⁾ 1870年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在《朝鲜论稿》中提出了夺取朝鲜乃日后经营世界的基地的设想。²²⁾ 1874年在日军进攻台湾之际，山县有朋提出了《外征三策》，表示“北上直隶”、“直捣天津”乃“成竹在胸”。1876年日本通过《江华岛条约》打开朝鲜国门之后，加紧对中国进行军事侦察。

1879年至1880年，日军参谋本部先后派出桂太郎等十余批军官到中国、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刺探各种情报，1880年11月，根据历年军事情报，由山县有朋向天皇进呈《邻邦兵备略》，提出了日本的要务是扩充军备，强兵优于其它一切施政措施。²³⁾ 被称为“日本军国之父”的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曾借此书上奏日皇，强调以“强兵”为“富国”之本，确立军事优先发展的方针。

在80年代，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半岛的攻防战一再升级，清朝政府加强了北洋水师的建设，日本也加强扩军备战。山县与大藏卿松方正义商议增加烟草等税以充扩军费用，山县上奏天皇：“将我帝国比作一大铁舰，以刚毅勇敢之精神展示实力于四方”。²⁴⁾ 天皇曾下诏六年内每年从宫廷储备金中支出30万日元，要求文武官员拿出十分之一薪俸，以充造舰费用。1890年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出了不仅要守卫“主权线”而且要夺取境外的“利益线”，强化了进攻型的对外战略方针。

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传统武士道的尚武文化基础上，强化战争精神。1869年建立东京招魂社，明治天皇参拜。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名义上是为祭奠所有的卫国战死者，但只从无数死者中挑出终于皇室的日本军人和文职人员予以祭奠。其余的为数众多的战死者、战死的普通百姓，还有为国事而捐躯的如西乡隆盛，长冈白虎队战死者等，只要是反对政府的也不能进入神社享受。靖国神社对于倡导对皇室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871颁布陆海军共同的《读法》，强调了发挥皇威等四条原则。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发《军人敕谕》，宣布“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以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头首”。²⁵⁾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强调“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²⁶⁾ 《军人敕谕》及《教育敕语》被规定为军人和国民必须严格遵循、随时甚至是早晚奉读的金科玉律。1890年2月山县内閣藉纪念皇纪2550年颁金鵄勋章，以鼓励“武功超群之军人·军属”。

为推行强势的军备政策，明治维新之后逐步确立了完整的国家军国主义体制。1878年设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掌管作战、用兵等军令大权，实行军令与军政分离的军事二元制。又规定军令长官有关军令事项不经过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断施行，逐步确立了“统率权独立”原则。1885年

20) 参考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上下)、森松俊夫《图说日本陆军史》，户部良一《逆说の军队》，等等。

21)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557页；译文参考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1页。

22)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外务省，1978年，第149页。

23) 大山樾：《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第91页。

24) 德富苏峰：《公爵山县有朋》中卷，山县有朋公纪念事业会，1917年，第816页。

25)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昭和49年，第13-14页。

26)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近代卷，岩波书店，2002年，第200页。

实行内阁官制,内阁下设陆、海军省军省。1889年“钦赐”明治宪法规定日皇总揽统帅权,1900年规定了陆海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出任内阁陆海军省的“大臣及总务长官者须由现役将官担任”,大臣须由大、中将担任,总务长官(即次官)须由中、少将担任。

1906年10月,山县有朋上奏陆军方面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案》,在此案基础上,同年底陆海军共同起草了《帝国国防方针》。1907年4月4日天皇正式批准了《帝国国防方针》、附件《国防所需兵力》以及《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这些文件规定的主要点有:“帝国国防以攻势为根本原则”;同时还确认了日本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假想敌国,以及“当以能在东亚发动攻势”的军备标准。²⁷⁾《帝国国防方针》及其附件《用兵纲领》的制定,确立了日本进攻型的东亚与世界战略,也彻底强化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

IV. 日本新军制的实战及朝鲜的沦陷

随着朝鲜半岛形势剧变及日军军事准备的不断升级,日本出现了许多富有煽动性的扩张理论。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采取西方列强的扩张手段,对朝、中等亚洲邻国采取强硬措施。同年森本藤吉(又作樽井藤吉)写出《大东合邦论》,要求直接吞并朝鲜,该书于1893年甲午战争前夕正式出版。书中强调:“日韩合邦之事,假令不成于今日,而他日岂无合同之机哉”。²⁸⁾

日本政府正式制定了对于朝鲜半岛以及大陆的侵略政策。1889年12月山县有朋内阁成立,翌年3月山县提出的《外交政略论》,他称:“盖国家独立自主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他认为,“方今立于列国之际,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于形胜之地”。宣称:“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于朝鲜”。²⁹⁾外相青木周藏也在5月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主张把俄国赶出西伯利亚,将朝鲜、满洲及勒拿河以东地区并入日本,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政策”。³⁰⁾山县首相综合上述意见于12月6日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强调了守卫主权线与利益线的重要性。山县要求控制“焦点”朝鲜和从釜山、义州间通往东亚大陆之大道,政策演说,标志着日本大陆侵略政策的正式形成。

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及对于朝鲜半岛的吞并,是使用新建的外征型武装力量,在对中国和俄罗斯战争中逐步实现的。1891年5月山县内阁总辞职,但山县内阁的扩张政策被固定下来,并在后任松方内阁得到继续推行,7月桦山海相提出建造1.1万吨的铁甲舰(清国最大铁甲镇远、定远舰各0.73万吨)四艘和巡洋舰六艘的预算被批准。1892年8月第二次伊藤内阁成立,全面地加强对外扩张。1893年2月推动了新的造舰计划。日皇下达敕语:“国防一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³¹⁾

1893年4-7月,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对清国和朝鲜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情报旅行。同年5月19日天皇批准《战时大本营条例》,同时批准了《海军军令部条例》,基本完成了国家的战时体制准备工作。其目标是:“明治二十五年,日清两国之间的暗云日渐浓密,陆海军都逐次进行了战时诸编制的整组”。³²⁾翌年7月天皇率大本营于9月15日进驻广岛,就近统率对清国及吞并朝鲜的战争。在进

27)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东京)朝云新闻社,昭和54年,第60页。

28) (日)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明治廿六年八月版,近藤圭造印刷,第四页。

29) (日)大山樺:《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昭和41年版,第196~197页。

30)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7页。

31) 大吉林社编:《皇室皇族圣鉴》——明治篇,大吉林社,1936年,第51页。

32) 外山操、森松俊夫编:《帝国陆军编制总览》,芙蓉书房昭和62年,第31页。

行战争过程中, 山县通过《朝鲜政策上奏》(1894.11.7)等进一步强调了朝鲜在全局战略目标中的地位, 指出为实现“我邦长久制霸东洋、雄视列国之间”, 须控制从釜山、义州间通往东亚大陆、以及横断中国直达印度之大道。

早在东学党起义发展之时, 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即认定扩大在朝鲜势力的良好时机已经来到。³³⁾ 并为获得出兵权, 授命驻韩代理公使杉村浚密探袁世凯, 怂恿中国出兵。四月二十九日外务省接到报告, 知朝鲜政府已向清廷提出借兵的请求, 正在官邸召开内阁会议的伊藤博文, 就立即派人请到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 决定出兵朝鲜并上奏日皇裁夺。³⁴⁾

五月初二日(6月5日)午后四点, 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偕同外务省和海军军令部官员乘巡洋舰出发。日本预计中国派往朝鲜的兵员为五千人, 决定派遣一支“拥有约八千兵员、完全能够压倒清国的战时编制的混成旅团。”³⁵⁾ 日本出兵之际, 朝鲜起义军已与政府达成停战协议。清政府立即依据中日《天津条约》第三款, 对日展开撤兵交涉。但完全没能阻止日军向中朝两国开战, 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之战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韩等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也是近代东亚国家关系转折突变之关键所在。日本对清军作战获胜, 通过《马关条约》排除了中国在朝鲜的力量。日本试图全面控制朝鲜, 由于三国干涉一度受到阻滞。俄国势力在控制东北的同时也全面深入朝鲜境内, 直至十年后的日俄战争, 双方在朝鲜展开全面角斗, 势力互有涨落。

日本于1904年2月发动日俄战争, 3月11日编组韩国驻扎军, 4月占领京城, 完成了对韩国的军事占领。1905年11月迫使朝鲜签订城下之盟《乙巳保护条约》, 1906年2月正式设置所谓韩国统监府, 伊藤博文担任第一任统监, 1907年7月由伊藤统监与朝鲜总理大臣李完用签订《丁未七约》, 规定解散朝鲜军队等条款, 并严厉镇压进行抵抗的各地义兵运动。至此, 日本军国主义已经遂其所愿, 将所要求的利益线“焦点”朝鲜半岛实质地控制在手。1909年7月6日, 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选择适当时机吞并朝鲜的方案, 朝鲜民族的亡国危机迫在眉睫。

在上述日本正式确定合并方针、朝鲜亡国的最后关头, 1909年10月26日发生了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事件。由于哈尔滨火车站是中东铁路枢纽, 深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日本军政当局不得不以尊重国际法的姿态, 对安重根进行了审判。安重根列举伊藤博文15项罪状, 以此来证明自己刺杀伊藤的正当性³⁶⁾。但是, 日本以日本法律为根据对他进行单独审判并迅速判决安重根死刑。³⁷⁾ 1910年3月26日上午10时, 安重根在旅顺日本监狱从容就义。半年之后的8月22日, 寺内正毅统监同李完用签署《日韩合并条约》, 废朝鲜国号设置总督府, 将朝鲜并入日本版图, 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为第一任朝鲜总督。在历史上独立存在了四千年以上的朝鲜, 终于一度灭国, 沦入了近四十年的殖民地时代。

综上, 可知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虽然试图维护东亚地域的和平关系, 但被日军的武力政策所打破。日本凭借新建外征型武装力量, 侵略中国, 对俄开战, 吞并朝鲜, 导致近代东亚国家关系陷入七十年动荡的低谷时期。

33) 山崎有信:《大鳥圭介伝》, 東京:東京博文館, 1915年, 第250页。

34) 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 商务印书馆, 1963年, 第9页。

35)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第260页。

36) 安重根所列举伊藤15条罪状见李东源译注《安重根审讯记录》, 载金宇钟等主编:《安重根》,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4年, 第270-271页:(1)杀害韩国王妃事件(2)光武9年11月, 缔结对韩国不利的五条保护条约(3)隆熙元年7月, 缔结韩日协约(七条)(4)杀害太皇帝事件(5)解散韩国军队事件(6)屠杀义兵及平民事件(7)剥夺韩国政治及其他权利(8)焚毁韩国教科书(9)禁止韩国的新闻业(10)发行掠夺性银行卷(11)非法募集2300万国债一事(12)废黜韩国皇帝破坏东洋和平(13)名不副实的保护政策(14)伊藤杀害了现日本皇帝之父孝明(15)就韩国问题欺瞒日本和世界的行为

37) 日本学者鹿野琢见撰文指出, 这样的审判完全是不公正、非法的, 安重根应被判无罪。参见氏著《安重根无罪论》, 载金宇钟等主编《安重根》,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4年版。

근대 동아시아의 朝鮮 要素와 日本 軍制의 변화

徐 勇 (北京大學校)

〈목 차〉

- I. 조선의 전략적 지위와 근대 동아시아 국가 관계의 전개
- II. 조선반도의 위기와 중일대립
- III. 일본 “외정형군대”의 확군(擴軍)체제 정립
- IV. 일본 신군제의 실천과 조선의 함락

내용 요약 : 근대에 중국, 조선, 일본, 러시아 등 국가 관계의 상호작용 과정 속에서 조선 반도는 그 특수한 역사와 지정학적 위치로 인해 당시 동아시아 국가 관계에서 모순의 초점이 되었다. 1871년 중일수호조규가 맺어지면서 동아시아에서 평화적인 관계가 시도되었으나, 일본군의 무력정책으로 깨졌다. 메이지정부는 《참모본부조례(參謀本部條例)》등의 조례를 반포하여 일본군의 중앙지휘체계를 강화했다. 이와 동시에 해외에서 대규모 전쟁이라는 임무를 수행하기 위해 1888년에는 사단제(師團制)로 내부안정(安內) 수비형의 “신다이(鎭台)” 제도를 대체하여 “외정형군대(外征型軍隊)”를 정식으로 창설했다. 메이지유신 이후 일본 군대제도의 변혁 및 그 역량 강화는 새로 건설한 외정형군대를 이용하여 중국을 침략하고 대러시아 전쟁을 펼치면서 조선반도를 병탄하는 과정 속에서 점차 현실화되었다.

키 워 드 : 근대동아시아, 조선, 요소(因素), 일본군제, 외정(外征)

근대의 동아시아는 격렬한 충돌이 빈번하고 격렬한 변동이 일어난 지역이었다. 메이지유신 이후 일본 정부는 육·해 양면의 확장 정책을 제정 및 실행했는데, 그 때 기도 다카요시(木戶孝允) 등의 강경파가 “정한론(征韓論)”을 주장하여, 일본 조야에서는 갈수록 그 사태가 심각했다. 일본의 대외 확장정책은 조선의 저항에 부딪혔고, 청 조정 또한 조선을 원조하면서 전통적인 화이질서 유지를 중심으로 하는 대일 외교정책을 채택했다. 따라서 중, 조, 일, 러가 정치, 외교, 군사 등의 영역에서 상호작용하는 가운데 조선반도는 당시 동아시아 국가간 관계에서 모순의 초점이 되었다.

일본은 무력을 등에 업고 확장하고 있었는데, 그 무력의 정비 과정은 확장 행동 속에서 완성된 것이기도 했다. 그 당시, 일본은 징병제를 실시하여 강력히 무력을 확장했고 군정당국은 중조 양국을 가상의 적으로 상정해서, 무진(戊辰)전쟁, 서남(西南)전쟁 시기에 건립된 내부안정수비(安內守備)의 신다이(鎭台)제도가 조선반도와 대륙에서 군사를 부리는 것

을 목표로 하는 사단제(師團制)로 재건되었고, 이것이 곧 실행으로 옮겨져 중국과 조선 양국을 침략하는 갑오전쟁(甲午戰爭)이 발동되었다. 이 시기 일본 군제 변화의 근본적인 특이점은 국경 밖 대규모 전쟁 임무를 수행하기 위해 외정형군대(外征型軍隊)의 기본 성질을 형성했다는 점이다. 본문에서는 일본이 대외 침략정책을 제정하고 외정형군대를 건립하는 과정과 특히 조선 등의 국가와의 관계에 대응하면서 나타난 변화 등의 사실(史實)에 대한 초보적인 분석을 해보고자 한다.

I. 조선의 전략적 지위와 근대 동아시아 국가 관계의 전개

19세기 중후기, 동아시아 국제관계는 동요하며 변화의 상황으로 접어들었다. 1871년 7월 텐진(天津)에서 청(淸)조정은 태자태보협판대학사(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 병부상서 직예총독 리홍장(李鴻章)을 전권대신(全權大臣)으로 임명하고, 일본 조약특사인 대장경(大藏卿) 다테 무네나리(伊達宗城), 부사(副使) 야나히가하라 사키미쓰(柳原前光)와 통상조약을 위해 회담을 시작했다. 이 해 9월 13일 청일 《수호조규(修好條規)》(총18조)와 《통상장정: 해관세칙(海關稅則)》(33조)이 체결되었다.

쌍방의 회담에는 곡절이 많았는데, 조약 내용 또한 외부로부터 관심과 압력을 받았다. 그 중 제2조가 정한 “상호 협조(彼此相助)”는 서방의 “공수동맹(攻守同盟)”에 맞서는 것이라고 일찍부터 지적되었다. 미국은 가장 먼저 일본 외무경을 조회하고 프랑스 등의 나라들도 잇따라 일본에 압력을 가했다. 일본 국내에서도 반대와 조약 개정의 의견이 있었는데, 조약이 일본 측과 관련된 치외법권 등의 요구를 만족시키지 못했다고 여겨졌다. 그러나 청조정은 조약 개정 회담에서 양보하지 않았다. 청조정은 “절대로 같게 할 수는 없다”고 하면서 일본측이 제출한 서방 열강의 수준에 버금가는 특권적 요구를 거절하고, 이와 동시에 임시 변통적인 의미가 있는, 일본을 비(非)속국으로서 대등하게 본다는 입장을 발표했다. 일본측은 대체로 중국측의 의견을 받아들였기 때문에 하마시타 다케시(濱下武志)는 청 조정이 조약 협상의 “주도성”을 장악하고 있었다고 지적했다.¹⁾

청일수호조규는 근대 중일 양국이 세운 비교적 평등한 최초의 국교 조약인데, 조약은 중일 양국의 국가 관계를 직접적으로 규정하는 데 그치지 않고 동아시아 국가관계에도 필연적으로 극히 커다란 영향을 주었다. 이 조규는 개장(開章)에서 “대청국과 대일본국은 진실하고 성실한 우의로 긴 세월을 보냈고, 지금 함께 오랜 것을 잘 고쳐 국교를 굳건히 하는데 도움이 되게 하고자 한다.”고 강조했다. 양국이 “진실하고 성실한 우의”의 역사적 관계가 있음을 확인하면서 앞으로 계속 평화우호를 국교의 원칙으로 삼자고 규정했다.

조약의 제1조는 쌍방이 “양국에 속한 영토에 대해서 각자 예의로써 대하고, 조금이라도 침범해서는 안 되며, 영구히 안전을 얻도록 한다.”고 규정했다. 이 규정에 따라 중일 양국은 평화안전의 원칙하에 동아시아 기존의 구조를 인정하고 전통적인 국가관계에서 안정적

1) (日)濱下武志, 朱蔭貴 等 譯, 《近代中國의國際契機 - 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中國社科出版社, 1999年版, 49쪽.

인 요소들을 지속시켜야 했는데, 여기에는 수천 년간 유지해 온 조선의 자주적 지위도 포함되어 있었다. 조약의 협상 과정과 표현 방식은 동아시아의 전통적 예의 법식에 따른 국교 관계와는 큰 차이가 있어서, “이 조약은 동아시아의 국제관계가 근대로 진입했음을 보여주는 조약의 효시라고 볼 수도 있다” 는 평을 하기도 한다.²⁾

그러나 쌍방이 문서를 교환한 후, 일본에서는 당시 완비되지도 않은 무력을 사용하여 타이완으로 남하, 출병하였고 “류큐처분(琉球處分)” 을 시행한 뒤, 곧바로 역량을 모아하여 북쪽으로 “정한(征韓)” 을 계속했다. 이렇게 조선반도와 대륙을 향한 대규모의 확장은, 조규가 규정한 “돈독함과 의리를 배가하고” 예의로써 “양국에 속한 영토” 를 대한다고 하는 등의 원칙을 심각히 침해했다. 따라서 중일 양국 영토의 사이에 있는 조선반도는 그 특수한 지역적인 이유와 역사전통적인 요소로 인해 결국 당시 중일의 대립 및 동아시아 지역의 관심이 모이는 문제가 되었다.

초점이 되는 문제로서의 조선 요소는 사실 전통적인 관계 속 중, 조, 일 삼국의 상호작용이라는 문제를 포함하고 있었다. 동아시아 전통의 화이질서 속에서 가장 마지막의 사례 - 중한관계 문제는, 그간 확실히 청조정이 상국의 위치를 점하면서 조선을 속국으로서, 대등하지 않은 예의로 대했던 관계를 포함하고 있었지만, 주권과 덕의(德義)의 각도에서 말하면, 쌍방의 상호 공존 관계는 장기간 존재해 온 것이었다. 황준헌(黃遵憲)은 1880 년간에 “자소이덕(字小以德), 사대이례(事大以禮)” 라고 묘사하였다. 황준헌은 “조선은 우리의 번방이 된지 이미 천년이 지났으니 그동안 중국은 덕으로써 편안히 지내게 하고 은혜로써 풀어줄 뿐, 한 번도 그 토지와 인민을 탐내는 마음을 가진 적이 없었음은 천하가 함께 믿는 바이다.” ³⁾라고 특별히 강조했다. 주일본 공사인 허루장(何如璋)의 지령에 따라 황준헌은 《조선책략(朝鮮策略)》을 기초하고 조선이 반드시 “청과 친하고(親淸)”, “일본과 맺고(結日)”, “미국과 연대(連美)” 해야 한다고 건의하면서 중국측은 조선의 자주적 지위를 간섭하지 않는다는 태도를 보였다.

오카모토 다카시(岡本隆司) 등의 최근 연구에 따르면 전통 청한관계는 “속국자주(屬國自主)” 의 개념을 해석하는 데에서, 현재 학계에서도 견해가 각기 다르지만, 당시에 마젠중(馬建中), 위엔스카이(袁世凱), 리홍장이 “속국” 과 “자주” 양자의 경증비례에 대해서 각기 내린 해석이 달랐다. 하지만 양국이 “속국” 의 전제하에 있으면서도 종주국은 속국의 주권을 부정하지 않았고, 그 내정에 간섭하지 않았던 것이 사실이었고, 또한 이것은 폭력을 등에 업고 통치하고 점령하는 것을 특징으로 하는 “근대 서양 국제질서” 와는 다른 성질을 갖는 것이었다.⁴⁾

그러나 평화 의의를 갖는 동아시아 전통 국가관계는 곧 새롭게 굴기하는 일본의 무력 정책으로 무너지게 된다. 일본군대는 타이완으로 출병하고, 곧 “류큐처분” 을 실시하여 천 년간 존재했던 류구국이 멸망했다. 조선반도가 이에 이어 공격을 당하면서 형세는 계속 악화되어갔다. 청 조정은 대책을 취할 수밖에 없어 리홍장의 견해에 따랐다. “류구는 이미 못쓰게 되었고, 조선은 장작더미 밑에 불이 놓인 형세이며, 서양 각국은 또한 장차 둘러보아 일

2) (日)濱下武志著, 앞의 책, 49쪽.

3) 黃遵憲《朝鮮策略》, 《日本外交文書》第13卷, (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 昭和38年 再版, 390쪽을 보시오.

4) (日)岡本隆司, 《屬國と自主》의 서론 제2장 및 결론 참고. 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2004年10月; 그 외에 考川島真, 服部龍二 等, 《東アジア國際政治史》, 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2007年, 23쪽 참고.

어설 것이니, 당연히 남을 위해 책략을 세우지 않을 수 없다.”⁵⁾ 오카모토 다카시의 결론은 대체로 비슷하다. “무쓰(陸奥) 외교가 아직 잔존했던 미약한 자주(自主)를 갑작스럽게 강화시켜 청조로부터 이탈·독립하도록 조선에 강요할 때, 청일전쟁은 피할 수 없는 사태가 되었다.” 또한 이로 인해 “동아시아 국면에는 커다란 변화가 시작되었다.”⁶⁾

II. 조선반도의 위기와 중일대립

일본이 그 대륙 침략 정책을 추진하는 가운데 청·한 양국은 침략의 주요 대상이 되었다. 조선반도는 특수한 지역적 위치로 인해 일본 침략 세력의 공격을 누구보다 먼저 당했다. 1869년 1월 23일 메이지 정부는 조선에 사신을 파견하여 일본이 왕정 복고를 실행할 것이라고 통고했는데, 그 국서에는 “아황즉위(我皇即位), 중정강기(重整綱紀)” 등의 자구를 사용하여 기존 양국 외교 문서의 격식에 부합하지 않았고, 그리하여 조선측으로부터 접수를 거부당했다.

일본 정부는 이것을 구실로 기도 다카요시 등 강경파는 “정한론”을 처음으로 제창하고 이를 “황국을 크게 일으킬” 기회로 삼자고 했다.⁷⁾ 강경한 “정한론”은 일본 조야에서 갈수록 심해져, 1870년 외무대신 야나기하라 사키미쓰는 《조선논고(朝鮮論稿)》에서 조선을 탈취하여 후일 세계를 경영하는 기지로 삼자는 구상을 제출했다.⁸⁾ 1872년 9월 외무대승(外務大丞) 하나부사 요시모토(花房義質)는 군함 춘일호(春日號)를 이끌고 조선을 침략하여 부산의 초량왜관(草梁倭館)을 접수 관리하고, 1875년 일본군함은 다시금 한강구의 강화도와 부산 등지를 침범했다. 이러한 일련의 행동은 조선이 1876년 2월 26일 불평등한 《대일본국대조선국 수호조규》(통칭 강화도조약) 체결을 강요하는 데로 나아갔다. 여기서 조선이 청국과 가졌던 종속관계는 부정되었고, 일본은 한성(漢城)에 대사관 설립, 부산·원산·인천 등의 항구의 강제 개방, 일본의 각 항구로의 영사 파견 및 영사재판권 보유 등을 규정했다. 개항권익의 연장선에서 익년에는 또 부산 등지에 차례로 조차지를 만들었다.⁹⁾

1879년 “류큐처분”이 순조롭게 이루어지면서 1880년대 일본은 조선 반도로의 확장 행동에 돌입했다. 1882년 7월 한성에서는 군인들의 폭동이 일어나 일본이 출병하여 간섭했는데, 이것이 임오군란(壬午事變)이다. 8월 30일, 일본은 조선을 압박하여 일본이 병사를 주둔하고 영사관을 설치하며 일본에 배상금을 지불하도록 하는 등의 사항이 있는 〈제물포조약〉을 체결하도록 했다. 조선의 지위는 심각하게 약화되었고, 청일 양국은 조선의 경성에서 대치 국면에 접어들었다.

1884년 11월 일본의 주조(駐朝)공사인 다케조에 신이치로(竹添進一郎)는 갑(甲), 을(乙) 두 안을 짜고, 이후에는 “내란발동”의 갑안(甲案)을 실시하여, 김옥균 등 개화파들이 “갑신정변”

5) 李鴻章, 《論勸導朝鮮通商》, 光緒 五年七月十二日, 《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9, 34쪽.

6) (日)岡本隆司, 《屬國と自主》のあいだ, 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2004年10月, 383쪽.

7) (日)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上, 商務印書館, 1992年版, 131쪽.

8) 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 外務省, 1978年, 149쪽.

9) (日)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上, 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159, 162쪽.

을 일으키고, 정치의 주도권을 잡고 있는 민비파 요인을 살해하도록 사주했다. 사변이 일어나자 청조정도 신속히 파병하여 조선군대와 연합해 일본의 지지를 받는 반란군을 격파했다. 그러나 일본은 강하게 외교적 압력을 가하여 조선이 1885년 1월 9일에 〈한성조약〉에 조인하도록 하고 조선은 다시금 일본에 사죄하고 배상금을 지불하게 되었다.

이렇게 끊이지 않고 악화하는 형세 속에서, 청 조정은 구레에 비추어 조선과의 무역을 보다 발전시키고 저리의 혹은 무이자 차관을 제공하며, 한성에서부터 부산, 인천, 의주 등지까지 전선(電線) 공사를 일으켜 국방 사무용 통신을 개설하는 등 조선관 양무운동을 전개했다. “조선정부를 지원하는 것은 난관을 겪으면서도 중조우호관계를 긴밀히 하는 데 유익했다.”¹⁰⁾ 1882년 10월 1일(광서8년8월20일), 텐진에서 체결한 중조(中朝) 〈상민수륙무역장정〉은 다음과 같이 규정했다. “조선은 오랫동안 번봉에 속해있어, 법전과 예식에 관한 일체는 모두 정해진 제도가 있으므로 다시 의론할 필요가 없다.”¹¹⁾ 또한 1883년 9월의 〈길림조선상민무역지방장정(吉林朝鮮商民貿易地方章程)〉에도 특별 조항에서 이렇게 규정했다. “체제를 존중하여, 조선은 반드시 ‘천조(天朝)’ 혹은 ‘상국(上國)’ 이라는 문구로 [중국을] 칭해야 한다……. 길림성 변계의 관원들은 곧 ‘조선국’ 혹은 ‘귀국(貴國)’ 이라는 문구로 [조선을] 칭해야 하니 이것으로써 우대를 표시한다.”¹²⁾ 법권(法權)의 형식으로, 일단 중국은 조선에 대한 종주국의 지위를 강제했다. 그러나 청조정의 기본적인 방침은 조선의 자주적 지위를 유지시키는 것이었고, 당시 국내 및 국외에서 있었던 조선을 중국의 행정구역에 넣자는 건의는 부정했다.

갑신정변으로 반도에서 중일 쌍방의 대립은 첨예화 되었다. 이 때, 중국과 프랑스의 전쟁은 앞길을 예측할 수 없었고, 청정부는 일본측의 소식과 동향을 밀탐하도록 명령했다.¹³⁾ 그러나 청정부는 일본의 전략적 의도를 알 수 없었고 조선 관련 사무를 처리하는 방침은 “난리와 불화를 진정시키는 것을 주로” 삼았다.¹⁴⁾ 1885년 3월 24일과 29일 중국 군대는 진남관(鎭南關)에서 대승을 거두고 양산(諒山)을 점령했으나 전쟁은 끝나지 않았다. 양 전선에서 위기가 생기지 않도록 청정부는 대만을 처리할 때처럼 스스로 양보하여 갈등을 없애는 방침을 채택했다.

리홍장은 일본국 특파 전권대신인 이토 히로부미(伊藤博文)와 협상을 했는데, 쌍방은 2월 18일 텐진에서 회담을 시작하여 모두 여섯 차례 회담을 가졌다. 리홍장은 조선과의 전통적 종번관계에 기반하여 조선 왕의 요청이 있다면 중국은 언제든지 조선에 파병을 할 것이고, 이것은 일본과 “관계가 없다” 고 했다. 그러나 일본측은 마음속에 저의를 품고 중국이 조선에 대해 가지는 전통적인 종주권을 부정하고 조약의 방식으로 일본이 조선에서 중국과 동등한 권리를 가짐을 명확히 할 것을 요구했다. 이토의 목표는 리홍장과 총리아문의 예상 밖의 것이었지만 청정부는 마지막엔 타협했다. 청정부는 리홍장에게 명령하여, “철병은 윤

10) 徐萬民：《中韓關係史(近代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73쪽.

11) 이 章程은 “光緒條約”，卷59를 보라；또한 王鐵崖 編，《中外舊約彙編》第一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465-466쪽에 실려 있다.

12) 王鐵崖 編，《中外舊約彙編》第一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447쪽에 실려 있다.

13) 《軍機處電寄黎庶昌徐承祖諭旨》(光緒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4쪽.

14) 參閱戴東陽《徐承祖與中日〈天津條約〉》，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5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허할 수 있지만, 영원히 파병하지 않는 것은 윤택할 수 없다. 만부득이하면, 제2조 안의 ‘무관하다’ 는 문장 하에 ‘양국이 조선에서 중대한 사변을 만나게 되면 각자 파병할 수 있되, 상호 통지하고, 앞 조항에는 두지 않는다.’ 는 몇 마디를 첨술하는 것은 가능하다.” 라고 했다.¹⁵⁾ 청조정의 타협으로, 쌍방은 마침내 철군과 교관 초빙 및 파병 문제에서 타협에 도달했다. 3월 4일(1885년 4월 18일) 중일〈텐진회의전조(天津會議專條)〉, 또는 “텐진조약”, 또는 “조선철병조약” 이라고 부르는 것에 조인했다. 조약은 다음과 같은 규정했다.

- “1. 회의는 중국이 조선에 주둔한 병사들과 일본국이 조선에 공사관 호위를 위해 주둔한 병졸들을 철수시킨다. 이 조약 조인일로부터 4개월을 기한으로 정하고 기한 내에 각각 그 전원을 철수시켜 양국 사이에 염려스러운 일이 생기는 것을 피한다. ……
1. 양국은 모두 조선 국왕에게 권하여 병사를 교련함으로써 치안을 스스로 유지할 수 있도록 하고, 또한 조선 국왕에게 제3국 무관 한 명 내지 몇 명을 선택해 고용하여 훈련 주사(主事)로 위탁하도록 한다. 금후로는 중일 양국은 모두 조선에 훈련 교관을 파견하지 않는다.
1. 장래 조선국에 만일 변란이나 중대한 사건이 일어나 중일 양국 혹은 일국에서 파병을 하고자 한다면 반드시 그에 앞서 서로 공문을 보내 통지하고, 그 사건이 진정되면 즉시 철수하여 더 이상 잔류시키지 못한다.”¹⁶⁾

동시에 전권대신은 일본 대사에게 공문을 보냈다.

“작년 10월 조선 한성에서 변이 일어나, 중국 관병과 일본 관병이 조선 왕궁에서 한차례 다툼을 일으킨 일은, 양국 국가가 생각지도 못한 일이 일이다. 본 대신은 극히 애석하게 생각한다. 생각건대 중일 양국은 오랫동안 화목했다. 중국 관병 등이 비록 일시적으로 발끈해 부득이하게 다툼이 있었다고 하나, 고찰하기에 주의하여 일을 처리하지 못했던 것이라, 본 대신이 문서를 보내 훈계하여 타이를 것이다. 귀 대신의 감독 하에 송환한 일본의 인민 本多奴之輔 妻 등의 진술서에 한성 안에서 화병(華兵)이 가옥에 침입해 약탈하고 인명을 살상한 사건이 있었다고는 하나 중국은 이에 정확한 증거가 전혀 없다. 고로 본 대신이 인원을 파견하여 방문 조사하여 명확한 공증을 취하여 만약 과연 당일에 실제로 모영(某營) 모병사(某兵)가 시가에 나와 사건을 일으켜 백성을 죽이고 노략질했다는 증거가 갖춰진다면 중국의 군법에 따라 엄격하게 처리할 것이다.”¹⁷⁾

공통 파병권의 규정이 전쟁을 야기했는가의 여부 판단하는 데 있어서, 관건은 조선을 병탄할 의도가 있었는가의 여부에 있다. 리홍장은 당연히 이 점을 알고 여러 차례 중국은 조선을 점거할 마음이 없음을 표시하고 동시에 재삼 일본에게 조선을 침범하지 않겠다는 태도를 표명할 것을 요구했다. 6번째 회담에서는 철군의 구체적인 조항이 협의에 도달했는데, 리홍장은 이토에게 조선을 병탄할 의도가 없다는 보증을 다시 요구했다.¹⁸⁾

15) 《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8, 6쪽.

16) 본 專條 및 照會는 “光緒條約”, 卷19를 보라; 또한 王鐵崖 編:《中外舊約彙編》第一冊, 三聯書店, 1957年版, 465-466쪽에 실려 있다.

17) 본 專條 및 照會는 “光緒條約”, 卷19를 보라; 또한 王鐵崖 編,《中外舊約彙編》第一冊, 三聯書店, 1957年版, 465-466쪽에 실려 있다.

18) 《天津談判筆記(第六)》(1885년4월15日), 《明治文化全集 外交篇》第11卷, 310쪽.

갑신정변 후, 6월 일본은 다케조에 공사를 파면하여 정변의 책임을 인정했다. 7월 양국 군대는 철수했다. 중국 측에서 쉽게 양보하여 공통 파병 조약 제3항이 성립했다. 그러나 출병하여 확장 하려는 기회만을 부심하여 찾고 있던 일본군에게는, 이 조약이 조선반도에서의 확장을 제약한 것도 아니었고 오히려 법리적인 보장을 해 준 것이었다. 일본은 기정목표에 완전히 도달했고, 청정부가 제정한 교섭 방침은 무너져서 전략과 외교에서 심각한 좌절을 맞았다.

당시 외상(外相)을 맡고 있던 무쓰 무네미쓰(陸奥宗光)는 《건건록(蹇蹇錄)》에서 득의양양하게 다음과 같이 평가하고 있다. “이 조약은 확실히 양국의 조선에서의 균등한 권력을 나타내는 유일한 공식 문서로, 이것 외에는 곧 중일 양국 사이에는 어떠한 보장도 없다. …… 정부의 이번 조약 체결에서 이러한 조항이 있어서 일대 타격을 받았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렇지만 이제껏 중국이 주장해온 속방론의 이론은 이로 인해 그 효력이 크게 무너져 버렸으니, 이것은 이미 추호도 의문의 여지가 없다.”¹⁹⁾

텐진회의 특별 조항의 체결은 양국의 대립과 충돌을 조금도 완화시키지 못했다. 중국과 프랑스의 육상에서의 전쟁과 마찬가지로 청정부는 한성에서 거둔 적은 군사적 승리를 이용해 외교적인 성과를 다지거나 확충하지 못하여, 일본군이 1880년대 한성에서 두 차례의 전투에서 패한 후에도 조선이 일본에 유리한 조약을 체결하게 했을 뿐 아니라 나아가 군비를 재정비하게 하여 1890년대 권토중래하게 만드는 결과를 가져왔다. 따라서 조선 문제를 초점으로 하여 결국은 대규모의 청일 전쟁이 폭발했다. 일본은 전쟁이라는 수단을 통해 마침내 조선을 손에 넣고 청 정부는 토지를 할양, 배상하여 전에 없는 큰 타격을 입었다.

III. 일본 “외정형군대”의 확군체제의 정비 건설

메이지 정부의 여러 유신 정책 중에서 “부국강병”은 “식산흥업”, “문명개화” 정책의 앞에 놓여 있었다. 1868년, 상무(尙無) 직할군대의 메이지 정부는 각 번에 징병을 선포하고 1871년 2월까지 사쓰마(薩摩), 조오슈우(長州), 도사(土佐) 세 번의 번병(藩兵)을 “어친병(御親兵)” 약 1만 명으로 편성했다. 메이지 정부는 차츰차츰 군권을 중앙으로 회수했다. 우선 도우산도(東山道)(본부는 이시노마키石巻에 설치)와 사이카이도(西海道)(본부는 고쿠라小倉에 설치) 두 개의 신다이(鎭台)를 설치하고, 이 두 개의 신다이의 기초 위에, 메이지 4년 8월에는 개조하여 도오쿄오(東京), 오오사카(大阪), 신제이(鎭西)(구마모토熊本), 도우호쿠(東北)(센다이仙台) 네 개의 신다이를 설치했고, 이후에는 또 나고야(名古屋), 히로시마(廣島) 두 개의 신다이를 증설했다.

신다이라는 단어는 막말(幕末)에 “에도 신다이(江戸鎭台)”, “오오사카 신다이” 등에 쓰였던 것이다. 4신다이 제도는 원래 각 번에 있던 상비병들을 해산시켜 정부의 상비병으로 고쳐 조직한 것이었다. 메이지 정부는 이렇게 군대의 국가화, 중앙화의 과제를 완성했는데, 정부 상비군의 숫자도 대폭 상승하여 4만 명에 달하였다(이상 모두 해군 불포함). 메이지 5년 11

19) 陸奥宗光 著, 龔德柏 譯, 《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秘史》(原名《蹇蹇錄》), 商務印書館, 民國18年初版, 7-8쪽.

월(1872.12.)〈징병조서(徵兵詔書)와 〈징병유고(徵兵諭告)〉를 하달하여 전국민 개병제도를 실행하고 육군 상비군을 확대 건설했다. 신다이제 체제하의 일본 군대의 주된 성격은 아직 내부안정수비형 군대였다.

메이지정부는 군대의 역량을 강화하기 위해 부단히 군제 변혁을 추진했다. 1886년(메이지 19년 3월 18일) 일황(日皇)이 재가한 〈칙령참모본부조례(勅令參謀本部條例)〉를 반포하여 본부장은 황족 1인이 칙령에 따라 담임하고, 평시에는 육해군의 제도를 절도 있게 지키고, 전시에는 유관 군령의 계획과 결재를 맡는다고 규정했다. 참모본부에서 중대하고 번다한 권한의 사항에 대해서는 그 제 11조에서 규정하기를 “육군부 제2국을 설치하여 외국의 병제·지리·정치제도 등 제 사항에 대해 철저하고 분명히 파악하고 작전 계획을 주관하도록 한다.”고 했다. 이러한 일련의 조치는 일본 군대의 중앙 지휘체계를 완비시켰다.

군대의 전투력을 충분히 발휘할 수 있도록 하기 위해 다시 육군의 서열 편성을 전면적으로 조정했다. 1888년(메이지 21년 5월 12일) 일황의 재가를 받아 신다이조례를 폐지, 사단사령부(師團司令部) 편성의 칙령을 반포했으니 이것이 곧 〈사단사령부조례〉이다. 그 제1조에서는 “사단장을 중장(中將)으로 임명하여 황제폐하에 직접 예속되도록 하고, 사관내(師管内)의 군대를 통솔, 관련 군사 제 사항을 총괄한다.”라고 규정했다. 제2조에서는 “사단장은 사관내 군대의 출사 준비를 정리하고 징병사항을 총괄한다.”고 규정했다.

상술한 참모본부조례와 사단사령부조례의 반포는 근대 일본 육군의 정식 건설을 상징한다. 상술한 조례는 유신 후의 신건육군(新建陸軍)의 지역성과 지방치안의 성격을 삭제하여 신건육군을 일황의 이름 아래 국내정치에서 가장 강대한 세력 집단으로 만들었고, 대외적으로 군사 움직임 때에는 더 이상 1885년에 건립된 내각 정부의 제제를 받지 않게 되었다.

1888년 5월 사단제조령(師團制條令)을 반포, 신식 사단으로 원래 있던 “신다이” 제도를 대체하였다. 사단은 국외에서 대규모의 전쟁의 임무를 수행하는 일본 군대의 전략적 단위였고, 새로 세운 사단은 국외에서 대규모의 야전 환경에 적응할 수 있었으므로 이것으로 내부안정수비형의 “신다이” 제도를 대체하여 일본이 “외정형군대” 즉 근대적 육군을 정식으로 성립시켰음을 드러내고 있었다.

사단제도 확립의 정치적 의의로는, 근대 일본군 건군 초기, 그 대외적 기능 설계에 대해 거대한 인식의 분기가 있었다는 것이다. 미우라 고로(三浦梧樓)는 이전에 “호향군(護郷軍)” 및 “월요회(月耀會)” 등을 주창하면서 “외정형군대” 등이 아닌 “국토방위”형 군대를 건립할 것을 강조하였다. 그러나 야마가타 아리토모(山縣有朋), 오오야마 이와오(大山巖) 등은 군확(軍擴)을 주장하면서 3년제 보편 병역, 서방군대의 전략단위 군단의 임무 표준에 맞춘 일본군의 사단제 성립, 사단을 전략단위로 삼되 전시에는 사단 위에 더욱 큰 작전 단위를 편성할 것을 요구했다. 야마가타 등의 군국주의 강화 주장은 지배적인 지위를 얻어 메이지 18년(1885)에 실시한 10년 군비계획에서 사단제 실행이 확정됐다. 사단제의 조직은 “외부 정벌에 필요한 근대적 군비의 대폭 강화를 위”한 것이었고, 착안점은 조선과 청국으로의 출병에 소용이 되도록 하는 것으로, 신속히 밖으로 공격해 나가도록 구비하기 위한 것이었다.²⁰⁾ 1888년 사단제의 확립과 실행은 야마가타 등의 인물들이 주장한 강대한 “외정형군대”

20) 松下芳男,《明治軍制史論》(上下), 森松俊夫,《圖說日本陸軍史》, 戸部良一,《逆説の軍隊》등 참고.

의 조직이 정식으로 추진되었다는 것을 보여준다.

국가의 군대를 조직하는 것과 동시에 메이지 정부는 대외확장적 정책을 강화하였다. 1868년 4월 6일 천황 명의로 반포된 시정강령(오조서문(五條誓文)과 〈신한(宸翰)〉(御筆信)은 일본의 총 대외 방침을 규정하고 있다. “천하를 경영하고 억조 만민을 어루만지며, 만리의 파도를 개척하여 국가의 위세를 사방에 떨치고자 한다.”²¹⁾ 1870년 외무대신인 야나히가하라 사키미쓰는 〈조선논고〉에서 조선을 탈취하는 것이 곧 후일 세계를 경영하는 기지가 된다는 구상을 제출한 바 있다.²²⁾ 1874년 일본이 타이완으로 진공하던 때에 야마가타 아리토모는 〈외정삼책(外征三策)〉을 제출하여 “직예(直隸)로 북상”, “텐진을 곧장 공격” 하는 것이 곧 “마음속에 그림이 그려진다”고 했다. 1876년 일본은 〈강화도조약〉을 통해 조선국의 문을 연 후, 중국을 향한 군사적 정찰에 박차를 가했다.

1879년에서 1880년에 이르기까지, 일본 군 참모본부는 차례로 가쓰라 다로오(桂太郎) 등 군관들을 10여 차례 중국, 조선 및 러시아 원동지구 등으로 파견하여 각종 정보를 탐지했다. 1880년 11월에는 여러 해에 걸친 군사 정보 수집에 근거하여 야마가타 아리토모가 천황에게 〈인방병비략(隣邦兵備略)〉을 진상하고, 일본이 중히 해야 하는 일은 군비를 확충하는 것으로, 강한 병사가 기타 모든 시정조치보다도 중요하다고 주장했다.²³⁾ “일본군국의 아버지”라고 불리는 초대 참모총장인 야마가타 아리토모는 일찍이 이 상주문을 일황에게 올려 “강병”을 “부국”의 근본이라고 강조하고 군사우선발전 방침을 확립했다.

1880년대, 중일양국의 조선을 둘러싼 공방전은 다시 확대되어가, 청조정부는 북양수군의 건설을 강화하고 일본 또한 군대를 확대하고 전쟁 준비를 강화했다. 야마가타는 대장경(大藏卿)인 마쓰카타 마사요시(松方正義)와 상의하여 연초세(煙草稅) 등을 증가시켜 군대 확대의 비용에 충당하기로 하고, 야마가타가 천황에게 상주했다. “우리 제국은 철로 된 하나의 커다란 전함으로 볼 수 있으니, 굳은 의지와 용감한 정신으로 그 실력을 사방에 펼쳐 보이려고 합니다.”²⁴⁾ 천황은 조서를 내려 6년 동안 매년 궁정의 비축금 중에서 30만 엔을 지출하고, 문무관원들의 봉급 중 1/10을 낼 것을 요구하여 전함을 건조하는 비용에 충당하라고 하였다. 1890년 내각 수상에 임명된 야마가타 아리토모는 국회 시정연설에서 단지 “주권선”만을 수호할 것이 아니라 국경 밖의 “이익선”을 탈취해야 한다고 주창하며 진공형(進攻型) 대외전략 방침을 강화했다.

메이지정부는 전통 무사도에 있는 상무(尙武)문화의 기초 위에 전쟁 정신을 강화하는 일련의 조치를 취했다. 1869년에는 도오쿄오에 쇼우콘사(招魂社)를 건립했고, 메이지 천황이 참배했다. 1879년에는 야스쿠니(靖國)신사로 개칭했다. 표면상으로는 나라를 보위하기 위한 모든 전사자들을 제사지내고 추모한다는 것이었으나, 결국은 무수한 사자들 중 단지 황실의 일본 군인과 문직 성원들만을 뽑아 제사지내고 추모하는 것이다. 그 밖의 무수한 많은 전사자들, 전사한 일반 백성들, 또한 국사(國事)를 위해 몸을 바친 사이고 다카모리(西郷隆

21) 《大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 第1冊, 557쪽; 譯文은 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上, 商務印書館, 1980年, 121쪽 참고.

22) 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 外務省, 1978年, 149쪽.

23) 大山樺, 《山縣有朋意見書》, 原書房, 1966年, 91쪽.

24) 德富蘇峰, 《公爵山縣有朋》中卷, 山縣有朋紀念事業會, 1917年, 816쪽.

盛)나 나가오까(長岡)의 백호대(白虎隊) 전사자 등은 단지 정부에 반대했기 때문에 신사에 들어가지 못했다. 야스쿠니 신사는 황실에 대한 충성과 헌신 정신을 창도하는 데에 극히 중요한 역할을 발휘했다. 1871년에는 육해군 공통의 <독법(讀法)>을 반포하여 천황 위엄의 발휘 등 네 가지 원칙을 강조했다. 1882년 천황의 명의로 <군인칙유(軍人勅諭)>를 반포하여 “짐은 너희 군인의 대원수이다. 그럴진대 짐은 너희를 고굉(股肱)으로 의지하고 너희는 짐을 우두머리로 받아들여야 한다.”²⁵⁾라고 선포했다. 1890년에 반포한 <교육칙어>는 “의롭고 용감하게 봉공(奉公)하고 하늘과 땅에 무궁한 황운(皇運)을 부익(扶翼)해야 한다”고 강조했다.²⁶⁾ <군인칙유>와 <교육칙어>는 군인과 국민들이 반드시 엄격히 따라야 하고, 수시로 심지어는 아침저녁으로 봉독해야 할 금과옥조로 규정되었다. 1890년 2월 야마가타 내각은 황기(皇紀) 2550년을 기념한다는 구실로 금치훈장(金鷄勳章)을 나누어주고 이로써 “무공이 발 군인 군인·군속”을 격려했다.

강력한 군비 정책을 추진해 나가면서 메이지유신 이후로 차츰 완성된 국가 군국주의 체제가 확립되어 나갔다. 1878년에는 참모본부를 천황 직속으로 설치하여 작전, 용병 등 군령의 대권을 주관하게 하고 군령(軍令)과 군정(軍政)을 분리하는 군사 이원제를 실행했다. 또한 군령장관은 관련 군령 사항을 내각을 통과하지 않고 천황에게 직접 상주하여, 천황으로부터 판정받아 시행하도록 규정하여 점차로 “통솔권 독립”의 원칙을 확립했다. 1885년에는 내각관제(內閣官制)를 실행해 내각 아래 육·해군성을 설치했다. 1889년에 “하사(欽賜)”한 메이지 헌법은 일황이 통수권을 장악하도록 규정했고, 1900년에는 육해대신(陸海大臣) 현역 무관 전임제를 규정하여 내각의 육해군성의 “대신 및 총무장관은 반드시 현역 장관이 담임”한다고 하여 대신은 반드시 대·중장이 말고, 총무장관(즉 차관)은 반드시 중·소장이 말도록 했다.

1906년 10월 야마가타 아리토모는 육군방면에 제정한 <제국국방방침안(帝國國防方針案)>을 상주했는데, 이 안에 기초하여, 연말에는 육해군이 함께 <제국국방방침>을 기초했다. 1907년 4월 4일 천황은 <제국국방방침>과 부록<국방소수병력(國防所需兵力)> 및 <제국군대 용병강령>을 정식으로 비준했다. 이 문건들이 규정하고 있는 요점에는 “제국국방은 공세(攻勢)를 원칙으로 한다”는 것이었다. 이와 동시에 중국을 포함하는 수많은 가상 적국을 확정하고 “동아시아에서 공세를 발동할 수 있도록 한다”는 군비(軍備)의 기준이 확립되고 있었다.²⁷⁾ <제국국방방침> 및 그 부록<용병강령>의 제정으로 일본은 진공형(進攻型)의 동아시아 전략과 세계 전략을 확립했고, 또한 근대 일본 군국주의 체제를 철저히 강화했다.

IV. 일본 신군제의 실천과 조선의 함락

조선반도의 형세가 급변하고 일본군의 군사 준비가 끊임없이 확장되면서 일본에서는 극히 선동적인 확장론이 무수히 출현했다. 후쿠자와 유키치(福澤諭吉)는 1885년에 <탈아론>

25) (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大本營陸軍部》(1), (東京)朝雲新聞社, 昭和49年, 13-14쪽.

26) 歴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4, 近代卷, 岩波書店, 2002年, 200쪽.

27) (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戰史叢書·陸軍軍戰備》, (東京)朝雲新聞社, 昭和54年, 60쪽.

을 발표하여 서방 열강과 같은 확장 수단을 취해 조선과 중국 등 아시아의 인근 국가들에 강경책을 취하자고 주장했다. 같은 해 모리모토 토키치(森本藤吉)(또는 다루이 도키치樽井藤吉라고도 함)는 〈대동합방론(大東合邦論)〉을 써내어 조선을 직접 병탄하자고 요구하였는데, 이 책은 1893년 갑오전쟁의 전야에 정식으로 출판되었다. 책 속에서는 “일한(日韓) 합방의 일은, 만일 오늘날 이루지 못한다고 하더라도 다른 날 어찌 합동의 기회가 없겠는가.” 라고 강조했다.²⁸⁾

일본 정부는 조선반도와 대륙 침략 정책을 정식으로 제정했다. 1889년 12월 야마가타 아리토모 내각이 성립하였고, 익년 3월에는 아리가타가 제출한 〈외교정략론〉에서 그는 “대개 나라의 독립과 자위의 길에는 두 가지가 있다. 하나는 주권선을 수호하는 것으로 타인을 침해하는 것을 허용하지 않는다. 두 번째는 이익선을 보호하는 것으로 지세가 뛰어난 곳을 잃지 않는 것이다.” 라고 했다. 그는 “바야흐로 이제 여러 국가들 사이에 선 때에 단지 주권선만을 보호하는 것으로는 국가의 독립을 유지하는 데에 이미 부족함이 있으니 반드시 나아가 이익선을 보호하여 항상 지세가 좋은 곳에 서야 한다.” 고 생각했다. “우리나라의 이익선의 초점은 실로 조선에 있다” 고 언명했다.²⁹⁾ 외상인 아오키 슈우조오(青木周藏)또한 5월에 〈동아열국의권형(東亞列國之權衡)〉을 제출하여 러시아를 시베리아에서 내쫓아 조선과 만주 및 아무르강 이동 지역을 일본에 병합하고, 조선에 대해서는 “강경한 수단을 취해 간섭 정책을 시행하자” 고 주장했다.³⁰⁾ 야마가타 수상은 상술한 의견을 종합하여 12월 6일에 국회에서 〈시정방침연설〉을 발표하고 주권선과 이익선 수호의 중요성을 강조했다. 야마가타가 “초점” 인 조선을 제압하길 요구하면서 부산부터 의주 사이에 동아대륙으로 통하는 큰 길이 있다고 정책 연설을 한 것은 일본 대륙 침략정책이 정식으로 형성되었음을 보여준다.

일본의 중국 침략이나 조선반도 병탄은 새로 건설한 외정형군대의 무장 역량을 사용한 것으로, 대중국·대러시아 전쟁 가운데 차츰 실현되었다. 1891년 6월 야마가타 내각이 총사직하였으나, 야마가타 내각의 확장정책은 정착하였고 이후에 마쓰카타 내각에서 계속 추진되었다. 7월 카바야마(樺山) 해상(海相)이 제출한 1.1만 톤의 철갑함(청나라 최대의 鐵甲鎮遠, 定遠艦은 각 0.73만 톤이었다) 네 척과 순양함 6척의 예산이 비준되었다. 1892년 8월 제2차 이토(伊藤) 내각이 성립하여 전면적으로 대외확장이 강화되었다. 1893년 2월에는 새로운 조선(操船)계획이 추동되었다. 일황은 칙어를 하달했다. “국방의 일은 하루라도 연기하면 백년을 후회한다.”³¹⁾

1893년 4월에서 7월, 참모차장 가와카미 소우로쿠(川上操六)가 직접 정보 수집을 위해 청나라와 조선에서 장장 3개월간 여행했다. 같은 해 5월 19일 천황은 〈전시대본영조례(戰時大本營條例)〉를 비준하고 동시에 〈해군군령부조례(海軍軍令部條例)〉를 비준해서, 기본적으로 국가의 전시 체제 준비 사업을 완성했다. 그 목표는 “메이지 25년, 일청 양국 사이에 압운이 날로 짙어지니, 육해군 모두 점차 전시 편제로 정비”³²⁾하는 것이었다. 익년 7월 천황

28) (日)森本藤吉, 《大東合邦論》, 明治廿六年八月版, 近藤圭造印刷, 4쪽.

29) (日)大山樾, 《山縣有朋意見書》, 原書房, 昭和41年版, 196~197쪽.

30) (日)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上册, 商務印書館, 1992年版, 237쪽.

31) 大吉林社 編, 《皇室皇族聖鑑》明治篇, 大吉林社, 1936年, 51쪽.

32) 外山操, 森松俊夫 編, 《帝國陸軍編制總覽》, 芙蓉書房, 昭和62年, 31쪽.

은 대본영을 이끌고 9월 15일 히로시마에 진주하여 청국 및 조선 병탄 전쟁을 가까이서 통솔했다. 전쟁이 진행되는 과정에서 야마가타는 〈조선정책상주〉(1894.11.7.) 등을 통해 조선이 전반적인 판국에서 전략 목표상 갖는 지위를 더욱 강조하고 “우리나라가 오랫동안 동양을 제패하고 열국 사이를 응시(雄視)” 하도록 하기 위해 반드시 부산에서부터 의주 사이의 동아대륙으로 통하는 큰길과 중국에서 인도로 곧장 통하는 큰길을 제압해야 한다고 했다.

일찍이 동학교도들의 기의가 확대될 때, 이토 히로부미와 무쓰 무네미쓰(陸奥宗光)는 눈앞에 조선으로 세력을 확대할 좋은 기회가 도래했다고 굳게 믿었다.³³⁾ 아울러 출병권을 얻기 위해 주한 대리공사인 스기무라 후카시(杉村濤)에게 위안스카이를 밀탐하도록 명하고, 중국에 출병을 부추겼다. 4월 29일 외무성은 보고를 받고, 조선이 이미 청 조정에 병사를 빌려줄 것을 요청했다는 것을 알자, 관저에서 내각회의를 열고 있던 이토 히로부미는 곧장 사람을 파견하여 참모총장인 아리스가와노미야 다루히토 신노(有栖川宮熾仁親王)와 참모차장가와카미 소우로쿠를 오도록 청해, 조선 출병을 결정하고 일황의 결정을 위해 상주했다.³⁴⁾

5월 2일(6월5일) 오후 4시, 주조(駐朝)공사 오오토리 게이스케(大鳥圭介)는 외무성과 해군 군령부관원을 대동하고 순양함을 타고 출발했다. 일본은 중국에서 조선에 파견할 병력을 오천 명으로 예측하고 “약 8천 병력을 보유한, 완전히 청국을 압도할 수 있는 전시편제의 혼성여단”³⁵⁾을 파견하기로 결정했다. 일본이 출병할 때, 조선의 기의군들은 이미 정부와 정전 협의에 도달해 있었다. 청정부는 곧 중일 〈천진조약〉 제3조에 의거하여 일본과 철군교섭을 전개했다. 그러나 일본군이 중조 양국에 싸움을 거는 것을 완전히 저지할 수는 없었고, 갑오전쟁은 폭발했다.

갑오전쟁은 근대 일본군국주의가 중국과 조선에 발동한 대규모 침략 전쟁이고, 또한 근대 동아시아 국가들의 관계 돌변의 관건이 여기 존재했다. 일본은 청군에 승리해 〈마관조약〉(馬關條約)을 통해 조선에서 중국의 역량을 배제했다. 일본의 조선 전면 제압의 시도는 삼국간섭으로 인해 한차례 지체되었다. 러시아 세력은 동북을 통제하는 동시에 전면적으로 조선의 경내에 깊이 들어와 10년 후 러일전쟁이 일어나자 조선에서 쌍방이 전면전을 일으켜 그 세력이 서로 오르락내리락 했다.

일본은 1904년 2월에 러일전쟁을 발동하고 3월 11일 한국 주찰군(駐札軍)을 편성했고, 4월에는 경성을 점령하여 한국의 군사점령을 완성했다. 1905년 11월에는 조선에게 굴욕적인 조약인 〈을사보호조약〉에 조인하도록 강요하였다. 1906년 2월에는 소위 조선통감부를 정식으로 설치해, 이토 히로부미가 첫번째 통감으로 임했고, 1907년 이토 통감은 조선총리대신인 이완용과 〈정미칠약〉(丁未七約)을 맺어, 조선군대 해산 등의 조항을 규정하고, 각지에서 저항하는 의병운동을 가혹하게 진압했다. 여기에 이르러 일본군국주의는 이미 그 원하던 바를 이루었고, 원했던 이익선의 “초점”인 조선반도를 실질적으로 손 안에 장악하게 되었다. 1909년 7월 6일, 일본 내각회의는 적당한 시기를 골라 조선에 병탄한다는 방안을 정식으로 통과시켜, 조선민족에는 망국의 위기가 눈앞에 임박했다.

일본이 정식으로 합병 방침을 확정하고, 조선이 망국의 가장 마지막 고비에 있을 때,

33) 山崎有信,《大鳥圭介傳》, 東京: 東京博文館, 1915年, 250쪽.

34) 陸奥宗光 著, 伊舍石 譯,《蹇蹇錄》, 商務印書館, 1963年, 9쪽.

35)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冊, 商務印書館, 1992年 版, 260쪽.

1909년 10월 26일 안중근의 이토 히로부미 사살 사건이 일어났다. 하얼빈 기차역은 중동(中東)철로의 요충지였기 때문에 국제사회의 뜨거운 관심을 일으켰다. 일본군정당국은 어쩔 수 없이 국제법을 존중하는 태도로 안중근에 대한 재판을 진행했다. 안중근은 이토 히로부미의 15개의 죄상을 열거하고 이것으로써 자신의 이토 히로부미 사살의 정당성을 증명했다.³⁶⁾ 그러나 일본은 일본의 법률을 근거로 그에게 단독 심판을 내리고 신속하게 안중근에게 사형을 판결했다.³⁷⁾ 1910년 3월 26일 오전 10시, 안중근은 뤼순(旅順) 일본감옥에서 조금도 두려워함 없이 정의를 위해 희생했다. 반년 후인 8월 22일, 데라우치 마사타케(寺內正毅) 통감은 이완용과 〈일한합병조약〉을 체결하고 조선국호를 폐하고 총독부를 설치했으며 조선을 일본의 판도 안에 편입했다. 육군대신 데라우치 마사타케는 초대 조선 총독으로 임명되었다. 역사상 4천 년 이상을 독립적으로 존재했던 조선은 결국 한동안 나라가 망하여 근 40년의 식민지시기로 빠져들었다.

종합하면, 1871년의 중일수호조규는 비록 동아시아의 평화적 관계를 유지·보호하고자 시도했으나 일본군의 무력정책으로 인해 그 시도는 깨졌다. 일본은 새로 건설한 외정형 무장 역량에 기대어 중국을 침략하고 러시아와 전쟁하며 조선을 병탄하여 근대 동아시아 국가관계가 70년간 요동하는 깊은 골짜기의 시대로 빠뜨렸다.

36) 안중근이 열거한 이토의 15가지 죄상은 李東源 譯注 〈安重根審訊記錄〉, 金宇鍾等 主編, 《安重根》, 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4年, 270-271쪽에서 볼 수 있다. (1)한국왕비를 살해한 건 (2)光武9年11月, 한국에 불리한 5조 호보조약을 체결한 것(3)隆熙 元年7月, 한일조약(7조)을 체결한 것(4)태황제를 살해한 건 (5)한국군대를 해산한 건(6)의병과 평민들을 학살한 건(7)한국의 정치적 권리와 기타 권리를 박탈한 건(8)한국 교과서를 불지른 것(9)한국의 신문업을 금지한 것(10)약탈적인 은행권을 발행한 것(11)불법적으로 2300만 국채를 모집한 것 (12)한국의 황제를 폐위시켜 동양의 평화를 깨뜨린 것 (13)유명 무실한 보호정책(14)이토는 현 일본황제의 부 孝明을 살해함(15)한국문제에 대해 일본과 세계를 기만하는 행위를 함.

37) 日本學者 鹿野琢는 이러한 방식의 심판은 완전히 불공정하고, 불법적인 것으로 안중근은 응당 무죄를 선고받아야 한다고 서술했다. 그의 〈安重根無罪論〉, 金宇鍾 等 主編《安重根》, 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4年版 참고.

【Abstract】

The Korean factor in modern Eastern As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s military system

XU Yong

Key words: Modern East Asia, Korea; Factor; Military system of Japan; External Aggressive

In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ong China, Korea, Japan and Russia in modern times, Korean peninsula, due to its unique history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had become the focus of contradictions. The 1871 *Sino-Japanese Fostering Relations Regulations* between Qing and Japan, aiming at maintaining peacefu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was broken up by the military policy of Japanese forces. The Meiji government issued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Ordinance, etc. to strengthen Japanese army's central commanding system, meanwhile, in 1888, replaced the sendai system with the division system, to prepare for future large-scaled outbound battle missions. These changes marked the official founding of modern Japanese "external aggressive army". The reform of Japan's military system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ts military power was gradually realized by using the newly built "external aggressive army", through the invasion to China, wars with Russia, and finally the annexation of Korea.

I. The strategy position of Korea and the start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East Asia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East Asia entered into a stirring transitional procedure. On July 1871 in Tientsin, the Qing government appointed Li Hung chang-Tai tse tai pao, an assistant grand secretary, minister of military affairs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of ChiLi, as the plenipotentiary officer to negotiate with the Japanese officers concerned about the making treaty in trade. On 13th of September 1871, *Sino-Japanese Fostering Relations Regulations* between Qing and Japan was assigned (18 items), and the customs duty regulations affiliated to trade regulations was assigned (33 items).

Sino-Japanese Fostering Relations Regulations between Qing and Japan was a comparatively equal treaty of diplomatic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modern history of both countries. The treaty not only formulated the bilateral diplomatic relation, but also influenced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This treaty emphasized at the beginning

"China and Japan have always been enjoying the friendship for a long time, for the sake of mutual friendship, the consolidate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is established" The treaty affirmed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states and stipulated peace and friendship as the principle of diplomatic relation."

The first item demanded that both states should treat the territory of the opposite side with courtesy and without any invasion, so as to creat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both two states. According to this item, both

sates recognized the existed East Asian structure and protected the factors attributing to the stab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which includ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dependency of Korea that had lasted for a long time. The negotiation and expression way of the treaty is quite different with those of suzerain-dependent diplomacy. As the comment described, this treaty became the symbol of the entrance of the eastern Asia's suzera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to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However, after the two parties had exchanged the treaty, Japan put anabasis to Taiwan, and carry through *Ryukyu Dealing*, then concentrate its power on north to conquer Korea, expanded to Korea peninsula and mainland, brought severe struck to the principle of promoting friendship and giving friendly treatment to each other's belonging countries. Korea peninsula, which locate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ecame the focus issue in Sino-Japan confrontation and East Asia, due to its special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traditional factors.

As being the last historical examp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vereign-vassal state System—China-Korea relationship, it was true that the Qing dynasty treated itself as a first-rate country and Korea as a secondary one. However, from the angle of sovereignty and morality, the co-existence and mutual-help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had existed for a long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 the traditional Qing-Korea relationship was concentrated on the concept of tributary country's self-determination. The historical fact was that Suzerain had no power to denial tributary's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e its municipal affairs. The system was different from the violent rule of modern west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2. the crisis of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n January 23, 1869, the Meiji government sent envoys to Korea to announce that all the power had been returned to the Mikado in Japan. Their credential, on which was written “*with the enthronement of our emperor,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need to be reshaped*”, was refused by Korean, because the credential's form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before.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is excuse, Kido Takayoshi and other hardliners i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itiated Seikanron as an opportunity to “fully prosper the country someday”. The uncompromising Seikanron became increasingly intense amo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n Japan. On February 26, 1876, Japan compelled Korea to assign the unequal *Treaty of Kanghwa-Do*.

After its conspiracy to get Okinawa in 1879, Japan speeded up the expansion action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80's. In July 1882, the soldiers in Seoul rioted, which was interfered by the Japanese army, and that was called *Renwu incident*. Due to this incident, Japan forced Korea to agree to the *Treaty of Inchon*, which included the items that Japan can send soldiers to their consulate in Korea and Korea must pay reparations to Japan. In November, 1884, based on the first proposal made by Japan's minister to Korea, Kim Okgyun and his colleagues launched *Jianshen Incident*, and killed the important members of Korea's last Empress's faction. After the incident, the Court of Ch'ing dynasty immediately sent army to Korea, which united with the army of Korea and defeated the rebel army supported by Japan. Whereas Japan brought full diplomatic pressure to Korea and forced the latter to agree to the *Treaty of Seoul* on January 9, 1885, later on, Korea apologized to Japan and paid repar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when the situation kept on worsening, the Court of Ch'ing dynasty once strengthened its position of suzerain of Korea. However, the

basic point of the Court of Ch'ing dynasty was to maintain the status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Korea, and denied the suggestion, coming from home and abroad, of making Korea into a province of Ch'ing dynasty.

The 1884 incident had aggravated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two sides on the peninsula, and after that Li hung-chang had 6 negotiations with the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Japan Ito Hirobumi for this situation. Due to the Ch'ing court's easy compromise, the two sides signed the Sino-Japanese "*special meeting of Tientsin*" in April 18, 1885, also known as the "*Treaty of Tientsin*", or "*Treaty on the Korean troops*." The Treaty states as follows "*if Korea had a social upheaval in the future, and China, Japan or both has to send troops to this country, each should make a prior notice to the other, and each side should withdraw its forces and leave no defense after peace.*"

As the Chinese side made concessions so easily, the Article 3 of joint military action was approved, but unfortunately the conclusion of the special article of *Sino-Japanese Tientsin session* did not ease off the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t all. After two military loss in Seoul in the 80's, Japan succeed not only in forcing Korea to make a treaty in favor of Japan, but also in the accumulation of military forces, so as to comeback in the 90's.

3. Japan's "external aggressive army" arms expansion concept and the new military system.

In the reform policies of the Meiji government, "Strength of military power" is prior to "prosperity of industry and business" and "enlightment of civilization". In 1868, the Meiji government, which by then had no private army, announced to recruit from all the warlords in Japan. By Feb. 1871, approximately 10 thousand people from troops in Satsuma, Choshu and Tosa were reorganized into "Gosinbei", which means "the emperor's private army". Since then, the Meiji government gradually cut down the military forces of warlords and strengthened its own power. Two sandais (military fortress) were first established in Tosando and Saikaido. In Aug. 1871, the two Sandais were regrouped into four, respectively in Tokyo, Osaka, Sansai(Kumamoto) and Tohoku(Sendai), and later supplemented by two more in Nagoya and Hiroshima.

The sandai system broke up the standing army of ex-warlords and regrouped them into the standing army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5th year of Meiji, November of lunar calendar (Dec. 1872), *Recruitment Rescript* and *Recruitment Instruction* were promulgated. These two orders promoted militarization, hence led to enlargement in scale of the standing army. More changes of military system were preceded by the Meiji government in order to increase its military power. *The Imperial Order of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Ordinance* issued in 1886 perfected Japanese army's central commanding system. In 1888, the 21st year of Meiji, May 12th, the *Division Headquarters Ordinance* abrogated the sandai system and replaced by the new division (shidan, in Japanese) system.

The release of above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Ordinance* and *Division Headquarters Ordinance* marked the official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Japanese army. These two ordinances eliminated the regional restriction and public security function of post-reform newly-organized Japanese army and made it answer directly to the Japanese emperor (Tenno). Thus, it became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syndicate among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when intending to send troops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 emperor would

no longer need the approval of the cabinet which was set up in 1885.

The *Division Headquarters Ordinance* released in May 1888 replaced the former sandais with divisions, which were strategic units built exclusively for extensive outbound battle missions. The newly built divisions can adapt to various outbound large-scaled field operations. This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indicated that Japan's modern Army, or another word, its new "aggression-aimed army" had been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he born of division system had another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disagreement, on the design of modern Japanese army's function since the day it was found, was resolved. At one time, there was Miura Goro advocating to build "home-guarding army", "Getsuyohkai" trying to promote "soil-protection-aimed" instead of "aggression-aimed" army, while Yamagoto Aritomo, along with Oyama Iwao etc., were calling for military expansion and demanding a three-year military service be taken by common citizens. The latter group also demanded to build Japanese army according to western standard, and organize them into strategic units — divisions, so that in case of war, even larger battle unit could be formed based on those ready-made divisions. The offensive group finally won out, and the succedent ten-year military plan (from 1885, the 5th year of Meiji, on) were carried out in their way. The establishment of division system is deemed as "the necessary vast enlargement of military force for future aggression". Especially, it's fully prepared for fast invasion to Korea and Qing Dynasty. The confirm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division system in 1888 suggested that Yamagoto and his fellow men's "aggression-aimed army" idea was formally accepted and gradually proceeded.

While organizing the new Japanese army, the Meiji government never forgot to put forward more expansionary diplomatic strategies. In 1876, Japan intensified the reconnaissance on China through *Kanghwa-Do Treaty*. In Nov. 1880, based on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previous years, Yamagoto Aritomo handed in to the emperor the *Military Strategy next to a Strong Neighbor*, which said the country's primary mission was to build up armament — powerful army spoke louder than any political measure.

The Meiji government also took a lot of approaches to root the war spirit upon Japanese traditional Bushido culture. In 1869, Meiji Tenno paid homage to the newly built Tokyo Shokonsha (spirit gathering temple), which changed its name into Yasukuni Jinja (Yasukuni Shrine) in 1879. In 1871, *Dokuho* (soldier's rules) was released to both army and navy. It emphasized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including showing the emperor's stateliness. In 1882, the emperor issued the *Words to My Soldiers*, which said: "I thee armymen Grand Marshall, thee my arms and legs, I thy head and brain."

In Oct. 1906, Yamagoto Aritomo handed in to army the *Imperial National Defense Guidelines: the Draft*. Later the same year, army and navy united drafted the *Imperial National Defense Guidelines*, which was approved by the emperor on April 4th, 1907, together with the *Necessary Military Power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Imperial Battle Guiding Principles*. Main points in these documents include: "Imperial national defense is based on Offensive military actions"; confirmation of several hypothetical enemies (including China, Qing dynasty); and "military power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declare war to any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Imperial National Defense Guidelines* and *Imperial Battle Guiding Principles* decla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s offensive East Asian and worldwide strategy, and completely strengthened its militarism.

4. The actual combat of Japan's new military system and the fall of Korea.

As the condi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dramatically changed, and Japan's military preparation continuously elevated, dozens of agitative theories of invasion rose within the Japanese islands. Before long,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ormally formulated the invasive strategy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hina mainland. In Dec. 1889, the Yamagoto Aritomo Cabinet was found. The next year, Yamagoto proposed the *Essay on Diplomatic Strategy*, in which he said: "To be strong and independent, a country has two ways: to defend the sovereignty lines so that no one dare bully it; or to struggle for the profit lines so that it can take more advantages. He thought that, "In today's world, to defend the sovereignty lines only, is not enough to survive among so many countries. We must try to struggle for the profit lines to take more advantages." He also said that, "The focal point of our profit, is Korea". Prime Minister Yamagoto gathered the ideas above, and gave the parliament a speech named *How to Carry out our Plan*, which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overeignty lines and profit lines. The speech, in which Yamagoto expressed his ambition of controlling Korea, the "focal point", and to clear the way to the East Asian continent through Pusan and Uiju, suggested that the invasive strategy of Japan to the mainland had officially formed.

Japan's invasion to China and Korea is realized by using the newly built "aggression-aimed army" and through wars with China and Russia. During April to July 1893, Kawakami Soroku, assistant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took a reconnaissance trip to Qing dynasty and Korea himself. On Sept. 15th, the following year, the Japanese emperor set the supreme headquarter in Hiroshima, making it easier for commanding troops which were later sent to Korea and Qing Dynasty for invasive purpose. During the war, Yamagoto further emphasize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Korea in the whole senario through *Report on Strategy against Korea* (Nov. 7th, 1894).

June 5th (May 2nd of lunar Calendar), Otori Keisuke, together with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navy commander set out in a corvette. As they estimated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soldiers garrisoning in Korea was 5,000, the Japanese army sent a "mixture troop with about 8,000 soldiers and overwhelming force". However, at the time the Japanese troop set out, the insurrection army had already signed cease-fire agreement with local government. Thus, Qing Dynasty immediately started negotiating with Japan in accordance to the third item of *Tianjin Treaty*. The attempt to negotiate was in vain. Japan eventually opened fire to China and Korea, which unfold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s a large-scaled invasive war started by Japanese militarism against China and Korea. It's also the turning point of moder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Qing's defeat by Japan led to the signing of *Maguan Treaty*, and its retreating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Japan's attempt to control Korea totally was once impeded by the intervention of three countries (Russia, Germany and France). Especially, Russia, whose force in northeast China was also comprehensively intruding into the Korean territory. Until the Russo-Japanese War which broke out 10 years later, both countries had experienced winnings and losses in fighting each other inside Korea.

In Feb. 1904, Japan started the Russo-Japanese War. It gathered the troops in Korea on Mar. 11th and took over Gyeongseong (Seoul) in April. In Nov. 1905, Japan forced Korea to sign the *Yisi Protection Treaty* and officially set the so-called Japanese Supervisor's Office in Korea in Feb. 1906. Ito Hirobumi became the first

supervisor. In July 1907, supervisor Ito signed the *Seven Treaties of Dingwei* with Korean Premier Lee Wan Yong. The treaties demanded that Korea disband its army and strictly suppress insurrect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On July 6th, 1909, Japanese cabinet officially passed the proposal to annex Korea at a proper time. The survival of Korea was in a precarious situation.

At this very moment, on Oct. 26th, 1909, Ahn Joong Keun shot Ito Hirobumi. As the shot took place in Harbin Railway Station, which is the hub of the railways in the mid-east, it's widely noti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arrested Ahn Joong Keun and judged him separately according to Japanese laws. Ahn Joong Keun was sentenced to death without and hesitation. On Mar. 26th, 1910, 10:00 am, Ahn Joong Keun sacrificed in a Japanese prison in Lushun. Half a year later, on Aug. 22nd, supervisor Terauchi Masatake signed with premier Lee Wan Yong the *Japan-Korea Annexation Treaty*, which declared the abolishment of Korea's country title and the Japanese supervisor's office in Korea, establishment of the governor's house, and Korea a part of Japan from then on. Army chancellor Terauchi Masatake became the first Japanese governor of Korea. Since then, Korea, a country that had been existing independently for more than 4,000 years, finally fell, and started its nearly 40-year colony period.

Generally saying, although the *Sino-Japan Reconciliation Regulation* signed in 1871 did tried to protect the peace of East Asia regions, but it's broken down by Japan's military strategy. Relying on its newly built "aggression-aimed army", Japan invaded China, warred with Russia, and finally annexed Korea, which gave rise to the 70-year turbulent era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of modern East Asia.

중일전쟁 직후 식민지 조선인의 만주와 중국에 관한 인식

■ 柳 時 賢 (高麗大學校) ■

중일전쟁 직후 식민지 조선인의 만주와 중국에 관한 인식

- 최남선의 기행문을 중심으로 -

柳 時 賢 (高麗大學校)

〈목 차〉

- I. 머리말
- II. 중일전쟁과 식민지 조선인의 ‘국경’ 넘기
- III. 동북아 국제 관계 속에서의 식민지 조선(인)의 위상 설정
- IV. 만주와 중국 동북지역 거주 조선인의 활동에 관한 인식
- V. 맺음말

I. 머리말

국제 여행기는 異國이라는 타자를 통해 자신의 정체성을 확인하는 방안의 하나이다. 사이드의 『오리엔탈리즘』에서 논의하듯이, 서구인의 여행기는 여행 대상지인 ‘동양’에 대해 정형화된 이미지를 만들고, 서양과의 차이를 고착화함으로써 서양 제국주의 지배를 합리화했다.¹⁾ 반면 ‘동양’의 서양에 관한 기행문 혹은 식민지에서 제국주의 국가로의 여행기는 이러한 목적과는 달리, 방문지의 ‘근대 경험’을 모델로 해서 국민국가를 건설하고자 한 민족주의적 관심과 긴밀히 결합되었다.²⁾ 그렇다면 동일한 제국주의 국가 내부의 식민지와 식민지 사이의 여행은 어떠한 의미를 지니는 것일까? 제국주의 국가들은, 비록 구체적인 식민지 정책에서 차이가 있지만, 대부분 각각의 식민지에 대해 다양한 위상을 부여했고, 이러한 정책은 식민지들 사이에 ‘서열화’로 연결되었다.³⁾ 본고에서는 식민지 지식인 최남선의 만주 기행에 대해 검토하고자 한다. 그 이유는 일본인이 만주지역을 방문한 것과 비교해서 보다 복잡한 시선과 논의가 내재될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즉 여행자의 민족 소속의식과 이해관계에 따라 만주는 각각 상이한 공간으로 이해될 수 있다.

1929년 대공황 이후 일제는 자원 확보 및 상품판매 시장 확대를 위해 1931년 만주를 침략하고, 1937년에는 중일전쟁을 일으켰다. 본격적인 침략전쟁기로 들어가면서, 일제에 협력하는 조선인의 숫자가 확대되고, 이들의 논지 역시 일제의 전쟁 협력의 방향으로 강화되었

1) 에드워드 사이드, 박홍규 역, 『오리엔탈리즘』, 교보문고, 1991, 11~58쪽.

2) 한말 일제시대 서구와 일본에 관한 기행문에서 주목된 것은 그들의 근대 문명과 문화였다. 해방 후에도 서구를 포함한 세계 지리 교육은 학생들에게 국민정신 함양과 국가·민족발달을 목표로 제시되었다(임종명, 『탈식민지시기(1945~1950) 남한의 지리교육과 국토표상』, 『한국사학보』 30, 2008.2, 12쪽).

3) 프랑스의 ‘분리통치’ 정책이 실시되던 인도차이나반도의 경우, 프랑스인들에게 ‘정력적이고 지적인’ 베트남인은 ‘어린애 같은’ 크메르와 라오스인들과 대비되었고, 베트남인 역시 프랑스의 입장을 반영했다(베네딕트 앤더슨, 윤형숙 역, 『상상의 공동체』, 나남출판, 162~171쪽).

다. 중일전쟁 이후 일제의 점령지역이 확대되면서, 일제의 피지배 민족(인종, 종족)의 외연이 확대되었다. 이제 한반도는 중국 동북지역-조선-일본을 연결하는 중간적인 존재가 되었다. 일제의 영토가 만주, 중국으로 확대되면서 일본 제국 안에서의 ‘조선인’의 위상이 달라졌다. 일제는 조선과 일본과의 관계를 염두에 두면 ‘內鮮一體’를 내세웠고, 대륙과 조선 사이의 관계에서는 ‘滿鮮一如’를 강조했다. 그 결과 일제의 강점 아래 있던 만주와 중국지역은 여러 민족이 공존 혹은 각축을 벌리던 공간이 되었다. 따라서 조선인에게 ‘만주’를 포함한 중국 동북지역 및 일본의 조차지인 관동주는 단순한 外國이 아니었다.

최남선은 출판인이자 역사가이면서 동시에 1920년대 『금강예찬』(1926), 『백두산근참기』(1927) 등의 민족주의적 입장을 강조한 여행기를 남긴 인물이었다. 1920년대 최남선의 기행문에 관해서는 1920년대 기행문을 중심으로 이루어졌는데, 『백두산근참기』를 중심으로 여행이 개인과 민족의 ‘心象空間’으로 이해되었음에 주목했고, 최남선의 묘향산과 금강산 기행이 식민지와 제국주의사이의 관계에서 또는 이광수의 기행문과의 비교 속에서 검토되었다.⁴⁾ 한편 최남선은 중일전쟁 직후인 1937년 9~10월 사이에 중국동북지역과 관동주를 기행하고, 『송막연운록』이란 기행문을 남겼다. 이전시기 여행기가 國土를 대상으로 했다면, 이번 여행기는 중일전쟁 이후 ‘異國’과 그곳에 거주한 조선인을 대상으로 삼았다. 따라서 1937년에 쓴 최남선의 여행기를 살펴보는 것은 일제에 협력하는 최남선의 논리 변화를 고찰함과 함께 당대 만주에 관한 조선 지식인의 복합적인 입장을 살펴볼 수 있는 계기가 될 수 있다. 또한 최남선의 기행문을 통해 만주에서 조선인의 활동에 관한 ‘기대’가 어떻게 일제의 침략전쟁의 진행이란 현실 속에서 어떻게 굴절되는지 여부의 단서를 찾고자 한다. 그리고 중국동북지역이 韓民族의 古代史의 공간으로 볼 때, 이 지역에 관한 과거와 식민지 시기의 논의 속에서 ‘민족사’ 인식의 연속과 단절이란 물음을 검토하고자 한다.

II. 중일전쟁과 식민지 조선인의 ‘국경’ 넘기

여행기의 경우 어느 시점에 쓰였고, 어느 언론 매체에 발표했는가 여부가 고려되어야 한다. 「송막연운록」은 1937년 7월 중일전쟁이 발발한 직후 중국 동북지역에 관한 여행기이다. 따라서 최남선의 이 글은 이전시기 국내 여행기인 『금강예찬』, 『백두산근참기』 등과 달리 전쟁과 확장된 공간의 문제가 깊숙이 개입되었다. 아울러 여행기가 발표되면 독자와의 교감이 전제된 작업이라고 할 때, 「송막연운록」은 『매일신보』에 한글로 게재되었으며 조선인 독자를 대상으로 한 여행기라고 볼 수 있다. 1930년대 중후반 최남선의 글쓰기는 『매일신보』에 집중되었는데, 『매일신보』에 게재된 연재물을 중심으로 최남선의 저술활동 속에서 「송막연운록」의 위치를 살펴보면 아래와 같다.

4) 우미영, 「시각장의 변화와 근대적 심상 공간」 『어문연구』 32-4, 2004; 서영채, 「최남선과 이광수의 금강산 기행문에 대하여」 『민족문화사연구』 24, 2004; 우미영, 「근대 여행의 의미 변이와 식민지/제국의 자기 구성 논리」 『동방학지』 133, 2006 참조.

〈표 1〉 1930년대 중후반 『매일신보』에 연재된 최남선의 글

년도	기사 목차와 게재 기간
1934	「甲戌史眞」, 1934. 1. 3~2. 18; 「이순신과 넬슨」, 1934. 4. 21~5. 1; 「龜船은 이조초부터」, 1934. 5. 3~5. 5; 「禁火에 관한 제도」, 1934. 5. 13~5. 16; 「興福寺·원각사로부터 파고다 공원까지」, 1934. 5. 19~6. 15; 「올어러 빛는 大圓光」, 1934. 5. 20~6. 2; 「5월5일 天中節」, 1934. 6. 16, 6. 21.
1935	「故事千字」, 1935.6.29~12.31
1936	「赤鼠五百年」, 1936. 1. 1~1. 3; 「日日是好日」, 1936. 1. 26; 「조선의 신화」, 1936. 2. 16~3. 13.
1937	「元日을 의의있게 하자」, 1937. 1. 4; 「신화·전설상의 牛」, 1937. 1. 9~1. 29; 「朝鮮文化當面の課題」, 1937.2.9~11; 「三重苦의 聖女 헬렌 켈러」, 1937. 5. 25~5. 29; 「조선상식 推候篇」, 1937. 9. 11~22; 「북지나의 역사적 특수성」, 1937. 10. 3~10. 10; 「괴담」, 1937. 10. 13~10. 22; 「제주도의 문화사관」, 1937. 9. 16~10. 2; 「松漠燕雲錄」, 1937. 10~1838. 4.
1938	「보은감사의 생활」, 1938. 1. 3~4; 「奇談소설」, 1938. 1. 11~26; 「동물괴담」, 1938. 4. 5~4. 13; 「변화괴담」, 1938. 4. 14~5. 2; 「人妖談」, 1938. 5. 3~5. 26; 「異物世界說話」, 1938. 5. 27~6. 16; 「動物故郷說話」, 1938. 6. 20~30; 「조선의 민담·동화」, 1938. 7. 1~7. 21; 「조선의 가정문학」, 1938. 7. 22~8. 2; 「삼도고적순례」, 1938. 9. 1~9. 15; 「고적 애호에 대하여」, 1938. 9. 9~9. 11; 「만주풍경」, 1938. 10. 4~18; 「로시아의 동방침략」, 1938. 10. 27~11. 2; 「寶盆설화」, 1938. 11. 3~11. 16; 「因鬼致富설화」, 1938. 11. 17~11. 29; 「仙鏡설화」, 1938. 11. 30~12. 15; 「여의주설화」, 1938. 12. 16~28.
1939	「露國 東侵연대기」, 1939. 1. 1~19; 「異人설화」, 1939. 1. 23~2. 3; 「조선의 신화」, 1939.2.16~3.13

〈표 1〉에서 볼 수 있듯이 1930년대 중후반 최남선의 글쓰기는 조선총독부의 기관지인 『매일신보』에 집중되었다. 『전집』의 약력에서 밝혔듯이, 최남선은 1933년 10월부터 이상협의 권유로 『매일신보』에 본격적으로 글을 게재하기 시작했다.⁵⁾ 이 시기는 1931년 ‘만주사변’ 이 발발하고, 만주국이 건립된 이후이다. 최남선은 1934년 12월에서 1935년 1월 사이에 일본의 神社를 답사한 기간을 제외하고,⁶⁾ 1939년 4월 만주 건국대학 교수로 옮기는 시점까지, 『매일신보』에 다양한 주제의 글을 연재했다. 『매일신보』에 게재한 글을 주제별로 나누어 살펴보면 첫째, 넬슨, 이순신, 헬렌 켈러 등의 인물을 소개한 글을 게재했고 둘째, 연도별 干支를 역사적 사실과 연결시켜 1936년에는 쥐와 1937년에는 소에 관한 일화를 소개했으며 셋째, ‘괴담’, ‘설화’ 등의 주제로 글이 있고 넷째, 조선의 문화와 역사 및 ‘동방문화권’에 관한 글과 중일전쟁 이후에는 만주와 러시아에 관한 기행문이나 평론 등으로 나누어 볼 수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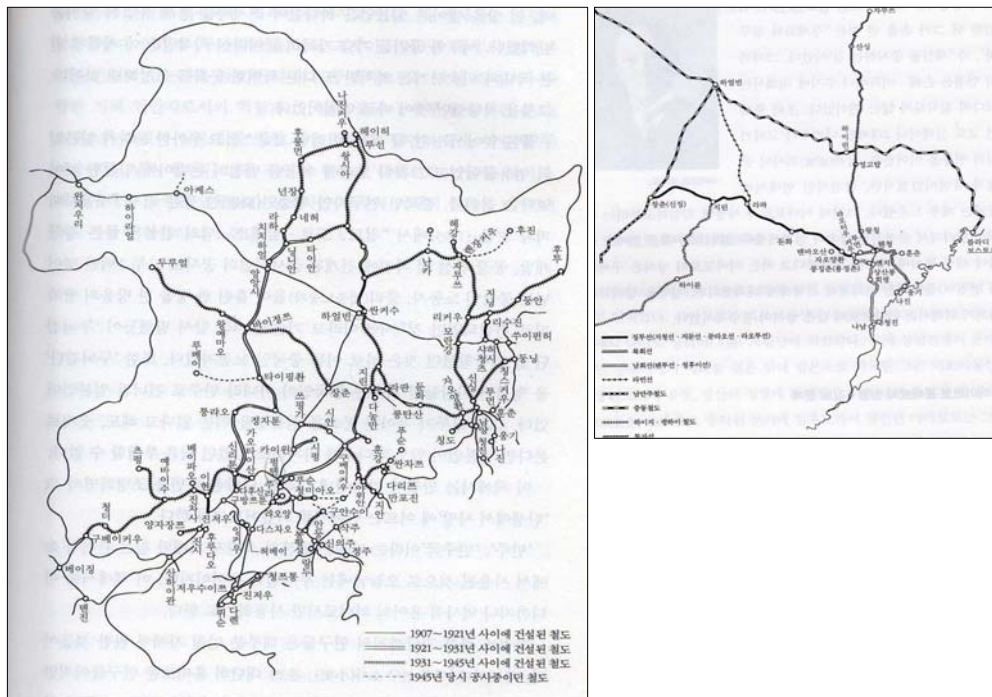
‘조선학’과 관련해서 다방면에 업적을 낸 최남선은 1930년대에도 지속적으로 여행기의 작가로서 주목된다. 「송막연운록」은 네 번째 분야에 포함된 글로, 중국 동북지역 및 러시아에 관한 글 「북지나의 역사적 특수성」, 「三都고적순례」, 「만주풍경」, 「로시아의 동방침략」, 「露國 東侵연대기」 사이에 위치한 여행기가 된다. 최남선은 중국 동북지역 여행의 동기에 관해 “별로 시절의 풍운에 충동된 것은 아니지마는, 오래 경륜하여 오던 滿支遊觀을 다시 더 늦추

5) 육당전집편찬위원회편, 「연보」, 『육당최남선전집(이하 『전집』)』 15, 1973, 현암사, 280쪽.

6) 최남선, 「日本の信仰文化と朝鮮」, 『文教の朝鮮』 115, 1935.3, 94쪽.

지 못할 듯한 생각이 간절할 때에, 鮮滿拓殖으로부터 만주에 있는 이른바 안전농촌의 구경을 중용하여 옴에 응하여 아무렇게나 나서 보겠다 한 것이다” 라고 밝혔다.⁷⁾ 최남선이 오래 전부터 만주와 중국지역을 보고자 한 기대감을 피력해서 중일전쟁과 무관하다는 입장을 밝혔지만, 주된 여행의 동기는 국책기업의 도움으로 조선인의 ‘안전농촌’을 살펴보는 데 있었다. 국책기업인 鮮滿拓植株式會社는 만선척식주식회사와 함께 1936년 9월 조선인의 이주를 조직적, 계획적으로 실시할 필요성에 의해 京城과 新京에 각각 설립되었다. 즉 「송막연운록」은 일제의 대륙지배정책아래 놓여있던 조선농민을 방문한다는 목적이 중심이었다.

「송막연운록」은 1937년 10월 28일부터 1938년 4월 1일까지 『매일신보』에 84회 연재되었다. 최남선은 「송막연운록」이란 제목에 관해 松은 滿洲, 漠은 蒙古, 燕은 北京, 雲은 山西를 의미한다고 밝혔다. 그의 여행은 1937년 9월 26일 경성을 출발하면서 시작했으며, 정확한 귀국 날짜는 확인되지 않지만, 여순과 대련에 머문 시점이 그해 10월 15일이었다. 즉 이 글은 중국 동북지역과 여순과 대련에 이르는 지역을 20일 정도 체류하면서, 그 지역 상황과 그곳에 살고 있는 조선인에 관한 내용을 담고 있는 여행기이다. 이동경로를 살펴보면, 경성을 출발해서, 청진과 회령을 거쳐 중국동북지역에서는 용정촌, 연길, 토문, 훈춘, 동경성, 하얼빈 등을, 하얼빈을 출발해서 만주국 지역에서는 신경(장춘), 길림, 봉천 등을, 그리고 봉천을 출발해서, 영구, 개평을 거쳐 관동주에서는 대련을 방문했다. 최남선 여행의 주요 운송수단은 기차였는데, 최남선의 주요 여행경로와 방문지를 기차노선에 따라 확인하면 아래 지도와 같다.⁸⁾



〈그림〉 만철노선도(1945년 현재, 좌) 길림성 주변의 철도선(우)

7)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0.28, 4면.

8) 그림 1은 고바야시 히데오, 임성모 옮김, 『滿鐵』, 산치림, 2004, 17, 98쪽에서 재인용.

최남선의 1910~20년대 여행기와 「송막연운록」의 차이는 공간적으로 국경을 넘는 것에 있었다. 조선에서 중국 동북지역으로 가는 경로 가운데 하나는 청진에서 두만강을 철도로 건너는 것이다. 琿春은 對蘇 국경지대이기에 신분 증명과 경찰의 허가가 필요한 일이지만,⁹⁾ 조선에서 만주국으로 가는 길은 조선에서 일본으로 가는 것보다는 훨씬 간편했다. 일본에 가기 위해서는 거주지의 경찰 허가와 함께 부산-시모노세끼 사이에 경찰의 시선이 요소소 배치된 여행이었다. 반면 최남선에게 조선과 중국 사이의 국경은 “간도 방면으로 향하는 이는 上三峰에서 朝開線이란 것을 갈아타고 강을 건너는 것이 순로가 된다…… 상삼봉역에는 만주국의 세관이 출장하여 있어 휴대물의 검사를 행하며 얼른 보기에 군인과 같다가 자세히 보면 복장이 좀 이상스러운 만주 순경의 오락가락함이 다 國境色으로 볼 것이었다”라고 해서,¹⁰⁾ 이국적인 정서만 있지만 세관 검사만으로 ‘국경 넘기’가 가능했던 것이다.

한편 조선에서 만주로 갈 때의 여행은 좁은 한반도에서 넓은 대륙으로 간다는 정서가 일반적이었다. 만주는 일본의 3.5배이며, 조선의 5배에 달하는 면적이었다. ‘땅이 좁은 반도’와 넓은 ‘만주 벌판’이란 대비는 당시 만주지역을 가리키는 상투적인 표현이었다. 최남선은 중국 동북지역이란 공간적인 넓음을 시간적으로 화려했던 조선의 고대사에 투영했다. 그는 옛날 한민족의 활동지인 요동지역을 통과할 때 “요동은 실로 古朝鮮의 西疆으로서 이 결과(秦開의 공격으로 인해-인용자)로 조선은 마침내 압록 이남에 退縮하기에 이르렀다”라고 해서 조선 민족과 만주지역(요동)을 역사를 통해 연결시켰다.¹¹⁾ 이 지역에 관한 최남선의 역사 인식은 고구려로 확장된다. 고구려가 요동지역을 차지한 것에 관해 ‘고구려인의 光復的 西進’이라고 표현했고, 이는 “다만 고구려인뿐 아니라 실로 전 동방 민족의 영광일 것”이라고 평가했다.¹²⁾ 아울러 이러한 화려한 과거의 강조는 신라의 삼국통일 이후 국토가 ‘퇴축’되었다는 인식이 함께 내재되어 있었다. 조선 민족사의 공간이 한반도로 줄어들었다는 인식은 고려시대와 조선시대에 관한 역사상에도 반영되었다.

고려·이조 1천년간에 國步가 鴨東에 倭遲하여 蹢躅地에 호흡이 얼른하면 질색하려 하는 萎縮朝鮮의 有心人이 죽히 한번 遼瀋의 境에 미치면 문득 俯仰 感慨에 舊業思變의 心이 油然而히 흥기함을 自抑치 못하기도 하였다.¹³⁾

중국 동북지역이란 공간과 한국의 고대사와 연결시킴으로써, 최남선은 이 지역을 조선인의 시선에서 살펴보았다. 또한 국경은 그에게 민족을 다시금 생각하는 계기를 만들었다. 최남선은 국경을 넘을 때, “年前的 백두산 觀參行의 정회가 부활함을 금할 수 없다. 백두산이 祖岳이라 해서 특이한 감흥에 끌렸던 것인즉, 祖疆이라 할 만주의 地를 往省하는 시방에 마찬가지의 심경을 봄이 진실로 당연하다 할는지”라고 밝혔다.¹⁴⁾ 백두산은 ‘祖岳’이며

9)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1.2, 4면.

10)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0.29, 4면.

11)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8.2.11, 4면.

12)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8.2.11, 4면. 한사군에 관한 최남선의 평가는 1920년대 초반 「조선민시론」의 서술부터 확인된다.

13)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8.3.12, 4면. 이와 유사한 표현으로 최남선은 조선을 ‘쎄님 朝鮮’을 표현했다(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8.3.11, 4면).

14)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0.28, 4면.

만주는 ‘祖疆’으로 대비되었다. ‘祖’라는 호명을 통해, 만주는 조선인의 과거와 현재를 연결시키는 공간이 되었다. 나아가 최남선에게 조선인이 많이 거주하는 간도지역으로 가는 풍경은 거의 조선적 향토색의 연장으로 인식되었다.

沿路의 驛名은 開山屯이니, 八道河子니 하여 米上불 漢文的 색채를 띠었으나, 눈에 들어오는 붉은 고추엮은 草屋과 白衣 두르고 다니는 남녀들이 하나도 조선 내지 그대로 아닌 것이 없다. 말하자면 기차 내에는 약간 異國 情調가 있을 법해도 車外의 세계는 의연히 조선의 연속일 뿐이다.¹⁵⁾

이렇듯 최남선에게 만주는 ‘異國’이지만 동시에 ‘祖疆’으로 간주되는 조선인 본위의 사고가 그의 여행기의 한 중심축이었다.¹⁶⁾ 하지만 「송막연운록」의 검토 공간은 한국 고대사의 흔적이 있는 동시에 당시 이주 조선인의 현실 삶의 현장이기도 했다. 1931년 만주사변 발발과 1932년 만주국 수립으로 조선인 이주자는 1933년을 제외하고는 계속 증대하여 1935년에는 8만 7,000여 명이 증가했다.¹⁷⁾ 최남선에게 만주가 당대 조선인의 ‘祖疆’이 되기 위해서는 古代史의 경험과 함께 당대 조선인의 역할을 설명해야 했다. 최남선은 조선인의 간도 지역 거주가 역사적 ‘사명’인 것처럼 강조했다.

여러분의 재주로 오늘날 여기까지를 싸워 나온 것도 아니다. 여러분의 털미에 보이지 않는 커다란 힘이 있어서 여러분을 끌고 여기로 오게 한 것이니라. 그것은 무엇이나 하면, 우리로 하여금 조상의 땅을 찾게 하는 뜻이다. 만주는 조선 및 조선인의 고향이요, 또 옛날 옛적부터 世世로 물려 가지던 우리의 세간이다.¹⁸⁾

하지만 만주를 ‘조상의 땅’으로 간주하는 것은 과거의 일이다. 최남선이 중국 동북지역을 여행했던 시점은 일제가 만주를 지배했던 시기였다. 일제는 1935~36년 치안 확립에 따라 만주국의 ‘제2기 건설’을 주장하며 종래의 치안공작 제일주의를 탈피하고 대중조직화운동을 전개했고, 滿洲國協和會에서는 조선인 조직화에 주력했다.¹⁹⁾ 비록 과거 민족사의 영역에서 ‘주인의식’을 지닐 수 있지만 당대 현실 속에서, 최남선이 중국 동북지역을 방문했을 당시 치외법권이 없어진, 만주국의 국민으로 포함된 조선인이 존재했다. 따라서 1930년대 현실은 중국 동북지역에서 ‘개척’을 주관하는 것은 일본 제국주의였고, 그들의 기획 아래에서 조선인의 역할이 규정되었다.

III. 동북아 국제 관계 속에서의 식민지 조선(인)의 위상 설정

국제관계에서 대립의 전형적인 형태가 전쟁이었고, 전쟁의 원인에 관해 전쟁 당사국 사

15)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0.30, 4면.

16) 최남선은 만주에 관해 ‘祖疆’이라 할 滿洲라고 표현했다(최남선, 같은 글, 1937.10.28, 4면).

17) 김경일·윤휘탁·이동진·임성모 지음, 『동아시아의 민족이산과 도시』, 역사비평사, 2004, 4쪽.

18) 최남선, 「松漠燕雲錄」, 『每日申報』, 1937.11.20, 4면.

19) 任城模, 『滿洲國協和會의 總力戰體制 構想 研究』, 연세대학교 사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 1997, 41~42쪽.

이에 정당성을 확보하는 것이 일반적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최남선은 한말부터 중국을 ‘老大國’으로 표현했고, “支那는 세계에서 比類가 없는 老大國인 동시에 4억이 넘는다는 그 국민은 그 역사와 문화를 자랑하기에 頑冥執拗하여 尋常한 방법으로는 그네를 근대 생활의 此岸으로 濟度해 낸다는 수가 없게 생긴 群像이다”라고 해서 이 시기에도 그의 중국관은 지속된다고 볼 수 있다.²⁰⁾ 나아가 그는 신해혁명 등의 격변기를 경험했음에도 불구하고, ‘노쇠한’ 중국 자체가 스스로 문제를 해결할 수 없다고 인식했다.

辛亥革命으로써 중원이 漢民族의 손으로 돌아간 지가 이제 26년입니다. 혁명이라 하고, 民國이라 하고, 訓政期라 하고, 新生活運動이라 하는 것이, 어느 것이나 거죽 허울은 좋습니 다마는, 이래 4반세기의 동안에 支那의 민중이 실질적으로 어떠한 복리를 받았으나 하면, 軍閥의 暴虐과 黨部の 專制 이외에 진실로 이렇다 할 아무 광명에 목욕하지 못한 것은 천 하의耳目이 다 함께 보아 오는 바입니다.²¹⁾

이러한 인식에 입각했을 때, 중국은 일본에 의해 ‘濟度’해야 할 대상이었다. 중일전쟁에서 일본제국의 역할을 표현하면서 “일이 이미 그릇되고 우리가 어쩔 수 없이 눈물의 채찍을 든 바에는 오늘부터 이후의 우리 일은 그네의 迷夢을 깨치고 그네의 誤信을 바로잡기에足한 철저적 응징을 수행함 이외에 다른 것이 없음이 진실로 무론입니다”라고 표현했다.²²⁾ 이 부분에서 ‘그네’는 중국인을 의미하고, ‘우리’는 일본인뿐만 아니라 조선인을 포함한 용어였다. 최남선은 중국에 관해 ‘채찍질’해야 한다고 표현했는데, 이는 문명된 존재로서 ‘야만’된 존재를 계몽시킬 때 사용하는 상투적 표현이었다. 최남선은 일본과 조선(인)의 역할은 중국인의 ‘미몽’과 ‘오신’을 바로잡는 ‘응징’에 있음을 밝히고 있어, 윗사람이 아랫사람 대하듯 하는 자세를 취했다.²³⁾

중일전쟁 이후 최남선의 시선에 주목된 것은 문명화 혹은 근대화된 중국의 ‘새로운’ 모습이었다. 하얼빈에서 중국인 거주 지역에 관한 최남선의 인상은 “支那人에 대한 새 인식으로부터 하얼빈 支那人의 시가의 구경은 일종의 감흥을 자아내게 되었다”라고 했으며 “支那人 市街라 하면 기성관념에 붙잡힌 이는 혹시 난잡하고 臭穢하고 또 幽昏한 어느 지구를 연상”하는 인식에서 벗어나길 독자들에게 요구했다.²⁴⁾ 만주국의 수도인 신징에 관해서는 “건축의 壯雄함이 신도시의 특색”이라고 주장했다.²⁵⁾ 물론 중국과 만주국의 도시를 이렇게 바꿔 문명화시킨 주체는 중국이 아니라 일본 제국주의였다. 최남선은 關東州에 관해 “산이 翠蒼에 싸이고 대소도로의 정연함이 시방까지의 荒亂한 광경과 같지 아니하여 누구에게든지 文明郷에 들어온 느낌을 준다”라고 해서 일본에 의해 ‘문명향’이 되었다고 보았다.²⁶⁾ 산

20) 최남선, 『전쟁과 교육』, 『삼천리』, 1939.7, 58쪽.

21) 최남선, 「북支那의 역사적 특수성」, 1937.10, 『전집』 10, 286쪽.

22) 최남선, 「북支那의 역사적 특수성」, 『매일신보』, 1937.10.3, 2면.

23) 최남선은 다른 글에서도 일본의 역할에 관해 “채찍은 정면으로 붙잡고 나선 일본의 교훈은 무론 이어나와 이번 사변(중일전쟁-인용자)의 교육적 의미는 日支 직접의 사이에만 그치는 것도 아니다. . . . 支那의 근대화에 귀중한 자극을 부여하고 있음을 본다”라고 표현했다(최남선, 『전쟁과 교육』, 『삼천리』, 1939.7, 59쪽).

24)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1937.12.11, 4면.

25)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2.21, 4면.

이 울창해지고, 도시가 발전했다는 평가는 조선을 강점한 후 일제가 조선에 대해 사용한 수사법이였다. 이러한 이해는 물질적인 측면뿐만 아니라 문화 사업에도 반영된다. 일제의 주도로 완성된 청조의 실록을 ‘학계에 일대 광명’을 준 것으로 평가했다.²⁷⁾ 즉 중일전쟁의 진행과정에서 최남선은 일본이 중국을 문명적으로 ‘계도’ 하고, 나아가 문화적으로 중국인을 지도하는 사업을 담당한다고 보았다.

한편 중국 동북지역은 한말 러일전쟁 때 러시아와 일본이 대결했던 공간이었고, 만주사변 이후 소비에트 러시아와의 대립이 예상되는 공간이었다. 최남선은 러시아를 1) 러일전쟁 당시 일본의 상대자로서의 제정 러시아 2) 황인종 대 백인종의 인종대립의 한쪽 주체인 러시아 3) 공산주의 국가인 소비에트 러시아 등을 나누어 살펴보았다. 중일전쟁 직후 『매일신보』에 게재한 글에서 최남선은 중일전쟁을 ‘비상시국’이라고 표현했고, 이 전쟁이 ‘정당한 日中關係’를 위한 것이며, 당대 동북아 국제 정세에 관해 다음과 같이 논의했다.

일본의 존재와 발흥은 □아시아의 기운이요 東方의 빛이요 그래서 유색인종이 기쁨을 외치고 일어나서 그들—일본을 맹주로 하여 일대 대동단결을 □드러서 白色人種에 대하여 우리 東洋의 역사와 생활과 영광을 확보할 좋은 기회임이 毋論입니다.²⁸⁾

당시 최남선은 동북아 정세를 일본을 중심으로 한 인종문제로 이해했다. 일본을 중심으로 한 유색인종을 동방과 동양이란 하나의 단위로 인식했고 러시아를 염두에 두고서 유색인종과 백색인종을 대비시켰다. 러시아는 ‘동방’ 혹은 ‘동아’라는 지역적 공간과 대비되어 ‘배제’해야 할 대상이었다. 최남선은 러시아에 대한 부정적인 이해를 역사 속에서 찾고, 일본과 러시아의 대립을 민족이 아닌 인종주의의 입장에서 설명하고자 했다. 여행기 직후에 쓴 「노서아의 동방침략」에서 “북방의 ‘소비에트’— 곧 노서아의 침략적 脅威가 어떻게 역사적으로 뿌리가 깊”다고 전제하고서 그들의 ‘동방침략’을 서술했다.²⁹⁾ 러시아를 영토확장을 위한 ‘침략적 나라’라고 보는 인식은 한말 시기의 대러시아 인식의 연장선상에 있는데, 이글에서는 러시아의 동방 침략이 “시베리아로써 만족하였나 하면 그런 것이 아니라 그 다음 만주 또 그 다음 조선반도로 그 징그러운 검정 손길을 뻗고 뻗고 그칠 줄을 모르던 중”이라고 표현함으로써 영토적 야심이 큰 나라라고 보았다.³⁰⁾ 즉 ‘동양인’의 他者로 설정된 러시아는 역사적으로 계속해서 ‘東方侵略’을 했던 부정적인 존재로 묘사되었다.

이러한 인식은 러일전쟁의 전적지인 대련을 방문했을 때 더욱 강조되었는데, 최남선은 러일전쟁을 ‘동서대항사’라고 규정하고, 이 전쟁의 결과에 관해 또한 大連에 있는 일본의 勝戰塔은 “황백 인종의 진퇴와 남북세력의 소장전선에 있어서 최초의 반발을 나타냄이자 영원한 자신을 부여한 동양인의 전승 기념탑이다”라고 소개했다.³¹⁾ 즉 일본이 러일전쟁 당시 러시아에 대항하여 동양을 지킨다는 관점을 견지했다. 그리고 러일전쟁의 결과로 인해

26)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8.3.29 4면.

27)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1938.2.1, 4면.

28) 최남선, 「시국인식의 근본점 來日の 신광명 약속」, 『매일신보』, 1937.8.15, 5면.

29) 최남선, 「노서아의 동방침략」, 『매일신보』, 1938.10.27, 4면.

30) 최남선, 「노서아의 동방침략」, 『매일신보』, 1938.10.27, 4면.

31) 최남선, 「松漠燕雲錄」, 『每日申報』, 1938.3.31, 4면.

“1904, 5 양년 간 일본과의 사이에서 동양 평화를 위하는 對仗이 일어나서, 일본의 무력에 露西亞가 驅逐되고 因하여 일본이 만주에 특수 권익을 가지게 되었다” 라고 보았다.³²⁾ 이렇듯 황백의 인종 사이의 대립에서 일본이 ‘동양인’ 을 대표해서 백인종을 물리친 사건을 러일 전쟁이라고 평가했다. 백인종의 ‘白禍’ 와 영토에 대한 욕심을 지녔다고 평가한 러시아에 대한 인상은 ‘赤禍’ 의 소비에트 러시아를 대상으로 더욱 부정적인 것으로 전환되었다.

꾸준하여 쉬지 않는 露西亞人の 침략성이 언제든지, 작게는 이웃의 평화를 어지럽게 하고, 크게는 세계의 질서를 깨뜨리는 버릇이 있음을 익히 아는 데서 나오는 것입니다. 옛날의 露西亞는 다만 영토적 野心에 인한 침략자로도 주의의 모든 국민에 대하여 큰 脅威이었습니 다. 그런데 최근의 소비에트 聯邦이라 하는 露西亞는 그 위에 또 한 겹 思想的 凶計를 덧 짐쳐 가진 侵略者로, 전 세계 공동의 敵이 되어 있습니다.³³⁾

최남선에게 러시아는 백인종의 ‘백화’ 와 공산주의 국가인 ‘적화’ 의 위협 요소를 지니고 있기에 일본뿐만 아니라 ‘전세계 공동의 敵’ 이라고 인식되었다. 그리고 중일전쟁이 발발한 직후 대러시아관계가 중국과 일본의 문제가 아니라 ‘북방민족’ 전체의 사안으로 확대되어 이해되었다.³⁴⁾ 그렇다면, 최남선에게 문화적으로 ‘북방민족’ 으로 규정된 일본과 조선 그리고 만주의 관계를 어떻게 이해했는가? 1930년대 중반 최남선은 중국과 구별되는 존재로서 북방민족을 설정했고, 문화적, 역사적으로 ‘동방문화’ 란 개념 속에서 아시아 북방민족의 공통성을 강조했다. 동북아 문화권의 강조는 중국과의 역사적 대비 속에서 이루어진다. 최남선은 양자의 대립을 논의하고, 중국이 지속된 것은 북방민족의 역할에서 비롯되었다고 보았다.

支那에는 국가란 관념도 없고, 국경이란 사실이 없다.…… 支那 민족의 철저한 포용력과 중원 문화의 무서운 동화력이, 얼른하면 우리 북방적 특징을 銷却하기 쉬움이다.…… 동양에 최고한 역사를 가진 支那 민족이 오히려 老衰殘廢하지 않고 줄곧 생존 繁衍을 계속하여 감은 실로 시대 시대마다 주위에 있는 신흥 민족의 청신한 혈액이 주입하여 대신 정화의 작용을 줌에 말미암는 것이다.³⁵⁾

‘북방민족’ 란 범주 속에는 다양한 민족 혹은 인종을 포함한 용어가 된다. 이 경우, 이 공간 속에서 일본의 역할이 어떠한 것인가? 최남선은 장춘을 방문했을 때 신경신사를 참배했다.³⁶⁾ 최남선의 여행기에서는 신사를 방문한 것에 관해 별다른 설명을 달고 있지 않다. 행적을 서술하되 그 의미를 부여하지 않은 것은 그 행위를 ‘일상성’ 으로 간주하는 것에서 비롯된다. 그렇다면 1930년대 중후반 최남선이 신사참배를 할 수 있는 논리는 어디에 근거했는가를 1930년대 중반 일본 고문화와 신사에 관한 최남선의 입장 속에서 살펴볼 수 있다. 즉 일본의 신사를 방문한 것은 현실 권력으로 일본을 인정한 것뿐만 아니라 문화상으로 동

32) 최남선, 「滿洲略史」, 『半島史話와 樂土滿洲』, 1943, 143쪽.

33)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론」, 『매일신보』, 1938.11. 2.

34) 러시아는 “동방 평화에 대한 절대의 凶賊인 赤蘇의 魔手” 라고 표현되었다(최남선, 「시국인식의 근본점 來日의 신평명 약속」, 『매일신보』, 1937.8.15, 6면).

35)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1938.1.24, 4면.

36)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1937.12.22, 4면.

북아 지역에서 일본을 역사적 연원을 지닌 ‘맹주’로 인식했음에 기반한다.

일본제국이 먼저 조선을 併呑하고, 다음 滿洲가 독립되고 . . . 만주국은 捲土重來의 의미로, 조선인은 고구려 이래로 발길을 중원에 들여놓을 뻔 못 들여 놓던 이상 실현의 기회로, 또 豊臣秀吉의 ‘一超直入大明國’ 하려던 壯圖가 半島에서 挫折한 遺恨을 가진 일본은 一來는 민족전통의 경륜을 성취하고, 一來는 亞細亞의 맹주적 지위를 확보하는 필요로 중원을 무대로 하는 오늘날 支那事變이 생겼느니라라고 할 수 있습니다. 이번의 북방세력은 이때까지 중원에서의 활동 역사를 가지지 않았으며 언제나 한 번은 중원으로 들어오고야 말리라 하던 亞細亞 最東方의 마지막 남아 있던 민족들이 대동단결을 하여 무대에 올라선 점에서 일층의 注意를 끄니다. 그리고 이것은 홀로 민족 투쟁이나 중원 쟁탈과 같은 야심적의 일이 아니라, 전 동양의 문화와 평화와 진정한 행복을 위하는 대의명분의 十字軍인 점으로 절대한 意義를 가집니다.³⁷⁾

최남선은 1930년대 들어와서 동북아시아지역에서 일본 문명과 문화의 우월성을 인정했다. 1920년대 그가 「불함문화론」에서 조선의 역할을 강조했던 것과 달리 1930년대 중후반 ‘동방민족’ 안에서의 지도적 역할이 일본에 있다고 보았다. 그리고 당대 소비에트 러시아의 ‘적화’ 의도에서 동북아시아를 방어한다고 인식할 때, 최남선에게 일본은 동방의 맹주의 지위를 지녔다. 그는 만주국에 관해 “王道樂土의 실험장으로 출현한 것”³⁸⁾으로 평가했으며 일제의 중국 동북지역에 대한 침략을 영토적 욕심이 아닌 ‘道義主義, 解放主義’로 보았다. 이러한 인식은 일제의 침략전쟁을 만주뿐만 아니라 중국에 대한 ‘문명적 역할’을 강조함에 있었다. 이러한 인식을 바탕으로 했을 때, 최남선은 문화의 보편성을 전제한 민족 상호간의 조화를 강조함으로써, ‘대동아공영권’이라는 일본 제국의 논리에 편입될 수밖에 없었다. 이는 서구의 근대를 대신한 ‘동양적’ 가치관을 통해 ‘근대의 超克’을 주장했던 일제의 논리와 연결된다고 볼 수 있다.³⁹⁾

IV. 만주와 중국 동북지역 거주 조선인의 활동에 관한 인식

최남선은 조선인의 개척적 능력으로 인해 ‘만주는 우리 것’⁴⁰⁾ 혹은 만주는 ‘新朝鮮’이며, 그곳에서의 조선인의 활동은 “조선인의 만주 발전은 일면으로 復古인 동시에 일면으로 신생명 개척”이라고 강변하였다.⁴¹⁾ 중일전쟁 이후 중국 동북지역의 조선인의 활동과 관련해서, 해명해야 할 문제는 1) 조선인의 만주에서의 중요한 역할을 담당한다고 주장했을 때 일

37) 최남선, 「北支那의 역사적 특수성」, 1937.10, 『전집』10, 286-287쪽.

38) 최남선, 「松漠燕雲錄」, 『每日申報』, 1938.1.14, 4면.

39) ‘근대의 초극’ 논의는 영미식 자본주의 사회체제와 이념과 소련이 중심이 된 사회주의 경제조직과 혁명이념을 모두 ‘초극’하는 새로운 체제이자 이념 즉 ‘오족협화’, ‘협동주의 철학’ 등을 찾고자 한 작업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일제말의 ‘근대의 초극’ 논의에 관해서는 히로마쓰 와타루(廣松渉), 김향 옮김, 『근대초극론』, 민음사, 1989, 참조.

40) 최남선, 「松漠燕雲錄」, 『每日申報』, 1938.3.7, 3면.

41) 최남선, 「松漠燕雲錄」, 『每日申報』, 1938.3.8, 4면.

본과의 관련성은 어떻게 설정할 것인지 2) 조선인을 만주국 내의 민족간의 서열화 속에서 일본인과 조선인을 선두에 위치할 때, 다른 민족 구성원과의 관계가 어떻게 염두에 둘 것인지 3) 조선인 역할을 강조할 때 이것이 중국 등 다른 민족에게 어떻게 인식되는지 여부가 될 수 있다.

최남선은 “만주와 일본과의 사이에 근본 문화상 일치가 있다 하면, 그 중간에 반도가 빠지지 못할 것은 물론 자명한 일이다”⁴²⁾고 하여 만주와 일본 사이에 있는 조선과 조선인이 중요한 역할을 담당해야 한다고 보았다. 최남선은 만주국 설립과정은 ‘신성한 운동’이며 이 운동의 “심핵분자는 일본인과 조선인”⁴³⁾이라고 보았다. 나아가 “일본인과 조선인의 완전한 결합만이 이것을 감당”⁴⁴⁾할 수 있다고 강변했다. 즉 재만 조선인과 조선인 사이의 ‘동반자’적 역할을 주장했다. 이와 관련해서 1937년 10월 11일 奉天에서 있었던 조선인과 일본인을 대상으로 한 강연회가 주목된다.

역사적으로 북방민족이 남방민족이 ‘진출’ 해왔는데, 북방민족 중 아직까지도 중원의 무대를 밟아 보지 못하고 남아 있으면서 또한 그 남방 민족의 강렬한 동화력에서 避하여 온 민족은 해양에 있던 大和民族과 반도에 있는 朝鮮民族이올시다.……현재 이 최후로 남아있던 일본민족이 대륙을 향하여 진출하는 그 형식 내용은 前日の 北方諸民族의 그것과 달리 침략 정벌이 주제가 아니라 아세아민족의 전체적 번영이 主題가 되어 있기 때문에 이 일본민족을 선두로 한 동방민족의 중원진출이야말로 동양사상에 유례가 없는 것이라고 말할 수 있습니다.……支那民族을 정화할 피는 조선족과 아울러 일본족이 아니면 안 된다고 사고합니다.⁴⁵⁾

이 강연의 특징은 최남선이 중국동북지역에서 과거 역사인식을 근거로 일본과 조선민족의 역할을 강조한 점에 있다. 나아가 조선과 일본의 역할이 중국을 ‘정화’ 하거나 ‘진보’ 시킨다고 의미를 부여했다.⁴⁶⁾ 이러한 인식은 중일전쟁을 지지하는 다른 글에서도 “동양 안정의 책임자, 동양 평화의 수호자인 일본제국의 대방침은 단정코 이것이 있을 뿐임을 확신하는 우리는 무엇으로 보담도 北支事變을 도덕적으로 인식하여 충심으로부터 국민으로의 당연한 책무를 極□히 다하기를 다 한 가지 기약할 것입니다” 라고 해서,⁴⁷⁾ ‘국민’의 의무를 다해야 한다고 주장했다. 즉 「송막연운록」의 한 부분에서는 ‘우리’는 조선인과 일본인을 함께 의미했으며, 조선인의 발전을 일본의 발전과 연동시켰다. 하지만 역사적, 문화적 실체로서의 조선인과 일본국민인 조선인이란 이중적 존재감이 최남선의 시선에 공존했다.

「송막연운록」에는 ‘조선인’, ‘백의민족’ 등 조선 본위의 표현이 등장한다. 최남선은 만주지역 조선인의 역할에 관해 “만주는 이제 王道의 지표 하에서 역사의 건설이 재촉되고 있다. 이에 대한 일본제국의 지도력이 아무러한 저해도 느끼지 아니할 것은 진실로 무론이다. 그리고 지리, 역사, 종족관계, 생활조건 무엇으로나 이 공작상의 가장 중요한 분자는 조선인

42) 최남선, 「松漠燕雲錄」, 『毎日申報』, 1937.11.8 3면.

43) 최남선, 「松漠燕雲錄」, 『毎日申報』, 1938.1.24, 3면.

44) 최남선, 「松漠燕雲錄」, 『毎日申報』, 1938.1.24 3면.

45) 최남선, 「동방민족의 중원 진출과 역사상으로 본 아세아제민족의 동향」, 『재만조선인통신』 38, 1937. 10, 6~7쪽

46) 최남선, 「北支の歴史的 特殊性」 상·하, 『재만조선인통신』 39, 40, 1937.11.

47) 최남선, 「시국인식의 근본점 來日の 新광명 약속」, 『매일신보』, 1937.8.15, 6면.

이 곧 그 일을 우리는 확신한다” 라고 표현했다.⁴⁸⁾ 즉 그는 중국 동북지역의 ‘발전’에 일본인 뿐만 아니라 조선인이 큰 역할을 했음을 강조했다. 이러한 인식은 조선인이 많이 거주한 용정지역에서 특히 그러했다.

龍井은 조선인의 잠재적 발전력을 구현한 자연 생성의 국외 도시인 동시에···의도적으로 특수한 산업기능을 開顯시킨 飛躍地로 영구한 명예를 가진 곳이다. 대개 조선인의 만주 발전은 水田이라는 독특한 생산수단으로써 모든 곤란을 극복한 결과인데 만주 토양의 수전 적가치 전환은 실로 이 용정에서 발단하였기 때문이다.···용정은 실로 만주에 있는 이 산업혁명의 발화점이다.⁴⁹⁾

최남선에게 중국 동북지역에서 조선인은 ‘발전’의 주체였고, 이들의 활동은 ‘산업혁명’으로 평가되었다. 水田의 강조는 방문지마다 강조되었는데, 최남선은 “황폐 不顧하던 땅을 손에 넣어서 적은 듯 良田 沃土를 化成한 우리 이주민의 용감과 근면을 생각하면 느껴운 눈물이 눈시울을 따듯하게 한다. 조선인의 개척적 능력도 놀랍지 아니한가. 이만만하면 滿洲가 우리의 것이겠다는 신념이 뜨끔하게 腦筋을 찌른다” 라고 해서,⁵⁰⁾ 조선인의 활동에 자신이 감정을 이입했고, 아울러 ‘개척정신’을 강조했다. 일반적으로 개척정신 혹은 모험정신은 서구 제국주의를 상징하는 용어였다. 최남선은 한말시기 『로빈슨 크루소』, 『걸리버여행기』 등을 번역해서 서구의 ‘개척’ 혹은 모험정신을 배우라고 강조했다. 그는 한말 국민국가 수립과 연결시킨 이러한 희망을 1930년대 들어와서 만주지역 조선인에게 재적용했다. 최남선이 만주지역에서 조선인의 개척정신을 강조한 것은 일본이 조선에 대해 강조했던 문명담론과 닮았다. 조선인의 활동은 만주인과 중국인의 활동과 대비됨으로써 더욱 부각되었다.

만주족은 아직도 不農不商하여 양반의 심리를 품고 지내고 淸國이 覆滅함과 함께 그네의 양반적 특권은 이미 依據를 잃어버렸을지라도 갖가지로 궁박한 사정이 유일한 生資인 토지 그것까지를 매각하여 더 僻地 더 深處로 退入하는 것이 그네 금일의 운명이다. 마치 수십 년 전에 우리가 經歷한 어느 계단을 그네가 시방 직면하였는데, 우리의 전일 보다 더 딱한 雄勢이다.⁵¹⁾

중인출신인 최남선에게 ‘양반’은 부정적인 존재였다. 부정적인 이미지의 활용은 조선민족을 ‘각성’ 시키고자 할 때 사용하는 수사법이였다. 최남선은 이를 만주에 적용했고, 수십 년 전 조선상황과 대비시켰다. 개평점을 방문해서 최남선은 “이 일대의 수전만은 조선인의 모범과 만철농사시험소의 지도에 의하여 支那人네의 自作하는 바로서 걸인이라도 버선을 벗지 아니하는 만주어늘, 이 근처에서만은 부녀까지도 눈에 들어서서 이앙도 하고 除草도 함이 도리어 一 奇觀이라고 일컫는다” 라고 강조했다.⁵²⁾ 즉 당대 만주는 조선을 다시 살펴보

48) 최남선, 「만주가 우리에게 있다」, 『재만조선인통신』 39, 1937.11, 1쪽.

49)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0.31, 4면.

50)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8.3.7, 4면.

51)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1.8, 4면.

52)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8.3.26, 4면.

는 거울과 같은 존재였으며, 중국 동북지역에서 조선인은 문명의 모델 역할을 담당했다. 다시 말해 1930년대 중반 최남선은 일본과 조선 사이에 문화적 동원관계를 주장했고, 만주와 중국에 관해 조선인의 문명을 강조한 것이다.

만주는 당대는 물론 가까운 과거에도 조선인에게 민족운동의 근거지였다. 이렇게 시기적으로 가깝거나 당대에도 진행되고 있는 민족운동이란 민감한 주제에 관해 최남선은 어떻게 언급했을까? 최남선은 1937년 9월 28일 남양역을 출발해서 圖佳線을 갈아타고 가는 도중 三道溝 鳳儀洞를 지나면서 “당년에 홍범도 일파의 점거 활동하는 데” 라고 보았고, 같은 해 10월 2일 濱綏線(빈수선)을 출발해서 海林이란 站名에서 “김좌진의 피비린내 나는 기억에 눈살이 찌푸러지더니” 라고 표현했다.⁵³⁾ 이렇듯 최남선은 1920년대 민족운동의 현장을 차창 밖의 풍경처럼 간단히 언급하는데 그쳤다. 앞서 언급했듯이 최남선은 「송막연운록」이 “시절의 풍운에 충동된 것은 아니지만” 이라고 해서 ‘탈정치적’ 입을 밝혔다. 하지만 선만척식주 식회사의 주선으로 일본의 점령지와 만주국이란 공간 속에서 조선인의 거주지역을 방문함으로써 분명히 ‘정치적’ 입장을 나타냈다. 그는 길림지역에서는 ‘我政治運動者 소굴시대의 情況’ 을 살핀다고 표현했다.

여기는 某名士의 寓居, 여기는 某團體의 舊基, 여기는 某事業의 發生處라고 지적함이 일일이 감개 깊은 것뿐이다. 그 중의 피비린내 나는 대문은 눈살을 찌푸러지게 하기도 하지만, 돌이켜서 이러한 풍상이 길림을 가져다가 조선인의 만주 발전상 一楔子이게 하였다고 보면, 그것도 결코 무의미하지 아니함을 깨닫겠다.⁵⁴⁾

최남선은 이전시기의 민족운동을 ‘정치운동’ 이라고 표현해서, 과거의 사실로 단정했다. 이러한 표현은 자신의 활동이 더 이상 ‘정치’ 적이지 않음을 표현한 것일 수도 있고, 이와 아울러 1930년대 중반의 시국은 이제 조선인의 ‘정치’ 활동이 요구되지 않은 과거의 현상으로 이해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즉 이러한 표현은 ‘탈정치화’ 가 아니라, 민족운동을 과거의 사건으로 침묵 내지는 폐기하는 서술이라고 볼 수 있다. 하지만 길림지역의 민족운동의 현장을 언급한 부분에서, 그가 만약 일제에 적극적으로 협력했다면, 이제 조선인들은 일제의 지배를 인정하고 ‘무모한’ 과거의 정치운동에서 벗어나라고 언급했을 것이다. 하지만 최남선은 민족운동의 역사적 경험을 ‘조선인의 만주 발전’ 에 있어서 하나의 ‘문설주(楔子)’ 였다고 해서, 당대 조선인의 ‘발전’ 에 의미있는 일로 포함시키고자 했다.

비록 당대 조선인의 활동을 ‘발전’ 과 ‘문명’ 의 담론으로 강조하더라도 일본의 주도권의 그림자가 깊게 놓여있었다. 최남선은 만주국에 관해 ‘역사적 諸民族이 현실적 구성분자’ 가 된 ‘민족협화’ 가 이루어진 공간으로 보았다. 그러나 각 민족 사이의 동등한 결합을 의미하는 ‘오족협화’ 는 실제로 일본을 정점으로 각 민족별로 서열이 나뉘어 있는 민족적 차별이 존재했다. 최남선도 ‘滿鮮一如’ 의 슬로건아래 조선인과 만주인의 거주 지역을 구별하여 그 ‘구별 의식’ 이 있음을 시인했다.

53)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1.4, 4면 ;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1.18, 4면.

54)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2.28, 4면

만선일여의 大旆가 펄떡거리는 오늘 날이지마는, 유래가 유래이라, 龍井은 어디까지고 조선인 중심의 읍락이요, 局子街 곧 延吉은 어디까지고 만주인 중심의 시가라는 특색이 아직도 전일과 다르지 아니하다. 다만 간도의 조선인 本位性이 갈수록 농도를 더함은 거의 속명적 약속이요, 또 금후의 사정은 전에 비하여 幾倍의 順便을 가지게 되었은 즉 (후략)⁵⁵⁾

당시 이지역에서 東北抗日聯軍의 활동이 비록 약화되었지만, 지속적인 활동이 있던 시절이었다. 관동군은 1936년 4월부터 1939년 3월까지 「滿洲國治安肅清計劃要綱」을 책정하고 安東省 및 賓江省의 동북부 지역과 三江省에서 활동을 하던 항일유격대에게 공격을 가하였다.⁵⁶⁾ 최남선은 1930년대 후반 이 지역에 살고 있던 조선인 농민들에게 일제의 침략과 지배를 지지하거나 협력하기를 요청한 것이다. 따라서 제국주의 일본의 주도아래 이루어진 조선인의 역할과 활동은 중국의 입장에서 보면 침략과 수탈의 첩병으로 보일 수 있었다.

V. 맺음말

최남선은 1930년대 들어와서 동북아시아지역에서 일본 문명과 문화의 우월성을 인정했다. 그는 만주국에 관해 “王道樂土의 실험장으로 출현한 것”으로 평가했으며, “역사적 제민족이 현실적 구성분자”가 된 ‘민족협화’가 이루어진 공간으로 보았다. 또한 일제의 중국 동북지역에 대한 침략을 영토적 욕심이 아닌 ‘道義主義, 解放主義’로 보았다. 이러한 인식은 일제의 침략전쟁을 만주뿐만 아니라 중국에 대한 ‘문명적 역할’을 부각함에 있었다. 아울러 백인종인 러시아의 공산주의의 방파제로서 일본의 역할과 아시아 인종(민족) 상호간의 조화를 강조함으로써, ‘대동아공영권’이라는 일본 제국의 논리에 편입될 수밖에 없었다. 그리고 일제의 침략전쟁을 동북아시아의 번영과 발전을 위한 것으로 강조한 것은, 1940년대 태평양전쟁을 ‘聖戰’으로 강변하며, 그가 1943년 경 조선청년의 전쟁 참여를 독려하는 ‘학병지원’ 유세에 적극적으로 나서는 활동과 연결되었다.

하지만 1930년대 중반 최남선에게 중국 동북지역은 일본의 ‘발전’ 뿐만 아니라 조선인의 발전 가능성을 확인하는 공간이었다. 일제의 침략전쟁을 지지하면서 최남선의 기행문에는 ‘조선(인) 단위’의 고민이 공존했다고 볼 수 있다. 최남선에게 간도는 현실에서 ‘이국’이지만, ‘실제의 간도’를 강조했듯이, 조선인의 역할에 관한 지대한 기대감을 피력했다. 그는 조선에서 국경을 넘어 넓은 만주를 접하면서, 화려한 과거에서 반도지역으로 조선인의 활동 공간이 축소했다고 보았다. 하지만 조선이 비록 ‘위축’되었지만, 만주라는 공간에서 다시금 화려한 과거를 재현해야 한다고 주장했다. 아울러 그는 ‘만선일여’란 슬로건 속에서도 조선인을 구별했고, 조선인 본위성을 강조했다. 즉 만주라는 공간에서 민족 각각의 시선에서 차이가 존재하듯이, 1930년대 중반 최남선 내부에서도 일본제국의 일원인 조선의 입장과 독자적인 조선인 역할을 강조하는 시각 등이 복합적인 정서가 그의 여행기에 반영되었다.

55) 최남선, 「송막연운록」, 『매일신보』, 1937.11.1, 3면.

56) 尹輝鐸, 『日帝의 滿洲國研究』, 一潮閣, 1996, 31쪽.

[Abstract]

Perspective among the colonized Joseon people towards China and Manchuria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 Focusing on the book of travel by Choi Nam-seon

RYU Sihyun

1. Preface

An international travel book is a way to confirm one's identity through a foreign country. As discussed in "Orientalism" by Edward W. Said, the books of travels by Westerners created a standardized image of the "Orient," and rooted 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st and East, thereby rationalizing Western imperial rule. In contrast, the books of travels by Oriental people who traveled to the West - including those from a colonized nation to an imperialist - a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nationalist view of building a nation-state by effectively using the "modern experience" as a model example. Then what meaning do travels between colonie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ame imperial country have? Though there were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detailed colony policies, most imperialists gave a different status to each colony. This kind of policy resulted in a hierarchy among the coloni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look at the travels of Choi Nam-seon, an intellectual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to Manchuria. This is because these travels might embody more complicated perspectives and discussions in comparison to those written by Japanese who visited Manchuria. In other words, Manchuria can be understood as a different space according to one's interests and sense of belonging to a nation.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areas that were occupied by Japan steadily grew. Naturally, the number of colonized people (ethnic groups, race)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andem with the expansion of Japanese territory to include Manchuria and China, the status of the "Joseon people" within the Japanese Empire changed. The Korean peninsula became an intermediary existence, connecting Northeast China with Japan.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Manchuria and China became a place where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lived together in harmony or in conflict. As such, the Northeastern area of China, including Manchuria, and Guandong, a Japanese-leased territory, were more than simply foreign nations to the Joseon people.

Choi Nam-seon was a publisher and historian. He wrote books of travel that emphasized the nationalist perspective, such as the *Geumgangyechan* (travels to Mt. Geumgang; 1926) and *Baekdusangeumchamgi* (travels to Mt. Baekdu; 1927). Between September and October 1937, immediately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he traveled to Northeast China and Guandong, and wrote a book of travel called *Songmagyeonullo*. While his previous books of travel were on Korea, this book of travel discussed a "foreign country" and the Joseon people residing there. The perception Joseon people had towards Manchuria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political stance Japan took in its invasion policies on Manchuria after the 1930s. As such, looking at the book of travel by Choi Nam that was written in 1937 will enable us to identify changes in the logic of Choi, who cooperated with the Japanese, and the complicated stance of a Joseon intellectual towards Manchuria.

2.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rossing of the national border by a Joseon person under Japanese rule

In case of books of travel, we need to consider when they were written and where they were released. The Songmagyeonullokk is a book of travel to Northeast China right after the onse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July 1937. This is why this book deeply embodies elements related to war and the expanded space. A book of travel is released for interaction with the reader. The Songmagyeonullokk was released on the Maeil Sinbo Newspaper in Korean, targeting the Joseon readers.

When asked why he traveled to Northeast China, Choi Nam-seon said, "The urge didn't suddenly come to me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times. I had always wanted to visit Manchuria and China, and was thinking that I shouldn't delay my visit any longer, when I was approached by the Seonman Colonization Company to take a look at a so-called safe agricultural village in Manchuria." Choi made known that he wanted to visit Manchuria and China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his journey there was irrelevant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main intent of his journey was to take a look at a "safe agricultural village" of the Joseon people, with the help of a government-run company named the Seonman Colonization Compan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oi's books of travel written in the 1910s to 1920s and Songmagyeonullokk is that Choi crossed the national border for the latter. The way from Joseon to Manchuria was much more convenient than the way from Joseon to Japan. Traveling to Japan required approval from the police with jurisdiction over the respective residential area and the thorough inspection of police between Busan and Shimonoseki. In contrast, to cross the border between Joseon and China, all Choi had to go through was an inspection by the customs,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unfriendly stares. In addition, the way to the Kanto, where many Joseon people were residing, featured many sceneries unique to Joseon.

Traveling across the national border to a country where the Joseon people lived triggered Choi to think about the nation. When he was passing through the border, Choi reflected upon the Baekdusangeumchamgi. He made a contrast between Mt. Baekdu and Manchuria by referring to Mt. Baekdu as a "spiritual mountain," while referring to Manchuria as the "ancestor's land." By using the word "ancestor," Choi connected Manchuria to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Joseon people. To Choi, Manchuria was a "foreign nation," but also the "ancestor's land." This thought was prevalent among the Joseon people and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his book of travel.

Descriptions of his journey from Joseon to Manchuria, in general, talk about traveling from the small land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the spacious continent. Historian Choi reassessed the Goryeo and Joseon eras, taking the extensive space of Manchuria into consideration. He reflected upon the past, when the nation saw its territory decrease from the extensive lands covering Manchuria to the peninsula, and described his wishes to relive the glorious past in Manchuria.

The space that the Songmagyeonullokk focused on was where traces of Korea's ancient history remained and a place that clearly showed the conditions that the Joseon people there had to endure. Though the Joseon people had a "sense of ownership" considering the nation's history, reality showed that there were Joseon people who had in fact become a part of the citizenry of Manchuria. The notion that Manchuria was the "land of the ancestors" was outdated. In the 1930s, the Japanese Empire was leading the "pioneering"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roles of the Joseon people were regulated under their plan.

3. Defining the status of the colonized Joseon people in Northeast Asian relations

The standard form of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s war. The general practice was for countries in war to secure justifiability for the war. Choi started referring to China as the "old great nation" at the end of the Joseon Dynasty, and this view towards China continued into the 1930s. Based on this mindset, China was a target of salvation by Japa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hoi said that Japan should "urge on" for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This was the kind of expression that was used when a civilized nation was enlightening an "uncivilized" nation. Choi said that the roles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Joseon people were "chastisement" - to rectify the "delusions" and "misbeliefs" of the Chinese, taking the stance of a person at a superior level than the Chinese.

What grabbed the attention of Choi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the "new" image of China - a civilized or modernized China. While describing Shenyang, the Manchurian capital, Choi said, "What makes the new city unique is the grandness of architecture." The Japanese Empire, rather than China, was behi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cities in China and Manchuria. Choi regarded Guandong, a Japanese-leased territory, as becoming civiliz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 with its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roads in the city. After Japan's occupation of Joseon, the Japanese used the same words to describe Joseon: The trees in the mountains of Joseon have become luxuriant and the city has develop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Choi thought that Japan was working on "enlightening" China and culturally leading the Chinese.

Northeast China was where the Russians and Japanese fought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at the end of the Joseon Dynasty, and was expected to be the site where conflicts would take pla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after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apan, Russia was a target of "exclusion" as a space that wa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East" or "East Asia." Choi categorized the Japanese and all other colored races into the Orient or the East, and placed Russia as a contrasting party - the white race. Choi described Russia as a nation that has historically been selfish about territory, stating this as the main reason why Russia invaded the Orient; and the Soviet Union as a negative body that spreads communism. In other words, Choi believed that Japan protected the Orient by fighting against Russ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that it protected the Northeast Asian region from the Soviet Union's intent of "communization." In this sense, Japan was a leader of the Orient to Choi.

4.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activities of the Joseon people residing in Northeast China and Manchuria

Choi said, "It is clear that the cultures of Manchuria and Japan are fundamentally similar, and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peninsula, located in the middle, is also similar." He believed that Joseon and the Joseon people should perform a pivotal role between Manchuria and Jap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for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Joseon people in Manchuria and the Japanese. He also added that the role of

Joseon and Japan was to "purify" or "advance" China. In other words, in Songmagyeonullok, the word "we" referred to both the Joseon people and the Japane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oseon people was connec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However, Choi also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a double meaning to being a part of the Joseon people - Joseon people who are a part of the Japanese citizenry and Joseon people who have their uniq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He emphasized that the Joseon peopl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Japanese.

To Choi, the Joseon people in Northeast China was behind "development" and described their activities related to spreading paddy fields in the area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e showed his personal emotions when describ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Joseon people and emphasized the "pioneering spirit." In general, the pioneering spirit or adventurous spirit was a term symbolizing Western imperialism. At the end of the Joseon Dynasty, Choi translated Robinson Crusoe and the Gulliver's Travels, and stressed the need to learn the Western "pioneering" or adventurous spirit. This hope, which was connec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state at the end of the Joseon Dynasty, was reapplied to the Joseon people in Manchuria in the 1930s. The activities of the Joseon people were more highlighted in their contrast with the activities of the Manchurian and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ose times, Manchuria mirrored Joseon and was a means to reflect upon the past of Joseon. Choi compared Manchuria to Joseon dozens of years ago. In other words, Joseon was a model of civiliz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mid-1930s, Choi claimed that there was a close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oseon and Japan, and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civilization of Manchuria and China. The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aspects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Joseon people was under influence by Japan. Choi requested that the Joseon farmers in Manchuria support or cooperate with the invasion and rule of Japan. As such, the rol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Joseon people that were carried ou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Japanese Empire could have been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as an act preceding invas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descriptions in a book of travel involve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traveler's "prior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area he/she visits. Choi, a researcher who ha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all areas related to Joseon culture in the 1910s to 1920s, actively reflected his knowledge on the history of Joseon as well as China and the northern race in the Songmagyeonullok. Choi emphas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ricultural culture of Buyeo and the "harmony among people of difference races," including the Malgal Tribe, of Balhae. This perspective was connected to the logic that emphasized the "peaceful elements," rather than the aggressive elements, of the roles played by Japa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5. In Closing

Choi Nam-seon acknowledged the superiority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n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30s. Choi regarded Manchuria as a testbed for creating a peaceful land based on a righteous government, and as a place where harmony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was achieved. In addition, Choi regarded Japan's invasion into Northeast China as being based on moral principles and the intent to liberate the East from the West, rather than selfishness for land. This thought was embedded in his emphasis on the roles

Japan's aggressive wars played in the civilization of Manchuria and China. Choi also emphasized Japan's role as a protective force against the communism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hite-raced Russians. He stressed the need to achieve harmony among the different races of people in Asia, supporting the logic of the Japanese Empire -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To Choi, Manchuria was an area to reconfirm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and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Joseon people. From Choi's perspective, Kanto was a "foreign land" in reality, but expressed great anticipations on the roles of the Joseon people in the area. Even while stressing that "Manchuria and Joseon are one," he separated the Joseon people from the Manchurian people, and highlighte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oseon people. Choi referred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Northeast China, emphasiz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orean race and Northeast China. Choi argued, "Manchuria is ours" or Manchuria is the "New Joseon," which would become reality based on the pioneering spirit and ability of the Joseon people. He referred to the activities of the Joseon people in Manchuria as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 by the Joseon people can be regarded as activities that continue the nation's legacy as well as that open a new chapter of pioneering." In other words, Choi focused on the "Joseon people,"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oseon people, even while emphasizing harmony among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The Songmagyeonullokk by Choi in the mid-1930s was a combination of his perspectives towards Joseon as a par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towards the independent Joseon people.

競爭和合作 ：冷戰時期香港電影界的左 派和右派

■ 李 培 德 (香港大學校) ■

競爭和合作：冷戰時期香港電影界的左派和右派

李 培 德 (香港大學校)

〈目 次〉

- I. 引 言
- II. 左派陣營：長城、鳳凰、新聯
- III. 右派陣營：港九電影戲劇自由總會
- IV. 游走和夾縫於左右派陣營的香港電影人
- V. 結語

I. 引 言

電影行業和其他行業一樣，存有各種各樣的競爭。香港的電影業與中國內地關係密切，從1930年代起，香港大量吸收上海電影界的人才，而起源於上海的左傾電影思潮，亦隨大批影人南移而帶到香港。¹⁾ 過去出現於電影界的競爭，包括通俗與藝術電影之爭、本地資本與外國資本之爭、國粵語片之爭，甚至電影公司之間的競爭，明星之間的鬥爭，可謂無時無之。不過，對於香港電影界來說，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左右派陣營之爭。

香港屬英國殖民地，從十九世紀起，華人已懂得怎樣去與英國人合作，但又可照顧到中國內地政權存在之現實。「華人政治」被譽為「中間人政治」(middle-men politics),²⁾ 香港華人周旋於中英兩大政權，絕不是新鮮之事。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原有的國民黨政權遷移台灣，香港的華人政治生態出現前所未有的巨變。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的數年間，香港華人又需面對國共兩黨之間的抉擇，從1952年香港左派影人被逐出境算起，直到1989年台灣廢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因左右兩派鬥爭而造成的擾攘，足足維持了三十多年。有趣的是，香港電影起飛，能蜚聲國際華人社會，無論於人才、技術、資本各方面，其基礎的奠定，都取決於這段時期。無疑，香港提供了國共兩黨競爭的最重要場所。到底，處於冷戰時期，香港電影業是如何可生存下來的？

甚麼是左派、右派？香港電影界對此標籤有何看法？國共兩黨在香港競爭的對象不僅是本地華人，還應包括廣大的海外華僑社會。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香港華人夾縫於統戰與反統戰之間又怎樣去取得平衡？香港左派、右派本身採取了甚麼政策去互相鬥爭？以上都是本文希望能夠解決的問題。

1) 有關此一觀點已有不少論者提及，參閱鍾雷編著《五十年來的中國電影》(台北：正中書局，1965年)，頁73-75。

2) 見Hui Po-keung, "Comprador politics and middleman capitalism," in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30-45.

II. 左派陣營：長城、鳳凰、新聯

「鞏固南國，發展長城，滲透南洋，爭取大觀，凍結永華」一度是戰後香港電影界左派陣營的策略。³⁾ 但是，不到幾年，香港政府就採取驅逐行動了。於1949至1952年間，被港府遞解出境的左派人士，計有：港九紡織工會副主席樓頌平、香島中學校長盧動、電車職工會主席劉法、副主席歐陽少峰及職員李文海、港九工會副主席麥耀全、九龍船塢勞工聯合主席麥河志、東華三院秘書陶開裕、海軍船塢產業華員職工會主席甄雄、港九紡織總工會城支會主任冼佩玲及書記姚堅、電影工作者司馬文森、劉瓊、舒適、齊聞韶、楊華、馬國亮、沈寂、狄梵、白沉、蔣偉，前後共十名電影工作者。⁴⁾ 顯而易見，被驅逐的人士中，以電影界最多。香港政府對左派的策略原則是打壓而非滅絕，利用而非縱容。曾經創辦新聯影業公司的廖一原，對於港府的左派政策有精闢的批評，他說：「英國人利用左派勢力打擊右派，後來國內形勢變化，真正威脅來自左派」，那時便要對付左派了。⁵⁾ 在香港的左派電影中，凡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歌、國徽和國家領導人出現以及展示解放軍形象的鏡頭都無法通過香港政府的電檢審查，不是被刪剪就是被禁映。

在香港電影界，左派的勢力主要來自幾家電影公司如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鳳凰影業公司、新聯影業公司，和由專門代理蘇聯、內地影片的南方影業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院線組合而成。有關長城、鳳凰、新聯的歷史，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這裏不作重複。值得注意的是，左派電影界是如何接受其他兄弟組織的幫助？例如，澳門有力商人何賢便曾兩次幫左派陣營收購戲院。第一次，成立豐年娛樂有限公司，收購九龍普慶戲院。第二次，成立豐順娛樂有限公司，收購港島高陞戲院。每一次都由他自任公司的董事長。⁶⁾ 除了何賢本人外，董事會成員還包括其他本地華商，例如中僑國貨公司董事長孫城增、中華廠商聯合會會董倪少強、利希慎公司屬下民樂公司董事袁耀鴻。⁷⁾ 此外，當南方影業公司急於尋找合適的辦公室時，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鄭鐵如出手相助，以每平方尺二元四角的低價出租中行大樓九樓某單位。⁸⁾

另一方面，香港的左派電影界與內地一直保持關係，盧敦對此有以下的憶述：

「新聯」是國家直接投資的。解放後，中國被全世界帝國包圍，唯一缺口就是香港，所以要在香港搞電影，用這個渠道將要說的話說出來。新聯的創業作《敗家仔》（1952），及之後的《夜夜念奴嬌》（1956）等都是掩飾來的，不能太左。最初全是中國官方資本，負責領導的是周總理（即周恩來），後來交到陳毅手上，再交給廖承志管理。在香港負責的是廖一原。……我們當初無戲院，後來廖一原不知由總理處批了多少美金來港，成立南華和銀都兩間戲院。有了戲院，可跟人聯線，從中得到資金。袁耀鴻其實當年是幫我們的，但不掛名字，免招麻煩。⁹⁾

3) 林達〈五十年代粵語電影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五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展》（香港：香港市政局，1978年），頁12。

4) 陳丕士〈大批左派人士被遞解出境〉，《文匯報》（香港）1952年4月22日。

5) 朱順慈訪問，馮潔聲整理〈訪問廖一原〉（1997年10月15日，香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問計劃），頁8。

6) 前揭〈訪問廖一原〉，頁15；朱虹〈閃耀在同一星空：中國內地電影在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頁14-15。據何賢的私人保鏢黃子雅說，何於澳門曾被國民黨特務追殺，見氏著《何賢與我——形影的生活》（澳門：星光書店，2005年），頁53-64。

7) 許敦樂〈打造基本 披荊斬棘——建立固定的發行院線〉，載氏著《墾光拓影》（香港：簡亦樂出版，2005年），頁64-65。

8) 許敦樂〈創建的年月——南方公司成立初期〉，載氏著《墾光拓影》，頁17。

9) 郭靜寧撰錄〈盧敦：我那時代的影戲〉，載郭靜寧編《南來香港》（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0年），頁130。

盧敦在上文提到的「不能太左」，正好點出當時內地對香港電影政策的方針。1964年8月，廖承志在北京召開的香港電影工作會議上說：「香港的電影是祖國電影的一部分，……既然是一部分，就應該與內地的電影大體上有個分工，二者有共同的要求，但也不能完全一樣。」¹⁰⁾ 夏夢認為長城的電影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既拍古裝，也拍香港市民生活的影片，能夠不盲目地追隨內地，得力於廖對香港的看法。正如她本人所說：「如果沒有廖公的指示，尤其是在當時，內地在搞文藝革命，而香港方面又對我們採取了嚴格限制的政策，我們是不可能把這些多種多樣的影片搞出來的。」¹¹⁾ 不要以為左派電影公司只會拍意識形態的影片，例如1964年由鳳凰影業公司拍攝的俠義故事片《金鷹》，由於電影裏有蒙古外景，成為香港第一部打破百萬票房紀錄的本地製作電影。1978年經歷過文革後，當香港電影界再一次會見廖承志時，他還是堅持香港應有自己的發展路向，廖說：「希望你們有自己的風格，不要照搬內地。香港觀眾對內地電影的表現手法不一定欣賞，你們的電影藝術要提高，一二年內要超過邵氏，應該有這樣的抱負，現在的條件很好。」¹²⁾

由於目前可查的資料不多，我們無法掌握香港左派電影陣營是如何拉攏右派或政治態度中立的影人。比較多人熟悉的，如五十年代的鄺山笑、黃河；八十年代的李翰祥、胡金銓、張徹、嚴浩、許鞍華、徐小明。1956年，為了壯大左派陣營的聲勢，一些中間偏左的粵語片影人包括：吳楚帆、白燕、張活游、李清、容小意、梅綺、紫羅蓮、黎灼灼、南紅、馮奔薇、李月清、導演如李鐵、李晨風、秦劍、王鏗、左几、劉芳、盧敦等，都成為羅致的對象。¹³⁾ 不過，脫離左派陣營的人亦大不少，如：喬莊、江揚、劉克宣、林黛、李湄、李麗華、陳思思、珠璣等。其中，不少人在離開後事業不斷發展。例如林黛參加入永華後，憑《翠翠》(1953)一片一炮而紅。後來林黛加盟邵氏，更連得四屆亞洲影后的殊榮。

值得一提的是，李麗華「投奔自由」的過程，顯示出台灣是如何籠絡香港的電影界。據廖一原回憶：

……台灣方面通知他：「邵先生，你們開始拍戲，有個李麗華，要請她拍。如果你們的影片來到台灣，特別優待。一定要請她。於是，邵某人用加倍的酬勞請了李麗華。龍馬萬五元一部戲，到這裏給三萬；龍馬給她四部戲，這裏一定會給她四部，甚至會超過。那麼她就過去了。那時香港有個叫「今日中國」後來改名叫「今日世界」的，第一版大字標題是李麗華小姐投奔自由。用李麗華的名字，說自己擺脫共產黨的魔爪，現在投奔自由了。」¹⁴⁾

左派和右派的電影公司之間，雖然存有競爭，但亦有暗中合作。香港的邵氏公司是自由總會的成員，台灣市場對邵氏來說固然重要，但邵氏的業務並非只限於拍攝電影，它於東南亞還有很多的戲院，如何能為這些戲院提供固定的片源，亦是邵氏必須面對的問題。如廖一原所說，長鳳新的電影多賣給被稱為兩大右派電影公司的邵氏和電懋。鳳凰的電影賣給邵氏，長城的賣給電懋，新聯的電影則既賣給邵氏，也賣給電懋，又賣給光藝，實行分散出售。¹⁵⁾ 朱克認為左右兩派雖然鬥得激烈，箇中又有些微妙：

10) 廖承志〈關於香港的電影工作〉(香港電影工作會議總結報告, 1964年8月), 載《廖承志文集》編輯辦公室編《廖承志文集》上冊(香港: 三聯書店, 1990年), 頁451-458。

11) 夏夢〈廖公與香港進步電影〉, 中國新聞社編《廖公在人間》(香港: 三聯書店, 1984年), 頁103-104。

12) 廖承志〈發展香港愛國電影事業〉(香港電影界座談會講話摘要, 1978年1月31日), 載《廖承志文集》編輯辦公室編《廖承志文集》下冊(香港: 三聯書店, 1990年), 頁555。

13) 石悟言〈左派影人向王元龍磕頭——這一個恭賀新年的頭磕下去，顯然不懷善意，中共要拆散自由影人陣線的工作，已經愈來愈緊了〉, 《新聞天地》(香港)第419期(1956年2月), 頁12-13。

14) 前揭〈訪問廖一原〉, 頁12。

15) 前揭〈訪問廖一原〉, 頁10。

你們是否知道，長城大部分的經費和影片的出路，是依靠邵氏公司的？邵氏跟長城曾經有合約，每年長城公司拍十部戲，邵氏公司每部戲出資港幣十二萬元，其中包括了星馬市場的發行權。公司拿到這十二萬元，就已足夠一部片的成本，可以開拍一部戲了。再加上本地票房，美洲、非洲或其他地方的賣埠所得，也差不多有十萬元，加起來就可以支持公司的營運經費。所以有人曾說：長城雖然是左派公司，卻是由邵氏支持的。這個矛盾也說明了一點，就是邵氏公司在馬來西亞擁有很多戲院，需要大量影片供應，而當時長城製作的影片，算是比較嚴肅的，所以也很賣座。也就是說，長城的影片在星馬一帶發行，從沒有試過虧本。¹⁶⁾

曾於長城任宣傳和編劇的葉逸芳，於1956年從上海來港時，後悔自己並沒有及時加入邵氏，「我到香港來，進了長城，他們後來叫我進邵氏，但我進了長城就不好去了。」¹⁷⁾ 後來終於不敵邵氏的優厚薪酬，離開了長城。根據葉逸芳的回憶，離開長城的原因並不僅為薪酬，在長城要集體創作，不斷去談和開會，有時花上幾個月都沒有進展，在邵氏則顯然自由得多。¹⁸⁾

不要以為左派電影公司到處被排斥，只會坐以待斃。他們亦會採取一些變通措施。例如為了進一步推廣，左派電影公司會以別的公司名義推出自己的電影。另一方面，受到北京中央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的鼓勵，香港左派電影公司用獨立製片公司名義與內地合作拍攝正大受歡迎的戲曲電影，以擴大香港左派電影在海外的影響。舉如：香港南方影業公司以繁華影業公司名義與北京電影製片廠合拍京劇《穆桂英大戰洪州》（1964年）；長城以金聲影業公司名義與珠江電影製片廠合拍潮劇《荔鏡記》（1961年）及與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合拍越劇《紅樓夢》（1962年）；鳳凰以大鵬影業公司名義與北京電影製片廠合拍京劇《林冲雪夜殲仇記》（1963年）；新聯以鴻圖影業公司名義與珠江電影製片廠合拍粵劇《彩蝶雙飛》（1959年）及漢劇《齊王求將》（1963年）、瓊劇《紅葉題詩》（1962年）。¹⁹⁾ 這種以獨立製片公司名義隱藏內地資本以推出影片的方法，只要能打開市場，一直到最近十年，銀都機構（1983年長城、鳳凰、新聯合併組成）仍在使用的。²⁰⁾

如何評價左派電影界於整個左派陣營的地位？電影界與其他同陣營的兄弟組織關係又如何？香港的左派陣營，包括銀行、工會、學校、企業、報館、電影公司和戲院，無不受命於香港澳門工作委員會（簡稱「港澳工委」）。「港澳工委」是代表黨設在香港的組織，享有省黨委地位，由一名書記領導，下設若干名副書記及多名委員，合組一個常務委員會去領導一切事宜。據學者所指，港澳工委架構分三大組成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國家和黨的行政人員，例如人大和政協代表；第二部分是設於本港的左派組織，如工會、報館、電影公司、出版社等；第三部分是內地派駐香港機構，例如銀行、企業、工商機構等。²¹⁾ 不過，有論者認為左派的電影公司，除了少數幾齣電影有好的叫座率外，大部分的電影的票房收入都不高，因而未能在整個左派陣營裏扮演重要角色，「在左派各條戰綫裏，相信電影界是最弱及最沒有影響力的一環。」²²⁾ 雖然如此，個別影人如長城的傳奇、石慧夫婦，於香港

16) 1950至1970年代香港電影的冷戰因素座談會朱克講話，見本書。

17) 朱順慈訪問，世怡整理〈葉逸芳〉，郭靜寧編《摩登色彩——邁進1960年代》（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8年），頁210-211。

18) 同上，頁216-217。

19) 許敦樂〈花開蕾放 滿園春色——六十年代國產電影在香港〉，載氏著《墾拓光影》，頁83；趙衛防〈李翰祥對內地、香港影視業互動的影響〉，載黃愛玲編《風花雪月李翰祥》（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7年），頁109。

20) 張燕〈香港左派電影公司的歷史演變〉，《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頁59-60。

21)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in *Asian Survey*, Vol. 30, No. 8 (August 1990), pp. 757-760.

22) 龍心著《香港的另一個政府》（香港：海山圖書公司，1986年），頁63-66。

六七年暴動期間則相當活躍，成為鬥委會成員，但遭港府拘禁。八十年代，石慧當上了人大代表，象徵她新政治生命的開始。

III. 右派陣營：港九電影戲劇自由總會

綜觀整個冷戰時代，台灣在香港電影界發揮最大影響力的組織，莫過於「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以下簡稱「自由總會」）。「自由總會」最早於1953年2月成立，當時稱「自由影人協會」，由王元龍、胡晉康、屠光啟、易文、珠璣、嚴幼祥等人倡議，不過並未得到香港政府批准註冊。1955年，由一批以粵語片技術人員為主組成的「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工會」發生了主席鄺山笑投誠左派陣營事件，使在港國語片影人大受刺激，紛紛加入，並於翌年重新改選，由王元龍任主席，胡晉康、白玉堂任副主席，更改名為「港九影劇從業人員自由工會」。1957年，經歷了九龍暴動以後，為洗去工人領導的形象，總會再改名為「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由一個勞工社團轉變為職業社團。²³⁾「自由總會」從1953年成立時起，幾乎每年都有組織回國勞軍或在港慶祝雙十國慶大型活動，有時亦參加於台北舉行的總統就職典禮、向蔣總統祝壽活動和金馬獎，由於是第一個海外電影團體到台訪問，受到台灣官方高度重視。1956年，「自由總會」又接受政府大陸救災總會港幣二萬元撥款，救濟在港電影界失業人士。²⁴⁾

1951年，台灣公布「勘亂時期國產影片處理辦法」，²⁵⁾中國內地的電影公司成為「附匪」公司，對過去曾准予放映的影片一律禁映。香港因具獨特的政治地位，香港政府容許左右派陣營在香港活動，為了爭取香港電影界的支持和對內地施行反統戰政策，「自由總會」承擔了策動香港影人赴台，支持國民黨政權之重要任務。正如後來擔任總會主席的童月娟所說：

創始之初，以團結自由影業人士，擁護中華民國政策為宗旨，後來台灣政府交付一項重要任務，要自由總會負責審查在香港拍攝生產的影片。……審查要繳付各項證明費，對我們經濟助益很大，由我們審查通過發給證照才得入台上映。²⁶⁾

…「投奔自由」代表棄暗投明積極涵義，自由總會有推波助瀾策動的功效。當時頗多香港左派公司影人(大多數出自長城)有脫離意願時，自由總會會主動聯繫進行勸說，由他們書文申請入會，再轉送行政院新聞局通過，即可成為自由影人。我們人多組織力量大，拍片機會遠超過左派公司，不用去拉，自然投靠者多。如導演秦劍、文逸民，演員樂蒂、關山、喬莊、高遠、陳思思等都在自由陣營有良好發展。²⁷⁾

到了六十年代內地爆發文化大革命，中國又被西方陣營圍堵，香港的國語片市場需另謀出路，就算是香港左派電影公司拍的電影亦無法進入內地，因而「台灣因素」的影響逐漸增加。處於左右派陣營對壘的環境下，香港影人要繼續拍片，保住台灣市場，只好加入「自由總會」。九十年代中被台

23) 左桂芳《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開創經過與演進》(未刊稿)，頁3。

24) 左桂芳《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歷年大事記》(未刊稿)，頁1。

25) 此法令於1989年5月廢除。

26) 左桂芳、姚立群編《童月娟：童月娟回憶錄暨圖文資料彙編》(台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2001年)，頁144。

27) 左桂芳、姚立群編《童月娟：童月娟回憶錄暨圖文資料彙編》，頁146-147。

灣派來接手《香港時報》的丁伯駢，對自由總會在香港扮演的角色，有以下的一段回憶，「……為了要和台灣做生意，為了要去到台灣拍片，加入『自由總會』是必不可少的一道手續，不僅是製片業者，即連導演、編劇、演員，甚而至於攝影、燈光以及佈景等工作人員，如果你不加入『自由總會』，除非在片頭上沒有你的名字，否則這部影片送審就不能通過，底片也就不能進口。」²⁸⁾ 丁氏曾於1979年在香港成立港九電影製作發行協會和中國影片聯合產銷中心，協助台灣片商來港處理影片事務，他對自由總會的了解甚具說服力。

由左派電影公司「轉投」右派陣營的影人計有：嚴俊、李麗華、林黛、樂蒂、文逸民、張森、胡心靈、²⁹⁾ 龔秋霞等，其中像胡心靈和龔秋霞更加親赴台灣，真的「投奔自由」去了。台灣當局藉自由總會去對內地進行反統戰，對香港影人固然是盡量拉攏，提供各種協助，據丁伯駢的回憶，「……在那個時代，香港的自由影人，真是得天獨厚，回國拍片既有政府的輔導，又有民間的支持合作，幾乎不要帶錢，兩手空空，捐着一塊『自由影人』的招牌到台灣找拍檔，只要有人合作，幾乎就一切搞定了……」³⁰⁾ 不過，這裏所指的「合作」，曾發生一段插曲。對於台灣片商而言，因借合作名義，可達到某種商業目的，而香港的自由總會亦因此成為利用的手段。因為於五、六十年代的台灣，非官營片廠是很難獲得政府批准去申請進口底片，因而有民營片商利用與香港「自由影人」合作的名義，從香港帶來底片，或由台灣片商乾脆親自到香港「虛設行號」，在當地申領商業登記牌照，然後加入自由總會，成為正式「自由影人」，再轉頭過來向台灣政府申請進口底片，這樣就不需要以高價在黑市購獲進口底片。³¹⁾

台灣當局對香港影人的支援，雖不容置疑，但亦非無條件施贈。1953年1月，在一篇發表於行政院新聞局於香港出版的《新聞天地》的文章裏，該文作者再三警告香港影人不能只保持「中立」，需清楚表明「反共」立場，文中謂：「這種可左可右，可反共可親共的所謂『中立』，怎麼不是投機呢？怎麼不是騎牆派呢？……如果不能來台灣工作，也得在香港表示明確的反共政治立場，向台灣報名歸隊……」。³²⁾ 由此可見，自由總會的政治角色相當明顯。

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自由總會一直發揮着監察、拉攏、策反香港左派影人的作用。1979年1月香港無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無線」)首次正式公開在內地攝製節目「歡樂今宵：羊城賀歲萬家歡」，有大批演員參加，包括：歌星羅文、薰妮，演員何守信、沈殿霞、鄭少秋、麥大成、盧大偉、斑斑、陳復生等29人。但為了不影響他們在台灣的發展，在節目尚未開拍之前，各人均預先到自由總會備案，遞交「悔過書」。³³⁾ 有趣的是，在他們所寫的「悔過書」書內，無不強調「北上」是非自願，是為勢所迫，他們更附上無線和他們簽訂的僱用合約及工作通告為證據。值得一提的是，隨攝製隊和演員北上的還有無線高級管理層，包括董事總經理羅仲炳、助理總經理林賜祥、製作部執行經理吳慧萍。礙於台灣輿論的壓力，一封「悔過書」並不能解決問題，不少人還須親自去台灣向行政院新聞局作出解釋，最重要還是要表明他們對「自由中國」忠貞不二的立場。麥大成在他自己所寫的「悔過書」³⁴⁾ 內是這樣陳的：

28) 丁伯駢《一個電影工作者的回憶》(香港：亞洲文化事業機構，2000年)，頁481。

29) 胡在台灣屈屈不得志，沒有甚麼發展，他對此極之難過，覺得自己是被自由總會欺騙，對童月娟更是不滿。筆者感謝黃仁先生提供這一線索。

30) 丁伯駢《一個電影工作者的回憶》，頁195。

31) 丁伯駢《一個電影工作者的回憶》，頁194-195；479-482。

32) 文宗漢〈台灣在甚麼角度看香港電影人〉，《新聞天地》(香港)第245期(1953年1月)，頁9-10。

33) 目前見到的悔過書計斑斑、羅蘭、鄭少秋、薰妮、麥大成、繆騫人共六封。

34) 複印件藏香港電影資料館香港自由影業總會檔案。

敬啟者：本人麥大成乃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之合約藝員。現「歡喜今宵」決定於一九七九年壹月廿九日移師廣州演出。本人獲悉已被選派參加是次演出後即以全力申請免役，經多次與「歡喜今宵」高層負責人洽商後，終因本人乃此節目之合約演員且乃當值是晚之「歡喜今宵」更獲公司通知不准請假，定要參加是次演出。因此特修此函以証明本人此次參加廣州之演出實非自願，更已盡最大努力而不果，合約所限，無法矣！最後本人謹此保証本人「反共愛國」的意志，絕不動搖。並祝台安此致

香港自由影業總會主事先生

會員麥大成謹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壹月廿日

1979年6月29日 《香港時報》 對此事有如下的報道：

……麥大成今天到行政院新聞局拜會電影事業處處長蔣偉民。麥大成曾於今年春節期間迫於無線電視台合約，前往共區錄製「羊城賀歲萬家歡」節目，回到香港後一直亟於回國表明其忠貞立場，終獲如願以償。

麥大成為何仍要赴台解釋？他所擔心的當然是台灣當局的反應，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沒有表明對台「忠貞」，會有被台灣市場封殺的危險，以後再沒有機會來台灣了。不過，無線另一藝員繆騫人卻例外。她和麥大成一樣，雖參加了廣州之演出，但她卻拒絕赴台向有關當局解釋，惹來台灣傳媒的一片爭議，³⁵⁾ 甚至連累到香港的自由總會也被譏諷為「……加入自由總會的，雖左派也變成右派，而加入了自由總會的右派，也可以隨時變了左派，這個會真的名副其實為自由。」³⁶⁾ 曾經當過自由總會主席的羅斌於1997年回憶總會在香港電影界的角色時，給予這樣的評價：

當時自由總會負責監察演員有否加入自由總會，只有加入自由總會，他們拍的片才能賣去台灣。這樣做是為了防範左派演員，恐防牽連到政治問題上，因為當時左、右兩派是壁壘分明的。……加入自由總會做會員，其實沒有甚麼損失，為甚麼不加入呢？加入了你的電影就可以賣埠，如果不加入，你的電影就不能賣埠，那就無法生活了。都是為了生計而已，對於政治你就不用理會了。³⁷⁾

北上非自願，一紙合約成為「反共愛國」的羈絆，如麥大成所說，責任出於無線，那麼，無線對發展與內地的關係又是如何開展的呢？八十年代初來港出任新華社社長的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對邵逸夫有這樣的記述：

同香港親臺人士的關係，第一個有新的突破的人物是著名的影業界鉅子邵逸夫。

香港無線電視台，通過副總經理出面同新華社分社的宣傳部長楊奇接觸，提出希望我能去參觀電視台的邀請，我立即接受。……過去同中共保持一定距離，以往，只在公共場合與新華社分社人員有一般接觸，從未像這次主動來接近我們。³⁸⁾

據許家屯的憶述，以後新華社就扮演了橋樑的角色，多次協助邵逸夫到內地訪問，而內地和邵的

35) 〈繆騫人態度仍顯得曖昧，政府堅要親往表明立場〉，《萬人日報》（香港）1979年2月21日。

36) 寒江雪〈未解釋而先解禁〉，《萬人日報》（香港）1979年4月21日。

37) 朱順慈訪問，藍天雲整理（羅斌），郭靜寧編《摩登色彩——邁進1960年代》，頁123。

38)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下冊（台北：聯合報，1983年），頁332。

關係，便是從這些訪問參觀和鉅額捐款逐漸加強。³⁹⁾

台灣對港的政策並非一成不變，不僅是「開禁」，而且更希望借香港與內地交流。據江奉琪於1992年參加在台北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電影會議第四次會議上所概括香港電影的兩點特色，一者多武打、通俗片，二者對台灣來說，可接近大陸，方便交流。⁴⁰⁾ 香港特有的中介功能，又被提到議程上。

IV. 游走和夾縫於左右派陣營的香港電影人

何謂「左派」⁴¹⁾、「右派」？除了對政權的認同外，我們應如何加以定義？

香港電影界的「左派」又有何特色？值得提出的是，過去被界定為「左派」的香港影人，在他們的口述訪問或回憶裏，多不認同這樣的標籤。他們對電影藝術、政治理念、時局和個人處境等等，都有截然分的看法。下面表一羅列了八位香港資深影人對如何界定「左派」、「右派」的看法。他們都認為左派、右派的叫法、分別，都是相對的。廖一原說，只有稱對方的人為甚麼派，但從不稱自己是甚麼派。比較有趣的是蕭芳芳，她連自己是怎樣踏入了左、右陣營也不大清楚，先與長城簽約，然後到台灣成為「投奔自由」的義士，極可能是由她母親去決定。張徹、廖一原、盧敦均說，拍電影是講商業和藝術，與左右派別無大關係。

左、右兩派最大的相同處，在於背後均有一個政權支持。至於對對方最大的威脅，例如對左派陣營來說，便是失去台灣市場。不過，一切都可以補救，只要願意寫「悔過書」加以解釋一番。朱克提及過國泰曾向他招手，只是他不願意寫「悔過書」而作罷。左派和右派的不同處，在於與內地的密切關係，當文革爆發時，香港亦被「禍延」。如沈鑒治所說，由於香港和內地走得貼近，香港的電影製作幾乎完全停頓。不過，如夏夢所指「左落右上」，台灣電影業能夠乘此機會大事發展。大部分的影人都認為「左派」、「右派」只是一個政治標籤，與電影藝術無大關係。盧敦指出，他不喜歡「紅」，因為會容易惹上麻煩。對於香港政府來說，左派和右派不和，便成為最大的得益者。朱虹說，香港政府以力打力，常借左派來打右派，或借右派來打左派。

表一：香港電影界對「左派」的看法

張徹	我在左派上加了引號，是表示「所謂左派」之意。袁仰安接手改組「新長城」，和後來的「鳳凰」等，習慣上被稱為「左派公司」與在「自由影人總會」旗下的所謂「右派公司」對待。實際上，它們並無甚麼意識形態之「左」「右」可分，基本上都拍商業電影，惟「左派」可能特別若干資金方面的支持，與中國大陸有相當聯繫。在我這「外人」來看，聯繫也並不緊密，資金情況則與新加坡之於「電懋」相仿，看來也似非充裕。 ⁴²⁾

39)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下冊，頁332-335。

40) 陳俊哲編輯《全國電影會議實錄，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七至八日》（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3年），頁176-181。

41) 曾鈺成對香港「左派」有這樣的描述：「這群北京支持者對香港和大陸上發生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並用自己的語言來形容這些事件。在這圈子以外的人稱圈內的人為『左派』，以表示他們與中國共產政府的關係。……這些人讀愛國報章，到戲院去看愛國電影，在只售中國產品的愛國商店買東西，參與愛國工會，更將子女送往愛國學校唸書。……由於他們與大陸的密切關係，他們往往更認識到北京政府的缺點和錯誤，甚至往往身受其害。但他們只將批評限於自己的圈子內。由於宣傳戰正在開展，每當有人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群忠心的人都感到有責任為她辯護。不管是好是壞，他們總會站在祖國的一方。」見氏著《曾鈺成直言集》（香港：天地圖書，1995年），頁159-160。

42) 張徹著《回顧香港電影三十年》（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頁23-24。

43) 前揭《理想時代：長城、鳳凰的日子》，頁278。

沈璧治	六十年代中以前，香港電影界可說是「左」「右」平分春色，但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卻令一切改觀。香港的中共領導盲從國內極左路線，禍延「左派」電影界，拍片工作因而幾乎陷於停頓，……。43)
蕭芳芳	那時左右派並不怎麼分的，只是十月一號中共國慶我一定要去慶祝會上表演。記得媽媽還說：「啲！他們唱的是共產黨歌！」到後來左派右派就分得很厲害，我後來到台灣拍戲，母親要寫了「悔過書」才讓去。我那時還小，不懂這些事，只知道台北機場會有另一個童星叫張小燕的來接我機，開心極了，我想這下可有人跟我玩了。在台北看到報章的消息就覺得奇怪，我問母親：「我怎麼變成『投奔自由』來了？甚麼叫『投奔自由』？」我媽說小孩子別管這事。44)
廖一原	……他是左派，但他們也不說自己是右派，左派就是跟共產黨走的。那時台灣有五、六百萬，香港市場三、四百萬人，所以邵氏、電懋等很多公司為了那裏的市場，就要……但朋友可以傾談，來往。……你問我是不是有左右派，我們自己沒有這個觀念，祇是做電影藝術工作。但是人家要搞，通過市場，一而再地通過這些手段，使到李麗華投奔自由，做宣傳，到趕走了十個人，到盡力壓制。……45)
盧敦	當年我們被認為是左派，中聯、華僑亦與我們聯繫，可以說都由我們領導，只不過我們不出面罷了。因為搞「紅」了，會很不方便的，像新聯便經常被包圍。……其實我有甚麼黨派呀？不過之前在廣州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總覺得文藝應為政治服務，文人不能離開政治。46)
夏夢	我覺得香港的左派太左了，這是因為國內派人來香港，袁仰安不是左嘛！我覺得從前的左派很正派，好像我簽的第一個合約就說明不用參加任何宴會。那個年代電影明星好像是要陪人吃飯的，我們的「左派公司」很正派，沒有這一套，但文革時就不好了。……文革對我們「左派公司」打擊太大，……文革一展開，台灣片就抬頭了。47)
朱克	……就是1958年離開長城的是事。我非黨員，但十分尊重共產黨。……碰巧國泰有人來找我，月薪一千八百元，算是不錯，不過他們要我寫悔過書，寫我過去錯了，如今走光明大道，但我拒絕了。48)
朱虹	……那時我們愛國要犧牲很多東西。當年香港政府很會搞平衡，當台灣那些力量抬頭，便抬起左派打台灣；左派勢力強，他們又壓着左派。……我們只不過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們的祖國，光是這一點便被人說是「左派」。49)

在香港眾多的影人中，以蕭芳芳和李翰祥的遭遇最能說明他們是如何夾縫、游走於兩派陣營。蕭芳芳在孩提時代出道時，毫不自覺地踏進了左右兩派的陣營，直至1958年她正式加入自由總會並親自到台灣，才醒覺到自己已「投奔自由」了。初時，她同時為左右兩派的電影公司拍攝電影。1955年為長城、中聯、南僑共拍攝了五部電影；1956年為邵氏拍攝了《梅姑》，但同時也為長城拍攝了《紅顏劫》和《玫瑰岩》，但自1958年後，就停止替左派電影公司工作了。對於這段往事，蕭芳芳有以下的憶述：

(1956年)拍完《梅姑》，我就進入長城成為基本演員。聽媽媽說做基本演員有月薪，生活可以比較穩定一些，當時的「邵氏」、「電懋」(所謂右派公司)並沒有興趣簽我。50)

童月娟對蕭芳芳於少年時不知覺地踏入了左派陣營有以下的評述：

而簽約當時還半大不小的蕭芳芳，早在1954年，才七歲大，就已從影，是左派長城旗下的童星；九歲時，她演出邵氏公司的《梅姑》，得到第二屆東南亞影展(亞洲影展與亞太影展前身)最佳童

44) 焦雄屏〈四十年傳奇路——專訪蕭芳芳〉，焦雄屏編著《香港電影傳奇：蕭芳芳和四十年電影風雲》(台北：萬象圖書，1995年)，頁148。

45) 前揭〈訪問廖一原〉，頁10、12。

46) 郭靜寧撰錄〈盧敦：我那時代的影戲〉，郭靜寧編《南來香港》(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0年)，頁132。

47) 前揭《理想時代：長城、鳳凰的日子》，頁127。

48) 前揭《理想時代：長城、鳳凰的日子》，頁181-182。

49) 前揭《理想時代：長城、鳳凰的日子》，頁229。

50) 焦雄屏〈四十年傳奇路——專訪蕭芳芳〉，頁148。

星獎；後又演出朱旭華主持的國風公司影片《苦兒流浪記》，開始成為香港國語片及粵語片的知名童星。……後來她成為六〇、七〇年代粵語片界與陳寶珠齊名的紅星。⁵¹⁾

上面童月娟的評述有點對左派電影公司指責的味道。意思說如果蕭芳芳沒有離開長城，她就不可能有以後的發展。

然而，左派和右派之間，不僅有競爭，同時也有合作，而且並不是絕對壁壘分明，兩派老死不往來。當時在香港被認為是右派的電影公司為了了解內地影片的最新發展，秘密地通過左派電影公司看試片，而由右派電影公司拍攝的電影更可通過左派電影公司的渠道流通到內地。據許敦樂說，導演如胡金銓和李翰祥，便是經常通過他去觀賞內地新片，「……所以到南方試影室看試片，變成一種極其秘密的行動。……還有一些被港英電檢處禁映的『秘片』，對於他們幾位來說，都特別『來勁』。……邵老闆就很喜歡來看大陸的影片，以資借鑑或交流，全部由南方提供。而邵氏出品的影片也都由我們經手借到北京，供領導人觀賞，……」⁵²⁾

當李翰祥回想到當時返回大陸拍片的過程，他就馬上想起兩位幫過他的人，這兩人便是廖承志和何賢：

……後來我才知道，為甚麼大家一直叫我回來拍戲。我覺得可能是廖公(廖承志)的一個想法，就是當時對港、台影人的統戰，希望他們能回來拍戲，希望我能打頭陣，因為這種事情過去我也做過。我曾經把香港的一些電影工作人員帶到台灣去，所以我知道，他們是希望我回大陸拍戲，能夠把兩岸的僵局打開。……我一生都很感謝何先生(何賢)，可以說他改變了我的一生。我也很感謝廖公，他讓我能回來拍《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兩部戲。⁵³⁾

這裏提到的「這種事情」，其中一件是指1966年李在台灣的時候，曾幫助於盧敦主持飛龍公司工作的伍秀芳到台灣。雖然李翰祥補充出手相助的原因在於欣賞伍的才華，認為她可為國聯公司拍片。至於伍為何急於赴台，除了效力國聯外，我們還未找到其他的原因。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伍是通過自由總會主席胡晉康以「反共義士」名義迅速辦理赴台手續，並在台北受到有關人士的歡迎。⁵⁴⁾

綜觀李翰祥的一生，經歷了數次陣營的轉換。首先，1949年前由上海逃來香港，加入長城。其次，離開長城，加入邵氏。第三，1963年被國泰羅致，離開邵氏，在台灣自組國聯影業有限公司。國聯成立後，與邵氏正面衝突，開拍相同題材的電影《七仙女》(1964)。⁵⁵⁾不過，李氏在台灣的發展並不順暢。根據他本人所述，「我在台灣所組的『香港國聯有限公司外景隊』，因為不善於理財，新加坡的國泰和台灣的聯邦又都不肯依約結賬，所以公司的情況越來越差。最後不得不重返香江，又加入了邵氏公司。」⁵⁶⁾他當時欲離開台灣，但遭遇不少困難，最後要利用為新片《緹縈》(1971年)到東京配樂的機會返回香港。⁵⁷⁾事緣新片《緹縈》被人告發有共產思想，有「為匪張目」之嫌，且李氏本人與中國大陸有不可告人之秘密關係，所以他多次申請離境都不被批准。第四，1978年10月，他從香港飛到北京，拜見時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數年後，得澳門富商何賢的資助，成立新崑崙影業公司，開拍《火燒圓明園》(1983)、《垂簾聽政》(1983)、《火龍》(1986)等電影，

51) 左桂芳、姚立群編《童月娟：童月娟回憶錄暨圖文資料彙編》，頁127。

52) 許敦樂〈憶舊〉，黃愛玲編《風花雪月李翰祥》，頁222-223。

53) 藍天雲〈李翰祥大擺龍門陣〉，黃愛玲編《風花雪月李翰祥》，頁134、136。

54) 李翰祥著《影城內外》(香港：天地圖書，1997年)，頁60。

55) 李翰祥著《銀海千秋》(香港：天地圖書，1997年)，頁201。

56) 李翰祥著《銀海千秋》，頁253。

57) 李翰祥著《銀海千秋》，頁204-205。

大受觀眾歡迎。不過，當時台灣仍未解禁。作為自由總會成員，需遭處罰，包括他本人不能入境和他拍的電影不能在台灣上映。

李翰祥由轉換電影公司，到游走於北京和台灣之間，並非沒有付出代價。他從邵氏轉到國聯和再由國聯回歸邵氏，都吃了官司，分別被邵氏和聯邦告以毀約，幸而最後都能逃過。⁵⁸⁾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李氏沒有到北京，他的事業就不能推上另一個高峰。從另一角度看，正因為他游走於不同陣營之間，他拍攝的電影，形成了不同的風格。⁵⁹⁾ 如果沒有穿梭於不同陣營，他的風格亦不能在兩岸三地傳揚開去。學者對他在台灣國聯時期廢除明星制度和阻止中國電影「托辣斯」的出現，給予頗高的評價。⁶⁰⁾

V. 結語

電影於冷戰時代，對於港人來說，不僅是娛樂，也是文化、政治。甚麼是左派，甚麼是右派？顯然，對於大部份的香港影人來說並無太大的意義。由左派跳到右派，或由右派轉移到左派，當問題發生時，轉變陣營成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影人游走不同的電影公司，也可以游走左右兩派。無可否認，電影是文化藝術，但對於冷戰時期的兩岸政權來說，都成為鞏固政權的措施，香港便成為一個要爭奪的對象。有人說左派的稱法，最早是由右派說起的，筆者同意標籤一般是由對方陣營開始的。不過，從政治角度來說，左派強調愛國愛黨，右派標榜自由和反共，都有各自的道理。

從宏觀角度看，香港電影於冷戰時代可謂經歷了數次不同的考驗，不僅沒有窒礙了發展，相反更使香港電影成功地由一個時代過渡到另一個時代。綜觀整個冷戰時代，正如研究者所指，香港電影由星馬勢力、中原(中國內地)勢力和本土勢力互相衝擊。不過，香港電影無論怎樣受外來因素影響，始終由殖民地本土社會運作，吸取外來包括星馬及中國大陸的營養而成長。⁶¹⁾ 文革前內地電影和長鳳新拍攝的影片在香港和東南亞市場均有一定的強勢，但文革後就形勢逆轉，可以說造就了邵氏公司一家獨秀，最後雄霸整個海外華人市場。⁶²⁾ 當中國大陸對外封閉時，香港的影人只能向外開拓市場，台灣自然成為理想目標，但當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時，龐大的市場又掩蓋了原來的台灣市場，他們與台灣的關係反而逐漸疏離，這充分反映港人左右逢源，講求現實的心理。

58) 沙榮峰《沙榮峰回憶錄暨圖文資料彙編》(台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2006年)，頁91-100。

59) 葉月瑜〈從邵氏到國聯——黃梅調影片的在地化〉，黃愛玲編《風花雪月李翰祥》，頁98-107。

60) 鄭樹森〈一九九七前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中介〉，載氏著《縱目傳聲——鄭樹森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2004年)，頁91-92。

61) 羅卡〈五、六十年代看香港電影的過渡〉，焦雄屏編著《香港電影傳奇：蕭芳芳和四十年電影風雲》，頁172-173；194。

62) 許敦樂〈迅雷一聲 風雨滿樓——「文革」期間的國產電影概況〉，載氏著《墾光拓影》，頁91-92。

경쟁과 협력: 냉전 시대 홍콩 영화계의 좌파와 우파*

李 培 德 (香港大學校)

〈목 차〉

- I. 들어가기
- II. 좌파진영: 장성(長城), 봉황(鳳凰), 신련(新聯)
- III. 우파진영(右派陣營): 홍콩구룡영화회극자유총회(港九電影戲劇自由總會)
- IV. 좌우진영 사이의 홍콩영화인
- V. 끝맺음

I. 들어가기

다른 분야와 마찬가지로 영화계에도 다양한 경쟁이 있다. 홍콩의 영화 산업은 중국과 긴밀한 관계를 가지고 있다. 1930년대부터 홍콩은 상해 영화계 인사들을 대거 흡수하기 시작하였다. 이에 따라 상해에서 탄생한 좌익 영화 사조가 이들을 따라 남쪽으로 이동하다가 결국 홍콩까지 전파되었다.¹⁾ 과거 영화계의 경쟁에서는 통속영화와 예술영화의 경쟁, 국내 자본과 외국자본의 경쟁, 국어(만다린)와 광둥어의 경쟁, 심지어 영화사간의 경쟁, 스타들 사이의 경쟁이 끊이지 않았다. 하지만, 홍콩 영화계에게 있어 가장 큰 영향을 준 것을 꼽자면 좌파와 우파간의 경쟁일 것이다.

영국의 식민지인 홍콩에서 중국인(華人)은 19세기부터 영국인과의 협력방법은 물론 중국 내 정권의 존재라는 현실까지 살필 수 있었다. ‘중국인 정치(華人政治)’는 ‘중간인 정치(middle-men politics)²⁾로 불렸는데, 홍콩 중국인이 중국과 영국의 두 정권 사이를 주선했던 것은 다 아는 사실이다. 1949년 중국 공산당이 정권을 잡고 기존의 국민당이 대만으로 옮겨가자, 홍콩의 중국인 정치도 전례 없는 대변화가 일게 되었다. 2차 세계대전 종식 후 수년간, 홍콩 중국인은 국공(國共) 두 정당 사이에서 선택을 해야 했으며, 1952년 홍콩 좌파 영화인들이 추방부터 1989년 대만 ‘비상동원시기 임시조항(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 철폐까지, 좌우파 투쟁으로 인한 어수선했음을 족히 30여 년 동안 계속되었다. 흥미로운 점은 홍콩 영화의 비약은 국제 중국인 사회에서 이름은 날렸고, 인력, 기술, 자본 각 분야의 기반이

* 본문의 저술 과정에서는 홍콩영화자료관의 황애령(黃愛玲), 오영은(吳詠恩), 성안기(盛安琪)님의 홍콩구룡영화회극산업자유총회(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의 일부자료 및 료일원(廖一原) 인터뷰기록을 제공, 대만 황인(黃仁) 선생님과 홍정의(洪靜宜) 님의 자료 협조, 홍콩대학 중국연구전략주제사업(Strategic Research Theme on China Studies)의 연구경비 제공에 감사를 표한다.

1) 이 관점에 대해서는 많은 이의 언급이 있었으며, 중뢰(鍾雷) 편저 『50년 동안의 중국영화(五十年來的中國電影)』 참조.(대북(台北): 정중서적(正中書局), 1965년), 73-75쪽.

2) Hui Po-keung, “Comprador politics and middleman capitalism,” in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30-45.

모두 이 시기에 다져졌다. 홍콩이 국공 경쟁의 가장 중요한 장소를 제공한 것임은 틀림없다. 그렇다면, 냉전시기 홍콩영화계는 어떻게 살아남을 수 있었을까?

무엇이 좌파이고 우파인가? 홍콩 영화계는 이러한 꼬리표에 어떠한 생각을 가지고 있는가? 국공 양당의 홍콩 내 경쟁 대상은 홍콩중국인 뿐만 아니라 수많은 해외 화교 사회까지 포함시켜야 할 것이다. ‘위에서 정책을 내놓으며 아래에는 대책이 있는 법’, 홍콩 중국인들은 통일전쟁과 반통일전쟁 사이에 끼여 어떻게 균형을 유지하였을까? 홍콩의 좌파, 우파 그 자신들은 어떤 정책으로 서로 투쟁을 하였을까? 이 모든 것이 본문에서 해결되었으면 하는 문제이다.

II. 좌파진영 : 장성(長城), 봉황(鳳凰), 신련(新聯)

‘남국 공고, 장성 발전, 남양 침투, 대관 쟁취, 용화 동결(鞏固南國, 發展長城, 滲透南洋, 爭取大觀, 凍結永華)’은 한때 전후 홍콩 영화계 좌파진영의 전략이었다.³⁾ 하지만, 몇 년이 못 가 홍콩 정부는 추방행동을 취하였다. 1949년부터 1952년까지, 홍콩정부에 의해 출국 당한 좌파인사로는, 홍콩구룡방직노조 부주석(港九紡織工會副主席) 루송평(樓頌平), 홍콩아일랜드 중고등학교 교장(香島中學校長) 로동(盧動), 전철직원노조의장(電車職工會主席) 류법(劉法)와 부의장 구양소봉(歐陽少峰) 및 직원 이문해(李文海), 홍콩구룡노조부의장(港九工會副主席) 맥요전(麥耀全), 구룡선장노동연합 회장 맥하지(九龍船塢勞工聯合主席麥河志), 동화삼원 비서 도개유(東華三院秘書陶開裕), 해군선창산업 중국인직원회 의장 견웅(海軍船塢產業華員職工會主席甄雄) 홍콩구룡방직총노조 성지부 주임(港九紡織總工會城支會主任) 세페령(洗佩玲) 및 서기 요견(姚堅), 영화스텝 마문삼(馬文森), 류경(劉瓊), 서적(舒適), 제문소(齊聞韶), 양화(楊華), 마국량(馬國亮), 침적(沈寂), 적범(狄梵), 백침(白沉), 장위(蔣偉) 등¹⁰여 명의 영화인이 있다.⁴⁾ 추방인사 중 영화계인사가 제일 많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홍콩정부는 좌파에 대해 원칙적으로 절멸(絶滅)과 용인이 아닌 탄압과 이용 전략을 취하였다. 신련영업공사(新聯影業公司)를 창설한 료일원은 홍콩정부의 좌파 정책에 대해, ‘영국인은 좌파세력을 이용해 우파를 물리쳤는데, 후에 국내상황이 변한 후 진정한 위협은 좌파에서 비롯되었는데’ 그 때는 좌파에 더 대응해야만 했다는 예리한 비평을 하였다.⁵⁾ 홍콩의 좌파 영화에서 중화인민공화국 국기, 국가, 국장 및 국가지도자가 등장하고 또 해방군 형상이 있는 장면은 모두 홍콩 정부의 검열에 통과할 수 없었으며, 삭제 되거나 상영 금지되었다.

홍콩 영화계에서, 좌파 세력은 주로 장성영화제작유한공사(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 봉황영업공사(鳳凰影業公司), 신련영업공사(新聯影業公司) 및 영화사에서 비롯되었는데, 소련,

3) 임달(林達) 「50년대 광둥어영화연구 중의 몇 가지 문제점(五十年代粵語電影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50년대 광둥어영화 회고전(五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展)』 (홍콩: 홍콩시정국(香港市政局), 1978년), 12쪽.

4) 진비사(陳丕士) 「호송출국당한 좌파인사들(大批左派人士被遞解出境)」, 『문회보(文匯報)』 (홍콩) 1952년 4월 22일

5) 주순자(朱順慈) 인터뷰, 풍결경(馮潔聲) 정리 「료일원 인터뷰」 (1997년 10월 15일, 홍콩영화자료관 역사구술인터뷰계획(香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問計劃)), 頁8.

중국내륙영화를 전문적으로 대리하는 남방영업유한공사(南方影業有限公司) 및 그가 관리하는 극장 체인으로 구성되었다. 장성, 봉황, 신련의 역사에 대해서는 이미 많은 연구결과물이 있기 때문에 여기에서는 반복하지 않겠다. 주목해야 할 점은, 좌파 영화계가 어떻게 다른 형제조직의 도움을 받았는가 이다. 예를 들어, 마카오의 유력한 상인인 하현(何賢)은 두 차례 좌파진영의 극장 매입을 도운 바 있다. 첫 번째는 풍년오락유한공사(豐年娛樂有限公司)를 설립하여 구룡보경극장(九龍普慶戲院)을 매입한 것이고, 두 번째는 풍순오락유한공사(豐順娛樂有限公司)를 설립하여 홍도고승극장(港島高陞戲院)을 매입한 것이다. 모두 하현 자신이 회사의 이사장을 맡았다.⁶⁾ 하현 본이 외의 이사회 회원으로는 중교국화공사 이사장(中僑國貨公司董事長) 손성증(孫城增), 중화상업연합회 이사(中華廠商聯合會會董) 예소강(倪少強), 리희신공사 계열 민락공사 이사장(利希慎公司屬下民樂公司董事) 원요홍(袁耀鴻) 등 홍콩의 다른 화상(華商)이 있다.⁷⁾ 이밖에, 남방영업공사는 적당한 사무실을 급히 구하던 중 중국은행 홍콩지점 경리 정철여(鄭鐵如)가 도움을 주어 평방척(平方尺) 당 2원 4각의 저가로 중국은행빌딩 9층의 한 부분을 임대하게 되었다.⁸⁾

또 다른 한편, 홍콩의 좌파영화계는 중국내륙과 관계를 지속하였는데, 로돈(盧敦)은 다음과 같이 기억하였다.

‘신련’은 국가가 직접 투자하였다. 해방 이후, 중국이 전세계 제국에 의해 포위되었을 때, 유일한 틈은 바로 홍콩이다. 그렇기 때문에 홍콩에서 영화를 하며 이러한 경로를 통해 하고 싶은 말을 해야 했다. 신련의 첫 작품 『패가자(敗家仔: Prodigal Son)』(1952)와 그 후의 『야야염노교(夜夜念奴嬌: My Darling Slave)』는 어느 정도 눈가림이 필요했으며 너무 좌파로 갈 수는 없었다. 처음에는 모두 중국관영자본이었고 책임자는 주총리(주은래: 周恩來)였는데, 후에 천의(陳毅)에 넘겨졌고, 다시 료승지(廖承志)가 관리하였다. 홍콩에는 료일원(廖一原)이 책임을 졌다. …… 우리는 처음에는 극장이 없었다, 후에 료일원이 어찌된 일인지는 모르지만 총리처에서 얼마간의 달러를 홍콩으로 가져와 남화(南華), 은도(銀都) 두 극장을 설립하였다. 극장이 생기자 사람들과 왕래를 하며 그 가운데에서 자금을 얻게 되었다. 원약홍(袁耀鴻)이 사실 그 해 우리를 도왔으나 괜한 번잡함을 피하기 위해 자신의 이름을 걸지 않았다.⁹⁾

로돈(盧敦)이 윗 글에서 ‘너무 좌파로 갈 수 없었다(不能太左)’고 언급한 것은 당시 홍콩 영화정책에 대한 중국내륙의 방침을 잘 보여준다. 1964년 8월, 료승지(廖承志)는 북경에서 열린 홍콩영화업무회의에서 ‘홍콩의 영화는 조국 영화의 한 부분이며, …… 일부분이라면

6) 전계(前掲) 「료일원 인터뷰(訪問廖一原)」, 15쪽. 주홍(朱虹) 『한 하늘에서 빛나는: 홍콩에서의 중국영화(閃耀在同一星空: 中國內地電影在香港)』(홍콩: 삼련서점(三聯書店), 2005년), 14-15쪽. 하현의 개인 보디가드인 황자아(黃子雅)의 말대로, 마카오에서 국민당 특무에게 쫓겼다고 함, 그의 저술 『하현과 나-그림자의 삶(何賢與我——形影的生活)』(마카오: 성광서점(星光書店), 2005년), 53-64쪽.

7) 허둔락(許敦樂) 「기본을 다져 가시나무를 헤쳐나감- 고정된 배급체인수립(打造基本 披荊斬棘——建立固定的發行院線)」, 『간광척영(鑿光拓影)』.(홍콩: 간역락출판(簡亦樂出版), 2005년), 64-65쪽.

8) 허둔락(許敦樂) 「창건의 해- 남방공사의 설립 초기(創建的年月——南方公司成立初期)」, 저서 『간광척영(鑿光拓影)』, 17쪽.

9) 곽정녕(郭靜寧) 저술노취 「로돈: 우리시대의 영화(盧敦: 我那時代的影戲)」, 곽정녕 편 『남쪽 홍콩으로(南來香港)』(홍콩: 홍콩영화자료관(香港電影資料館), 2000년), 130쪽.

중국 내륙의 영화와는 대략적인 분업이 이루어져야 하며, 이 둘은 같은 요구가 있긴 하지만 또 완전히 같을 수는 없다' 라고 말했다.¹⁰⁾ 하몽(夏夢)은 장성(長城)이 자신의 뜻대로 사극도 찍고 홍콩서민의 삶을 그린 영화도 찍으며 맹목적으로 내륙을 따르지 않을 수 있었던 것은 바로 홍콩에 대한 료승지의 견해의 힘입은 것이라고 생각하였다. 그녀 스스로 '만약 료선생님의 지시가 없었다면, 특히 당시 내륙에서는 문화혁명이 진행 중이었고 또 홍콩 또한 우리에게 엄격한 정책을 취하였기 때문에 우리가 이렇게 다양한 영화를 만들어낼 수 없었을 것이다'¹¹⁾고 말한 바 있다. 좌파영화사가 이데올로기적 영화만을 찍을 수 있다고 보아서 안된다. 예를 들어, 1964년 봉황영업공사(鳳凰影業公司)가 찍은 무협영화 『금영(金鷹)』은 영화 속의 몽고촬영으로 영화관람객수가 홍콩 최초로 관람객 백 만 백만을 넘는 홍콩제작영화가 되었다. 1978년 문혁이 지나간 후 홍콩영화계가 다시 료승지와 만남을 가졌을 때에도 료승지는 홍콩이 자신만의 길을 걸어가야 한다고 보았다. 그는 '내륙을 쫓는 것이 아닌 당신들만의 풍격을 가지길 바란다. 홍콩관람객들이 내륙영화의 표현방식을 꼭 좋아하리란 법은 없다. 영화예술을 격상시켜 1,2년 내에 쇼브라더스(邵氏)를 따라 잡겠다는 부담감을 가져야 하며, 지금의 조건은 좋다.'¹²⁾라고 말했다.

자료의 불충분으로 홍콩좌파영화진영이 어떻게 우파나 정치중립 영화인을 끌어들이는가를 파악할 방법은 없다. 많이 알려진 영화인들로는 50년 대의 광산소(鄺山笑)·황하(黃河), 80년대의 이한상(李翰祥)·호금전(胡金銓)·장철(張徹)·엄호(嚴浩)·허안화(許鞍華)·서소명(徐小明)이 있다. 1956년 좌파진영의 세력을 키우기 위해, 좌파편향의 중립 광둥어영화인들, 즉 오초범(吳楚帆), 백연(白燕), 장활유(張活游), 이청(李清), 용소의(容小意), 매기(梅綺), 자라련(紫羅蓮), 여작작(黎灼灼), 남홍(南紅), 풍혁미(馮奔薇), 이백청(李月淸)과 이철(李鐵), 이진풍(李晨風), 진검(秦劍), 왕갱(王鏗), 좌궈(左几), 류방(劉芳), 로돈(盧敦) 등의 감독이 포섭의 대상이 되었다.¹³⁾ 그러나, 교장(喬莊), 장양(江揚), 류극선(劉克宣), 임대(林黛), 이미(李湄), 이려화(李麗華), 진사사(陳思思), 주기(珠璣) 등 좌파진영을 벗어나려는 사람도 많았다. 그 중 많은 이들이 좌파진영을 떠난 후 계속 성장했다. 예를 들어, 임대(林黛)는 용화(永華)에 가입한 후 『취취(翠翠)』(1953)한 편의 영화로 일약 스타가 되었다. 이후 임대는 쇼브라더스(邵氏)가맹하여 4차 아시아영화제 최우수여우주연상(亞洲影后)의 영예를 얻기도 했다.

주목할 만한 점은 이려화(李麗華)가 '자유로 투항(投奔自由 - 역주: 자유중국, 즉 대만으로의 귀순)' 하는 과정을 통해 대만이 어떻게 홍콩의 영화계를 끌어 들였는지 알 수 있다는 점이다. 료인원(廖一原)은 다음과 같이 기억하였다.

10) 료승지(廖承志) 「홍콩의 영화작업에 관해(關於香港的電影工作)」 (홍콩영화업무회의 종합보고서(香港電影工作會議總結報告), 1964년8월), 『료승지 문집(廖承志文集)』 편집사무실 편 『료승지 문집(廖承志文集)』 上(홍콩: 삼련서점(三聯書店), 1990년), 451-458쪽.

11) 하몽(夏夢) 「료공과 홍콩 진보 영화(廖公與香港進步電影)」, 중국신문사(中國新聞社) 편 『세상에서의 료공(廖公在人間)』 (홍콩: 삼련서점(三聯書店), 1984년), 103-104쪽.

12) 료승지(廖承志) 「홍콩애국영화사업 발전(發展香港愛國電影事業)」 (홍콩영화계좌담회 연설 요약문(香港電影界座談會講話摘要), 1978년1월31일), 『료승지 문집』 편저사무실 편 『료승지 문집』 下 (홍콩: 삼련서점(三聯書店), 1990년), 555쪽.

13) 석오언(石悟言)의 「좌파영화인, 왕완룡(王元龍)에게 고개숙이다.——새해 축하로 고개를 숙였지만 좋은 뜻은 없었으며, 중공의 좌파진영해체 작업이 갈수록 강화됨.」, 『신문천지(新聞天地)』 (홍콩) 제 419기(195년2월), 12-13쪽.

.....대만측이 ‘소(邵)선생님, 당신들이 영화를 찍는다면 이려화(李麗華)에게 같이 찍자고 하십시오. 영화가 대만에 올 경우 특별한 대우를 해드릴 것입니다. 반드시 그녀를 모십시오’라고 통지를 하였다. 그래서, 쇼브라더스는 보수를 배로 주며 이려화를 끌어왔다. 용마(龍馬)가 편 당 1만 5천을 주면, 쇼브라더스는 3만을, 용마가 네 편을 찍자면 여기는 4편, 아니 더 이상을 주었을 것이다. 결국 그녀는 쇼브라더스에 건너갔다. 당시 홍콩에는 「금일중국(今日中國)」이라는 있었는데, 후에는 「금일세계(今日世界)」로 바뀌었는데, 첫 면의 큰 글씨로 이려화가 자유로 투항하였다고 써있었다. 이려화의 이름으로 자신이 공산당의 마수에서 벗어나 지금 장로 투항하였다고 말했다.¹⁴⁾

좌우파 영화사간에는 경쟁을 하기도 했지만 암암리에 협력도 이루어졌다. 홍콩의 쇼브라더스(邵氏公司)는 자유총회의 회원이었으며, 쇼브라더스에 있어 대만시장도 물론 중요하기는 했지만, 영화제작뿐만 아니라 동남아에 여러 극장까지 가지고 있어 이 극장들을 위한 고정적인 영화공급원 확보 또한 문제였다. 료일원의 말대로, 장성과 봉황의 신작들이 양대 좌파영화사로 불린 쇼브라더스(邵氏)와 케세이(電懋)에 많이 팔렸다. 봉황(鳳凰)의 영화는 쇼브라더스에, 장성(長城)의 영화는 케세이에 팔렸으며, 신련의 영화는 쇼브라더스, 케세이, 광예(光藝) 등 분산 판매가 이루어졌다.¹⁵⁾ 주극(朱克)은 좌우양파들이 치열한 투쟁을 벌이기도 했지만 또 미묘한 관계를 유지하기도 하였다고 보았다.

장성(長城)의 대부분의 경비와 영화판매를 쇼브라더스에 의존하고 있었다는 것을 당신들이 아닌지 모르겠다. 쇼브라더스와 장성은 장성이 매년 10편을 찍고 쇼브라더스가 편당 홍콩달러 12만원을 출자하며, 그 중에는 싱가포르, 말레이시아 시장의 발행권을 포함한다는 협약을 맺은 적 있다. 회사가 이 12만원을 받으면 영화 한편을 족히 찍었기 때문에 영화촬영을 시작할 수 있었다. 여기에 현지 극장수입과, 미주·아프리카 및 다른 지역에 대한 판매수입이 거의 10만원이었기 때문에 이를 합하면 회사의 운영경비를 충당할 수 있었다. 그래서, 장성이 좌파이지만 쇼브라더스가 지원하고 있다고 말하는 사람이 있었다. 또, 쇼브라더스도 말레이시아에 많은 극장을 소유하고 있어 대량의 영화공급이 필요했는데, 당시 장성이 제작한 영화는 엄숙한 편에 속해 관객이 많이 들었다는 것이다. 다시 말해, 장성의 영화가 싱가포르와 말레이시아 일대에서 배급되어 손해를 본 적이 없다는 것이다.¹⁶⁾

장성에서 홍보와 각본을 맡았던 섭일방(葉逸芳)은, 1956년 상해에서 홍콩으로 돌아왔을 때 바로 쇼브라더스에 가입하지 것을 후회했다. ‘내가 홍콩에 왔을 때 장성에 들어갔다. 그들이 후에 나에게 쇼브라더스로 오라고 했지만, 이미 장성에 간 상태였기 때문에 가기가 그랬다.’¹⁷⁾고 했다. 하지만, 결국 쇼브라더스의 두툼한 월급봉투에 이기지 못하고 장성을 떠났다. 섭일방은 장성을 떠난 것은 보수뿐만 아니라 장성이 단체작업으로 계속 회의만 하고 수 개월 동안 아무런 진척을 보이지 않는 것에 비해 쇼브라더스가 훨씬 자유로웠기 때

14) 전계(前掲) 「료일원 인터뷰(訪問廖一原)」, 12쪽

15) 전계(前掲) 「료일원 인터뷰(訪問廖一原)」, 10쪽

16) 1950년부터1970년대 홍콩영화의 냉전요소좌담회 주극 연설문

17) 주순자(朱順慈) 인터뷰, 세이(世怡) 정리 「섭일방(葉逸芳)」, 광정녕 편 『마등색채-1960년대로(摩登色彩——邁進1960年代)』 (홍콩: 홍콩영화자료관, 2008년), 210-211쪽.

문이라고 회고했다.¹⁸⁾

좌파영화사가 소외당하며 앉아서 죽기만을 앉아 기다렸다고 여겨서는 안 된다. 그들 또한 변통 조치들을 취했다. 예를 들어 홍콩 좌파영화사들은 다른 회사의 명의를 빌어 자신들의 영화사를 찍곤 했다. 또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진황매(陳荒煤) 북경중앙문화부 부부장의 격려 속에 독립제작사의 이름으로 중국내륙과 함께 당시 인기를 끌었던 희곡영화(戲曲電影)를 공동제작하여 그의 해외 영향력을 확대하고자 하였다. 예를 들어, 홍콩남방영업공사(香港南方影業公)는 번화영업공사(繁華影業公司)라는 이름으로 북경전영제편창(北京電影製片廠)과 경극『목계영 대전 홍주(穆桂英大戰洪州)』(1964년)를 공동제작하였다. 장성은 금성영업공사(金聲影業公司)라는 이름으로, 주강전영제편창(珠江電影製片廠)과 조극(潮劇)『려경기(荔鏡記)』(1961년)를, 상해해연전영제편창(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과는 월극(越劇)『홍루몽(紅樓夢)』(1962년)을 공동제작하였다. 또, 봉황(鳳凰)은 대봉영업공사(大鵬影業公司)라는 이름으로 북경전영제편창(北京電影製片廠)과 경극『임충 설야 섬구기(林冲雪夜殲仇記)』(1963년)를 공동제작하였다. 그리고, 신련(新聯)은 홍도영업공사(鴻圖影業公司)라는 이름으로 주강전영제편창(珠江電影製片廠)과 월극(粵劇)『채접쌍비(彩蝶雙飛)』(1959년)·한극(漢劇)『제왕구장(齊王求將)』(1963년) 및 경극(瓊劇)『홍엽제시(紅葉題詩)』(1962년)를 공동제작하였다.¹⁹⁾ 이런 독립제작사의 이름을 통해 중국내륙자본임을 숨긴 채 영화를 제작하는 방식으로는 단지 시장을 여는 작용 밖에는 할 수 없었는데, 최근 10년 까지, 은도기구(銀都機構 1983년 장성, 봉황, 신련의 합병으로 구성)가 아직 이 방법을 사용하고 있다.²⁰⁾

전체 좌파진영에서 홍콩좌파영화계의 지위는 어떻게 평가할 수 있을까? 영화계와 다른 좌파형제기관들과의 관계를 어떠했을까? 홍콩의 좌파진영으로는 은행, 노조, 학교, 기업, 신문사, 영화사 및 극장들을 포함하였으며, 모두 홍콩마카오업무위원회(香港澳門工作委員會)의 명령을 받았다. 홍콩마카오업무위원회는 당을 대표해 홍콩에 설립된 기구로써 성당위원회(省黨委)의 지위를 가지고 있으며, 서기(書記) 1인이 지도하며, 아래로는 몇 몇의 부서기와 여러 명의 위원을 두고, 상무위원회로 조합되어 모든 사업을 지도한다. 예를 들어, 학자들의 지적처럼 홍콩마카오업무위원회는 세 부분으로 구성되는데, 첫 번째 부분은 국가와 당의 행정인력을 포함한다. 예를 들어, 전인대(人大)과 정치협상대표(政協代表)이다. 두 번째 부분은 홍콩 현지에 세워진 좌파조직, 예를 들어 노조, 신문사, 영화사, 출판사 등이 있다. 세 번째 부분은 중국에서 홍콩에 파견한 조직으로, 은행, 기업, 상공업기관 등이 있다.²¹⁾ 하지만, 논자들은 좌파 영화사들은 소수 영화를 제외한 대부분 영화의 관람객수입이 저조하였기 때문에 전체좌파진영에서 중요한 역할을 맡지 못했으며, ‘좌파의 여러 전선에서 영화계가 가장 취약하고 영향력 없는 부분이라고 믿는다’²²⁾ 그렇지만, 장성의 전기(傳奇),

18) 위와 같음. 216-217쪽.

19) 허둔락(許敦樂) 「만발한 꽃, 가득한 봄빛(花開蕾放 滿園春色)——60년대 홍콩국산영화」, 『간광척영(墾光拓影)』, 83쪽, 조위방(趙衛防) 「중국내륙, 홍콩영화TV업 상호작용에 대한 이한상(李翰祥)의 영향」에서 황애령(黃愛玲)편 『풍화설월 이한상(風花雪月李翰祥)』의 기록(홍콩: 홍콩영화자료관, 2007년), 109쪽.

20) 장연(張燕) 「홍콩좌파영화사의 역사적인 변천」, 『영화예술』 2007년 제4기, 59-60쪽.

21) John P. Burns,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in Hong Kong,” in Asian Survey, Vol. 30, No. 8 (August 1990), pp. 757-760.

22) 용심(龍心) 저 『홍콩의 또 다른 정부』 (홍콩: 해산도서공사(海山圖書公司), 1986년), 63-66쪽.

석혜(石慧) 부부와 같은 개별적인 영화인들은 홍콩 76년 폭동에서 상당한 활약을 하여 투쟁위 위원이 되기도 했는데, 하지만 홍콩정부에 체포되었다. 80년대, 석혜는 전인대 대표가 되어 그녀의 새로운 정치생명을 시작하게 되었다.

III. 우파진영(右派陣營) : 홍콩구룡영화희극자유총회(港九電影戲劇自由總會)

냉전시대 전체적으로 홍콩영화계에서 가장 영향력을 크게 발휘한 대만조직은 ‘홍콩구룡영화희극자유총회(이하, ‘자유총회’로 약칭)일 것이다. ‘자유총회’는 1953년 2월 설립되었으며, 당시에는 ‘자유영화인협회(自由影人協會)라고 불리었다. 이 협회는 왕원룡(王元龍), 호진강(胡晉康), 도광계(屠光啟), 역문(易文), 주기(珠璣), 엄유상(嚴幼祥) 등 이 발의하였지만, 홍콩정부의 허가를 얻지는 못했다. 1955년, 광둥어영화기술인력으로 조직된 ‘홍콩구룡영화종사자자유총회(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工會)’에서 주석 광산소(鄺山笑)가 좌파진영으로 귀순하는 사건이 발생하자 홍콩국어영화인들이 큰 자극을 받아 너도 나도 좌파에 가입하였다. 또한 이듬해 다시 개편을 통해, 왕원룡이 주석을, 호진강, 백옥당(白玉堂)이 부주석을 맡아 ‘홍콩구룡영화희극종사자자유총회(港九影劇從業人員自由工會)’라고 이름을 바꾸었다. 1957년, 구룡폭동이 있을 후, 노동자 지도자 이미지를 씻기 위해, 총회는 또 ‘홍콩구룡영화희극사업자유총회’로 이름을 바꿈으로써, 한 노동단체가 직업단체로 전환되게 되었다.²³⁾ ‘자유총회’는 1953년 설립된 이후, 거의 매년 단체를 조직해 귀국위문공연을 갖거나 홍콩 내 국경일경축행사에 참가하였으며, 대북에서 열리는 총통취임식, 장개석 축수행사 및 금마장(金馬獎)에 참가하기도 하였는데 대북을 찾은 첫 해외영화단체로 대만정부의 높은 관심을 얻었다. 1956년, ‘자유총회’는 또 정부대륙구제총회의 홍콩달러 1만원을 받아 홍콩영화계 실업자 구제에 나섰다.²⁴⁾

1951년, 대만이 ‘비상동원시기 국산영화 처리방법(勘亂時期國產影片處理辦法)²⁵⁾을 공표하고, 중국의 영화사를 ‘공비에게 부역한(附匪)’ 회사라 부르며 과거 상영을 허가한 영화들에 대해 일률적인 상영금지조치를 내렸다. 홍콩은 그 독특한 정치적지위로 말미암아, 홍콩정부는 좌우파진영의 홍콩 내 활동을 용인하였으며, 홍콩영화계의 지지와 중국에 대한 반통일정책을 위해 ‘자유총회’는 홍콩영화인의 대만 방문책동을 책임지고 국민당정권의 중요사업을 지원하였다. 후 자유총회 주석을 맡은 바 있는 동월연(童月娟)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했다.

자유영화인들을 단결시켜 중화민국정책을 옹호한다는 취지를 가지고 창설된 자유총회는 대만 정부로부터 홍콩에서 제작 생산되는 영화를 심사토록 하는 중요한 임무를 교부받았다. …… 심사에는 여러 항목의 경비가 필요했기 때문에 우리들에게 있어서는 많은 경제적인 도움이 되었으며, 우리가 심사를 통과시키고 증명서를 발급해야만 대만에서 상영될 수 있었다.²⁶⁾

23) 좌가방(左桂芳) 『홍콩구룡영화희극사업총회(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창립과정과 변천』 (未刊稿), 3쪽

24) 좌가방(左桂芳) 『홍콩구룡영화희극사업총회(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연혁사』 (未刊稿), 1쪽

25) 이 법령은 1989년 5월에 폐지됨.

...’ 자유투항(投奔自由)은 어둠을 버리고 광명으로 향한다는 적극적인 의미를 가지고 있는데, 자유총회는 이를 북돋아주는 역할을 하였다. 다시 많은 홍콩좌파영화사(대다수 장성출신)가 좌파에서 벗어나고자 하는 의사가 있을 경우, 자유총회가 주동적으로 그들과 만나 권유를 하고 그들의 서한으로 입회를 신청하고 이를 다시 행정원 신문국에 전하여 통과되면, 그들은 바로 자유영화인이 될 수 있었다. 우리들은 조직력이 커서 영화를 찍을 수 있는 기회가 좌파사보다 훨씬 많아 그들을 포섭할 필요로 없이 자연히 많은 사람들이 우리 쪽으로 왔다. 예를 들어, 감독 진검(秦劍)·문일민(文逸民), 연기자 락제(樂蒂)·관산(關山)·교장(喬莊)·고원(高遠)·진사사(陳思思) 등이 모두 자유진영에서 잘 클 수 있었다.²⁷⁾

60년대 중국의 문화대혁명과 서방진영의 봉쇄로 홍콩의 국어(國語) 영화시장은 다른 활로를 모색해야만 했다. 홍콩의 좌파영화사가 찍은 영화도 중국에 진입할 수 없었기 때문에 ‘대만 요인(台灣因素)’의 영향이 점차 늘어나게 되었다. 좌우진영의 대립 환경 속에서 홍콩 영화인들은 계속 영화를 찍고 대만 시장을 지키기 위해, ‘자유총회’에 가입할 수 밖에 없었다. 90년대 중반 대만파에서 파견되어 『홍콩시보(香港時報)』를 접수한 정백신(丁伯駢)은 홍콩에서의 자유총회의 역할은 다음과 같이 기억했다. ‘.....대만과 사업을 하고 대만에서 영화를 찍기 위해서는, 자유총회의 가입은 필수적인 수속이었으며, 제작자이건 감독, 각본, 연기자이건 심지어 촬영, 조명, 무대에 종사하는 영화인들조차 자유총회에 가입하지 않은 경우에는 영화에 이름을 올릴 수 없었으며, 그렇지 않을 경우 그 영화는 심사에서 통과되지 못했고 원판 또한 수입할 수 없었다.’²⁸⁾ 정백신은 1979년 홍콩에서 홍콩구룡영화제작배급협회(港九電影製作發行協會)와 중국영화연합생산판매센터(中國影片聯合產銷中心)를 설립하여 대만영화사가 홍콩에 와서 영화업무를 처리한 바 있는데, 자유총회에 대한 그의 이해는 설득력을 가진다.

좌파영화사에서 우파진영으로 ‘전역(轉投)’한 영화인으로는 엄준(嚴俊), 이려화(李麗華), 임대(林黛), 락제(樂蒂), 문일민(文逸民), 장삼(張森), 호심령(胡心靈),²⁹⁾ 공추하(龔秋霞) 등이 있는데, 그 중 호심령과 공추하는 직접 대만행을 결정해 진정한 ‘자유투항’을 하였다. 대만 당국은 자유총회를 빌어 중국에 반통일전을 진행하였으며 홍콩영화인을 끌어들이고자 그들에게 많은 협조를 하였다. 정백신의 기억에 따르면, ‘.....그 시대 홍콩의 자유영화인은 정말 천혜의 환경을 누린 것이다. 귀국해 영화를 찍는 데 정부의 지도 뿐만 아니라 민간의 지원과 협력을 얻을 수 있어, 거의 돈 없이 맨손으로 ‘자유영화인’이라는 간판만 내걸고 대만에서 협력파트너만 찾으면 거의 모든 것이 끝나는 것이었다.....’³⁰⁾ 그런데, 여기서 말하는 ‘협력’과 관련된 한 에피소드가 있다. 대만영화사들은 협력이라는 명목이 있어야 필요한 사업상 목표를 이룰 수 있었는데, 홍콩의 자유총회가 바로 이를 위한 이용수단이 되었

26) 좌가방(左桂芳), 요립군(姚立群) 편 『동월연(童月娟) : 동월연 회고록 및 도서자료편람』 (대북 : 재단법인국가영화자료관, 2001년), 144쪽.

27) 좌가방(左桂芳), 요립군(姚立群) 편 『동월연(童月娟) : 동월연 회고록 및 도서자료편람』, 146-147쪽.

28) 정백신(丁伯駢) 『한 영화인의 기억』 (홍콩 : 아시아문화사업기구, 2000년), 481쪽.

29) 호심령은 대만에서 뜻을 굽히지 않았으며 어떤 발전도 이루지 못했다. 그는 이를 매우 괴로워했는데, 자신이 자유총회에 속았다고 느끼고 동월연에게 불만을 가졌다. 필자는 황인(黃仁) 선생님께서 이러한 실마리를 제공한 것을 감사히 여긴다.

30) 정백신 『한 영화인의 기억』, 195쪽.

다. 5,60년대 대만에서는 非관영 영화사가 정부로부터 원판수입신청허가를 받기가 매우 어려웠다. 이 때문에 대만영화사는 홍콩 ‘자유영화인’ 과의 협력을 이용하여 홍콩에서 원판을 가져오거나 또는 직접 홍콩으로가 가짜 영업등록허가증을 만들어 자유총회에 가입, 정식 ‘자유영화인’ 이 된 후 다시 대만으로 돌아와 정부에 원판수입을 신청하는 경우도 있었는데, 이렇게 하면 밀매시장에서 수입원판을 비싸게 살 필요가 없었다.³¹⁾

홍콩영화인에 대한 대만 당국의 지원은 사실이지만 그렇다고 무조건적인 것은 아니었다. 1953년 1월 행정 신문국이 홍콩에서 출판한 『신문천지(新聞天地)』에 실린 한 글에서는 홍콩영화인이 ‘중립’ 만 지켜서는 안되며 ‘반공(反共)’ 입장을 확실히 표명해야 한다고 재삼 경고하였다. 그 글에서는 ‘좌도 되고 우도 되고, 反공도 되고, 親공도 되는 소위 [중립]이 어찌 투기가 아니며, 어찌 양다리를 걸친 것이 아니란 말인가? 만약 대만에서 일할 수 없다면, 홍콩에서 명확한 반공정치입장을 표시하고 대만에 귀순하여야 할 것이다.’³²⁾ 자유총회의 정치적 역할이 상당히 뚜렷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70년 말 중국이 개혁개방의 시대에 접어들자, 자유총회는 홍콩좌파영화인들을 감찰, 포섭, 내란을 선동하는 역할을 했다. 1979년 1월 홍콩무선TV방송(香港無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이하 ‘TVB’ 으로 약칭)은 중국촬영프로그램 ‘환락금소:양성하세만가환(歡樂今宵:羊城賀歲萬家歡)’을 정식 공개하였는데, 가수 나문(羅文)·훈니(薰妮), 배우 하수신(何守信)·침전하(沈殿霞)·정소추(鄭少秋)·맥대성(麥大成)·노대위(盧大偉)·반반(斑斑)·진복생(陳復生) 등 29명의 연기가 대거 참여하였다. 대만에서의 성장에 영향을 피하기 위해 프로그램 촬영 시작 전, 그들은 모두 자유총회에 와서 ‘시말서’를 제출하였다.³³⁾ 흥미로운 점은 그들이 작성한 ‘시말서’에는 ‘북쪽행(北上)’이 스스로의 선택이 모두 아니라 시대 때문에 어쩔 수 없었다고 작성했다는 점이다. 그들은 여기에 더해 TVB와 그들 사이의 고용계약서 및 업무통보를 증거로 내놓았다. 또, 촬영팀과 배우를 따라 ‘북쪽행’을 한 TBV 고위관리층으로는 이사총경리 라중병(羅仲炳), 조리총경리 임사상(林賜祥), 제작부 집행경리 오혜평(吳慧萍)이 있다. 대만 여론의 압력 앞에 ‘시말서’ 한 부로 문제가 해결되지 않자 직접 대만 행정원 신문국에 해명을 간 사람도 많았는데, 그들에게 더 중요한 것은 ‘자유중국’에 충성한다는 입장을 표명하는 것이었다. 맥대성은 자신이 작성한 ‘시말서’³⁴⁾에서 다음과 같이 진술하였다.

삼가 아뢰니다.

본인 맥대성은 홍콩TVB 계약 배우입니다. 현재 ‘환희금소(歡喜今宵: 즐거운 오늘밤)’는 1979년 1월 29일 광주(廣州) 공연이 결정되었습니다. 본인이 이미 참가배정이 되었다는 소식을 접하고 최선을 다해 제외를 해 줄 것을 요청하고 ‘환희금소’ 고위책임자와 논의하였으나 본인이 이 프로그램의 계약배우로 이를 이행하여야 하며 회사의 휴가불허를 통보 받아 이번 공연에 참가하게 되었습니다. 이 때문에 본인은 이 시말서를 통해 본인의 이번 광주

31) 정백신 『한 영화인의 기억』, 194-195; 479-482쪽.

32) 문종한(文宗漢) 「대만은 어떤 각도로 홍콩영화인을 보는가」, 『신문천지(新聞天地)』 (홍콩) 제245기 (1953년1월), 9-10쪽.

33) 지금 남아있는 시말서로는 반반(斑斑), 나란(羅蘭), 정소추(鄭少秋), 훈니(薰妮), 맥대성(麥大成), 무건인(繆騫人) 총 여섯 부이다.

34) 사본은 홍콩영화자료관 홍콩자유영업총회파일에 보관됨.

공연은 스스로 원한 바가 아니며 이미 최선의 노력을 다하였으나 계약상의 제약으로 인해 방도가 없었음은 증명하는 바입니다. 마지막으로 본인은 저의 ‘반공애국’의 의지에 어떤 동요가 없음을 삼가 증명하는 바입니다. 삼가 문안 드립니다.

홍콩자유영업총회 담당자님(香港自由影業總會主事先生)

회원 맥대성 올림

중화민국 68년 1월 20일

1979년 6월 29일 『홍콩시보(香港時報)』는 이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이 보도하였다.

……맥대성은 오늘 행정원신문국에서 전영사업처(電影事業處) 장탁민(蔣倬民) 처장을 만났다. 맥대성은 올 춘절기간 TVB와의 계약 때문에 중공지역으로 가 ‘양성하세만가환(羊城賀歲萬家歡)’ 프로그램을 제작하였으며, 홍콩으로 돌아온 후 귀국하여 그 충절을 표명하는 데 노력하여 결국 만족스런 결과를 얻었다.

맥대성이 왜 대만으로 가 해명을 하여야 했을까? 그가 걱정한 것은 물론 대만 당국의 반응이었다. 앞의 시말서에도 나와 있듯, 만약 대만에 대한 ‘충절’을 표명하지 않는다면 대만시장에서 차단당할 것이며 다시 대만에 올 기회를 잃을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하지만, TVB의 또 다른 연예인 무건인(繆騫人)은 예외였다. 그녀는 맥대성과 마찬가지로 광주 공연에 참가하긴 했지만, 대만으로 가 관련당국에 해명하는 것을 거절함으로써 대만 언론의 논쟁을 불러일으켰으며,³⁵⁾ 심지어 홍콩의 자유총회 또한 ‘……자유총회에 가입한 이는 비록 좌파이지만 우파로 변했으며, 자유총회에 가입한 우파는 또 언제든지 좌파로 변할 수 있다. 이것이 진정한 명실상부의 자유일 수 있다.’³⁶⁾는 풍자에 연루되기도 했다. 자유총회의 주석을 역임했던 라빈(羅斌)은 1997년 홍콩영화계서의 총회의 역할을 회고하며 다음과 같은 평가를 내렸다.

당시 자유총회는 배우들의 자유총회가입여부 감찰을 책임졌다. 자유총회에만 가입하면 그들이 찍은 영화는 대만으로 팔려갈 수 있었다. 이렇게 하는 것은 좌파배우는 막기 위 위한 것이며, 정치문제에 혹시 연루되는 것을 막기 위함이었다. 왜냐하면 당시 좌, 우 양파의 벽은 분명했기 때문이다.…… 자유총회의 회원으로 가입한다고 해서 특별한 손해를 보는 것도 아닌 데 왜 가입을 마다 하겠는가? 가입만 하면 당신의 영화를 팔 수 있지만, 가입하지 않을 경우에는 영화도 팔 수가 없고 생활을 할 수가 없게 된다. 모두 생계 때문일 뿐이며 정치에 대해서는 이해할 필요가 없다.³⁷⁾

북쪽행이 자원이 아니었지만, 계약서 한 부는 ‘반공애국’의 족쇄가 되었다. 맥대성이 한 말처럼 책임은 TVB에 있는 것이다. 그렇다면, TVB는 중국과의 관계 발전을 어떻게 추진하였을까? 80년대 초 이후 홍콩 신화사 사장으로 임명된 허가둔(許家屯)은 그의 회고록에서

35) 「애매모호한 무건인의 태도, 정부는 직접방문을 통한 입장표명 견지하여야」, 『만인일보(萬人日報)』(홍콩)1979년 2월 21일.

36) 한인설(寒江雪) 「미해명, 선해금(未解釋而先解禁)」, 『만인일보』(홍콩)1979년 4월 21일.

37) 주순자(朱順慈)방문, 남천운(藍天雲) 정리 「라빈(羅斌)」, 관정녕(靜寧編) 편 『모던색채——960년대로』, 123페이지.

소일부(邵逸夫)에 대해 아래와 같이 기술하였다.

홍콩 친대만 인사와의 관계에서 첫 번째 새로운 돌파구를 찾은 인물이 유명한 영화계 거두인 소일부이다.

홍콩 TVB는 부총경리가 나서 신화사 지점의 선전부장 양기(楊奇)와 접촉하며 방송국 견학을 초청하였으며 나는 바로 이를 받아들였다.……과거 중공과 일정한 거리를 두며 공공장소에서만 신화사 지점 인력들과 일발적인 접촉만 가졌는데, 이번처럼 주도적으로 우리에게 접근한 적은 없었다.³⁸⁾

허가둔의 기억에 따르면, 이후 신화사는 가교역할을 맡아 여러 차례 소일부의 중국방문에 협조했다. 그런데, 중국과 소일부의 관계는 이러한 방문, 견학과 거액 성금으로 인해 점점 강화되었다.³⁹⁾

대만의 對홍콩 정책이 시종 불변한 것은 아니며, ‘해금’ 뿐만 아니라 홍콩을 통한 중국과의 교류를 희망하기도 했다. 강봉기(江奉琪)는 대북에서 열린 13차 전국영화회의 4차 회의에 참가해 홍콩영화의 2대 특징을 개괄하였는데, 하나는 무술영화와 통속영화가 많다는 점이고 또 하나는 대만이 홍콩영화를 통해 중국 대륙에 접근하고 쉽게 교류할 수 있게 되었다는 점이다.⁴⁰⁾ 홍콩 그 특유의 중개작용이 또 다시 의제로 떠올랐다.

IV. 좌우진영 사이의 홍콩영화인

무엇이 ‘좌파(左派)’⁴¹⁾, 우파(右派)인가? 정권에 대한 정체성 외에 무엇으로 이를 정의 내려야 할까?

홍콩영화계의 ‘좌파’ 는 또 어떤 특징을 가지는가? 과거 ‘좌파’ 로 분류되었던 홍콩영화인은 그들의 대담 인터뷰나 회고록에서 대부분 이러한 꼬리표를 인정하지 않았다는 점을 말할 필요가 있다. 그들은 영화예술, 정치이념, 시국과 개인상황 등에 있어 확연히 분류되는 견해를 가지고 있다. 아래의 표1에서는 ‘좌파’ , ‘우파’ 분류에 대한 홍콩유명영화인 8명의 견해

38) 허가둔(許家屯) 『허가둔 홍콩 회고록(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하(대북: 연합보, 1983년), 332페이지.

39) 허가둔(許家屯) 『허가둔 홍콩 회고록(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하, 332-335페이지.

40) 진준철(陳俊哲) 편 『전국영화회의 녹취, 중화민국 81년 12월 7일~8일』 (대북: 행정원신문국, 1993년), 176-181페이지.

41) 증옥성(曾鈺成)은 홍콩 ‘좌파’ 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이 묘사하였다. 이들 북경 지지자는 홍콩과 중국대륙에서 발생하는 일에 대해 자신의 견해를 가지고 있었으며, 자신의 언어로 이런 사건을 형용하였다. 이 울타리 밖의 사람들은 울타리 안의 사람은 ‘좌파’ 라고 부름으로써 그들과 중국공산당정부와의 관계를 표했다. ……이러한 사람들은 애국신문을 읽고 극장에 가서 애국영화를 보고 중국제품만 파는 애국상점에 가 물건을 사고 애국노조에 참여하였으며 더 나아가 자녀를 애국학교에 보냈다. ……그들과 중국대륙과의 밀접한 관계로 인해 그들은 북경 정부의 결점과 착오를 더 잘 인식하고 심지어 그 피해를 직접 보기도 했다. 하지만 그들은 이러한 비평을 자신들의 울타리 안에서 이루어지도록 제한했다. 선전전이 진해오디고 있었기 때문에 중화인민공화국을 공격하는 사람이 있을 때 마다 이들 충성심을 가진 이들은 중국을 변호할 책임이 있다고 느꼈다. 그것이 좋건 나쁘건 간에 그들은 항상 조국의 편에 섰다.」 見氏著『증옥성직언집(曾鈺成直言集)』 (홍콩: 천지도서(天地圖書), 1995년), 159-160쪽.

를 나열하였다. 그들 모두 좌파, 우파의 명칭과 구분은 모두 상대적인 것이라고 보았다. 료일원(廖一原)은 상대편을 무슨 파라고 말할 뿐 자신이 무슨 파라고는 말한 적은 없다. 소방방(蕭芳芳)의 경우는 흥미롭다. 그녀는 자신이 어떻게 좌우 진영에 발을 들여놓았는가조차도 잘 몰랐다. 먼저 장성과 계약을 하고 그 후에 대만으로 가서 ‘자유투항’ 의사(義士)가 되었는데, 그녀의 어머니가 결정을 했을 가능성이 크다. 장철(張徹), 료일원(廖一原), 로돈(盧敦)은 영화를 찍는 것은 비즈니스와 예술이며, 좌우파의 구별과는 관계없다고 말했다.

좌파와 우파의 가장 같은 점은 그 배후에 모두 정권의 지원이 있다는 점이다. 상대편에 대한 최대의 위협이라면, 예를 들어 좌파진영에 있어서는 대만 시장을 잃어버리는 것이다. 하지만, 모든 것은 구제가 가능하다. 시말서로 해명만 한번 하면 된다. 주극(朱克)은 국태(國泰)가 그에게 손을 내민 적이 있었지만, 그가 시말서를 쓰려 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일이 성사되지 않았다는 말을 하였다. 좌파와 우파의 다른 점은 중국과의 밀접한 관계에 있다. 문혁이 발발했을 때 홍콩 역시 그 ‘불통(禍延)’ 이 튀었다. 침감야(沈鑒治)의 말처럼, 중국에 가까이 있던 홍콩의 영화제작이 거의 완전히 멈춰 섰다. 하지만, 하몽이 말한 ‘좌의 몰락과 우의 상승(左落右上)’ 의 경우처럼, 대만영화계는 이 기회를 틈타 큰 성장을 거두었다. 대부분의 영화인이 모두 ‘좌파’, ‘우파’ 는 정치적인 꼬리표일 뿐 영화예술과는 관계없다고 보았다. 로돈은 ‘붉은 것’ 은 싫다고 했는데 번거로움에 휘말리기 쉽기 때문이었다. 홍콩정부는 좌파와 우파의 불협화음의 최대 수혜자가 되었다. 주홍(朱虹)은 홍콩정부는 좌파를 이용해 우파를 치거나 좌파를 이용해 우파를 치곤 했다고 말했다.

표 1: 좌파에 대한 홍콩영화계의 생각

장철 (張徹)	나는 좌파에 인용표시를 더해 ‘소위좌파(所謂左派)’ 라는 의미를 쓴다. 원앙안(袁仰安)이 접수해 새로 만든 ‘신장성(新長城)’, 그 후의 ‘봉황(鳳凰)’ 등은 습관적으로 ‘좌파회사(左派公司)’ 로 불리며, ‘자유영화인협회(自由影人總會)’ 아래의 소위 ‘우파회사(右派公司)’ 를 상대한다. 사실, 그들은 어떤 이데올로기의 ‘좌’, ‘우’ 구분을 가지지는 않는다. 기본적으로 모두 상업용 영화를 제작할 뿐이다. 다만, ‘좌파’ 는 약간의 자금 지원에 있어 중국과 상당한 연계성을 가진다. 나 같은 이런 ‘외부인(外人)’ 이 보았을 때 이러한 연계성은 긴밀하지 않았으며, 자금상황은 오히려 싱가포르의 케세이(電懋)와 비슷했고, 넉넉하지 않을 것처럼 보였다. ⁴²⁾
침감치 (沈鑒治)	60년대 중반 이전 홍콩영화계는 ‘좌’, ‘우’ 의 양대 분할이라고 말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중국의 문화대혁명은 모든 것을 바꾸어놓았다. 홍콩의 중공지도자들은 국내극좌노선을 맹종하였으며, ‘좌파’ 영화에 불통이 튀어, 영화제작은 이로 인해 거의 중단에 이르렀다. ⁴³⁾
소방방 (蕭芳芳)	당시 좌,우파는 별로 구분되지 않았다. 다만 10월 1일 중공국경일이면 나는 경축공연을 가야만 했다. 엄마가 ‘와! 공산당노래를 부르네!’ 라고 한 것이 기억난다. 후에 좌파 우파의 구분이 매우 심해졌을 때 대만에서 영화를 찍게 되었는데, 어머니가 ‘시말서’ 를 쓰고야 넘어갈 수 있었다. 당시 나는 너무 어려서 아무것도 몰랐으며, 대북공항에서 장소연(張小燕)이라는 여자아이가 공항에 마중을 나왔는데, 난 누구와 놀 수 있다는 사실에 너무 기뻐했다. 대북에서 본 신문에 난 기사가 이상해 어머니에게 ‘내가 왜 [자유투항]으로 변한 거예요? [자유투항]이 뭐예요?’ 라고 물어봤었다. 엄마는 애들은 상관 말라고 하셨다. ⁴⁴⁾

료일원 (廖一原)	……그는 좌파이다. 하지만, 그들도 자신이 우파라고 말하지 않았다. 좌파는 공산당을 따라 가는 것이다. 그때, 대만은 5,60만 명이었고, 홍콩시장은 3,4만 명이었기 때문에 쇼브라더스와 케세이 등 많은 영화사가 그 시장을 위해서……하지만 친구라는 터놓고 지낸다.……당신이 나에게 좌우파라는 것을 묻는데, 우리 자신은 그런 개념이 없이 다만 영화예술을 할 뿐이다. 하지만, 남들이 하나까, 시장을 통해, 재차 이런 수단을 통해, 이리화가 자유투항 하였고, 열 명을 보낼 때까지 사력을 다해 압제를 하였다.…… ⁴⁵⁾
로돈 (盧敦)	당시 우리는 좌파로 여겨졌다. 중련(中聯), 화교(華僑) 또한 우리와 연락을 취했다. 모두 우리가 이끌고 했다고 말할 수도 있는데, 다만 앞에 나서서 하지 않았을 뿐이다. ‘빨강계(紅)’ 되면 불편해진다. 신련이 자주 압박을 당하는 것처럼 말이다. 하지만, 이전 광주에서는 혁명사상의 영향을 받아, 문예란 정치를 위해 일해야 하며 문인은 정치를 떠날 수 없다고 여겼었다. ⁴⁶⁾
하몽 (夏夢)	난 홍콩의 좌파가 너무 좌익이라고 본다. 왜냐하면 국내에서 홍콩으로 보낸 원앙안(袁仰安)이 좌가 아닌가! 예전의 좌파는 정정당당(正派)했다. 내가 싸인한 첫 번째 계약서에서는 어떤 파티에도 참여할 필요가 없다고 써있었다. 그 시대 영화스타는 사람들과 식사를 해야만 하는 것 같았다. 우리의 ‘좌파회사’는 정정당당했다. 그런 것도 없었다. 그런데 문혁시대에는 좋지 않았다.……우리 ‘좌파회사’들에게 문혁의 타격은 너무 컸다.……문혁이 시작하자마자 대만영화가 고개를 들었다. ⁴⁷⁾
주극 (朱克)	……바로 1958년 장성을 떠난 것이 일이다. 나는 비당원이었지만 공산당을 매우 존중했다.……국태에서 어떤 사람이 날 찾아와 월급 1800원을 제시했다. 괜찮은 편이었지만 그들은 나에게 시말서를 쓰고 내가 과거 잘못을 했으며 지금 광명의 길을 걷고 있다고 쓰라고 했다. 난 거절했다. ⁴⁸⁾
주홍 (朱虹)	……그때 우리는 애국을 위해 많은 것을 희생하였다. 당시 홍콩정부는 균형을 찾으려 했는데, 대만의 그 세력이 고개를 들자 좌파를 들어 대만을 쳤다. 좌파세력이 강해지자 그들은 또 좌파를 압박했다. ……우리는 중화인민공화국이 우리의 조국임을 인정했을 뿐인데 이 한가지 때문에 ‘좌파’로 불렸다. ⁴⁹⁾

홍콩의 여러 영화인 중, 소방방과 이한상을 보면 그들이 어떻게 좌우 양 진영 사이에서 왔다갔다했는지 잘 알 수 있다. 소방방은 어릴 때 이 일을 하며 자기도 모르게 좌우 두 진영에 발을 들여 놓았으며, 1958년 그가 정식으로 자유총회에 가입하며 대만에 직접 갔을 때에 비로서 자신이 ‘자유투항’ 했다는 것을 자각했다. 1955년, 장성, 중련, 남교(南僑)를 위해 5편의 영화를 찍었다. 1956년은 쇼브라더스를 위해 『매고(梅姑)』를 찍었지만, 이와 동시에 장성을 위해서도 『홍안겁(紅顏劫)』과 『매괴암(玫瑰岩)』을 찍었다. 하지만 1958년 이후 좌파영화사를 대신한 작업을 중단하였다. 이러한 과거에 대해 소방방은 아래와 같이 기억했다.

42) 장철(張徹) 저 『홍콩영화 30년을 돌아보며(回顧香港電影三十年)』 (홍콩: 삼련서점(三聯書店), 1989년), 23-24쪽.

43) 전개(前掲) 『이상시대: 장성, 봉황의 날(理想時代: 長城, 鳳凰的日子)』, 278쪽.

44) 초웅병(焦雄屏) 「40년 전기의 길——소방방 특별인터뷰」, 초웅병 편저 『홍콩영화전기: 소방방과 40년 영화풍운』 (대북: 만상도서(萬象圖書), 1995년), 148쪽.

45) 전개(前掲) 「료일원 인터뷰(訪問廖一原)」, 10, 12쪽.

46) 광정녕(郭靜寧) 撰錄 「로돈(盧敦): 나의 그 시대의 영화(我那時代的影戲)」, 광정녕 편 『남쪽에서 홍콩으로(南來香港)』 (홍콩: 홍콩영화자료관2000년), 132쪽.

47) 전개(前掲) 『이상시대: 장성, 봉황의 날(時代: 長城, 鳳凰的日子)』, 127쪽.

48) 전개(前掲) 『이상시대: 장성, 봉황의 날』, 181-182쪽.

49) 전개(前掲) 『이상시대: 장성, 봉황의 날』, 229쪽.

(1956년) 『매고(梅姑)』를 찍고 난 장성의 기본배우가 되었다. 엄마 말이 기본배우가 되면 월급을 받고 생활이 안정된다고 했는데, 당시 ‘쇼브라더스’와 ‘케세이’(소위 우파회사)는 나와 계약에 흥미가 없었다.⁵⁰⁾

동월연(童月娟)은 소방방이 어렸을 때 자기도 모르게 좌파진영에 발을 들여놓은 것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은 논평하였다.

계약 당시 어른은 아니지만 어린 나이도 아니었던 소방방은 일찍이 1954년 겨우 일곱 살에 이미 영화를 찍었고 좌파 장성 밑의 아역스타였다. 9살 때에 쇼브라더스의 ‘매고’를 찍어 제2회 동남아영화제(아시아영화제와 아태영화제의 전신)의 최고아역배우상을 받았다. 또 주서화(朱旭華)가 주재하는 국풍(國風)의 영화 『고아유랑기(苦兒流浪記)』를 찍어 홍콩 국어 및 광둥어 영화의 유명아역배우가 되기 시작했다.……후에 그녀는 60, 70년대 광둥어 영화계에서 진보주(陳寶珠)와 이름을 나란히 하는 인기스타가 되었다.⁵¹⁾

위의 동월연(童月娟)의 논평은 좌파영화사들을 비난하는 듯한 느낌이 있다. 만약 소방방이 장성을 떠나지 않았다면 그 후에 성장하지 못했을 것이라는 뜻이다.

하지만, 좌파와 우파간에는 경쟁도 있었지만 협력도 있었으며, 경계가 분명해 절대 왕래를 하지 않는 것은 아니었다. 당시 홍콩에서 우파로 여겨졌던 영화사는 중국영화의 최신발전을 알기 위해 몰래 좌파영화사에 가 영화를 보았고, 뿐만 아니라 우파영화사가 찍은 영화도 좌파영화사의 루트를 통해 중국으로 유통될 수 있었다. 허둔락(許敦樂)의 말에 따르면, 호금전(胡金銓)과 이한상(李翰祥)과 같은 감독들은 자주 그를 통해 중국 신작을 감상했는데, ‘……그래서 남방시사실에 와 테스트작을 보는 것이 비밀스러운 행동으로 변했다.……또, 홍콩영국영화검열처에서 상영금지처분을 내린 ‘비밀작(秘片)’이 그들 몇의 특별한 관심을 끌었다.……소(邵) 사장은 중국 대륙영화를 보러 오는 것을 즐겼는데 모두 남방에 제공하였다. 그런데 쇼브라더스가 출품한 영화 또한 우리의 손을 빌어 북경으로 전해져 중국 지도자들이 관람했다.……’⁵²⁾

이한상은 당시 중국으로 돌아가 영화를 찍게 된 과정을 회고하며 그를 도운 두 사람을 떠올렸는데, 그 둘은 바로 료승지(廖承志)와 하현(何賢)이다.

……그 후에야 왜 모두 나에게 돌아와 영화를 찍으라고 했는지 알게 되었다. 난 료승지의 생각, 즉 당시 홍콩, 대만영화인에 대한 통일전이었다고 생각한다. 홍콩영화인들이 돌아와 영화를 찍기를 바랬고 내가 선두전을 치루기를 바랬다. 왜냐하면 내가 과거에 그런 일을 해 본 적이 있기 때문이다. 나는 홍콩의 일부 영화사직원들을 대만으로 데리고 간 적이 있는데 그래서 나는 그들은 내가 중국으로 영화를 찍으러 가 양안의 경색을 풀기를 희망했다는 것을 안다. ……나는 일생 동안 하선생님(何賢)께 감사를 드린다. 그가 나의 삶을 바

50) 초웅병(焦雄屏) 「40년 전기의 길——소방방 특별인터뷰」, 148쪽.

51) 좌가방(左桂芳), 요립군 편 『동월연: 동월연 회고록 및 도서자료편람(童月娟: 童月娟回憶錄暨圖書資料彙編)』, 127쪽.

52) 허둔락(許敦樂) 「회고(憶舊)」, 황애령(黃愛玲) 편 『풍화설월 이한상(風花雪月李翰祥)』, 222-223쪽.

꾸어 높았다고 말할 수 있다. 또한 료승지에게 감사를 드린다. 그는 내가 중국으로 돌아가 『불타는 원명원(火燒圓明園)』, 『수렴청정(垂簾聽政)』 두 편을 찍게 했다.⁵³⁾

여기서 말하는 ‘그런 일’ 중 한가지는 1966년 그가 대만에 있을 때 로돈이 비룡공사(飛龍公司)에서 일하던 오수방(伍秀芳)을 데리고 대만에 가는 것을 도운 것이다. 이한상이 도움의 손길을 뻗은 데에는 오수방의 재능을 높이 보아 그녀가 국련공사(國聯公司)의 영화를 찍을 만 하다고 보았기 때문이기도 하다. 오수방이 급히 대만에 간 것은 국련에 힘을 다하겠다는 것 외에는 다른 원인을 찾을 수 없었다. 하지만, 오수방이 자유총회 주석 호진강(胡晉康)을 통해 ‘반공의사(反共義士)’라는 이름으로 대만행 수속을 서둘렀으며 대북에서 관련 인사의 환영을 받았다는 것은 확실하다.⁵⁴⁾

이한상의 일생을 살펴보면 여러 차례의 진영 변화를 겪었다. 먼저, 1949년 전 상해에서 홍콩으로 도망 와 장성에 가입하였다. 그 다음으로는 장성을 떠나 쇼브라더스에 가입하였다. 셋째, 1963년 국태(國泰)의 초빙을 받고 쇼브라더스를 떠나 대만에서 국련영업공사(國聯影業有限公司)를 조직하였다. 국련 설립 이후, 쇼브라더스와 정면 대결을 펼치며, 같은 소재의 영화 『칠선녀(七仙女)』(1964)를 찍었다.⁵⁵⁾ 하지만, 대만에서의 성장은 순탄하지 않았다. 그 본인의 말에 따르면, ‘내가 대만에서 조직한 [홍콩국련영화공사 야외촬영팀]은 돈을 굴릴 줄 잘 몰랐고 싱가포르의 국태와 대만의 연방이 계약대로 결제를 해주지 않아 회사의 상황이 점점 나빠졌다. 결국 향강(香江)으로 돌아가 쇼브라더스에 다시 가입할 수 밖에 없었다.’⁵⁶⁾ 그는 당시 대만을 떠나려 했지만 여러 어려움으로 결국 신작 『제영(緹縈)』(1971년)의 동경 더빙 기회를 이용하여 홍콩으로 돌아왔다.⁵⁷⁾ 다큐멘터리 신작 『제영』은 공산사상을 가졌다고 고발당하였으며, ‘공비를 위해 눈을 떴다’는 혐의를 받았으며, 그 본인이 중국대륙과 남에게는 알릴 수 없는 비밀관계가 있었기 때문에 여러 차례 출국 신청에도 허가를 받지 못했다. 넷째, 1978년 10월, 그가 홍콩에서 북경으로 날아와 국무원 교포사무관공실(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주임인 료승지(廖承志)를 만났다. 수년 후, 홍콩의 거부 하현(何賢)의 자금지원으로 신곤륜영업공사(新崑崙影業公司)를 설립하고, 『불타는 원명원(火燒圓明園)』(1983), 『수렴청정(垂簾聽政)』(1983), 『화룡(火龍)』(1986) 등의 영화를 찍어 인기를 얻었다. 하지만, 당시 대만은 아직 해금을 하지 않았다. 자유총회회원으로서의 처벌로 그 본인의 입국불허뿐만 아니라 그가 찍은 영화도 대만에서 상영될 수 없었다.

이한상은 영화사를 바꾸며 북경과 대만 사이를 오가면서 대가를 치르지 않았던 것은 아니다. 그는 쇼브라더스에서 국련으로, 다시 국련에서 쇼브라더스로 옮기며 법정소송을 겪었으며, 쇼브라더스와 연방에게 각각 계약위반으로 고발되었으나 다행히 결국 도망칠 수 있었다.⁵⁸⁾ 하지만 만약 이한상이 북경에 오지 않았다면 그의 사업은 또 다른 전성기를 맞볼 수

53) 람천운(藍天雲) 「이한상 李翰祥大擺龍門陣」, 황애령(黃愛玲) 편 『풍화설월 이한상(風花雪月李翰祥)』, 134·136쪽.

54) 이한상(李翰祥) 저 『영성내외(影城內外)』(홍콩: 천지도서(天地圖書), 1997년), 60쪽.

55) 이한상(李翰祥) 저 『은해천추(銀海千秋)』(홍콩: 천지도서, 1997년), 201쪽.

56) 이한상(李翰祥) 저 『은해천추(銀海千秋)』, 253.

57) 이한상(李翰祥) 저 『은해천추(銀海千秋)』, 204-205쪽.

58) 사영봉(沙榮峰) 『사영봉 회고록 및 도서자료편람(沙榮峰回憶錄暨圖書資料彙編)』(대북: 재단법인 국가

없었을 것이다. 또 다른 각도로 보면, 그가 좌우진영 사이를 오갔기 때문에 그가 찍은 영화가 각각 다른 스타일을 가질 수 있었다.⁵⁹⁾ 만약 좌우진영 사이를 오가지 않았다면 중국, 홍콩, 대만 세 곳에서 그의 스타일이 널리 알려질 수 없었을 것이다. 학자들은 그가 대만 국련에 있을 당시의 스타제도 폐지와 중국영화 ‘트러스트’ 출연 제지에 높은 평가를 하고 있다.⁶⁰⁾

V. 끝맺음

냉전시대 영화는 홍콩인에게 있어 오락일 뿐만 아니라 문화, 정치였다. 무엇이 우파이고, 무엇이 좌파인가? 대부분의 홍콩영화인에게 있어 이는 큰 의미가 없다. 좌파에서 우파로, 우파에서 좌파로, 문제가 발생하였을 때 이렇게 두 진영을 오가는 것은 하나의 문제해결 방법이었다. 이 때문에 영화인들은 서로 다른 영화사를 오고 가고 또 좌우파 사이를 오갔다. 영화는 문화예술이지만 냉전시대의 양안정권에게 있어서 영화는 정권을 공고히 하는 한 조치이며, 홍콩은 서로 차지하려는 대상이 되었다는 것은 부인할 수 없는 사실이다. 좌파라는 말을 우파가 가장 먼저 사용했다고 말하는 사람이 있는데, 필자는 이런 꼬리표가 일반적으로 상대방진영에서 시작되었다는데 동의한다. 하지만, 정치적인 각도에서 보았을 때 좌파는 애국애당(愛國愛黨)을 강조하였고, 우파는 자유와 반공을 표방하는 등 모두 자신만의 논리를 가지고 있었다.

크게 볼 때, 홍콩영화는 냉전시기 여러 차례의 시련을 겪었지만 그의 성장을 막지는 못했으며 이와 반대로 한 시대에서 또 다른 시대로 과도를 성공적으로 이루었다. 냉전시대 전체를 놓고 보면, 연구가들이 지적한 것처럼 홍콩영화에서는 싱가포르·말레이시아세력, 중원(중국)세력 및 홍콩본토세력이 서로 대립하였다. 그러나, 홍콩영화는 어쨌든 외부요인의 영향을 받았고, 그 식민지 사회의 운영 속에 싱가포르, 말레이시아, 중국을 포함한 외부의 영향을 섭취하며 성장해왔다.⁶¹⁾ 문혁 이전에는 중국영화와 장성, 봉황, 신련이 찍은 영화가 홍콩과 동남아시아에서 강세를 보였지만, 문혁 이후에는 상황을 역전되었다. 이는 쇼브라더스의 독주를 초래하였고 결국 쇼브라더스는 전체 해외 중국인시장을 재패하였다.⁶²⁾ 중국대륙이 대외적으로 폐쇄되었을 때 홍콩의 영화인은 밖으로의 시장개척에 나설 수 밖에 없었고 이에 대만은 자연이 가장 이상적인 목표가 되었다. 하지만, 중국의 개혁개방 실시로 중국의 넓은 시장이 기존 대만시장의 매력을 상쇄함에 따라 그들과 대만의 관계 또한 점점 멀어지게 되었다. 이 점은 좌우 끌어안기를 통해 현실에 충실하고자 하는 홍콩인의 심리는 잘 반영한다.

영화자료관(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2006년), 91-100쪽.

59) 섬월유(葉月瑜) 「쇼브라더스에서 국련까지－황매조 영화의 현지화(從邵氏到國聯——黃梅調影片的在地化)」, 황애령(黃愛玲) 편 『풍화설월 이한상(風花雪月李翰祥)』, 98-107쪽.

60) 정수림(鄭樹森) 「1997년 해협 양안간 홍콩의 문화적 중개(一九九七前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中介)」, 『종목전성－정수림 자서집(縱目傳聲——鄭樹森自選集)』 (홍콩: 천지도서(天地圖書), 2004년), 91-92쪽.

61) 나잡(羅卡) 「5,60년대 홍콩 영화의 과도(五、六十年代看香港電影的過渡)」, 초웅병(焦雄屏) 편저 『홍콩영화전기: 소방방과 40년 영화인생(香港電影傳奇: 蕭芳芳和四十年電影風雲)』, 172-173, 194쪽.

62) 허돈락(許敦樂) 「신리일성 풍운만루－‘문혁’ 시기 국산영화개황(迅雷一聲 風雨滿樓——「文革」期間的國產電影概況)」, 『간광척영(壘光拓影)』, 91-92쪽.

【Abstract】

To Compete and also Cooperate: The Hong Kong Filmmakers Caught between the Left-Right Struggle during the Cold War

Lee Pui-tak

Introduction

The film industry is like any other industries, competition existed since from the industry commenced business. The film industry of Hong Kong had closely related with China since the 1930s when a large group of Shanghai film talents cam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inherited not only the talents but also the left-wing thoughts from Shanghai.

Hong Kong was a British colony since the 1840s, Chinese in Hong Kong were used to learn how to cooperate with the British on one hand, 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regime in the mainland on the other. The term ‘Chinese politics’ had been regarded as ‘middle-men politics’, for Hong Kong Chinese to manipulate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established its regime in 1949 and the Nationalist Party (KMT) moved to Taiwan, the ‘Chinese politics’ in Hong Kong made drastic changes. Chinese in Hong Kong confronted with a new political challenge after several years of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for they had to choose between the CCP and KMT. Started from the year of 1952 when the left-wing film people were deported from Hong Kong to the year of 1989 when Taiwan abolished the martial law, the disturbance created b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left-wing and the right-wing, had lasted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It is interesting to be mention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uccess of Hong Kong films in the 1980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ree decades before the 1980s. Whatever in terms of talent, technology, capital and other aspects,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dustry was laid in the period of 1950s-1970s. Anyway, during this period, Hong Kong had been an important venue for the CCP and KMT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What is left-wing and what is right-wing? How the Hong Kong filmmakers reacted to this ‘political label’,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 pursue. The left-wing competed with the right-wing in soliciting support not only from the local society, but also from the international wid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t is used to say *shangyou zhengce xiayou duice* (when the higher authorities have policies, the localities will have counter-measures), so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ask a question of how Hong Kong Chinese reacted to the dilemma of going-between the KMT and CCP particularly they were confronted with an united-front (from CCP) and anti-united front (from KMT) tactics. This paper is to shed light on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both the KMT and CCP when they competed to each other in the colonial Hong Kong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he Left-wing Camp: Changcheng, Fenghuan and Xinlian

‘Enforce the Nanguo, develop the Changcheng, penetrate into the Nanyang, ally with the Daguan and freeze the Yonghua’ had once been the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left-wing camp to get a foothold in the local film industry. However, before it was fulfill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tarted to take actions in deportation. Between 1949-1952, the left-wing supporters who had been deport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largely came from the local film circle, the most representing ones included Sima Wenshen, Liu Qiong, Shu Shi, Qi Wenshao, Yang Hua, Ma Guoliang, Shen Ji, Di Fan, Bai Chen, and Jiang Wei. As recollected by Liu Yiyuan who founded the Xinlian Studio Company, the tactic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ver the left-wing was to suppress but not vanish, to use but not without conditions. As Liu put it, “The British used the left-wing to fight with the right-wing, however, when the situation in the mainland favoured the left-wing and threatened their rule in Hong Kong. Then the British took actions against the left-wing.”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film censorship in Hong Kong, any scenes abou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uch as national flag, national song, government leaders, an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ill all be definitely banned.

In Hong Kong’s film industry, the left-wing camp constituted by the several film companies including the Changcheng, Fenghuan, Xinlian, and the agent of USSR and PRC film the Nanfang which also operated a group of cinemas. It is interesting to ask how the film group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the other brother groups of the left-wing camp? There were evidences to indicate the left-wing groups helped each other. Say for example, a prominent wealthy merchant He Xian helped the left-wing to buy theatres for twice. First to set up the Fengnian Entertainment Co. Ltd. to buy the Puqing Theatre in Kowloon. Second the set up the Fengshun Entertainment Co. Ltd. to buy the Gaosheng Theatre in Hong Kong Island. He himself served as the CEO of both the companies. Except H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lso included other local Chinese merchants such as Sun Zhangcheng, the CEO of the Zhongqiao National Products Co., Ni Shaoqiang, a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and Yuan Yaohong, a director of the Minle Co. which was a subordinate of the Lee Hysan Co. It has to be mentioned that when Nanfang was urgently looking for an office in town, Zheng Tieru gave an fabulous rental offer of \$2.4 per square feet in an unit in the Bank of China Building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business district of Central in the Hong Kong island.

Nevertheless, the left-wing filmmakers usually to mainta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as Lu Dun recollected, “Xinlian is directly invested by the country. When China was surrounded by the world’s super powers, the only outlet of China is Hong Kong, that is the major reason why we have to make films in Hong Kong, to let our voice out. The two films made by Xinlian such as *Baijiazai* (The Prodigal Son, 1952) and *Yeyeniannujiao* (Tonight and Everynight, 1956) are cover for us, to show us not so ‘left.’ At the beginning, the capital i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Zhou Enlai is the person in charge. Later, it turns to Chen Yi and finally to Liu Chengzhi. In Hong Kong, it is Liu Yiyuan to take charge of the business... We don’t have theatres when we first started making film, it is Liu to ask for capital from Zhou Enlai, then we have Nanhua and Yindu theatre. When we have the theatres, then we can group up

with other theatres in the city and we make big business. Yuan Yaohong is our friend who help us a lot but secretly without arousing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What Lu mentioned ‘not too left’ in the above really reflected the mainland policy towards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We are used to say the left-wing filmmakers can only produce ideological films, actually it was with exception. *Jinyin* (The Golden Eagle) was made by the Fenghuan Company in 1964, was the first Hong Kong film to film in Mongolia. Moreover, it was the first local Chinese film to have broke the million box-office record. In 1978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ended, the left-wing filmmakers organized a visit to Beijing again and was welcomed by Liu Chengzhi. Liu said to the delegation that “The Hong Kong audiences might not appreciate the films made by the mainland, so please upgrade the arts quality of the films you make and catch up with the Shaw’s within a couple of years.”

As it is restricted by limited sources, we are not able to show how the left-wing filmmakers successfully solicited the support from the neutral and even the right-wing filmmakers in Hong Kong. Anyway, we can identify the following figures who had been absorbed by the left-wing: Kong Shanxiao and Huang He in the 1950s; Li Hanxiang, Hu Jinquan, Zhang Che, Yan Hao, Xu Anhua, and Xu Xiaoming in the 1980s. During the heyday of the left-wing group in the film industry in 1956, few of the Cantonese movie artists who did not have a political background became the tapping targets, they were Wu Chufan, Bai Yan, Zhang Huoyou, Li Qing, Rong Xiaoyi, Mei Qi, Zi Lolin, Li Zhuozhuo, Nan Hong, Feng Yimei, Li Yueqing. Film directors including Li Tie, Li Chenfeng, Qin Jian, Wang Keng, Zhuo Ji, Liu Fang, Lo Dun, all became left-wing’s targets. Nevertheless, there were also people who left the left-wing group such as Qiao Zhuang, Jiang Yang, Liu Kexuan, Lin Dai, Li Mei, Li Lihua, Chen Xixi, Zhu Ji, etc. It has to be mentioned that quite a few of them had a prosperous career after they left the left-wing. Take Lin Dai as an example, her film *Cuicui* (Singing under the Moon, 1953) made her as a superstar within a night. Later Lin joined the Shaw’s and she continuously received the Best Actress Award in the Asian Film Festivals for four years.

It is worth to pint out the process of Li Lihua’s seek refuge with Taiwan for freedom, showing how Taiwan put efforts in cultivat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Hong Kong filmmakers. According to the recollection of Liu Yiyuan, “...One Taiwan official informed Mr. Shao Chuanren, ‘Mr. Shao, please invite Li Lihua to be your film actress, if you can do so, your production in Taiwan will be specially treated. So, you must invite her. Then, Shaw’s competed with Longma in seeking Li Lihua as their super actress by paying her double remuneration and giving her more film contracts. Li then was made a popular person in the local Hong Kong newspapers like Today’s China (later renamed as Today’s World) with a big headline read ‘Li Lihua seek refuge to Taiwan for freedom.’ Li was set free from the communist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ight-wing and left-wing in the film industry was more vigorous than assumed. They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but they also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Say for example, the Shaw’s Brothers was a member of the Zhiyou zonghui (Hong Kong & Kowloon Cinema & Theatrical Enterprise Free General Association). Shaw’s business spanned over not only Hong

Kong and Taiwan, but also Southeast Asia. Shaw's had to supply films to its numerous theatres which were located in different c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o, sources of films had been a big question to the Shaw's. As has been mentioned by Li Yiyuan, the products made by the Changcheng, Fenghuan and Xinlian companies were used to be sold to Shaw's and Dianmau, and sometimes to Guangyi as well.

How to assess the role played by the film sector in the whole left-wing in Hong Kong will be a question. More importantly, how the film sector maintained connection with other brother organizations will b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 ask. Including bank, trade union, school, enterprise, press, film company and theatre, all are subordinates of the Xianggang aomen gongzuo weiyuanhui (Working Committee of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committee was an organization representing the CCP, equivalent to a provincial organization. As was told by a scholar, the committee was composed by three major parts: firstly, administrator who came from 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secondly, the local left-wing organizations such as trade union, press, film company, and publisher; thirdly, organizations sent from mainland including bank, enterpris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institutions. Scholar also commented since the left-wing film companies failed to make good business, they did no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left-wing group in Hong Kong.

The Right-wing Camp: Hong Kong & Kowloon Cinema & Theatrical Enterprise Free General Associ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he most influential organization of Taiwan in Hong Kong was the Gangjiu dianying xiju shiye ziyou zonghui (Hong Kong & Kowloon Cinema & Theatrical Enterprise Free General Association;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Free Association). It was set up in February 1953, by the following persons: Wang Yuanlong, Hu Jinkang, Tao Guangqi, Yi Wen, Zhu Ji and Yan Youxiang, however, it was not officially registered 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1956, the Free Association reorganized with Wang Yuanlong as new chairman, Hu Jinkang and Bai Yutang as vice chairman. The Free Association was renamed as Gangjiu Yingju congyerenyuan ziyou gonghui (Hong Kong & Kowloon Cinema & Theatrical Enterprise Free Labour Union) and received an amount of HK\$20000 as subsidy from the Taiwan government. After the Kowloon riots in 1957,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image of worker leadership, the Free Association renamed again as Gangjiu dianying xiju shiye ziyou zonghui (Hong Kong & Kowloon Cinema & Theatrical Enterprise Free General Association), changed itself as a professional union rather than a labour union. The Free Association used to organiz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activities both in Hong Kong and in Taiwan. They sent delegates to Taiwan for celebrating the inauguration of new president and other occasions such as celebrating the president's birthday and film festival. Since the Free Association was the first film organization coming from overseas to Taiwan, the Taiwan government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it.

Since 1951 when Taiwan started to implement the martial law, all films from China mainland were regarded as 'communist film' and were banned. Hong Kong as being the British colony, allowing both

the left-wing and right-wing to organize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As Taiwan aimed to solicit the support from Hong Kong filmmak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counter the influence made by the united front tactics by mainland China. So, the Free Association had a task in seeking filmmakers to going Taiwan and support al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KMT in Hong Kong. As Tong Yuejuan recollected, “Take refuge for freedom is a positive virtue, the Free Association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left-wing people (mostly from Changcheng) to leave. Since we are a big organization with huge available resources, we are able to attract film directors like Qin Jian, Wen Yimin, and actors like Le Ti, Guan Shan, Jiao Zhuang, Gao Yuan and Chen Xixi, they are all doing well in our camp.”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roke out in China, market in the mainland had been blocked, Hong Kong filmmakers thus had to look for new alternative, indirectly increased the weight of Taiwan in Hong Kong. When Hong Kong filmmakers were caught between the right-left struggle, they had to join the Free Association so as to protect their Taiwan market. Ding Boshen was sent to take over Xianggag Sibao (Hong Kong Times) in the mid 1990s, has the following comments on the Free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do business with Taiwan and make films in Taiwan, joining the Free Association is a must. Not only the producers, but also directors, actors, and even the photographers or venue assistants, all have to do so, otherwise their names cannot be appeared in any films which will be distributed to Taiwan market because they will be banned.

‘Jumping’ from the left camp to the right camp was not a rare phenomenon. These persons included Yan Jun, Li Lihua, Lin Dai, Le Ti, Wen Yimin, Zhang Shen, Hu Xinling, and Gong Qiuxia, etc. Unlike the others, Hu Xinling and Gong Qiuxia took refuge to Taiwan physically. Nevertheless, the Taiwan authority used the Free Association in Hong Kong to take counter measure against united front campaign launched by the mainland China. It is needless to say, they will by all means provide any assistances to the Hong Kong filmmakers or actors as much as they can. As according to the memoirs of Ding Boshen, “...during that time, Hong Kong’s free filmmakers have so much privileges. They can produce films in Taiwan with special subsidy from the government, or cooperate with the commercial sector. So, they don’t need to have money to start up their business because they have a brand of ‘Free Filmmaker.’ Any persons in Taiwan would like to cooperate with these people.”

Up to the end of the 1970s when mainland China opened up for its economic and open door policy, the Free Association functioned as an organ of monitoring, soliciting, and instigating against the right-wing camp. In January 1979, the Hong Kong Television & Broadcasting Limited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TVB) started to make the first tv programme in mainland China, named as “Enjoy Yourself Tonight: New Year Celebration at Guangzhou.” This programme is a variety show with many TVB artists participated in it. As aimed of not to have sent a wrong message to Taiwan, these artists went to the Free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explain why they were involved in a tv programme associated with mainland China. Many of them even wrote *huiguo shu* (letter of repentance) to show they were still loyal to the Free China (Taiwan).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all these ‘letter of repentance’ has the same emphasis of ‘not really intended to work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y are forced to do so.’ These letters all attached with the working contracts signed by them with the TVB. Many of these artists even went to

Taiwan and asked for meeting with the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ral explanation seems inadequate to ‘wash off’ their suspicion of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They had to show their absolute loyalty to the Free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mass media. Say for example, in the ‘letter of repentance’ of Mai Dacheng reads,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Mai Dacheng is a contract artist of TVB. Now TVB decided to produce a programme ‘Enjoy Yourself Tonight’ at Guangzhou on 29 January 1979. Though I have tried by efforts not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gramme but without approval. As has been informed by TVB I have to take by duty as I am a contract artist, I have no excuse of being absent in debuting in this programme. Therefore, I write to the Free Association to state that I have no alternatives of overriding the instruction given by my employer. I also have to clarify that I am absolutely patriotic to my country and anti-communism.

Mai Dacheng (signed)

20th January, 68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bviously, what Mai Dacheng anxious about was the response of the Taiwan authority towards his recent debut in Guangzhou. As has been mentioned in the above, if he failed to clarify his loyalty to Taiwan, his films (even only a part in the film) will be banned and he personally can never come to Taiwan again. However, not all Hong Kong artists will act as Mai, Miao Qianren would be an exception. As same as Mai, Miao went to Guangzhou for her debut in the programme, but she did not think herself did anything wrong though she agreed to write the ‘letter of repentance’ but refused to fly to Taipei for a personal meeting with the relevant officials. This aroused criticism from the media in Taiwan. Even the Free Association was satirized as a ‘not really free organization’ because right-wing artist likes Miao can easily transform as right-wing artist. In regarding the Free Association’s role in the film circle, Lo Bin, who had been the chairman of the Free Association made the following comments in 1997, “During that time, the main duty of the Free Association is to monitor artist to join the Free Association as member, only films made by the members are allowed to be imported to Taiwan. This is regarded as a measure to suppress communist thoughts penetrating into the Free China. Needless to say, during that time the right and left camps are in fierce struggle. Honestly speaking, as a member of the Free Association who will have many privileges. So, why we don’t join the Free Association? Once we are joined, your film will have no obstacles in entering into the Taiwan market. Let’s make it simple, if your film cannot be sold, you will lose your living. Without a living how you can talk about politics?”

As it is analyzed in the above, both Mai and Miao made their excuse as ‘they are forced to do so,’ so the responsibility rested on their employer rather than themselves. Thus, we have to look 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VB and mainland China. How TVB cultivat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Xu Jiatun, who came to take up the directorship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Hong Kong Branch in the early of the 1980s, made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in his memoirs, “The first breakthrough we have

done with the pro-Taiwan persons in Hong Kong is the renown television tycoon Shao Yifu. TVB invited me to make a visit to their office, I immediately accepted. ... In the past, they used to keep a distance from us. They never actively approach us so directly like this time.” According to the memoirs of Xu, from then the Xinhua New Agency invited Shao to visit mainland for a number of times, s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hao and the mainland was enforced by frequent visit of Shao and generous donations from Shao too.

Hong Kong filmmakers: Going between and Caught between the left-right struggle

How to define ‘left-wing’ and ‘right-wing’? Except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political regimes, what else we can define?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the left-wing circle in the film industry of Hong Kong? It has to be mentioned that these persons who had been identified as ‘left-wing’ never called themselves as ‘left.’ Actually, they are quite sensitive of being labeled as ‘left.’ This can be easily reflected from their memoirs or oral history transcription. If we looked at the non-political aspects such as arts, political thought, social trend and personal reaction of different situation, we will argue they are not ‘left.’ As Liu Yiyuan said, “Only the opposite camp will make this political labels, they never call themselves either left or right.

The only common feature between the right camp and left camp is the support from a political regime in behind. Practically speaking, as to the right camp, the biggest threat rested on the loss of Taiwan market. However, in the political word, nothing cannot be remedied if you can write the ‘letter of repentance.’ A famous script writer Zhu Ke, who had been identified as leftist, recalled his experience of being tapped by the right camp. This did not make possible as he refused to write his ‘letter of repentanc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ight camp and left camp is the connec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Geographically, Hong Kong is on the fringe of China, proximity to the mainland is sometimes not a plu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isastrous impact in the mainland extended to this small British colony. As it is pinpointed by Shen Jianzhi, a famous script writer, “As Hong Kong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ainland, film production came to a standstill as in the mainland.” Xia Meng, a renown film producer, who mentioned the magical trend of *zuoluo youshang* (the right go upwards while the left go downwards). When the left camp was in depression, the right camp will grasp this opportunity to expand and develop business. In sum, most of the artists thought either ‘left’ or ‘right’ is a meaningless political label, nothing to do with arts. As Lu Dun put it, “I don’t like to be ‘red’ as it will easily cause trouble. Hong Kong government likes to see the right-wing fought with the left-wing because it can take advantage from the fight.” Zhu Hong mentioned the same poin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used one force to fight with another force, therefore it provoked the right to fight with the left and vice versa.”

The story of Xiao Fangfang and Li Hanxiang is the most illustrative to show how Hong Kong artist or filmmaker being caught in the left-right struggle and go-between the two camps. As Xiao who started

her career early in her childhood, admitted that she did not aware how she was involved in the left-right struggle. It was not until 1958 when she joined the Free Association and went to Taiwan, she came to discover that she already ‘took refuge’ for freedom with Taiwan. Before 1958, she worked for both left-wing and right-wing film company. In 1955, she totally participated in five films produced by Changcheng, Zhonglian and Nanjiao. In 1956, she made the *Meigu* (The Orphan Girl, 1955) for Shaw’s but at the same time, she also made *Hongyanjie* (She Swallowed her Sorrows, 1956) and *Meiguiyan* (Rose Cliff, 1956) for Changcheng. However, from 1958 onwards, Xiao stopped to work for the left-wing camp, as she recollected, “After finished the film *Meigu*, I entered into Changcheng and became its basic artist. I have been told by my mother that basic artist can receive monthly salary, so we can have more stable living. During that time, the two famous so-called right-wing companies are not interested to sign contract with me.”

In fact, the right-wing did compete with the left-wing, but they als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Honestly, the two camps somehow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Say for example, when the right filmmakers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up-to-dated progress of film production in the mainland, they will secretly asked the leftist filmmakers to watch the pre-view. More interestingly, the movie made by the right camp will sometimes secretly imported by the left camp. Needless to say, the two camps tended to watch films made by the opposite camp. As according to Xu Dunle, the two prominent film directors Hu Jinqun and Li Hanxiang, always came to his place in watching films produced by the mainland. Xu even supplied the ‘left’ films to Shao Yifu, the entertainment tycoon in Hong Kong, and the ‘right’ films to the government leaders in Beijing, as Xu knew they have a desire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When Li Hanxiang recalled his memory of returning to the mainland for making films, he immediately linked with the two figures who have helped him, they are Liu Chengzhi and He Xian, “Afterwards, I gradually understand why everyone asked me to return to China for making films. It is the reason Liu Chengzhi has such a thought of align with filmmakers of Hong Kong or Taiwan, so I became the first pioneer. Since I did the similar thing in some years ago when I took a team from Hong Kong to Taiwan. I can say Liu wanted me to break the dead air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Honestly, I appreciated very much with He Xian, who has changed my life. My appreciation also goes to Liu Chengzhi as he allowed me to make the two films of *Huoshao yuanmingyuan* and *Chuilin tengzheng*.

To summarize the legendary life of Li, he have had several challenges: Firstly, he fled from Shanghai to Hong Kong in 1949 and joined Changcheng. Secondly, he left Changcheng and joined the Shaw’s. Thirdly, he was tapped by Guotai to set up a new company called Guolian in Taiwan, so he left Shaw’s. Li made conflicts with Shaw’s when he decided to make the film *Qixiannu* (A Maid from Heaven, 1963) which Shaw’s was on its way to finish a film of same title. Nevertheles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Li in Taiwan was not smooth. As according to Li himself, “I was not skilled in taking care of my finance, this contributed as the major reason why my newly established company Guolian finally bankrupted. With worse financial condition, I have no choices but going back to Hong Kong and

rejoined Shaw's." Fourthly, in October 1978, Li fled to Beijing to meet with Liu Chengzhi, who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ouncil'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during that time. A few years later, Li became able to set up a new company called Xin Qunlun and made the popular films *Huoshao yuanmingyuan* (Burning of the Imperial Palace, 1983), *Chuilin tengzheng* (Reign behind the Curtain, 1984) and *Hulong* (The Last Emperor, 1986) etc. However, since Li was a member of the Free Association he obviously offended the rule of not working in the mainland China, thus he received the penalty of his film being banned in Taiwan and Li himself cannot enter into Taiwan.

Jumping from one company to another and going between Beijing and Taiwan, Li did not pay no cost. He was sued by Shaw's when he joined Guolian and again by Guolian when he returned to Shaw's though he was finally survived. It is worth to note that if he did not come to Beijing, he would never have come to a peak in his career. So, if we viewed from this aspect, then we may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Li's style in film production really coincided with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going between different companies and different camps. More importantly, Li's personal style would never spread out widely across the strait.

Concluding remarks

Watching film in the cold war period is not just an entertainment but also a politic and culture as regarded by mos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Sometimes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define what is left-wing and what is right-wing. Jumping from on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from one wing to another wing, had been considered as the best solution to solve problems. Therefore, artists or filmmakers moved among different film companies as well as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Needless to say, film is a kind of arts culture, but it had always been used by the two regimes across the strait during the cold war. For this sense Hong Kong had been functioned as a venue for competition as it can help to enforce the political rule of the KMT and CCP. Go back to the definition of left and right-wing, it is a sort of political label as done by the other wing. Anyway, the features of the left-wing as patriotic and loyal to the CCP are parallel with the features of the right-wing such as quest for freedom and anti-communism, both are doctrine driven.

To sum up, the film industry during the cold war, had witnessed several challenges. It was survived with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m one decade to another. As has been pointed by scholars that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had been divided and competed by different group of power such as from Singapore-Malaysia, mainland China, and the local itself. Whatever the industry was affected by external forces, it was manipulated by the local colonial authority. It grew by absorbing the vitamins given by the Singapore-Malaysia and mainland China groups.

The films either made by the mainland or made by the left-wing studios in Hong Kong were popular in Southeast Asia. However, it changed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roke out in the mainland. This made Shaw's as the only competitor in the market, taking over all the shares in the world market which were occupied by other competitors. When mainland was closed to the world, Hong Kong filmmakers

had to look for new markets and Taiwan was automatically became the alternative. However, when mainland was opened to the world for economic reason, Taiwan was over shadowed by the giant China market. As a result,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as made less important, indicating how Hong Kong filmmakers were so flexible on one hand, and so practical on the other.

Glossary:

Bai Chen	白沉
Bai Yan	白燕
Bai Yutang	白玉堂
Baijiazai	敗家仔
Changcheng Film Production Co, Ltd.	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
Chen Xixi	陳思思
Chen Yi	陳毅
Chuilin tengzheng	垂簾聽政
Cuicui	翠翠
Di Fan	狄梵
Dianmao	電懋
Ding Boshen	丁伯騫
Gangjiu dianying xiju shiye ziyou zonghui	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
Gangjiu yingju congyerenyuan ziyou gonghui	港九影劇從業人員自由工會
Gaosheng Theatre	高陞戲院
Gao Yuan	高遠
Gong Qiuxia	龔秋霞
gongu Nanguo Fazhen Changcheng, shentou Nanyang, zhengcui Daguan, dongjie Yonghua	
鞏固南國, 發展長城, 滲透南洋, 爭取大觀, 凍結永華	
Guan Shan	關山
Guangyi	光藝
Feng Yiwei	馮奔薇
Fenghuang Film Production Co.	鳳凰影業公司
Fengnian Entertainment Co, Ltd.	豐年娛樂有限公司
Fengshun Entertainment Co, Ltd.	豐順娛樂有限公司
He Xian	何賢
Hongyanjie	紅顏劫
Hu Jinkang	胡晉康
Hu Jinquan	胡金銓
Hu Xinling	胡心靈
Huang He	黃河

huiguo shu	悔過書
huoshao yuanmingyuan	火燒圓明園
huolong	火龍
Jiang Wei	蔣偉
JiangYang	江揚
Kong Shanxiao	鄺山笑
Le Ti	樂蒂
Lee Hysan Co.	利希慎公司
Li Chenfeng	李晨風
Li Hanxiang	李翰祥
Li Lihua	李麗華
Li Mei	李湄
Li Qing	李清
Li Tie	李鐵
Li Yueqing	李月清
Li Zhuozhuo	黎灼灼
Lin Dai	林黛
Liu Chengzhi	廖承志
Liu Fang	劉芳
Liu Kexuan	劉克宣
Liu Qiong	劉瓊
Liu Yiyuan	廖一原
Lo Bin	羅斌
Longma	龍馬
Lu Dun	盧敦
Ma Guoliang	馬國亮
Mai Dacheng	麥大成
Mi Qi	梅綺
Meigu	梅姑
Meiguiyan	玫瑰岩
Miao Qianren	繆騫人
Minle Co.	民樂公司
Nan Hong	南紅
Nanfang Film Production Co. Ltd.	南方影業有限公司
Nanhua Theatre	南華戲院
Ni Shaoqiang	倪少強
Puqing Theatre	普慶戲院
Qi xiannu	七仙女

Qi Wenshao	齊聞韶
Qiao Zhuan	喬莊
Qin Jian	秦劍
Rong Xiaoyi	容小意
shangyou zhengce, xiayou duice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Shao Yifu	邵逸夫
Shen Ji	沈寂
Shen Jianzhi	沈鑒治
Shu Shi	舒適
Sima Wenshen	司馬文森
Sun Chengzhang	孫城增
Tao Guangqi	屠光啟
Tiying	緹縈
Tong Yuejuan	童月娟
Wang Keng	王鏗
Wang Yuanlong	王元龍
Wen Yimin	文逸民
Wu Chufan	吳楚帆
Xia Meng	夏夢
Xianggang aomen gongzuo weiyuanhui	香港澳門工作委員會
Xianggang Sibao	香港時報
Xiao Fangfang	蕭芳芳
Xin Kunlun Film Co.	新崑崙影業公司
Xinlian Film Production Co.	新聯影業公司
Xu Anhua	許鞍華
Xu Dunle	許敦樂
Xu Jiatun	許家屯
Xu Xiaoming	徐小明
Yan Hao	嚴浩
Yan Jun	嚴俊
Yan Youxiang	嚴幼祥
Yang Hua	楊華
Yeyeniannujiao	夜夜念奴嬌
Yi Wen	易文
Yindu Theatre	銀都戲院
Yuan Yaohong	袁耀鴻
Zhang Che	張徹
Zhang Huoyou	張活游

Zhang Shen

張森

Zheng Tieru

鄭鐵如

Zhongqiao National Products Co.

中僑國貨公司

Zhou Enlai

周恩來

Zhu Ji

珠璣

Zhu Hong

朱虹

Zhu Ke

朱克

Zi Lolin

紫羅蓮

Zuo Ji

左几

zuoluo youshang

左落右上

从近年来主流媒体报道看 中国国际观的发展变化

■ 柴 璠 (中國傳媒大學校) ■

从近年来主流媒体报道看中国国际观的发展变化

— 以亚洲的声音呼唤和谐世界的新秩序 —

柴 璠 (中國傳媒大學校)

—〈目 次〉—

- I. 阐释框架的构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思路
- II. 《今日亚洲》报道亚洲人的亚洲
- III. 重大新闻议题报道中的“和谐世界”国际观的体现
 - 一. “和而不同”——应对西方社会的外交挑战
 - (一) 媒体再现中国对法国的理性立场
 - (二) 捍卫尊重原则的中美媒体对决
 - 二. “以和为贵”——低调处理与亚洲周边国家摩擦
 - (一) 媒体对中韩“口水战”的低调立场
 - (二) 中韩“口水战”的前生后世
 - 三. “和实生物”——媒体重塑中国国际形象
 - (一) “有所作为”赢得国际尊重
 - (二) 媒体凸显中国大国责任意识
- IV. 中国国际观的发展变化

2006年8月3日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在于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上说,为了改善中日关系,两国之间应该展开内容和内涵更为丰富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公共外交的作用主要就是要通过两国间多渠道的交流,促进两国公众之间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为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广泛的民意基础。“公共外交”的理念是对官方外交、政府外交的补充,其内容和内涵更为丰富。我认为,大众媒体传播正是“公共外交”的显著、有效途径之一。赵启正先生的这番讲话不但符合加强中日两国关系的宗旨,同样适用于中国同亚洲其他国家交往的现实。不同国家的媒体虽然在报道的角度、方式等方面有差异,但是只要客观真实、尊重平等地对待别国,一定能够在各国人民中拓展具体鲜活的交流,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信息的沟通,拉近感情,深入合作。《论语·子路》有记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如果在更加宽泛的层面上理解和发扬孔子的治国理念,我认为,中国本着“和谐世界”的国际秩序构想,正在外交领域上不断践行和深化“近者悦”。中国不但以自身的进步和强大寻求“近者”——亚洲国家的友好和认同,也努力通过大众传播途径塑造一个自信而负责的大国形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昨天褪色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真实的历史。本文将着重对2008年中国媒体几个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进行观察和分析,记录2008年的新闻传播历史,试图抽绎出一个结论,中国在21世纪将更多的承担“大国责任”,加强同亚洲各国的合作和共进,以亚洲国家身份发出亚洲自己的声音,彰显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立场和价值观,向长期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社会主动披露客观真实的亚洲。

I. 阐释框架的构建

首先阐释一下本文的研究对象和主要观点。

一. 研究对象。

1. 本文“近年来”所针对的时间背景是指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的开幕式上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人民度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岁月。”2008年在中国当代史上不仅有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坐标意义,更因为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关乎国计民生和国际关系的事件,而必将成为历史记忆深刻的一年。

2. 本文涉及的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指“(1)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各界视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2)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在我国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具有较强影响力;(3)具有较强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群广泛关注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较多地被国内外媒体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4)着力于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动向,是历史发展主要脉络的纪录者;(5)基本受众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6.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影响较广泛受众群。”¹⁾限于专业的研究方向,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主流媒体主要是广播电视媒体,比如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省级以上电台、电视台等。

3. 主流媒体的报道限定在重大新闻事件和重大新闻议题的报道上。重点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大反应和影响的新闻专题,如北京奥运火炬全球范围传递、“5·12汶川地震”及抗震救灾、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等。

二. 研究思路。

本文力求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中国应对国际社会的基本思想理念是如何在主流媒体中显现的。

1. 中国政府最为重视的、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国中央电视台开设新栏目《今日亚洲》,与亚洲国家的电视台合作,交换节目,传递更多由亚洲各国自己报道的政经要闻、社会文化资讯。为中国受众打开关注亚洲,放眼世界的窗口,加强主流电视媒体对中国观众关注面、兴趣点的引导作用,启发中国民众的亚洲文化认同感。

2. 在重大新闻议题设置中,特别是在奥运火炬全球传递、“5·12汶川地震”报道以及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的报道中,主流电视媒体重视国际社会的反应,并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发出响亮的声音,表明中国“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和谐世界”国际观。

1) 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主流媒体判断标准和评价》,《中国记者》,2004年第5期。

II. 《今日亚洲》 报道亚洲人的亚洲

在中国主流电视媒体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新闻栏目和报道中, 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新闻报道总是排在整体报道最后的部分。通常不会因为事件或人物的重要性、时效性而把国际新闻安排在整个报道或栏目中的首要位置。中国主流广播电视媒体的中文报道设有专门的国际新闻栏目, 比如CCTV的新闻节目《国际时讯》《全球资讯榜》《环球资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CNR)的新闻节目《世界报道》; 北京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国际双行线》; CNR的经济之声和北京电视台的经济频道都设有《天下财经》的栏目, 但是选题很少是国际题材; 东方卫视(Dragon TV)早间新闻栏目《看东方》是一档120分钟的版块栏目, 内容主要涉及上海、中国国内的新闻、气象、专题、谈话、生活服务等, 只有在《杜邦东游记》中涉及东方其他各国的旅游资讯。据调查, 其他省级电视台和电台的国际新闻和报道的布局与中央三台(CCTV、CNR、CRI)相似。

在所有国际新闻报道的栏目中, 专门涉及亚洲的只有2008年7月28日开播的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的《今日亚洲》。观照2008奥运会举办前后的中国主流媒体报道, 专门开办“以亚洲人的视角报道亚洲; 展现亚洲的进步和发展; 捕捉亚洲经济发展的脉搏; 表现亚洲丰富多彩的文化; 反映亚洲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宣传中国与亚洲各国合作共赢”²⁾的《今日亚洲》栏目反映了中国对亚洲局势、亚洲事务和中国同亚洲各国关系的重视和认同。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今日亚洲》定位于“展示亚洲风采, 倾听亚洲声音”, 以主持人和视频报道为基本形态, 栏目时长为30分钟, 北京时间周一至周六23点首播, 次日7点重播。

《今日亚洲》栏目的诞生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 2007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高4倍。在全球GDP增长中, 新兴市场经济体占到50%, 同时还拥有全球75%的外汇储备。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中包括韩国、印度、中国等。2007年, 世界银行以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五大经济体中, 亚洲国家占了3名, 中国占世界总产值的9%以上;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占全球总产值的7%; 印度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占世界总产值的4%以上³⁾。即使发达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困扰之际, 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兴经济体正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来源”。IMF预测, 2008年尽管发达经济体经济表现更加疲软, 但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带动, 世界经济仍有望增长4.1%。⁴⁾虽然这只是一个乐观的预测, 但至少说明亚洲的经济实力受到世界的普遍重视。

但是与经济注意力不相匹配的是, 亚洲的政治地位与欧美发达国家不能对等; 国际主流媒体也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 西方报道中不乏歪曲、片面、甚至“妖魔化”亚洲形象的声音。亚洲要开放平等地进入国际视野, 需要亚洲人发出响亮的亚洲声音。中国中央电视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作《今日亚洲》节目。

目前, 《今日亚洲》节目与韩国KBS电视台、日本NHK电视台、伊朗PRESS TV、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孟加拉国CHANNEL 1电视、巴基斯坦PTV电视台、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朝鲜中央电视台、柬埔寨CTN电视台、越南VTV电视台、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澳大利亚CBS等机构交换节目。正在协商合作的电视台还有缅甸电视台、老挝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RTM)、印尼美都电视台、印度Zee TV、叙利亚电视台、斯里兰卡电视台、斐济电视台等。《今日亚洲》涉及的选题

2) 《今日亚洲》栏目介绍。http://news.cctv.com/society/20080729/104861.shtml

3) <http://www.amr.gov.cn:8080/dsj.nsf/efd4cc8e8edfb27c48256a7800205a1c/95433d6d87b0cc11482573bc0009208f?OpenDocument>

4)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1/01/content_10289471_1.htm

主要包括, 亚洲国家本地化热点, 用亚洲国家电视台的电视新闻节目来报道当天亚洲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 亚洲资讯速览, 汇集每日亚洲新鲜资讯, 突出大信息量; 区域化热点, 选取亚洲国家共同关注的当日热点话题, 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 考察其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这些国家的反应; 精彩亚洲, 基调比较轻松, 主要介绍亚洲各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及风土人情。

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搜索“《今日亚洲》”, Google显示766条相关新闻, 百度(Baidu)显示1940条相关信息, 在央视国际(CCTV.com)网站上, 138条回帖(BBS)中正面评价居多, 其中有些评价是, “这个节目将亚洲各国的资讯更视角放宽了许多, 并不局限于战争、经济、政治这些, 而是加入了风土人情, 真的是很好! 节目的形式比较新鲜, 特别是播放亚洲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画面, 国内很少见。”

“希望继续拓展节目资源。”“在播放介绍亚洲国家的概况之前, 希望放一个亚洲整体的区域地图, 明示本期节目要介绍的国家的地理位置, 让观众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在介绍了各个国家的概况后, 希望今后制作一些介绍亚洲文土人情、传统文化的专题短片, 比如日本樱花、泰国佛教建筑、印度的亚洲硅谷等等。”⁵⁾“很长一段时间对欧美的情况比较了解, 反而是对周边亚洲国家的发展情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 这个节目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周边所发生的变化。只是觉得时间上还有点短, 看了几期, 感觉内容上对西亚的报道不多, 主要还是局限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最后祝这个节目越办越好!”“众所周知, 中国在多边外交和地缘政治中非常重视亚洲周边的临邦和兄弟, 可以说东北亚、东南亚(东盟)以及南亚全是我们所高度重视和发展的。但是, 目前央视各频道各版块节目均没有一档面向亚洲的深度报道和解析的新闻评论类栏目。因此, 强烈建议《今日亚洲》能借此扩编, 从而强化和弥补该领域的空白, 把视角对准我们身边的朋友, 更能正确地审视和发展我们自己。”“希望在短期内建立一个亚洲联盟。”⁶⁾“中央台难得的好节目, 让人大开眼界, 了解亚洲, 了解世界! 能与凤凰卫视PKPK了!”⁷⁾

从以上评论(comments)可以看出, 《今日亚洲》更多地使中国人了解亚洲其他国家的现实、历史和文化; 而中央电视台以开办《今日亚洲》为契机, 与亚洲一些国家电视台或机构商谈双边合作机制, 包括新闻节目提供、选派特约报道员、建立联合采访机制、互授新闻版权等方面的内容, 如果合作顺利和广泛, 将至少极大促进合作国之间的交流和了解。因此, 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不仅仅是个栏目, 还是一种亚洲国家电视合作的机制, 通过这个机制传播“新亚洲”的形象, 这不仅是亚洲国家间电视的互利共赢,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 《今日亚洲》成为中国对亚洲兄弟国家进行“近地外交”的一个窗口。

III. 重大新闻议题报道中的“和谐世界”国际观的体现

一. “和而不同”——应对西方社会的外交挑战

从2008年4月1日起, 北京奥运会火炬开始进行全球传递, 规模空前, 创下参与人数最多、历时最长、难度最大、经过城市最多的纪录。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不仅为全球媒体提供公用信号, 还从3月开始, 进行长达5个月的直播跟踪报道。这次历史性直播全程展现奥运火炬传递, 盛况空前。

5) <http://fuxing.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11857360&extra=&page=1>

6) <http://fuxing.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11857360&extra=&page=2>

7) <http://fuxing.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11857360&extra=&page=4>

注: 凤凰卫视(PHOENIX TV)是香港以具有国际视野报道特征而著名的电视频道。

但是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一波三折，持不同政见者对火炬传递的干扰增强了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敌视，中西方的外交“过招”引发当时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反应。

(一) 媒体再现中国对法国的理性立场

2008年4月7日，当北京奥运会火炬抵达巴黎传递后，“藏独”分子用暴力手段从中国残疾运动员金晶手上抢夺火炬未遂，于是冲击传递队伍，辱骂中国留学生、撕毁五星红旗。法国的一些媒体比如《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等做出了幸灾乐祸的不公正报道。此事被中国媒体报道后，中国网民发起抵制法资超市家乐福号召，并得到全国各大城市网民的响应。这件事情迅速演变成“家乐福事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8年4月10日CCTV的早间新闻《朝闻天下》节目，通过引用新华社的图片、中国各大报纸比如《工人日报》《解放军报》等报道和评论，转述中央电视台的立场。同时大量播出网友(netizens)的留言和评论(comments)，全部都是谴责海外藏独分子的声音。一位网友说：“关键时刻见真情，祖国在我们的心目中太重要了，我们要用生命来保卫她，那一刻，火炬就象征我们的尊严，不容‘藏独’分裂分子玷污。”⁸⁾另外也引用了藏族同胞的评论，比如，藏族退休老干部曲扎说：“分裂分子半个月前在拉萨搞打砸抢烧，搞得拉萨乌烟瘴气、人心惶惶，现在又在海外破坏奥运圣火传递，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败类，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感到羞愧！”拉萨中学藏族学生西绕说：“我们祖国正日益壮大，我们期待着奥运圣火早日来到拉萨。”“干扰和破坏是对奥运圣火的亵渎，也是对全人类友谊的亵渎，我强烈谴责这种卑劣行径。”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说：“藏民族是善良的、朴实的、纯朴的，是知恩图报的民族，这些人打着藏族的名义，从事这样的活动，我作为藏族人，确实感觉羞愧。他们这些行动更充分地把其真面目暴露于世人面前。”⁹⁾4月7日到4月25日，CCTV的《新闻联播》《新闻30分》《整点新闻》《中国新闻》《新闻60分》《环球时报》《华人世界》《东方时空》等栏目都以不同的形态报道了这一事件，并且以转述的、明确的方式强烈谴责藏独分子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活动。4月25日CCTV的著名新闻栏目《东方时空》(Oriental Horizon)播出《外交危机中的中法互访》，是对整个“不愉快的事件”(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语)——“巴黎火炬传递破坏事件”(《东方时空》称)的梳理和分析。在4月7日巴黎火炬传递过程中，中国残疾火炬手金晶遭藏独分子抢夺火炬，激起在法华人和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继而，中国很多城市展开了抵制家乐福超市的民间活动。4月19日，法国巴黎华人万人集会，抗议法国二台等媒体对中国的偏颇言论。中国留学生李涪的慷慨演讲，抨击法国媒体和反华势力的不实报道，并号召热爱民主与和平的法国民众不要受了解和正视事实真相，赢得在场华人的欢呼和热泪。海外华人和中国国内民众声势浩大的抗议风潮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一方面劝导民众要理性，而另一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提出严正声名，反对巴黎市长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市民的称号。胡锦涛主席也向法国总统萨科齐递交亲笔信。在4月15日，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就此问题做了表态“我想这些都是事出有因，也需要法方很好地深思和反思。我相信这些中国民众会依法来表达他们的合理诉求。”法国政府在一周内三次派特使频繁来华表示友好和诚意。在外交危机中的中法关系有了转机。《东方时空》节目通过与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丁纯教授的电话采访，向观众传递了政府对法问题上的外交思路。丁纯教授认为，法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英美是一家，而中俄关系比较近。法国是中立的一票。因为中法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和战略上的分歧和冲突，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待两国关系。中国电视媒体通过播出各方的声音，向

8)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410/100495.shtml>

9)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410/100495.shtml>

世界传递了一个声音，中法两国求同存异有利于两国战略合作，对世界和谐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贡献。

（二）捍卫尊重原则的中美媒体对决

2008年4月10日，北京奥运火炬在旧金山传递。美国CNN电视网对此事进行了转播，在转播中，《SITUATION ROOM》的主持人兼时事评论员卡弗蒂情绪激动，发表了与火炬传递无关的话语，妄称中国产品是“垃圾”，而且攻击说“在过去50年里，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是一帮暴民和匪徒。”卡弗蒂大段的言论迅即被转发在各大中文网站上，引起全球华人的愤慨；截止4月14日已经有2万人在网络上签名，强烈抗议并要求CNN公开道歉；4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对有关言论予以强烈谴责，并严正要求CNN和卡弗蒂本人向中国人民道歉；4月22日纽约居民梁淑冰及一位中国公民李女士对CNN及其主持人卡弗蒂提出集体诉讼，要求赔偿13亿美元，一律师称，“赔偿每位中国人一美元，并不算多。”诉讼内容和理由包括：第一，被告侮辱和污蔑全体华人；第二，被告故意给中国人造成精神损失；第三，被告重大疏忽对中国人造成精神伤害。继伦敦、巴黎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之后，旧金山传递及CNN主持人辱华言论彻底激怒了全球华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间对西方世界的感情发生了显著变化。2008年3月20日清华大学毕业生饶谨创办反CNN网站(www.anti-cnn.com)， “希望自己在发出声音的同时，用西方人民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引导西方的网民。”¹⁰⁾

中国各主流媒体包括CCTV、CNR、CRI等在内的广播电视媒体及时、反复地做了相关报道，具有密集性、广泛性和深刻性。例如，CCTV的《新闻联播》《朝闻天下》《新闻30分》《新闻会客厅》《中国新闻》《整点新闻》，CNR的《天下财经》等节目不仅转述了卡弗蒂辱华言论的大意，而且明确传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达强烈谴责和要求CNN公开道歉的声明，更在收视黄金时段(20点30分)的《新闻会客厅》节目中展开访谈，分析卡弗蒂辱华言论的细节、卡弗蒂背景和CNN反馈的本质等等问题。以《新闻会客厅》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反复强调西方媒体的某些评论员“说的话要有公信力”，不能对全人类的良知和公理进行挑战，“东西方的碰撞，东西方的交流从古至今，在未来也会延续，但是需要记住的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尊重彼此，尊重事实。”¹¹⁾中国媒体和CNN进行了一场关于媒体公信力、职业道德和人类美德的公开对决，可以说这场对决表达了中国人对“和而不同”中“和”的底线阐释，“和”的底线是彼此尊重。

二、“以和为贵”——低调处理与亚洲周边国家摩擦

（一）媒体对中韩“口水战”的低调立场

2008年4月27日北京奥运火炬在韩国首尔传递，《新闻联播》的现场报道突出了首尔市副市长罗镇求在启动仪式上的致词、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为火炬传递加油助威、著名韩国运动员的火炬接力等画面，并在新闻的结尾说“据介绍，韩国中央政府和首尔政府对圣火在首尔的传递高度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各种组织工作。搭载着北京奥运会圣火的专机是在今天凌晨抵达韩国的，受到了韩国奥委会官员等的热情迎接。”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主调基本与CCTV的《新闻联播》一致。

但是，与在广播电视媒体上再现的热烈而顺利的场面相对照，数千名中国人与破坏火炬传递的团体发生摩擦，并伤及韩国警察和记者的报道，在网络媒体上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在新闻报道及相关

10) http://gb.cri.cn/18824/2008/04/16/2225@2021316_1.htm

11) 2008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节目。

跟贴(comments)中,中韩两国网民站在不同立场上打起了不见面的“口水战”。韩国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侧重报道了中国留学生与扰乱火炬传递的韩国市民团体间的冲突。从28日开始,韩各大媒体将之描写为“集体施暴行为”,报道题目故意选择渲染情绪的词汇,如“在别国首都,竟然对警察施暴”、“在首尔市中心挥舞凶器的中国人”、“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国耻现场”、“傲慢的中华主义……让人联想到纳粹捣乱”。在市民团体和媒体的煽动和压力下,韩国政府官员也发表了一系列强硬讲话。韩国外交部5月1日称,要“强制驱逐肇事中国学生”,“今后向中国留学生和中国人发放签证时,将会进行严格审查”。曾担任多年外交官的韩国总理韩升洙称,中国学生的“暴力行为”伤害了韩国的民族自尊心,“必须采取法律、外交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对韩国民众和政府的愤怒和谴责,中国媒体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一方面播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态度,“北京奥运火炬在首尔的传递顺利结束,韩国政府和人民对这次活动给予了热情欢迎和积极协助。这体现了韩国政府和人民对北京奥运会的关心和支持,也体现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中方对此表示感谢。此次火炬传递活动受到在韩国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的热情欢迎,他们表达了支持奥运,期盼奥运的热情。一些团体企图对火炬传递活动进行干扰破坏,同中国留学生发生了一些摩擦,中方对韩方个别警员和记者在此过程中受伤表示慰问。”另一方面,在重要的新闻访谈节目CCTV-4《今日关注》当中,通过采访国际问题专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传达了媒体这样的立场:目前中日关系处于改善趋势之中,中韩关系这两年总体发展比较快。奥运火炬在日韩传递总体上比较好。但在火炬传递过程中,有个别不法分子与华人和留学生发生个别冲突、冲撞是不能完全排除的,韩国和日本没必要因此对五星红旗的飘扬感到恐惧。中国面对世界,除了对付那些有意识捣乱的分裂分子以外,也要注意体现当代中国青年良好的国民素质。要注意到,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也好、分裂势力也罢,有些人就是想激怒我们做一些出格的事,挑动一些对立情绪和不理智,我们要共同来维护国内的良好秩序,维护中国人的良好声誉,合理理智地表达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

继奥运火炬首尔传递的摩擦之后,媒体最关注的新闻要算韩国首尔电视台(SBS)泄露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场面。韩国SBS电视台对7月28日的奥运会开幕式彩排进行了拍摄,并在29日《八点新闻》中播放,长度约2分钟,主持人还对视频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和点评。中国媒体对此事在迅速做出跟踪报道的同时,也在深度报道和评论节目中做出述评。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CCTV新闻频道评论节目《新闻1+1》中说,在这次偷拍和泄密事件中,最大的输家是SBS,而观众是另外的一个输家,因为“我们的快乐被人提前给偷走了一部分”。与北京奥运新闻宣传部副部长孙伟德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也看到了有关报道,对韩国电视台播出有关奥运会开幕式的片段感到失望。”的基调相似,广播电视媒体并没有表达如网民一样的愤怒和谴责,而是理性地分析违反新闻从业道德操守和破坏保密协议的行为的后果与危害。显然,媒体要表达一种宽容和客观的态度。

众所周知,主流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体是中国政府的“喉舌”,一贯坚持和恪守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因此从主流媒体特别是CCTV的报道中,能够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

(二) 中韩“口水战”的前生后世

中国和韩国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的经贸合作始终保持迅猛发展的势头。统计显示,中韩两国2006年的双边贸易额已突破了1300亿美元,相当于15年前的26倍。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而韩国也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随着中韩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韩国对华投资也不断增加。目前,在中国投资的韩国企业超过3万家,投资金额累计达到

了35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与此同时,中国对韩投资也开始起步,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韩投资金额累计达到8.9亿美元。据中国教育部提供的数字,目前在中国仅接受学历教育的韩国留学生就超过了55000人,已连续5年居世界各国来华留学人数首位。此外,每年还有6万左右韩国人在中国接受汉语教育等短期培训,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韩国人数也以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现在韩国已有200多所大学,650多所高中开设了汉语专业和汉语课。全韩国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了15万人。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留学生赴韩国的人数也一直在持续增长,总人数已近1万人,这些留学生分布在韩国各地的几十所高校学习,中国已经成为韩国外国留学生的最大生源国。而韩国《朝鲜日报》刊登署名为世明大学国际通商系教授李志哲的评论文章,引述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的资料,目前在中国的韩国学生有4万多人,2000年之后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剧增为2万人。两国观光客交流也倍数成长,从1988年的9000人次年增长到2006年的480万人次。中韩两国的合作从经贸、文化拓展到各个领域和层面上。以电视剧、歌曲、流行音乐、游戏、服饰为代表的“韩流”深受中国青年喜爱。“韩国周”的品牌优势越来越大,哈尔滨韩国周、青岛韩国周、天津韩国周等发展势头很好,为中国加速对韩国全面开放搭建了有效平台,也为中国人了解韩国开辟了更多的窗口和途径。

2007年中国最大的通讯社新华社所属《国际先驱导报》¹²⁾进行了一次中国网民邻国印象调查,有1.2万中国网民参与,其中不太喜欢的国家前三位是韩国(40.1%)、日本(30.2%)、印尼(18.8%),当被问及“你通过什么渠道获取有关中国周边邻国的信息”的,答案是互联网(65.3%)、书刊、报纸、电视、广播(26.0%);也有报道显示,韩国《中央日报》于2008年9月22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引起众多关注。调查显示,57%的韩国受访者认为“最厌恶的国家”是日本,13%的受访者认为“最厌恶的国家”是中国,10%受访者认为朝鲜“最令人厌恶”。此次调查是《中央日报》调查员以亲自访问家庭进行面谈的方式进行的,调查时间从8月25日至9月7日,对象为除济州岛地区以外的1200名19岁以上韩国人。

从民间反映来看,中韩两国民众的感情非常复杂和微妙。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世界的了解基本来源于互联网,他们喜欢的是电影、电视剧和网络游戏里的韩国,是演艺明星所代表的韩国,对真正的韩国他们了解的并不多。一方面,他们喜欢韩国的时尚、娱乐,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真正区别韩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异同。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韩国的家族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大部分中国人认为那是中国遗失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虽然近年来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数量增加,但很多人表示失望,认为韩国与韩剧中的韩国印象相差甚远。而赴韩留学的中国人很多是朝鲜族学生,他们对韩国的感情与其他民族对韩国的认识不尽相同。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韩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民情。大部分信息是民众在网络上得到的消息。一方面,中国民众熟知的一些消息又都是不利于中韩交流的,比如韩国将端午节、韩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SBS记者泄露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内容等等;另一方面,随着在中国精通韩语的人增多,韩国网站上“厌恶”、“攻击”中国和中国人的BBS内容也被翻译成中文流广泛流传开来。

同样的,韩国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也不甚了了。笔者在韩国生活工作一年中,遇到过一些没到过中国的韩国市民。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人是在餐馆中打工的和贫穷的中国留学生形象;他们认为中国人很穷,不会用手机,没钱买热带水果比如芒果、木瓜;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礼貌、个人利益当前、没有社会公德,说话的声音很吵,等等。北京奥运火炬在首尔传递过程中中国留学生伤及韩国警察

12) 《国际先驱导报》创刊于2002年6月6日,依托新华社遍及全球的新闻采集网络,率先提出“大国际”的传播理念,即用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思维、世界的标准观察、解读、记录中国复兴的进程。重点关注于国际国内时政、经济、文化的重大题材并深度报道。

和记者的事件更加加深了韩国人对中国人的恶感。日本高原基彰学者通过自己的《韩中日现代人互相排斥的理由》中分析道,中国的厌韩症;韩中的反日;韩日的排中都是新国际主义思想。竞争激烈的形势下,三国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不安感是对方国家造成的。三国的“88万韩元时代(每月赚88万韩元的非正式职员)”扩散了自己排斥民主主义精神。¹³⁾

不管怎样,韩国和中国需要全局的、长期的、战略的合作,在发展经贸合作、官方文化交流的同时,两国人民的感情交流对于中韩世代友好的外交前景至关重要。我认为,中国主流媒体体现正致力于加强中国人进一步熟悉和认识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工作。

三. “和实生物”——媒体重塑中国国际形象

(一) “有所作为” 赢得国际尊重

2008年4月的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纷扰刚刚结束,“5·12”汶川地震突如其来地给四川人乃至整个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政府的救灾的快速反应和“举国体制”的高效全面,中国民众的万众一心、舍己救人感动了国际社会。世界各国纷纷伸出援手。中国一改“自力更生”、“不依靠外援”的原则,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接受俄罗斯、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人员、物资、技术援助。

CCTV从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2008年5月12日15点终止常态播出节目《电影传奇》)开始,进行了全天24小时的直播,这在中国电视传播史上是首次,无论从反应速度、时间长度、直播规模、直播形态、参与人员、传播效果、社会影响等方面上看,都开创了中国电视传播的新时代。

这次直播报道特别关注了国际社会的反应。5月13日8点24分,直播播报了一些外国政府和领导人就四川地震灾害向中方表示慰问的消息;5月13日11点42分,播报联合国表示随时准备支援中国政府救助四川地震灾区的新闻;5月14日4点58分,直播海外包括香港《大公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等在内的媒体关注汶川地震的报道,其中英国的《金融时报》,认为从北京到边远的贵州,可以看到整个行政体系都在把“及时公开准确信息”,作为稳定民心的关键,电视、网络甚至手机短信,都成为官方信息的发布渠道。几乎每隔几个小时,CCTV“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直播都会向全国人民报道,联合国、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沙特、巴基斯坦等等国家对中国从物质到人员的支持。在整个国际援助报道中,CCTV把重点放到了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行动上。5月14日7点47分,转引据俄罗斯塔社13号报道,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当天出动1架伊尔-76运输机,向中国运送地震救灾物资;5月15日22点31报道日本救援队抵达中国协助救援;5月16日4点13分,中国政府本着邻近、快捷原则,同意俄罗斯、韩国、新加坡三国政府派遣专业救援人员赴四川地震灾区协助救援行动;5月16日9点27分,报道中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在15号的发言,四川发生强震之后,日本政府和人民最先向中国人民表达同情和慰问,日本救援队也是第一支抵达中国的外国救援队,抗灾救灾、以及防灾能力合作,将成为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新亮点;5月17日11点32分的直播中,回顾了16日国际救援队的人员和装备情况。5月16日下午,一行41人的韩国国际救援队抵达成都,他们中的三分之二人员都参加过7次以上的地震救援工作,极富经验。日本第二批救援队一行32人,以消防队员为主,协助第一批搜救队员做相关善后工作。主持人文静说“衷心地感谢你们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让我们觉得亲如一家。”代表了那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

13) <http://blog.sina.com.cn/jsck>

中国的网络媒体也发表和转载相关话题的消息,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跟帖。中国网民最关注的是日本和韩国媒体的报道。《朝鲜日报》北京分局局长朴胜俊在文章《加油,中国》中说“希望他们不要总是说‘我们的奥运会,我们的五星红旗’,摆脱这种只强调自己主张的形象,顶住地震这个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痛苦,成功举办奥运会。‘加油,中国!’”韩国《东亚日报》5月19日文章说遭遇四川大地震的中国人创造了各种口号和话语,通过充满智慧的古代词句来互相激励,与灾难抗争。《朝鲜日报》记者全炳根(2008年5月15日发表)中国制造不良食品、医药品风波、西藏事件、各国的奥运圣火传递过程频频受到干扰,现在又遭遇大地震……中国似乎四面楚歌。外电评价说,但随着中国政府在应对此次大地震上显示出迅速且开放的应对方式,也许会因祸得福。全球华人也踊跃加入到捐款和献血的行列之中,展现出“团结成一体”的惊人凝聚力。这些报道和评论让中国民众体会到外媒的客观和友好,联系国际援助的事实,感动了当时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中国人。

奥运火炬全球传递中群情激昂的“80后”“四月青年”被一些外国媒体评为民族主义高涨的群体,引发中国国内外学者的担忧;在“5·12汶川地震”的救灾中,民族主义情绪转换成互帮互助、空前团结的人性力量。虽然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对于风波频起的2008年的中国来说,却是一个缓和外交形象的契机。中国主流媒体及时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对内不断宣传国际社会的救援和赞扬,对外尽量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抗震救灾第一个月中几乎每天都召开由不同政府部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

(二) 媒体凸显中国大国责任意识

真正把中国推向世界经济舞台前台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8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大幅攀升,导致广东、山东等很多省份的小型出口商品生产企业纷纷破产。在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的冲击下,世界范围内潜藏的金融风险和中国出口贸易困境被媒体有意识地弱化了。直到2008年9月14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标志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开端,同时掀起了全球性金融危机蔓延的序幕。从2008年3月开始CCTV对初见端倪的全球性金融风险进行了报道,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依赖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困境的选题上。直到9月20日,CCTV特别在经济频道开设了特别策划专题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以每天一期的频度在CCTV-2的晚间黄金时段18:05和20:55播出,以主持人芮成钢与经济和金融专家的访谈为主体,穿插大量专题片,共同解读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和即时发展。在整个金融危机报道中,CCTV把很多的篇幅集中在10月24日和25日的第七届亚洲首脑会议上。这次会议临时更改会议议题,集中探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对策。中国政府首脑在第七届亚洲首脑会议上的态度和立场从一个层面反映了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基本的外交思路。

在10月21日的CCTV-4的《中国新闻》报道中说,美国提出召开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峰会的倡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解决金融危机问题,平等协商应该是各国磋商的基本原则,应对方案要尊重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他表示,中方主张国际社会应该平等协商,加强合作,来共同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本周末在北京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上,亚洲和欧洲45国领导人将通过双边和多边磋商,讨论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方案,秦刚表示,中方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和协调。这给了世界一个信号,中国是积极参与全球性抵御金融危机行动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协商和尊重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在24日第七届亚洲首脑会议开始前,CCTV的《新闻30分》《晚间新闻》《东方时空》《新闻会客厅》等重要新闻节目都纷纷报道西方国家领导对中国的评价和建议,比如,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1日称赞中国是全球经济在动荡时期的“重要引擎”,并赞赏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承担的责任和合作精神;美国白宫发言人弗莱托22号表示,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问题上,中国将发挥“稳定者”的角色。他还高度评价即将在北京

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认为此次会议“极其重要”。在今年北京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上,能源和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重要话题必然不可回避,但是对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这一严峻现实更让人关注。

《东方时空》节目归纳近期世界各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发表的评论,诸如,法新社10月7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在金融风暴中表现出帝国般的镇定》,文章中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特色性使得这个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受到了保护,它在提供援助的同时确信能够应付;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7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对金融混乱的观点:警惕但自信》,文章说:中国的管理者相信,渐进而慎重的改革帮助中国避免了当前市场混乱中最糟糕的一面;英国《经济学家》10月11日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经济,是多米诺骨牌还是发动机?》,文章总结说:中国已经为采取财政刺激措施做好了准备,而这也是外界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发动机不会停歇的最主要原因;路透社在10月8日的报道说: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储备,也许会在平息全球金融风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10月8日对媒体表示:中国经济可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对当前世界经济来说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言强调,“当前的全球危机凸显了世界领导人进行全面的对话,加强理解,加深协调的重要性。”而且发出警告,“不可能通过关上自己的大门独善其身去迎接这些挑战,我们都曾经从开放的商业环境和贸易当中受益,所以,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经济的民族主义。”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呼吁,“欧洲人将要用一个声音说话,我们将要推出我们共同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倡议,我们希望亚洲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一努力”。欧洲希望能够在这次会议上寻求亚洲国家的支持,共同面对目前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年前的1998年,当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召开时,适逢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亚洲经济在短时间内复苏作出了贡献和牺牲。10年后的今天,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又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下,世界需要中国怎样的合作呢?身兼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说,在11月份召开的国际金融峰会上,“如果缺乏像中国、印度等这样的亚洲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觉得,在此次金融危机风暴中,欧洲国家至少是需要寻求亚洲国家的支持,联合起来一起来共同面对目前的金融危机。从他的这番话也可以反映出,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

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中,亚洲国家的观点和立场不尽相同,韩国希望同中日、东盟联合建立外汇储备金,帮助外汇短缺的国家;而日本首相在亚欧峰会期间则表示,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影响有限。虽然欧盟力主彻底改革目前的金融体制,但日本暗示主张维持现有国际金融体制。这个观点来源于亚洲经济韧性还很强,亚洲各国外汇储备充足,亚洲面临的形势与美欧不同。

面对国际金融的动荡和中国的经济形势,温家宝总理近期在多个场合强调: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在亚欧首脑会议开幕式致辞中,中国主席胡锦涛强调,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当前,有两点是关键,一是信心,一是合作。通过合作来重塑信心,共渡这场危机。在合作方面,中国政府与东盟、日韩建立800亿美元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理论上是为了防止个别国家出现“外汇短缺”;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指出,针对亚洲区域内经济体特别是越南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中国应该出手向越南提供贷款援助,并通过区域货币合作的框架倡导东亚国家联手防范危机;路透社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对越南的问题非常关注,如果能达成共识的话,进行双边援助可能是最具操作性的选择。

从CCTV以上的报道来看,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亚洲国家的声音,在通盘考虑本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关切他国的现实。

IV. 中国国际观的发展变化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2008年10月18日在戴维营与美国总统布什会面时强调：“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讲话中认为，“目前的全球金融体系已不能反映今天的世界经济形势”。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构想，国际社会应考虑建立包括西方7国和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内的14国集团(G14)或范围更大的新集团，甚至有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建议，不妨提升目前20国集团(G20)的层次，使这个包括西方七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组织成为协商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重要平台。当前似乎要进入一个重置世界金融、政治、文化新秩序的新时期。日本就有自民党议员田村太郎主张“抄底”欧美金融市场，认为日本可以成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救赎者。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认为随着美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相对衰退，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可避免也将衰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守护者，而是包括中国、印度、欧洲和日本等多方共同监管世界经济。更多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希望中国能在这次金融海啸中担当大国的责任。

我认为，中国将如何应对，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对当前世界金融形势的分析以及对自身经济实力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目前的国际观。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当代领导的外交思想的不同阐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理论，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当代领导人的“和谐世界”，体现了中国国际观的发展。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号召“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晚年的这个外交思想非常重要，它的提出，对于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寻求朋友，打破前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孤立中国的计划，改善中国国际环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为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着力搞经济建设，这个外交思想就有了其不可回避的局限性。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理论体现了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定位。

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而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美苏两极冷战格局不复存在，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失衡。面对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与中国承受的巨大压力，1989年9月，邓小平向几位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指出：“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990年12月，邓小平又对几位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谈到：“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邓小平在冷战结束之际的这些重要谈话，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国在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时采取的20字战略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简称“韬光养晦¹⁴⁾、有所作为”。

邓小平早就提出过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¹⁵⁾，后来江泽民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体说来，中国关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新国家关系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¹⁶⁾在“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阐述中，已经考虑到亚洲各国关系的问题，中国“绝不当头”，与包括东盟、印度在内的亚洲各国为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发挥作用。

2005年4月22日，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的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同年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同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优化国际秩序，对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在外交方面，中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的交往和关系是对“和谐世界”理论最好的实践，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10+3”合作、中韩日合作、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桥梁，努力建设和谐周边，积极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表现了中国全力展示一个自信且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信心和努力。

主流媒体以国家外交政策为原则，以广泛传播、实实在在的报道打破亚洲国家之间的模糊、片面、刻板的文化想象，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不仅让中国观众看到并了解原汁原味的其他邻国，而且通过电视机构、节目之间的合作，展现真实的中国现实，彰显中国当前国际观的实质。

2008年是中国经历复杂的一年，特别是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方面更是一波三折。在国际政治、经济、体育和两岸关系都面临新行使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国际观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都发生了很多改变。正如新加坡东南亚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阿萨德·拉蒂夫在11月1日的《海峡时报》发表的题为《年轻人眼里的中国》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这个中国要在强权围坐的桌边寻找自己的位置：不是赶走已经坐下的人，而是要求一张更大的桌子。”

14) “韬光养晦”一词出自《旧唐书·李元昊传》，原文是“历太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意思是指隐藏才能，不使之外露。

1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2-413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2、328、359-360页。

16)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9页。

근대 주류 언론 보도에 나타난 중국의 세계관 변천 과정

- ‘조화로운 세계’라는 신질서를 외치는 아시아의 목소리 -

柴 璠 (中國傳媒大學校)

〈목 차〉

- I. 해석의 틀
 - 1. 연구 대상
 - 2. 연구 방법론
- II. ‘투데이 아시아’가 보도하는 아시아인의 아시아
- III. 주요 뉴스 보도에 나타난 ‘조화로운 세계’라는 세계관
 - 1. ‘조화 속의 차이[和而不同]’¹⁾—서구 사회의 외교적 도전에 대한 대응
 - 1) 프랑스에 대한 중국의 이성적 태도를 보여준 언론
 - 2) 원칙 존중을 위한 중미 언론 대결
 - 2. ‘화합 최우선[以和爲貴]’²⁾—아시아 주변국과의 갈등에 대한 신중한 처리
 - 1) 한중 ‘설전’에 대한 언론의 신중한 태도
 - 2) 한중 ‘설전’의 전과 후
 - 3. ‘다양성의 조화[和實生物]’³⁾—언론에 의해 재형성된 중국과 세계의 이미지
 - 1) 국제적 존경을 얻어낸 ‘능동적 자세[有所作爲]’
 - 2) 언론이 부각시키고 있는 중국의 대국으로서의 책임 의식
- IV. 중국 세계관의 변천

2006년 8월 3일 중국 정치협상회의 의사위원회 부주임 자오치정(趙啓正)은 일본 동경에서 열린 제2회 ‘도쿄·베이징’ 포럼에서 중일 관계 개선을 위해 양국 간에 내용과 의미를 풍부하게 발전시킨 ‘공공 외교(public diplomacy)’의 필요성을 역설하였다. 공공 외교는 주로 양국 간 다양한 채널의 교류를 통해 일반인들 사이에 정확한 상호 이해와 인식을 도모하여, 양국의 정치 및 경제 관계 발전을 위한 광범위한 여론적 기반을 조성하는 역할을 한다. ‘공공 외교’ 개념은 공식 외교나 정부간 외교를 보완하는 개념으로, 그 함의나 내용이 훨씬 풍부하다. 필자는 대중 매체의 보도가 바로 ‘공공 외교’를 위한 가장 효과적인 채널이라고 본다. 자오치정 부주임의 발언은 중일 양국 관계 강화만 아니라, 중국과 아시아 다른 나라

1) 역자주: 남과 사이 좋게 지내기는 하나 무턱대고 동조하지는 않는다는 뜻. 『論語』의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에서 나온 말로, “군자는 남들과 조화를 이루지만 똑같이 하지는 않고, 소인은 남들과 똑같이 하지만 조화를 이루지 못한다.”는 의미이다.

2) 역자주: 『禮記』의 “禮之用和爲貴”에서 나온 말로, “예를 행하는 데에는 조화가 가장 중요하긴다”는 의미이다.

3) 역자주: 『國語』의 “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에서 나온 말로, “다른 것들끼리 만나서 조화를 이루고 협조하면 만사 만물이 번창하지만, 차이를 말살하고 동일하게 해버리면 지속되지 못한다”는 의미이다.

와의 현실적인 관계에도 적용 가능하다. 각 나라별로 보도 관점이나 보도 방식 등에 차이가 있지만, 언론이 객관적이고 진실한 보도로 다른 나라를 존중하고 평등하게 다룬다면 정치, 경제, 사회, 문화 등 각 분야의 구체적이면서도 생생한 정보 소통을 통해 아시아인들이 서로 가깝게 느끼도록 만들고 나아가 더 수준 높은 협력까지 가능하게 할 수 있다. 『논어(論語)』 「자로(子路)」편을 보면 “염공이 정치에 대해 물으니, 공자왈 ‘가까운 자는 기쁘게 하고, 먼 데 있는 자는 오게 하는 것이다.’ 고 하였다.” 고 한다. 공자의 정치관을 한층 폭넓게 이해하여 발전시켜 본다면, 중국은 ‘조화로운 세계’ 라는 국제 질서 구상에 따라 외교 분야에서 ‘가까운 자를 기쁘게 한다’ 는 원칙을 쉽없이 실천하면서 그 깊이를 더하고 있다고 필자는 생각한다. 중국은 자기 자신의 진보와 발전을 통해 ‘가까운 자’ , 즉 아시아 각국과의 우호적인 공감대 형성을 추구할 뿐 아니라, 대중 매체라는 채널을 통해 자신감 있는 태도로 책임지는 대국의 이미지를 만들어 나가기 위해 노력하고 있다.

어떤 의미에서 역사는 어제의 퇴색된 뉴스이며, 뉴스는 내일의 진실된 역사라고도 할 수 있다. 본고는 2008년 중국 언론 가운데 몇 가지 중요한 뉴스를 중심으로 관찰·분석하여 2008년 뉴스 보도의 역사를 기록하면서, 다음과 같은 하나의 결론을 도출하고자 한다. 그것은 바로 21세기 들어 더 막중한 ‘대국의 책임’ 을 기꺼이 짊어지고자 나선 중국이 아시아 각국과의 협력 강화와 공동 발전을 통해 아시아 국가로서 아시아 스스로의 목소리로 아시아의 정치, 경제, 문화의 입장과 가치관을 부각시킴으로써, 오랫동안 우위를 점했던 서구 사회에 객관적이고 진실된 아시아를 적극 보여주려 한다는 사실이다.

I. 해석의 틀

먼저 본고의 연구 대상과 연구 방법론을 밝히고자 한다.

1. 연구 대상

- 1) 본고에서 다루는 ‘최근’ 이란 2008년 올림픽 개최를 전후한 시기를 가리킨다. 중국 후진타오(胡錦濤) 국가 주석은 제7회 아셈 정상 회의 개막식에서 “과거 몇 달 동안 중국 인민은 평범하지 않은 시간을 보냈다.” 고 언급하였다. 2008년은 중국 현대사에서 개혁 개방 30주년이라는 역사적 좌표로서의 의미를 가질 뿐 아니라, 더욱이 이 해에 중국에 국민 생활과 국제 관계와 관련한 중요 사건들까지 일어났기 때문에 역사적으로 깊은 기억을 남기는 한 해가 될 수밖에 없다.
- 2) 본고에서 다루는 주류 매체(Mainstream Media)란 다음과 같다. “(1) 당과 정부 및 인민의 대변인 기능을 하면서, 일반 언론 매체와는 비교할 수 없는 권위와 영향력을 가지고 있어, 국제 사회와 국내 각계에서 당과 정부 및 대다수 인민의 뜻, 목소리, 주장으로 간주되는 권위 있는 대표적 언론이다. (2) 사회의 주류 이데올로기와 가치관, 즉 중국에서 사회주의 이데올로기 및 이에 상응하는 가치관을 체현하고 전파하면서, 사회 발전의 주

요 방향성을 견지하고 주도하는 측면에서 강력한 영향력을 가지고 있다. (3) 비교적 공신력이 커서 그 보도나 논평을 사회 대다수 인민들이 주목하고 스스로의 사상이나 행동의 근거로 삼기 때문에, 국내외 언론의 전재, 인용, 분석, 평가에 자주 활용된다. (4) 국내외 정치, 경제, 사회, 문화 등 분야의 주요 동향 보도에 주력하고 있어, 역사 발전의 주된 맥락을 기록한다. (5) 기본 수용자층이 사회 각계 각층의 대표적인 그룹이다. (6) 발행량이 많거나 청취 또는 시청 비율이 높아 광범위한 수용자층에게 영향력을 가진다.”⁴⁾ 전문적인 연구 방향에 맞추어, 본고는 주요 언론 매체인 라디오와 TV 매체를 연구 대상으로 삼는다. 예를 들어 중국 인민 라디오 방송국, 중국 중앙 TV방송국, 중국 국제 라디오 방송국, 각 성급 이상의 라디오 방송국과 TV 방송국 등이 있다.

- 3) 주류 매체의 보도는 중요한 뉴스 사건과 중요한 뉴스 의제에 관한 보도로 제한한다. 특히 세계적으로 중요한 반향을 일으킨 뉴스 칼럼을 집중적으로 연구한다. 여기에는 전세계에서 진행된 베이징 올림픽 성화 봉송, ‘5·12 원찬 대지진’ 및 지진 구호 활동, 제7회 아셈 정상 회의 등이 포함된다.

2. 연구 방법론

본고는 다음의 두 가지 측면에서 주류 매체를 통해 드러난, 국제 사회에 대한 중국의 기본적인 사고 방식을 관찰한다.

1. 중국 정부가 가장 중요시하는, 당과 정부의 ‘목소리’ 인 중국 중앙 TV방송국이 새로 편성한 ‘투데이 아시아(今日亞洲)’는 아시아 각국의 TV방송국과 협력하여 프로그램을 교환하고 있다. 이에 따라 아시아 각국에서 자체 보도한 정치, 경제 주요 뉴스와 사회, 문화 정보를 ‘투데이 아시아’가 다룬다. 이 프로그램은 중국 시청자들이 아시아에 주목하면서 세계로 시야를 넓히도록 만드는 창구 역할을 하고 있다. 이를 통해 ‘투데이 아시아’는 중국 시청자들의 관심과 흥미를 주도하는 주류 TV 매체로서의 역할을 강화하여, 아시아 문화에 대한 중국인들의 정체성을 일깨우고 있다.
2. 주요 뉴스 의제는 올림픽 성화의 전세계 봉송, ‘5·12원찬 대지진’ 보도 및 제7회 아셈 정상회담 보도로 설정한다. 이러한 의제를 다루면서 주류 TV 매체는 국제 사회의 반응을 집중 보도하는 동시에, 나름의 원칙을 가지고 힘찬 목소리를 통해서 ‘화합 최우선以和爲貴’, ‘조화 속의 차이和而不同’, ‘다양성의 조화和實生物’ 및 ‘조화로운 세계[和諧世界]’라는 중국의 국제관을 표명하고 있다.

II. ‘투데이 아시아’가 보도하는 아시아인의 아시아

중국 주류TV 매체인 중국 중앙 TV 방송국(이하 CCTV)의 뉴스 프로그램 편성이나 보도

4) 新華社, ‘여론 주도의 효과와 영향력 연구(輿論引導有效性和影響力研究)’ 프로젝트팀의 연구 성과 「主流媒體判斷標準和評價」, 『中國記者』, 2004년 제5기.

내용을 보면, 국제 문제와 국제 관계에 대한 뉴스는 일반적으로 사건이나 인물이 중요하거나 시효성이 있더라도 항상 가장 마지막 부분에 넣는 경향이 있다. 또한 중국 주류 라디오 TV 매체의 중국어 보도 프로그램은 전문적인 국제 뉴스 프로그램을 별도로 마련하고 있다. 그 예로는 CCTV의 뉴스 프로그램인 ‘국제 단신[國際時迅]’, ‘글로벌 정보 게시판[全球資訊榜]’, ‘글로벌 정보環球資訊’, 중앙 인민 라디오 방송국(이하 CNR)의 뉴스 프로그램인 ‘세계보도[世界報道]’, 베이징TV 방송국의 대담 프로그램인 ‘국제 쌍곡선[國際雙行線]’ 등이 있으며, CNR의 ‘경제의 목소리[經濟之聲]’와 베이징 TV 방송국 경제 채널에는 모두 ‘천하 경제[天下財經]’이라는 프로그램이 들어가 있지만 국제적인 소재를 선택하는 경우는 많지 않다. 이 밖에도 동방 위성(Dragon TV)의 120분 짜리 아침 뉴스 프로그램인 ‘동방의 아침[看東方]’은 주로 상하이와 중국 국내의 뉴스, 날씨, 칼럼, 대담, 생활 서비스 등을 전하고 있으며, 단지 ‘두팡 아시아 여행기[杜邦東游記]’에서 아시아 다른 나라의 여행 정보를 다루고 있을 뿐이다. 조사 결과 다른 성급 TV 방송국과 라디오 방송국의 국제 뉴스 및 보도 편성도 중앙 세 방송국(CCTV, CNR, CRI)과 거의 비슷하다.

모든 국제 뉴스 보도 프로그램 가운데 아시아에 관련된 전문 프로그램은 2008년 7월 28일 시작된 중앙 TV 방송국 중국어 국제 채널(CCTV-4)의 ‘투데이 아시아’가 유일하다. 2008년 베이징 올림픽을 전후한 중국 주류 매체의 보도를 살펴보면, ‘아시아인의 시각으로 아시아를 바라보고, 아시아의 진보와 발전을 보여주며, 아시아 경제 발전의 맥박을 잡아내고, 아시아의 풍부하고 다채로운 문화를 표출하며, 아시아와 세계의 선순환 과정을 반영하고, 중국과 아시아 각국의 협력과 공영을 홍보한다’⁵⁾는 취지 하에 편성한 ‘투데이 아시아’는, 중국이 아시아로서의 정체성을 가지고 아시아 정세와 아시아 문제 및 중국과 아시아 각국과의 관계를 중요시하고 있다는 사실을 반영한 것이다.

‘다채로운 아시아의 보여주고 아시아의 목소리에 귀 기울이는’ 프로그램으로 포지셔닝하고 있는 CCTV-4의 ‘투데이 아시아’는 사회자가 영상을 통해 보도하는 형식의 30분짜리 프로그램으로, 베이징 시간으로 매주 월요일부터 토요일까지 오후 10시에 방송하고, 이튿날 오전 7시에 재방송한다.

‘투데이 아시아’ 프로그램의 탄생의 배경에는 다음과 같은 현실적인 고려가 있었다. 국제 통화 기금(IMF)에서 발표한 최근 보도에 따르면, 2007년 중국을 포함한 신흥 시장의 발전 속도는 선진국의 4배 이상이라고 한다. 세계 GDP 성장 가운데 신흥 시장의 비중이 50%에 이르며, 전세계 외환 보유고의 75%를 보유하고 있다. 이들 신흥 시장에는 한국, 인도, 중국 등이 포함된다. 2007년 세계은행이 발표한 구매력 기준 글로벌 5대 경제권에 아시아 3개국이 포함되었다. 이 가운데 중국은 세계 GDP의 9% 이상을 차지하고 있고, 일본은 세계 3대 경제로서 전세계 GDP의 7%를 차지하고 있으며, 인도는 세계 5대 경제로서 세계 GDP의 4% 이상을 차지하고 있다.⁶⁾ 최근 선진국 경제가 금융 위기로 인해 어려움을 겪는 가운데에도, 신흥 경제권이 ‘세계 경제 안정의 원천’이 되고 있다고 생각하는 사람들이 늘고 있다. IMF는 2008년 선진국 경제의 침체는 더 심해지겠지만 신흥 경제권의 주도로 세계 경제는 여전

5) 투데이 아시아 프로그램 소개. <http://news.cctv.com/society/20080729/104861.shtml>

6) <http://www.amr.gov.cn:8080/dsj.nsf/efd4cc8e8edfb27c48256a7800205a1c/95433d6d87b0cc11482573bc0009208f?OpenDocument>

히 4.1% 성장할 것으로 전망하고 있다.⁷⁾ 비록 이것이 낙관적인 예측에 불과할 지라도, 최소한 아시아의 경제력이 현재 세계적으로 주목받고 있다는 사실을 설명하기에는 충분하다.

그러나 경제적인 관심과는 달리, 아시아는 정치적 지위 측면에서 구미 선진국과 대등한 자리를 잡지 못 하고 있다. 세계의 주류 언론 역시 아시아 각국의 문화 전통과 가치 체계를 총체적으로 객관적으로 평가하지 않고 있다. 서구 보도 가운데에는 아시아의 이미지를 왜곡하고 일방적으로 폄하하거나 심지어 ‘악마’ 처럼 묘사하는 목소리도 적지 않다. 아시아가 세계의 시야 속에 개방적으로 평등하게 진입하기 위해서는, 아시아 스스로가 내는 아시아의 목소리가 필요하다. 바로 이러한 배경을 속에서 CCTV가 ‘투데이 아시아’ 프로그램을 제작하게 된 것이다.

현재 ‘투데이 아시아’ 는 한국 KBS, 일본 NHK, 이란 PRESS TV, 카타르 반도 TV, 방글라데시 CHANNEL ITV, 파키스탄 PTV TV, 싱가포르 아시아 뉴스 방송국, 조선 중앙 TV, 캄보디아 CTN TV, 베트남 VTV TV, 아랍 에미리트 아부자비 TV, 오스트레일리아 CBS 등과 프로그램을 교환하고 있다. 이 밖에도 현재 협력을 논의하고 있는 TV 방송국으로 미얀마 TV, 라오스 TV, 말레이시아 라디오 TV 방송국(RTM), 인도네시아 메트로 TV, 인도 Zee TV, 시리아 TV, 스리랑카 TV, 피지TV 등이 있다. ‘투데이 아시아’ 가 다루는 주제는 주로 아시아 각국의 현지 핫이슈로서, 아시아 공영 방송국의 뉴스 프로그램을 활용해 그 날 아시아 각국에서 일어난 주요 사건을 보도한다. 이 가운데 매일 아시아의 새로운 정보를 모아서 보도하는 ‘아시아 정보 단신(亞洲資訊速覽)’ 은 방대한 정보량을 특징으로 하고 있으며, 그 날 아시아 각국의 공동 관심사가 된 핫이슈를 다루는 ‘지역 핫이슈(區域化熱點)’ 는 사건의 경과를 간단히 정리하면서 아시아 각국에 대한 영향과 반응을 살펴보고 있으며, 가벼운 내용을 주로 다루는 ‘놀라운 아시아(精彩亞洲)’ 는 주로 아시아 각국의 문화와 풍속 및 생활상 등을 소개하고 있다.

중국 인터넷에서 ‘투데이 아시아’ 로 검색해 보면 Google에는 766개의 관련 뉴스가 뜨고, 바이두(Baidu)에는 1940 개의 관련 뉴스가 뜬다. 중앙 방송국 웹사이트(CCTV.com)의 138개 게시판(BBS)을 보면 긍정적인 평가가 많다. 이 가운데 일부를 소개해 보면, “이 프로그램은 아시아 각국의 정보를 훨씬 시야를 넓혀 다루고 있다. 전쟁, 경제, 정치와 같은 분야에 국한하지 않고 풍속이나 생활상까지 다루고 있어 정말 좋다! 프로그램 형식도 신선한 편인데, 특히 아시아 공영 방송국의 사회자를 직접 본다는 것은 국내에서 드문 경우다.” , “계속 프로그램 소스를 확대했으면 한다.” , “아시아 각국의 단신 소개에 앞서 아시아 전역의 지도를 보여주었으면 한다. 지도를 통해 소개하는 국가의 지리적 위치를 알려주면 시청자들이 더 직관적으로 이해할 수 있을 것 같다. 그리고 각국 단신 뒤에 일본의 벚꽃, 태국의 불교 건축, 인도의 아시아 실리콘 밸리 등 아시아 지역의 생활이나 전통 문화에 관한 테마 단신을 편성했으면 좋겠다.” ⁸⁾ , “그 동안 유럽이나 미국에 대해서는 잘 알고 있는 편이지만, 오히려 주변 아시아 국가의 발전 상황에 대해서는 전혀 모르거나 별로 아는 것이 없었는데, 이 프로그램이 마침 이러한 갈증을 풀어주어 우리 자신의 주변에서 일어난 변화를 이해하는데

7)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1/01/content_10289471_1.htm

8) <http://fuxing.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11857360&extra=&page=1>

도움이 된다. 단지 프로그램 시간이 좀 짧은 것 같다. 그리고 몇 번 본 느낌으로는 중동에 대한 보도가 부족한 대신 주로 동아시아, 남아시아, 동남아에 편중되어 있다는 느낌이다. 마지막으로 이 프로그램의 건투를 빈다!” , “모두 알다시피 중국은 다자간 외교와 지정학적인 측면에서 아시아 주변국을 매우 중요시하고 있어 동북아, 동남아(아세안), 남아시아는 우리가 늘 관심을 가지고 있고 또 관심이 날로 커지는 지역이다. 그러나 현재 중앙 방송국의 각 채널에 아시아에 대한 깊이 있는 보도나 해설을 하는 뉴스 평론 프로그램이 거의 전무하다. 따라서 이번 기회에 편성을 확대 강화하여 이러한 부분의 갈증을 풀어주기를 ‘투데이 아시아’에 강력하게 제안한다. 시각을 우리 주변에 맞춘다면 우리 스스로를 더 정확하게 인식하면서 발전할 것이다.” , “빠른 시일 안에 아시아 연합이 구축되기를 바란다.”⁹⁾, “중앙 방송국의 소중한 프로그램으로, 아시아를 이해하고 세계를 이해하도록 우리의 시야를 넓히고 있다! 봉황 위성 방송국의 PKPK만큼이나!”¹⁰⁾

이상과 같은 논평(comments)를 통해서 ‘투데이 아시아’가 중국인에게 아시아 다른 나라의 현실과 역사 및 문화를 이해하도록 일조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으며, ‘투데이 아시아’ 편성을 계기로 중앙 TV 방송국이 아시아 여러 국가의 방송국이나 기관과 양자간 협력을 진행하거나 협의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여기에는 뉴스 프로그램 제공, 특파원 파견, 공동 인터뷰 시스템 마련, 뉴스 판권 공유 등의 내용이 포함되며, 이러한 협력이 순조롭게 확대된다면 적어도 협력 국가 간의 교류와 이해를 크게 증진시킬 수 있다. 따라서 중앙 TV 방송국은 단순히 프로그램만을 제공한다고 보다는 아시아 TV 방송국을 망라하는 협력 메커니즘을 형성하는 역할을 하고 있으며, 이러한 메커니즘을 통해 ‘새로운 아시아’의 이미지를 전파하고 있다. 이는 아시아 각국 TV방송국의 호혜 상생을 의미할 뿐 아니라, 어떠한 의미에서 ‘투데이 아시아’는 아시아 이웃 나라에 대해 중국이 펼치고 있는 “근거리 외교”의 창구 역할을 톡톡히 해내고 있는 것이다.

III. 주요 뉴스 보도에 나타난 ‘조화로운 세계’라는 국제관

1. ‘조화 속의 차이[和而不同]’ — 서구 사회의 외교적 도전에 대한 대응

2008년 4월 1일부터 베이징 올림픽 성화 봉송이 전세계에서 진행되었다. 그 규모는 전례 없는 것이었으며, 참가자수나 진행 시간 및 경과 도시수 그리고 겪어야 했던 난관까지도 최대 기록을 세웠다. 중앙 TV 방송국의 뉴스 채널은 전세계 매체에 공용 신호를 제공하는 동시에, 3월부터 5개월 동안 생중계로 추적 보도하였다. 이는 올림픽 성화 봉송의 전 과정을 생중계한 역사적인 일로서, 시청자들의 관심도 전례 없을 만큼 뜨거웠다.

하지만 외국에서 진행된 올림픽 성화 봉송 과정에는 우여곡절이 많았으며, 정치적인 건

9) <http://fuxing.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11857360&extra=&page=2>

10) <http://fuxing.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11857360&extra=&page=4>

注: 凤凰卫视(PHOENIX TV)是香港以具有國際視野報道特征而著名的电视频道.

해가 다른 이들의 성화 봉송 방해는 일부 서구 국가의 중국에 대한 적대감을 부추겼다. 이로 인한 중국과 서구의 외교적인 ‘대결’은 당시 국제 사회의 큰 관심과 반응을 일으켰다.

1) 프랑스에 대한 중국의 이성적 입장을 보여준 언론

2008년 4월 7일 베이징 올림픽 성화가 파리에 도착하자, ‘티벳 분리’ 세력은 중국의 장애인 선수인 진징(金晶)의 손에서 성화대를 빼앗으려 했으나 실패하고 말았다. 이로 인해 봉송대와 충돌한 그들은 중국 유학생들을 모욕하고 중국 국기인 오성홍기를 짓밟았다. 프랑스의 일부 언론, 특히 르피가로지나 리베라시옹지 등은 마치 불난 집에 부채질하는 듯이 불공정하게 보도하였다. 이 일이 중국 언론에 보도된 이후 중국 네티즌들은 프랑스 자본 대형 마트인 까르푸 제재를 제안하였고, 전국 각 대도시에서 네티즌의 호응을 얻었다. 이 사건은 빠르게 ‘까르푸 사건’으로 확대되어 국제 사회의 주목을 받게 되었다. 2008년 4월 10일 CCTV의 아침 뉴스 프로그램인 ‘세계의 아침[朝聞天下]’은 신화사의 사진과 ‘노동자 일보[工人日報]’, ‘해방군보[解放軍報]’ 등 중국 주요 신문의 보도와 논평을 인용하여 CCTV의 입장을 피력하였다. 이와 함께 네티즌(netizens)들이 게시판에 남긴 말과 논평(comments)을 대거 방송에 내보냈는데, 모두 해외의 티벳 분리주의자들을 비판하는 목소리들이었다. 한 네티즌은 “결정적인 순간이 오면 진실한 마음이 드러난다. 조국은 우리 마음 속에 너무나 소중하다. 우리는 생명을 바쳐 조국을 지켜야 한다. 그 순간 성화는 우리의 존엄을 상징했다. 결코 ‘티벳 분리’를 주장하는 분열주의자의 구정물 세례를 용납할 수 없다.”¹¹⁾고 글을 남겼다. 이 밖에도 티벳 소수민족의 논평도 인용하였다. 일례로 퇴직한 티벳 노간부 취자(曲扎)는 “보름 전에 라싸(拉薩)에서 분열주의자들이 돌을 던지고 불을 질러 검은 연기가 감돌고 인심이 흉흉해졌다. 지금 다시 나라 밖에서 올림픽 성화 봉송을 방해하고 있는 그들은 우리 민족의 배신자이다. 그들의 행동을 보고 나는 부끄러웠다!”고 말했다. 라싸 중고등학교에 다니는 티벳 학생 시라오(西繞)는 “조국이 날로 발전하고 있는 지금, 우리는 올림픽 성화가 하루 빨리 라싸에 도착하기를 기대하고 있다.”며 “방해와 파괴는 올림픽 성화에 대한 모독이며 또한 전 인류의 우정에 대한 모욕이다. 그래서 나는 이러한 비열한 행위를 강력히 규탄한다.”는 의견을 피력했다. 티벳 자치구 주석인 상바핑취(向巴平措)는 다음과 같이 지적하였다. “선량하고 소박하며 순박한 티벳 민족은 은혜를 알고 은혜를 갚을 줄 아는 민족이다. 티벳 민족의 이름을 내걸고 그런 짓을 하다니, 티벳인의 한 사람으로서 정말 부끄럽게 생각한다. 그들의 행동은 자신들의 본색을 세계 사람들에게 드러내기에 충분했다.”¹²⁾ 4월 7일부터 4월 25일까지 CCTV의 연합 뉴스[新聞聯播], 30분 뉴스[新聞30分], 정시 뉴스[整點新聞], 중국 뉴스[中國新聞], 60분 뉴스[新聞60分], 글로벌 단신[環球時迅], [중국인 세계[華人世界], Oriental Horizon[東方時空] 등 프로그램은 다양한 형태로 이 사건을 보도하면서, 티벳 분리주의자들의 올림픽 성화 봉송 방해 활동을 강력하게 비난하였다. 4월 25일 CCTV의 유명한 뉴스 프로그램 ‘Oriental Horizon’의 ‘외교 위기 와중의 중불 상호 방문’은 이

11)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410/100495.shtml>

12)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410/100495.shtml>

모든 ‘유쾌하지 못한 사건(라파랭 프랑스 전총리의 표현)-파리 성화 봉송 폭력 사건 (Oriental Horizon의 표현)’을 다음과 같이 총정리하고 분석하였다. 4월 7일 파리에서 성화가 전달되는 과정에서, 중국 장애인 성화 봉송 주자 진정(金晶)은 성화를 강탈하려는 티벳 분리주의자의 공격을 받았고, 이는 재불 중국인과 중국 민중들의 큰 분노를 일으켰다. 이어 중국의 수많은 도시에서 까르푸 불매 운동이 전개되었다. 4월 19일 프랑스 파리의 중국인들이 만인 집회를 열고 프랑스 2방송국 등 언론의 중국에 대한 편파 보도에 항의하였다. 중국 유학생 리환(李洹)은 연설을 통해 프랑스 언론과 반중국 세력의 진실하지 않은 보도를 질타하면서 민주주의와 평화를 사랑하는 프랑스 민중들에게 이에 현혹되지 말고 진상을 직시하라고 호소하여, 그 자리에 참여한 중국인들의 환호와 뜨거운 눈물을 자아냈다. 해외 중국인과 중국 국내 민중의 집단적인 항의는 중국 정부의 주목을 불러일으켰다. 정부는 민중들에게 이성적인 대처를 권유하는 한편, 외교부 대변인 장위(姜瑜)의 엄숙한 성명을 통해, 달라이 라마를 명예 시민으로 위촉하려는 파리 시장의 행동에 반대하였다. 후진타오(胡錦濤) 주석 역시 프랑스 사르코지 대통령에게 친서를 전달하였다. 4월 15일 중국 외교부는 대변인의 연례 기자회견을 통해 “이번 일에는 그럴 만한 이유가 있다고 개인적으로 생각한다. 프랑스 측은 깊이 반추하고 성찰해야 할 것이다. 중국 민중들은 합법적으로 자신들의 합리적인 요구를 표출한다고 믿는다.”고 견해를 밝혔다. 일주일 동안 세 차례나 중국에 특사를 파견한 프랑스 정부의 우호적인 의사 성의 표시는, 외교 위기에 봉착했던 중국과 프랑스 관계에 전환의 계기가 되었다. ‘Oriental Horizon’은 푸단대학(復旦大學) 유럽문제연구센터 부주임 덩춘(丁純) 교수와의 전화 인터뷰를 통해, 프랑스 문제에 대한 정부의 외교 방침을 해석하였다. 덩춘 교수의 견해에 따르면, 프랑스는 UN 상임이사국의 일원으로, 상임이사국 가운데 영국과 미국이 한 편이라면 중국과 러시아가 비교적 관계가 가까운 편이고, 프랑스는 중립적인 한 표에 해당한다. 중국과 프랑스 사이에는 그 동안 전략적으로 이견이나 충돌이 없었기 때문에, 중국으로서는 전략적인 관점과 장기적인 안목으로 양국 관계를 다루어야 한다. 중국 TV 매체는 각계각층의 목소리를 방송에 내보내면서 세계에 하나의 목소리를 전달하였다. 그것은 바로 중국과 프랑스 양국이 갈등보다는 화합을 추구하며, 이는 양국의 전략적 협력을 위한 것일 뿐 아니라 조화로운 세계를 위한 소중한 공헌이라는 목소리였다.

2) 원칙 존중을 위한 중미 언론 대결

2008년 4월 10일, 베이징 올림픽 성화가 샌프란시스코에 도착했다. 녹화 중계를 담당한 미국 CNN TV의 방송 과정에서, ‘SITUATION ROOM’의 사회자 겸 시사평론가인 카퍼티(Cafferty)는 흥분한 나머지 성화 봉송과는 무관한 발언을 했다. 그는 감히 중국 제품을 ‘쓰레기’라고 부르면서 “과거 50년 동안 중국인은 기본적으로 늘 폭력 조직 또는 비적 무리였다.”고 공격적인 발언을 하였다. 카퍼티의 발언이 빠르게 여러 중국어 웹사이트로 알려지면서, 전세계 중국인의 격분을 샀다. 4월 14일에 이미 2만 명이 인터넷 서명에 참여하여, CNN의 공개 사과를 요구하면서 강력하게 항의하였다. 4월 15일 중국 외교부 대변인 장위(姜瑜)는 이 발언을 강력하게 비난하면서, CNN과 카퍼티 본인이 중국인에게 사과하라고 공식적

으로 요구했다. 4월 22일 뉴욕 주민 량수빙(梁淑冰)과 중국 여성 리모 씨는 CNN 및 사회자인 카퍼티에게 13억 달러의 배상금을 요구하는 집단 소송을 제기하였다. 변호사는 “모든 중국인에게 1달러씩 배상한다고 치면 그리 많은 금액은 아니다.” 라고 설명하였다. 소송 내용과 이유는 다음과 같다. 첫째, 피고는 모든 중국인을 모욕하고 멸시하였다. 둘째, 피고는 고의로 중국인에게 정신적인 손실을 입혔다. 셋째, 피고의 중대한 과실로 중국인에게 정신적인 상처를 초래했다. 런던과 파리의 성화 봉송 방해에 이어 샌프란시스코 그리고 CNN 사회자의 중국인 모욕 발언은 전세계 중국인을 완전히 격분시켜, 민족주의 정서가 팽배해지고 서구에 대한 민간 정서에도 큰 변화가 생겼다. 2008년 3월 20일 칭화대학(清華大學) 졸업생인 라오진(饒謹)은 안티 CNN 웹사이트(www.anti-cnn.com)를 개설하고, “스스로 목소리를 내는 동시에 서구인들이 이해하고 수용하는 방식으로 서구 네티즌을 이끌기를 바란다.”¹³⁾고 밝혔다.

중국의 각 주류 언론, 특히 CCTV, CNR 및 CRI를 포함한 라디오 TV 매체들은 실시간으로 반복해서 관련 보도를 내보냈다. 이는 광범위하면서도 깊이 있는 집중 보도였다. 예를 들어 CCTV의 연합 뉴스[新聞联播], 세계의 아침[朝聞天下], 30분 뉴스[新聞30分], 뉴스 응접실[新聞會客廳], 중국 뉴스[中國新聞], 정시 뉴스[整點新聞], CNR의 천하 경제[天下財經] 등은 카퍼티의 중국인 모욕 발언의 의미를 분석하였을 뿐 아니라, 중국 외교부 대변인이 공식적으로 밝힌 강력한 비난과 CNN에 대한 공개 사과 요구 성명을 그대로 보도했으며, 특히 프라임 타임(오후 8시 30분) 프로그램인 ‘뉴스 응접실’에서는 인터뷰를 통해 카퍼티 발언의 세부적인 내용을 분석하고 그 배경과 CNN 반응의 본질 등을 다루었다. ‘뉴스 응접실’ 등 중국 주류 언론은 서구 언론의 일부 해설자들의 “발언이 공신력을 가지려면” 전 인류의 지성과 공리에 도전해서는 안 되며, “동서양의 충돌과 교류는 예로부터 지금까지 그리고 미래에도 계속되겠지만, 서로를 존중하고 사실을 인정한다는 한 가지 원칙을 망각해서는 안 될 것”¹⁴⁾이라는 점을 반복적으로 강조하였다. 중국 언론과 CNN은 언론의 공신력, 직업 윤리 및 인류의 미덕을 둘러싼 공개적인 대결을 벌였으며, 이러한 대결은 중국인의 ‘조화 속의 차이[和而不同]’에서 ‘조화(和)’의 마지노선에 대한 해석을 보여주었다고 말할 수 있다. 그 마지노선은 바로 서로 간의 존중이었다.

2. ‘화합 최우선[以和爲貴]’ — 아시아 주변국과의 갈등에 대한 신중한 처리

1) 한중 ‘설전’에 대한 언론의 신중한 태도

2008년 4월 27일 베이징 올림픽 성화가 한국 서울에 도착하였다. 연합 뉴스[新聞联播] 현장 보도는 서울시 나진구(羅鎮求) 부시장의 치사, 화교와 유학생들의 성화 봉송 응원 모습, 저명한 한국 운동 선수들의 성화 릴레이 등의 화면을 부각시켰으며, 뉴스는 “한국 중앙 정부와 서울시 정부는 성화 서울 봉송을 매우 중요시하고 있으며, 현재 봉송 조직 작업에 박

13) http://gb.cri.cn/18824/2008/04/16/2225@2021316_1.htm

14) 2008년 4월 19일 CCTV ‘뉴스 응접실[新聞會客廳]’ 프로그램.

차를 가하면서 완벽을 기하고 있습니다. 베이징 올림픽 성화를 실은 전용기가 오늘 새벽에 한국에 도착해, 한국 올림픽 위원회 간부 등의 열렬한 환영을 받았습니다.” 는 내용으로 마무리되었다. 중국 주류 언론의 보도 기조는 기본적으로 CCTV 연합 뉴스(新聞联播)와 일치했다.

그러나 라디오 및 TV에서 재현된 열렬하고도 순조로운 장면과는 대조적으로, 수천 명의 중국인과 성화 봉송을 방해하는 단체 사이에 충돌이 있거나 한국 경찰과 기자가 부상을 입었다는 보도로 인터넷 여론이 들끓기 시작하였다. 뉴스 보도 및 게시판 댓글(comments)에서는 한중 양국의 네티즌이 서로 다른 입장에서 인터넷 ‘설전’을 벌였다. 한국의 신문, TV 등 언론은 중국 유학생과 성화 봉송을 저지하려는 한국 시민단체의 충돌만을 집중 보도하였다. 28일부터 한국의 각 주류 매체는 이를 ‘집단 폭력 행위’로 묘사하고, 뉴스 제목을 뽑을 때에도 의도적으로 선정적인 어휘를 골랐다. 예를 들면 ‘남의 나라 수도에서 백주대낮에 경찰에 폭력 행사’, ‘서울 중심가에서 흥기를 휘두르는 중국인’, ‘국가 주권이 침해받는 국치의 현장’, ‘오만한 중화주의……나치를 연상시킨다.’ 등과 같았다. 시민단체와 언론의 선동 및 압력 속에서 한국 정부 관료 역시 강경한 발언을 연이어 내놓았다. 한국 외교부는 5월 1일 “소동을 일으킨 중국 학생을 강제 추방할 것이다.”, “앞으로 중국 유학생과 중국인에게 비자를 발급할 때 엄격하게 심사할 것이다.”고 밝혔다. 다년간 외교관을 지낸 한승수 한국 총리는 중국 학생의 ‘폭력 행위’로 한국의 민족 자존심에 상처를 입었다며, “반드시 법적, 외교적 조치를 취해” 이 문제를 해결해야 한다고 하였다.

한국 민중과 정부의 분노와 비난에 대해 중국 언론은 신중한 태도를 취하는 한 편, 다음과 같이 중국 외교부 대변인의 기사 회견 석상 발언을 내보냈다. “베이징 올림픽 성화의 서울 봉송이 순조롭게 마무리되었고, 한국 정부와 국민들은 성화 봉송에 열정적인 환영과 적극적인 협조를 보냈다. 이는 베이징 올림픽에 대한 한국 정부와 한국인들의 관심과 지지를 보여주는 것이며, 양국 인민들의 우호적인 감정을 체현한 것으로, 중국측은 이에 감사를 표한다. 이번 성화 봉송 활동은 한국 체류 화교, 중국인 및 유학생의 열렬한 환영을 받았고, 그들은 올림픽을 지지하며 기대한다는 열정적인 모습을 보여주었다. 일부 단체가 성화 봉송을 방해하려고 파괴적인 행동을 해 중국 유학생과 일부 갈등을 빚었으나, 중국측은 이 과정에서 부상을 입은 한국측의 몇몇 경찰과 기자들에게 위문의 뜻을 표한다.” 한편, 주요 뉴스 대담 프로그램인 CCTV-4 투데이 포커스(今日关注)는 국제 문제 전문가인 칭화대학(淸華大學) 국제문제연구소 류장용(劉江永) 교수의 인터뷰를 통해 다음과 같은 입장을 전달하였다. “현재 중일 관계는 개선되는 방향으로 가고 있고, 중한 관계는 최근 2년 전반적으로 빠르게 발전하고 있다. 올림픽 성화 봉송이 한국과 일본에서는 전반적으로 잘 진행되었다. 그러나 성화 전달 과정에서 일부 불순 분자와 중국인 및 유학생들 사이에 개인적인 충돌 발생을 완전히 막을 수는 없었다. 한국과 일본은 이로 인해 휘날리는 오성홍기에 공포감을 가질 필요는 없다. 세계를 향해 중국은, 의도적으로 소란을 일으키는 일부 분열주의자가 아니라 현대 중국 청년들의 우수한 국민적 소양을 보여주는 데 집중해야 한다. 또한 세계적으로 우리가 상궤를 벗어나는 행동을 하도록 자극하려는 일부 적대 세력과 분열 세력이 비이성적인 적대감을 조장하고 있다는 사실에도 주목해야 한다. 우리는 함께 국내 질서를 훌륭하게 유지하여 중국인의 명예를 지켜야 하며, 중국 청년들은 애국적 열정을 합리

적이고 이성적으로 표현해야 한다.”

서울의 성화 봉송 과정 충돌 이후 언론에서 가장 관심을 기울인 뉴스는 한국 서울 방송국(SBS)이 베이징 올림픽 개막식 장면을 노출한 사건일 것이다. 한국 SBS는 7월 28일 올림픽 개막식 축하 공연을 촬영하여 29일 8시 뉴스에서 약 20분 가량의 장면을 방송하였으며, 사회자는 영상을 상세하게 소개하면서 평가까지 덧붙였다. 중국 언론은 이 사건을 신속하게 추적 보도하는 동시에, 프로그램의 내용을 깊이 있게 보도하고 논평하였다. 유명 프로그램 사회자인 바이옌쑹(白岩松)은 CCTV 뉴스 채널 논평 프로그램인 ‘뉴스1+1(新聞1+1)’에서 이번 도둑 촬영과 누설 사건에서 가장 큰 도둑은 SBS이고 “우리의 즐거움의 일부를 남이 먼저 훔쳐갔으므로” 시청자 역시 또 다른 도둑이라고 말했다. 로이터 기자의 질문에 대해 “우리도 관련 보도를 보았다. 한국 방송국의 올림픽 개막식 일부 사전 방송에 대해 실망하고 있다.” 라고 대답한 쑨웨이더(孫偉德) 베이징 올림픽 홍보부 부부장의 기조와 마찬가지로, 라디오 TV 매체는 결코 네티즌과 같은 분노나 질책을 표출하지 않았으며, 오히려 언론 종사자로서의 도덕을 지키지 않고 기밀 협약을 위반한 행위의 결과와 문제점을 이성적으로 분석했을 뿐이었다. 이를 통해 언론에서 객관적이면서도 어느 정도 관용적인 태도를 보여 주려고 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주지하는 바와 같이 주류 언론, 특히 라디오 TV 매체는 중국 정부의 ‘대변인’으로, 정부가 원하는 여론의 방향성을 항상 견지하고 지키고 있다. 따라서 주류 언론 특히 CCTV의 보도에서 우리는 중국 정부의 태도와 입장을 파악할 수 있다.

2) 한중 ‘설전’의 전과 후

중국과 한국은 1992년 수교 이후 경제 무역 협력을 지속적으로 빠르게 확대해 왔다. 통계를 보면 한중 양국의 2006년 양자간 무역 총액은 이미 1300억 달러를 돌파하여, 15년 전의 26배가 되었다. 중국은 이미 수년간 한국 최대의 무역 동반자이자 최대의 해외 투자 대상국이 되었으며, 한국 역시 중국의 세 번째 무역 동반자가 되었다. 한중 양자간 무역의 지속적인 증가에 따라, 한국의 대중국 투자 역시 계속 늘어났다. 현재 중국에 투자한 한국 기업은 3만 개가 넘고, 투자 금액은 총 350억 달러에 달한다. 중국은 이미 한국 기업이 대외 투자를 계획할 때 가장 먼저 고려하는 지역이 되었다. 동시에 중국의 대한국 투자 역시 시작되어, 2006년 말 기준 총투자액이 8억 9천만 달러에 이른다. 중국 교육부 통계에 따르면, 현재 중국의 정규 학교에 등록한 한국 유학생은 55,000 명이 넘어 5년 연속 1위를 기록하였다. 이 밖에 매년 6만 명 가량의 한국인이 중국에서 중국어 단기 연수 등의 과정을 이수하고 있으며, 한어수평고시 응시자수도 4년 연속 1위를 기록하였다. 현재 한국에서는 200여 대학과 650여 고등학교에서 중국어 전공과 수업을 개설하는 등, 한국에서 중국어를 배우는 사람은 15만 명이 넘는다. 이와 함께 최근 중국 학생의 한국 유학도 수직 상승세를 타고 있어, 거의 1만 명에 달하고 있다. 이들은 한국 각지의 수십 개 대학교에서 공부하고 있으며, 한국에 유학오는 외국 학생 중 1위를 차지하고 있다. 한국 조선일보에 실린 세명대학교 국제통상학과 이지석(李志哲) 교수의 칼럼에서는 한국 교육인적자원부의 자료를 인용하여 현재 중국에 있는 한국 학생이 4만 명이 넘고, 2000년 이후 한국에서 공부하는 중국 유학생

역시 급증하여 2만 명에 달한다고 밝히고 있다. 양국의 관광객도 해마다 두배씩 늘고 있다. 1988년 연인원 9,000명이던 양국 상호 관광객 숫자는 2006년 480만 명으로 늘었다. 한중 양국의 협력은 경제, 문화에서 다양한 분야로 확대되고 있다. TV 드라마, 가요, 음악, 게임, 패션으로 상징되는 ‘한류’는 중국 청년들에게 큰 인기를 끌고 있다. ‘한국 주간’의 브랜드 가치도 날로 커지면서, 하얼빈, 칭다오(靑島), 톈진(天津) 등에서 한국 주간 활동이 해마다 성황리에 열리는 등, 중국의 한국에 대한 완전 개방 가속화를 위한 효과적인 무대이자 중국인의 한국 이해를 위한 장이 되고 있다.

2007년 중국 최대 통신사인 신화사 소속 ‘인터내셔널 해럴드 리더[國際先驅導報]¹⁵⁾는 중국 네티즌을 대상으로 이웃 나라에 대한 이미지 조사를 진행하였다. 만이천 명의 네티즌이 참여한 조사에서 싫어하는 나라 순위의 상위 3개국은 한국(40.1%), 일본(30.2%), 인도네시아(18.8%)로 조사되었다. 당시 “중국 주변국에 대한 정보를 어디에서 얻는가”라는 질문에 대한 대답은 인터넷(65.3%), 책이나 신문 TV 및 방송(26.0%)의 순이었다. 또한 보도에 따르면 한국 중앙일보가 2008년 9월 22일 발표한 조사 결과가 큰 관심을 끌었다. 이 조사에 따르면 57%의 한국 응답자가 ‘가장 혐오하는 나라’는 일본이라고 생각하고, 13%는 중국, 10%는 북한이라고 생각한다고 대답했다. 이 조사는 중앙일보 조사원이 직접 가정을 방문해 면담하는 방식으로 진행되었다. 조사 기간은 8월 25일부터 9월 7일로, 대상은 제주도를 제외한 120명의 19세 이상 한국인이었다.

이러한 민간 반응으로 볼 때, 한중 양국 국민의 감정은 매우 복잡 미묘한 것으로 나타났다. 중국인 특히 젊은이들의 세계에 대한 이해는 기본적으로 인터넷을 통해 이루어진다. 그들이 좋아하는 것은 영화, TV 드라마와 인터넷 게임 속의 한국이지만, 진정한 한국에 대해서는 그다지 아는 것이 없다. 그들은 한국의 패션과 엔터테인먼트를 좋아하지만, 한편으로는 한국 문화와 중국 문화의 차이를 제대로 구별하지 못 한다. TV 드라마에서 보는 한국의 가족 문화와 사회 도덕을, 대부분의 중국인은 바로 중국이 잃어버린 중국 유교 문화의 정수라고 생각한다. 또한 최근 한국을 여행하는 중국인이 늘기는 했지만, 대다수가 실망을 나타내고 있다. 실제 한국은 드라마 속의 한국의 인상과 큰 괴리가 있다고 생각하기 때문이다. 또한 한국에 유학하는 중국인들도 대부분 조선족 학생으로, 한국에 대한 그들의 감정은 한국에 대한 중국의 다른 민족의 인식과는 차이가 있다. 중국인들은 한국의 역사, 문화, 정치 및 민족 감정을 제대로 이해하지 못하고 있으며, 대부분의 정보를 인터넷에서 얻고 있다. 중국인들이 잘 알고 있는 일부 정보는 또한 한중 교류에 유익하지 못한 것들로, 한국이 단오절과 한의학을 세계 문화 유산으로 등록했다던가 SBS 기자가 베이징 올림픽 개막식 내용을 누설했다던가 하는 내용들이고, 또 한 편에서는 중국에 한국어 능통자들이 많아지면서 중국과 중국인을 ‘혐오’하거나 공격하는 한국 인터넷 게시판 내용이 중국어로 번역되어 퍼지기 시작하였다.

마찬가지로 중국에 대한 한국인들의 인식도 그다지 깊지 못하다. 한국에서 1년 정도 생

15) ‘인터내셔널 해럴드 리더[國際先驅導報]’는 2002년 6월 6일 창간되어, 세계적인 신화사 뉴스 수집 네트워크를 통해 ‘大國際’라는 개념을 최초로 제창하였다. 즉 세계의 시각과 세계의 사고 방식 그리고 세계의 기준으로 중국 부흥의 과정을 관찰하고 해석하며 기록한다는 개념이다. 주로 국내외 시사, 경제, 문화 등 핫이슈에 주목하여 깊이 있는 보도를 하고 있다.

활하면서 필자는 중국에 가본 적이 없는 한국인들을 만난 적이 있다. 중국인에 대한 그들의 인상은 식당에서 일하는 가난한 중국 유학생의 이미지였고, 중국인이 너무 가난한 나머지 핸드폰도 사용할 줄 모르고 망고나 모과 같은 열대 과일도 사먹지 못 한다고 알고 있었다. 그들은 중국인에 대해 무례하고 사리사욕만 앞세우며 공중 도덕 관념이 없고 목소리가 시끄럽다는 등의 생각을 가지고 있었다. 베이징 올림픽 성화 서울 봉송 과정에서 중국 유학생들이 한국 경찰과 기자들을 폭행한 사건은 중국인에 대한 한국인의 악감정을 부추겼다. 일본 학자 다카하라 모토아키(高原基彰)는 ‘한중일 인터넷 세대가 서로 미워하는 진짜 이유’라는 글을 통해 중국의 험한증, 한중의 반일 감정, 한일의 배중 감점은 모두 신국체주의라고 분석하였다. 그에 따르면, 치열한 경쟁으로 내몰리고 있는 세 나라 젊은이들은 자신들의 불안감을 상대방 국가에서 만든 것으로 생각하고, 세 나라의 ‘88만원 세대(월급 88만 원의 비정규직)’은 스스로 반민주주의적인 사고 방식을 확산시키고 있다는 것이다.¹⁶⁾

어찌됐든 한국과 중국은 전반적이고 장기적이며 전략적인 협력을 필요로 하고 있다. 양국의 경제 무역 협력과 정부 차원의 문화 교류 확대 못지 않게, 양국 국민들의 정서적 교류 역시 우호적인 외교 관계의 미래를 위해서 매우 중요하다. 한국 등 아시아 국가를 중국인들이 더 잘 알고 이해하도록 만들기 위한 작업에 중국 주류 언론이 현재 매진하고 있다고 필자는 생각한다.

3. ‘다양성의 조화[和實生物]’ — 언론에 의해 재형성된 중국과 세계에 대한 이미지

1) 국제적 존경을 얻어낸 ‘능동적 자세[有所作為]’

2008년 4월 올림픽 성화 봉송을 둘러싼 사건들로 인한 소동이 막 가라앉을 즈음, ‘5·12’ 원촨 대지진이라는 갑작스러운 재난이 쓰촨 지역을 비롯한 모든 중국인들에게 닥쳤다. 중국 정부의 신속한 구호 노력과 ‘거국 체제’를 통한 효율적인 활동 그리고 중국 민중이 일치 단결하여 자신을 희생하면서 남을 구하는 모습은 국제 사회를 감동시켰다. 세계 각국에서 앞다투어 도움의 손길을 보냈다. 중국은 ‘자력更生’과 ‘외부 원조 배격’의 원칙을 버리고 단기간 동안 러시아, 싱가포르, 한국, 일본 등의 인적, 물적 및 기술적 원조를 받아들였다.

CCTV는 지진 발생 당일 오후(2008년 5월 12일 15시에 정규 방송 프로그램인 ‘명작 영화[電影傳奇]’ 중단)부터 24시간 생방송을 진행하였다. 이는 중국 TV 방송 역사상 최초의 일로, 반응 속도나 시간, 생방송 규모나 형태, 그리고 참여 인원과 보도 효과 및 사회적 영향력 등 측면에서 중국 TV 방송의 새로운 시대를 열었다.

이번 생방송 보도는 특히 국제 사회의 반응에 주목하였다. 5월 13일 8시 24분, 쓰촨 대지진에 대해 외국 정부와 지도자들이 보내온 위로의 말을 생방송으로 보도하였다. 5월 13일 11시 42분, 쓰촨 지진 지역 구호를 위해 언제든지 중국 정부를 지원할 준비가 되었다는 UN 뉴스를 보도하였다. 5월 14일 4시 58분, 홍콩 대공보(大公報), 영국 BBC, 미국 월스트리트저널 등을 포함한 해외 언론의 원촨 대지진에 대한 보도를 방송하였다. 이 가운데 영국 파이

16) <http://blog.sina.com.cn/jsck>

낸셜 타임즈는 베이징에서 저 멀리 구이저우(貴州)까지 모든 행정 시스템이 ‘실시간 정확한 정보 공개’를 민심 안정의 열쇠로 삼고 있으며, TV, 인터넷 심지어 핸드폰 문자 메시지까지 모두 정부 소식을 발표하는 루트가 되었다고 보도하였다. 거의 몇 시간 간격으로 CCTV의 ‘지진 구호, 국민의 힘’ 생방송이 전국민에게 보도되었으며, UN, 미국, 프랑스, 영국, 독일, 사우디아라비아, 파키스탄 등의 물자 및 인력 지원을 보도하였다. 국제적 지원에 대한 보도 가운데 CCTV는 러시아, 일본, 한국, 싱가포르 등을 집중 보도하였다. 5월 14일 7시 47분, 러시아 긴급상황부에서 당일 IL-76 수송기 한 대를 출동시켜 중국으로 지진 구호 물자를 운송하였다는 러시아 이타르타스 통신의 13일 보도를 전했다. 5월 15일 22시 31분, 일본 구조지원대가 중국에 도착해 재해 구호에 협조하였다고 보도하였다. 5월 16일 4시 13분, 중국 정부는 근린 및 신속 원칙에 따라 러시아, 한국, 싱가포르 세 나라 정부가 전문 구호 요원을 스촨 지진 발생 지역에 파견하여 구호 활동을 벌이는 데 동의하였다. 5월 16일 9시 27분, 주일 중국 대사 추이텐카이(崔天凱)의 15일 발언을 보도하였다. 스촨 강진 발생 이후 일본 정부와 일본인들이 가장 먼저 중국인들에게 동정과 위문을 표시했고, 가장 먼저 중국에 도착한 일본 구조대원들의 협력은 중일의 전략적 호혜 관계 발전을 위한 새로운 계기가 될 것이라는 내용이었다. 5월 17일 11시 32분, 생방송에서 16일 기준 국제 구호단의 인력과 장비 상황에 대해 보도하였다. 5월 16일 오후 41명으로 구성된 한국 국제구호단이 청두(成都)에 도착했다. 이들 중 3분의 2는 7차례 이상 지진 구호 활동에 참여한 경험이 풍부한 인력이었다. 주로 소방대원으로 구성된 32명의 2차 일본 구조대원들이 1차 구조대원들과 함께 재해 뒷수습 작업을 진행하였다. 사회자 원징(文靜)은 “당신들이 지금 뻔은 도움의 손길에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립니다. 마치 한 집안처럼 친근한 느낌을 줍니다.” 라고 말했다. 이는 당시 대다수 중국인의 마음을 대변하는 것이었다.

중국의 인터넷 매체 역시 관련 소식을 발표하거나 옮기면서, 네티즌들의 열렬한 게시판 토론을 이끌었다. 중국 네티즌들이 가장 관심을 보인 것은 일본과 한국 언론의 보도였다. 조선일보 베이징 분국 박승준(朴勝俊) 국장은 ‘파이팅, 중국’이라는 글에서 “그들이 ‘우리의 올림픽, 우리의 오성홍기’라고 부르기를 고집하지 않았으면 한다. 이렇게 자신의 주장만을 강변하는 이미지에서 벗어나, 지진이라는 자연 재해가 가져온 크나큰 아픔을 딛고 올림픽을 성공적으로 개최하기를 바란다. ‘파이팅! 중국’ ” 이라고 말했다. 5월 19일자 한국 동아일보의 스촨 대지진을 겪은 중국인은 각종 구호와 담론을 창조하면서, 지혜가 담긴 옛 시구를 통해 서로 격려하고 재난과 맞서 싸우고 있다고 보도하였다. 조선일보 전병근(全炳根) 기자는(2008년 5월 15일 발표) “메이드인 차이나 불량 식품, 의약품 파동, 티벳 사건, 각국의 올림픽 성화 봉송 과정 방해, 그리고 지금 다시 대지진 발생 등……중국은 마치 사면초가인 셈이다. 하지만 중국 정부는 이번 대지진 대처를 통해 신속하고 개방적인 대처 방식을 과시했으며, 아마도 재난으로 인해 얻은 것도 있을 것이라고 외신은 평가하고 있다. 전세계 중국인 역시 현혈과 모금 대열에 앞다투어 참여하여, ‘하나로 단결하는 중국’이라는 놀라운 응집력을 보여주었다.” 고 하였다. 이러한 보도와 평가는 중국 민중들에게 외국 언론의 객관적이고 우호적인 태도를 느끼게 만들었고, 세계의 적극적인 도움의 손길과도 연결되어 당시 용감하게 지진과 싸우던 중국인들을 감동시켰다.

올림픽 성화 봉송 사건으로 격앙된 ‘포스트 80’, ‘4월 청년’ 등, 일부 외국 언론에 의해 과

또한 민족주의 성향으로 평가되었던 군중들은 중국 국내외 학자들의 우려를 샀다. 하지만 ‘5·12 원촨 대지진’ 구호 활동 속에서 민족주의 정서는 서로 돕고 단결하는 인간적 역량으로 전환되었다. 비록 대지진이 큰 재난이기는 했지만, 풍파가 끊이지 않은 2008년의 중국에게 있어, 오히려 외교적 이미지를 부드럽게 만드는 계기가 되었다. 중국 주류 언론은 이 기회를 놓치지 않고 국제 사회의 원조와 찬사를 끊임없이 국내에 보도하고, 대외적으로는 정보를 투명하게 공개하기 위해 전력을 다했다. 지진 구호 활동이 진행된 첫 달에는 여러 정부 부처에서 여는 기자회견이 거의 매일 열리다시피 했을 정도였다.

2) 언론이 부각시키고 있는 중국의 대국으로서의 책임 의식

진정으로 중국을 세계 경제 무대의 선두로 이끌어 올린 것은 2008년의 금융위기였다. 2008년 초, 달러 대 위안화 환율이 대폭 상승세를 보이면서 광둥(廣東), 산둥(山東) 등지의 소규모 수출 기업이 줄지어 도산하였다. 베이징 올림픽과 원촨 대지진 등 큰 사건의 충격때문에, 세계적으로 잠재되어 있는 금융 위기와 중국 수출 무역난은 언론에 의해 의식적으로 보도가 자제되었다. 2008년 9월 14일, 미국 리먼브라더스 파산은 미국 금융 위기의 시작을 상징하는 동시에, 전세계 금융 위기의 서막을 열었다. 2008년 3월부터 CCTV는 이제 막 징조를 보이기 시작한 전세계 금융 위기를 보도하면서, 주로 중국에 집중되어 있는 노동집약형 수출 기업을 집중 조명하였다. 9월 20일, CCTV 경제 채널은 ‘월스트리트를 강타한 폭풍’이라는 특별 프로그램을 편성하고, 매일 CCTV-2의 오후 프라임 타임인 18:05과 20:55에 방송하였다. 사회자 루이청강(芮成鋼)은 경제 및 금융 분야 전문가들과 인터뷰를 진행하고 다양한 주제를 통해, 금융 위기의 배경과 실시간 동향을 함께 다루었다. 금융 위기 관련 보도 가운데 CCTV는 주로 10월 24일과 25일의 제7차 아셈 정상 회담에 많은 시간을 할애했다. 아셈 정상 회담은 회의 의제를 임시 변경하여, 전세계 금융 위기 대책을 집중 논의하였다. 중국 정부 지도자가 제7차 아셈 정상 회담에서 보여준 태도와 입장은 현재 중국이 국제 사회에서 차지하고 있는 위치와 중국의 기본적인 외교 방침을 어느 정도 반영한 것이었다.

10월 21일 CCTV-4 ‘차이나 뉴스(中國新聞)’는 미국이 전세계 금융 위기 대처를 위한 정상 회담 개최를 제안하였고, 이에 대해 중국 외교부 대변인 친강(秦剛)은 금융 위기를 해결을 위해서는 평등 협상이 기본 원칙이 되어야 하며 그 대처 방안은 개도국의 이해 관계를 존중하고 보호해야 한다고 밝혔다고 보도하였다. 대변인에 따르면, 중국측은 국제 사회가 평등한 협상과 협력 강화를 통해 현재 닥친 국제 금융 위기에 공동 대처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한다. 주말 베이징에서 열릴 예정인 아셈 정상 회의에서 아시아와 유럽 45개국 지도자들은 양자간 및 다자간 협상을 통해 금융 위기 대처 방안을 논의할 것이며, 대변인에 따르면, 중국측은 책임지는 자세를 지속적으로 견지하면서 관련 당사자들과 대화하고 의견을 조율할 것이니. 이는 중국이 금융 위기 확산을 막기 위한 전세계의 행동에 적극 참여할 것이며, 그 기본 원칙은 평등한 협상과 개도국의 이해 관계 존중과 보호라는 메시지를 세계에 보내는 것이었다. 24일 제7차 아셈 정상 회담 개최 이전, CCTV 30분 뉴스(新聞30分), 저녁 뉴스(晚間新聞), Oriental Horizon(東方時空), 뉴스 응접실(新聞會客廳) 등 주요 뉴스 프로그램은 앞다투어 다음과 같은 서구 지도자의 중국에 대한 평가와 제안을 보도하였다. 21일 폴슨 미재

무부 장관이 전세계 경제가 흔들리고 있는 때에 중국이 ‘중요한 엔진’이며, 중국은 전세계 금융 위기 대처를 위해 책임 있는 자세와 협력하는 정신을 보여주었다고 높이 평가했다. 22일 페리노 미백악관 대변인은 현재 금융 위기 해법 속에서 중국은 ‘안정자’의 역할을 할 것이라고 평가하였다. 그는 또한 베이징에서 곧 열리게 될 아셈 정상 회담을 높이 평가하며 ‘매우 중요하게’ 생각하고 있다면서, 올해 베이징에서 열리는 아셈 정상 회담에서 에너지와 기후 변화 및 식량 안보 등 주요 의제는 물론 피할 수 없는 의제이지만, 현재 국제 정세를 감안할 때 세계 금융 시장의 불안 가속화와 전세계 경제 성장의 뚜렷한 위축과 같은 심각한 현실보다 더 큰 관심사는 없을 것이라고 지적하였다.

Oriental Horizon은 최근 중국 경제에 대한 세계 각국 주요 언론의 평가를 모아 보도하였다. 예를 들어 AFP는 10월 7일 ‘금융 위기 속에서 중국이 보여준 제국과도 같은 위엄’이라는 제목의 칼럼을 통해서, 중국 금융 시장의 특징은 세계 4위의 경제권인 중국을 보호하고 있으며, 도움을 주는 동시에 대처할 능력이 있다는 확신을 준다고 보도하였다. 미국 타임즈지 인터넷판 10월 7일 ‘금융 혼란에 대한 중국의 관점: 경각심을 늦추지 않으나 자신 있다’는 제목의 칼럼을 통해, 점진적이고 신중한 개혁으로 현재 시장 혼란의 와중에서 중국은 가장 심각한 영향을 피할 수 있다고 중국의 관리자들이 자신하고 있다고 언급했다. 영국 이코노미스트지는 10월 11일 ‘중국 경제, 도미노패인가 아니면 엔진인가?’라는 제목의 글을 통해, 중국이 이미 재정 정책을 준비하고 있으며 이는 외부에서 중국의 경제 엔진이 멈추지 않기를 바라는 가장 큰 원인이기도 하다고 말했다. 로이터 통신은 10월 8일 보도를 통해, 세계 최대의 외환보유고를 자랑하는 중국은 아마도 세계 금융 위기를 진정시키는 과정에서 중요한 역할을 할 것이라고 언급하였다. 줄릭 세계은행 총재는 10월 8일 언론을 통해 중국 경제는 지속적으로 빠른 성장세를 유지할 것이며, 이는 현재 세계 경제에 매우 중요하다고 밝혔다.

특히 제7차 아셈 정상 회담에서 바호주 EU집행위원장은 발언을 통해 “현재 세계 위기는 세계 지도자들이 앞장서 대화를 통해 이해와 협조를 강화해야 할 필요성을 증대시키고 있다.”고 지적하면서, “스스로 문을 닫아 걸고 위기를 비켜가려는 방식으로서는 이 도전에 맞설 수 없으며, 우리는 모두 과거 개방적인 상업 및 무역 환경 속에서 혜택을 입었으므로 보호주의, 고립주의 및 경제 민족주의에 단호하게 반대해야 한다.”고 경고하였다. 사르코지 프랑스 대통령 역시 “유럽인들은 하나의 목소리를 내야 한다. 우리는 함께 심사 숙고를 거쳐 창의적인 제안을 내놓아야 하며, 아시아가 우리의 이러한 노력을 지지하기를 희망한다.”고 호소하였다. 유럽은 아셈 정상 회담을 통해 아시아 각국의 지지를 얻어 현재 세계를 휩쓸고 있는 금융 위기를 함께 극복하기를 희망하였다.

역사는 놀라울 정도로 반복된다. 10년 전인 1998년 제2차 아셈 정상 회담이 열리던 당시, 아시아 금융 위기가 발생했다. 당시 중국은 위안화 절상 불가 약속을 지켜, 아시아 경제가 빠르게 회복하는 데 공헌과 희생을 하였다. 10년 후인 지금, 제7차 아셈 정상 회의는 다시 한번 세계 금융 위기와 조우하였다. 이러한 상황에서 세계는 중국의 어떠한 협력을 필요로 하는가? EU 순회의장을 맡고 있는 프랑스 사르코지 대통령은 11월에 열린 국제 금융 정상 회담에서 “중국, 인도와 같은 아시아 국가가 없는 상황은 상상할 수조차 없다.”고 밝혔다. 이번 금융 위기 속에서 유럽 각국은 최소한 아시아 국가들의 지지를 얻어 목전의 금융 위

기를 함께 극복해야 한다고 인식하고 있기 때문이었다. 그의 발언을 통해 현재 중국을 포함한 아시아 각국이 금융 위기 대처를 위해 발휘해야 할 역할이 점점 더 커지고 있다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다.

이번 금융 위기 속에서 아시아 각국의 관점과 입장은 서로 달랐다. 한국은 중국, 일본, 아세안과 함께 외환 준비금을 만들어 외환이 부족한 나라를 돕기를 바라고 있지만, 일본은 아시아에 대한 금융 위기의 영향은 제한적일 것이라고 아셈 정상 회담 기간에 밝혔다. EU는 현 금융 체제의 철저한 개혁을 외치고 있지만, 일본은 지금의 국제 금융 체제를 유지하려는 입장을 내비치고 있다. 이는 아시아 경제가 충분히 감당할 능력이 있으며, 아시아 각국의 외환 보유고는 충분하고 아시아 상황은 구미와는 다르다는 생각에서 출발한 것이다.

국제 금융 불안과 중국의 경제 상황에 대해 원자바오(溫家寶) 총리는 최근 여러 차례 “13억 인구를 가진 대국이 장기간 경제의 안정적이면서도 빠른 발전을 지속하는 것 자체가 세계에 대한 가장 큰 공헌”이라고 강조하였다. 아셈 정상 회담 개막식 연설에서 추진타오(胡錦濤) 중국 국가 주석은 세계 금융 위기 상황에서 신뢰와 협력 이 두 가지가 핵심이라고 강조하였다. 협력을 통해 신뢰를 되찾고 이번 위기를 함께 극복하자는 것이다. 협력 측면에서 중국 정부는 한국, 일본, 아세안과 800억 달러의 ‘아시아 외환 보유 기금’을 창설하였다. 이론적으로 개별 국가에 ‘외환 부족’ 사태 발생을 막기 위한 것이었다. 하지만 중국 사회과학원의 연구 보고서는, 아시아 지역 경제 특히 베트남에 금융 위기 발생의 징조가 있으므로, 중국이 베트남에 차관 원조를 제공하여 도와야 하며, 지역 화폐 협력을 구축하여 동아시아 각국이 함께 위기를 방지해야 한다고 지적하였다. 로이터 통신 역시 소식통을 인용하여, 중국이 베트남 문제를 예의주시하고 있으며, 만약 공감대가 형성된다면 양자간 원조가 아마도 가장 효과적인 선택이 될 것이라고 밝혔다.

이상과 같은 CCTV 보도를 통해 중국 정부가 아시아 각국의 목소리를 적극 경청하고 있으며, 이번 금융 위기 속에서 중국의 지위와 역할을 총체적으로 고려하는 동시에 다른 나라의 상황에도 주의를 기울이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IV. 중국 세계관의 변천

바호주 EU 집행위원장은 2008년 10월 18일 미국 캠프데이비드에서 미국 부시 대통령과 만난 자리에서 “우리는 새로운 세계 금융 질서를 필요로 한다.”고 강조하였다. 폴슨 미재무 장관은 금융 위기 대응에 관한 연설에서 “현재 세계 금융 시스템은 지금의 세계 경제 상황을 반영하지 못하고 있다.”고 인식하였다. 줄릭 세계은행 총재는 국제 사회가 선진 7개국과 중국, 브라질, 인도, 멕시코, 러시아, 사우디아라비아, 남아프리카공화국 등 주요 신흥 경제국을 포함한 G14 또는 일부 경제학자와 정계 인사들의 제안에 따라 더 범위를 확대하여 G20까지 포괄하는 새로운 그룹 창설을 고려해야 하며, 선진 7개국과 주요 신흥 경제국을 포괄하는 새로운 조직이 금융 위기 대처 방안을 논의하는 중요한 장이 되어야 한다고 자신의 구상을 밝혔다. 지금은 마치 세계 금융, 정치, 문화의 새로운 질서를 만들어 나가는 새

로운 시대로 접어든 것처럼 보인다. 일본 자민당 다무라 구오타로(田村太郎) 의원은 구미 금융 시장을 ‘평가 절하’ 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하면서, 일본이 이 금융 위기의 구세주가 될 수 있다고 보았다. 시오자키 야스히사(鹽崎恭久) 전임 일본 관방장관은 미국 경제와 금융 능력이 상대적으로 쇠퇴하면서 미국의 주도적 지위도 불가피하게 위축될 것이지만, 이는 결코 다른 나라가 미국을 대신해 세계 경제의 수호자가 된다는 의미는 아니며, 오히려 중국, 인도, 유럽, 일본 등이 세계 경제를 공동으로 감독할 것이라고 의견을 밝혔다. 보다 많은 유럽 및 아시아 국가는 중국이 이번 금융 쓰나미 속에서 대국으로서의 책임을 다해줄 것을 바라고 있다.

중국의 대응 방식은 현재 세계 금융 상황에 대한 분석과 중국의 경제력에 대한 판단에 따라 결정되며 동시에 현재 중국의 세계관에 의해 결정될 것이라고 필자는 생각한다.

1949년 이후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지도자들은 외교 방침에 대해 다양한 발언을 해왔다. 마오쩌둥(毛澤東)의 ‘3 개의 세계’, 덩샤오핑(鄧小平)의 ‘도광양희(韜光養晦: ‘재능을 숨겨 나서지 않는다’ 는 뜻-역자주) 및 ‘영원히 앞장서지 않는다’, 장쩌민(江澤民)의 ‘새로운 국제 정치 경제 질서 구축’ 그리고 현재 지도자의 ‘조화로운 세계’ 까지 이들 발언은 중국 세계관의 변화 발전을 보여준다.

1974년 2월 22일 마오쩌둥 주석은 카운다 잠비아 대통령을 만난 자리에서 ‘3 개의 세계’ 이론을 제시하면서, ‘제3세계 국가’가 연합하여 패권주의에 맞서야 한다고 호소하였다. 마오쩌둥은 “내가 보기에 미국과 소련은 제1세계이고 중간 세력인 일본, 유럽, 오스트레일리아, 캐나다가 제2세계라면 우리는 제3세계이다.”, “제3세계는 인구가 가장 많다. 아시아는 일본을 제외하고 모두가 제3세계이다. 아프리카는 전부 다 제3세계이며, 라틴 아메리카 역시 제3세계이다.” 라고 하였다. 마오쩌둥 만년의 이러한 외교 방침은 큰 중요성을 갖는다. 이는 중국을 고립시키려는 소련의 패권주의적 계획을 무산시키고 세계에 중국의 우방국을 형성하는 데 큰 역할을 하였으며, 또한 이후 중국 외교 정책 제정과 조정의 기반이 되었다. 그러나 개혁 개방 정책을 실시하고 경제 건설에 집중하면서, 이러한 외교 방침은 불가피하게 제한적이라는 문제점을 노출하게 되었다. 덩샤오핑이 제시한 ‘도광양희(韜光養晦)’와 ‘나름의 공헌[有所作爲]’ 이론은 8,90년대 세계 무대에서 중국이 자신의 역할을 어떻게 규정했는가를 보여준다.

1989년 중국에 ‘6·4’ 천안문 사건이 일어나자, 미국을 위시한 서구 선진국은 중국에 일련의 제재 조치를 취하였다. 1989년 하반기부터 1990년대 초까지 동유럽의 격변과 소련 와해 이후 미소 양극 냉전 구도가 사라지고 미국이 유일한 초강대국이 되자, 전세계 전략 구도에 심각한 힘의 불균형이 나타났다. 국제 정세의 급격한 변화와 이로 인해 중국이 직면한 압력을 고려해, 1989년 9월 덩샤오핑은 중국 공산당 중앙위원회의 몇몇 책임자들에게 “전반적으로 국제 정세를 개괄해 볼 때 다음 세 가지 결론이 나옵니다. 첫째, 냉정하게 관찰한다. 둘째, 발밑을 탄탄하게 지킨다. 셋째, 침착하게 대응한다. 성급해서는 안 되고, 또 그래봤자 소용 없습니다. 냉정, 냉정 또 냉정해야 합니다. 실질적인 업무에 매진하고 우리 내부의 일에 집중합시다.” 고 지적하였다. 1990년 12월 덩샤오핑은 다시 몇몇 간부들에게 “제3세계 일부 국가들은 중국이 앞장서기를 바라고 있습니다. 하지만 우리는 결코 앞장서서는 안 됩니다. 이것이 가장 근본적인 국책입니다. 그 자리는 우리 힘에 부칩니다. 뒷 자리에 앉아

좋은 것도 없습니다. 윗 자리에 오르면 굴러떨어지기 마련입니다. 중국은 영원히 제3세계의 편에 설 것이며, 중국은 영원히 패권도 선두 자리도 바라지 않습니다. 하지만 국제 문제에 손 놓고 있어서는 안 되고, 나름대로 역할을 발휘해야 합니다. 그렇다면 어떤 역할을 해야 할까요? 국제 정치 경제의 새로운 질서 추동에 적극 나서야 한다고 저는 생각합니다. 우리는 누구도 두렵지 않지만, 누구와도 척을 질 필요는 없습니다. 평화 공존 5대 원칙에 따라 일을 처리하고, 원칙적 입장을 고수해야 합니다.” 고 강조하였다. 냉전 당시 덩샤오핑의 이 중요 담화는 나중에 한층 발전되어, 국제적으로 큰 변화가 있을 때 중국이 취해야 할 5가지(20자) 전략적 방침으로 개괄되었다. 그 내용은 곧 ‘냉정한 관찰, 발밑 지키기, 침착한 대응, 도광양회, 나름의 공헌[冷靜觀察, 穩住陣腳, 沉着应付, 韜光養晦, 有所作爲]’으로 이를 줄여서 ‘도광양회,¹⁷⁾ 나름의 공헌’이라고 한다.

덩샤오핑은 평화공존 5대 원칙을 기반으로 국제 정치 경제 새질서 구상을 제안하였고,¹⁸⁾ 나중에 장쩌민은 이 방침을 계승 발전시킨 담화를 통해 중국은 평화롭고 안정적이며 공정하고 합리적인 국제 정치 경제 새질서 구축을 주장한다고 하였다. 국제 정치 경제 새질서에 대한 중국의 구체적인 구상은 ‘새로운 국가 관계관, 새로운 안보관, 새로운 발전관, 새로운 문명관’의 네 가지의 내용을 담고 있다.¹⁹⁾ ‘국제 정치 경제 새질서 건설’ 이론에 관한 언급에서 이미 아시아 각국과의 관계를 고려하고 있으며, 중국은 ‘결코 앞장서지 않는다’는 것은 아세안, 인도를 포함한 아시아 각국이 세계 다극화 형성에 역할을 발휘한다는 의미이다.

2005년 4월 22일 후진타오(胡錦濤) 중국 국가 주석은 자카르타에서 열린 아시아 아프리카 정상 회담에서 아시아와 아프리카 국가들은 “서로 다른 문명이 사이좋게 교류하고 평등하게 대화하며 공존 공영하는 하나의 조화로운 세계를 함께 구축해야 한다”고 제안하였다. 이는 ‘조화로운 세계’라는 개념을 처음으로 국제 무대에 선보인 것이었다. 같은 해 7월 1일, 후진타오 주석은 모스크바 방문시 ‘조화로운 세계’를 ‘21세기 국제 질서에 관한 중대 공동 성명’에 포함시켜, 처음으로 국가 간의 공감대로 발전시켰다 이는 이 새로운 개념이 점차 국제 사회의 시야 속에 들어가고 있음을 의미한다. 같은 해 9월 15일 후진타오 주석은 UN 본부 연설을 통해 ‘조화로운 세계’의 깊은 함의를 총체적으로 밝혔다. 즉, 세계 문화의 다양성과 발전 모델의 다양성을 존중하고 국제 질서를 개선하는 것이 국제 관계의 조화로운 발전에 가장 중요하다는 내용이었다. 외교 분야에서 중국은 주변 아시아 국가와의 교류 관계에서 ‘조화로운 세계’의 방침을 가장 우선적으로 실천하고 있다. 즉 APEC, 아세안 지역 포럼, 아세안+한중일 협력, 한중일 협력, 동아시아 지역 협력 연맹 등을 활용하여 조화로운 주변 관계 구축에 노력하면서 주변국과의 이익 공동체를 적극 추진하는 것이다. 이는 자신감 있으면서 동시에 책임지는 자세로서, 자신의 대국 이미지를 세계에 보여주려는 믿음과 노력을 표현한 것이다.

중국 주류 언론은 중국의 국가 외교 정책을 원칙으로 삼아, 광범위하고 실질적인 보도를

17) ‘韜光養晦’는 『구당서(舊唐書)』, 의종기(宜宗記)편에 나오는 말로, 원문은 “歷太和會昌朝, 愈事韜晦, 群居游處, 未嘗有言.” 이다 그 의미는 재능을 숨겨 이를 밖으로 드러내지 않는다는 뜻이다.

18) 中央文獻研究室 편찬, 『鄧小平思想年譜』, 412~413쪽 및 『鄧小平文選』 제3권, 282, 328, 359~360쪽.

19) 江澤民,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人民出版社, 2002년판, 46~49쪽.

통해 아시아 각국과 모호하거나 일방적이거나 편견에 사로잡힌 문화적 상상을 극복하고자 노력하고 있다. 특히 형식과 내용 모두 혁신을 꾀하면서, 중국 시청자들에게 있는 그대로의 이웃나라를 직접 보고 이해하도록 할 뿐 아니라, 각국 방송 기관과의 프로그램 협력을 통해 진실한 중국의 모습을 보여주고자 노력하고 있다. 이는 중국이 가진 세계관의 실질적인 실천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2008년은 중국 역사상 가장 복잡다단한 한 해였다. 특히 국제 관계와 외교적 측면에서 우여곡절이 많았다. 국제 정치, 경제, 스포츠, 대만과의 관계 등에 새로운 상황이 나타나는 가운데, 우리는 중국의 세계관과 국가 이미지 구축 측면에서 많은 변화를 확인할 수 있다. 싱가포르 동남아 문제 연구소 아사드 라티브 객원연구원이 11월 1일 ‘해협시보(海峽時報)’에 기고한, ‘젊은이의 눈으로 본 중국’이라는 글의 말미에서 한 말처럼, “중국은 강대국들이 빙 둘러 앉은 탁자에서 자신의 자리를 찾고자 한다. 하지만 이미 자리를 차지한 자들을 몰아 내려는 것이 아니라 더 큰 탁자를 요구하고 있는 것이다.”

【Abstract】

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Conception presenting in Mainstream Media recently in China: Building the New Order of Harmonious World by the voice of Asia

CHAI Fan

Mass communi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and effective way to perform international conception. In some sense, history is the news of yesterday, and news is the history of tomorrow. I will observe and try to analyze a few milestones of news events by mass media in the year of 2008, from which I should like to make a conclusion that China government now is improv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Asian nations, taking more responsibility of great power, revealing orient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s by the voice of Asia, disclosing the objectivity of Asia to western world which is stronger than Asian countries for long term on international stage.

1. Main study ideas

A. Studying object

The“recently”in my heading means recent month in 2008 year. President Hu Jin-Tao had a speech that Chinese people spent a very special time during the past months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Asia-Euro Meeting. The year of 2008 a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open policy, not only ha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is an impressive year, in which great changes have been taken i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Mainstream Media refer the “mouthpiece” of the people, government and CPC, which disseminate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social values with strong social credibility, high rating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audience. Directly involving in chatting with netizens online in People's Daily for the first time on June 20, 2008, Hu Jin-Tao, the President of China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internet as the role of mass media. Although internet has become an official mass media as the same as newspaper, radio and television, the primary choice which putting government PR into practice is traditional TV and radio disse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my field of major, what my study focus on TV news broadcast.

I will pay much attention on the momentous news reports and breaking news on the mainstream TV media. For example, the special reports about Beijing Olympic torch relay on a global scale, “5·12” Wen Chuan earthquake, the 7th Asia-Euro Meeting and so on. The following is my observations on the reflec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dealing with the major news events in TV media and interpretation about main international conception from two aspects.

B. Studying structure

A new program "Asia Today" appears on CCTV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mouthpiece recently. It made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way of exchanging TV programs broadcast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news, social and cultural express with several Asian nations. This new program opens a window to view the whole Asia, that is to say, it provides fresh information and news made by original broadcast in Asia and strengthens Chinese audience the sense of Asian identity.

Regarding major news agenda setting especially about the Beijing Olympic Torch global relay, "5·12" Wen Chuan earthquake, as well as the seventh Asia-Europe meeting, the TV media put their effort to elucidated the "harmonious World" thought as "Harmony Be Precious"(以和为贵), "Harmony But Different"(和而不同)and "Harmony Creating World"(和实生物)in a louder voice.

2. "Asia Today" broadcasts the Asian's Asia

On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news programs editing list, reports related to the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ways come in the final order of the whole even if they are in the importance of timeliness and magnitude. "Asia Today" is a rather unique program only reporting the Asian news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news programs in Mandarin in mainstream TV media, which is launched in the CCTV International Channel (CCTV-4) on July 28, 2008. Its basic form is video report with Chinese dubbing leading with announcer's broadcast within 30 minutes at 23:00 (Beijing time)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first broadcast, replaying at 7:00 the next day.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Asia does not match its economic strength so that can not be equal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western mainstream media does not have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Asia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value systems in a way; on the contrary, there are no lacks of distorted, one-sided reports and even "demonizing" image in the western programs. Asian nations should open themselves up to be appea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y issuing a clarion of theirs. "Asia Today" is that kind of production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Asia Today" is special for "reporting Asia from Asian angle; showing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capturing the pulse of Asia's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using Asia's rich and varied culture; performing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Asia and the world ;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 The program makes a great show of concern on the Asian affairs and recognition to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t present, "Asia Today" exchanged programs with many TV stations in Asia, such as KBS (the Republic of Korea), NHK (Japan), PRESS TV (Iran), Al Jazeera, CHANNEL I (Bangladesh), PTV (Pakistan), Channel News Asia (Singapore), KCT(the North Korea), CTN (Cambodia), VTV (Vietnam), Abu Dhabi Televisio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CBS (Australia), Zee TV (India). Further consultation is conducting with TV stations in Myanmar, Laos, Malaysia, Indonesia, Syrian, Sri Lanka, and Fiji. The main contents of "Asia Today" cover the major news events, fresh information, hot topics, the peoples of Asia's cultural life and customs.

If you Google "Asia Today" on China mainland website, there were 766 related news, Baidu(百度) showed 1940 related information, 138 replies on BBS which are mostly positive assessments on CCTV.com. "Asia Today" made more Chinese people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reality, history and culture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It is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create TV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volving in news provision, special reporter's detachment, the joint mechanism for interview, news copyrights granted by each other. It is not only a window to show "new Asia" image but also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for China and other Asian nations. It still drops a hint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insist on conducting the principle of "neighbor diplomacy" from the unique program in mainstream TV media".

3. International concept of "harmonious world" embodied in major news report

A. "Harmony but Different"(和而不同): To deal with diplomatic challenges from western community

As is known, from the beginning of April 1, 2008, the Beijing Olympic torch began a global relay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which was another historic event in CCTV for 5 months long of follow-up live coverage. But the interference from dissidents increased more hostility to China, the diplomatic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nations arous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response.

Beijing Olympic Torch relaying in Paris met a lot of trouble, for example, some ones from "Tibet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 used violent ways to crash Olympic torch relaying team on April 7, 2008. Some media, such as "Le Figaro" and "Liberation Daily", they made the unfair coverage to show their schadenfreude. From April 7 to 25, programs of CCTV, such as "CCTV News"(《新聞聯播》), "News 30"(《新聞30分》), "News hour"(《整點新聞》), "China News"(《中國新聞》), "News 60"(《新聞60分》), "Global Times"(《環球時訊》), "Chinese world"(《華人世界》) and "Oriental Horizon"(《東方時空》), strongly condemned the destruction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activities in Olympic torch relaying by different ways. A well-known news program "Oriental Horizon"(《東方時空》) in April 25 broadcasted the special report of "the Sino-French diplomatic visits in crisis", which carded and analyzed the whole "unpleasant incidents" (former French Prime Minister Jean-Pierre Raffarin said). It quoted the deputy director Professor Ding Chun working in European Studies Center of Fudan University to convey the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to France. Pro.Ding Chun showed his opinion that comparing to two special closed relationships,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Russia, France remains his neutral standpoint as one of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re are no long-term, strategic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China media expressed their idea that China will do the benefit to strategic co-operation which will be contribution to the harmony world with France by reducing differences and changing antinomy. It is evidence reproduced in the media that China deliberately consolidated 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France.

China media have taken a different attitude to deal with the comment from Jack Cafferty, the host of CNN program "SITUATION ROOM"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dignity and reputation of Chinese people and government. That kind of response reflected the subtle character of interdependence and mutual

compromi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such as CCTV, CNR, CRI, made intensiv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reports directed against Jack Cafferty's aggressive speech in a timely and intense manner. For example, "CCTV News" (《新聞聯播》), "News in the Morning" (《朝聞天下》), "News 30" (《新聞30分》), "News Room" (《新聞會客室》), "China News" (《中國新聞》), "News hour" (《整點新聞》), CNR's "financial world" (《財經天下》) and other programs rebroadcasted the program that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trongly condemned Cafferty's comment and demanded CNN to make a public apology statement. "News Room" program in the prime-time (Beijing 20:30) interviewed two guests who are experts of foreign affairs to analyze the details of Cafferty's contumelious speech, background of Caffert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feedback of CNN. "News Room"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has repeatedly stressed that some commentators in western media have no credibility on the conscience of humanity and justice. Li Xiao-meng, anchor of "News Room" said that the collis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East and West from ancient time have never been broken and will be continued in the future on the base of mutual respect and respect for facts. China media which argued with CNN on objectivity, media ethics and humanity virtues openly showed the world how to interpret "Harmony but Different" on the premise of mutual respect.

B. "Harmony is precious" (以和為貴): To bate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 neighbors under continual restraint

"CCTV News" made a live highlights report when Beijing Olympic torch relaying in Seoul on April 27, 2008. The other mainstream China media reported the scene of warm friendship as the same as CCTV. However, the reports in South Korean on newspapers, television and other media made the focus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people of International Campaign Resistance to Mandatory Repatriation of Refugees Fleeing the North Korea and abused violently Chines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n network.

Facing to the "battle in words" between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people, China mainstream media was calm and restrained to confront with their anger and condemnation. Topics about the friction were adopted infrequently on TV and radio programs; on the contrary, opinions of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were inclined to be emphasized.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expressed the appreciation to citizens in Seoul meanwhile condolences to wounded policemen in TV program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Professor Liu Jiang-yong, the expert i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conveyed his opinion in an important news talk show "Today's Focus" (CCTV-4), which even if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radical students and the some criminals who disrupted Olympic torch relaying can not be avoided, it shouldn't be threat to the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South Korea or Japan. At present, mutual trust,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and development faster and faster in good-neighborly relations.

Followed the friction of Olympic torch relay, a reporter of SBS took the film of Beijing Olympic Games opening ceremony secretly as well as disclosed some fractions of scene in news program. Bai

Yan-song, a well-known host in CCTV News Channel comments show "News 1+1" said that the biggest loser is SBS in the incident of Beijing Olympic opening ceremony leak, compared to that all audience is another one of the losers for "some of our happiness was stolen ahead of time." TV and Radio media didn't make any comments on any anger and condemnation about it, whereas delivered rational analysis about consequences of hazards for journalists to undermine the conduct and violate ethics and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s. It is clear that it is an expression of tolerance and objective manner.

As we all know, the mainstream media, as Chinese government's "mouthpiece", has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abide by the government and advocate of public opinion, the mainstream media reflect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try to keep peaceful circumstance in Asia in order to show the "harmony" ideas.

C. "Harmony Creating World"(和寔生物):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China in the media

Overseas troubles accrued suddenly during Beijing Olympic torch relay in April 2008 just eliminated, "5 · 12" earthquake in Wenchuan of Sichuan province brought tremendous disaster unexpectedly to the whole Chinese people. CCTV began to carry on 24-hour live broadcast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the earthquake outbreak in the afternoon on 12, May, 2008, which opened up a new era of TV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reaction speed, length, live-scale, program forms, communication effects and social influence in the TV newscast history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apid response of disaster-relief and efficient solutions under the "national system" not only aroused all the Chinese people helping each other by one heart but also mov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ese government changed its "self-reliance" and "do not rely on foreign aids" principle to accept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s from South Korea, Japan, Russia, Singapore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Almost every few hours, the news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Britain, Germany, Saudi Arabia, Pakistan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broadcast on live. And more special features have been focused on search and rescue work by Russia,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Wen Jing, one of the anchors of 24-hour livecast "United as a wall for earthquake relief", said that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hands when we need you, which let us appreciate you as our family." Both the practices of government and opinions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tried to improve and rebuild better diplomatic image.

4. Evolvement of Chinese diplomatic thoughts

We have three main historical periods to observe the evolvement of Chinese diplomatic thoughts after the year of 1949, Mao Ze-Dong's "three worlds" theory, Deng Xiao-Ping's "hiding our capacity" and "never take the lead" theory, Jiang Ze-Min's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nd then Hu Jin-Tao's "harmonious world". These related but different diplomatic thoughts reflect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ncept.

When Chairman Mao Ze-Dong met with Zambian President Kenneth Kaunda, on February 22, 1974,

he expatiated "three worlds" theory and called o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to unite against the hegemony powers. Mao's diplomatic thought aimed at searching for friends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that hegemony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 in an attempt to isolate China at that time. It played an inestimable role of laying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However, 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dopted, the diplomatic policy had its inevitable limitations to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6·4" political disturbances occurred in 1989 in China, followed by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old War seemed cease, at the meantime strategic balance of forces was in a serious imbalance. In the face of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eng Xiao-Ping developed a diplomatic strategy as "hiding our capacity" to reduce the enormous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succession of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put forward "the buil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theory based on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 concept of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means China would play its role in the building of a multipolar world by cooperating with ASEAN, Indi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but "will never take the lead".

When attended the Asian-African summit in Jakarta on April 22, 2005,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pointed out in his speech that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promote the friendly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dialogue on an equal footing,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to build a harmonious world togeth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Chinese leader to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world"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n the same year on July 1, during Hu Jin-Tao's diplomatic visit in Moscow, "harmonious world" was written into th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egard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 I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consensus to enter the 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same year on September 15, Hu Jin-Tao delivered a speech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to expound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meaning of "harmonious world",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respect for the pluralism of world culture and the diversity of development models to optimiz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armoniou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governmen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best practice of "harmonious world" theory to its neighboring Asian countries by cooperating with APEC,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10 +3" cooperation,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co-operation and the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peripheral environment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onclusion

The active and positive national image now is propagated by mainstream media in innovation system follow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oreign policy. There are mainly two ways to show how to rebuild China international image, one is push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broadcasting system in the neighbor countries, the other is dedicating news reports which express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o remove the fuzzy, one-sided, rigid cultural surmise between each other.

• Panel 3-2 近世에서의 海外情報

- Moderator** 河宇鳳 (HA Woobong, 全北大)
- Panelist-1** 宮嶋博史 (MIYAJIMA Hiroshi, 成均館大)
: 近世日本の朝鮮認識 - 壬辰倭亂の記憶を中心に
(근세 일본의 조선 인식 - 임진왜란의 기억을 중심으로)
- Panelist-2** 田中葉子 (TANAKA Yoko, 東京大)
: かわら版(木版印刷物)にみる江戸庶民にとってのペリー來航
(가와라반(목판인쇄물)으로 본 페리 내항이 에도의 서민들에게
미친 영향)
- Panelist-3** 松方冬子 (MATSUKATA Fuyuko, 東京大)
: キリシタンから西洋近代へ
-17世紀末～18世紀末オランダ風説書の主題
(크리스찬에서 서양 근대로 - 17세기말~18세기말 네덜란드 풍설서의
주제)
- Panelist-4** 八耳俊文 (YATSUMIMI Toshifumi, 青山學院女子短期大學)
: 漢譯洋學書と19世紀日本の出版文化 - ホブソン書を中心に
(한역양학서와 19세기 출판문화 - 홉슨의 서적을 중심으로)
- Panelist-5** 許東賢 (HUH Donghyun, 慶熙大)
: 開化初朝(1876~1881) 遣日使節의 日本認識
- Discussant** 金豊起 (KIM Punggi, 江原大)
韓明基(HAN Myunggi, 明知大)

近世日本の朝鮮認識

－ 壬辰倭乱の記憶を中心に －

■ 宮嶋博史 (成均館大 學 校) ■

近世日本の朝鮮認識－壬辰倭乱の記憶を中心に

宮嶋博史（成均館大 schools）

〈目 次〉

- I. はじめに
- II. 壬辰倭乱に関する各種記録
- III. 徳川幕府と大名による公的記録
- IV. 新井白石の認識
- V. 明治維新以後への展望
- VI. 現在の問題

I. はじめに

日本史では豊臣政権の成立をもって中世と近世を分かつ分水嶺とみなす見解が一般的である。こうした理解に立てば、壬辰倭乱(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戦争)は近世の初頭に起きた大事件であったとい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が、同様に、日本近代の開始を告げる明治維新の前後から「征韓論」が唱えられ、それはやがて日本による韓国支配へとつながっていった。つまり、日本の歴史における近世の始まりと近代の始まりは、ともに朝鮮＝韓国に対する侵略と深く結びついていたのであるが、「明治」日本の指導者たちも、朝鮮＝韓国に対する侵略政策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つねに秀吉の故事を意識していた。こうした事態は日朝関係にとってきわめて不幸なことであったが、なぜこのような繰り返しが生じたのであろうか。

この報告は、この繰り返しがなぜ生じたのかを考えるひと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近世日本において壬辰倭乱がどのように語られ、記憶されたのかについて考察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壬辰倭乱に関する記録はさまざまな種類のものがあるが、最初にそれらを種類別に概観したうえで、武士たちによって作成された記録を中心に考察することにした。なぜならば、薩摩の島津氏や長州の毛利氏は、壬辰倭乱の主要な参戦者であっただけでなく、明治維新以後の朝鮮＝韓国侵略を主導する役割をも果たしたからである。

そしてこれら武士による壬辰倭乱の記録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特に次の諸点に着目しようと思う。すなわち、第一に、壬辰倭乱は所期の目的を達成することに失敗したという意味において日本の敗北であったといわざるをえないが、壬辰倭乱が敗北であったと日本が認識していたのかという点である。そして第二に、このことと関連して、なぜ所期の目的を達成できなかったに関して、どのような認識が行なわれたのかという点である。第三には、壬辰倭乱の前後における対朝鮮認識の問題である。つまり、壬辰倭乱がどのような朝鮮認識に基づいて引き起こされ、また乱後に朝鮮認識がどう変化し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れら三つの点に焦点をあてることによって、明治維新以後の日本の対朝鮮＝韓国政策を歴史的に規定した朝鮮認識のありかたを探ってみよう。

Ⅱ. 壬辰倭乱に関する各種記録

近世の日本においては、壬辰倭乱に関するさまざまな記録が作成され、またその一部は刊行されて多くの人に読まれた。それらを主に著者、あるいは編者の類型によって区別すると、以下のよう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すなわち、第一には民間人による記録であり、その多くは刊行されることがなかったが、中には刊行されて広く読まれたものも少数ながら存在している。第二には幕府や大名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ものであり、壬辰倭乱に直接参加した武士やその子孫たちの壬辰倭乱に関する認識をよく示す史料である。

第三の類型として、やや性格が異なるが、朝鮮側の壬辰倭乱に関する記録を原文のまま、あるいは日本語に翻訳して出版されたものがある。特に壬辰倭乱当時、朝鮮政府の中枢にいて戦争を指揮した柳成龍が戦後執筆した『懲毖録』は1695年に日本で刊行されたのをはじめ、以後、数度にわたって刊行、翻訳された。1695年に江戸で出版された『懲毖録』の序文は著名な儒学者であった貝原篤信(益軒)が書いている。益軒はその中で、古語を引きながら、兵には義兵、応兵、貪兵、驕兵、忿兵の五種類があること、義兵と応兵は君子の用兵であることを指摘したうえで、秀吉の朝鮮出兵は貪、驕、忿の兵として天道の憎むところであり、敗北せざるをえなかったと述べている。さらに、大国であっても好戦的であれば滅び、天下が平安であっても戦争を忘れると危険であるという言葉を引きながら、朝鮮は後者の場合であって、国が滅びる直前であったと批判している。こうした益軒の評価は比較的客観的なものであり、秀吉の敗北を冷静に受け止めているといえるが、こうした見方はきわめて少数に属するものであった。

第一の類型に属するものとしては、小瀬甫庵(おぜ・ほあん)の『太閤記』、竹内確斎・岡田玉山『絵本太閤記』、堀杏庵『朝鮮征伐記』、下河辺拾水『絵本朝鮮征伐記』、川口長孺『征韓偉略』などが代表的なもので、特に最初のふたつは徳川時代に人口に膾炙して、日本人の壬辰倭乱観、朝鮮観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また加藤清正の家臣であった古橋又玄(ふるはし・ゆうげん)が著した『清正記』も同様の類型に属する記録である。これらの記録は史実とフィクションを交えながら、壬辰倭乱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戦功を賛美する立場から書かれており、壬辰倭乱やそれを引き起こした秀吉に対する批判的な省察はまったく見られない。

以上にあげたものはいずれも刊行されたが、民間人による記録の多くは刊行されることなく、家伝の史料として近年の研究によって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ものである。その代表的なものとして、壬辰倭乱に医僧として従軍した慶念という人物の体験記録である『朝鮮日々記』を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日記では壬辰倭乱の悲惨さが赤裸々に描かれているが、内藤雋輔によって発掘、紹介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広く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慶念著、内藤雋輔校注、「朝鮮日々記」、『朝鮮学報』35、1965年)。

また倉地克直も1669年に岡山・池田藩で作成された「岡山藩家中諸士家譜」を用いて、そこに収録されている一般藩士たちの家譜の中から壬辰倭乱に従軍した人物たちの記録を紹介している(倉地克直『近世日本人は朝鮮をどうみていたか』、角川選書、2001年)。倉地は、壬辰倭乱の呼称として「高麗陣」という言葉が使われ、国内の戦いと同様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いる事実から、壬辰倭乱が外国との戦争であるという認識がほとんど見られないことを指摘しながらも、日本という「民族的」自覚や、朝鮮に対する蔑視という面だけでは捉えられない多様な意識のあり方を紹介している。

第二の類型に属する記録に関しては次節で検討するので、ここでは省略するが、壬辰倭乱に関する日本側の各種記録の特色として一点だけ指摘しておきたいことがある。それは壬辰倭乱に関する公的記録といえるものが、豊臣政権によっても徳川政権によっても作成され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言いかえると、日本では国家の立場に立って壬辰倭乱全体を対象とした公的記録がいったい作成され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そしてこのことは、日本において「正史」というものの編纂が古代の一時期を除いて行われ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と深く結びついている。

周知のように、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いて、歴史という学は特別な意味を与えられてきた。それに対応して、歴史を記録するという営みもきわめて重視されたが、その端的な現われが「正史」というものの編纂であった。中国で始められた正史の編纂という事業は、その周辺地域でも受容され、朝鮮でもヴェトナムでも、王朝が滅びると、その王朝の正史を編纂することが、新しい統治者の義務とみなされたのである。しかし他の事象でも見られることであるが、儒教文化圏に片足だけを突っ込んでいた日本においては、歴史を記録することにおいても、他の東アジア地域と異なった様相を呈してきた。すなわち、古代においては日本でも『日本書紀』をはじめとして、正史と見なすことのできる書籍が何度か編纂されたが、律令国家が衰退するとともに正史の編纂が行われなくなり、10世紀以後は正史が存在しないという特異な状況が続く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歴史を記録し、歴史書を編纂するということに関する朝鮮と日本のこのような違いは、壬辰倭乱に関する記録においても如実に現れている。朝鮮では『宣祖実録』という基本史料が残されているだけでなく、柳成龍や李舜臣といった壬辰倭乱の最高指揮者たちの手になる記録が作成されたのに対して、日本では公的記録だけでなく、指揮官たちが直接執筆した記録もきわめて断片的なものが残されているだけなのである。

日本のこうした状況については、いくつかその原因を指摘することができよう。武士たちの教養のなさ、豊臣政権が戦後まもなく崩壊し、徳川政権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たこと、などもその原因であろう。しかしより根本的な原因として、歴史を記録しそれを編纂するという伝統が日本では欠如し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周知のように朝鮮では、壬辰倭乱によって焼失した朝鮮前期の『実録』を復刊するために多大の努力を傾けたのであるが、歴史を記録してそれを後世に残す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朝鮮のこうした熱意と比較するとき、日本の状況はきわめて対照的である。そしてこのことは、単に歴史書編纂の問題にとどまるものではなく、壬辰倭乱が日本の敗北であったという認識をもてなくさせた大きな原因のひとつでなかったのだろうか。

Ⅲ. 徳川幕府と大名による公的記録

次に壬辰倭乱に関する各種記録の中で、公的な性格を有するもの、すなわち徳川幕府や近世の大名家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ものを検討する。

まず幕府による記録としてもっとも注目されるのは、『寛政重修諸家譜』（以下、『寛政家譜』と略称する）である。『寛政家譜』は、1799年に幕府の命によって編纂が開始され1812年に完成された全1520巻から成る膨大な家系記録である。幕府はこれに先立って『寛永諸家系図伝』を編纂したことがあったが、『寛政家譜』はこれを大幅に補充したもので、徳川時代の最上級武士たち

の家系と個人の行跡を記録している。その編纂は各大名や旗本から提出された家譜をもとにして、その真偽を幕府が調査するという方法で行なわれたので、幕府の公的史料としての性格を有しているとい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寛政家譜』に収録されているのは、徳川時代中期の時点で存在していた大名と旗本の家系であり、家系が断絶した家門はその支流が存続しているものに限って、史料の残っている範囲で収録することを原則とした。したがって壬辰倭乱において中心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た小西行長や加藤清正、さらには宇喜多秀家などの家系は収録されていない。『寛政家譜』は家譜という名称からも推測しうるように族譜の一種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が、日本の家譜は基本的に傍系子孫を除外していること、政府の命により編纂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などの点で韓国や中国の族譜と区別され、琉球の家譜と同じ性格を有している。そしてこれも琉球の家譜と共通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が、重要な個人に関してはきわめて詳細な履歴が記載されており、この個人記録の部分に、壬辰倭乱と関連する記述を多く発見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壬辰倭乱の際の豊臣軍は全体が9隊に分けられたが、各隊の指揮者は第1隊から順番に小西行長、加藤清正、黒田長政、毛利吉成、福島正則、小早川隆景、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豊臣秀勝であった。このほかの重要な参戦者としては宗義智、鍋島直茂、大友吉統、島津義弘、細川忠興などがあり、また水軍の中心的人物としては九鬼喜隆、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加藤嘉明などを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以上にあげた主要参戦者の中で、小西行長、加藤清正、宇喜多秀家、豊臣秀勝の4名を除くすべての人物が『寛政家譜』に収録されているので、徳川時代の壬辰倭乱に関する公的な認識を示す史料としての価値が高いといえることができる。特に黒田長政、宗義智、島津義弘、九鬼喜隆、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加藤嘉明等の伝記部分では、壬辰、丁酉倭乱の際の行跡がきわめて詳細に述べられている。

『寛政家譜』に収録されている人物たちの壬辰倭乱に関する記録の特徴は、そのほとんどが戦勝の記録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たとえば、水軍の指揮者のひとりであった脇坂安治に関しては、次のように記述されている。

文禄元年朝鮮の役に浮田(宇喜多—引用者、以下同じ)秀家を総大将とし、陸軍の大將は小西行長、加藤清正、黒田長政等である。水軍の大將は安治および九鬼嘉隆、加藤嘉明である。4月12日に名護屋を発して釜山浦の着船し、そこから水陸に分かれて数箇所の城を攻め破り、しばらくして諸軍がソウルに攻め入り、浮田が陣を構えた。(その途中)安治は数万の敵陣を攻め破り、首千余級を得、生け捕りした者が二百人に及んだ。(中略)慶長2年、ふたたびかの地を征伐しようと諸將とともに海を渡った。(中略)唐島の前にいる板屋船がどうかするとわが軍船渡海の妨害をする。まずこれを追い払おうと熊川に行き、大きな船を造って諸軍一体になって鐘太鼓を合図に進退して打ち取ることを約束しあい、前後を争って敵船を攻撃し、片時の間に敵船数十艘を乗っ取った。残った船もことごとく敗北し、沖の方に向かって逃れるのを、諸軍が追いかけてこれを打ち取った。この事情が名護屋に伝えられると、太閤(秀吉)は書簡を送り、東照宮(徳川家康)からもその戦功を賞賛する書簡が与えられた。(『寛政家譜』、937巻、藤原氏支流 脇坂条)

さらにこのほかにも、明の軍隊が立て籠もっていた泗川城を攻撃して手柄を立てた話しや、蔚山に立て籠もった加藤清正軍を救出した話なども記録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が、総じていえば、安

治の戦功のみが述べられていて、李舜臣が指揮する水軍と戦って敗れた話しなどはまったく出てこないのである。

こうした傾向は安治に限られたものでなく、ほとんどの場合、勝利した記録、戦功を立てた記録だけが一方的に強調されている。不名誉な記録としては大友吉統(おおも・よしむね)の場合が唯一といってよいが、吉統に関して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られている。

文禄2年朝鮮の役に、明将李如松大軍をひきいて小西行長が籠れる平壤城を攻。行長使を吉統および黒田長政等が許にはせて、援兵をこうといえども、吉統明兵の形勢におそれてこれを救わず。太閤此よしを聞おおいに怒り、吉統がふるまい日本の恥辱なりとて、領国をのぞかれ、佐竹義宣に預けらる。(『寛政家譜』、114巻、清和源氏(為義流)大友条)

吉統がこのような秀吉から罰せられたのは、他の武将に対するみせしめとしての意味もあったが、それよりも彼の領国であった豊後国を豊臣の直轄領にしたかったからであるともいわれている(池上裕子『織豊政権と江戸幕府』、講談社、日本の歴史15、2002年)。いずれにせよ、『寛政家譜』の中で珍しく不名誉なことが記録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が、これは大友氏がこの処罰を契機に没落して、徳川政権のもとで存続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ために生じた現象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言いかえると、徳川時代にも大名として存続した家門の場合、壬辰、丁酉倭乱における敗北や不名誉な記録は意図的に避けられたのである。

『寛政家譜』の中で特に注目したいのは、島津氏の薩摩藩と毛利氏の長州藩の場合である。なぜならばこの両藩は壬辰倭乱に加わったのち、豊臣の臣下として徳川と争ったにも関わらず徳川時代にも存続しただけでなく、周知のように明治維新の中心勢力として、近代日本の建設において核心的な役割を果たすとともに、韓国侵略を先導したからである。‘征韓論’を唱えた西郷隆盛は薩摩藩出身であり、初代韓国統監の伊藤博文と初代朝鮮総督となった寺内正毅は長州藩出身であった。

島津氏で壬辰・丁酉倭乱に出軍した義弘の場合、『諸家譜』では義弘の功績が詳細に描かれている(108巻)。特に丁酉再乱の時に、南原城の攻撃や、泗川における明将・董一元との戦いで戦功を上げたことが特記されている。島津氏の場合、これだけでなく、『征韓録』(島津久通・高柳行文編、1671年刊)という書籍を独自に編纂しているが、これは壬辰倭乱当時の文書史料をも多く収録していて、島津氏による公的な記録としての性格を有している。編者のひとりである島津久通は島津氏の族臣であったことも、このことを裏付けてくれる。したがってこの記録はそれなりの史料価値を有しているとい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が、その内容においては壬辰倭乱時の日本軍の行動について、やはりその勝利の側面ばかりを記録していて、この戦争が何を目的として起され、何を結果したのかというような根本的な問題に関しては何の言及もないのである。

柳成龍の『懲毖録』では、壬辰倭乱の教訓を得るために、朝鮮軍の敗北や、内部の混乱なども包み隠さずに描かれているのに対して、日本では壬辰倭乱に関する記録のほとんどが、あたかも勝利した戦争であったかのように描かれている。そしてこうした記録を通じて壬辰倭乱に関する記憶が蓄積されていったのであるが、明治維新以後、日本が再度韓国に対する侵略政策を推進しようとした際に、秀吉の侵略が‘大陸雄飛’の先駆としてあらためて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それが手痛い敗北であったことは忘却されてしまった。

こうした全体的な傾向の中で、毛利氏の場合はやや様相を異にしているのが注目される。『寛

『政家譜』の毛利輝元の部分では、壬辰、丁酉倭乱に関してごく簡略な記述があるだけである。これは輝元が朝鮮に渡った翌年に発病したため、養子の秀元が代わりに出兵したこと、丁酉再乱の際も壱岐に行っただけで、直接参戦しなかったこ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ろうが、丁酉再乱のときの蔚山城籠城戦で輝元の家臣が多く戦死したことが述べられ、壬辰倭乱が毛利氏にとって苦い経験であったことをうかがわせてくれる。また毛利氏のこうした立場は、あるいは壬辰倭乱に際して朝鮮に渡ったときの輝元が秀吉に送った報告に見える次のような認識も影響しているのかも知れない。

さてさてこの国手広きこと、日本より広く候ずると申すことに候、今度御人数にては、この国御治めは少分のことに候、そのうえ口通ぜず候、一所一所に通事も物知りあまたいり申すべく、殊の外むつかしきことに候、(中略)このまま唐などへはなかなか人があるまじく候、成らざることに候、少々の大なることにてはなく候、お察し給うべく候、(中略)この状、大坂へ御見せ頼み申し候、絵図もお副え候べく候。(『厳島文書』、『広島県史』 古代中世資料集3、朝尾直弘「16世紀後半の日本」、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11、1993年、より再引用)

倉地が指摘しているように、日本の武将たちは壬辰倭乱を国内の戦いの延長として認識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が、輝元はそこが日本国内とはまったく異なる異国の地であることを緒戦で思い知らされたのである。逆にいうと、日本軍は朝鮮に関する基本的な情報、すなわち国土の広さや地理、人口などに関する情報をもたないまま侵略戦争を始めたのであった。そして皮肉なことに、壬辰倭乱当時の両国の人口数は歴史上もっとも近接した状況にあったと思われ、輝元の認識は当之无愧といえども遠からずであった。

しかしこうした輝元のような見方は例外的なものであり、多くの武将たちは自己の戦績を誇るだけで、個々の戦闘ではほとんど勝利を収めながらも、所期の目的をなぜ達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かについては疑問をもつことも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IV. 新井白石の認識

次に、公的な記録とはいふことができないが、新井白石が壬辰倭乱をどのように認識していたのかをみることにしたい。白石は周知のように徳川家に儒者として仕え、幕府の中樞になっただけでなく、朝鮮通信使との関係を改めようとした経歴の持ち主であり、徳川時代の対朝鮮外交において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人物である。先にふれたように徳川氏自身による壬辰倭乱の公的総括は行なわれなかったもので、白石の壬辰倭乱観を通じて、徳川政権の立場をある程度うかがう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のである。

白石の代表的な歴史論として著名なのは、あらためていうまでもなく『読史余論』である。この書物は、摂関政治の開始から徳川政権成立までを対象として、日本の歴史を大きく公家の時代と武家の時代に分け、公家の時代が九変して武家の時代となり、さらに武家の時代が五変して徳川政権が樹立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を論じている。そして徳川政権の立場に立って執筆されているために豊臣秀吉に対してはきわめて批判的な見方をしているが、その批判は秀吉の国内政治に関するものであり、壬辰倭乱に関する批判はみられないのである。

『読史余論』はその末尾で「秀吉天下の事」として秀吉に関して論じている。「此人匹夫より起

り天下を掌にし給いしかば、世の人は是を称するなり。かゝる事我朝にては希なりしかど、異朝には其ためし少なからず。但し時の運に乗ぜられしによれるか」として、秀吉が天下を取ったことを冷笑的に述べている。そして秀吉の政権が2世という短命で終わった原因として五つの失政を指摘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が、それは検地を厳しくしたこと、厳罰主義を採用したこと、臣下を信用しなかったこと、武家の官位が高くなったこと、奢侈に流れたことがそれである。そして徳川政権のもとではこうした秀吉の統治とは反対の政策がとられたことを指摘して、体制の擁護をはか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が、豊臣政権の致命傷となった壬辰、丁酉倭乱に関しては一言の言及もない。

『読史余論』では壬辰倭乱に関して何の言及もないのに対して、白石の壬辰倭乱観がよくあらわれているのが『藩翰譜』である。『藩翰譜』は白石が仕えた甲府藩主・徳川綱豊(後に徳川幕府の第6代将軍となって家宣と改名した)の命によって執筆されたもので、大名337家の由来と行跡を記録し、さらに系図が付されている。

『藩翰譜』に収録されている人物の中で壬辰倭乱に参戦したのは加藤嘉明、藤堂高虎、毛利輝元、島津義弘、鍋島直茂、蜂須賀家政、有馬晴信、脇坂安治、宗義智、福島正則、加藤清正などであり、小西行長、宇喜多秀家を除いて、主要な人物がすべてほぼ網羅されている。問題は各人物の描き方であるが、基本的に『寛政家譜』と同様に戦勝の記録で埋めつくされているといえることができる。『寛政家譜』との違いといえば、個別の戦闘に関する考証部分で、史料によって日付が食い違っているものについて推論を加えているのが異なっているだけである。この違いは、白石の儒者としての「合理性」のあらわれとみることもできるが、壬辰倭乱そのものに対する批判はまったくみられない。そもそも徳川家康の壬辰倭乱に対する態度は、自らは直接参戦しなかったものの、それに反対したわけでは決してなかった。秀吉が朝鮮攻撃を最終的に決定するために開いた五宿老、三小宿老、五奉行との会議において、五宿老の筆頭であった家康ひとりが賛成の発言をしたのである。したがって徳川政権としては秀吉の朝鮮侵略を批判しうる立場にはなかったものであり、こうしたことが白石にも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のかも知れない。

白石に限らず、徳川時代日本の儒者たちは、「武」に対する「文」の優位という儒教のきわめて原則的な立場に立って豊臣、徳川政権を批判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武」の支配を認めたうえでの「仁政」の追求、これが彼らに共通する姿勢であったのである。「武」による全国統一という論理の延長で企図された壬辰倭乱に対して批判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も、こうした儒者としての不徹底さと不可分の関係に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のである。

V. 明治維新以後への展望

幕末になって日本が欧米の脅威にさらされる中で、征韓の主張が再度高まってくること、それが明治維新政府にも引き継がれていくことに関しては、これまでも指摘されてきた。そして韓国を併合して初代の朝鮮総督になった寺内正毅が、「小早川、加藤、小西が世にあれば、今宵の月をいかにみるらむ」という歌を詠んだことも周知の通りである。こうして明治維新以後の日本において、秀吉は大陸雄飛の先駆者としてふたたび蘇るのであるが、こうした現象は近世における壬辰倭乱認識、すなわちそれに対する批判の欠如の産物であった。

近世における壬辰倭乱認識と近代のそれとの共通性を端的に示すものとして、1924年に参謀本

部で編纂、出版された『日本戦史 朝鮮役』を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本は、経過表、附表、附図から成る本巻と文書、補伝から成る補巻の2冊で構成されているが、その内容は、近世に編纂された壬辰倭乱に関する各種書物と基本的に変わるところがない。すなわち、ほとんどが戦勝の記録であり、この戦争が何を目的として、どういう判断にもとづいて始められたのか、所期の目的がなぜ達成されなかったのか、等の基本的な問題に関しては何も語っていないのである。補伝の最後の部分で、「朝鮮役の評」としていくつかの史料を抜粋しているが、「武家事紀」からの抜粋がもっとも大きな部分を占めている。

秀吉晩年ニ及ンテ朝鮮ヲ征伐シ其勇膽古今ニ拔出ス。凡ソ朝鮮ハ本朝ノ属国藩屏タルコト往古神功皇后三韓ヲ征伐セラレシヨリ此方代々其制旧記ニ明白也。其後本朝ノ王威衰エ武家未ダ四海平均ノ化ニ及ブコトナシ。故ニ朝鮮久シク本朝ヘ貢賦ヲ奉ズル事絶エテ中比ヨリ唯隣交ノ好ヲ修スルト称ス。秀吉治世ニ当テ東西南北武化ヲ慕テ不庭ノ賊臣アラズ。故ニ秀吉朝鮮征伐ノ催ヲナシ玉ウ。朝鮮元懦弱国ナルカ故ニ僅カー戦ニ利ヲ失ッテ国王逃亡シ王子既ニ生捕ラル此時朝鮮征伐ノ諸將志ヲ一ニシテ忠義ヲ竭サンニハ朝鮮ハ云ウニ不及大明国モ一旦敗亡ニ至ルベシト雖モ衆議不正諸將不和ガ故ニ悉ク異国ノ謀ニ落ツ。(以下略)

「武家事紀」は山鹿素行の著述であり、彼の見解が参謀本部＝日本軍部の見解であったわけではもちろんないが、さまざまに存在した壬辰倭乱に関する評価の中で、「武家事紀」の評価をわざわざ長々と紹介しているのは、参謀本部の立場をそれとなく示すものであろう。儒者である山鹿素行の壬辰倭乱観も寒心に耐えないものであるが、近代日本においてもこうした山鹿のような見解が大きな影響力を発揮したのである。

VI. 現在の問題

壬辰、丁酉倭乱の原因に関しては周知のように色々な見解があり、一致した理解というものはいまも存在していない。しかしそれが無知と誇大妄想から発したきわめて無謀な企て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は、大方の意見は一致しているとみてもよいだろう。そうした意味では、近世から近代にかけての壬辰倭乱観は克服されたとみることにもできるが、戦国の内乱状況を克服して国内統一を達成した豊臣政権に対する高い評価と、壬辰倭乱に関する否定的評価とが総合されないままに並存しているのが現状ではなかろうか。統一を成し遂げるまでの秀吉は大好きであるが、それ以後の秀吉はまったく評価できないという司馬遼太郎の見解は、こうした現状を端的に反映したものであろう。

こうした問題を再考するためには、「武家事紀」がいみじくも述べているように、武家による統一政権の成立ということが、ただちに海外への侵略となって現われざるをえなかったという問題、すなわち日本における統一政権の成立が東アジア全体にとってはきわめて不幸なことであったという問題を深刻に省察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と思われる。そしてそれは、明治維新という変革が東アジア世界にとっては災いと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問題と深く結びついていると私は考える。

근세일본의 조선인식-임진왜란의 기억을 중심으로

宮嶋博史 (成均館大學校)

〈목 차〉

- I. 들어가기
- II.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각종 기록
- III. 도쿠가와 막부와 다이묘에 의한 공적 기록
- IV. 新井白石(아라이 하쿠세키: 인명)의 인식
- V. 메이지유신 이후의 전망
- VI. 현재의 문제

I. 들어가기

일본사에서는 豊臣(도요토미)정권의 성립을 가지고 중세와 근세를 분할하는 분수령이라고 보는 견해가 일반적이다. 그런 식으로 이해를 하면 임진왜란(豊臣秀吉<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의 조선침략전쟁)은 근세 초엽에 일어난 대사가건이었으며, 그와 마찬가지로 일본 근대의 시작을 알리는 대사가건인 明治維新(메이지유신: 1868년)을 전후해서 ‘정한론’이 나오고, 중국에는 일본에 의한 한국지배로 이어져갔다. 즉 일본 역사에 있어서 근세의 시작과 근대의 시작은 모두 조선=한국침략과 매우 깊은 관련이 있다는 것인데, ‘明治(메이지)시대(1868년~1912년)’의 일본 지도자들도 조선=한국에 대한 침략정책을 추진함에 있어서 항상 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가 했던 일을 의식하고 있었다. 이런 일들은 일본과 조선과의 관계에 있어서 매우 불행한 일이었지만, 왜 그와 같은 일이 되풀이 되었던 것일까?

이 보고서는 왜 이런 식으로 역사가 되풀이 되었는지를 생각해보게 하는 하나의 실마리로서, 근세 일본에서 임진왜란이 어떻게 논해졌으며, 기억되고 있는지에 대해 고찰하려는 것이다.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기록은 많은 종류의 것이 있다. 먼저 그것들을 종류별로 개괄한 후에 무사들에 의해 작성된 기록을 중심으로 고찰해 보고자 한다. 왜냐하면 薩摩(사츠마: 옛 지명, 지금의 규슈지방)의 島津(시마즈)氏나 長州(초슈: 옛 지명)의 毛利(모오리)氏는 임진왜란의 주요 참전자이었을 뿐만 아니라 메이지유신(1868년) 이후의 조선=한국침략을 주도하는 역할을 했기 때문이다.

그리고 이들 무사에 의한 임진왜란의 기록을 검토함에 있어서 특히 다음과 같은 점에 주목하고자 한다. 즉 먼저 임진왜란은 소기의 목적을 달성하는데 실패했다는 점에서 일본의 패배였다고 밖에 할 수 없으나, 일본이 임진왜란을 과연 패배로 인식했었는가 하는 점이다. 그리고 두 번째로 그것과 관련해서 왜 소기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었는지에 대해서는 어떻게 인식하고 있었는가 하는 점이다. 세 번째로는 임진왜란 전후의 조선에 대해 어떻게 인

식하고 있었는가 하는 문제이다. 즉 임진왜란이 어떠한 ‘조선에 대한 인식’ (이후 ‘조선인식’)에 의해 일어났으며, 또 임진왜란 후에는 조선인식이 어떻게 변화했는가 하는 것이다. 이 세가지 점에 초점을 맞추므로써 메이지유신 이후 일본의 對조선(=한국)정책을 역사적으로 규정한 조선인식이 어떠한지에 대해 알아보기로 한다.

II.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각종 기록

근세 일본에서는 임진왜란에 관한 많은 기록이 작성되었고 또 그 일부는 간행되어 많은 사람들이 읽었다. 그것들을 주로 저자, 또는 편자의 유형에 따라 구별해보면 아래와 같이 나눌 수 있다. 즉 첫 번째로는 민간인에 의한 기록인데 그 대부분은 간행되지 않았으나 그 중에는 간행되어 널리 읽힌 서적도 간혹 존재한다. 두 번째로는 막부나 다이묘(大名: 영주)에 의해 편찬된 것이며, 임진왜란에 직접 참가한 무사나 그 자손들이 임진왜란에 대해 어떻게 인식했는지 그런 점을 잘 나타내는 사료이다.

세 번째 유형은 위의 두 개와는 약간 성격이 다를지 모르지만 조선에서 쓰여진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기록을 원문 그대로 또는 일어로 번역해서 출간한 것이 있다. 특히 임진왜란 당시 조선정부의 중심부에 있으면서 전쟁을 지휘했던 유성룡이 전후에 집필한 ‘징비록’은 1695년 일본에서 처음으로 간행되었고, 그 후에도 몇 번에 걸쳐 간행, 번역되었다. 1695년에 에도(江戸: 현재의 동경)에서 출판된 ‘징비록’의 서문은 저명한 일본의 유학자였던 貝原益軒(가이바라 에키켄)이 썼다. 가이바라 에키켄은 그 중에서 한서에 나온 고사를 인용해, 兵에는 의병, 응병, 탐병, 교병, 분병의 5종류가 있으며, 의병과 응병은 군자의 용병이라고 지적한 후에 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의 조선출병은 탐, 교, 분의 병으로서 하늘의 법도(天道)가 싫어하는 일이며, 패배할 수 밖에 없었다고 말한다. 나아가 대국이라 하더라도 호전적이면 멸망하고, 천하가 평안하더라도 전쟁을 잊어버리면 위험하다는 말을 인용하면서 조선은 후자에 해당하며 국가가 망하기 직전이었다고 비판하고 있다. 이러한 가이바라 에키켄의 평가는 비교적 객관적인 것이며, 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의 패배를 냉정하게 받아들이고 있다고 할 수 있지만 이런 견해는 극히 소수에 속하는 것이었다.

첫 번째 유형에 속하는 것으로서 小瀬甫庵(인명:오제 호안)의 ‘太閤記(역주: 太閤은 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를 칭함)’, 竹内確齋(인명:다케노우치 카쿠사이)·岡田玉山(인명:오카다 교쿠산)의 ‘그림책 太閤記’, 堀杏庵(인명:호리 교안)의 ‘조선정벌기’, 下河邊拾水(인명:시모코베 슈스이)의 ‘그림책 조선정벌기’, 川口長孺(인명:카와구치 초쥬)의 ‘征韓偉略(정한위략)’ 등이 대표적인 것으로 특히 첫 번째와 두 번째는 도쿠가와 시대에 많이 인구에 회자되어 일본인의 임진왜란관, 조선관에 큰 영향을 미쳤다. 또한 加藤清正(가토 기요마사)의 가신이었던 古橋又玄(후루하시 유겐)이 저술한 ‘清正記’도 마찬가지로 유형에 속하는 기록이다. 이 기록들은 사실과 픽션을 가미해, 임진왜란에서 일본군의 공적을 찬양하는 입장에서 쓰고 있으며, 임진왜란이나 그것을 일으킨 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에 대한 비판적인 성찰은 하나도 보이지 않는다.

위에서 서술한 서적들은 모두 간행된 것이지만 민간인에 의한 기록의 대부분은 간행되는 일 없이 집안에 내려오는 사료로서 최근의 연구로 알려지게 된 것이다. 대표적인 것은 임진왜란에 의승(의사겸 스님)으로 종군했던 慶念(교넌)이라는 인물의 체험기록인 ‘조선일일기(朝鮮日々記)’를 들 수가 있다. 이 일기에는 임진왜란의 비참함이 적나라하게 그려져 있으며 内藤雋輔(나이토 쉰보)에 의해 발굴, 소개됨으로써 널리 알려지게 되었다. (慶念著, 内藤雋輔 (나이토쉰보)교정, ‘조선일일기’, ‘조선학보’ 35, 1965년).

또한 倉地克直(구라치 가츠나오:역사학자)도 1669년에 岡山(오카야마)번과 池田(이케다)번에서 작성된 ‘岡山藩家中諸士家譜五音寄(오카야마번에 있던 무사들의 족보)’를 인용해, 거기에 수록되어 있는 일반 무사들의 가보 중에서 임진왜란에 종군한 인물들의 기록을 소개하고 있다(倉地克直 ‘근세 일본인은 조선을 어떻게 보고 있었는가’, 角川選書, 2001년). 구라치는 임진왜란의 호칭으로 ‘高麗陣’이라는 말이 사용되었고, 국내 전쟁과 같은 호칭을 사용하고 있었다는 사실에 입각해 임진왜란이 외국과의 전쟁이라는 인식이 거의 없었다는 것을 지적하면서 일본이라는 ‘민족적’ 자각이나 조선에 대한 멸시라는 면만으로는 알 수 없는 다양한 의식의 존재를 소개하고 있다.

두 번째 유형에 속하는 기록에 관해서는 다음 절에서 검토할 것이므로 여기서는 생략하지만 임진왜란에 관한 일본측의 각종 기록의 특색으로 하나만 지적해두고 싶은 것이 있다. 그것은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공적인 기록이라고 할 수 있는 것이, 도요토미 정권이나 도쿠가와 정권에 의해서 만들어지지 않았다는 것이다. 바꿔 말하면 일본에서는 국가의 입장에서 임진왜란 전체를 대상으로 한 공적인 기록이 일체 만들어지지 않았다는 것이다. 그리고 이것은 일본에 있어서 ‘正史’라는 것의 편찬이 고대의 한 시기를 제외하고는 만들어지지 않았다는 것과 깊은 연관이 있다.

아시다시피 동아시아세계에 있어서 역사라는 학문은 특별한 의미를 갖고 있었다. 따라서 역사를 기록한다는 행위도 매우 중시되었고, 그 단적인 예가 ‘정사’ 편찬이다. 중국에서 시작된 정사 편찬사업은 그 주변지역으로 확산되어 조선과 베트남에서도 왕조가 망하면, 그 왕조의 정사를 편찬하는 것이, 새로운 통치자의 의무로 생각했다. 그러나 다른 사상에서도 볼 수 있는 일이지만, 유교문화권에 한 다리만 걸쳐놓고 있던 일본은 역사를 기록하는 것에 대해서도 다른 동아시아지역과 다른 양상을 나타내고 있었다. 즉 고대 일본에서는 ‘일본서기’를 비롯한 정사로 볼 수 있는 서적이 몇 번이나 편찬되었으나, 율령국가가 쇠퇴함과 동시에 정사편찬도 사라지고, 10세기 이후에는 정사편찬이 존재하지 않는 특이한 상황이 계속되었다.

역사를 기록하거나 역사서를 편찬하는 것에 대해 조선과 일본은 이렇게 차이가 있었고,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기록에 관해서도 그 차이점이 여실히 나타났다. 조선에서는 ‘선조실록’이라는 기본사료가 남아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유성룡이나 이순신이라는 임진왜란의 최고지휘자들이 직접 쓴 기록이 있는데 비해, 일본에서는 공적인 기록뿐만 아니라, 지휘관들이 직접 집필한 기록도 극히 단편적인 것만 남아 있을 뿐이다.

일본의 이러한 상황에 대해서는 몇 가지 그 원인을 지적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무사들이 교양이 없었다는 점, 도요토미 정권이 임진왜란 후에 곧바로 붕괴되어 도쿠가와 정권으로 넘어간 점 등도 그 원인일 것이다. 그러나 보다 근본적인 원인은 역사를 기록하고 그것을 편

찬하려는 전통이 일본에는 없었다는 점을 지적할 수 밖에 없다. 아시는 바와 같이 조선에서는 임진왜란에 의해 소실된 조선전기의 ‘실록’을 복간하기 위해 많은 노력을 기울였는데, 역사를 기록하고 그것을 후대에 남기는 것에 대한 조선의 이러한 열의와 비교해보면, 일본의 상황은 완전히 대조적이다. 그리고 이것은 단순히 역사서 편찬의 문제뿐만 아니라 임진왜란이 일본의 패배였다는 인식도 없게 만든 큰 원인 중 하나가 아니었을까?

III. 도쿠가와 막부와 다이묘에 의한 공적 기록

다음으로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각종 기록 중에서 공적인 성격을 갖는 것, 즉 도쿠가와 막부나 근세의 다이묘가에 의해 편찬된 것을 검토해본다.

우선 막부에 의한 기록으로서 가장 주목받는 것은 ‘寬政重修諸家譜’(이하 ‘寬政家譜’라 칭함)이다. ‘寬政家譜’는 1799년에 막부의 명령으로 편찬이 시작되어 1812년에 완성된 전 1520권으로 된 방대한 신하들의 계보 기록이다. 막부는 이보다 앞서 ‘寬永諸家系図伝(에도막부가 편찬한 족보)’을 편찬한 적이 있었으나, ‘寬政家譜’는 이를 대폭 수정, 보충한 것으로 도쿠가와시대의 최상급무사들의 가계와 개인의 행적을 기록하고 있다. 그 편찬은 각 다이묘나 하타모토에서 제출된 가보를 토대로 하여, 그 진위를 막부가 조사하는 방법으로 이루어졌기 때문에 막부의 공적 사료로서의 성격을 갖고 있다고 할 수 있다.

‘寬政家譜’에 수록되어 있는 것은 도쿠가와 시대 중기의 시점에서 존재한 다이묘와 하타모토(旗本: 에도시대에 장군직속으로 만석 이하의 녹봉을 받던 무사)의 가계이며, 가계가 단절된 가문은 그 지류가 존속되고 있고 가계에 대한 사료가 남아 있는 범위 내에서 수록하는 것을 원칙으로 삼았다. 따라서 임진왜란에 서 중심적인 역할을 했던 小西行長(고니시 유키나가)나 加藤清正(가토 기요마사), 나아가 浮田(=宇喜多: 우키타) 秀家(히데이에) 등의 가계는 수록되어 있지 않다. ‘寬政家譜’는 가보라는 명칭에서도 추측할 수 있듯이 족보의 일종으로 볼 수 있으나, 일본의 가보는 기본적으로 방계자손을 제외하고 있다는 것, 정부의 명으로 편찬된 것이라는 것 등의 점에서 한국과 중국의 족보와는 구별되고 류큐(琉球: 지금의 오키나와)의 옛이름으로 일본과는 다른 왕조가 있었다)의 가보와 같은 성격을 갖고 있다. 그리고 이것들도 류큐의 가보와의 공통점인데 중요한 개인에 관해서는 극히 상세한 이력이 기재되어 있으며, 이 개인기록 부분에 임진왜란과 관련된 기술을 많이 발견할 수 있었다.

임진왜란 때의 도요토미 군대는 전체가 9개 대대로 나뉘어 있었는데, 각 대대의 지휘자는 제1대부터 순서대로 小西行長(고니시 유키나가), 加藤清正(가토 기요마사), 黒田長政(구로다 나가마사), 毛利吉成(모오리 요시나리), 福島正則(후쿠시마 마사노리), 小早川隆景(고바야카와 타카카게), 毛利輝元(모오리 테루모토), 宇喜多秀家(우키타 히데이에), 豊臣秀勝(도요토미 히데카츠)였다. 그 밖의 중요한 참전자로서는 宗義智(소 요시토시), 鍋島直茂(나베시마 나오히데), 大友吉統(오오토모 요시무네), 島津義弘(시마즈 요시히로), 細川忠興(호소가와 타다오키) 등이 있으며 또한 수군의 중심적 인물로서는 九鬼嘉隆(구기 요시타

카), 藤堂高虎 (토도 다카토라), 脇坂安治(와키자카 야스지), 加藤嘉明(가토 요시아키) 등을 들 수가 있다. 위에서 말한 주요 참전자 중에서 小西行長(고니시 유키나가), 加藤清正(가토 기요마사), 宇喜多秀家(우키타 히데이에), 豊臣秀勝 (도요토미 히데카즈), 이 4명을 제외한 모든 인물이 ‘寬政家譜’에 수록되어 있으므로 도쿠가와 시대의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공적인 인식을 나타내는 사료로서 가치가 높다고 할 수 있다. 특히 黒田長政(구로다 나가마사), 宗義智(소 요시토시), 島津義弘 (시마즈 요시히로), 九鬼嘉隆(구기 요시타카), 藤堂高虎 (토도 다카토라), 脇坂安治(와키자카 야스지), 加藤嘉明(가토 요시아키) 의 전기부분에서는 임진왜란과 정유재란 시의 행적이 대단히 상세하게 나와 있다.

‘寬政家譜’에 수록되어 있는 인물의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기록의 특징은 그 대부분이 전승기록이라는 것이다. 예를 들어 수군의 지휘자 중 하나였던 脇坂安治(와키자카 야스지)에 관해서는 다음과 같이 기술되어 있다.

1592년 1차 조선침공에 浮田(=宇喜多: 우키타)秀家(히데이에)를 총대장으로 하여 육군 대장은 小西行長(고니시 유키나가), 加藤清正(가토 기요마사), 黒田長政(구로다 나가마사) 등이 있었다. 수군의 대장은 脇坂安治(와키자카 야스지) 및 九鬼嘉隆(구기 요시타카), 加藤嘉明(가토 요시아키)이었다. 4월12일에 名護屋(나고야:현재 사가현)를 출발하여 부산항에 배를 붙여 거기서 육군과 수군으로 나뉘어 몇 군데의 성을 공략해 격파하고, 잠시 있다가 모든 군이 서울로 쳐들어가 우키타가 진을 쳤다. (그 도중)와키자카 야스지는 수만의 적진을 뚫어 몇 천의 수급을 얻고 생포한 자가 2백 명에 이르렀다. (중략) 1597년, 다시 그 땅을 정벌하고자 여러 장수들과 함께 바다를 건넜다. (중략) 唐島(가라시마:지명)의 앞에 있는 판옥선(조선시대의 전투선)이 걸핏하면 우리 군선이 바다를 건너는 것을 방해할 한다. 우선 이것을 쫓아내려고 웅천(熊川)에 가서 큰 배를 만들어 여러 군이 일체가 되어 징과 북의 신호로 진퇴하며 적을 물리치자고 약속해 앞뒤를 다투어 적의 선박을 공격하고 순식간에 적선 수십 척을 차지했다. 나머지 배들도 계속해서 패배하여 바다 쪽을 향해 도망가는 것을 우리 군이 쫓아가 그것을 물리쳤다. 이러한 전황이 나고야에 알려지자 太閤(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는 서한을 보내왔고, 東照宮(도쿠가와 이에야스)께서도 공적을 치하하는 서한을 보내셨다. (‘寬政家譜’ , 937권, 후지와라씨 支流 와키자카條)

나아가 그 밖에도 명나라 군대가 농성하던 泗川城을 공격해 공적을 세운 이야기라든지, 울산에서 농성하던 加藤清正(가토 기요마사)군을 구출했다는 이야기 등도 기록되어 있으나, 총체적으로 말하자면 와키자카 야스지의 공적만이 기술되어 있고, 이순신이 지휘하던 수군과 싸워서 패배한 이야기 등은 전혀 나오지 않는 것이다.

이러한 경향은 와키자카 야스지 뿐만 아니라, 대부분의 경우 승리한 기록, 공로를 세운 기록만이 편파적으로 강조되어 있다. 불명예스런 기록으로서는 大友吉統 (오오토모 요시무네)의 경우가 유일한데, 요시무네에 관해서는 다음과 같이 기술되고 있다.

1593년 조선침공 때, 명나라 장수 李如松(이여송)이 대군을 이끌고 고니시 유키나가 지키고 있는 평양성을 공격했다. 고니시 유키나가는 요시무네 및 구로다 나가마사 등에게 사람을 보내어 원군을 청했으나, 요시무네는 명나라 군대의 형세에 놀라 이를 구하지 않았다.

太閤(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는 이를 전해 듣고 매우 화를 내었고 요시무네의 행실이 일본의 치욕이라며 영토를 빼앗아 佐竹義宣(사타케 요시노부)에게 주었다. (『寛政家譜』, 114권, 清和源氏(세이와 겐지) 오오토모條)

요시무네가 이처럼 히데요시로부터 벌을 받은 것은 다른 장수들에 대한 본보기라는 의미도 있었으나, 그것보다도 그의 영토였던 豊後(붕고:현재의 오오이타현)를 도요토미의 직할령으로 만들고 싶었기 때문이라고도 한다. (池上裕子(이케가미 유코) ‘오다 노부나가·도요토미 정권과 에도막부’, 講談社, 일본 역사 15, 2002년). 어쨌든 『寛政家譜』 속에서 드물게 불명예스런 것이 기록되어 있는데, 이는 오오토모씨가 이 처벌을 계기로 몰락하여, 도쿠가와 정권 하에서 존속할 수 없었기 때문에 생긴 현상이라 생각된다. 바꿔 말하면 도쿠가와 시대에 다이묘로서 존속한 가문의 경우, 임진왜란, 정유재란에서의 패배나 불명예스런 기록은 의도적으로 회피한 것이다.

『寛政家譜』 안에서 특히 주목할 것은 島津氏(시마즈씨)의 薩摩藩(사츠마번)과 毛利氏(모오리씨)의 長州藩(초슈번)의 경우이다. 왜냐하면 이 두 번은 임진왜란에 가담한 후 도요토미의 신하로서 도쿠가와와 싸웠음에도 불구하고 도쿠가와 시대에도 존속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아시다시피 메이지유신의 중심세력으로서 근대 일본의 건설에 있어서 핵심적인 역할을 하고, 한국 침략을 선도했기 때문이다. ‘정한론’을 제창한 西郷隆盛(사이고 타카모리)는 사츠마번 출신이며, 초대 한국 통감인 伊藤博文(이토 히로부미)와 초대 조선총독이 된 寺内正毅(테라우치 마사타케)는 초슈번 출신이었다.

시마즈씨에서 임진왜란과 정유재란에 출군한 義弘(요시히로)의 경우, 『諸家譜』에 요시히로의 공적이 상세하게 나와 있다(108권). 특히 정유재란 시에 남원성을 공격한 것과 사천에서 명나라 장수인 董一元(동일원)과 싸워 공적을 세운 것이 특기되어 있다. 시마즈씨의 경우 이것 뿐 만 아니라 ‘정한론’(島津久通(시마즈 히사미치), 高柳行文편, 1671년 간행)이라는 서적을 독자적으로 편찬하고 있는데 이는 임진왜란 당시의 문서사료도 많이 수록하고 있어 시마즈씨에 의한 공적인 기록이란 성격을 갖고 있다. 편자의 한 사람인 시마즈 히사미치가 시마즈씨의 족신(친족출신의 가신)이었던 것도 이것을 뒷받침하고 있다. 따라서 이 기록은 어느 정도 사료적인 가치를 갖고 있다고 할 수 있으나 그 내용에 있어서는 임진왜란 때 일본군의 행동에 대해서 역시 승리한 면만을 기록하고 있을 뿐이다. 이 전쟁이 어떤 목적으로 일어났고, 어떤 결과가 있었는가 하는 근본적인 문제에 관해서는 아무런 언급도 없다.

유성룡의 ‘징비록’에는 임진왜란의 교훈을 얻기 위해 조선군의 패배와 내부의 혼란 등도 하나 숨김없이 나와 있는데 반해 일본에서는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기록의 대부분이 마치 승리한 전쟁처럼 쓰였다. 그리고 이러한 기록을 통해 임진왜란에 관한 기억이 축적되어갔고, 메이지유신 이후 일본이 다시 한국에 대한 침략정책을 추진하려 했을 때, 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의 침략이 ‘대륙옹비’의 선구자로서 다시 주목받게 되어 그것이 뼈아픈 패배였다는 것은 잊어버렸다.

이러한 전체적인 경향 속에서 모오리씨의 경우는 약간 양상이 다르다는 점이 눈에 띈다. 『寛政家譜』의 모오리 테루모토 부분에서는 임진왜란과 정유재란에 관해 극히 간략한 기술만이 있을 뿐이다. 이는 모오리 테루모토가 조선에 건너간 이듬 해에 발병했기 때문에 양자인

히데모토가 대신에 출병한 것, 정유재란 때도 이키섬에 건너갔을 뿐 직접 참전하지 않았던 탓이겠지만, 정유재란 때의 울산성 농성전에서 테루모토의 가신들이 대부분 전사했다는 기록이 있어 임진왜란이 모오리씨에게 있어서 쓰라린 경험이었다는 것을 엿보이게 한다. 또한 모오리씨의 이러한 입장은 어쩌면 임진왜란 때 조선에 건너가서 테루모토가 히데요시에게 보낸 보고서에서 보여주는 다음과 같은 인식도 영향을 주고 있는 것인지도 모른다.

“이 나라의 넓이는 일본보다 넓고, 이번에 동원한 사람들로써 이 나라를 통치하기엔 적고, 게다가 말도 통하지 않고, 통역이라든지 여기에 대해 제대로 알고 있는 사람도 많지 않으니 예상 외로 어렵다고 할 수 있습니다. (중략) 이대로 중국으로 갈 수는 없을 것 같으니 많이 통찰해주시길(중략) 이 편지를 오사카(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가 있는 곳)에 보내주시길 부탁드립니다 그림도 같이 넣습니다”(『巖島文書(역주:히로시마에 있는 이즈쿠섬에 관한 고문서)』, 『広島県(히로시마 현:지명)史 古代中世資料集3』, 朝尾直弘(아사오 나오히로:역사학자) ‘16세기 후반의 일본’, 岩波講座 일본 역사11, 1993년, 에서 재인용)

구라치가 지적하듯이 일본의 장수들은 임진왜란을 국내 전쟁의 연장으로 인식하고 있었는데, 테루모토는 그곳이 일본과는 완전히 다른 이국 땅이라는 것을 여러 전투에서 깨닫고 있었던 것이다. 반대로 말하자면 일본군은 조선에 관한 기본적인 정보, 즉 국토의 크기나 지리, 인구 등에 관한 정보를 가지지 않은 채 침략전쟁을 일으킨 것이다. 그리고 아이러니컬하게도 임진왜란 당시 양국의 인구수는 역사상 가장 근접한 상황이었었던 것으로 보이며, 테루모토의 인식은 아주 틀린 것만은 아니었다.

그러나 이런 테루모토와 같은 견해는 매우 이례적인 것이었으며 많은 장수들은 자신의 공적을 자랑하기만 할 뿐이었고, 개개의 전투에서는 거의 승리를 거두면서도 소기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었던 것에 대한 의문은 가지지도 않았다.

IV. 新井白石(아라이 하쿠세키: 인명)의 인식

다음으로 공적인 기록이라고 할 수는 없지만, 아라이 하쿠세키가 임진왜란을 어떤 식으로 인식하고 있었는지에 대해 살펴보겠다. 하쿠세키는 아시다시피 도쿠가와 가문에 유학자로써 종사하여 막부의 중심인물이 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조선통신사와의 관계를 새롭게 하려고 한 경력을 가진 사람으로 도쿠가와 시대의 대조선외교에 있어서 중요한 역할을 한 인물이다. 먼저 말한 것처럼 도쿠가와씨는 직접적으로 임진왜란에 대해 공적인 총정리를 하지 않았으므로, 하쿠세키의 임진왜란관을 통해 도쿠가와 정권의 입장을 어느 정도 엿볼 수 있을 것이라 생각된다.

하쿠세키의 대표적인 역사론으로서 저명한 것은 두 말할 필요 없이 ‘讀史余論’이다. 이 서적은 섭관정치의 시작부터 도쿠가와 정권 성립에 이르기까지, 일본의 역사를 크게 귀족(公家) 시대와 무가 시대로 나누어, 귀족 시대가 9번 변하여 무가 시대가 되고, 나아가 무가 시대가 5번 변하여 도쿠가와 정권이 수립되었다는 것을 논하고 있다. 그리고 도쿠가와

정권 입장에서 집필되어 있으므로 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에 대해서는 극히 비판적인 견해이나, 그 비판은 히데요시의 국내 정치에 관한 것일 뿐 임진왜란에 관한 비판은 없다.

『讀史餘論』은 그 말미에 ‘히데요시 천하의 일’라는 문장을 넣었는데, 거기서 히데요시에 관한 말을 쓰고 있다. “이 사람은 필부에서 시작해 천하를 손에 넣었고 세상 사람들은 이를 칭송했다. 이런 일은 우리 정권에서는 드문 일이지만, 다른 정권에서는 적지 않다. 단 때의 운에 맡겨진 것이다”라며, 히데요시가 천하를 손에 넣은 것에 대해 냉소적으로 말하고 있다. 그리고 히데요시 정권이 2대라는 단명으로 끝난 원인으로서 5개의 실정을 지적하고 있는데, 그것은 검지(세금을 걷기 위한 측량조사)를 엄격하게 한 것, 엄벌주의를 채택했던 것, 신하를 신용하지 않은 것, 무가의 관위가 높아진 것, 사치를 하게 된 것 등이다. 그리고 도쿠가와 정권 하에서는 이러한 히데요시의 통치와는 반대의 정책을 취하게 된 것을 지적하며 도쿠가와 체제를 옹호하고 있다. 도요토미 정권의 치명상이 된 임진왜란과 정유재란에 관해서는 전혀 언급이 없다.

『독사여론』에서는 임진왜란에 관해 아무런 언급이 없으나 하쿠세키의 임진왜란관이 잘 나타나 있는 것은 『藩翰譜』(에도시대의 역사서)이다. 『藩翰譜』는 하쿠세키가 종사했던 甲府(고후)번주 徳川綱豊(도쿠가와 츠나토요: 후에 도쿠가와 막부의 6대 장군이 되어 ‘이에노부’로 개명했다)의 명령으로 집필된 것으로 다이묘(大名: 영주) 33개 가문의 유래와 행적을 기록했고 또한 계보도 수록했다.

『藩翰譜』에 수록되어 있는 인물 중에서 임진왜란에 참전했던 사람은 加藤嘉明(가토 요시아키), 藤堂高虎(토도 타카토라), 毛利輝元(모오리 테루모토), 島津義弘(시마즈 요시히로), 鍋島直茂(나베시마 나오히데), 蜂須賀家政(하치스카 이에마사), 有馬晴信(아리마 하루노부), 脇坂安治(와키자카 야스지), 宗義智(소 요시토시), 福島正則(후쿠시마 마사노리), 加藤清正(가토 기요마사) 등이며, 小西行長(고니시 유키나가), 宇喜多秀家(우키타 히데이에)를 제외하고 주요 인물이 거의 모두 망라되어 있다. 문제는 각 인물의 묘사인데, 기본적으로 ‘寛政家譜’와 마찬가지로 전승 기록으로 딱 차있다. ‘寛政家譜’와의 차이점은 개별 전투에 관한 고증부분에서 사료마다 날짜가 틀린 부분에 대해 추론을 더하고 있는 것 뿐이다. 이런 차이점은 하쿠세키가 유학자로서 ‘합리성’을 발휘한 것일 뿐 임진왜란 자체에 대한 비판은 전혀 보이지 않는다. 본래 도쿠가와 이에야스의 임진왜란에 대한 태도는 스스로는 직접 참전하지 않았지만, 그것에 반대한 것이 결코 아니었다. 히데요시가 조선공격을 최종적으로 결정하기 위해 열었던 五宿老(중신의 호칭), 三小宿老(중신의 호칭), 五奉行(무가시대의 직함)과의 중신회의에 있어서 오숙로의 필두였던 이에야스 한 명만이 찬성하는 발언을 한 것이다. 따라서 도쿠가와 정권으로서는 히데요시의 조선침략을 비판할 수 있는 입장은 아니었으며, 그런 사정이 하쿠세키에도 영향을 미치고 있었는지도 모른다.

하쿠세키 뿐만 아니라 도쿠가와 시대의 일본 유학자들은 ‘무’보다 ‘문’이 우위에 서있다는 유교의 원칙적인 입장에서 도요토미와 도쿠가와 정권을 비판하는 일은 없었다. 일단 ‘무’의 지배는 인정하고 그 다음에 ‘仁政’을 추구하는 것이 그들에게 공통된 자세였던 것이다. ‘무’로써 전국통일을 했다는 논리의 연장선상에서 기도된 임진왜란에 대해 비판할 수 없었던 것도 이런 유학자로서의 철저하지 못함과 불가분의 관계에 있었다고 생각되는 것이다.

V. 메이지유신 이후의 전망

막부 말기가 되어 일본이 서구로부터 위협받는 가운데, 다시 ‘정한론’이 대두한 것, 그것이 메이지유신 정권으로 이어져 가는 것에 대해서는 지금까지도 많은 지적이 있었다. 그리고 한국을 합병하여 초대 조선총독이 된 데라우치 마사타케가 “오바야카와, 가토, 고니시 등이 세상에 있었다면 오늘 밤의 달을 어떻게 볼까”라는 시를 읊조린 일도 다 아는 사실이다. 이렇게 메이지유신 이후의 일본에서 히데요시는 대륙옹비의 선구자로서 거듭났는데, 이러한 현상은 근세에 있어서의 임진왜란에 대한 인식, 즉 그것에 대한 비판이 결여된 산물이었다.

임진왜란에 대한 근세인식과 근대인식과의 공통점을 단적으로 나타내는 것으로서, 1924년에 참모본부에서 편찬, 출판된 ‘日本戰史 朝鮮役’을 들 수가 있다. 이 책은 경과표, 부표, 부도로 이루어진 본권과 문서, 보전으로 되어 있는 보권의 2장으로 구성되어 있는데, 그 내용은 근세에 편찬된 임진왜란에 대한 각종 서적과 기본적으로 다르지 않다. 즉 대부분이 전승기록이며, 이 전쟁이 무엇을 목적으로 하고 있었는지, 어떤 판단에 의거해 시작된 것인지, 소기의 목적이 왜 달성되지 못했는지 등의 기본적인 문제에 관해서는 아무런 말도 언급되지 않았다. 보전의 마지막 부분에 “조선역의 평”이라며 몇 가지 사료를 발췌하고는 있으나 ‘武家事紀(무가사기:무사들의 교양서로서 무가정치의 연혁과 예의, 풍속 등과 함께 무가정치의 정당성에 대해 논한 책)’에서의 발췌가 가장 큰 부분을 차지하고 있다.

“히데요시가 만년에 이르러 조선을 정벌하고자 고문서에 있는 문장을 발췌했다. 대략 조선은 우리 나라의 속국이다. 왕년에 神功(진구)황후가 삼한을 정벌했으므로 이는 명백하다. 그 후에 본국의 왕의 위력이 쇠퇴했고, 무가들은 아직 바다를 건너 넘어가지 않았다. 따라서 조선은 오랫동안 조공을 바치지 않았고 다만 친교만 맺고 있었다. 히데요시가 세상을 통치함에 있어서 동서남북을 무력으로 굴복시켜 이제 불복할 신하는 없다. 따라서 히데요시는 조선을 정벌하고자 한다. 조선은 본래 약한 나라여서 불과 한 번 싸움에 이익을 잃고서 국왕이 도망가고 왕자는 생포되었다. 이 때 조선을 정벌한 장수들을 하나같이 충의를 다하고자 조선은 말할 것도 없고 大明나라도 일단 패망하게 만들어야 한다고 했지만 그렇지 않은 사람도 있어서 불화가 잦아져 계속해서 이국의 계략에 빠지게 되었다”(이하 생략)

‘武家事記’는 山鹿素行(산가 소코)의 저술이며, 그의 견해가 참모본부=일본군부의 견해였다는 것은 물론 아니지만, 여러 가지 존재했던 임진왜란에 관한 평가 중에서 ‘무가사기’의 평가를 일부러 길게 소개하고 있는 것은 참모본부의 입장을 슬쩍 나타내는 것이리라. 유학자인 산가 소코의 임진왜란관도 한심하지만, 근대 일본에 있어서도 이러한 산가 소코와 같은 견해가 큰 영향을 발휘한 것이다.

VI. 현재의 문제

임진왜란과 정유재란의 원인에 관해서는 주지하다시피 여러 견해가 있어서 일치된 이해라는 것은 현재도 존재하지 않는다. 그러나 그것이 무지와 과대망상에서 나타난 극히 무모한 기획이라는 것에 관해서는 대부분의 의견은 일치하고 있다고 보면 될 것이다. 그런 의미에서는 근세에서 근대에 걸친 임진왜란관은 극복되었다고 볼 수도 있지만, 전국의 내란 상황을 극복해 국내통일을 달성한 도요토미 히데요시 정권에 대한 높은 평가와, 임진왜란에 관한 부정적 평가가 종합되지 않은 채 그대로 병존하는 것이 현황일 것이다. 통일을 성취하기 전까지의 히데요시는 아주 좋아하지만, 그 이후의 히데요시는 전혀 평가할 수 없다는 시바 료타로(일본의 유명한 역사소설가)의 견해는 이런 현상을 단적으로 반영한 것이다.

이러한 문제를 재고하기 위해서는 ‘무가사기’가 적절하게 말하고 있듯이 무가에 의한 통일정권의 성립이라는 것이 곧바로 해외침략으로 나타날 수 밖에 없었다는 문제를 심각하게 성찰할 필요가 있다고 생각한다. 그리고 그것은 메이지유신이라는 변혁이 동아시아 세계에 있어서는 재앙이 되어버렸다는 문제와 깊은 연관이 있다고 필자는 생각한다.

【Abstract】**Modern Japan's perception of Joseon Kingdom**

MIYAJIMA Hiroshi

1. Introduction

The beginning of Japan's modern histo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invasion of Joseon (Korea). Japan forayed into Joseon in 1592 (Imjinwar) at the start of modern days and also attempted to rule over the nation with ``Jeonghanron – theory for conquering Korea’’ in later modern times. In the Meiji Reform era, Japanese leaders were always aware of the old story of Hideyoshi, who triggered the Imjinwaeran war,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aggression into Joseon. Now we need to shed light on how had Imjinwaeran been discussed and assessed in Japan's modern days.

Review will be focused on the records written by warriors on the Imjinwaeran invasion. In particular, stresses will be laid on three points -1. Whether Japan acknowledged the invasion as defeated war 2. Why Japan failed to achieve its earlier purposes and 3. How it changed its notion of Joseon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Review will also be made on Japan's perception of Joseon after the Meiji Reform.

2. Various records on Imjinwaeran

Records on Imjinwaeran can be broadly categorized into three. First, records by civilians were scarcely published but, once circulated, they were read widely. Second, some were published by Japan's then feudal government which well shows the opinion on Imjinwaeran held by warriors who personally took part in the war or their offspring. Third, the others were either from Joseon's documents or translation for publication.

The first type mainly refers to in-house documents most of which had remained unpublicized and known through recent researches. Such documents hardly describe Imjinwaeran as a war against foreign nation.

The second type is classified as official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Japan which had had no compilation of official documents since ancient period. Japan previously had no official records on Imjinwaeran because the warriors were not intelligent enough while the Toyotomi government was replaced by the Tokukawa regime after the war.

The third type is represented by ``Jingbirok,’’ written by Yoo Seong-ryong. The book w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1696 in Japan. Kaibara Ekiken, who wrote the preface of the book, said Japan had been destined to failure in the war citing an episode in ancient book of ``Hanseu.’’ He said Hideyoshi's mobilization of forces was contrary to the Heaven's providence. He also criticized that Joseon was at that time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as it forgot the danger of war with rampant easygoing attitude, which the writer asserted only reflects the notion of minority.

3. Official records by Tokukawa government and Taimyo

More in-depth review will be made on the second-type records since they had the biggest impact upon the warriors of Satsuma and Choshu who led the Meiji Reform.

The 'gwanjeongjungsujegabo (寛政重修諸家譜)' book attracted the keenest attention from the then federal government. Printed in 1799 at the i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document was completed in 1812. Composed of 1,520 books, it is a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in-house and individual affairs of the highest class warriors during the Tokukawa age.

The book '寛政重修諸家譜' is about the family lineage of Taimyo and Hatamoto in the middle of the Tokukawa age. Discontinued lineage was supposed to maintain branches for records with available historic materials. So the records on the families of Konish Yukinaka, Kato Kiyoshima, Ukita Hideie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book.

Despite missing records of some families, the document contained family lineages of all nine command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Imjinwaeran. In particular, facts on Imjinwaeran and Jeongyujaeran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documents on Kuroda Nakashima, So Yoshitoshi, Shimaz Yoshihiro, Kugi Yoshitaka, Todo Takatora, Wakijaka Yasuharu and Kato Yoshiaki.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characters of the records on people involved in Imjinwaeran and referred in the '寛政重修諸家譜' is that they are mostly about victories in the war.

For instance, the record on Wakijaka Yasuharu only deals with Wakijaka's victories without mentioning his defeats by Joseon's navy led by Admiral Yi Sun-shin. And the situation is almost the same as in other references.

Ootomo Yoshimune is the only figure with dishonorable record, which tells he, scared by the massive size of Ming troops, failed to assist Konish. Toyotomi in punishment confiscated his land to give it to Sadake Yoshinobu. Such record remained as Ootomo collapsed with the punishment and could not maintain his status as Taimyo in the Tokukawa age. In other word, the families which sustained their Taimyo status in the Tokukawa era intentionally avoided dishonorable record of their losses in the Imjinwaeran.

We need to pay special heed in the '寛政重修諸家譜' regarding the cases of Satsuma-bon of Simazu and Chosu-bon of Mori. This is because the two took part in Imjinwaeran and remained as Taimyo despite their fight against Tokukawa on the side of Toyotomi.

Those from the two areas include Saigo Takamori who advocated the 'Jeonghanron', and Ito Hirobumi and Terauchi Masatake, who were the first rulers of Korea.

Simazu described performances of Yoshiro in detail and published the 'Jeonghanron' by himself in 1671. As the book has contents in the documents during Imjinwaeran, it has is regarded as the official record on Simazu. But it also deals with only victories in the war period.

Compared to 'Jingbirok' which also touched on the defeat of Joseon forces and internal chaos to get the lesson from the Imjinwaeran, Japan recorded history as if Imjinwaeran was a victory for Japan. And through the record, memories on Imjinwaeran had been accumulated. For instance, Hideyoshi emerged

as the flag-bearer of Japan's bid to leap onto the continent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after the Meiji Reform, which means Japan forgot the fact that the Imjinwaeran was a painful defeat.

Despite the general pattern like this, the case of Mori is somewhat different. '寛政重修諸家譜's part on Mori Terumoto briefly deals with Imjinwaeran. This is partly because his son attended the war instead of him due to his illness after Imjinwaeran and partly because most of his men died in a battle at Ulsan fortress during Jeongyujaeran, which shows Imjinwaeran was bitter experience for Mori. This also shows that Mori recognized the fact that Imjinwaeran was a war against foreign nation through his experiences of battles, in contrast with other warriors who regarded the war as civil one. But Terumoto's recognition is nothing but formality. The warriors would not harbor doubts on why they were not able to achieve their original goals.

4. The understanding of Arai Hakuseki

Despite based on unofficial record, I will explore on how did Arai Hakuseki think about Imjinwaeran. As a key official of the Japanese feudal regime, Hakuseki attempted to mend ties with correspondent officials from Joseon. H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Joseon's diplomatic history.

Hakuseki's historical theory is highlighted in 'Toksayeoron,' which deals with Japan's eras ranging from 'seokwan (concurrent holding government posts) politics' until the onset of Tokukawa government. The book also divides the period between 'noble class age' and 'warriors' age.' Tokukawa regime was very critical of the Toyotomi regime, but stopped short of mentioning the Imjinwaeran with references of only domestic affairs, though the war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crumbling Toyotomi government.

In contrast, Hakuseki touches on Imjinwaeran in his another book titled 'Byeonhanron,' which describes the origins and affairs of 337 families of Taimoyo at the instruction of Tokukawa Tsunayoto, lord of Kohu province.

The book is about the performances of main commanders in the Imjinwaeran but is full of victorious stories like in the '寛政重修諸家譜'. What is different is the fact that the book contains inference about the incorrect description of dates of each battle.

Hakuseki's such description is in defense of Tokukawa family since the family, who supported the Imjinwaeran, was not in the position of criticizing Hideyoshi for his aggression of Joseon.

5. Post Meiji Reform prospect

In the post-Meiji Reform era, Japan's Hideyoshi was reborn as the pioneer who enabled Japan to leap onto the continent, in the absence of criticism on the people who triggered Imjinwaeran.

Another book entitled '日本戦史 朝鮮役' (Japan's war history and the role of Joseon) also shows Japan shares same recognition on war against Korea both in early and late modern times. The book, published by joint chiefs of army in 1924, has similar contents with books published in early modern

days, replete with records of war victories without referring cause and purpose of the war and the reason of defeat. Though the book presents some historical facts on Joseon's role, it is focused on Soko's comment, describing Joseon as an incapable nation which was succumbed by Hideyoshi's armed forces. It says at one battle Joseon's king fled and princes were caught as captives.

Soko's such comment has had a far-flung influence until later modern days.

6. The matter of the present

Despite inconsistent and various opinions on the causes of Imjinwaeran and Jeongyujaeran, experts share the notion that they were reckless plans motivated by ignorance and expansive delusion. Despite high appreciation of Toyotomi's unification of Japan, there is no negative assessment on Imjinwaeran, which seems sheer nonsense.

This indicates the need for an in-depth review that the inauguration of a unified nation would easily lead to aggression of foreign nations. The writer believes the profound change of Meiji Reform had been a sort of catastrophe for East Asia.

かわら版(木版印刷物)にみる 江戸庶民にとってのペリー来航

■ 田中葉子 (東京大 schools) ■

かわら版(木版印刷物)にみる江戸庶民にとってのペリー来航

田中葉子(東京大 schools)

〈目 次〉

- I. 本報告の課題
- II. ペリー来航経緯と研究史の整理
- III. 黒船かわら版の製作と板行
- IV. 黒船かわら版の内容分類
- V. 蒸気船図
- VI. アメリカ人物図
- VII. 結び

I. 本報告の課題

嘉永六年(一八五三)および翌七年の二回にわたるペリー率いるアメリカ東インド艦隊の浦賀来航、いわゆる「黒船来航」は、当時の日本人、特に江戸庶民にはどう捉えられたのだろうか。ペリー来航に際して板行されたかわら版から考察する。

かわら版とは、「摺りもの」「一枚摺り」「読売」などと呼ばれ、火事や地震などの災害情報や珍しい事件などを記事にして販売した、木版の印刷物である¹⁾。板行許可のを受けていない、違法出版物であるが、たびたびの禁止令にも関わらず、ペリー来航時には、錦絵とともに都市部のメディアとして定着していた。かわら版の定義としてしばしば引用されるのが、中山栄之輔による以下の四点による定義である²⁾。

- 一、ニュース性をもっていること。
- 二、即製に摺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
- 三、無届け出版であること。
- 四、有料であること。

本報告では三点目に重点をおいて、改印がない木版印刷物をかわら版として検討する対象とした。かわら版の史料的特質として、次の二点を指摘することができよう。

一点目は、商品であったという点である。売り物として利益をあげるためには、かわら版の製作者は、買い手が何を求めているのか、何に興味を示すのかということを見無視するわけにはいか

1) かわら版に関する研究は、小野秀雄『かわら版物語』(雄山閣、一九六〇年)に代表されるように、新聞前史としての位置づけから始まった。一九七〇年代末からは近世期の情報の一スタイルとして捉え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九〇年代には都市における情報の形式に注目がなされ、近年、情報史研究での一素材ともなる一方、錦絵の時事性の指摘とあわせ、近世の都市におけるメディアのあり方として、かわら版そのものをもう一度捉えなおす試みがされている。「摺物」の呼称の提唱など、かわら版とは何かということが再検討される段階にきているといえよう。また、かわら版史料全体の目録化も始まっており絵画情報史研究会が「摺物資料一覧(第一稿)」(一九九四年)を、さらにそれを踏まえて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附属画像史料解析センターが「摺物総合編年目録」(一稿一九九八年、二稿二〇〇〇年)を作成している。

2) 中山栄之輔『江戸明治かわら版選集』人文社、一九七四年

ず、かわら版の内容は買い手である庶民の受容し得るもの、彼らの嗜好や興味関心を反映しているものといえる。かわら版でどのように記されたかは、その出来事が庶民にどのように認知されたかを示しており、歴史史料として、当時の庶民の意識や情報のあり方を考える格好の材料といえるだろう。

二点目は、木版印刷物であった点である。印刷物として複数製作されるため、多数の人が目にすることになる。その分、販売地域の庶民への影響も大きく、また、より多くの庶民の意識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とも考えられるだろう。

なお、本報告では、ペリー来航に際して板行されたかわら版を黒船かわら版と総称する。「黒船」と冠したが、かわら版の内容はペリー艦隊の蒸気船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い。ペリー来航当時、艦隊の蒸気船に対しては主に「異国船」「亜墨利加(あめりか)蒸気船」との呼び方が用いられており、「黒船」と表現することはごく稀であった。本来「黒船」という語は、近世日本ではヨーロッパの船を指して使われた言葉であって、ペリー艦隊のみを意味する言葉ではない。「黒船かわら版」という語はペリー来航当時の用語ではなく、研究史上で「黒船」の語がペリー来航を指して使用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る。

Ⅱ. ペリー来航経緯と研究史の整理

はじめに、ペリー来航経緯について概観しておく。

東アジアでの軍務、特に日本遠征のため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にアメリカのノーフォークを出港したマシュー・カルプレイス・ペリーは、喜望峰経由で一八五三年四月七日香港に到着。五月二十六日那覇へ向い、小笠原調査後、七月二日に那覇を出航(以上日付は西暦)。嘉永六年六月三日(西暦七月八日。以下、日付は日本の暦で記す)、ペリーを司令長官としてアメリカ東インド艦隊の軍艦四隻が浦賀に来航した。艦隊の編成は、汽走軍艦が二隻、帆走軍艦が二隻であった。ペリー艦隊が江戸近海に現われると、直ちに沿岸の警備を担当する忍・川越・彦根・会津の四藩や浦賀奉行から幕府に報告が入り、江戸の人々は浦賀と江戸との間をあわただしく使者が行きかう様を目にすることとなった。翌日、老中らが登城、衆議をおこない、江戸市中に対しては、諸物価高騰や噂話の禁止、船持ちには見物船をだすことの禁止が触れられたが、異国船見物に出かける者は跡を絶たず、江戸庶民の耳目を集めた異国船の噂はかわら版の板行を促すこととなる。来航から六日後の六月九日、ペリーは久里浜でフィルモア大統領からの国書を日本側代表(浦賀奉行戸田氏栄・井戸弘道)に渡し、翌春の来航を伝え、六月十二日、滞在九日間で退帆した。六月二十二日には将軍家慶が死去するが、幕府は翌年の来航に備え矢継ぎ早に行動していく。大名・幕臣へのアメリカ大統領国書の回覧と意見の諮問(六月二十六日から)、これには大名だけでなく江戸町人にいたる約八百通の建白書が出された。水戸徳川斉昭の海防参与就任(七月三日)。また、江戸城に近い江戸湾内の警備を強化するため、湾内に十一の台場を造ることを決定し、八月から建設を開始。十一月十四日には台場築造に合わせて江戸湾防備の比重を内海に移し、担当藩の大規模な配置換えが行われた。これらの動向は江戸市中の関心を集め、その都度かわら版に取りあげられている。

翌七年一月十六日にペリー艦隊が浦賀に七隻で再来航した。この時の編成は、汽走軍艦が三隻、帆走軍艦が二隻、輸送船が二隻であった。のちに帆走軍艦一隻と輸送船一隻が加わり、計九隻の編成となった。二月からは横浜村での交渉が始まり、日米での贈り物の授受が行われた。三月三

日に横浜で日米和親条約が調印されると、ペリーは開港が約束された下田、箱館を視察、五月に下田で和親条約附録を調印した。ペリー艦隊は約半年間の日本滞留を経て六月四日に下田を出港。六月一七日、那覇で琉球と修好条約を締結し帰途についた。

ペリー来航に関する研究はすでに明治期からの蓄積があり、『ペリー艦隊日本遠征記』や浦賀奉行の書簡をはじめ、日米双方の資料も多数翻刻され、事態の具体的な推移が明らかにされてきている。近年では、海防に関わる藩・村の動向に関して名主の日記を分析した研究や、豪農層・国学者たちの情報伝達の様相を検討した研究、藩主間でのペリー来航予告情報のやり取りに関する研究がさかんである³⁾。

ペリー来航から「御一新」という変革期を庶民自身がどう捉えたのか、また彼らの生き方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かを、庶民自身の記録した書簡や日記、風説留め、あるいはかわら版・時事錦絵などのすり物から考察する研究も進められつつある⁴⁾。黒船かわら版は、江戸庶民が手にしたペリー来航情報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のかを具体的に知ることのできる歴史史料といえる。しかし、当時出回った黒船かわら版の全貌は、いまだ明らかになっておらず、歴史史料として十分に活用されているとはいいがたい。以下、本報告では、黒船かわら版の全体像を捉え、内容の具体的な検討を行うこととする。

Ⅲ. 黒船かわら版の製作と板行

現在、黒船かわら版は個人および諸機関によって所蔵されているが、ペリー一行が訪れた地域の博物館や資料館での所蔵が多い。管見では三七〇種、一〇〇〇点あまりに及ぶ。日本国内の諸機関に所蔵されているかわら版のデータベースである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附属画像解析史料センターによる「摺物総合編年目録(二稿)」(二〇〇〇年)には、ペリー来航の際のかわら版が二七一点採録されている。目録に再録されたものには、本報告者が未調査のものもあり、管見のかかわら版と目録採録のかかわら版とを合わせると、四〇〇種類以上の黒船かわら版の現存が確認できるものと推定される。仮に一版木から一杯⁵⁾刷ったとして総数約八万枚、現存しない版が存在することも考慮すると、ペリー来航当時は十万枚を超えるかわら版が出回っていたものと推測される。このような黒船かわら版の大量板行からは、ペリー来航に対する江戸庶民の関心の高さがうかがえる。かわら版は当時の庶民の情報源の一つとして、ペリー来航時、量・種類とも著しく増加している。かわら版の板行量は、庶民がペリー来航に高い関心を寄せ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といえるだろう。

板行時期、板行方法、板行地域について検討しよう。当時の記録類から、かわら版の板行・販売にかんする記述を見ていく。

まず板行時期だが、神田の古本屋藤岡屋由蔵の情報録「藤岡屋日記」には、六月十一日の晩にかわら版販売がされたの記載が見られる⁶⁾。他の日記類からも、第一回目の来航中から二回目の

3) 近年の研究成果は、三谷博『ペリー来航』(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三年)、加藤祐三『幕末外交と開国』(ちくま新書、二〇〇四年)で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4) 佐藤誠朗『幕末維新の民衆世界』岩波新書、一九九四年。高橋敏『幕末狂乱』朝日新聞社、二〇〇五年。若水俊『江戸っ子気質と鯨絵』角川学芸出版、二〇〇七年。

5) 錦絵の一回の刷り出し量。通常二百枚。

6) 『藤岡屋日記』第四十三冊「嘉永六年 海防全書 上」

来航期にかけて継続的に製作・板行がされ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⁷⁾。

「市中取締類集」には、嘉永六年十一月に町奉行所へ出された絵草紙掛名主伺書とそれに対する回答である附札案⁸⁾がみられ、武士が内職で板木彫りにたずさわり、正式な板行許可を得ない無改めのまま草紙屋での隠売や人通りの多い往来での販売がなされているといった、製作や販売の様子がうかがえる。

IV. 黒船かわら版の内容分類

黒船かわら版は、内容により、ペリー一行に関するアメリカ側情報、幕府の対応に関する日本側情報、ペリー来航に関連するさまざまな事柄を使った娯楽的なものとに、三分される。

一つ目のアメリカ側情報は一〇〇種余りみられ、蒸気船をはじめとするペリー艦隊の船、ペリー提督やその一行の風貌、持ち物、言葉、横浜上陸の様子、アメリカから日本へ贈られた物などの解説である。これらについては、ここでは簡単に概観しておき、後で具体的にかわら版の検討を行う。

ペリー一行の船についてのかわら版は、蒸気船についてのものが中心であり、外にボートや他の帆船、オランダ船や唐船、日本の御用船や番船などが添えて描かれたものもある。船図としては、日本で作られた車を使った船、雲龍船のかわら版も存在する。

ペリー一行の風貌に関しては、個人名を記した肖像があり、ペリー提督と副官アダムスの肖像画がほとんどである。個人名の記されない兵士の人物図は、アメリカ人の図解的な肖像であるが、半身単身の肖像と全身立ち姿複数人の肖像とに大別される。他に、服や帽子、持ち物の図解がされる。特に服装や帽子に関しては、それらの形が階級により違うことが意識されている。帽子についての紹介が多いのは、日本人が被らないため異国性を感じさせるものであり、装飾的で絵にやすく、見たときに分かりやすく、また種類が多かったからであろう。

一行の名前の一覧や、「アメリカ言葉和解」として単語の紹介もある。単語は正確な英語のものは少ない。単語の紹介を主題とするものもあるが、アメリカに関する知識の一つとして肖像画に添え書きされていることもある。かわら版でのアメリカ言葉は、その単語をアメリカ人との会話で活用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はなかった。単語集には「めでたい事を きんぱ」「うれしい事を さんちよろ」と紹介しているが、言葉の意味ではなく耳慣れない音の響きが楽しまれたものと思われる。アメリカ言葉のかわら版は異国紹介の一環であり、異国趣味を満たすためのものだったのであろう。かわら版に紹介されている言葉は、日常生活に関わる単語ばかりである。かわら版に紹介された身の回りにあるものの名を異国の言葉で確認するとき、かわら版の買い手にとって異国アメリカは身近にイメージできるものとなっ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幕府への贈り物も、品名の一覧や図解を伴ってかわら版に紹介された。二回目の来航の際には模型の蒸気機関車(一八五三年、フランス・ノブリス工場製作)が贈られ、何種類物のかわら版が

7) 土浦の商人色川三中の日記「片葉雑記」五、嘉永七年四月二十九日の条に、「アメリカ詞など称して売り出すもの諸国うり歩行もの多し」。江戸町年寄喜多村家の国学者喜多村信節の随筆「きゝのまにまに」嘉永六年十月の条に、「大筒之絵其外読売類の版行に甲冑着用の図蒸気船之図、東条が刻して罪を得し伊豆七島の図も翻刻して売れども咎もなし」

8) 『市中取締類集 書物錦絵之部』第二七三件(六二六)「絵草紙掛名主伺書」

作られている。この蒸気機関車は実物の四分の一の大きさであったため車のなかには入れなかったが、日本人の役人は屋根の上に乗って走らせたことがペリーの日記に記されている。かわら版に描かれた蒸気機関車は大きく、人が内側に乗った状態で描かれている。客車は「遊山屋形船」と表示されたものもあり、屋形や御輿の様に描かれ蒸気機関車とは思えないような図もある。

二つ目の幕府側情報は一三〇種あまりだが、そのほとんど、一〇〇種余りが浦賀や江戸湾周辺の防備に関するものであり、ほかに、幕府からアメリカへの贈物の紹介が二〇種、町触を刷りものにしたものが一〇種ほどである。

江戸湾の海岸防備は当時「御固(おかたゝめ)」といわれ、浦賀奉行ら役人の名と各藩の海岸防備の持ち場を一覧にした役人付(やくにんづけ)、それを地図に記した御固図が板行された。各藩の警備担当場所については何度か場所替えがあり、持場の異動から、そのかわら版がいつ頃の状態を記したものかがわかるが、二回目の来航後の嘉永七年一月十五日から二月迄のものが多い。幕府は一回目の来航後、江戸防備のため内海に十一の台場を作ることを決定し八月下旬から建設が始まったが、その予定地や規模などを記したかわら版も作られている。その他、御固めの光景など、海岸防備に関するかわら版が日本側情報のかわら版の内の四分の三を占めている。

ペリー一行と幕府役人との交渉を描いたものとしては、上陸した横浜での応接の光景や、食事の接待の様子などが紹介された。アメリカへの贈り物の一覧もつくられたが、それらは日本人武士に平伏するペリーの図が描かれたものが多い。

三つ目の娯楽的なものは約一二〇種あり、ペリー一行や幕府の対応など関連するさまざまな事象を主題あるいはモチーフとして、言葉遊びや見立て(パロディ)としたものである。娯楽もののかわら版を形式で分類すると、次の通りである。三十六歌仙や芝居の台詞のパロディなど、言葉の見立てについては、言葉遊びに含めた。七割以上が言葉遊びであり、種類数・点数とも特に狂歌が多いことが確認できる。

言葉遊びは、版の多い順に、狂歌、端唄、野保台詩(やぼたいし)⁹⁾、吉原言葉¹⁰⁾、芝居文句のモジリ、川柳、とんち問答、落し噺などがあり、八〇種ほど。

見立てものは、証文、大小暦、武鑑、霊宝・仏像の縁起、艶書、引札(広告)、顔見世番付、蒸気船図に見立てたものがあり、二〇種ほど。身近にあったものを元に、技巧に凝ったものが作られている。

この他に、武具尽くしの戯画やアメリカ人を捕縛・撃退する読み物などがある。

以上、黒船かわら版の内容についてみてきたが、多種多様なものが板行され、ペリー一行や幕府側の対応に関する情報だけでなく娯楽性の高いものも多数板行されたことがわかる。

先述したように、現存する黒船かわら版には、ペリー艦隊について説明するものが一〇〇種余りみられる。その半数の五〇種類は蒸気船を主として艦隊の船を描いたものであり、ペリー提督の肖像をはじめとする人物図は二〇種、アメリカ言葉の単語集が一〇種、蒸気車模型をはじめとする贈物の紹介が二〇種。ペリー来航以前、異国に関する情報は船・人・言葉をセットとしてい

9) 野保台詩とは、一見ばらばらに並べられたように見える漢字をある順序に従って読むことで意味が読み取れる仕組みとなっている漢詩である。原形は、吉備真備が唐からもたらしたという難読の予言詩、野馬台詩であり、野馬台詩をもじって野保台詩(やぼたい詩)である。ペリー来航時には、縦三字・横三字の九字を使った変形版が作られている。

10) 遊女が客に話しかける艶っぽい言葉に続けて、時事的な言葉を取り合わせたもの。その意外性が眼目なので、一読して判りやすいものとなっており、一言一言は短い。

ることが多く、黒船かわら版においても同様の関心をみることができる。船・人・言葉を知る事で異国を知る、という意識の枠組みが存在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もできるだろう。黒船かわら版でのアメリカ船・人について、画像分析を主に検討していこう。

V. 蒸気船図

図1は、嘉永六年の一回目のペリー来航に際して作られたかわら版である。ずんぐりとした黒い船体を持ち、三本マスト一杯に張られた帆は風をはらんでいる。ロープをつたう黒ン坊や遠眼鏡を覗く人物、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のマークであるVOCもどきの旗が描かれており、当時の江戸庶民が抱いていた南蛮船・オランダ船のイメージ(図2)を下書きに描かれている事がわかる。しかしよく見ると、オランダ船図に見られないものが描きこまれている。一つは、船体に付いた二つの車輪であり、紙面の記述には、「アメリカ蒸気船」には十間の「水車」が四つ或いは二つ付いているとされている。一回目の来航後の蒸気船図では、車の形や数はまちまちであり、多いものでは六つもの車がつけられている。オランダ船図と異なるもう一つの点は、甲板上の煙突から激しく噴き上がる煙である。長崎版画などのオランダ船図をみると、甲板に短い煙突と白い煙が描かれているものがあるが、それは船内での炊事用の煙である。それと比べて、蒸気船図に描かれた煙突と煙は大きく、蒸気船図によっては黒煙を上げているものも見られる。煙突と煙とが強調されており、当時の江戸庶民にとって蒸気船は、オランダ船に車が付き煙を噴きあげている船として認識され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

しかし二回目のペリー来航時には、この蒸気船イメージが大きく変わる事となった。図3を見てみよう。低くスマートになった船体は、イラストレイテッド・ロンドンニュースに描かれたペリー艦隊(図4)と似ているようだが、図1と見比べた際に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るのは、その形体の違いよりも、画面から受けるスピード感であろう。黒々とした船体の周りには砕ける波が描写され、覆いのある外輪も波しぶきをあげている。煙突からはもうもうたる黒煙が後方へたなびき、星条旗もどきの旗を連ねたロープは後方へ弧を描いている。蒸気船が疾走している様を絵にしているのだが、注目すべきは、すべての帆がたたまれたままである点だろう。図1は後方からの風を帆に受けて進む帆船の図であり、旗は船首側へなびいている。逆に、図3では旗や煙は後方になびき、帆を張らず風を切って疾走する船の図となっている。ロンドンニュースの図4が帆を張った状態で描かれていることに照らしてみれば、図3の蒸気船図は、帆を張らず、つまり風向きに左右されずに高速で進む船として、蒸気船の機能面を絵としたものである。

黒船かわら版の蒸気船図は、江戸の人々にとってのアメリカ船認識が、オランダ船に似た船から、驚くような機能を備えた船へと大きく変化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といえるだろう。

VI. アメリカ人物図

黒船かわら版に最も多く描かれたモチーフはアメリカ人物であり、似た形の画像が多くみられ、あるパターンが形成されている。アメリカ人の具体的なイメージが、実際に上陸したアメリカ人

の姿や浦賀沖に浮かぶ蒸気船を目にしていなかった人にもかわら版を通じて広まっていったことが推測される。ペリーの肖像画・アメリカ人物図・挿絵でのアメリカ人物図からアメリカ人物の描かれ方を分析し、当時のアメリカ人イメージを検討していこう。蒸気船図の検討のところで、船図の変化を指摘したが、人物図も、ペリー来航以前からの伝統的異国人像から新しいアメリカ人像の創出という时期的な変化が見られる。本報告では、新たに創出されたアメリカ人像の検討を行うこととする。

もっとも多く描かれたペリー像(図5)の描写を見てみよう。「嘉寅仲春」と記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二回目のペリー来航に際して出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顔面の描写からみていくと、肌は白く、それを縁取る帽子や毛髪、顔面の黒目を引き立てる効果を出している。毛髪は細かく渦を巻いており、黒くはなく、短い。毛質・毛色・髪型ともに壮年の日本人と異なっている。髪型は所属する社会を象徴するものであり、絵の中では異国性を強調するポイントとなるところでもある。眉毛と髭も同じように細かく渦を巻いている。当時の日本人男性の多くは剃る或いは抜くなどして髭をたくわえないため、髭も異国性を示すものであったが、やはり細かく渦を巻いている。目は大きく黒目がちに描かれ、上瞼の太目の描線と共に力強い印象を与えている。眼球の下ラインは丸く膨らみ、少し眼球が飛び出している。上瞼がそれに被さるように描か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な目の描写は、浮世絵の手法の中では豪傑や力士、異国人、動物に用いられる「かなつば眼」の描写と共通する。目じりにかけて二本の線が描かれ、余計に目が強調されている。皺の描写は、高齢を示すものとして日本人の老人を描く際にも用いられるが、異国人や豪傑を描いた浮世絵にも確認され、「異人性」を示すものとしても使用される。鼻は、高くまた大きい。斜めから捉えられた鼻梁が左頬のラインから飛び出て描かれている。この描き方は、鼻が高いことで知られた歌舞伎役者松本幸四郎を描いた歌川豊国の役者絵に使われるなど、鼻の高さを陰影法を使わずに表現する当時の手法の一つであった。小鼻の外には、やはり皺らしき線が添えられている。陰影がついていないため、実際にどのような鼻の形を想定しているのか分かりづらいが、この線は老人であることを示す、或は骨ばった顔を表現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り、ここでは鼻の存在感を高めるという効果も認められる。口は大きめで横一文字に閉じられており、唇の輪郭が描かれている。その周りを縮れた髭が囲んでいる。顎は少ししゃくれ、頬は下あごにかけてたっぷりとした肉付きとなっている。耳は耳たぶが大きい福耳である。その表情は喜怒哀楽といった感情を示してはいないが、目鼻など顔面の各パーツが大ぶりに描かれ、全体として力強い、或は堂々とした印象を与えるものとなっている。

次に服装と持ち物をみていこう。

紙面上で目を引くのは、帽子と上着の生地 of 黒い色である。帽子は、筒形のものである。円状のものや鋏、房、アルファベットのHのようなものなど、装飾が多い。当時の日本人が頭を覆う際には笠や頭巾が用いられた。長崎絵のオランダ人がしばしば広いつばの付いた帽子を被った姿で描かれたり、唐人飴売りや唐人祭りの際などに日本人が帽子を被って唐人に扮したように、帽子は異国性を示す効果的な道具であった。黒船かわら版のなかには、様々な形の帽子を描きそれぞれに職名が添えられているものもみられ、帽子は使用する人物の身分や職業などを示すものとして認識されてい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図5の上着は前身ごろ中央に白く丸いボタンが並び、両肩には甲南に用いられる菊座の金物に似た飾りが付けられている。襟元は丸首だが、首の後ろは襟が立てられている。袖は手首までの長さがあるようだが、紙面に袖全体が描かれていないため形状は不明である。両肩から白いバンドが胸の前で交差するように掛けられている。右手で剣を掲

げているが、柄の部分のサーベルに似た輪のような描写など、構造が分かりづらい。鞘には魚の尾や雲のような装飾がされ、剣先に向かって太くなっている点は、青龍刀を連想させる。日本においても、ヨーロッパの絵画においても、肖像に添えた小物で像主の属性を示すことは肖像画の伝統的な手法であった。像主の身分や職業を象徴するものが添えられることが多いが、日本では武士像に刀を添えて描くことが常套であり、剣を携えた図であることから武人であると読み取れる。

図6は、図5と同じ構図であり、鞘の装飾が雲紋となりやや異なるものの、右手に持った剣と手の形も同様という点から、両者には制作上の因果関係が推測される。しかし図6の印象は図5と大きく異なり、中国的である。細部の表現からこの印象を生み出している要素を確認していく。

中国的という印象を生んでいる最も大きな要素は、髭と目の描き方であろう。毛は長く、縮れていない黒毛となっている。髪は後頭部の上方でまとめてあり、骨のような三ツ又の替をさしている。眉は太く垂れぎみである。髭は豊かに蓄えられているが口元を覆い隠すものではなく、このような髭の表現は、孔子や関羽といった中国人像の形体のうちでも見慣れたものの一つであった。

目は、アーモンド形の釣り目で二重であり、目尻や目の下には皺が描かれている。額にも三本の皺が描かれている。鼻の下が描かれ、小鼻の上にも線が寄っている。図5みられたような、頬の輪郭線から鼻梁を飛び出させた鼻の高さの強調はみられない。鼻の穴の描き方も異なり、口は閉じられ、下唇の右端に一本曲線が描かれている。

服装では首周りの白い襷が目に付く。襷の描線は太く、筆書きされたような肥瘦があり、他の部分の描線とは異なっている。肥瘦のある線は、浮世絵をはじめ、当時の絵を見ると、衣服を描く際によく使用されているものだが、武人や豪傑を描く際には肉体部分の描線としてもしばしば用いられる線であり、異人表現の一手法ともなっている。図6の襷の直線的で太い描線は張りを感じさせ、力強さや威厳を感じさせると共に、画像を引き締める効果を生んでいる。白い襷の下には、前身頃の中央にボタンが並んだ黒い生地 of 服が見えている。白いバンドはないが、襷より下は図5と類似してる。右脇の線は、体の中央に寄りすぎており頭部とのつながりが不自然であるが、腹が太く突き出た体形に見える。中国の武人像には腹が大きなものが多く、これも中国的印象を与える一因となっている。

図7の画像は、紙面左上に人物の容貌が解説されており、墨摺りのかわら版では分からない色や素材などの説明が加わり、より具体的にイメージ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 「○ 面体色白く、はな高くしてはな筋ひたいよりとふり、眼白めかちにて人見(瞳)薄赤く、まゆ毛あかし、齒こまかにして、牙有、耳大きく、髪 of 毛薄赤くしらか(白髪)交りうつをまく、手足指日本の鳥のことく、爪なかし、
- 衣服黒羅紗、筒仕立、袖白羅紗にて縁を取、胸金こはせ八ツ、肩掛錦猩々緋にて縁をとる、夫より金くさり壹尺五寸さかる」

画像と説明文の内容はほぼ合致しているが、画像では口を閉じているために描かれていない歯の説明や、足の指についても説明していることから、画像に描かれなかった情報も文字の説明に加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まで検討した半身像について、形体と手法の特徴をまとめておく。

顔面描写は多様だが、服装は黒い軍服姿のものと中国的なものに大別される。特に、肩章を付けた黒い上着に前一行ボタン、胸の前で白いバンドを交差させた形体が多く認められた。中国

的形体や、肥瘦のある線、隈、かなつば眼、皺、髭、髪型や毛質の違いといった、異国人を描く際にしばしば用いられてきた手法や形体が使用されている。帽子やボタン、首の周りの襷も異国性を示すものとして、異国人像によく用いられる要素である。ペリー来航以前に蓄積された異国人描写の手法を組み合わせているわけだが、出来上がった人物像は長崎絵のオランダ人像等とは異なったものとなっている。錦絵での異国人表現に近い人物表現であり、江戸のかわら版屋が、長崎絵ではなく、より身近な江戸の浮世絵に人物像の手本を求めたことが推測される。浮世絵の表現を使用して、新しい異国人像の形体が作り出された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

次に、個人の肖像ではなく、アメリカ人物図として描かれたものから、アメリカ人イメージを確認しよう。

図8のタイプは、どれも嘉永7年の二回目の来航後、多くは二月以降のものである。右手で剣付き銃を抑え、両足を揃えて正面を向いて立っている「衣服黒、剣ヲ背おい、剣付之鉄砲ヲ持」との説明が添えられ、黒い服、背負った剣と剣付き銃とがアメリカ人物像に付随するものと認識されていた。白いバンドについての言及はないが、画像にはやはり胸の前で交差する白いバンドが描かれている。図5から7で検討した半身の肖像は、胸から上が紙面に大きく描かれている。その画面の三分の一から半分が黒い服に占められており、その分、黒という色の視覚的インパクトは大きい。「アメリカ人の服装は黒」という認識が形成され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黒と白のコントラストが印象的であり、この黒い上着と白いバンドの表現が何度も用いられていくうちに、モデル的なアメリカ人像を構成する一つの表現形体として定着したのだろう。ペリーに随行した画家ハイネの絵には、紺地の上着に白いバンドを交差させたアメリカ水兵が描かれている。この実際の水兵の服装を元に、描き手にも見る側にも分かりやすい黒い上着に交差したバンドという形体がアメリカ人を示すシンボリックな服装となったものと推測される。以上の検討から、黒い上着に前ボタンと白いバンドを交差させ、帽子をかぶり、剣付きの鉄砲を持った姿が「北アメリカ人物」としてされ使用されてい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る。

最後に、挿絵的アメリカ人像をみてみよう。

ペリー来航に関するかわら版で、アメリカ人像が最も多く見られるのは、挿絵的な使用においてである。それぞれの人物図に「これはアメリカ人である」という説明を付けなくてもアメリカ人として認識されていた図像であり、そこにどのような人物像が描かれているのかを検討することから、当時の人々のアメリカ人のイメージを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これまで検討してきた肖像画やモデル的な「北アメリカ人物図」の描き方に比べると、小さくて簡略な描写のものも多く、顔面の描写がはっきりしない像が多い。アメリカ人像としての認識は、顔面以外の描写、服装や持ち物、記載された文章の内容などからの推察によ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そこで、服装や持ち物に注目してアメリカ人像の検討を行うことにする。

アメリカ人像は三つのタイプに大別される。

- A、軍服姿のもの
- B、唐人姿のもの
- C、AとBとが混合されたもの

Aは、黒い簡袖の軍服姿のものである。「北アメリカ人物図」の形体を用いたもので、ペリー一行が横浜に上陸する様子を描いた行列図や、贈答のかわら版に多い。また、他の異国人と並べて描かれたときにも、このタイプのアメリカ人像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アメリカ人の姿の紹介をする内容のかわら版に多いタイプといえる。白いバンドを交差させていないものも、ほとんどは黒い

筒袖の上着を着ている。半身像にみられた肩の飾りは、人物像が大きくはっきりしている像には描かれていることもあるが、人物像が小さい場合には省略されている。アメリカ人像の服装表現としては、黒い上着、ついで白いバンドが重視されており、肩の飾りはここではあまり重視されていない。

Bは、唐人姿で描かれたものである。頭頂部に房の付いた帽子を被っているものが多く、筒袖の上着を着、白いズボンと黒い靴を履いた像が多い。帽子の形は様々であるが、丸いヘルメットに白い毛の縁取りがしてあるものと三角形の笠状のことが多い。頭頂部に房の付いた帽子は、半身像やモデル的アメリカ人像にはみられなかった形である。頭頂部の房は蒙古人や武将の被り物に描かれることが多いものであり、また、長崎にいる同時代の中国人(清の風俗)を描いた唐人像にも描かれている。当時の中国人を描く際に多用された表現のであるため、頭頂部に房の付いた帽子が描かれただけで唐人や蒙古人の印象を受ける。また、この帽子が描かれたときには、そのかわら版の内容も唐人や中国と関係する場合が多い。人物を描かずに、房の付いた帽子だけを挿し絵として用いたものもあることから、この帽子が唐人のものとして当時広く認知されていたモチーフ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

Cは、Aの軍服表現とBの中国的形体とが混在加しているものである。唐人に交差する白いバンドや鉄砲を持たせたものや、逆にまた「北アメリカ人物図」に中国的形体を加えたもの(広がった袖口、あるいは伸びた袖、長い髭、一つにまとめた総髪など)である。両手を組んで目の前に差し上げたポーズを併用したものも多い。

B・Cのように中国的形体が用いられるものは、狂歌や言葉遊びのかわら版に挿し絵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多い。かわら版の内容によって、アメリカ人像のタイプを選んで使用してい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

これまでのアメリカ人像の検討から、当時の庶民によるペリー来航の捉え方を考察する。以下四点にわけて指摘したい。

一点めは、これまでの当時の庶民にとって、ペリー一行が憎い敵として捉えられ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こと、恐怖心を抱い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顔面の描写には、以前から使われた異人表現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が、天狗や鬼として描かれてはいない。近世の画像では、悪・敵役の描き方には動物的要素を用いることが普通であった。図7のペリー像では、獣のような指と尖った爪が描かれているが、このように動物の特徴を加えることは像主を風刺・批判したり見世物として扱うときにみられる手法であり、特に落書に多くみ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そのような異様さの強調がみられるのは、管見ではこの一点だけである。異人表現を用いつつも、ほとんどは敵役ではなく、自然な人間の姿である。このことは、ペリーらを自らに害成す者と捉えない意識にも通じている。同様な意識は、持ち物の描写からもうかがえる。肖像にはその人物を象徴するものが描き添えられるのであり、半身・全身像に武器が多く描かれていたことは、アメリカ人が軍人、兵士として認識され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ただしそれらの武器は、大筒のような破壊力を感じさせるものとはなっていない。また、実際に使われている状態ではなく単に持っているだけの状態で描かれている。蒸気車を描いたかわら版には運転するアメリカ人が描かれているものも見られるが、武器については形を図示するのみで使用している姿ではない。武器としての機能、攻撃性にあまり関心が寄せられていないといえよう。

二点目は、ペリー一行やアメリカに対する関心の強さである。ペリーら半身像の個人肖像が多数描かれたことは、それまでの異国人報道とは異なる点であった。構図からは、歌麿の美人画や

写楽の役者絵など、錦絵の大首絵が連想される。役者絵は役を演じている状態の描写であるから、厳密には肖像画と呼べない。しかし、絵の性質ではなく画像の形態としてみるなら、非常に近い画像といってよく、ペリーらは役者絵や美人絵と共通する受けとめられ方が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る。大首絵は、役者や美人といった当時の庶民にとってアイドル的な存在について、より詳しくその人物を知らせ、そこに描かれた対象を見るものに身近に感じさせる効果を持っていた。当時の錦絵は単に眺めるものではなく、そこに描かれているものから情報を積極的に読み取ろうとする見方が存在していた。半身像の多さは、当時の庶民のペリー一行に対する興味や好奇心の強さを示すものであり、庶民は肖像を通して、ペリー像が体現するアメリカというものを読み取ろうとし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三点目は、アメリカをそれまで見知っていた異国とは区別して意識されたことである。「北アメリカ人物図」という新しい人物像が出来上がっていったことから、それまでの異国人との違い、新しさに注目する意識が確認される。ペリー来航以前の異国人物表現を確認すると、最も多いのは中国人(唐人イメージも含む)、ついでオランダ人(ペリー来航前嘉永三年に商館長の江戸参府があった)、琉球人(同じく嘉永三年に慶賀使が江戸に来ている)、朝鮮人(通信使が江戸まで来たのは明和元年(一七六四)家治襲職の賀が最後であり、後は対馬止まり)が多く、それは江戸の庶民が実際に目にする機会のあった異国人でもあった。しかし、それ以外の国々の人物も描かれ、当時の異国人像は、長崎絵に限らず、見世物、祭礼行列、皿の絵柄、煙草の根付といった工芸品にも描かれている。また、歌舞伎や読み物としての異国物語も多く、馬琴『椿説弓張月』の為朝や朝比奈の島巡り、国姓爺の和藤内といった異国話は身近にあふれていた。しかし、アメリカ人については、ほとんどの日本人が初めて目にする人々であり、弘化三年のビートル来航がアメリカを意識する初めての機会だったであろう。一八世紀末からしばしば来航してきたロシア人の姿は、長崎絵のオランダ人を元にして描かれており、西洋風の人物図となっている。西洋系の外国人については、それまでは長崎絵を手本に描かれてき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た異国人物像の流れからすれば、ペリー一行の人物像も長崎絵に基づく西洋風人物像になったはずである。しかし、ペリー一行のアメリカ人像は長崎絵の人物像とは異なる姿となった。細部をみると、長崎絵の表現では、西洋人の髪は巻毛として描かれ、髭は描かれていないものが多いが、ペリーらの肖像には縮れた毛の表現が用いられ、髭が描かれた。また、以前の洋風表現では髪や服が白く、全体的に白っぽい印象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アメリカ人は髪も服も黒の占める割合が多い表現となっている。服装も、オランダ人やロシア人像とは異なる軍服姿で描かれている。かわら版の描き手が、中国人・朝鮮人・オランダ人・イギリス・ロシア人といった、それまで知っていた異国人と違う画像を作ろうと試み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ペリー来航後、まだ早い時期のかわら版でのアメリカ人像は、ペリー来航以前の世界図に見られるような人物像を用いていたが、半年後には黒い軍服表現の新しい人物像へと変わっていった。江戸のかわら版屋が、中国人、朝鮮人、オランダ人、イギリス人やロシア人といった、それまで知っていた異国人と違う画像を作ろうと試み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このような人物表現からは、アメリカ人に対する認識、「アメリカ人はそれ以前に来航した異国人とは違う」という意識がうかがえる。蒸気船に乗り、長崎ではなく江戸近海に来航するというペリー艦隊の出現の仕方、それに対する幕府の対応も、それまでの異国人来航とは異なっている。新しいアメリカ人像は、庶民がアメリカをそれまで見知っていた国々と区別・識別して具体的に認識され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かわら版での報道は、この「違う」という点が当時の庶民には意識されていた事を示しているだけでなく、かわら版がさらにその違いの

認識を広めた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四点目は、三点目でみたようにオランダ人・ロシア人とアメリカ人とを区別する意識がみられた一方、伝統的な異人表現、特に中国的形体が多く用いられたことから、アメリカ人を日本人と違う人物、「唐人」として捉える意識も根強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美術史研究者からは、異国を表現するときにしばしば中国杓形体が使用されることが指摘されている¹¹⁾。そうして出来上がったのが現実の中国人とは異なる、イメージとしての異国人、或は象徴としての異国人、「唐人」である。唐人イメージの形成は唐人をしめすものの記号化をもたらした。黒船かわら版のアメリカ人物の表現に唐人像や唐人を示す記号が使用されたことから、唐人表現が強く定着していた異人表現であったことが伺える。その場合、アメリカ人物からアメリカという国が持つインパクトは消え、日本以外の国々の一つに過ぎないものとなっている。新しく認識されたアメリカも従来からの世界像へ取り込まれ、それは当時の日本人の持つ世界観を反映したものともいえる。アメリカ人として国別に捉える世界観と、日本とそれ以外の異国という枠組みでの世界観とが存在していたといえよう。

「唐人」という語を素材とした狂歌問答を記した黒船かわら版が残されている。

問「▲日本ハきりもことハもしらぬのか あめりか人を毛とう人とハ」

答「●唐人ハから人ばかりいふでなし 十しうハミんな」

この狂歌の前提には、当時の日本人がアメリカ人を唐人として表現している、という認識があり、唐人とは「から人」つまり中国人だけをさすのではなく、「外異十しう」異国の人はずべて唐人だという。当時の庶民の、アメリカ人も唐人なのだという感覚を反映しており、共通観念ともなっていたといえるだろう。

VII. 結び

江戸庶民はかわら版という媒体を通じて、ペリー来航に関する様々な情報・知識・イメージを手にした。蒸気船図と人物図の検討を通じて確認したように、それらはペリー来航以前からの海外情報・知識・イメージを下敷きにしつつ、新たな蒸気船・アメリカ人イメージ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かわら版の画像は、より目新しいイメージの提示に力点が置かれており、そこでは情報の正誤よりも、いかに「それらしいか」が重視されている。黒船かわら版は、江戸庶民が手にしたペリー来航情報を見せるだけでなく、彼らが身につけていた海外情報・知識・イメージをも現在の我々に示す史料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出来るだろう。

11) 坂本満氏は、古来、日本の最大の関心の的であった外国は中国なので、中国に関して日本画家たちが持っている形体のレパートリーは多く、他に依拠するものがない場合に画家たちが見も知らぬ南蛮人たちの囲や風俗を描くときにでも中国的な情景として表現するのはむしろ当然としている。『日本の美術・南蛮屏風』坂本満、至文堂、一九七七年。

가와라반(목판인쇄물)에서 본 페리 내항이 에도의 서민들에게 미친 영향

田中葉子 (東京大學校)

〈목 차〉

- I. 본 보고의 과제
- II. 페리 내항의 경위와 연구사의 정리
- III. 흑선가와라반의 제작과 발행
- IV. 흑선가와라반의 내용 분류
- V. 증기선도(蒸氣船圖)
- VI. 미국인물도
- VII. 맺음

I. 본 보고의 과제

1853년 (가에이[嘉永] 6년) 및 1854년의 두 번에 걸쳐 페리가 이끄는 미국의 동인도 함대가 우라가浦賀에 내항한, 이른바 ‘흑선 내항’ 을 당시의 일본인, 특히 에도(江戸:도쿄의 옛 이름으로 에도 성을 중심으로 한 지역, 에도 시대에 에도 막부가 위치한 일본의 정치 중심지, 지금의 도쿄)의 서민들은 어떻게 받아들였나. 내항에 즈음하여 발행된 가와라반을 통해 고찰해 보고자 한다.

가와라반이란 ‘인쇄물’, ‘한 장의 인쇄’, ‘요미우리[讀賣]’ 등이라 불리며 화재나 지진 등의 재해 정보나 희귀한 사건 등을 기사로 실어 판매한 목판인쇄물이다.¹⁾ 발행 허가의 검사를 받지 않은 위법 출판물이나 빈번한 금지령에도 불구하고 페리 내항 시에는 니시키에(錦絵:컬러 목판화)와 더불어 도시부의 미디어로서 정착했다. 가와라반의 정의로서 종종 인용되고 있는 것이 나카야마 에이노스케(中山榮之輔)의 이하의 4가지에 의한 정의다.²⁾

1. 뉴스성이 있어야 한다.
2. 즉석에서 인쇄한 것이어야 한다.

1) 가와라반에 관한 연구는 오노 히데오[小野秀雄]의 『가와라반 이야기』(雄山閣, 1960년)로 대표되듯이, 신문전사(新聞前史)라는 위상에서 시작되었다. 그리고 그것은 1970년대 말부터는 근세기 정보의 한 스타일로서 여겨지게 되었다. 90년대 들어와 도시에서의 정보 형식에 주목이 모아져, 최근에 정보사 연구의 한 소재가 되고 있는 한편, 니시키에의 시사성 지적과 함께 근세 도시에서 미디어의 행태로서 가와라반을 다시 한번 재조명해 보자는 시도가 일어났다. ‘인쇄물’이란 호칭의 제창 등, 가와라반이란 무엇인가가 재검토되는 단계에 와 있다고 하겠다. 또 가와라반 사료 전체를 목록화하는 일도 시작되었으며 회화정보사연구회가 ‘인쇄물자료일람(第一稿)’(1994년)을, 도쿄대학 사료편찬소 부속 화상사료해석센터가 ‘인쇄물종합편년목록’ (一稿 1998년, 二稿 2000년)을 작성하였다.

2) 나카야마 에이노스케[中山榮之輔]의 『에도 메이지 가와라반 선집』人文社, 1974년

3. 무단 출판이어야 한다.
4. 유료이어야 한다.

본 보고에서는 세 번째에 중점을 두고 개인(改印)이 없는 목판인쇄물을 가와라반으로서 검토할 대상으로 삼았다. 가와라반의 사료적 특질로서는 다음의 두 가지를 지적할 수 있다.

첫째는, 상품이였다는 점이다. 매물로서 이익을 올리기 위해서는 가와라반의 제작자는 사는 사람이 무엇을 원하는지, 무엇에 흥미를 보이는지를 무시할 수 없어 가와라반의 내용은 사는 사람인 서민들이 수용할 수 있는 것, 그들의 기호나 흥미, 관심을 반영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가와라반에 어떻게 기록되어 있었는지는 그 사건이 서민들에게 어떻게 인지되었는가를 나타내며, 역사적 사료로서 당시 서민들의 의식이나 정보의 의미를 생각하는 데 더 없이 좋은 재료라 할 수 있다.

둘째는, 목판인쇄물이었다는 점이다. 인쇄물로서 복수로 제작되었기 때문에 다수의 사람들이 보게 되었다. 그 만큼 판매지역의 서민들에 대한 영향도 크고, 보다 많은 서민들의 의식이 반영되어 있다고도 생각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본 보고에서는 페리 내항에 즈음하여 발행되었던 가와라반을 흑선 가와라반이라고 총칭한다. ‘흑선’이란 말을 붙였는데, 가와라반의 내용은 페리 함대의 증기선으로 한정되지 않았다. 페리 내항 당시, 함대의 증기선에 대해서는 주로 ‘이국선’, ‘아메리카(亞墨利加) 증기선’이란 호칭을 이용하고 있어 ‘흑선’이라 표현하는 일은 매우 드물었다. 본래 ‘흑선’이란 말은 근세 일본에서는 유럽의 배를 가리켜 사용한 말이어서, 페리 함대만을 의미하는 말이 아니다. ‘흑선가와라반’이라는 말은 페리 내항 당시의 용어가 아니라 연구사상 ‘흑선’이란 말이 페리 내항을 가리켜 사용된 것에 따른 것이다.

II. 페리 내항의 경위와 연구사의 정리

먼저 페리 내항의 경위에 대해 살펴보겠다.

동아시아의 군무, 특히 일본 원정을 위해 1852년 11월 24일에 미국의 노포크(Norfolk)를 출항한 매튜 칼브레이스 페리는 희망봉을 경유해 1853년 4월 7일 홍콩에 도착한다. 5월 26일 나하(那覇)를 향해 오가사와라(小笠原)를 조사한 후, 7월 2일에 나하를 출항(이상의 날짜는 서기)한다. 가에이(嘉永) 6년 6월 3일(서기 7월 8일. 이하 날짜는 일본의 연호로 표기한다), 페리를 사령관으로 한 미국의 동인도함대의 군함 4척이 우라가(浦賀)에 내항했다. 함대의 편성은 기주군함(汽走軍艦) 2척, 범주군함(帆走軍艦) 2척이었다. 페리함대가 에도 근해에 나타나자 연안의 경비를 담당하던 오시(忍)·가와고에(川越)·히코네(彦根)·아이즈(会津)의 4개 한(藩: 가신이나 영주들이 지배하던 봉토(封土))과 우라가 부교(浦賀奉行)는 즉시 막부에 보고하였고, 에도 사람들은 우라가와 에도 사이를 사자들이 분주하게 오가는 모습을 보게 되었다. 이튿날 로쥬(老中: 에도막부의 장군 직속으로 정무를 담당하던 최고의 책임자)들이 등성하여 중론을 벌인 끝에 에도 시내에는 물가 양등과 소문의 금지, 선주들에게는 구경 삼아 배를 띄우는 일을 금지하도록 하였으나, 이국선을 구경하기 위해 나온 사람

들이 끊이지 않아 에도 서민들의 이목이 집중하면서 이국선의 소문은 가와라반의 발행을 재촉하게 되었다. 내항 6일째인 6월 9일, 페리는 구리하마(久里浜)에서 밀러드 필모어 대통령이 보낸 친서를 일본측 대표(浦賀奉行 戸田氏榮・井戸弘道)에게 전달하고, 이듬해 봄에 재차 내항하겠다는 뜻을 전하고는 체재 9일째인 6월 12일에 돌아갔다. 6월 22일에는 장군 이에요시(家慶)가 서거하는데 막부는 이듬해의 내항에 대비하여 재빨리 행동을 취한다. 다이묘(大名:만석 이상을 영유한 막부의 직속 무사)·막신(幕臣: 막부 장군의 직속 신하)에 대한 아메리카 대통령 국서의 회람 및 의견 자문(6월 26일부터)에는 다이묘뿐만 아니라 에도의 상인들로부터도 약 800통의 건백서가 제출되었다. 또한 미토(水戸)의 한주인 도쿠가와 나리아키(徳川斉昭)가 해방참여(海防参与: 해상 방위를 맡은 참여직)직에 취임(7월 3일)하였고, 또 에도 성에 가까운 에도만 내의 경비를 강화하기 위해 만 내에 11개의 포대를 만들기로 결정하여 8월부터 건설에 착수했다. 이어 11월 14일에는 포대 축조에 맞춰 에도만 방위의 비중을 내해로 옮겨 담당 한의 대규모 배치변경이 이루어졌다. 이와 같은 동향은 에도 사람들에게 큰 관심을 모아 그 때마다 뉴스가 가와라반에 오르기 시작했다.

이듬해 6년 1월 16일 페리가 우라가에 7척의 선박을 이끌고 내항했다. 이 때의 편성은 기주군함(증기선) 3척, 범주군함(돛단배) 2척, 수송선이 2척이었다. 그리고 후일 범주군함 1척과 수송선 1척이 더해져 총 9척의 편성이 되었다. 2월부터는 요코하마(横浜)에서 협상이 시작되어 미일의 선물 수수가 이루어졌다. 이어 3월 3일 요코하마에서 미일화친조약이 조인되자 페리는 개항을 약속한 시모다(下田), 하코다테(箱館)를 시찰하고, 5월에 시모다에서 화친조약 부록을 조인했다. 페리함대는 약 반년간의 일본 체재를 거쳐 6월 4일 시모다를 출항하여, 6월 17일 나하에서 류큐(琉球)와 수호조약을 체결하고 귀로에 올랐다.

페리 내항에 관한 연구는 이미 메이지(明治)기부터 축적되어 있어 ‘페리함대 일본 원정기’나 우라가 부교의 서간을 비롯해 미일 쌍방의 자료도 다수 번각되어 사태의 구체적인 추이가 밝혀져 왔다. 근년에는 해방(海防:바다 방위)에 관한 한(藩: 가신이나 영주들이 지배하던 봉토(封土))·촌(村)의 동향에 관하여 각주의 일기를 분석한 연구나 호농층(豪農層)·국학자들에 의한 정보전달의 양상을 검토한 연구 및 한주(藩主) 간의 페리내항 예고 정보를 주고받은 것에 관한 연구가 한창이다.³⁾

페리의 내항에서부터 ‘御一新(메이지유신)’이라는 변혁기를 서민들 자신은 어떻게 받아들여 왔는지, 그들의 삶이 어떠했는지를 서민들이 직접 기록한 서간이나 일기, 풍설, 혹은 가와라반·시사 니시키에(錦絵) 등의 인쇄물로 고찰하는 연구도 추진되고 있다.⁴⁾ 흑선가와라반은 에도 서민들이 입수한 페리 내항 정보가 어떤 것이었는지를 구체적으로 알 수 있는 역사적 사료라고 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당시 나돌던 흑선가와라반의 전모는 아직도 밝혀지고 있지 않아 역사사료로서 충분히 활용되고 있다고는 말하기 어렵다. 이하의 본 보고에서는 흑선가와라반의 전체상을 파악하고 내용을 구체적으로 검토하기로 하겠다.

3) 최근의 연구성과는 미타니 히로시(三谷博)의 『페리 내항』(吉川弘文館, 2003년), 가토 유조(加藤祐三)의 『막부말의 외교와 개국』(치쿠마 신쇼, 2004년)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다.

4) 사토 시게로(佐藤誠朗)의 『막부말 유신의 민중 세계』 이와나미신쇼(岩波新書), 1994년. 다카하시 사토시(高橋敏)의 『막부말의 광란』 아사히신문사, 2005년. 와카미즈 스구루(若水隼)의 『에도 토박이 기질과 메기 그림』 가도카와학예출판, 2007년

III. 흑선가와라반의 제작과 발행

현재 흑선가와라반은 개인 및 여러 기관이 소장하고 있는데, 특히 페리 일행이 방문한 지역의 박물관이나 자료관에서 많이 소장하고 있다. 내 관점으로는 그 수가 대략 370종의 1000여 점에 이른다고 생각한다. 일본 국내의 여러 기관에 소장된 가와라반의 데이터베이스인 도쿄대학 사료편찬소 부속 화상해석사료센터에 의한 ‘인쇄물 종합 편년 목록(二稿)’(2000년)에는 페리 내항시의 가와라반이 271점이나 채록되어 있다. 그리고 목록에 다시 수록된 것에는 본 보고가 조사하지 않은 것도 있어 내 관점의 가와라반과 목록채록의 가와라반을 합하면 400종류 이상의 흑선가와라반이 현존함을 확인 할 수 있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가령 1 판목에서 1장⁵⁾을 인쇄했다고 가정하고 총 수가 약 8만장이니 현존하지 않는 판이 존재한다는 점도 고려하면 페리 내항 당시는 10만장이 넘는 가와라반이 나돌았다고 추측된다. 이와 같은 흑선가와라반의 대량 발행은 페리 내항에 대한 에도 서민들의 관심이 얼마나 높았는가를 짐작하게 한다. 가와라반은 당시의 서민들에게 정보원의 하나로서 페리 내항시에는 양과 종류 모두 현저하게 증가했다. 가와라반의 발행량은 서민들이 페리 내항에 높은 관심을 보이고 있음을 나타내고 있다고 말할 수 있다.

그럼 발행 시기, 발행 방법, 발행지역에 대하여 검토해 보고자 한다. 당시의 기록 류에서 가와라반의 발행 및 판매에 관한 기술을 살펴본다.

우선 발행시기인데, 간다(神田)의 현책방 후지오카야 요시조[藤岡屋由蔵]의 정보록인 ‘후지오카야 일기’에는 6월 11일 밤에 가와라반을 판매했다는 기록이 있다.⁶⁾ 다른 일기 류에서도 첫 번째 내항 중부터 두 번째 내항기에 걸쳐 계속적으로 제작, 발행하고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⁷⁾

‘시중취체류집(市中取締類集)’에는 가에이 6년 11월에 마치부교쇼(町奉行所: 에도의 사법, 행정을 총괄하던 관청인)에 제출된 회초지괘명주사서(絵草紙掛名主伺書)와 그에 대한 회답인 부찰안(附札案)⁸⁾이 있어 무사가 부업으로 판목을 새겨 정식 발행허가를 받지 않고 검사도 없이 소시아(草紙屋: 에조시나 니시키에를 파는 가게)에서 몰래 팔거나 사람들의 통행이 많은 거리에서 판매했던 제작과 판매의 모습을 짐작할 수 있다.

IV. 흑선가와라반의 내용 분류

흑선 가와라반은 내용에 따라 페리 일행에 관한 미국측 정보와 막부의 대응에 관한 일본

5) 니시키에[錦絵]의 1회 인쇄량. 통상 200장.

6) 『후지오카야[藤岡屋] 일기』 제43권, ‘嘉永 6년 해방전서(海防全書) 上’

7) 츠치우래土浦의 상인 이로카와미나카[商人色川三平]의 일기 ‘片葉雜記’ 5, 嘉永 7년 4월 29일의 조(条)에 ‘아메리카詞라 칭하며 파는 자와 여러 지방에 팔려 다니는 사람들이 많다’. 에도초[江戸町]의 노인 기타무라喜多村가의 국학자 기타무라 노부요[喜多村信節]의 수필 ‘기키노마니마니’ 嘉永 6년 10월의 조(条)에 「大筒之絵其外読売類の版行に甲冑着用の図蒸気船之図, 東条が刻して罪を得し伊豆七島の図も翻刻して売れども咎もなし」

8) 『시중취체류집(市中取締類集) 서물금회지부(書物錦絵之部)』 제273권(626) 회초괘명주사서(絵草紙掛名主伺書)

측 정보, 페리 내항에 관련한 가지각색의 사정을 오락적인 것의 3가지로 분류된다.

첫 번째인 미국측 정보로는 100종 남짓이 있는데 그것은 증기선을 비롯한 페리 함대의 배, 페리제독과 그 일행의 품모, 소지품, 언어, 요코하마 상륙 모습, 미국에서 일본으로 보낸 선물 등의 해설이다. 이에 대해 여기서는 간단하게 개관만 하고 나중에 구체적으로 가와라반을 검토하기로 한다.

페리 일행의 선박에 관한 가와라반은 증기선에 대한 것이 중심인데 그 밖에도 보트나 다른 범선, 네덜란드선이나 당선, 일본의 어용선 및 한선(番船) 등이 첨부되어 그려져 있는 것도 있다. 선박그림으로는 일본에서 만든 바퀴를 이용한 선박인 운용선(車船, 雲龍船)에 관한 가와라반도 있다.

페리 일행의 품모에 관해서는 개인명을 기록한 초상이 있고 페리 제독과 부관인 아담스의 초상화가 대부분이다. 개인명이 없는 병사의 인물도는 미국인의 도해적(図解的)인 초상이나 반신의 단신 초상과 여러 사람이 같이 서있는 전신 모습의 초상으로 크게 나눌 수 있다. 그 밖에도 의복과 모자, 소지품에 대한 도해가 있다. 특히 복장과 모자에 관해서는 그 모습이 계급에 따라 다르다는 것을 의식하여 기술되었다. 모자에 대한 소개가 많은 것은 일본인이 쓰지 않기 때문에 이국성을 느끼게 하였고, 장식적이고 그리기 쉬우며 볼 때 이해하기 쉽고, 또 종류가 많았기 때문일 것이다.

일행의 이름과 일람 및 ‘미국어 회화(미국어의 일본어 해석)’로서 단어 소개도 있다. 단어는 정확한 영어가 적다. 단어 소개를 주제로 한 것도 있으나 미국에 관한 지식의 하나로서 초상화에 곁들여 쓴 것들도 있다. 가와라반의 미국어는 그 단어를 미국인과의 회화에서 활용하기 위한 것이 아니었다. 단어집에는 ‘경사스런 일을 긴파’, ‘기쁜 일을 산치료로’로 소개하고 있는데, 말의 의미가 아니라 귀에 익지 않은 소리를 재미있어 했던 것으로 여겨진다. 미국어의 가와라반은 이국어 소개의 일환이며 이국 취미를 충족시키기 위한 것으로 생각된다. 가와라반에 소개된 말은 일상생활에 관한 단어뿐이다. 가와라반에 소개된 신변용품에 대한 이름을 이국의 말로 확인할 때, 가와라반을 사는 사람들에게는 이국인 미국이 가깝게 느껴지지 않았을까.

막부에 전해진 선물도 품명의 일람과 도해를 곁들여 가와라반에 소개되었다. 두 번째 내항 시에는 모형 증기기관차(1853년 프랑스 노브리스공장 제작)를 보내 와 여러 종류의 가와라반이 제작되었다. 이 증기기관차는 실물 크기의 4분의 1로 만들어진 것이어서 차 안에는 들어가지 못했으나, 어떤 일본인 관리가 지붕 위에 타고 달린 것이 페리의 일기에 쓰여 있다. 가와라반에 그려진 증기기관차는 크며 사람들이 안에 탄 상태로 그려져 있다. 객차는 ‘유산옥형선(遊山屋形船:지붕이 있는 놀잇배, 집배)’이라 표시된 것도 있어 집배나 신여처럼 그려져 있어 증기기관차라고는 여겨지지 않는 그림도 있다.

두 번째인 막부측 정보는 130여종인데, 그 대부분인 100여종이 우라가나 에도만 주변의 방위에 관한 것이고, 그 밖에는 막부에서 미국측에 보낸 선물 소개가 20종, 마치부레(町触: 에도시대에 막부나 다이묘가 마을에 포고한 법령)를 인쇄한 것이 10종 정도다.

에도만의 해안방위는 당시 ‘오카타메(御固(おかため))’라 하여 우라가 부교(관리)들의 이름과 각 한의 해안방위 담당 장소를 일람으로 만든 관리부(役人付(やくにんづけ)), 그것을 지도에 표시한 어고도(御固図)가 발행되었다. 각 한의 경비 담당 장소에 대해서는 몇 번이나

장소를 변경하고 있어, 담당구역 이동으로 인해 그 가와라반이 언제의 상황을 기록한 것인지 알 수 있는데, 두 번째 내항 후인 가에이 7년 1월 15일부터 2월까지의 것이 많다. 에도 막부는 첫 번째의 내항 후 에도 방위를 위해 내해에 11개의 포대를 만들기로 결정하여 8월 하순부터 건설에 들어갔는데, 그 예정지와 규모 등을 기록한 가와라반도 만들어졌다. 그 밖에도 오카타메의 광경 등, 해안방위에 관한 가와라반이 일본측 정보 가와라반 내의 4분의 3을 차지하고 있다.

페리 일행과 막부 관리와의 협상을 그린 것으로서는 상륙한 요코하마에서의 응접 광경과 식사 접대 모습 등이 소개되었다. 미국에 대한 선물의 편람도 만들어 졌는데, 그것은 일본인 무사에게 부복하고 있는 페리의 그림이 그려진 것이 많다.

세 번째의 오락적인 것으로는 약 120종이 있는데, 페리 일행과 막부의 대응 등과 관련한 다양한 사상(事象)을 주제나 모티브로 하여 말놀이나 패러디로 만든 것들이다. 오락물 가와라반을 형식으로 분류하면 다음과 같다. 36가선(歌仙)과 연극 대본 패러디 등, 언어의 패러디에 대해서는 말놀이에 포함시켰다. 70% 이상이 말놀이이고, 종류 수와 점수 모두 특히 교카(狂歌: 일본 와카(和歌)의 한 형식인 31음의 단카(短歌)의 일종)가 많음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말놀이는 판이 많은 순서대로 교카, 하우타(端唄: 짧은 속요), 야보타이시(野(や)保(ほ)台(たい)詩(し)),⁹⁾ 요시와라 고토바(吉原言葉),¹⁰⁾ 연극 대사 패러디, 센류(川柳: 에도 중기 이후 에도(지금의 도쿄)를 중심으로 유행한 5·7·5조의 17음 정형시), 재치 문답, 만담 등이 있으며 그 종류는 약 80종 정도다.

패러디물은 증서, 대소력(大小曆), 무가 연감, 사찰 보물·불상의 유래, 염서(艶書), 광고 전단, 가부키 출연배우 리스트(顔見世番付), 증기선도(蒸氣船図) 를 패러디한 것이 있는데 그 종류는 약 20종 정도다. 이들은 우리 주변에 있는 것들을 소재로 삼아 한층 기교를 부려 만들어졌다.

이 밖에도 무구를 나열한 캐리커처나 미국인을 포박·격퇴하는 책 등이 있다.

이상 흑선가와라반의 내용에 대해 살펴보았는데, 다양한 것들이 발행되어 페리 일행과 막부 측의 대응에 관한 정보뿐만 아니라 오락성이 높은 것들도 다수 발행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앞서 언급한 바와 같이, 현존하는 흑선가와라반에는 페리 함대에 대해 설명한 것들이 100여종이나 됨을 알 수 있다. 그 중 절반인 50 종류는 증기선을 주로 한 함대의 선박을 그린 것이며, 페리 제독의 초상을 비롯한 인물도 20종, 미국어 단어집 10종, 증기차 모형을 비롯한 선물 소개 20종, 페리 내항 이전의 이국에 관한 정보로는 배·사람·언어를 세트로 한 것이 많아 흑선가와라반에서도 마찬가지로의 관심을 볼 수 있다. 이로써 배·사람·언어를 아는 것이 이국을 아는 것이라고 하는 의식의 틀이 존재했다고도 할 수 있겠다.

그러면 흑선가와라반의 미국 선박·사람에 대해, 주로 초상화 분석을 검토해 보자.

9) 야보타이시(野保台詩)란 언뜻 제각각 아무렇게나 늘어놓은 듯이 보이는 한자를 어떤 순서에 따라 읽음으로써 의미를 알 수 있는 구조가 되는 한시(漢詩)다. 원형은 기비노 마키비(吉備真備)가 당나라에서 갖고 왔다고 하는 난독(難読)의 예언시 야보타이시(野馬台詩)이며, 야보타이시를 빗대어 만든 것이 야보타이시(춘스러운 시)다. 페리 내항 시에는 세로 3자·가로 3자의 9자를 사용한 변형판이 만들어졌다.

10) 유녀가 손님에게 말을 거는 요염한 말에 이어, 시사적인 말을 적절히 배합한 것. 그 의외성이 포인트이므로, 한 번 읽어도 알기 쉽게 되어 있으며 한 마디 한 마디가 짧다.

V. 증기선도(蒸氣船図)

그림 1은 가에이 6년 첫 번째 페리 내항에 즈음하여 만들어진 가와라반이다. 땅딸막한 검은 선체에 3개의 돛대에 가득 펼쳐진 돛은 바람을 안고 있다. 로프를 타고 있는 흑인과 원시경을 들여다 보는 인물, 네덜란드동인도회사의 마크인 VOC 와 비슷한 깃발이 그려져 있어, 당시의 에도 서민들이 품고 있던 남만선·네덜란드 선박의 이미지(그림 2)를 밑그림으로 그렸음을 알 수 있다. 그러나 자세히 보면 네덜란드 선박도에서는 볼 수 없었던 것이 그려져 있다. 하나는 선체에 붙은 2개의 바퀴인데, 지면(紙面)의 기술에서는 ‘미국증기선’에는 10칸의 ‘수차(水車)’가 4개 혹은 두 개가 붙어 있다고 되어 있다. 첫 번째 내항 후의 증기선도에서는 바퀴의 형태나 수는 제 각각이었고 많은 것은 6개나 되는 바퀴가 달려 있었다. 네덜란드 선박도와 다른 또 하나의 점은 갑판 상의 굴뚝에서 심하게 뿜어져 나오는 연기다. 나가사키(長崎) 판화 등의 네덜란드 선박도를 보면 갑판에 짧은 굴뚝과 하얀 연기가 그려진 것이 있는데, 그것은 선박 내에서 취사를 하기 때문에 나는 연기였다. 그에 비해 증기선도에 그려진 굴뚝과 연기는 매우 크며 증기선도에 따라서는 검은 연기를 뿜어내고 있는 것도 볼 수 있다. 굴뚝과 연기가 강조되어 있어 당시의 에도 서민들에게 증기선은 네덜란드 선박에 바퀴가 붙어 있고 연기를 뿜어내는 선박으로서 인식되었던 점을 짐작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두 번째 페리 내항 시에는 이 증기선의 이미지가 크게 달라졌다. 그림 3을 보자. 낮게 스마트해 진 선체는 영국잡지 일러스트레이티드 런던 뉴스에 그려진 페리 함대(그림 4)와 비슷한 듯하나, 그림1과 비교해 보면 크게 다른 점은 그 형체의 차이보다도 화면에서 느끼는 스피드감이다. 시커먼 선체의 주위에는 부서지는 파도가 묘사되어 있고, 덮개가 있는 외륜도 파도의 비말을 흩날리는 모습을 하고 있다. 굴뚝에서는 검은 연기가 뿜어져 나와 자욱하게 뒤쪽으로 깔리고, 성조기인듯한 깃발을 줄지어 달아 놓은 로프는 후방으로 호를 그리고 있다. 이는 증기선이 질주하고 있는 모습을 그린 것인데, 주목해야 할 것은 모든 돛이 접혀 있는 상태라는 점이다. 그림1은 돛이 후방에서 부는 바람을 받아서 앞으로 나아가는 범선의 그림인데, 깃발은 뱃머리 측으로 휘날리고 있다. 반대로 그림 3에서는 깃발과 연기는 후방으로 날리고 돛은 올리지 않고 바람을 가르며 질주하는 배의 그림이 묘사되어 있다. 런던 뉴스의 그림 4가 돛을 편 상태로 그려져 있는 것과 비교해 보면, 그림 3의 증기선도는 돛을 펴지 않고, 즉 바람방향에 좌우되지 않고 고속으로 질주하는 배로서, 증기선의 기능면을 그림으로 그린 것이다.

흑선가와라반의 증기선도는 에도 사람들의 미국선박에 대한 인식이 네덜란드 선박과 닮은 배이므로 놀랄만한 기능을 갖춘 선박으로 크게 변화했음을 나타내고 있다고 할 수 있겠다.

VI. 미국인물도

흑선가와라반에 가장 많이 그려진 모티브는 미국인물이며, 비슷한 형태의 초상화를 많이 볼 수 있어 일정한 패턴이 형성되고 있다. 미국인의 구체적인 이미지가, 실제로 상륙한 미

국민의 모습이나 우라가 앞바다에 떠 있는 증기선을 보지 못한 사람들에게도 가와라반을 통해 확산되었음이 추측된다. 페리의 초상화·미국인물도·삽화의 미국인물도에서 미국인물이 그려진 방법을 분석하여 당시 미국인의 이미지에 대해 검토해 보자.

증기선도의 검토에서 선박도의 변화를 지적했는데, 인물도도 페리 내항 이전부터의 전통적인 이국인상으로부터 새로운 미국인상의 창출이라는 시기적인 변화를 볼 수 있다. 본 보고에서는 새롭게 창출된 미국인상에 대해 검토하겠다.

가장 많이 그려진 페리상(그림5)의 묘사를 보자. ‘가인중춘(嘉寅仲春)’이라 고 쓴 것으로 볼 때, 두 번째 페리 내항에 즈음하여 나온 것이다.

안면의 묘사를 보면 피부색은 하얗고 그 윤곽을 그린 모자와 모발, 안면의 검은 눈을 두드러지게 하는 효과를 나타내고 있다. 모발은 가늘고 곱슬곱슬 말려 있고 검지 않으며 짧다. 모발의 질·모색·헤어스타일 모두 장년의 일본인과는 다르다. 헤어스타일은 소속된 사회를 상징하는 것이며 그림 속에서는 이국성을 강조하는 포인트가 되는 점이기도 하다. 눈썹과 수염도 마찬가지로 가늘며 돌돌 말려 있다. 당시 대부분의 일본인 남성들은 깎든지 뽑든지 하여 수염을 기르지 않기 때문에 수염도 이국성을 나타내는 점인데, 수염도 역시 가늘고 돌돌 말려 있다. 눈은 크고 눈동자가 두드러진 눈으로 그려져 상안검의 굵은 묘선과 함께 강한 인상을 주고 있다. 안구 밑의 라인은 둥글게 부풀어 올라 다소 안구가 돌출되어 있다. 그리고 상안검이 그것을 덮듯이 그려져 있다. 이와 같은 눈의 묘사는 우키요에[浮世繪]의 기법 중에서는 호걸이나 역사, 이국인, 동물에 이용되는 ‘오목눈’의 묘사와 공통된다. 또 눈꼬리에 걸쳐 두 줄의 선이 그려져 있어 눈이 더 강조되어 있다. 주름의 묘사는 고령을 나타내는 것으로서 일본인 노인을 그릴 때에도 채용하는데, 이국인이나 호걸을 그릴 우키요에에서도 확인되며, ‘이인성(異人性)’을 나타내는 것으로도 채용된다. 코는 높고 크다. 비스듬히 바라 본 콧날이 왼쪽 뺨의 라인에서 튀어나와 그려져 있다. 이러한 묘사법은 코가 높은 것으로 알려진 가부키[歌舞伎] 배우인 마츠모토 고시로[松本幸四郎]를 그린 우타가와 도요쿠니[歌川豊国]의 배우 그림에도 채용되는 등, 코의 높이를 음영법을 쓰지 않고 표현하는 당시 기법 중의 하나였다. 콧방울의 바깥쪽에는 역시 주름 같은 선이 더해져 있다. 음영이 표현되어 있지 않아 실제로 어떤 코의 모양을 상상하였는지는 알기 어려우나, 이 선은 노인임을 나타내거나 혹은 뼈가 불거져 나온 얼굴을 표현하기 위한 것이며, 여기서는 코의 존재감을 높이는 효과도 인정된다. 입은 큰 편으로서 일자로 굳게 닫혀 있고 입술의 윤곽이 그려져 있다. 그리고 그 주위를 곱슬곱슬한 수염이 둘러싸고 있다. 턱은 아래 턱에 걸쳐 통통하게 살이 모습이다. 귀는 귓볼이 큰 복귀다. 그 표정은 희로애락과 같은 감정을 나타내지는 않았으나, 눈과 코 등 안면의 각 부분이 큼직하게 그려져 있어 전체적으로 강한 혹은 당당한 인상을 주고 있다.

다음은 복장과 소지품에 대해 살펴 보자.

지면상에서 눈을 끄는 것은 모자와 상의 옷감의 검은 색이다. 모자는 통형(筒形)이다. 원 모양이나 압정(鋌), 술, 알파벳의 H와 같은 것 등, 장식이 많다. 당시 일본인들은 머리를 가릴 때에는 삿갓이나 두건을 썼다. 나가사키에(長崎絵: 나가사키 등지에서 볼 수 있는 이국적인 문화를 담은 그림)의 네덜란드인이 종종 넓은 차양이 달린 모자를 쓴 모습으로 그려지거나, 외국인(唐人: 당시 일본인은 외국인을 무조건 ‘당나라 사람’으로 불렀다.) 옛장

사나 외국인 축제 때 등에 일본인이 모자를 쓰고 외국인으로 분장한 것처럼, 모자는 이국성을 나타내는 효과적인 도구였다. 흑선가와라반 속에는 다양한 형태의 모자를 그려 각각에 직명이 곁들여 있는 것도 있어 모자는 사용하는 인물의 신분이나 직업을 나타낸 것으로서 인식하고 있음을 짐작할 수 있다. 그림5의 상의는 옷의 앞길 중앙에 하얗고 둥근 단추가 나란히 달려있고 양 어깨에는 갑남(甲南)에 쓰는 국화꽃 모양의 금속장식 좌금(菊座)이 달려 있다. 칼라는 목을 둥글게 하여 목 뒤쪽을 세웠다. 소매는 손목까지 길게 있는 것 같은데 지면에 소매 전체가 그려져 있지 않아 형상은 알 수 없다. 양쪽 어깨에서는 하얀 밴드가 내려와 가슴 앞에서 교차되어 있다. 오른 손에 검을 들고 있으나 자루 부분의 사벨(sabel:서양 검)과 비슷한 고리 같은 묘사 등, 구조를 알기 어렵다. 칼집에는 물고기의 꼬리나 구름과 같은 장식이 있고 칼끝으로 갈수록 두꺼워지는 점은 청룡도를 연상케 한다. 일본에서나 유럽의 회화에서도 초상화에 곁들여진 소품으로서 주인공의 속성을 나타내는 것은 초상화의 전통적인 기법이였다. 주인공의 신분과 직업을 상징하는 것이 곁들여지는 일이 많은데, 일본에서는 무사상에 칼을 곁들여 그리는 일이 상투적이었고, 검을 지닌 그림으로 보아 초상화의 인물이 무인이었음을 짐작할 수 있다.

그림 6은 그림 5와 같은 구조인데, 칼집의 장식이 구름모양이 되어 다소 다르긴 하나 오른손에 쥔 검과 손 모양도 같은 점으로 보아 양자 사이에는 제작상의 인과관계가 추측된다. 그러나 그림 6의 인상은 그림 5와 크게 달라 중국적이다. 세부의 표현에서 이와 같은 인상을 만들어 내고 있는 요소를 확인해 보자.

중국적이라는 인상을 낳고 있는 가장 큰 요소는 수염과 눈의 묘사법이다. 털은 길고 곱슬곱슬하지 않은 흑모로 되어 있다. 머리는 후두부 위 쪽에서 묶어 뼈와 같은 모양을 한 세 가닥의 체(替)를 꼬고 있다. 눈썹은 굵고 다소 쳐진 듯한 인상이다. 수염은 수북이 나있는데 입가를 덮어 가린 것은 아니며, 이와 같은 수염의 표현은 공자나 관우와 같은 중국인상의 형체에서도 낮익은 것 중의 하나였다.

눈은 아몬드 모양의 눈초리가 치켜 올라간 눈이며 쌍꺼풀이 있고 눈꼬리나 눈 밑에는 주름이 그려져 있다. 이마에도 3개의 주름이 그려져 있다. 코 밑에 선이 그려져 있고 콧방울 위에도 선이 모아져 있다. 그림5에서 보았듯이 뺨의 윤곽선에서 콧날을 튀어나오게 하여 코 높이를 강조한 점은 찾아 볼 수 없다. 콧구멍의 묘사법도 다르며 입은 닫혀있고 아랫입술 오른쪽 끝에 한 개의 곡선이 그려져 있다.

복장은 목둘레의 흰 주름이 눈에 띈다. 주름의 곡선은 굵고 붓으로 그린 듯 비수(肥瘦)가 있어 다른 부분의 묘선(描線)과는 다르다. 비수가 있는 선은 우키요에를 비롯해 당시의 그림을 보면 의복을 그릴 때 흔히 사용하는 것이나, 무인이나 호걸을 그릴 때에는 육체 부분의 묘선으로서도 종종 쓰이는 선이어서 이인(異人) 표현의 한 기법이기도 하다. 그림6의 주름의 직선적이며 굵은 묘선은 긴장감을 느끼게 하여 강함과 위엄을 느끼게 함과 동시에 인물을 단정하게 보이게 하는 효과를 낳고 있다. 흰 주름 밑에는 옷의 앞길 중앙에 단추가 나란히 달린 검은 옷이 보인다. 흰색의 밴드는 없으나 주름 아래로는 그림5와 유사하다. 오른쪽 옆의 선은 몸의 중앙에 너무 기울어져 있어 두부와의 이어짐이 부자연스러운데 배가 뚱뚱하게 돌출된 체형으로 보인다. 중국의 무인상에는 배가 뚱뚱한 것이 많은데 이것도 중국적인 인상을 주는 한 요인이 되고 있다.

그림7의 인물은 지면 좌상에 인물의 용모가 해설되어 있어 검정 칠을 한 가와라반으로는 알 수 없는 색과 소재 등의 설명이 첨부되어 보다 구체적으로 이미지를 떠올릴 수 있다.

‘○면체 색은 희고, 코는 높고 콧날이 이마에서 흘러내리며, 눈은 흰자위가 많고 눈동자가 불그레하며 눈썹은 빨갛고 이는 자잘하게 나있고 송곳니가 있으며, 귀는 크고 머리카락은 술이 없고 붉으며 흰머리가 섞여 곱슬곱슬하고 손발가락이 일본의 새와 같으며 손톱이 길다.

○의복은 검은 나사(羅紗)에 통 바느질, 소매는 나사로 바이어스를 두르고 가슴에 8개의 금속단추를 달았고, 어깨에 걸친 견장은 파란빛을 띤 진홍색으로 가상자리에 죽 둘러 바이어스를 대고, 금속 체인을 1척 5촌 정도 드리워

초상화의 인물과 설명문의 내용은 거의 합치하고 있으나 화상 인물에서는 입을 다물고 있어 그려지지 않은 치아의 설명과 발가락에 대해서도 설명하고 있는 점으로 보아 초상화에 그려지지 않은 정보도 문자 설명을 첨부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지금까지 검토한 반신상에 대해 형체와 기법의 특징을 정리해 보자.

안면 묘사는 다양한데 복장은 검은 군복차림의 것과 중국적인 느낌의 것으로 크게 구분된다. 특히 견장을 단 검은 상의에 앞에 일렬로 나란히 단 단추, 가슴 앞에 흰 밴드를 교차시킨 형체가 많이 보인다. 중국적인 형체나 비수가 있는 선, 隈, 오목눈, 얼굴 주름, 수염, 헤어스타일이나 모질(毛質)의 차이와 같은 이국인을 그릴 때에 종종 사용해 온 기법과 형체를 사용하였다. 모자나 단추, 목 둘레의 옷 주름도 이국성을 나타내는 것으로서 이국인상에 흔히 채용되는 요소다. 페리 내항 이전에 축적된 이국인 묘사의 기법을 조합하고 있는데 완성된 인물상은 나가사키에의 네덜란드 인물 그림과는 다르다. 니시키에의 이국인 표현에 가까운 인물 표현으로서, 에도의 가와라반 상인이 나가사키가 아니라 보다 친숙한 에도의 우키요에에서 인물상의 모델을 구했음을 추측할 수 있다. 우키요에의 표현을 사용하여 새로운 이국인상의 형체가 만들어졌다고 볼 수 있겠다.

다음은 개인의 초상이 아니라, 미국인물도로서 그려진 것 중에서 이국인 이미지를 확인해 보자.

그림 8의 유형은 모두 가에이 7년의 두 번째 내항 후 대부분이 2월 이후의 것이다. 오른손으로 검이 달린 총을 누르고 양쪽 발을 가지런히 모으고 정면을 보고 서 있는 ‘의복은 검고, 검을 등에 매고 검이 달린 소총을 지닌(衣服黒, 劍ヲ背おい, 劍付之鉄砲ヲ持)’이라는 설명이 곁들여져 있어 검은 옷, 등에 맨 검과 검이 달린 총이 미국인물상에 부수되는 것이라는 인식이 있었다. 흰색의 밴드에 대한 언급은 없으나, 초상화의 인물에는 역시 가슴 앞에서 교차하는 흰색의 밴드가 그려져 있다. 그림5에서 7을 검토한 반신 초상은 가슴에서 위가 지면에 크게 그려져 있다. 그 화면의 3분의 1부터 절반이 검은 옷이 차지하고 있는데, 그 만큼 검은 색의 시각적 임팩트는 크다. ‘미국인의 복장은 검은색’이라는 인식이 형성되어 있었다고 생각된다. 흑과 백의 대조가 인상적이며 검은 상의와 흰색의 밴드 표현이 몇 번이고 사용되면서 자연스럽게 모델적인 미국인상을 구성하는 하나의 표현 형체로서 정착한 것으로 여겨진다. 페리를 수행한 화가 하이네의 그림에는 감색의 천으로 된 상의에 흰색의

밴드를 교차시킨 미국 해군병사가 그려져 있다. 이와 같이 실제 해군병사의 복장을 근거로 화가나 보는 사람들도 알기 쉬운, 검은 색 상의에 교차시킨 흰 밴드라는 형체가 미국인을 나타내는 심볼적인 복장이 된 것으로 추측된다. 이상의 검토에서 검은 상의에 앞 단추와 흰색의 밴드를 교차시키고 모자를 쓰고 검은 차고 소총을 든 모습이 ‘북아메리카인물’로 여겨져 사용되었음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마지막으로 삽화적인 미국인상을 살펴 보자.

페리 내항에 관한 가와라반에서 미국인상이 가장 많이 보이는 것은 삽화적인 사용에서다. 각각의 인물도에 ‘이것은 미국인이다’라는 설명이 없어도 저절로 미국인으로서 인식되었던 도상(圖像)이므로, 거기에 어떤 인물상이 그려져 있는가를 검토하면 당시 사람들이 갖고 있던 미국인에 대한 이미지를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지금까지 검토해 온 초상화나 모델적인 ‘북아메리카인물도’의 묘사법과 비교하면 작고 간략한 묘사를 한 것도 많고, 안면의 묘사가 분명치 않은 상이 많다. 미국인상으로서의 인식은 안면 이외의 묘사나 복장과 소지품, 기재된 문장의 내용 등으로 추찰한 것이라고 생각된다. 따라서 복장과 소지품에 주목하여 미국인상을 검토하고자 한다.

미국인상은 세가지 유형으로 크게 구분된다.

- A, 군복 차림의 것
- B, 외국인 차림(唐人姿)의 것
- C, A와 B가 혼합된 것

A는 검은 간수(簡袖)의 군복차림이다. ‘북아메리카인물도’의 형체를 이용한 것으로서 페리 일행이 요코하마에 상륙한 상황을 그린 행렬도나 선물이 소개된 가와라반에 많다. 또 다른 이국인과 나란히 그려졌을 때도 이런 유형의 미국인상이 이용되고 있다. 미국인이 모습을 소개하는 내용의 가와라반에 많은 유형이라 할 수 있다. 흰색의 밴드를 교차시키지 않은 것도 대부분은 검은 간수의 상의를 입고 있다. 반신상에서 볼 수 있는 어깨 장식은 인물상이 크고 분명한 상에는 그려져 있있는 경우도 있으나, 인물상이 작은 경우에는 생략되어 있다. 미국인상의 복장 표현으로서는 검은 상의에 이어 흰색의 밴드가 중시되고 있어 어깨의 장식은 여기서는 별로 중시되지 않고 있다.

B는 외국인 모습으로 그려진 것이다. 두정부에 뿔이 달린 모자를 쓰고 있는 것이 많으며 원통형의 소매(筒袖)가 있는 상의를 입고 흰색 바지와 검은 색 구두를 신은 상이 많다. 모자의 형태는 다양하나 둥근 헬멧에 흰 털로 가상자리를 장식한 것과 삼각형의 삿갓 모양의 것이 많다. 두정부에 술이 달린 모자는 반신상이나 모델적인 미국인상에서는 볼 수 없었던 형태다. 두정부의 술은 몽고인이나 무장의 쓰개에 그려지는 일이 많으며, 또 나가사키에 있는 동시대의 중국인(청나라의 풍속)을 그린 당인상(唐人像)에도 그려져 있다. 당시 중국인을 그릴 때에 많이 쓰인 표현이므로, 두정부에 술이 달린 모자가 그려진 것만으로도 당인(唐人)이나 몽고인의 인상을 받는다. 또 모자가 그려졌을 때는 그 가와라반의 내용도 당인이나 중국인과 관계가 있는 경우가 많다. 인물을 그리지 않고 술이 달린 모자만을 삽화로서 이용한 것도 있는 것으로 보아, 이 모자가 당인이 것으로서 당시 널리 인지된 모티브임을 알 수 있다.

C는 A의 군복 표현과 B의 중국적인 형체가 혼재되어 있는 것이다. 唐人에게 교차하는 흰색의 밴드나 소총을 지닌 것이나, 그와는 반대로 ‘북아메리카인물도’에 중국적인 형체를 가

미한 것(넓은 소매부리, 혹은 긴 소매 긴 수염, 전체를 뒤로 하여 하나로 묶은 머리 등)이다. 양 손을 끼고 눈 앞으로 높이 들어올린 포즈를 병용한 것도 많다.

B·C와 같이 중국적인 형체가 이용된 것은 교카나 말놀이 가와라반에 삽화로서 이용된 것이 많다. 가와라반의 내용에 따라 미국인상의 유형을 선택해 사용하고 있었음을 짐작할 수 있다.

다음은 지금까지의 미국인상에 대한 검토에서 당시 서민들이 페리의 내항을 어떻게 생각하였는지에 대해 고찰한다. 이하의 4가지로 나눠 지적하고자 한다.

첫째는 당시 서민들은 페리 일행을 미운 적으로서 생각하고 있지 않았다는 점, 공포심을 갖고 있지는 않았다는 점이다.

안면의 묘사에는 이전부터 사용되어왔던 외국인 표현을 채용했으나, 괴물 텐구(天狗)나 악귀로 그려져 있지 않다. 근세의 초상화에서 악과 적을 묘사하는 방법으로는 동물적인 요소를 이용한 것이 일반적이었다. 그림7의 페리상에서는 짐승과 같은 손가락과 날카로운 손톱이 그려져 있으나, 이와 같이 동물의 특징을 가미한 것은 주인공을 풍자·비판하거나 구경거리로서 취급할 때 보이는 기법이며, 특히 낙서에서 많이 보여왔다. 그와 같은 이상함이 강조된 것을 볼 수 있는 것은 내 관점으로는 이것 한 점 뿐이다. 외국인 표현을 채용하면서도 대부분의 경우는 적으로서가 아니라 자연스런 인간의 모습으로 그렸다. 이 점은 페리 일행을 해를 끼치는 자로 보지 않은 의식과도 통하고 있다. 이와 같은 의식은 소지품의 묘사에서도 엿볼 수 있다. 초상에는 그 인물을 상징하는 것들이 함께 그려지는데, 반신·전신상에 무기가 많이 그려져 있는 것은 미국인이 군인, 병사로서 인식되었음을 나타내고 있다. 다만 그 무기들은 대통(오즈츠[大筒]:대포에 가까운 총)과 같은 파괴력을 느끼게 하는 것으로는 표현되어 있지 않다. 또 실제로 사용하는 상태가 아니라 단순히 갖고 있는 상태로 그려져 있다. 증기차를 그린 가와라반에는 운전하는 미국인이 그려져 있는 것도 있으나, 무기에 대한 형태를 도시했을 뿐, 사용하고 있는 모습이 아니다. 무기로서의 기능, 공격성에 별로 관심을 기울이지 않았다고 할 수 있다.

둘째는 서민들이 페리 일행과 미국에 대해 강한 관심을 갖고 있었다는 것이다. 페리 일행의 반신상의 개인 초상이 다수 그려진 것은 그 때까지의 이국인 보도와는 다른 점이다. 구도를 보면 우타마로(歌麿)의 미인도나 샤라쿠(写楽)의 배우 그림 등, 니시키에의 오쿠비에(大首繪:인물의 상반신을 크게, 그리고 표정을 특히 강조해 그린 것)가 연상된다. 배우 그림은 그 역을 연기하는 상태를 묘사한 것이라, 엄밀하게는 초상화라 부를 수 없다. 그러나 그림의 성질이 아니라 초상화의 형태로 보면 초상화에 매우 가깝다고 할 수 있으며, 그런 의미에서 그들은 페리 일행이 배우 그림이나 미인화와 공통된다고 생각했다고 여겨진다. 오쿠비에는 배우나 미인과 같이 당시 서민들에게 아이돌적인 존재에 대하여 보다 상세하게 그 인물을 알려, 거기에 그려진 대상을 보면서 자신과 가깝게 느끼게 하는 효과를 갖고 있다. 당시의 니시키에는 단순히 바라보는 것이 아니라 거기에 그려진 것들에서 정보를 적극적으로 읽으려고 하는 견해가 존재했다. 대부분의 반신상은 당시 서민들이 페리 일행에 대해 강한 흥미나 호기심을 나타내고 있었음을 볼 때, 그들은 초상을 통해 페리상이 체현하고 있는 미국이라는 나라를 알려고 했던 것이 아닐까.

셋째는 미국을 그때까지 보고 알고 있었던 이국과는 구별하여 의식한 사실이다. '북아메리카인물도' 라고 하는 새로운 인물상이 형성되어 갔다는 점에서 그때까지의 이국인과는 달

리, 새로움에 주목하는 의식이 확인되었다. 페리 내항 이전의 이국인물 표현을 확인해 보면, 가장 많은 것이 중국인(唐人의 이미지를 포함), 이어서 네덜란드인(페리 내항전 가에이 3년에 상관장(商館長)이 에도 에 근무하였다), 류큐인(가에이 3년 경하사(慶賀使)가 에도에 왔다), 조선인(통신사가 에도까지 온 것은 1764년 이에하루[家治]의 습직(襲職) 축하가 마지막이었으며, 후에는 쓰시마가 마지막)이 많은데, 이들은 에도의 서민들이 실제로 볼 기회가 있었던 이국인이기도 했다. 하지만 그 이외의 나라 사람들의 인물도 그려서 당시의 이국인상은 나가사키에 국한되지 않고 미세모노[見世物, 제례행렬, 접시 그림, 담배 싹지 끈에 다는 세공품과 같은 공예품에도 그려져 있다. 또 가부키나 읽을 거리로서의 이국이야기가 많아 바킨[馬琴]의 진세츄유미하리즈키[椿説弓張月: 에도 후기의 소설]의 위조(為朝)나 아사히나[朝比奈]의 섬유람, 고쿠센야[国姓爺]의 와토나이[和藤内]와 같은 이국 이야기가 주위에 넘쳐났다. 그러나 미국인에 대해서는 대부분의 일본인들이 처음으로 보는 사람들인데, 고카[弘化] 3년의 비틀 내항이 미국을 이식하는 첫 기회였을 것이다. 18세기 말부터 종종 내항해 온 러시아인들의 모습은 나가사키에의 네덜란드인을 바탕으로 그려 서양풍의 인물도가 되어버렸다. 서양계 외국인에 대해 그때까지 나가사키에를 본으로 삼아 그려 온 것이다. 이러한 이국인물상의 흐름으로 본다면 페리 일행의 인물상도 나가사키에를 근거로 한 서양풍의 인물상이 된 것이 당연하다. 하지만 페리 일행의 미국인상은 나가사키에의 인물상과는 다른 모습이 되었다. 자세히 보면 나가사키에의 표현에서는 서양인의 머리가 곱슬머리로 그려져 있으며 수염은 그리지 않은 것이 많으나, 페리 일행의 초상에는 곱슬곱슬한 머리와 수염이 그려져 있다. 또 이전의 양풍 표현에서는 머리카락이 하얗게 전체적으로 하얀 인상을 주는 것이 많았음에 비해, 미국인은 머리카락도 검은색이 차지하는 비율이 많이 표현되었다. 복장도 네덜란드인이나 러시아인의 인물모습과는 다른 군복차림으로 그려져 있다. 가와라반의 화가가 중국인·조선인·네덜란드인·영국인·러시아인과 같은 그때까지 알고 이국인과는 다른 초상을 만들려고 시도한 것을 짐작할 수 있다. 페리 내항 후, 아직 이른 시기의 가와라반에서 미국인상은 페리 내항 이전의 세계도에서 볼 수 있던 인물상을 이용했으나, 반년 후에는 검은 군복 표현의 새로운 인물상으로 바뀌었다. 에도의 가와라반 상인이 중국인, 조선인, 네덜란드인, 영국인, 러시아인과 같은 그때까지 알고 있었던 이국인과 다른 초상을 만들려고 한 시도를 알 수 있다. 이러한 인물 표현에서 미국인에 대한 인식, 즉 '미국인은 그 이전에 내항한 이국인과는 다르다'고 하는 의식을 엿볼 수 있다. 증기선을 타고 나가사키가 아니라 에도 근해에 내항한 페리함대의 처사나 그에 대한 막부의 대응도 종전의 이국인 내항 때와는 달랐다. 새로운 미국인상은 서민들이 미국을 종전에 알고 있던 나라들과 구별·식별하여 구체적으로 인식하고 있었음을 말해 준다.

가와라반의 보도는 이 '다르다'고 하는 점을 당시 서민들이 인식하고 있었음을 보여주고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가와라반이 그 차이에 대한 인식을 더 확산시켰다고 말할 수 있겠다.

넷째는 세 번째에서 본 봐와 같이 네덜란드인·러시아인과 미국인과의 구별하는 의식을 볼 수 있었던 반면, 전통적인 이국인 표현, 특히 중국적인 형체가 많이 이용되었던 것에서, 미국인을 일본인과 다른 인물, 즉 외국인(당인, 도진[唐人])이라고 생각한 의식도 뿌리 깊었다는 것이다. 미술사 연구자들로부터 이국을 표현할 때 종종 중국형 형체를 사용하는 일을 지적 받고 있다.¹¹⁾ 그리고 완성된 것은 실제의 중국인과는 다른 이미지로서의 이국인, 혹

은 상징으로서의 이국인인 당인(도진[唐人])이다.

당인 이미지의 형성은 당인을 가리키는 기호화를 초래했다. 흑선가와라반의 미국인물의 표현에 당인상이나 당인을 나타내는 기호가 사용된 것에서 당인 표현이 강하게 정착해 있었던 이국인 표현이었음을 엿볼 수 있다. 그 경우 미국인물에서 미국이라는 나라가 갖는 임팩트는 사라지고 일본 이외의 나라들 중 하나에 지나지 않는 것이 된다. 새롭게 인식된 미국도 종래부터 가져 왔던 세계상에 포함시켰는데, 그것은 당시 일본인이 지닌 세계관을 반영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미국인으로서 나라별로 생각하는 세계관과 일본과 그 이외의 이국이라는 틀로 생각했던 세계관이 존재했다고 할 수 있겠다.

‘당인(도진[唐人])’이라는 말을 소재로 한 교카몬도[狂歌問答]를 쓴 흑선가와라반이 전해지고 있다.

問：「▲日本ハきりもことハもしらぬのか あめりか人を毛とう人とハ」

(일본은 의리도 말도 모르는가. 미국인(아메리카진)을 털난 당인(게도진[毛唐人])이라고 하다니)

答：「●唐人ハから人ばかりいふでなし 外(くわ)異(い)十(じゅう)ハミんな十人(とうじん)」

당인(도진[唐人])은 중국인(가라비토)만을 가리키는 것이 아니라 이국사람(外(くわ)異(い)十(じゅう))은 모두 당인(도진[唐人])이다.

이 교카의 전제에는 당시의 일본인들이 미국인을 외국인(唐人)으로 표현하고 있다는 인식이 있으며, ‘唐人’이란 ‘가라비토’, 즉 중국인만을 가리키는 것이 아니라, ‘外(くわ)異(い)十(じゅう)’ 즉, 이국 사람은 모두唐人이라고 한다. 이는 당시 서민들이 갖고 있던 ‘미국인도 외국인(唐人)’이라고 하는 감각을 반영한 것이며, 이는 공통관념이 되어 있었다고 할 수 있겠다.

VII. 맺음

에도의 서민들은 가와라반이라는 매체를 통해 페리 내항에 관한 다양한 정보·지식·이미지를 입수했다. 증기선도와 인물도의 검토를 통해 확인한 바와 같이, 그들은 페리 내항 이전부터 해외정보·지식·이미지를 바탕으로 두고 새로운 증기선과 미국인의 이미지를 만들었다. 가와라반의 초상화는 보다 새로운 이미지의 제시에 역점을 두고 있으며, 거기서는 정보의 진위 보다도 얼마나 ‘비슷하냐’가 중시되었다. 흑선가와라반은 에도의 서민들이 입수한 페리 내항의 정보를 보여 줄 뿐만 아니라 그들이 습득하고 있던 해외정보·지식·이미지들조차도 현재의 우리들에게 보여주는 사료(史料)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11) 사카모토 미츠루[坂本満]씨는, 예로부터 일본의 최대 관심의 대상이었던 외국은 중국이므로 일본의 화가들이 중국에 관해 갖고 있는 형체의 레퍼토리가 많으니, 달리 의거할 데가 없는 경우에는 화가들이 보지도 못한 남만인들의 풍속을 그럴 때에도 중국적인 정경으로 표현하는 것은 오히려 당연하다고 말하고 있다. 『일본의 미술·남만병풍』 사카모토 시즈쿠[坂本満, 시분도[至文堂], 1977년.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Squadron of Commodore Perry for Common People of Edo: Seen through Woodprints *Kawaraban*

TANAKA Yoko

Introduction

In 1853 and 1854 the expedition from the American Squadron under 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 including steamers, reached Uraga of Edo (modern Tokyo) bay. How did common people living in Edo know this fact? I tr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considering woodprints called *kawaraban* [illegal publications sold by events such as fires, earthquakes, murders, etc.]. As *kawaraban* was a popular and cheap commodity, it influenced a large part of the Edo population and reflected the interests and tastes of commoners.

1. Facts and Historiography

Perry's Squadron first arrived in Uragawa on July 8, 1853, and then came back to Uraga on February 11, 1854. When Commodore Perry approached Edo bay, the news was immediately reported to the shogunate in Edo. His ships stayed in Edo bay for 9 days in 1853 and about 6 months in 1854. Rumors of the arrival of the foreign ships prompted a hug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kawaraban*, which I consider to be a specific category. I call this category *kurofune kawaraban* in this talk. *Kurofune*, literally translates as "black ship(s)", meant "Western ship(s)" in the 16th-19th century. Now we use this word specifically for the squadron under Perry. The category of *Kurofune kawaraban* has not been examined sufficiently.

2. Production and Peddlery of *Kurofune Kawaraban*

I have found more than 1000 extant copies of 370 types. I suppose more than 100,000 *kurofune kawaraban* to be printed representing the strong interest of Edo commoners regarding Commodore Perry's arrival.

According to my examination, the first print had already appeared during his first stay and the publication continued for a whole year. I also found out that a low class of samurai was engaged with carving blocks as by-work. *Kurofune kawaraban* were peddled on the streets and secretly sold in shops, illegally.

3. Categories of *Kurofune Kawaraban*

Kurofune kawaraban can be divided into (1) the American side information about Commodore Perry's Squadron, (2) the Japanese s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sponse of the shogunate, (3) amusing

prints of various things relating to Commodore Perry's visit.

- (1) There are around 100 extant types of the first category, and it shows images of the Perry Squadron such as the steamships, Commodore Perry himself and his party's appearances, their belongings, "American" words, the gifts to Japan by America, the sight of their landing on Yokohama.
- (2) There are some 130 extant types of the second category, namely 100 types on the guarding force deployed along the Edo bay, 20 types list the presents from the shogunate to America, and 10 types of public notices for inhabitants of Edo.
- (3) Amusing prints consist of about 120 kinds. They picked up various matters concerning Commodore Perry's arrival as a main subject for word plays, puzzles, literal and pictorial parodies, etc. More than 70% are word plays, and many of them are comical poems(*kyōka*).

As mentioned above, vast numbers of various prints of *kawaraban* were issued. I think the people got various knowledge.

Since Commodore Perry's arrival,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 countries had dealt with their ships and people, and were sometimes accompanied by lists of their vocabulary, similar concerns can be seen in the *kurofune kawaraban* as well.

4. Printes of Steamships

"Amerika jōkisen no zu"(Illustration of an American Steamship) is the *kawaraban* mad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rst arrival in 1853. This was drawn based on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of a Dutch ship which Edo people had in those days.

However, we also find something new here two wheels and the smoke from the chimney rising violently. A steamship was recognized as a strange Dutch ship with wheels and an enormous quantity of smoke for Edo people.

This image, however, changed greatly a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visit by Commodore Perry in 1854. On "Ikokusen no zu" (Illustration of Foreign ships), a steamship rushes and cuts wind with its flags with smoke yielding backward and its sails taken in. This figure focuses on the function of the steamship indicating its high speed without wind.

Kawaraban tells us that the Edo people's recognition of American ships changed greatly from a ship similar to a Dutch one to a ship with surprising functions.

5. Prints of the American

The most abundant motif of *kawaraban* was a figure or figures of the Americans, and it contains certain similarities. *Kawaraban* spread images of the American out to people who did not actually see the Americans.

When Commodore Perry visited the second time, a new pattern of American figure(s) was created and accompanied by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foreigners.

Many portraits of Perry were drawn in the style of "Kita Amerika Kōwa Seijisyū Jōkan Sinzō no Utsushi"(The Real Portrait of an Offic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gure often wore a black hat and a black coat, and a white band crossing before the breast. The hair, eyebrows and beard were short and crinkled. It was emphasized that their color was not black. The hairstyle was different from the Japanese. Generally speaking, a hairstyle and a hat symbolizes a society which a person belongs to, so they are points which indicate a foreigner.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figure, impression of "Kinsa Zenken Kokuō Sisetu"(Plenipotentiary appointed by the king) is a typical *tōjin*. *Tōjin*, literally translated Chinese, meant foreigners in general. The images of *tojin* had various "non-Japanese" elem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Chinese, with straight black hair and wearing a gathered collar around the neck. This is an example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foreigners.

Conclusion

Edo people got various information, knowledge, images about Commodore Perry's arrival through the medium of *kawaraban*. *Kawaraban* spread a fresh impression of steamships and the Americans. But, these images were primaril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foreigners. The image of foreigners revised by new information such as *kurofune kawaraban* included not only novelty but also tradition. The emphasis was more that the image appeared exotic rather than whether it was right. "Exotic" meant "non-Japanese" rather than "American" in this context. In order to create an "exotic" figure, the Edo people used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images of *tōjin*.

Kurofune kawaraban shows us how common people in Edo accepted Perry's arrival, that is a great historical event. They did not confront or ignore the event but enjoyed it with their highest level of ability of amusement mixing their curiosity with faith in their own society.

キリシタンから西洋近代へ

-17世紀末～18世紀末オランダ風説書の主題-

■ 松方冬子 (東京大 schools) ■

キリシタンから西洋近代へ

－ 17世紀末～18世紀末オランダ風説書の主題 －

松方冬子(東京大 schools)

〈目 次〉

- I. 「暹羅(シャム)風説」、1690～1715年
- II. 「彼等は何でも信じる」：ベンガルとセイロン、1758～1766年
- III. フランス大革命とナポレオン戦争、1794～1817年

1641年江戸幕府は、日本にいるオランダ人全員に平戸から長崎への移住を命じ、オランダ船が長崎以外の港に来航することを禁止した。それと同時に、オランダ人に対してキリシタン(ローマ・カトリック教徒、オランダ語の史料には「ポルトガル人やスペイン人」と書いてあるので、そのように通訳されたのであろう)の日本渡航に関する情報を提供するように命令した。幕府は、情報提供を怠っていたことが、後日明らかになった際には、オランダ船の日本渡航を禁止する、として、この情報提供が、日本で貿易をするための最重要の条件の一つであることを強調した。

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の日本商館長は、これを受諾した。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にとって、情報提供の命令は、むしろ歓迎すべきものであったからである。オランダ人は、この命令を受け取る以前から、自分たちの貿易の競争相手であるポルトガル人やスペイン人を日本貿易から排除するために、彼らに関する情報を平戸藩や幕府に流していた。また、この情報を伝え聞いた、バタヴィア(現インドネシア、ジャカルタ)にいる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の東インド総督は、中国ジャンク船を日本貿易から追い出すために、この命令を利用しようと考えた。

この命令は、毎年オランダ商館長が貿易許可のお礼を言うために江戸に旅行する際、江戸城で申し渡された。命令の内容は、何度か改定された。1666年から、幕府は海外の情報を書面で提出するように命じた。それを受けて、長崎のオランダ通詞は、オランダ人からの聞き取りをもとに、「風説書」と呼ばれる和文の文書を作成し、オランダ商館長の署名を添えて、江戸へ送るようになった。また、同じ頃から、オランダ人は幕府の命令を、ポルトガル人やスペイン人だけでなく、「ヨーロッパ及び東インド」の情報を提供することだと理解するようになり、様々な情報を伝えるようになった。

17世紀を通じて、オランダ風説書の最も重要な主題は、カトリック勢力の動きであった。特に、宣教師の日本渡航や日本に対する敵対行為・使節の派遣などは、日本側にとってもオランダ人にとっても必ず報じられ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内容であった。

しかし、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ポルトガル人とスペイン人の勢力は、17世紀半ばまでに、衰えていった。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は、1641年にポルトガルからマラッカ(現マレーシア、ムラカ)を、1642年にスペインから台湾のキールン(基隆)を奪取した。ヨーロッパでは、1640年にポルトガルが勢力の弱まったスペインの支配下から独立を宣言、1641年にはスペインとの戦争を有利にするため、ポルトガルとオランダとの間で10年間の休戦協定が結ばれた。1648年のウェストファリア

条約によって、スペインはオランダ共和国の独立を正式に承認した。ポルトガルはマカオを、スペインはフィリピンのマニラを根拠地に貿易を続けたが、もはや往時の勢いはなかった¹⁾。

I. 「暹羅(シャム)風説」、1690～1715年

1681年に清朝は三藩の乱を鎮圧し、1683年には台湾の鄭氏政権が清に降伏した。これを受けて、清朝は展海令を布き民間商船の海外渡航を許したため、大量のジャンク船が長崎に殺到した。従って、1685年以降、東アジア海域は安定と平和の時代を迎え、幕府にとっても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にとっても、もはやカトリック勢力は恐れる相手ではなくなったと考えるのが一般的である²⁾。

しかし、私はオランダ風説書の中に、1690年から1715年まで「暹羅(シャム)風説」と呼ばれるものが見出されることに着目したい。シャム情報だけを扱ったオランダ風説書は、1673年から見られる。「暹羅風説」という表題は持たないものの、鄭氏政権がシャムの日本貿易を牽制するためシャムに手紙を送ったという内容である。長崎のオランダ商館の史料中、次にシャムに関する情報提供への言及が見られるのは、1683年の商館長の公務日誌においてである。2人のオランダ通詞が商館を訪れ、シャムからの報せを聞き取り、以下のような内容を書き取った。すなわち、清朝によって南中国から駆逐された中国人の一軍が、カンボジアを攻撃して占領し、カンボジア王は避難して行方不明になった、と。通詞たちは、商館長がこの情報をもっと早く伝えなかったため江戸に送る風説書に書き込めなかったことに対する、長崎奉行の不快感を伝えた³⁾。これを受けて、オランダ商館長は翌年から、シャムの情報をオランダ船の到着直後に伝えるように努めた⁴⁾。

なぜ、シャムからの情報だけが、他の情報とは別に幕府に報告されたのだろうか？

シャム王のナライ(在位1656～1688年)は、国際貿易にも外交にも熱心で、外国商人を喜んで迎え入れるとともに、外交使節の派遣受け入れにも積極的だった。1662年にパリ外国伝道会の宣教師が初めてシャムに入国した。彼らは、フランス東インド会社とフランス王ルイ14世にシャムでの宣教活動の援助を要請した。1680年に、フランス東インド会社がアユタヤに商館を建設、1680年代にはシャムの使節が2回フランスを訪れ、フランスの使節を伴ってアユタヤに帰朝した。ナライ王は、フランスと結びついたギリシア人のフォールコンを寵愛しており、フランスの使節は、ナライ王がローマ・カトリックに改宗す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たが、仏教国であるシャムの王が改宗することにはありえなかった。

1688年に、ナライ王が嗣子なくして死ぬと、有力な配下の一人ペトラチャーが王位を篡奪した(在位1688～1702年)。フランス東インド会社の軍隊は排斥され、後に残ったフランス人あるいはカトリック教徒は迫害された。ペトラチャーと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は、フランスに対する敵意という点で一致していた。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は、シャム王との条約により、シャム産の蘇木と鹿皮を独占的に日本へ輸出する権利を得る代わりに、シャムのジャンク船が日本産銅のシャム輸入権を独占することを認め、またシャムの王室ジャンク船を外洋でできるかぎり保護するこ

1) 上記に関しては、松方冬子『オランダ風説書と近世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1章、第2章による。

2) 例えば、羽田正『東インド会社とアジアの海』(講談社、2007年)342～343頁。

3) 長崎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1683年8月24日条(オランダ国立中央文書館所蔵日本商館文書〈以下、NFJ〉96)。

4) 長崎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1684年8月25日条(NFJ97)。

とを約束した⁵⁾。

1687年末、ポルトガル人宣教師が日本に潜入した。また、1688年イギリス東インド会社は、通商条約の締結のための手紙をシャムの新王ペトラチャーに送り、オランダ東インド総督は、その写しを日本商館に送った⁶⁾。1688年11月イギリスで名誉革命が起こり、オランダのオラニエ公ウィレム3世がイギリス国王として迎えられたが、オランダからバタフィアへの通信には数ヶ月を要したため、1688年中、オランダの東インド総督はイギリスを敵と見做していた。そのため、東インド総督は、イギリス東インド会社からシャムへの遣使は脅威だと認識した。

1688年10月、オランダの日本商館長は、東インド総督への手紙の中で以下のように書いている。すなわち、長崎奉行はフランス人やポルトガル人の宣教師がシャムから中国に入ることを心配しており、シャムや他の場所におけるフランス人やポルトガル人の「悪い」企てを恐れている、しかし、江戸の幕府の高官たちは商館長が江戸に旅行した際、ヨーロッパ人の動きについて何も質問しなかった、と⁷⁾。1689年7月付の返信の中で、東インド総督は、幕府がヨーロッパ情勢に無関心な理由について、疑問を呈しつつ、名誉革命と9年戦争の勃発を含むヨーロッパ情勢を知らせた。そして、長崎商館長に、イギリスの前王ジェイムズ2世やフランスのルイ14世の行動は残酷だと、日本人に告げるように指示した⁸⁾。

日本人の要求に応えるため、1689年から1710年ごろまで、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の長崎商館長は、シャム商館長に対して、シャム情勢、特にフランス系やポルトガル系のカトリック教徒について報せてくれるように、要請した。それに応じて、シャム商館長は、同地に関する情報を、バタフィアからシャム経由で日本に向かうオランダ船に託して伝えた。既に述べたように、最初の「暹羅風説」という文書が作成されるのは、1690年である。

II. 「彼等は何でも信じる」：ベンガルとセイロン、1758～1766年

1758年11月12日、日本商館長ヘルベルト・フルメウレンは、オランダ東インド総督のヤコブ・モッセルに以下のような手紙を書いた。

[前略：オランダ人から日本人に説明した理由] ベンガルでのイギリス人とベンガル人との争乱によって、ベンガルの絹織物は、宮廷 [江戸の幕府] への贈物用にも、ましてや販売用にはなおさらのこと、手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なぜなら、織手たちが逃亡したので、それによって同地の織物業 [織場] が沈黙したからである。そこで、同地での絹の集荷がほとんど止まり、それによって我々は結果として、十分な量の貿易商品を運んでく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た。[中略]

これらの理由は、今や、かなり説得力のあるものであり、日本人のように、他の国とあらゆる通交関係の外に暮らしていて、オランダ人が言うことをほとんど何でも信じる

5) 'Rulansilp, Bhawan,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Merchants at the Court of Ayutthaya: Dutch Perceptions of the Thai Kingdom, c. 1604-1765*, Leiden/Boston: Brill, 2007, pp. 111-179.

6) 1688年5月7日付日本商館長Hendrick van Buijtenhem宛オランダ東インド総督Johannes Camphuijs書翰(NFJ319)。

7) 1688年10月12日付東インド総督Johannes Camphuijs宛日本商館長Hendrick van Buijtenhem書翰(NFJ319)。

8) 1689年7月1日付日本商館長Cornelis van Outhoorn宛東インド総督Johannes Camphuijs書翰(NFJ320)。

ような人々にとっては、オランダ人が望むことのすべてが完全に、受け入れられることである。[中略] 彼らは、そこで、以上のような話のなかに [オランダ人にとって望ましい] 効果的な考察が含まれていることを発見する。すなわち、ベンガル人たちがこのような強制をイギリス人から押し付けられたのは、ただ以下の理由による。すなわち、彼らがあまりに多くの外国人の入国を彼ら自身の国に許してしまったからであり、彼ら [外国人] は彼ら [ベンガル人] を支配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かし、反対に、彼ら [ベンガル人] がオランダ人とだけ付き合っていたならば、このようなことは起こりえ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という考えである。このような [日本人の] 意見に、我々 [オランダ人] は、全く異議を唱えることはしない。[日本人は] 今やこれと、諸外国から災いを招かない彼ら自身の安全 [な状態] を比較して、彼等はそれ [安全な状態] が確かに我々との貿易の継続にかか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それゆえ、彼らはこのシステムをますます維持しようと努力している⁹⁾。

前年1757年に西ベンガルでブラッシーの戦いがあり、イギリス東インド会社の軍隊が、ベンガル太守とフランス東インド会社の連合軍を破った。両者の対立は、ヨーロッパの七年戦争の動向とも絡んで長い間続いていたが、結局この戦いと、その後イギリス東インド会社がベンガルで獲得した徴税権を梃子に、イギリスのベンガルでの優勢が確定する。

ブラッシーの戦いを日本人に伝えた際、オランダ商館長の主張の中心は、それが原因でベンガル生糸の輸入量が減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あったようである。しかし、この言い訳は別の効果をもたらした。長崎のオランダ通詞は、ヨーロッパ人のなかでオランダ人としか付き合っていない日本のありかたを、外国との紛争を防ぐ良い状態だと認識し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ブラッシーの戦いの報せは、オランダ風説書に書き込ま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つまり、通詞や長崎奉行は、この情報を江戸に伝える必要がない、あるいは伝えないほうが望ましい、と判断したことになる。おそらく前者であろう。少なくとも通詞は、この情報に接して幕府の政策の正しさを証明するものと判断しているので、伝えないほうが望ましいと考える理由は思いつかない。従って、幕府は、大英帝国に代表される西洋近代の帝国主義の最初の報せを聞く機会を逃したことになる。

第一章との関わりで言えば、オランダ風説書は、1765~1766年のビルマ軍のシャム侵入とアユタヤ王朝の滅亡にも触れていない。18世紀の初めに、日本人が強い興味を抱いていたシャムは、もはや関心の外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しかし、同じ時期のセイロン(現スリランカ)のできごとは、1765~1766年のオランダ風説書の中に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¹⁰⁾。

1765年、セイロン島において、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は、キャンディ王朝の王キルティ・スリ・ラジャ・シンハとの戦いに勝利し、王都を占領した。そして、有利な条件で講和を結んだ。1766年の条約により、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は、国王領で自由にシナモンを採取する権利を手に入れ、セイロン島の沿岸部を領土に組み込み、もはやキャンディ王の前で王国の作法に従って行動することをやめた¹¹⁾。これは、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が、従来とは方針を変え、貿易の条件を有利に

9) The letter from Herbert Vermeulen, Japan to Jacob Mossel, the Governor-General in Batavia, Nov. 12, 1758 (NFJ493). Meijlan, German F., *Geschiedkundig Overzicht van den Handel der Europezen op Japan* [ヨーロッパ人の日本貿易史概観], Batavia, 1833, 181-182頁も参照のこと。

10) 法政蘭学研究会編『和蘭風説書集成(下)』(日蘭学会、1979年)41頁、45~46頁。

するだけでなく、領土の拡大にも乗り出した点で、注目される。

オランダ風説書は、オランダ人がセイロンの領主との戦いに勝利し、首都を占領し、講和を結んだ、と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るが、条約の細部には触れていない。恐らく、オランダ商館長が伝えようとしたことも、通詞や長崎奉行、ひいては幕府が理解したことも、オランダがアジアで十分その勢力を保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のみであったのだろう¹²⁾。1766年のセイロン情報は、西洋近代の帝国主義の最初の予兆として、江戸の幕府に理解される可能性もあったのであるが、結果的には伝統的な一連の情報の一つとして埋没してしまった。

以上見てきたように、18世紀の半ばは、ある意味において、オランダ風説書の黄金時代である。すなわち、中国以外の情報を幕府に提供する経路は、ほぼオランダ風説書に限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そのため、オランダ商館長が、日本人は我々の言うことをほとんど全て信じる、と感じるほどであったという意味においてである。ジャンク船が東南アジアから来航しなくなったこと、ポルトガル人やスペイン人などの宣教師の日本への密入国が途絶えたこと¹³⁾、などが理由である。

それは同時に、幕府を初めとする日本人が、そして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が、18世紀の初めには感じていた、カトリックの勢力が日本に再び及ぶ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恐怖がもはや消滅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た。西洋近代の新しい働きかけは、日本ではいまだ脅威だとは認識されていなかった。海外に恐れるべきものがない以上、日本人にとって、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に海外の情報を提供させる積極的な理由は、ほとんどない。オランダ人側でも、追い落と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競争相手がなければ、情報を提供する動機は、相対的に減少した。従って、この時期のオランダ風説書は、概して短く、内容も薄い。18世紀の半ばは、オランダ風説書にとっての黄金時代である同時に、停滞の時代でもあった。アユタヤ王朝の滅亡やプラッシーの戦いなど、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大変動が伝えられていないことが、それを象徴している。

Ⅲ. フランス大革命とナポレオン戦争、1794～1817年

既に1937年に板沢武雄は、多くのオランダ風説書が、英蘭戦争における敗戦などオランダにとって不利と思われる情報をも収録しているのに対し、フランス大革命の後数年間のオランダ風説書の内容が、事実と相当異なっ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た¹⁴⁾。板沢が言及した風説書の内容を改めて紹介しよう¹⁵⁾。

フランス大革命への言及が最初に見られるのは、1794年の風説書である。ヨーロッパの報せでも、1年後には風説書で言及されるのが通例であるが、大革命の報知には5年近くを要している。バステューユ牢獄の陥落の段階では、歴史的な大事件が起きたとは認識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1794年の関連部分を現代語に訳すと、

11) この条約については、Schrikker, Alicia, *Dutch and British colonial intervention in Sri Lanka, 1780-1815: Expansion and Reform*, Leiden/Boston: Brill, 2007, pp. 39による。

12) 残念ながら、この情報を提供するに至ったオランダ側の意図や、日本側の反応についての史料は、現在のところ見つかっていない。

13) 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2002年)343頁参照。

14) 板沢武雄『オランダ風説書の研究』(日本古文化研究所、1937年)。のちに、解説部分が、『日蘭文化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59年)に再録された。

15) 前掲『和蘭風説書集成(下)』94、127、140頁に収録された風説書を現代日本語に直した。

フランス王の家来が徒党を組み、王と王子を殺し、国中で騒乱が起きた。オランダを含む周辺の国々の軍隊がフランスに侵入し、戦争になった。

と書かれている。1804年には、以下のような記事が風説書に見られる。

フランス王の弟ルイ・ナポレオンがオランダ王家の養子となり、王位に就いた。

1817年には、

フランス王の弟ルイ・ナポレオンは、オランダ王家の養子となり、王位に就いていたが、死去した。そのため、前の王の親戚であるオラニエ公が王位を継承し、国家統治は30年前の状態に戻った。

と書かれている。

これらは、オランダ風説書の歴史の中でも際立った情報操作の例である。実際には、フランス革命軍が1794年にオランダに侵入、翌年にはオランダ全土を制圧した。その結果、200年続いたオランダ共和国が崩壊して、親フランス派のバターフ共和国が成立し、総督オラニエ公ウィレム5世はイギリスに亡命した。1797年イギリスがバターフ共和国に対して宣戦布告、亡命中のオラニエ公は、オランダの海外拠点に対してイギリスの保護下に入るように命令を発した。その中で、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は1799年に切れた特許を更新することなく解散し、資産と債務はバターフ共和国が引き継いだ。フランス皇帝として即位したナポレオンは、1806年弟のルイをオランダ王とした。しかし、ルイが大陸封鎖令を厳格に守らなかったため、1810年オランダをフランス帝国に併合した。これにより、オランダという国は一時消滅した。1815年、ナポレオンの没落に伴い、ウィレム5世の子が、オランダ王ウィレム1世として即位した。

当時、日本商館長を務めていたヘンドリック・ドゥーフは、後任者が来ないため、1803年から1817年まで同職にあった。彼の在任中に、ロシア使節ニコライ・レザーノフが長崎に来航したり(1804年)、マカオ攻撃中のイギリス艦隊の1隻フェートン号が長崎湾に侵入したり(1808年)という事件が起きた。ここでは、これらの事件の詳細や、日本・オランダ・ロシア・イギリスの関係について深く立ち入って考察することはしない¹⁶⁾。ただ、第4次英蘭戦争とそれに続くナポレオン戦争の影響で、オランダがほとんど長崎へ船を派遣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状況下で、長崎奉行や通詞たちはロシア船やイギリス船といった新しい情報源に出会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けを指摘しておきたい。もちろん、長崎の役人たちは、無条件にロシア人やイギリス人の言うことを信じたわけではないが、彼らから聞いた情報に基づき、ドゥーフは国際情勢について、長崎奉行の名のもとに通詞から厳しく質問された¹⁷⁾。例えば、「オラニエ公は現在どこにいるか」といった質問である。ドゥーフは、夥しい質問に何とか返答したが、数十年間オランダがほぼ独占していると信じられてきた日本への情報提供について、新しいライバルが出現したことを思い知らざるを得なかった。彼は、オラニエ公が亡命中であるこ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の独立、などについて、彼が知っている限りで答え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ただし、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が解散したことについ

16) この時期の日本を取り巻く国際情勢については、例えば、横山伊徳「18—19世紀転換期の日本と世界」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日本史講座七 近世の解体』(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を参照。レザーノフの来航時の詳細については、ニコライ・レザーノフ著、大島幹雄訳『日本滞在日記、1804-1805』(岩波文庫、2000年)など参照。フェートン号事件の背景や意義については、宮地正人「ナポレオン戦争とフェートン号事件」『幕末維新期の社会的政治史研究』(岩波書店、1999年)が詳しい。

17) 日蘭学会編『長崎オランダ商館日記 四』(日蘭学会、1992年)。

ては語らなかったし、イギリスとロシアが同盟しているという「仮説」で幕府を説得しようとした。従って、幕府がこれによって同時代の世界情勢を直ちに理解したと結論するのは妥当ではない。ただ、後に「帝国主義」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る西洋の新しい動きに注目し始めたにすぎない。

本章を簡単にまとめてみよう。第一に、この時代、オランダと長崎のオランダ人は、江戸時代を通じて最大の危機に直面しており、そのため日本での立場を維持するために、情報を操作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第二に、にもかかわらず、ロシア船やイギリス船の来航で、日本人が新しい情報源を得たことにより、情報操作は再び困難になり始めていた。第三に、オランダ人にとっても、幕府にとっても、最大の関心事は、ポルトガルやスペインから、大英帝国に代表される近代化しつつある西洋列強へと移り始め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おわりに

以上述べてきたように、オランダ風説書の主題は、18世紀を通じて、ローマ・カトリック勢力から西洋近代へと、変化していった。

オランダ風説書が始まったとき、その目的は、オランダ人にとっても、日本人にとっても、スペインとポルトガルというイベリア勢力を日本とその近海から排除することにあった。幕府にとってはキリシタン禁制のため、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にとっては日本貿易の利潤を上げるためにそれは必要であった。

1680年代から1710年代に見られた「暹羅風説」は、この目的のためのオランダ風説書の最後の成果物であったといえよう。この段階では、幕府は、オランダ人が提供した海外情報の内容を、中国・東南アジアから来航するジャンク船や日本に潜入しようとする宣教師などから聞いた情報と比較して検討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った。逆に言えば、オランダ風説書は、対抗情報源の存在により、事実在即したかなり詳しい内容となっていた。すくなくとも長崎の役人たちは東南アジア情勢に注目していた。一方で、17世紀の末には、将軍を初め、江戸の幕府は、キリシタン問題や対外的な問題についての関心を失っていた。長崎のオランダ商館付きの医師として来日したエンゲルベルト・ケンペルが、日本を「閉じた国」だと観察したのは、まさに1690年ごろのことである。いわゆる「鎖国」が、幕府も無自覚のうちに形成されつつあった。

18世紀の半ば、オランダ人は、情報提供に関してライバルがいなかった。ジャンク船は、もはや中国からしか来航せず、東南アジアの知らせをもたらすことはなかった。今日で言うベトナム以西の情報は、オランダ人が独占的に日本に供給した。そして、そのことを長崎の役人でさえ問題だ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この時期の主たる勢力争いの舞台は、ベンガルやセイロン島など南アジアであり、幕府の伝統的な情報収集範囲あるいは興味の外であった。幕府は、東の間の平穏を満喫していた。

フランス大革命とナポレオン戦争が起きたとき、長崎のオランダ人たちは、大きな困難に直面した。長崎商館自体が、オランダ船の不着により、ヨーロッパやアジアの情報から取り残され、何が起きているの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だった。彼らは知っている情報をつなぎ合わせ、必要に応じて自分たちの都合の良いように改変して、日本人に伝えたが、ロシア船やイギリス船が、日本人への新たな情報提供者として現れた以上、全てを嘘で固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一方、幕府は、李氏朝鮮、琉球など伝統的な経路で伝えられる情報が、訪れつつある新たな危機に対応するには不十分であると気づくことになった。西洋近代の脅威は、まだ東アジアでは現実的な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が、幕府は意識して、「鎖国」体制を維持しようと努めるようになり始めた¹⁸⁾。

18) 藤田覚『近世後期政治史と対外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크리스찬에서 서양 근대로

-17세기말~18세기말 네덜란드 풍설서의 주제-

松方冬子 (東京大學校)

〈목 차〉

- I. 「시암(暹羅) 풍설」, 1690~1715년
- II. 「그들은 무엇이든 믿는다」: 벵골과 실론, 1758~1766년
- III. 프랑스 대혁명과 나폴레옹 전쟁, 1794~1817년

1641년에도 막부는 일본에 거주하고 있는 모든 네덜란드인에게 히라도(平戸)를 떠나 나가사키(長崎)로 이주할 것을 명령, 네덜란드 국적의 배가 나가사키 이외의 항구에 내항하는 것을 금지했다. 그와 동시에 네덜란드인에게 기리시탄(16세기 일본에 들어온 로마 가톨릭 계의 기독교: 옹긴이) (로마·가톨릭 교도, 네덜란드어로 된 사료에는 「포르투갈인이나 스페인인」이라 쓰여 있으므로 이처럼 통역되었을 것이다)의 일본 도항에 관한 정보를 제공하도록 명령했다. 막부는 차후에 성실히 정보 제공에 임하지 않은 사실이 밝혀지는 경우에는 네덜란드 선박의 일본 도항을 금지하겠다고, 는 말로 이 정보를 제공하는 행위가 일본에서 무역을 영위하기 위한 가장 중요한 조건 중 하나임을 강조했다.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의 일본 상관장(商館長)은 이를 수락했다. 이 정보 제공 명령은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의 입장에서는 오히려 환영할만한 것이었기 때문이다. 네덜란드인은 이 명령을 받아들이기 전부터 자신들의 무역 경쟁상대인 포르투갈이나 스페인 사람들을 일본 무역에서 배제하기 위해 그들에 관한 정보를 히라도 번(平戸藩)과 막부에 흘리고 있었다. 또한, 이 정보를 전해 들은 바타비아(지금의 인도네시아 자카르타)에 있던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의 동인도 총독은 중국의 정크선을 일본 무역에서 몰아내기 위해 이 명령을 이용하고자 했다.

이 명령은 네덜란드 상관장이 무역 허가에 대한 답례를 하기 위해 매년 에도를 여행할 때, 에도성으로부터 내려왔다. 명령의 내용은 여러 번 개정되었다. 막부는 1666년부터 해외 정보를 서면으로 제출할 것을 명했다. 이에 따라 나가사키의 네덜란드 통사는 네덜란드인 으로부터 들은 얘기에 근거하여 「풍설서(風説書)」라 불리는 일본어로 된 문서를 작성하여 네덜란드 상관장의 서명을 첨부하여 에도로 보내게 되었다. 또한, 네덜란드인들은 이 무렵 막부의 명령을 포르투갈인이나 스페인인들 뿐만 아니라, 「유럽 및 동인도」의 정보를 제공하는 것이라 이해하게 되면서 다양한 정보를 전하기 시작했다.

17세기를 통틀어 네덜란드 풍설서의 가장 중요한 주제는 가톨릭 세력의 움직임이었다. 특히, 선교사의 일본 도항이나 일본에 대한 적대 행위·사절 파견 등은 일본측이나 네덜란드측 모두가 꼭 필요로 하는 내용이었다.

하지만 포르투갈과 스페인 사람들이 동아시아에서 차지하는 세력은 17세기 중엽까지 점차 쇠퇴해갔다.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는 1641년에 포르투갈로부터 말라카(현, 말레이시아의 멜라카)를, 1642년에 스페인으로부터 타이완의 지룽(基隆)을 취탈했다. 1640년, 유럽에서는 포르투갈이 세력이 약해진 스페인의 지배로부터 독립을 선언하였고, 1641년에는 스페인과의 전쟁을 유리하게 만들기 위해 포르투갈과 네덜란드 간에 10년간의 휴전 협정이 체결되었다. 1648년에 체결된 베스트팔렌 조약에 따라 스페인은 네덜란드 공화국의 독립을 정식 승인했다. 포르투갈은 마카오를, 스페인은 필리핀의 마닐라를 근거지로 삼아 무역을 지속했지만 더 이상 예전의 영광은 누리지 못했다.¹⁾

I. 「시암(暹羅) 풍설」, 1690~1715년

1681년에 청나라는 삼번의 난을 진압했고 1683년에는 타이완의 정씨 정권이 청나라에 항복했다. 이후 청나라는 해양으로 뻗는다는 진해령(展海令)을 공포하고 민간 상선의 해외 도항을 허가했는데, 이로써 수많은 정크선이 나가사키에 쇄도하게 되었다. 따라서 1685년 이후, 동아시아 해역은 안정과 평화의 시대를 맞이했고 막부나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에게 가톨릭 세력은 더 이상 두려움의 대상이 아니라는 견해가 일반적이었다.²⁾

하지만 나는 네덜란드 풍설서 가운데 1690년부터 1715년 사이에 등장하는 「시암 풍설」이라 불리는 것에 주목하고자 한다. 시암에 관한 정보만을 다룬 네덜란드 풍설서는 1673년부터 존재했다. 「시암 풍설」이라는 표제를 채택하고 있지는 않지만, 정씨 정권이 시암의 일본 무역을 견제하기 위해 시암에 편지를 보냈다는 내용이다. 나가사키의 네덜란드 상관에 관한 사료 가운데, 시암 관련 정보 제공에 대한 다음 언급이 발견된 것은 1683년 상관장의 공무일지이다. 두 명의 네덜란드인 통사가 상관을 찾아가 시암 관련 정보를 들은 다음과 같은 내용을 남겼다. 즉, 청나라에 의해 남중국에서 쫓겨난 중국인 무리가 캄보디아를 공격하여 점령했으며 캄보디아 왕은 피난을 갔는데 행방불명이 되었다는 것이다. 통사들은 상관장이 이 정보를 늦게 전해 에도로 보내는 풍설서에 이 내용을 적지 못한 것에 대한 나가사키 봉행(長崎奉行)의 불만을 전했다.³⁾ 이 일이 있은 후, 네덜란드 상관장은 이듬해부터 시암에 관한 정보를 네덜란드 배가 도착한 직후에 전달하기 위해 노력했다.⁴⁾

그런데 어쩌서 여타 정보와는 달리, 시암 관련 정보만이 막부에 보고되었던 것일까?

시암의 나라이 왕(재위 1656~1688년)은, 국제무역과 외교 양 측면에 열의가 있던 인물로, 외국 상인을 흔쾌히 영입함과 동시에 외교 사절을 받아들이는데도 적극적이었다. 1662년에 파리외국전도회의 선교사가 최초로 시암에 입국했는데 그들은 프랑스 동인도회사와 프랑

1) 상기와 관련해서는 마쓰타카 후유코 『네덜란드 풍설서와 근세 일본』 (도쿄대학 출판회, 2007년) 제1장, 제2장에 따름.

2) 예를 들면, 하네다 마사시 羽田正 『동인도회사와 아시아의 바다』 고단샤, 2007년 342~343쪽.

3) 네덜란드 상관장 일기, 1683년 8월 24일(네덜란드 국립 중앙문서관 소장 일본 상관문서 <이하, NFJ> 96).

4) 나가사키 네덜란드 상관장 일, 1684년 8월 25일(NFJ97).

스의 왕 루이 14세에게 시암에서 선교 활동을 할 수 있도록 도움을 요청했다. 1680년에 프랑스 동인도회사가 아유타야에 상관을 건설, 1680년대에는 시암의 사절이 2회에 걸쳐 프랑스를 방문, 프랑스 사절을 동반하고 아유타야로 귀국하기도 했다. 나라이 왕은 프랑스와 연계된 그리스인 파울콘을 총애하였으며, 프랑스 사절은 나라이 왕이 로마·가톨릭으로 개종하리라 기대했으나 불교국인 시암의 왕은 개종하지 않았다.

1688년에 나라이 왕이 대를 이을 아들 없이 사망하자 유력한 부하 중 하나였던 페트랏차가 왕위를 찬탈했다(재위 1688~1702년). 프랑스 동인도회사의 군대는 배척을 당했고 남아 있던 프랑스인과 가톨릭 교도들은 박해를 받았다. 페트랏차와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는 모두 프랑스에 대한 적의를 가지고 있었다.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는 시암 왕과의 조약에 따라 시암산 소목(蘇木)과 사슴 가죽을 일본에 독점 수출할 수 있는 권리를 얻는 대신, 시암의 정크선이 일본산 동(銅)의 시암 수입권을 독점하도록 인정, 또한 난바다에서 시암의 왕실 정크선을 가능한 한 보호할 것을 약속했다.⁵⁾

1687년 말, 포르투갈인 선교사가 일본에 잠입하는 사건이 있었다. 또한, 1688년 영국 동인도회사는 통상조약을 체결하기 위한 서신을 시암의 왕인 페트랏차에게 보냈고, 네덜란드 동인도 총독은 그 사본을 일본상관으로 보냈다.⁶⁾ 1688년 11월 영국에서 명예혁명이 일어나 네덜란드의 오렌지공 윌리엄 3세가 영국의 국왕으로 추대되지만 네덜란드로부터 바타비아까지 이 소식이 전해지는 데는 수개월이 소요되었기 때문에 1688년 내내, 네덜란드의 동인도 총독은 영국을 적으로 간주하고 있었다. 때문에 동인도 총독은 영국 동인도회사가 시암에 사절을 파견하는 것은 위협적이라고 인식하고 있었다.

1688년 10월, 네덜란드의 일본 상관장은 동인도 총독에게 보내는 편지에 다음과 같이 쓰고 있다. 즉, 나가사키 봉행은 프랑스인이나 포르투갈인 선교사가 시암으로부터 중국으로 들어오는 것을 염려하고 있으며, 시암이나 타 지역에 관한 프랑스인이나 포르투갈인의 「나쁜」 계략을 두려워하고 있다. 하지만 에도 막부의 고관들은 상관장이 에도를 여행할 때, 유럽인의 움직임에 대해 아무런 질문도 하지 않았다, 는 것이 그 내용이다.⁷⁾ 1689년 7월에 보낸 답신에서 동인도 총독은 막부가 유럽 정세에 무관심한 이유에 대해 의문을 표하면서 명예혁명과 9년 전쟁 발발을 포함한 유럽의 정세를 전했다. 그리고 나가사키 상관장에게 영국의 전대 왕인 윌리엄 2세나 프랑스의 루이 14세의 행동은 잔혹하다는 사실을 일본인들에게 고하도록 지시했다.⁸⁾

일본인들의 요구에 응하기 위해 1689년부터 1710년경까지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의 나가사키 상관장은 시암의 상관장에게 시암의 정세, 특히 프랑스계나 포르투갈계 가톨릭 교도에 대해 보고해 줄 것을 요청했다. 이에 대해 시암의 상관장은 이 지역에 관한 정보를 바타비

5) Rulansilp, Bhawan,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Merchants at the Court of Ayutthaya: Dutch Perceptions of the Thai Kingdom, c. 1604–1765, Leiden/Boston: Brill, 2007, pp. 111–179.

6) 1688년 5월 7일 일본 상관장 Hendrick van Buijtenhem 수신 네덜란드 동인도 총독 Johannes Camphuijs 서한 (NFJ319).

7) 1688년 10월 12일자 동인도 총독 Johannes Camphuijs 수신 일본 상관장 Hendrick van Buijtenhem 서한 (NFJ319).

8) 1689년 7월 1일자 일본 상관장 Cornelis van Outhoorn 수신 동인도 총독 Johannes Camphuijs 서한 (NFJ320).

아에서 시암을 경유하여 일본으로 향하는 네덜란드 선박에 부탁하여 전하였다. 앞서 말했듯이 최초의 「시암 풍설」이라는 문서가 작성된 것은 1690년이다.

II. 「그들은 무엇이든 믿는다」: 벵골과 실론, 1758~1766년

1758년11월12일, 일본 상관장 헐버트·버물렌은 네덜란드 동인도 총독인 야곱·모셀에게 다음과 같은 서한을 보냈다.

[전략: 네덜란드인이 일본인에게 설명한 이유]벵골에서 영국인과 벵골인 간에 발생한 쟁란으로 인해 벵골의 견직물은 판매용은 말할 것도 없고 궁정[에도 막부]에 보내기 위한 것도 손에 넣을 수가 없었다. 왜냐하면, 직공들이 도망을 쳐서 현지의 직물업[직물 공장이] 생산을 중단했기 때문이다. 때문에 현지의 명주 집하가 거의 정지되었으며 그로 인해 우리는 결과적으로 충분한 양의 무역 상품을 운반할 수 없게 되었다. [중략]

이런 이유는 지금은 상당히 설득력이 있으며, 일본인처럼 다른 나라와 거의 모든 통교 관계를 갖지 않으며 네덜란드인이 하는 말을 대부분 무엇이든 믿는 사람들로서는 네덜란드인이 원하는 모든 것이 다 받아들여지는 것이다. [중략]

그래서 그들은 위와 같은 얘기 속에 [네덜란드인으로서는 바람직한]효과적인 고찰이 포함되어 있음을 발견한다. 즉, 벵골인들이 영국인들로부터 이렇게 강요를 당한 것은 오로지 다음과 같은 이유 때문이었다. 즉, 그들이 너무 많은 외국인의 자국 입국을 허가했기 때문이며, 그들[외국인]은 그들[벵골인]을 지배하고자 했다.

하지만 반대로 그들[벵골인]이 네덜란드인들과만 교류를 했다면 이 같은 일은 일어나지 않았을 것이라고 생각한다. 이 같은 [일본인의]의견에 우리[네덜란드인]는 일체 이의를 달지 않을 것이다. [일본인은]현재 이것과 다른 나라들로 인한 재난을 초래하지 않고 있는 그들 자신의 안전한 상태를 비교하며, 그들은 그것[안전한 상태]이 분명 우리들과 무역을 계속하기 위한 조건이라 생각하고 있다. 때문에 그들은 이 시스템을 앞으로도 계속 유지하고자 노력하고 있다.⁹⁾

전년도인 1757년에 서벵골에서 플라시 전투가 발발했는데, 영국 동인도회사의 군대가 벵골의 태수(太守)와 프랑스 동인도회사의 연합군을 격파했다. 이 둘의 대립은 유럽의 7년 전쟁과도 맞물려 장기간 계속되었으나 결국 이 싸움과 그 후 영국 동인도회사가 벵골에서 획득한 조세 징수권 덕에 영국은 벵골 지역에서 우위를 다지게 되었다.

플라시 전투를 일본인에게 전할 당시, 네덜란드 상관장이 주로 주장한 것은 그것이 원인이 되어 벵골 생사(生糸)의 수입량이 감소했다는 내용인 것으로 보인다. 하지만, 이 변명은 다른 효과를 가져왔다. 나가사키의 네덜란드 통사는 유럽인 가운데 네덜란드인하고만 교류를 하는 일본의 행태를 외국과의 분쟁을 막는 바람직한 상태라고 인식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9) The letter from Herbert Vermeulen, Japan to Jacob Mossel, the Governor-General in Batavia, Nov. 12, 1758 (NFJ493). Meijlan, German F., *Geschiedkundig Overzicht van den Handel der Europezen op Japan* [유럽인의 일본 무역사 개관], Batavia, 1833, 181-182쪽도 참고.

있다. 네덜란드 풍설서에는 플라시 전투에 관한 보고는 없었다. 즉, 통사나 나가사키 봉행은 이 정보를 에도에 전할 필요가 없거나 혹은 전하지 않는 것이 좋겠다, 고 판단한 것이라 볼 수 있다. 아마 전자에 해당할 것이다. 적어도 통사는 이 정보를 접하고 막부의 정책이 옳다는 것을 증명하는 것이라고 판단했기 때문에 전하지 않는 편이 낫겠다고 생각한 것으로 볼 수 있다. 따라서 막부는 대영제국으로 대표되는 서양 근대 제국주의에 관한 최초의 보고를 전해들을 수 있는 기회를 놓친 셈이 된다.

제1장과 연관 지어 설명하면, 네덜란드 풍설서는 1765~1766년 사이에 있었던 버마군의 시암 침입과 아유타야 왕조가 몰락한 사실도 전해 듣지 못했다. 18세기 초에 일본인이 깊은 관심을 갖고 있었던 시암은 이제 관심 밖으로 밀려났다고 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같은 시기의 실론(현 스리랑카)에서 발생한 사건은 1765~1766년 사이의 네덜란드 풍설서에서 찾아볼 수 있다.¹⁰⁾

1765년, 실론섬에서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는 캔디 왕조의 왕인 카르티 스리 라자 싱하와의 싸움에서 승리하여 왕도(王都)를 점령했다. 그리고 유리한 조건으로 강화 조약을 맺었다. 1766년에 체결된 조약으로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는 국왕령으로 자유롭게 계피를 채취할 수 있는 권리를 얻고 실론섬의 연안부를 영토로 편입, 그때부터는 더 이상 캔디왕 앞에서 국왕이 만든 법에 따라 행동하지 않았다.¹¹⁾ 이는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가 지금까지의 방침을 바꿔 무역의 조건을 유리하게 만들 뿐만 아니라, 영토 확장에도 나섰다는 점에서 주목할 만한 일이다.

네덜란드 풍설서는 네덜란드인이 실론 영주와의 싸움에서 승리하여 수도를 점령하고 강화 조약을 맺었다는 사실은 전하고 있으나, 조약의 세부적인 내용에 대해서는 언급하고 있지 않다. 아마, 네덜란드 상관장이 전하고자 했던 것이나 통사와 나가사키 봉행 그리고 막부도 네덜란드가 아시아에서 그 위력을 충분히 유지하고 있다는 것 정도만 이해하는 수준이었을 것이다.¹²⁾ 에도 막부는 1766년 실론의 정세를 서양 근대 제국주의의 첫 전조로 받아들였을 가능성도 있으나 결과적으로는 전통적인 일련의 정보 가운데 하나로 묻히고 말았다.

이상과 같이, 18세기 중반은 어떤 의미에서는 네덜란드 풍설서의 황금시대였다. 즉, 중국 이외의 정보를 막부에 제공하는 경로는 거의 네덜란드 풍설서로 국한되었고, 때문에 네덜란드 상관장이 일본인은 우리가 하는 말은 거의 다 신뢰한다고 믿을 정도라는 점에서 말이다. 동남아시아로부터 정크선이 내항하지 않게 되고 포르투갈이나 스페인 선교사의 일본 밀입국이 단절된 것¹³⁾ 등이 그 이유이다.

이는 동시에 막부를 비롯한 일본인이, 그리고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가 18세기 초에 느꼈던 공포, 즉 일본에 다시 가톨릭 세력이 영향을 미칠지도 모른다는 공포가 이젠 소멸되었음을 의미했다. 일본에서는 아직 서양 근대의 새로운 움직임이 위협으로 인식되지 않고 있

10) 호세난학연구회(法政蘭學研究会)편 『화란풍설서집성(和蘭風說書集成)(하)』(일본 네덜란드 학회, 1979년)41쪽, 45~46쪽.

11) 이 조약에 대해서는, Schrikker, Alicia, *Dutch and British colonial intervention in Sri Lanka, 1780-1815: Expansion and Reform*, Leiden/Boston: Brill, 2007, 39쪽을 참조로 했다.

12) 유감스럽지만 이 정보를 제공하게 된 네덜란드의 의도나 일본측의 반응에 관한 자료는 아직 발견된 것이 없다.

13) 고노이 다카시(五野井隆史) 『일본 기리시탄사 연구』(요시카와고분칸吉川弘文館, 2002년)343쪽 참조.

었다. 해외를 두려워할 필요가 없는 이상,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로 하여금 일본인에게 해외 정보를 제공하도록 할 적극적인 이유는 거의 없었다. 네덜란드 입장에서 밀쳐내야 할 경쟁 상대가 없으니 정보를 제공해야 할 동기는 상대적으로 희박해졌다. 따라서 이 시기의 네덜란드 풍설서는 대체적으로 짧고 내용도 충실하지 못했다. 18세기 중반은 네덜란드 풍설서의 황금기임과 동시에 정체의 시기이기도 했다. 아유타야 왕조의 몰락이나 플라시 전투 등, 아시아 지역의 대변동이 전해지지 않았다는 사실이 이를 반증한다.

III. 프랑스 대혁명과 나폴레옹 전쟁, 1794~1817년

이미 1937년에 이타자와 다케오(板沢武雄)는, 대부분의 네덜란드 풍설서가 영국-네덜란드 전쟁에서 패전한 사실 등, 네덜란드로서 불리하다고 생각되는 정보까지 수록하고 있는데 반해, 프랑스 대혁명 후 수년 동안에는 네덜란드 풍설서의 내용이 사실과 상당 부분 다르다는 점을 지적했다.¹⁴⁾ 이타자와가 언급한 풍설서의 내용을 소개해 보도록 하자.¹⁵⁾

프랑스 대혁명에 대한 구체적인 언급은 1794년도 풍설서에서 찾아볼 수 있다. 1년 후에는 유럽에 대한 보고도 언급되는 것이 통례인데, 대혁명에 대한 보고는 5년 가까운 시간을 요했다. 바스티유 감옥의 함락 단계에서는 역사적인 대사건이 일어났다는 인식이 없었는지도 모른다. 1794년의 관련 부분을 현대어로 바꾸어 보면,

프랑스 왕의 가신이 도당을 조직해 왕과 왕비를 살해하여 온 나라가 소란에 휩싸였다. 네덜란드를 포함한 주변국들의 군대가 프랑스에 침입해 전쟁이 되었다.

고 적혀있다. 1804년에는 풍설서에 다음과 같은 기사가 실려 있었다.

프랑스 왕의 아우인 루이 나폴레옹이 네덜란드 왕가의 왕자가 되어 왕위에 올랐다. 1817년에는,

프랑스 왕의 아우인 루이 나폴레옹(보나파르트)은 네덜란드 왕가의 양자가 되어 왕위에 올랐으나 서거했다. 때문에 전대 왕의 친척인 오라녜공이 왕위를 계승함으로써 국가 통치는 30년 전 상태로 되돌아갔다.

라고 적혀있다.

이 기사들은 네덜란드 풍설서가 기록하고 있는 역사 가운데서도 눈에 띄는 정보 걸작의 예이다. 실제로는 프랑스 혁명군이 1794년에 네덜란드를 침입, 다음 해에는 네덜란드 전역을 제압했다. 그 결과, 200년간 지속되어 온 네덜란드 공화국이 붕괴되고 친프랑스파인 바타비아 공화국이 성립되었으며 총독인 오라녜공 빌럼5세는 영국으로 망명했다. 1797년 영

14) 이타자와 다케오(板沢武雄) 『네덜란드 풍설서 연구』 (일본 고문화 연구소, 1937년). 훗날, 해설 부분이 『일본 네덜란드 문화 교섭사에 관한 연구, 요시카와 고분칸, 1959년』에 재록되었다.

15) 앞에 나온 『화란풍설서집성(하)』94, 127, 140쪽에 수록된 풍설서를 현대일본어로 바꿈.

국이 바타비아 공화국에 대해 선전포고를 했고, 망명중인 오라네공은 네덜란드의 해외 거점에 대해 영국의 보호 하에 들어가도록 명령했다. 그런 가운데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는 1799년에 소멸된 특허를 갱신하지 않고 해산시켰으며 자산과 채무는 바타비아 공화국이 인계했다. 프랑스 황제의 자리에 즉위한 나폴레옹은 1806년 아우인 루이를 네덜란드의 왕으로 삼았다. 하지만 루이가 대륙 봉쇄령을 엄격히 지키지 않았기 때문에 1810년 네덜란드를 프랑스 제국에 합병시켰다. 이에 따라 네덜란드라는 나라는 일시 소멸되었다. 1815년 나폴레옹이 몰락하면서 빌렘 5세의 아들이 네덜란드 왕 빌렘 1세로 즉위했다.

당시 일본 상관장이었던 헨드릭 도프(Hendrik Doeff)는 후임자가 정해지지 않은 탓에 1803년부터 1817년까지 연속 재직했다. 그의 재임 기간 중에 러시아 사절인 니콜라이 레자노프가 나가사키에 내항했고 (1804년), 마카오를 공격중이던 영국의 함대 가운데 한 척인 패튼호가 나가사키 항에 침입하는 (1808년) 사건이 발생했다. 여기서는 이들 사건에 eogks 상세한 설명이나 일본·네덜란드·러시아·영국의 관계에 대해 심도 깊은 고찰은 하지 않겠다.¹⁶⁾ 다만, 제4차 영국-네덜란드 전쟁과 그 뒤의 나폴레옹 전쟁의 영향으로 네덜란드가 나가사키에 거의 배를 파견할 수 없는 상황하에서 나가사키 봉행이나 통사들은 러시아 선박과 영국 선박이라는 새로운 정보원을 만나게 되었다, 는 것만큼은 지적해 두고자 한다. 물론, 나가사키의 공무원들이 무조건적으로 러시아나 영국인들이 하는 말을 신뢰한 것은 아니었지만 도프 상관장은 그들로부터 입수한 정보에 근거하여 국제 정세에 대해 나가사키 봉행의 이름으로 통사로부터 까다로운 질문을 받았다.¹⁷⁾ 예를 들면, 「오라네공은 지금 어디에 있는가」라는 질문이 그 예이다. 수십 년 동안 일본에 정보를 제공하는 것은 거의 네덜란드의 독점이라고 믿어왔던 도프 상관장은, 어려운 질문에 몇 번인가 답변을 하기는 했으나, 이젠 새로운 경쟁 상대가 출현했다는 사실을 절감하게 되었다. 그는 오라네공이 망명 중이라는 사실과 미합중국의 독립, 등에 대해 그가 알고 있는 모든 것을 대답할 수 밖에 없었다. 다만,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가 해산된 점에 대해서는 말을 하지 않았으며, 영국과 러시아가 동맹을 맺었다는 「가설」로 막부를 설득하려 했다. 따라서 이로써 막부가 동시대의 세계 정세를 이해했다고 결론짓는 것은 타당하지 못하다. 단, 훗날 「제국주의」라 불리게 되는 서양의 새로운 움직임에 주목하기 시작한 것에 불과하다.

이번 장을 간단히 요약해 보자. 첫째, 이 시대에 네덜란드와 나가사키에 주재했던 네덜란드인은 에도시대 동안 최대의 위기에 직면하게 되었으며, 때문에 일본에서의 입장을 유지하기 위해 정보를 조작할 수밖에 없었다. 둘째,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러시아 선박이나 영국 선박이 내항함으로 인해 일본인들이 새로운 정보원을 얻게 되면서 정보 조작은 어려워지기 시작했다. 셋째, 네덜란드인과 막부의 최대 공통 관심사는, 포르투갈이나 스페인으로 부터 대영제국으로 대표되는 근대화를 이루고 있는 서양 열강 쪽으로 옮겨가기 시작했다,

16) 이 시기의 일본을 둘러싼 국제 정세에 대해서는 예를 들면, 요코야마 요시노리(横山伊徳)「18—19세기 전환기의 일본과 세계」역사학 연구회, 일본사 연구회편 『일본사 강좌7 근세의 해체』(도쿄대학 출판회, 2005년) 참조. 레자노프가 내항했을 당시의 상세 기록은 니콜라이 레자노프저, 오시마 미키오(大島幹雄)역 『일본 체재 일기, 1804-1805』(이와나미 분코, 2000년)등을 참조. 패튼호 사건의 배경이나 의의에 대해서는 미야치 마사토(宮地正人)「나폴레옹 전쟁과 패튼호 사건」『막부 말기 유신기의 사회적 정치사 연구』(이와나미 쇼텐, 1999년)에 상세히 기술되어 있다.

17) 일본 네덜란드 학회편 『나가사키 네덜란드 상관 일기4』(일본 네덜란드 학회, 1992년).

는 점이다.

마지막으로 이상에서 말한 것처럼, 18세기를 거치면서 네덜란드 풍설서의 주제는 로마·가톨릭 세력으로부터 서양 근대로 변화해 갔다.

네덜란드 풍설서가 시작되었을 때, 네덜란드인과 일본인들의 공통된 목적은 스페인과 포르투갈이라는 이베리아 세력을 일본과 일본 근해로부터 배제하는 것이었다. 이는 막부로서는 기리시탄을 금지하지 위해, 네덜란드 동인도회사로서는 일본 무역에서 이윤을 창출하기 위해 꼭 필요한 것이었다.

1680년대부터 1710년대에 등장한 「시암 풍설」은 이 목적을 위한 네덜란드 풍설서의 마지막 성과물이라 할 수 있다. 이 단계에서 막부는, 네덜란드인이 제공한 외국 정보의 내용을 중국·동남아시아에서 내항하는 정크선이나 일본에 잠입하려는 선교사들로부터 들은 정보와 비교, 검토할 수 있었다. 거꾸로 말하면 네덜란드 풍설서는 대항 정보원의 존재로 인해 사실에 근거한 상당히 상세한 내용으로 변해 갔다. 적어도 나가사키의 공무원들은 동남아시아의 정세에 주목하고 있었다. 한편, 17세기 말, 쇼군(將軍)을 비롯해 에도의 막부는 기리시탄 문제와 대외적인 문제에 대한 관심을 잃어갔다. 나가사키의 네덜란드 상관 근무의로 일본에 온 앵겔베르크 캠퍼(Engelbert Kaempfer)가 일본을 「단힌 나라」라고 평한 것이 바로 1690년 무렵의 일이다. 막부도 느끼지 못하는 사이, 소위 말하는 「쇄국」이 형성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18세기 중엽, 네덜란드인은 정보 제공에 관해 경쟁 상대가 없었다. 정크선은 이제 중국에서만 들어왔고 동남아시아에 관한 정보는 전해지지 않았다. 오늘날 말하는 베트남 이서의 정보를 독점 제공하는 것은 네덜란드인들이었다. 그리고, 그것에 대해서는 나가사키의 공무원들조차 문제성을 느끼지 않았던 것이다. 이 시기의 세력 싸움의 주된 무대는 벵골이나 실론섬 등 남아시아였으며, 이는 막부의 전통적인 정보 수집 범위 혹은 관심 밖이었던 것이다. 막부는 순간의 평온을 만끽하고 있었다.

프랑스 대혁명과 나폴레옹 전쟁이 발발했을 때, 나가사키의 네덜란드인들은 큰 어려움에 직면했다. 나가사키 상관 자체가 네덜란드 선박의 불착으로 인해 유럽과 아시아의 정보로부터 소외되어 무슨 일이 일어나고 있는지 알 수 없는 상태였던 것이다. 그들은 알고 있는 정보를 꿰어 맞추어 필요에 따라 자신들의 사정에 맞게 바꾸어 일본에 전했는데 일본에 새로운 정보를 제공하는 러시아 선박이나 영국 선박이 등장한 이상, 모든 것을 거짓으로 포장할 수는 없게 되었다. 한편, 막부는 이씨 조선, 류큐(琉球, 현재의 오키나와)등 전통적인 경로를 통해 전해지는 정보가, 밀려드는 새로운 위기에 대응하기에는 불충분하다는 것을 깨닫게 되었다. 근대 서양의 위협은 아직 동아시아에서 현실로 나타나지는 않았지만 막부는 이를 의식하고 「쇄국」체제를 유지하고자 노력하기 시작했다.¹⁸⁾

18) 후지타 사토루(藤田覚) 『근세 후기 정치사와 대외 관계』 (도쿄대학 출판회, 2005년).

【Abstract】**From Roman Catholicism to the Shadow of Western Imperialism:
The Subject of Oranda Fūsetsugaki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TSUKATA Fuyuko

Introduction

When the Tokugawa shogunate, ordered all Dutch in Japan to move from Hirado to Nagasaki in 1641,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or the VOC, accepted the obligation to gather foreign news especially about Portuguese or Spanish plans for aggression against Japan. The shogunate stressed that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continuing trade, and the Dutch complied in order to keep their position as the only European nation trading with Japan. In 1666 the shogunate ordered the VOC to present information in document form. Therefore, the Japanese interpreters of the Dutch language in Nagasaki began preparing official reports, or *Oranda fūsetsugaki* based on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the Dutch chief when Dutch ships arrived in Nagasaki. The chief signed these documents, which were written in Japanese, and the Nagasaki magistrates immediately sent them on to Edo.

1. “News from Siam” : Dutch News Reports, 1690-1715

By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the Portuguese and the Spanish lost their power and influence in East Asia. In addition, in 1681 the Qing dynasty quashed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and in 1683 the Zheng family surrendered after dominating Taiwan for twenty-years. As the Qing consequently permitted commercial junks to sail to Japan, an enormous number rushed to Nagasaki. Therefore it is easy to suppose that, from 1685 onwards, the East China Sea was peaceful as neither the shogunate nor the VOC faced threats until Russian ships visited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 found, however, some specific reports named “News from Siam”, or *Shamu fūsetsu*, among the extant copies of *fūsetsugaki* made from 1690 to 1715.

The Siamese monarch, Narai (r. 1656-1688), involved himself actively not only in foreign trade but also diplomacy. I want to draw attention, however, to relations with France.

In 1662 French priests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arrived in Siam. In order to convert King Narai to Roman Catholicism, the French priests tried to capture Narai’s interest throughby trade, by offering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by dispatching royal embassies from France. They asked the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King Louis XIV to support their activities in Siam. In 1680 the French Company opened its trading post in Ayutthaya. Twice in the 1680s King Narai’s envoys traveled to France and returned to Ayutthaya with French embassies dispatched by Louis XIV. Of course the

French missions sought to convert Narai to the Roman Catholic faith, but were unsuccessful.

When King Narai died in July 1688 without an heir, one of his most eminent officials took the throne in the subsequent “Palace Revolution.” The French troops at the trading post were expelled and those left behind, being French or Roman Catholic, were persecuted. The new king, Phetracha (r. 1688-1702), and the Dutch shared mutual hostility towards the French. Phetracha repeatedly told the Dutch that he considered them his only European ally.

Although it was not named “News from Siam”, the first Dutch news report concentrating on Siam was a report in 1673, describing how the Zheng family sent a letter in hopes of preventing Siam from trading with Japan. In 1683, two interpreters came to the Dutch factory to hear news from Siam and recorded the following: that a troop of Chinese, expelled from southern China by a Qing expeditionary force, had conquered and taken control of Cambodia and that the Cambodian king had fled and was missing. The interpreters conveyed the magistrate’s displeasure that the Dutch chief had not told this piece of news early enough to be included in the annual Dutch news reports. Beginning the next year the Dutch tried to provide news from Siam just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ship.

In October 1688 the Dutch chief in Japan wrote to Batavia that the Nagasaki magistrates would be opposed to French or Portuguese priests coming from Siam to China and be distressed by French and Portuguese “evil” plans in Siam or elsewhere, but that, by contrast, high officials of the shogunate did not ask any questions on European matters when the Dutch chief journeyed to Edo in March 1688. He also wrote to the Siam station chief that the Nagasaki magistrate demanded news about all the incidents in Siam, especially about Catholics.

In his reply, written in July 1689, the Governor-General wondered why no questions were ask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Hol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in Europe in Edo. In the same letter he informed the Nagasaki factory news of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nd the breakout the Nine Year’s War (1688-1697). He gave instructions to the chief of the Nagasaki factory to describe as “brutal” the actions of Louis XIV and those of, James II, the former king of England. He , and of Louis XIV in hopes that such information would shape Japanese policy more favorably for the Dutch.

In order to satisfy Japanese curiosity from 1689 until around 1710, the Dutch chief in Nagasaki continued to request his colleague in Ayutthaya to inform him about conditions in Siam, especially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French or Portuguese Catholics. In return, the Dutch chief in Ayutthaya sent news of Siam to Nagasaki. In 1690 the first document named “News from Siam” was made.

2. “They Will Believe Everything” : Bengal and Ceylon, 1758-1766

Herbert Vermeulen, the Dutch chief in Japan wrote to Jacob Mossel, the Governor-General in Batavia, in November 12, 1758. According to this letter, the Dutch tried to explain to the shogunate official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with the Japanese why the VOC could not bring enough silk from Bengal to Japan to meet Japanese requests. According to protocol established with the shogunate,. The letter also says that the DutchThey should have told the Japanese about conflicts in Bengalthe Battle of

Plassey [Palashi] in the previous year 1757 during unofficial face to face meetings, although I cannot prove that they mentioned the Battle of Plassey [Palashi] in the previous year 1757.

This exchange had a greater impact beyond trade. The Nagasaki officials recognized that international events, namely the desire of many Western nations the English and French East Indian Companies to dominate them, were harming the ability of the Bengali people to actively engage in trade. suffer these constraints only because they had allowed so many nations, who now wanted to rule them. As a result, tThe Japanese showed their pride in the so-called ‘seclusion policy’, thinking the policythey had createdlocated an effective way for Japan to escape exterior troubles.

Yet despite of their pride, the Nagasaki officials did not include the problems in Bengal in the annual news reports to Edo, considering it not important enough to report to Edo. This could be the first suggestion of Western Imperialism in Asia, leaded by Great Britain, but shogunate officials in Edo lost their chance to hear it.

In the same years, in 1765-1766, the annual report to Edo informed the victory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gainst Kirti Sri Radja Simha, the king of Kandy in Ceylon (modern Sri Lanka). This policy seemed to changeIn the same years, in 1765-1766 because in, the annual report to Edo, officials in Nagasaki informed their superiors of victory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ictory overagainst Kirti Sri Radja Simha, the king of Kandy in Ceylon (now Sri Lanka).

As the result of a the treaty signed in of 1766 with Kandy, the VOC secured its “right to peel cinnamon freely in the king’s territories and its territorial possessions were expanded” and “the Dutch would never again be forced to perform the degrading rituals before the king.” Therefore, tThis piece of news can be seen as could have representing the first reference to Western imperialism received byoffered to leaders of the shogunate. Both the Dutch chief and the shogunate officials, however, considered it not as the start of imperialism but as a proof that the Dutch power was dominant in Asia.

To sum up,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golden age of Dutch news reporting because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at developed between the VOC and Japanese officials. The Dutch thought they held an effective monopoly on new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flowing into Nagasaki because other potential news sources, junks from Southeast Asia, were calling in far few numbers. The Dutch recognized that it was easy ?nearly possible to deceive the Japanese and as a result,. In other words, the Dutch news reports of this period were dull. (I don’t quite get your meaning here) High officials of the shogunate found no threats, flourishing in the general peace that typifiedof their surrounding area, or East Asia.

3.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Napoleonic War: 1794-1817

Already in 1937, Itazawa Takeo, a historian of Dutch learning, or *rangaku*, noticed that the several annual reports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re manipulated although the most of the “Ordinary News” was reliable. I will introduce the articles from the Ordinary News which Itazawa pointed out.

The first mention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ppeared in 1794.

Subjects of the French kingdom illegally grouped together, killed the king and the prince, and raised a disturbance all around the country. It was reported that troops from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including Holland rushed into France and battled [against the rebels].....

The Ordinary News of 1809 written in Nagasaki included the following article.

A brother of the French king, Louis Napoleon, was adopted into the royal family in Holland and took the throne....

In 1817 the Ordinary News reported the following:

Louis Napoleon, a brother of the French king, had been adopted into the royal family in Holland and taken the throne, but he died. Therefore, a relation of the previous king, Prince of Orange, ascended the throne,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Netherlands recovered [from the confusion] into the state of thirty years ago.

These are distinct case of manipulations.

Hendrik Doef served as chief of the Dutch factory in Nagasaki during an irregularly long term, from 1803 to 1817, because no successor came to Japan. During his term, in 1804 a Russian envoy, Nikolai Rezanov, and in 1808 a British frigate Phaeton entered Nagasaki harbor. I do not want to dwell on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among the Netherlands, Britain and Russia at that time. There is space here only for mentioning that Nagasaki officials got other news sources than Dutch ships which seldom sailed into Nagasaki in this period. Doef received rigorous inquiries by interpreters in the name of the Nagasaki magistrates, such as “Where is Prince of Orange now?” He managed to answer the numerous questions, but he realized that rivals had appeared of Dutch news reporting.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the main issue of the Dutch news reports to the shogunate changed from Roman Catholicism to Western imperialism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first aim of Dutch news reporting was to prevent Roman Catholicism both in the Dutch and the Japanese contexts. “News from Siam” from 1690 to 1715 was the subsequent and final result of this aim. In this stage, the Dutch news reports had rivals who could provide news of the wider world for the shogunate, such as “Chinese” junks, which sailed in the China Seas and called at Nagasaki. On Nagasaki officials in Nagasaki were still watching Southeast Asia, while the shogun and high officials of the shogunate was obviously growing less concerned about possible threats to Japan from Christianity or a foreign power external affairs of the country. These events match precisely the observations of in 1690-1691, Engelbert Kaempher who in 1690-1691 concluded that observed Japan

was establishing as a “closed country”. The so-called “ isolation *sakoku*” system was taking shape, although no Japanese was conscious of it.

In the mid eighteenth century, the Dutch found no equals in news reporting to the shogunate, mostly because Chinese junks from Southeast Asia no longer sailed to Japan. The Dutch monopolized information channels which provided the shogunate with for the shogunate to access news from points in Asia outside of the west of China. Even O Nagasaki officials in Nagasaki and Edo, however, did not find it a problem that the Dutch monopolized the information channel. (?). The Tokugawa regime was enjoying a temporal calm.

Whe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Napoleonic War broke out, the Dutch in Nagasaki found themselves in trouble. Although having little access to outside information, the Nagasaki factory had to manipulate the information it did receive in hopes of maintaining trying to keep the privileged position the Dutch enjoyed position in Japan. As a result, tThey had to compete against the British and the Russians not only in business but also in gathering and delivering intelligence.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hogunate became aware that their established traditional news sources were insufficient not enough into dealing with the Western nations enjoying increasing influence in East Asia the new powers coming around its territory. Western imperialism was not yet visible in East Asia, but the shogunate began consciously to watch its growing shadow consciously.

漢訳洋学書と19世紀日本の 出版文化

■ 八耳俊文（青山學院女子短期大學校） ■

漢訳洋学書と19世紀日本の出版文化

－ ホブソン書を中心に －

八耳俊文（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校）

〈目 次〉

I. はじめに	二. 中国
II. ホブソン書の成立	三. 韓国
III. 漢字文化圏への広がり	IV. 日本への広がり
一. ベトナム	

I. はじめに

筆者の手元には「京城帝国大学図書章」の蔵書印が捺されたベンジャミン・ホブソン(Benjamin Hobson, 1816-1873)の中国語医書がある。『西医略論』(初版1857年)、『内科新説』(初版1858年)、『全体新論』(初版1851年)、『婦嬰新説』(初版1858年)の4点で、いずれも中国書である。刷りの状況から後印と判断されるが、「医 774」から「医 777」のスタンプと、「薬 1639」から「薬1642」のシールが貼られ、かつて同大学医学部図書室あるいは医学部薬学講座の所蔵であったことを想像させる。

本発表は漢訳洋学書とくにホブソンの書物を取りあげ、漢字文化圏に流布するさまを述べ、そのあと日本では種々の関連本が刊行されたことを、幕末から明治初期の19世紀の出版文化にあわせ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

II. ホブソン書の成立

金沢大学附属図書館は教育掛図を多数所蔵するが、その中にロビンソン動物掛図というのがある¹⁾。大きさ約85×60cmで、「哺乳類」「鳥類」「両生類・爬虫類・魚類」「軟体動物・有関節動物・放射相称動物」の4軸からなる。多種多様の動物を彩色で表し、これらの分類の中に配置し一望したものである。画工フレデリック・ロビンソン(Frederick Robinson)が描き、1855年にロンドンで刊行された。「第四高等中学校図書」の印があり、第四高等中学校で使用されたと思われる。

これと同じ図がホブソンの『博物新編三集』にも見ることができる。「胎生類」「卵生類」「鱗介類」「昆虫類」と分類された図である²⁾。『博物新編三集』の初版は1854年の刊行になるため、ロビンソン動物掛図より古く、後者をもとに前者が作成された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が、同一の原図があり、それをもとに『博物新編三集』の図がつくられ、一方ではロビンソン動物掛図がつくら

1) 松田清・益満まを編『金沢大学所蔵近代掛図目録－印刷図編－』（京都：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2008年）11-14頁、109頁。

2) 『博物新編三集』（広州：恵愛医館、1854年）1甲-1乙。

れたと考えるか、ロビンソン動物掛図はそれ以前にも作成されていて、1855年版はその新版とみなして、その古い版を直接であれ間接であれ原図にして『博物新編』の図が作成されたとも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いずれにせよ同掛図の存在は『博物新編』の図は独自に作図されたのではなく、当時としてはよく使用された教育図で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ホブソンは1816年、イングランドの中部ノーサンプトンシャー州のウェルフォードに生まれた³⁾。父は同地の会衆派の牧師であった。現在でも父が勤め、ホブソンが育った教会が同地に残っている。1830年代前半、ホブソンはバーミンガム総合病院附設の医学校で医学教育を受けた。さらに1835年にはユニバーシティ・カレッジ・ロンドンに進学、専門的に医学を学んだ。同大学では医学の基礎として科学を、医学については薬学、産科学、解剖学、外科学、内科学などを広く学んだ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1838年にはロンドン王立外科医師協会の試験に合格、1839年にはユニバーシティ・オブ・ロンドンの学位試験にも合格し、医学士の学位を取得した。1838年にロンドン伝道会から広州の医療宣教師となるよう指名を受け、1839年7月英国を出航し、同年暮れマカオに到着した。

マカオでは1843年1月まで診療を続け、その後は南京条約締結にともない英国に割譲された香港へと移り、新設された病院の経営にあたった。ここで医療をおこなうとともに布教活動もおこなった。中国で活動する中で、中国医学は解剖学の知識が欠落しているとの認識に至り、西洋医学を修得した中国人医師の養成を考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れを実現したのが次の広州時代で、だがたちまち次の4つの困難に出会った。一つは中国語で授業することの難しさ、一つは解剖や実験器具の不足、一つは医学の基礎を教える中国語テキストの欠如、一つは横行する誤った医学理論と処方である。ホブソンはイギリスで最新の医学の学習に努め、成績も上位にあった。伝道に対する情熱に満ちた若い医者ホブソンに

中国医学への理解を期待する余地はなかった。1849年に香港の商人を通じ、石版印刷機械を購入したことを契機に中国語によるテキスト作成に取りかかった。一番はじめに著述したのは『天文略論』で医学というより伝道の一環として作成したもので、西洋人が運営する学校で教科書として使用された。

1850年冬に医学講義を病院内で週3回おこなうようになり、図入りの解剖学と生理学の本をホブソンの中国語の教師である陳修堂の協力を得て完成させた。これが『全体新論』である。複数の医学書から図をトレースして掲載された。印刷部数は初刷が1200部、2刷が2000部で、出版にあたっては中国内外の西洋人から財政的支援があった。中国側でも関心を招き1852年には潘仕成編纂の『海山仙館叢書』に加えられた。また1853年には両広總督葉名琛の父、葉志詵が『全体新論』の図の部分だけを8幅に収めた『全体分図』を

作成、両広總督署から刊行した。人体図の掛け図である。葉志詵は『全体新論』の翻刻もおこなっている。ホブソンも図を石版から木版に変え、以降、たびたび増刷された。

『博物新編』もこの広州時代に作成された。この『博物新編』の成立の経緯は未明部分もあるが、『全体新論』と同様、陳修堂の協力を得て1853年に著述がおこなわれ、1854年には第三集が2000部印刷された。初集と第二集についても同様に1854年のうちに印刷予定であったが、広州では排外気運が高まり印刷を続行するのは危険と判断されたため、印刷は上海へと移し、1855年に全三集をまとめ墨海書館より発行された。

3) ホブソンの生涯は、八耳俊文「ウェルカム図書館蔵ホブソン文書を用いたベンジャミン・ホブソン(合信)伝」『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総合文化研究所年報』第11号(2003年)99-120頁、に拠る。

ホブソンも1857年に上海に活動の拠点を移し、時間的余裕を得て執筆活動に励んだ。この年は西洋の医学書をもとに『全体新論』の続編で、中国での治療例も豊富に載せた『西医略論』を、エドキンスの推薦のあった文人、管嗣復の協力で完成させ、上海の仁済医館よりこの年500部出版した⁴⁾。さらに700部の印刷も保証された⁵⁾。翌年には産科と小児科の書物である『婦嬰新説』を、内科と薬物を説明した『内科新説』を同じく管嗣復の協力により著述し、1858年に上海仁済医館から刊行した。ホブソンは1858年12月に上海を離れ、帰国の途についたが、外国人商人からホブソンの書物の予約購読代として2000ドルの支払いが約束され、ホブソンが帰国後も印刷は続け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ホブソンの書物は確かに中国でも需要が高かったが、彼の活動を支持する西洋人社会から財政的援助があり、需要に応じて供給されるというのではなく、需要とは関係なく大量に印刷されたのである。

Ⅲ. 漢字文化圏への広がり

一. ベトナム

ホブソンのこれらの医学書は、彼の科学入門書であった『博物新編』（初版1855年）とともに、19世紀後半において時には20世紀はじめにまで漢字文化圏の人々が西洋医学や科学を学ぶのに使用された。まずその例をベトナムにみてみよう。ベトナムの国家図書館は古典籍を多数所蔵するが、そのうち「古典」「歴史」「哲学」「文学」に分類される歴史資料(刊本が主)をウェブ上で公開し始めた(<http://www.nomfoundation.org/index.php>)。その「哲学」分類に『博物新編』が含まれている。嗣徳30年(1877)に誌された陳仲恭による「重鐫博物新編序」がつき、表紙には「維新己酉(1909)孟夏 / 博物新編 / 觀文堂蔵版」とする2冊本である。1冊目には「博物新編」初集を、2冊目には二集と三集を翻刻する。同図書館の古典籍の医学関係書については既に茨城大学の眞柳誠の調査があり、この『博物新編』もその中で報告しており、1877年のハノイ版に基づく1909年のベトナム觀文堂蔵版の刊本と眞柳誠は記している⁶⁾。中国書の出版後の20年を経てベトナムで翻刻が試みられ、20世紀に入ってから刊行されているのはベトナムで本書の存在意義が20世紀になっても失われ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二. 中国

中国では『全体新論』が注目を浴び、『海山仙館叢書』に収録されたり、葉志詵による翻刻がおこなわれたりした。ホブソンは例言の中で坊本(民間出版物)も多く出ているが、図に誤りが目立ち注意が必要と述べており、正確度の欠く俗本まで流布したようである。

医者たちの中には『全体新論』の知識を自らの中に取り込もうとする人たちも出現した。ホブ

4) 『西医略論』英文序、Wellcome Library, Hobson Papers, MS.5852/16.

5) A Short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Canton, December 1857, Wellcome Library, Hobson Papers, MS.5852/18/1-3.

6) 眞柳誠「ベトナム国家図書館の古医籍書誌」『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人文学科論集』第45号(2006年)1-16頁中15頁。

ソンの書前後に現れ、中国の伝統医学と西洋の近代医学の両理論に通じようとした「中医匯通派」と呼ばれる医家で、彼らの著述物を検討した松本秀士によると、彼らの医書のほとんどは『全体新論』などの中国語による西洋医学書を参照しており、人体解剖図については『全体新論』や『婦嬰新説』からの引用が多く、中には『博物新編』に言及するものもあるという⁷⁾。

魯迅も読者の一人であった。彼は南京の江南水師学堂で木版の『全体新論』を目にしたことがあると『呐喊』自序(1922年)で述べている⁸⁾。彼が見たのは19世紀末のことであったが、1929年10月22日の江紹原宛の手紙の中で「全体新論」のあとに「等五種」の3文字追加を依頼している⁹⁾。ホブソンの代表作が上記5種であったことを魯迅は知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ホブソンが中国にいた1858年当時すでに『博物新編』から『内科新説』の5種は評価を得ていた¹⁰⁾。魯迅はホブソン書をどの程度読んだのか記録に残していないが、中国の伝統ではなく西洋の新しい文化の書物としてとらえていたことは確かであった。

三. 韓国

韓国では2005年に延世大学校の全寅初主編で『韓国所蔵中国漢籍総目』(学古房)全6冊が刊行されたが、その子部・西学類を見ると、中国で発行された伝道団体の漢訳洋学書や宗教書、江南製造局の科学技術書などが多数、韓国内に所蔵さ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¹¹⁾。筆者はかつて日本の国内に所蔵される同種の書の所蔵目録を作成したことがあるが¹²⁾、それと比較するなら、韓国に所蔵される種類の多さは日本を凌駕しており、特に江南製造局の出版物はソウル大学校奎章閣の蔵書を中心に、遙かに日本より揃っているとい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ホブソンの書を『同総目』から見ると、ソウル大学校奎章閣や高麗大学校華山文庫ほかで所在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¹³⁾。実際、筆者は2006年3月に高麗大学校中央図書館内で『婦嬰新説』と『全体新論』を閲覧したことがあるが、後印ではあるがいずれも和刻本ではなく中国書であった。『同総目』によれば2点とも医学校旧蔵書とするので、ホブソンの中国語による医書は韓国でも西洋医学書として注目されていたのであろう。一方の奎章閣は「朝鮮王朝期の1776年に王室の各種記録や朝鮮の古典籍・中国書籍の収蔵・保存などを統括する機関として設置されたもの」¹⁴⁾で、日韓併合にともない、一時期、李王職の管理下に置かれたのち、朝鮮総督府の所管となり、京城帝国大学成立後、1928年から30年にかけて京城帝国大学附属図書館へ移管されたとされる¹⁵⁾。現在はソウル大学校奎章閣に至る。

この朝鮮総督府時代に、奎章閣文庫中に含まれていた朝鮮図書と中国図書については『朝鮮総

7) 松本秀士「中華文明上に組み込まれる西洋医学」『或問』第10号(2005年)29-46頁。

8) 魯迅「呐喊・自序」、丸山昇訳者代表『魯迅全集2』呐喊・彷徨(東京:学習研究社、1984年)9-17頁。

9) 魯迅「江紹原 宛」、竹内実訳者代表『魯迅全集14』書簡I(東京:学習研究社、1985年)458-459頁。

10) 王韜はこれら5種を「筆墨簡潔、講論精核、真伝作也」と高く評価している(王韜日記、咸豊八年十有四月乙酉)。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55頁。

11) 全寅初主編『韓国所蔵中国漢籍総目』三(서울:学古房、2005年)子部西学類、592-647頁。

12) 八耳俊文「清末期西人著訳科学関係中国書および和刻本所在目録」『化学史研究』第22巻第4号(1995年)312-358頁。

13) 全寅初主編『韓国所蔵中国漢籍総目』三、603-604, 610, 612, 633-634頁。

14) 宮本正明「解題」、加藤聖文・宮本正明編『旧植民地図書館蔵書目録』第1巻・京城帝国大学附属図書館和漢書書名目録(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年)所収、417-423頁中 418頁。

15) 同上。

督府古図書目録』が作成されている¹⁶⁾。同目録の中国図書の子部に特に兵家類、農家類、医家類、天文類、訳学類、芸術類に多くの西学書の所蔵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ホブソンの書にしても医家類に『内科新説』を3点、『西医略論』を3点、『婦嬰新説』を4点、『全体新論』を2点、芸術類に『博物新編』を5点、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朝鮮王朝は盛んにこれらの洋学書を購入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これらがのちに京城帝国大学に収まったはずであるが、筆者が冒頭に紹介した書がそれに該当するかはわからない。京城帝国大学には『附属図書館和漢書書名目録』が1933年から編纂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には医学部あるいは理工学部の図書が含まれておらず、この部分の行方を追うことができないからである¹⁷⁾。それでも『同目録』第2輯(1935年)には『婦嬰新説』と『内科新説』が、第3輯(1936年)には『博物新編』が2点収載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がどのように利用されたかは不明だが、中国で発行されたホブソンの書が朝鮮に持ち込まれ、それらがいくつかの経路を経て同大学図書館に収められたことは違いない。

中国で刊行された書物がさまざまな経路を通じて朝鮮時代の知識人の手に渡っていた例として丁若鏞(茶山、1762-1836)の『麻科会通』補遺に収められた「新證種痘奇法詳悉」がある¹⁸⁾。これは1805年に英国東インド会社商館医ピアソン(Alexander Pearson)が種痘をマカオで実施し、その体験をもとに作成した種痘の解説(英文)を現地で中国語に堪能なスタウントン(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生)が中国語に翻訳したもので¹⁹⁾、広州を中心に頒布され、版も重ねた。1828年には北京の瑠璃廠で奎光斎により重刊本が作成されたが、『麻科会通』に収録されるのはこの奎光斎刊本である。『麻科会通』の補遺が丁若鏞の手によるものか、後世の人による追加なのか不明であるが²⁰⁾、「新證種痘奇法詳悉」は『英咭喇國種痘奇書』ともいい、日本には1805年に中国で刊行されたのち伝わるのが遅れ1841年に伊藤圭介が、1849年に広瀬元恭が翻刻し、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れ以前に北京版が朝鮮に伝わっているのは興味深い。北京の瑠璃廠の古書街は燕行使に随行した文人が好んで立ち寄る場所であったといい²¹⁾、瑠璃廠での珍しい出版物ということで朝鮮に持ち帰ったのであろうか。

ホブソン書の朝鮮における使用例としては崔漢綺(1803-77)の「身機踐験」をあげるべきであろう²²⁾。崔漢綺は思想家と呼ぶにふさわしく万学に関心をもち人間の身体についての理解を深めるため、西洋の医学書としてホブソンの書を読破している。「身機踐験」は全9巻から成り、巻1・2は『全体新論』、巻3・4は『内科新説』巻上、巻4の終わりから巻7のはじめまで『西医略論』巻上中、巻7の残り大部は『婦嬰新説』、巻8は『博物新編』初集、巻8続は『内科新説』巻下と『西医略論』巻下を抄録し、要所に独自の論を立てている。

ホブソン書を手にした人は多くても、このように5点すべてを読むことのできた環境にあった人は少なかったはずで、崔漢綺はどのようなルートで本書を読んだのか興味が惹かれる。彼が独自に立てたのは序、凡例、目録以外の本文では巻1冒頭の「腦為一身之主」、巻2末の「身機総論」、

16) 加藤聖文・宮本正明編『旧植民地図書館蔵書目録』第11巻・朝鮮総督府古図書目録/朝鮮総督府古図書目録補遺(東京:ゆまに書房、2006年)。

17) 京城帝国大学附属図書館和漢書書名目録第1輯(1933年)、凡例。

18) 「新證種痘奇法詳悉」奎光斎刻本、『麻科会通』補遺所収、京都大学附属図書館蔵富 土川文庫。

19) 田崎哲郎「『英咭喇國種痘奇書』について」、有坂隆道・浅井允晶編『論集日本の洋学』Ⅱ(大阪:清文堂出版、1994年)203-220頁。

20) 三木栄『朝鮮医書誌 増修版』(大阪:学術図書刊行会、1973年)131頁。

21) 姜在彦『西洋と朝鮮—異文化の出会いと格闘の歴史—』(東京:朝日新聞社、2008年)155頁。

22) 崔漢綺「身機踐験」、同『増補明南樓叢書』4(서울:成均館大学校出版部、2002年)所収、263-507頁。

卷3冒頭の「中西医学」、卷8冒頭の「諸氣致用」、卷8末の「万物運化皆攝医学」で総論にあたる。『博物新編』については全3集のうち初集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のは偶々なのか、あるいは崔が読む機会をもったのがこの初集のみ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かわからない。

朝鮮における牛痘種痘の創施者かつ普及者として知られる池錫永もこのホブソン書の読者であった。三木栄は池錫永所蔵の医学関係書として、『博物新編(唐本)』1冊、『全体新論(唐本)』1冊、『内科新説(唐本)』1冊、『内科新説(和刻本)』3冊、『婦嬰新説(唐本)』1冊、『婦嬰新説(池錫永自筆本)』1冊があったことを報告している²³⁾。同じく三木栄によれば、池錫永は1885年に『牛痘新説』を著し、私家版をつくり頒布したが、本書にはホブソンの種痘論が掲載されているという²⁴⁾。これは『婦嬰新説』にある「種痘論」をさすと思われる。ホブソンはこの項で牛痘法の劇的な効果と、まだ中国で広がらない現状を述べる。蔵書にある自筆の「婦嬰新説」とは同書を書写したのであろう。

IV. 日本への広がり

日本の特徴を言うなら、中国書の輸入は体系的ではな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が、入手して有益と判断したなら中国書をもとに日本版を作成し、日本における普及を積極的に進めたという点にある。朝鮮王朝は中国の文化動向に敏感で、絶えず新刊本の購入に努めていたが、その普及には熱心ではなかった。これに対しホブソンの書を例にとるとすべて和刻本がつくられ、とくに『博物新編』にいたっては幕末期から明治初期にかけ藩校・郷校・小学校の自然科学の教科書としては最も使用されるまで至った²⁵⁾。筆者はこのことを指して1860年代・70年代の20年間を「博物新編の時代」と表現したことがある²⁶⁾。

これらの書の日本への伝わりかたには種々のルートがあったが、幕末になると外国人が入国できようになり、直接、中国から持ち込まれる例がみ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59年1月に上海から長崎にきた米国人マッゴウァンの場合、彼は寧波で13年間にわたり医療宣教師として活動した体験をもち、筆談にて日本人知識人と交流した²⁷⁾。そして1858年に上海仁済医館から出版されたホブソンの新刊である『婦嬰新説』と『内科新説』を長崎の医者・福地苟菴に贈っている。また大村藩医の尾本公同には1858年に上海で刊行された『植物学』を贈っている。福地苟菴は受領した本の翻刻を決意するが、途中で挫折し、京都の医者安藤桂洲(天香堂)に出版を委ねた。安藤桂洲は安政6年(1859)のうちに幕府に出版の許可を得、安政6年に『婦嬰新説』が、安政7年に『内科新説』の日本版を刊行している²⁸⁾。表紙に「平安 天香堂蔵版」とあるのがそれである。

一方、『婦嬰新説』と『内科新説』の2点については江戸の外科医・三宅良斎(桃樹園)によっても安政6年のうちに翻刻された。安藤桂洲は『内科新説』を出版するにあたり、「東都すでにこの挙あり」と江戸にて和刻本が刊行されていることに言及している²⁹⁾。しかし価値ある書は普及さ

23) 三木栄『朝鮮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閣出版、1991年)267-268頁。

24) 三木栄『朝鮮医学史及疾病史』263頁。

25) 新家浪雄「『博物新編』—幕末の自然科学教科書—」『図書』第411号(1983年)60-63頁。

26) 八耳俊文「幕末明治期に渡来した自然神学的自然観—ホブソン『博物新編』を中心に—」『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総合文化研究所年報』第4号(1996年)127-140頁中136頁。

27) 八耳俊文「D.J.マッゴウァンと中国、日本 1843-1893」『洋学』創刊号(1993年)43-87頁中57-60頁。

28) 『婦嬰新説』(京都：天香堂、1859年)序、1ウ。

29) 『内科新説』(京都：天香堂、1860年)序、2オ。

せること(「東西両挙」)に意義があると述べ³⁰⁾、京都での出版を推し進めた。安政5年暮れには、三宅良斎は江戸で『西医略論』も翻刻している。三宅良斎が翻刻した書は表紙に「桃樹園蔵梓」とあるので区別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ようにホブソンの5点のうち3点をいち早く入手し、翻刻した背景として、「良斎は恐らく長崎を経てであらうが、上海方面とも可成り密接に書籍薬品等の購入に関しては交通のあったことゝ思はれる」と曾孫の三浦義彰一は「三宅良斎略伝」の中で推測している³¹⁾。上海で出版されたホブソン書がほぼ1年の間に日本に舶載され翻刻まで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全体新論』は1851年に広州の恵愛医館で刊行され、1857年にホブソンが上海に転居すると仁済医館の蔵板となった。洋学に詳しい儒者、古賀謹一郎の旧蔵書にこの恵愛医館蔵板の『全体新論』が含まれており³²⁾、日本には1850年代前半のうちに伝わった可能性がある。本書の翻刻を企画したのは大洲藩侍医・山本節庵で、安政4年暮れに出版申請をおこない、許可まで得ていたが、翌年5年(1858年)2月、伊予の人で当時、京都で医業を営んでいた越智崧に蔵版を譲渡し、「越智蔵版」として『全体新論』が誕生した³³⁾。この経緯から『全体新論』の和刻本の成立は見返しに「安政四丁巳晩冬」とあるが安政5年(1858)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本書の見返しには「越智蔵版」とするもの、「二書堂発兌」とするものの2種類が存する。本文の版は同じである。二書堂は京都にあって明治のはじめ教科書販売を手がけた書店である。越智崧も京都で開業しており、京都での刊行物として引き継いだものと想像される。

『博物新編』の和刻本の出版は幕府自ら、開成所によっておこなわれた³⁴⁾。官板であるため、出版申請の記録には現れず、出版の時期や経緯ははっきりしないが、販売を担当した老皂館(萬屋兵四郎)の元治元年の「発兌書目」が奥付にある刊本があることから、元治元年とされたりその前の文久年間(1861-1863)の刊行とみなされたりしている³⁵⁾。

ホブソンの書のうち科学書の『博物新編』はなぜ幕府の出版となったのか、そして『全体新論』から『内科新説』までの4点の和刻本が出揃ったあと出版されたことになるが、なぜ広範囲な読者層が期待される本書の和刻がこのように時間を要したのか、考察に値する。

まず、第一の問題に関して、当時の幕府の出版物でこのような中国の洋学書を翻刻したものをあげると、『博物新編』の他に『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外彙誌』『重学浅説』『数学啓蒙』『鴉片戒』『万国公法』がある³⁶⁾。これらの共通点をあげるとそれぞれの分野の基本文献とまとめられる。はじめの3点については世界情勢を伝えるもので、原本の記事を取捨選択して翻刻されており、海外ニュースは幕府が管轄するとの意思を読み取ることができる。『鴉片戒』はアヘンの危険性と対処法を記したもので、幕府のアヘンへの危機意識の現れと理解される。『万国公法』は国際法を説明するもので、幕府が政治的判断を決するに参照する重要な文献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にみていくと新知識の管理と普及という基本的態度を指摘できる。科学分野における新知識の普

30) 同上。

31) 三浦義彰「三宅良斎略伝」、同『文久航海記』(東京：冬至書林、1942年)所収、1-67頁、22頁。

32) 古賀謹一郎の蔵書は宮内庁書陵部に所蔵される。

33) 出版の経緯は、都立中央図書館特別買上文庫中の「開版見改元帳二」に記されている。なお同資料は、日本科学史学会編『日本科学技術史大系・第1巻・通史(1)』(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64年)に活字翻刻されており(61-66頁)、該当箇所は62頁参照。

34) 福井保『江戸幕府刊行物』(東京：雄松堂出版、1985年)228-229頁。

35) 福井保『江戸幕府刊行物』228頁。

36) 福井保『江戸幕府刊行物』第9章「蕃書調所・洋書調所・開成所の刊行物」、第10章「陸軍所の刊行物」。

及に重きをおいたのが、幕府による『博物新編』の翻刻であったといえよう。

次、第二の問題である翻刻の時期の遅れはどのように解釈できるであろうか。『博物新編』の中国書が1850年代後半、日本に伝わら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か。ホブソンの医学書は舶載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博物新編』のみ伝わらなかったとは考えにくい。高知県の牧野文庫には『博物新編』の最初の形態である『博物新編三集』(広州恵愛医館、1854年)が所蔵されており³⁷⁾、筆者は伝来していたと考えている。また幕府の刊行についても筆者はかつて『官板博物新編』の調査にもとづき安政6年(1859年)遅くとも万延元年(1860年)には出版されたと推論したことがある³⁸⁾。この推論にしたがうなら、1851年から1858年にかけ順次、中国で刊行されてきたホブソンの代表作5点は日本で数年から早いものは1年以内に、1860年の時点にはすべて翻刻され、日本で普及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となる。

ホブソン書の和刻本は木版を用いた整版でおこなわれ、いったんつくられた版木は繰り返し印刷に使用された。このため印刷はのちになると刷りが鮮明でなくなった。逆に不鮮明な印刷物でも流布した事実は、需要が途絶えることのなか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この増刷の過程は連続的であり、印刷物に違いを見出すのは容易ではない。ところが漢訳洋学書の中には木活字版で和刻本がつくられたものがある。木活字による印刷は活字を組み印刷する、これで完結しており、印刷が終われば活字はもとに戻される。本を求める人がいれば再度、活字が組まれて印刷がおこなわれることになる。活字の組み直しがあればそこに誤植が生まれる可能性が出る。この点に注目すると、誤植の違いから版面の違いが指摘され、流布する過程を追うことができる。ホブソン書ではないが、ホブソン書の和刻本作成のきっかけをつくった前述のマッゴウァンの中国書『航海金針』で、この方法を用い、普及の様子を再現してみよう³⁹⁾。

『航海金針』は入華医療宣教師で米国人のマッゴウァン(Daniel Jerome Macgowan、中国名、瑪高温)が、英人リードの『(航海実用)暴風・種々の風の法則』(1849年)の東アジアから東南アジア海域の台風の箇所をもとに、中国語で著した航海気象学書であった。1853年に寧波でマッゴウァンの住居兼診療所であった愛華堂から刊行されている。この本は1年もたたないうちに上海や香港などの開港地で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もなく日本にも伝わるようになった。本書を入手したのが薩摩藩で、同藩は木活字版で一部宗教的字句を削除して翻刻している。木活字版は百から数百の部数しか印刷できず通常の出版物扱いを受けない。薩摩藩は府学版つまり藩校による出版物として作成しており、せいぜい藩内の教育用に供するつもり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

ところがこの出版を江戸でおこなったため、蕃書調所関係者の間で注目されることになり、同関係者のみならず洋学者、洋学に関心をもつ藩主、藩校が読者となった。最初の版は安政3年(1856)に公刊されたが、まもなく第2版が作成され、安政4年(1857)の第3版からは江戸の大書店の一つ、岡田屋嘉七に販売が委ねられ、より広範囲に広まった。第4版まで作成され、現在、日本国内に50以上の刊本の所在が確認されている。国外でもオランダのライデン大学図書館や米国議会図書館にも所蔵されており、韓国でも前述の『韓国所蔵中国漢籍総目』に国立中央図書館蔵として1本が収録されている⁴⁰⁾。

37) 高知県立牧野植物園編集発行『牧野文庫蔵書目録(和書・漢籍の部)』1986年、136頁。

38) 八耳俊文「幕末明治期に渡来した自然神学的自然観」133頁。

39) 八耳俊文『『航海金針』の成立と流布』『一滴』第14号(2006年)41-64頁。

40) 和刻本とは記載されていないが、『総目』3の643-644頁の説明文にある「聚珍板」という文字(これは活字版の雅称であって日本版にある文字で、中国書にはない)、「26.0×17.7cm」との大きさ、これも和刻本の大きさであることから(中国書は29.7×17.5cm)、同図書館蔵本は和刻本であることは

マッゴウァンは1859年に長崎に来日したとき、本書に出会っている。彼はのちにこの体験を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私は上海から長崎を訪れたが、そこで私は全くの見知らぬ人でないことを知った。長崎の書店では『航海金針』が販売されていたのである。それは薩摩侯が名誉にも私の名前で鹿児島にて翻刻してくれていたものであった⁴¹⁾。」薩摩侯とは島津斉彬のことである。

マッゴウァンは日本を訪れるさい、日本ではこれら漢訳洋学書が歓迎されるとの情報を得て、ホブソンの『内科新説』や『婦嬰新説』やウイリアムソンらの『植物学』を用意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ろう。このほかには中国語訳の聖書も持参したと述べている。ワイリの『入華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師記録：著作と生涯』（1867年）の「六合叢談」の項では日本で幕府により宗教的記事を除いて翻刻されたことを書誌情報として記載している⁴²⁾。ではホブソンは自著が日本で翻刻版がつけられるほど読まれていると知っていたのであろうか。これについての記録はないが、ホブソンの旧蔵書が現在、ロンドンのウェルカム図書館に所蔵されており、その中に三宅良斎が翻刻した『西医略論』が含まれている⁴³⁾。三宅による翻刻が安政5年の暮れ(1859年1月)になされたとする、ホブソンはすでに1858年12月に上海を離れており、中国滞在中にこの和刻本は入手できなかったが、帰国後、誰かから贈られ、ホブソンは承知していたと思われる。

ホブソンの書物はこのように日本でも読む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が、これらの解説書も著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最も早い試みは、「開版見改元帳」の万延元年(1860)の部に記録の残る、正月、広瀬元恭が申請した「婦嬰新説釈義」3冊をあげることでできる⁴⁴⁾。これは同年正月11日に改済みとなった。現在、この書を確認できず、実際に刊行されたか不明である。しかし京都の医者、広瀬元恭が安政6年(1859)に刊行された『婦嬰新説』をテキストに1年もたたないうちに解説書を著し、出版申請しているのは注目される。広瀬元恭の養子となった広瀬元周が明治7年に『婦嬰新説和解』を刊行している。この題言(明治6年)によれば広瀬家の家塾で本書を講義し、その講義録が塾生により作成されたが、そのまま家蔵していた。そこに京都寮病院教師ヨンケルに学んだ友人林得三の勧めがあり、出版を決意したとする⁴⁵⁾。家塾とは広瀬元恭の時習堂をさすならば、「婦嬰新説釈義」の原稿がもとになっ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

幕末期にはまだホブソン書の原文の翻刻にとどまっていたが、明治に入ると、これらは漢文であったため、解説を加えた邦訳書が刊行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博物新編』については大森惟中(秀三、解谷)訳の『博物新編訳解』全5冊が慶応4年(1868)から明治3年(1870)にかけ出版されている。『全体新論』については明治6年から7年にかけ、高木熊三郎訳の『全体新論訳解』が大阪の文栄堂から、明治7年には石黒厚訳の『全体新論訳解』が名古屋の静観堂から出版された。明治11年には松井惟利抄訳の『通俗全体新論』初編が東京で刊行されている。これは『全体新論』の本文の前半を抄訳し、養生の勧めを随所に挟んだものである。『西医略論』については明治10年、山本義俊訳の『西医略論訳解』が東京の萬笈閣から刊行されている。『婦嬰新説』については広瀬

間違いないであろう。

41) *The Rising Sun and Nagasaki Express*, January 18, 1893, p.3.

42)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173.

43) Hartmut Walravens(Introduction by Nigel Allan),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94), p.10.

44) 「開版見改元帳」(日本科学技術史大系・第1巻通史(1))63頁。

45) 広瀬元周『婦嬰新説和解』(京都：文明書楼、1874年)題言、1ウ。

元周の『婦嬰新説和解』が明治7年に上梓されたことは前述した。『内科新説』の邦訳版の存在は確認していない。ただ『内科新説』の一節でコレラの症状と対症法を記した「霍乱證論」を抜粋して、『内科新説伝染霍乱説コレラ病』のタイトルにて安政7年の序で刊行されている。翻刻は尾張藩医師柳田政矩によりおこなわれ、彼の門人である信濃の医者関島良致が製本している。原文であるテキスト自体も明治になっても繰り返し印刷された。『博物新編』などははっきりと再刻(明治5年)、三刻(明治7年)を明記した版がつくられ、より広く流布した。

『博物新編』の普及にともないこの補遺版の体裁をもった科学入門書も著された。小幡篤次郎訳述の『博物新編補遺』で明治2年に尚古堂から発売された⁴⁶⁾。序の日付は慶応4年8月とされており、明治に改元される1ヶ月前に原稿が準備されたことになる。小幡篤次郎は中津出身、慶応義塾のメンバーの一人で、のち教育者、英学者、啓蒙思想家として活躍した。本書はロバート・チェンバーズの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を翻訳したもので、『博物新編』を「窮理ノ端倪ヲ示シ之ニ由テ物理ヲ推究シテ漸ク大知ノ域ニ進ム可キ門戸ヲ開ケリ」と評価し、本書を「珍藏スルモノ少ナカラス」とし、「西洋文明開化ノ由テ来ル所ノ原アルヲ知ラシムヘキ宝鑑」として刊行したと説明している。全3冊で松永俊男の研究によれば1860年代前半の版(1861年版か)を翻訳したものという⁴⁷⁾。書名の一部に「博物新編」がつくが、科学入門書という点で一致するものの直接には関係ない。

もはや幕末には「博物新編補遺」の書名が起案されるほど、『博物新編』は流布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明治9年(1876年)に東京の大角豊次郎が出版した『博物新編二編』2冊も、科学入門書ではあるが『博物新編』との繋がりはない。本書で興味深いのは清国広東省香山県の容兆倫(槐圃)の著作とされている点である。序文には中国の南屏氏紹雲が明治8年に東京に遊んだおり、郷土の人で博聞多覧の容兆倫先生に出会い、本書の原稿を見たところ、事理を窮め尽くしていることに感動し、貴重な著述が湮没しないためにも刊行することにしたとの経緯が記されている。内容は、人類総論からはじまり地学、力学、植物学、化学、人体論の順となっている。力学は棹や滑車や斜面などを扱い、原本はチェンバーズの『国民百科』(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のようにも思えるが、このように西洋の科学に通暁していて、広東省香山県出身で明治8年に東京に居た容兆倫とはどのような人物であったであろうか。容という姓、広東省香山県というと中国最初の米国留学生容闳が浮かぶが(彼はさらに香山県南屏村出身である)⁴⁸⁾、彼自身は日本に居住しておらず、彼と何らかの関係がある人物なのであろうか。本書に関する研究はないが、今後の研究が期待される資料である。

以上、ホブソンの著書が日本でどのように歓迎されたのか述べた。和刻本の出版地は東京(江戸)、名古屋、京都、大阪と各地にわたる。出版者もあるいは出版に関与した人も開成所という幕府から、民間の医者、教育者と多様である。これはホブソン書に限らず幕末維新期の漢訳洋学書の出版に携わった人々についても同様に指摘できる。これらの普及に貢献したのは特定の人物というより日本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広がりであった。もし漢訳洋学書の出版に意義を認めるとするなら、日本ではこの事業に携わった人々の多様さが、その意義を強めたといってい間違いないであろう。

46) 小幡篤次郎訳述『博物新編補遺』(東京：尚古堂、1868年。再刻、慶応義塾出版局、1873年)巻上中下。

47) 松永俊雄「チャンバーズ著『科学入門』と小幡篤次郎訳『博物新編補遺』」『桃山学院大学人間科学』第24号(2003年)149-168頁。

48) 百瀬弘訳注『西学東漸記－容闳自伝－』(東京：平凡社、1969年)、石霓訳注『容闳 自伝－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管林主編『広東歴史 人物辞典』(広州：広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34頁。

한역양학과와 19세기의 출판문화

—홉슨의 서적을 중심으로—

八耳俊文 (靑山學院女子短期大學校)

〈목 차〉

- I. 서 론
- II. 홉슨 서적의 성립
- III. 한자문화권으로의 보급
 - 1. 베트남
 - 2. 중국
 - 3. 한국
- IV. 일본으로의 보급

I. 서 론

필자의 수중에는 ‘경성제국대학도서관’의 장서인이 찍힌 벤자민 홉슨(Benjamin Hobson, 1816-1873)의 중국어 의서가 있다. 〈서의약론〉(초판 1857년), 〈내과신설〉(초판 1858년), 〈전체신론〉(초판 1851년), 〈부영신설〉(초판 1858년)의 네 점으로 모두 중국서적이다. 인쇄 상황으로 볼 때 후인으로 판단되나 ‘의 774 부터 의 777’의 스탬프와 ‘약 1639’부터 ‘약 1642’의 스티커가 붙어 있어 예전에는 이 대학 의과대학도서관실 혹은 의과대학 약학강좌의 소장이었을 것이라 추측된다.

이 발표는 한역양학과 특히 홉슨의 서적을 예로 들어 이것이 어떻게 한자문화권에 유포되었는지에 대해 언급하고 그 후 일본에서는 다양한 관련서적이 간행되었다는 점을 막부 말기부터 메이지 초기의 19세기의 출판문화에 비추어 논하고자 하는 것이다.

II. 홉슨 서적의 성립

가나가와대학 부속도서관은 교육과도를 다수 소장하고 있는데 그 중에 로빈슨동물과도라는 것이 있다.¹⁾ 크기는 약 85×60으로 ‘포유류’ ‘조류’ ‘양서류, 파충류, 어류’ ‘연체동물, 유관절동물, 방사상칭동물’의 4가지 축으로 이루어진다. 다양한 동물을 색깔별로 표현하며 4분류 속에 배치해 정리해놓은 것이다. 화공인 프레드릭 로빈슨(Frederick Robinson)이 그림

1) 마쓰다 기요시·마스미쓰 마오편 『가나가와대학소장근대과도목록-인쇄도편-』(교토: 교토대학대학원 인간·환경학연구과, 2008년)11-14쪽, 109쪽.

을 그렸으며 1855년에 런던에서 간행되었다. ‘제4고등중학교 도서’라는 인장이 찍혀있어 제4고등중학교에서 사용된 것으로 사료된다.

그것과 같은 그림을 홉슨의 〈박물신편삼집〉에서도 볼 수 있다. ‘태생류’ ‘난생류’ ‘인개류’ ‘곤충류’로 분류된 그림이다.²⁾ 〈박물신편삼집〉의 초판은 1854년에 간행되었기 때문에 로빈슨동물패도보다 오래된 것이어서 후자를 바탕으로 전자가 작성된 것은 아니지만 원그림이 같고 그것을 바탕으로 〈박물신편삼집〉의 그림이 그려지고 한편에서는 로빈슨동물패도가 만들어졌다고 생각하는 게 옳은 것인지 아니면 로빈슨동물패도는 그 이전에 만들어졌고 1855년판은 그 신판으로 간주하여 오래된 판을 직접적이든 간접적이든 원그림으로 해서 〈박물신편〉의 그림이 그려졌다고도 생각할 수 있다. 어쨌든 이 패도의 존재는 〈박물신편〉의 그림이 독자적으로 작도된 것이 아니라 당시에는 많이 사용된 교육도였음을 나타내주고 있다.

홉슨은 1816년 잉글랜드 중부의 노샘프턴셔주의 웰포드에서 태어났다.³⁾ 아버지는 이 지역의 회중파의 목사였다. 지금도 아버지가 현직에 있으며 홉슨이 자란 교회가 이 지역에 남아있다. 1830년대 전반, 홉슨은 버밍엄종합병원 부설 의학학교에서 의학교육을 받았다. 그리고 1835년에는 유니버시티 칼리지 런던에 진학하여 전문적으로 의학을 배웠다. 이 대학에서는 의학의 기초로 과학을 익혔으며 의학에 대해서는 약학, 산과학, 해부학, 외과학, 내과학 등을 두루 배운 것으로 알려져 있다. 1838년에는 런던왕립외과의사협회의 시험에 합격하고 1839년에는 유니버시티 오브 런던의 학위시험에도 합격하여 의학학사 학위를 취득했다. 1838년에 런던전도회로부터 광저우의 의료선교사가 되라는 지명을 받아 1839년 7월에 영국에서 출항, 그 해 말에 마카오에 도착하였다.

마카오에서는 1843년 1월까지 진료를 계속했고 그 후에는 난징조약 체결로 영국에 할양되었던 홍콩으로 이주하여, 신설된 병원의 경영을 맡았다. 여기서 의료와 더불어 포교활동도 하였다. 중국에서 활동하면서 중국의학에는 해부학의 지식이 결여되어 있음을 깨닫고 서양의학을 익힌 중국인의사의 양성에 대해 생각하게 되었다. 광저우에 이주한 후 이를 실현시켰으나 곧 4가지 어려움에 부딪혔다. 하나는 중국어로 수업하는 어려움, 둘째 해부나 실험기구 부족, 셋째 의학의 기초를 가르치는 중국어 텍스트의 결여, 넷째 판치는 잘못된 의학이론과 처방이었다. 홉슨은 영국에서 최신의학을 배우고 성적도 상위권이었으며 전도에 대한 열정에 가득 찬 젊은 의사였다. 그런 홉슨에게 중국의학에 대한 이해를 기대할 여지는 없었다. 1849년에 홍콩 상인을 통해 석판인쇄기계를 구입한 것을 계기로 중국어로 된 텍스트를 만들기 시작하였다. 맨 먼저 저술한 것이 〈천문약론〉으로, 의학이라기 보다 전도의 일환으로 씌어졌으며 서양인이 운영하는 학교에서 교과서로 사용되었다.

1850년 겨울에 병원내에서 의학 강의를 주 3회 개설되어 그림이 들어간 해부학과 생리학 책을 홉슨의 중국어교사인 천슈탕(陳修堂, 진수당)의 협력으로 완성하였다. 이것이 〈전체신론〉이다. 여러 권의 의학서적 그림 위에 얇은 종이를 대서 베끼는 그림이 실렸다. 인쇄부수는 초판이 1200부, 2쇄가 2000부로, 중국내외의 서양인들의 재정적 지원으로 출판될 수 있

2) 『박물신편삼집』(광저우: 해애의관, 1854년)1갑-1을.

3) 홉슨의 생애는 야쓰미미 도시후미「웰컴도서관장 홉슨문서를사용한 벤자민 홉슨(合信)전」『아오야마가쿠인여자단기대학 종합문화연구소 연보』제11호(2003년)99-120쪽, 에 의함.

었다. 중국측에서도 관심을 보여 1852년에는 판쓰청(潘仕成, 반시성)이 편찬한 <해산선관총서>에 포함되었다. 그리고 1853년에는 양광 총독인 섭명침(葉名琛, 예밍첸)의 아버지, 섭지선(葉志詵)이 <전체신문>의 그림 부분만을 여덟 폭으로 정리한 <전체분도>를 만들어 양광 총독서에서 간행하였다. 인체도의 껍데기이다. 섭지선은 <전체신문>을 번각하기도 하였다. 흡슨도 그림을 석판에서 목판으로 바꾸었고 그 이후에는 종종 증쇄되었다.

<박물신편>도 광저우시대에 만들어졌다. 이 <박물신편>의 성립 경위는 불명확한 부분도 있으나 <전체신문>과 마찬가지로 천슈탕의 협력을 얻어 1853년에 저술이 이루어져 1854년에는 제3집이 2000부 인쇄되었다. 초집과 제2집도 같은 해 1854년 중에 인쇄예정이었으나 광저우에서는 외세 배척의 기운이 고조되어 인쇄를 계속하는 것은 위험하다고 판단, 인쇄는 상하이로 옮겨 1855년에 전3집을 엮어 목해서관에서 발행되었다.

흡슨도 1857년에 상하이로 활동거점을 옮겨 시간적 여유를 가지고 집필활동에 임하게 되었다. 그 해는 서양의학서를 바탕으로 한, <전체신문>의 속편으로 중국에서의 치료예도 다수 실은 <서의약론>을, 에드킨스의 추천을 받은 제자인 관사복(管嗣復)의 협력을 얻어 완성시켜, 상하이의 인제의관에서 그 해에 500부 출판하였다.⁴⁾ 700부의 추가인쇄도 보장받았다.⁵⁾ 이듬해에는 산과와 소아과 서적인 <부영신설>을, 내과와 약물을 설명한 <내과신설>을 역시 관사복의 협력으로 저술하여 1858년에 상하이 인제의관에서 간행하였다. 흡슨은 1858년 12월에 상하이를 떠나 귀국했으나 외국인상인들로부터 흡슨의 서적의 예약구매대금으로 2000달러를 지불하겠다는 약속을 받아 흡슨은 귀국 후에도 인쇄를 계속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흡슨의 책은 중국에서도 수요가 많았으나 그의 활동을 지지하는 서양인사회에서 재정적인 지원이 있어서 수요에 따라 공급되었던 게 아니라 수요와 상관없이 대량으로 인쇄되었던 것이다.

III. 한자문화권으로의 보급

1. 베트남

이러한 흡슨의 의학서적들은 그의 과학입문서였던 <박물신편>(초판 1855년)과 더불어 19세기 후반, 때로 20세기 초반까지 한자문화권의 사람들이 사양의학이나 과학을 배우는 데 사용되었다. 먼저 그 예를 베트남에서 살펴보자. 베트남의 국가도서관은 고전서적을 다수 소장하고 있으나 그 중 ‘고전’ ‘역사’ ‘철학’ ‘문학’에 분류되는 역사자료(주로 간본)를 웹상에서 공개하기 시작하였다(<http://www.nomfoundation.org/index.php>). 그 ‘철학’ 분류에 <박물신편>이 포함되어있다. 사덕30년(1877)에 씌어진 진중공(陳仲恭)에 의한 ‘중전박물신편서’이다. 그 표지에 ‘유신을유(1909) 맹하/박물신편/관문당장판’이라고 되어있고 두 권으로 이루어져

4) 『서의약론』영문서, Wellcome Library, Hobson Papers, MS.5852/16.

5) A Short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Canton, December 1857, Wellcome Library, Hobson Papers, MS.5852/18/1-3.

있다. 첫 권은 〈박물신편〉 초집을, 둘째 권은 2집과 3집을 번각한 것이다. 이 도서관의 고문서적의 의학관련서적에 대해서는 이미 이바라키대학의 진유성이 조사한 바 있으며 이 〈박물신편〉도 거기서 보고되어 있다. 그 보고에서 진유성은 1877년의 하노이판을 바탕으로 한 1909년의 베트남 관문당장판의 간본이라고 기술하고 있다.⁶⁾ 중국서적이 출판 후 20년 만에 베트남에서 번각되었고 20세기에도 간행되고 있는 것은, 베트남에서 이 책의 존재의 의는 20세기가 되어서도 여전하다는 점을 말해주고 있다.

2. 중국

중국에서는 〈전체신문〉이 주목을 받아 〈해산선관총서〉에 수록되거나 섭지선에 의해 번각되기도 하였다. 홉슨은 예언 중에서 방본(민간출판물)도 많이 나와있지만 그림에 오류가 많아 주의가 필요하다고 쓰고 있어, 정확하지 않은 속본까지 유포되었음을 시사하고 있다. 의사들 중에는 〈전체신문〉의 지식을 자신의 것으로 하고자 하는 사람들도 있었다. 홉슨 서적 간행 전후에 중국의 전통의학과 서양의 근대의학의 양 이론에 정통하고자 한 ‘중서의회통파’라 불리는 의사들로, 그들의 저술을 검토한 마쓰모토 히데시에 의하면 그들의 대부분의 의서는 〈전체신문〉등 중국어로 된 서양의학서를 참조한 것이며 인체해부도는 〈전체신문〉이나 〈부영신설〉에서의 인용이 많고 그 중에는 〈박물신편〉에 언급한 것도 있다고 한다.⁷⁾

루쉰(魯迅)도 독자의 한 사람이었다. 그는 난징의 강남수사학당에서 목판의 〈전체신문〉을 본 적이 있다고 〈吶喊(납함)〉자서(1922년)에서 기술하고 있다.⁸⁾ 그가 본 것은 19세기 말 이었는데 1929년 10월 22일에 강소원(江紹原)에게 부친 편지에서, 〈전체신문〉뒤에 ‘등 오종’이라는 세 글자를 추가할 것을 요청하였다.⁹⁾ 홉슨의 대표작이 상기의 다섯 종이였음을 루쉰은 알고 있었던 셈이다. 홉슨이 중국에 있었던 1858년에는 이미 〈박물신편〉부터 〈내과신설〉까지 다섯 종은 좋은 평가를 받고 있었다.¹⁰⁾ 루쉰은 홉슨의 서적을 어느 정도 읽었는지는 기록에 남기지 않았지만 중국의 전통이 아니라 서양의 새로운 문화의 서적으로 받아들이고 있었음은 확실하다.

3. 한국

한국에서는 2005년에 연세대학교의 전인초 주편으로 〈한국소장중국한적총목〉(학고방) 전6권이 간행되었으나 그 자부, 서학류를 보면 중국에서 발행된 전도단체의 한역양학서나 종교

6) 진유성「베트남국가도서관의 고의적서지」『이바라키대학 인문학부 기요인문학과논집』 제45호(2006년)1-16쪽 중 15쪽.

7) 마쓰모토 히데시「중화문명상에 편입되는 서양의학」『흑문』 제10호(2005년)29-46쪽.

8) 루쉰「납함·자서」, 마루야마 노보루 역자대표『루쉰전집2]납함·방황』(도쿄: 학습연구사, 1984년) 9-17쪽.

9) 루쉰「江紹原에게」, 다케우치 미노루 역자대표『루쉰전집14]서간 I』(도쿄: 학습연구사, 1985년) 458-459쪽. Jiang shao-yuan

10) 왕도는 이들 다섯 점을「筆墨簡潔, 講論精核, 真伝作也」라며 높이 평가하고 있다(왕도일기, 咸豐8年十有四月乙酉). 방행·양지적정리『왕도일기』(베이징: 중화서국, 1987년)55쪽.

서적, 강남제조국의 과학기술서 등의 다수가 한국내에 소장되어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¹¹⁾. 필자는 예전에 일본국내에 소장되고 있는 같은 종류의 서적의 소장목록을 만든 적이 있는데¹²⁾, 그것과 비교하자면 한국에서 소장되고 있는 종류의 다양함은 일본을 능가하며 특히 강남제조국의 출판물은 서울대학교 규장각의 장서를 비롯 일본보다 훨씬 많다고 할 수 있다.

홉슨의 서적을 앞서 나온 〈총목〉에서 보면 서울대학교의 규장각이나 고려대학교 화산문고 등지에서 소재를 확인할 수 있다.¹³⁾ 실제로 필자는 2006년 3월에 고려대학교 중앙도서관내에서 〈부영신설〉과 〈전체신론〉을 열람한 적이 있는데, 후인이기는 하나 둘 다 화각본이 아니라 중국서였다. 〈총목〉에 의하면 두 점 다 의학학교에 소장되어 있었다고 하니 홉슨의 중국어로 된 의서는 한국에서도 서양의학서로 주목받고 있었던 것 같다. 한편 규장각은 ‘조선왕조기인 1776년에 왕실의 각종 기록이나 조선의 고전서적, 중국서적의 수장, 보존 등을 통괄하는 기관으로 설치된 것’¹⁴⁾으로, 한일합방으로 한때 이왕직의 관리하에 있었으며 그 후 조선총독부 소관이 되어 경성제국대학 성립 후 1928년부터 30년에 걸쳐 경성제국대학 부설도서관으로 이관되었다고 알려져 있다¹⁵⁾. 현재의 서울대학교 규장각이다.

이 조선총독부 시대에 규장각 문고에 포함되어 있던 조선도서와 중국도서에는 대해서는 〈조선총독부고도서목록〉이 작성되어 있다.¹⁶⁾ 이 목록의 중국도서의 자부에 특히 병가류, 농가류, 의가류, 천문류, 역학류, 예술류에 많은 서양서가 소장되어있었음을 확인할 수 있는데, 홉슨의 서적도 의가류에 〈내과신설〉 세 점, 〈서의약론〉 세 점, 〈부영신설〉 네 점, 〈전체신론〉 두 점, 예술류에 〈박물신편〉 다섯 점을 볼 수 있다. 조선왕조는 활발하게 이들 양학서를 구입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이들이 훗날에 경성제국대학에 소장되었을 텐데 필자가 모두에 소개한 서적이 그에 해당되는지는 알 수 없다. 경성제국대학에는 〈부속도서관화한서서명목록〉이 1933년부터 편찬되어 있으나 이에는 의과대학이나 이공학부의 도서가 포함되어 있지 않아서 이와 관련된 책의 행방을 추적할 수 없기 때문이다.¹⁷⁾ 그렇다면 〈목록〉 제2집(1935년)에는 〈부영신설〉과 〈내과신설〉이, 제3집(1936년)에는 〈박물신편〉이 두 점 수록되어 있다. 이들이 어떻게 이용되었는지는 분명하지 않지만 중국에서 발행된 홉슨의 서적이 조선에 반입되어 그것이 몇 가지 경로를 거쳐서 이 대학 도서관에 소장되었음은 틀림없다.

중국에서 간행된 서적이 다양한 경로를 통해서 조선시대의 지식인의 손에 건네졌던 예로, 정약용(다산, 1762-1836)의 〈마과회통〉보유에 수록된 ‘신증종두기법상실’이 있다.¹⁸⁾ 이것은 1805년에 영국 동인도회사 상관의였던 피어슨(Alexander Pearson)이 마카오에서 종두

11) 전인초주편 『한국소장중국한적총목』삼(서울: 학고방, 2005년)자부서학류, 592-647쪽.

12) 야쓰미미 도시후미「청말기서인저역과학관계중국서 및 화각본소재목록」『화학사연구』 제22권 제4호 (1995년) 312-358쪽.

13) 전인초주편 『한국소장중국한적총목』삼, 603-604, 610, 612, 633-634쪽.

14) 미야모토 마사아키「해제」, 가토 기요후미·미야모토 마사아키 편 『구식민지도서관장서목록』 제1권·경성제국대학부속도서관화한서서명목록(도쿄: 유마니서방, 2002년)수록, 417-423쪽 중418쪽.

15) 상동.

16) 가토 기요후미·미야모토 마사아키 편 『구식민지도서관장서목록』 제11권·조선총독부 고도서목록/조선총독부 고도서목록보유(도쿄: 유마니서방, 2006년).

17) 경성제국대학부속도서관화한서서명목록 제1집(1933년), 별례.

18) 「신증종두기법상실」규광제 각본, 『마과회통』보유 수록, 교토대학부설도서관장 후지카와문고.

를 실시한 경험을 토대로 작성한 종두의 해설(영문)을, 현지에서 중국어에 능한 스톤턴(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생)이 중국어로 번역한 것으로,¹⁹⁾ 광저우를 중심으로 보급되어 증판도 이루어졌다. 1828년에는 베이징의 리우리창(琉璃廠)에서 규광제(奎光齋)에 의해 중간본이 만들어졌는데 <마과회통>에 수록된 것은 이 규광제 간본이다. <마과회통>의 보유가 정약용의 손에 의한 것인지 후세 사람들이 추가한 것인지는 분명하지 않지만²⁰⁾ ‘신증종두기법상설’은 <英咭喇國종두기서>라고도 하여 1805년에 중국에서 간행된 후 일본에는 보급이 늦어 1841년에 이토 게이스케가, 1849년에 히로세 겐코가 번각해서 알려졌다. 그 이전에 베이징판이 조선에 전래된 것은 흥미로운 점이다. 베이징의 리우리창의 고문서거리는 연행사를 수행한 문인들이 즐겨 들렀다고 하니²¹⁾ 리우리창에서 발견한 보기도문 출판물이라 하여 조선에 들고 들어갔던 것일까.

홉슨의 서적이 조선에서 사용된 예로는 최한기(1803-77)의 ‘신기천협’을 들어야 할 것이다.²²⁾ 최한기는 사상가답게 만학에 관심을 가지며 인간의 신체에 대한 이해를 심화시키기 위해 서양의학서로 홉슨의 서적을 독파하였다. ‘신기천협’은 전9권이며 1, 2권은 <전체신론>, 3, 4권은 <내과신설>상권, 4권 끝부터 7권의 시작부분까지 <서의약론>상, 중권, 7권의 나머지 대부분은 <부영신설>, 8권은 <박물신편>초집, 8권 속편은 <내과신설>하권과 <서의약론>하권을 발췌해 적고 요소요소에 자신의 의견을 추가하였다.

홉슨의 서적을 읽어본 사람은 많아도 이와 같이 다섯 점 모두를 읽을 수 있는 환경에 있던 사람은 적었을 터인데 최한기는 어떤 루트로 이 책을 읽었는지 관심이 가는 바이다. 그가 독자적으로 의견을 단 것은 서, 범례, 목록 이외의 본문에서는 1권 모두의 ‘뇌위일신지주’, 2권 말의 ‘신기총론’, 3권 모두의 ‘중서의학’, 8권 모두의 ‘제기치용’, 8권 말의 ‘만물문화개설의학’이며 총론에 해당된다. <박물신편>에 대해서는 전3집 중 초집만 의견을 단 것은 우연이었는지 혹은 최한기에게 읽을 기회가 이 초집만 있었던 것인지는 알 수 없다.

조선에서의 우두종두의 창시자이자 보급자로 알려진 지식영도 이 홉슨 서적의 독자였다. 미키 사카에는 지식영이 소장했던 의학관계서로 <박물신편(당본)> 한 권, <전체신론(당본)> 한 권, <내과신설(당본)> 한 권, <내과신설(화각본)> 세 권, <부영신설(당본)> 한 권, <부영신설(지석영 자필본)> 한 권이 있었다고 보고한 바 있다.²³⁾ 또한 미키 사카에에 따르면 지식영은 1885년에 <우두신설>을 저술하여 사가판을 만들어 배포하였는데 그 책에는 홉슨의 종두론이 게재되어 있다고 한다.²⁴⁾ 이는 <부영신설>에 있는 ‘종두론’을 지칭하는 것으로 보인다. 홉슨은 이 항목에서 우두법의 극적인 효과와 아직 중국에서 확산되지 않고 있던 현황에 대해 언급하고 있다. 장서에 있는 자필의 <부영신설>은 이 책을 필사한 것인 듯하다.

19) 다사키 데쓰로 『『英咭喇國종두기서』에 대하여』, 아리사카 다카미치·아사이 마사아키 편 『논집 일본의 양학』 II(오사카: 세이분도출판, 1994년)203-220쪽.

20) 미키 사카에 『조산의서지 증수판』(오사카: 학술도서간행회, 1973년).

21) 강재언 『서양과 조선-이문화의 만남과 격투의 역사-』(도쿄: 아사히신문사, 2008년)155쪽.

22) 최한기 『신기천협』, 동 『증보 명남루총서』 4(서울: 성균관대학교 출판부, 2002년)수록, 263-507쪽.

23) 미키 사카에 『조선의학사 및 질병사』(교토: 온분카쿠 출판, 1991년)267-268쪽.

24) 미키 사카에 『조선의학사 및 질병사』 263쪽.

IV. 일본으로의 보급

일본의 특징을 말한다면 중국서적의 수입은 체계적이지 않았을 지도 모르나 가지고 있는 게 유익하다고 판단되면 중국서적을 바탕으로 일본판을 만들어 적극적으로 일본국내에서의 보급에 힘썼다는 점이다. 조선왕조는 중국의 문화동향에 민감하여 끊임없이 신간을 구입하였으나 보급시키는 데는 그다지 심혈을 기울이지 않았다. 이에 대해 홉슨의 서적을 예로 들면 모두 화각본이 만들어져 특히 <박물신편>같은 경우에는 막부 말기부터 메이지 초기까지 번교, 향교, 소학교의 자연과학 교과서로 가장 많이 활용되는 서적이었다.²⁵⁾ 필자는 이를 두고 1860년대, 70년대의 20년간을 ‘박물신편의 시대’라 표현한 적이 있다.²⁶⁾

이러한 서적이 일본에 보급된 과정에는 다양한 루트가 있었지만 막부 말기가 되면서 외국인이 입국할 수 있게 되어 직접 중국으로부터 들여오는 예를 볼 수 있게 되었다. 1859년 1월에 상하이에서 나가사키로 온 미국인 맥고웬(Macgowan)의 경우 그는 Ningbo에서 13년간 의료선교사로 활동한 경험이 있으며 필담으로 일본인과 교류하였다.²⁷⁾ 그리고 1858년에 상하이인제의관에서 출판된 홉슨의 신간인 <부영신설>과 <내과신설>을 나가사키의 의사인 후쿠치 고안(福地苟菴)에 기증한 바 있다. 그리고 오무라번의였던 오모토 고도에게는 1858년 상하이에서 간행된 <식물학>을 기증하였다. 후쿠치 고안은 그가 받은 책의 번각을 결심하나 중간에서 좌절, 교토의 의사인 안도 게이슈(安藤桂洲, 天香堂)에게 출판을 맡겼다. 안도 게이슈(天香堂)는 안세이6년(1859)에 막부의 출판허가를 얻어 안세이6년에 <부영신설>을, 안세이 7년에 <내과신설>의 일본판을 간행하였다.²⁸⁾ 표지에 ‘천안 天香堂 장판’이라고 되어 있는 게 그것이다.

한편 <부영신설>과 <내과신설>의 두 점은 에도의 외과의인 三宅良齋(미야케 곤사이, 桃樹園)도 안세이 6년에 번각하였다. 미야케 곤사이는 <내과신설>을 출판할 때 ‘에도에서 이미 이런 시도가 있었음’이라는 말로 에도에서 화각본이 간행된 점을 언급하고 있다.²⁹⁾ 그러나 가치 있는 서적은 보급시키는 게(‘동서양거’)의의가 있다고 하면서,³⁰⁾ 교토에서의 출판을 추진하였다. 안세이 5년 말에는 미야케 곤사이는 에도에서 <서의약론>도 번각하였다. 미야케 곤사이가 번각한 서적은 표지에 ‘桃樹園 장재’라 되어 있기 때문에 구별이 가능하다. 이와 같이 홉슨의 서적 다섯 점 중 세 점을 재빨리 입수하여 번각한 배경을 ‘곤사이는 아마도 나가사키를 거쳤겠지만 상하이쪽과도 서적 약품 등의 구입에 있어 상당히 밀접하게 소통이 있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고 그의 증손인 미우라 요시아키(三浦義彰)는 ‘미야케 곤사이 약전’에서 추측하고 있다.³¹⁾ 상하이에서 출판된 홉슨 서적이 거의 1년 사이에 일본에 배편

25) 신케 나미오 「『박물신편』-막부 말기의 자연과학교과서-」 『도서』 제411호(1983년)60-63쪽.

26) 야쓰미미 도시후미 「막부 말기 메이지기에 도래한 자연신학적 자연관-홉슨 『박물신편』을 중심으로-」 『아오야마가쿠인여자단기대학 종합문화연구소 연보』 제4호(1996년)127-140쪽 중 136쪽.

27) 야쓰미미 도시후미 「D.J. 맥고웬과 중국, 일본 1843-1893」 『양학』 창간호(1993년) 43-87쪽 중 57-60쪽.

28) 『부영신설』(교토: 天香堂, 1859년)서, 1ウ.

29) 『내과신설』(교토: 天香堂, 1860년)서, 2オ.

30) 상동.

31) 미우라 요시아키 「미야케 곤사이 약전」, 동 『문구항해기』(도쿄: 동지서림, 1942년) 수록, 1-67쪽, 22쪽.

으로 들어와서 번각까지 되고 있는 것이다.

〈전체신문〉은 1851년에 광저우의 혜애의관에서 간행되어 1857년에 흡슨이 상하이로 이주하자 인제의관의 장판이 되었다. 양학에 능한 유학자, 고가 긴이치로(古賀謹一郎)가 소장하고 있던 책 중에 이 혜애의관 장판의 〈전체신문〉이 포함되어 있으며,³²⁾ 일본에는 1850년대 전반에 전해졌던 가능성이 있다. 이 책의 번각을 기획한 것은 오즈(大洲)번 어의인 야마모토 세쓰안(山本節庵)이었으며, 안세이 4년 말에 출판을 신청하여 허가를 얻었으나 이듬해 5년(1858년) 2월 이요 출신으로 당시 교토에서 개업하고 있던 오치 슈(越智崧)에게 장판을 양도하여 ‘오치장판’으로써 〈전체신문〉이 탄생하였다³³⁾. 이러한 경위로 볼 때 〈전체신문〉의 화각본의 성립은 면지에 ‘안세이사정사만동’이라 되어 있으나 안세이 5년(1858)이었던 것으로 생각된다. 이 책의 면장에는 ‘오치장판’이라 되어 있는 것과 ‘二書堂(니쇼도)발태’라 되어 있는 것 두 종류가 존재한다. 본문의 판은 같다. 니쇼도는 교토에 있고 메이지 초기에 교과서를 판매하고 있던 서점이다. 오치 슈도 교토에서 개업하고 있었으니 양도 받아 교토에서 간행한 것으로 추측된다.

〈박물신편〉의 화각본 출판은 막부 스스로가 개성소에서 하였다.³⁴⁾ 관판이기 때문에 출판신청 기록에는 남아있지 않아 출판시기나 경위는 분명하지 않으나 판매를 담당한 老皂館(요로즈야 헤이시로)의 겐치 원년의 ‘발태서목’이, 판권장이 있는 간본이 있는 점으로 보아 겐치 원년 혹은 그 전의 분류연간(1861-1863)에 간행된 것으로 간주되고 있다.³⁵⁾

흡슨 서적 중 과학서인 〈박물신편〉은 왜 막부에 의해 출판되었는지, 그리고 〈전체신문〉부터 〈내과신설〉까지의 네 점의 화각본이 모두 나온 후에 출판된 셈인데 광범위한 독자층이 기대되는 이 책의 화각이 왜 이토록 늦어졌는지, 이 두 가지 점에 대해 고찰해 볼만 하다.

먼저 첫 번째 문제에 대해 살펴보자면, 당시의 막부의 출판물로 이 같은 중국의 양학서를 번각한 것을 들어보면 〈박물신편〉 외에도 〈육합총담〉 〈중외신보〉 〈중외잡지〉 〈중학천설〉 〈수학계몽〉 〈아편계〉 〈만국공법〉이 있다.³⁶⁾ 이들 서적의 공통점은 각각의 분야의 기본문헌으로 정리될 수 있다는 점이다. 앞의 세 점은 세계정세를 전하는 것으로 원본 기사를 취사선택해서 번각되고 있으며 해외뉴스는 막부가 관할하겠다는 의사를 막부가 가지고 있었음을 간파할 수 있다. 〈아편계〉는 아편의 위험성과 대처법을 명기한 것으로 막부의 아편에 대한 위기의식이 나타나있다. 〈만국공법〉은 국제법을 설명하는 것으로 막부가 정치적 판단을 하는 데 참조하는 중요한 문헌이었다. 이렇게 살펴보면 신지식의 관리와 보급이라는 기본적 태도를 지적할 수 있다. 과학분야의 신지식 보급에 중점을 둔 결과가 막부에 의한 〈박물신편〉의 번각이었다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다음으로 두 번째 문제인 번각 시기가 늦어진 것은 어떻게 해석할 수 있을까. 〈박물신편

32) 고가 긴이치로의 장서는 궁내청서릉부에 소장되어 있다.

33) 출판 경위는 도립중앙도서관 특별매상문고 중「개관전개원장 이」에 기술되어 있다. 그리고 이 자료는 일본과학사학회 편『일본과학기술사대계·제1권·통사(1)』(도쿄: 제일법규출판, 1964년)에 활자번각되어 있으며 (61-66쪽), 해당되는 곳은 62쪽 참조.

34) 후쿠이 다모쓰『에도막부 간행물』(도쿄: 웅성당출판, 1985년)228-229쪽.

35) 후쿠이 다모쓰『에도막부 간행물』 228쪽.

36) 후쿠이 다모쓰『에도막부 간행물』 제9장 「번서조소·양서조소·개성소의 간행물」, 제10장 「육군소의 간행물」.

편〉의 중국서가 1850년대 후반 일본에는 전해지지 않았던 것일까. 홋슨의 의학서는 배편으로 운반되고 있는 것으로 보아 〈박물신평〉만 전해지지 않았다고는 생각하기 어렵다. 고치현의 마키노문고에는 〈박물신평〉의 최초의 형태인 〈박물신평삼집〉(광저우해애의관, 1854년)이 소장되어 있어,³⁷⁾ 필자는 일본에도 전해졌을 것이라 생각한다. 그리고 막부의 간행에 대해서도 필자는 예전에 하였던 〈관판박물신평〉의 조사에 따라 안세이 6년(1859년), 늦어도 만엔 원년(1860년)에는 출판되었다고 추론한 바 있다.³⁸⁾ 이 추론에 따른다면 1851년부터 1858년에 걸쳐 순차적으로 중국에서 간행된 홋슨의 대표작 다섯 점은 일본에서 수년 이르면 1년 이내 즉 1860년 시점에는 모두 번각되어 일본에 보급되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홋슨 서적의 화각본은 목판을 사용한 정판으로 이루어져 한 번 만들어진 판목은 반복적으로 인쇄에 사용되었다. 그래서 인쇄는 나중에는 선명하지 못했다. 오히려 선명하지 못했던 인쇄로라도 유포되었다는 사실은 수요가 끊기지 않았다는 증거가 된다. 이 증쇄의 과정은 연속적이며 인쇄물 간에 차이를 발견하는 것은 쉽지 않다. 그런데 한역양학서 중에는 목활자판으로 화각본이 만들어진 것도 있다. 목활자에 의한 인쇄는 활자를 조합하고 인쇄하면 끝이고 인쇄가 끝나면 활자는 다시 제자리로 돌아간다. 그러다 책을 사고자 하는 사람이 나타나면 다시 활자를 조합하고 인쇄를 하게 된다. 활자를 다시 조합하게 되면 오식의 가능성이 있다. 이 점에 주목하면 오식의 차이에서 판면의 차이가 부각되어 유포되는 과정을 추적할 수 있다. 홋슨 서적은 아니지만 홋슨 서적의 화각본 작성의 계기를 만든, 앞서 언급한 맥고웬의 중국서 〈항해금침〉이 어떻게 보급되었는지 이 방법으로 재현해보도록 하자.³⁹⁾

〈항해금침〉은 중국에 들어간 의료선교사로 미국인인 맥고웬(Daniel Jerome Macgowan, 중국명 瑪高温)이 영국인 리드의 〈(항해실용)폭풍, 기타 바람의 법칙〉(1849년)에 나왔던 동아시아에서 동남아시아 해역에 걸쳐 태풍이 발생하던 곳을 바탕으로 중국어로 쓴 항해기상학서였다. 1853년에 Ningbo에서 맥고웬의 주거 겸 진료소였던 애화당에서 간행되었다. 이 책은 1년도 되지 않아 상하이나 홍콩 등의 개항지에 알려져 곧 일본에도 전해졌다. 이 책을 입수한 것이 사쓰마번이며 사쓰마번은 목활자판으로 일부 종교적인 문구를 삭제한 후 번각하였다. 목활자판은 백에서 수백의 부수밖에 인쇄할 수 없어 일반적인 출판물로 간주되지 않는다. 사쓰마번은 부학판 즉 번교에 의한 출판물로서 만들었으며 그저 번 내부의 교육용으로 활용하려고 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그런데 에도에서 출판되었기 때문에 번서조소 관계자들의 주목을 받게 되어 이 관계자뿐만 아니라 양학자, 양학에 관심을 가지는 번주, 번교가 독자가 되었다. 초판은 안세이 3년(1856)에 공간되었고 곧 제2판이 만들어져 안세이 4년(1857)의 제3판부터는 에도의 대형서점 중 하나인 오카다야가시치에 판매가 이양되어 보다 광범위하게 보급되었다. 제4판까지 만들어져 현재 일본국내에서 50이상의 간본의 소재가 확인되고 있다. 국외에서도 네덜란드의 라이덴대학 도서관이나 미국의회도서관에도 소장되어 있으며 한국에도 앞서 언급한 〈한국소장중국한적총목〉에 국립중앙박물관 소장으로 하나가 수록되어 있다.⁴⁰⁾

37) 고치현립마키노식물원 편집발행 『마키노문고 장서목록(화서·한적의 부)』 1986년, 136쪽.

38) 야쓰미미 도시후미 「막부 말기 메이지기에 도래한 자연신학적 자연관」 133쪽.

39) 야쓰미미 도시후미 「『항해금침』의 성립과 유포」 『일적』 제14호(2006년) 41-64쪽.

맥고웬은 1859년에 나가사키에 왔을 때 이 책을 만났다. 그는 훗날 그때의 체험을 이렇게 말했다. “나는 상하이에서 나가사키를 방문했는데 거기서 나는 전혀 낯선 사람은 아니라는 것을 알았다. 나가사키의 서점에서 〈항해금침〉이 판매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사쓰마후가 명예롭게도 내 이름으로 가고시마에서 번각해준 것이었다.⁴¹⁾ 사쓰마후란 시마즈 나리아키라(島津齊彬)를 지칭한다.

맥고웬은 일본을 방문할 때 일본에서는 그런 한역양학서가 환영받는다는 정보를 미리 알고 있다가 흡슨의 〈내과신설〉이나 〈부영신설〉, 윌리엄슨 등의 〈식물학〉을 준비해갔었을 것이다. 그 외에도 중국어로 번역된 성서도 지참했다고 한다. 와일리의 〈입화프로테스탄트선교사 기록: 저서와 생애〉(1867년)의 〈육합총담〉의 항목에는 일본에서 막부에 의해 종교적 기사가 제외되고 나머지가 번각되었다고 서지정보로 기재되어 있다.⁴²⁾ 그렇다면 흡슨은 자신의 저서가 일본에서 번각판이 만들어질 정도로 읽히고 있다는 것을 알고 있었을까. 이에 대한 기록은 없으나 흡슨이 소장했던 장서들이 현재 런던의 웰컴도서관에 소장되어 있는데 그 중에 미야케 곤사이가 번각한 〈서의약론〉이 포함되어 있다.⁴³⁾ 미야케에 의해 안세이 5년 말(1859년 1월)에 번각이 이루어졌다고 한다면 흡슨은 이미 1858년 12월에 상하이를 떠났기 때문에 중국 체류 중에 그 화각본을 입수할 수는 없었더라도 귀국 후 누군가에게 선물받는 등 해서 흡슨은 알고 있었을 것이라 생각된다.

흡슨의 서적은 이 같은 과정을 거쳐 일본에서도 읽을 수 있게 되었는데 이들의 해설서도 저술되었다. 가장 빠른 시도는 ‘개관견개원장’의 만엔 원년(1860)의 부에 기록이 남아 있는, 1월에 히로세 겐쿄(広瀬元恭)가 신청한 ‘부영신설석의’ 세 권을 들 수 있다.⁴⁴⁾ 이것은 같은 해 정월 11일에 개정이 끝났다. 현재 이 서적을 확인할 수 없어 실제로 간행되었는지는 명확하지 않다. 그러나 교토의 의사인 히로세 겐쿄가 안세이 6년(1859)에 간행된 〈부영신설〉을 텍스트로 해서 1년도 안 돼 해설서를 저술하고 출판신청한 점은 주목할 만하다. 히로세 겐쿄의 양자가 된 히로세 겐슈(広瀬元周)가 메이지 7년(1874)에 〈부영신설화해〉를 간행하였다. 이 제언(메이지 6년)에 의하면 히로세가내의 가숙(서당)에서 본서가 강의되었고 그 강의록이 가숙의 학생들에 의해 만들어졌으나 그대로 집에 소장되어 있었다. 그러다 교토료병원 교사인 영켄을 사사한 친구, 하야시 도쿠조(林得三)의 권유로 출판을 결심하게 되었다고 한다.⁴⁵⁾ 가숙이 히로세 겐쿄의 시숙당을 지칭한다면 ‘부영신설석의’의 원고가 그 바탕이 되었을 가능성이 있다.

40) 화각본이라고 기재되어 있지는 않지만 『총목』3의643-644쪽의 설명문에 있는「聚珍板」이라는 문자(이는 활자판의 아칭이며 일본판에 있는 문자로 중국서에는 없다), 「26.0×17.7cm」라는 크기 또한 화각본의 크기인 점으로 보아(중국서는 29.7×17.5cm), 이 도서관의 소장본은 화각본임이 틀림없을 것이다.

41) *The Rising Sun and Nagasaki Express*, January 18, 1893, p.3.

42)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173.

43) Hartmut Walravens(Introduction by Nigel Allan),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94), p.10.

44) 「개관견개원장」(일본과학기술사대계·제1권·통사<1>)63쪽.

45) 히로세 겐슈 『부영신설화해』(교토: 문명서루, 1874년)제언, 1ウ.

막부 말기에는 아직 흡습 서적의 원문을 번각하는 데 그쳤으나 메이지시대에 들어서면서 이들이 한문이었기 때문에 해설을 곁들인 일본어번역서가 간행되었다. <박물신편>에 대해서는 오모리 이추(大森惟中, 슈조, 가이코쿠) 역 <박물신편역해> 전 5권이 게이오 4년(1868)부터 메이지 3년(1870)에 걸쳐 출판되었다. <전체신론>에 대해서는 메이지 6년부터 7년에 다카기 구마자부로(高木熊三郎) 역 <전체신론역해>가 오사카의 분에이도에서, 메이지 7년에는 이시구로 아쓰시(石黒厚) 역 <전체신론역해>가 나고야의 세이칸도에서 출판되었다. 메이지 11년에는 마쓰이 유허(松井惟利) 초역 <통속전체신론> 초편이 도쿄에서 간행되었다. 이것은 <전체신론>의 본문의 전반부를 초역하고 섭생을 권하는 글을 곳곳에 삽입한 것이다. <서의약론>에 대해서는 메이지 10년, 야마모토 요시토시(山本義俊) 역 <서의약론역해>가 도쿄의 반큐카쿠에서 간행되었다. <부영신설>에 대해서는 히로세 겐슈의 <부영신설화해>가 메이지 7년에 출판되었음은 앞서 언급하였다. <내과신설>의 일본어번역판의 존재는 확인되고 있지 않다. 그러나 <내과신설>의 일부로 콜레라의 증상과 대증법을 기재한 ‘곽란증론’을 발췌하여 <내과신설전염곽란설콜레라병>이라는 제목으로 안세이 7년 초반에 간행되었다. 번각은 오와리번의사인 야나기다 마사노리(柳田政矩)에 의해 이루어졌고 그의 제자인 시나노의 의사, 세키지마 요시유키(요시무네, 関島良致)가 제본하였다. 원문인 텍스트 자체도 메이지시대에 들어서도 반복해서 인쇄되었다. <박물신편>의 경우에는 명확히 재각(메이지 5년), 삼각(메이지 7년)임을 명기한 판이 만들어져 보다 널리 유포되었다.

<박물신편>이 보급됨에 따라 그 보유판의 체제를 갖춘 과학입문서도 나왔다. 오바타 도쿠지로(小幡篤次郎) 역술 <박물신편보유>로, 메이지 2년에 쇼코도에서 발매되었다.⁴⁶⁾ 서문의 날짜는 게이오 4년 8월이라 되어 있어, 메이지로 개원되는 한 달 전에 원고가 준비되었음을 나타낸다. 오바타 도쿠지로는 나카쓰 출신, 게이오기주쿠 멤버 중 한 명이며 훗날 교육자, 영어학자, 계몽사상가로서 활약하였다. 이 책은 로버트 챔버스의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를 번역한 것으로, <박물신편>을 ‘궁리의 처음과 끝을 나타내고 있어 물리를 얼마 동안 추구함으로써 대지의 경지에 이르는 문호가 열린다’고 평가하여 이 책을 ‘소장하는 사람이 적지 않다’고 하면서 ‘서양문명개화의 근원이 있음을 알려주는 보감’으로써 간행했다고 설명하고 있다. 전 3권으로, 마쓰나가 도시오(松永俊男)의 연구에 의하면 1860년대 전반의 판(1861년판인 듯)을 번역한 것이라고 한다.⁴⁷⁾ 서적명 일부에 ‘박물신편’이 들어가나 과학입문서라는 점에서는 일치하지만 직접적으로는 ‘박물신편’과는 상관없는 서적이다.

이미 막부 말기에는 ‘박물신편보유’의 서적명이 기안될 정도로 <박물신편>은 널리 유포되어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메이지 9년(1876년)에 도쿄의 오스미 도요지로(大角豊次郎)가 출판한 <박물신편이편> 두 권도 과학입문서이기는 하지만 <박물신편>과 관련은 없다. 이 책에서 흥미로운 것은 청나라 광둥성(広東省)香山縣의 용조윤(容兆倫, 槐圃)의 저작이라 되어 있는 점이다. 서문에는 중국의 南屏氏紹雲이 메이지 8년에 도쿄에 들렀을 때 고향사람이고 박문다람한 용조윤 선

46) 오바타 도쿠지로 역술 『박물신편보유』 (도쿄: 상고당, 1868년. 재각, 게이오기주쿠출판국, 1873년)상권 중하.

47) 마쓰나가 도시오「챔버스 저 『과학입문』과 오바타 도쿠지로 역술 『박물신편보유』 『모모야마가쿠인 대학 인간과학』 제24호(2003년)149-168쪽.

생을 만나 본서의 원고를 봤더니 사리를 꿰뚫고 있음에 감동받아 귀중한 저술이 사라지게 하지 않기 위해 간행하기로 하였다는 경위가 적혀져 있다. 내용은 인류총론부터 시작되어 지학, 역학, 식물학, 화학, 인체론의 순으로 되어 있다. 역학은 장대나 도르래, 사면 등을 다루었으며 원본은 챔버스의 〈국민백과〉(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로 생각되나 이처럼 서양 과학에 정통하고 광둥성 香山縣출신으로 메이지 8년에 도쿄에 있었던 용조윤이란 어떤 인물이었을까. 용이라는 성, 광둥성香山縣라고 하면 중국 최초의 미국유학생, 용굉(容闳)이 생각나는데(그는 香山縣南屏村출신이다),⁴⁸⁾ 그는 일본에 살지 않았으니 무슨 관련이 있는 인물이었을까. 이 책에 관한 연구는 없지만 앞으로 연구가 기대되는 자료이다.

이상, 흠슨의 저서가 일본에서 어떻게 환영받았는지에 대해 적었다. 화각본의 출판지는 도쿄(에도), 나고야, 교토, 오사카 등 각지에 이른다. 출판자도 혹은 출판에 관여한 사람도 개성소라는 막부부터 민간의 의사, 교육자 등 다양하다. 이는 흠슨 서적뿐만 아니라 막부 말 유신기의 한역양학서 출판에 관여한 사람도 마찬가지일 것이다. 그 보급에 기여한 것은 특정인물이라기 보다 일본의 출판문화의 확산이었을 것이다. 한역양학서 출판의 의의를 찾고자 한다면 일본에서는 이 사업에 관여한 사람들의 다양함이 그 의의를 더욱 빛냈다고 하면 틀림없을 것이다.

48) 모모세 히로시 역주 『서학동점기－용굉자전－』 (도쿄 : 헤이본사, 1969년), 석예 역주 『용굉자전－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상하이 : 백가출판사, 2003년). 관림주 편 『광둥역사인물사전』 (광저우 : 광둥고등교육출판사, 2001년) 제634쪽.

【Abstract】

Western Learning Work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19th Century Japanese Publishing Culture, with an Emphasis on Hobson

YATSUMIMI Toshifumi

1. The life of Hobson and his works

Benjamin Hobson was born at Welford, Northamptonshire, in 1816.¹⁾ His father was a Congregationalist minister of that place, and the church that Hobson was raised in still stands today. Hobson received a medical education at the medical school attached to Birmingham General Hospital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30s. In 1835 he went on to attend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for advanced medical study. It is known that he studied widely there, including science as the foundation of medicine, and such medical fields as materia medica, obstetrics, anatomy, physiology, surgery, and therapeutics. He passe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in London in 1838, and also passed the degree examin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1839, thereby attaining the degree of M.B. He was appointed a medical missionary to Canton (Guangzhou) by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1838. He set sail from England in July 1839, arriving in Macao late in the same year.

He practiced medicine in Macao until January 1843, and after that moved to Hong Kong, which had been ceded to the British Empire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where he managed a newly constructed hospital. He engaged in medical practice here as well as missionary activities. During his activities in China he came to recognize that anatomical details were lacking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decided to tra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ysicians in Western medicine. He was able to realize this goal while at Guangzhou, but was immediately confronted by four difficulties: (1) the difficulty of lecturing in Chinese, (2) the lack of dissection and laboratory equipment, (3) the dearth of Chinese language books on the basics of medicine, and (4) rampant erroneous medical theories. Hobson has studied the most modern medical science in England, attaining the highest recognition for his work. As an ardent missionary, the young Hobson felt no urge to attempt an understanding of non-West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ing purchased a lithographic printing press from a Hong Kong merchant in 1849, he began publishing books in Chinese. The first book he wrote, the *Digest of Astronomy* (*Tianwen luelun* 天文略論), was not a work of medicine but one related to his missionary activities. It was used as a textbook at schools run by Westerners.

In the winter of 1850 Hobson began lectures on medicine at his hospital three times a week, an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hen Xiutang 陳修堂, his Chinese tutor, he was able to complete an illustrated textbook

1) For a further biography of Hobson see YATSUMIMI Toshifumi, "Biographical Study of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using the Hobson Papers in the Wellcome Library" (in Japanese), *Bulletin of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Aoyama Gakuin Women's Junior College*, 2003, 11:99-120.

o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The title of the book was *Treatise on Physiology* (*Quanti xinlun* 全体新論), and it included many illustrations traced from medical works. In the first printing 1,200 copies were produced, and 2,000 copies in the second print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publishing was obtained from Westerner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The work received attention in China, and in 1852 Pan Shicheng 潘仕成 included it in his *Haishanxian-guan Collectanea* 海山仙館叢書. In 1853 Ye Zhishen 葉志誥, the father of Ye Mingchen 葉名琛, the Governor-General of Liangguang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used portions of the illustrations in *Quanti xinlun* for his eight illustrated hanging scrolls on human anatomy titled *Quanti fentu* 全体分圖, and published them from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Liangguang. Ye Zhishen also reproduced the *Quanti xinlun*. Hobson's lithographic illustrations became woodblock prints, and were reprinted several times afterwards.

Hobson also wrote his *Treatise of Natural Philosophy* (博物新編, *Bowu xinbian*) while at Guangzhou. The process leading to the completion of this work is not fully known, but as with the *Quanti xinlun* he was assisted by Chen Xiutang in writing it in 1853, and 2,000 copies of the third part were printed in 1854. The first and second parts were scheduled to be printed in 1854 as well, but due to increasingly anti-foreign movements in Guangzhou continuing the publishing work there seemed dangerous. Publishing was moved to Shanghai, where all three collections were printed together by the Mission Press, Mohai Shuguan 墨海書館.

Hobson shifted his base of activities to Shanghai in 1857, and having some free time devoted himself to writing. At this time he completed *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 (*Xiyi luelun* 西医略論) based on Western medical books as the sequel to his *Quanti xinlun*, an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uan Sifu 管嗣復, a scholar recommended to him by Joseph Edkins. In that year 500 copies were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Hospital at Shanghai, Renji Yiguan 仁濟醫館.²⁾ A further printing of 700 copies was promised.³⁾ In the following year Hobson wrote a work on obstetrics and pediatrics called the *Treatise on Midwifery and Diseases of Children* (*Fuying xinshuo* 婦嬰新說), and another book discussing internal medicine and drugs title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Neike xinshuo* 內科新說), both with the help of Guan Sifu. These were published by Renji Yiguan in 1858. Hobson left Shanghai in December 1858 to return to England, having received a promise of \$2,000 from Western merchants as payment for a reserved subscription to Hobson's writings, and it was agreed that publishing would continue after Hobson's return home. Hobson's books were indeed in great demand in China. However, Hobson's activities were supported by Western society, which provided much financial support that resulting in large printings which ignored the actual demand for the work, rather than supplying the books according to demand.

2) "Short Introductory Preface," in *Xiyi luelun* (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 November 1857, Wellcome Library, Hobson Papers, MS.5852/16.

3) "A Short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Canton," December 1857, MS.5852/18/1-3.

2. Circulation in the Chinese-literate sphere

2.1 Vietnam

Hobson's medical and scientific works were used in the sphere of Chinese literacy for the study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science through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ven into the 20th century. As an example,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Vietnam holds a 1909 publication of *Bowu xinbian*, reprinted in Hanoi in 1877.⁴⁾ Two decades after the Chinese publication of this work, it had been reprinted in Hanoi and was still being publish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uggesting that the usefulness of this book had not been exhausted in Vietnam even into the 20th century.

2.2 China

The *Quantu xinlun* received attention on China, and was included in the *Haishanxian-guan Collectanea* and reprinted by Ye Zhishen. In the introductory notes to the 1853 edition of this work, Hobson wrote that many privately published editions were appearing. Physicians were absorb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e *Quantu xinlun*. These physicians, belonging to the “movement merg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Zhongxiyi huitong-pai 中西医匯通派) appearing around the time that Hobson's works became available, attempted to combine the the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modern Western medical science. According to Matsumoto Hideshi 松本秀士, their works made nearly exclusive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Western medical works such as the *Quantu xinlun*, and many of the anatomical diagrams were taken from the *Quantu xinlun* and the *Fuying xinshuo*, and some even made reference to the *Bowu xinbian*.⁵⁾

Lu Xun 鲁迅 was also a reader. He wrote in his introduction to *Na Han* 呐喊 (1922) that he had read a woodblock-printed copy of the *Quantu xinlun* at Jiangnan Naval Academy 江南水師學堂 in Nanjing.⁶⁾ That wa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but on 22 Oct. 1929 he wrote a letter to JIANG Shaoyuan 江紹原 requesting the *Quantu xinlun* and “the others, five works.”⁷⁾ There is no record of how enthusiastically Lu Xun read Hobson's works, bu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he saw them as works of the new, Western culture.

2.3 Korea

A Complete List of the Classics Related to China in Korea 韓國所藏中國漢籍總目 (published by Hakgobang, 學古房) edited by Jeon Incho 全寅初 of Yonsei University in six volumes was published in 2005. From the section on miscellanea and Western studies it is clear that many books published by

4) For full text see <http://www.nomna.org/index.php?IDcat=12&cat=4&subcat=208>, 209.

5) MATSUMOTO Hideshi,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Japanese), *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2005, 10:29-46.

6) Lu Xun, “Preface,” *Na Han* (Call to Arms), from *Rojin Zenshu*, vol.2, *Tokkan and Houkou*, Japanese tr. MARUYAMA Noboru et al. (Tokyo: Gakushu Kenkyu-Sha, 1984), pp.9-17.

7) Lu Xun, “A Letter to JIANG Shaoyuan,” from *Rojin Zenshu*, vol.14, *Shokan I*, Japanese tr. TAKEUCHI Minoru et al. (Tokyo: Gakushu Kenkyu-Sha, 1985), pp.458-459.

missionary organizations in Chinese on Western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work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Jiangnan Arsenal 江南製造局 were collected in Korea.⁸⁾ The listings for Hobson's works in the above *Complete List* demonstrates that these books were kept at the Gyu-jang-gag 奎章閣 royal library maintained b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the Hwasan Collection 華山文庫 of Korea University, and elsewhere.⁹⁾ Among the Chinese works in the Gyu-jang-gag collection established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is *The Catalogue of Vintage Books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in Korea* 朝鮮總督府古圖書目錄 (1921). In the miscellaneous Chinese works category of this catalogue many Western scientific books are noted. Among Hobson's identified works are three copies of *Neike xinshuo*, three copies of *Xiyi luelun*, four copies of *Fuying xinshuo*, two copies of *Quanti xinlun*, and five copies of *Bowu xinbian*. The Joseon Dynasty was actively purchasing such books on Western science.

A Korean example worth mentioning of the usage of Hobson's books is the *Singi cheonheom* 身機踐驗 of Choe Hangi 崔漢綺 (1803–77).¹⁰⁾ Choe Hangki was a philosopher interested in many fields, and in order to deepen his knowledge of the human body studied Western medicine through Hobson's books painstakingly. The *Singi cheonheom* consists of nine chapters in all, of which the first two are abbreviated versions of the *Quanti xinlun*, the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s are from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Neike xinshuo*, the end of the fourth chapter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h chapter are from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Xiyi luelun*, the remainder of the seventh chapter is the *Fuying xinshuo*, chapter eight is from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wu xinbian*, chapter eight (continued) is from the last chapter of *Neike xinshuo* and the last chapter of *Xiyi luelun*. On important points Choe provides unique discussions.

Ji Seogyong 池錫永, famous as the originator of cowpox vaccination in Korea, was also a reader of Hobson. Miki Sakae 三木栄 reports that among the medical books in Ji Seogyong's collection were a Chinese copy of *Bowu xinbian*, a Chinese copy of *Quanti xinlun*, a Chinese copy of *Neike xinshuo*, three Japanese reprints of *Neike xinshuo*, a Chinese copy of *Fuying xinshuo*, and a copy of *Fuying xinshuo* handwritten by Ji Seogyong.¹¹⁾ According to Miki, Ji Seogyong wrote *Udu sinseol* 牛痘新說 in 1885 and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it himself, including Hobson's discussion of vaccination.¹²⁾

3. Spread to Japan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Japanese situation is that, while the Chinese texts may not have been imported systematically, when the Chinese texts that were received were judged to be useful Japanese editions were printed and actively circulated in Japan. The Joseon Dynasty was sensitive to Chinese cultural

8) JEON Incho, ed., *A Complete List of the Classics Related to China in Korea*, vol.3 (Seoul: Hakgobang), pp.592-647.

9) JEON Incho, ed., *A Complete List* (cit. n. 8), pp.603-604, 610, 612, 633-634.

10) CHOE Hangi, "Shingi Cheonheom," in *Myeongnamru Chongseo*, enlarged edition (Seoul: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2002), vol.4, pp.263-507.

11) MIKI Sakae,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Disease in Korea* (in Japanese) (Kyoto: Shibunkaku Shuppan, 1991), pp.267-268.

12) MIKI Sakae,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Disease in Korea* (cit. n. 11), p.263.

trends and endeavored to purchase Chinese books constantly, but was not active in disseminating the materials thus procured. On the other hand, Japanese editions of every one of Hobson's books, for example, were published, and the *Bowu xinbian* (Jpn. *Hakubutsu shinpen*) in particular was very commonly used as a textbook in the domain schools of the final years of the Edo period and in Meiji era provincial schools and elementary schools.¹³⁾ The author has referred to the two decades of the 1860s and 1870s as the "*Hakubutsu shinpen* era."¹⁴⁾

These books came to Japan by various routes. In the final years of the Edo period foreigners were able to enter Japan, and at times brought the books themselves directly from China. The American Daniel J. Macgowan, who arrived in Nagasaki from Shanghai in the first month of 1858, had been a medical missionary in Ningbo for thirteen years and was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Japanese literati in writing.¹⁵⁾ He gave copies of the *Fuying xinshuo* and *Neike xinshuo* newly published in 1858 by Renji Yiguan to the Nagasaki physician, Fukuchi Kōan 福地苟菴. In 1858 he also gave a copy of a work on botany titled *Zhiwuxue* 植物学 to Omoto Kōdō 尾本公同, the official physician of the Ōmura domain.

Fukuchi decided to reprint the books but was unable to. He entrusted the printing to the Kyoto physician, Andō Keishū 安藤桂洲. Andō received Bakufu permission to publish in 1859, and published a Japanese edition of *Fuying xinshuo* (Jpn. *Fuei shinsetsu*) in the same year and *Neike xinshuo* (Jpn. *Naika shinsetsu*) in 1860.¹⁶⁾ At the same time, *Fuying xinshuo* and *Neike xinshuo* were published by the Edo surgeon Miyake Gonsai 三宅良斎 in 1859. Miyake had also printed *Xiyi luelun* (Jpn. *Sei ryakuron*) late in 1858 in Edo.

Quanti xinlun was published in 1851 by the publisher Huiai Yiguan 惠愛醫館 in Guangzhou, and may have reached Jap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50s. The Ōzu domain physician Yamamoto Setsuan 山本節庵 planned to reprint this book, and applied for permission to do so in late 1857. The permission was granted, but in the second month of 1858 passed the woodblocks to Ochi Shū, a physician from Iyo working in Kyoto, who published the *Quanti xinlun* (Jpn. *Zentai shinron*).¹⁷⁾

It is commonly known that the Japanese edition of the *Bowu xinbian* was published by the Kaiseisho 開成所 of the Bakufu during the Bunkyū period (1861–63).¹⁸⁾ As to why the Bakufu published this work on science among Hobson's texts, their attitude of wishing to control and disseminate new

13) SHINKE Namio, "*Hakubutsu Sinpen: A Natural Science Textbook used in the final years of Edo Period*"(in Japanese), *Tosho*, 1983, 411:60-63.

14) YATSUMIMI Toshifumi, "Between Natural Theology and Natural Philosophy : A Study of B.Hobson's Chinese Works and Thier Japanese Editions"(in Japanese), *Bulletin of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Aoyama Gakuin Women's Junior College*, 1996, 4:127-140, esp. p.136.

15) YATSUMIMI Toshifumi, "Daniel Jerome Macgowan in Changing China and Japan, 1843-1893"(in Japanese), *Annal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earning in Japan*, 1993, 1:43-87, esp. pp.57-60.

16) "Original Record of the Publication permission by Tokugawa Bakufu" in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 Historical overview*(in Japanese), e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in Japan (Tokyo: Daiichi Hoki, 1964), p.63.

17) "Original Record"(cit. n. 16), p.62.

18) See, e.g., FUKUI Tamotsu, *Publications of the Tokugawa Bakufu*(in Japanese)(Tokyo: Yusho-do, 1985), pp.228-229.

knowledge by publishing Western book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t this time is cited. The *Bowu xinbian* was published in light of this attempt to introduce new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author conjectures from extant volumes that the *Bowu xinbian* was reprinted somewhat earlier than is usually stated in 1859 or 1860 at the latest.¹⁹⁾ If this theory is correct, then all five of Hobson's representative works published in China between 1851 and 1858 were published in Japan within a few years or even within one year, and all had been published and were circulating in Japan by 1860.

In this manner Hobson's works came to be read in Japan, and annotated versions were produced in Meiji era Japan. Ōmori Korenaka's 大森惟中 translation of the *Bowu xinbian* in five volumes titled *Hakubutsu shinpen yakkai* 博物新編訳解 was published between 1868 and 1870. Takagi Kumasaburō 高木熊三郎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from Bun'eidō 文榮堂 in Osaka the *Quanti xinlun* in 1873-74 under the title *Zentai shinron yakkai* 全体新論訳解. In 1874 Ishiguro Atsushi's 石黒厚 translation also titled *Zentai shinron yakkai* was published by Seikandō 静観堂 in Nagoya. Matsui Koretoshi 松井惟利 published an annotated version titled *Tsūzoku zentai shinron* 通俗全体新論 in Tokyo. This was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Quanti xinlun*, making recommendations for convalescence in many places throughout the text. A translation of *Xiyi luehun* was published in 1877 by Yamamoto Yoshitoshi 山本義俊 titled *Sei ryakuron yakkai* 西医略論訳解 from Bankyūkaku 万笈閣 in Tokyo. Hirose Genshū 広瀬元周 translated the *Fuying xinshuo* into Japanese under the title of *Fuei shinsetsu wage* 婦嬰新説和解 in 1874 in Kyoto. No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Neike xinshuo* has been located as yet.

Along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owu xinbian*, introductory works on science in the manner of supplements to that work were written. Obata Tokujirō 小幡篤次郎 published *Hakubutsu shinpen hoi* 博物新編補遺 in 1869 from Shōkodō 尚古堂.²⁰⁾ This was a translation of Robert Chamber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 (c.1861). The two-volume *Hakubutsu shinpen nihen* 博物新編二編 published in 1876 by Ōsumi Toyojirō 大角豊次郎 of Tokyo wa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written by Rong Zhaolun 容兆倫. This Chinese author was interestingly from Guangzhou, but further details remain unclear.

The above has been a discussion of how Hobson's works were received in Japan. Japanese editions were published in several locations: Tokyo (Edo), Nagoya, Kyoto, and Osaka. Publishers or those contributing to publishing ranged from the Bakufu's Kaiseisho to private physicians and educators. This was the case not only for Hobson's works, rather it can be pointed out that this was true for all those involved in publishing Western scientific materials from Chinese in late Edo or early Meiji Japan. The widespread publishing culture of Japan contributed more to this dissemination than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If there is any significance in this publishing of Western scientific materials from Chinese translations, the variety of people involved in Japan undoubtedly enhanced that significance.

19) YATSUMIMI, "Between Natural Theology and Natural Philosophy" (cit. n. 14), pp.133-134.

20) On *Hakubutsu Sinpen Hoi* see MATSUNAGA Toshio, "Robert Chamber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 and its Japanese Translation by OBATA, Tokujiro" (in Japanese), *Human Science's Review, St. Andrew's University*, 2003, 24:149-168.

개화초기(1876~1881) 遣日使節의 일본인식

■ 許 東 賢 (慶熙大學校) ■

개화초기(1876~1881) 遣日使節의 일본인식

許 東 賢 (慶熙大學校)

〈목 차〉

- I. 서 론
- II. 동도서기론자의 일본 인식
- III. 국민국자수립론자의 일본 인식
- IV. 이와쿠라 사절단과의 비교를 통해 본 조사시찰단의 한계
- V. 결 론

I. 서 론

중국 중심의 국제질서가 동아시아를 지배하던 시절 아시아의 변방이었던 일본은 서세동점의 시대를 맞아 “서구의 충격(western impact)”에 발 빠르게 대응해 일본형 국민국가를 이루면서 지역의 중심으로 거듭났다. 신흥세력으로 떠오른 일본은 1876년에 미국이 자국의 문호를 개방시킬 때 사용했던 포함외교를 그대로 조선에다 구사하여 쇄국의 기치를 내리게 함으로써, 동아시아에서 중국을 대체할 새로운 문화공급자로 급부상하였다.¹⁾ 이때부터 문화의 강물은 일본에서 조선으로 역류하기 시작하였다. 당시 일본인들의 눈에 한국은 부정적 타자의 이미지로 각인되고 말았지만, 세계의 신조류에 대응하려는 개화파 지식인들의 눈에 비친 일본의 모습은 역전되기 시작했다. 특히 1876년의 開港은 한·일 양국간 문화의 수혜자와 공급자의 위치를 뒤바꾼 문화교류사상 역전현상을 초래하는 시점인 동시에 제국주의 침략이 시작된 기점이다.

사실 일본은 불평등조약인 강화도조약을 무력으로 강요하여 조선을 경략하는 데 필요한 여러 특권 곧 무역권·조차권·치외법권·종가 8%의 협정관세·駐使權·駐兵權 등을 확보한 “제국주의적 침략자”였다. 그러나 일본은 소총을 비롯한 근대무기류를 조선에 기증하고 유학생의 파견을 유도하면서 조선을 일본식 제도 개혁으로 유도하려고 애썼다. 또 기회 있을 때마다 조선 조정에 러시아의 침략에 대비할 것을 경고했으며, 1880년에는 조선과 미국의 수교를 중재하기도 하였다. 한 마디로 1876년 이래 일본은 조선에 대해 실제로는 “제국주의적 침략자”였지만, 겉으로는 “개화와 독립의 옹호자”라는 가면을 쓰고 있는 양면적 태도를 보였다.²⁾

1) Key-Hiuk Kim, The Last Phase of East Asian World Order : Korea, Japan and the Chinese Empire, 1860~1882(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328~351; 金基赫, 「開港을 둘러싼 國際政治」, 『韓國史市民講座』7(서울: 一潮閣, 1990), pp. 1~23.

2) 유영익, 「한·미관계 전개에 있어서의 일본의 역할」, 『한·미수교 1세기의 회고와 전망』(한국정신문화연구원, 1983), pp. 136~142.

조선정부는 1876년과 1880년에 걸쳐 두 차례의 修信使, 그리고 1881년에는 朝士視察團을 일본에 보내 서구화된 문물제도와 시설 등을 살펴 보고하게 하였다. 조선정부는 두 차례에 걸친 수신사의 보고를 통해 서구열강의 東漸에 맞서 국가의 존립을 도모하기 위한 대책 수립의 필요성을 절감했다. 이에 조선정부는 1880년 12월 統理機務衙門을 창설한 후 본격적으로 開化·自強政策을 추진하려 했다. 1881년 조사시찰단의 파견도 조선의 본격적인 문호 개방과 富強策의 추진에 앞서 통리기무아문과 세관의 조직·운영, 그리고 군제의 개혁 등에 필요한 인재의 확보와 참고자료 수집에 그 목적이 있었다. 조사시찰단은 조선정부가 메이지 일본을 근대화의 본보기로 삼으려 한 본격적 시도로서 일본의 이와쿠라(岩倉)사절단에 비견되는 한국 근대화 도상에 있어 중요한 의미를 갖는 역사적 사건이었다.³⁾

제1차 수신사 金綺秀(1832~1894)는 『日東記遊』, 제2차 수신사 金弘集(1842~1896)은 『修信使日記』를 남겼으며, 조사시찰단 姜文馨(1831~?)·金鏞元(1842~?)·閔種默(1835~1916)·朴定陽(1841~1904)·沈相學(1845~?)·魚允中(1848~1896)·嚴世永(1831~1899)·趙秉稷(1833~1901)·趙準永(1833~1886)·李元會(1827~?)·李金憲永(1835~1907)·洪英植(1855~1884) 같은 朝士들은 90여책에 달하는 “視察記”類와 “聞見事件”類로 大別되는 결과보고서들과 시찰활동과 관련해 작성한 일기 및 기행록 등을 남겼다.⁴⁾

이들 전일사절들은 일본의 문물과 제도를 시찰한 뒤 크게 두 부류로——도덕을 지키면서 근대 기술문명의 장점을 취하려 한 東道西器論者와 따라 배워야 할 이상적 모델로서 일본의 경험을 주목한 국민국가수립론자로——대별되는 일본 인식을 갖게 되었다. 이 연구에서는 개화초기 전일사절들이 남긴 각종 기록에 보이는 두 개로 대조적 일본인식의 요체를 조사시찰단을 중심으로 적출·부각해 보려한다.

II. 동도서기론자의 일본 인식

1876년 조선정부는 강화도조약의 체결을 구래의 교린관계의 회복으로 인식하였다. 그러나 1876년과 1880년 두 차례의 修信使와 1881년의 朝士視察團을 통해 메이지유신 이후 일본의 변화에 대한 정보와 지식을 얻음으로써 기존의 유교문명관에 입각한 일본인식이 변화하기 시작하였다. 유교 문명관에 가해진 충격의 파열음은 제1차 수신사 金綺秀(1832~1894)의 다음과 같은 소회가 잘 대변한다.⁵⁾

기교가 이럴 수가 있겠는가! 한 개의 火輪으로써 천하의 모든 것을 다 만든다. 기교가 이럴 수가 있겠는가! 공자께서 말씀하시지 않은 바이니, 나는 이것을 보고 싶지 않다. 지난번에 나의 유람을 막은 사람이 옳았고, 나에게 유람하도록 권고한 사람은 옳지 못했는데, 나

3) 이와쿠라 사절단과 조사시찰단에 관한 비교에 대해서는 줄고, 「조사시찰단(1881)의 일본 경험에 보이는 근대의 특성」, 『한국사상사학』19(2002), pp. 525~532 참고.

4) 조사시찰단이 남긴 각종 문헌에 관한 자세한 解題는 줄고, 「朝士視察團(1881)의 日本見聞記錄總覽」, 『史叢』48(1998), pp. 23~53 참고. 이들 문헌은 줄편, 『조사시찰단 관계 자료집(이하 자료집으로 약칭)』 1~14(國學資料院, 2000)에 영인·수록되어 있다.

5) 김기수, 『日東記遊』,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修信使記錄』(국사편찬위원회, 1971), p. 103.

는 그 옳은 말을 쫓지 못했으니 그렇다면 내가 유람한 것은 옳지 못한 일이었는가? 奇技淫巧도 말로는 이것으로 利用厚生한다고 하니, 이용후생이라면 이를 배워야만 하는 것인데, 하물며 이를 보는 것쯤이라.

이제 일본은 더 이상 문명론적 시각에서 볼 때 야만이 아니라 이용후생에 도움이 되는 기술과 산업이란 장점을 가진 문명한 타자로서 인식되기 시작하였다. 도덕을 기준으로 문명과 야만을 가르던 종래의 문명관념은 압도적 기술문명 앞에 흔들리기 시작하였다.⁶⁾ 김기수의 경우 독일하기 전에 갖고 있던 일본 夷狄觀을 일본 시찰을 통해 이를 탈피하였지만,⁷⁾ 그가 귀국 후 지방관으로 좌천될 만큼 당시 倭洋一體論的 衛正斥邪論은 거의 모든 유교 지식인의 뇌리를 여전히 사로잡고 있었다.⁸⁾ 메이지일본이 수용한 서구 근대 기술을 접한 조선의 지식인 중에서는 華夷論的 왜양일체관을 폐기하고 근대 기술의 수용을 고민하는 이들이 나오기 시작한 것은 제2차 수신사 김홍집이 가져 온 『朝鮮策略』의 영향으로 개화정책이 추진되고,⁹⁾ 이에 따라 조사시찰단이 메이지 일본의 근대문물과 제도를 살살이 조사한 이후 부터였다.¹⁰⁾

조사시찰단의 조사들 중에는 일본 시찰을 통해 일본을 개혁의 모델로 삼는 문명관의 전환을 경험한 이도 있었지만, 4개월에 불과한 시찰기간은 대다수 조사들에게는 평생 몸에 밴 유교의 가치와 세계관을 벗어나게 하기에는 너무 짧았다. 이들은 유교적 가치기준으로 메이지 일본의 이모저모를 비판적으로 평가하였지만, 趙準永(1833~1886)처럼 “그 군제나 무기·배·기계·농법 등 나라를 튼튼하게 하고 백성들을 넉넉하게 할 만한 것은 본받을 만하다”고 생각을 품게 되었다.¹¹⁾ 이처럼 조사시찰단의 대부분의 조사들은 평생 깊게 밴 유교적 가치관을 뛰어넘는 문명관의 변혁을 경험하지는 못했지만, 전통적인 문화와 제도를 온존시키는 범위 안에서 국가의 부강과 백성의 후생에 도움이 되는 서양의 제도와 기술을 받아들이는, 이른바 동도서기론을 바탕으로 한 국가개혁을 구상하였다. 동도서기론자들의 국가구상은 크게 넷으로 요약된다.¹²⁾

첫째, 메이지 일본의 국가통합 장치 중에서 왕정복고, 집권적 정부형태, 삼권분립의 권력 구조 그리고 행정체제와 관료제도의 효율성에 깊은 관심을 보였지만, 민권의 확대에 대해서는 부정적이었다. 구체적으로 일본의 사법제도와 경찰제도, 군제와 군사력에 큰 관심을 보였다.

둘째, ‘절용·애민’의 전통적인 경제관을 가지고 일본을 바라본 이들은 메이지유신 이후

6) 허동현, 『근대한일관계사연구: 朝土視察團의 일본관과 국가구상』 (국학자료원, 2000), pp. 24~28.

7) 하우봉, 「개항기 수신사의 일본인식」, 김용덕·미야지마 히로시 공편, (고려대학교 아세아문제연구소, 2001), pp. 248~249, 256~257.

8) 한철호, 「제1차 수신사(1876) 김기수의 일본인식과 그 의의」, 『사학연구』84(2006), p. 157.

9) 김홍집은 국왕에게 올린 보고서에서 왕정복고와 문호 개방의 과정을 소개하고, 이를 시세에 맞는 “自然之勢”로 긍정하였으며, 메이지유신 이후 부국강병정책을 호의적으로 평가하였다. 하우봉, 앞의 글, pp. 250~251.

10) 허동현, 「조사시찰단의 일본 경험」, pp. 514~520.

11) 조준영, 『문견사건』, 허동현 편, 『조사시찰단관계자료집』 12(국학자료원, 2000), pp. 610~611.

12) 허동현, 앞의 책, pp. 97~126, 149~166, 186~207, 219~232; ———, 「조사시찰단의 일본 경험」, pp. 522~524.

의 경제적 성장은 높이 샀지만 이로 인한 국가재정과 민간경제의 파탄에 대해서 우려를 금치 못했다. 이들은 일본식 산업진흥 정책을 선별적으로 채택하여 추진하는 입장을 취했는데, 편리함과 재정수입 증대 효과가 있는 교통·통신 시설, 우수한 근대식 광산 채굴 설비와 공법, 기술인력의 양성, 국민계몽과 기술 자립을 위한 박물관과 산업박람회 개최, 농민 계몽사업을 비롯한 농업진흥 정책의 수용에 대해서는 적극적이었다.

셋째, 일본의 사회·풍속상의 변화는 대체로 매우 비판적으로 보았다. 그러나 적어도 상공업의 진흥을 위해서는 직업·신분 제도에 변화가 필요함은 인식하였고, 이용후생의 관점에서 신문의 계몽기능이나 서양 의학, 맹아원 같은 사회복지 시설에 대해서는 긍정적으로 보았다. 결국 선별적으로 서양의 사회제도나 기술을 수용한다는 입장이었다. 하지만 이들은 메이지유신 이후 문명개화의 원동력이 바로 서구 근대 사상이라는 점을 이해하지 못함으로써, 서구 근대 기술의 우월성만 인정하고 그 기술문명을 꽃피운 토대의 중요성은 인식하지 못하는 결과가 되었다. 이들의 국가 생존전략은 피할 수 없는 서구에 대한 문호개방과 서양 세력의 진출에 대응해 서구의 기술과 무기체계는 받아들이되 전통적 체제나 가치는 유지·강화하겠다는 것으로, 근대 국민국가를 창출할 수 없는 한계를 지닌 미봉책이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이들 동도서기론자들이 제기한 선별적 서구 문물 수용론은 개신유학자들에게 영향을 미쳐 개화상소 운동의 계기가 되었다. 특히 임오군란 이후 1882년 8월에는 국왕에 의해 국가 정책으로 천명되자 동도서기를 주장하는 전직관료와 재야유생들의 개화상소가 연이어 올려졌다.¹³⁾ 동도서기론의 정연한 논리는 다음과 같은 1882년 12월 尹學善의 상소에서 잘 나타난다.¹⁴⁾

아! 서법이 나오게 되자 그 기계의 정밀함과 부국의 방법에 있어서는 비록 周를 일으킨 呂尙이나 蜀을 다스린 諸葛亮이라 할지라도 그 사이에 간여하여 논의할 수 없게 되었다.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의 윤리는 하늘로부터 얻어서 본성에 부여된 것인데, 천지에 통하고 만고에 뻗치도록 변하지 않는 이치로 위에서 道가 된 것이다. 수레·배·군사·농업·기계는 백성에 게 편하고 나라에 이로운 것으로 밖에 드러나 器가 되는 것이니, 제가 변화시키고자 하는 것은 器이지 道가 아닙니다.

이처럼 서구나 메이지 일본의 근대문물 중 유교 도덕을 해치지 않는 기술과 무기 등을 수용하려 한 採長補短의 동도서기론에 입각한 일본관은 1880년대 전반을 품미하였다. 물질과 정신을 구분해 유교문명의 본질을 해치지 않는 기술 등만을 받아들이려는 배제와 수용의 논리는 시대와 상황이 바뀌면서 점차 수용 쪽으로 기울었고 그 폭도 기술과 제도에서 정신으로 확대되어 나갔다. 그러나 일본의 침략이 가시화됨에 따른 배제의 논리도 계속 제기되고 있었다. 유교문명과 근대문명을 절충하려한 동도서기론자들은 유교적 신념을 포기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메이지 일본의 제국주의적 침략을 비판할 수 있었다.¹⁵⁾

13) 권오영, 「동도서기론의 구조와 그 전개」, 『한국사시민강좌』7(1990), pp. 86~96.

14) 『日省錄』 고종 19년 10월 7일조, 역문은 권오영, 위의 글, pp. 92~93에서 재인용.

15) 장인성, 「근대 조선의 일본관」, pp. 180~181, 193~194. 침략자로서 일본에 대한 부정적 인식은 1900년대까지 이어졌다. 이에 대해서는 유영렬, 「한말 애국계몽언론의 일본인식」, 김용덕·미야지마 히로시 공편, 앞의 책, pp. 317~352.

III. 국민국가수립론자의 일본 인식

서세동점의 시대를 맞아 일본은 “서구의 충격(western impact)”에 발 빠르게 대응해 메이지유신으로 일본형 국민국가를 이루면서 지역의 중심으로 거듭났다. 이후 약육강식의 세상에서 살아남기 위해 “힘”을 키워야 한다고 생각한 현실주의적 개화파 지식인들의 눈에 일본은 야만이 아닌 문명의 상징으로 비치기 시작하였다. 이제 일본은 더 이상 야만의 상징인 倭가 아니라 따라 배워야 할 문명으로서 和로 다가왔으며, 이러한 문명관의 변화는 1882년 제3차 수신사로 일본을 다녀온 박영효가 남긴 기행문 『使和記略』의 제목이 잘 말해준다. 이들 문명개화론들은 메이지 일본을 새로운 서구 중심 국제질서 속에서 조선의 생존을 위해 따라 배워야 할 이상적 개혁 모델로 인식하였다.¹⁶⁾ 이러한 인식의 변화는 조사시찰단의 洪英植(1855~1884)과 魚允中(1848~1896)이 귀국 후 국왕에게 복명한 다음의 문답에 잘 나타난다.¹⁷⁾

고 종 : 일본의 제도가 장대하고 정치가 부강하다고 하는데 살펴보니 이와 같더냐.

홍영식 : 일본의 제도가 비록 장대하나 모두 모이고 쌓여서 이루어진 것입니다. 財力에 이르러서는 여러 가지 사업을 추진하는 것이 매우 많으므로 항상 부족함을 근심합니다. 그 軍政은 강하지 않다고 할 수 없습니다. 그러나 이는 모두 밤낮을 가리지 않고 부지런히 마음과 힘을 하나로 모아 이룩 한 것입니다. 일본이 노력한 바를 갖고 현재 이룩된 것을 보면 진실로 어려운 일은 아닙니다.

고 종 : 오로지 부강만을 도모하던 戰國時代와 동일하더냐.

어윤중 : 진실로 그러합니다. 春秋戰國은 바로 小戰國이며 오늘날은 바로 大戰國이라 모든 나라가 다 만 智 力으로 경쟁할 뿐입니다. ... 현재 형세를 돌아볼 때 부강함이 아니면 국가를 지키지 못하므로 상 하가 한 뜻으로 노력할 것이 바로 이 한 가지 일일뿐입니다.

특히 어윤중은 “일본 사람들은 일의 이익과 손해를 따지지 않고 단연히 감행하므로, 잃는 바가 있더라도 國體를 세울 수 있었다. 청나라 사람들은 낡은 관습에 연연해 허송세월하며 날을 보낸다. 이로써 천하를 보면 이해를 돌아보지 않고 행하는 자가 성공한다”고 하여 메이지 일본의 근대화 정책을 높이 평가했다.¹⁸⁾ 청국은 “악의 반면교사”이고 일본은 그러한 청국을 대체하는 이상적 모델이라고 본 그의 일본 진단은 문명개화론자들의 일본관을 잘 대변한다.¹⁹⁾ 이러한 인식은 조사시찰단의 수원으로 일본에 유학했던 尹致昊(1865~1945)에게서도 찾을 수 있다.²⁰⁾ 그는 1884년 6월 1일 고종에게 다음과 같이 진언하였다.²¹⁾

16) 허동현, 「개화기 한국인의 일본관」, pp. 222~225.

17) 『承政院日記』 1881년 9월 1일조.

18) 어윤중, 『수문록』, 허동현 편, 『조사시찰단관계자료집』13(국학자료원, 2000), p. 7.

19) 장인성, 「근대 조선의 일본관」, p. 186.

20) 그의 중국에 대한 혐오감은 지인에게 보낸 다음과 같은 서한에 잘 나타난다. “중국에 대한 내 의견

청국은 사람이 많고 땅이 커서 일본의 11배나 됩니다. 그런데 일본은 30여년 내외로 更張・振作하여 문명과 부강을 사람들이 일꾼게 되었고 60년이나 외국과 더불어 통상한 청국보다 백배나 더 낫습니다. 그것은 무슨 까닭입니까? 청국은 옛 것만 지켰으나 일본은 능히 옛 것을 고쳐 새것을 본받았기 때문입니다. 우리 나라에는 이 두 개의 본보기가 있습니다. 새 것을 쫓고 옛 것을 지키는 이익과 손해가 분명하여 의심할 것이 없는 것입니다.

이 처럼 어윤중과 윤치호 두 사람은 일본 시찰과 유학을 통해 일본형 국민국가를 향후 조선에서 실현 가능한 국가 모델로 삼는 개혁 구상을 할 수 있었다.²²⁾ 특히 어윤중은 메이지 유신 이후 일본이 이룩한 국가, 경제, 국민, 문화 통합 장치를 모델로 삼아 개혁 추진 주체로서 집권적 정부형태의 도입, 차관 도입과 정부주도의 경제개발계획의 입안, 서구의 근대 사상과 기독교 수용, 그리고 근대 국민의 형성을 위한 신분제 타파와 교육의 진흥도 도모하는 혁신적 국민국가 수립론을 세웠으며, 이는 갑신정변을 주도한金玉均(1851~1894)·홍영식·朴泳孝(1861~1939) 등이 꿈꾼 개혁구상의 원형을 이룬다.²³⁾

사실 비민주적 집권정부로 특징지어지는 일본형 국민국가의 국가통합을 위한 장치들은 다원화된 근대 시민사회를 창출하기에는 근본적인 한계가 있었지만, 서구의 제도를 부분적으로 모방한 당시 일본의 통치체제는 입헌체제로 나아가는 과도기 체제였고, 삼권분립 체제를 갖추었기 때문에 외형적으로는 근대 정치체제의 발전방향과 일치했다고 볼 수 있다. 그리고 일본의 통치·지배 기구는 일본처럼 시민계층이 존재하지 않았던 당시 조선이 본보기로 삼을 수 있는 발전 모델일 수 있었다.²⁴⁾

그러나 개혁의 모델로서 메이지 일본을 보는 인식은 불변의 고정관념은 아니었다. 윤치호·박영효·徐載弼(1864~1951) 같은 이들은 힘을 중시하는 현실주의적 문명개화론자로서 사회진화론에 입각한 황인종주의나 아시아 연대론에 영향을 받아 일본을 독립의 옹호자로 보기도 했다. 그러나 일본이 가면을 벗고 침략자로서의 면모가 들어 났을 때에는 일본에 대한 반감을 드러내거나 반일태도를 노정하였다.²⁵⁾ 그 대표적 인물로는 윤치호를 들 수 있다.²⁶⁾ 그는 조사시찰단의 한 사람으로 1881년 5월부터 1883년 4월까지 일본에 유학함으로

을 말해보겠습니다. 중국이란 나라는 마치 더럽기 짝이 없는 물이 가득 괴어있는 웅덩이처럼 느껴 집니다. ...물은 괴이면 썩어가고 잡초가 덮이고 진흙과 벌레가 가득 차 더러워지기 마련입니다. 중국은 낡아빠진 집과 흡사합니다. ...그 지붕은 이제 현대를 휩쓸어가려고 하는 강한 폭풍이 불어 닥 치기만 하면 제일 먼저 날아갈 차비를 하고 있습니다. 중국은 늙은 바보영감과 아주 똑같습니다.” 윤치호, 「T. H. Yun's Leter to Anonymous Person, June 5, 1885」, 윤경남 역, 『(국역) 좌옹 윤치호 서한집』(효산문화, 1995), pp. 32~33.

21) 송병기 역, 『국역 윤치호 일기』1(연세대학교 출판부, 2001), pp. 150~151.

22) 허동현, 「어윤중(1848~1896)의 개화사상 연구: “온건”개화파 내지 친청사대파설에 대한 비판적 검토」, 『한국사상사학』17(2001), pp. 442~467; ———, 「개화기 윤치호의 해외체험과 문화수용」, 『한국문화연구』11(2006), pp. 123~124.

23) 허동현, 「조사시찰단의 일본 경험」, pp. 520~521. 어윤중을 친청성향의 온건개화파로 보는 학설에 대한 비판은 위의 「어윤중의 개화사상 연구」참조.

24) 허동현, 「조사시찰단의 일본 경험」, pp. 509~512.

25) 갑신정변을 주도한 친일 개화파와 갑오경장 주도세력은 일본을 독립과 개화의 진정한 지지자로 보았지만, 갑신정변시 일본은 친일 개화당을 끝까지 지지하지 않았고 갑오경장 시에도 청일전쟁에서 승리하자 일본은 한국의 보호국화를 꾀하는 등 침략자로서의 면모를 여실히 드러냈다.

26) 박영효도 청일전쟁 승리후 일본의 침략성이 가시화되자 반일활동을 전개한 바 있었다. 유영익, 「박영효와 갑오경장」, 『동학농민봉기와 갑오경장』(일조각, 1998), pp. 77~84.

써, 이미 살펴 본 것처럼 메이지 일본을 모델로 하는 일본 지향형의 개혁사상을 수립하였었다. 그러나 그는 갑신정변 실패 이후 청국의 압제로 인해 자력에 의한 조선 개혁의 가능성이 없어지자 차선택으로 영국이나 러시아의 지배를 받는 것이 낫다는 생각을 품기도 했으며,²⁷⁾ 1895년 청일전쟁 승리 후 일본의 침략 야욕이 전면으로 드러나자 일본에 기댄 조선 개혁의 꿈을 거두었었다.²⁸⁾ 그는 삼국간섭(1895년 4월 23일)으로 일본의 조선 보호국화 기도가 물거품으로 돌아가자 외부협판으로 친미·친러 로선을 취하면서 박영효가 배일정책을 펼치는 데 힘을 보탰다.²⁹⁾ 특히 그는 민비시해 후 러시아를 조선의 개혁을 지원해 줄 문명국으로 보기 시작했지만, 러시아가 침략자의 모습을 드러내자 러시아에 기댄 조선 개혁의 꿈도 거둬들였다.³⁰⁾ 이후 그는 독립협회에 참가해 반러시아 운동을 주도하면서 “내부 혁명”의 길을 모색하기도 하였지만,³¹⁾ 그가 꿈꾼 내부혁명은 친러·친일의 수구세력과 대한제국 황제에 의해 무산되고 말았다.³²⁾ 이후 러시아를 조선의 생존을 위협하는 최대 위협 세력으로 본 그는 일본이 주도하는 “극동 3국 제휴론”을 제기하기도 하였다.³³⁾ 윤치호의 외세에 대한 한결같은 판단 준거는 어떤 외세가 그 때 조국의 생존에 도움이 되는지 여부였다.³⁴⁾ 다시 말해 윤치호의 메이지 일본 인식은 국제와 국내정치현실의 변화에 따라 바뀌었

27) 이러한 그의 구상은 1890년 5월 18일의 일기에 일목요연하게 담겨있다. “내가 알고 있는 한 오늘의 조선이 선택할 길은 다섯이다. ... 다섯째, 영국이나 러시아의 지배. 분명히 셋째, 넷째보다 이것이 훨씬 나은 선택이다. 영국이나 러시아 지배아래 인민은 인민으로서 많은 부분 고통이 제거된 상황을 맞을 것이고 여러 이득을 향유하게 될 것이다. 그러나 지금까지 여러 정황을 보건대 나는 러시아의 지배보다는 영국의 지배를 더 좋게 여긴다. 이 마지막 선택을 바라는 나는 자포자기적이다. 그러나 처음 두 가지는 일어날 가능성이 없고 그 다음 두 가지는 견뎌 낼 수가 없다.” 『윤치호 일기』, 1886년 9월 9일자, 송병기 역, 앞의 책, p. 373.

28) 윤치호의 눈에 조선을 보호국으로 삼으려는 일본은 이제 조선 개혁을 도울 문명국이 아니라 침략자로 비칠 뿐이었다. “과거 수개월 동안 일본은 행동 면에서 조선의 이익을 위해 아무런 관심도 보여주지 않았다. ...일본은 자국에 이익이 되고 조선을 해치게 되는 모든 것을 탈취하려 했고 탈취하고 있다”고 하거나 “그들(일본 외교관들)은 과거 유럽인들이 일본에 쓴 모든 야비한 속임수를 조선에 쓰고 있다”고 보아 일본의 침탈행위를 꼬집은 그의 1895년 8월 5일자와 9월 7일자 일기에는 일본에 대한 실망감이 넘쳐흐른다.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윤치호 일기』4, pp. 54, 62~63. 역문은 유영렬, 「개화지식인 윤치호의 러시아 인식」, 『한국민족운동사연구』41(2004), pp. 105, 106.

29) 허동현, 「개화기 윤치호의 해외체험과 문화수용」, pp. 138~140.

30) 이는 “그러한 비열한 행위(조선왕비 살해행위)는 일본이 이제까지 해온 어떠한 행위보다도 조선인을 러시아에 더욱 호의적으로 기울게 했다. 이제 조선과 일본 사이에는 조선왕비의 피로 물든 불신과 혐오의 검은 물결이 흐르는 건널 수 없는 강이 가로놓여 있다”고 해 민비시해에 대한 분노가 물씬 풍기는 1895년 12월 4일자와 “우리가 반드시 외부의 영향으로 개혁되어야 한다면, 우리는 일본인보다는 유럽인을 선호한다”고 쓴 같은 해 12월 26일자 일기가 웅변한다.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윤치호 일기』4, pp. 101, 112. 역문은 유영렬, 위의 글, p. 107.

31) 『윤치호일기』 1890년 5월 18일자. 박정신 역, 『국역 윤치호 일기』2(연세대학교 출판부, 2003), pp. 72~73.

32) 신용하, 『독립협회 연구』 (일조각, 1976). pp., 515~525; 유영렬, 위의 글, pp. 112~113.

33) 『윤치호일기』1902년 5월 7일자,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윤치호일기』5, p. 327, “일본인과 한국인 사이에는 인종·종교·문자의 동일성에 기초한 감정과 이해의 공통성이 있다. 일본·청국·한국은 극동을 황인종의 영원한 보금자리로 지키고, 그 보금자리를 자연의 뜻대로 아름답고 행복하게 만들기 위하여 공동의 목표와 공동의 정책과 공동의 이상을 가져야 한다.”

34) 이점은 그가 지인에게 보낸 편지 내용을 옮겨 놓은 1905년 12월 12일자 일기에 잘 나타난다. “내 행동이 당신을 혼동시키나요? 나는 러시아가 한국의 개혁을 도와줄 것이라고 생각했을 때 러시아에 호의적이었다. 그러나 내가 속았다는 것을 알자마자, 비록 친러가 승진과 부를 의미했지만, 나는 러시아에 등을 돌렸다. 나는 한국을 위하는 범위 내에서만 일본에 호의적이다. 만일 나의 일본에 대한 믿음이 식었다면, 그것은 다만 어떤 이들이 그렇다고 믿어라 하듯 일본의 자비와 은혜가

지만, 그 호오와 공부의 일관된 기준은 조국과 민족의 생존이었다. 그의 외세에 대한 모순된 인식은 외세가 아닌 민족을 주어로 해서 볼 때는 일관되어 있었다.³⁵⁾

VI. 이와쿠라 사절단과의 비교를 통해 본 조사시찰단의 한계

조사시찰단은 한국의 근대 서구 문물 수용사에서 특기할 만한 역사적 사건이다. 시찰단 일행에게는 이 경험이 국민국가 수립 혹은 서구 기술과 무기체계의 수용을 도모할 필요성을 자각하는 계기가 되었으며, 이들의 국가구상은 이후 조선의 정치·사회에도 적지 않은 영향을 미쳤다. 또 조사시찰단은 한·일 문화교류사에서 교류의 위상이 뒤바뀌는 전환점이자, 일본을 근대화의 발전모델로 상정한 최초의 시도이기도 하다. 12명이나 되는 고위관료와 일본의 곳곳을 누비며 이모저모를 살핀 뒤에 그 보고 들은 바를 조선의 개혁에 반영하려 하거나, 유학생을 보내 일본의 학문과 기술을 배우려 한 것은 유사 이래 처음 있는 일이었기 때문이다.

사실 한국사의 틀 내에 국한시켜 살펴보면, 조사시찰단은 근대문물에 대한 이해의 깊이와 폭 면에서 1881년 중국에 보내진 領選使나 1883년 미국과 유럽을 돌아 본 報聘使 같은 해외 파견 사절이 별다른 기록을 남기지 않은 데 비한다면, 이들의 성과는 출중했다.

그러나 시야를 넓혀 막부 말기의 서구 국가들에 파견된 사절단과 메이지유신 후의 이와쿠라 사절단 등 조사시찰단과 비슷한 성격의 일본 사절단과 비교해 보면, 조사시찰단의 취약점이 드러난다. 이 양자의 비교를 통해 우리는 조선이 가진 서구 문물 수용 노력의 한계성을 찾을 수 있다.

일본의 서구 선진 문물을 수용하려는 노력은 공식 사절단 파견과 해외 유학생 등으로 짐작할 수 있다. 막부 말기부터 메이지유신이전까지 모두 여섯 차례 서구 국가들에 사절단을 파견했는데, 1860년 80명의 사절이 미국에 파견되었으며, 1862년 유럽 국가들을 순방한 사절단의 규모는 38명이었다. 그리고 1862년 네덜란드, 1865년 러시아에 유학생을 보냈으며, 메이지유신을 주도한 죠슈와 샤쓰마도 이 시기에 영국에 유학생을 밀파했다. 각국의 정치·학제·군제 등을 파악하는 사명을 띤 사절단은 대의정치, 군사제도, 정부 전매제도, 사회보장제도에서부터 의술, 병원 경영법, 각종 학교, 전신, 우편, 토목 기술, 부두, 보세창고에 이르기까지 근대 서구문명이 이룩한 모든 것을 탐구하였다. 특히 1862년 사절단의 경우 서구 문물에 대한 탐색활동이 매우 조직적이고 철저했는데, 하급 조사원들이 매일 탐구활동에 관한 보고서를 제출하면 상급 서기관은 이 보고서들을 토대로 『영국탐험』, 『프랑스탐험』, 『러시아탐험』 등의 책자로 정리하였다.³⁶⁾

사절단원 중에서도 후쿠자와 유키치의 왕성한 활동은 군계일학과 같았다. 동료들이 처음

충만한 관음보살이 아니고 희생만을 강요하는 神像임을 알았기 때문일 것이다.” 국사편찬위원회 편, 『윤치호일기』6(탐구당, 1971), p. 327, 역문은 유영렬, 위의 글, p. 118.

35) 장인성, 앞의 글, pp. 163~164; 허동현, 「개화기 윤치호의 해외체험과 문화수용」, pp. 123~148.

36) 田中彰, 『開國と倒幕: 日本の歴史 15』(集英社, 1992), pp. 223~225; 하가 토오루 저, 손순옥 역, 『명치유신과 일본인』(예하, 1989), pp. 125~136.

본 기차에 크게 감탄하며 차량의 크기, 속도, 레일의 폭과 높이를 측정해서 일기에 기록하고 있을 때, 이미 그는 철도회사의 구성과 경영법, 은행업, 영국과 프랑스의 이집트 철도 분할 지배 같은데 관심을 기울였다. 이 때의 경험을 바탕으로 나중에 후쿠자와는 서구 근대문명의 구조를 체계적으로 기술하면서 새로운 국가구상의 비전을 제시하는 저서를 냈다. 그것이 『西洋事情』이다. 그 무렵 15만에서 20만 부가 팔린 것으로 추정되는 베스트셀러 『서양사정』은 일본인들에게 서구 근대의 산물인 국민국가 수립의 꿈을 효과적으로 전파한 최고의 매체였다.³⁷⁾

조사시찰단이 일본에 파견되기 10년 전에, 메이지 일본은 대규모 해외사절단을 파견한다. 우대신 이와쿠라 토모미(岩倉具視)를 특명전권대사로 한 이 해외사절단은 특명전권부사 네 명—참의 키도 타카요시(木戸孝允)·대장경 오쿠보 도시미치(大久保利通)·공부대보 이토 히로부미(伊藤博文)·외무소보 야마구치 나오요시(山口尚芳)—과 정부 각부서의 중견 실무관리 41명 등 공식 사절 46명을 비롯하여 18명의 수행원과 유학생 43명으로 구성되어 있었다. 廢藩置縣을 단행한 지 겨우 4개월, 근대국가로의 첫 걸음을 막 내딛은 신생 정부는 정부 수뇌의 절반을 사절단의 대표로 삼고 그 밑에 막말의 사절 참가자들을 서기관으로 배속한데다 정부 각 부처에서 파견한 전문 이사관까지 참여시킨 100여명 규모의 이와쿠라 사절단을 해외에 파견한 것이다.³⁸⁾ 이와쿠라 사절단의 성격과 목표는 그 때 이들을 전송한 태정대신 산조 사네토미(三條實美)의 송별사에 잘 드러난다.³⁹⁾

외국과의 교제는 국가의 안정과 위기에 관련되며 사절의 능력 여부는 국가의 영욕에 관계된다. 지금은 대정유신, 해외 각국과 어깨를 나란히 할 때이니 그 사명을 만리 떨어진 곳에서 완수해야 한다. 내외정치, 앞날의 대업이 성공하고 못하고가 실로 이 출발에 달려 있고 그대들의 대임에 달려 있지 않는가? 대사는 천부의 훌륭한 자질을 지닌 중흥의 공적이 있는 원로이다. 동반하는 여러 卿들은 모두 국가의 주석이며 함께 하는 관원들도 한 때의 인물들이다. 모두 이 훌륭한 뜻을 한 마음으로 받들어 협력하여 그 직분을 다해야 한다. 나는 그대들의 뜻이 실현될 날이 멀지 않았음을 안다. 가라! 바다에서 증기선을 옮겨 타고 육지에서 기차를 갈아타며, 만리 각지를 돌아 그 이름을 사방에 떨치고 무사히 귀국하기를 빈다.

이와쿠라 사절단은 1871년 11월부터 이듬해 9월까지 1년 10개월 동안 미국·영국·프랑스·벨기에·네덜란드·독일·러시아·덴마크·스웨덴·이탈리아·오스트리아·스위스 등 구미 선진국가들을 공식적으로 방문하였으며, 돌아오는 길에 중동과 아시아의 낙후된 상황도 관찰하였다.⁴⁰⁾ 산조의 송별사에도 나오듯이, 전권대사 이와쿠라와 부사 오쿠보와 기도는 메이지유신의 주역이자 귀국 후 헤게모니를 장악한 실세들이었다. 시찰을 통해 얻은 지식과 정보를 바탕으로 오쿠보는 「입헌정체에 관한 의견서」, 기도는 「헌법제정의 建言書」를

37) 하가 토오루, 위의 책, pp. 138~140.

38) 田中 彰, 『岩倉使節團：講談社現代新書487』(講談社, 1977), pp. 8~9; ———, 『岩倉使節團『米歐回覽實記』：同時代ライブラリ174』(岩波書店, 1994), pp. 2~3.

39) 田中 彰, 위의 책, 1994, p. 44.

40) 田中 彰, 위의 책, pp. 46~194.

제출한데서 알 수 있듯이 자신들의 국가구상, 다시 말해 일본형 국민국가의 창출을 곧바로 실천에 옮길 수 있었다.⁴¹⁾ 그리고 사절단의 중견관리나 유학생들도 각 분야에서 두각을 나타내며 성장하여 일본형 국민국가의 형성을 실질적으로 뒷받침했다. 뿐만 아니라 이와쿠라 사절단이 거둔 성과는 구메 구니타케의 『미구회람실기』에 고스란히 담겨 전 국민이 공유할 수 있는 지식과 정보가 되었다. 구메는 이 책에 “이 사절이 거둔 모든 성과를 국민의 일반적 이익과 개발을 위해 편집·간행” 한다고 썼듯이, 이와쿠라 사절단원들은 천황이 아니라 바로 국민을 대표한다고 생각했으며, 이 같은 사고를 실천에 옮겨 자신들이 경험한 바를 국민들과 함께 나누었던 것이다.⁴²⁾

이로부터 10~20년 후에 근대의 문물을 배우기 위해 떠난 우리의 조사시찰단은 일본의 사절들과 달리 비공식 시찰단이었다. 이것은 당시 조선과 일본의 근대문물 수용태도를 간접적으로 보여주는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시찰임무를 띠었던 12명의 조사와 그 수행원들이 약 4개월 동안 일본의 제도와 문물을 나름대로 열심히 조사하고 살펴보았지만, 이들의 경험이 조선의 근대화 작업에 전폭적으로 활용되기 힘들었다는 한계를 처음부터 안고 있었다. 우선 이들은 고종의 밀명을 받고 개인자격으로 갔으며 또 그럴 수밖에 없을 정도로 위정척사파의 세력이 강했다. 또 일본의 막부 말기와 메이지유신 후의 사절단과 비교해 볼 때 다음과 같은 한계가 있었다고 보인다.

첫째, 일본이 1860년으로부터 시작한 근대문물의 수용 노력을 우리는 20년 후에, 그것도 일본의 눈에 의해 변형된 이미지를 간접 경험했다. 4개월여에서 1년여의 짧은 시찰기간 내지 유학기간은 일본형 국민국가나 서구 근대의 지적 성과를 충분히 소화·이해하기에는 턱없이 부족한 기간이었다. 특히 이들은 그는 서구 근대의 지적 성과를 이해함에 있어 대체로 일본 지식인들에 의해 “번역된 근대(translated modernity)” – “오역”, “오독” 된 근대 – 를 통했음을 가능성이 더 크다. 따라서 이들은 동시대의 일본 지식인들이 겪은 지적 혼돈 보다 더한 서구와 일본의 상호작용에 의해 일본적으로 변형된 “삼중 번역된 근대(triple-translated modernity)”의 미로를 헤맬 수밖에 없었다.⁴³⁾ 특히 근대 서구에서 이입된 개념들 – 일본에서 조어진 번역된 한자어들 – 을 처음으로 접한 조사시찰단원들은 이를 이해함에 있어 문자의 이면에서 생기는 개념의 차이를 극복하기도 쉽지 않은 일이었다.⁴⁴⁾

둘째, 후쿠자와가 말한 것처럼 일본 사절단은 서구 근대가 이룩한 정신적·물질적 성과의 요체를 파악하여 이를 일본에 적용함으로써 서구 국가들과 어깨를 나란히 한다는 뚜렷

41) 田中 彰, 위의 책, pp. 210~212.

42) 田中 彰, 위의 책, p. 46; 松本健一, 『日本の近代: 開國・維新』 1(中央公論社, 1998), pp. 347~355; 福井純子, 『米歐回覽實記の成立』 『米歐回覽實記を読む』 (法律文化社, 1995), pp. 429~430.

43) 지금은 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로 번역어가 정착된 자유민권운동도 메이지 시대 일본인들이 개개인의 개별적인(individual) 권리를 집합개념으로서 민권(people's right)로 잘못 번역한데서 비롯된 것이라던가, Herbert Spencer의 Social Statics(1851)을 번역하면서 서명을 『社會靜學』이 아닌 『사회평권론(社會平權論)』으로 오역함으로써 이 책이 자유민권운동의 성전으로 자리잡게 했다는 에피소드가 대표적 사례이다. 마루야마 마사오·가토 슈이치 저, 임성모 역, 『번역과 일본의 근대』 (이산, 2000), pp. 54, 88~89, 107. “번역된 근대”라는 개념에 대해서는 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임성모 역, 『옮긴이의 말』 같은 책, pp. 219~226 참조.

44) 아키즈키 노조미(秋月望), 「스에마쓰 지로(末松二郎)의 필답에 나타난 ‘근대’: 1881년의 ‘신사유람단’과의 교류를 중심으로」 『근대교류사와 상호인식』 I (고려대학교 아세아문제연구소, 2001), pp. 25~34.

한 목적의식을 공유하고 있었으며, 대부분 진취적인 성향의 인물이자 메이지 정부의 실세들로 구성되었다. 그에 비해 조사시찰단의 경우, 물론 능력이 출중한 이른바 정예 관료 출신의 조사들이었지만, 어윤중과 홍영식을 제외한 대부분은 국왕의 하명에 따라 피동적으로 참여한 봉건군주의 家臣의 범주를 벗어나지 못한 사람들이었다. 또 그 수행원들은 조사들과의 사사로운 관계로 선발되었으며, 尹致昊(1865~1945)나 兪吉濬(1856~1914)처럼 일본 유학이 예정되어 있던 사람들을 빼면 대개가 관직 경험이 없고 전문성이 결여된 인물들이었다. 그밖에 역관 출신의 통역과 하인 등 20여 명도 조사들이 근대 문물제도를 파악하는 데 큰 도움이 될 만큼 각성되지는 못했다.

셋째, 일본의 사절단은 자신들의 경험을 활자화하여 국민들과 공유하는 데 힘을 썼지만, 우리의 조사들은 그러하지 못했다. 조사들은 조선으로 돌아와서 자신들이 왕의 밀명을 얼마나 잘 수행했는지 보고하기 위해, 약 2개월 동안 書寫에 능한 아전들을 동원해 “문견사건”과 “시찰기” 형식의 보고서를 작성했다. 이렇게 해서 비단으로 장정한 手書本을 고종에게 바쳤다. 따라서 조사들의 보고서는 국왕이나 일부 위정자들이 정책을 결정할 때 참고자료로 이용되는 정도였기 때문에 이들이 거둔 성과가 일반 대중들에게까지 영향을 미쳤다고 보기는 어렵다.⁴⁵⁾

V. 결 론

본고에서는 개화초기(1876-1881) 견일사절들의 일본 인식을 살펴 본 결과 다음을 밝힐 수 있었다. 첫째 1880년대 정부의 개화정책 추진에 힘입어 서양과 일본의 앞선 기술과 농업 등을 받아들여자는 東道西器論을 수용한 개신 유학자들이 늘어나면서 화이론적 메이지 일본 인식은 유교 지식인 사이에서도 점차 힘을 잃어갔다. 이들은 메이지유신 이후 일본이 이른 부국강병과 산업화를 높이 평가해 일본을 이용후생에 도움이 되는 기술과 선업을 가진 장점을 가진 문명한 타자로서 인식하였다. 메이지 일본의 근대문물 중 유교 도덕을 헤치지 않는 기술과 무기 등을 수용하려 한 採長補短의 동도서기론에 입각한 일본인식은 1880년대 전반을 풍미하였다. 물질과 정신을 구분해 유교문명의 본질을 헤치지 않는 기술 등만을 받아들여려는 배제와 수용의 논리는 시대와 상황이 바뀌면서 점차 수용 쪽으로 기울었고 그 폭도 기술과 제도에서 정신으로 확대되어 나갔다. 그러나 일본의 침략이 가시화됨에 따른 배제의 논리도 계속 제기되고 있었다. 유교문명과 근대문명을 절충하려한 동도서기론자들은 유교적 신념을 포기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메이지 일본의 제국주의적 침략을 비판할 수 있었다.

둘째로 국민국가수립론자들은 일본을 모델로 한국에 국민국가를 수립하려 했으며, 이들에게서는 전통적인 일본 이적관이 불식되고 전근대에서부터 항상 따라 배워야 했던 우월한 문명이었던 것으로 인식되는 타자규정의 역전현상이 초래되기도 했다. 개혁의 모델로서 메

45) 조사들의 일본견문 보고서 대부분은 고종의 개인 장서인 집옥제 도서관으로 보관되어 왔다. 이태진, 『고종시대사의 재조명』(태학사, 2000), pp. 300~303.

이지 일본을 보는 인식은 불변의 고정관념은 아니었다. 윤치호·박영효·서재필 같은 이들은 힘을 중시하는 현실주의적 문명개화론자로서 사회진화론에 입각한 황인종주의나 아시아 연대론에 영향을 받아 일본을 독립의 옹호자로 보기도 했지만, 일본이 가면을 벗고 침략자로서의 면모가 들어 났을 때에는 일본에 대한 반감을 드러내거나 반일태도를 노정하였다. 윤치호와 박영효 같은 이들의 메이지 일본 인식은 국제와 국내정치현실의 변화에 따라 바뀌었지만, 그 好惡과 肯否의 일관된 기준은 조국과 민족의 생존이었다. 이들의 외세에 대한 모순된 인식은 외세가 아닌 민족을 주어로 해서 볼 때는 일관되어 있었다.

셋째, 거시적으로 볼 때 위정척사와 지식인들과 달리 서구 문물의 수용에 유연한 자세를 보인 동도서기론자들도 일본을 시찰하면서 얻은 근대 문물과 제도에 대한 지식에 힘입어 시각이 크게 변하면서 조선에 국민국가를 수립할 필요성을 자각할 가능성이 컸다. 사실 후쿠자와 유키치도 1862년 유럽을 둘러 볼 당시 서구 근대의 산물인 민주주의의 기본 제도와 관행을 이해할 수 없었다.⁴⁶⁾ 그러나 후쿠자와는 서구 국가들을 둘러보면서 익힌 새로운 견문을 바탕으로 근대적 계몽사상가로 거듭났다. 서구의 근대 문물을 접하면서 습득한 지식과 정보가 그 당장은 잘 이해가 되지 않았지만, 장기적으로 후쿠자와의 세계관 변화에 큰 영향을 미쳤던 것은 확실한 것 같다. 마찬가지로 동도서기론을 제기했던 조사들 중 몇몇은 10여년의 세월이 흐른 뒤 본격적으로 일본 지향의 근대 국민국가 수립을 도모한 갑오경장(1894~1895)에 각각 참여한 바 있었다. 당시 박정양은 학부대신과 총리대신, 이현영은 내부대신, 엄세영은 농상공부대신으로 활약하였다. 갑오경장의 개혁 추진기구인 軍國機務處는 이들 동도서기론자들이 긍정적으로 받아들였던 일본의 집권적 정부와 유사한 집단지도 체제의 성격을 띠고 있었으며, 당시 지방제도 개혁의 일환으로 추진한 선거에 의한 鄉會의 구성도 이들이 호평했던 일본의 부·현회와 비슷한 제한적 지방자치제도였다. 이 같은 점을 미루어볼 때, 이들도 장기적으로 국민국가를 수립할 필요성을 깨달은 것 같다. 그렇다면 국민국가를 수립하겠다는 어윤중의 이상은 왜 물거품이 될 수밖에 없었을까? 여러 가지 이유가 있겠지만, 그 하나는 아이러니컬하게도 어윤중과 동일한 이상을 꿈꾸던 급진개화와 인사들이 일본의 힘을 빌려 무모하게 일으킨 유혈 쿠데타 갑신정변(1884)에서, 그리고 또한 한 가지 이유는 갑신정변이 실패하고 더욱 심해진 중국의 간섭과 보수세력의 반동에서 찾을 수 있다.

46) 福澤諭吉, 『福翁自伝』, 慶應義塾 編, 『福澤諭吉全集』 7(岩波書店, 1970), pp. 107~108. “정치상의 선거법이라는 것이 무엇인지 전혀 이해되지 않는다. 선거법이란 것이 어떤 법률이고, 의회라는 것은 어떠한 관청이냐고 질문하면, 저쪽 사람은 웃기만 한다. 무엇을 묻는지 잘 알고 있다는 태도이다. …또한 보수당과 자유당이라는 당파 같은 것이 있어 서로 지지 않고 밀리지 않으려고 맹렬하게 싸운다고 한다. … 태평무사한 천하에서 정치적인 다툼을 하다니. 도대체 알 수가 없다. … 저 사람과 이 사람이 적이라면 서로 함께 식사도 하고 술도 마신다. 전혀 이해가 되지 않는다.”

【Abstract】**The Perception of Japan of the Korean Missions to Japan in the Times of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HUH Donghyun

During the time of Chinese-centered world order of East Asia, Japan, a remote nation, attempted to move an axis of power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in establishing a Japanese style of nation-state in response to the 'western impact.' In 1876, Japan, emerging a newly arising nation in Asia, instead of China, is fast becoming an alternative to Korea to be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ovider of openness in adopting a model of the inclusive diplomac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used for her own open policy. In fact, Japan was a 'imperialistic invader' that enforced Korea to make an unequal agreement of Kangwhado which brought up the unilateral rights of getting Korea enfeebled including trade rights,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and the rights of the stationary troops. Japan made an effort to lead Korea to accept the Japanese way of system reform by dispatch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Japan and offering weaponries such as rifles to Korea. Japan frequently gave the Korean royal government a warning about the invasion of Russia and functioned as a mediator in making the amity between Korea and Russia in 1880. In short, Japan maintained a dual approach to Korea: 'imperialist invader' and 'supporter of enlightenment and independence.'

Korea was viewed as a 'negative other' in the eyes of Japan at that time, but, for the civilized intellectuals, Japan came to be a ideal model of the new world. In particular, the opening of a port in 1876 was the year that Japanese imperialism was set to begin in reaching the culmination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ccupation to Korea. Between 1876 and 1882, Japan invited Korean delegates and Korean Courtiers Observation Mission twice to introduce western culture, system, and military facility in order to intensify so-calle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of Korea.' In this way, Japan attempted to appear as the supporter of Korea's independence and modernization especially in the view of the Korean civilized intellectuals.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 of Travel to Japan>(entitled<*Sawhagiraek*>) by Park Young-hyeo, the Korean civilized intellectuals no longer considered Japan as the 'enemy Japan' but as the leader of Asian power to be followed. After the agreement of Kangwhado, members of Korean Mission offered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shifting from the Chinese-centered view to the pro-Japanese view.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major points resulted in the examination on the perception of Japan of the Korean Mission for the times of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First, the first Korean delegates were sent to Japan to fulfill the following tasks; collecting the new information about Meiji Japan, learning military skills, and recovering Korea-Japan alliance and trust. In 1880, the numbers of neo-Confucian scholars, who advocated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about the advanced skills and agricultural methods of the Western worlds and Japan, had been increased by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f the royal government. Some of them insisted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Japanese style industry and weaponry within the scope of Confucian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boundary. It was the cause of the major shift of the conceptual scheme turn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oriented exclusivism to the political inclusivism, and eventual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cultural trends spreading out the times of 1880s. However, as the intention of Japanese invasion came to be obvious, the exclusive manner towards the positions being supportive of reform and open policy continued to be disputed among the civilized intellectuals. The theorists of Eastern Tao and Western Skills(*Tongdo Seogi*), who attempted to combine the Confucian ideology with the compon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e Confucian conviction that often empowered themselves to offer a critical view of the imperialistic invasion of Japan.

Secondly, the advocates of nation-state made an effort to establish a Japanese style nation-state that gradually moved away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concept of the 'enemy Japan.' However, their views on Japan as an ideal model had also been challenged; Some civilized intellectuals such as Yoon Chi-ho, Park Young-hyeo, Suh Jae-pil, who obtained the progressive perspectives of the practical civilizations of Korea, tried to hold the balance of the dual positions; one was Japan as a supporter of Korea's independence influenced by the spirit of 'Yellow race' and 'Asian solidarity' intertwined with a social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the other, Japan as an imperialistic invader with a guise of modernity. Although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Yoon Chi-ho and Park Young-hyeo seemed to be inconsistent in interpreting the perception of the Meiji Japan depending upon the inner and outer political order, the fundamental norm for their positions was the survival of the homeland and people. The inconsistent perception over the foreign power including Japan for them needs to be assessed in relation to the sovereignty of the Korean people.

Thirdly, Korean Courtiers Observation Mission thought to reflect their Japanese experiences in Korea, its trip to Japan can be considered an epoch-making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Korean modernization. The Mission—12 middle-ranked officials, 27 attendants(students included), 12 translators(among them 2 Japanese), and 13 lackeys, 64 persons in total—stayed in Japan for 4 month in 1881, making a detailed observation of its modern structures. That was the first serious attempt to introduce Western institutions, using Japan as a model, in Korean history.

The tasks of the Mission members included, for example, detailed reporting on such special things as training of Japanese infantry or work of Japanese customs. As a result, the Mission members produced more than 80 books of reports, which concentrated what they learned on Meiji industry,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the delegation of specialists who could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Japanese modernization, the Mission can be rightfully compared with Japan's Iwakura Embassy(1871). Iwakura Embassy's scribe, Kumi Kunitake(1839~1931), published his <Account of Travel to America and Europe>(<Beio kairan jikki>) in 5 volumes in 1876, thus making the Embassy travel an important occasion in the story of introducing Western modernity by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populace. As the reports made by the members of Korean Mission were not published, they certainly were not as influential as Kumi's <Account of Travel to America and Europe>.

However, their reports, with all these detailed accounts about thing Western they contained, were devoured by the “progressives” interested in introducing Western ideas and institutions, and were important for breaking down traditional pejorative views of West and Westernized Japan, held by Confucian

conservatives. So, the reports were the primary materials used by Korean authorities in their quest for “self – strengthening” and “opening” in the 1880s, when they needed to assess Japan's posture on Westernization.

The 1881 Korean Mission members were able to relate the shock they felt in the encounter with Japan's “bunmei kaiwa”, to Korea's rulers, contributed in changing their value system, and influenced their decision – making process. In this respect, we can say that their Japanese experiences were socially – not only personally – meaningful. Their trip also signified the “trading of roles” in the history of Korean – 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e ideas of either establishing a nation – state or reforming existing structures (“Eastern morality”)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skills” that the Mission members came to in the result of their trip became two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inspiration for Korea's reforms of the 1880 – 1890s. We can say that at that period, Korea could follow either Chinese moderate way of “Eastern morality, Western skills” – type reforms, or Japanese way of building a nation – state. From our today positions, the latter seems to be more desirable. The former, which acknowledged only Western technical superiority and did not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its basis, modern Western ideas, was, in fact, rather an anachronism.

• **Panel 4-1** 教育, 文化的 結節과 波及

Moderator 吳密察 (WU Micha, 國立成功大)

Panelist-1 宋成有 (SONG Chengyou, 北京大)

：佛教東傳過程中的文化互動與選擇

불교의 동점(東漸)과정에서의 문화적 상호작용과 선택

Panelist-2 柳浚弼 (RYU Junpil, 成均館大 東亞細亞學術院)

：近代初期 東아시아 大學에서 ‘文科’ 制度의 成立과 學科 編制

－ 明治 時期의 日本學과 東洋學 關聯 學科 制度를 中心으로

Panelist-3 許佩賢 (HSU Peih sien, 新竹教育大)

：日治末期台灣的教育政策 - 以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為中心

(일본식민통치 말기 대만의 교육정책 - 의무교육제도 시행을 중심으로)

Panelist-4 柳書琴 (LIU Shuchin, 國立清華大)

：文化徵用與戰時良心

－ 地方文化論述, 臺灣文化更生及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

(문화 징용과 전시 양심 - 지역 문화론, 대만 문화의 소생 및 대북

조국대 (台北帝大) 문정학부 교수들)

Discussant 金旼奎 (KIM Minkyu, 東北亞歷史財團)

鄭文祥 (CHUNG Moonsang, 嶺園大)

佛教东渐的过程中的文化互动与选择

■ 宋 成 有 (北京大學校) ■

佛教东渐的过程中的文化互动与选择

宋 成 有 (北京大學校)

〈目 次〉

I. 佛教的东传

- 一. 佛教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传播
- 二. 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成为佛教传播的新天地

II. 佛教与东北亚国家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

III. 佛教与东北亚国家文化的相互选择

- 一. 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佛教与权力的相互选择
- 二. 思想和学理层面的选择

IV. 简短的结论

儒学、汉传佛教和道教(简称儒释道)等三大要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构成古代文化交流的主体。对中国而言,儒学和道教为原创文化因素;佛教则是东渐的异质文化,历经从东汉至隋唐500余年的传入过程,演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对于韩国、日本而言,儒释道均为外来的异质文化,经过长时期的引入、消化和吸收,逐渐实现了本土化,成为本国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国在国情和发展程度存在着鲜明差异,外来文化在与本土文化互动过程中的传播不尽相同,吸收和融合也因此面临着各具特色的文化选择,形成东北亚国家接受异质文化的不同特点。限于篇幅,本文以佛教为例,进行说明和分析。

I. 佛教的东传

一. 佛教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传播

公元前6世纪佛教创立于古印度,而后传入天山南北的西域诸国,开始了不断东传的过程。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内地,尚无定论。见诸史籍记载,并具有一定可信性的说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伊存授经说”。《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¹⁾“浮屠”即佛陀,“浮屠经”即佛经。《浮屠经》简略地记述了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故事,留下了“临蒲塞”、“桑门”、“伯闻”、“疏可”、“白疏可”、“比丘”、“晨丁”等弟子的名号。公元前2世纪受匈奴挤压的月支人,被迫离开敦煌、祁连山故地,西迁阿姆河以南的大夏国,占领其土地,另建大月支国,并逐渐接受了当地的佛教信仰。至公元1世纪,大月支国成为佛法东渐的中心。由此可知,佛教在西汉哀帝刘欣在位的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西来,传播者为大月支国的使者,均有可信之处。但是,《魏略》对佛法的内容未提及,景卢在何地受经亦不甚明确。

2、“明帝梦感说”或“永平求法说”。此说在《牟子理惑论》等典籍中多有记述。其中,《后汉

1) 《魏略·西戎传》,引自《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评》裴松之注。

书》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黄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一般认为，²⁾ 汉使求来的首部汉译佛经，即《四十二章经》。这部佛经记录了佛祖释迦牟尼宣示佛法要旨和修道纲领的42段语录，由汉明帝在位的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随求法汉使来华的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又名揭摩腾)和竺法兰，摘译《阿含经》的要点而成。为其作序的未详作者某，将遣往西域求经的使者，说成是“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可谓指鹿为马。³⁾ 但是，《序》文所说的明帝时佛教“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⁴⁾ 却大体接近事实。

另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明帝的皇弟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楚王英奉诏贡“黄缣白纨三十四”赎罪，明帝不受，下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⁵⁾ 据此可知，在汉明帝时代，佛教斋戒已进入皇族豪宅，僧侣“伊蒲赛”、“桑门”(沙门)受到礼敬和供养。

3、“桓帝好神说”。据载，东汉桓帝刘志(在位时间为公元147—167年)“好神，数祀浮图、老子”，“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⁶⁾ 由此可见，桓帝时释迦牟尼与老子同时被皇家尊奉、祭祀，上行下效，遂流行开来。

由上述可知，佛教在东汉时期进入中原地区。汉译经典，是此时佛教西来的阶段性特点。据载，桓帝建和元年(147)，月支国高僧支娄迦谶(支谶)来洛阳，译出《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等大乘佛教经典14部27卷。建和二年(148年)来洛阳的安息国名僧安世高(安清)，至灵帝建宁年间(公元168年—171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等多为小乘佛教经典34部40卷。灵帝末年，来洛阳汉译佛经的安息人安玄，与汉人沙门严佛调共译大乘佛经《法镜经》等。至灵帝、献帝年间，西域僧人支曜、康巨、康孟详、竺大力等也远来洛阳，汉译《成具光明经》、《问地狱事经》、《中本起经》、《修行本起经》等多部。值得注意的是，除严佛调之外，在孙和、周提力等汉人施主的资助下，洛阳孟元士、南阳张莲、南海子碧等汉族佛教徒也参与经典的翻译。西域僧人和佛经初入汉地，语言障碍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汉人在译经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是在情理之中。东都洛阳，自然也成为域外高僧云聚、竞相汉译佛教之处。

在魏蜀吴争霸的三国时代，译经和僧团弘法并行，构成了佛教东渐的新特点。在曹魏首都洛阳，来自印度的昙柯迦罗译经《僧祇戒心》，康居沙门康僧铠译经《郁伽长者经》和《无量寿经》。随着曹魏与西域佛教国家于阗、焉耆、鄯善、龟兹、大月氏等交往日益频繁，高僧和佛经日益增多地进入洛阳。在吴国，为躲避中原战乱而南渡的西域高僧不乏其人。安世高游庐山、会稽、广州等地，促进了江南佛教传播中心的形成。支谶的再传弟子支谦率数十名门徒来吴，备受孙权的赏识而旅居建康30余年，译出《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慧印三昧经》等经书36部48卷。此外，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保持着交往关系的吴国，为维祇难、康僧会等印度高僧循海路前来传播佛教提供了便利。至于远在西南边陲的蜀国，有关佛教传播的记述鲜见于史书。但在四川乐山县麻浩享堂、彭山县崖墓发现的东汉末年的小型佛像实物，表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蜀国并非与佛教绝对无缘。

279年一统天下的西晋王朝，登场不久就被一场“八王之乱”搞得气息奄奄。内乱严重削弱了司马

2) 《后汉书·西域列传·天竺国》。

3) 汉明帝刘庄在位时间为公元58—75年，张骞是西汉武帝时代的名臣，曾经在公元前139年出使大月支国、公元前119年出使乌孙等西域诸国，卒于公元前114年。不可能在近200年后的东汉明帝时代出使。

4) 《四十二章经·序》。

5)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

6) 《后汉书·西域列传·天竺国》；《后汉书·襄楷传》。

氏家族对国内的控制力，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大胡族乘机崛起、建国称帝，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316年西晋灭亡，东晋王朝偏安东南。在两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飞跃发展。其特点是：

1、佛教形成凉州、长安、洛阳、庐山等多个传播中心，对胡汉两大族群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影响。其中，北方的凉州为前凉、后凉、北凉的首都，西域高僧活跃在这里。长安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曾经是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的首都，吸引了众多高僧前来传法。洛阳地处中原要衢，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首都，也是鸠摩罗什、道安等高僧云集，译经讲学之所。在南方，景色秀丽、飞峙长江南岸的庐山，庙宇林立。帛尸梨蜜多罗、竺法汰、慧远等高僧收徒弘法，与文人雅士展开对“有”与“无”的思辨，远近有名。

2、佛教的传播核心势力，逐渐由外籍高僧转变为中国僧人，佛法理念与中国文化要素相融汇，开始了发展为汉传佛教的进程。般若学与玄学相互影响、渗透，加快了汉传佛教的发展步伐。其中，道安创立的本无宗，是佛法与魏晋玄学嫁接的尝试。高僧法显与慧景、道整等结伴远游，不畏艰险，前往佛教的发祥地天竺，刻苦求法13年。法显等历经磨难，取回《摩诃誓祇律》、《萨婆多众律》等律典，回国后翻译刻印，丰富了经论律三位一体的佛法典籍体系。慧远在庐山创立法门，成为净土宗开山鼻祖并代有传人，等等。在汉传佛教发展过程中，汉人高僧的作用日益不可取代。

3、佛教在五胡十六国兴旺发展，胡族国家俨然佛国世界。在羯人创建的后赵，永嘉四年(310)来洛阳的印度高僧佛图澄依托石氏政权，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在后赵建立佛寺890座，门徒多达万余人。其佼佼者，如竺佛调、须菩提、释道安、竺法雅、竺法和、竺法汰、竺僧朗等数十名弟子皆为名僧。⁷⁾其中，汉人高僧释道安，饱学经典，活跃在后赵、鲜卑人创建的前燕和氐人创建的前秦，讲授《般若经》并潜心汉译、注释般若学经典数十种，首次编著了佛教经典目录，并以门下徒众数百名为核心，形成实力颇强的北方僧团。

前秦建元十八年(383)，苻坚派遣吕光攻击龟兹。被武力迎回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却因前秦的骤亡而成为羌人建立的国家后秦皇帝姚兴的座上客。姚兴对其“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⁸⁾时常“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教”，并与鸠摩罗什校译新旧“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⁹⁾鸠摩罗什旅居后秦首都长安11年，主持重译或新译《般若经》、《中论》、《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大量经典，为佛教流派的兴起，作出贡献。

420年东晋由刘宋取而代之。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而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北朝诸国的变迁，与宋、齐、梁、陈先后承接的南朝对峙，史称南北朝时期。胡汉王权的南北对峙，佛教却在大陆普遍传播。在北方，甘肃敦煌、山西云冈和洛阳龙门石窟的宏大、精美的佛像雕刻，见证了佛教的足迹。在南方，唐朝诗人杜牧的一首《江南春》，留下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的遐想。据统计，在南朝的刘宋，有佛寺1913所；南齐有2015所；南梁有2846所，李陈有1232所。在北朝，北魏末年洛阳一地就有佛寺1367所，全国居然超出1万余所；东魏、北齐有佛寺3万余所，僧尼300余万；北周拥有佛寺1万余所，僧尼100万人。¹⁰⁾这一时期佛教东渐的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佛学摆脱了对黄老之学、道教和玄学的依附，独立发展并成为世俗精神世界的主流意识之一。由于得到胡汉王权的长期保护，已经在黄河南北赢得大批信奉者，佛教在南北均得到兴旺发展。佛

7)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147页。

8) 《高僧传》卷2。

9) 《晋书·姚兴载记》。

10) 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05页。

教取得在世俗精神世界堪与儒学、道教三分天下的地位,继续与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相互侵染,逐步内化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

2、形成以禅学为中心的汉传佛教诸多流派。其中包括:三国时传入、北魏时形成受戒规范的律宗;循龙树菩萨的《中论》、《十二门论》以及提婆的《百论》的三论宗;东晋时道安倡导、慧远结社,北魏时菩提流支、昙鸾等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引导往生西方弥勒净土的净土宗;由开讲天台山的智顗(亦名天台大师、智者大师)集大成,以《法华经》为依据的天台宗(法华宗);源出印度的密教,尊奉《大日经》、《金刚顶经》为经藏,通过诵咒祈祷等语、身、意的“三密”的修行而“即身成佛”的密宗,等等。

其中,禅宗的影响最大。“禅”即梵语“禅那”(Dhyāna)的略称,通过“坐禅”与“悟禅”,即通过静坐默思、排除外部诱惑而感悟真谛。禅法先于佛教而流行于古印度,被纳入佛教后,隐喻为西天说法会上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禅法东渐之初,汉末的安世高、十六国时期的鸠摩罗什等传授经典。南朝刘宋时,禅师求那跋陀罗译的《楞伽经》,归纳了禅法修炼的法门。南朝梁武帝时,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来中国,悟禅嵩山少林寺,宣教禅法。复经门下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楞伽禅师传承,蔚然而成为隋唐时期重要的佛教宗派。达磨也因此被认祖归宗,奉为禅宗始祖。禅宗望口为教,望心名禅,强调体味佛陀之心而成正果,故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修行方式简单易行,是禅宗在东亚国家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3、宗教之间的竞争尖锐化,佛教与王权之间的矛盾浮现。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僧人剧增而导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寺院享有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并挤占大量的耕地、佛教弃家出世的观念与儒学忠孝观念产生矛盾、道教急欲排挤佛教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佛教力量的显著增强。王权出于稳定统治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考虑,也在某些时候,对佛教进行大规模镇压,史称“法难”。北魏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灭佛,佛教受到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大体出于同样的原因,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年)和建德六年(577年)连续灭佛,佛教受到第二次沉重打击。¹¹⁾

二、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成为佛教传播的新天地

《三国史记》载,佛教传入高句丽是在第17代国王小兽林王即位的第二年:“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四年,僧阿道来”。¹²⁾《三国遗事》载:“高句丽本纪云:小兽林王即位二年壬申,乃东晋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之年也。前秦苻坚遣使记僧顺道,送佛像经文。又四年甲戌,阿道来自晋,明年乙亥二月,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高丽佛法之始。”¹³⁾

小兽林王二年为公元372年,正值佛教盛行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高句丽与北方民族国家接壤,佛教自然最早传入高句丽,并受到王权的欢迎。高句丽故国壤王九年(391)三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由国家出面,弘扬佛教。至广开土王即位的第二年(392),“创九寺于平壤”,¹⁴⁾佛教发展具备了一定的规模。高句丽诸王热心佛教的传入,既有祈福神佛的考虑,更有内政外交的需要。佛教进入高句丽之日,即高句丽诸王南进与西进并举的扩边之时。南进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与倭国关系密切的百济,

11) 唐武宗在会昌三年(843)、四年(844)、五年(845),接连采取禁止讲经说法、拆毁佛像和寺院、勒令僧尼还俗等措施,第三次打击佛教。三个庙号均带有“武”字帝王的上述行动,史称“三武灭佛”。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又下诏废寺毁佛,第四次打击佛教,合称“法难三武一宗”。

12)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

13) 《三国遗事·顺道肇丽》。

14)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壤王·广开土王》。

解除后顾之忧的需要提上日程。与此同时,高句丽伺机西进,与后燕、北燕、契丹等进行着争夺辽东支配权的拉锯战。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与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王权密切关系,远交近攻、赢得主动。这样,佛教的初传就并非偶然地发生在前秦和高句丽之间。

《三国遗事》载:“百济本纪云:第十五枕流王即位甲申(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胡僧摩罗难陀至自晋,迎置宫中礼敬。明年乙酉。创佛寺于新都汉山州,度僧十人,此百济佛法之始也。”¹⁵⁾ 枕流王即位在384年,即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据《日本书纪》记载,百济圣明王(523—554)时,遣使将佛教引入日本。这样,百济成为传递大陆文化于列岛的桥梁。《三国史记》的圣王时代记事,并无遣使倭国的内容。但终圣王一朝,战乱连年。在高句丽、新罗夹击下的百济圣王4次使梁朝贡,争取外交支持、并请毛诗博士、涅槃等经义以及工匠、画师等。与此同时,圣王通过传播佛教来加强与倭国的关系,牵制新罗。另外,圣王时高僧谦益矢志求法,不顾海上风浪之险,远赴中天竺学梵五载。归国时,百济王郊迎之,安置于兴轮寺,又召28名僧人协助译律部经书72卷,也足见百济君臣对佛教的热忱之甚。

在新罗,据《三国史记》载:“初讷祇王时,沙门墨胡子自高句丽至一善郡,郡人毛礼于家中作窟室安置。于时,梁使赐衣著香物,群臣不知其香名与其使用,遣人赍香遍问。墨胡子见之,称其名目曰:此焚之则香气芬馥,所以达诚于神圣。所谓神圣,未有过于三宝:一曰佛陀,二曰达摩,三曰僧伽。若烧此发愿,必有灵验”。¹⁶⁾ 讷祇王在位时间是417—458年,其间为东晋末代皇帝恭帝司马德文以及刘宋少帝刘义符、文帝刘义隆当朝期间。502年武帝萧衍废南齐和帝,建立梁朝。因此,文中的“梁遣使”当为“宋遣使”。墨胡子何时自高句丽来新罗,语焉不详。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墨胡子的身份是僧侣沙门,黯熟佛教礼仪;虽暂居民间,但一旦有机会接触王权,则宣扬佛教三宝。

在日本,对佛教通过官方渠道传人的具体时间,有宣化三年戊午(538)、钦明六年(545)前后、钦明七年戊午(546)、十三年壬申(552)等不同说法。其中,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冬10月的记事最详。《日本书纪》载:百济圣明王遣使“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在表文中盛赞佛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甚至赋诗赞美说:“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钦明“天皇闻已,喜欢踊跃。诏使者云: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决”。¹⁷⁾ 经过一番争论,钦明命宿祢大臣苏我稻目迎入家中祭祀。与《日本书纪》同时代成书的《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等,记载钦明七年10月或12月百济圣明王遣使送来佛像、佛器和佛经。《日本书纪》钦明七年仅记至秋七月,不能与上述两著在传入的年代相互印证。综合以上诸说,佛教在6世纪前半期自百济传入的说法,基本可信。

II. 佛教与东北亚国家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

作为来自域外的异质文化,佛教在传入东北亚之初,一方面势必遇到如何与各国原有的本土文化协调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东北亚国家长时期陷入战乱而动荡不安,既有学说和信仰苍白无力,无法满足世人的精神追求,又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这样,就形成了西来佛教与东北亚国家本土文化的互动大环境。

15) 《三国遗事·难陀辟济》。

16)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法兴王》。

17) 《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条。

在中国,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 作为本土文化的儒学、黄老学、神仙方术处于危机, 道教、玄学新兴但底气不足。曾经在汉武帝时代获得独尊地位的儒学,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胡汉诸帝为巩固统治, 竞相尊孔、祭孔, 魏文帝封孔氏为宗圣侯, 北魏孝文帝立孔庙于洛阳, 北齐文宣帝赐孔氏为享有百户邑的崇圣侯等, 以笼络人心, 宣示统治的正当性。在黄河南北, 儒学虽然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但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 华夷变态、纲纪混乱, 赤裸裸的暴力取代了温良恭俭让, 骄奢淫逸与惟利是图刺激着物欲横流。在种种冷酷的现实面前, 儒学说教和价值观日益无力化。

汉初的黄老学所主张自然无为、清静无为的无为论, 构成过轻徭薄赋、修养生息, 积蓄国力以赢得汉匈战争胜利的治国理念, 显示了其存在的价值。至崇尚武力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无为” 早已被“有为” 所取代, 成了政治上的明日黄花。儒学和黄老学的困境, 在无形中为佛教的东渐, 提供了机遇和发展空间。

道教创立于在东汉末年, 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相当的发展, 几乎与佛教的传播同步进行。东汉顺帝(126-144)时, 蜀郡张陵(张道陵)学道鹤鸣山中, 著《太平洞极经》, 创立互助共济的五斗米道。其子张衡继之, 其孙张鲁尊奉老子为教祖, 自号“师君”, “教以诚信不欺诈, 有病自首其过”, 信众遍及巴蜀。¹⁸⁾ 与此同时, 齐鲁琅琊人于吉在东海创立信奉《太平青领书》(《太平经》)的太平道, 宣扬阴阳五行、成仙飞升、离欲寂静、立致太平、各令平均等理念。太平道首领、巨鹿人张角兄弟兼以符水医病, 在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区地区赢得大批信徒。这样,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 初步形成。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晋人葛洪在建武元年(317)撰成《抱朴子内篇》, 归纳道术与理论; 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革新演乐诵诫章法, 南朝道士陆修静整理三洞《太平经》经典, 规范斋戒律条, 至此道教臻于成熟。但是, 在宗教思想的深刻性、思辨性和系统性等方面, 道教难以与流传既久的佛教相匹敌。因此, 借用佛法思辨哲学、经典和宗教祭祀仪式, 成为丰富和发展道教所必需。在一定时期内, 道教与佛教的关系相对平和, 尚未对佛教的传播构成障碍, 从而有利于佛法的扩展。

魏晋士人热衷其间的玄学之“玄”, 来自《老子》第一章。其文曰: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无名, 天地始; 有名, 万物母。常无, 欲观其妙; 常有, 欲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又说: “古之善为士者, 微妙玄通, 深不可识。”¹⁹⁾ 玄学之妙, 在思考“无”与“有”之间, 探究宇宙自然本源的幽深玄远。《老子》、《庄子》、《周易》等号称“三玄”的经典, 则是谈玄寻幽之所本。魏晋玄学风行一时: “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 谈者以虚荡为辩而剑名检, 行者以放浊为通而狭信节, 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²⁰⁾ 王弼、何晏、夏侯玄等主张“贵无论”, 裴頠、郭象等持“崇有论”, 展开论争。竹林七贤嵇康、阮籍等主张自然生天地, 天地生万物, 故应道法自然。玄学者冲破儒学名教的束缚, 放荡不羁、道法自然, 沉湎于玄而又玄、宏大而虚幻的形而上天地。在对陷入困境的汉儒的冷嘲热讽中, 渲泄精神世界苦闷的魏晋玄学士人, 很快在“无在万化之前, 空为众形之始”的佛教般若学里, 找到了知音, 从而激发了对佛教的浓厚兴趣, 又一片精神世界对佛教开放。

在上层社会对异质文化真谛产生强烈探求冲动的同时, 底层社会的心灵慰藉需求, 也是佛教东传的有力杠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 离乡背井、颠沛流离, 生活极不安定, 屠城略地、杀人如麻也已司空见惯。在动荡的时代, 个人的命运变幻无常。在长时期的精神折磨中, 祈求神佛的荫护保佑, 以解脱于苦难, 逢凶化吉以求得身家平安, 从一夕数惊的心灵恐怖中得到片刻的喘息安宁, 乃至暂且游离苦海, 进入某种豁达的境界等, 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初传的佛教恰恰在某种

18)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19) 《老子·上篇·道经》第一、十五章。

20) 《晋书·愍帝纪》。

程度上,满足了前述社会心理的需要。

因此,《四十二章经》借佛陀之口,列出“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嫉”、“恚”、“痴”等“十恶行”,警戒并劝导世人弃恶向善。在这部经典中,佛陀将人生的烦恼和苦难归结为“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忍色忍欲难”、“见好不求难”、“被辱不瞋难”、“触事无心难”、“广学博究难”、“除灭我慢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见性学道难”、“随化度人难”等“二十难”,供社会各阶层的信仰者对号入座,以自我觉照、迷途知返。名与利,是最常见的人生追求目标。《四十二章经》训诫热衷于求名者说:“人随情欲,求於声名。声名显著,身已故矣”;对斤斤计较的聚敛财富之人,晓之以理:“财色於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对撒手人寰的死亡,给以“视涅槃如昼夕寤”的达观阐明。²¹⁾ 上述教说,涉及劝善去恶、皈依佛法、善待人生、淡泊名利、打破生死关等民生日常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对人生20种苦难的归纳,为中国传统典籍所见所未见未闻,不乏启迪意义。这些教说与社会心理需求相互作用,构成佛教传播的深厚精神土壤。

在文化互动环境相对有利的情况下,佛教高僧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主动性,也是能在较短时期内,取得显著进展的重要原因。

第一,佛教东渐之初,僧人以灵活态度对待东北亚国家既有的本土文化,设法减缓与当地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与本土文化产生柔性互动关系。在佛教开始传人的东汉、三国时期,来自域外的佛教传播者不惜屈尊依附黄老道术,以求侵染之效。例如,在揭摩腾、竺法兰主持汉译的《四十二章经》,大量采用大量道家、道教的概念来解说佛法。在这部经典中,佛法被称为“道”或“至道”,佛教被称为“佛道”,僧人经常被称为“学道之人”或“道人”,修行过程被称为“沙门学道”。佛言训导说:“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畏前境”,最终“破灭众魔,而得道果”;或言“净心守志,可会至道”。²²⁾ 在这里,译经者故意将道教和佛教混为一谈,借助世人耳熟能详的道家、道教的语言,来传播佛教人生无常、修行向善等基本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魏晋士人入信佛教,能利用其准确掌握汉语、谙熟经史子集的学理优势,擅长于将传统文化要素用诸佛理的阐释,收取“老瓶”装“新酒”之浸润的功效。在这方面,《牟子理惑论》(通称《牟子》)堪称代表作。所谓“理惑”,即梳理世人对佛教、佛法的错误理解,阐释佛法教理。一般认为,牟子名牟融,字子博,生活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官拜苍梧郡太守。牟子饱学经传诸子和神仙长生之书,足以驾轻就熟地利用道家、道教用语,对佛教作出便于世人理解的新解释:“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神皇、五圣帝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²³⁾ 佛陀有神性:“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²⁴⁾ 此外,牟子又借用道家有关“道”和“无为”的观念,来论述佛教的清静无欲说,即“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²⁵⁾ 等等。《牟子理惑论》从“吾睹佛经之说,览老子之要”的立场出发,以黄老之学的言论,针对有关佛祖行状、佛法经纶和沙门修行质疑,展开对话,借以弘扬佛教理念。例如,针对“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但佛道“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的质疑,《牟子理惑论》引用《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认为佛道与圣人之教“何异之有乎”。再如,针

21) 《四十二章经》。

22) 《四十二章经》。

23) 《弘明集·牟子理惑论》。

24) 《弘明集·牟子理惑论》。

25) 《弘明集·牟子理惑论》。

对“不孝莫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而“何其違福孝之行也”的指责，牟子引用老子“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的论说，为僧人出家修行正名，等等。²⁶⁾

第二，鉴于鬼神迷信思想、神仙方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精神世界颇有人气的现实，远道而来的域外高僧因时制宜，纷纷以神咒法术为传播佛教影响的工具。晋时来华的西域高僧帛尸梨蜜多罗不仅精通佛法，擅长与权贵高谈阔论，而且“善持咒术，所向皆验。初江东未有咒法，蜜译出《孔雀王经》，明诸神咒，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²⁷⁾在这里，帛尸梨蜜多罗显然利用了动荡时代人们敬畏鬼神的心理，使咒术成为传播佛教的得力工具。再如，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洛阳的西域高僧竺佛图澄(道进)，既“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又“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²⁸⁾所谓“能役使鬼物”，当然是佛图澄借以传播佛教的障眼法，目的在“志弘大法”。为此，甚至包括采用魔术为传播佛教开路。在他被后赵皇帝石勒召见时，石勒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看透赳赳武夫石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使之敬服佛道。于是，他从容不迫地回答说“至道虽远，也可以近事为证。”言毕，佛图澄“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耀目，勒由此信服。”一次魔术表演，征服了后赵皇帝石勒。加之佛图澄劝告石勒停止滥杀而颇得民心，“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²⁹⁾

第三，佛教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占领人们的精神信仰空间，与传播者的人格魅力、学识才能和布教的使命感，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明帝时随汉使来洛阳白马寺传经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善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任”，精通佛学，立志高远。当应邀赴汉时，年事已高，但“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外处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在洛阳译出《四十二章》后不久，摄摩腾病故。³⁰⁾同行的另一位天竺高僧竺法兰“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既达洛阳，欲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为汉译佛经作出贡献。³¹⁾桓帝时来华的安息高僧安清也非平常之人。据载，他是安息国太子，“幼以孝行见称，加又志业聪敏，刻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故俊异之声，早被西域”。来华后，“才悟机敏”的安清“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颇受读者好评。³²⁾

晋时来建康的西域高僧帛尸梨蜜多罗，“天姿高朗，风神超迈，直而对之，便卓出于物”。“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太尉庾元规、光禄周伯仁、太常谢幼舆、廷尉桓茂伦皆一代名士，见之，终日累叹，披衿致契”。又结交尚书令卞望之、大将军王处仲等，贤名见闻于宦海。蜜所译《孔雀王经》等，闻名江东。³³⁾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新罗。起初被王权疏远的佛教之所以逐渐引起重视，是因为沙门墨胡子治愈了生病的王女。此事见载于《三国遗事》：“时王女病革，使召墨胡子。焚香表愿，王女之病寻愈。”女儿病愈，讷祇王兴高采烈，对墨胡子厚加赏赐，从而在无形中扩大了佛教的影响。³⁴⁾然而，佛教的初传，遭到群臣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僧徒童头异服，议论奇诡而非道，今若纵之，恐

26) 《弘明集·牟子理惑论》。

27) 释慧皎撰：《高僧传·晋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28) 释慧皎撰：《高僧传·晋邺中竺佛图澄》。

29) 释慧皎撰：《高僧传·晋邺中竺佛图澄》。

30) 释慧皎撰：《高僧传·汉洛阳白马寺摄摩腾》。

31) 释慧皎撰：《高僧传·汉洛阳白马寺竺法兰》。

32) 释慧皎撰：《高僧传·汉洛阳安清》。

33) 释慧皎撰：《高僧传·晋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34) 《三国遗事·阿道基罗》。

有后悔。”群臣竞相表态“不敢奉诏”。³⁵⁾在多数大臣坚持排佛立场的强大压力下,讷祇王冷遇佛教,下令诛杀了力主崇信佛法的近臣异此顿(处道),堵塞了官传渠道。

40余年后,佛教通过民传渠道,再次传入新罗。据《三国遗事》载:“又至二十一毗处王时,有我道和尚与侍者三人亦来毛礼家。仪表似墨胡子,住数年,无疾而终。其侍者三人留住,讲读经律,往往有信奉者。”³⁶⁾毗处(照知)王在位时间,为479—499年。其间,“仪表似墨胡子”的游方僧阿道基罗(我道、阿头),不避排佛的风险,重来新罗传法,终于收到“往往有信奉者”的效果。关于其来历和进入新罗的时间,历来有争议。笔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佛法初传新罗时期,僧人弘法的大无畏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在高句丽,原来流行天神信仰。如《三国志》所载:“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灵星、社稷”;“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³⁷⁾其中,尚未佛教传入高句丽的记载。在《周书·异域上》中,出现高句丽“敬信佛法”的记述,而且高句丽“又有神庙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之像;一曰登高神,云是始祖夫余神之子”。³⁸⁾在《北史》中,记述高句丽“信佛法,敬鬼神”。³⁹⁾新来的佛法被原来信仰鬼神的高句丽人坦然接纳,固然与高句丽历来处于输入中原文化的走廊,养成开放到心态有关,但传入佛教的高僧顺道的人格魅力,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海东高僧传》称其“迈德高标,慈忍济物。誓志弘宣,周流震旦。移家就机,诲人不倦”;以为顺道来而佛法畅行于海东,“非其有大智慧、大谋猷,得不思议通力。其何以行之哉,以此知其为异人。”⁴⁰⁾也因此之故,顺道被尊称为海东高僧第一人,名列《海东高僧传》卷首。

在百济,历来“信鬼神,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诸国各有别邑,名之为苏涂。立大木,悬铃鼓,事鬼神”。⁴¹⁾尽管百济本土祭祀传统深厚,本土神与域外来的佛并无冲突。《三国志》在解释“别邑苏涂”的含义时说:“其立苏涂之义,有似浮屠”。文中“有似浮屠”的解释应该是:在曹魏人或百济人看来,“浮屠”与“苏涂”是可以划等号的,祭祀佛陀或建筑佛塔,与传统的“事鬼神”相得益彰。这种情景,与魏晋人士将佛教与黄老、神仙之术混为一谈,大同小异。因此,枕流王时首传佛教的胡僧摩罗难陀自晋来百济,发挥“神异感通、莫测阶位、约志游方、不滞一隅”的弘法精神,其效果是:百济君臣“一旦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即皆革面迁善,修真面内”而迎佛奉法。⁴²⁾

在日本,佛教自传播之初,即遭遇来自灭佛派权贵豪族的有力抵抗。但这种在“国神”与“蕃神”矛盾冲突的背后,是大和朝廷内部豪族之间的激烈争斗,并非单纯的文化冲突。敏达天皇十三年(584年)秋九月,宿弥苏我马子拜旅居播磨国的高句丽僧慧便为师,“深信佛法,修行不懈”,“修治佛殿。佛法之初,自兹而作。”十四年春二月,苏我马子又“起塔于大野丘北,大会设斋”。⁴³⁾不久,国内瘟疫流行,物部氏乘机废佛,打击苏我氏。此后苏我氏反击物部氏获胜,至推古朝苏我氏支持下的圣德太子立志兴隆佛法,为佛教大举登陆列岛,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摄政期间,圣德太子派出遣隋使,大力引进中国佛法,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寺院,著佛教经典义疏,被尊为日本佛教的始祖。圣德

35)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法兴王》。

36) 《三国遗事·阿道基罗》。

37) 《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

38) 《周书·列传·异域上·高丽》。

39) 《北史·列传·高句丽》。

40) 《海东高僧传·释顺道》。

41) 《三国志·魏书·韩传》。

42) 《海东高僧传·释摩罗难陀》。

43) 《日本书纪》卷二十,敏达天皇十三、十四年条。

太子弘法虽非域外僧人所为, 但就个人在佛教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 效果类似。

III. 佛教与东北亚国家文化的相互选择

自汉末传人的佛教, 逐渐盛行于东北亚各国。佛教采用借助王权和民间交往的两种途径而持续东渐, 是初传东北亚的共同国际现象, 也是东北亚国家官民与异质文化佛教之间不断进行相互选择的历史过程。概括起来看, 这种选择包括权力、学理、心灵等不同层面, 相互进行着漫长选择。其中, 心灵之间的相互感应, 渗透在权力与学理的选择之中, 以下主要论述前两个层面。

一. 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佛教与权力的相互选择

前述见载于典籍中的“伊存授经”、“明帝感梦”、“楚王洁斋”、“桓帝好佛”、“苻坚求法”、“姚兴礼佛”等佛教初传的记述, 以及高句丽小兽林王时代的“道顺送经”、百济枕流王时代的“王迎胡僧”、新罗訥祇王时代的“墨胡子医愈王女”, 日本的“钦明传法”等等, 在古代东北亚国家有关佛教初传的记述中, 均体现了佛教与王权相结合的特点, 具有普遍性。如何解释这一并非偶然的現象呢?

概言之, 对佛教而言, 依托王权无疑于掌握了一把打开布教之门的钥匙。特别是在“王土王民”、“朕即国家”的封建时代, 得到王权的容纳、支持和庇护, 等于得到一路放行的通行证, 这是初传的佛教选择王权而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对王权而言, 新来的佛教奉释迦牟尼为主佛、诸佛菩萨位次有序, 与现有的等级制度相吻合, 有利于强化王权的需要; 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劝善弃恶等观念, 有助于稳定统治秩序; 初传时期的佛教被视为祈福成仙的道术、佛陀被视为神, 如楚王“诵黄老之微言, 尚浮屠之仁祠, 洁斋三月, 与神为誓”,⁴⁴⁾求得佛陀的保佑, 镇护王威并趋利避害, 从而满足了帝王贵族的精神需要。这样, 在王权与佛教之间产生了强烈的互补性, 双方各取所需, 自然相互选择。

在中国, 300余年的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 北方胡族王权崛起。较之汉族王权, 胡族王权更需要以德运轮替和神佛西来, 来论证建国称帝的合法性。率先自称汉王的匈奴贵族刘渊以有德者王天下传统观念为理由, 挑战华夷之别: “夫帝王岂有常哉! 大禹出于西戎, 文王生于东夷, 顾惟德所授耳。”⁴⁵⁾在羯人创建的后赵, 中书令王波、著作郎王度等向皇帝石虎建议禁佛, 说: “佛出西域, 外国之神, 功不施民, 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 建议仿照汉魏旧章, 汉人不得出家, 禁止官民拜佛烧香, 出家为僧者一律还俗。石虎答复说: “度议云: 佛是外国之神, 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 忝当期运, 君临诸夏。至于饗祀, 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 正所应奉。”⁴⁶⁾从中, 不难看出胡族王权大力倡导佛教的原因所在。

在高句丽, 自兽林王二年佛教自前秦入境, 王权就支配了佛教在高句丽传播的全过程。《海东高僧传》载第25代高句丽国王平原王(559—589)时期, “大丞相王高德, 乃深怀正信, 崇重大乘, 欲以释风被之海曲。然莫测其始末缘由,”遂“遣渊乘帆向业”。⁴⁷⁾被王高德派遣赴陈求法的“渊”, 即高句丽高僧义渊。待其回国, 赢得高句丽佛教“法门栋梁”的赞誉。

44)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

45) 《晋书·刘元海载记》。

46) 释慧皎撰: 《高僧传·晋邺中竺佛图澄》。

47) 《海东高僧传》。

在新罗，由于缺乏王权的支持，佛教在初传之时颇受打击而难以形成规模。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第23代国王法兴王金元宗(514—540)即位，将振兴佛教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在王权的介入下，佛教在新罗兴旺发展。法兴王五年，建成兴轮寺，“许人出家为僧尼奉佛”；十年，“梁遣使与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王使百官奉迎兴轮寺前路”；十四年，动工修建皇龙寺，历时13年建成；二十六年，“陈遣使刘思与僧明观来聘，送释氏经论千七百余卷”。史称法兴王“一心向佛，至末年祝发，被僧衣，自号法云，以终其身。王妃亦效之为尼，住永兴寺。”⁴⁸⁾至真兴王时，继续推行佛教国教化的政策。十年(551)，封前来新罗的高句丽高僧慧亮为僧统，建立僧官制度。在慧亮的主持下，通过举办百座讲会和八关会，传播佛法戒律。八关即八戒，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泆、不妄语、不坐高大床、不着香华、不自乐视听。关者闭也，谓禁闭八罪不犯也。”⁴⁹⁾二十九年(568)真兴王巡游国内，“沙门道人法藏、慧忍”等伴驾随行，参与国事。⁵⁰⁾新罗王权弘扬佛法事出有因：三国兼战争期间，新罗急欲通过礼佛而得到南朝的外交支持；自智证王(500—514)时代起，新罗王权开始了多方面的改革。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中，观念更新历来伴随着深化改革的过程。在当时，弘扬佛法成为观念更新的重要手段。

在百济，佛教的传播同样得益于王权强有力的支持。史载：枕流王元年(384)9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致宫内礼敬焉”；二年，“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⁵¹⁾从佛法传人之时起，百济王权就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至圣王(523—554)时，遣使朝贡与求取佛经等，同为开展对南梁外交的主要内容。至法王(599—600)即位的“是年冬，下诏禁杀生。放民家所养鹰鹞之类，焚渔猎之具。明年庚申，度僧三十人”；又“创王兴寺于是都泗泚城”，“其寺亦名弥勒寺，附山临水，花木秀丽，四时之美具焉。王每命舟，沿河入寺，赏其形胜壮丽。”⁵²⁾百济王权在弘扬佛法、享受生活的同时，国王称法王，所建寺院称王兴寺或弥勒寺。王即佛的佛教国家化意识，已经深深地深入百济政治生活之中。因此，在百济王权的倡导下，百济涌现了诸如玄光、慧显、谦益等赴南朝或天竺的高僧，也出现将佛法南传日本的昙惠、道深、慧聪等国际型的佛教大师。

在日本，佛教自钦明朝传入后，立即成为大和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导火索。由于王权软弱，佛教在初传日本的命运，取决于苏我氏或物部氏等权贵豪族权力斗争的结局。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圣王遣使送来佛像佛经。钦明天皇征询诸臣的意见说：“西蕃献佛，相貌端严，全未曾看，可礼以不？”对此，迎佛派大臣苏我稻目认为：“西蕃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排佛派大连物部尾与等表示反对：“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⁵³⁾苏我、物部氏争执不下，天皇优柔寡断，佛教仅流行于苏我氏家族内部。物部氏还两度利用瘟疫流行，大肆灭佛，打击苏我氏。至崇信佛法的用明天皇临朝，情况方发生变化。在即位第二年(587)，用明天皇复命群臣再议兴佛与否。大连物部守屋等老调重谈：“何背国神，敬他神也！”苏我马子力主尽臣道，应随诏兴佛，天皇坚定兴佛决心，丰国法师入宫说法。⁵⁴⁾佛教得到王权的支持，传法进入兴旺时期。同年苏我马子与厩户皇子联合，击垮物部氏，扫清了阻碍佛教传播的顽固势力。588年苏我氏拥立的泊瀨部皇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日本君臣在兴佛的问题上立场一致，并以后来居上的姿态，迎来推古朝佛教大发展的新时期。

48)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法兴王》。

49) 《东史纲目》。

50) 《黄草岭真兴王巡狩碑》。

51)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二·枕流王》。

52) 《三国遗事·法王禁杀》。

53) 《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十三年条。

54) 《日本书纪》卷二十一，用明天皇二年条。

当然，当佛教传播过程中，因僧尼出家人数过多而导致王权控制的劳动力急剧减少，进而危及国家财政收入，或者皇帝入信道教、佛教成为农民反抗的旗帜而对王权构成威胁时，也会发生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断然灭佛，造成法难的恶性事件。但法难事件并非王权与佛教相互选择的主流，法难过后，佛教往往更加发展。

综上所述，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东北亚纷纷涌现的民族国家王权兴衰隆替不已，帝王更替如同走马灯。但作为共同的特点，是王权与佛教产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双方彼此选择，推动了佛教东渐的进程。

二. 思想和学理层面的选择

魏晋南北朝期间，连年不断的战争和频繁的王权更替，既造成大量的伤亡与灾难，也使王权在整体上受到削弱。其间，个人福祸荣辱的始料未及、命运多舛的兴衰沉浮，展现了人生无常的万般无奈。以上诸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给此一时期打上放任自流、宽松奔放和奇谈怪举一时俱来的时代特点。获得某种精神自由的士人们，生逢乱世，随时面临生死、命运、人生变幻等尖锐的问题，精神世界处于亢奋状态。他们在悲叹人生际遇，渴望倾诉、渲泄的同时，组成各类不问朝政国事，埋头学术的文化社团，探讨学理真谛，追求谈玄论道的极终真谛。诸家各抒己见、展开论争，使得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在继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之后，进入又一个思想活跃、新论叠出的文化时代。

佛教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以经、律、论齐备的精密思想和丰富的学识滋养，吸引并选择各国上层思想精英人士，求取填补思想空间，扩大社会影响的实效。魏晋南北朝士人，则在思想和学理层面，选择了经卷浩繁、诸派立论多彩、论说新奇的佛教，以求新的精神发现和思索。双方相互选择，在推进了佛教本土化的同时，也使释学教理越来越深入地切入思想和学理层面，演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要素。

魏晋时期的精英聚会，首推曹魏的西园会。在这里，曹操父子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玚、刘桢等“建安七子”彼此以文会友，于杯觥交错的酒酣之际，咏诗放歌、寓情言志，催生了灿烂的建安文学之花。后来，曹丕得知因瘟疫流行，“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的悲报时，致信吴质回忆西园会相聚的情形说：“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⁵⁵⁾其中，不难看到当年的盛况。

两晋时期，北有河南金谷会，南有会稽兰亭会等文人聚会、切磋学艺的场所。金谷会因“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而得名。石崇与“冠绝时辈”的24友，“日以赋诗”。⁵⁶⁾元康六年(297)的一次聚会的情景是：众人“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⁵⁷⁾可知，石崇与苏绍、潘岳、贾谧、欧阳建、陆机、陆云等文坛名流继承了西园会的遗风，在笙歌悠扬、酒香四溢中聚会，赋诗文咏，令京师士人心向往之。

至于文人荟萃的兰亭会，书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对永和九年(353)三月在会稽兰亭举行的聚会，进行了记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与金谷会大吹大擂、酒气熏天的豪门盛宴不同，兰亭会追求文人墨客的清谈情趣：“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55) 《曹丕集·又与吴质书》。

56) 《晋书·刘琨传》。

57) 《全晋文·金谷诗序》。

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⁵⁸⁾史载,出席兰亭会聚会的有“王羲之与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⁵⁹⁾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支遁(支安)是熟知般若,杂糅老释之学的高僧,著有《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安般经注》及《本起四禅序》等文章,主张顿悟,喜与王羲之、谢安、孙绰、李充等名士交往,切磋教理,促进了僧俗的思想交流。

白莲华社(白莲社)是东晋末至南朝初期,士人在学理、教理的探讨中,皈依佛法的另一个重要场所。白莲社在庐山虎溪东林寺,因净土宗初祖慧远与慧永、慧持、道生、刘遗民、雷次宗、宗炳等僧俗人士,开凿东西两净池种植白莲而得名。其结社目的,在于探讨佛法教理,希求见佛往生于西方弥勒净土。在白莲社的聚会中,山水诗人谢灵运与慧远等高僧的交往,持续着类似兰亭会王羲之等与支遁的思想和学理的交流。谢灵运出身豪门谢氏家族,袭封公爵。有生之年恰逢刘宋代晋的改朝换代,被降官减封、监视和防范,因对世事多有不平。谢灵运于是在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乐和问津佛法,以求摆脱人生的失意和苦闷。谢灵运与慧远多有来往,慧远圆寂后,曾写下祭文《庐山慧远法师诔》,寄托哀思和仰慕之情。

当然,在佛教浸润东北亚精神世界,在双方相互进行思想和学理的选择过程中,也会发生争论乃至对抗。东晋抚琴、雕刻、论说高手戴逵,虽然在佛像雕刻方面颇富匠心,但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不以为意。为此,曾经撰写《释疑论》质疑慧远师徒。在论争中,慧远著《三报论》,戴逵再回以《答远法师书》作答,掀起文坛争论的波澜。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赋诗支持戴逵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⁶⁰⁾此外,佛教也受到道教的抗拒。西晋惠帝时,天师道祭酒王浮与僧人帛远论证道教与佛教正邪优劣,王浮每每落败,情急之下,引用东汉末年“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⁶¹⁾编著《化胡经》,宣称老子西去天竺教化胡人,将道教说成是佛教的源头,以抬高道教的地位,等等。

在倭国和新罗,则发生了前述迎佛与排佛的论争。与此同时,思想与学理选择与融合的过程,也出现在中国周边国家。在新罗,圆光25岁时入南陈求法11年,“博通三藏,兼学儒术”,修行为著名高僧。后随隋使回国,新罗真平王“君臣敬重为师。常讲大乘经典”。在皇龙寺举行的说经百座道场上,圆光被公认为首席大法师。作为僧侣,讲授佛经是其本分。圆光的过人之处,是儒佛两学融会贯通,并能根据时势的需要,灵活运用,对国家发展发挥作用。贤士贵山等慕名而来,请教何为“终身之戒”。圆光对僧俗两界之戒进行了划分,说:“佛教有菩萨戒,其别有十。若等为人臣子,恐不能堪”。圆光嘱咐贵山等另择“世俗五戒”为终身之戒,即“一曰事君以忠,二曰奉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不退,五曰杀生有择。”贵山等对“杀生有择”表示不理解,圆光解释说:“六斋日春夏月不杀,是择时也。不杀使畜,谓牛马鸡犬。不杀细物,谓肉不足一脔,是择物也。此是世俗之善戒。”贵山等心悦诚服,发誓终身奉行,“不敢失坠”。⁶²⁾

新罗真兴王时,盛行花郎道(也称风月道),即在歌乐群游中选拔贵族子弟的有德者,为国家之用。自新罗君臣“仰若圣人”的圆光大法师将儒学的忠、孝、信、勇、仁等“世俗五戒”纳入花郎道之后,⁶³⁾使之完成了伦理化的飞跃,从整体上提升新罗贵族子弟的素质,王权骨干武装力量的凝聚力大为增强。因此,《三国遗事》记载当面请教圆光“终身之戒”的贵山等人“从军事,皆有奇功于

58) 《晋书·王羲之传》。

59) 《晋书·王羲之传》。

60) 《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其二。

61) 《后汉书·襄楷列传》。

62) 《三国遗事·圆光西学》。

63) 《三国遗事·圆光西学》。

国家” , 云。⁶⁴⁾

IV. 简短的结论

回顾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东渐的过程,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佛教东渐是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选择和融合的范例。从古至今, 来自域外的异质文化多次冲击东北亚国家。佛教的东渐, 是异质文化最早的一次冲击。与近世基督教文化第二次冲击以中日韩三国实施锁国而告终, 近代第二次冲击以欧美列强的武力殖民征服为先导不同, 佛教的东渐伴随着古代东北亚国家文化开放和持续交流的过程, 并未导致暴力和侵略行为的发生。佛教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 先后实现了本土化, 成为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这是佛教东渐历程中特色独具的现象, 值得深入研讨。

2、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开放, 是民族文化发展总过程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 古代民族国家活跃发展。各个国家, 尤其是胡族国家和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因文化的落差和制度建设的需要, 对来自西域或中原地区的异质文化采取开放方针, 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即使在中原地区, 连续不断的战乱, 使得有汉以来, 在大一统时代经常被奉为治国大典的儒学苍白无力; 新兴的道教尚处于汲取营养的成长期, 因此历来以中华自居的汉族王权和汉人社会也对初传的佛教持开放态度。在这个过程中, 各国文化开放中展开文化建设, 遂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3、佛教东渐的意义深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北亚国家, 纷纷将来自西域的佛教异质文化本土化, 并进而使之成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 形成多元的复合型文化构造。因此, 佛教虽然在其发祥地逐渐衰落, 却在东北亚国家发展为汉传佛教, 历经二千余年间的多次法难, 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佛教与儒学、汉字、道教等文化要素鼎足而立, 共同构成了东北亚古代灿烂的文化圈, 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佛教的文化史地位及其在文明进步中的作用, 值得高度重视, 并继续给予必要的深入研究。

64) 《三国遗事·圆光西学》。

불교의 동점(東漸)과정에서의 문화적 상호작용과 선택

宋 成 有 (北京大學校)

〈목 차〉

- I. 불교의 동점
 - 1. 중국대륙에 전파된 불교
 - 2. 불교 전파의 신천지 고구려, 백제, 신라, 일본
- II. 불교와 동북아 국가 현지 문화와의 상호작용 관계
- III. 불교와 동아시아 국가 문화의 상호선택
 - 1. 정치문화 영역에서의 불교와 권력의 상호선택
 - 2. 사상과 학리의 선택
- IV. 결 론

유학, 한전불교(漢傳佛教)와 도교(약칭 유불도)등 삼대요소는 중국전통문화의 근간으로 고대문화교류의 주체였다. 중국의 입장에서 보면 유교와 도교는 원천적인 문화요인이지만 불교는 동점(東漸)된 이질문화이다. 동한시대부터 수당시대에 이르기까지 500여 년 동안 중국으로 전파되면서 중국전통문화의 구성요소로 자리잡았다. 한국과 일본의 입장에서 보면 유불도는 모두 이질문화에 속한다. 오랜 세월 동안의 유입과 흡수, 전파과정을 통해 현지화되었고 자국 전통문화의 구성부분이 되었다. 이 과정에서 각국은 국가의 상황과 발전수준 등에 있어 뚜렷한 차이를 보일 뿐만 아니라 외래문화를 받아들여 현지문화와 상호작용하면서 전파하는 데 있어서도 다른 양상을 보였다. 따라서 이질문화를 흡수하고 융합하는 과정에서도 독특한 문화적 선택이 이루어져 동북아 국가들은 각자 나름의 독특한 특징을 형성하였다. 지면상의 제한으로 본 논문은 범위를 불교에 국한시켜 설명과 분석을 시도하고자 한다.

1. 불교의 동점

1. 중국대륙에 전파된 불교

기원 전 6세기 불교는 고인도에서 생겨나 천산(天山) 남북의 서역국가들로 전파되기 시작하면서 불교의 동점이 시작되었다. 그러나 불교가 언제 중국으로 전파되었는지에 대해서는 정확한 설이 없다. 사적의 기록을 살펴보면 믿을만한 견해는 다음 세 가지이다.

1. ‘이존수경설(伊存授經說)’. 《위략·서용전》기록에 보면 ‘한대 애제 원수 원년 박사 제자 경로가 대월지왕의 사신인 이존으로부터 《부도경》을 전수 받았다’.¹⁾ ‘부도(浮屠)’는 바

로 불타이다. ‘부도경’은 바로 불경이다. 《부도경》은 불조 석가모니의 탄생설을 간략하게 기술한 것으로 임보색, 상문, 백문, 소문, 백소간, 비구, 진문 등 제자의 이름을 남겼다. 기원전 2세기 흉노의 제압을 받은 월지인은 돈황과 기연산 등의 터전에서 쫓겨나 서쪽 아무하 이남의 대하국으로 갔다. 그곳에서 다시 대월지국을 세우고 현지의 불교신앙을 점차 받아들였다. 1세기 무렵 대월지국은 불교동점의 중심이 되었다. 이로써 불교는 서한시대 애제류흠이 재위하던 원수 원년, 즉 기원 전 2년 서쪽으로 전해졌고 전파자는 대월지국의 사자라는 것이 신빙성이 있다. 그러나 《위략》은 불교의 내용에 관한 언급이 전혀 없으며 경호가 어디서 경을 받았는지도 명확한 설명이 없다.

2. ‘명제몽감설(明帝夢感說)’ 혹은 ‘영평구법설(永平求法說)’. 이 설은 《모자이혹론》 등 전적에 많이 기술되어있다. 그 중《후한서》의 기록을 보면 “명제가 꿈에 장대한 금인을 보았는데 정수리에서 빛이 나고 색은 황금색이었다. 이에 신하들에게 물으니 혹자는 답하길 ‘서방에 신이 있는데 이름은 불(佛)이라 하고 그 형태는 길이가 육척이고 황금색입니다.’ 명제가 그리하여 사신을 천축으로 파견하여 불법을 배우게 했다. 후에 중국에 그림과 불상을 가지고 돌아왔다.” 이때²⁾ 한나라 사신이 구해온 한역불경이 바로 《사십이장경》이다. 이 불경은 불조 석가모니가 가르치는 42단의 어록으로 구성된 불법요지와 수도강령을 기록해 놓았으며 한 명제 재위기간인 용평 연간(서기 58~75년) 구법하는 한나라 사신을 따라 중국에 온 인도의 스님 가섭마등(혹은 계마등)과 축법란이 함께 《아함경》의 요점을 번역하여 만들어진 것이다. 그 서문을 쓴 사람이 누구인지는 정확하게 알려져 있지 않다. 서역으로 불법을 구하러 간 사신은 ‘장건, 우림중량장 진경, 박사의 제자 왕준 등 열두명이다.’ 그러니 그들의 말을 믿고 따를 수 밖에 없었다.³⁾ 그러나 《서》에서 말하고 있는 명제 때 불교는 “도법을 알리고, 곳곳에 사찰을 세우고, 멀리서 사람들이 찾아와 업드리며, 신하나 하인이 되기를 원하는 자들이 부지기수였다”는 내용은⁴⁾ 사실과 대체로 가깝다. 《후한서·초왕영전》의 기록에 따르면, 초왕 류영이 “어려서 유협을 좋아하고, 빈객과 소통하기를 좋아했으며, 만년에 이르러 황노를 좋아하는 동시에 부도 즉 불교의 재계(齋戒)나 제사를 배웠다.” 용평 8년(65), 초왕 영은 비단 30필을 벌금으로 물고 사면을 받게 되었다. 이에 명제는 비단 30필을 초왕 영에게 돌려주면서 “초왕은 황노의 미언(微言)을 독송하고, 부도의 인사(仁詞)를 숭상하며 결재(潔齋)를 3개월 간 하고, 신과 맹세하여 누구도 미워하지 않고 의심하지 않는다. 그러므로 당연히 뉘우침이 있을 것이다. 그 속(贖:벌금)을 돌려주니 이포새(또는 우바새)와 상문(또는 사문)의 성찬을 도우라.”⁵⁾ 이로써 한나라 명제 시대에 불교 재계는 이미 황족이나 호족가문에 파고들었고 승려 우바새와 상문 등은 예의와 공양을 받았음을 알 수 있다.

3. ‘환제호신설(桓帝好神說)’. 기록에 의하면 동한의 환제 유지(재위기간 서기 147-167년)는 “신을 좋아하고, 부도와 노자에 제사를 지냈다.”, “궁에 황노와 부도의 사(祠)를 세웠다”,

1) 《魏略·西戎傳》, 《三國志·魏志·烏桓鮮卑東夷傳·評》에서 인용. 裴松之 주.

2) 《後漢書·西域列傳·天竺國》.

3) 漢明帝劉庄在位時間為公元58—75年, 張騫是西漢武帝時代的名臣, 曾經在公元前139年出使大月支國, 公元前119年出使烏孫等西域諸國, 卒于公元前114年. 不可能在近200年後的東漢明帝時代出使.

4) 《四十二章經·序》.

5) 《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楚王英傳》.

“백성 중에 섬기는 자가 약간 있었고 후에 많아졌다.”⁶⁾ 이로써 환제시기 석가모니와 노자가 동시에 황가의 존봉과 제사를 받았고, 위에서 아래로 유행하기 시작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상술한 내용을 볼 때 불교는 동한시기에 중원지역에 전파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한역경전은 이 당시 불교가 전해지던 단계적 특징이다. 기록을 보면 환제 건화 원년(147), 월지국의 고승 지여가참(혹은 지참)이 낙양으로 와서 《반야도행품경》, 《수릉엄삼미경》, 《반주삼미경》등 대승불교 경전 14부 27권을 번역했다. 건화 2년(148)낙양으로 온 안식국의 명승 안세고(혹은 안청)는 영제 건녕 년간(서기168-171)에 《안반수의경》, 《음지입경》, 《사체경》등 소승불교 경전 34부 40권을 번역했다. 영제 말년 낙양에 와서 불경을 한역한 안식인 안현과 한인 사문 엄불조는 대승불교 경전 《법경경》등을 함께 번역했다. 영제, 헌제 연간 서역의 스님 지요, 강거, 강맹상, 축대력 등도 멀리 낙양을 찾아와《성구광명경》, 《문지옥사경》, 《중본기경》, 《수행본기경》등을 번역했다. 주목할만한 것은 엄불조를 제외하고 재손화, 주제력 등 한인 시주의 도움으로 낙양의 맹원사, 남양의 장련, 남해자벽 등 한족 불교도들도 경전 번역에 참가했다. 서역의 스님과 불경이 처음 한나라에 들어오면서 가장 먼저 해결해야 할 문제는 언어소통 이었다. 따라서 경전을 번역하는 데 있어서 한인의 역할이 점차 증대되는 것은 당연한 것이었다. 낙양도 자연스레 역외의 고승들이 모이고 불경을 번역하는 곳으로 자리잡아 갔다.

위촉오 시대에 나타난 불경번역과 승려들의 불법 전파는 불교동점의 새로운 특징이 되었다. 조위의 수도 낙양에는 인도로부터 온 육가가라 역경《승지계심》와 《육가장자경》그리고《무량수경》이 있었다. 조위와 서역의 불교국가 우전, 언기, 선선, 구자, 대월씨 등의 왕래가 점차 빈번해지며 점점 더 많은 고승과 불경이 낙양으로 들어왔다. 오나라에서는 중원의 전란을 피하기 위해 남쪽으로 온 서역의 고승들이 많았다. 안세고는 려산, 회계, 광주 등지를 돌아다니며 강남불교의 전파중심을 형성해갔다. 지참의 제자 지겸은 수십 명의 문도들을 이끌고 오나라로 와서는 손권의 중시를 받고 30여 년을 건강하게 살며 《유마힐경》, 《대명도무겁경》, 《혜인삼미경》등의 경서 36부48권을 번역했다. 이 밖에도 동남아, 남아시아 국가들과 왕래가 있던 오나라는 유지난, 강승회 등 인도의 고승들이 바닷길을 따라 불교를 전파하러 오는데 편의를 제공했다. 멀리 남쪽의 촉나라는 불교 전파와 관련된 기술이 사적에 명확히 나타나있다. 그러나 사천 낙산현 마호향당, 팽산현 애묘에서 발견된 동한 동한 말년의 소형 불상 실물을 보면 “촉으로 가는 길은 어렵고 푸른 하늘 오르기 보다 더 어렵구나!” 한 촉나라가 불교와 전혀 인연이 없지 않음을 알 수 있다.

279년 천하를 다스리던 서진왕조가 들어선지 얼마 되지 않아 ‘팔왕의난’이 일어나며 목숨이 위태로웠다. 내란은 사마씨 가족의 국내 통제력을 약화시켰고 흉노, 선비, 갈(羯), 저(氐), 강(羌) 등 오대호족이 기회를 틈타 들고 일어나 나라를 세우고, 북방에 오호십육국이 생겨난 시기이다. 316년 서진이 멸망하고 동진 왕조가 동남지방에 안거하였다. 양진과 오호십육국 시기에 불교가 매우 발전했고 그 특징은 다음과 같다.

1. 불교는 양주, 장안, 낙양, 려산 등 여러 개의 전파중심을 형성하며 호한 양대부족에 갈수록 많은 영향을 미쳤다. 그 중 북방의 양주는 전량, 후량, 북량의 수도로 서역 고승들이

6) 《后汉书·西域列传·天竺国》；《后汉书·襄楷传》.

주로 이곳에서 활약했다. 장안은 십육국과 북조시기 전조, 전진, 후진, 서위, 북주의 수도였고 많은 고승들이 이곳에 와서 불법을 전했다. 낙양은 중원의 요충이었고 동한, 조위, 서진, 북위의 수도로 마찬가지로 구마라습, 도안 등 고승이 모여 경전을 번역하고 불법을 강의하던 곳이었다. 남쪽으로는 경치가 아름다운 려산에는 사당이 많이 있다. 백시리밀다라, 축법태, 혜원 등 고승이 불도들에게 불법을 전했고 문인이나 아사들과 ‘유’와 ‘무’에 대한 설전을 벌이던 곳으로 유명하다.

2. 불교 전파의 핵심세력은 처음에는 외국의 고승들이었지만 점차 중국 스님들로 바뀌어 갔고 불법의 이념과 중국 문화요소가 서로 융합하면서 한전불교로 발전해갔다. 반야학과 현학이 서로 영향을 미치며 침투되어 한전불교의 발전을 가속화했다. 그 중 도안이 창립한 본무종은 불법과 위진현학을 접목한 시도였다. 고승 법현과 혜경, 도정 등은 함께 먼길을 떠나, 위험을 무릅쓰고 불교의 발상지인 천축으로 가서 13년 동안 불법을 공부하며 고행했다. 법현 등은 오랜 수련을 마치고 《마가승기률》, 《살파다중률》등의 율전을 가지고 돌아왔다. 귀국 후 이 책들을 번역하여 경(经), 논(论), 률(律) 삼위일체의 불법 전적체계를 잡았다. 혜원은 려산에 법문을 열고 정토 종개산 시조가 되어 후대에 전해졌다. 한전불교 발전과정에서 한인 고승의 역할이 나날이 중요해져 갔다.

3. 불교가 오호십육국에서 발전하기 시작하면서 호족국가들은 엄연한 불국국가가 되었다. 갈인이 세운 후조, 영가 4년(310)낙양에 온 인도의 고승 불도징은 석씨 정권에 의지하여 수십 년의 노력 끝에 후조에 사찰890개를 세웠고, 문도가 만 명이 넘었다. 그 중 뛰어난 자들이 축불조, 수보제, 석도안, 축법아, 축법화, 축법태, 축승량 등으로 수십 명의 제자들이 명승이 되었다. 그 중 한인고승 석도안은 경전을 많이 공부했고 후조, 선비인이 세운 전연과 저인이 세운 전진에서 활약하며 《반야경》을 강의하고 수십 종에 달하는 반야학 경전을 중국어로 번역하거나 주석을 달았다. 그리하여 처음으로 불교경전 목록을 만들었고 문하에 있는 수백 명의 불도들이 주축이 되어 막강한 실력을 갖춘 북방승려단체를 형성하게 되었다.

전진 건원 18년(383) 부견은 려광을 파견하여 구자를 공격하게 했다. 무력으로 다시 얻게 된 서역고승 구마라습은 전진이 갑자기 망하자 강인이 세운 국가인 후진의 황제 요흥의 상객으로 대접받았다. 요흥은 그를 ‘국사의 예로 대하고, 극진히 대접했다’로 대우했다.⁷⁾ 종종 “많은 사문을 증현당에 불러모아 구마라습의 불교강의를 들었다.” 아울러 구마라습과 ‘삼백여권의 경전’을 논하고 번역했다. ‘불도에 의탁하는 자가 점점 많아졌고 고관대작 이하 모두 공경해 마지 않았다. 멀리로부터 온 사문이 오천여 명에 달했다’. ‘주군이 교화되어 불교를 섬기는 자가 열집 중 아홉에 달했다.’⁸⁾ 구마라습은 후진의 수도 장안에서 11년을 머물며 《반야경》, 《중론》, 《묘법연화경》, 《아미타경》등 수많은 경전을 다시 번역하거나 새로 번역하면서 불교유파 형성에 공헌했다.

420년 동진이 유송에게 넘어갔다. 439년 북위가 황하유역을 통일하고 동위, 서위, 북제, 북주 등 북조제국의 변천을 겪으면서 송, 제, 량, 진을 계승한 남조와 대치했다. 이때를 남

7) 《高僧傳》卷2.

8) 《晋書·姚興載記》.

북조 시기라고 한다. 호한 왕권이 남북으로 대치하고 있는 동안 대륙에서는 오히려 불교가 널리 전파되었다. 북방지역의 감숙 돈황, 산서 운강과 낙양 용문석굴의 장엄함과 정교하고 아름다운 불상조각들은 불교의 족적들을 보여주는 것들이다. 남방지역에서는 당대의 시인 두목이 지은 《강남춘》에는 ‘남조 때 지은 사백팔십 개의 사찰에 수많은 누대들이 이슬비에 젖는구나’라는 시 구절이 있다. 통계에 따르면 남조의 유송은 1913개의 사찰이 있었고 남제는 2015개, 남량은 2846개, 이진은 1232개가 있었다. 북조 시기 북위 말년 낙양 일대에는 1367개의 사찰이 있었고, 전국적으로는 1만개가 넘었다. 동위, 북제에는 3만여 개의 사찰과 300여 만 명의 승려가 있었다. 북주는 1만여 개의 사찰과, 100만여 명의 승려가 있었다.⁹⁾ 이 시기 불교동점의 주된 특징은 다음 몇 가지로 나타난다.

1. 불학이 황노지학, 도교와 현학에 의존하던 것을 탈피하여 독립적으로 발전하게 되었고 세속 정신세계의 주류로 자리잡았다. 호한 왕권의 보호 덕분에 이미 황하 남북지역에 신봉자들이 많이 생겼으며 불교는 남북지역에서 고루 흥성하며 발전했다. 불교는 세속의 정신세계에서 유학, 도교와 삼분천하의 지위를 얻었으며 중국 전통문화요소와 계속 상호 침투하며 전통문화의 중요한 구성부분으로 점차 내화되었다.

2. 선학(禪學)을 중심으로 한 한전불교의 여러 유파를 형성했다. 그 중에는 삼국시기에 전파되어 북위시기에 율종(律宗), 순룡수보살의 《중론》, 《십이문론》, 제파의 《백론》 삼론종, 동진시기 도안 주창하고 혜원이 조직하고 육란 등이 ‘나무아미타불’이라는 이름으로 서방 미륵정도로 이끄는 정도종, 천태산의 지의(혹은 천태대사, 지자대사)가 집대성한 《법화경》을 근거로 한 천태종(법화종), 인도에서 발생한 밀교로 《대일경》, 《금강정경》을 신봉하며 주술기도 등 언어, 신체, 의미의 ‘삼밀’ 수행으로 부처가 되는 밀종(密宗) 등이 있다.

그 중 선종의 영향력이 가장 컸다. ‘선(禪)’은 범어로 ‘선나(禪那)’ (Dhyāna)의 약칭이고, ‘좌선’과 ‘오선(悟禪)’을 통해 즉 정좌묵상을 통해 외부의 유혹을 물리치고 진리를 깨닫는 것이다. 선법(禪法)은 불교보다 먼저 고인도에서 유행했고 불교에 포함된 이후, 서천 설법회에서 불조의 념화(拈花)와 가협미소의 이야기로 꾸며졌다. 선법 동점 초기 한말의 안세고, 십육국 시기의 구마라습 등이 경전을 전수했다. 남조 유송 시기 선사(禪師) 구나발타라가 한역한 《륜가경》을 선법수련의 법문에 포함시켰다. 남조 양무제 시기 인도 고승 보리달마는 중국에 와서 송산 소림사에서 좌선을 하며, 선법을 전했다. 문하의 혜가, 승찬, 도신, 홍인, 혜능 등은 륜가선사를 계승하여 수당시기 중요한 불교종파를 형성했다. 달마도 추대되어 선종시조로 봉해졌다. 선종은 마음으로 전해지는 가르침을 중시하여 불타의 마음을 몸으로 깨닫는 것을 강조하였다. 고로 불립문자(不立文字), 교외별전(敎外別傳), 직지인심(直指人心), 견성성불(見性成佛)이라 했다. 수행방식도 쉽고 간단했으며 이는 선종이 동북아 국가에서 크게 발전할 수 있었던 중요한 이유이다.

3. 종교간의 경쟁이 첨예화 되어 가면서 불교와 왕권간의 모순이 점차 두드러졌다. 그러나 이런 상황은 결코 우연히 생겨난 것이 아니다. 승려가 급증하다 보니 노동력이 크게 유실되고 사원은 세금과 부역을 면제받는 특권을 누렸으며 대량의 농지를 점유했다. 속세를

9) 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05页。

버리고 떠나는 불교의 이념과 유교의 충효사상이 서로 상충되고 도교가 불교를 배척하는 등 복합적인 요인이 작용한 것이다. 동시에 불교역량이 눈에 띄게 증가했음을 나타내는 것이다. 왕권은 안정된 통치와 국가 재정수입을 늘리기 위해서 때로는 불교를 대대적으로 진압하였는데 이를 ‘법난(法難)’이라 했다. 북위 태무제는 태평진군 7년(446년)에 불교를 멸하여 불교는 처음으로 심각한 타격을 입었다. 대부분 비슷한 이유로 북주 무제는 건덕 3년(574년)과 건덕 6년(577년)에 계속 불교를 멸하여 불교는 두번째로 심각한 타격을 받았다.¹⁰⁾

2. 불교 전파의 신천지 고구려, 백제, 신라, 일본

《삼국사기》기록에 보면, 불교가 고구려에 전해진 것은 17대 소수림왕 즉위 2년으로 “여름 6월, 진 나라 왕 부 견이 사신과 중 순도를 파견하여 불상과 경문을 보내 왔다. 태학을 세워 자제들을 교육하였다. 처음으로 법령을 반포하였다. 4년 중 아도가 왔다.”¹¹⁾ 《삼국유사》기록에 보면 “고구려본기에 이렇게 말했다. 소수림왕이 즉위한 2년 임신(壬申; 372)은 곧 동진 함안 2년이며, 효무제가 즉위한 해이다. 전진의 부견이 사신과 중 순도를 시켜서 불상과 경문(經文)을 보내고 이때 부견은 관중, 즉 장안에 도읍하고 있었다. 또 4년 갑술(374)년에는 아도가 동진에서 왔다. 이듬해 을해(375)년 2월에 초문사를 세워 순도를 거기에 두고 또 이불난사를 세워 아도가 있게 하니, 이것이 고구려에서 불법이 일어난 시초이다.”¹²⁾

소수림왕 2년 서기 372년은 바로 오호십육국에서 불교가 성행하던 시기이다. 고구려가 북방민족 국가와 국경을 접하고 있었기 때문에 불교가 가장 빨리 고구려로 전파될 수 있었고 왕권의 환영을 받았다. 고구려 고국양왕 9년(391)3월, “교서를 내려 불교를 숭상하고 복을 받게 하라”고 하며 국가에서 나서 불교를 널리 알렸다. 광개토왕 즉위 2년(392), ‘평양에 아홉 개의 절을 창건’하여,¹³⁾ 불교는 어느 정도 발전규모를 갖추게 되었다. 고구려의 왕들은 신불에 기복을 하는 목적도 있었지만 국가를 잘 다스리고 외교를 펼치는데 필요했기 때문에 불교전파에 열성을 보였다. 불교가 고구려에 전파되던 시기는 바로 고구려 왕이 남쪽과 서쪽으로 영토를 확장하던 시기였다. 남쪽의 주요 공격대상은 왜국과 관계가 밀접한 백제였기 때문에 후환을 제거할 필요가 있었다. 동시에 고구려의 기회를 보며 서쪽으로 후연, 북연, 거란 등과 요동지역의 지배권을 놓고 쟁탈전을 벌였다. 이런 상황에서 고구려와 한때 북방지역을 통일했던 전진 왕권이 관계가 밀접해지면서 멀리 있는 나라와 교류하며 가까운 나라를 공격하여 주동권을 얻었다. 따라서 전진과 고구려에 처음 불교가 전파된 것은 결코 우연이 아니었다.

《삼국유사》기록을 보면 “백제본기에 이렇게 말했다. 제15대 침류왕이 즉위한 갑신년(동진 효무제의 태원 9년)에 호나라의 승려 마라난타가 동진에서 오자 그를 맞아서 궁중에 두고 예로 공경했다.” 이듬해 을유년에 새 도읍인 한산주에 절을 세우고 도승 열 사람을

10) 唐武宗 会昌三年(843), 四年(844), 五年(845), 接连采取禁止讲经说法, 拆毁佛像和寺院, 勒令僧尼还俗等措施, 第三次打击佛教. 三个庙号均带有“武”字帝王的上述行动, 史称“三武灭佛”. 显德二年(955)年, 周世宗又下诏废寺毁佛, 第四次打击佛教, 合称“法难三武一宗”.

11)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

12) 《三国遗事·顺道肇丽》.

13)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壤王·广开土王》.

두었으니 이것이 백제 불법의 시초이다.¹⁴⁾ 침류왕 즉위 384년은 동진 효무제 태원 9년이었다. 《일본서기》에 보면, 백제 성명왕(523-554)시기 사신을 파견하여 불교를 일본으로 들여왔다 라는 기록이 있다. 이렇게 백제가 대륙문화를 열도로 파견하는데 교량역할을 했다. 《삼국사기》의 성왕시기 기록을 보면 사신을 왜나라로 파견했다는 내용이 없다. 그러나 성왕시기 내내 전란이 끊이지 않았다. 고구려와 신라 사이에 끼어있던 백제 성왕은 네 차례나 사신을 양(梁)으로 보내 조공을 했고 외교적 지원을 받았으며 모시박사, 열반, 경의, 장인, 화가 등을 초청했다. 동시에 성왕은 불교전파를 통해 왜나라와의 관계를 강화했고 신라를 견제했다. 그밖에 성왕시기 고승 겸익은 구법에 뜻을 세우고, 거친 파도도 아랑곳 않고 멀리 천축까지 가서 범오재를 배웠다. 귀국 후 백제왕이 그를 맞이하여 흥륜사에 머물게 해주었고 또 28명의 승려들의 도움으로 율부경서 72권을 번역했다. 이를 통해 백제의 군신들이 불교에 대해 보여준 열정을 가히 짐작할 만하다.

신라에서는 《삼국사기》를 보면 “처음으로 불법이 시행 되었다. 처음 눌지왕 때, 중 목호자가 고구려로부터 일선군에 왔었다. 그 곳 사람 모레가 집안에 굴을 파서 방을 만들고 그를 편히 모셨다. 이 때 양 나라에서 사신을 보내 의복과 향을 주었으나 임금이나 신하들이 그 향의 이름과 용도를 알지 못했다. 이렇게 되자 관리에게 향을 주어 여러 곳을 다니며 물어보게 하였다. 목호자가 이를 보고 그 이름을 말해주면서 "이것을 태우면 향기가 피어나고, 그 정성이 신성한 곳에 이르게 되오. 소위 신성이란 3보(三寶)를 일컫는 것이니, 첫째는 불타요, 둘째는 달마요, 세째는 승가라요. 만일 이것을 태우며 원하는 바를 기원하면 반드시 영험이 있을 것이오” .¹⁵⁾ 눌지왕 재위기간은 417-458년으로 그 기간 동진의 마지막 황제 공제 사마덕문과 유송의 소제 유의부, 문제 유의룡의 집권기간 이었다. 502년 무제가 양(梁)나라를 세웠다 따라서 글 속에 ‘양이 사신을 파견했다’ 는 ‘송이 사신을 파견했다’ 가 마땅하다. 목호자가 언제 고구려에서 신라로 왔는지는 자세히 알 길이 없다. 그러나 분명한 것은 목호자의 신분이 승려사문이었고, 불교의 예의를 잘 알고 있었다. 비록 잠시 민간에서 살았지만 왕권과 닿을 기회만 생기면 불교의 三寶를 널리 알렸다.

일본에서 불교가 공식적인 통로로 전해진 기간은 선화 3년 무오(538), 흠명 6년 (545) 전후, 흠명 7년 무오(546), 13년 임신(552) 등 설이 다양하다. 그 중 흠명 천황 13년(552) 겨울 10월이라는 기록이 가장 상세하다. 《일본서기》기록을 보면 백제의 성명왕이 사신을 파견하여 “석가모니 금불상 하나, 깃발, 경전 몇 권을 보내왔다.” 또 불교를 극찬하여 말하길 “여러 법 중에서 특히 우수하여 이해하기도 어렵고 받아들이기도 어렵다. 주공 공자도 아직 이해하지 못했다.” , “이 법은 무한한 복과 덕을 가져다 준다.” 흠명천황이 이를 듣고 기뻐하며 사신을 불러 이르길, 짐은 그 동안 한번도 이렇게 오묘한 법을 들은 적이 없다.”¹⁶⁾ 한바탕 논쟁을 거친 후 흠명은 숙니대신 도아도목에게 집안으로 들여 제사를 지내도록 명령했다. 《일본서기》와 동시대에 쓰여진 《상궁성덕법왕제설》, 《원흥사가람연기병류기 자재장》등은 흠명 7년 10월에서 12월 백제 성명왕이 사신을 파견해 불상과 불경을 보내온 것을 기록한 것이다. 《일본서기》에는 흠명 7년 7월 가을까지만 기록되어 있어 상술한 두

14) 《三国遗事·难陀辟济》.

15)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法兴王》.

16) 《日本书纪》卷十九, 钦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条.

권의 저서가 전해진 년대와 딱 맞아떨어지는지 검증할 방법이 없다. 이상의 여러 가지 설들을 종합해 볼 때 불교는 6세기 상반기 백제로부터 전해졌다는 설이 가장 믿을만하다.

II. 불교와 동북아 국가 현지 문화와의 상호작용 관계

이질문화로서 불교는 동북아에 처음 전파될 때 각국의 본토문화와 어떻게 조화로운 관계를 유지할 것인가? 당시 동북아 국가들은 오랜 기간 전쟁으로 불안정한 상황이었기 때문에 기존의 학설이나 신앙이 힘을 잃어 사람들의 정신적 요구를 만족시키지 못하여 불교의 전파에 상대적으로 유리한 조건을 제공하게 되었다. 이렇게 해서 서역에서 온 불교와 동북아 국가의 현지문화가 서로 상호작용하는 환경이 형성되었다. 중국에서는 한말, 위진남북조 시기 본토문화인 유학, 황노학, 신선방술이 위기에 처하면서 도교와 현학이 새로이 발전했으나 저력이 부족했다. 일찍이 한무제 때 독보적인 지위를 누렸던 유학이 위진남북조 시기에 이르러 호한의 왕들이 통치의 안정화를 위해서 앞다투어 공자를 떠받들고 제사를 모셨다. 위 문제는 공씨를 종성후 작위에 봉했고 북위 표문제는 낙양에 공묘를 세웠으며 북제 문선제는 공씨에 백호읍의 종성후를 하사라는 등 민심을 구슬리며 통치의 정당성을 강조했다. 황하 남북지역은 유학이 독보적인 지위를 잃었지만 여전히 전통적인 영향력은 행사하고 있었다. 동시에 화이변태(華夷变态)와 국가의 기강이 혼란해지면서 ‘적나라한 폭력이 따듯하고 어질고 공손하고 검소하며 겸양한’ 사회풍조를 대신했고 ‘교만하고 사치스럽고 음란하고 안일한’ 풍조와 이익만을 추구하는 세태가 물욕에 대한 욕구를 더욱 자극했다. 이러한 냉혹한 현실에 직면하여 유학 설교와 가치관이 갈수록 무력화 되었다.

한대 초기 황노학이 주장하는 자연무위, 청정무위의 무위론은 백성의 세금과 요역을 가볍게 부과하고 수양하여 국력을 신장시켜 한흉전쟁의 승리를 이끌 수 있는 치국이념으로서의 존재가치를 보여주었다. 무력을 숭상하는 위진남북조 시대에 ‘무위’는 ‘유위’로 대체되었고 정치적 가치도 퇴색 되었다. 유학과 황노학의 곤경은 알게 모르게 불교의 동점에 기회와 함께 발전공간을 제공했다.

도교는 동한 말년에 생겨나 위진남북조 시대에 크게 발전했다. 불교의 전파와 거의 동시에 이루어 졌다고 할 수 있다. 동한시대 순제(126-144)때 촉군 장릉(장도릉)이 곡명산에서 도를 닦으며 《태평동극경》을 저술했고 함께 어려움을 극복해내는 오두미도(五斗米道)를 창설했다. 그 아들 장형이 그것을 계승하고 손자 장노가 노자를 교조로 받들고 스스로를 ‘사군’이라 칭하며 “성실함으로 남을 속이지 않는 것을 가르쳤으며 병이 있는 것은 그 죄를 먼저 다스려야 낫는다고 했다.” 그 후 교도들이 파촉까지 널리 퍼졌다.¹⁷⁾ 동시에 랑야인(琅玕人) 우길(烏稽)이 동해에 《태평청령서》(《태평경》)를 신봉하는 태평도를 창시하고, 음양오행, 성선비승, 이육적정(육망에서 벗어나 절대적 고요한 상태), 입치태평, 각령평균 등의 이념을 널리 알렸다. 태평도의 수령이었던 거록인 장각형제는 부수(符水)로 병을 고치면서 하북, 하남, 산둥 등지에서 많은 신도들을 거느렸다. 이렇게 도교는 현지 종교로서 점차 자리

17)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잡기 시작했다. 위진남북조 시기에 이르러 동진인 갈홍이 건무 원년(317)에 《포박자내편》을 써서 도술과 이론을 정리했다. 북위 송산 도사 구겸지가 송계장법(誦戒章法)을 연주하고, 남조의 도사 룡수정이 《태평경》경전을 정리하였으며, 재계율조(齋戒律條)를 규범화하면서 이때부터 도교가 발전하기 시작했다. 그러나 종교사상의 심각성과 사변성, 계통성에 있어 도교는 오랫동안 이어져온 불교와는 비교가 되지 않았다. 따라서 불교의 사변철학, 경전, 종교제사의식은 도교를 풍부하게 발전시키는데 필요했다. 한동안 도교와 불교는 평화로운 관계를 유지하면서 불교 전파에 걸림돌이 되기 보다는 확장에 도움이 되었다.

위진의 선비들은 현학의 ‘현’에 매료되었는데 《노자》제1장에 보면 다음과 같이 나와있다. “도를 도라고 이름 붙여 말할 수 있으나 언제나 그 이름이 도는 아니다. 이름으로 어떤 것에 이름 붙일 수 있으나 언제나 그 이름이어야 하는 것은 아니다. 이름이 없는 것은 천지의 처음이고, 이름이 있는 것은 만물의 어머니이다. 그러므로 항상 욕심이 없는 것으로 미묘한 본체를 살피고 항상 욕심이 있는 것으로 그 순환하는 현상을 살핀다. 이 둘은 같이 나와 이름을 달리하며 둘 다 현묘한 것이라고 한다. 현묘하고 또 현묘하여 모든 미묘한 것이 나오는 문이다.” 또 이르기를 “예로부터 도를 닦은 훌륭한 선비는 미묘하고 심오하여 그 깊이를 알 수가 없다.”¹⁸⁾ 현학의 오묘함은 ‘무’와 ‘유’를 생각하는 그 사이와 우주자연 본원의 심원하고 현묘함을 탐구하는 것이다. 《노자》, 《장자》, 《주역》등을 ‘삼현’의 경전이라고 하는 것은 현묘함을 논하고 심원함을 탐구하는 것이기 때문이다.¹⁹⁾ 왕필, 하안, 하후현 등은 ‘귀무론’을 주장하고 배위, 곽상 등은 ‘송유론’을 주장하며 논쟁을 벌였다. 죽림칠현의 혜강, 완적 등은 자연이 천지를 낳았고 천지가 만물을 낳았으니 도는 자연을 따른다고 주장했다. 현학자들은 유학자들의 가르침의 틀을 깨고 한없이 방탕하며 현묘함에 빠져들었다. 곤경에 빠진 한대 유학은 조롱과 멸시 속에서 정신세계의 고뇌를 표출하는 위진의 현학자들로부터 매우 빠르게 불교 반야학의 지음을 얻고 불교에 많은 흥미를 보이며 또 다른 정신세계를 불교에 선사했다.

상층 사회는 이질문화의 진리에 대해 강렬한 탐구욕망을 보여줌과 동시에 기층사회의 영혼을 위로할 필요가 있었는데 이 또한 불교가 동점된 강력한 이유 중의 하나였다. 한말, 위진남북조 시기 전란이 끊이지 않아 사람들은 고향을 등지고 각지를 떠돌아 다녀 생활이 매우 불안정 했고 사람을 죽이고 땅을 점령하는 일이 부지기수로 발생했다. 불안정한 시기에 개인의 운명은 담보하기란 어려웠다. 오랜 기간 정신적 고통을 당하면서 신불에게 비호를 구하며 고난으로부터 탈피하기를 원했고, 전화위복을 통해 몸과 집안의 평화를 구했다. 오랜 공포 가운데 순간의 평안함을 구하고, 고통의 바다를 헤매다 확 트인 세상으로 진입하고자 하는 것이 당시의 보편적인 사회심리였다. 초기의 불교는 상술한 사회심리를 어느 정도 만족시켰다.

따라서 《사십이장경》는 불타의 입을 빌려 ‘살생’, ‘흠지기’, ‘간음’, ‘이간질’, ‘욕하거나 멸시하는 말’, ‘망언’, ‘실없고 잡된 말’, ‘질투’, ‘원망’, ‘어리석음’ 등 ‘십악행’을 말하고 세상 사람들이 악을 버리고 선을 행할 것을 경계하고 권고했다. 이 경전은 불타가 인생의 번뇌와

18) 《老子·上篇·道经》第一, 十五章.

19) 《晋书·愍帝纪》.

고난을 “가난하면 보시하기 어렵고, 존귀하면 도를 배우기 어렵고, 일부러 생명을 버리기 어렵고, 불경을 만나기 어렵고, 이성에 대한 욕심을 참기 어렵고, 좋은 것을 보고 탐하지 않기 어렵고, 수모를 당하고 성내지 않기 어렵고, 사건을 대해 당황하지 않기 어렵고, 널리 배우고 연고하기 어렵고, 아만심을 일으키지 않기 어렵고, 마음가짐이 평등하기 어렵고, 시비에 말려들지 않기 어렵고, 공부하여 견성하기 어렵고, 중생을 제도하기 어렵다” 등 ‘이십난’으로 귀납하고, 사회 각계층의 신앙자들에게 대호입좌(對號入座)하게 하여 스스로 깨닫고 잘못된 길에서 바로 돌아오게끔 했다. 명(名)과 리(利)는 가장 흔한 인생의 목표이다. 《사십이장경》은 명을 구하는 자들에게 훈계하길 “사람들이 정욕을 따라 명성을 구하지만 그렇게 해서 명성은 이미 두드러져도 몸은 이미 없도다.” 애써 재물을 모으려고 하는 자들에게 “사람들이 재물과 색을 버리지 못하는 것이 마치 칼날에 묻은 꿀은 한번 맛보기도도 넘 넘치 않거늘 어린아이가 이를 핥다가 혀를 베이는 것과 같다”고 했다.²⁰⁾ 상술한 설교는 권선징악, 불법귀의, 인생우대, 담박명리, 생사관문 타파 등 백성들이 일상에서 자주 직면하는 문제들이다. 특히 인생의 스물 가지 고난을 귀납한 것은 중국 전통 전적에서 찾아보기 어려운 것으로 깨우치는 바가 크다. 이러한 설교와 사회심리가 상호작용을 일으키며 불교 전파의 든든한 정신적 토양을 만들었다.

문화의 상호작용 환경이 상대적으로 유리한 상황에서 불교의 고승들은 전파 과정에서 주동적인 역할을 발휘하였으며 이는 불교가 빠르게 발전할 수 있었던 중요한 원인이기도 하다.

첫째, 불교동점 초기 스님은 동북아 국가의 기존 본토문화에 탄력적인 태도를 취했으며 현지의 본토문화와 모순이나 충돌을 줄이기 위해 설법했다. 따라서 본토문화와 유연한 상호작용관계를 형성했다. 불교가 전파되기 시작한 동한과 삼국시기 타지의 불교 전파자들은 몸을 낮춰 황노도술에 의지하여 감화시키는 것을 마다하지 않았다. 예를 들면 게마등, 축법란의 주도로 《사십이장경》을 한역했고 많은 도가, 도교의 개념으로 불법을 설명했다. 이 경전에서 불법은 ‘도(道)’ 혹은 ‘지도(至道)’라고 불렸고 불교는 ‘불도’라고 불리었으며 승려들은 ‘학도지인’ 혹은 ‘도인’이라 불리었다. 그리고 수행과정을 ‘사문학도’라고 했다. 불교의 교훈은 “마땅히 마음을 다져먹고 부지런히 용맹전진하고 다가서는 경계를 두려워하지 않는다.” 최종적으로 “온갖 마구니를 처부수어어야 도과(道果)를 얻게된다” 또는 “마음에 티끌이 없어 이를 지키면 지극한 도에 이를 수 있다” 였다.²¹⁾ 여기에서 경전을 번역한 사람이 고의로 도교와 불교를 혼동하여 함께 논하며 세인들에게 익숙한 도가나 도교의 말로 불교의 인생무상과 수행 등의 기본이념을 전파했다.

주목할만한 것은 위진의 사인들이 불교를 믿음에 따라 정확한 한어와 경사자집의 학리우세를 이용할 수 있게 되었고 전통문화요소를 불교의 섭리를 해석하는데 사용하여 ‘오래된 병’에 ‘새로 담근 술’을 담은 침윤의 효과를 거두었다. 이와 관련하여 《모자이혹론》(일반적으로《모자》라 칭함)이 대표적이다. 이른바 ‘이혹(理惑)’이라는 것은 불교와 불법에 대한 세인들의 오해를 해명하는 것을 말한다. 모자의 이름은 모용이고 자는 자박이다. 동한 말년과 삼국시대 사람이며 창오군 태수이다. 모자는 경전제자와 신선장생과 관련된 책

20) 《四十二章經》.

21) 《四十二章經》.

을 많이 읽었으며 도가와 도교의 용어를 사용하여 불교에 대해 세인들이 이해하기 쉬운 새로운 해석들을 쉽게 내놓았다. “불자는 시호다. 이름은 삼신황, 오성제이다. 불은 도덕의 원조이고 신명의 가계(家系)이다.”²²⁾ 불타는 신성이 있다. “황홀히 변화하고 분신하여 몸을 해체시키며 살기도 하고 죽기도 하며 커졌다가 작아지기도 한다. 둥글었다 네모지기도 하고 늙었다가 젊어지기도 하며 모습을 감췄다가 드러내기도 한다. 불이 붙어도 타지 않고 칼이 닿아도 상처 나지 않으며 더러운 곳에 있어도 오염되지 않고 화가 미쳐도 재앙을 당하지 않으며 가려고 하며 날고 앉아 있으면 빛을 발하는 고로 부처라 한다.”²³⁾ 이밖에도 모자는 또 도가와 관련된 ‘도’와 ‘무위’의 관념을 이용해서 불교의 청정무욕설을 설명했다. 즉 《모자이혹론》은 ‘불경지설(佛經之說)과 노자지요(老子之要)’ 입장에서 출발하여 황노지학의 말로 불조의 행상과 불법경륜, 사문수행에 의문을 던지고 대화를 전개했으며 이를 통해 불교의 이념을 전파했다. 《모자이혹론》은 《노자》를 인용하여 “하늘과 땅이 있기 전에 그 어떤 물이 존재하고 있었고 천하의 어머니가 될 수 있다. 나는 그 이름을 몰라 그것을 그저 도라고 부른다.” 불도와 성인의 가르침을 “무엇이 다름이 있는가”라고 여겼다. 또 ‘불효’에 대해 사문은 사문은 ‘아내를 버리고’, ‘재물을 손해 보거나 ‘평생 아내를 맞이하지 않아’ “어찌 효를 저버리는 행위를 하는가”라고 비난했다. 모자는 노자의 “명예와 생명 중 어느 것이 절실한가, 생명과 재산 중 어느 것이 소중한가”를 인용하여 승려들에게 출가수행의 중요성을 강조했다.²⁴⁾

둘째, 귀신이나 미신사상, 신선방술이 한말 위진남북조 시기의 중국 정신세계에 매우 인기를 끌었던 현실에 비추어 멀리서 온 타지의 고승들은 시대의 상황에 맞게 주술을 불교의 영향력을 넓히는 도구로 썼다. 진나라 때 중국에 온 서역 고승 백시리밀다라는 불법에 정통했을 뿐만 아니라 권세가들과의 토론에도 능했다. 그리고 “주술을 잘 하여서 향하는 곳마다 모두 영험이 있다. 과거 강동에는 주문을 외우는 법술이 없었다. 백시리밀다라는 《공작왕경》을 번역하여 여러 신주를 밝혔다. 또 제자 역력에게는 높은 소리의 법패를 가르쳐 주었다. 지금까지 그 소리가 전한다.”²⁵⁾ 여기서 백시리밀다라는 불안한 시기 사람들이 귀신을 두려워하면서도 존경하는 심리를 이용하여 주술을 불교전파의 힘있는 도구로 사용하였다. 또 진 회제 영가 4년(310) 낙양에 온 서역 고승 축불도징(도진)은 “주술을 외우는 것에 능해 귀신을 잘 부리고 기름과 연지를 손바닥에 바르고 천리 밖의 일을 손바닥 들여다 보듯 훤히 안다.”²⁶⁾ 이른바 ‘귀신을 잘 부린다’는 불도징이 불교를 전파하는데 장안법을 사용했다. 목적은 ‘불법을 널리 알리기 위함’이다. 이를 위해 어떤 때는 심지어 마술로서 불교전파의 길을 열기도 했다. 그가 후조 황제 석륵을 알현할 때 석륵은 단도직입적으로 그에게 질문을 하나 던졌다. “불교는 무엇이 영험한가?” 불도징은 석륵이 용감한 사람이라는 것을 꿰뚫어 보고 “심오한 이치에 도달하지 도술로서 정복할 수 있다”로 그를 불도에 탐복케 하고자 했다. 그래서 태연자약하게 대답하길 “도에 이르는 비록 멀지만 가까이 있는 일

22) 《弘明集·牟子理惑論》.

23) 《弘明集·牟子理惑論》.

24) 《弘明集·牟子理惑論》.

25) 釋慧皎撰：《高僧傳·晉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26) 釋慧皎撰：《高僧傳·晉邺中竺佛圖澄》.

로 증명할 수 있다.” 말을 마치고 불도정은 “그릇을 가져와 물을 담고는 향을 태우며 주문을 외우니 순식간에 연꽃이 피어나며 눈이 부셨다. 석륵이 이에 탐복했다.” 한번의 마술 공연으로 후조 황제 석륵을 사로잡았다. 게다가 불도정은 석륵에게 무자비한 학살을 그만둘 것을 권했고 민심을 크게 얻어 후조가 불교를 믿게 되었다.²⁷⁾

셋째, 불교가 단기간에 사람들의 정신신앙세계를 사로잡은 데에는 전파자들의 인격적인 매력, 학식과 재능, 포교의 사명감도 중요한 요인으로 작용했다. 명제 때 한나라 사신을 따라 낙양에 온 백마사에 경을 전해준 천축의 고승 섭마등은 “소승과 대승 경전을 해석했고” 불학에 정통했고 뜻을 높이 세웠다. 초청을 받고 한에 갔을 때 나이가 이미 많았지만 불교 전파를 위해 노력을 아끼지 않았다. 낙양에서 《사십이장》을 번역한지 얼마 되지 않아 섭마등은 병이 났다.²⁸⁾ 동행한 또 다른 천축의 고승 축법란은 “수많은 경전을 암송했고 천축 한자술의 스승으로 불렸다”, “낙양에 와서 섭마등과 함께 머물며 어려서부터 중국어를 잘해서” 불경 번역에 많은 공헌을 했다.²⁹⁾ 환제 때 중국에 온 안식 고승 안청도 평범한 인물은 아니었다. 기록에 의하면 그는 안식의 국태자이고 “그는 어려서 효행스럽고, 총명하며, 배우기를 좋아했다. 외국의 전적이나 칠요오행, 의방이술, 금수의 소리까지 못하는 것이 없다.” “남달리 뛰어난 안청은 일찍이 서역에서 나왔다.” 중국에 온 후 “총명하고 기민한” 안청은 “하나를 들으면 열을 알았고 오래도록 배우기를 그치지 않고 중국어를 배웠다. 따라서 경을 번역하며 호나라의 경을 한나라의 경으로 바꾸었다”, “번역한 불경이 39부에 달한다. 뜻과 이치가 명확하며 글자가 바르면서도 말이 지나치게 화려하지 않고 수준도 저속하지 않아” 독자들의 호평을 받았다.³⁰⁾

진나라 때 서역의 고승 백시리밀다라는 “타고난 자태가 높고 밝았다. 신령한 풍채가 뛰어나서 직접 그를 대하면 남들보다 우뚝 빼어났다.” “영가 년에 처음 중국에 와서 전란이 일자 양자강을 건너 건초사에 머물렀다.” 승상인 왕도가 “한번 보자마자 기이하게 여겼다.” “태위 유원규, 광록 주백인, 태상 사유여, 정위 환무륵은 모두 일대의 명사이다. 그를 보고 종일토록 여러 번 탐복하여 가슴을 열어젖히고 관계를 맺었다.” 또 상서령 변망지와 대장군 왕치중 등과 사귀며 이름을 알렸고, 《공작왕경》등을 번역하여 강동에 이름을 알렸다.³¹⁾

비슷한 상황이 신라에서도 나타났다. 처음에는 왕권과 소원하던 불교가 점차 관심을 받게 된 데에는 사문 묵호자가 왕녀의 병을 고쳤기 때문이다. 이 일은 《삼국유사》에 기록되어 있다. “이때 왕녀의 병이 위중하여 묵호자를 불러 향을 피우고 축원하게 했더니 왕녀의 병이 나았다.” 딸의 병이 낳자 눌지왕은 기뻐 묵호자에게 후하게 상을 내렸다. 이렇게 하여 불교의 영향력을 알게 모르게 넓혀나갔다.³²⁾ 그러나 초기 불교는 군신들의 반대에 부딪혔다. 이유는 “요즘 중의 무리를 보면 머리를 깎고 이상한 복장을 하였으며 말하는 것이 기괴한 것이 이는 영원히 진실한 도가 아닙니다. 아제 만약 그들을 방치하면 후회할 일이 생길까 염려됩니다.”³³⁾ 대다수의 대신들은 배불(排佛) 입장을 견지하는 바람에 눌지왕은

27) 释慧皎撰：《高僧传·晋邺中竺佛图澄》。

28) 释慧皎撰：《高僧传·汉洛阳白马寺摄摩腾》。

29) 释慧皎撰：《高僧传·汉洛阳白马寺竺法兰》。

30) 释慧皎撰：《高僧传·汉洛阳安清》。

31) 释慧皎撰：《高僧传·晋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32) 《三国遗事·阿道基罗》。

불교를 냉대했고, 종신불법을 주장한 근신 이차돈(처도)의 목을 베라고 명령하여 관전 경로를 차단했다.

40여 년 후 불교는 민전경로를 통해 다시 신라에 들어왔다. 《삼국유사》의 기록을 보면 “또 21대 비처왕 때에 이르러 아도승이 시자 세 사람을 데리고 역시 모례의 집에 왔는데 모습이 묵호자와 비슷했다. 몇 해를 살다 아무 병도 없이 죽었고, 시자 세 사람은 머물며 살면서 경과 율을 강독하니 간혹 신봉하는 사람이 생겼다.”³⁴⁾ 비처(조지)왕 재위기간은 479~499년이다. 이 기간 “모습이 묵호자와 비슷”한 유방승 아도기라(아도, 아두)는 배불의 위험을 무릅쓰고 다시 신라로 와서 불법을 전했으며 마침내 “간혹 신봉하는 사람이 생기는” 효과를 보았다. 그의 이력과 그가 신라에 온 시기에 대해서는 줄곧 논쟁이 일고 있다. 필자가 여기서 강조하고 싶은 것은 초기에 불법이 신라에 전파되었을 때 두려워하지 않는 승려들의 정신과 불교전파를 위해 포기하지 않고 노력하는 승려들의 정신이다.

고구려는 원래 천신신앙이 유행했었다. 《삼국지》기록을 보면 “집을 관리하는 것을 즐겨 그 거하는 곳에 큰 집을 좌우에 세우고 귀신에 제사 지낸다. 또 신령스런 별과 토지신에게도 제사 지낸다.” “10월에 하늘에 제사 지내는 것이 나라의 큰 모임으로 동맹이라고 한다.” “그 나라의 동쪽에 큰 구멍이 하나 있데 수혈이라 한다. 시월 나라의 큰 모임에서 수혈신을 맞이하여 나라 동쪽에서 하늘에 제사를 지내는데 나무로 수혈신의 자리를 만들어 둔다.”³⁵⁾ 그 중 불교가 아직 고구려에 전해지지 않았다는 기록이 있다. 《주서·이역상》에 보면 고구려 ‘경신불법(敬信佛法)’이라는 기술이 있고 고구려가 “또 신묘가 두 곳 있는데 하나는 부여신으로 나무를 조각해서 부인의 상을 만들어 놓았다. 또 하나는 등고신으로 시조 부여신의 아들이라 했다”라고 기록되어 있다.³⁶⁾ 《북사》에 보면 고구려는 “불법을 믿고 귀신을 경배한다”라고 기록되어 있다.³⁷⁾ 새로 전해진 불법은 원래 귀신을 믿었던 고구려인이 기꺼이 받아들인 것으로 고구려와는 줄곧 중원문화를 받아들이는 통로역할을 했고 개방적인 태도를 지녔던 것과 관계가 있다. 그러나 불교를 전파한 고승 순도의 인격적 매력도 무시할 수 없는 중요한 요인이다. 《해동고승전》에보면 순도가 불법을 해동에 전파했다고 여겼다.³⁸⁾ 따라서 순도는 해동 고승의 일인자로 존경받았으며, 《해동고승전》1권에 이름이 올랐다.

백제는 줄곧 “귀신을 믿고 국가와 고을은 각각 한 명의 주제천군을 세웠는데 천군이라 이름했다. 또 제국은 각자 별읍이 있었는데 소도(蘇涂)라 이름했다. 큰 나무를 세우고 방울을 메달아 두들기며 귀신을 섬겼다.”³⁹⁾ 설사 백제 본토는 제사를 지내는 전통이 뿌리 깊었지만, 본토신과 타지역으로부터 전파된 불교는 서로 충돌하지 않았다. 《삼국지》는 ‘별읍 소도(別邑蘇涂)’의 뜻을 이렇게 풀고 있다. “그 소도를 세운 뜻을 보면 부도와 유사하다.” 이 중 ‘부도와 유사하다’의 뜻은 분명 조 위인이나 백제인이 보기에는 ‘부도’와 ‘소도’는 등호

33)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法兴王》.

34) 《三国遗事·阿道基罗》.

35) 《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

36) 《周书·列传·异域上·高丽》.

37) 《北史·列传·高句丽》.

38) 《海东高僧传·释顺道》.

39) 《三国志·魏书·韩传》.

관계이고 불타에 제사를 지내거나 혹은 불탑을 세우는 것과 전통적인 ‘귀신을 섬기는 것’은 서로의 장점을 더욱 부각시키는 것이다. 이는 위진 인사가 불교와 황노, 신선을 하나로 놓고 논하는 것과 대동소이하다. 따라서 침류왕 시기 처음 불교를 전파한 호나라 승려 마라난타는 진에서 백제로 와서 “신은 다르나 느낌은 통하고 그 경지는 헤아릴 수 없이 높아 여러 곳을 떠돌며 뜻을 전하여 하였다”는 홍법정신을 발휘했다. 그 효과는 백제의 군신들이 “일단 들은 것을 듣지 못하고 본 것을 보지 못하니 철저하게 회개하여 선하게 바뀌고 내면의 진리를 수행한다”며 불교를 받들게 되었다.⁴⁰⁾

일본은 불교가 전파된 초기 멸불파인 권세거나 호족의 저항에 직면했다. 그러나 이런 ‘국신’과 ‘번신(蕃神:외국신)’의 상호충돌 배후에는 대화 조정 내부 호족간의 격렬한 투쟁이 있었다. 이는 결코 단순한 문화적 충돌이 아니었다. 민달천황 13년(584년)9월, 숙미 소아마자는 고구려의 승려 혜변을 스승으로 삼고 “불법을 깊이 믿으며 끊임없이 수행했다.”, “불전을 다스렸다. 불법이 전해진 초기부터 이렇게 행해졌다.”⁴¹⁾ 얼마 후 국내에 역병이 유행하면서 물부씨는 기회를 틈타 불교를 폐지시키고 소아씨를 공격했다. 그 후 소아씨는 물부씨를 반격하여 승리를 거두었고, 소아씨의 지지를 받은 성덕태자는 불법홍성에 뜻을 세우고 불교를 대대적으로 열도에 상륙시키며 길을 닦았다. 섭정기간, 성덕태자는 수나라 사신을 파견하여 중국의 불법을 대대적으로 도입했고 법륜사, 사천왕사 등의 사원을 세우고 불교경전의 주석본을 저술하여 일본불교의 시조로 추대되었다. 성덕태자의 불교전파(홍법)는 타지역의 승려가 한 것은 아니었지만 그러나 불교전파에서 개인적 역할을 평가해 보면 효과는 비슷하게 나타났다.

III. 불교와 동아시아 국가 문화의 상호선택

한대 말 전래된 불교는 점차 동북아 국가로 전파되었다. 불교는 왕권과 민간교류라는 두 가지 경로를 통해 지속적으로 동점되었는데 이는 초기 동북아로 전파될 당시의 공통적인 국제현상이었다. 또한 동북아 국가들의 왕이나 백성은 이질문화인 불교와 상호선택이라는 역사적 과정을 끊임없이 반복해왔다. 종합해보면 이런 선택은 권력, 학리(學理), 심령 등 다양한 차원에서 이루어졌고 기나긴 선택의 과정을 거듭해왔다. 그 중 심령간의 상호감응은 권력과 학리의 선택에 침투되었고, 이는 다음과 같은 두 가지로 정리할 수 있다.

1. 정치문화 영역에서의 불교와 권력의 상호선택

앞서 전적중에 기술된 ‘이존수경’, ‘명제감몽’, ‘초왕길재’, ‘환제호불’, ‘부견구법’, ‘요흥예불’ 등 불교의 초기전파 기록과 고구려 소수림왕 시대의 ‘도순송경’, 백제 침류왕 시대의 “황이 호나라 승려를 맞이하다”, 신라 눌지왕 시대의 “묵호자가 의술로 왕녀를 치유하다”, 일본의

40) 《海东高僧传·释摩罗难陀》.

41) 《日本书纪》卷二十, 敏达天皇十三, 十四年条.

‘흠명전법’ 등 고대 동북아 국가들의 초기 불교전파와 관련된 기술은 모두 불교와 왕권이 상호결합 되는 특징을 보이고 있으며 보편성을 지니고 있다. 결코 우연이 아닌 이런 현상을 어떻게 설명할 수 있을까?

종합적으로 얘기해보면 불교는 왕권에 의지해서 포교의 문을 열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특히 “짐이 곧 국가”인 봉건시대 왕권의 용인과 지지, 비호를 받았다는 것은 거침없는 통행증을 얻은 것과 다를 바 없다. 이는 초기 불교가 왕권을 선택하면서 빠르게 발전할 수 있었던 중요한 원인이다. 왕권은 새로 들어온 불교가 석가모니를 주불(主佛)로 모시고 나머지 보살들에게도 순위를 메겼는데 이는, 기존의 등급제도와 맞아떨어져 왕권을 강화시키는데 도움이 된다. 불교가 강조하는 인과응보, 轉世輪回, 권선징악 등의 관념은 통치질서를 안정시키는데 도움이 되었다. 초기에 전해진 불교는 기복신앙으로 불타를 신으로 보았다. 초왕은⁴²⁾ 불타의 보우를 얻어 왕위를 유지하고 이익을 쫓으며 피해를 줄일 수 있었으며, 제왕귀족의 정신적 요구를 만족했다. 이렇게 왕권과 불교간에는 강력한 상호보완성이 형성되었고 자연스럽게 서로를 선택했다.

중국은 300여년 동안 위진남북조의 분열을 겪으면서 북방지역에는 호족왕권이 켜졌다. 한족 왕권과 비교했을 때 호족왕권은 덕을 갖춘 왕권이나 신불이 전파되어 왕권의 합법성을 증명할 필요가 있었다. 먼저 스스로를 한왕이라 칭한 흉노귀족 유연은 유덕자 왕천하(有德者王天下)라는 전통관념을 이유로 화이지별(華夷之別)에 도전했다.⁴³⁾ 갈인이 세운 후조에서 중서령 왕파와 저작랑 왕도 등은 황제 호석에게 금불(禁佛)을 건의하며 말하길 “불교는 서역으로부터 온 것이고 외국의 신입니다. 그 공이 백성에 미치지 않으므로 천자가 받아들여 모실 것은 아닙니다.” 또 과거 한위의 방식대로 출가를 금지하며 관리와 백성들의 배불과 향피우기를 금하고 출가하여 중이 된 자들은 일괄 세속으로 돌아올 것을 건의했다. 이에 석호가 대답하길 “왕도가 불교는 외국의 신이므로 천자가 받들어 보실 것은 아니라고 하였는데 짐은 변경지역에서 태어났고 운이 맞아 떨어져 하로 오게 되었다. 제사를 지내는 것은 마땅히 본래의 관습을 같이 따라야 하는 것이니 불교가 융의 신이라고 했으니 마땅히 받들어 따를만하다.”⁴⁴⁾ 이 대목에서 호족왕권이 불교를 적극 주도한 이유를 알 수 있다.

고구려는 수림왕 2년 전진으로부터 불교가 들어왔고 왕권은 고구려에서 불교가 전파되는 전과정을 지배했다. 《동해고승전》기록을 보면 제25대 고구려 국왕 평원왕(559-589)시기 대승상⁴⁵⁾ 왕고덕에 의해 진으로 불법을 구하러 가게 된 ‘연’은 바로 고구려의 고승 의연이다. 그가 돌아와 고구려의 불교는 ‘법문동량(法門棟梁)’의 영예를 얻었다.

신라는 왕권의 지지가 미약하여 초기 불교가 전파되었을 때 공격을 많이 받아 제대로 발전하지 못했다. 반세기 이후 23대 법흥왕 김원종(514-540)이 즉위하자 불교진흥을 국가정책의 우선순위에 두었다. 왕권의 개입으로 신라에서 불교가 빠르게 발전하기 시작했다. 법흥왕 5년 흥륜사를 세우고 “많은 사람들이 출가하여 승려가 되어 불교를 신봉했다.” 10년 “양나라가 사신과 유학승 각덕편에 부처사리를 보내왔다. 왕이 백관들로 하여금 흥륜사 앞

42)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

43) 《晋书·刘元海载记》.

44) 释慧皎撰：《高僧传·晋邺中竺佛图澄》.

45) 《海东高僧传》.

길에서 그들을 맞이하게 했다.” 14년 황룡사 짓기 시작하여 13년 만에 완성했다. 26년 “진나라에서 사신 유사와 중 명관을 보내와 예방하고 불경 1천 7백 여권을 보내왔다.” 역사 기록을 보면 “법흥왕은 독실하게 불교를 신봉하였다. 말년에 와서는 삭발을 하고 가사를 입고 법운이라는 법명을 스스로 지어 부르며 생애를 마쳤다. 왕비도 역시 이를 본받아 중이 되어 영흥사에서 살았다.”⁴⁶⁾ 진흥왕 때까지 불교국교화 정책을 추진했다. 10년(551), 신라에서 온 고구려 고승 혜량을 국통에 봉하고 승관제도를 세웠다. 혜량의 주도로 백좌강회와 팔관회를 통해 불법과 계율을 전파했다. 팔관 즉 팔계는 ‘살생하지 말 것, 도둑질하지 말 것, 거짓말하지 말 것, 높고 넓으며 잘 꾸민 평상에 앉지 말 것, 꽃다발을 쓰거나 향을 바르고 장식하지 말 것, 노래하거나 춤추지 말 것’ 등을 말한다.⁴⁷⁾ 29년(568) 진흥왕은 국내를 순례할 때, ‘사문도인 법장 혜인’ 등이 수행했고 국사에 참여했다.⁴⁸⁾ 신라의 왕권이 불법을 널리 알린 데에는 이유가 있다. 삼국이 모두 전란 중이었고 신라는 예불을 통해 남조의 외교적 지원을 매우 필요로 했다. 지정왕(500-514) 때부터 신라의 왕권은 다양한 개혁을 시작했다. 역사적인 개혁들을 돌이켜 보면 의식의 혁신이 항상 개혁의 과정을 심화시켜 왔다. 당시 불법의 전파는 의식을 혁신시키는 중요한 수단이었다.

백제는 불교전파에 있어 마찬가지로 왕권의 전폭적인 지지를 받았다. 역사기록을 보면 침류왕 원년(384) 9월, “인도(호) 승려 마라난타가 진나라에 오자 왕이 궁중으로 맞아들여 우대하고 공경했다.” 2년 “한산에 절을 창건하고 중 10명에게 도첩을 주었다.”⁴⁹⁾ 불법이 전해졌을 때 백제왕권은 강력한 지지를 보냈다. 성왕(523-554)에 이르러 사신을 파견하여 조공을 하고 불경을 구하였고, 동시에 남량(南梁)외교를 전개했다. 법왕(599-600)이 즉위한 해 겨울 “살생을 금하는 조서가 내려졌다. 민가에서 기르는 매나 새매 따위를 놓아주고 또 물고기 잡는 기구를 불살라서 일체 금지시켰다. 이듬해 경신년 30명의 도승을 두었다.” 또 “당시 수도인 사차성에 왕흥사를 세웠다.”, “그 절 이름도 역시 미륵사라 했고 산을 등지고 물에 임했으며 화목이 수려하여 사시의 아름다움을 갖추었다. 왕은 항상 배를 타고 강물을 따라 절에 들어가서 그 경치가 장엄하고 고운 것을 구경했다”⁵⁰⁾ 백제왕권은 불법을 널리 알리고 생활을 즐김과 동시에 국왕을 법왕이라 칭하고 사원을 건축하여 왕흥사 또는 미륵사라고 불렀다. ‘왕이 곧 불’ 인 불교국가 의식이 백제의 정치생활에 깊이 파고들었다. 따라서 백제왕권의 주도하에 백제에서는 현광, 혜현, 겸익 등 남조나 천축으로 간 고승들이 많이 생겨났고 불법을 남쪽 일본으로 전파한 육혜, 도심, 혜충 등 국제적인 불법대사들이 탄생했다.

일본은 불교가 흠명 시대부터 전파되기 시작하면서 대화조정의 내부 권력투쟁의 도화선이 되었다. 왕권이 약했기 때문이 초기 불교가 일본에 전파되었을 때의 운명은 소아씨 혹은 물부씨 등 권세가나 호족들의 권력투쟁에 의해 운명이 지어졌다. 흠명천황 13년(552), 백제 성왕이 사신을 통해 불상과 불경을 보내왔다. 흠명천황은 사신들의 의견을 구했다. “서번에서 불상을 보내왔는데 모습이 단정하고 근엄한 것이 한번도 본적이 없다. “이에 대

46)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法兴王》.

47) 《东史纲目》.

48) 《黄草岭真兴王巡狩碑》.

49)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二·枕流王》.

50) 《三国遗事·法王禁杀》.

해 역불과 대신 소아도목은 말하길 “서번의 제국들이 모두 예로써 하는데 일본만이 이를 거스릅니다.” 배불과 대련물부 미여 등은 반대하며 말하길 “우리나라는 왕천하자(王天下者)여서 항상 천지의 사직 180신을 섬기고 1년 4계 제사를 모십니다. 지금에 와서 외국의 신을 모시게 되면 국신이 노할까 두렵습니다.”⁵¹⁾ 소아와 물부씨의 논쟁은 끊이지 않았고 천황은 우유부단하여 불교는 소아씨 가족 내부에서만 유행하였다. 물부씨는 또 두 차례의 역병이 유행하는 때를 이용하여 대대적으로 멸불을 단행했고, 소아씨를 공격했다. 그러나 불법을 숭배하는 용명천황이 등극하면서 상황은 변하기 시작했다. 즉위 이듬해(587)용명천황은 신하들에게 불교 숭상에 대한 의견을 다시 물었다. 대련물부 수옥 등은 옛말을 되풀이했다. “어찌 국신을 저버리고 외국 신을 경배할 수 있습니까!” 소아마자는 강력하게 홍불을 주장했다. 천황은 홍불을 결심했고, 풍국법사가 궁에 들어가 설법했다.⁵²⁾ 불교가 왕권의 지지를 받으면서 불교는 왕성한 발전시기에 진입했다. 같은 해 소아마자와 구호황자가 연합하여 물부씨를 무너뜨리고 불교전파를 저애하는 완고한 세력들을 쓸어버렸다. 588년 소아씨가 옹호하는 박뢰부황자 즉 승준천황이 즉위했다. 일본의 군신은 홍불 문제에 있어 동일한 입장을 취했고 후래거상의 자세로 불교의 발전의 새로운 전기를 맞이했다.

불교가 전파되는 과정에서 출가한 승려가 너무 많아 왕권이 통제 범위내에 속한 노동력이 크게 줄어들었고 나아가 국가 재정수입을 위협했다. 또 황제가 도교를 믿어 불교가 농민반항의 기치가 되어 왕권을 위협하게 되자 북위의 태무제와 북주의 무제는 단호히 멸불을 단행하여 최악의 법난(法難)을 초래했다. 그러나 법난이 왕권과 불교의 상호 선택의 주류는 아니었다. 법난 이후 불교는 더 크게 발전하곤 했다.

요컨대 위진남북조 시기 동북아 지역에서는 곳곳에 민족국가가 생겨나며 왕권의 흥망성쇠와 교체가 빈번히 일어났고 제왕의 교체가 주마등처럼 이루어졌다. 그러나 공통적인 특징은 왕권과 불교가 매우 밀접하게 연계되어 있었고 서로가 서로를 선택함으로써 불교동점을 추진했다.

2. 사상과 학리의 선택

위진남북조 시기 연이은 전쟁과 빈번한 왕권교체로 수많은 사상자와 재난이 속출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왕권도 총체적으로 쇠약해 졌다. 이 시기는 개인의 영욕을 예측하기 어려웠고 운명이 부침을 거듭하면서 인생무상의 덧없음이 지배적인 분위기가 되었다. 이 같은 다양한 요인이 종합적으로 작용하여 자유방임과 여유분방, 괴상이나 기이한 행동 등이 시대적 특징으로 자리잡았다. 정신적으로 자유로운 인사들은 어지러운 세상에 삶과 죽음, 운명, 인생변화 등 날카로운 문제에 직면하여 정신세계가 극도의 흥분상태에 놓여 있었다. 그들은 인생의 처지를 비탄하고 마음속의 것을 분출하고 토로하고자 갈망하였으며, 때문에 국사를 논하기 보다는 학문적인 문제를 논하는 모임을 조직하여 학기의 지리를 논하고, 현학과 도교를 추구하면서 진리를 추구했다. 모두들 자신의 의견을 고집하여 논쟁이 끊이지 않았고,

51) 《日本书纪》卷十九, 钦明天皇十三年条.

52) 《日本书纪》卷二十一, 用明天皇二年条.

이런 논쟁 덕분에 이 시기의 사상계는 춘추전국시대 제자백가 이후 사상적으로 활발하고 새로운 견해들이 많이 개진된 문화의 시기였다. 불교는 이런 시대적 장점을 충분히 활용하여 경(經), 른(律), 론(論)을 두루 갖춘 정밀사상과 풍부한 학식을 자양분으로 각국의 상류층 지식인들을 끌어 들였고 그들을 통해 상상의 빈 공간을 채우고 사회적으로 영향력을 확대시켰다. 위진남북조 시대의 사인들은 사상과 학리에 있어서 풍부한 경전과 다채롭고 신기한 학설이 많은 불교를 선택했고 이를 통해 새로운 정신발현과 사색을 추구했다. 이러한 상호작용으로 불교 본토화가 이루어졌을 뿐만 아니라 석가 교리도 사상과 학리에 깊이 파고들어 중국 전통문화의 새로운 요소로 자리잡았다.

위진남북조 시기의 지식인 모임 중 손에 꼽히는 것이 조위의 서원회이다. 조조부자와 공융, 진림, 왕찬, 서간, 원우, 응창, 류정 등 건안칠자이다. 건안칠자는 서로가 글로써 벗이되어 잔을 서로 부딪히며 시와 노래를 읊조리고 정과 의를 논하며 찬란한 건안문학의 꽃을 피웠다. 후에 조비는 역병의 창궐로 “역병으로 서간, 진림, 응창, 류정이 세상을 뜨다”라는 비보를 듣고 서원회 모임을 추억하며 쓴 시는⁵³⁾ 당시의 성대했던 상황을 가히 짐작케 한다.

양진시기 북쪽으로는 하남 금곡회가 있었고, 남쪽으로는 회계 난정회 등 문인모임과 학문과 예술을 연마하는 장소가 있었다. 금곡회는 “석송이 하남 금곡에 가지고 있는 별장”에서 얻어진 이름이다. 석송과 당시 훌륭한 24명의 문인들은 날마다 시와 부를 지었다.⁵⁴⁾ 원강 6년(297)의 한차례 모임은 “밤마다 연회를 열어 다같이 모여 앉아 악기 연주에 맞추어 시를 짓는데 제대로 짓지 못하면 벌주를 마셨다”⁵⁵⁾ 이로써 당시 석송과 소소, 반악, 가밀, 구양진, 룡기, 룡운 등의 문인들은 서원회의 유풍을 계승하여 시와 술이 넘쳐나는 모임을 통해 당시 민심을 반영했다.

문인들의 모임인 난정회에 대해 서성 왕희지는 《란정집서》에 용화 9년(353)3월 회계란정에서의 모임을 다음과 같이 기술해 놓고 있다. “현인 무리들이 나이에 관계없이 모두 모였다. 송산의 험준한 곳이거늘 숲과 고결한 선비들이 서로 잘 어울려져 유상곡수(流觴曲水)를 연상케한다.” 금곡회의 왁자지껄하고 거나하게 술기운이 도는 호족가문의 성대한 연회와는 다르게 난정회는 문인들이 공리공담을 추구했다.⁵⁶⁾ 역사의 기록을 보면, 난정회 모임에 참석한 사람들은 “왕희지와 손작, 사안, 지둔 등 41명 이었다”, “모두 문인들로 동쪽 지역에 집을 두었으며 모두 뜻을 같이하는 자들이다.”⁵⁷⁾ 주목할 만한 것은 위에서 언급한 지둔(지안)은 반야를 잘 아는 고승으로 《석즉색본무의》, 《도행지귀》, 《안반경주》 및 《본기사선서》를 썼고 돈오, 왕희지, 사안, 손작, 리충 등과 교류하며 교리와 학리를 연마하고 불계(승계)와 속세의 사상교류를 추진했다.

백연화사(백련사)는 동진 말년부터 남조 초기까지 사인들이 학리와 교리를 연구하고 불법을 연구하던 또 다른 중요한 장소이다. 백련사는 려산 호계 동림사에 위치하고 있으며, 혜원과 혜영, 혜지, 도생, 류유민, 퇴차중, 종병 등이 주변에 백련을 심어 얻어진 이름이다.

53) 《曹丕集·又与吴质书》.

54) 《晋书·刘琨传》.

55) 《全晋文·金谷诗序》.

56) 《晋书·王羲之传》.

57) 《晋书·王羲之传》.

모임의 목적은 불법교리를 연구하고 견불(見佛)을 갈망하며 서방의 미륵정토로 왕생하는 것이다. 백련사 모임에서 산수시인 사령운과 혜원 등 고승의 교류는 난정회의 왕희지 등과 지둔의 사상 및 학리의 교류와 유사하게 지속되었다. 사령운은 호족가문 중의 하나인 사씨 가문 출신이고 공작의 작위에 봉해졌었다. 태어난 해가 마침 유송시기 진의 왕조가 바뀌는 시기여서 작위의 감봉과 감시, 통제로 세상에 불만을 품고 있었다. 그래서 사령운은 방탕한 세월에 산수의 즐거움을 마음을 의지하며 불법에 몰입을 구함으로써 인생의 무상과 고뇌를 털어버리고자 했다. 사령운은 혜원은 자주 왕래하였으며 혜원이 귀적한 후 《려산혜원법사뢰》이라는 제문을 써서 슬픈 마음과 추모하는 마음을 표현했다.

불교가 동북아 국가의 정신세계에 파고들면서 사상과 학리과정에서 논쟁 심지어는 대치상황이 발생한 것은 당연한 것이다. 동진의 악기, 조각, 설법의 고수 대규는 불상조각에 장인정심이 깊숙이 베어 있지만 불교의 인과응보설도 크게 신경쓰지 않았다. 그는 《석의론》을 써서 혜원에 질문을 던졌다. 두 사람의 논쟁에서 혜원이 《삼보론》을 썼고 대규는 《답원법사서》로 답을 하여 문단쟁론의 파란을 일으켰다. ‘동쪽 울타리에서 국화를 다듬고’를 쓴 전원시인 도연명은 시를 써서 대규를 지지했다. “선행을 쌓으면 복을 받는다 했건만, 백이 숙제 수양산에 굶어 죽었지, 선악이 제대로 응보되지 않았는데, 어찌하여 공연한 말만 서있는가! 구십노인 절개지켜 곤궁히 살았건만, 젊은 나이에 이까짓 가난쯤이야, 가난해도 굶은 절개 지키지 않으면, 어찌 후세에 영원히 이름 남기리.”⁵⁸⁾ 이밖에도 불교는 도교의 저항을 받았다. 서진시대 혜제 때 도사 왕부과 승려 백원은 도교와 불교의 정사우열(正邪优劣)에 관해 논쟁했고, 왕부는 번번히 패배했다. 번번히 실패하여 마음이 조급한 나머지 동한 말년의 “노자가 인도에 가서 부도가 되었다(老子化胡說)”는 전설을 인용하여⁵⁹⁾ 《화호경》을 편저하고 노자가 천축으로 가 호인을 교화하고 도교가 불교의 시조라고 하며 도교의 지위를 높였다.

왜나라와 신라에서는 상술한 역불과 배불 논쟁이 일어났다. 동시에 중국의 주변국가에서는 사상과 학리의 선택, 융합 과정이 생겨났다. 신라에서는 원광이 25세때 남진에 가서 11년간 구법하며 수행하여 ‘삼장에 두루 통하고 유술에 능한’ 유명한 고승이 되었다. 후에 수나라 사신을 따라 귀국하자 신라 진평왕은 “군신이 스승으로 공경하고 중히 여기며 항시 대승경전을 가르치길 원했다.” 황룡사에서 거행한 백좌도장에서 원광은 수석 대법사로 인정받았다. 불경을 강연하는 것은 승려의 본분 중에 하나이다. 원광의 장점 중의 하나는 유교와 불교 모두를 관통하여 시대적 상황에 맞게 탄력적으로 활용하면서 국가발전에 기여했다. 현사 귀산 등이 원광의 이름을 듣고 찾아와서는 ‘종신계’가 무엇인지 가르침을 청했다. 원광은 세속과 불계를 구분지어 말하길 “불교에는 보살계라는 것이 있는데 그 각각이 열개이다. 원광은 귀산 등에게 ‘세속오계’를 종신계로 선택케 했는데, 첫째는 사군이충, 둘째는 사친이효, 셋째는 교우유신, 넷째는 임전무퇴, 다섯째는 살생유택이었다.” 귀산이 ‘살생유택’에 대해 이해가 안가 다시 묻자 원광은 설명하기를 “6재일과 봄, 여름에는 죽이지 않는 것이니 이것은 시기를 가리는 것이다. 말, 소, 개 등 가축을 죽이지 않고 고기가 한 점도 되지 못하는 미물을 죽이지 않는 것이니 이것은 물건을 가리는 것이다. 또한 죽일 수 있는 것도 또한 쓸 만

58) 《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其二.

59) 《後漢書·襄楷列傳》.

큼만 하고 많이 죽이지 말하는 것이다. 이것이 바로 세속의 좋은 경계인 것이다” 귀산이 말하길 “지금부터 이 말을 받들어 실천하여 감히 어기지 않겠습니다” 했다.⁶⁰⁾

신라 진흥왕 때 화랑도(또는 풍월도)가 유행했다. 귀족자제 중에서 유덕자를 뽑아 국가에서 기용했다. 신라의 원광대법사는 유학의 충, 효, 신, 용맹, 인의 정신과 세속오계를 화랑도에 포함시켜 윤리적 기반을 다졌으며 신라 귀족자제의 자질을 높였고 왕권의 주요 무장 역량의 응집력을 크게 증대시켰다. 따라서 《삼국유사》의 기록에 보면 원광의 ‘종신계’의 가름침을 받은 귀산 등은 ‘전쟁에 나가 국가에 큰 공을 세웠다’고 되어있다.⁶¹⁾

IV. 결 론

위진남북조 시기 불교동점의 과정을 돌이켜 보면 다음과 같은 결론을 도출할 수 있다.

첫째, 불교동점은 이질문화와 본토문화가 상호 선택과 융화하는 과정을 보여주었다. 예로부터 지금까지 다른 지역의 이질문화는 수 차례나 동북아 국가에 충격을 주었다. 그 중 불교의 동점은 최초의 이질문화 충격이라 할 수 있다. 근세에 기독교 문화가 한중일 삼국에 충격을 가했으나 쇄국정책으로 큰 영향력을 행사하지 못했다. 서구 열강의 무력 식민지 정복과는 다르게 불교의 동점은 고대 동북아 국가 문화의 개방과 지속적인 교류과정을 수반했으며 폭력이나 침략행위도 유발하지 않았다. 불교는 기나긴 전파과정에서 현지화를 실현했고, 전통문화의 구성요소로 자리잡았다. 이는 불교동점과정의 특이한 현상 중의 하나로 매우 연구할만한 가치가 있다.

둘째, 민족국가의 문화건설과 문화개방은 민족문화 발전에 꼭 필요한 것들이다. 위진남북조 시기 고대 민족국가가 활발히 발전했고, 각 국가 특히 호족국가와 고구려, 백제, 신라, 왜나라는 문화적 차이와 제도건설의 필요성 때문에 서역이나 중원지역으로부터 전파된 이질문화에 개방적인 태도를 취함으로써 문화건설 속도에 박차를 가했다. 중원지역의 끊임 없는 전란으로 한대 이후 치국대전이라 불리우던 유학이 힘을 잃고, 신흥 도교는 영향분을 흡수하는 성장단계에 진입했다. 따라서 줄곧 중화를 자처하던 한족왕권과 한족사회도 초기 불교에 대해 개방적인 태도를 취했다. 이 과정에서 각국은 문화개방을 통해 문화건설을 추진했다. 따라서 이 시기의 문화는 뚜렷한 시대적 특징을 보이고 있다.

셋째, 불교 동점의 의미. 위진남북조 시기의 동북아 국가는 서역의 이질적인 문화라 할 수 있는 불교를 현지화 시키면서 이를 자민족 전통문화의 구성요소로 삼아 다원적인 복합형 문화구조를 형성해 갔다. 따라서 불교의 발원지는 점차 쇠약해져 갔지만 동북아 국가에서는 한전불교로 발전하여 2천여 년 동안의 수 차례의 법난을 겪으면서도 왕성한 생명력을 이어 갔다. 불교와 유교, 한자, 도교 등의 문화적 요소가 서로 유지되면서 동북아 고대의 찬란한 문화권을 형성하였고 인류의 발전에도 크게 기여하였다. 불교의 문화사적 지위와 문명발전 과정에서의 역할은 높이 평가할 만하며 앞으로도 깊이 있는 연구가 수반되어야 한다.

60) 《三国遗事·圆光西学》.

61) 《三国遗事·圆光西学》.

【Abstract】**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Mutual Choosing in the Eastward Spread of Buddhism**

SONG Chengyou

Confucianism, Chinese Buddhism, and Taoism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ave been flowing in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since ancient time. For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re the original cultural factors; Buddhism is a different western culture, which, however, has completed its evolution into an ele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fter an about-500-year interac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century. For South Korea and Japa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re all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outside, but those three ideologies have successfully indigenized themselves and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countries' traditional culture component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introduction,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In this process, due to different national backgrounds and developments, there ar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foreign culture and local culture. Therefore, the absorp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re faced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hoosing, and result out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heterogeneous cultural integrations among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Due to space limitations, this paper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spread of Buddhism for research.

I. the Eastward Spread of Buddhism**(A) Buddhism spreading in Mainland China**

Buddhism was founded in ancient India in the 6th century BC, and then started its eastward spread by being introduced into the Western Regions countries around Tianshan. The time when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is f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century. Especially between the 3rd and 6th century, when China was undergoing a 300 years period of division and confrontation, Buddhism was not only popular in the nation's farming areas in the South, but also popular in the wide large areas controlled by nomadic people in the North.

In China, Buddhism develops into different schools, wins a large number of followers, and exerts wide-ranging implic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he Zen (Dhyāna)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people's spiritual life.

While the competitions between relig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the conflicts between Buddhism and the monarchy emerge above surface. Buddhism has been suppressed by the monarchy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which, however, also shows the power of Buddhism is enhanced.

(B) Buddhism spreading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region

During the 4th century,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from China to Goguryeo and Baekje, and it then smoothly and rapidly expanded its influence there. During the 5th and 6th century,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Silla and Japan. Due to the resistance of traditional forc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I.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uddhism from the west and local cultures of the countries in Northeast Asia

As a heterogeneous culture, Buddhism inevitably encountered the problem to interact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the local countries during its introduction to Northeast Asia. During the same time,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re trapped in a long period of wars, and the existing believes and ideologies were too feeble to meet people's spiritual needs. All of those provided Buddhism a relatively favorable condition to spread.

In a flexible posture, Buddhism coordinat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disseminates its teachings in a Chinese people's familiar language. When necessary, monks would use of medicine, divination, or even magic to win the favor of the monarchy.

Of course, personal charisma, knowledge and sense of mission of the Buddhism missionaries are also the factors tha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Buddhism is also indigenizing itself, combining itself with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gradually become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Buddhism also faces a similar situation in its sprea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In Japan, the result of the aristocrats' struggles decides the fate of Buddhism.

III. The mutual choosing between Buddhism and cultures of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Official and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are two common means adopted by Buddhism to spread into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ose exchanges are als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utual choosing between Buddhism and Northeast Asia's State Governments and the people. To sum up, mutual choosing takes place in different levels of power, academia, and spirit. Among those arenas, the spiritual choosing penetrates into the choosing of power and academia all the way.

(A) the mutual choosing between Buddhis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culture

Undoubtedly, relying on monarchy is a key to open the preaching door for Buddhism. In the feudal monarchical supremacy Era, being supported by the monarchy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Buddhism to choose to rely on monarchy, and develop rapidly as a result. At the same time, many of Buddhism philosophies help strengthening the monarchy, stabilizing the rule of order, and meeting the aristocrats' fine God demands. In this way, the monarchy and Buddhism have a strong complementarity, and the two sides choose each other because one met some needs of the other. Especially for the northern

nomadic royal power, it needs to promote Buddhism, which like the nomadic monarchy itself is also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its rule. Therefore it vigorously develops Buddhism, and Buddhism wins a large-scale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China in this way.

(B) The mutual choosing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and theoretical level

Northeast Asia was undergoing a divided and unstable period of turmoil during 3-6 Century, so the search of common people for a new spiritual sustenance provided a favorable article for Buddhism to choose space to spread into. In a spiritual depression, the social elite scholars also chose the voluminous and novel-argumentation Buddhism in the academic and ideological level for their new spiritual discovery and reflection. The mutual choos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promoted the localization of Buddhism.

Conclusion

1, The Eastward Spread of Buddhism is not only a good example of the mutual choosing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culture and local culture, but also the first shock brought by a different culture to the cultures of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Buddhism,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re in a stage of cultural opening up and continual exchange, so there was n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occurring. This i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in the process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Buddhism.

2, Nation states'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opening up are two indispensable elements of the tot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reasons for Buddhism's successful spread.

3, The far-reaching Eastward Spread of Buddhism brings out the North-East Asia Cultural Circle, which is constituted of Buddhism, Chinese characters, Confucianism, and other cultural elements, and contributes to human's progress. Buddhism's status and role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is worthy of highly attention, and some necessary in-depth study in the future.

근대 초기 동아시아 대학에서 ‘文科’ 제도의 성립과 학과 편제

■ 柳 浚 弼 (東亞細亞學術院) ■

근대 초기 동아시아 대학에서 ‘文科’ 제도의 성립과 학과 편제

— 明治 시기의 일본학과 동양학 관련 학과 제도를 중심으로 —

柳 浚 弼 (東亞細亞學術院)

〈목 차〉

- I. 들어가며
- II. 중국 경사대학당 ‘文科’ 의 학과 편제와 일본의 영향
- II. 일본 帝國大學 文科의 학과 편제와 그 성격
- III. 제국대학 설립 이전의 자국학 인식과 그 학과 편제
- IV. 나가며

I. 들어가며

오늘날 우리가 익숙하게 사용하고 있는 인문학이라는 학문은 자명한 듯하지만 그 실체가 애매하다. 역설적이게도 인문학은 있지만 인문학자가 있는지는 의문이 들기 때문이다. 文·史·哲의 통합이 인문학이라고 부른다면 그런 인문학자는 존재하지 않는다. 적어도 우리에게 익숙한 대학의 학과 제도 혹은 지식 편제의 차원에서는 확인되지 않는다. 그렇다면 인문학이란 추상적 환상이고 인문학자는 이데올로기적 유령에 지나지 않는다고 해야 하는가. 그럼에도 여전히 현실 속에서 인문학과 인문학자는 존재한다는 사실을 철회하기 힘든 이유는 무엇일까.

인문학과 유사한 문제는 동양학이라는 데서도 반복된다. 동양학은 분명 존재하는 듯하지만 동양학자가 있는지는 의문이고, 중국·일본·베트남·인도 등 개별 국가를 귀속처로 하는 전 공만이 대학의 학과 제도로 표현될 뿐이다. 더군다나 한국학은 동양학을 구성하는 일부인지 거기에 포함되지 않는지에 대해서도 궁금하다. 한국의 지정학적 위치를 고려해서 동양학을 동아시아로 바꾸면 그 상상의 범위는 한정되지만 여전히 동일한 문제가 반복될 뿐이다.

만약 인문학도 존재하고, 동양학도 실재하며, 나아가 동아시아학 또한 작용하는 것이라면, 이러한 학문과 지식의 범주는 명확한 제도적 틀로 존재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비가시적인 담론의 형식으로 작용한다고 가정해 볼 수 있다. 인문학(자)도 동양학(자)도 동아시아학(자)가 실존적 형식으로 존재하지는 않더라도, 그렇다고 부재한다고 할 수도 없다. 어쩌면 대학의 학과 제도와 지식을 낳는 역사적 조건과 힘은 제도 그 자체만으로 환원해서는 확인 불가능하다는 뜻인지도 모른다.

본 발표는 이런 문제와 부분적으로 연결된다. 동아시아 대학에서 인문학으로 통칭할 만한 학과 제도가 설치되고 지식이 편제되는 과정에 대해 검토해 보려고 하기 때문이다. 그렇지만 그 당시의 용어로는 인문학은 주로 文科(혹은 文學部)로 불렸다. 당연한 말이지만

동아시아에서 文科 제도를 가장 먼저 설립한 것은 일본이다. 역시 당연하게도 서양 근대 학문을 수용하는 과정에서 대학의 문과 제도가 설립되었고, 이 과정에서 객체인 서양(학)에 대비되는 동양(학) 혹은 주체로서의 일본 자국학 관련 학과 제도가 변모·정착되어 갔다.

동양 일원에서 적어도 동아시아에서 명치유신 이래 일본은 이웃나라로부터 근대화에 성공한 모범국으로 인식되었다. 물론 그러한 인식에 대한 반발과 비판도 함께 공존하였지만, 특히 1895년 청일전쟁 승리 이후로 ‘모범국’ 일본의 위상은 뚜렷하게 확립되었다. 일본의 근대국가 수립 과정을 배우려는 움직임이 본격화된 것도 이 시기 이후였다. 정부의 관료들 뿐만 아니라 수많은 유학생들이 일본으로 몰려들었고, 일본의 경험을 전달하고자 일본인 顧問과 敎習이 다른 나라로 파견되었다. 조선은 물론이고 중국의 근대화 노력에 드리운 일본의 영향은 지금까지도 지속되고 있다.

자국의 학문 발전과 고급 인재 양성을 위해 근대적 고등교육 기관의 설립이 필수적이라는 인식은 어디서나 확인된다. 그렇지만 전통적인 학술과 교육제도를 근대적으로 개혁하는 과정은 적잖은 시행착오와 갈등을 유발하기 마련이다. 이 문제와 관련해서도 일본은 좋은 범례일 수밖에 없었다. 중국이 교육제도 개혁과 대학 설립을 추진할 때도 그러했고, 상대적으로 일본의 영향이 더 직접적이었던 한국의 경우도 마찬가지였다. 학제를 마련하고 학과·교과를 구상하는 데에 그 영향은 지대하였다.

그렇다고 해서, 해당 국가의 역사적 조건과 사정이 다르기 때문에 그 영향이 단순히 일방적인 모방에 그친다는 뜻은 아니다. 무엇보다 전파와 수용 과정에는 반드시 時差가 동반되기 마련이다. 수용자의 입장에서는 결과물을 수용하는 것이지만 그 결과물이 형성되기까지의 맥락을 재구성하여 인식하지 못한다면 수용하려는 결과물의 효과와 함의를 제대로 파악하기는 어려운 법이다. 동아시아에서 근대적 지식과 교육 제도의 형성·수용 과정에 참여한 일본의 역할은 막중하지만, 그 속에 존재하는 時差를 섬세하게 고려할 필요가 있다.

근대적 대학 제도 및 학과·지식 체제의 설립과 관련해서는 더욱 그렇다. 근대적 지식 체제의 제도적 구현을 상징하는 대학의 경우, 일본·중국·한국 사이에는 각각 수십 년에 이르는 거리가 존재한다. 일본의 경우 대학 제도 자체가 계속 변화를 겪었고 그 속에서 학과 및 지식 편제 또한 적잖이 재편성되었다. 명치 유신 직후부터 일본은 대학 설립을 서둘렀고, 그 주도권을 놓고 다양한 정치적·학문적 입장이 서로 경합하고 충돌하였다. 적어도 2~30년에 걸쳐 학과·지식의 편제가 지속적인 변모를 겪는 과정이었다. 공존하던 것이 분리되고, 있던 것이 사라지거나 없던 것이 새로 설치되었다. 그 이유는 일본 나름의 역사적 조건과 처지에서 연유한 것이므로, 다른 나라의 사정과 다를 수도 있다. 따라서 수용 과정에서 발생하는 시차로 인해 수용자의 인식은 달라질 수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그 맥락의 이해 정도에 따라 인식의 편차도 발생한다.

II. 중국 경사대학당 ‘文科’의 학과 편제와 일본의 영향

1926년 제국대학의 하나로 설립된 경성제국대학의 학과 제도는 식민지라는 특수한 역사적 상황임을 감안해서 차치하더라도¹⁾, 중국에서 1898년에 개혁의 일환으로 추진하다가 중

지된 대학 설립 정책²⁾이 본격적으로 1902~1904년에 다시 실시될 때³⁾, 일본의 제국대학 모델을 적극적으로 참조하였다. 1902년 경사대학당 재건의 책임자로 임명된 管學大臣 張百熙는 吳汝綸을 경사대학당 總敎習으로 초빙하고,⁴⁾ 이후 일본 시찰 및 내외 사정의 검토를 거쳐 새로운 학제를 담은 《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이하 《欽定》)을 공포하였다. 《欽定》의 기본 방향은 실용적 지식의 교육에 놓여 있다는 보수파들의 반발로 인해 장백희는 張之洞을 책임자로 추천하여 교육제도의 구상을 재정비하라고 요청한다. 1904년 장지동은 《奏定大學堂章程》을 제안하였다. 이 두 章程을 통해 청말민국초 교육제도의 기본 구상이 완료되었다.⁵⁾

《欽定》에서는 대학당을 크게 세 층위로 구분하였다. 각각 “大學院”, “大學專門分科”, “豫備科” 였다. 대학원, 본과(전공), 예과(학부)로 이해된다. 이 가운데 대학원은 연구를 중심으로 하기 때문에 구체적인 課程이 제시되어 있지 않고, 7개의 전문분과와 ‘政·藝科’ 둘로 나뉘어 지는 예비과의 과목을 제시하였다. 여기서 7개의 분과를 도표로 제시하면 다음과 같다.

〈표〉 張百熙, 《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의 分科表⁶⁾

學堂種類	專門分科名	課 程 科 目
大學 專門 分科	政治科	政治學 法律
	文學科	經學 史學 理學 諸子學 掌故學 詞章學 外國語言文字學
	格致科	天文學 地質學 高等算學 化學 物理學 動植物學
	農業科	農藝學 農業化學 林學 獸醫學
	工藝科	土木工學 機器工學 造船學 造兵器學 電氣工學 建築學 應用化學 採鑛冶金學
	商務科	簿計學 產業製造學 商業語言學 商法學 商業史學 商業地理學
	醫術科	醫學 藥學

청의 대학제도 구상은 기본적으로 일본의 경험으로부터 도출된 바가 컸다. 《欽定》은

- 1) 설립 당시 경성제국대학의 학과 제도에 대해서는, 정선이, 『경성제국대학 연구』, 문음사, 2002, pp. 103~127 참조.
- 2) 《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 湯志鈞·陳祖恩 편,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戊戌時期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pp. 125~136; 莊吉發, 《京師大學堂》, 精華印書館, 1970, pp. 8~32 참조. 1898년 總理衙門이 대학 설립을 건의한 《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籌議》로 약칭)은 梁啟超가 기초한 것으로 알려져 있다. 모두 8장으로 구성된 《籌議》는 제 2장에서 교육과정을 서술하고 있다. 모든 학생들이 학습해야 하는 “普通學” 과 전공 분야인 “專門學” 으로 나누어져 있다. 보통학 과정은 모두 10개의 영역으로 이루어져 있다. ① 經學 ② 理學 ③ 中外掌故 ④ 諸子學 ⑤ 逐級算學 ⑥ 初級格致學 ⑦ 初級政治學 ⑧ 初級地理學 ⑨ 文學 ⑩ 體操學. 이 다음 과정이 專門學인데, ‘高等算學’, ‘高等格致學’ 이외에, 고등정치학(법률학), 고등지리학, 농학, 礦學, 工程學, 商學, 兵學, 衛生學 등 10개 전공 분야가 포함되어 있었다. 보통학과 전문학 이외에도 영어, 프랑스어, 러시아어, 독일어, 일본어 등 5개의 외국어가 “語言文字學” 으로 추가되어 있다. 학생들은 보통학 영역을 학습하면서, 동시에 외국어도 1개 이상 익혀야 했다.
- 3) 이하 경사대학당의 설립과 학과제도에 관한 서술은, 류준필, 「京師大學堂 學科制度의 設立 過程과 ‘文學’의 位相」, 『중국문학』 56집, 2008에서 검토한 내용을 재정리한 것이다.
- 4) 이러한 사정에 대해서는, 翁飛, 〈吳汝綸與京師大學堂〉, 《安徽大學學報》 24권 2기, 2003, 96~103면에 자세하다.
- 5) 김유리, 〈청말 서원의 학당개편과 근대 학제의 성립과정〉, 101~103면; 陳國球, 앞의 책, 11~13면 참조.
- 6) 《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 236~237면.

“일본의 사례를 본떠서” 7), ‘政治科, 文學科, 格致科, 農業科, 工藝科, 商務科, 醫術科’ 등 7개의 분과로 학문 영역을 구분하였다. 일본 제국대학의 학제를 모방했다고는 하지만, 완전히 동일한 것은 아니었다. 일본 제국대학의 학제는 원래 ‘法科·醫科·工科·文科·理科’의 5과로 구성되었다가 1900년에 農科가 증설되어 6과 체제로 정착되었다. 《欽定》은 商務科를 보태어 7과로 구성되어 있고, 文(學)科를 醫科나 工科보다 앞선 자리에 놓았다.

《欽定》에서 문학은 ‘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 까지도 아우르는 개념이라 하였는데, 나머지 6과와의 관계를 감안해 볼 때 문학은 中(國)學과 거의 동의어로 이해된다. 中學과 같은 함의라면 이때의 문학이란 중국의 문자로 표현된 기록 일체를 의미한다고 보는 편이 자연스럽다. 요컨대 文學科가 실제로는 西學(用)에 대비되는 中學(體)을 함의한다는 점을 충분히 짐작할 수 있다. 일본 제국대학의 학제를 참조했다고 해도, 이 당시의 동경 제국대학의 문과대학이 ‘哲學·國文學·漢學·國史·史學·言語學·英文學·獨逸文學·佛蘭西文學’ 등으로 구성되었다는 점⁸⁾을 상기하면, 《欽定》의 문학과와의 거리가 짐작된다. 1902년의 《欽定》을 기준으로 보면, 경사대학당의 文學(科) 개념은 ‘中(國)學·詞章·外國語言文字’ 등의 영역들이 서로 뒤섞인 범주 속에서 설정되는 것이다.

1904년 장지동의 《奏定大學堂章程》(이하《奏定》)에서는 문학과와 규정의 차이가 또 달라졌다. 단적으로 문학과와 하위 항목이었던 經學을 상위 항목으로 격상시켰다. 그 결과, ‘경학과대학, 정법과대학, 문학과대학, 의과대학, 격치과대학, 농과대학, 공과대학, 상과대학’ 등 모두 8개의 분과대학이 마련되었다.⁹⁾

〈표〉 《奏定大學堂章程》 經學科大學과 文學科大學의 專門 분야 구성¹⁰⁾

分科大學名	專門名	
經學科大學	周易學 尚書學 毛詩學 春秋左傳學 春秋三傳學 周禮學 儀禮學 禮記學 論語學 孟子學 理學	11門
文學科大學	中國史學 萬國史學 中外地理學 中國文學 英國文學 法國文學 俄國文學 德國文學 日本國文學	9門

《欽定》에서 文學科 안에 있던 경학(및 관련 영역)이 경학과대학으로 독립함으로써, 《奏定》의 문학과대학에는 ‘사학, 사장학, 외국어언문자학’ 세 영역이 남게 되었다. 이 영역은 약간의 출입을 거쳐 모두 9개의 하위 영역으로 재조정된다. ‘중국사학, 만국사학, 중외지리학, 중국문학, 영국문학, 法國문학, 俄國문학, 德國문학, 日本문학.’ 사학, 지리학, 문학이 문학과대학을 구성하는 학문영역이었다. 《欽定》에서는 ‘문학과’가 中學의 전통을 두루 포괄하는 형태를 띠고 있었던 반면에, 《奏定》에서는 경학과대학이 설정됨으로써 文學=中學의 구도가 더 이상 유지되기는 어려웠다. 다만 사학과 외국어언문자학이 사학과 외국어문

7) 위의 책, 236면.

8) 『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 p. 419.

9) 《奏定大學堂章程》, 璩鑫圭·唐良炎 편,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340면.

10) 《奏定大學堂章程》, 340~358면에 서술된 내용을 도표화하였다.

학 분야로 재배열됨에 따라, 《奏定》의 ‘중국문학’은 《欽定》의 詞章學 영역을 직접적으로 계승하는 성격에 더 가까워졌다.

《奏定》의 학과 제도는 신해혁명 직후 중화민국의 대학 제도로 큰 변화 없이 이어졌다. 다만 1912년 10월에 반포한 〈대학령〉에서 더 이상 대학의 학과제도는 ‘經史之學’을 근간으로 하지 않는다고 천명한 다음, ‘문과, 이과, 법과, 상과, 의과, 농과, 공과’ 등 7개 학과로 대학의 학과 체제를 구성하였다. 이것은 경학과대학을 폐지하고 나머지 7개과는 기존 제도를 계승하는 것이었다. 이후로 이 체제가 근대 중국의 대학 제도로 정착되었다. 이들 7개 분과 가운데 문학과는 모두 4개의 전문 분야로 나뉘어지고, 그 하위에 다시 다양한 학과목이 포함된다.

〈표〉 중화민국 교육부 공포 대학규정(1913)¹¹⁾

문과의 하위 4門	4門의 하위 類	비고
哲學	中國哲學, 西洋哲學	2類
文學	中國文學, 梵文學, 英文學, 法文學, 德文學, 俄文學, 意大利文學, 言語學	8類
歷史學	中國史學·東洋史學, 西洋史學	2類
地理學		1類

위에서 보듯이 문과를 구성하는 하위 학과 가운데 문학·역사학·지리학은 1904년의 경사대학당 학과제도와 동일하고, 경학과가 폐지된 대신에 철학이 문과에 포함된 것이 다르다. 좀 더 세부적으로는 문학에 일문학이 제외되고 대신에 梵文學·意大利文學·言語學이 포함되고, 역사학에 東洋史學이라는 명칭이 등장한 점이 다르다 할 수 있다. 지리학만 제외한다면 당시의 동경제국대학의 ‘철학·사학·문학’의 3과 체제¹²⁾와 거의 동일하다. 중국에서 근대적 대학 제도가 설치되고 중국 대학의 문과와 일본 대학의 문과가 그 학과 편제가 거의 유사해지는 데에 10여 년의 시간이 흘러야 했다. 그것도 신해혁명의 성공으로 인해 비로소 가능해졌다고 할 수 있다.

여기에 1926년에 식민지 제국대학으로 설치된 경성제국대학의 문과 관련 학과 제도를 덧붙여 간략하게 살펴보자. 경성제국대학은 법문학부와 의학부 2개 학부만으로 설립되었다.¹³⁾ 아울러 법학부와 문학부를 통합하여 법문학부로 단일화한 형식이었다. 법문학부에는 법학과를 제외하면 ‘철학·사학·문학’의 3개 학과가 있다는 점에서는 제국대학의 문과 제도와 동일하다. 경성제국대학의 개설 강좌를 기준으로 살펴도, 언어학·인도철학·법문학 정도를 제외하면 유사 강좌가 다 개설되고 있었다.¹⁴⁾ 문과 혹은 문학부만에 초점을 둔다면 양적으로 아주 큰 차이가 있다고 보기는 어렵다.

11) 「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 『教育雜誌』 제 5권·1호, 1913.

12) 동경제국대학의 경우 1904~1919년까지 ‘철학·사학·문학’의 3과 체제로 문과대학을 구성하였고, 그 하위에 19개의 專修學科가 배치되었다. 그러다가 1919년에 19개의 독립된 학과로 다시 나뉘어진다. 『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 pp. 422~425.

13) 理工學部가 추가로 설치되어 3개 학부 체제가 되는 것은 1941년에 가서야 이루어진다.

14) 관련 내용은 정선이, 앞의 책, pp. 103~111 및 『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 pp. 422~424.

II. 일본 帝國大學 文科의 학과 편제와 그 성격

1904년에 제시된 경사대학당의 학과 제도는 문(학)과의 경우 여전히 中體西用의 인식이 근거에 자리하고 있었다. 경학과를 최우선으로 설정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문학과를 서학 분야보다 우선적으로 배치하는 데서 잘 드러났다. 이후 1913년의 대학 학과 제도는 일본 제국대학 모델에 한층 더 가까워졌다. 그런 점에서 이 두 구상 사이의 거리는 대학의 학과 제도 혹은 지식 편제의 근대성을 암시한다고 볼 수 있다. 따라서 전통적인 학문 체계 속에는 포함되지 않다가 새로이 등장하는 학문의 존재는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예컨대, 言語學·梵文學·東洋史學 등이 그렇다. 아울러 식민지의 경성제국대학 강좌에서 확인되지 않는 언어학·인도철학·범문학 등의 분야를 포개어 본다면, 言語學·梵文學이 문(학)과에 등장하는 과정을 살펴볼 필요성이 생긴다.

명치 정부가 대학 설립을 추진하고 우여곡절을 겪으면서 20년이 지난 다음, 명치 19년(1886년) 3월에 ‘帝國大學令’이 제정되었다. 이전의 동경대학 및 工部大學校의 사업을 계승하는 새로운 고등교육기관으로 제국대학을 창설하기 위해서였다. 1897년 京都帝國大學의 설립과 더불어 東京帝國大學으로 명칭이 바뀌기까지 제국대학은 지속되었다. 제국대학령 제 10조가 분과대학에 대한 규정인데,¹⁵⁾ ‘법과대학·의과대학·공과대학·문과대학·이과대학’의 5개 분과대학으로 제국대학을 구성한다는 내용으로 되어 있다.¹⁶⁾ 동경대학의 문학부에 속했던 哲學科·和文學科·漢文學科 등 기존 세 학과에다가, 博言學科가 증설되어 네 개의 학과 체제로 제국대학 문과대학이 출범하였다.¹⁷⁾ 일본의 대학에 언어학과가 창설된 시초로서, 博言學科는 제국대학 설립과 더불어 문과대학에 신설된 학과였다.¹⁸⁾

이듬해 명치 20년에 ‘史學科·英文學科·獨逸文學科’가 추가로 증설되어 모두 7개 학과 체제가 되었고, 명치 21년 內閣 修史局의 修史 업무가 문과대학으로 이관되고 臨時編年史 編纂掛가 설치되었다. 이에 따라 修史局의 重野安繹·久米邦武·星野恒 등 3명이 문과대학 교수가 되었고 명치 22년에는 이들을 교수진으로 하는 國史學科가 설치되었다. 국사학과의 설치에 따라 화문학과→국문학과, 한문학과→한학과로 명칭이 변경되었다. 명치 23년 신설된 佛蘭西文學科와 더불어 문과대학은 9개 학과로 이루어져 있었다.¹⁹⁾

후술하겠지만 박언학과를 제외한 나머지 8개의 학과는 제국대학 설립 이전부터 학과의 전통이 마련되어 이어져온 반면에, 박언학과만은 상대적으로 돌출적인 성격이 강하다. 박언학은 기본적으로 당대 서양 학문과 동시대적 위상을 가지기 때문이다. 19세기 초 서구에

15)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pp. 787~789.

16) 제국대학령 草案에는 工科大學 다음에 農科大學이 들어 있어 6개 분과대학의 체제였지만, 실제로 제국대학에 농과대학이 설치된 것은 명치 23년의 일이다.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pp. 795~796 참조.

17) 또, 博言學科의 2~3년생은 ‘조선어·아이누어·梵語·佛語·支那語(俗語)’에서 하나의 언어를 배우는 것으로 되어 있다. 『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 1986, p. 418.

18) 박언학과의 설치는 즉흥적인 결정이 아니라 제국대학의 구상 단계부터 포함되어 있었다. 제도적 기초를 설계했던 초안에 따르면 문과대학의 하위 학과들은 다음과 같았다. ‘本邦文學, 哲學, 心理學, 論理學, 道義學, 史學, 社會學, 古物學, 人種學, 博言學, 希臘及羅馬語學, 梵語學, セミチック語學, 英文學, 修辭學, 獨逸文學, 佛蘭西文學, 支那文學.’ 이러한 학문 구성은 伊藤博文編, 『秘書類纂 官制關係資料 全』에 실린 「東京帝國大學制」에 실려 있다.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p. 795 참조.

19)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 1303; 『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 p. 419.

서 고전 및 동양 연구가 증대되면서 산스크리트어의 지식을 바탕으로 비교언어학이 탄생하고, 1870년대에 라이프치히를 중심으로 소위 청년문법학파가 등장하였다. 이를 배경으로 제국대학에 박언학과가 설치되었던 것이다.

박언학과 설치의 주도한 인물은 1873년(명치 6) 23세의 나이로 일본으로 건너와서 일본 연구에 큰 기여를 한 챔벌레인(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이었다. 챔벌레인은 박언학과와 화문학과 교수를 겸임하면서 동경제국대학의 일본어문학 연구의 기본 틀을 정립한 上田萬年과 芳賀矢一을 가르쳤다. 1893년 강좌제가 설치될 때 박언학강좌도 마련되었는데, 2~3년 후 上田萬年과 芳賀矢一도 박언학강좌 담임을 하였다. 이 두 사람이 독일 유학을 떠난 1898년에는 高楠順次郎이 그 강좌를 맡았다.²⁰⁾ 박언학과와 관련된 이들 세 사람의 존재는 특별히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일본 내적으로는 국학 전통으로부터 독립한 일본의 근대적 자국학을 정립하고, 외적으로는 이른바 일본적 동양학의 발생을 촉진한 당사자들이기 때문이다.

上田萬年과 芳賀矢一은 각각 일본어와 일본문학 연구의 근대적 과학화를 주창하였다. 특히 上田萬年은 和文學科 출신이었음에도 국학의 전통에 반대하며 과학적 국어연구를 강조하였다. 독일 유학 이전인 1890년에 上田은 일본어 연구에 古學派와 科學派의 두 파가 있다고 하고, 전통 학문의 일본어 연구를 고학파라 비판하면서 과학파의 의의를 부각한 바 있다. 이에 따르면 일본어는 과학적 원리에 따라 연구·교육되어야 하는바, 그것은 博言學과 教育學의 원리라고 한다. 이어 챔벌레인 등의 업적을 칭송한다. 上田은 일본어를 언어로서 연구해야 한다고 하면서, 언어란 “한 사람의 입에서 발하여 타인의 귀에 들리는 소리 일체이고, 사회인이 자기 사상을 전달하기 위하여 符牒기호으로 사용하는 것”²¹⁾이라 규정한다. 즉 언어는 글이 아니라 소리(말)라는 점을 출발점으로 삼아야만 언어를 언어 그 자체로 연구하는 박언학의 정립이 가능하다는 뜻이다.

이러한 언어 인식은 19세기 후반의 독립 청년문법학파나 소쉬르 등 유럽 언어학자들의 언어론에 근거한 것으로 종이 위에 기록된 문자를 언어와 동일시하는 문헌학적 연구 방법을 비판하는 것이다. “언어의 본체는 글말이 아니라 입말, 문자가 아니라 음성에 있으며, 언어 변화의 규칙은 화자의 의지에 의존하지 않는 합리적 질서에 따른다는 비교언어학의 발견”²²⁾은 그리스·로마의 전통을 계승하는 고전문헌학과 스스로를 대립시켰다. 이러한 언어론에 근거한 일본어의 언어학적 연구는 결국 “질서 정연한 대일본 제국의 국어를 만들어 내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하였다. 이 목적을 달성하는 데에 기존의 국학 전통은 버려야 할 장애일 뿐이다. 국학자는 “언어와 문학의 구별조차 분명하”게 하지 못하기 때문이다.²³⁾

이런 맥락에서 볼 때, 박언학과 설치와 그로 인한 언어학적(과학적) 일본어 연구의 추진이 함의하는 바는 적지 않다. 上田의 주장을 따른다면, 언어학의 출현은 그리스어·라틴어 중심의 고전문헌학과 대립을 전제로 하는 것이고, 그 대립은 동양의 언어인 산스크리

20) 『東京帝國大學學術大觀・總說文學部』, 1942, pp. 453~460.

21) 上田萬年, 「日本言語研究法」(1889), 『落合直文・上田萬年・芳賀矢一・藤岡作太郎集』(明治文學全集44), 筑摩書房, 1968, p. 181.

22) 이연숙, 고영진·임경화 역, 『국어라는 사상』, 소명출판, 2006, p. 135. 上田萬年の 언어 인식은 이 책의 제 4장에 의거하였다.

23) 上田萬年, 「言語上の變化を論じ國語教授の事に及ぶ」(1889), 앞의 책, p. 179.

트어의 문법 연구를 비교언어학의 준거로 삼은 것이며, 나아가 인문주의적 문학 전통이 부재하는 동양(인도)의 ‘야만적 언어’를 서구 고전어와 대등하게 설정하는 것이기 때문이다.²⁴⁾

이것은 두 가지 측면의 효과를 야기한다. 하나는 전통적 국학과의 인식론적 결별을 선언하는 것이고, 다른 하나는 일본어 연구에 비교언어학적 방법이 도입되어 주변 민족의 언어가 학문적 대상으로 부상하는 것이다. 특히 후자의 경우 비록 산스크리트어 혹은 인도학에 기반한 서구의 동양학이므로 그 결과가 일본어 연구에 직접적으로 적용되지는 않더라도, 영어·불어·독어 중심의 서구어가 아니라 일본 주위의 아시아 언어가 시야에 들어오도록 만드는 것이다. 개성학교 이래의 양학 전통과는 다른 외국어 연구가 필요하며, 이것은 이른바 일본적 동양학의 등장을 촉진하는 계기가 된다. 박언학과의 설치가 가지는 획기적인 의의는 여기서 찾을 수 있다.

〈표〉 제국대학 문과대학 博言學科 신설 당시(1886) 교육과정²⁵⁾

1학년 과목명	주당시수	2학년 과목명	주당시수	3학년 과목명	주당시수
論理學	2	博言學	1	博言學	1
史學	3	漢文學	4	漢文學	3
博言學	1	和文學	4	和文學	4
英文學	4	英語	5	英語	4
和文學	4	獨語	5	獨語	4
英語	6	羅甸語	3	羅甸語	3
獨語	6	朝鮮語*	3	朝鮮語*	3
羅甸語	3	アイノ語*	3	支那語(俗語)	3
作文		梵語	3	アイノ語*	3
		佛語	3	梵語	3
		作文		佛語	3
				作文	

* 표는 선택과목.

위의 표는 설립 당시 박언학과의 교육과정을 정리한 것이다. 여기서 朝鮮語·アイノ語·支那語(俗語) 등의 교과목에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박언학과는 그 출발에서부터 일본어와 지역적으로 인접한 언어들을 교육하는 데에 중점을 두었다는 사실을 충분히 짐작할 수 있다.²⁶⁾ 白鳥庫吉과 金澤庄三郎 등의 권유로 조선어 연구를 시작하여 조선총독부에 근무하다가 경성제국대학 교수가 된 小倉進平도 이 학과 출신이었다(1903년 입학).²⁷⁾ 훗날 정치적 상황의 변동에 따라 식민지학을 포함하는 제국의 학문으로서 일본의 동양학이 기능할 때 조선학도 그 일부를 담당하는데, 그 제도적 연원은 박언학과에서 유래한 바 적지 않다. 가

24) 이연숙, 앞의 책, pp. 141~147.

25)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p. 1287~1288.

26) 이듬해인 1887년에 3개 학과 증설에 따라 博言學科의 교과과정에 약간의 변화가 생겼다. 주목할 만한 변화는 博言學 과목이 比較博言學으로 바뀌었다는 점과 アイノ語 과목이 사라졌다는 점이다.

27) 安田敏朗, 『「言語」の構築』, 三元社, 1999, pp. 42~45.

령 1904년 러일전쟁과 한일협약 이후 조선의 식민지화가 예감되고 일본의 세력 확장이 준비되는 상황에서, 언어학과의 젊은 연구자들은 ‘일본어를 위한 언어학’을 위해 매진할 것을 다짐하고 있었다. 만주어와 몽고어를 연구한 언어학과 교수 藤田勝二를 위시하여, 小倉進平(조선어)·橋本進吉(일본어)·伊波普猷(유구어)·金田一京助(아이누어)·後藤朝太郎(중국어) 등의 출현은 자연스런 광경이라 할 수 있겠다.²⁸⁾

이밖에도 梵語 과목의 개설에서 시작하여 1901년 ‘梵文學講座’로 이어진 印度學과 관련하여 高楠順次郎의 존재도 적잖은 의의를 지닌다. 산스크리트어 연구를 위시한 인도학이야말로 19세기 유럽 동양학의 본령에 해당하지만, 일본에서 梵文學의 등장은 언어학과는 또 다른 역사적 배경을 가진다. 1881년부터 동경대학 철학과에 ‘印度及支那哲學’이 개설되어 있었지만, 高楠順次郎은 배경을 달리 하는 연구자였다. 불교계에서 유럽으로 유학을 보낸 인사들 가운데 하나로, 이들은 근대적 불교학의 수립을 위해 노력하였다. 그 대표적인 인물이 바로 南條文雄과 高楠順次郎이었다. 이들은 영국으로 유학하여 산스크리트학·인도학 등을 배우고 귀국하였다. 먼저 유학을 떠난 南條文雄은 1885년 귀국하여 2월 동경대학 문학부에 ‘梵語學’ 과목을 개강하였고, 1897년 귀국한 高楠順次郎은 1899년 박언학과 교수로 부임하여 1901년 ‘梵文學講座’를 개설하고 그 초대 교수가 되었다.²⁹⁾

이상에서처럼 박언학과의 설치는 무엇보다 19세기 유럽에서 발흥한 동양학(혹은 동서비교학)이 일본으로 유입되어 일본적 동양학을 창출하는 데에 결정적인 역할을 하였다. 문과의 학과 제도 형성과 관련해서 박언학과의 등장은 획시기적인 의의가 있다. 그렇지만 유럽에서 발흥한 동양학이 하나의 독자적 학술 영역이라면, 이와는 달리 부분적으로 유럽 동양학의 수용을 통해 형성된 일본의 동양학은 다양한 개별 분과 영역을 포괄적으로 지칭하는 ‘집합명사’에 가깝다.³⁰⁾ ‘동양사’, ‘인도철학·문학·어학’, ‘지나철학·문학·어학’, 그리고 기타 동양 지역에 관련된 어학·민족학 등이 일본의 동양학 범주를 구성하는 학과들이었다.

추상적인 수준에서 동양학이라는 용어가 활용될 수는 있지만, 그 용어에 부합하는 학과 제도나 지식 편제를 구성하기는 어렵다. 무엇보다 동양의 범위가 일본을 초과해서 존재할 뿐만 아니라 그 동양에 일본 자신이 포함되기 때문이다. 동양이라는 범위를 먼저 수락하는 가운데 자기 자신을 바라보게 되면 일본의 경계는 불확실하고 모호해지기 마련이다. 이로 인해 유럽 동양학의 일본적 수용과 변용에는 독특한 역설이 존재한다.

유럽의 동양학이란 그 출발에서부터 자기 자신의 바깥에 존재하는 대상에 대한 지식 즉 객체화된 지식 체계이다. 그렇지만 그것을 동양에서 수용한다는 것은 동양의 주체가 스스로를 객체화된 대상으로 인식하는 것이 된다. 이 기묘한 역설에서 벗어나려면, 유럽의 동양학에서처럼 동양이라는 대상이 무엇보다 먼저 객체로 정립되어야 한다. 달리 말해 동양에 속하는 주체 자신은 동양학의 대상에 포함되지 않아야 한다는 뜻이다. 동아시아에서 처음 동양학을 마련한 일본의 경우라면, 동양학의 대상엔 일본이 포함되지 않아야 한다는 의미이기도 하다.

28) 이들에 대해서는, 『東京帝國大學學術大觀・總説文學部』, pp. 456~460; 安田敏朗, 앞의 책, pp. 45~50 참조.

29) 江上波夫 편, 『東洋學の系譜』, 大修館書店, 1992, pp. 61~71; 中見立夫, 「日本の「東洋學」の形成と構圖」, 岸本美緒 編, 『帝國日本の學知・東洋學の磁場』, 岩波書店, 2006, pp. 21~22.

30) 中見立夫, 위의 글, pp. 48~50.

支那史나 印度哲學이라고 하면 그다지 불안정하지 않아 보이는 학과의 경계가 東洋史나 東洋哲學이라 하면 흔들리는 느낌을 준다. 동양에는 서양이 대당으로 설정되므로, 일본=주체의 위상이 모호해지기 때문이다. 철학과에서 ‘동양철학’을 담당한 井上哲次郎이 1891년 사학회 강연에서 ‘동양사학의 가치’를 주장한 사례가 있지만³¹⁾, 실제 역사학자들에게 東洋이란 여간 난감한 용어가 아니었다. 동양사학의 창시자로 불리기도 하는 『支那通史』(1890)의 저자 那珂通世가 1894년 중등학교 교육에 관한 모임에서 외국역사를 동양역사와 서양역사로 양분하자고 제의했을 때, 동양사는 분명 일본이 제외된 외국의 역사였다.³²⁾

이렇게 보자면 일본의 동양학 혹은 일본의 동아시아학이 형성되는 과정에는 한 가지 전제가 필수적이다. 동양 혹은 동아시아에 속하는 일본이 자신을 제외한 여타의 동양(동아시아) 지역을 객체화할 수 있는 일본 자신의 위치 정립이 필요하다. 이것은 곧 일본의 자기주체화이겠지만, 여기서의 주체화란 동양의 일원으로서 스스로가 지닐 수밖에 없는 속성을 배제하는 과정이 된다. 그러므로 동양학의 성립은 기본적으로 자국학의 배타적 독립성이 확립되는 과정과 분리되기 어렵다. 달리 말해 일본의 자국학(일본학)은 동양학의 성립의 암묵적 전제로 작용한다는 것이다.

III. 제국대학 설립 이전의 자국학 인식과 그 학과 편제

1886년 제국대학의 설립과 학과 제도의 재편이 지닌 획시기적 의의를 살폈지만, 기실 일본 정부가 대학 설립을 위해 기울인 정책적 노력은 명치유신 직후부터 지속적으로 진행되었다. 근 20년에 걸친 고투 끝에 제국대학이 창설될 수 있었다고 보아야 한다. 한편으로 이것은 일본 명치정부의 근대 국가 체제를 구축하는 과정의 일환이기도 했다. 따라서 국가주도의 대학 설립인 한에서 보자면, 대학의 학과 제도를 편의적으로 설정하기는 어려웠다. 일본의 국가적 이념이 학문적으로 구현되어야 하고, 거기에 부합하는 학과 편제가 실시되어야 하기 때문이다.

자국학과 동양학이라는 앞서의 문제와 관련지어 보면, 막부의 체제교학이었던 유학 혹은 한학의 위상이 핵심적 쟁점이 될 수밖에 없었다. 만약 유학 및 한학적 전통을 인정하게 되면 일본의 위상은 동아시아 즉 중국을 중심으로 하는 한자·유교문화권의 범위 속에서 논의되기 마련이다. 그리고 그것은 결국 일본의 자국학적 이념의 자립적 독립성을 위협하는 것으로 인식되기 쉽다. 일본을 배제한 동양학의 이념이 이런 맥락에서 창출될 수는 없다. 상징적으로나마 천황 중심의 권력 구조를 생성하기 위해서는 막부의 통치 이념이었던 유학·한학을 부차화해야 했다. 이런 맥락에서 平田派 국학자들인 平田鋈胤·玉松操·矢野玄道 등³³⁾이 정부의 의뢰를 받아 새로운 학제를 구상하기도 하였다.³⁴⁾ 이른바 神道國教化 정

31) 五井直弘, 『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 青木書店, 1976, p. 39.

32) 江上波夫 편, 『東洋學の系譜』, pp. 2~3. 비슷한 난처함은 白鳥庫吉에게서도 확인할 수 있다. 이런 상황에서 동경제국대학과 경도제국대학을 중심으로 동양사학이 학과 제도로 정착하는 과정에 대해서는, 中見立夫, 앞의 글, pp. 25~35.

33) 이 당시 이들 3인은 모두 정부의 관료로 임명되어 있었다.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1984, p. 105.

책과 궤 를 같이 하는 제도 구상이었다.³⁵⁾

平田派 국학자의 구상이 순조롭게 추진되지는 못했다. 명치 정부의 學習院 재건이 그 단적인 사례이다. 원래 학습원은 한학 중심의 公家 교육기관이었기 때문이다. 얼마 간의 갈등을 겪으면서 명치 원년 9월에 漢學과 皇學의 병립 정책을 취하게 되었다.³⁶⁾ 명치 3년(1870년) 2월 19일 〈大學規則〉이 제정되었다. 개성학교·의학교와 통합된 대학교의 학과 편제는 크게 보아 國漢學·洋學·醫學으로 삼분될 수밖에 없었다. 하지만 명치 4년 대학이 폐지됨으로써 이러한 학과 체제가 본격적으로 시행되지는 못했다.

〈표〉 大學規則의 학과 체제³⁷⁾

	하위 학문	필독 서목
敎科	神敎學 修身學	古事記 日本紀 萬葉集 古語拾遺 宣命 祝詞 孝經 論語 大學 中庸 詩經 書經 周易 禮記
法科	國法 民法 商法 刑法 詞訟法 萬國公法 利用厚生學 典禮學 政治學 國勢學	令 殘律 儀式 延喜式 江家次第 三代格 周禮 儀禮 唐六典 唐律 明律 文獻通考 大學衍義補
理科	格致學 星學 地質學 金石學 動物學 植物學 化學 重學 數學 器械學 度量學 築造學	
醫科	豫科	(생략)
	本科	
文科	紀傳學 文章學 性理學	五國史 三鏡 大日本史 枕草子 源氏物語 春秋左氏傳 國語 史記 前後漢書 通鑑 文章軌範 八家讀本

위의 학과 체제의 특징 가운데 하나는 皇(國)·漢學의 병존이 분명하다는 것이다. 교과, 법과, 문과 모두 그렇다. 또 다른 특징으로 대학의 학과 체제에서 처음으로 文科라는 명칭이 등장하였다는 사실이다. ‘紀傳學·文章學·性理學’이라는 분과가 은연중에 이른바 문·사·철을 의식하고 있다는 것도 짐작할 수 있다. 다만 성리학 관련 서목은 교과의 수신학과 겹쳐서인지 제시되지 않고 있다. 그렇지만 이 학과 제도의 구상은 양학과 병존하는 방식으로 이루어졌을 뿐이지, 전통 國·漢學의 기본 성격에는 어떤 변화도 추구하지 않았다.

폐쇄된 대학교가 동경대학으로 다시 설립되는 것은 약 6년이 지난 1877년이였다. 기본적으로는 동경개성학교와 동경의학교를 통합하여 동경대학으로 그 명칭을 바꾸는 것이었다. 동경대학은 모두 4개의 학부로 구성되었고, 개성학교에 法學部·理學部·文學部를 두고 의

34) 阪本是丸, 『明治維新と國學者』, 大明堂, 1993, pp. 185~187; 藤田大誠, 『近代國學の研究』, 弘文堂, 2007, p. 247.

35) 國家神道와 관련하여 1868~1871년은 신도국교화 정책 추진 시기이고, 1871~1877년은 국민교화 정책 시기이며, 제국헌법(1889)과 교육칙어(1890)로 귀결되는 1877~1890년은 국가신도의 이론적 제도적 성립 시기로 정리된다. 이와 관련해서는, 박규태, 「국가신도란 무엇인가」, 『종교연구』 29, 2002, pp. 229~ 231 참조.

36) 大久保利謙, 『日本の大學』, 創元社, 1943, p. 213;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p. 108.

37) 「大學規則并中小學規則」, 『法規分類大全』第1編·學政門一, pp. 14~16.

학교에 의학부를 설치하였다.³⁸⁾ 법학부와 이학부는 개성학교의 법학과와 이학과를 계승한 것이 분명한 반면, 문학부는 새롭게 설치된 학부라 할 수 있다.³⁹⁾ 명치 3년의 〈대학규칙〉에도 文科가 있었지만, 그 구체적인 내용에서는 동경대학 文學部와 성격이 전혀 다르다.

문학부는 2개의 학과로 구성되었는데, 제 1과는 ‘사학·철학·정치학과’ 이고 제 2과는 ‘화한문학과’ 였다. 제 1과는 오늘날까지 이어지고 있는 근대적 학문 명칭으로 주로 서양 학문을 익히는 것이었다. 명칭만으로도 짐작할 수 있듯이, 제 1과의 서양 학문은 지리적·지역적 한정을 받지 않는 보편 학문으로서의 명칭이고 제 2과는 ‘和漢’이라는 한정을 받는 지역학적 개념에 가까웠다.

양학의 입장에 기반을 둔 제 1과를 기준으로 삼자면, 이렇듯 아직 근대적 학문 체제에 진입하기에는 미흡한 전근대적 학문 전통을 대학 학과 체제의 하나로 구성하는 데에는 동경대학 총리 加藤弘之의 역할이 컸다. 加藤弘之에 따르면 일본 전통 학문의 계승 노력이 없으면 결국 일본의 주체 의식을 고양하기 어렵다는 것이다.⁴⁰⁾ 이런 이유로 和漢學의 계승을 위해 和漢文學科를 설치하였다.

〈표〉 동경대학 문학부 학년별 교과과정표⁴¹⁾

학년	제 1과(사학·철학·정치학과)	제 2과(화한문학과)	비고
1년	英吉利語(논문)·논리학·심리학(大意)·화문학·한문학·불란서어 혹은 日耳曼語(*)		(*)는 제1과에만 해당
2년	화문학·한문학·영吉利문학·철학(철학사와 심리학)·구미사학·불란서어 혹은 日耳曼語	화문학·한문학·영吉利문학·구미사학 혹은 철학	
3년	화문학·한문학·영吉利문학·철학(道義學)·구미사학·정치학·경제학	화문학·한문학·영吉利문학·구미사학 혹은 철학	
4년	영吉利문학·철학·구미사학·政學及列國交際法	화문학·한문학·구미사학 혹은 철학	

위의 교과과정 표의 밑줄 친 부분에서처럼 제 1과에서도 1~3학년 3년 동안 화한문학을 익히도록 함으로써, 화한문학과의 설립 취지를 구현하고자 하였다. 이러한 구도로부터 문학부의 2개 학과 체제가 성립되었다. 학부제로 인해 문학부라는 명칭을 달고 있지만 제국대학 문과대학의 전신이므로, 문과의 학과 제도가 형성되는 과정을 잘 보여주는 사례로 이해할 수 있겠다. 그렇지만 이 체제는 그리 오래 가지 않아 2년이 지나면서부터 학과 체제에 변화가 생겨나기 시작했다. 나아가 명치 19년 제국대학 설치에 이르기까지 문학부의 학과 체제는 내부적으로 지속적인 변동이 있었다. 이를 도표로 제시하면 다음과 같다.

38)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pp. 411~412.

39)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 685.

40)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p. 686~687에 해당 문서가 실려 있다.

41)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p. 687~690의 내용을 도표로 정리하였다.

〈표〉 1877~1885년 동경대학 문학부 학과 구성의 변천

연도	제 1학과	제 2학과	제 3학과	제 4학과
명치10년(1877)	史學・哲學・政治學	和漢文學科		
명치12년(1879)	哲學・政治學・理財學	和漢文學科		
명치14년(1881)	哲學科	政治學・理財學科	和漢文學科	
명치18년(1885)	哲學科	政治學・理財學科	和文學科	漢文學科
명치18년	哲學科	和文學科	漢文學科	

우선 눈에 띄는 사실은 명치 12년(1879) 개교 2년만에 문학부에서 제1과의 명칭에서 史學을 없애고 理財學⁴²⁾으로 대신하였다는 점이다. 加藤弘之에 따르면 원래 史學이란 歐美史學 중심이기는 하지만 동서양의 학문에 두루 해박하고 또 철학적 지식까지 갖춘 학자라야 되는데 그런 교수를 찾기 어렵고 희망 학생들의 지원 또한 드물기 때문에 폐지한 것이다.⁴³⁾ 반면에 理財學은 전적으로 서양의 학문이기 때문에 교수 요원을 찾기 용이하고 학생들의 수요 또한 적지 않아 대신 설치하자는 것이다.⁴⁴⁾

다음으로 철학과와 분리 독립이 명치 14년에 진행되었다. 명치 18년에는 화문학과와 한문학과와 분리·독립이 실시되었다. 명치 17년 문부성에 보낸 문서에서 화문학과 한문학은 그 규모가 방대하여 그 둘을 兼修하는 기존 학과 체제로는 교육 효과를 크게 기대하기 어려우므로 1년생만 공통으로 하고 2년생부터는 학과를 분리하여 교육하기를 요청하였다. 결국 문부성의 승인을 얻어 명치 18년 두 학과로 나뉘어졌다.⁴⁵⁾ 끝으로 명치 12년 12월 동경대학의 학부 체제에 큰 변화가 생겼다. 법정학부와 공예학부가 신설되어, 문학부의 제 2학과인 政治學・理財學科가 정치학과로 명칭을 바꾸어 법정학부로 옮겨졌다. 이러한 과정을 거쳐 최종적으로 동경대학 문학부는 철학과·화문학과·한문학과 3개 학과 체제가 되었다.⁴⁶⁾

동경대학 문학부의 제 2과로 출발한 화한문학과는 일본의 근대적 자국학이 명시적으로 정립되지 않은 상태에서의 자국학 혹은 동양학이라 부를 수도 있다. 근대적 분과학문으로 분화되기 이전의 통합성이 유지된다는 점에서 지역학과 더 유사하지만, 일본 스스로를 예외적 위치로 제외하지 않고 자신을 포함하는 학과 체제라는 점에서는 이질적이다. 물론 國・漢學의 대립이 일본 자국학의 자립성을 둘러싼 핵심 문제이기는 하지만, 적어도 이 단계에서는 일방적 배제가 불가능한 복합적 관계이다. 따라서 명시적인 학과 제도의 형식으로 일본의 자국학 혹은 동양학 같은 관념은 아직 형성되지 못하였지만, 和漢의 복합성 그 자체가 바로 일본을 상징하고 있었다.

1885년 화문학과와 한문학과와 두 학과로 분리되었지만, ‘和文學・漢文學・經學・法制(日本及支那)’ 등은 공통의 교과목이었다. 화문학과와 비교하여 한문학과와 가장 큰 특징은 經

42) 이 시기 전에는 經濟學이라 칭하다가 지금 시점에서는 理財學으로 불렸다가 명치 26년에 다시 경제학으로 학문 명칭을 고쳤다.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 690.

43)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 690;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p. 456. 그렇다고 史學 교육이 사라진다는 의미는 아니다. 학과의 명칭에서는 빼고 교과목에는 포함되었다.

44)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p. 457.

45)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p. 708~709;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pp. 458.

46)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pp. 500~505.

學 과목을 배운다는 것이고, 또 화문학과와 歌文 과목과는 달리 詩文 과목을 배운다는 것이었다. 그렇지만 화한문학과 공히 법제 과목은 언제나 ‘日本及支那’의 법제였고, 한문학과 의 교과 내용은 모두 일본에 학문적 전통으로 내재하는 것이었다. 그래서 和漢의 결합 자체가 일본일 뿐이었다. 이러한 특성은 1886년 이후 제국대학의 문과대학 설치 이후에도 지속되었다. 경학의 명칭이 支那經學으로 바뀌었을 뿐, 화문학과와 한문학과에서 공통적으로 “日本歷史” · “支那歷史” · “和漢古代法制” 과목을 이수하도록 되어 있었다.⁴⁷⁾

동경대학교 시절 화한문학과와 존재는 제 1과의 학술 관념에 적잖은 영향을 끼쳤다. 단적으로 철학과에서 동양철학을 교과목으로 설정할 때, 화한문학과를 일본의 자국학으로 인식할 수밖에 없었다.

〈표〉 동경대학 문학부(1877~1886) 제 1과의 철학 교과목 변천⁴⁸⁾

哲學科 독립 이전		哲學科 시기(1881)		哲學科(1882)	
학년	과목명	학년	과목명	학년	과목명
2	철학 (철학사 · 심리학)	2	철학(철학사 · 세태학 · 심리학)	2	동양철학(철학사)
				2	서양철학(철학사 · 세태학 · 심리학)
3	철학(도의학)	3	철학(근세철학 · 印度及支那哲學)	3	동양철학(인도급지나철학)
				3	서양철학(근세철학)
4	철학	4	철학(심리학 · 도의학 · 심미학 · 印度及支那哲學)	4	동양철학(인도급지나철학)
				4	서양철학(심리학 · 도의학 · 심미학)

위의 표에서 보듯이 1881년 철학과가 단일 학과로 독립된 이후부터 “印度及支那哲學” 이 강의 내용에 포함되고 다시 철학의 교과 내용 자체가 동양철학과 서양철학으로 양분되었다. 이 때의 “동양”은 일본을 제외한 동양이었다. 19세기 서유럽의 동양학에 영향을 받아 형성된 ‘동양철학’이라는 관념은 那珂通世의 ‘외국사로서의 동양사’라는 제안과 동질적이다. 그렇다면 이러한 동양(학) 인식의 이면에는 언제나 일본의 자국학이 전제되어 있어야 한다. 화한문학과가 상징하는 일본의 자국학은 일본과 동양(한학 혹은 지나)이 구분되지 않는 일본이었다. 달리 말해 화한학의 일본은 그 자체로 동양학적일 수 있다는 뜻이기도 하다.

1886년 설립된 제국대학의 문과에 박언학과가 처음 설치되고, 이어서 폐지되었던 사학과가 영문학과 · 독일문학과와 더불어 증설된 다음, 1888년 內閣 修史局의 修史 업무가 문과대학으로 이관됨에 따라 修史局의 重野安繹 · 久米邦武 · 星野恒 등을 교수진으로 하는 國史學科가 새로이 설치되었다. 국사학과의 설치에 따라 화문학과→국문학과, 한문학과→한학과로 명칭이 변경되고, 여기에 佛蘭西文學科가 보태어져서 제국대학의 문과대학은 9개 학과로 편제된다. 여기서 무엇보다 특기할 만한 사실은 국사학과의 등장이다.

명치 유신 직후부터 추진된 대학교 설립 정책은 새로운 교육제도의 확립을 위해서뿐만 아니라, 문교 정책 전반을 관리하는 중추 기관을 마련하기 위해서였다. 가령 명치 2년의 대

47)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p. 709~714, pp. 1284~1286.

48)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p. 687~708.

학교 책임자인 別堂의 역할은, 대학교(창평교)·개성학교·의학교 및 병원을 관리하는 데 그치지 않고, 전국의 學政을 관장하는 것으로 되어 있었다. 여기에 덧붙여 국사 편찬의 임무도 주어져 있었다. 대학의 교원들 또한 마찬가지로, 학생 교육과 더불어 “국사의 修撰”, “洋書의 번역”, “질병 치료” 등이 업무로 제시되어 있었다. 번역과 의료는 각각 개성학교와 의학교에 해당하는 바이고 국사 편찬은 대학 본교의 업무로 이해할 수 있다.⁴⁹⁾ 皇學과 漢學 세력의 대립으로 인해 대학교가 폐지되는 데 이르자, 정부는 문부성을 설치하고 국사 편찬 업무를 문부성이 담당하는 것으로 바꾸었다.⁵⁰⁾ 제국대학 국사학과의 교수진은 국사 편찬을 담당하던 사람들로써 주로 한학적 전통을 잇는 이들이었다.⁵¹⁾

학과의 명칭으로만 보자면 화문학과를 이은 국문학과와 국사학과의 학과로 설치됨으로써 일본의 자국학이 근대적 제도화에 성공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무엇보다 늘상 和漢으로 통칭되던 단계를 벗어나서 국문·국사라는 자기 지시성을 획득하였기 때문이다. 동경대학의 화문학과나 한문학과 시절에 교과목 명칭에서 활용되던 “日本及支那” 과 “和漢”이라는 용어는 거의 사라진 것도 뚜렷한 사실이다. 이에 따라 “일본” 과 “지나” 라는 귀속처가 분명하게 되었다. 그 사정은 아래 교과목 명칭에서 잘 드러난다.

〈표〉 제국대학 문과대학 국사학과·국문학과·한학과 교과목 비교(1889)⁵²⁾

학년	國史學科		國文學科		漢學科	
	과목명	시수	과목명	시수	과목명	시수
1	日本歷史及地理	5	日本歷史	2	日本法制沿革	1
	日本法制沿革	2	日本法制沿革	2	支那法制沿革	3
	支那歷史及法制	3	國語	4	支那歷史	3
	法制沿革	3	國文	4	漢文學	3
	國文學	1	漢文	1	國文	1
2	日本歷史及地理	5	日本歷史	2	日本法制沿革	1
	日本法制沿革	4	日本法制沿革	2	支那法制沿革	3
	支那歷史及法制	2	國語	4	支那歷史	3
	法制沿革	2	國文	4	日本歷史	1
	國文學	4	支那歷史	1	漢文學	2
					國文	1

49)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p. 20~24.

50) 坂本太郎, 박인호·임상선 역, 『일본사학사』, 침성대, 1991, pp. 208~215.

51) 명치 유신 전후 사학의 조류는 크게 넷으로 나누어볼 수 있다. 첫째, 德川 막부 이래의 유교적 명분론을 ‘天皇-臣民’의 존왕론적 명분론으로 재생시키고, 교육칙어로 귀결되는 유교적 이데올로기 그룹이다. 元田永孚(1818~1891)가 대표적 인물이다. 둘째, 유교를 모체로 하면서 청조 고종학을 익혀 봉건적 명분론을 넘어서고자 하는 사족 출신의 한학자 그룹이다. 重野安繹(1827~1910), 久米邦武(1839~1931), 星野恒(1839~1917) 등이 대표적인데, 이들은 정부의 국사편찬사업에 중추적 역할을 맡았고 유럽의 근대 역사학에 영향을 받았으며 제국대학 문과대학 교수로 재직하였다. 셋째, 國學-神道 계열의 학자들이다. 이른바 平田篤胤(1776~1843)의 계통을 잇는 平田派 그룹들이 가장 대표적이다. 넷째, 文明史·開化史 계열의 사상가들이다. 福澤諭吉(1843~1901)를 필두로 『日本開化小史』의 田口卯吉(1855~1905) 등이 널리 알려져 있다. 永原慶二, 『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學』, 吉川弘文館, 2003, pp. 8~42.

52)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 pp. 1303~1307.

학년	國史學科		國文學科		漢學科	
	과목명	시수	과목명	시수	과목명	시수
3	日本歴史	4	國語	3	日本歴史	1
	日本法制沿革	4	國文	5	支那法制沿革	2
	支那歴史及法制	1	支那歴史	1	支那歴史	3
					漢文學	2

위의 표는 국사학과·국문학과·한학과 교육과정 가운데서 상호 관련성이 높은 과목을 뽑아 정리한 것이다. 여기엔 예외없이 ‘國’·“日本”·“支那” 등 지리적 지시의 의미가 분명하게 나타나 있다. 다만, 관용적 용례로 이해될 수도 있지만, “漢學科”나 “漢文(學)”만이 여전히 전통적 모호함을 품고 있다. 따라서 이 단계에까지는 和漢學의 모호한 위상이 남아 있다고 보아야 한다. 1893년 제국대학에 강좌제가 시행될 때에도 漢學·支那語學 강좌가 셋 설치되고 있다. 1904년 문과대학의 학과제도가 바뀌어 철학과·사학과·문학과 3개 학과의 통합 단위제가 실시되었을 때, 受験學科(專修學科)가 19개 있었는데 거기엔 漢學이라는 명칭이 보이지 않는다. ‘지나철학·지나문학·동양사학’ 등이 독립된 학과로 등장하면서 한학은 사라졌다.⁵³⁾

반복해서 말하지만, 화한학으로서의 자국학이 제국대학의 학과 제도 내에서 사라지는 과정은 일본의 근대적 자국학 — 국어학·국문학·국사학이 정립되고 동시에 일본을 제외한 동양학의 범주화 가능성이 확립되는 과정과 거의 동시적으로 진행되었다. 따라서 역으로 보자면, 화한학은 일본 자국학의 이념적 경계를 흐리거나 일본적 동양학의 가능성을 약화시키는 효과가 있었다. 무엇보다 화한학은 일본 자국학의 내적 명징성을 확립하는 데에 장애로 인식되었다.

IV. 나가며

화한학이라고는 하지만 이것은 和學(國學)과 漢學이 상호 대립하면서 형성해 온 집합체라 하는 편이 온당하다. 엄밀히 말하자면 화한학과 非화한학의 대립이 있었다기보다는 화한학의 구조 자체가 내적 대립을 포함하고 있었다. 신도국교화 운동이 그렇듯, 명치 초기 왕정복고의 이념적 근거를 제시한 것은 국학 진영이었다. 특히 平田派 국학자들은 국학적 이념에 기반한 대학의 설립을 절실히 염원하였다. 慶應 4년(1868) 2월 22일 平田篤胤의 국학을 계승하는 平田派 국학자들인 平田鍊胤·玉松操·矢野玄道 등⁵⁴⁾이 정부의 의뢰를 받아 입안한 『學舍制』는 새로운 학제 구상이었다.⁵⁵⁾ 이 구상은 한학 세력과의 갈등으로 인해 좌초당하였다. 古道論 혹은 복고론적 성격이 강한 이들의 주장은 배제의 논리에 가까웠기 때

53) 『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 pp. 419~424.

54) 이 당시 이들 3인은 모두 정부의 관료로 임명되어 있었다. 『東京大學百年史 通史1』, 1984, p. 105.

55) 阪本是丸, 『明治維新と國學者』, 大明堂, 1993, pp. 185~187; 藤田大誠, 『近代國學の研究』, 弘文堂, 2007, p. 247.

문에, 정부의 정책으로 채택되기 어려웠다.

반면에 국학의 전통을 계승하면서 대학의 학과 제도 속으로 국학을 끌어들이는 이들은 小中村清矩・横山由清・木村正辭 등 和學講談所 출신의 국학자들이었다. 이른바 명치기의 考證派 국학자로 분류된다. 명치 2년(1869)에 ‘史料編輯六國史校正御用掛’ 소속으로 임명되는 것을 시작으로 이들은 거의 행보를 같이 한다. 특히 고등교육기관의 교수로 크게 활약하였다. 1869년 6월에 설립된 동경의 大學校, 1877년의 東京大學, 1884년의 동경대학 문학부 부설 고전강습과, 같은 해의 皇典講究所, 나아가 1890년에 설치된 국학원에 이르기까지 이들은 지속적으로 밀접한 관계를 유지하였다.⁵⁶⁾ 적어도 근대 초기 화한학적 전통의 일본 자국학 성립이라는 측면에서 이들이 미친 영향은 적지 않다.

〈표〉 명치 유신 전후 考證派 國學者の 국학 체계 구상⁵⁷⁾

	저자	시기	하위 분과	
『或問稿』	小中村清矩	安政5년	上ツ代の事の學ひ	*神學
			歷代の事の學ひ	
			歌文言詞の學ヒ	
「學則」	木村正辭	慶應3년	神典學	
			國史(歴史)學	
			律令學	
			言語學	
『學則稿』	小中村清矩	慶應3년	事實學(歷世ノ事實ヲ考究)	
			言詞學(古今ノ言詞ヲ熟知)	
「學規私言(初稿)」	小中村清矩	明治元年	神典學	
			歴史學	
			辭章學	
「月舍學則」	横山由清	明治2년	事實學	
			言語學	
			神典學	

神典學 혹은 神學이 주요 영역으로 설정되어 있음을 쉽게 확인할 수 있다. 그렇지만 시간이 흐를수록 이들의 인식이 서서히 달라져갔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이러한 사정은 동경대학

56) 藤田大誠, 『近代國學の研究』, pp. 52~53.

57) 『或問稿』는 東京大學附屬總合圖書館所藏의 『陽春廬蒐集錄』7 및 國立國會圖書館古典資料室에 있고, 『學則稿』는 東京大學附屬總合圖書館所藏의 『陽春廬蒐集錄』6에 수록되어 있다. 「學規私言」은 여러 형태로 자료가 남아 있다. 「學規私言(初稿)」는 東京大學附屬總合圖書館所藏의 『陽春廬草稿』4에 수록되어 있고, 명치 22년의 訂正本이 『陽春廬雜考』卷8, 1897에 실려 있다. 横山由清의 「月舍學則」은 天理大學校附屬天理圖書館所藏 『横山由清』의 『國學の説』에 수록되어 있고, 木村正辭의 「學則」은 財團法人東洋文庫의 岩崎文庫所藏 『櫟齋編著書』에 들어 있다. 小中村清矩의 저술 서지사항에 대해서는 高橋陽一, 「國學における‘事實’問題の展開と教化」, 寺崎昌男 편,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知の配分と國民統合』, 第一法規, 1993; 藤田大誠, 앞의 책, pp. 60~61, 376~389, 405~409 참조.

에 국학을 계승하는 학과(古典講習科)의 설치를 주도한 小中村清矩에게서 확연히 드러나는 사실이다.

〈표〉 小中村清矩의 국학 체계 구상⁵⁸⁾

제목	시기	하위 분과
「我國ノ古書ヲ學習スル說」	명치 12년	事實學
		言詞學
「古典講習科開業演說案」	명치 15년	事實學
		制度學
		言詞學
「學規私言(小中村先生自刪)」	명치 22년	歷史學
		法制學
		言詞學
「國學の前途」	명치 22년	事實學
		言詞學

이상에서 보듯이 小中村清矩은 국학의 체계를 2~3개의 하위 영역들로 구성하였다. 법률·제도를 독립된 영역으로 하느냐에 따라 2개가 되거나 3개가 되는 것이었다. 그러다가 이후로 차츰 歷史(事實)學과 言詞學의 두 영역으로 귀결되었다. 이것은 결국 古道の 복고적 성격을 탈각하고 도달한 방식이다. 학과 제도의 수준에서 다시 논의하자면, 小中村의 역사학과 언사학이란 결국 국사학과와 국문학과에 해당되는 체계와 동일하다 하겠다. 小中村의 구상과는 달리 제국대학의 국사학과에는 한학적 전통에서 국사 편찬 업무를 추진해온 이들이 자리한 탓에, 국학의 전통은 아무래도 국문학 분야로 이어졌다.

그렇지만 小中村에게서 얼마간 수학하였음에도, 上田이 과학적 언어학의 이름으로 국어를 수립하고 芳賀矢一이 독일 문헌학의 방법론을 빌어 국문학의 건립에 나설 때, 이들 모두 국학적 전통과의 단절을 학문적 과제로 삼았다. 아울러 근대적 동양학의 범주를 구성하는 학과 제도가 정착하는 이면에는 한학의 전통이 제국대학 학과 제도 내부에서 그 자리를 상실하는 과정이 동시에 진행되고 있었다. 비록 제국대학 문과의 학과 제도라는 한정된 영역의 경우에 불과하지만, 일본 내외에 영향을 미친 학과 제도라는 점에서 그 의의를 과소평가할 수는 없다.

다만, 한 가지, 명시적인 학과 제도의 형식을 지니지는 못하였다 할지라도 화한학적 자국학의 전통이 완전히 해소되어 버렸는지 묻는 일이 남아 있는 듯하다. 이것은 결국 일본과

58) 「國學の前途」(명치 22, 1889), 『陽春廬雜考』卷8에서는 “國學이라고 하는 것을 大別하면 事實을 아는 것과 言詞를 아는 것의 두 가지 길이 있다”라고 하였고, 「國學將來の目的」(1889), 『日本文學』15에서는 “國學은 다양하게 나누어지지만 대별하면 歷史와 言詞의 둘에 지나지 않는다”고 하였으며, 「國文學大意」(1892), 『國文學』3편4호에서도 “國學은 요컨대 事實을 알아야 하는 歷史學과 自國固有의 言語를 배워야 하는 國語學 둘이 있다”고 언급하였다. 보다 자세한 분석은, 藤田大誠, 앞의 책, pp. 390~391 참조.

일본 자신이 포함되는 동양을 분리하지 않는 인식의 몇 가지 경향을 검토하는 일이기도 하다. 따라서 서양이라는 상대적 범주가 설정되고 이에 대응되는 일본(동양)의 위상을 어떻게 설정하는지에 초점을 둘 필요가 있다.

무엇보다 화한학적 전통은 명치 초기 문명개화 정책에 대해 반발하는 지배 체제의 이데올로기 속에서 동원된다. 단적으로 천황의 시강이던 元田永孚는 정부의 지나친 문명개화 정책으로 인해 국민의 덕성 교육이 피폐해졌다는 입장에서, 1879년(명치 12)에 “仁義忠孝”를 강조하는 〈教學大旨〉를 작성하였다.⁵⁹⁾ 이 문제와 관련해서 伊藤博文과 논쟁을 벌이기도 하였다. 元田은 그간의 서구지향적 풍조로 인해 인의충효의 관념이 상실되었으니 윤리·국체 교육이 필요하고, 이를 위해 유교와 신도에 기반한 國敎의 수립을 주장하였다.⁶⁰⁾ 이러한 논리의 연장선에서 ‘修身’ 과목의 중요성이 부각되고 아동용 도덕교과서가 편찬되기도 하였다. 그 궁극적 귀결점은 천황제 이데올로기를 상징하는 『敎育勅語』(1890)일 것이다.⁶¹⁾

元田永孚의 경로와는 달리 한학의 전통에서 국학 전통과 대결하며 국사 편찬에 힘쓴 흐름에도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제국대학 국사학과 교수였던 重野安繹·久米邦武·星野恒 등은 이른바 기기의 신성성을 부정하고 철저한 실증사학의 건립을 주장한 이들이다. 제국대학 사학과에 부임하여 실증적 방법론에 기초한 역사학을 지향한 랑케의 제자 리스Ludwig Riess와 협력하며 근대적 역사학 수립에 힘썼다.⁶²⁾ 실증사학이라는 외피를 쓰고 있지만 이들의 주된 관심사는 神道·國學의 일본사 인식을 부정하는 데 있었다. 重野安繹가 “抹殺博士”라는 별명을 얻고, 神道는 고대 祭天의 옛 습속에 불과하다고 주장한 久米邦武 결국 제국대학 교수직을 사임한 것도 이런 연유에서였다.⁶³⁾

이들의 주장은 크게 두 가지 함의를 지닌다. 하나는 신도·국학과 대립이고 다른 하나는 ‘일선동조론’의 근거 제시이다. 이들은 천황가가 조선 반도로부터 이주하였다는 입장에서 한일은 본래 인종과 언어가 동일한 같은 나라였다고 주장한다. 이러한 논리는 개방적 개국과 폐쇄적 쇄국의 대비 속에서 국학의 자폐적 국수주의를 비판하는 데도 활용된다. 이들에 의한 일본의 혼합민족설도 이런 맥락에서 발생한다.⁶⁴⁾ 여기엔 묘한 이중성이 포함되어 있는데, 정치적 상황의 변화에 따라 침략을 정당화하는 논리가 되지만 내적으로는 국체의 명징성을 어지럽게 만든다는 반발을 초래하기 쉽다는 것이다. 따라서 일본을 동질적 단일성으로 규정할 것인가 아니면 이질성의 복합체로 규정할 것인가 하는 문제가 관건이 된다.

국학과 한학의 대립적 관계 속에서 빚어지는 화한학적 전통이 제국대학의 지식 편제 과정에서 제도적으로 안착하지는 못하였지만, 제국대학이 상징하는 관학 혹은 아카데미즘의 외부에서 더 현실적인 위력을 발하였는지 모를 일이다. 단적으로 그 과학적 객관성이라는 이름으로 명칭한 자국학의 수립이 진행되고 그와 더불어 일본이 배제된 동양학이라는 학과

59) 「教學大旨」, 『敎育の體系』(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6), 岩波書店, 1990, pp. 78~79.

60) 伊藤博文, 「敎育議」; 元田永孚, 「敎育議附議」, 『敎育の體系』pp. 80~86.

61) 劉岳兵 編, 『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pp. 37~39, 182~185.

62) 리스의 역사학에 대해서는, 스테판 타나카, 박영재·함동주 역, 『일본 동양학의 구조』, 문학과지성사, 2004, pp.72~76.

63) 鹿野政直·今井修, 「日本近代思想史のなかの久米事件」, 大久保利謙 編, 『久米邦武の研究』, 吉川弘文館, 1991 참조.

64) 小熊英二, 조현설 역, 『일본 단일민족신화의 기원』, 소명출판, 2003, pp. 122~143.

와 지식 편제가 수행될 때 발생하는 균열과 공백의 지점은 화한학적 전통이 점유하기 시작했다고 볼 수 있다. 그것은 자국학도 아니고 동양학도 아닌 자리, 달리 말해 자국을 포함한 동양 혹은 동양을 내재한 자국이라는 위치일 것이다. 국학적 배제의 논리든 한학적 통합의 논리든 이 둘은 적대적 관계 속에서 상호 의존성을 지니면서, 아카데미즘이 개입하기 힘든 정치적 현실 속에서 자기 근거를 마련해 간 것은 아닌지 묻게 된다.

【Abstract】

Establishment of 'Liberal Arts College' and Organization of Department in Early Modern East-Asian

RYU Junpil

Introduction

The term 'humanities' sounds familiar to us and seems self-explanatory in itself. In truth, however, the essence of it is quite obscure. It is paradoxical that one cannot but be questioning about the existence of 'humanities scholars' while there is a branch of learning defined as 'humanities.' At least we cannot prove the very existence of humanities scholars at the level of department system or knowledge system of a university. Then, does this mean that the discipline of humanities is an illusionary fantasy and humanities scholars are non other than ideological ghosts?

The similar question is raised in the discipline of Oriental Studies. 'Oriental Studies' seems exist in itself but the existence of 'orientalists' is doubtful. Only those majors that are attributed to individual nations such as China, Japan, Vietnam, and India are represented by the department system of a university. If we change name Oriental Studies into East-Asian Studies, taking consideration of geopolitical location of Korea, the range of imagination will be limited but the same question will arise repeatedly.

If the discipline of humanities as well as Oriental Studies do exist and East-Asian Studies does work, the scope and range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would exist in the form of invisible discourse not in clearly defined framework of a system. 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humanities scholars, orientalist, and East-Asian Studies scholars we cannot say for sure that they do not exist. It may be that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and power that give birth to the department system of university may not be identified simply by restoring the system.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partly related to these questions as it tries to examine in what process the department system of humanities was established in East-Asian universities. The term, humanities was used to specifically refer to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during the time. It is not surprising at all that Japan was the first in setting up Literature Department in East-Asia. It is also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Literature Department was introduc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accommodating the modern studies of the west.

1. Organization of Department in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Beijing and Influence of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02 and 1904 when China began its full-fledged effort to set up colleges, it actively made reference to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Japan model. Following is the department

organization proposed in 1902 for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lassification of College	Name of Department	Courses
College Department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Dept. of Literature	Jingxue, Lixue, Zhuzixue, Zhanggu, Cizhang, Foreign Language
	Dept. of Science	
	Dept. of Agriculture	
	Dept. of Arts and Crafts	
	Dept. of Business	
	Dept. of Medicine	

In 1904, a modified plan was proposed as the following:

Name of College	Major	
College of Chinese Classics	Zhouyi, Shangshu, Maoshi, Chunqiu zuozhuan Chunqiusanzhuan, Zhouli, Yili, The Book of Rite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Words of Mencius, Lixue	11 Major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inese History, World History, Geography, Chinese Literature, British Literature, French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German Literature, Japanese Literature	9 Majors

The department system of 1904 was carried over to the period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ithout major modification. The "University Act" promulgated in October 1912, however, declared that the department system would no longer be based solely on Jingxue and History. Following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Act, the university system was organized into seven colleges: Liberal Arts, Science, Law, Business, Medicine,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Simply put, the College of Chinese Classics was abolished and the seven departments survived. Since then, it formed an official university system of modern day China. Of the seven departments,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was designed as follows.

4 sub-divisions of literature department	Sub-courses of 4 sub-departments	Note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Western Philosophy	2 courses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Indian Literature, English Literature, French Literature, German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Italian Literature, Linguistics	8 courses
History	Chinese History · Oriental History (Japanese History), Western History	2 courses
Geography		1 course

The department system of the University of Beijing proposed in 1904 was still based on the idea of

'the Western Function with Chinese substance', in the case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The department system in 1913 was even more closer to that of Japanese Imperial College model. In this regard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models imply the modernity of university department system in China during that time. Thus, it is noteworthy to pay attention to a branch of learning appear on the stage which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traditional categories of learning. For instance Linguistics, Indian Literature, and Oriental History, to name but a few.

2. Organization of Depart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Japanese Imperial University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Japan was established in March 1886 and along with it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was first set up. It was Chamberlain (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 who l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eda Kazutoshi who was taught by Chamberlain is particularly worthwhile to take notice of. It was none other than him who established modern Japanese Studies independent from its traditional study of Japanese classics and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alled Japanese style Oriental Studies.

Ueda Kazutoshi maintained that the study of Linguistics could only be established when language was perceived not as a letter but as a sound. His argument brought about effects in two aspects. First, it bade epistemological farewell to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Japanese classics. Second, it helped languages of neighboring peoples rising to the surface as a subject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tudy. The latter, in particular, was of significance for bringing Asian languages into perspective. In fact, the function of Japanese Oriental Studies was not less originated from the study of linguistics. As mentioned abov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introducing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into Japan and in formulating Japanese Oriental Studies. Thus, the emergence of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carries a significance in relation to the organization of departments in College of Arts.

From the beginning, Oriental Studies in Europe wa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objects outside of oneself, namely the objectified system of knowledge. Accepting the concept by the orient meant that the orient perceived themselves as an objectified subject.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this queer paradox, the subject, namely the orient, should be defined properly as an object in the first place. In other words, the subject itself which belongs to the orient must not b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f orient. In the case of Japan who introduced Oriental Stud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East Asia should have excluded Japan from the objects of study. To put it differently, the national study of Japan should be an implicit premise in formulating oriental studies.

3. Perception on the National Study of Japan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its Department Organiz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founded in 1877, was composed of 4 colleges. One of them was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It was composed of 2 departments: the first being 'History · Philosophy · Political Science', the second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former was the names of the modern studies which are still in use. As one may guess from their names western studies in the first department was not limited by geographical and regional boundary. The second was more or less closer to the regional studies. This system was under continuous modification until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has firmly taken root.

Year	1st Dept.	2nd Dept.	3rd Dept.	4th Dept.
10th year of Meiji (1877)	History · Philosophy · Political Science	Japanes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12th year of Meiji (1879)	Philosophy · Political Science · Economics	Japanes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14th year of Meiji (1881)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 Economics	Japanes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18th year of Meiji (1885)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 Economics	Japa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18th year of Meiji	Philosophy	Japa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started out as the second department of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may be referred to as the National Studies of Japan or Oriental Studies before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modern Japanese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t is more similar to regional studies in that it maintains the integrity of the pre-department school system of the past.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is unusual that the department did not treat Japan as an exclusive object but include itself in the study. Though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was the core issue of the autonomy of Japanese Studies, sheer exclusion of Japan was not plausible, at least at this stage. Thus, though the concept of Japanese Studies or Oriental Studies under a clear-cut department system was not formed yet, the complex concept of Japan and China represented Japan itself.

Though the department was split into two in 1885, most of the curriculum of Chinese Department was inherent in Japanese Studies. Therefore, the composition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was a sheer representation of Japan. The characteristic was maintain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Liberal Arts College at Imperial University after 1886. The existence of Department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has had quit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cademic concept of the first department. For instance, whe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cluded Oriental Philosophy into its curricula, it had to acknowledge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as its own national studies.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1881, subjects like "Indian Philosophy" was included in the lecture and curriculum was divided into Oriental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Here, the term "Oriental" does not include Japan. The concept of "Oriental Philosophy" which has been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riental Studies in Western Europe in 19th century was of the same kin as the offering of "Oriental History as Foreign History". The oriental studies should always have national study of Japan in it. The national study of Japan symbol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was the one that did not discern Japan and the Orient (or China). In other words, Japan represented by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is most oriental in itself.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concept of its department system. For instance, whe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cluded Oriental Philosophy into its curriculum, it could not but accept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as its own national studies.

<Table 1>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1877~1886)

Dept. of Philosophy Prior to independence		Dept. of Philosophy (1881)		Dept. of Philosophy (1882)	
Year	Subject	Year	Subject	Year	Subject
2	Philosophy (History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2	Philosophy (History of philosophy, Sociology, Psychology)	2	Oriental philosophy (History of philosophy)
				2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y of philosophy, Sociology, Psychology)
3	Philosophy (Moral philosophy)	3	Philosophy (Modern philosophy, Indo-China Philosophy)	3	Oriental philosophy (Indo-China philosophy)
				3	Western philosophy (Modern philosophy)
4	Philosophy	4	Philosophy (Psychology, Moral philosophy, Aesthetics, Indo-China Philosophy)	4	Oriental philosophy (Indo-China philosophy)
				4	Western philosophy (Psychology, Moral philosophy, Aesthetics,

As shown in Table 1 above, subjects like "Indo-China Philosophy" was included in the lecture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1881, and the curriculum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riental Philosophy, Western Philosophy. Here, the term "Oriental" does not include Japan. The concept of "Oriental Philosophy" was of the same kin as the offering of "Oriental History as Foreign History". The Oriental Studies should always include national study of Japan in it. The national study of Japan symbol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was the one that did not discern Japan and the Orient (or China). In other words, Japan represented by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was perceived to be most oriental in itself.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founded in 1886. Later,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which had been abolished was expanded into the departments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German Literature. In 1888,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History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History,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was changed to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iterature while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transformed to the Department Classics Studies. In addition, with the inclu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French Literature,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had 9 departments under it.

Judging from the name of the departments,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seems to have been successful by introducing the department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history. Above all, they now gained self-referring name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History getting out of the stage where they were referred in a combined entity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the terms often used for describing subjects such as "Japan-China" and "Japanese and Chinese" under the departments of Japanese Studies or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did not appear any more. This clearly discerned the affiliation of "Japan" and "China" respectively.

When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introduced new courses in 1893, there were three courses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In 1904,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had 19 departments and the name Chinese Studies was nowhere to be seen. With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Literature, Oriental History as independent departments respectively, the name Chinese Studies disappeared for good.

Again,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name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disappeared from the department system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progress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process where the disciplines like Japanese Language, Jap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History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 concept of Oriental Studies excluding Japan was formulated. To put it in a reverse angle,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had an impact on obscuring the ideological boundary of Japanese Studi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apanese style Oriental Studies. Above all,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was perceived as an obstacle in defining the inherent clarity of Japanese Studies as the discipline of national studies.

日治末期台灣的教育政策

— 以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爲中心 —

■ 許 佩 賢 (新竹教育大學校) ■

日治末期台灣的教育政策

— 以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為中心 —

許佩賢（〔台灣〕新竹教育大學校）

〈目次〉

- I. 前言
- II. 1943年義務教育實施的決策過程
- III. 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的財政問題
- IV. 準備期間的一地方——新竹地區的例子
 - 一. 新竹市的學校、班級增設情形
 - 二. 新竹市的教育財政
 - 三. 地方上的教育要求
- V. 結語：兼論殖民地末期教育史研究的課題

I. 前言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一直到統治結束前不久的1943年，在戰爭緊迫的局勢中，才終於實施義務教育制度。筆者以前曾經發表〈戰爭與義務教育的實施〉¹⁾，以1943年義務教育制度的實施為中心，探討日治時期教育法制的建立。但是該文主要是以法規、諭告及報章雜誌為主要史料，雖然能提出義務教育與戰爭動員的關係，但包括政策決策過程或施行過程在內的諸多問題未及深論。義務教育制度在台灣施行的決策過程，以及自1939年決定實施後，逐年擴充初等教育機關、增設師資培育機關的過程，乃至台灣社會的一般民眾、兒童對制度改變的對應情形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以往台灣教育史的研究中，1930年代後期以後的研究相對較少，有則多集中在教科書的內容分析。對於此時期的教育史，之所以有這麼多空白，主要原因之一還是來自於史料的問題。對教育史研究者來說，相當於總督府四十年來教育施政報告書的《台灣教育沿革誌》（1939年）只寫到1937年；總督府檔案也很少1930年代以後的材料，而許多資料在戰爭時期或戰後散佚。

2001年10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公開了「茗荷谷研修所舊藏記錄」（以下簡稱《茗荷谷文書》），其主要內容為外務省、興亞院、大東亞省在中國、滿洲經濟活動的文書，以及拓務省、內務省所管轄的殖民地行政文書等。其中的I門是教育相關史料，包括了殖民地末期朝鮮、台灣的教育政策資料。這批資料特別的地方是，第一，年代大部分集中在1930年代後半到1940年代，有許多是1940年代的資料。第二，其中有很多是總督府向日本中央官廳的報告書。後來其中一部分由ゆまに書房作成微卷並出版目錄²⁾，收有歷次台灣教育令改正時台灣總督府所準備的審議資料，以及1940年代的教育狀況調查。因為其性質是準備審議的資料，等於是台灣總督府要給上級看的報告書，並不會有總督府內

1) 收於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

2) 廣瀬順晴編，《茗荷谷研究所舊藏記錄 戰中期殖民地行政史料總目錄 教育、文化、宗教篇》（東京：ゆまに書房，2003年）。關於《茗荷谷文書》的介紹，可參考熊本史雄，〈外交史料館所藏『茗荷谷研修所舊藏記錄』の構造とその資料的位置－拓務省關係文書中心に－〉，《外交史料館報》16號（2002年），頁82-109。

部討論的過程，不過，從資料作成的時間來看，這是我們了解日本統治後期相當珍貴的資料。本文主要即是想利用這份資料，試圖更進一步解明總督府在制定及實施義務教育政策的過程，同時，由於其資料性質的限制，可以呈現的是總督府討論後的結果，至於總督府內部的討論過程，限於檔案欠缺，只能藉由當時報刊報導有限的掌握。另一方面，由於義務教育的施行，在行政方面影響最大的當屬初等教育機關設立主體的市街庄層級，因此，本文也擬考察此時期因應義務教育的實施，地方基層社會的教育施設狀況及地方民眾的對應。

II. 1943年義務教育實施的決策過程

台灣總督府決定自1943年在台灣實施六年義務教育制的時間點，是在1939年。此前，在台灣施行義務教育的議題也曾數次被提出，但是都沒有實現。對於義務教育施行的經緯，總督府的相關官員通常都是這麼整理的：最早是在明治36年(1903年)第一回學事諮問會中，當時的後藤新平民政長官召集全島小公學校長及各廳學事主任屬57名，召開學事諮問會，會中提出的答申說：「對本島住民徹底普及國語，同時涵養其國民性，乃為本島統治的根基；因此，儘快施行初等教育義務制，強制其就學，確立同化的根本方針最為緊要。」其次是明治37年(1904年)學務課長木村匡在教育會常集會中發表儘速實施初等教育義務制的意見。大正10(1921)年6月總督府向評議會提出關於義務教育施行時期及方法的諮問案，之後交付委員會討論，於1922年第三回評議會提出答申。答申案中基本上同意有朝一日要實施義務教育，不過考慮到地方團體的財政問題，無法立即實施，如果地方團體的負擔能力達到一定程度，可以由市街庄向州知事或廳長提出，再由台灣總督來認可。³⁾

這樣的回顧中，總督府官員想要強調的是，總督府方面一直都有注意到這個課題，不過長久以來，由於財政困難及台灣人的向學心不足，都沒有付諸實行。民眾的向學心不足，自然是總督府的推託之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還是在財政問題。筆者在前文中已經討論過，台灣總督府在需錢恐急的戰爭時期決定施行義務教育，顯然與日本的戰爭動員有關。總督府內部資料也顯示義務教育制度施行的背景之一是未來在台灣實施徵兵制已經可以預想。⁴⁾ 以下即就目前可以掌握的資料，試圖重建總督府決定到施行義務教育的過程。

義務教育實施的決策經過，由於缺乏總督府內部檔案，以目前可見的資料來看，最早提及此問題的是1939年8月19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報導中提到最近在台灣總督府評議會的懇談會中，有內地人會員提出關於義務教育實施的積極意見。報導中同時指出，總督府方面自前一年的4月在學務課中設置新的係，設置專任事務官，開始著手調查。⁵⁾ 由此可知，這個議案在總督府內部的提出應該是在1938年年初。其後調查的指示及過程不明，不過1939年前半年的《台灣日日新報》，就經常有各州為準備義務教育做基本調查的相關報導。⁶⁾ 同年8月23日台灣總督府便明令設置臨時教育調查委員會，專門調查義務教育實施問題。

3) 森田俊介，〈臺灣に於ける義務教育制度の將來〉，《台灣時報》245號(1940年2月)，頁8-10。同文也刊載在《台灣教育》455號，1940年5月。

4) 〈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茗荷谷文書》R16-473。

5) 〈本格的な調査へ，臨時教育調查委員會を設置〉，《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19日夕刊。1938年學務課組織職掌更動待查。

6) 〈義務教育に備へて，就學率を調査，現在の狀態では前途遼遠〉，《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5月29日；〈今から來春入學の，學齡兒童を募集，新竹市教育課の學童基本調査〉，《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5月31日；〈苗栗街の學齡兒調査〉，1939年6月14日；〈公學校入學者は飛躍的の向上率〉，1939年7月5日夕刊等。

這個臨時教育調查委員會的組成如下：

- 委員 台大總長三田定則、殖產局長田端幸三郎、交通局長泊武治、專賣局長今川淵、警務局長二見直二、內務局長山縣三郎、文教局長島田昌勢、府事務官山本真平、財務局長中島一郎。
- 幹事 府事務官木原圓次、同須田一二三、同鈴木秀夫、同廣谷致員、同細井英夫、視學官波多野清太郎、同石井權三、編修官加藤春城、府事務官高橋衛、同慶谷隆夫、同鈴木信太郎、同鹽見俊二、同鈴木斗人、同大山綱隆、府理事官佐藤武、同南出隆。⁷⁾

由其組成來看，除了掛名委員長的三田定則，其他都是總督府的官員，由總務長官領銜，局長級的人擔任委員，而實際的討論及草案擬定是由幹事負責。第一次幹事會於翌日召開，⁸⁾ 之後幹事又開了數次會議，遂於10月5日作出提案，準備提交委員會討論。幹事會作成的基礎案中指出，義務教育實施的前提是大量教員的養成及超齡兒童(超過六歲而未入學者)的處理，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需要數年的時間，因此提議自昭和十八年度開始實施。⁹⁾ 後來這個基礎案的提議在委員會中，僅修正幾處詞句，幾乎原案通過，¹⁰⁾ 表示真正決定實施細節的是總督府內的事務官。之後，總督府於10月24日召開地方長官意見交換會，討論此事。據報導，地方長官幾無異議大表同意。¹¹⁾ 之所以需要地方長官的意見，主要是義務教育實施，需要相當的財政基礎，特別是地方團體的財政是否足夠將是重要關鍵之一。

地方長官意見交換會後，總督府於10月26日將此案提送第九回總督府評議會，出席的評議委員有26名(評議員總共有29人)，任命近江時五郎、河村徹、許丙、山田尚吉、張臬生、黃欣、中村一造等七人為答申書作成委員會，作成報告書，經討論後，全場一致通過。¹²⁾ 總督府遂公布實施要綱，其內容如下：

一、目標

初等教育乃鍊成扶翼皇運之國民的基礎資質，故以之為義務制。

二、實施時期

昭和十八年度起，實施義務教育，同年度以降，達到就學始期的兒童，其就學適用義務制。

三、義務教育制度適用範圍

凡普通行政區域內的內地人、本島人、高砂族之學齡兒童皆行義務教育。

四、學齡

兒童滿六歲之翌日起至滿十四歲間之八年為學齡。

五、就學義務

學齡兒童達到學齡之日以後的最初學年開始時，為就學之始期，修畢尋常小學校或公學校之教科書為就學之終期。學齡兒童的保護者負有使學齡兒童自就學之始期至終期就學之義務。

六、修業年限

尋常小學校及公學校的修業年限均為六年。

7) 《台灣總督府府報》3667號(1939年8月24日)。〈待望の義務教育制，愈よ本島で實施，督府に調査委員會設立〉，《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24日。

8) 〈臨時教育調查會の初幹事會開かる，義務教育實施可否次回に決せん〉，《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24日夕刊。

9) 〈台灣の義務教育實施，十八年度頃とならん，諸般の準備に數年かかる〉，《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10月6日。

10) 〈臨時教育調查委員會，委員長一任で原案を可決〉，《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10月18日。

11) 〈義務教育制度實施の，根本問題に異議なし，けふの地方長官打合會〉，《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10月24日夕刊。

12) 〈義務教育制の實施〉，《台灣教育》449號(1939年12月)，頁72。

七、初等教育之刷新改善

隨著義務教育之施行，初等教育之刷新改善，將另設調查機關審議之。¹³⁾

義務教育實施要綱公布後，文教局長島田昌勢到東京向拓務省等官廳說明。實際交涉過程不明，根據事後媒體報導島田的談話，島田表示已取得拓務省諒解。¹⁴⁾

根據這個要綱第七項，台灣總督府於昭和15年(1940年)7月廢止臨時教育調查委員會，改設初等教育制度審議委員會，專職「應台灣總督的諮問，調查審議義務教育制度實施準備事項及其他關於教育重要事項」。¹⁵⁾ 其成員與臨時教育調查委員會有相當的重疊，也是由三田定則及總督府內局長級的官員擔任委員，另外還加上了台北帝大教授伊藤猷典；同時任命了幾位學校關係人為臨時委員，包括：中學校長渡邊節治、師範學校校長藤谷芳太郎、高等女學校校長松井實、師範學校長大浦精一、師範學校教諭折戶傳吉及森田了三、公學校訓導田淳吉、小學校訓導段塚繁壽。其下還有實際負責庶務的幹事及書記，分別由總督府的高等官及敕任官中選任。¹⁶⁾

委員會成立後，總督府向委員會提出二項諮問。第一，「隨義務教育制度實施，關於初等教育制度及內容的刷新改善之具體方案如何」；第二「隨義務教育制度實施，國家及地方團體的財政調整方策之具體意見如何」。¹⁷⁾ 其後由幹事中選定特別委員會，與文教局協議後，草擬了教育制度及內容刷新改善大綱，¹⁸⁾ 也就是第一項諮問案的答申。至於第二項諮問的答申，要遲至2年後的1942年10月才提出。¹⁹⁾

究竟，在台灣實施義務教育制度需要什麼樣的法定程序呢？1941年以後，日本本國義務教育的法律根據是「國民學校令」(昭和16年敕令第148號)中關於「就學」的相關條款，其中規定保護者對於滿6歲到14歲的兒童有使其就學的義務；同時，也規定市町村有設置國民學校的義務。1941年決定在台灣也適用國民學校令時，其法律程序是修改「台灣教育令」，在其中刪除小學校及公學校的相關條文，改為「初等教育依國民學校令」，然後由台灣總督府以府令公布「台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昭和16年府令第47號)，在其中註明「國民學校令」中與義務教育相關的條款不適用。因此，台灣總督府決定要在台灣實施義務教育，在法律程序上，只要修改府令的「台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中原本不適用「國民學校令」的條項即可，並不會牽涉到更上層的法。但是，事實上，台灣總督府在決定這麼重大的事項時，還是要到中央政府說明，尋求諒解，特別是牽涉到多額的國庫補助。

從前引報紙報導，總督府在決定義務教育實施要綱後，總督府的文教局長島田昌勢是先到當時總督府的主管機關拓務省報告，尋求諒解。此時是否作成書面資料不明，目前可見1939到1940年中央政府相關檔案中並沒有發現相關資料，但是《茗荷谷文書》中有一份由台灣總督府作成的「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其中有部分統計數據是1942年10月底的資料，推測這份資料應該1942年年底左

13) 森田俊介，〈臺灣に於ける義務教育制度の將來〉，《台灣時報》245號(1940年2月)，同文也刊載在《台灣教育》455號，1940年5月。

14) 〈義務教育案は，拓務省も諒解，文教局長談〉，《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11月21日夕刊。

15) 「初等教育制度審委員會規程」(訓令79號)，《府報》3932號(1940年7月7日)。後來這個委員會在1943年4月義務教育施行後就廢止，見《台灣總督府官報》304號(1943年4月10日)，訓令82號。

16) 《府報》3933號(1940年7月9日)。

17) 台灣總督府，〈台灣教育令中改正に関する説明資料〉(昭和17年12月)，《茗荷谷文書》R16-413。

18) 〈義務教育に關し，制度と内容の刷新改善，特別委員會で方針決定〉，《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7月23日夕刊。這個特別委員會後來還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建議，即主張台灣也要採行國民學校制度，在總督府內部做成決議，由森田俊介學務課長上京與法制局折衝。見〈台灣初等教育の改正，熟議を重ね答申案成る〉，《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10月8日。

19) 〈義務教育制度實施準備狀況〉，《茗荷谷文書》R16-452。

右完成，於1943年初由總督府官員帶到中央去報告時所準備的資料，或是由台灣總督府準備好，以備拓務省向其他相關官廳說明的文件。總之，這份文件應該可以視為自1939年以來總督府準備施行義務教育的總報告。²⁰⁾

這份說明資料有兩部分，第一部分分為27項，內容包括在台灣施行義務教育的理由、義務教育制度實施準備狀況、實施計畫等的說明，也對財政負擔、國庫補助辦法、學費徵收等問題作了說明(目錄見附表一)；第二部分是義務教育相關的各項統計資料(目錄見附表二)。

其間，總督府與拓務省之間，或是中央官廳之間有什麼樣的交涉過程，以目前可見的資料不明之處仍多。可以確定的是，總督府方面的計畫，最終得到拓務省的諒解，1943年3月23日以府令第45號，公布修訂「台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取消了1941年公布的規則中義務教育不適用的條項。²¹⁾同日，總督發布諭告，宣布在台灣實施義務教育。²²⁾

III. 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的財政問題

前節主要著目於台灣總督府自1939年8月間提出義務教育的提案，到1943年確定實施的行政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當總督府決定在台灣施行義務教育後，在3年的準備期間中，總督府實際上做了些什麼樣的準備工作，特別是總督府如何規畫義務教育所需的財政基礎。

如同總督府在報告書中指出，義務教育實施最大的困難在於迅速增加班級並培養足夠的師資，同時對超齡兒童能有適當的安排，而這二項皆需要龐大的經費。

義務教育能否實施的關鍵之一即在於是否能籌措足夠的經費。早在1921年田健治郎總督剛上任時，提出的義務教育諮問案的答申中，就已經指出，能否施行義務教育的關鍵之一在於地方公共團體的財政是否充足。昭和14(1939)年，這個問題再度浮上檯面時，《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也很早就提出義務教育成否，完全都在財政問題，甚至報導中還指出，如果教員俸給可以由國庫補助的話，那麼昭和16年度以後就有可能實施。²³⁾

總督府方面當然也非常清楚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什麼當委員會作成初步的草案後，總督府要召集地方長官來討論，因為初等教育的經費主要便是來自地方費。在這個討論會中，地方長官最關心的恐怕也是自己的財政要怎麼樣才能應付膨脹的預算，如何才能爭取到更多中央補助款。昭和15(1940)年成立了初等教育制度審議委員會後，總督府方面提出的兩項諮詢案之一就是如何調度義務教育所需的財政問題。這個問題，委員會還研究討論了近2年，於昭和17年才提出答申案，顯然這個問題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台灣日日新報》甚至在社論中提出強硬的主張，認為此時中央政府決無可能補助台灣的義務教育費，而依賴民間的捐款或是改變國庫、地方費的分擔比例也都不是長久之計，而主張應該為了義務教育的實施制定新的正規稅。²⁴⁾類似的主張，其後也一再提出。²⁵⁾

那麼，事實上整體的財政問題如何解決呢？總督府有什麼規畫呢？

從目前可見的資料，並沒有辦法解答總督府基於什麼樣的財政計畫，才能夠做出實施義務教育的

20) 台灣總督府，〈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茗荷谷文書》R16-464。

21) 「台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台灣總督府官報》298號(1943年3月23日)。

22) 「諭告第1號」，《台灣總督府官報》298號(1943年3月23日)。

23) 〈成否は一に財政問題，教員俸給國庫補助に依れば，十六年度以降の實施可能か〉，《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19日。

24) 〈(社説)義務教育に伴ふ地方財政，新財源なしには樂觀できぬ〉，《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6月15日。

25) 〈(社説)義務教育と地方財政の將來，速かに根本的對策を樹てよ〉，《台灣日日新報》1941年1月12日。

決定，只能從1939年之後的相關資料來討論總督府的財政規畫。

1940年總督府委託的初等教育制度審議委員會對總督府關於義務教育財政調整的諮問，他們提出的方案是：昭和18年度由國庫對州廳補助330萬圓，逐年順次增加150萬圓補助，至昭和23年度補助額增為1080萬圓。另外對國民學校教員之臨時家族津貼、臨時津貼、戰時勤勉津貼等，昭和18年度以降所需要額度的二分之一由國庫補助。²⁶⁾而國庫補助金的分配，分成二部分，按各州廳所需分配：(1)補助金的一半依前年度決算各州廳國民學校教員俸給總額為基準分配給各州廳，以備州廳支付教員薪資。(2)國庫補助金的另一半，依該年度四月底各州廳國民學校的班級數比例分配。²⁷⁾也就是說，總督府似乎並沒有增徵新稅或加重稅收的計畫，而期待由國庫補助金來支應。²⁸⁾

前述的〈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基本上就是根據這樣的構想，向上級主管機關提出的報告，相關的統計資料及預算表，都收錄在這份說明資料之後，題為「義務教育關係統計資料(手持用)」，應該是本來準備帶到備詢或報告現場用的文件。²⁹⁾

在1939到1942年3年的準備期間中，從1939年到1942年州廳教育費的預算增加620萬圓左右，市街庄教育費的增加額為500萬圓左右，結果都沒有發生什麼問題；而這三年當中，全島每年約增加800到1000班級，自1943年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到預定完成的1948年度，每年預計增加700-800個班級，比之前的準備期間所需經費更少，總督府根據這樣的計算，估計地方財政在實施義務教育後應不致於發生問題。³⁰⁾

總督府雖然口頭上保證不加重地方的負擔，³¹⁾事實上地方的預算也確實是提高了，但是，我們還是看到此時期擴充教育的重要財源之一，就是來自民眾的捐款。僅就可見的報導，例如1939年台北市希望能在該年度即完成所有學齡兒童皆就學的目標，許丙、郭廷俊、許智貴等人遂發起募款計畫，準備募集五萬圓資金，提供給市當局使用。³²⁾5萬圓約是該年度市費支付的小公學校費總額的15%，算是相當高額の捐款。³³⁾又如新竹州苗栗街自1938年起即依賴祭祀公業、神明會的大額捐款，才能順利新建教室，義務教育實施公布後，希望就學人數激增，苗栗街長與視學、當地二所公學校校長及二校保護者會正副會長商議，決定六年內所需教員薪給及其他一切費用皆由家長及街民負擔。³⁴⁾這些參與協商的人當中，真正有力量動員地方捐款的應該是台灣籍的保護者會正副會長。此時期因應義務教育實施而來的經費需求，不只是地方上個別人士的捐款，也有平均分派當地住民的方法，或是由地方上的公共事業的經費來支應。³⁵⁾

不僅是初等教育階段的擴充，我們也可以看到此時期台灣人對教育的要求比以往更強烈，為了滿足自己的教育需求，也很願意付出代價。1939年12月，宜蘭的頭圍公學校要設置高等科，校舍建築費用

26) 〈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茗荷谷文書》R16-491。〈台灣教育令改正ニ関スル説明資料〉，《茗荷谷文書》R16-413。

27) 〈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茗荷谷文書》R16-492。

28) 這個國庫補助案的規畫與分配原則，很可能是參考日本本國義務教育費國庫補助法的內容，詳細情形有待進一步探討。

29) 〈義務教育關係統計資料(手持用)〉，《茗荷谷文書》R16-499-548。

30) 「義務教育制度實施ニ関スル負擔關係」(R16-490-491)及「義務教育準備期間中ニ於ケル州廳市街庄初等教育費」(R16-533-534)。

31) 〈財政問題は考慮する，義務教育に關し，森岡長官談〉，《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10月25日。

32) 〈寄附金五萬圓を集む，皆入學助長の為〉，《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8月6日。

33) 1939年台北市的小公學校費，由市費支出額總計366985圓。台北市役所，《台北市統計書(昭和十四年)》(台北市：台北市役所，1941年)，頁38-39。

34) 〈就學希望者全部收容，經費一切は父兄が負擔，苗栗街のヒット〉，《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3月18日。

35) 如苗栗街增築教室的經費即來自該街的寺廟神明會、祖公會、祭祀公業等連續三年捐款，〈教室を新築して，學校に寄附，苗栗義民等の美舉〉，《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1月30日，

由庄民捐款一萬圓，尚不足2000圓，保護者會決定由當地頭圍公學校在學兒童一人二圓，附近二圍、大谷兩校兒童一人一圓集資募款。³⁶⁾ 1940年1月，彰化市要設立家政女學校而缺乏經費，經由市會議員商討，決定將寺廟整理委員會的綜合寺廟建設存款捐出一萬圓，另由市民捐款一部分，最後才能設立。³⁷⁾

這些捐款是否實現，從報導中沒有辦法確認，但是可以看到各地教育機關確實明顯擴充。筆者過去曾經研究日本統治初期教育經費的來源，發現日治初期初等教育經費，除了教師薪資以外，幾乎都是由地方民眾以派捐或是自由捐獻的方式籌集。³⁸⁾ 該文只研究到1910年代初期，1920年代以後由於地方制度改正，地方團體成為設立小公學校的主體，初等教育經費的教師薪資及諸項補助，主要由州廳費支出，其他經費則由市街庄負擔。20年代以後的教育財政運作，有待考察，不過，從前引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民眾的教育需求大大的高於國家所提供的教育量，因此，民眾不得不選擇自己額外負擔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教育需求，而國家也因財政困難，樂於或不得不接受，甚至鼓勵這樣的方法。

IV. 準備期間的一地方——新竹地區的例子

作為初等教育機關的設置主體，地方行政最下層的市街庄以及負擔教師薪資及津貼的州廳，其預算編列及經費調度應如何進行；同時，清查管內學齡兒童人數、掌握就學狀況，立定解決方策，也都是市街庄當局及州當局必須多方設想的。我們以台灣北部的新竹市來考察這段期間最接近第一線的地方政府的準備工作以及此時期地方民眾的教育動態。

一. 新竹市的學校、班級增設情形

新竹市在1930年代有4所公學校及1所小學校。市內的日本人學齡兒童就學率幾達百分之百，而台灣人方面的就學情形如附表三所見。義務教育制度公布前後的班級數及學生數統計如下：1936年班級數80，本科學生5080人。³⁹⁾ 在1938年，班級數98，本科學生6125。⁴⁰⁾ 1940年有139個班級，本科學生6289人。⁴¹⁾ 1941年新設1所小學校，又因市區擴張，新納入3所公學校，變成7所公學校，兒童數10512人，就學率70.27%。根據新竹市長在演說中的資料，1940年的就學率為85%，1941年為91%，1942年再增設9個班級，就學率達95%。⁴²⁾ 1943年又新設1所國民學校。⁴³⁾

1939年公布將自1943年起施行義務教育，根據總督府設定的目標，實施第一年的1943年入學率要達到80%，逐年提高，至1948年完成100%的就學率。當時社會上普遍的情形是，雖然總督府所規定的入學年齡是六歲，但六歲那年沒有入學而在七、八歲以後才入學一年級，如此一來自然也會排擠到適齡兒童的入學機會。總督府在決定施行義務教育時，其所設定的就學率是以適齡兒童的就學率計算，

36) 〈校舍建築費を，庄民が寄附，頭圍公に高等科併置〉，《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12月16日。

37) 〈市立家政女の新設は有望，財源は寄附説が有力〉，《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1月28日。

38)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

39) 《新竹州第十六統計書(昭和十一年)》（新竹：新竹州，1938年），頁36-37。

40) 《新竹州第十八統計書(昭和十三年)》（新竹：新竹州，1940年），頁36-37。

41) 《新竹州第二十統計書(昭和十五年)》（新竹：新竹州，1942年），頁42-43。

42) 〈市尹演述〉，《新竹市報》878(1942年3月5日)。此為1942年2月25日第二十回新竹市會中矢野市長演述要旨。

43) 〈國校新設學級增加，新竹市の義教對策成る〉，《台灣日日新報》1942年10月1日。

已經超過入學年齡(六歲)的兒童，則另外設置特設國語講習所收容。1941年總督府甚至通過54萬圓的預算，以在全島設置600餘所三年制的國語講習所，以收容超齡兒童。⁴⁴⁾翌年預算執行的情形不明，至少可見的是新竹市於1940年前後設置了十所特設國語講習所，⁴⁵⁾其後應該也有陸續增設。特設國語講習所與一般國語講習所不同的地方是它是特別設計來收容想進入公學校卻因年齡超過而被拒絕的人，其中課程設計也準據公學校，就學期間為三年。⁴⁶⁾其經費與一般學校經費不同，是屬於社會教育費。⁴⁷⁾新竹市的矢野榮治市長很得意的報告新竹市就學率的成長，即是以六歲的適齡兒童就學率計算。

義務教育制度實施前一年，新竹市調查市內入學適齡兒童數有日本人283名、台灣人2277名，其中98%確定要就學。⁴⁸⁾至翌年確定入學人數時，人數稍有變動，其中日本人全數入學，台灣人確實入學的占93.79%。新竹市役所對此表示非常滿意。⁴⁹⁾

對於激增的班級數，總督府及各州廳都注意到教員不足的問題相當嚴重。總督府於1940年增設屏東、新竹兩所師範學校，第一年僅設一年的講習科，即是希望速成的培養更多教員。新竹州同樣，也為教員的調配頭痛，從1940年起就開始開設數梯次的臨時教員講習會，講習時間三個月，養成後成為代理教員。受講資格為：(1)實業補習學校卒業以上，思想堅實身體強健者；(2)中等學校三年以上半途退學者，思想堅實身體強健者；(3)小公學校高等科卒業者及同等以上學力者，人品學力身體皆優秀者；(4)以上各項年齡滿18，未滿30者歲。⁵⁰⁾州當局雖然認知到「臨時養成結果，自然教員素質低下」，但是也別無他法。⁵¹⁾類似的講習會於之後幾年幾乎每年都有辦理數次，如1942年也募集新竹高女補修科畢業生，接受三個月講習，採用為教員。⁵²⁾補充教員主要有幾個來源，以1943年為例，根據新竹州當局的統計，總共補充250名教師，其中全島按比例分配的師範學校畢業生100名，女學校畢業生70名，總督府主辦講習會修了生50名，州講習會修了生30名。⁵³⁾根據此時期報上的報導，各州廳經常都是在學年度開始前，勉強調度了足夠的教師，才鬆一口氣。而此時期新增設的許多實業補習學校，如新竹有新竹家政女學校，也成為重要的師資來源。

二. 新竹市的教育財政

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以後，以市街庄為小公學校設置主體，其經費來源主要分為兩部分：教師的薪資及津貼由州(廳)費支出，其餘學校費用由市街庄費支付。1930年代後期以降的增設班級及學校，對州費及市街庄費預算應該有相當大的影響。附表四為1939年義務教育要綱實施前後新竹市年度歲出、歲入、教育費支出額及占歲出比例。⁵⁴⁾

從附表四來看，教育費的膨脹比較明顯的是臨時部的營繕、建築費，應該主要是新築校舍的費用。1943年新竹市增設花園國民學校，新設預算就達18萬圓。⁵⁵⁾如附表四所見，在教育急速擴充的這幾

44) 〈全島に六百餘の、特設國語講習所〉，1941年1月8日。

45) 同上。

46) 〈特設國語講習所生徒募集〉，《新竹市報》807(1941年2月3日)。

47) 見《新竹市報》中各年度預算、決算。

48) 〈國校新設學級增加，新竹市の義教對策成る〉，《台灣日日新報》1942年10月1日。

49) 〈就學率劃期的な好成績，新竹市國民學校新年度入學兒童〉，《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1日。

50) 〈臨時教員養成講習會講習員募集〉，《新竹市報》775(1940年10月24日)。

51) 〈教員心得の講習會，公學校高等科卒業生集め〉，《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12月2日夕刊。

52) 〈新竹州短期教員養成講習會始る〉，《台灣日日新報》1942年1月13日。

53) 〈新教育近く配置，新竹州助教員講習會強化〉，《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21日。

54) 由於《新竹市報》並非每期都留存下來，本表僅就可確認的年度整理。

年，教育費大約占全市預算的7-8%，這個數字如何評價，必須放在整個日治時期教育財政來考量，目前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如同前節所見，在教育擴充的過程中，民眾也自願或非自願的透過捐款而參與其中。附表五是新竹地區(新竹州)因教育擴充向地方民眾募款的事例。雖然款項總額與教育費總額比起來還是相當有限，但是也有幾筆相當龐大的捐款募集額，如師範學校、桃園家政女學校、苗栗家政女學校等事例，雖然不能確定是否如期募集到預定數額，但是顯然這些學校最後能夠成立，應該相當程度的依賴民眾對教育的熱心。

三. 地方上的教育要求

1930年代後期以降，地方民眾對教育欲求的表現特別明顯，總督府方面的官方說法都是說民眾受到「支那事變」的刺激，作為皇國臣民的自覺提高，因此對教育的欲求也提高。這當然是總督府的片面之詞，此時的民眾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有更普遍性的教育欲求，確實是饒富趣味的問題。或許有可能確實受到義務教育實施的刺激，也有可能是以往類似的要求沒有受到相應的重視。這種現象不只是新竹如此，全台各地都有類似的例子，此處僅就新竹市的例子討論。

1940年時，新竹市內有4所公學校，分別是新竹第一、第一、第三及住吉公學校，其中僅新竹第一公學校設有高等科；1所小學校(新竹小學校)。1941年以後，因應國民學校改制，上述諸校分別改為新興、北門、新富、高丘、新竹國民學校；同時新設的東山小學校也改為東山國民學校(一號表)，因市區擴大新納入新竹市的三所公學校也分別改為南寮、香山、鹽水國民學校。初等教育以上有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各1所；1940年新設新竹商業學校(實業學校)、新竹家政女學校(實業補習學校，原為私立，1941年改為市立)。此時，新竹市內學齡兒童就學率為72.75%(男89.28/女56.23)。⁵⁶⁾ 1942年新富、香山國民學校新設高等科。1943年又新設花園國民學校。

雖然可以看到市內教育機關的擴充，但是似乎不能滿足當地住民的需求，地方人士紛紛透過各種管道向當局提出擴充教育機關的訴求。1940年起，地方人士對於政府的教育要求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增設公學校(或是增加班級)，二是增設公學校以上的教育機關，包括公學校高等科、實業學校、實業補習學校，還有設置新竹第二中學的要求。顯然，新竹市民對於普及的初等教育及中等以上教育的需求都已經超過市當局提供的程度。

1940年地方人士向新竹市會要求儘速解決新設公學校、高等工業學校等事，聯名請願的委員是包括台灣人及日本人的市議員。⁵⁷⁾ 1942年地方人士組成新竹二中設置期成會，開會討論新設中學校的問題，甚至決議由新竹市及州內各郡捐款分攤70萬圓的工程費，⁵⁸⁾ 可見地方人士的決心。翌年3月好像真的籌集了8萬圓，購置土地，⁵⁹⁾ 但是這個計畫，後來受到挫折。由於戰爭動員的需求，總督府方面更重視培養工業人才、技術人員，因此主導將二中設立計畫的資金，轉為開設工業學校的準備。⁶⁰⁾

由於資料的限制，除了少數的人名留下來，我們無法了解在後面推動擴充教育機關的這些地方人

55) 〈決戰預算を審議，廿五，六の兩日，新竹市市會を招集〉，《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2月18日。

56) 新竹州，《新竹州第二十統計書(昭和15年)》(新竹：新竹州，1942年)，頁40-41。

57) 〈新竹市議の陳情團近く出北〉，《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3月5日。

58) 〈新竹に第二中學新設要望昂る，有力者間で期成會組織〉，《台灣日日新報》1942年4月23日。〈新竹二中設置要望の聲熾烈，設置期成會組織〉，《台灣日日新報》1942年10月27日夕刊。

59) 〈第二中學實現へ，新竹市期成同盟會運動展開〉，《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18日。

60) 〈新竹に工業學校，來年から開校の計畫〉，《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6月12日夕刊。

士，究竟是什麼樣的組成、基於什麼樣的利害關係或理念在從事這些工作，僅能利用有限的資料試圖描繪在戰局緊迫的時期，地方上的人仍然為了子弟的教育爭取更多可能的機會。

V. 結語：兼論殖民地末期教育史研究的課題

本文以《茗荷谷文書》的檔案及報章雜誌的報導為主要材料，藉由義務教育制度施行的討論，嘗試描繪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的教育政策及地方社會的教育事情。本文所討論的義務教育制度也還有許多未盡之處，但是這個問題應該還要和殖民統治末期的其他幾個議題同時討論，才能有比較全面性的了解。

首先是國民學校改制問題。1941年包括殖民地朝鮮、台灣在內，日本全國的初等教育機關全部改為國民學校，這是日本自明治初年實施近代學制以來的大變革。國民學校的改制，當然與日本發動對外戰爭的發展有關，隨著戰爭持久化，日本考慮到未來所需戰力，計畫從初等教育階段開始培養國家未來戰爭所需的人力資源。國民學校不只是名稱的改變，因應教育目的的改變，教授科目也大幅調整，教科書也全部改編。例如將國語、修身、歷史、地理合併為著重國民精神涵養的國民科，體操課也改為更具軍事教練意義的體鍊科等，表現了戰時體制對「少國民」精神及身體的要求。國民學校的改制在日本本國已有相當多的研究累積，不過關於台灣國民學校時期的研究卻很少見，從法制上的改變到實際實施的情形，不明之處尚多，還有待進一步深掘。

第二，中等教育擴充的問題。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普通中等教育以1915年台中中學校成立為嚆始；1919年台灣教育令，有限的開放了中等普通教育機關；1922年新台灣教育令公布之後，增設了許多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並且開放日台共學。其後，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陸續有增設，至1945年時中學校及高女各有22所，其中有許多是1930年代以後增設的學校。除了中等普通教育機關之外，1922年以後也陸續設了許多實業學校及實業補習學校，這些學校也收容了不少想升學的台灣青年。在戰爭時期，實業學校及實業補習學校似乎扮演補充戰時政府所需人力資源的角色，也因此有頻繁的擴充及改制的現象。這些學校在戰後，則多改制為初中或高職。例如台北市有名的金華國中，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台北家政女學校；現在台南的新化高工，其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新化農業補習學校，1934年改為新化農業專修學校；二者在日治時期的學制均屬實業補習學校。根據台灣總督府的統計，至1943年為止，歷年來台灣人自中學校畢業者有近9500人，自高女畢業者有近9800人，自實業學校畢業者有近7300人，自實業補習學校畢業者，男生有近20000人，女生有近4400人。⁶¹ 整體來說，殖民地統治最後幾年，也正好是處於戰爭時期的數年，中等教育有擴充的現象，可推測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台灣人強烈的升學意願，迫使台灣總督府不得不面對問題，另一方面，應該也有政府方面人力資源的考量。此時期中等教育機關的擴充也與戰後的中等教育有密切相關，然而實際的情形不明之處甚多。

第三，社會教育膨脹的問題。自日治時期以來，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兩個不同體系即各司其職。筆者過去的研究多集中在學校教育體系，但是也一直感到兩者無法截然畫分開來，例如公學校老師經常被要求支援社會教育體系的工作。1930年代以後，總督府開始大規模推展社會教化運動，想要將無法由學校控制的青年全部納入教化體系，包括已經從學校畢業的青年及未就學的青年。青年團、國語講習所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組織，此外，在義務教育實施以後，各國民學校也都增設各種教育

61) 水野直樹編，《戰時期殖民地統治資料 第一卷》（東京：柏書房，1998年），頁229。

機關來收容已超過就學年齡的兒童。如何從與學校教育的關連以及整個戰爭時期教育擴充的角度來檢討，也將是未來的課題。

《茗荷谷文書》可以提供一些考察上述統治末期教育問題的資料，同時，在這些審議資料中，有部分資料是拓務省統整各「外地」——包括台灣、朝鮮、樺太等地的教育問題，以備樞密院審議的資料，相信也可以作為未來殖民地教育政策比較研究的基礎。⁶²⁾

62) 朝鮮部分已有一些研究者利用：樋口雄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茗荷谷文書』について〉，《日本植民地研究》14號（2002年）、佐野通夫，〈茗荷谷文書に見る朝鮮植民地末期の教育政策〉，《アジア教育史研究》12號（2003年3月），頁56-72。

附表一 〈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 目錄 R16-464-498

1. 台灣欲施行義務教育之理由
2. 義教實施準備狀況
3. 台灣義教實施計畫
4. 義教實施時期
5. 義教實施地域
6. 義教適用範圍
7. 使兒童就學的義務如何
8. 使兒童就學義務之免除及猶豫
9. 使兒童就學必要的學校設置的義務
10. 市街庄學校組合或街庄學校組合
11. 學齡兒童教育事務的委託
12. 市街庄,市街庄學校組合或街庄學校組合之學校設置義務免除
13. 對內地人也實施六年制之理由
14. 就學義務免除的要件加上保護者貧窮
15. 台灣的國民學校制度(實施義教的場合)與內地制度的相異
16. 內台人共學狀況
17. 國校初等科課實業科的理由
18. 國校初等科修了者之進學狀況及就職狀況
19. 國校高等科修了者之進學狀況及就職狀況
20. 義教實施之負擔關係
21. 義教國庫補助對各州廳的分配方法
22. 隨義教實施,國校授業料應如何
23. 蕃地教育狀況
24. 台灣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狀況
25. 台灣的國民學校的教科用圖書
26. 「行後見人職務者」之規定不適用台灣
27. 對本島人之親權後見制度.

附表二 〈義務教育關係統計資料(手持用)〉 目錄R16-499-548

1. 本島人學齡兒童就學步合
2. 入學適齡兒童就學步合
3. 本島人第一學年入學狀況
4. 自S13-S17本島人第一學年入學狀況
5. 本島人入學適齡兒童入學狀況
6. 州廳別年齡別本島人國民學校第一學年入學者
7. 本島人入學拒否兒童數
8. 國語普及狀況
9. 實業補習學校調
10. 街庄組合立實業補習學校數調
11. S17年十月末日現在未置市街庄區域的學齡兒童為了就學而居住在市街庄兒童數
12. S17.10月末現在他市街庄或未置市街庄地域通學兒童數調
13. 州廳別高砂族人口
14. 州廳立國民學校一覽
15. 教育所,學級,職員兒童數
16. 蕃地高砂族兒童就學步合
17. 內地一學級兒童數
18. 內地昭和13年度尋常小學校卒業後狀況
19. 委託及學校組合調(內地)
20. S17教育費預算調
21. 初等教育國庫補助額調
22. 昭和十七年度初等教育費國庫補助調
23. 公立國民學校經費調(國庫,地方團體經費)
24. 義教實施件,國庫補助分配辦法
25. S15,16,17年度各廳教員俸給預算單價調
26. 義教準備期間,州廳市街庄初等教育費預算增加調
27. 昭和16年度特設國語講習所在學者年齡別調

附表三 新竹市學齡兒童統計(1936-1940)

年	學齡兒童 總數(男/女)	就學者			不就學者			已達就學始 期者中百人 就學率
		已達就學始 齡兒童數 (男/女)	已修習公學 校教科者	修畢公學校 教科者	不就學者 總數	尚未修習公 學校教科者	公學校半 途退學者	
1936	8965 (4505/4460)	5201 (3291/1910)	4484 (2853/1631)	717 (438/279)	3764 (1214/2550)	3579 (1107/2472)	185 (107/78)	58.01 (73.05/42.83)
1938	10133 (5133/5000)	6557 (4954/2503)	5344 (3290/2054)	1213 (764/449)	3576 (1079/2497)	3312 (920/2392)	264 (159/105)	64.52 (78.98/50.06)
1940	14492 (9385/5107)	11251 (8379/2872)	6330 (3782/2548)	4921 (4597/324)	3241 (1006/2235)	3128 (941/2187)	113 (65/48)	72.75 (89.28/56.23)

資料出處：各年度《新竹市統計書》。

附表四 新竹市初等教育經費額度及占總歲出比例(1937-1942)

年度 決算	歲入總額 經常部 臨時部 (單位：圓)	歲出總額 經常部 臨時部 (單位：圓)	教育費支出 經常部 (單位：圓)	教育費支出 臨時部 (單位：圓)	教育費支出 占歲出 總額比	出處《新竹 市報》號 日期
1937 決算	1422142.44 543422.66 858719.78	1323110.41 361516.31 836918.24	小學校費 6323.80 公學校費 21428.77 學事諸費 6756.11	小學營繕費 13108.96 公學營繕費 65434.77	8.5%	611 1938.12.3
1940 決算	1982042.36 880653.42 1101388.94	1450452.90 569359.82 826476.38	小學校費 6701.51 公學校費 24776.09 學事諸費 14071.28	小學營繕費 / 建築費 120896 公學建築費 40474	6.8%	851 1941.11.8
1942 決算	2564834.35 1601484.53 963349.82	2049157.95 924459.22 697085.90	國民學校費 39624.40 學事諸費 25983.81	國民學校營繕 / 建築費 102547.79 國民學校充實費 4381.94	8.4%	961 1943.12.6

附表五 新竹地區教育相關捐款事例(1937-1943)

目 的	方 法	金額	出處 《新竹州報》
宋屋公學校教育敕語奉安金庫購入費	保護者各一圓範圍內	300	1170號 1937.5.28
新竹一公新校地整理費及收音機體操施設費	新竹一公保護者任意寄附	400	1211 1937.10.12
師範學校敷地買收費	有志任意寄附	13500	1453 1940.3.20
伯公岡公學校分教場設置費及敷地買收費	有志任意寄附	5000	1466 1940.4.19
外埔公學校大山分教場設置費	任意寄附	4000	1468 1940.4.27
獅潭及八角林公學校校舍新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2000	1468 1940.4.27
橫山庄國語講習所費	有志任意寄附	2400	1475 1940.5.19
白沙屯分離教室設置費	任意寄附	5000	1484 1940.6.20
尖山公學級臨時增加費	有志任意寄附	600	1502 1940.8.7
大溪公校舍一教室新築及諸設備費	有志任意寄附	3700	1505 1940.8.13
香山公校舍增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3500	1508 1940.8.20
舊港公分離教室建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2650	1511 1940.8.29
六家公教室增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4350	1520 1940.9.24
坪頂公校舍增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2500	1530 1940.10.12
富興公敷地買收費	有志任意寄附	1300	1567 1940.12.26
頭屋公走廊其他改修費	有志任意寄附	900	1592 1941.2.23
新坡公分離教室敷地買收費	有志任意寄附	3400	1621 1941.4.23
桃園家政女設立費	有志任意寄附	216000	1626 1941.5.4
高丘國校校地擴張費	有志任意寄附	5000	1643 1941.7.10
苗栗家政女設立費	有志任意寄附	185671	1657 1941.8.20
四湖及五湖國校教室建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5000	1664 1941.9.19
苑裡庄特設國講所新設費	有志任意寄附	6890	1682 1941.11.2
公司寮國崎頂分設置費	有志任意寄附	4000	1879 1943.8.22

일본식민통치 말기 대만의 교육정책

- 의무교육제도 시행을 중심으로 -

許 佩 賢 ([台灣]新竹教育大學校)

〈목 차〉

- I. 머리말
- II. 1943년 의무교육 시행의 정책결정 과정
- II. 의무교육제도 시행의 재정 문제
- III. 준비 기간 중의 한 지방—신주(新竹) 지역을 예로
 - 1. 신주시의 학교·학급 증설 상황
 - 2. 신주시의 교육 재정
 - 3. 지방에서의 교육 요구
- IV. 맺음말—식민지말기 교육사연구의 과제를 함께 논하며

I. 머리말

대만은 일본의 식민통치가 끝나기 얼마 전인 1943년, 전쟁이라는 긴박한 정세 속에서 마침내 의무교육제도를 시행하게 된다. 필자는 일전에 「전쟁과 의무교육의 실시(戰爭與義務教育的實施)」¹⁾ 라는 논문에서 1943년 의무교육제도의 시행을 중심으로 일본통치 시기 대만에서의 교육법제의 수립에 대해 논한 바 있다. 그 논문에서는 주로 법규, 유고 및 신문·잡지를 주요 사료로 삼아 의무교육과 전쟁동원의 관계를 지적했지만 정책결정 과정이나 실행 과정에 내포된 여러 문제들까지는 깊이 논하지 못했다. 의무교육제도가 대만에서 시행되게 된 정책결정 과정, 1939년 실시가 결정된 이후 매년 초등교육기관을 확충하고 교사 육성기관을 증설하는 과정, 더 나아가 대만 사회의 일반 민중과 아동의 제도개혁에 대한 대응 상황은 앞으로 해명되어야 할 과제들로 남아있다.

기존의 대만교육사 연구 가운데 1930년대 후반 이후를 대상으로 한 연구는 상대적으로 적은 편이고, 있다 해도 대부분 교과서 내용 분석에 집중되어 있다. 이 시기의 교육사 연구에 이런 많은 공백이 존재하는 주된 원인은 바로 사료 문제에서 연유한다. 교육사 연구자들이 활용하는 자료 중에 총독부의 40년래 교육 시정보고서에 해당되는 『臺灣教育沿革誌』(1939년)가 있지만 그마저도 1937년까지만 기록되어 있다. 총독부 당안 역시 1930년대 이후 자료는 매우 적을 뿐더러 많은 자료들이 전쟁 기간이나 전후에 산실되었다.

2001년 10월, 일본 외무성 외교사료관은 『茗荷谷研修所舊藏記錄』(이하에서는 『茗荷谷文書』로 약칭)을 공개했는데, 그 주된 내용은 外務省·興亞院·大東亞省의 중국·만주에서의

1) 許佩賢, 『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 台北: 遠流出版社, 2005年.

경제 활동에 관한 문서 및 拓務省·內務省이 관할한 식민지 행정문서 등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그 중의 한 꼭지가 교육관련 사료로, 식민지 말기 조선·대만의 교육정책 자료를 포함하고 있다. 이 자료가 특별한 것은, 첫째, 대상 시기가 대부분 1930년대 후반에서 1940년대까지에 집중되어 있고 상당 부분이 1940년대의 자료들이라는 점, 둘째, 총독부가 일본 중앙 관청에 낸 보고서가 많다는 점이다. 후에 유마니서방에서 그 중 일부분을 마이크로필름과 출판목록으로 만들었는데,²⁾ 거기에는 여러 차례의 대만교육령 개정 시 대만총독부가 준비한 심의자료와 1940년대의 교육상황에 대한 조사 자료들이 수록되어 있다. 이 문서의 성격 자체가 심의 준비를 위한 자료이고 대만총독부가 상급 기관에 보여주려고 작성한 보고서에 해당하기 때문에 총독부 내부의 토론 과정이 나타나 있지는 않다. 하지만 자료가 작성된 시간으로 보면 일본통치 후기의 상황을 이해하는 데 상당히 진귀한 자료가 됨은 물론이다. 본문에서는 바로 이 자료를 중심으로 총독부가 의무교육정책을 제정하고 시행하려던 과정을 해명해 보고자 한다. 자료가 갖는 성격의 한계로 인해 이것을 통해 파악할 수 있는 것은 총독부 토론 후의 결과로, 총독부 내부의 논의 과정에 관해서는 당시 신문보도의 기사에 의존해 제한적이거나 그 내용을 파악해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한편, 의무교육의 시행은 행정 방면에서 최대의 초등교육기관 설립 주체였던 市街庄 계급에 영향을 주었다는 점에서, 본고에서는 이 당시 의무교육의 시행을 맞아 지방 기층사회의 교육시설 상황과 지방 민중들의 대응은 어떠했는지 살펴보고자 한다.

II. 1943년 의무교육 시행의 정책결정 과정

대만총독부가 1943년부터 대만에서 6년의 의무교육제를 시행한다고 결정했던 것은 1939년의 일이었다. 그 이전에도 대만에서 의무교육을 시행하자는 의제가 이미 여러 차례 제기되었지만 모두 실현되지는 않았다. 총독부의 관련 관리들은 의무교육 시행의 경위에 대해 통상 다음과 같이 정리했다. 처음으로는, 明治 36년(1903년) 제1회 學事諮問會에서 당시 고토 신페이(後藤新平) 민정장관이 전 대만섬의 小·公學校長 및 각 廳의 학사주임 57명을 소집하여 학사자문회를 열었을 때였다. 이 회의에서 제출된 답신에 “本島 주민에게 국어를 철저히 보급하고, 그 국민성을 함양하여 전 대만섬 통치의 토대로 삼는다. 그러므로 되도록 빨리 초등교육의무제를 시행하여 그 취학을 강제하고 동화의 근본 방침을 확립하는 일이 가장 긴급하다.” 고 말한 것이다. 그 다음으로는, 明治 37년(1904년) 학무과장 키무라 교(木村匡)가 教育會 常集會에서 되도록 빨리 초등교육의무제를 실시하자는 의견을 발표했던 일이다. 大正 10년(1921년) 6월, 총독부는 평의회에 의무교육 시행 시기 및 방법에 관한 자문안을 제출한 후 위원회에 토론을 회부했고, 1922년 제3회 평의회에서 답신이 제출되었다. 답신안에는, 언젠가 의무교육을 시행해야 한다는 것에는 기본적으로 동의하지만, 지방

2) 廣瀬順昭編, 『茗荷谷研究所舊藏記録 戦中期植民地行政史料總目録 教育・文化・宗教篇』, 東京: ゆまに書房, 2003년. 『茗荷谷文書』에 대한 소개는 熊本史雄, 「外交史料館所蔵『茗荷谷研修所旧蔵記録』の構造とその資料的位置—拓務省関係文書中心に—」, 『外交史料館報』16號, 2002년, 82~109쪽을 참고할 수 있다.

단체의 재정 문제를 고려할 때 즉시 실시할 수는 없는 상태이며, 만약 지방 단체의 부담 능력이 일정한 정도에 도달하게 되면 시가장이 주지사나 청장에게 제출하고 대만총독부로부터 인가받을 수 있을 것³⁾이라고 적고 있다.

이러한 회고에서 총독부 관리가 강조하고자 했던 것은, 총독부 측은 물론 이 과제에 대해 관심을 기울였으나 오래도록 재정 곤란과 대만인의 향학심 부족으로 실행에 부치지 못했다라는 것이다. 민중의 향학심 부족은 총독부가 의무교육의 시행을 거절하기 위해 내세운 핑계에 불과했고, 가장 근본적인 원인은 아마도 재정 문제에 있었을 것이다. 필자가 이전 논문에서 지적한 것처럼, 대만총독부가 자금이 필요했던 전쟁 시기에 의무교육 시행을 결정했던 것은 분명 일본의 전쟁동원과 관련이 있었음을 예측할 수 있다. 총독부 내부 자료에도 의무교육제도 시행의 배경 중 하나가 조만간 대만에서 징병제를 실시하는 데 있었음이 드러나 있다.⁴⁾ 이하에서는 현재 파악 가능한 자료들을 통해 총독부의 의무교육 시행의 결정과정 상황들을 그려보자.

총독부 내부 당안이 부족한 상태이기 때문에, 당시 의무교육 실시의 정책결정 과정을 살펴볼 수 있는 자료로 이 문제를 가장 처음 제기했던 1939년 8월 19일 『臺灣日日新報』의 기사를 참고할 수 있다. 이 신문 기사는 최근 대만총독부 평의회 의 간담회에서 어떤 내지인 회원이 의무교육 시행에 관해 적극적인 의견을 제출했다고 보도했다. 또한 총독부 측은 작년 4월부터 학무과에 새로운 과와 전임 사무관을 설치해 관련 조사에 착수하기 시작했다고 언급했다.⁵⁾ 이로부터 총독부 내부에서 이러한 안건이 제출된 것이 1938년 초의 시점이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이후의 조사 지시 및 과정상의 상세한 내용들에 대해서는 알 수 없지만, 『臺灣日日新報』의 1939년 전반기 기사를 보면 각 州에서 의무교육 준비를 위해 기본조사를 하고 있다는 관련 보도가 자주 실렸음을 알 수 있다.⁶⁾ 같은 해 8월 23일, 대만총독부는 임시교육조사위원회 설치를 명문화하여 공포하고 의무교육 실시 문제를 전문적으로 조사하게 했다.

이 임시교육조사위원회의 구성은 다음과 같다.

委員	台大總長 三田定則, 殖產局長 田端幸三郎, 交通局長 泊武治, 專賣局長 今川淵, 警務局長 二見直二, 內務局長 山縣三郎, 文教局長 島田昌勢, 府事務官 山本眞平, 財務局長 中島一郎
幹事	府事務官 木原圓次・須田一二三・鈴木秀夫・廣谷致員・細井英夫, 視學官 波多野清太郎・石井權三, 編修官 加藤春城, 府事務官 高橋衛・慶谷隆夫・鈴木信太郎・鹽見俊二・鈴木斗人・大山綱隆, 府理事官 佐藤武・南出隆 ⁷⁾

이 구성에서 보면, 명의만 내걸었던 사다노리 미타(三田定則)를 제외하면 다른 사람들은

3) 森田俊介, 「臺灣に於ける義務教育制度の將來」, 『台灣時報』 245號, 1940年 2月, 8~10쪽. 같은 글이 『台灣教育』 455號, 1940年 5월에도 실려 있다.

4) 「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 『茗荷谷文書』 R16-473.

5) 「本格的な調査へ, 臨時教育調査委員會を設置」, 『台灣日日新報』 1939年8月19日 夕刊.

6) 「義務教育に備へて, 就學率を調査, 現在の狀態では前途遠慮」, 『台灣日日新報』 1939年5月29日; 「今から來春入學の, 學齡兒童を募集, 新竹市教育課の學童基本調査」, 『台灣日日新報』 1939年5月31日; 「苗栗街の學齡兒調査」, 1939年6月14日; 「公學校入學者は飛躍的の向上率」, 1939年7月5日夕刊 등.

7) 『台灣總督府府報』 3667號, 1939年8月24日. 「待望の義務教育制, 愈よ本島で實施, 督府に調査委員會設立」, 『台灣日日新報』 1939年8月24日.

모두 총독부의 관리로, 총무장관과 국장급의 인물들이 위원을 맡았고, 실제 토론과 초안 입안은 간사들이 책임졌다. 제1차 간사회가 다음 날에 열렸고,⁸⁾ 그 후에도 수차례 회의가 열려, 10월 5일에는 마침내 제안서가 제출되고 위원회에 회부할 토론을 준비했다. 간사회가 만든 기초안에는 의무교육 실시의 전제가 대량의 교원의 양성 및 超齡 아동(6세를 초과하였으나 아직 입학하지 않은 자)의 처리이며, 이 두 가지 문제를 해결하려면 몇 년의 시간이 필요하기 이유로 昭和 18년부터 실시해야 한다고 언급했다.⁹⁾ 그 후 이 기초안은 위원회에서 겨우 몇 군데 문구만 수정한 채 거의 원안대로 통과되었는데,¹⁰⁾ 이는 시행의 세부 사정을 실제로 결정한 것이 총독부의 사무관들이었음을 의미한다. 그 후 총독부는 10월 24일 지방장관 의견교환 모임을 소집하고 이 사안을 토론헤 했다. 기사에 따르면, 지방장관은 별다른 이견 없이 동의했다고 한다.¹¹⁾ 이렇게 지방장관의 의견을 필요로 했던 것은 의무교육 실시를 위해서는 상당한 재정적 기초가 필요했고, 특히나 지방 단체의 재정이 충분한지의 여부가 일의 성패를 결정하는 중요한 관건 중의 하나였기 때문이다.

총독부는 지방장관 의견교환회를 거친 후 10월 26일에 이 안을 제9회 총독부 평의회로 넘겼다. 이때 출석한 평의위원은 26명(전체 평의원은 29명)이었는데, 오우미 토키고로(近江時五郎), 허춘처(河村徹), 쉬빙(許丙), 야마다 쇼우키치(山田尚吉), 장네성(張泉生), 황신(黃欣), 나카무라 이치조우(中村一造) 등 7명을 답신서작성위원회 위원으로 임명하고, 보고서 작성과 토론을 진행한 후에 만장일치로 통과시켰다.¹²⁾ 총독부는 마침내 실시 요강을 공포했는데, 그 내용은 아래와 같다.

1. 목표 : 초등교육은 바로 皇運을 扶翼하는 국민의 기초 자질을 단련시키므로 그것을 의무제로 삼는다.
2. 시행 시기 : 昭和 18년부터 의무교육을 실시하고, 동년 이후 취학 시기에 도달하는 아동은 그 취학에 의무제를 적용한다.
3. 의무교육제도의 적용 범위 : 보통행정구역 내의 모든 内地人·本島人·高砂族의 학령 아동은 모두 의무교육을 행한다.
4. 학령 : 아동이 만 6세가 된 다음 날부터 만 14세 사이의 8년이 학령이 된다.
5. 취학 의무 : 학령 아동이 학령에 도달한 날 이후 최초 학년이 시작될 때가 취학의 始期가 되고, 尋常小學校나 公學校의 교과서를 마치면 취학의 終期가 된다. 학령 아동의 보호자는 학령 아동으로 하여금 취학의 始期에서 終期까지 취학하게 할 의무를 진다.
6. 수업 연한 : 尋常小學校와 公學校의 수업 연한은 모두 6년이다.
7. 초등교육의 쇄신 개선 : 의무교육의 시행에 따라 초등교육의 쇄신 개선은 별도로 조사기관을 설치해 그것을 심의한다.¹³⁾

8) 「臨時教育調査會の初幹事會開かる, 義務教育實施可否次回に決せん」, 『台灣日日新報』 1939년 8월 24일 夕刊.

9) 「台灣の義務教育實施, 十八年度頃とならん, 諸般の準備に數年かかる」, 『台灣日日新報』 1939년 10월 6일.

10) 「臨時教育調査委員會, 委員長一任で原案を可決」, 『台灣日日新報』 1939년 10월 18일.

11) 「義務教育制度實施の, 根本問題に異議なし, けふの地方長官打合會」, 『台灣日日新報』 1939년 10월 24일 夕刊.

12) 「義務教育制の實施」, 『台灣教育』 449號, 1939년 12월, 72쪽.

13) 森田俊介, 「臺灣に於ける義務教育制度の將來」, 『台灣時報』 245號, 1940년 2월, 같은 글이 『台灣教育』 455號, 1940년 5월에도 실려 있다.

의무교육 시행요강이 공포된 후 문교국장 시마다 쇼우세이(島田昌勢)는 도쿄에 가서 拓務省 등의 관청에 설명을 했다. 실제 교섭 과정은 알 수 없으나 사후에 시마다의 담화를 보도한 신문기사의 내용을 보면 시마다가 이미 척무성의 양해를 얻었다고 명시되어있다.¹⁴⁾

대만총독부는 요강 제7항에 근거해 昭和 15년(1940년) 7월, 임시교육조사위원회를 폐지하고 초등교육제도심의위원회를 개설해, “대만총독의 자문에 응하고 의무교육제도 실시 준비 사항 및 교육에 관한 다른 중요 사항들을 조사, 심의” 하는 일을 전담시켰다.¹⁵⁾ 초등교육제도심의위원회의 구성원은 임시교육조사위원회와 상당히 중첩되는데, 사다노리 미타와 총독부 내의 국장급 관리들이 위원직을 맡았고, 그밖에 타이베이제국대학 교수 이토 유우텐(伊藤猷典)을 추가시켰다. 또한 학교 관련 인물 몇 명을 임시위원으로 임명하였는데, 그 가운데 중학교장 와타나베 세쓰지(渡邊節治), 사범학교 교장 후지타니 요시타로오(藤谷芳太郎), 고등여학교 교장 마쓰이 미노루(松井實), 사범학교장 오오우라 세이이치(大浦精一), 사범학교 교유 오리토 덴키치(折戸傳吉)와 모리타 료우조우(森田了三), 공학교 훈도 덴 준키치(田淳吉), 소학교 훈도 단즈카 한쥬(段塚繁壽)가 포함되었다. 그 아래에 실질적인 서무를 책임지는 간사와 서기를 두었는데, 각각 총독부의 고등관과 직임관 중에서 선임했다.¹⁶⁾

위원회 성립 후 총독부는 위원회에 두 가지 항목의 자문을 구했다. 하나는 “의무교육제도의 실시에 따른 초등교육제도 및 내용의 쇄신 개선에 관한 구체적인 방안은 무엇인가” 이고, 두 번째는 “의무교육제도 실시에 따라 국가 및 지방단체의 재정 조정 방책에 대한 구체적인 의견은 무엇인가”¹⁷⁾였다. 그 후 간사 중에서 특별위원회를 선정하고 문교국과 협의한 후 교육제도 및 내용의 쇄신개선요강을 초안한 것이¹⁸⁾ 바로 첫 번째 자문안에 대한 답신에 해당했다. 두 번째 자문의 답신은 2년 후인 1942년 10월에서야 비로소 제출된다.¹⁹⁾

대만에 의무교육제도를 시행하는 데 있어 도대체 어떠한 법률 규정 절차가 필요했던 것일까? 1941년 이후 일본 본국의 의무교육에서의 법률 근거는 ‘國民學校令’ (昭和 16년 勅令第148호) 중 ‘취학’ 관련 조항을 따랐다. 그 내용 중에는 보호자가 만6세에서 14세까지의 아동을 취학시킬 의무를 갖고 있고, 市町村은 국민학교를 설치할 의무가 있음이 규정되어있다. 1941년에 대만에도 국민학교령을 적용한다고 결정했을 때 그 법률의 절차는 다음과 같았다. 먼저 ‘臺灣教育令’ 을 개정하고 그중에서 소학교 및 공학교의 관련 조문을 삭제하여 ‘初等教育依國民學校令’ 으로 고쳤다. 그런 다음 대만총독부가 府令으로 ‘臺灣立法國民學校規則’ (昭和 16년 府令 제47호)을 공포하고 그중 ‘國民學校令’ 중에서 의무교육과 관련되는 조항이 적용되지 않는 것에 상세히 주를 달아놓았다. 그리하여 대만총독부는 대만에서 의무교육을 실시하려면 법률 절차상 부령인 ‘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 중에서 원본이 ‘國民學校

14) 「義務教育案は、拓務省も諒解、文教局長談」, 『台灣日日新報』 1939年11月21日 夕刊.

15) 「初等教育制度審委員會規程」(訓令79號), 『府報』3932號, 1940年7月7日. 후에 이 위원회는 1943년 4월 의무교육 시행 후 폐지되었다. 『台灣總督府官報』 304號, 1943年4月10日, 訓令82號를 보라.

16) 『府報』 3933號 (1940年7月9日).

17) 「台灣教育令中改正に関する説明資料」(昭和17年12月), 『茗荷谷文書』 R16-413.

18) 「義務教育に關し、制度と内容の刷新改善、特別委員會で方針決定」, 『台灣日日新報』 1940年7月23日 夕刊. 이 특별위원회는 이후에도 대만도 국민학교제도를 채택해 시행해야 한다고 하는 중요한 건의를 했는데, 총독부 내부에서 결의되어 모리타 순스케(森田俊介) 학무과장이 상경하여 法制局과 절충을 벌였다. 「台灣初等教育の改正、熟議を重ね答申案成る」, 『台灣日日新報』 1940年10月8日을 보라.

19) 「義務教育制度實施準備狀況」, 『茗荷谷文書』 R16-452.

습'에 적용되지 않는 조항을 고치기만 하면 가하다고 결정하고 상층의 법에 영향을 받지 않도록 했다. 하지만 사실상 대만총독부는 이러한 중대한 사항을 결정할 때 여전히 중앙정부에 사안을 설명하고 양해를 구해야 했고, 특히나 이것은 많은 액수의 국고 보조와 관련되어 있는 일이었다.

앞서 인용한 신문 기사에 따르면, 총독부가 의무교육 실시요강을 결정한 후 총독부의 문교국장 시마다 쇼우세이가 먼저 당시 총독부의 주관 기관인 척무성에 가 보고를 하고 양해를 구했다고 한다. 이때 서면자료를 작성했는지 여부는 알 수 없는데, 현재로는 1939~1940년까지 중앙정부 관련 당안 중에서는 관련 자료가 발견되지 않았음을 알 수 있다. 하지만 『茗荷谷文書』 중에 대만총독부에서 작성한 「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가 있어 이해에 도움을 준다. 그중 부분 통계 데이터가 있는 것이 1942년 10월 말의 자료이다. 이 자료는 1942년 연말쯤 완성된 것으로, 1943년 초에 총독부 관리가 중앙에 보고하려고 준비했던 자료이거나 대만총독부로부터 준비되어져 척무성이 기타 관련 관청에 설명하기 위해 구비되었던 문서라고 추측된다. 요컨대, 이 문건은 1939년 이래로 대만총독부가 의무교육시행을 위해 준비했던 총 보고서라고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²⁰⁾

이 설명 자료는 두 부분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제1부는 27항으로 나누어져, 대만에서 의무교육을 시행하는 이유, 의무교육제도 시행 준비상황, 시행 계획 등의 설명을 포함하고 있고, 재정 부담, 국고 보조 방법, 학비 징수 등 문제에 대해서도 설명하고 있다.(표 1 참고) 두 번째 부분은 의무교육과 관련된 각종 통계자료가 수록되어 있다.(표 2)

그 사이 총독부와 척무성 간에 혹은 중앙관청 간에 어떤 교섭 과정이 있었는지는 알기 어렵다. 현재, 자료를 통해 확인할 수 있는 것은 총독부 측의 계획이 최종적으로 척무성의 양해를 얻었고, 1943년 3월 23일 부령 제25호로 「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을 수정, 공포하였으며, 1941년 공포된 규칙 중 의무교육이 적용되지 않는 조항을 삭제했다는 것이다.²¹⁾ 같은 날, 총독은 유고를 발표하여 대만에서의 의무교육 실시를 선포했다.²²⁾

II. 의무교육제도 시행의 재정 문제

앞 장에서는 주로 대만총독부가 1939년 8월 의무교육에 관한 제안을 제출한 때로부터 1943년 시행을 확정할 때까지의 행정과정에 주목하였다. 이 과정에서 가장 주목할 만한 부분은 총독부가 대만에서의 의무교육 시행을 결정한 후 3년의 준비 기간 동안 실제 어떤 준비 작업을 했고, 특히 의무교육에 필요한 재정 기초를 어떻게 계획했는가 하는 것이다.

총독부가 보고서에서 언급한 것처럼, 의무교육 시행에 있어서의 가장 큰 어려움은 어떻게 신속하게 학급을 늘리고 충분한 교사를 육성할 것인가와 초령 아동을 어떻게 적절히 안배할 것인가에 있었는데, 이 두 가지 사안은 모두 엄청난 경비를 필요로 했다.

20) 台灣總督府, 「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 『茗荷谷文書』 R16-464.

21) 「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 『台灣總督府官報』 298號, 1943년3월23日.

22) 「諭告第1號」, 『台灣總督府官報』 298號, 1943년3월23日.

의무교육의 실시 여부를 결정하는 관건 중의 하나는 바로 의무교육에 필요한 경비를 어떻게 조달할 수 있는가에 달려있었다. 이것은 일찍이 1921년에 덴 겐지로(田健治郎) 총독이 막 부임했을 때 제출한 의무교육 자문안의 답신에서 의무교육제도를 시행할 수 있느냐 없느냐의 관건 중 하나가 지방 공공 단체의 재정이 충분한가 여부라고 답했던 바로 그 내용이었다. 昭和 14년(1939년)에 이 문제가 다시 무대 위로 부상했을 때 『臺灣日日新報』의 기자 역시 의무교육의 성패 여부는 전적으로 재정 문제에 달려있다고 지적하고, 심지어 만약 교원의 급여가 국고 보조에서 지원될 수 있다면 昭和 16년 이후에는 의무교육을 실시할 수 있을 것이라고 논하기도 했다.²³⁾

총독부 측도 당연히 이 문제를 명확히 인식했는데, 이는 왜 위원회가 초보적인 초안을 작성한 후에 총독부가 지방장관들을 소집해 논의하게 했던가와 관련된 일이었다. 왜냐하면 초등교육의 경비가 주로 지방비에서 나왔기 때문이다. 토론회의 와중에 지방장관들이 가장 관심을 둔 것은 아마도 어떻게 해야 팽창하는 예산에 지방 재정이 대처할 수 있을까, 어떻게 더 많은 중앙의 보조금을 얻을 수 있을까 하는 문제였을 것이다. 昭和 15년(1940년) 초 등교육제도 심의위원회가 성립된 후 총독부 측이 제출한 두 항목의 자문안 중의 하나는 바로 어떻게 의무교육에 필요한 재정문제를 관리하고 배치할 것인가였다. 이 문제에 대해 위원회는 이미 2년간을 연구하고 토론한 후에야 昭和 17년에 비로소 답신안을 제출할 수 있었는데, 이는 의무교육 시행에 있어서 재정 문제가 결코 해결하기 쉽지 않은 난제였음을 확연히 보여준다. 『臺灣日日新報』는 심지어 사실에 강경한 어조로, 지금 중앙정부가 대만의 의무교육비를 보조할 수 없는 상태에서 그 비용을 민간의 기부금이나 국고·지방비의 분담 비율을 변경하는 것에 의존하려는 것은 장기적인 계획이 아니며, 의무교육의 실시를 위해서는 새로운 정규세를 제정해야 한다고 주장했다.²⁴⁾ 이와 유사한 주장이 그 후에도 재차 제기되었다.²⁵⁾

그렇다면 사실상 의무교육제도의 시행을 위해 필요했던 총체적인 재정문제는 어떻게 해결되었는가? 총독부는 어떤 계획을 가지고 있었는가?

지금 확인할 수 있는 자료로는 총독부가 어떤 재정 계획을 세우고 있었는지에 답할 수 없다. 다만 가까스로 의무교육을 실시한다는 결정을 내릴 수 있었다는 것과 1939년 이후의 관련 자료를 통해 총독부의 재정 계획을 논할 수 있을 뿐이다.

1940년 총독부가 위탁한 초등교육제도심의위원회는 총독부의 의무교육 재정의 조정에 관한 자문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은 방안을 제시했다. 즉, 昭和 18년 국고에서 州廳에 330만원을 보조해 주고, 해마다 순차적으로 150만원의 보조금을 증액하여, 昭和 23년까지 보조액을 1,080만원으로 증가시킨다. 그 밖에, 초등학교 교원에 대한 임시 가족수당, 임시 수당, 전시 근면수당 등은 昭和 18년 이후 필요한 액수의 2분의 1을 국고에서 보조한다.²⁶⁾ 국고 보조금의 분배는 두 부분으로 나뉜다. 즉, 각 주청의 필요에 따라 분배하는데, ① 보조금의 반

23) 「成否は一に財政問題, 教員俸給國庫補助に依れば, 十六年度以降の實施可能か」, 『臺灣日日新報』 1939년 8월 19일.

24) 「(社説)義務教育に伴ふ地方財政, 新財源なしには樂觀できぬ」, 『臺灣日日新報』 1940년 6월 15일

25) 「(社説)義務教育と地方財政の將來, 速かに根本的對策を樹てよ」, 『臺灣日日新報』 1941년 1월 12일

26) 「義務教育關係説明資料」, 『茗荷谷文書』 R16-491. 「台灣教育令改正ニ関スル説明資料」, 『茗荷谷文書』 R16-413.

은 전년도 각 주청의 초등학교 교원 급여 총액을 기준으로 한 결산에 의거해 각 주청에 분배하여 주청이 교원의 급여를 지불하는 것을 대비하게 한다. ② 국고 보조금의 나머지 반은, 그 해 4월 말에 각 주청에 있는 초등학교의 학급 수 비율에 따라 분배한다.²⁷⁾ 다시 말해, 총독부는 새로운 세금을 만들어 추가 징수하거나 세수를 가중시키려는 계획이 없었고, 의무교육 재정을 국고 보조금에서 처리하려고 했던 듯하다.²⁸⁾

전술한 「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는 기본적으로 이러한 구상에 근거해 있다. 상급의 주관 기관에 제출된 보고, 관련 통계자료 및 예산표가 「義務教育關係統計資料(手持用)」라는 제목으로 이 설명 자료 뒤에 수록되어 있는데, 이는 분명 자문에 대비하기 위해서였거나 현장 보고용 문건으로 준비되어 만들어진 것일 것이다.²⁹⁾

1939년~1942년 3월까지의 준비 기간 중에 1939년~1942년까지의 주청의 교육비 예산은 620만 원 정도가 증가했고, 시가장의 교육비 증가액은 500만 원 가량이었는데, 결과적으로는 어떤 문제도 발생하지 않았다. 이 3년 동안, 전 대만섬에는 매년 대략 800~1000개의 학급이 증가했다. 그리고 1943년 의무교육이 실시된 때로부터 완성 예정 시점이었던 1948년도까지 매년 700~800개 학급이 증가할 것으로 전망되었다. 이는 이전의 준비 기간에 필요했던 경비에 비해 더욱 적은 규모였기 때문에, 총독부는 이러한 계산에 근거해 의무교육을 실시한 후에도 지방 재정에는 문제가 발생하지 않을 것이라고 예측했다.³⁰⁾

총독부는 입으로는 지방의 부담을 가중시키지 않을 것이라고 장담했지만,³¹⁾ 사실상 지방의 예산도 확실히 높아졌다. 그런데 우리는 이 시기 의무교육을 확충하는 데 쓰였던 중요 재원 중의 하나가 바로 민중의 기부금으로부터 나왔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기사에 따르면, 예를 들어 1939년 타이베이시(臺北市)는 그 해에 모든 학령 아동을 취학시키는 목표가 완성되기를 희망했고, 이에 쉬네이(許內), 귀연준(郭延俊), 쉬즈구이(許智貴) 등이 곧 모금 계획에 착수해 5만원의 자금을 모금한 후 시 당국에 사용하라고 제공했다.³²⁾ 5만원은 대략 그 해에 市費에서 지불되는 小・公學校費 총액의 15%에 해당하는, 상당한 고액의 기부금인 셈이었다.³³⁾ 또한 신주주(新竹州) 마오리가(苗栗街)의 경우, 1938년부터 祭祀公業, 神明會의 대량의 모금에 의지해 순조롭게 교실을 증축할 수 있었다. 또한 의무교육 시행이 공포된 후에 취학아동의 수를 격증시키길 희망하자 苗栗街長은 視學・當地 공학교 교장 및 두 학교의 보호자회 정·부회장과 상의하여, 6년 내에 필요한 교원의 급여 및 기타 일체 비용을 모두 가장과 가민들이 부담한다고 결정했다.³⁴⁾ 이러한 협상에 참여한 사람들 중에 해당 지방에서 강력한 모금 동원력을 갖고 있었던 것은 대만적(籍)의 보호자회 정·부회장이었을

27) 「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 『茗荷谷文書』 R16-492.

28) 이 국고보조안의 계획과 분배 원칙은 일본 본국에서의 의무교육비의 국고보조법 내용을 참고했던 것으로 보이는데, 상세한 정황에 대해서는 더욱 심층적인 검토가 필요하다.

29) 「義務教育關係統計資料(手持用)」, 『茗荷谷文書』 R16-499-548.

30) 「義務教育制度實施ニ関スル負擔關係」R16-490-491 및 「義務教育準備期間中ニ於ケル州廳市街庄初等教育費」R16-533-534.

31) 「財政問題は考慮する, 義務教育に關し, 森岡長官談」, 『台灣日日新報』 1939년 10월 25일.

32) 「寄附金五萬圓を集む, 皆入學助長の為」, 『台灣日日新報』 1939년 8월 6일.

33) 1939년 台北市의 小公學校費의 경우 市費에서 지출된 금액의 총 액수는 366,985원이었다. 台北市役所, 『台北市統計書(昭和十四年)』, 台北市: 台北市役所, 1941년, 38-39쪽.

34) 「就學希望者全部收容, 經費一切は父兄が負擔, 苗栗街のヒット」, 『台灣日日新報』 1940년 3월 18일.

것이다. 이 시기 의무교육 시행에 따라 발생한 경비는 지방의 일부 인사들의 모금뿐 아니라, 그 지역의 주민들에게 할당되거나, 지방의 공공사업 경비에서 처리한 것이기도 했다.³⁵⁾

또한 우리는 이 시기 대만인들의 교육에 대한 요구가 초등교육 확충의 단계를 넘어 이전보다 더욱 강렬해졌고, 자신의 교육 요구를 만족시키기 위해서라면 흔쾌히 대가도 지불하려고 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그 예로, 1939년 12월, 이란(宜蘭)의 頭圍公學校가 고등과를 설치하려고 하자, 校舍 건축 비용으로 庄民들이 1만원을 기부했다. 아직도 2,000원이 부족하자 보호자회는 현지의 頭圍公學校로부터 아동 1인 당 2원을, 부근에 있던 二圍·大谷의 두 학교에서 아동 1인당 1원의 자금을 책정해 모금하기로 결정했다.³⁶⁾ 1940년 1월, 장화시(彰化市)는 家政女學校를 설립하고자 했으나 경비가 모자라자, 시회의원의 협의를 거쳐 寺廟整理委員會의 종합사묘건설예금에서 1만원을 내고, 일부는 시민의 기부금을 받기로 결정해, 결국 가정여학교를 설립할 수 있게 되었다.³⁷⁾

이러한 기부가 실현되었는지 여부는 기사에서는 확인할 방법은 없지만, 각지의 교육 기관들이 확실히 확충되었다는 사실은 명확하다. 필자는 일전에 일본통치 초기 교육경비의 출처에 대한 연구를 통해, 일본통치 초기 초등교육의 경비 중에서 교사 급여 이외에 거의 모든 경비가 지방 민중들에게 기부금으로 할당되거나 자유 기부의 형식으로 조달되었음을 밝힌 바 있다.³⁸⁾ 이 논문에서는 1910년대 초기까지만을 다루었는데, 1920년대 이후가 되면 지방제도의 개정으로 인해 지방 단체가 小·公學校를 설립하는 주체가 되어, 초등교육 경비의 교사 급여 및 제 보조는 주로 州廳費에서 지출되고 기타 경비는 市街庄에서 부담하게 되었다. 20년대 이후의 교육 재정의 운영에 대해서는 연구가 더 필요하나, 앞서 인용한 예들에서 알 수 있듯이 민중의 교육 요구가 국가가 제공한 교육량보다 훨씬 더 높았고, 이로 인해 민중이 자기 돈을 따로 부담하는 방식을 부득이하게 선택해 자기의 교육 요구를 만족시켰음을 알 수 있다. 또한 국가도 재정의 곤란으로 이를 기쁘게 혹은 부득이하게 받아들였으며, 심지어 이러한 방식의 경비 조달을 격려하기도 했던 것이다.

III. 준비 기간 중의 한 지방—신주(新竹) 지역을 예로

초등교육기관의 설치 주체로서, 지방행정 최하층의 시가장과 교사의 월급 및 수당을 책임졌던 주청은 예산 편제와 경비 관리, 그리고 관리 지역 내의 학령아동의 인원 조사와 취학상황 파악, 해결방책 마련 등의 문제들을 다방면으로 고려해야 했다. 본장에서는 대만 북부에 있는 신주시(新竹市)를 중심으로 이 기간에 제1선에 있었던 한 지방정부의 준비 작업과 당시의 지방 민중의 교육 동태에 대해 살펴보고자 한다.

35) 苗栗街의 교실 증축에 필요한 경비는 苗栗街의 寺廟神明會, 祖公會, 祭祀公業 등이 3년 연속으로 기부해 충당했다. 「教室を新築して, 學校に寄附, 苗栗義民等の美舉」, 『台灣日日新報』 1940년 1월 30일.

36) 「校舍建築費を, 庄民が寄附, 頭圍公に高等科併置」, 『台灣日日新報』 1939년 12월 16일.

37) 「市立家政女の新設は有望, 財源は寄附説が有力」, 『台灣日日新報』 1940년 1월 28일.

38) 許佩賢, 『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 台北: 遠流出版社, 2005년.

1. 신주시의 학교·학급 증설 상황

신주시에는 1930년대에 4곳의 공학교와 1곳의 소학교가 있었다. 시내의 일본인 학령아동 취학률은 거의 100퍼센트에 달했으며, 대만인의 취학 상황은 <표 3>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다. 의무교육제도가 공포된 전후의 학급 수 및 학생 수의 통계는 다음과 같다. 1936년 학급 수 80개, 본과학생 5,080명³⁹⁾ ; 1938년 학급 수 98개, 본과학생 6,125명⁴⁰⁾ ; 1940년 학급 수 139개, 본과학생 6,289명⁴¹⁾ ; 1941년에는 1개의 소학교를 신설하고, 시가 지역의 확장으로 인해 새로 3곳의 공학교가 들어서 7곳의 공학교로 바뀌었고, 아동 수는 10,512명, 취학률은 70.27%였다. 신주시장의 연설 자료를 살펴보면, 1940년의 취학률은 85%, 1941년은 91%였으며, 1942년에는 9개 학급이 더 증설되었고 취학률은 95%에 달했다.⁴²⁾ 1943년에는 또 1곳의 초등학교가 신설되었다.⁴³⁾

대만총독부는 1939년에 1943년부터 대만에 의무교육이 시행될 것이라고 공포했다. 이때 총독부가 설정한 목표는 첫 해인 1943년의 입학률이 80%에 도달하도록 실시하고, 해마다 취학률을 늘려 1948년에는 100%의 취학률을 완성한다는 것이었다. 당시 사회의 보편적 정세는, 총독부가 규정한 입학 연령은 6세였지만 6세가 된 해에 입학할 시키지 않고 7·8세 이후에야 1학년으로 입학시키기도 해 자연스레 적령 아동의 입학 기회가 밀리기도 했다. 총독부가 의무교육 시행을 결정하면서 설정했던 취학률은 적령 아동을 대상으로 계산된 것으로, 이미 입학 연령(6세)을 초과한 아동은 별도로 특설 국어강습소를 설치하여 수용하였다. 1941년, 총독부는 심지어 54만원의 예산을 통과시켜, 대만섬 전체에 총 600여 곳, 3년제의 국어강습소를 설치하고 초령 아동을 수용하고자 했다.⁴⁴⁾ 다음 해의 예산 집행 상황이 어떠했는지는 불명확한데, 최소한 신주시가 1940년 전후로 10곳의 국어 강습소를 설치했다는 것은 확인할 수 있고,⁴⁵⁾ 그 후에도 계속 증설했을 것이다. 특설국어강습소와 일반국어강습소의 차이점은 전자의 경우 공학교에 들어가하고자 했으나 연령 초과로 거절당한 아동을 수용하기 위해 특별히 마련된 것이라는 점이었다. 과정 역시 공학교에 준했고 취학 기간은 3년이었다.⁴⁶⁾ 그 경비는 일반 학교의 경비와 달리 사회 교육비에 속해 있었다.⁴⁷⁾ 신주시의 야노 에이치(矢野榮治) 시장은 신주시 취학률의 증가를 매우 득의양양하게 보고했는데, 이는 6세의 적령 아동 취학률로 계산된 것이었다.

의무교육제도가 시행되기 1년 전, 신주시는 시내의 입학 적령 아동의 수를 조사했는데, 일본인 283명, 대만인 2,277명으로 그중 98%가 취학해야 했다.⁴⁸⁾ 다음 해에 입학 인원을 확

39) 『新竹州第十六統計書(昭和十一年)』, 新竹:新竹州, 1938年, 36~37쪽.

40) 『新竹州第十八統計書(昭和十三年)』, 新竹:新竹州, 1940年, 36~37쪽.

41) 『新竹州第二十統計書(昭和十五年)』, 新竹:新竹州, 1942年, 42~43쪽.

42) 「市尹演述」, 『新竹市報』 878, 1942年 3月5日. 이는 1942年 2月 25日 제20회 新竹市會 야노 에이치(矢野榮治) 시장의 연설 요지이다.

43) 「國校新設學級增加, 新竹市の義教對策成る」, 『台灣日日新報』 1942年10月1日.

44) 「全島に六百餘の, 特設國語講習所」, 1941年1月8日.

45) 위의 글.

46) 「特設國語講習所生徒募集」, 『新竹市報』 807, 1941年2月3日.

47) 『新竹市報』 중 각 연도의 예산·결산 참고.

48) 「國校新設學級增加, 新竹市の義教對策成る」, 『台灣日日新報』, 1942年10月1日.

정할 때에는 숫자상에 약간 변동이 있었는데, 일본인 전부가 입학했고, 대만인 중에 입학을 확실히 한 아동은 93.79%를 점했다. 신주시는 이에 대해 매우 만족해했다.⁴⁹⁾

학급 수가 격증함에 따라 총독부와 각 주청은 교원 부족 문제가 상당히 심각하다는 것에 주목했다. 총독부는 1940년에 핑둥(屏東)·신주 두 곳의 사범학교를 증설하고 첫 해에 겨우 1년짜리 강습과를 설치했는데, 이는 속성으로 더욱 많은 교원을 육성하고자 했기 때문이다. 신주(新竹)도 마찬가지로 교원의 배치 문제로 골치가 아팠고, 1940년부터 수차례 교원강습회를 개설하기 시작했다. 강습 기간은 3개월로, 양성 후 대리 교원이 되었다. 강습을 받을 수 있는 자격은 ① 실업보습학교 졸업 이상으로, 사상이 건실하고 신체가 강건한 자, ② 중등학교 3년 이상 중도에 퇴학한 자로, 사상이 건실하고 신체가 강건한 자, ③ 소·공학교 고등과 졸업자 및 동등 이상의 학력자로, 인품, 학력, 신체가 모두 우수한 자, ④ 이상 각 항의 연령은 만 18세에서 만 30세 이하인 자⁵⁰⁾로 규정되었다. 주 당국은 ‘교원을 임시로 양성하는 결과는 자연히 교원의 자질 저하를 낳는다.’는 것을 인식하고 있었지만 별다른 도리가 없었다.⁵¹⁾ 유사한 강습회가 그 후 몇 년 동안 거의 매년 수차례씩 개최되어 교원 부족 문제를 처리하는 방편으로 활용되었는데, 예를 들어, 1942년에도 新竹高女 補修科 졸업생을 모집하고 3개월의 강습 후 교원으로 채용했다.⁵²⁾ 교원 보충에는 주로 몇 곳의 공급지가 있었다. 신주(新竹) 당국의 통계에 따르면, 1943년에 전체 250명의 교사를 보충했는데, 대만 전국에서 비율로 분배된 사범학교 졸업생이 100명, 여학교 졸업생 70명, 총독부가 주최한 강습회 수료생 50명, 주 강습회 수료생 30명으로 구성되었다.⁵³⁾ 당시 신문 보도에 따르면, 각 주청은 늘 새 학년이 시작되기 전에 교사를 가까스로 조달하고 나서야 긴장을 놓을 수 있었다고 한다. 새롭게 증설된 여러 실업보습학교(예를 들어 신주에는 新竹家政女學校가 있었음)도 교사를 충당하는 데 있어 중요한 원천이 되었다.

2. 신주시의 교육 재정

1920년에 지방제도가 개정된 이래 시가장이 소·공학교를 설치하는 주체가 되었다. 그 설치 경비는 주로 두 부분에서 충당되었는데, 교사의 급여와 수당은 주(청)비에서 지출되었고, 나머지 학교 비용은 시가장비에서 지불되었다. 1930년대 후반부터 증설되기 시작한 학급과 학교는 주비와 시가장비 예산에 상당히 큰 영향력을 가지고 있었을 것으로 생각된다. <표 4>는 1939년 의무교육요강이 실시된 전후에 신주시의 세출, 세입, 교육비 지출액 및 세출에서 차지한 비율을 정리한 것이다.⁵⁴⁾

<표 4>에 따르면, 교육비의 팽창이 비교적 명확하게 확인되는 것은 임시부의 영선·건축비인데, 주로 교사를 신축하는 데 드는 비용이었을 것이다. 신주시는 1943년 花園國民學校를 증설했고 신설에 든 예산은 18만원에 달했다.⁵⁵⁾ <표 4>에서 볼 수 있듯이, 교육이 급속

49) 「就學率劃期的な好成績, 新竹市國民學校新年度入學兒童」, 『台灣日日新報』, 1943년3월1일.

50) 「臨時教員養成講習會講習員募集」, 『新竹市報』 775, 1940년10월24일.

51) 「教員心得の講習會, 公學校高等科卒業生集め」, 『台灣日日新報』, 1940년12월2일 夕刊.

52) 「新竹州短期教員養成講習會始る」, 『台灣日日新報』, 1942년1월13일.

53) 「新教育近く配置, 新竹州助教員講習會強化」, 『台灣日日新報』, 1943년3월21일.

54) 『新竹市報』 전부가 남아있지 않기 때문에 본 표에서는 확인 가능한 연도를 중심으로 정리했다.

하게 확충되던 몇 년간, 교육비는 대략 전체 시 예산의 7~8%를 차지했다. 이러한 수치를 어떻게 평가할지는 이것이 전체 일본식민통치 시기의 교육재정 안에서 어떤 위치를 갖는 것인가에 대한 고려가 있어야 가능하다. 앞으로 연구가 더 필요한 부분이다.

한편, 앞 절에서 살펴본 것처럼, 교육 확충의 과정에서 민중들도 자원 혹은 비자원으로 기부를 통해 교육 사업에 참여했다. <표 5>는 신주 지역(新竹州)이 교육 확충으로 인해 지방 민중들에게 기부금을 모금했던 사례이다. 경비 총액을 교육비 총액과 비교해 보자면 여전히 정도 차이가 크긴 하지만, 상당히 방대한 기부 모금액이었던 것은 분명하다. 예를 들어 사범학교, 도원가정여학교, 묘율가정여학교 등의 사례를 보면, 비록 기일 내에 예정 금액을 모금했는가 여부는 확인할 수 없지만, 이들 학교들이 결국 설립될 수 있었던 데에는 확실히 민중의 교육에 대한 열성에 많은 부분을 의존하고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3. 지방에서의 교육 요구

1930년대 후반 이래로 지방 민중들의 교육에 대한 욕구는 확연히 높았다. 이러한 현상에 대한 총독부 측의 관방 논조는 민중들이 ‘지나사변’의 자극을 받아 황국신민으로서의 자각이 높아졌고, 이로 인해 교육에 대한 욕구 또한 높아졌다는 것이었다. 이는 당연히 총독부의 편면적인 언설이었고, 당시 대만의 민중들이 어떤 조건 하에서 보편적인 교육에 대한 욕구를 가지게 되었는가는 확실히 흥미를 돋우는 문제이다. 확실히 의무교육 실시에 자극을 받았을 가능성도 있고, 원래부터 존재했던 유사한 요구가 그에 상응하는 중시를 받지 못했을 가능성도 있다. 이러한 현상이 신주 지역만이 아니라 전체 대만의 각지에서 유사하게 나타났던 것인데, 여기에서는 신주시의 예를 통해 그것을 논한 것뿐이다.

1940년 시점에 신주시에는 4곳의 공학교(新竹第一·新竹第二·新竹第三·住吉公學校)가 있었는데, 그중 新竹第一公學校에만 고등과가 설치되어 있었음)와 1곳의 소학교(新竹小學校)가 있었다. 이들 학교들은 1941년 이후에는 국민학교로 개조되어 각각 新興·北門·高丘·新竹國民學校로 바뀌었다. 또한 신설된 東山小學校도 東山國民學校로 바뀌었고, 시가 지역의 확대로 새롭게 신주시에 들어선 세 곳의 공학교 역시 각각 南寮·香山·鹽水國民學校로 바뀌었다. 초등교육 이상의 상급 교육기관으로는 중학교와 고등여학교가 각각 1곳씩 있었다. 1940년에는 新竹商業學校(실업학교), 新竹家政女學校(실업보습학교, 원래는 사립이었는데 1941년에 시립으로 바뀌었음)를 신설했다. 당시 신주시 내의 학령 아동의 취학률은 72.75%(남 89.28%, 여 56.23%)였다.⁵⁵⁾ 1942년 新富·香山國民學校에 고등과가 신설되었고, 1943년에는 또 花園國民學校가 세워졌다.

이처럼 교육 기관은 확충되었지만 현지 주민들의 요구를 다 만족시킬 수는 없었던 것 같다. 지방 인사들은 각종 방법을 통해 계속해서 당국에 교육기관을 확충할 것을 요구했던 것이다. 1940년 이후 지방 인사들의 정부에 대한 교육 요구는 크게 두 가지 사안으로 모아졌는데, 하나는 공학교를 증설하는 것(혹은 학급을 늘리는 것), 또 하나는 공학교 이상의

55) 「決戰預算を審議, 廿五, 六の兩日, 新竹市市會を招集」, 『台灣日日新報』 1943년 2월 18일.

56) 新竹州, 『新竹州第二十統計書(昭和15年)』, 新竹: 新竹州, 1942년, 40~41쪽.

교육 기관을 증설하는 것으로, 여기에는 공학교 고등과·실업학교·실업보습학교가 포함되었으며 新竹第二中學을 설치하라는 요구도 있었다. 확실히 보급된 초등교육 및 중등 이상의 교육에 대한 신주시민들의 요구는 이미 시 당국이 제공한 정도를 넘어서 있었다.

지방 인사들은 1940년에 신주시회를 향해 조속히 공학교, 고등공업학교 등을 신설할 것을 요구했는데, 이때 연명하여 청원한 위원은 대만인과 일본인을 포함한 시의원들이었다.⁵⁷⁾ 1942년, 지방인사들은 新竹二中設置期成會를 구성하고, 회의를 열어 중학교 신설 문제를 논의했다. 이 회의에서 신주시와 신주주 내의 각 군으로부터 70만원의 공사비용을 균등하게 나누어 분담하자고 결의했을 정도니⁵⁸⁾ 지방 인사들의 결심을 알만 하다. 다음해 3월에 정말 8만원을 조달하여 토지를 구매했던 듯한데,⁵⁹⁾ 이 계획은 이후 좌절되게 된다. 전쟁동원의 요구에 따라 총독부 측이 공업 인재, 기술 인원을 육성하는 일에 더욱 몰두했고, 때문에 新竹二中 설립 계획에 쓰일 자금을 공업학교를 개설하는 준비금으로 돌리도록 주도했던 것이다.⁶⁰⁾

이렇듯 교육기관을 확충하고자 노력했던 이들 지방 인사들이 어떻게 조직되었고, 또 어떤 이해관계나 이념에 기초해 이러한 일들을 진행해 나갔는지에 대해서는, 소수의 인명만이 남아있는 것을 제외하고는 자료의 한계를 넘기 힘들다. 다만, 제한된 자료를 통해서나마 긴박했던 정국 속에서 지방 사람들이 자제의 교육을 위해 더욱 많은 가능성의 기회를 쟁취하려고 했음을 그려볼 수 있었다.

IV. 맺음말 — 식민지말기 교육사연구의 과제를 함께 논하며

본 논문에서 필자는 『茗荷谷文書』의 당안 및 신문·잡지의 기사를 주된 자료로 삼아, 일본식민통치 말기 대만의 교육정책과 지방사회의 교육상황을 의무교육제도 시행에 대한 논의를 통해 묘사해보고자 했다. 본문에서 논한 의무교육제도 역시 아직 미진한 부분들이 많이 남아있지만, 이 문제는 일본식민통치 말기의 다른 몇 가지 의제들과 함께 논의되어야 전면적인 이해가 가능할 것으로 생각한다.

먼저, 국민학교 개조 문제이다. 1941년 식민지 조선과 대만을 포함하여 일본 전국의 초등교육 기관은 전부 국민학교로 바뀌게 되었는데, 이는 일본이 메이지 초기부터 근대학제를 실시한 이래의 대변혁이었다. 이러한 국민학교의 개조는 일본이 대외전쟁을 발동했던 발전과정과 관련이 있음은 물론인데, 즉, 전쟁이 장기화됨에 따라 일본은 장래에 필요한 전력을 고려하여 초등교육 단계부터 국가 미래 전쟁에 필요한 인력 자원을 양성하고자 했고 국민학교 개조는 바로 이러한 계획 하에서 취해졌던 조치였던 것이다. 국민학교의 개조는 단지 명칭의 변화에 그친 것이 아니라 교육 목적의 변화에 따른 것이었기 때문에, 교수 과목도

57) 「新竹市議の陳情團近く出北」, 『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3月5日.

58) 「新竹に第二中學新設要望昂る, 有力者間で期成會組織」, 『台灣日日新報』1942年4月23日. 「新竹二中設置要望の聲熾烈, 設置期成會組織」, 『台灣日日新報』1942年 10月27日 夕刊.

59) 「第二中學實現へ, 新竹市期成同盟會運動展開」, 『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18日.

60) 「新竹に工業學校, 來年から開校の計畫」, 『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6月12日 夕刊.

대폭으로 조정되었고 교과서도 전부 개편되었다. 예를 들어, 국어, 수신, 역사, 지리를 국민 정신 함양에 중점을 둔 國民科로 합쳤고, 체조과 역시 한층 더 군사 교련의 의미를 지닌 體鍊科로 바꾸는 등, 전시 체제 하의 ‘소국민’ 정신 및 신체에 대한 요구를 직접적으로 드러냈다. 이러한 초등학교의 개조 문제에 대해 일본에서는 이미 상당한 연구가 집적되었다. 하지만 대만의 국민학교 시기에 관한 연구는 적으며, 법제상의 변화로부터 실제 시행 과정에 이르기까지 명확치 않은 부분이 여전히 많아 앞으로 더욱 심층적인 연구가 필요하다.

둘째, 중등교육 확충 문제이다. 일본통치 시기 대만인의 보통중등교육은 1915년 臺中中學校 성립을 그 효시로 한다. 1919년 대만교육령에 따라 중등보통교육기관이 제한적으로 개방되게 되고, 1922년 신대만교육령이 공포된 뒤에는 여러 중학교와 고등여학교를 증설하였으며 또 일본인·대만인의 공학을 개방했다. 그 후 중학교 및 고등여학교가 연이어 증설되었는데, 1945년 시점까지 중학교와 고등여학교는 총 22곳이었고, 그중 대부분이 1930년대 이후에 증설된 학교들이었다. 중등보통교육 기관 이외에, 1922년 이후에도 여러 실업학교와 실업보습학교가 계속해서 개설되었는데, 이들 학교들 역시 진학을 열망하는 많은 대만 청년들을 수용했다. 전쟁 시기에 이르러 이들 실업학교 및 실업보습학교는 전시정부가 필요로 하는 인력 자원의 공급 역할을 맡는 듯 했는데, 이 때문에 빈번한 확충과 개조 현상들이 나타났다. 이들 학교들은 전후에 初中이나 高職으로 개조되게 된다. 예를 들어, 타이베이시의 유명한 金華國中的 경우 그 전신은 1937년에 설립된 臺北家政女學校이다. 현재 타이난(臺南)에 있는 新化高工의 전신은 1926년에 설립된 新化農業補習學校였고, 1934년에 新化農業專修學校로 바뀌었다. 양자는 일본통치 시기의 학제상 모두 實業補習學校에 속한다. 대만총독부의 통계에 따르면, 1943년까지 대만인들 중에서 중학교 졸업자는 9,500여명, 고여 졸업자는 9,800명, 실업학교 졸업자는 7,300여명, 실업보습학교 졸업자는 남자 20,000여명, 여자 4,400명이었다.⁶¹⁾ 전체적으로 보면, 일본식민통치의 마지막 몇 년, 그리고 바로 전쟁의 와중에 있던 몇 년 동안 중등교육이 확충되는 현상이 발생했던 것이다. 그 원인을 추측해 보자면, 한편으로는 대만인들의 강렬한 진학 염원이 존재했고 이에 대만총독부가 부득이하게 이 문제를 처리하지 않을 수 없게 되었기 때문이고, 또 한편으로는 정부 방면의 인력 자원의 고려가 있었기 때문일 수 있다. 당시 중등교육 기관의 확충 역시 전후의 중등교육과 밀접한 관련이 있으나 실제 상황이 어떠했는지는 명확치 않은 부분이 많다.

셋째, 사회교육 팽창의 문제이다. 일본통치 이래로 학교교육과 사회교육이라는 서로 다른 두 체제는 각각의 역할을 담당했다. 필자는 일전의 연구에서 학교교육 체제를 집중적으로 논했지만, 양자는 명확히 구분될 수 없다는 것을 잘 인식하고 있다. 예컨대, 공학교의 교사들은 늘 사회교육 체제를 지원하는 일을 요구받았다. 1930년대 이래로 대만총독부는 대규모의 사회교화운동을 추진하기 시작해, 학교에서 통제할 방법이 없는 청년들을 모두 교화 체제 안으로 들여보내고자 했다. 여기에는 이미 학교를 졸업한 청년과 미취학 청년들이 포함되었다. 靑年團과 國語講習所는 그중 가장 대표성을 갖고 있었던 조직이다. 그 외에 의무교육실시 이후 각 국민학교도 각종 교육기관을 증설하여 이미 취학 연령을 초과한 아동들을 수용했다. 어떻게 이것을 학교교육과의 관련성, 그리고 전체 전쟁 시기동안 진행

61) 水野直樹編, 『戰時期殖民地統治資料 第一卷』, 東京: 柏書房, 1998年, 229쪽.

되었던 교육 확충이라는 문제 속에서 검토할 수 있을지는 장차 해결해야 할 과제로 남겨져 있다.

이상에서 살펴본 것처럼 『茗荷谷文書』는 일본통치 말기의 대만 교육문제를 고찰할 수 있는 자료를 제공할 수 있다. 또한 이 심의 자료 가운데 몇몇 자료들은 척무성이 관할한 '外地' (대만, 조선, 사할린 등지)의 교육문제를 추밀원 심의에 대비하여 정리한 것으로, 앞으로 식민지 교육정책 비교연구의 기초 자료로 활용될 수 있을 것이라고 생각한다.⁶²⁾

62) 조선 부분에 대해서는 이미 몇몇 연구자들이 이 자료를 이용한 바 있다. 樋口雄一,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茗荷谷文書』について」, 『日本植民地研究』 14號, 2002年 ; 佐野通夫, 「茗荷谷文書に見る朝鮮植民地末期の教育政策」 『アジア教育史研究』 12號, 2003年 3月, 56~72쪽.

附表 一 〈義務教育關係說明資料〉 目錄 R16-464-498

1. 台灣欲施行義務教育之理由
2. 義教實施準備狀況
3. 台灣義教實施計畫
4. 義教實施時期
5. 義教實施地域
6. 義教適用範圍
7. 使兒童就學的義務如何
8. 使兒童就學義務之免除及猶豫
9. 使兒童就學必要的學校設置的義務
10. 市街庄學校組合或街庄學校組合
11. 學齡兒童教育事務的委託
12. 市街庄,市街庄學校組合或街庄學校組合之學校設置義務免除
13. 對內地人也實施六年制之理由
14. 就學義務免除的要件加上保護者貧窮
15. 台灣的國民學校制度(實施義教的場合)與內地制度的相異
16. 內台人共學狀況
17. 國校初等科課實業科的理由
18. 國校初等科修了者之進學狀況及就職狀況
19. 國校高等科修了者之進學狀況及就職狀況
20. 義教實施之負擔關係
21. 義教國庫補助對各州廳的分配方法
22. 隨義教實施,國校授業料應如何
23. 蕃地教育狀況
24. 台灣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狀況
25. 台灣的國民學校的教科用圖書
26. 「行後見人職務者」之規定不適用台灣
27. 對本島人之親權後見制度.

附表 二 〈義務教育關係統計資料(手持用)〉 目錄R16-499-548

1. 本島人學齡兒童就學步合
2. 入學適齡兒童就學步合
3. 本島人第一學年入學狀況
4. 自S13-S17本島人第一學年入學狀況
5. 本島人入學適齡兒童入學狀況
6. 州廳別年齡別本島人國民學校第一學年入學者
7. 本島人入學拒否兒童數
8. 國語普及狀況
9. 實業補習學校調
10. 街庄組合立實業補習學校數調
11. S17年十月末日現在未置市街庄區域的學齡兒童為了就學而居住在市街庄兒童數
12. S17.10月末現在他市街庄或未置市街庄地域通學兒童數調
13. 州廳別高砂族人口
14. 州廳立國民學校一覽
15. 教育所,學級,職員兒童數
16. 蕃地高砂族兒童就學步合
17. 內地一學級兒童數
18. 內地昭和13年度尋常小學校卒業後狀況
19. 委託及學校組合調(內地)
20. S17教育費預算調
21. 初等教育國庫補助額調
22. 昭和十七年度初等教育費國庫補助調
23. 公立國民學校經費調(國庫,地方團體經費)
24. 義教實施件,國庫補助分配辦法
25. S15,16,17年度各廳教員俸給預算單價調
26. 義教準備期間,州廳市街庄初等教育費預算增加調
27. 昭和16年度特設國語講習所在學者年齡別調

附表三 新竹市學齡兒童統計(1936-1940)

年	學齡兒童 總數(男/女)	就學者			不就學者			已達就學始期 者中百人就學率
		已達就學始齡 兒童數(男/女)	已修習公學校 教科者	修畢公學校教 科者	不就學者 總數	尚未修習公學 校教科者	公學校半途退 學者	
1936	8965 (4505/4460)	5201 (3291/1910)	4484 (2853/1631)	717 (438/279)	3764 (1214/2550)	3579 (1107/2472)	185 (107/78)	58.01 (73.05/42.83)
1938	10133 (5133/5000)	6557 (4954/2503)	5344 (3290/2054)	1213 (764/449)	3576 (1079/2497)	3312 (920/2392)	264 (159/105)	64.52 (78.98/50.06)
1940	14492 (9385/5107)	11251 (8379/2872)	6330 (3782/2548)	4921 (4597/324)	3241 (1006/2235)	3128 (941/2187)	113 (65/48)	72.75 (89.28/56.23)

資料出處：各年度《新竹市統計書》。

附表四 新竹市初等教育經費額度及占總歲出比例 (1937-1942)

年度 決算	歲入總額 經常部 臨時部 (單位：圓)	歲出總額 經常部 臨時部 (單位：圓)	教育費支出 經常部 (單位：圓)	教育費支出 臨時部 (單位：圓)	教育費支出 占歲出 總額比	出處《新竹 市報》號 日期
1937 決算	1422142.44 543422.66 858719.78	1323110.41 361516.31 836918.24	小學校費 6323.80 公學校費 21428.77 學事諸費 6756.11	小學營繕費 13108.96 公學營繕費 65434.77	8.5%	611 1938.12.3
1940 決算	1982042.36 880653.42 1101388.94	1450452.90 569359.82 826476.38	小學校費 6701.51 公學校費 24776.09 學事諸費 14071.28	小學營繕費 / 建築費 120896 公學建築費 40474	6.8%	851 1941.11.8
1942 決算	2564834.35 1601484.53 963349.82	2049157.95 924459.22 697085.90	國民學校費 39624.40 學事諸費 25983.81	國民學校營繕 / 建築費 102547.79 國民學校充實費 4381.94	8.4%	961 1943.12.6

附表五 新竹地區教育相關捐款事例(1937-1943)

目 的	方 法	金額	出處 《新竹州報》
宋屋公學校教育敕語奉安金庫購入費	保護者各一圓範圍內	300	1170號 1937.5.28
新竹一公新校地整理費及收音機體操施設費	新竹一公保護者任意寄附	400	1211 1937.10.12
師範學校敷地買收費	有志任意寄附	13500	1453 1940.3.20
伯公岡公學校分教場設置費及敷地買收費	有志任意寄附	5000	1466 1940.4.19
外埔公學校大山分教場設置費	任意寄附	4000	1468 1940.4.27
獅潭及八角林公學校校舍新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2000	1468 1940.4.27
橫山庄國語講習所費	有志任意寄附	2400	1475 1940.5.19
白沙屯分離教室設置費	任意寄附	5000	1484 1940.6.20
尖山公學級臨時增加費	有志任意寄附	600	1502 1940.8.7
大溪公校舍一教室新築及諸設備費	有志任意寄附	3700	1505 1940.8.13
香山公校舍增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3500	1508 1940.8.20
舊港公分離教室建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2650	1511 1940.8.29
六家公教室增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4350	1520 1940.9.24
坪頂公校舍增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2500	1530 1940.10.12
富興公敷地買收費	有志任意寄附	1300	1567 1940.12.26
頭屋公走郎其他改修費	有志任意寄附	900	1592 1941.2.23
新坡公分離教室敷地買收費	有志任意寄附	3400	1621 1941.4.23
桃園家政女設立費	有志任意寄附	216000	1626 1941.5.4
高丘國校校地擴張費	有志任意寄附	5000	1643 1941.7.10
苗栗家政女設立費	有志任意寄附	185671	1657 1941.8.20
四湖及五湖國校教室建築費	有志任意寄附	5000	1664 1941.9.19
苑裡庄特設國講所新設費	有志任意寄附	6890	1682 1941.11.2
公司寮國崎頂分設置費	有志任意寄附	4000	1879 1943.8.22

【Abstract】

**Taiwan's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the Late Period of Japanese
Governance
Center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bligatory Educational System**

HSU Peih sien

Not until 1939, in the late period of Japanese governance in Taiwan, did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in Taiwan mak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expect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obligatory educational system in 1943. To judge from the timing of its announc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obligatory educational system was actually closely connected with Japan's wartime mobilization. As clearly indicated by the restricted document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ne of the backgrounds that form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bligatory educational system in Taiwan referred to the anticipated enforcement of the draft system in Taiwan. Making use of the files preser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reports issued b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and enforcing policies on obligatory education b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in Taiwan and to explore how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financial expansion result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Moreove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was supposed to produce the most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level of shikaityo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aiwan) as the subject in charge of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s of primary education, this paper also intend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dispensation at the basic levels of local society and reactions of local people to the enforcemen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ssue of enforcing obligatory education in Taiwan had been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since the Japanese governance. However,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normally avoided facing up to the issue with excuses such as financial difficulty and low enthusiasm for study in the general public.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1930s that the issue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was again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earliest data that can have been traced so far, it was supposed to be in early 1938 that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set up a new division speci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issue under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authorities. Around the time before and after 1939, syutyos (states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aiwan) started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mstances of primary education within the range of their management. On August 23rd, 1939,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made a proclamation establishing a tempora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investigations to particularly examine the issue of enforcing obligatory education. The primary members of this committee include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lerks of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who drafted the main content and schedule of the enforcemen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enforcemen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regulated that the span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was six years (eight years in Japan), the preparation period would extend from 1940 for three years, the enforcement would begin from 1943, the age range was from six to fourteen years, and areas of enforcement were limited in ordinary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On the basis of the draft submitted by the committee,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convened a meeting for local officials to exchange opinions and a meeting inside the Office to evaluate and comment on the issue. Both sides came to an agreement.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therefore officially made an announcement of the outlines of enforcing obligatory education and decided to put the outlines into practice from 1943. After the announcement and decision, the Director of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authorities under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made a description of the enforcement to the Department of the Expansion of Colonial Affairs in Tokyo and gained the approval of the Department.

What kind of legal procedure would the enforcemen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in Taiwan as a colony require? In Japan, after 1941, the legal foundation for obligatory education was based on related articles under the category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 Decree," which regulated that parents or guardians had the obligation to send their children aged between six and fourteen years to school for education and that shityosons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Japan) had the duty of establishing public schools. When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decided in 1941 to apply the "Public School Decree" to Taiwan, the legal procedure included two parts. First, the Office modified the "Education in Taiwan Decree," canceling articles related to "Elementary School" and "Common School" and changing the previous decree into the "Primary Education Based on Public School Decree." Then, the Office proclaimed the "Regulations for Public Schools in Taiwan," stating that articles related to obligatory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 Decree" were not applicable to Taiwan. To sum it up, in the legal procedure, the Office only needed to modify some articles in the "Regulations for Public Schools in Taiwan" that would not fit into the "Public School Decree" to implement obligatory education in Taiwan, without involving laws of higher ranks. Despite the limited extent of modification, the Office still had to explain the change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Japan and sought their understanding when making these significant decisions, particularly as the changes would involve extra subsidies supplied by the exchequer.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ly available data, the negotiating processes between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Department of the Expansion of Colonial Affairs or between other official divisions were not completely clarified. What could be ascertained was that the project planned b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eventually arrived at a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Department of the Expansion of Colonial Affairs. On March 23rd, 1943,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made an announcement, numbered 45, to revise the "Regulations for Public Schools in Taiwan" by canceling some articles unapplicable to obligatory education in Taiwan that were previously declared in 1941. On the same day, the Governor officially promulgated the enactment of enforcing obligatory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above analysis outlines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from the proposal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b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in Taiwan in August 1939 to its decided enforcement in 1943. In this process, what deserved special attention was how the Office concretely made preparations for the

enforc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ree years after the decision, specifically on how the Office mapped out the financial basis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For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the greatest difficulties of enforcing obligatory education lied in rapidly increasing classes and cultivating a sufficient number of qualified teacher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in making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for students over the legal range of ages for public school education, both of which would entail great expenses on the colonial finance.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ly available data, it could not be explicated that on what kind of financial project did the Office make the decision of enforcing obligatory educa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financial layout of the Office would be primarily grounded on related materials after 1939.

In 1940, the committee commissioned b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for the discussion of primary educational system submitted a proposal regarding the financial adjustment for the enforcemen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The proposal advised that syutyos (states) be subsidized by the exchequer for an amount of 3.3 million dollars (of the local currency in Taiwan at this time) in 1943, then with an increase of 1.5 million dollars for each year, until the total amount of subsidy came to 10.8 million dollars in 1948. As to subsidies for teaching faculties in public schools, half of the required amount would be financed by the exchequer from 1943.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otal subsidies from the exchequer w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syutyos. On the one hand, half of the amount of subsidies would be allocated to syutyos for their disbursement of the salaries of teaching faculties in public schools, based on the yearly accounts of the total amount of salaries dispensed by syutyos. On the other hand, the other half of the amount of subsidies would be distributed among public schools in proportion as the recorded number of classes at the end of April each year. In view of the above design of financial distribution,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seemed to rely on the subsidies from the exchequer for the enforcemen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instead of collecting taxes for new items or raising taxes to meet the extra expenditure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issued in 1942 b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the education budget of syutyos (states) had increased with an additional amount of about 6.2 million dollars from 1939 to 1942, while the education budget of shikaityos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had enlarged with an additional amount of 5 million dollars arou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financial problems happening as a result of the budget increas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ree years, there was a growth of about 800 to 1000 classes in public schools around the island per year. As for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nforcemen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in 1943 and the expected accomplishment of the enforcement in 1948, the number of classes in public schools was assumed to show an increase of 700 to 800 classes, whose expenditures were supposed to be less than those of the preceding preparation period. Grounded on this way of calculation,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estimat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serious problem in local finances after the enforcemen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Despite the verbal promise made b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of not adding to the burden of local finances and despite the increase of subsidies for local budget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spreading education at this time came from public donation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ever

conducted a study on the sources that supported expenditures on educatio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governance in Taiwa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expenditures on primary education at that time, except the salaries of teaching faculties, were mostly supplied by the local public through appointed or voluntary donations. This study focuses on materials and situations related to education before the early 1910s. After 1920s, because of the revision of the local system, local organizations became the subject of establishing elementary schools and common schools. Expenditures on primary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salaries of teaching faculties and various items of subsidies, were disbursed by the budget of syutyos (states) when other items of expenditures were undertaken by the budget of shikaityos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At this time, it could be discovered that the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general public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e capacity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evident need for more education prompted people of the general public to satisfy their own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through additional payment for study. Faced with this circumstance, the government, taking the financial difficulty into account, was either glad or reluctant to accept or even encouraged this channel of acquiring education.

Performing the role as the subject in charge of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s of primary education, both the authorities of shikaityos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as the most basic rank in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the authorities of syutyos (states) burdened with expenses of the salaries and subsidies of teaching faculties had to think carefully by taking many different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about how to draw up and distribute their budgets, how to carry out thorough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umber of local school-age children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school education, and how to fram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accordingly to settle difficulties. To illustrate how these diverse factors would be mutually interwoven to affect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up Hsinchu City as the subject of a case study to observe the preparation tasks undertaken by local divisions of government and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public during the period with a thriving growth of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At an early period, almost all of the Japanese school-age children living in Hsinchu City had already started to receive school education, whereas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school-age children in the same city who received their school education had increased gradually in a growing proportion—58 percent of them were educated in school in 1936, about 65 percent in 1938, and about 73 percent in 1942.

The tremendous boost in the number of classes in public schools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and its syutyos (states) to the serious problem concerning the insufficient number of qualified teachers. Responding to this problem,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set up two more normal schools in Pingtung and Hsinchu in 1940, with the single department of one-year training in lecturing in their first year of establishment, for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more teachers within a short term. Hsinchu Syutyos, like other syutyos, also faced the difficulty in arranging teaching faculties.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y, the authorities of Hsinchu Syutyos had organized several three-month seminars for training provisional teachers. After undergoing the quick training provided by seminars, the trainees became substitute teachers in public schools. Although the syutyos authorities recognized that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cultivated through provisional training seminars would be inevitably inferior to those teachers who received normal education, they could only accept the expedient to supply the pressing need for teachers. There were several sources of teachers at this time. Take the statistics made by the authorities of Hsinchu Syutyo in 1943 as an example. There were 250 teachers in total provided for public schools in Hsinchu, including 100 normal school graduates distributed in proportion to local requirements across the island, 70 girls' school graduates, 50 trainee teachers graduating from short-term seminars organized b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and 30 trainee teachers graduating from seminars held by Hsinchu Syutyo. In addition, a number of newly built business supplementary schools during this period, such as Hsinchu Girls' School of Domestic Science, also significantly served the need for teachers.

Since the late 1930s, the local public had given a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expression of their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The offi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had attributed the phenomenon to the stimulation encouraged by the exigency in China, which elevated the lo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being the people of the Japanese Divine Emperor and as a result raised the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local public. This understanding was obviously the one-sided view of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The issue abou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local public were generally inspired for more education is worth a deep study. Proba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phenomenon might pertain to the stimulation activated by the enforcemen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and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had not appropriately responded to the previous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proposed by the local public.

In 1940, there were 4 common schools and one junior school in Hsinchu. Among the four common schools, only one was established with an affiliated division of junior education. In 1941, there were a newly founded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ree newly incorporated common schools as a result of the expanded range of Hsinchu City. As for schools above the level of primary education, there were one high school and one girls' high school. In addition, in 1940, Hsinchu Business School and Hsinchu Girls' School of Domestic Science (a private business supplementary school, changed into a municipal school in 1941) were established. During this period, 72.75 percent of school-age children in Hsinchu received school education (among which 89.28 percent of the children were male and 56.23 percent of them were female). In 1942, two of the public schools in Hsinchu set up their division of junior education. In 1943, another public school was founded.

Although Hsinchu Syutyo continuously proceeded with the task of expanding it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expansion seemed unable to meet the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of local residents. The local public therefore filed their appeal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authorities for a more active aug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ince 1940, the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sub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by the local public had focused on two sorts of school establish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local public expected the government to set up more common schools (or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lass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requested the government to found mor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bove the level of common school,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vision of junior

education in common schools, of business schools, business supplementary schools, and Hsinchu Second High School. These demands apparently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the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of local people in Hsinchu for primary education that had prevailed in many places and for education above the junior level had exceeded the range that could b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available data, except a few recorded personal nam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who locally advocated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as unable to find out, so was any possible relationship of reciprocity or any kind of ideal that might push them forward to bring benefits to lo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can only make use of the limited available data to describe how and why the local public endeavored to create mor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children even under the pressing conditions of wartime.

In the process of expand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general public in Taiwan had actu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expansion through their donations to school establishment, whether voluntarily or involuntarily. The total sum of these donations was relatively limited when compared to the total required expenditures on education, but the respective amounts of several donations were still considerable. For instance, even though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some normal schools, of Taoyuan Girls' School of Domestic Science, and Miaoli Girls' School of Domestic Science had not been sure about the success in duly achieving the expected amount of donations, these schools were eventually founded, supposedly to a great extent owing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their enthusiasm for educat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files preser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reports issued b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t that time as the main resources of materials for study.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obligatory educational syste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n account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Taiwan in the lat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of education affairs in local societies. The discussion of the obligatory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is paper has not yet encompassed all the details related to the issue in question. A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will probably be accomplished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ther connected issues aroused in the late period of colonial governance.

文化徵用與戰時良心

—地方文化論述、
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

■ 柳 書 琴 (國立清華大學校) ■

文化徵用與戰時良心

— 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 —

柳書琴(國立清華大學校)

〈目次〉

- I. 前言
- II. 台灣地方文化論述與戰時文化甦生
- III. 戰時文化轉折與台北帝大教授的文化介入
- IV. 文化甦生中的文學科教授們
- V. 結論

I. 前言

在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極為困難的八年期間，台灣文化界曾透過對於地方特殊性的強調，掙扎於國民文化、日本精神的徵召面前，在有限條件中持續演替創造；並在法西斯主義「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等概念臻於頂峰當時，在所謂的「皇民化運動」下，產生了一段本土文化於1937-1940年間受抑，而後又於1940-1943年間復甦的文化轉折現象。

戰時台灣的文化甦生現象，是翼贊運動在台灣掀起的官方文化戰、1930年代中期以後浮現的在台日人文化意識，以及挪用翼贊文化論述而獲得生機的本土文化運動，三者交相促進的結果，促使三股文化力量相互激發的觸媒，則是大政翼贊運動所主導的「地方文化振興運動」。肇始於日本內地的「地方文化振興運動」擴及殖民地台灣之後，引發了以總督府文化機構與本土文化人為兩極的官/民地方文化論述，兩者在外貌上皆以「台灣地方文化」論述的形態顯現，不過內涵與精神卻有根本的差異。可稱為「官製地方文化論述」的前者，宗旨為戰時國民精神建設，指向「國民性」建立問題；宜稱為「本土地方文化論述」的後者，則關切台灣文化的主體性維繫與持續現代性，指向「地域主體」的建立，亦即台灣性問題；最後，介在「國民性」與「地域主體」兩端之間的，則是在台日本文化人從在台日本人社會文化處境與未來願景出發的「外地文化論述」。

戰爭時期，往往也是文化混合加速的時期。戰時本土文化與區域文化的混合，對文化體內部的原有質素與發展趨勢，以及其與區域文化或全球文化的後續互動，均會遺留某些影響。1920、30年代以來本土蓬勃發展的鄉土文學/文化論述，隨著戰時蓬勃的外地文學/文化論述的加入，以及翼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的提倡，逐漸匯激出一股豐富多面的地方文化運動。包含複數脈絡與源頭的地方文化論述，成為了活化1935-1945年間台灣文化發展的新動力。除了長期耕耘台灣文化藝術，熟稔台灣文化議題的本土文化人之外，官方文化機構、帝大學者、在台日本文化人也開始積極走向文化場域的中心，成為文化界的一股新勢力。外地文化論述集體這個並非均質的群體，有的偏向肯定與協助官方論述及政策，有的則同情並扶持台灣本土文化運動，帶有濃厚菁英色彩。其中，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可謂言論與實踐上的領導者，具有文化論述及意見「火車頭」之地位。

對於戰爭期台灣主體論述的建構具有關鍵性影響的「地方文化論述」，便是由殖民政府文化機關、在台日本人文化菁英、台灣本土文化人投入的上述三種論述，在不均衡的競爭與互利結構下，交互

共構而成的產物。本文嘗試探討下列議題：(一)、在戰爭擴大化、長期化的背景下，大政翼贊會地方文化振興論如何成為台灣地方文化論述的觸媒，又如何在皇民化運動的制約下啟動戰爭期的文化復甦？(二)、在台灣文化由「鄉土文化」向「地方文化」進行轉折，以及帝國軍事擴張引動的台灣學建構熱潮中，素以南方研究、台灣研究為重點的台北帝大教授們，扮演了什麼角色？(三)、在台灣文化由低迷而活絡，復又納入更嚴格的統制的波動裡，學術動員體系中技術性資本最低的文學科教授們，如何在島內文化的扶掖、指導或統制方面發揮專業影響，成為文化統制施行的助力，或者本土文化界的屏障？

II. 台灣地方文化論述與戰時文化甦生

構成戰時台灣地方文化論述核心的「地方文化振興論」，是近衛內閣大政翼贊運動文化部揭櫫的新文化治理原則。大政翼贊運動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調整擴大，它啟動了1937年8月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之後一次最為重要的政策轉彎。作為運動核心，翼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被視為建設戰時「新國民文化」的下手基礎，以農村文化／地方文化振興為核心思維。相較於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偏重形式主義的硬直皇民化政策及殖民地文化壓制主義，翼贊運動轉向啟動非都市地方文化潛力及尊重地方傳統與特色的文化動員主義。¹⁾ 故而，翼贊運動雖不脫文化治理範疇，它對於農村／地方文化振興與都會文化健全轉化的整體思考，以及內／外地一體施行的原則，卻為戰時地方文化(特別是殖民地)的實踐或想像，增添了更多的政策合法性與表述空間。

透過革新地方文化的指導理念尋求「國民文化」的革新，帶有濃厚納粹文化政策色彩的此一運動，意圖透由地方文化振興、戰時娛樂指導之名，積極介入文化活動。結果產生了雙面效應，一方面由於統制的施行，產生了朝國策方向納編與變質的負面現象；另一方面，因為官方的少有重視，引發了短暫的復甦。除了日本內地、殖民地及「滿洲國」之外，中國占領區(譬如，北京、天津、南京等)，也受到翼贊文化運動深淺不一的影響。²⁾ 在朝鮮，1940年12月成立的「國民總力朝鮮連盟」(以下簡稱「總力連盟」)及次月設置的「文化部」，為翼贊文化運動朝鮮推動機構。總力連盟改組自1938年成立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朝鮮連盟」，為戰時動員的新體制。1937年7月以後，朝鮮被設定為「大陸兵戰基地」，並開始施行「內鮮一體」的皇民化政策；在皇民化政策下遭到嚴重壓抑的朝鮮文化界，隨著文化部的設置及「朝鮮新體制」的轉化性政策，獲得了緩和。在台灣，大政翼贊運動的執行機構為「台灣皇民奉公會」，該會宣稱基於「台灣一家」理念，在後方推動激發戰意、實踐決戰生活、強化勤勞態度、建立民間防衛等運動。與日本及朝鮮同樣，皇民奉公會文化部為翼贊文化運動的台灣推動中心，此後文化部主導的「奉公文化運動」取代國民精神總動員模式，成為戰時台灣文化治理的新型態，稍不同的是該部成立時間較晚(1941年8月設立)。

翼贊文化運動引動了帝國及殖民地同步性的文化甦生效應，除了因其彈性特質之外，還包括中央政體機構到殖民地／占領區在地承作機制的整體配合。吳密察曾從近衛內閣智囊團「昭和研究會」與大政翼贊會成員的決策影響；文化部首長等人的文化人背景及鄉土文化觀點；翼贊地方文化運動台灣版官方宣言的出現(1941年1月《台灣時報》「皇民化的指導原理特輯」、中村哲〈作為文化政

1) 參考，吳密察(著)、矢野充宏(譯)〈『民俗台灣』發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編)《台灣の「大東亞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12月)，頁231-265。

2) 相關研究可參考，施淑〈文藝復興與文學進路——《華文大阪每日》與日本在華占領區的文學統制(二)〉，《新地文學》第四期，2008年6月，頁21-37。

策的皇民化問題))；台北帝大副教授中村哲與昭和學會重要成員東京帝大教授矢部貞治的師生關係，揭示該運動經由學術／官僚體系下達文化界，由台北帝大政治學教授在台灣啟動宣傳與文化引導的政治擴張過程。³⁾

除此之外，戰爭擴大化、長期化引發的區域地緣政治變化以及殖民權力結構調整，對於地方文化論述及地方文化復甦，也有良性影響。帝國日本的空間重塑，為近代全球化歷程在東亞區域的一段畸型展現，於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接連爆發，廣大占領區出現之後，臻於高峰。1940年以後台灣總督府官方文書中，已常使用「南方圈」來稱呼「南支」、「南洋」之地理範疇，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南方圈」一詞蔚為流行。此時，「南支」所指的福州、廈門、汕頭等日本帝國領事館所轄區域；以及「南洋」所指的以馬來群島為中心的菲律賓、英領婆羅洲、英領馬來(馬來西亞)、蘭領印度(印尼)與帝汶、法領印度支那(越南)、暹羅(泰國)等⁴⁾之廣闊領土、戰略地位與豐富資源，已成為總督府向外延伸其帝國使命與管轄勢力之目標。「大東亞戰爭」時期所指的「大東亞」地區，泛指台灣、新南群島、關東州、樺太、南洋群島、朝鮮、滿洲、中國占領區、青島租界、東南亞、南亞、南洋及南太平洋……等廣大地域。在占領區快速浮現的新領土視野與資源開發需求中，殖民地台灣等「外地」逐漸從帝國邊緣向內部浮靠，成為帝國與戰地或新占領地的中介，與內地的層位落差相對縮小，甚至被譬喻為「大東亞建設之左右手」⁵⁾，成為帝國有機體內部的重要組成。「帝國最早的殖民地」台灣，此刻已成為僅次於日本內地的一塊——「有歷史」、「有教化」的現代新國土。

在「南方圈」與「大東亞共榮圈」的擴張過程中，「帝國化」歷程攀向巔峰。台灣也在帝國擴大化的歷程中，隨著地理想象、地域歸屬感、地緣政治的變化、皇民化運動的展開，進一步去中國化、脫國族化，化約為帝國境內「特殊的地方—南方」，一個具有從南方出發前進更為南方之地潛力的一—「南進基地」。在帝國境內眾多「地方」一一湧現之後，過往以同化主義為主軸，著重「內／外地」差別治理的文化政策，雖不改其日本文化優位的本位主義，但是此時由於帝國轄下無法遽然消融的多種差異文化的加入，不僅被迫容認地域社會內部的多元文化現實，甚至還必須進一步期許異己文化發揮文化創造功能，對日本文化進行俾補。

空間重塑的現實基礎為異國領土的軍事占領，其中至為切要的利益莫過於資源占有。為了快速徵用豐富的新占領資源，除了軍事控制之外，必須進行體系性的學術調查、開發研究與徵用計劃。此時分踞東南亞與東北亞大陸邊緣的台、朝兩大殖民地之官僚機構、學術組織、民間菁英乃至一般人力，依著地理與文化的親緣性，遂被賦予了他們自明治時期承受「南進」、「北進」帝國使命以來，最為巨大而沈重的一次任務。然而這個沈重的帝國先鋒角色，卻也使台灣、朝鮮與日本的關係，從「殖民地／殖民母國」上下隸屬的單向關係被釋放出來。在帝國多向度地域發展的需求下，殖民地得以在某種程度內回復或拓展它與其它周緣地域的關係，譬如，台灣與華南、海南島、東南亞的關係，朝鮮與滿洲、蒙疆的關係。領土、資源、人力、人才有限的日本，其帝國的擴大與空間的重塑，終究不得不面對意圖以日本化予以隔斷的殖民地，重新恢復其與原屬地域社會的聯繫。侵略戰爭帶動的種種變化緩和了皇民化運動下急促貫徹的文化一元主義，對殖民地地域優勢與文化資源的重新評估，起了正面的催化效用。

在帝國空間重塑的帶動下，殖民地在空間、時間、文化及認同方面的重塑，也併聯著發生。至遲

3) 參見，吳密察〈『民俗台灣』發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前揭文。

4) 參見，周婉窈〈從南方調查到南方共榮圈—以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法屬中南半島的開發為例〉，「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27-28日，頁2。

5) 此語係中村哲在文藝對談的公開場合所言。參見，〈中村哲、龍英宗之座談會—關於台灣的文化〉，《台灣藝術》4卷2號，1943年2月；彭萱中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0月)，頁76-86。

在1930年代中期左右，台灣大眾已普遍有了透過身體感官，體驗並且內化新殖民時空的經驗。此外，不止於具體身體經驗，也不限於島內地理想像，即便是殖民地都市裡的一項空間重塑，往往也能向外擴延，而在時人的社會意識中，升起充滿想像力與開拓性的「世界圖景」。這圖景既是殖民地式的、帝國式的，也是地域性的、全球性的。它帶著殖民地人民認知世界的特定立足點、眼光與期盼，又難以逃脫對帝國擴張想像及帝國階層式世界觀的宿命接受與不自覺複製。不斷隨著戰爭報導充斥在生活周邊的世界圖景，促使殖民地的人們逐漸超越民族或民族國家的舊有共同體認知，形成另一種更為浮動也更加廣闊的「帝國共同體」或「東亞地域社會」的模糊想像。⁶⁾

地方文化論述的熱絡化，首先受到帝國空間重塑、中央文化政策轉向等外部因素直接影響；其次則與殖民地官僚體系與旅台日本住民「外地化」、台灣菁英與本土社會逐漸「帝國化」（特殊地方化），亦即兩者在不同背景下共同「地方化」的內部趨向，有著重要關聯。經過40餘年統治，台灣總督府官僚體系逐漸自足化、資深化，日人官吏在台灣形成了一個土產化的殖民地官海，戰時殖民地行政尤其強調符合台灣特殊狀況之務實走向。在「學經歷／民族出身／官吏階級秩序」相互對應的差別結構維持不變的態勢下，官僚體系在不得不正視行政特殊性的時代中持續朝「外地化」演化，台灣人官吏儘管在數量與位階上始終存在弱勢，卻也持續緩緩向上流動與在下擴充。⁷⁾ 在官僚體系「地方化」的過程中，在台日本人意識的形成、台灣人意識的強化，兩者之間相互交涉，彼此激發。1935年中期以後，「灣生世代」相關論述，以及在台日本人對戲劇、文學、藝術等的文化消費與娛樂需求，在盛極一時的本土文化菁英的台灣鄉土論述之外展露頭角，成為文化界的新興議題。在台日本人的文化意識與文化需求逐漸成長，台灣知識階層也持續在長期的跨文化學習、抗爭與斡旋中，透過既是學習窗口也是抵抗對象的日本，吸收現代性及各種異文化養分，開展混合式的台灣本土論述與現代文化實踐。在種種因素的累積下，包含帝國文化治理、外地文化意識、台灣本土意識等多重相異向量的「殖民地地方主義」，為非常時期下台灣文化的復甦提供了重要土壤。

台灣地方文化論述在新體制下依附日本官方的翼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而生發，但由於官／民、日／台及知識份子之個別思維差異，因而產生了大致可區分為以大政翼贊會文化部、台灣皇民奉公會文化部及與此附和的在台日人官僚、學者、文化人為主，堪稱為文化戰的「官製地方文化論述」；由台／日自由主義立場的官僚、學者、文化菁英所建構、觸發台灣文化甦生的「本土地方文化論述」；以及以在台日本人為主，基於在台日本人社會文化意識、外地文化定位渴望及外地文化消費需求而形成的「外地文化論述」等，三種貌合神離的立場、思維、論述與行動。地方文化論述擴及台灣之後，這股官製文化運動理念在殖民地日本學者與文化人共同穿針引線的詮釋解讀之下，很快便與1930年代累積到高峰的台灣鄉土文化運動，以及1930年代逐漸浮現的在台日本人外地文化意識，產生了官／民文化論述的各自表述與混合匯聚。其結果是短暫搗亂了戰時文化統制的單向推進，在官方制約存在的前提下，催發了一股潛伏於1940年底到1943年底之間，遍布於戲劇、文學、民俗、民藝、音樂、廣播、美術……等領域的——台灣文化甦生。文化甦生現象不僅限於台灣，在日本內地、台灣、朝鮮與「滿洲國」皆有類似效應，只不過由於施行政策與文化慣性的差異，具體表現不盡相同。以同時期的朝鮮為例，朝鮮知識階層也積極把握政策轉向中的新論述空間，利用朝鮮地方文化運動總轄機構「總力連盟文化部」的設立及推行過程，提出種種文化意見，爭取民族文化延續的機會。⁸⁾

6) 譬如作家朱點人便在小說中銘刻了受殖者覺察到殖民地物質建設及空間重塑被歷史化的那一剎那，所體驗的帝國無邊勢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民族認同、歷史記憶、身體感官的多重失落。參見，朱點人〈秋信〉，原刊於《台灣新文學》1卷2號，1936年3月。發表時遭到當局削除，後收於《朱點人、王詩琅合集》（台北：前衛，1991年2月），頁225-237。

7) 參見，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官僚的政治史—朝鮮・台灣總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年2月）。

8) 參見，宮本正明〈戰爭期朝鮮における「文化」問題〉，《年報・日本現代史》叢書第7號，赤澤史朗（等編）

以翼贊文化運動為觸媒，在殖民地地方主義的累積、戰爭長期化帶動的政策轉型、帝國空間重塑造成的社會文化意識變遷之中，文化活動獲得了復甦。文化甦生的整體背景為文化動員，在文化動員的需求下，本土知識階級在近代化、日本化以及傳統文化之間，與統治當局進行充滿矛盾而又富於戰略的角力。而台北帝大學者、在台日本文化人、文化團體，則被捲入官方文化運動中，開始了他們對殖民地文化場域未曾有過的深廣介入；在前述三種台灣地方文化論述中，台北帝大文學科及關心人文藝術領域的學者，都有不同的介入。無論殖民者或受殖民者階層，戰爭下的文化問題都成為文化人此時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課題。

III. 戰時文化轉折與台北帝大教授的文化介入

戰時文化統制政策未曾停歇或退轉，戰爭期整體文化環境是一個逐漸趨向變質的過程。只不過由於階段治理模式的調整，以及官方／本土／外地地方文化論述三者的勢力消長不一，遂產生了文化自主發展脫逸於統制之外、本土地方文化論述與外地文化論述激烈競爭，抑或文化統制凌駕於自主發展之上的波動及轉折現象。

戰爭期台灣文化的轉折，除指發生於1937-1945年間台灣文化的起伏波動、文化統制下的文化質變之外，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內容，在於台灣文化發展主流、議題、概念與性質與中日戰爭之前的差異。戰時本土地方文化論述，除了承襲1920、1930年代台灣文化論述主要成果之鄉土文化論述之外，也隨著快速擴延的東亞占領區內新政經文化內容的出現，發掘出與鄉土文化運動思想基礎相異的一些新邏輯。「地方文化」一詞在1937至1945年間所激發的新意涵，已使以地方文化論述為核心的台灣本土文化論述，在暗承以社會主義或民族主義為基礎架構的30年代鄉土意識之外，增闢了另一面與戰爭帶動之帝國空間重塑相關的抗爭維度。那是——戰時台灣以「帝國下的一個地方主體」，參照持續增加的帝國版圖與成員，所提出的有關「台灣」在「大東亞」中的位置與關係的重新想像。空間重塑及日益嚴峻的準戰體制及戰時殖民地政治情勢，帶動了文化意識、文化抗爭與文化想像的商榷與位移。不同於30年代前期，「鄉土文學」一詞在1937年以後的台灣已成為隱含台灣人反動思想或民族主義的敏感用語。在「大眾文藝」、「殖民地文學」、「報告文學」等論題也未能成為新的文化領導概念之際，戰時台灣文化論述的主流話語，便逐漸被具有政治曖昧性的「地方文化」一詞所取代。

中日戰爭前後台灣文化論述思維與活動形態的轉折，即鄉土文化論述的退位與地方文化論述的登場；然而兩者並非斷裂與對立，而具有承續與拓展的關係。就當時的指涉而言，「鄉土」一詞對應於民族／國家，「地方」對應於具有全球性／區域性概念的帝國。地方文化不以「鄉土」而以「地方」命名，隱含著承認台灣隸屬帝國地方細胞之基本性質。故而不僅是名稱變異，在論述內容、批評位置與文化邏輯方面，地方文化論述皆與1930年代前期以「帝國下的一個民族主體」所構建的「帶有民族主義分離色彩或社會主義世界主義想像的鄉土文化」激進意象，產生了錯位。在翼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中，「地方文化」、「國民文化」及「大東亞文化圈」的關係辯證，在帝國論述與殖民地論述之間存在著分歧。基於「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及「完成國防國家體制」之國策考量，帝國論述強調「國民文化vs.(複數)地方文化」以及「大東亞文化圈vs.(複數)地方文化」之間，一頭多體的「首／體」、「領導／支援」及「指導／回饋」關係。也就是，意圖透過矯正「中央文化」之菁英主義、個人主義、都會中心主義，引動具有集體主義文化優點的「(新)國民文化」、「(新)大東亞文化」、「(新)

國民精神運動」，進而廣泛策發日本內外地的國民總力。殖民地論述卻在「總力戰」這個無能違抗的國策前提之下，朝「大東亞文化圈」下「地方文化體」自有的文化傳承以及差異文化體系存在的必要性等面向發揮，藉此試探地方傳統維護及多元文化主義扎根的縫隙。

連續戰爭使台灣文化加速被編入「帝國下的地方文化」之一環，日本、台灣、朝鮮、「滿洲國」乃至中國淪陷區，因此產生了程度不一的跨域共存感、地方交流與文化連動，至少也浮現了對交流與連動的資訊、想像與期待。1942年底，「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台灣作家代表歸台之後，主要派遣單位「台灣文藝家協會」會長矢野峰人，曾以「台灣文學的黎明」慶賀此一文化盛舉。他認為，原來不過屬於地方性的本島文藝，過去被內地當作「影子」一般漠視，此次卻由於大會的參加，「使我們的聲音傳到對岸及南方諸國」，本島文藝因而「首次被公認了存在的意義」。「如今因獲中央承認而成為日本的一份子，甚至躍昇到可與鄰國往來的地位。這些都真正是台灣的文藝史上從未有過的事，甚至文化史上亦未曾見過前例。」⁹⁾帝國空間重塑、資源徵用需求、南方地域優勢、殖民地官僚機構與移住民的外地化發展，以及帶有儀式性的帝國各地文化代表的串聯活動等多種因素，帶動地域角色的上昇與地方主義的抬頭。在地方文化論述在台傳播的過程中，不論在文化措施、官方致辭、公開座談、媒體專輯、各式文論、創作實踐中實際鋪陳與開展的過程，或在文化甦生潮流中湧現的大小活動裡，皆可觀見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那就是1928年建校、經十餘年學術累積，具有文化介入優勢與台灣／南方研究專業的——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們對殖民地學術及文化活動的參與。

作為殖民地最高學術機構，1928年台灣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與1926年朝鮮設置的「京城帝國大學」同樣，除一般性學術目的之外，還帶有強烈的政治性¹⁰⁾、國策性(北進／南進)、殖產性(殖民地資源及產業之開發、培育、利用與研發)，以及樹立殖民學等特殊宗旨。台北帝大為帝國唯一位居熱帶的大學，基於特殊地理位置，創校之初主要機能便定位於熱帶醫學、熱帶農／理學等南方產業及熱帶科學方面，後來隨著日軍侵略及占領的需要亦擴及南方人文研究領域。這些可以泛稱為「綜合性熱帶殖民學」的學科，遍佈人種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文學、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心理學、哲學、宗教、政治學、經濟學、風土氣候學、動／植物學、生態學、土壤學、農林畜產學、園藝學、作物學、造林學、水產學、農產加工學、農藝化學、製糖化學、釀造學、理學、工學、熱帶醫學、獸醫學、病理學、衛生學、藥學、昆蟲學、菌學、微生物學、地理學、地質學、能源科技……等，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科學及應用科學多種領域。直到日本戰敗為止，台北帝大設校十八年內最具影響力的講座、研究組織或學術成果，多與輔助殖民統治或侵略占領之各項調查、研究、徵用與開發事業有關。滿洲事變後，戰爭與學術相互配合的趨勢逐漸明顯，中日戰爭後加劇¹¹⁾。此後直到太平洋戰爭末期，帝大教授們紛紛帶領研究助理及學生，或投入調查事業及報告書編纂(譬如，1940-1942年的南方學術調查)¹²⁾，或組織學術調查團隊(譬如，京城帝大1938年「蒙疆學術探險隊」、台北帝大1940-1942年「海南島學術調查團」)，或開設新研究組織¹³⁾，或增設與南方作戰及南方資源

9) 參見，矢野峰人〈台灣文學の黎明〉，《文藝台灣》5卷3號，1942年12月，頁6-9。

10) 譬如，回應社會要求、籠絡菁英、涵養國家思想、解消藉爭取高教設立凝聚的民族運動等。

11) 1935年後台北帝大某些講座開始從事日軍中國新佔領地之調查，1938年日軍攻打華中時為解決戰線過長的補給問題，決定開闢現地農場，也委任台北帝大教授進行實地調查，此一模式後來亦被日軍採用於南洋戰爭之中。參見，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台北帝國大學為中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1年4月，頁218-219。

12) 1940年後，配合日本軍事南進政策的議定，台北帝大配合時局的南方學術調查成果大量出現，截至1942年「南方關係印刷物目錄」統計為止，總計523輯的南方調查書中，有82輯由台北帝大師生所完成。參見，葉碧苓〈台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6月，頁102-106。

13) 譬如，京城帝大方面設置的有：1932年「滿蒙文化研究會」、1938年「大陸文化研究會」、1939年「生藥研

開發相關的講座，或以顧問、理事等要職支援總督府官廳外圍團體的調查研發工作(譬如，1939年成立的「台灣南方協會」)。多方面地投入並且持續擴大他們對總督府官廳施政及帝國軍事行動之專業協助與技術配合。

在理工農醫等其它四大學部教職員及學生為配合戰爭調查及研發事業而奔忙之際，應用性較低的文政學部方面也同樣受到調查及研究事業引發的殖民學熱潮所籠罩。只不過，在包含文學科、史學科、哲學科、政學科四科，以及與南方／台灣研究淵源最深的「南洋史學講座」、「土俗學·人種學講座」、「言語學講座」、「心理學講座」四講座在內的文政學部之中，仍以史學科在1936年6月起為推動台灣關係史料的蒐集整理與島內史蹟調查而設置的「台灣史料調查會」，以及在「南支·南洋」研究方面具有獨特成果的「南洋史學講座」(由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教授擔任)及「土俗·人種學講座」(由移川子之藏教授、宮本延人助手擔任)，最具有參與南方殖民學的技術資本。在研究室與各科學會方面，則以跨學科的「南方土俗研究會」(1929年成立，發行《南方土俗》，1940年改稱《南方民族》)，以及師生人數眾多、學術活動鼎盛的政學科「金曜會」最富凝聚力。對戰後台灣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有重要影響的這些學者們，以史學科、政學科為主，亦包含言語學講座之小川尚義、淺野惠倫等，師生人數極少的哲學科教授，乃至理農學部教授及帝大總長弊原坦等等，經常帶領助理及學生齊聚一堂，進行例會討論、演講等相關之學術交流及傳播活動。在南進地緣性及學術軍事應用方面功能較為間接的文學科教授們，雖亦偶爾出席這些研究會或討論會，但是次數較少，參與程度也較淺。¹⁴⁾

不論理工農醫或文政學部，台北帝大教授對於官方戰爭調查事業與台灣研究的廣泛介入，使戰爭期地方文化論述在官方殖民地文化政策以及在台日本人文化論述之外，拉出第三個以專業殖民地學術機構為中心的向度。在三種勢力交互構築的論述空間中，台灣地方文化論述同時包含了從「國民文化」建設到「地方文化」發展等多種各異其趣的目標，混雜了國策思維、殖民統治理念、自由主義本土／外地知識人之各種不同文化願景。台灣地方文化論述的重要價值之一，在於產生了間隔統治階層文化政策與本土文化界直接交鋒的緩衝作用，闢出一隅多重文化勢力斡旋的空間。姑且不論個別政治動機的輕或重，日人中心觀點的深或淺；在調查事業與公共發言上舉足輕重的台北帝大學者，他們日益積極的台灣文化論述或發言，在開拓與維繫戰時台灣文化論述的空間與合法性方面，皆有重要助益。在皇民化文化改造、總力戰文化動員，以及複數民族文化活動錯雜競合的戰時文化情境下，透過學術專業批評、一般文化論述形構的此一「論議的公共空間」，也使得總督府的政策制定與文化操作無法過於武斷，而使台灣文化人與官方文化政策的互動斡旋變得更有空間。

IV. 文化甦生中的文學科教授們

在日趨嚴峻的武力戰、知識戰與資源戰中，文學科多少顯得「無用武之地」。不過，文學科在神田喜一郎教授領導的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的「東洋文學講座」中，竟也培養出了諸如吳守禮、田大熊、

究所」、1942年「高地療養研究所」、1945年「大陸資源科學研究所」。台北帝大方面則有：1939年「熱帶醫學研究所」、1943年「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及「南方人文研究所」等。這些機構都直接間接為帝國軍事行動提供了所需要的自然、人文、資源之情報蒐集，以及農學、化學、細菌學、藥學、醫學、能源科學等應用科學之實驗及研發成果。鄭麗玲，前揭文，頁210-255。

14) 參見，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創刊號，台灣大學台灣研究社，1997年5月，頁72-98。陳昭如、傅家興〈文政學部—政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創刊號，頁19、22。

黃得時、稻田尹等，專精於台灣的閩南語、歌謠、對聯、漢文古籍、漢文傳統文學史、台灣現代文學、布袋戲、歌仔冊等的蒐集、編譯、注解及研究的優秀學生們¹⁵⁾，可見台北帝大蓬勃的台灣研究及南方研究風氣，對整體學部、科系及師生們的文化關懷與研究議題，具有相當的刺激性與影響力。除了整體學風對文學科台灣文化研究的影響之外，在文學科教授中也有對總督府南方政策及戰時熱帶學術潮流敏感，並且較早受到占領區文化工作或南方調查事業委託者，那就是前述的文學科元老、擔任東洋文學講座的神田教授，以及擔當英語、法語、文學概論等科目的中生代講師島田謹二。

出身京都帝大、師事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名師，且家學深厚的神田喜一郎，因為精通中國古籍，在廈門大學淪陷被日本南支派遣軍接收後，於1938年7月和擁有土俗學、考古學專業的移川子之藏及宮本延人兩位史學科學者，受聘協助處理在戰火中受創之廈大圖書館及博物館珍貴典藏。後經確定圖書室未受殃及，但神田仍建議基於徹底清查需要，將包含珍本線裝書、近代鉛版書及西文書在內的書籍，全部運回台北帝大，這批圖書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後才被廈門當局索還。¹⁶⁾ 島田則因精通法語，受聘擔任台灣總督府外事部外圍團體「台灣南方協會」（1939年11月成立）推動的「南方講習會」法語教授工作。此外，神田的第一位台籍本科弟子田大熊(1929-1933年在學)，畢業後進入台籍生稱羨的台灣總督府圖書館任職，1941年起復轉往總督府外事部擔任雇員，負責華南文獻的翻譯事宜，其順遂之任職歷程背後應該也有神田教授的助力。¹⁷⁾ 上述可謂文學科教授及畢業生配合戰爭學術徵召的開端。1943年，神田再次受總督府委任前往另一個占領區香港，擔任「市民圖書館」（原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島田隨行赴任，擔當相當於副館長之職。當時在館內擔任要職，言行內斂、敏於觀察的香港知名文化人陳君葆，對島田言行的私下評價極為惡劣，幾乎可總結為「狼子野心」一語，對神田印象稍好，但也不無批評。¹⁸⁾ 他的日記裡不時流露占領區文化人，在冷眼旁觀殖民地大學日本學者作為帝國主義學術侵略機器一環之際，深藏於內心的警戒、疏離與強烈反感。

台北帝大台灣／南方研究關係學者，在當時包含日／台人在內的台灣研究知識群體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影響力已如上述，那麼文政學部教職員，特別是文學科方面，在戰時的殖民學熱潮及台灣文化界的位置與影響，特別是與文化甦生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文學科教職員亦屬於當時台灣研究知識群體中，占有龍頭地位的台北帝大台灣／南方研究關係學者之一環。透過上述介紹可知，文學科及其內部的兩大講座「東洋文學講座」（神田喜一郎擔任）及「西洋文學講座」（矢野峰人擔任），由於其以古典文學及西方文學為主的知識特性，較不具備切要提供軍事資訊、知識與技術的功能，故而在整體的帝大學術動員系統中，除了零星介入占領區圖書館行政、古籍整理、語學教授及情報翻譯之外，並沒有擔當長期性、體系性的大型調查、研究或研發計畫。不過，這卻不意味著他們以及文學科其餘教授，與熱烈的殖民學熱潮保有距離，或者沒有介入南方區域社會或台灣文化界一展所長的使命感和野心。和投注龐大精力於島外，並以調查研發為主要形態的理工農醫等學科不同，撇開匯聚學術大軍的南支、南洋、台灣相關調查、研究與研發計畫之後，便能發現文學科教授藉由學者之中介位置，位於官方文化機構與民間文化團體之間進行斡旋與指導，活躍於島內文化界的姿影。可以說，戰時島內文化界的指導與統制，正是文學科教授與其它學科「不共的使命」，教授們也因而受到總督府統治當局的聘任、委託、暗許或期待。

15) 參見，拙論〈文化遺產與知識鬥爭：戰爭期漢文現代文學雜誌《南國文藝》的創刊〉，國家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5期，2007年10月，頁217-258。

16) 參見，葉碧苓，前揭文，頁135-138。

17) 譬如，在《南方調查書》中，即有他譯著的《南支の桐油事業》（1941年）、《戦前のシンガポール事情》（1942年）兩種。

18) 譬如，他曾寫道「神田不住地在各書裡翻出他的名字來，似乎很怕我不認識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的神氣」。參見，陳君葆著、謝榮滾編《陳君葆日記》下冊（香港：商務書局，1999年4月），頁62。

以矢野峰人為例，擔任「西洋文學講座」、曾任台北帝大圖書館長的他，擁有與神田喜一郎不相上下之崇高學術名望。1935年以後力捧西川滿的他，在西川處女詩集《媽祖祭》發行之際，除了肯定其南國情調、異國趣味之外，更以「新時代的感性」高度讚揚這位年輕詩人將充滿瑰麗與幻想性的殖民地風土輸入中央文壇的成就，並認為它的誕生預示了外地文藝的新動向。¹⁹⁾次年，島田謹二也從「外地文學」作為一種「新藝術」、「新領域」的角度，對《媽祖祭》進行褒獎，指出它以不同於台灣作家的南歐式的鄉土主義，「使『台灣』首度被登錄在日本文學史」的劃時代意義。²⁰⁾此後從1938到1941年間，島田陸續以外地文學視野，撰寫以南島文學誌、華麗島文學志、外地文學、台灣的文學……為議題的系列論文，並以比較文學方法持續關注法屬殖民地文學，成為對戰時本土文壇造成強大對話性與衝擊力的「外地文學論」最主要的鼓吹者與理論化人物。憑藉學術界肯定及外地文學論的議題化效應，而不斷增益文名與文壇資本的西川滿，於1940年1月創辦《文藝台灣》以後，兩位教授長期提供稿件支持，隱然成為該誌幕後的學術顧問。

在矢野與島田對於三歲來台、近乎灣生世代的西川外地文學的肯定之中，可以看見此時普遍瀰漫於學者與文化人之間，一種立足於外地，以混雜性地方文化之異國情調，重新面對中央文壇的自覺與自負。這種概念與情緒的背後，除了日益成長的在台日本人社會文化意識之外；不能否認地，也包含了台北帝大學者對戰時南方殖民學新興趨勢的敏銳認識，以及對殖民學在帝國文化圈中不斷增長的重要性之樂觀自信。

與多數的台北帝大教授一樣，島田畢竟未曾露骨地躍入文化界，直接介入文壇統制或干涉文藝生產，但是他權威、多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學術式論述，已然對本土文學勢力與外地文學勢力的論辯競爭，投下了不小的影響。資深教授矢野峰人，則擔當較多政治性職務。1940年1月由作家與文藝愛好者自主凝結的「台灣文藝家協會」宣布解散，1941年2月同名的新協會在情報局策動下成立，矢野在堪稱文學統制機關雛型的新協會中，出任了會長。此後，類似任務緊隨不輟，直到戰爭末期。1942年8月「皇民奉公會」文化部成立，矢野以「台灣文藝家協會」會長頭銜，出任文化部文藝班班長，成為皇民奉公會文化部下級外圍組織及幹部。1942年12月，「大東亞省」設置及「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後，他密集在《文藝台灣》、《台灣時報》發表〈大詔渙發〉（1942年11月）、〈台灣文學の黎明〉（1942年12月）、〈台灣的文學運動〉（1943年1月）等文論，以善巧精到而不失學術氣質的談話，以最低的政治色彩，指示最新時局下台灣文學的應行方向。〈台灣文學の黎明〉一文，指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確立了將來本島文學的進路，台灣文學應從過去在「外地」之名下的自我設限中解放出來，全力邁向「作為日本文學一翼」的「大東亞文學」之路。²¹⁾這些帶有政策宣告性質的文論，除了否定隱匿於外地／地方等名義下任何游離於國策思想之外、立場曖昧的特殊文化政治，也強化了帝大教授在官方文化統制中所扮演的發言人、指導者之中介角色。「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後，矢野擔任常任理事；1944年5月，台灣文學奉公會統合兩大民間文學雜誌成立《台灣文藝》後，他一方面發表戰爭詩，一方面經常撰寫具有文藝指導功能的文論或〈後記〉，直到1945年1月該誌停刊為止。

不過，受到委任而協助文藝統制推動的矢野峰人，卻非引導、傳播或規範戰時文化運動及文化統制輿論的關鍵人。在地方文化運動與官方文化統制易於失衡的天枰上，企圖透過概念宣導及批評引導儘可能追求其平衡的學界推手，乃是前述協助翼贊地方文化運動啟動台灣傳播的「憲法講座」

19) 參見，矢野峰人〈《媽祖祭》禮讚〉，《媽祖》第6號，1935年9月；葉笛中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頁277-278。

20) 參見，島田謹二〈詩集《媽祖祭》讀後〉，《愛書》第6號，1936年4月；葉笛中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頁480-488。

21) 參見，矢野峰人〈台灣文學の黎明〉，前揭文，頁503-505。

教授中村哲。在此可以看見學術分工，也投現於文化統制與文化動員體制當中。除如前述，曾發表具有翼贊地方文化運動台灣版官方宣言性質的〈作為文化政策的皇民化問題〉²²⁾一文之外，早在近衛第二次內閣成立的1940年7月時，中村已發表了〈外地文學的課題〉一文，透過「外鄉人文學」與「外地文學」的關係釐清，呼籲外地文藝界進行方向調整。他認為「外鄉人文學」與外地書寫對象保有距離，有助於外地文學者知性之眼的啟發，但卻易耽溺於特殊性的過度強調而淪為異國情調的獵奇文學，因此在可作為「外地文學」的「前車之鑑」。「外地文學」應致力於「外地人生活實情」的務實描寫，避免陷入都市文化崇拜的一味盲從，或者刻意規避都市文化而故步自封之兩極狀態。²³⁾這篇發表於內閣更迭之際，帶有地方文化與都市文化機能辨證與文化方向檢討意圖的文論，同樣能佐證中村哲在新體制文化政策轉向的理念宣導方面，所扮演的引導性角色。

對於翼贊地方文化運動理念的認同，並不等於同意當時官方文化論述中甚囂塵上的「文化政治化」作法或激進的文化統制政策。從新體制運動啟動到1943年底文化甦生現象萎縮之前，中村哲所發表的多篇文藝評論中，皆流露他支持翼贊地方文化運動理念，卻排斥膚淺的偽地方主義或過度政治性的一貫立場。認同地方文化及寫實精神的他，認為在本地文化發展初期首先應培育寫實精神，他明言以異國情調為標榜的文學，不是寫實主義的「超越」而是其「逃避」，亦即不是一種現代主義，根本就是外地文學的「邪門外道」，並以此暗貶西川滿的唯美主義，褒揚張文環作品的雄渾有力。²⁴⁾反對異國情調式特殊性描寫的他，認為走在大稻埕街上，「我們並不覺得有什麼特異之處。大家都過著具有世界性的生活」。秉持地方文化運動之向下扎根精神，他提倡「腳的文學運動」，認為欲振興台灣的文學，「與其振興台北等都會的文學，還不如培育台中、台南、佳里這些地方的文學。」對於過於直接表達作家意圖與口號政治的濱田隼雄，也毫不客氣地譏之為「高級作文」。²⁵⁾當濱田躊躇滿志地發表《南方移民村》之後，中村也以冷語期許他「要自我省察」、「盡量排除政策性的文學」、「不要忘了作家的立場」。言辭犀利卻熟諳尺度的他，透過作品評論指引地方文學走向，同時對於文學政治化問題加以勸諷。另外，他更暗示由於文學政治化、台灣文學標籤化及欠缺新世代作家接棒等現象，台灣文學界兩三年來令人刮目相看的復甦表現即將萎縮，並在一年之內(1943年)達到極限。²⁶⁾事實證明，中村深藏於平鋪直敘的文評中的點醒並非杞人憂天，而是出於準確的文化觀察與政治警覺。中村哲自許為無黨派的業餘文藝評論家，但是從他對發表刊物的選擇以及言論內容來看，他對以張文環等台灣作家為中心的《台灣文學》集團及作家，顯然較為認同而且也抱持期待。若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後到1943年初，他與矢野峰人兩人的文論或公開談話相比，更可看出對於1943年以後的台灣文學發展分別抱持「黎明論」與「極限論」的兩人，對文化政治、政策文學不同的態度和立場。

站在《台灣文學》集團背後的學者，除了勇於批評、善於議論的政學科活躍教授之外，還有行事風格相對低調、與台灣作家更為親近的文學科助教授工藤好美，以及擔任國文學教授、關注台灣戲劇發展及實際演出的助教授瀧田貞治。透過諸如吳濁流回憶錄、呂赫若日記等的回顧與記載，1940年代工藤好美與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吳濁流、王白淵等台灣作家交往密切，彼此交流頻仍，亦曾在工藤住宅或研究室舉行讀書會。事實上，工藤好美除了被視為理解台灣文化人的親近之友之外，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到翌年4月「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之間最為敏感的文藝政策

22) 參見，中村哲〈文化政策と皇民化問題〉，《台灣時報》1941年1月號，頁6-12。

23) 參見，中村哲〈外地文學の課題〉，《文藝台灣》1卷4號，1940年7月10日，頁262-265。

24) 參見，中村哲〈昨今の台灣文學について〉，《台灣文學》2卷1號，1942年2月，頁2-6。

25) 參見，中村哲、竹村猛、松居桃樓〈文學鼎談〉，前掲文，頁332-341。

26) 參見，中村哲〈台灣文學雜感〉，《台灣文學》3卷1號，1943年1月，頁2-5。

縮口期裡，他也曾對文藝政策及外地文學派進行批判。戰爭期最大的一次、也是日據時期最後一次的文學論戰——「冀現實主義論戰」，即由他擔任台灣總督府第一屆「台灣文化賞」評審後發表的文論中爆發。〈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一文充分流露工藤精湛的學院派評論風格，及深厚的文藝認知與文藝批評功力。極少在一般雜誌上發表文論的工藤，在這篇略有篇幅的評論文章中，首先全面檢討第一屆「台灣文化賞」獎項設計上的缺失，藉此批評台灣總督府對於台灣文化領域認知的貧乏。他特別提出，當局應對台北帝大堪稱獨步全日本的台灣文化研究專業貢獻，予以正視。此後，他則集中火力指摘台灣詩壇上出現的世紀末頹廢風格及墮落化的浪漫主義所呈現之逃避現實的不良趨向，並且暗示這種封閉腐化、自我陷溺的詩派中，有著應當清理的軍國主義淵源。在進入得獎作家評論時，他仔細針對作品與現實的聯繫關係、聯繫技巧及作品的歷史觀進行分析。透過比較與烘托的方式，善巧地藉著突出張文環現實主義文藝的特質與成就，左諷西川滿，右譏濱田，進而宣揚他個人所主張的「歷史性的現實主義」之文藝主張。²⁷⁾ 工藤清楚認知到「歷史的大轉換期」已到來，在這個過程中不論日本文化也好、殖民地文化也好，都將面臨艱鉅的挑戰。所以，相較於無根據的官方誇大文化宣傳，或者外地文學派在幻想與浪漫中對歷史的編造，工藤在其穩重有富有條理的文字中，依舊難遮嚴肅而急切的心情。

類似的心情，也流動於瀧田貞治有關台灣戲劇的評論中。瀧田曾針對1943年9月「厚生演劇研究會」在台灣戲劇史上聞名的演出，進行接近演出指導的詳盡評論。當時他不畏某些「黨派」的反對議論，精準指出這次的公演，「堪稱台灣新戲史上劃時代的事件」。他還斥責藉由向當局投訴、向刑警密告等「扣帽子」作法打擊文化對手的卑劣行徑，也反對成藝術「一味遷就口號」，或淪為政策「公布欄」。瀧田在12月接獲停刊命令後出版的《台灣文學》終刊號上，針對該誌姊妹團體「厚生」的「歷史式」的讚揚，以及對於不良藝文風氣的批判，對雜誌陣地殞失，「台灣文學決戰會議」也才剛上演「台灣有沒有『非皇民作家』」的恐怖猜疑，而意氣消沈的本土作家而言，可謂雪中送炭吧？不過儘管給予溫暖支持，瀧田卻也提醒「台灣從事文化運動的朋友們」，應該停止「殖民地特殊性」的標榜，因為那是容易導致自我設限「文化之癌」；此外，在未來演出的戲目中，也應避免〈閨雛〉之類帶有「懷舊」風格、「與現實走向不合」的劇目。試想，如果把〈閨雛〉這齣最受好評的劇碼刪除，那麼這一次的公演是否依然能夠如此轟動呢？很顯然地，具有專業評論眼光的瀧田，其建議卻是與現實相違的。對此，他的理由只有耐人尋味的寥寥數語，「只要正視現實的嚴苛，就應該明白我的意思。」²⁸⁾

隨著戰事的急轉直下，瀧田也面臨到如何以學者對「增產與文學」關係的務實思考，對相關事務當局、軍人家屬或文學者，就書刊購置、書寫及閱讀提示方向的嚴酷時刻了。他提到，對於以血肉之軀在數百架敵機襲擊中，搏命於前線，以長滿老繭的雙手種植蔬菜與地瓜的產生戰士而言，究竟要選送怎樣的書刊才能予以安慰呢？脫離時局的戀愛小說、令人屏息的血戰之作、刻板的時局說教讀物，與軍士險峻的處境與緊繃的心情皆有隔閡，絕非切合之選。因此，「擁有札實力量的作品反而能打動人心，對一寸光陰一寸金的勇士來說，只有這種作品才能慰勞他們，給予他們活力。」所以，歸根究底，不是小說類型的問題，而是「作家本身的見識與態度」。倘能如此，則即便非以時局為主題，也不會產生與國家方向悖離的作品。²⁹⁾ 理性而誠實的分析，顯露了當時極為少數勉強保有文化發言權的帝大教授，在非常時局下的學術良知。1944年3月，呂赫若出版其生平唯一的短篇小說集。在戰事吃緊、紙張限制，各種狀況都不利於文藝出版的時期，想必歷經不少波折與爭取的過程。為

27) 參見，工藤好美〈台灣文化賞と台湾文学〉，《台灣時報》279號，1943年3月，頁98-110。

28) 參見，瀧田貞治〈演劇對談——厚生演劇公演瑣評〉，《台灣文學》4卷1號，1943年12月，頁70-75。

29) 參見，瀧田貞治〈增產與文學〉，《台灣公論》9卷3號，1944年3號；邱香凝中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頁460-465。

《清秋》寫序，在其中努力為「冀贊現實主義論戰」中遭到「暗的文學」之污名化進行辨護，同時以日語教育、慰問前線勇士之價值吹揚該書價值的³⁰⁾，也正是在戲劇與文學方面都與呂赫若有所交流的瀧田教授。³¹⁾

綜而言之，台北帝大教授與台灣文壇的交流，在現代文藝領域，有傾向支持《文藝台灣》集團的矢野、島田等人，以及親近《台灣文學》的中村、工藤、瀧田等不同網絡。除此之外，戰爭期經常被忽略的漢文文藝雜誌由於創刊及發行更為困難，必須爭取各種資源。前述的神田喜一郎教授，在漢文文藝刊物《南國文藝》的創刊過程中，便扮演了支持性的角色。林荊南透過與致力於台灣歌謠采集、整理的稻田尹之交往，協助其《台灣歌謠集》編纂、日譯，直接間接獲得稻田恩師神田喜一郎，以及稻田任職的台北帝大「南方土俗研究室」同人宮本延人講師的發言或撰文支持，終於使《南國文藝》在漢文禁壓時期獲得了難得的發刊機會。

如上舉例，在台灣文化發展與官方文化統制的纏鬥過程中，以文學科為主關心人文藝術的學者們，依據個人的政治觀點或文化價值，以不同的言論、書寫與行動，展現與官方文化機構、外地文化人或台灣文化人不同程度的聯結網絡。

不論是台灣文學或外地文學，都必須在「冀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文學報國」、「大東亞文學」或「皇民文學」等前仆後繼的文化統制原則催迫下，徘徊於國策要求與文化存續之間，接受一波又一波的檢討與改造；只不過，前者蒙受的壓力遠甚於後者。在文化改造的每一次波動中，我們都可以看見基於各種不同原因及立場關心文化議題的台北帝大文學科教授們，以一種(偽)中立、旁觀的學術集團角色，俯視著島內文化運動的姿影。他們的學術權威、社會位置與專業批評，對於戰時台灣的地方文化論述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同時扮演了呵護、引導以及規範整體地方文化行向的多重角色，帝大學者們對於地方文化的影響有正面、也有負面，其影響力越到戰爭後期越是明顯，甚至也持續到戰後。

V. 結 論

冀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訴求的首要對象為內地文化界，後來沿著「外地亦即帝國裡的地方」之思路，才擴延到殖民地及其它附屬政權。意外的是，由於此一官製運動正面肯定地方文化振興在總力戰體制中的價值，因而提供了在硬直皇民化政策下受到壓抑的殖民地本土文化運動復甦的契機。以文化差異、地方價值為訴求，卻不一味強調民族文化本質的戰時本土化運動，以台灣地方文化論述之面貌呈現，正是在「東亞／大東亞戰爭」所捲動的東亞全球化歷程加速之際，寄生於冀贊文化運動的極有限資源下綻放的奇葩。

殖民統治並非全然依循帝國企劃所願，往單方面推行同化，而往往是雙向變質的過程。外來政權的本土化與本土社會的殖民化，在極不均衡的勢力下，透過某些反抗結構或互利結構，以不同形態與速率發生，然而其不可逆轉的步履卻是同步邁開的。不論是基於文化相似性或文化差異性的操作，帝國失控的野心，除了加速了兩者異化、交混與轉化的進程，也干擾了殖民主單向預設的路徑。在皇民化運動中被捲入新的政經社會脈絡，而重新網絡化的台灣文化交混歷程，並未因為政策勢力的

30) 參見，瀧田貞治〈呂赫若君のこと〉，呂赫若《清秋》（台中：清水書店），頁1-4。瀧田在署名前，還特別注明「寫予台北帝國大學國文學研究室」。

31) 兩人戲劇交流情況，參見垂水千恵《呂赫若研究：1943年まで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風間書房，2002年2月），頁300-301。

介入與傷害而中止。戰時文化史乃是殖民者與受殖民者，在同一個文化公共空間中交互建構的結果。

1928年建校的台北帝大經過為期十年的累積，在1938年開始廣泛介入殖民地社會，一向與殖民地文化界有所距離的文政學部教授，也紛紛走出象牙塔，然而他們的參與卻因為戰爭時代的來臨受到種種制約與限定，沿著帝國失控的野心，徘徊在學術徵用與文化良心間。這一批動盪時代中的學人背影，可說是以「後帝國」或「後殖民」立場進行帝國近現代史或殖民地歷史研究的我們，最為珍貴的「前車之鑑」。

문화 징용과 전시 양심

-지방 문화론, 대만 문화의 소생 및 대북 제국대 (台北帝大) 문정학부 교수들-

柳 書 琴 (國立清華大學校)

〈목 차〉

- I. 서 론
- II. 대만지방문화론과 전시 문화 회복
- III. 전시 문화의 전환과 대북 제국대학 교수의 문화개입
- IV. 문화 회복에서 문학과 교수들
- V. 결 론

I. 서 론

1937년 중일 전쟁 발발 후, 매우 힘겨웠던 8년 동안, 대만 문화계는 지방 특수성을 강조함으로써 국민문화와 일본정신의 소집 앞에서 버티며 제한된 조건 하에서도 자연갱신의 창조성을 지속해왔다. 또한 파시즘의 ‘동아시아 신 질서 (東亞新秩序)’, ‘대동아 공영권 (大東亞共榮圈)’ 등의 개념이 최고조에 이르렀을 때, 소위 ‘황민화 운동(皇民化運動)’ 하에서 1937년부터 1940년까지 억압당하던 본토문화가 1940년부터 1943년까지 다시 회복되는 문화 전환 현상이 나타났다.

전시 대만의 문화 소생 현상은 대만에서 익찬 운동(翼贊運動)이 불러 일으킨 관방 문화전(官方文化戰), 1930년대 중반 이후 나타난 재 대만 일본인의 문화의식 그리고 익찬 문화론의 변통으로 활기를 띠게 된 본토 문화문화 운동, 이 3가지 운동이 상호 촉진 작용을 일으킨 결과로서, 이 3 가지 문화 역량의 상호작용을 불러 일으킨 촉매는 바로 대정 익찬 운동(大政翼贊運動)이 주도한 ‘지방문화진흥운동(地方文化振興運動)’이었다. 일본 국내에서 시작된 ‘지방문화진흥운동 (地方文化振興運動)’은 식민지 대만으로 보급된 뒤, 총독부 문화기관과 본토 문화인들을 양극으로 한 관 / 민(官 / 民) 지방문화론을 불러일으켰다. 외형적으로는 모두 ‘대만지방문화(台灣地方文化)’론의 형태를 보이긴 했으나, 그 함의와 정신은 근본적으로 달랐다. ‘관제 지방문화론(官製地方文化論述)’으로 불린 전자의 취지는 전시 국민 정신의 건설로서, ‘국민성(國民性)’ 세우기 문제를 지향했다. ‘본토지방문화론(本土地方文化論述)’으로 불리어진 후자는 대만문화의 주체성 유지와 지속적인 현대성에 관심을 기울여 ‘지역주체(地域主體)’의 구축, 즉 대만성(台灣性) 문제를 지향했다. 마지막으로 ‘국민성’과 ‘지역주체’, 이 양 극단의 중간에 놓여 있던 것이 바로 재 대만 일본 문화인이 재 대만 일본인의 사회문화적 현실 상황과 미래의 전망으로부터 출발해 제기한 ‘외지문화론(外地文化論述)’이었다.

전쟁 시기에는 문화간의 혼합이 가속화되는 경우가 많다. 전쟁 시기 본토문화와 지역문화간의 혼합은 문화체 내부에 존재하던 기존의 문화적 요소와 발전 추세 그리고 이러한 요소와 지역 문화 혹은 세계 문화간에 일어난 상호작용에 모두 일정한 영향을 줄 수 있다. 1920년, 30년대 이후 본토에서 왕성하게 발전한 향토문화/문화론(鄉土文學/文化論述)은 전시에 흥성했던 외지 문학/문화론(外地文學/文化論述)의 유입, 그리고 익찬 지방문화진흥운동(翼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의 제창으로, 점차 풍부하고 다양한 지방문화운동을 불러 일으켰다. 복수의 맥락과 원천성을 포함한 지방문화론은 1935년에서 1945년까지 대만의 문화를 발전시킨 새로운 원동력이 되었다. 오랫동안 대만의 문화 예술을 키워옴으로써 대만문화의 테마에 정통한 본토 문화인 외에도 관방 문화기관, 제국대 학자들, 재 대만 일본 문화인들 역시 적극적으로 문화의 중심으로 나아가 문화계의 새로운 세력으로 부상했다. 외지문화론 집단이라고 하는 이 동질적이지 않은 집단 중 일부는 관방론과 그 정책을 인정하거나 협조하는 경향을 보인 반면, 일부는 대만 본토 문화운동을 동정하고 지지하는 엘리트적인 성격이 강했다. 이 가운데 대북 제국대(台北帝大) 문정학부의 교수들은 언론과 실무에 있어서 지도자로 불리어져 문화론과 의견을 이끄는 위치에 있었다.

전쟁시기 대만 주체론(台灣主體論述)의 구축에 있어 결정적 역할을 한 ‘지방문화론’은 바로 식민지 정부의 문화기관, 재 대만 일본인 문화 엘리트, 대만 본토문화인이 참여한 상호한 3가지 논점이 경쟁과 상호 이익이라는 불균형적인 구조 속에서 서로 구축되어 얻어진 산물이다. 본 논문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은 의제에 대해서 논의해 보고자 한다.

(1) 전쟁이 확대되고 장기화되는 상황에서, 대정 익찬회의 지방문화진흥론(大政翼贊會地方文化振興論)이 어떻게 대만의 지방 문화론의 촉매제가 되었는가? 또한 황민화 운동의 제약을 받는 상황에서 어떻게 전쟁시기의 문화회복을 일으킬 수 있었는가?

(2) 대만의 문화가 ‘향토문화’로부터 ‘지방문화’로 전환되고, 제국의 군사 확장에서 시작된 대만학 구축의 열풍이 불기 시작했을 때, 그동안 남방연구, 대만연구를 중점적으로 해오던 대북 제국대 교수들은 어떠한 역할을 했는가?

(3) 대만문화가 침체와 불확실성을 겪다 다시 더욱 엄격한 통제하에 들어갔던 이러한 동요 속에서 학술 동원체 가운데, 기술적 자본이 가장 낮았던 문학과 교수들이 어떻게 대만에서 문화의 부조, 지도 혹은 통제에 있어 전문적인 영향력을 발휘해, 문화통제시행에 도움을 주거나, 본토문화계의 보호막이 될 수 있었는가?

II. 대만지방문화론과 전시 문화 회복

전시 대만 지방문화론의 핵심을 이루었던 ‘지방문화진흥론(地方文化振興論)’은 근위내각(近衛內閣)의 대정 익찬운동 문화부가 제시한 신문화 통치 원칙이다. 대정 익찬운동은 국민정신 총동원 운동(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을 조정하고 확대한 것으로, 1937년 8월 국민정신 총동원 운동 이후 가장 중요한 정책적 전환이다. 이 운동의 핵심인 익찬 지방문화진흥운동은 전시 ‘신 국민문화(新國民文化)’를 구축한 하부 기초로서 농촌문화/지방문화진흥이 사유의

핵심이다. 국민정신 총동원 운동 중 형식주의에 치우쳤던 경직된 황민화 정책과 식민지 문화압제주의에 비해, 익찬운동은 비 도시 지방문화의 잠재력을 발굴하고, 지방의 전통과 특색을 존중하는 문화동원주의로 방향을 전환했다. 때문에 익찬 운동이 문화통치의 범주를 벗어나지 못했으나, 농촌/지방문화진흥과 도시 문화의 전화(轉化)라는 총체적인 사고와, 내지/외지에서 시행하는 원칙에 있어서, 전시 지방문화(특히 식민지)의 실천 혹은 상상에 더 많은 정책의 합법성과 설명할 여지를 더해주었다.

지방문화의 지도이념의 혁신을 통해, ‘국민문화’의 혁신을 추구하는 나치 문화의 정책적 색채가 강했던 이 운동은 지방문화의 진흥과 전시 오락(즐거움)의 지도라는 명목을 빌려, 적극적으로 문화활동에 개입하고자 하는 의도였다. 그 결과 양면적인 효과가 나타났는데, 한편으로는 통제가 시행되면서 국책 방향으로 편입되고 변질되는 부정적 현상이 나타났고 다른 한편으로는 관에서 거의 중요하게 생각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단기적으로 회복될 수 있었다. 일본 국내, 식민지 및 ‘만주국(滿洲國)’ 외에도 중국 점령지역(예를 들면 북경, 천진, 남경 등) 역시 익찬 문화운동의 크고 작은 영향을 받았다. 조선에서는 1940년 12월 설립된 ‘국민총력조선연맹(國民總力朝鮮連盟)’(이하 총력연맹으로 약칭)과 그 다음달 설치된 ‘문화부’가 익찬 문화운동의 조선 내 추진 기구가 되었다. 총력연맹은 1938년 설립된 ‘국민정신총동원조선연맹(國民精神總動員朝鮮連盟)’에서 개편되어 발족된 것으로, 전시 동원의 새로운 체제였다. 1937년 7월 이후, 조선은 ‘대륙병전기지(大陸兵戰基地)’로 정해졌고 ‘내선일체(內鮮一體)’의 황민화 정책을 시행하기 시작했다. 황민화 정책하에서 가장 심한 억압을 받던 조선문화계는 문화부의 설치와 ‘조선신체제(朝鮮新体制)’의 전환적인 정책으로 완화되었다. 대만에서 대정 익찬운동의 집행기관은 ‘대만황민봉공회(台灣皇民奉公會)’로서 ‘대만 일가(台灣一家)’이념에 근거해 후방에서 전의를 불러일으키고, 결전에 임한 생활을 실천하고, 근로 태도를 강화하고 민간 방위 구축 등의 운동을 추진한다고 공언하였다. 일본, 조선과 마찬가지로, 황민봉공회 문화부는 익찬 문화운동의 대만 내 추진 부서였다. 그 뒤, 문화부가 주도한 ‘봉공문화운동(奉公文化運動)’이 국민정신총동원 모델을 대체해 전시 대만 문화통치의 새로운 형식체가 되었는데, 조금 다른 점이 있다면, 문화부의 설립 시기가 비교적 늦다는 것이다. (1941년 8월 설립)

익찬 문화운동은 제국과 식민지에서 동시에 문화소생 효과를 불러일으켰다. 익찬 문화운동 자체가 가지고 있는 유연성 외에도 중앙 정체(政體)기구가 식민지/점령 현지에서 통합적인 업무를 도맡아 했기 때문이다. 오밀찰(吳密察)은 근위내각의 브레인 집단인 ‘소화연구회(昭和硏究會)’와 대정 익찬회 회원의 정책 결정의 영향, 문화부 수장 등 문화인의 배경과 향토문화의 관점, 익찬 지방문화운동의 대만판 관방 선언의 출현(1941년 1월 <대만시보>의 ‘황민화의 지도원칙 특집’ 中村哲 <문화정책으로서의 황민화문제>), 대북 제국대학 부교수 中村哲과 소화연구회의 중요한 성원이었던 동경 제국대 교수 矢部貞治의 사제관계 등으로부터 이 운동이 학술/관료체계를 거쳐 문화계로 전해지고, 대북 제국대학의 정치학 교수가 대만에서 홍보 활동을 벌이고, 문화를 이끈 정치확장과정임을 밝히고 있다.

이 밖에도 전쟁의 확대와 장기화가 야기한 이 지역의 지정학적 변화와 식민지 권력구조의 조정은 지방문화론과 지방문화의 회복에 긍정적 영향을 미쳤다. 제국 일본의 공간의 재배치는 동아시아 지역에서 근대의 세계화 과정이 기형적으로 전개된 것으로서, 중일전쟁, 태평양

전쟁이 연이어 발발해 점령지역의 범위가 광대해진 후 최고조에 이르렀다. 1940년 이후 대만 총독부의 관방 문서에서는 이미 ‘남방권(南方圈)’이라는 용어로 ‘남지나(南支)’, ‘남양(南洋)’의 지리적 범주를 칭하고 있다. 1941년 말 태평양전쟁이 발발한 이후 ‘남방권’이라는 단어는 널리 유행됐다. 이때, ‘남지나’가 가리킨 복주, 하문, 산두 등 일본 제국주의 영사관 관할지역, ‘남양’이 가리킨 말레이군도를 중심으로 한 필리핀, 영국령 보르네오, 영국령 말레이(말레이시아), 네덜란드령 인도(인도네시아)와 티모르, 프랑스령 인도차이나(베트남), 사이암(태국) 등은 광활한 영토, 전략적 지위와 풍부한 자원을 갖고 있어, 제국의 사명을 수행하고 관할 지역을 더욱 확장하고자 하는 총독부의 목표였다. ‘대동아전쟁’ 시기에서 말하는 ‘대동아’ 지역이란 넓게는 대만, 신남군도(新南群島), 관동주, 가라후토(樺太), 남양군도, 조선, 만주, 중국 점령지역, 청도 조계지, 동남아, 남아시아, 남양 및 남태평양. 등 광대한 지역을 가리킨다. 점령지에서 빠른 속도로 늘어난 신 영토적 시각과 자원개발의 수요에서 식민지 대만 등 ‘외지’는 점차 제국주의의 변두리에서 중심으로 떠올라 제국과 전쟁지역 혹은 신 점령지역의 중간적 지위를 차지하면서 내지와외의 차이가 상대적으로 축소되었고 심지어 ‘대동아 건설의 심복’으로 비유되기까지 하면서 제국 유기체 내부의 중요한 성원이 되었다. ‘제국 최초의 식민지’ 대만은 이때, 이미 일본 내지 다음으로, ‘유서 깊고’ ‘교화된’ 현대의 새로운 국토가 되었다.

‘남방권’과 ‘대동아 공영권’의 확장 과정에서 ‘제국화’ 과정은 최고조에 이르렀다. 대만 역시 제국이 확장되는 과정에서, 지리적 상상력, 지역적 귀속감, 지정학적인 변화, 황민화 운동의 전개에 따라, 더욱 탈 중국화, 탈 국족화(國族化)함으로써 제국 영토 내에서 ‘특수한 지방-남방’이 되어, 남방에서 출발해 남방의 잠재력을 더 많이 가진 ‘남진기지(南進基地)’가 되었다. 제국의 영토 내에 많은 ‘지방’이 하나씩 생겨난 이후, 과거 동화주의(同化主義)를 표준으로 ‘내/외지’를 차별적으로 통치하던 문화정책은 비록 일본 문화 우위라고 하는 본위주의는 바뀌지 않았으나, 이때에 이르러서는 제국 관할 하에 단숨에 융화되지 못하는 다양한 다른 문화들이 합쳐지면서 어쩔 수 없이 지역 사회내부의 다원 문화의 현실을 용인하지 않을 수 없게 되었고, 심지어 타 문화가 문화창조력을 발휘해, 일본 문화를 보완해 줄 것을 기대하기에 이르렀다.

공간 재배치의 현실적 기초는 타국 영토의 군사적 점령이었는데, 이중 가장 절실했던 것이 바로 자원 점유였다. 풍부한 신 점령지의 자원을 신속하게 징발하기 위해서는 군사적 통제 외에도 체계적인 학술 조사와 개발연구, 징발계획이 필요했다. 당시 동남아와 동북아 대륙의 경계선에 위치해 있던 대만과 조선이 양대 식민지는 관료기관, 학술기구, 민간의 엘리트, 일반인들까지 지리적, 문화적 친근성으로 인해 명치(메이지)시대부터 ‘남진’과 ‘북진’의 제국주의 사명을 받아들인 이래로 가장 거대하고 막중한 임무를 부여 받게 되었다. 그러나 이 막중한 제국 선봉의 역할은 오히려 대만, 조선과 일본과의 관계를 ‘식민국/피식민국’의 상하 예측적인 일방적인 관계로부터 해방시켰다. 제국은 다각적인 지역 발전을 필요로 했기 때문에 대만과 화남, 해남도, 동남아와의 관계나 조선과 만주, 몽강(蒙疆)과의 관계처럼 식민지는 어느 정도까지는 그 주변 지역과의 관계를 회복하거나 확장할 수 있었다. 영토, 자원, 인력, 인재가 부족했던 일본 제국의 확장과 공간의 재배치는 일본화로 단절됐던 식민지가 원래 귀속된 지역사회와의 연계를 다시 회복하고자 하는 의도와 맞닥뜨리지 않을 수 없었다. 침략전쟁이 일으킨 다양한 변화는 황민화 운동에서 서둘러 관철시킨 문화

일원주의를 완화시켰는데, 이는 식민지의 지역적 우위와 문화자원의 재 평가에 있어 긍정적인 촉진 역할을 했다.

제국주의의 공간 재배치로 공간, 시간, 문화 및 아이덴티티에 있어서 식민지의 재배치 역시 연이어 이루어졌다. 늦어도 1930년대 중반을 전후로 대만 대중들은 신체 감각 기관을 통해 신식민지의 시공을 체험하고 내화하는 경험을 가지게 되었다. 이는 구체적인 신체경험에 그치거나, 대만 섬 내의 지리적 상상에 국한되지 않았는데 식민지 도시 속의 공간 재배치라 할지라도, 외연화 되기 마련이어서, 당시의 사회 의식 속에 상상력과 개척성으로 가득한 ‘세계도경(世界圖景)’이 일어났다. 이 도경은 은 식민지식이자 제국식이면서 지역적, 세계적이기도 하다. 이는 식민지 주민들이 세계를 인식하는 특정한 근거, 안목, 기대를 가지고 있으면서도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제국 확장에 대한 상상력과 제국의 계층적 세계관에 대해서는 숙명적으로 받아들이거나 무의식적으로 복제할 수밖에 없었다. 전쟁에 대한 보도가 생활주변에 넘치던 ‘세계도경’은 식민지 주민들로 하여금 점차 민족이나 민족국가라는 오래된 공동체 인식을 넘어서서 더욱 유동적이고 더욱 넓은 의미의 ‘제국공동체’ 혹은 ‘동아시아 지역사회’라는 모호한 상상을 구축하게 만들었다.

지방문화론에 대한 친근감은 우선적으로는 제국주의 공간의 재배치, 중앙문화정책의 전환 등 외부 요소의 직접적인 영향을 받았다. 그 다음으로는 식민지 관료체계와 재 대만 일본 주민의 ‘외지화’, 대만 엘리트들과 본토 사회의 ‘제국화’ (특수 지방화), 즉, 이 두 가지가 각각의 배경하에서 함께 ‘지방화’된 내부 추세와 중요한 관계가 있었다. 40여 년간의 통치를 거쳐 대만 총독부 관료체계는 점차 자족화, 원로화되었고, 일본인 관리들은 대만에서 현지화된 식민지 관료를 형성하여 전시 식민지 행정은 특히 대만의 특수상황에 맞는 실무적인 방향을 강조하였다. ‘학력/민족출신/관리계급질서’가 상호 대응되는 차별적인 구조가 바뀌지 않는 상황에서 관료 체계는 행정 특수성의 시대에서 계속해서 ‘외지화’로 진화하는 것을 직시하지 않을 수 없었고, 대만인 관리들은 숫적으로나 직위상 여전히 약자의 위치에 놓여있었으나, 계급은 지속적으로 서서히 상승했고 관리의 수도 늘어났다. 관료체계의 ‘지방화’ 과정에서 재 대만 일본인들의 의식의 형성, 대만인들의 의식의 강화는 상호 영향을 미쳤고 상승작용을 일으켰다. 1935년 중반 이후, ‘대만에서 출생한 세대(灣生世代)’의 관련 논점, 재 대만 일본인들의 연극, 문학, 예술 등에 대한 문화 소비와 오락에 대한 수요는 한 때 성행했던 본토 문화엘리트들의 대만 향토론 외에도 두각을 나타내어 문화계의 새로운 의제로 등장했다. 재 대만 일본인의 문화의식과 문화수요가 점차 성장해나가면서 대만 지식계층 역시 지속적이고 장기적인 다문화학습, 항쟁과 중재에서 학습의 창구이자, 저항의 대상이었던 일본을 통해서 현대성과 각종 이문화의 양분을 흡수해 혼합된 대만 본토론과 현대 문화의 실천을 전개하게 되었다. 여러 가지 요소가 누적되어져, 제국문화의 통치, 외지문화 의식, 대만본토의식 등을 포함해 다양하고 상이한 ‘식민지 지방주의’가 비상시기의 대만문화의 회복에 중요한 토양을 제공해주었다.

대만 지방 문화론은 신 체제아래 일본 관방의 익찬 지방문화 진흥운동에 기대어 생겨났다. 그러나 관/민, 일/대만 그리고 지식인들의 사고의 차이로 인해 다음과 같이 구분되었다. 대정 익찬회 문화부, 대만 황민 봉공회 문화부와 이에 동조한 재 대만 일인 관료, 학자, 문화인을 위주로 한, 소위 문화전쟁으로 불리운 ‘관제지방문화론’과 대만/일본 자유주의

입장을 가진 관료, 학자, 문화 엘리트들이 구축하고 대만 문화 회복을 일으킨 ‘본토지방문화론’, 재 대만 일본인들이 주축이 되어 재 대만 일본인 사회문화의식과 외지 문화에 대한 열망 및 외지문화소비수요에 기반해 형성된 ‘외지문화론’ 등 입장, 사유, 논점과 행동에 있어 전혀 다른 3가지로 구분되었다. 지방문화론이 대만으로 보급된 이후 이 관제문화운동이념은 식민지 일본 학자와 문화인들의 해석, 주해에 힘입어 매우 빠른 속도로 1930년대 절정에 달했던 대만 향토문화운동과 1930년대 점차 부상한 재 대만 일본인 외지문화의식과 함께 관/민 문화론을 이뤄 각자의 견해가 표출되고, 혼합, 통합되어졌다. 그 결과 잠시 전시 문화통제를 교란시킨 일방적인 추진이 관방의 제약이 존재한다는 전제하에서 1940년 말부터 1943년 말에 이르기까지 연극, 문학, 민속, 민예, 음악, 방송, 미술 등 분야에 잠복해 있던 대만 문화회복을 촉발시켰다. 문화회복현상은 대만에만 국한되지 않고, 일본 내지, 대만, 조선과 ‘만주국’ 모두 유사한 효과를 일으켰다. 다만 시행 정책과 문화 관습에 차이가 있어 구체적으로 나타난 모습이 달랐을 뿐이다. 동 시기 조선을 예로 들면, 조선의 지식인들 역시 정책 방향의 전환에서 새로운 논점을 적극적으로 파악하여 조선의 지방문화운동 총괄기구인 ‘총력연맹문화부’의 설립과 추진 과정을 이용해 다양한 문화의견을 제시했고, 민족문화 연장의 기회를 쟁취했다.

익찬 문화운동을 촉매제로 식민지 지방주의의 축적, 전쟁의 장기화가 가져온 정책적 변화, 제국의 공간 재배치로 인한 사회문화의식의 변화 과정 속에서 문화활동은 회복되었다. 문화 회복의 전반적인 배경은 문화동원으로서 문화동원이 필요한 상황에서 본토의 지식계층은 근대화, 일본화 및 전통문화 사이에서 통치 당국과 갈등과 전략으로 가득찬 힘겨루기를 벌였다. 대북 제국대학의 학자들, 재 대만 일본 문화인, 문화단체는 관방 문화운동에 말려들어 전례 없이 깊고 넓게 식민지 문화 분야에 개입하기 시작했다. 앞서 3가지 대만 지방문화론에서 대북 제국대학 문학과와 인문 예술 분야에 관심을 가졌던 학자들 모두 이에 개입했다. 식민지의 지배층이건 피지배층이건 전쟁시기의 문화문제는 문화인들이 당시 가장 힘들어하고 가장 중요하게 생각하는 과제였다.

III. 전시 문화의 전환과 대북 제국대학 교수의 문화개입

전시의 문화 통제 정책은 중단되거나, 후퇴 된 적이 없다. 전쟁시기 전체 문화환경은 점진적으로 변질되는 과정이었다. 다만 각 단계마다 통치방식이 조정되고, 관방/본토/외지 지방 문화론, 이 3자간의 세력간의

부침이 있어 문화의 자주발전이 통제를 벗어나고 본토의 지방 문화론과 외지문화론이 치열한 경쟁을 벌이거나 혹은 문화통제가 자주 발전의 능가하는 불안정한 상황과 전환현상이 나타났다.

전쟁시기 대만 문화의 전환이란, 1937년에서 1945년 사이에 발생한 대만 문화의 기복과 불안정, 문화통제하의 문화 변질을 가리키기도 하지만 더 중요한 내용은 대만문화발전의 주류, 의제, 개념, 성질에 있어 중일 전쟁 발생 이전과 다른 차이점을 가리키기도 한다. 전

시 본토 지방문화론은 1920, 1930년대 대만문화론의 주요 성과인 향토 문화론을 답습하기도 했지만 빠르게 확장된 동아시아 점령지역내에서 새로운 정치경제문화내용이 출현하면서 향토문화운동사상의 기초와는 상이한 새로운 논리를 발굴해냈다. ‘지방문화’라는 어휘가 1937년에서 1945년 사이에 새로운 의미를 만들어냄으로써 지방문화론을 핵심으로 하는 대만 본토 문화론은 암암리에 사회주의 혹은 민족주의를 기초로 구축된 30년대 향토의식을 계승하였고, 전쟁으로 수반된 제국 공간 재배치와 관련된 항쟁의 폭을 넓혔다. 그것은 전쟁 시기 대만이 ‘제국하의 하나의 지방주체’로서 지속적으로 확장된 제국 판도와 그 구성원을 참조해서 제기한 ‘대동아’에서 ‘대만’이 차지하는 위치 그리고 대동아와의 관계와 관련돼 제기한 새로운 상상력이었다. 공간의 재배치와 날로 심각해지는 준 전시체제 및 전시 식민지 정치 상황은 문화의식, 문화항쟁과 문화상상에 대한 논의와 변위를 수반했다. 30년대 전반부와는 달리, ‘향토문학’라는 단어는 1937년 이후의 대만에서 대만인들의 반동사상 혹은 민족주의를 의미하는 민감한 용어가 되었다. ‘대중문예’ ‘식민지 문학’ ‘보고문학’ 등 논제 역시 문화를 주도하는 새로운 개념이 되지 못하는 이 때, 전시 대만문화론의 주류 담화는 점차 정치적인 애매성을 띤 ‘지방문화’라는 어휘로 대체되었다.

중일전쟁을 전후로 대만 문화론의 사유와 활동 형태의 전환으로 향토문화론이 퇴장하고 지방문화론이 등장했다. 그러나 이 두 가지는 결코 단절이나 대립의 관계가 아니라 계승과 확장의 관계였다. 당시 ‘향토’라는 단어는 민족/국가에 대응되는 단어였고, ‘지방’은 세계적/지역적 개념의 제국에 대응하는 개념이었다. 지방문화론을 ‘향토’라 하지 않고 ‘지방’으로 명명한 것은 대만이 제국의 지방세포에 예속되어있다는 기본 성질을 인정한다는 의미를 내포했다. 따라서 명칭의 변이뿐만 아니라, 논점의 내용, 비평의 위치와 문화 논리에 있어서, 지방문화론은 1930년대 전반부의 ‘제국하의 하나의 민족주체’로서 구축된 ‘민족주의 분리색채를 띄거나 혹은 사회주의 세계주의 상상력을 가진 향토문화’의 급진적인 이미지와 위치가 전도되었다. 익찬 지방문화 진흥운동에서, ‘지방문화’ ‘국민문화’와 ‘대동아문화권’의 관계는 제국론과 식민지론 사이에 이견이 존재함을 논증해주었다. ‘대동아 신질서 구축’과 ‘국방 국가체제 완성’이라는 국가 정책을 고려해, 제국론은 ‘국민문화 대 (복수의) 지방문화’, ‘대동아 문화권 대 (복수의) 지방문화’ 간에 하나의 머리에 여러 개의 몸을 가진 ‘머리/몸’, ‘지도/지원’ 및 ‘지도/반응’ 관계를 강조했다. 즉 ‘중앙문화’의 엘리트주의와 개인주의, 도시 중심주의를 수정함으로써 집체주의 문화의 장점을 가진 ‘(신) 국민문화’, ‘(신)대동아 문화’, ‘(신) 국민정신운동’을 이끌어내고 더 나아가 일본 내지와 외지의 국민 총력을 광범위하게 이끌어내고자 하는 의도였다. 식민지론은 ‘총력전’이라는 저항할 수 없는 국가 정책의 전제 아래서, ‘대동아 문화권’ 아래 ‘지방 문화체’ 고유의 문화전승과 상이한 문화체계에 존재하는 필요성 등을 향해 발휘되었고, 이를 통해, 지방 전통의 보호와 다원화된 문화주의가 뿌리를 내릴 수 있는 틈을 모색한 것이다.

계속된 전쟁으로 대만문화는 ‘제국하의 지방문화’의 일원으로서의 편입이 가속화되었고, 일본, 대만, 조선, ‘만주국’ 더 나아가 중국 점령지에 이르기까지, 지역을 아우르는 공존감, 지방 교류와 문화 연동 현상이 나타났으며, 적어도 교류와 연동에 대한 정보, 상상, 기대가 드러났다. 1942년말 ‘제 1 회 대동아 문학자 대회’의 대만 작가 대표들이 대만으로 돌아온 다음, 주요 파견 기관인 ‘대만문예가 협회’의 회장인 矢野峰人は ‘대만문학의 여명’이라는 말로

이 문화 행사를 축하했다. 그는 다만 지방에 속해 있을 뿐, 과거 내지로부터는 ‘그림자’로 여겨져 경시되었던 대만의 문예가 이번 대회 참가로 ‘우리의 목소리를 대만 맞은 편 해안과 남방 여러 나라로 전달’ 됨으로써 대만의 문예가 이로 인해 ‘처음으로 존재의 의미를 인정받았다’고 여겼다. ‘오늘날 중앙의 인정을 받아 일본의 일부분이 되었고, 이웃 국가와 왕래할 수 있는 지위로까지 뛰어올랐다. 이는 실로 대만의 문예역사상 전례 없었던 일은 물론, 문화역사상으로도 전례 없었던 일이다’ 제국의 공간 재배치, 자원의 징발 요구, 남방의 지역적 우위, 식민지 관료기관과 이주민의 외지화 그리고 의식적인 성격을 띤 제국 각 지역의 문화대표의 교류 활동 등의 다양한 요소가 지역 역할의 강화 및 지방주의 대두를 이끌어냈다. 대만에서 지방문화론이 전파되는 과정에서 문화관련 조치, 관방의 연설, 공개 좌담, 미디어, 각종 저술 등 창작 과정에서 실제로 전개되는 과정이건, 혹은 문화 회복의 흐름 속에서 드러난 크고 작은 활동에서건, 결코 간과할 수 없는 세력이 나타났는데, 그것은 바로 1928년 설립되어 10여 년의 학술적 경험을 쌓아 문화 개입의 우위를 가지고 있으며 대만/남방 연구를 전공으로 한 대북 제국대학 교수들이 식민지 학술과 문화활동에 참여한 것이었다.

식민지 최고의 학술 기관으로서, 1928년 대만에 설립된 ‘대만 제국대학’은 1926년 조선에 설립된 ‘경성제국대학’과 마찬가지로, 일반적인 학술 목적 외에도, 정치성, 국책성(북진/남진), 식민지생산성(식민지 자원과 산업의 개발, 양성, 이용과 연구) 및 식민지학 구축 등 특수한 취지를 가지고 있었다. 대만 제국대학은 제국에서 유일하게 열대에 위치한 대학으로서 특수한 지리적 위치를 기반으로, 학교 설립 초창기에는 열대 의학, 열대 농업, 열대 자연과학 등 남방산업과 열대 과학분야에 주요 초점이 맞춰졌다. 후에는 일본군의 침략과 점령에 의한 필요에 의해, 남방인문연구 분야로까지 확대되었다. ‘종합적 열대 식민지학’으로 총칭할 수 있는 학과로는 인종학, 인류학, 민족학, 언어학, 문학, 사회학, 역사학, 민속학, 심리학, 철학, 종교, 정치학, 경제학, 풍토기후학, 동/식물학, 생태학, 토양학, 농림축산학, 원예학, 작물학, 조림학, 수산학, 농산 가공학, 농예화학, 제당화학, 양조학, 이학, 공학, 열대의학, 수의학, 병리학, 위생학, 약학, 곤충학, 세균학, 미생물학, 지리학, 지질학, 에너지과학 등 인문, 사회과학, 기초과학과 응용과학 등 여러 분야에 걸쳐 있었다. 일본의 전쟁 패배까지, 대북 제국대학 설립 18년 동안 가장 영향력을 가진 강좌, 연구기관 혹은 학술 성과는 대부분 식민통치나 침략 점령을 보조해주는 각종 조사, 연구, 징발과 개발사업과 관련된 것이었다. 만주 사변 후, 전쟁과 학술간의 결합 추세는 더욱 긴밀해졌고 중일 전쟁 후에는 더욱 가속화되었다. 그 뒤 태평양 전쟁 말기에 이르기까지, 제국 대학의 교수들은 연구 조교와 학생을 이끌고, 조사를 벌이거나, 보고서 편찬(예를 들면 1940-42년까지의 남방학술조사)를 작성하거나, 학술 조사팀(예를 들면 경성제국대학의 1938년 ‘몽강(蒙疆) 학술 탐험대’나 대북 제국대학의 1940-1942년까지의 ‘해남도 학술조사단’)을 조직하거나, 새로운 연구기관을 만들거나, 혹은 남방 작전과 남방 자원개발과 관련된 강좌를 신규 개설하거나, 고문, 이사 등 요직을 통해 총독부 관청의 외부단체의 조사연구사업(1939년 설립된 ‘대만남방협회’)을 지원하기도 했다. 총독부 관청의 정책 시행과 제국의 군사행동에 대한 협조와 기술적 도움이 다방면에 걸쳐 지속되고 확대되었다.

자연과학, 공학, 농업, 의학 등 기타 4대 학부의 교직원들과 학생들이 전쟁조사와 연구사업을 위해 분주하던 때에, 응용도가 비교적 낮은 문정학부에서도 마찬가지로, 조사 및 연구

사업 붐이 일으킨 식민지학 열풍에 휩싸였다. 문학과, 사학과, 철학과, 정치학과를 포함한 4개 학과와 남방/대만연구 전통이 가장 깊은 ‘남양사학강좌’, ‘토속학, 인종학 강좌’, ‘언어학강좌’, ‘심리학 강좌’, 이 4 강좌를 포함한 문정학부 가운데 1936년 6월부터 대만관계사료의 수집과 정리, 대만섬 내 사적의 조사를 위해 사학과가 설치한 ‘대만사료조사회’와 ‘남지나, 남양’ 연구분야에서 독특한 성과를 가지고 있는 ‘남양사학강좌’ (村上直次郎, 岩生成一 교수가 맡음)와 ‘토속, 인종학 강좌’ (移川子之藏 교수, 宮本延人 조교가 맡음)만이 남방 식민지학 연구에 참여할 수 있는 기술적 자원을 가장 많이 가지고 있었다. 연구실과 각 학과의 학회 가운데, 학과간의 영역을 넘나드는 ‘남방토속연구회’ (1929년 설립되어, ‘남방토속’을 발행, 1940년 ‘남방민속’으로 개칭)와 교수진과 학생수가 가장 많고, 학술활동이 왕성한 정치학과의 ‘금요회’가 가장 강한 응집력을 지녔다. 전후 대만의 사학, 인류학, 사회학 연구에서 중요한 영향을 미친 이러한 학자들은, 사학과, 정치학과를 중심으로 이루어졌으며 언어학 강좌의 小川尚義, 淺野惠倫도 포함하고 있었다. 교수와 학생수가 매우 적었던 철학과 교수와 자연, 농학부 교수, 제국대학 총장이었던 弊原坦 등은 자주 조교와 학생들을 이끌고 정례적인 토론회, 강연 등 학술 교류활동과 보급활동을 벌였다. 南進의 지정학성과 학술 및 군사응용분야에서 간접적인 기능을 가지고 있던 문학과 교수들은 가끔 이러한 연구회나 토론회에 참석하기도 했지만 그 횟수가 적었고, 참여도 역시 낮았다.

자연, 공학, 농학, 의학, 혹은 문정학부를 막론하고, 대북 제국대학 교수들이 관방전쟁 조사 사업과 대만 연구에 광범위하게 개입함으로써 전쟁시기 지방문화론은 관방 식민지 문화정책과 재 대만 일본인 문화론 외에 전문적인 식민지학술 기관을 중심으로 한 세 번째 논점을 만들어냈다. 이렇게 세가지로 구축된 논점에서 대만의 지방문화론은 ‘국민문화’로부터 ‘지방문화’로 발전하는 등 다양하면서도 서로 다른 목표를 가지고 있었고, 국책 사유, 식민통치 이념, 자유주의 본토/외지 지식인의 각각 상이한 문화적 비전이 혼재돼있었다. 대만의 지방문화론의 중요한 가치 중 하나는 통치계층의 문화정책과 본토 문화계의 직접적인 대립 사이의 완충작용을 함으로써, 다양한 문화세력이 조정, 중재될 수 있는 여지를 만들어 냈다는 것이다. 개별적인 정치동기의 경중이나 일본인 중심 관점의 깊이는 잠시 논외로 하기로 하자. 조사사업과 공공 발언에서 중요한 위치를 차지했던 대북 제국대 학자들이 갈수록 대만 문화론이나 발언에 적극성을 발휘함으로써 전시 대만문화론의 공간과 합법성을 개척하고 연계시키는데 중요한 일익을 담당하였다. 황민화 문화개조, 총력전 문화동원과 복수의 민족 문화활동이 복잡하게 경합하는 전시의 문화적 상황에서, 학술전문비평과 일반문화론, 이 ‘논의의 공공 공간’ 때문에 총독부의 정책 제정과 문화조작이 지나치게 독단적으로 이루어 질 수 없었고, 대만문화인과 관방문화정책간의 상호작용과 조정에도 여지를 만들어주었다.

IV. 문화 회복에서 문학과 교수들

날로 격화되는 무력전쟁과 지식전쟁, 그리고 자원전쟁에서 문학과(文学科)는 ‘재능을 발휘할 여지’가 없어 보였다. 그러나 문학과는 神田喜一郎 교수가 이끄는 중국 고전문학을 중

심으로 한 ‘동양문학강좌’에서 吳守禮, 田大熊, 黃得時, 稻田尹 등 대만의 민남어, 가요, 대련, 한문 고적, 한문 전통문학사, 대만 현대문학, 부다이시(布袋戏)등을 수집, 번역, 주해, 연구에 있어 우수한 학생들을 배출해냈다. 이로써 대북 제국대학에서 왕성하게 이루어진 대만연구와 남방연구가 전체 학부, 과, 및 교수, 학생들의 문화에 대한 관심과 연구의제에 대해 연구의 동기와 영향력을 미쳤음을 알 수 있다. 전반적인 학풍이 문학과 대만문화연구에 대해 영향을 끼친 점도 있었지만, 문학과 교수 중에는 총독부의 남방 정책과 전시 열대학술의 흐름에 관심을 가지고, 비교적 일찌기 점령지 문화사업이나 남방조사사업의 위탁을 받은 교수들이 있었는데, 이들은 바로 앞서 서술한 문학과 원로이자 동양문학강좌를 맡았던 神田교수와 영어, 프랑스어, 문학개론 등의 학과목을 맡았던 강사인 島田謹二였다.

교토 제국대 출신으로서, 內藤湖南, 狩野直喜 등의 학자로부터 사사 받 았고 학문적 깊이가 있었던 神田喜一郎은 중국 고적에 능통해 하문대학이 일본의 남 지나 파견군에 의해 점령된 뒤에는 1937년 7월, 토속학, 고고학 전공을 가진 移川子之藏와 宮本延人 이 두 명의 사학과 학자들과 함께 전쟁의 포화 속에서 파괴당한 하문대 도서관과 박물관의 진귀한 소장품을 처리하는 업무를 맡게 됐다. 神田은 도서관의 피해가 없음을 확인하였으나, 진귀한 장서, 근대 연판서와 서문서를 포함한 서적을 철저하게 조사해야 할 필요가 있다고 건의하여 이를 모두 대북 제국대학으로 운반해 갔다. 이 도서들은 1945년 전쟁이 끝난 뒤에야 비로소 하문 당국으로 반환되었다. 島田은 프랑스어에 능통해서 대만 총독부 외사부의 외부단체인 ‘대만남방협회’(1939년 11월 설립)가 추진하는 ‘남방강습회(南方讲习会)’의 프랑스어 교수직을 맡게 되었다. 神田의 첫 번째 대만국적의 제자인 田大熊(1929-1933년 재학)은 졸업 후 대만인들이 부러워하는 대만총독부 도서관에서 근무하게 되고 1941년부터는 총독부 외사부에서 직원으로 근무하며 화남 문헌의 번역사업을 책임지게 된다. 그의 이러한 순조로운 경력의 배후에는 당연히 神田 교수의 도움이 자리 잡고 있었다. 상술한 내용들은 문학과 교수와 졸업생들이 전쟁 학술에 협조하기 시작한 것이라 할 수 있다. 1943년 神田은 다시 총독부의 위임을 받아 또 다른 점령지인 홍콩에서 ‘시민도서관’(구 홍콩대학 도서관)관장을 맡게 된다. 島田은 그를 수행해 부임해, 부관장에 해당되는 직책을 맡게 된다. 당시 도서관에서 요직을 맡고 있었고, 언행이 조심스럽고 관찰력이 뛰어났던 홍콩의 저명문화인인 陳君葆은 島田의 언행을 ‘홍악한 야심가’라고 표현할 정도로 그에 대해 대단히 나쁜 개인적 평가를 내렸다. 神田에 대한 인상은 그보다는 조금 나았지만 역시 비난을 하지 않은 것은 아니다. 그의 일기에는 자주 점령지 문화인으로서 냉소적인 시각으로 식민지 대학의 일본학자들이 제국주의 학술 침략의 도구 역할을 하는 것을 지켜보면서 내면의 경계심과 소외, 그리고 강렬한 반감을 드러내고 있다.

대북 제국대학 대만/남방 연구관계 학자들 중 당시에 일본인/대만인을 포함한 대만 연구에 종사한 지식인 그룹 가운데 중요한 위치를 점하고 있고 영향력을 가진 사람들에 대해서는 앞서 밝힌 바 있다. 그렇다면 문정학부의 교직원들 중 특히 문학과 교직원들은 전시의 식민지학 열풍과 대만 문화계에서는 어떠한 위치를 차지하고 영향력은 어떠했으며 특히 문화회복과는 어떠한 관계가 있었는가? 문학과 교직원들 역시 당시 대만 연구에 종사한 지식인 그룹에 속해 있으면서, 선도적 지위를 가지고 있었던 대만 제국대학 대만/남방 연구관계 학자들의 한 축을 차지했다. 앞서서도 밝혔듯이 문학과와 그 내부의 양대 강자인

‘동양문학강좌’ (神田喜一郎 담당)와 ‘서양문학강좌’ (矢野峰人 담당)는 고전문학과 서양문학 위주의 지식을 제공하는 특성 때문에 군사 정보, 군사 지식과 군사 기술을 제공할 역할을 맡지 못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따라서 전체적인 제국 대학의 학술 동원체제에서 점령지역의 도서관 행정, 고서적 정리, 어학 교습 및 정보 번역 같은 작업에 산발적으로 참여한 것 외에는 장기적이고 체계적인 대형 조사와 연구, 개발 계획을 담당하지 못했다. 그러나, 그렇다고 해서 그들과 문학과와 나머지 교수들이 당시 활발하게 진행되던 식민지학의 열기와 거리를 두었거나 남방 지역 사회 혹은 대만 문화계가 가지고 있었던 사명감과 야심에 개입하지 않은 것은 아니다. 대만 바깥 세상에 집중적인 관심을 기울이고 조사와 개발 작업을 벌였던 자연, 공학, 농업, 의학 등 학과와는 달리, 문학과 교수들은 남지나, 남양, 대만과 관련된 조사, 연구와 개발 계획에 종사하지 않는 대신 학자들간의 중간적인 위치를 이용해 관방 문화기구와 민간 문화단체 사이에서 중재와 지도 역할을 맡아 대만의 문화계에서 활발하게 활약했다. 따라서 전시 대만 내의 문화계를 지도하고 통제한 것이야말로 바로 문학과 교수들이 기타 학과와 ‘공유하지 않은 사명(不共的使命)’ 으로서, 교수들도 이로써 총독부 통치 당국으로부터 초빙과 위탁, 암묵적 허용, 기대를 받았다고 볼 수 있다.

矢野峰人の 경우, ‘서양문학강좌’ 를 맡고, 대북 제국대학 도서관장을 역임했었기 때문에 神田喜一郎과 견줄만한 학술적 명성을 가지고 있었다. 1935년 이후 西川滿을 추앙했던 그는 西川이 처녀 시집인 <마조제(媽祖祭)>를 발간했을 때, 그 남국의 정서와 이국적 정취를 인정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신 시대의 감성’ 이라는 말로 이 젊은 시인이 매력적이고 환상적인 식민지의 풍토를 중앙문단에 붙여넣은 성과를 올렸다고 높이 평가했으며 이 시집의 탄생은 외지 문예의 새로운 동향을 예고해 준다고 밝혔다. 그 다음해, 島田謹二 역시 ‘외지문학’ 을 일종의 ‘신예술’, ‘신 영역’ 의 각도에서 바라 보고, <마조제(媽祖祭)>에 대해 대만 작가와는 다른 남유럽식 향토주의로 ‘대만’ 을 처음으로 일본문학사에 올려 놓은 획기적인 의미를 가진다고 칭찬을 아끼지 않았다. 그 뒤, 1938년에서 1941년까지, 島田은 계속해서 외지문학의 시각으로 남도(南島)문학지, 화려도(華麗島)문학지, 외지문학, 대만의 문학 등을 주제로 하는 논문 시리즈를 집필했고, 비교문학적 방법으로 프랑스령 식민지문학에 주목한 결과, 전쟁 시기 본토문단에 강한 충격을 가져온 ‘외지문학론’ 에 있어 가장 중요한 선동자이자, 이론적 인물이 되었다. 학술계의 긍정적 평가와 외지문학론의 의제화 효과, 날로 높아지고 있는 명성, 문단 자본의 도움을 받은 西川滿은 1940년 1월 <문예대만(文艺台湾)>을 창간했고, 그 후 두 명의 교수가 장기적으로 원고를 제공해줌으로써 암암리에 그 잡지의 막후 학술고문을 맡게 되었다.

矢野와 島田이 3살에 대만으로 건너와 대만 출생 세대와 유사한 西川の 외지문학을 인정 한 것으로부터, 당시 학자들과 문화인들 사이에는 외지에 근거를 두고, 혼합적인 지방문화의 이국적 정서로 중앙문단에 대응하는 자각심과 자부심이 보편적으로 널리 퍼져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러한 개념과 정서의 배후에는 나날이 성장하는 재 대만 일본인의 사회문화적 의식 이외에도 대북 제국 대학 학자들이 전시 남방 식민지학의 새로운 추세를 민감하게 인식하고, 제국의 문화권에서 식민지학이 계속해서 발전하고 있는 중요성을 낙관한 점이 포함되어 있음을 부인할 수 없다.

다수의 대북 제국대학 교수들과 마찬가지로, 島田도 노골적으로 문화계에 투신해 직접적

으로 문단의 통제에 개입하거나, 문예 활동을 간섭한 적은 없다. 그러나 그의 권위나 왕성한 작품활동, 그리고 인상 깊은 학술식 논점은 이미 본토 문학세력과 외지문학세력의 논쟁 경쟁에 적지 않은 영향을 주었다. 원로 교수 矢野峰人은 주로 정치적 직무를 많이 담당했다. 1940년 1월 작가와 문예 애호가들이 자주적으로 결성한 ‘대만문예가협회’가 해산을 선포하고, 1941년 2월 동명의 새로운 협회가 정보국의 획책 하에 조직되었는데, 矢野는 문학 통제기관의 원형이라 불린 이 새로운 협회에서 회장직을 맡았다. 그 뒤 그는 계속해서 전쟁말기까지 유사한 직책을 맡는다. 1942년 8월 ‘황민 봉공회’ 문화부가 설립되고 난 뒤 矢野는 ‘대만문예가협회’ 회장으로서 문화부 문예반 반장을 맡아 황민 봉공회 문화부 소속 외부 단체 간부직을 맡았다. 1942년 12월 ‘대동아성’ 설치 및 ‘대동아 문학자대회’가 개최된 후, 그는 〈문예대만(文藝台灣)〉, 〈대만시보(台灣時報)〉에 〈大詔渙發〉(1942년 11월), 〈台灣文學의黎明〉(1942년 12월), 〈대만의 문학운동〉(1943년 1월) 등의 글을 발표했다. 섬세하고 주도면밀하면서도 학술적 기질을 잃지 않은 담화는 가장 정치적 색채가 적은 글로서 당시 시국에서 대만문학이 나아갈 방향을 지시했다. 〈대만문학의 여명〉이라는 글에서는 ‘대동아 문학자대회’가 향후 대만 문학의 나아갈 길을 확립해 주었고, 대만문학은 과거의 ‘외지’라는 스스로의 한계를 벗어나 ‘일본문학의 일부’의 ‘대동아 문학’의 길로 힘껏 나아가야 한다고 밝히고 있다. 정책적 선언의 성격을 띤 이 글은 외지/지방 등 명목 하에 감춰져 있었던, 국책사상과 유리되고, 입장이 애매한 특수한 문화정치를 부정한 것 외에도 관방문화의 통제하에서 제국 대학 교수들이 맡았던 발언인, 지도자로서의 중간 역할도 강화시켰다. ‘대만 문학 봉공회’가 조직되고 나서 矢野는 상임이사직을 맡았다. 1944년 5월 대만 문학 봉공회가 양대 민간문학잡지를 통합해 〈대만문예〉를 창간한 뒤, 그는 전쟁시를 발표하는 한편, 문예 지도적 성격을 띤 글이나 〈후기〉도 저술했는데, 이는 1945년 1월 이 잡지가 정간될 때까지 계속됐다.

그러나 위임을 받아 문예통제를 도왔던 矢野峰人は 전시 문화운동과 문화통제여론을 주도하고 전파하거나 규정지었던 중심 인물은 아니었다. 지방문화 운동과 관방문화통제가 균형을 잃기 쉬웠던 천칭 위에서 개념에 대한 홍보와 비평을 통해, 균형을 추구했던 학계의 추진자는 바로 앞서 익찬 지방 문화운동의 대만 내 전파를 도운 ‘헌법강좌’ 교수 中村哲이었다. 이를 통해 학술의 분업 또한 문화통제와 문화동원 체제 속에 드러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앞서 언급한 바와 같이 익찬 지방 문화운동의 대만판 관방 선언의 성격을 띤 〈문화정책으로서의 황민화문제〉라는 글을 발표한 것 외에도 일찍이 근위 제 2차 내각이 성립되던 1940년 7월에 中村은 이미 〈외지문학의 과제〉라는 글을 발표하여, 〈외향인 문학(外郷人文學)〉과 〈외지문학(外地文學)〉의 관계를 정리하여 외지문학계에게 방향조정을 할 것을 호소했다. 그는 〈외향인 문학〉이 외지의 저작 대상과 거리를 유지하는 것이 외지문학자의 지성의 안목을 계발하는데 도움은 되나, 특수성을 과도하게 강조해 이국정서의 엮기문학으로 전락할 우려가 있으므로 ‘외지문학’의 ‘귀감’으로 삼을 수 있다고 밝혔다. 외지문학은 ‘외지인의 생활 현실’을 현실적으로 묘사하는 데 힘써서, 도시 문화승배의 일률적인 맹종에 빠지거나, 혹은 일부러 도시문화를 피해 자기 폐쇄를 하게 되는 양극단적인 상태에 빠지는 것을 피하는데 주력해야 한다고 하였다. 내각 교체시기에 발표되어서, 지방문화와 도시문화의 기능 변증과 문화방향 검토의 의도를 가진 이 글도 中村哲이 신 체제 문화정책의 방향

전환의 이념을 선도하는 데 있어, 수행했던 지도적, 주도적 역할을 증명해 줄 수 있다. 익찬 지방문화운동의 이념에 대해 동조한다고 해서 당시 관방 문화론에서 떠들어댔던, ‘문화정치화’ 혹은 급진적인 문화통제정책에 동의한다는 것은 아니었다. 신 체제 운동의 시작에서 1943년 말 문화회복현상이 위축되기 전까지, 中村哲은 여러 편의 문예논평을 발표하고 그가 익찬 지방문화운동의 이념은 지지하나 얄은 거짓 지방주의 혹은 지나친 정치성은 배척한다는 일관된 입장을 드러내고 있다. 지방문화와 사실정신에 동조한 그는 외지문화 발전 초기에는 우선 사실 정신을 함양해야 한다고 생각했다. 그는 이국정서를 표방하는 문학은 사실주의의 ‘초월’이 아니라 ‘도피’로서, 다시 말해, 현대주의가 아니라 근본적으로 외지문학의 ‘정당하지 못한 길’이라고 밝혔다. 또한 이를 통해 西川滿의 유미주의를 은연중에 폄하하고 장문환(張文環) 작품의 웅장함을 찬양했다. 이국 정서식의 특수한 서술 형식을 반대하던 그는 大稻埕거리를 걸을 때, “우리는 특이한 점을 전혀 발견하지 못한다. 모두들 세계적인 느낌의 생활을 하고 있다”고 생각했다. 지방문화운동의 뿌리내리기 정신을 견지하며 그는 ‘다리의 문학운동’을 제창하고, 대만 문학을 진흥시키고자 하면 ‘대북(台北) 등 도회의 문학을 발전시키는 것보다는 대중(台中), 대만(台南), 가리(佳里) 등 지방의 문학을 발전시키는 것이 더 낫다.’고 하였다. 지나치게 직접적으로 작가의 의도와 구호 정치를 표현한 濱田隼雄에 대해서는 노골적으로 ‘고급작문’이라고 비웃기도 했다. 濱田이 득의 양양하게 〈남방이민촌(南方移民村)〉을 발표한 뒤, 中村은 냉담하게 ‘스스로 성찰’, ‘최대한 정책적인 문학 배제’ ‘작가의 입장을 잊지 말 것’ 등을 그에게 기대했다. 연사는 날카로우나 적절한 수위를 조절할 줄 알았던 그는 작품 평론을 통해 지방문학의 나아갈 바를 지시했으며 문학의 정치화 문제에 대해서는 충고와 비난을 아끼지 않았다. 또한 그는 문학의 정치화와 대만 문학의 표식화 및 신 세대 작가 교체의 부재 등의 현상으로 대만 문학계가 2,3년 동안 괄목할 만한 회복현상이 위축될 것이며 1년 내(1943년)에는 최고조에 이를 것을 예시했다. 실제로, 中村이 진술한 문예 비평을 통해 우려를 나타낸 바는 결코 기우가 아니라 정확한 문화관찰과 정치적 경각심에서 나온 것이었다. 中村哲은 스스로를 무당파의 아마추어 문예 평론가라고 칭했으나 그가 글을 발표할 때 선택한 간행물이나, 그의 글의 내용을 보면, 그가 장문환(張文環)등 대만 작가를 중심으로 한 〈대만문학〉그룹과 작가에 대해 비교적 동조하고 있으며 기대를 걸고 있음이 분명하다. ‘대동아 문학자 대회’ 이후부터 1943년 초까지, 그와 矢野峰人 두 사람의 글과 공개 담화를 비교하면, 1943년 이후의 대만 문학의 발전에 대해 각각 ‘여명론(黎明論)’과 ‘극한론(極限論)’을 가지고 문화정치, 정책 문학에 대한 상이한 태도와 입장을 가지고 있음을 더욱 잘 알 수 있다.

〈대만문학〉그룹의 배후에 있던 학자들 가운데는 비평에 용감하고 논쟁에 능했던 정치학과의 활발한 교수 외에도 행동스타일이 상대적으로 무기력해서 대만 작가들과 더욱 가까웠던 문학과 조교수인 工藤好美와 국문학과 교수이자, 대만 연극 발전과 연출에 관심을 가졌던 조교수 瀧田貞治가 있었다. 吳濁流의 回憶錄과 呂赫若의 日記 등의 회고와 기록을 통해 1940년대 工藤好美가 張文環, 呂赫若, 龍瑛宗, 吳濁流, 王白淵 대만 작가들과 활발히 교류하였고, 工藤好美의 집이나 연구실에서 독서회를 열기도 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실제로 工藤好美는 대만 문화인을 이해한 가까운 친구로 여겨졌을 뿐만 아니라 ‘대동아 문학자대회’가 개최되어 그 다음해 4월 ‘대만문학 봉공회’가 조직되기까지, 가장 민감했던 문예 정책의

축소기에 문예정책과 외지 문학파를 비판하기도 했다. 전쟁 기간 동안 가장 큰 규모이자, 일 점거 기간 동안 최후의 문학논쟁인－「분현실주의논전(糞現實主義論戰)」은 그가 대만 총독부의 제 1 회 ‘대만문화상’ 심사를 맡은 후 발표한 글에서 촉발되었다. 〈대만문화상과 대만문학〉이라는 글에서 工藤은 학원파의 깊이 있는 평론 스타일과 심도 있는 문예적 인식 그리고 문예비평의 솜씨를 드러냈다. 일반 잡지에는 거의 글을 신지 않던 工藤은 이 다소 긴 글에서 우선 제 1 회 〈대만문화상〉의 수상 항목의 부족한 점을 전면적으로 검토하고, 이를 통해 대만 문화분야에 대한 대만총독부의 이해 부족을 비난했다. 그는 특히 당국이 대북 제국대학이 전 일본을 통틀어 독보적으로 대만 문화연구에 있어 기여한 점을 직시해야 한다고 밝혔다. 그 뒤 그는 대만 시 문단상에 나타난 세기말적 퇴폐 스타일과 타락화된 낭만주의가 드러낸 현실 도피적인 추세에 대해 집중적으로 공격했다. 또한 이렇게 폐쇄적이고 부패되고 자아 타락적인 시파에는 군국주의적 근원이 존재하므로 반드시 이를 정리해야 한다고 밝혔다. 수상 작가에 대한 평론에서는 작품과 현실을 잇는 연결 관계, 연결 기교 및 작품의 역사관을 자세히 분석했다. 비교와 부각의 방법을 통해 장문환(張文環)의 현실주의 문예의 특징과 성과를 부각시켰으며, 西川滿을 풍자하고 濱田을 비웃었으며 그 자신이 주장한 ‘역사적 현실주의’의 문예주장을 널리 알렸다. 工藤은 ‘역사적 대전환기’가 이미 도래했고, 이 과정에서 일본문화이전, 식민지 문화이전, 모두 거대한 도전에 직면할 것임을 분명히 알고 있었다 따라서 관방이 근거 없이 문화선전을 과장하거나, 외지 문학파가 환상과 낭만 속에서 역사를 날조한 것에 비해 工藤은 진중하고 조리 있는 글을 통해 엄숙하고 급박한 심정을 감추지 않았다.

유사한 심정은 瀧田貞治와 같은 대만 연극 관련 평론에서도 드러났다. 瀧田貞治는 1943년 9월 ‘후생 연극연구회(厚生演劇研究會)’가 대만 연극 사상 유명한 공연을 할 때, 자세히 평론한 바 있다. 당시 그는 일부 ‘당파’의 반대 의견을 두려워하지 않고 이 공연이 ‘대만의 신 연극사에 있어서 획기적인 사건으로 불릴 만 하다’고 정확히 의견을 밝혔다. 그는 당국에 투서한다던가, 경찰에 밀고 하는 등의 ‘죄를 덮어씌우는’ 방법으로 문화 적수를 공격하는 비열한 행위를 비난했으며 예술이 ‘일률적으로 구호에 영합’하거나 정책의 ‘게시판’으로 전락하는 것에 반대했다. 瀧田은 12월 정간 명령을 받은 뒤 출판한 〈대만문학〉 최종호에서, 그 잡지의 자매단체인 ‘후생(厚生)’의 ‘역사방식’에 대한 찬양, 잘못된 문예 분위기에 비판, ‘대만문학결전회의(台灣文學決戰會議)’의 ‘대만에는 ‘비황민작가(非皇民作家)’가 있는가’에 대한 우려 섞인 추측은 의기소침한 본토작가들에게는 어려운 가운데 도움을 준 것과 같았다. 그러나 따뜻한 지원을 했음에도 불구하고, 瀧田은 ‘대만에서 문화운동에 종사하는 친구들’에게 ‘식민지 특수성’의 표방을 중단하라고 일깨웠다. 왜냐하면 그것은 스스로를 ‘문화의 암’이라는 한계 속에 가두기 쉽기 때문이었다. 이 밖에도 앞으로 공연하는 연극 중에서 〈엄계(閼雞)〉처럼 〈회고적〉 스타일로서 〈현실의 추세에 부합하지 않는〉 작품은 피해야 한다고 하였다. 만약 〈엄계(閼雞)〉라고 하는 가장 호평을 받은 작품을 올리지 않고 삭제한다면, 이번 공연이 여전히 전과 같은 폭발적인 반응을 불러 일으킬 수 있을 것인가 생각해 보아야 한다. 전문 평론가의 안목을 가졌던 瀧田의 제안이 현실에 부합되지 않았음은 분명하다. 이에 대해 그는 흥미로운 몇 마디 이유만을 밝혔다. “현실의 가혹함을 직시한다면, 내 뜻을 이해할 수 있을 것 이다 ”

전쟁의 급변으로, 瀧田역시 학자로서 ‘증산과 문학’ 간의 관계에 대해 현실적으로 고려하기 시작했는데, 관련 사무 당국, 군인가족과 문학가에 대해서 서적의 구입과 저술 및 독서에 대한 방향을 제시해야 하는 가혹한 상황에 직면하게 되었다. 적기 수백 대의 공습을 받는 가운데 굶은 살이 막힌 두 손으로 야채와 고구마를 경작하다 전쟁터로 나온 전사들에게 어떠한 책을 보내야 위로할 수 있을 것인가? 그는 시국과 괴리된 연애소설, 숨죽이는 전쟁작품, 판에 박힌 시국 설교물은 위험한 상황과 불안한 심리와는 동떨어진 것으로 적절한 선택이 아니라고 생각했다. 그래서 ‘현실적인 작품이야말로 사람의 마음을 움직일 수 있고, 시간이 금처럼 소중한 전쟁터의 용사들에게는 이런 작품만이 그들을 위로하고 그들에게 활력을 줄 수 있다’고 생각했다. 따라서 이것은 소설 유형의 문제가 아니라 ‘작가 자신의 식견과 태도’에 달린 것이다. 만약 이렇게 할 수만 있다면 시국을 주제로 한 것은 아닐지라도 국가의 시책과 배치되는 작품을 만들어내지는 않을 것이다. 이성적이면서 성실한 분석은 당시 간신히 문화발언권을 가지고 있었던 극소수의 제국 대학의 교수들이 비상 시국 하에서의 가졌던 학술적 천부성을 잘 보여주었다. 1944년 3월 呂赫若는 그 생애 유일의 단편소설집을 출판했다. 긴박해진 전쟁, 부족한 종이 등 상황적으로 문예 출판에 불리했던 시기에는 많은 우여곡절과 쟁취의 과정을 겪을 수밖에 없었다. 〈청추(淸秋)〉에 서문을 싣고 〈분현실주의 논전(糞現實主義論戰)〉에서 ‘암적문학(暗的文學)’이라는 오명을 입은 것에 대해 변호하고자 했으며, 일본어 교육과 전선의 용사들을 위문한다는 것으로 그 책의 가치를 찬양한 사람은 바로 연극과 문학 방면에 있어 呂赫若와 교류했던 瀧田교수였다. 결론적으로, 대북 제국 대학 교수와 대북 문단의 교류에 있어 현대 문예 분야는 〈문예대만(文藝台灣)〉 그룹을 지지한 矢野, 島田 등과 〈대만문학(台灣文學)〉에 가까웠던 中村, 工藤, 瀧田 등으로 나누어졌다. 이 밖에도 전쟁 기간 동안 경시됐던 한문 문예잡지는 창간과 발행이 더욱 힘들었기 때문에 각종 지원을 필요로 했다. 상술한 神田喜一郎 교수는 한문 문예 간행물 〈남국문예(南國文藝)〉 창간 과정에서 지원을 아끼지 않았다. 林荊南은 대만 가요의 수집과 정리에 힘쓴 稻田尹와의 교류를 통해서 〈대만 가요집(台灣歌謠集)〉의 편찬과 일본어 번역을 도왔고, 稻田의 은사인 神田喜一郎과 稻田이 임직했던 대북 제국대학의 ‘남방토속연구실(南方土俗研究室)’의 동업자인 宮本延人 강사의 발언과 글로부터 직, 간접적으로 지원을 받아 마침내 한문이 압박을 받던 시기에 〈남국문예(南國文藝)〉는 발간의 기회를 얻게 되었다.

상술한 것처럼 대만의 문화발전과 관방문화의 통제와 투쟁과정에서 문학과가 중심이 되어 인문 예술에 주목하던 학자들은 개인의 정치적 관점과 문화적 가치에 따라, 다양한 언론과 글쓰기, 행동으로 관방문화기관, 외지문화인 혹은 대만문화인과의 연결 관계를 보여주었다. 대만문학이건 외지문학이건 모두 ‘익찬 지방문화진흥운동(翼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과 ‘문학보국(文學報國)’, ‘대동아 문학(大東亞文學)’ 혹은 ‘황민문학(皇民文學)’ 등 계속해서 이어진 문화통제원칙의 압박하에, 국책의 요구와 문화의 존속 사이를 배회하며 연이은 검토와 개조를 받아들였다. 다만 전자가 받은 압박이 후자보다 훨씬 더 컸다. 문화개조의 동요가 일 때 마다 다양한 원인과 입장에서 문화 의제에 관심을 기울였던 대북 제국대학 문학과 교수들이 일종의 (위장) 중립적, 방관적 학술 집단의 역할로 대만 내의 문화운동의 그림자를 굽어보고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들의 학술적 권위, 사회적 위치와 전문적인 비평은 전시 대만의 지방문화론을 더욱 선동하는 효과를 가져왔다. 또한 전체 지방문화의 향방

을 보호하면서도 이끌어 나가는 다양한 역할을 수행했다. 제국 대학의 학자들은 지방문화에 대해 긍정적인 영향과 부정적인 영향을 미쳤는데, 그 영향력은 전쟁 후반기에 접어들면서 더욱 커졌고, 이는 전후까지도 지속됐다.

V. 결 론

익찬 지방 문화진흥운동은 처음에는 내지(内地) 문화계가 그 대상이었다가 후에 ‘외지는 제국내의 지방’이라는 사고에 따라 식민지 및 기타 부속정권으로 확대되었다. 의외였던 것은 이 관제운동이 총력전 체제하의 지방문화진흥운동의 가치를 정면으로 긍정한 것이었다. 이에 따라 경직된 황민화 정책하에서 압박 받았던 식민지 본토 문화운동이 회복될 수 있는 계기를 제공해주었다. 문화적 차이, 지방 가치에 호소해서 일률적으로 민족 문화 본질만 강조하지 않았던 전시본토화 운동이 대만 지방문화론의 형태로 나타난 것은 ‘동아/대동아 전쟁’ 이권동한 동아시아 글로벌화 과정이 가속화되는 때에 익찬 문화운동의 지극히 유한한 자원에 기생하여 핀 꽃과 같다고 볼 수 있다.

식민통치는 완전히 제국이 원하는 방향에 따라 일방적으로 동화를 추진한 것은 아니며 때로는 양방향으로 변질되는 과정이기도 했다. 외래 정권의 본토화와 본토사회의 식민지화는 지극히 불균형적인 상황에서 항거 구조와 상호이해 구조를 통해, 다른 형태와 속도로 발생했으나, 되 돌릴 수 없는 행보는 동시에 시작된 것이었다. 문화유사성에 근거했건 문화차이성의 조작에 근거했건, 제국의 견잡을 수 없던 야심은 양자간의 이화와 혼합, 그리고 전환의 과정을 가속화시켰고, 식민당국이 일방적으로 만들어 놓은 경로도 방해했다. 황민화 운동에서 새로운 정치경제사회의 맥락에 말려들었다가 다시 짜여진 대만문화의 혼합 과정은 정책세력의 개입과 상처로 중지되지 않았다. 전시의 문화사는 식민자와 피식민자가 동일한 문화 공공의 공간에서 서로 구축한 결과물이다.

1928년 설립된 대북 제국 대학은 10여 년 뒤인 1938년부터 식민지 사회에 광범위하게 개입하기 시작했고 식민지 문화계와 거리를 두어왔던 문정학부 교수들 역시 상아탑을 벗어나기 시작했다. 그러나 그들의 참여는 전쟁이 임박하면서 여러 제약과 제한을 받을 수 밖에 없었고 제국의 통제 불가능한 야심을 따라, 학술 징용과 문화 양심 사이를 배회했다. 이러한 불안정한 시대의 학자들의 그림자는 ‘후제국’ 혹은 ‘후식민’ 의 입장에서 제국의 근현대사 혹은 식민지 역사를 연구하는 우리에게 가장 소중한 ‘교훈이 된다’ 고 생각한다.

【Abstract】**Cultural Expropriation and Wartime Conscience**

LIU Shuchin

Keywords: wartime, the organization in support of the royal monarchy,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non-local culture,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cultural revival

Under the limited conditions of the environment, the cultural circle in Taiwan had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constant development, alternation, and creation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37 and 1945. At the time when fascist ideas, such a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and “Ring of Pan-East-Asian Collective Prosperity,” reached their summit, the movement of Japanese assimil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brought about a cultural transition between a suppress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from 1937 to 1940 and a revival from 1940 to 1943.

The wartime cultural revival in Taiwan was the result of an interaction among the official cultural battle aroused in Taiwan by the movement launched to solidify the monarchy of the Divine Emperor in Japan,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Japanese in Taiwan emerging after the mid-1930s, and the local cultural movement that regained its vitality from its appropriation of the cultural discourse in support of the royal monarchy in Japan. The catalyst that prompted these three streams of cultural power to mutually stimulate each other was the movement of invigorating the local culture guided by the movement of solidifying the royal monarchy. After the movement of invigorating the local culture, which originated in Japan, was enlarged to cover Taiwan as the colony of Japan at this time, an opposition was evoked between the two poles of the official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presented by the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der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civil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articulated by people of the local cultural circle. From the appearance of matters, the two poles respectively expressed their gist with the mode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but actually their thought and spirit were essentially distinct.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former pole as “the officially-made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was the wartime spiritual construction of people, referring to the issue of constructing proper identities that would qualify people of the nation. The aim of the latter pole as “the native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was nevertheless concerned abou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its sustained modernity, referr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subjectivity,” namely an issue regarding the identities that belonged to people of Taiwan. What lay between the pole that centered on the identities that would qualify people of the nation and the other pole that highlighted the regional subjectivity was “the discourse on the non-local culture,” made by the cultural circle of the Japanese in Taiwan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of the Japanese in Taiwan and their future vision.

The wartime was also the time when cultural mixture accelerated. In addition to the local cultural

elite, the offi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the Japanese in Taiwan started to actively move toward the center of the cultural field, becoming two new streams of power in the cultural circle. Among the diverse streams of power in the cultural circle, professors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could be labeled the leaders of discourse and practice, whose position could be on a par with the locomotive that pulled a train, guiding directions of cultural discourses and viewpoints. Eventually, “the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which crucially influenced the wartim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Taiwanese subjectivity, was the product interactively co-constructed under imbalanced structures of competition and reciprocity by the three kinds of discourses respectively created by the 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cultural elite of the Japanese in Taiwan, and the local cultural circle in Taiwa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issues:

(1)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panded and extended war, how could the discourse on invigorating the local culture proposed by the organization in support of the royal monarchy become the catalyst of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and how could this discourse switch on the wartime cultural revival under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movement of Japanese assimil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2)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the “homeland culture” to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ese culture, as well as situated in a popular trend of constructing Taiwan as an academic subject of study, what kind of role did professors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perform now that they had been laying particular stress on researches of the South and of Taiwan?

(3) During the fluctua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from its arrested development to a vigorous growth, then once again being subsumed under stricter governance, how did professor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s the lowest rank of the technical capital in the system of academic mobilization, exert their professional influences on the support, guidance, or governance of culture in Taiwan so as to either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or defend the local cultural circle?

The analyses conducted by this paper reveal the following discoveries:

1.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and the wartime cultural revival:

The discourse on invigorating the local culture, which constituted the core of wartime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was the principle of the new cultural governance indicat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in charge of the movement that solidified the royal monarchy, ruled by the Cabinet under the command of Konoe. Although the movement mainly stayed within the scop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ts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an invigoration of the rural/local culture and a well-founded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its principle of implementing the same cultural policy to the local and the non-local as a unity, nevertheless added the legitimacy of policy and the space of articulation to the practice or imagination of the wartime local culture (particularly the local culture

of colonies).

The gradual prosperity of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could be partially attributed to the outer influences caused by the reshaping of the imperial space and the veering of the central cultural policy. Furthermore, the prosperity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non-localization” of the colonial bureaucracy and the Japanese in Taiwan and the “imperialization” (a distinctive localization) of the Taiwanese elite and the local society, which together formed a trend towards common “localization”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 emergent consciousness of the Japanese in Taiwan and the intensified consciousness of the Taiwanese were mutually involved and stimulated. After the mid-1930s, discourses concerning “the generation born in Taiwan” and the need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ntertainment in drama, literature, and art for the Japanese in Taiwan stood out conspicuously beyond the homeland discourse in Taiwan upheld in full flourish by the local cultural elite and became newly risen issues of the cultural circle. The “colonial regionalism,” which contained an accumulation of multiple and diverse vectors including the imperial cultural governanc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non-local, and the native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provided soil favorable to the revival of Taiwanese culture during the restricted colonial period.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burgeoned by attaching themselves to the Japanese official movement of invigorating the local culture guided by the movement in support of the royal monarchy. After the range of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was expanded to cover Taiwan, the ideas produced by the official cultural movement,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interpretation made by Japanese scholars and the Japanese cultural circle in the colony in concert, soon interacted with the homeland cultural movement in Taiwan that reached its summit in the 1930s and the non-loc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Japanese in Taiwan that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1930s. This interaction created respective articulations with cultural mixture and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civil cultural discourses.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 briefly sabotaged the unidirectional advance of the wartime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existent official restriction, urged the revival of Taiwanese culture, whose traces potentially spread through fields of drama, literature, folk customs, folk arts, music, broadcasting, and fine art from the end of 1940 to the end of 1943. This phenomenon of cultural revival not only took place in Taiwan, but also exercised its effects on Japan, Korea, and Manchoukuo. These various events of cultural revival were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in their respective practical executions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policies of implementation and specific cultural conventions.

With the official cultural movement as the catalyst,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aiwan regained their chances of revival in the surroundings shaped by the growth of colonial regionalism, the veering of policy driven by the extended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aused by the reshaping of the imperial space. Cultural mobilization served as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this cultural revival, whose requirement obliged people of the local knowledge class, confronted with conflict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modernization, Japanese assimil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o paradoxically and strategically wrestle with the ruling authorities. As for scholars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the Japanese in Taiwan,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they were involved within the official cultural movement and began their unprecedented, deep, and extensive interference in the colonial cultural field. People of the cultural circle, including both the class of the colonizer and that of the colonized, faced at this time the most difficult and also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deal with wartime cultural issues.

2. The wartime cultural transition and the cultural interference of professors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The wartime transi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in addition to referring to the cultural fluctu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essence under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from 1937 to 1945, further revealed the changes in major streams of development, issues, ideas, and characteristics that distinguished the wartime culture from the culture before the war. The wartime “native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not only inherited “the discourse on the homeland culture,” which was the main fruit of discourses on Taiwanese cultur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but also excavated some new kinds of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basic ideas that supported the movement advocating the homeland culture, accompani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new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ultural contents in the rapidly stretched East-Asian zone of occupation. The term “local culture” had become the mainstream wording of the wartime discourse on native Taiwanese culture from 1937 to 1945. Connotations of the term “local culture” had opened up another dimension of resistance connected with the reshaping of the imperial space set off by the war, beyond the 1930s homeland consciousnes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socialism or nationalism. Discourses on Taiwanese culture moved into a renewed imagination pertaining to the posi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Taiwan in the Pan-East-Asia,” proposed from the role as “a local subject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the Empi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ithdrawal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homeland culture” and the staging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involved both inheritance and expansion.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the role of region and the growing awareness of regionalism were activat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reshaping of the imperial space, the requirement of resources expropriation,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 southern region, the development of non-localization in the colonial bureaucracy and immigrants, and the ceremonially joint activities held by local cultur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mpire in alliance. Wheth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or in activities that sprang up in the trend of cultural revival, there was a stream of power that could not possibly be disregarded. This stream of power came from the participation in colonial academ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by professors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928, with a vantage point of cultural interference and its professional researches on Taiwan/the South. As the only university located in the tropical area for the Empire,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was strongly characterized by its properties associated with politics, national policies, and colonial productivity, with particular objectives to achieve,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c

colonial study an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various subjects that could be generalized under the name “the synthetic tropical colonial study.” During the eighteen year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 most influential lectures, research organizations, or academic research fruits of the university were chiefly linked to miscellaneous surveys, researches, expropri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s assistance in colonial invasion, occupation, or governance.

The wide-ranged interference in the official enterprise on wartime surveys and in researches on Taiwan by professors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had created a third dimension in wartime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with a professional colonial academic organization as its center, in addition to the official colonial cultural policy and the cultural discourse made by the Japanese in Taiwan.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buffered the effects of direct confrontation that might be provoked in an encounter between the cultural policy enforced by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local cultural circle, and moreover inaugurated a space for the media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multiple streams of cultural power. The increasingly active discourses or articulations on Taiwanese culture made by scholars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who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colonial enterprise on surveys and in public statements,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space and legitimacy of wartime discourses on Taiwanese culture. Under the wartime cultural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cultural reformation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Japanese assimil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the overall cultural mobilization for the victory of war,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multiple peoples were mutually interwoven, accompanied by competition and comb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ublic space for commentary” formed through the media of academic professional criticism and common cultural discourses also politicized the interaction and contention between the Taiwanese cultural circle and the official cultural policy.

3.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roles of professor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in the cultural revival

The faculty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was one link in the circle of scholars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who pursued related researches on Taiwan/the South and achieved a position of primacy in the knowledge communities with their focus on the study of Taiwan. However, because of their comparatively secondary importance in the function of providing military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the faculty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s a result played a relatively minor role in the overall system of academic mobilization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Despite their minor position,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prosperous trend in colonial study to the same extent as those scholars who occupied the primary position in researches on the colony. Furthermore, they entertained a sense of indispensable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an ambition to utilize their specialties and wield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outhern region or o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Taiwan. Professor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were active i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Taiwan, constantly conducting negotiations and offering guidance between the offi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civil cultural groups, by means of the role of

scholar as an intermediary position. The professors were employed, entrusted, accorded undisclosed permissions, or held with expectations b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for the necessity of assisting the wartime guidance and governance of the cultural circle in Taiwan. This was the “unshared duty” undertaken by professor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separated from the tasks carried out by professors of other subjects.

Among professor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Kiitirou Kanda, who gave lectures on Oriental Literature, was highly sensitive about the policy of the South formulated b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and academic trends in the tropical region. He was also one of those who were entrusted more previously than others with cultural tasks in regions of occupation and with participation in the enterprise of surveys on the South. After Xia-Men University was taken over by Japan, Professor Kanda was engaged for assisting in dealing with precious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and the museum of Xia-Men University, upon which heavy losses were inflicted by the war. In 1943, he was once again appointed b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to take the position of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for City Residents (the former Library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in the region of occupation in Hong Kong. In addition to Professor Kanda, there were two groups, with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networks, supporting, directing, or criticizing the fields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art in Taiwan, respectively the group “Literature and Art of Taiwan” inclined to uphold Japanese writers, advocated by Kinzi Shimada and Mine Yano, and the group “Taiwanese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having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writers in Taiwan, favored by Akira Nakamura, Yoshimi Kudou, and Sadaharu Takita. The discourse on non-local literature asserted by Professor Shimada intensified debates and competitions between the local literary power and the non-local literary power. As a senior professor with reputation, Professor Yano was appointed to help promote the official governa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hence took charge of more political tasks than other professors of literature. Professor Kudou, among the professors, was the most familiar with Taiwanese writers and gave support to local literature and art in Taiwan. Professor Takita, in another aspect, concentrat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drama and stage performance in Taiwan. Professor Nakamura, who gave lectures on the Constitution, was devoted to the pursuit of balance in the guida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new system of cultural ideas proposed by the movement in support of the royal monarchy and balance in the tension between local cultural movements and the official cultural governance, achieved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ideas and the guidance of critiques. An academic division of labor was effected under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system of cultural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war, professors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who used to keep a distance away from the colonial cultural circle, gradually stepped across the boundary of the academic ivory towe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lonial cultural circle was nevertheless regulated and restricted, and moreover with the imperial ambition out of control, wavered between academic expropriation and cultural conscience. The dilemma confronted by these professors in the period of wartime upheaval may serve as the worthiest caution for researchers like us who select the post-imperial or post-colonial point of view to pursue our studies.

• Panel 4-2 留學生과 知的 流通

- Moderator** 張圭植 (CHANG Kyusik, 中央大)
- Panelist-1** 楊寧一 (YANG Ningyi, 北京師範大)
：近代早稻田大學的中國留學生 - 以1898-1931年期間爲中心
(근대 와세다대학의 중국 유학생 - 1898~1931년 기간을 중심으로)
- Panelist-2** 朴贊勝 (PARK Chanseung, 漢陽大)
：1930年代 以後 渡日留學生과 民族運動
- Panelist-3** 徐志民 (XU Zhimin,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對中國留日軍事學生政策研究
(9·18사변 이전 일본의 중국군사유학생 정책에 대한 연구)
- Discussant** 裴京漢 (BAE Kyoungghan, 新羅大)
咸東珠 (HAM Dongju, 梨花女大)

近代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 以1898～1931年期间为中心 —

■ 楊 寧一（北京師範大學校） ■

近代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 以1898~1931年期间为中心 —

楊 寧一（北京師範大學校）

〈目 次〉

- I. 早稻田大学在近代中国留日运动中的地位
- II. 《校友会员名簿》反映出的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基本情况
- III. 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 IV. 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对落后地区发展的推动
- V. 几点思考

从清朝末年開始，中國掀起留學日本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学界对中国留日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以《早稻田大学校友会员名簿》为基本线索，对1898-1931年期间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个案研究。之所以时间下限截止到1931年，是因为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留日学生有明显减少趋势，不具有典型意义。

I. 早稻田大学在近代中国留日运动中的地位

学者们在研究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学校时，经常提到主要有弘文学院、东京同文书院、法政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本文认为，在近代中国留日运动中，尽管许多学校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但是早稻田大学有着特殊的地位。

当时，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学习语言为主的速成学校，弘文学院、东京同文书院即属于这类学校。弘文学院1902开设，校长嘉纳治五郎，其前身是亦乐书院。学院学制3年，讲授日语及中等程度的普通学科，第三学年分文科和理科二部。1909年该校关闭。东京同文书院是由同文会为中国留日学生于1902年创办的，主要为留学生讲授日语和普通中等学科，政治目的明显，1926年停办。显然，这类学校开办时间短，兼顾中等教育和大学预科教育，本身不能培养出高层次人材。

另一类是法政大学、陆军士官学校等正规的大学或专门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是培养军事人材的专门学校，1898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入学。毕业于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的中国军队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其中一些人在中国军事舞台以至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法政大学1904年开始大量接受中国留学生。20世纪初留日学生多希望学习法律，其中进入法政大学的人数最多。不过，法政大学在成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是一所法律专门学校，以晚上上课为主，1904年才设立实业科。至1920年，根据新大学令，法政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改变为白天上课为主。¹⁾

与上述这些学校相比，早稻田大学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早稻田大学既有预科和补习科，也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并且以后者为主。

1) 释：、参阅法政大学编：《法政大学八十年史》，法政大学，1961年，第49-68页。

第二、在学科设置方面，早稻田大学比较齐全，既有政治法律，也有文学科和商学科，还有理工专业和师范专业。

第三、接受留学生的时间长。早稻田大学创办于1882年，从1898年开始接受中国留学生，在近代一直没有间断。

第四、早稻田大学的创立者大隈重信提出“东西文明之调和”，尽管有其历史背景与主观意图，但从文明论的角度是难能可贵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着应该支撑大隈所创立的早稻田大学的学问的支柱的精神”，“对早稻田大学这一具有特色的私立大学的理想来说，也包含着可以成为其根本原理的根源性”。²⁾ 因此，早稻田大学有重视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传统。1905年为接纳中国留学生专门设立了教育机构清国留学生部就是一个案例。该部设有本科、预科和补习科。本科学制二年，下设师范科、政治理财科和商科，师范科又分物理化学科、博物学科、历史地理科。

第五、早稻田大学建校的宗旨是“学问之独立”，使学校成为自由研究与教育的场所。在这一宗旨之下，早稻田大学聚集了一批追求真理、关注现实，甚至具有反叛性格的学者，例如浮田和民、安部矶雄、佐野学、久米邦武、津田左右吉、大山郁夫等。他们的身传言教对留学生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在近代中国留日运动中，进入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人数多。据实藤惠秀先生所著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统计，1902—1931年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人数为1272人，在所列表中各类学校中居第三位。而且，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

II. 《校友会员名簿》反映出的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基本情况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现保存有大正元年、三年、五年、六年、十三年、十五年以及昭和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各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学校友会员名簿》，是研究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宝贵史料。笔者对《校友会员名簿》进行了初步整理。

自1902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以来，到1931年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毕业生的情况如下³⁾：

一 九 〇 二	一 九 〇 三	一 九 〇 四	一 九 〇 五	一 九 〇 六	一 九 〇 七	一 九 〇 八	一 九 〇 九	一 九 一 〇	一 九 一 一	一 九 一 二	一 九 一 三	一 九 一 四	一 九 一 五	一 九 一 六	一 九 一 七	一 九 一 八	一 九 一 九	一 九 二 〇	一 九 二 一	一 九 二 二	一 九 二 三	一 九 二 四	一 九 二 五	一 九 二 六	一 九 二 七	一 九 二 八	一 九 二 九	一 九 三 〇	一 九 三 一
1	2	4	4	1 2	6	2 2 8	1 9 6	2 0 9	9 8	3 2	5 8	1 0	1 3	3 9	2 1	2 7	1 5	4 3	2 2	5 3	3 0	3 0	1 8	1 7	1 5	1 2	9	2 0	2 8

从表中可以看出，1908—1911年期间，留学生毕业人数明显多于其他年份，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清国留学生部的学生大体在这个时期毕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有一定数量的毕业生没有在《校友会员名簿》登记，实际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要比据《校友会员名簿》统计的数字多。

早稻田大学接受了多少中国留学生，现在没有发现可靠的数字。但是，根据毕业生人数可以大致

2) 峰島旭雄：《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大隈重信：《东西方文明之调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298页。
3) 摘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113-115页，“历年毕业于日本各校之中国留学生人数一览表”。

上作出推算。实藤惠秀先生指出，1908年的毕业生大约占同届留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1927-1937年的毕业生为平均各届留学生数的三分之一。⁴⁾ 这两个毕业生与同届留学生比例的差距太大。而学界通常认为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为7万人左右，有记载的毕业生人数为11966人。二者之间的比例大约为6~7：1，恰好是实藤惠秀先生指出比例的中间值。我们姑且按照6：1的比例推算，1898-1931年早稻田大学共接受了近8000名中国留学生。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留学生毕业后基本回国就业，归国后居住地区分布如下：

地区	北京	上海	浙江	广东	直隶	四川	湖南	江苏	江西	山西	福建	湖北	安徽	山东	广西	辽宁	河南	贵州	陕西	吉林	甘肃	云南	黑龙江
人数	99	17	166	83	57	51	50	42	39	33	26	24	22	21	18	18	13	11	10	6	3	3	2

按照北洋政府时期的行政区划，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归国居住地区有两个特点：第一，覆盖了除蒙古、青海、新疆、西藏以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第二，分布不平衡，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人数多。

毕业生在中国从事的职业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具体情况如下表：

职业	从政	教育界	经济界(包括实业、金融界)	自由职业(包括律师、记者等)	总计
人数	79	32	20	17	148

从表中可以看出，毕业生中从政者最多，其次是教育，同时也有一定数量从事实业和金融业。当然，由于《早稻田大学校友会员名簿》中只记载了147人的职业，占毕业生总数的八分之一左右，尚有八分之七的毕业生职业不明。这其中包括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者，已经去世者，但大多数可能生活工作在社会最基层，属于草根阶层。换言之，《早稻田大学校友会员名簿》记载了职业的毕业生应该归于社会精英阶层。

III. 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如上所述，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教育层次较高，专业设置比较齐全，因此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分布在各个领域，发挥了很大作用。下面，本文分别加以介绍。

在政治领域，如表所示，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从政者很多。其中既有毕业生，也有中途退学者。这不仅是和在早稻田大学所受到的专业教育有关，而且更取决于当时中国的形势。众所周知，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彭湃、廖承志等人都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其他如杨度、张继、冯自由等，均在中国政坛名噪一时。在中国政坛上活跃的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涉及到很多部门，有国会议员，也有财政、司法、交通、外交各部的官员，有供职于中央政府者，也有地方政府要员。其中有些人对中国的政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景耀月就是之一。景耀月1882年出生于山西省芮城县，1904年作为山西首批官派留日生之一，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毕业时获法学士学位。在日本留学期间，景耀月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担任组织干事，还被留日同学推举为中国留日同学会主席，与胡汉民、宋教仁、黄兴等人一起为在中国创建民主共和国奔走呐喊。

4) 同上，第117-118页。

从日本返回后，他在上海与于右任一起创办《民吁日报》，并时常在报纸上发表时评与文章，宣传和发动民众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前夕，他负责北方地区的起义筹备工作。武昌起义后他以山西省代表的身份被推举为各省代表会议议长，呕心沥血，妥善处理了不少事务。他起草了《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法》，对于建立民主体制的立法工作，贡献甚多。在马上要举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而就职宣言还未准备妥当之时，他进入一旁室，执笔急书，几乎一挥而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他以参议会参议长的身份，发表支持孙中山就职的演说，并亲手向孙中山交付了印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次长，并兼任南京政法大学校长。他主持拟订了全国第一部民主教育法规，主张男女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废止祀孔读经，为我国近代的民主教育奠定了基础。他经常与“国父”孙中山一起共商国是。孙中山曾亲书“高远”条幅赠予他，以表彰他的赫赫功勋。

他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因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他被扣押在总统府怀仁堂达十数天。袁世凯欲达到恢复帝制之目的，花重金收买景耀月为己所用，景严辞拒绝不在赞附帝制文约上签字。张勋复辟，他激于大义，潜回山西，发动晋、陕、豫各省的革命力量，组织“两河讨伐军”（两河指黄河、渭河），并被推举为总司令，声讨叛逆；曹锟贿选，他有病住院，还托老友带手书给曹，谴责其可耻行径。在东北军阀张作霖逮捕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等人时，他写信给张，劝阻不要杀害文化界的爱国人士。

景耀月虽留学日本，但保持着民族气节。惊闻“九一八事变”，景伏案痛哭，三日卧床不食。他写信给伪满洲国的总理郑孝胥，斥责他：“背叛祖国，甘效吴三桂、洪承畴，认贼作父……”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支持下野多年的吴佩孚“出山”筹备“华北自治”，他面见吴予以劝阻。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致函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又写信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说：“必将使蒋停内战，息党争，顾大局，团结御侮，救亡图存，避免内战，勿予敌以可乘之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政府对他硬逼软诱，要他主持华北教育总署工作。景以“我是文人，无心政治”予以拒绝。日伪政府登报发表景就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消息，他立即登报声明：“此事，我事先不知道。我今年老体衰，百病缠身，实难胜任。”他非常清楚自己处境险恶，但丝毫不惧怕，还常说：“我不能为文文山(文天祥)，亦当效史可法！现在是民族兴亡大事，不同于国内争端，未可丝毫苟且！”还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苏武乃是我师！”抗战期间，他久居凶险之中，没有收入，生活困顿，无钱治病，病情日益加重，终被日寇迫害致死。

由于景耀月在创建中华民国中的不朽功勋和抗战期间以身殉国的大忠大义行为，重庆国民党政府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宣读了褒扬抚恤令。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新华日报》上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⁵⁾

活跃在外交界的富士英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富士英(1880—1926)，浙江嘉兴人1898年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4年后毕业返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北洋大臣公署从事外务工作。1913—1919年，任驻朝鲜总领事。其时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士英到任后，为华裔创立子弟学校，实施爱国教育。总领事馆地处汉城市区中央，馆址宽广，日人垂涎，亟欲攫之，拟改建为总督府，以重金贿赂富士英，谋求征购，被严词拒绝。卸任归国后，日人又以故伎收买后任，并继以重金贿士英，以求勿再作异议。士英再拒，并上书当局，力言如此丧权辱国之事，绝不可行。日人终未得逞。后士英任外交部参事。一次巡视至新疆伊犁，当地官员有弊，乃暗中贿送财物，图谋得到庇护，富士英严厉回绝。在北京任期，车马、交际诸费均以自己薪俸开支。经济紧迫时，辞退家中佣人，由其妻操劳。任职

5) 高胜恩：《景耀月与民国初创》，《文史月刊》，2007年第10期；同著者：《民国风云人物景耀月的家世后裔》，《文史月刊》，2007年第11期。

多年,两袖清风。8个子女均刻苦学习,考入公费学校。⁶⁾

教育领域是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人材备出的领域。

蹇念益(1876—1930),贵州遵义人。在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丧权辱国,有志青年纷纷出国留学,探求强国之道的大潮中。蹇念益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因其出众的组织能力,当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结识了梁启超。蹇念益比梁启超小3岁,因政治主张相近,结为莫逆之交。学成回国后,在政府任职。辛亥革命后,与梁启超更为接近。一时之间,梁启超的谋划,均由蹇念益决断,故有“梁谋蹇断”之说。在袁世凯称帝活动越演越烈之时,蹇念益与蔡锷往返京、津间,与梁启超密谋反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各地军阀依然割据称雄,国事未能走上正轨。蹇念益不愿担任政府职,只图以议员身份共定国是

蹇念益在教育领域里的贡献是,1912年其他法学界著名人士在北京创办了朝阳大学。这是一所以法律、政治、经济等系为主的著名的私立法科大学,享有盛誉,是中国的法学摇篮之一,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无朝(阳)不成(法)院”。1949年,在原址建立了中国政法大学。次年2月,中国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⁷⁾

任凯南是又一位在教育领域中作出贡献的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他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青年时期聪明好学,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留日期间,结识了黄兴并加入同盟会,竭力为辛亥革命奔走联络,撰写文章。辛亥革命后,他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

他笃信教育可以救国。1921年,与雷梦强创办长沙大麓中学,并兼任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1922年,又主持创办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校长,锐意革新,注意师生素质。1926年,该校与工专、法专等合并为省立湖南大学,任凯南任经济学教授,1928年当选为校长。1927年,他又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武大经济学教授。1932年,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后兼任武汉大学法学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此后,任凯南又应邀回湖大任教务长,兼任大麓中学董事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被聘为湖南省参议员,至1945年,深感“参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遂辞去。后被委以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但坚辞未就,说:“办教育不是为了做官,有官瘾的人办不了教育。”他的收入,多半用于购书,并视典籍为天下公共财产。去世后,后人遵其遗命,将其万余册藏书赠送湖南大学和大麓中学。

可以说,任凯南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学识渊博,在经济学方面造诣尤深,在经济学界被誉为“南任北马(马寅初)”两大家之一。⁸⁾

在文化领域,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可谓群星璀璨。苏曼殊、杜国庠在中国文化界尽人皆知。在这里,本文要介绍的是被称为“五大天王”中的四位:黄侃、汪东、钱玄同和朱希祖。他们均出自稻门,归国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等名校任教。黄侃被誉为国学大师,钱玄同是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朱希祖则是中国大学文科中自有历史系以来的首任系主任。

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还有一部分人从事自由职业,如记者、律师等。林白水是报人中的佼佼者。他是福建省闽侯人,报界先驱。他早年从事报业,后留学日本,被称为中国在国外进修新闻学课程的第一人。回过一度从政,后长期办报,创办《公言报》、《社会日报》、《平和日报》等,经常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林白水对中国新闻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创办

6) 参阅浙江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人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7) 参阅熊先觉、徐葵:《法学摇篮——朝阳大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8) 汨政文整理:《任凯南先生传略》,政协汨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汨罗文史资料 第1辑》,政协汨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

白话报, 推动了报纸从使用文言文向使用白话文的转变。1923年1月1日25日 《社会日报》 载文揭露军阀张宗昌的心腹潘复说: “讲起这位潘大少, 他的做官成绩, 实在可惊。他统共做了一年零几个月的财政次长兼盐署署长, 在北京就买了两所大房子, 连装饰一切, 大约花去十万块钱。又在天津英(租)界, 盖一座大洋房, 光是地皮, 就有十亩之大, 一切工程地价, 统共花去十五万块钱。” 语言通俗, 敢讲真话。正是因为如此, 因在社论中屡次抨击军阀张宗昌, 1926年被张逮捕杀害。⁹⁾

唐宝锷则可以称为律师界的佼佼者。唐宝锷, 出生于上海, 是中国近代名人唐绍仪的侄辈。唐宝锷是中国官费派往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13人中的一人, 入学亦乐书院, 毕业后被清廷任命为驻日本长崎领事馆代理副领事, 时年21岁。两年后, 又调任驻东京公使馆馆员。

唐宝锷在驻日公使馆担任翻译期间, 还在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的行政科学习国际法, 毕业后, 又升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学习, 是中国第一批在日本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唐宝锷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 在仕途中无甚进展。1924年退出政界后, 在天津定居专执律师职业。

唐宝锷不仅是天津有名的大律师, 而且是中国国际法学科的开山人, 中国律师协会的创办人, 并长期担任中国律师公会会长。这些头衔足以证明他对中国律师业的贡献。¹⁰⁾

此外, 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人从事实业。例如, 据 《校友会员名簿》 记载, 明治41年毕业的程良楷任上海中国银行总稽核, 明治42年毕业的汪振声就职于济南中国银行, 大正6年毕业的杨继熙就职于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遗憾的是,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有关他们的其他资料。

IV. 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对落后地区发展的推动

中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 相对比较集中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 到落后地区就业的人数较少。尽管如此, 这些较少人数的留学生对落后地区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从以下几个具体事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浙江是近代经济发达地区, 也是 《校友会员名簿》 中记载的毕业中国留学生最多的省份。毫无疑问, 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 废除科举后, 浙江非常缺乏适应新式教育的教师, 因此浙江巡抚于1906年设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它在浙江新式学堂中规模最大, 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

学堂从最初就重视招聘有日本留学经验者, 教师中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占有一定比例。杨乃康, 1908年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师范科毕业, 应聘教授博物科, 一度代理教务长。朱希祖, 1908年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历史地理科毕业后, 1909年任该学堂历史教师。叶正度, 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该学堂教授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易宗周, 1906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 在该学堂教授法律制度和财务管理。张宗绪, 1908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 教授博物与植物。他们教授的科目几乎都是在日本学习的, 内容和教育方针是崭新的, 提高了学校的水平。两级师范学堂水平的提高, 就意味着担任浙江新式教育的中小学教师的水平提高, 无疑对浙江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¹¹⁾

9) 王仲莘: 《白话报的鼻祖 通俗化的大师——谨以此文纪念林白水先生英勇就义八十周年》, 《炎黄纵横》, 2006年第8期。

10) 唐培堃 《中国最早的留日学士唐宝锷》, 政协珠海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珠海文史 第七辑》, 政协珠海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年。

11) 吕顺长: 《清末における浙江省留日学生の帰国後の活躍》, 大里浩秋、孙安石: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研

当时，贵州是比较落后的地区，不可能像浙江那样集中大量留学回国人材。在有清一代，贵州出了三个状元和一个探花，称为“三鼎甲一探花”。民主主义革命者、遵义人杨锡谟，早年曾在《公车上书》签名，因怕影响录取，改名杨兆麟，于1903年中一甲第三名(探花)，后来留学日本，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政局动荡，1914年返回遵义定居。应地方政府和父老乡亲邀请，为家乡做事。主持编写地方志《续贵州府志》。因深恶痛绝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婉言辞谢前往北京编修国史之邀请。袁世凯称帝、蔡锷首先起义后，积极联络贵州民主派同人响应，亲自草拟电文，通电全国声讨。此后，参与为地方先贤修建祠堂、编辑文集等事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遵义比较闭塞，消息到得较迟，直到6月下旬，各界才纷起响应。亲到现场，发表演说。¹²⁾ 杨兆麟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民主革命的发展。

在教育领域，1905年前后，贵州分两批派出20名学生赴日留学，其中王佩芬入早稻田大学。他们回国后积极推进新学，并在贵州大学堂任教，成为了办学的骨干力量。1928年，在贵州大学堂的基础上建立了贵州大学。王佩芬在教授中文的同时，还于1930年创办了贵阳市立中学。民国初期，贵阳教育发展缓慢，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仅存一所普通中学。王佩芬任校长，办学认真，受到社会好评。有人评价说，贵州省有许多从事军事、政治、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工作者，都出自他的门下，真可谓桃李满天下。¹³⁾

在另一个落后地区福建龙岩，同样有一位毕生为教育事业服务的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林会嘉，1891年出生于龙岩，1918年留学日本，192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他回国后，以“仕官不作，商贾不就，专事教育”的精神，在创办于1903年的省立第九中学任教，后任学监和事务主任，同时兼任曹溪萃英小学校长。1929年他侨居印度尼西亚，依然以办学为生，心系家乡教育事业。1947年回国，继续在中学任教，并多次主持为教育捐资盖校舍。¹⁴⁾ 正是在林会嘉等献身教育事业的几代人的努力下，第九中学(现龙岩一中)人才辈出，被誉为“红土地上的教育明珠”。

V. 几点思考

从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个案可以看出，在早稻田大学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将所接受的新知识、新思想运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当中，说明留学是知识交流与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大学是国际性知识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不是所有的大学能够起到国际知识交流的作用，或者这个作用有大有小。从早稻田大学的案例可以看出，这至少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高水平的教育，一个是办学面向国际化。

在研究留学这种特殊的知识交流与转移的作用时，以往比较注意少数精英阶层，忽略了社会基层的情况。例如，著名学者安藤彦太郎在其研究早稻田大学与中国关系的著作中，重点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只是李大钊、彭湃、廖承志。¹⁵⁾ 实际上，留学生在基层或者在地方上，不求闻达，默默工作，令

究の現段階》，御茶水の書房，2002年。

12) 韦敦：《清探花贵州遵义杨兆麟生平》，贵州文史研究馆：《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1期。

13) 杨适：《民国时期贵阳普通中学教育简介》、熊先煜：《忆贵阳中学校长王梦淹先生》，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26辑》，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

14) 林荣照：《毕生为教育事业服务的林会嘉先生》，政协龙岩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龙岩文史资料 第13辑》，政协龙岩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第89-90页。

15) 参阅安藤彦太郎：《未来にかけの橋——早稻田大学と中国》，成文堂，2002年，第四部分“早稻田で学ん

人钦佩，而且因为他们见过世面，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当地必然有很大影响，构成了支撑中国社会的基础。因此，对他们的研究更能看到社会变迁的真实情况。当然，对他们的研究有很大难度，需要在几乎没有线索的情况下去收集资料。

另外，在评价留学生作用方面，还存在着一个方法问题需要突破。到目前为止，一般论证留学生的作用时，大多采取的方法是介绍留学的经历和归国后的活动。这种方法存在一个漏洞，即留学经历与归国后的活动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有，又体现在哪里。例如，本文所提到的“五大天王”中的四位，虽然都出自稻门，但又都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他们的成就，有多少受惠于早稻田大学，又有多少受惠于章太炎。这是一个值得具体分析的问题。另外，同样是留学日本，即有包括本文上述介绍到对中国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的人，也有少数如殷汝耕、金邦平那样的卖国贼。以往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化。今后需要对留学生接受的教育内容、思想发展演变过程、归国后活动的指导思想等许多方面深入加以研究，才能够对留学生的作用作出恰当的评价。

근대 와세다대학의 중국 유학생

- 1898~1931년 기간을 중심으로 -

楊 寧一 (北京師範大學校)

〈목 차〉

- I. 머리말
- II. 근대 중국의 일본유학운동에서의 와세다대학의 위치
- III. 『早稻田大學校友會員名簿』에 반영된 와세다대학 중국유학생들의 기본 정황
- IV. 와세다대학의 중국유학생들이 중국 근대화의 각 영역에서 공헌한 바
- V. 와세다대학 중국유학생들이 낙후지역의 발전에 미친 영향
- VI. 몇 가지 생각할 거리

I. 머리말

청조 말부터 중국에는 일본 유학 붐이 형성되어 중국의 근대적 사회 변화를 강력하게 촉진시키게 된다. 그간 학계에서는 이러한 중국의 일본유학운동(留日運動)에 대해 많은 연구를 진행해왔다. 본 연구는 『早稻田大學校友會員名簿』를 기본 단서로 삼아, 1898~1931년 기간 와세다대학(早稻田大學)의 중국유학생들에 대해 살펴보고자 한다. 검토 기간의 하한선을 1931년으로 끊은 것은, 이 해에 일본이 중국을 침략해 전쟁을 일으키게 됨에 따라 일본으로의 유학이 뚜렷하게 감소하는 추세를 보이기 때문에 그 이후의 시기는 중국의 일본유학운동에 있어 전형적인 의미를 가지지 못하다는 판단에서이다.

II. 근대 중국의 일본유학운동에서의 와세다대학의 위치

연구자들이 중국유학생을 받은 일본의 학교들을 연구할 때 주로 언급되는 곳은 弘文學院, 東京同文書院, 法政大學과 陸軍士官學校 등이다. 그런데 필자는 근대 중국의 일본유학운동에서 이러한 많은 학교들이 중요한 영향력을 가지고 있었지만, 그중에서 와세다대학이 특수한 위치를 점하고 있었다고 생각한다.

당시 중국 유학생을 받은 학교는 크게 두 종류로 나눌 수 있다. 하나는 언어 학습을 중심으로 한 속성학교로, 홍문학원, 동경동문서원이 바로 이 범주에 속한다. 亦樂書院을 전신으로 하는 홍문학원은 1902년에 개설되었고, 학교장은 카노 지고로(嘉納治五郎)였다. 학원의 학제는 3년으로 운영되었고, 일본어와 중등 정도의 보통학과 수업을 강의했으며, 3학년이 되면 문과와 이과로 나뉘었다. 1909년에 문을 닫았다. 동경동문서원은 同文會가 중국유

학생들을 위해 1902년에 세운 곳으로, 주로 일본어와 보통중등학과 수업을 받았다. 정치적인 목적이 선명했고, 1926년에는 운영을 중단했다. 이들 학교들이 운영되었던 기간이 짧았고, 중등교육과 대학예과교육을 아울러 다루었다는 점에서 그 성격상 고등 인재를 양성할 수는 없었음이 분명하다.

또 다른 유형은 법정대학, 육군사관학교 등 정규대학 혹은 전문학교의 경우이다. 육군사관학교는 군사인재를 배양하기 위한 전문학교로, 1898년에 처음 중국 유학생들이 입학하였다. 사관학교를 졸업한 유학생들은 청 말에서民国 초까지 중국 군대의 근대화 과정에서 중요한 역할을 담당했고, 그중 몇몇은 군사 방면에서 정치 방면에까지 당당한 위세를 떨쳤다. 법정대학은 1904년에 많은 수의 중국 유학생들을 받기 시작했다. 20세기 초, 일본으로 유학 간 많은 중국 유학생들이 법률을 공부하고자 했는데, 그중 법정대학에 들어간 사람이 가장 많았다. 그러나 법정대학은 설립 후 오랜 기간 동안 법률전문학교로서 야간 수업을 중심으로 운영되었고, 1904년이 되어서야 실업과를 설립했다. 1920년에 시행된 새로운 대학령에 따라 법정대학은 종합대학으로서 주간 수업을 주로 할 수 있게 되었다.¹⁾

와세다대학은 상술한 이들 학교들과 비교해 다음의 몇 가지 특징을 갖는다.

첫째, 와세다대학은 예과와 보습과뿐 아니라 본과와 연구생 교육도 있었으며, 게다가 후자가 중심이 되었다.

둘째, 와세다대학은 학과의 설치가 비교적 완비되어 있었다. 예를 들어, 정치법률 뿐 아니라 문학과와 상학과도 있었고, 이공 전공과 사범 전공도 있었다.

셋째, 유학생을 받았던 기간이 길었다. 1882년에 설립된 와세다대학은 1898년에 처음 중국 유학생을 받기 시작해 근대 이래로 중단된 적이 없었다.

넷째, 와세다대학의 창립자인 오쿠마 시게노무(大隈重信)가 제기한 ‘동서문명의 조화’는 그것에 역사적인 배경과 주관적인 의도가 있었다고 하더라도, 문명론의 관점에서 높이 살 만하다. 즉, 그것은 “모종의 의미에서 오쿠마가 설립한 와세다대학을 지탱시키는 학문의 버팀목이 되는 정신을 지니고 있었고”, “와세다대학이라는 이러한 특색 있는 사립대학의 이상에 대해 말하자면 또한 그 근본 원리가 되는 근원성을 포함하고 있었다.”²⁾ 이로 인해 와세다대학은 아시아, 특히 중국의 전통을 중시했다. 1905년 중국유학생을 받아들이기 위해 淸國留學生部라는 교육기구를 전문적으로 설치한 것이 바로 그 예이다. 이 청국유학생부에는 본과, 예과와 보습과가 설치되었다. 본과의 학제는 2년이었고, 아래로 사범과, 정치이재과와 상과를 설치하였고, 사범과는 또 물리화학과, 박물학과, 역사지리과로 나뉘었다.

다섯째, 와세다대학의 설립 취지는 ‘학문의 독립’으로, 자유로운 연구와 교육이 이루어지는 학교를 만드는 것이었다. 이러한 취지하에 와세다대학은 진리를 추구하고 현실에 관심을 가지는, 심지어는 반역적인 성격을 지닌 학자들까지 불러모았는데, 예를 들어, 우끼다 가즈오(浮田和民), 아베 이소오(安部磯雄), 사노 마나부(佐野學), 구메 쿠니다케(久米邦武), 츠다 소우기치(津田左右吉), 오야마 이쿠오(大山郁夫) 등을 들 수 있다. 그들의 가르침은 유학생들에게 학문뿐 아니라 인격 형성에도 큰 영향을 주었다.

1) 法政大学编, 『法政大学八十年史』, 法政大学, 1961年, 49~68쪽 참조.

2) 峰島旭雄,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 大隈重信, 『东西方文明之调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2年, 298쪽.

중국유학생이 처음으로 와세다대학을 졸업한 1902년부터 1931년 시점까지의 와세다대학의 중국유학생 졸업자들의 정황은 아래와 같다.³⁾

1 9 0 2	1 9 0 3	1 9 0 4	1 9 0 5	1 9 0 6	1 9 0 7	1 9 0 8	1 9 0 9	1 9 1 0	1 9 1 1	1 9 1 2	1 9 1 3	1 9 1 4	1 9 1 5	1 9 1 6	1 9 1 7	1 9 1 8	1 9 1 9	1 9 2 0	1 9 2 1	1 9 2 2	1 9 2 3	1 9 2 4	1 9 2 5	1 9 2 6	1 9 2 7	1 9 2 8	1 9 2 9	1 9 3 0	1 9 3 1
1	2	4	4	1 2	6	2 2 8	1 9 6	2 0 9	9 8	3 2	5 8	1 0	1 3	3 9	2 1	2 7	1 5	4 3	2 2	5 3	3 0	3 0	1 8	1 7	1 5	1 2	9	2 0	2 8

와세다대학은 많은 중국유학생들을 받았는데, 현재로서는 정확한 수치를 확인하기는 어렵다. 다만 졸업생 수에 근거해 대략적인 추산은 할 수 있다. 가네토 게이슈는 1908년의 졸업생이 같은 기수의 유학생 총수의 10분의 1 정도를 차지하고 있고, 1927~1937년 사이의 졸업생이 평균 각 기수의 유학생 수의 3분의 1에 해당한다고 지적했다.⁴⁾ 졸업생 수와 같은 기수의 유학생 비율의 격차는 너무 크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학계에서는 통상 일본에서 유학한 근대중국의 유학생 수가 대략 7만 명 정도라고 보는데, 문서상에 기록되어 있는 졸업생 명수는 11,966명이다. 양자 간의 비율은 대략 6~7 : 1로, 바로 가네토 게이슈가 지적한 비율의 중간치에 해당한다. 잠정적으로 6 : 1의 비율 정도로 추산해보면, 1898~1931년 와세

4) 同上, 117~118쪽.

다대학에는 모두 약 8,000명의 중국 유학생들이 유학을 했음을 짐작해 볼 수 있다. 이는 결코 적지 않은 숫자라 하겠다.

유학생들은 졸업 후에 대체로 중국으로 돌아와 취업을 했다. 귀국 후 유학생들이 거주했던 지역의 분포 상황은 아래와 같다.

지역	北京	上海	浙江	廣東	直隸	四川	湖南	江蘇	山西	福建	湖北	安徽	廣西	遼寧	河南	貴州	陝西	吉林	甘肅	雲南	黑龍江	臺灣	總數
명수	99	17	166	83	57	51	50	42	33	26	24	22	21	18	13	11	10	6	3	3	2	1	85

북양정부 시기의 행정 구획에 비춰보면, 와세다대학 졸업생들이 귀국 후 거주한 지역은 다음의 두 가지 특징을 지닌다. 첫째, 명구(蒙古), 칭하이(靑海), 신장(新疆), 시짱(西藏) 이외의 전국 대부분의 지역을 포함하고 있다. 둘째, 분포가 불균등하고, 비교적 경제와 문화가 발달한 지역에 많은 사람들이 거주했다.

졸업생들이 중국에 돌아와 종사한 직업군은 대체로 네 가지 정도로 나눌 수 있는데, 구체적인 상황은 아래 표와 같다.

직업	정계	교육계	경제계 (실업 · 금융계 포함)	자유직업 (변호사 · 기자 등 포함)	총계
명수	79	32	20	17	148

표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듯이, 졸업생 가운데 정치에 참여한 사람들이 가장 많았고, 그 다음으로 교육계에, 그리고 일정한 수가 실업과 금융업에 종사했다. 사실상 『早稻田大學校友會員名簿』에는 전체 졸업생 총수의 8분의 1에 해당하는 147명의 직업만이 기재되어 있기 때문에 나머지 8분의 7에 해당하는 졸업생들의 직업은 아직 알 수 없다. 그중에는 공산주의 운동에 종사한 자, 이미 사망한 자도 포함되는데, 그러나 아마 대다수는 사회의 가장 기층에서 일하며 생활했던 풀뿌리계층에 속했을 가능성이 있다. 바꿔 말하면, 『校友會員名簿』에 직업이 기록된 졸업생들은 분명 사회 엘리트 계층에 속했을 것이라고 볼 수 있다.

IV. 와세다대학의 중국유학생들이 중국 근대화의 각 영역에서 공헌한 바

상술한 것처럼 와세다대학의 유학생 교육 수준은 비교적 높았고, 전공 설치도 비교적 완비되어 있었다. 때문에 중국 유학생들은 귀국 후 중국사회 내의 각 영역에 퍼져 상당한 영향력을 발휘했다. 이하에서 각 영역으로 나누어 소개해보고자 한다.

먼저 정치 영역을 살펴보자. 위의 표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듯이 와세다대학의 중국유학생들은 귀국 후에 정치에 참여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그 중에는 졸업생도 있었지만 또 중도에 퇴학한 사람도 있었다. 이는 와세다대학에서 받은 전공 교육과 관련이 있었고, 더욱이 당시 중국의 형세에서 결정된 측면이 컸다. 주지하듯이, 공산주의운동에 투신한 천두슈(陳獨秀), 리다차

오(李大釗), 펑바이(彭湃), 라오청즈(廖承志) 등은 모두 와세다대학에서 수학했다. 그 밖에 양두(楊度), 장지(張繼), 펑즈여우(馮自由) 등은 중국 정계에서 한 때 이름이 널리 알려진 인물들이다. 이처럼 중국 정계에서 활약한 와세다대학 출신 유학생들은 다방면에 영향을 미쳤는데, 국회의원, 재정·사법·교통·외교 부문의 관리도 있었고, 중앙정부와 지방정부에서 직무를 담당하는 이들도 있었다. 그중 몇몇은 중국의 정치 건설에 있어 중대한 공헌을 하기도 했는데, 징야오웨(景耀月)가 바로 그러한 인물이다. 1882년 산시성(山西省) 루이청현(芮城縣)에서 출생한 징야오웨는 1904년에 산시성에서 처음으로 일본에 파견한 유학생 중의 한 명이었다. 그는 일본 와세다대학에 들어가 법률을 공부하고 법학사 학위를 받았다. 징야오웨는 일본 유학 기간동안 쑨중산(孫中山)이 창립한 同盟會에 참가해 조직간사를 맡았으며, 또한 유학생 동학들에 의해 中國留日同學會의 위원장직에 추천되었고, 후한민(胡漢民), 쑹자오런(宋教仁), 황싱(黃興) 등과 함께 중국의 민주공화국 건설을 위해 노력했다.

일본에서 돌아온 후, 그는 상하이(上海)에서 위여우런(于右任)과 함께 『民吁日報』를 창간하고 신문에 시평과 문장을 발표하면서 민중참여와 반제 반봉건의 혁명운동을 선전했다. 辛亥革命 전야에는 북방 지역의 기의 준비 작업을 책임졌다. 武昌起義 후에 그는 산시성 대표 자격으로 각 성 대표회의의 의장으로 추대되어 심혈을 기울여 수많은 사무들을 처리했다. 또한 「臨時約法」과 「臨時政府組織法」의 초안을 기초하고, 민주체제를 건립하기 위한 여러 입법 활동에 많은 공헌을 했다. 또 이런 일도 있었는데, 곧 총통의 취임선서식이 거행될 예정이었으나 아직 취임선언문이 완벽하게 준비되지 않은 급박한 상황에서 그는 어떤 방에 들어가 일필휘지로 급히 글을 집필하여 「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을 완성시켰다. 그는 참의회 참의장의 신분으로 쑨중산의 취임을 지지하는 연설을 발표하고, 직접 쑨중산에게 인수를 교부하였다. 南京臨時政府 성립 후, 그는 임시정부의 교육차장에 취임하였고 南京政法大學의 교장직을 겸임하였다. 그는 전국 제1부 민주교육법규의 초안을 주관했는데, 여기에서 그는 남녀 모두 평등하게 교육을 받을 권리를 보장할 것과 공자 제사와 독경을 폐지할 것을 주장하는 등, 중국의 근대적 민주교육을 위한 기초를 놓았다. 그는 종종 ‘국부’ 쑨중산과 함께 국시를 논의했으며, 쑨중산은 친히 쓴 ‘高遠’이라는 족자를 그에게 주어 그의 혁혁한 공헌을 표창하기도 했다.

그는 위안스카이(袁世凱)의 帝制 복벽을 반대했다. 북양정부가 시대의 흐름에 역행하고 있음을 규탄한 것을 이유로 그는 總統府 懷仁堂에 10여 일 동안 구금되기도 했다. 위안스카이는 제제를 회복하려는 목적을 달성하고자 했고, 이에 화중진(花重金)은 징야오웨를 매수하려고 시도했으나, 징야오웨는 제제에 동조한다는 것을 표하는 증서에 서명하라는 그의 요구를 강하게 거절했다. 장쉰(張勳)이 복벽하자, 그는 대의에 격동되어 산시로 숨어들어가, 산시(山西)·산시(陝西)·허난(河南) 각 성의 혁명 역량을 이끌고 ‘兩河討伐軍’(兩河는 黃河, 渭河를 가리킴)을 조직해 반역을 성토했다. 이때 그는 총사령으로 천거되었다. 차오쿤(曹錕)이 선거에 당선되기 위해 뇌물을 쓰자, 그는 병으로 입원한 상태에서도 옛 친구에게 손수 쓴 글을 차오쿤에게 가지고 가도록 부탁해 그 치욕스런 행실을 질책하였다. 동북군벌 장쥘린(張作霖)이 중국공산당의 지도자 리다차오 등을 체포하자 장쥘린에게 편지를 써 문화계의 애국 인사를 살해하지 말 것을 당부하기도 했다.

징야오웨는 비록 일본에 유학했지만 민족의 기개를 품고 있었다. ‘9·18사변’이 발발했다

는 소식을 듣고 놀란 그는 책상 앞에 엎드려 통곡하고 3일 밤낮을 침대에 누워 식음을 전폐했다. 그는 괴뢰만주국의 총리 정샤오쉬(鄭孝胥)에게 편지를 써서 “조국을 배반하고, 자진하여 吳三桂, 洪承疇에게 굴복하고, 적을 아버지로 삼으니……” 라고 그를 질책했다. 1935년 ‘華北事變’ 후, 일본이 몇 해 동안 물러나 있었던 우페이푸(吳佩孚)가 ‘속세로 나와’ ‘華北自治’의 준비하는 것을 지지하자, 그는 우페이푸를 만나 그만 둘 것을 설득했다. 1936년 ‘西安事變’이 발생했을 때에는 장쉐량(張學良), 양후청(楊虎城) 두 장군에게 서한을 보내고, 또 마오 주석과 주 총사령관에게도 편지를 보내, “반드시 장(蔣介石)으로 하여금 내전을 중지하고 당쟁을 그만 두고 대국을 돌보게 하며, 단결해 외부의 침략에 항거하여 민족을 멸망으로부터 구하고, 내전을 피해 적에게 이용할 수 있는 기회를 주지 말게 하라.” 고 역설했다. 1937년 ‘7·7사변’ 후, 일본괴뢰정부는 그를 압박하고 회유하면서 華北教育總署의 일을 맡기려 했다. 그는 “나는 문인이고, 정치에는 뜻이 없다” 는 뜻을 밝히고 그 제안을 거절했다. 일본괴뢰정부는 신문에 기사를 게재하여 징야오웨이(鄭孝胥)가 北平圖書館 관장직에 취임한다는 소식을 발표하자, 그는 즉시 성명서를 실어 “이 일은 나는 모르는 일이다. 나는 지금 몸이 노쇠하여 갖가지 병이 몸에 달라붙어 있으니 실로 능히 감당하기가 어렵다.” 고 거절의사를 분명히 했다. 그는 자신이 위태로운 상황에 처해 있음을 분명히 알았지만 전혀 두려워하지 않고 항상 “나는 文天祥이 될 수는 없지만, 다만 역사를 본받을 수 있어야 함이 마땅하다! 지금은 민족의 흥망이 걸린 상황으로 국내에서 분쟁이 있어나는 것과는 다르니 터럭만큼도 소홀히 할 수 없다.” 고 하고, 또 “굶어 죽는 것은 작은 일이고, 절개를 잃는 것은 큰 일이니, 蘇武가 바로 나의 스승이다!” 라고 말했다. 항전시기 그는 오랜 기간 위태로운 상황에 처해, 수입이 없어 생활이 견딜 수 없을 정도로 고달팠고 병을 치료할 돈조차 없어 병의 상태가 날로 나빠지다가, 끝내는 일본 침략자의 박해로 생을 마감했다.

중정국민당정부는 중화민국을 창건하던 과정에서의 징야오웨이의 불후한 공헌과 항전시기에 순국한 충성심과 대의를 기리기 위해 성대한 추도회를 열고 무훈령을 표창했다. 중국공산당원 역시 『新華日報』에 그의 타개 소식을 실었다.⁵⁾

외교계에서 활약한 푸스잉(富士英) 역시 언급할 만한 인물이다. 푸스잉(1880~1926)은 저장(浙江) 자싱(嘉興) 사람으로, 1898년에 일본 도쿄에 있는 와세다대학으로 유학을 가 4년 후에 졸업했다. 중국으로 돌아온 그는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및 北洋大臣公署에서 외교 사무를 담당했다. 1913~1919년에는 駐朝鮮總領事를 역임했다. 당시 조선은 이미 일본 식민지로 전락한 상태였는데, 그는 부임 후 華裔를 위해 제자학교를 설립하고 애국교육을 실시했다. 당시 총영사관은 서울시 중앙에 위치해 있었는데, 영사관의 부지가 넓어 일본인이 탐을 냈고 그것을 가로채 총독부로 개축하려고 했다. 이에 거금의 뇌물로 푸스잉을 회유해 그곳을 사들이려고 했으나 푸스잉은 이를 강경하게 거절했다. 파견 기간이 끝나 귀국한 후에도 일본인은 오래된 수법으로 후임자를 매수한 데 이어 푸스잉에게 거금의 뇌물을 쥐 다시는 다른 의견을 내지 못하게 하려 했다. 그러나 푸스잉은 이를 재차 거절하고, 당국에 글을 올려 주권을 상실하고 국위가 실추되는 이러한 일이 절대로 일어나서는 안된다고 역설했다. 일

5) 高胜恩, 「景耀月与民国初创」, 『文史月刊』, 2007年 第10期; 「民国风云人物景耀月的家世后裔」, 『文史月刊』, 2007年 第11期.

본인은 결국 자신들의 목표를 달성하지 못했다. 후에 푸스잉은 외교부 참사로 임명되게 된다. 한번은 신장(新疆) 이리(伊犁)로 순시를 갔는데, 현지 관원이 자신의 잘못을 감추기 위해 푸스잉에게 은밀히 뇌물을 건네 자신을 비호해 줄 것을 요구했다가 푸스잉이 호되게 거절했던 사건도 있었다. 베이징에서의 임기 때에는 교통비, 사교비 등 여러 비용들을 모두 자신의 급여에서 지출했다. 경제가 어려울 때에는 집의 하인을 그만두게 하고 그 처를 대신 일하게 했다. 임직 기간 동안 그의 양 옷소매가 닳고 돈 한푼 없는 형편이 될 정도로 청렴했다. 여덟 명의 자녀가 모두 열심히 공부하여 公費학교에 들어갔다.⁶⁾

교육 영역은 와세다대학 출신의 중국유학생 인재들이 준비해 놓고 있던 영역이었다.

젠넨이(蹇念益(1876~1930))는 구이저우(貴州) 쯔이(遵義) 사람이다. 8국 연합군이 중국을 침략하여 청 정부의 주권과 국위가 실추되자, 당시 뜻이 있는 청년들은 중국이 강국으로 발돋움할 수 있는 방법을 찾고자 분분히 유학을 떠났다. 이러한 현상이 일종의 사회조류로서 형성되었다. 젠넨이는 일본으로 건너가 와세다대학에서 유학하면서 정치 법률을 공부했다. 그는 출중한 조직 능력으로 중국유학생총회 간사로 선출되었고 량치차오(梁啓超)와 교류하였다. 젠넨이는 량치차오보다 3살이 적었으나, 정치적 입장이 서로 비슷했기 때문에 막역한 사이가 되었다. 공부를 마치고 귀국한 그는 정부에서 직무를 맡게 된다. 신해혁명 이후 량치차오와 다시 가까워지게 되는데, 당시 량치차오의 계획이 젠넨이로부터 결정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하여 ‘량(치차오)이 계획하고 젠(넨이)이 결정한다’는 말이 있을 정도였다. 위안스카이의 稱帝 활동이 점차 격렬해지자 젠넨이와 차이어(蔡鐸)는 북경과 천진 사이를 왔다 갔다 하면서 량치차오와 함께 은밀히 反袁을 꾀하였다. 호국전쟁이 끝난 후에도 각지의 군벌은 여전히 할거 상태에 있었고, 국사는 아직 정상 궤도에 접어들지 못했다. 젠넨이는 정부 요직을 맡길 원치 않았고 오로지 의원의 신분으로 국사를 함께 의논하고자 하였다.

젠넨이의 교육 영역에서의 공헌은, 1912년에 다른 법학계 저명 인사들과 함께 베이징에 朝陽大學을 창설한 일이었다. 조양대학은 법률, 정치, 경제 등을 중심으로 한 저명한 사립 법과대학으로 당시 성대한 칭송을 얻은 중국의 법학 요람 중의 하나였는데, “남쪽에는 東吳가 있고, 북쪽에는 朝陽이 있다”, “朝陽 없이는 법원이 이루어지질 않는다”는 말이 있을 정도였다. 1949년, 원래 조양대학이 있던 땅에 中國政法大學이 건립되었다. 다음 해 2월, 中國政法大學과 華北大學, 華北人民革命大學이 합병되어 中國人民大學이 설립되었다.⁷⁾

런카이난(任凱南)도 교육 영역에서 큰 공헌을 한 와세다대학 출신 중국유학생이다. 후난성(湖南省) 상인현(湘陰縣)에서 태어난 그는 청년 시절 총명하고 공부를 잘해 관비 유학시험에 붙었고 이에 일본의 와세다대학으로 건너가 수학했다. 일본유학 시절, 황싱과 사귀어 동맹회에 가입하였고 열심히 신해혁명을 도왔다. 신해혁명 후 그는 영국 런던대학에 합격하여 경제학을 공부하고 경제학 박사학위를 취득한 후 중국으로 돌아왔다.

런카이난은 진심으로 교육이 나라를 구할 수 있다고 여겼다. 1921년, 레이명창(雷夢強)과 長沙 大麓中學을 설립하고, 湖南省立圖書館의 관장직을 맡았다. 또한 1922년에 湖南商業專門學校의 개교를 주관했다. 그는 교장을 역임하면서 특히 교육의 혁신과 교사의 자질 문제

6) 浙江省人物志編纂委員會編, 『浙江省人物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年을 참고.

7) 熊先覺·徐葵, 『法学搖籃—朝陽大學』,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年 9月 第1版을 참고.

를 중시했다. 1926년, 湖南商業專門學校와 湖南工業專門學校, 湖南法政專門學校 등이 省立 湖南大學으로 합병되게 되는데, 그는 이곳에서 경제학을 가르쳤고, 1928년에 교장으로 선출되었다. 1927년, 런카이난은 또 國立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 위원, 武漢大學 경제학 교수로 초빙된다. 그 후, 런카이난은 다시 호남대로 돌아와 교무장직을 맡았고, 대륙중학 이사장 등의 직책을 역임했다. 항일전쟁 기간, 그는 후난성 참의원으로 초빙되었으나, 1945년에 “참여하나 의논하지 않고, 의논하나 결정하지 않고, 결정하나 행하지는 않는다”는 것을 깊이 실감하고는 곧 사직하였다. 후에 후난성 교육청 청장에 위임되었으나 “교육을 하는 것은 관리가 되기 위해서가 아니고, 벼슬하려고 안달하는 병이 있는 자는 교육을 할 수 없다”고 말하면서 고사하였다. 그는 수입의 대부분을 책을 구입하는 데 썼고 전적을 천하 공공의 재산으로 여겼다. 별세 후 후세 사람들이 그의 유언을 받들어 그가 소장하고 있던 만여 권의 장서를 호남대학과 대륙중학에 기증했다.

런카이난은 자신의 일생을 교육 사업에 헌납했다고 말할 수 있다. 그의 학식은 깊고 넓었고, 특히 경제학 방면에서의 조예가 깊었는데, 바로 경제학계에서 “남쪽에는 런(카이난)이 있고 북쪽에는 마(인추, 馬寅初)가 있다”고 칭송했던 두 명의 대가 중의 하나이다.⁸⁾

와세다대학의 중국유학생 중에는 문화 영역에서 활약한 뛰어난 인물들이 많다. 쑤만수(蘇曼殊), 두귀샹(杜國庠)은 중국 문화계에서 모든 사람들이 다 알 정도로 유명한 인물들이다. 이하에서는 소위 ‘5대 천왕’이라고 불린 사람들 가운데 황간(黃侃), 왕둥(汪東), 첸쉬안통(錢玄同)과 주시쭈(朱希祖) 이 네 명을 소개하고자 한다. 그들은 모두 와세다 출신으로 귀국 후 北京大學, 輔仁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지금의 南京大學) 등의 유명한 학교에서 교편을 잡았다. 황간은 국학대사로 칭송되었고, 첸쉬안통은 어문 개혁 활동가, 문자 음운학자, 오사 신문화운동의 창도자 중의 하나였으며, 주시쭈는 중국대학 문과에서 역사학과 있었던 이래로 수석 과주임이 되었다.

와세다대학 출신의 중국유학생 중에는 자유직업, 예컨대 기자, 변호사 등에 종사한 이들도 있었다. 린바이수이(林白水)는 저널리스트 중에서 특히 출중한 인물이었다. 그는 푸젠성(福建省) 민허우(閩侯) 출신으로, 중국 신문계의 선구자가 되었다. 그는 젊은 시절 신문업에 종사했고, 후에 일본으로 유학을 가 국외에서 신문학 과정을 공부한 최초 인물로 불렸다. 귀국 후 한동안 정치에 참여하다가 이후에는 오랫동안 신문을 발행했다. 그는 『公言報』·『社會日報』·『平和日報』 등을 창간해 정론에 관한 글을 발표하면서 군벌 정객들의 내막과 추문을 폭로했다. 린바이수이가 중국 신문업의 발전에 미친 중대한 공헌 중의 하나는 백화 신문을 낸 것으로, 이는 신문에 문언문 대신 백화문을 사용하게 하는 변화를 일으켰다. 그는 1923년 1월 25일 『社會日報』에 군벌 장쑹창(張宗昌)의 심복 판푸(潘復)에 대한 글을 게재하여 “이 판푸라는 놈을 말할 것 같으면 그의 관리로서의 성적은 실로 놀랄 만하다. 그는 1년 몇 개월 동안의 재정차장 겸 염서 서장을 맡으면서, 베이징에서 두 채의 집을 샀고 장식 일체를 포함하여 대략 10만원을 써버렸다. 또 텐진 영국조계에서 큰 양옥 한 채를 지었는데, 부지만 해도 10무 정도이고 전체 공사 지가로 전부 15만원을 사용했다.”고 폭로했다.

8) 汨政文整理, 「任凱南先生傳略」, 政协汨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汨罗文史资料 第1輯』, 政协汨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年.

이처럼 린바이수이는 사설을 통해 누차 군벌 장종창을 비판하였고, 결국 그 때문에 1926년 장종창에게 체포되어 살해당하게 된다.⁹⁾

탕바오어(唐寶鏢)는 변호사 계통에서 두각을 나타낸 인물이라 할 수 있다. 상하이에서 출생한 탕바오어는 바로 중국근대 명인 탕사오이(唐紹儀)의 조카이다. 탕바오어는 관비로 일본에 파견된 최초의 유학생들 13인 중의 한 명으로, 亦樂書院에 입학했다. 그가 졸업 후 청정부로부터 駐日本長崎領事館 대리 부영사에 임명되었던 때가 21세였다. 2년 후, 그는 駐東京公使館의 관리로 임명되었다.

탕바오어는 주일공사관에서 번역 업무를 담당하면서 도쿄 와세다전문학교의 행정과에 들어가 국제법을 공부했고, 졸업 후 와세다대학 정치경제부로 진학했다. 이것은 중국인으로서는 일본에서 학사학위를 취득한 최초의 유학생들 중 하나가 된 것이었다. 탕바오어는 와세다대학 졸업 후 귀국길에 올랐으나 벼슬길에서는 큰 진전이 없었다. 1924년 정계에서 물러난 후 텐진(天津)에 정착하여 변호사로 활동했다.

탕바오어는 텐진의 유명한 변호사였을 뿐 아니라, 국제법학과의 개조자였고, 중국 변호사협회의 창립 멤버였으며, 오랜 기간 중국변호사공회의 회장직을 역임했다. 이러한 직함들은 중국 법률계에서의 그의 공헌을 족히 증명해준다.¹⁰⁾

그 밖에, 와세다대학을 졸업한 중국 유학생들은 실업에도 종사했다. 『校友會員名簿』에 기록된 바에 따르면, 明治 41년에 졸업한 청량제(程良楷)는 상하이중국은행 총회계감사직을 맡았고, 明治 42년에 졸업한 왕전성(汪振聲)은 지난(濟南)중국은행에 취직했으며, 大正 6년에 졸업한 양지시(楊繼熙)는 중국전기주식유한공사에 취직했다. 안타까운 것은 지금까지 아직 그들과 관련된 다른 자료들이 발견되지 않았다는 것이다.

V. 와세다대학 중국유학생들이 낙후지역의 발전에 미친 영향

중국의 국토 면적은 광활하여 지역 간의 발전 수준에는 큰 차이가 있다. 와세다대학의 중국유학생들은 귀국 후에 상대적으로 경제 문화가 발달된 지역에 집중적으로 거주했던 반면, 낙후 지역에서 취업한 이들은 적었다. 하지만 그렇다 하더라도 적은 수의 이들 유학생들이 낙후 지역의 발전에 미친 영향력은 컸다. 이하의 구체적 사례를 통해 살펴보기로 한다.

저장은 근대 경제의 발달지역이며, 또한 『校友會員名簿』에 기재된 중국유학생 졸업자 수가 가장 많은 지역이기도 하다. 의심할 바 없이 와세다대학의 중국 유학생들은 저장의 근대화 발전과정에 중요한 역할을 담당했다. 예를 들어, 과거가 폐지된 후 저장에는 신식 교육에 적합한 교사들이 매우 부족했고, 때문에 저장 순무는 1906년에 浙江兩級師範學堂을 설립하게 된다. 이곳은 저장에 존재했던 신식 학당 중 규모가 가장 컸고, 전문적으로 중소 학교의 교사들을 육성했다.

9) 王仲莘, 「白话报的鼻祖 通俗化的大师—谨以此文纪念林白水先生英勇就义八十周年」, 『炎黄纵横』, 2006年 第8期.

10) 唐培堃, 「中国最早的留日学士唐宝鏢」, 政协珠海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珠海文史 第七辑』, 政协珠海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年.

이 학당은 처음부터 일본유학 경험자를 초빙하는 것을 중시했는데, 교사 중에 와세다대학 출신의 중국유학생들이 일정 비율을 차지했다. 양나이강(楊乃康)은 1908년에 와세다대학 청국유학생부 사범과를 졸업한 후 박물과 교수로 초빙되었고 한동안 교무장을 대리했다. 주시쭈(朱希祖)는 1908년에 와세다대학 청국유학생부 역사지리과를 졸업한 후, 1909년에 이 학당의 역사 교사가 되었다. 예정두(葉正度)는 와세다대학 졸업 후 이 학당에서 외국역사와 외국지리를 가르쳤다. 이종저우(易宗周)는 1906년 와세다대학 전문부 정치경제과에서 공부했고, 이 학당에 와 법률제도와 재무관리를 가르쳤다. 장종쉬(張宗緒)는 1908년 와세다대학 사범과를 졸업하고, 박물과 식물을 가르쳤다. 그들이 가르친 과목들은 거의가 일본에서 배운 것으로, 수업 내용과 교육 방침이 참신했으며 학교의 수준을 향상시킬 수 있었다. 이러한 양급사범학당의 수준 향상은 저장 지역에서 신식교육을 담당했던 중소학교 교사들의 수준 향상을 의미했는데, 이는 의심할 바 없이 저장의 장구한 발전에 큰 영향을 미쳤다.¹¹⁾

당시 구이저우(貴州)는 비교적 낙후한 지역이었기 때문에, 저장과 같이 많은 수의 유학 인재들이 모일 수가 없었다. 청조 때에는 구이저우에서 세 명의 장원과 한 명의 탐화랑을 내 사람들이 이를 ‘三鼎甲一探花’라고 불렀다. 쑤이(遵義) 출신의 민주주의혁명가 양시모(楊錫謨)는 젊은 시절 일찍이 『公車上書』에 이름을 올리고는 합격에 영향을 줄까 두려워 이름을 양자오린(楊兆麟)으로 바꿨다. 1903년에 一甲 第三名(探花)에 붙었고, 후에 일본으로 유학을 가 와세다대학의 법학박사학위를 받았다. 일본에서 동맹회에 가입하여 민주혁명에 참여했던 그는 신해혁명 후 정국이 동요하자 1914년 쑤이로 돌아와 정착하게 된다. 지방정부와 아버지의 동향사람의 요청에 응하여 고향을 위해 일 했고, 지방지 『續貴州府志』의 편찬을 주관하기도 했다. 위안스카이 등 북양군벌에 심히 반대한 그는 北京編修國史로 오라는 그들의 요청을 완곡하게 거절했다. 위안스카이가 황제를 칭하자, 이에 차이어가 먼저 기의를 일으켰고, 뒤이어 그도 적극적으로 구이저우의 민주파 동인들과 연락을 취하고 전문을 작성해 전국에 통전하여 위안스카이의 복벽을 규탄했다. 그 후 전대의 지방의 현인들을 위해 사당을 세우고, 문집 등을 편집하는 일에 참여했다. 1919년 5·4운동이 폭발하였으나 쑤이가 편벽한 지역이었던 탓에 소식이 늦게 도달해 6월 하순이 되어서야 각계에서 호응하여 혁명에 동참하게 된다. 이때 양자오린은 친히 현장으로 가 연설했다고 한다.¹²⁾ 이러한 양자오린의 활동이 구이저우 민주혁명의 발전을 강력히 추진시켰음은 물론이다.

1905년을 전후해 구이저우는 두 무리로 나누어 20명의 학생을 일본으로 유학 보냈는데, 그중 왕페이편(王佩芬)이 와세다대학에 입학했다. 그들은 귀국 후 적극적으로 新學을 추진하였고 貴州大學堂에서 교편을 잡는 등 교육 방면에서 중요한 역할을 담당하게 된다. 1928년, 貴州大學堂의 기초 위에 貴州大學이 설립되는데, 왕페이편은 그곳에서 중문을 가르쳤다. 1930년에는 貴陽縣立中學을 세웠다. 민국 초, 구이양(貴陽)의 교육 발전은 완만했는데, 1920년대에 다만 보통중학 한 곳만이 존재했다. 왕페이편은 교장직을 맡고 있는 학교 운영에 최선을 다했고 사회의 호평을 받았다. 어떤 논자는 구이저우성에서 군사, 정치, 교육문화와 과학기술에 종사하는 많은 이들이 모두 그의 문하에서 나왔으니 왕페이편의 제자들이 천하

11) 吕顺长, 「清末における浙江省留日学生の帰国後の活躍」, 大里浩秋·孙安石,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研究の現段階』, 御茶水の書房, 2002年.

12) 韦敦, 「清探花贵州遵义杨兆麟生平」, 贵州文史研究馆, 『贵州文史丛刊』, 2001年 第1期.

를 가득 채웠다고 말할 만하다고 평가하기도 한다.¹³⁾

또 다른 낙후 지역인 푸젠(福建) 룡옌(龍巖)에도 마찬가지로 와세다대학을 졸업한 중국 유학생이 이곳의 교육 사업을 위해 힘썼다. 1891년 룡옌에서 태어난 린후이자(林會嘉)는 1918년 일본으로 유학을 갔다가 1921년에 와세다대학 정치경제과를 졸업했다. 그는 귀국 후에 “벼슬은 맡지 않고, 상인은 나아가지 않으며, 오로지 교육에만 힘쓴다.”는 정신으로, 1903년에 설립한 成立 第9中學에서 교편을 잡고 후에 학감과 사무주임을 맡았으며, 曹溪萃英小學의 교장을 겸임했다. 1929년, 그는 인도네시아로 건너가서도 여전히 교육을 업으로 생각하고 고향의 교육 사업을 마음에 두고 있었다. 1947년에 중국으로 돌아와 계속해서 중학교에서 교편을 잡았고, 수차례 교육 사업에 돈을 기부하고 교사를 짓도록 하였다.¹⁴⁾ 이처럼 린후이자 등 교육 사업에 헌신한 몇 대의 사람들의 노력으로 제9중학(현재의 龍巖一中)의 인재들이 배출되어 “붉은 토지 위의 교육 명주”라고 칭송될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VI. 몇 가지 생각할 거리

이상에서 와세다대학의 중국 유학생들의 몇 가지 사례를 통해, 와세다대학에서 근대 교육을 받은 중국유학생들이 귀국 후 자신이 받아들인 새로운 지식과 사상을 중국사회에서 실천하였고, 유학이 지식교류와 전파에 있어서 중요한 형식이 되었으며, 대학이 국제적 지식교류의 중요한 경로의 하나였음을 살펴볼 수 있었다. 그러나 모든 대학이 국제지식교류 작용을 할 수 있었던 것은 아니며, 작용을 했다 할지라도 그 영향력에는 차이가 있었다. 와세다대학의 사례를 통해 보면, 이것의 성패 여부는 최소한 두 가지 조건 즉, 높은 수준의 교육, 국제화된 학문에 의해 결정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기존 연구에서는 유학이라는 이러한 특수한 지식교류와 전이 작용을 연구함에 있어 주로 소수의 엘리트 계층에 주목했던 반면 사회 기층의 상황은 간과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예를 들어, 저명한 학자인 안도 히코타로(安藤彦太郎)가 와세다대학과 중국과의 관계에 대해 연구한 저작을 살펴보면 그가 중점적으로 연구한 중국 유학생은 리다차오, 평바이, 랴오칭즈 뿐이다.¹⁵⁾ 실제로 유학생들은 기층이나 지방에서 명예나 영달을 구하지 않고 그저 묵묵히 일했으니, 이는 우리의 감탄을 자아낸다. 또한 그들은 중국의 사회 상황을 잘 인식하고 있었고 고등교육을 받았기 때문에 자신이 살고 있던 현지에서 큰 영향을 미칠 수 있었다. 그리고 그것이 중국 사회를 지탱하는 기초를 형성했던 것이다. 그들에 대한 연구는 진정한 중국사회의 변화 상황들을 파악할 수 있게 하는 이유가 여기에 있다. 물론 거의 단서가 없는 상황에서 자료를 수집해야 하는 등 그들을 연구하는 데에는 상당한 어려움이 따른다.

그 밖에, 이들이 중국 사회에 미친 영향을 평가할 때 여전히 돌파해야 할 방법상의 문제

13) 杨适, 「民国时期贵阳普通中学教育简介」, 熊先煜, 「忆贵阳县中校长王梦淹先生」, 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26辑』, 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9年.

14) 林荣照, 「毕生为教育事业服务的林会嘉先生」, 政协龙岩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龙岩文史资料 第13辑』, 政协龙岩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6年, 89~90쪽.

15) 安藤彦太郎, 「早稻田で学んだ中国留学生」, 『未来にかけの橋—早稻田大学と中国』, 成文堂, 2002年.

가 존재한다. 지금까지 유학생들의 영향력을 논증할 때 일반적으로 취했던 방법은 유학의 경력과 귀국 후의 활동을 소개하는 것이었다. 이러한 방법은 맹점을 가지고 있는데, 즉 유학 경력과 귀국 후의 활동 사이에 필연적 연계가 있는지 없는지, 그리고 만약 있다면 그것이 어디에서 드러나는가의 문제이다. 예를 들어, 본문에서 언급한 ‘5대 천왕’ 중의 네 명의 인물들은 모두 와세다 출신이긴 했지만 또한 모두가 국학대사 장타이엔(章太炎)의 제자들이었다. 그들이 이론 성취는 얼마간 와세다대학에서 영향을 받았고, 또 얼마간은 장타이엔에게 영향 받은 바가 있는 것이다. 이는 구체적으로 분석할 필요가 있는 문제이다. 그 외에 마찬가지로 일본 유학은 본문에서 중국의 근대화에 중요한 영향을 주었다고 소개했던 사람들뿐 아니라 인루경(殷汝耕), 진방핑(金邦平)과 같은 일부 매국노들도 포함한다. 기존의 연구 방법은 너무 간단했다. 앞으로, 유학생들이 받은 교육내용, 사상 발전의 변화과정, 귀국 후 활동에서의 지도사상 등 다방면에 대한 심층적인 연구가 더 필요하다. 또한 이러한 연구들에 기반해 유학생들이 근대 중국사회에 미친 영향에 대한 보다 정합적인 평가가 가능해질 것이다.

【Abstract】**Chinese Students in Waseda University in Modern times
— Focus on the period from 1898 to 1931 —**

YANG Ningyi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leg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Yang Ningyi

Ever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China has raised an upsurge of studying in Japan, which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he academic circles undertook extensive researches on this movement. Taken “Alumni Book of Waseda University” as the basic clue, this paper conducts the case study on Chinese students in Waseda University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898 to 1931.

Waseda University has a special position in modern movement of studying in Japan. Compared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that also admitted Chinese students, i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irst, it not only set up preparatory and supplementary programs, but also mainly conducted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education.

Second, it established relatively complete subjects, including politics and law, literature and commerce, as well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cialty and normal courses.

Third, it admitted overseas students for a longer time. Founded in 1882, Waseda University stayed open for Chinese Students from 1898, and never ceased in modern time.

Fourt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presented by Shigenobu Okuma, the founder of Waseda University, in spite of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ubjective intention, is valuab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In a sense, this concept has the spirits that support the knowledge pillar of Waseda University", and "for this characteristic private University, it also contains the origin that could be its fundamental principle." As a result, the Universit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Asian tradition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ones. The Qing Department,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set up in 1905 for Chinese students, is just an example. This Department established undergraduate, preparatory, and supplementary programs. With two academic years, undergraduate program has Normal, Politics, Finance, and Commerce branches. Normal Branch was composed of physical chemistry, natural science,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Fifth, the tenet of its establishment is "to make knowledge independent", and turn the university into a place full of fre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With this purpose, Waseda University gathered a group of scholars seeking the truth, concerning the reality, and even with a rebelling character, such as Kazumi Ukita, Abe Iso, Sano manabu, Kunitake Kume, Tsuda Soukichi, Ikuo Ooyama and so on. Their teaching not only enriched the mind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ut also had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ir personality.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entering Waseda University was the largest during the movements of studying in Japan.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1902 to 1931, 1272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Waseda University, and this number ranked the third among all types of schools. In addition, the

students returned back from Waseda University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all fields.

There is no reliable figure on how many students studying in Waseda University. However, it can be estimat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Based on the ratio of 6:1 between all the students and graduates, from 1898 to 1931, Waseda University had admitted a total of 8,000 students, which is not a small figure.

After graduation,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employed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the Northern Warlords Government, the living areas of returned Waseda University graduates had two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 areas covered most parts of the country, in addition to Mongolia, Qinghai, Xinjiang, and Tibet. Second, the students distributed unevenly and the majority clustered in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developed areas.

The occupation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engaged in politics, followed by education, but a certain number of them also were involved in industrial and financial sectors. "Alumni Book of Waseda University" records that the professional graduates should be the social elite and most of the students may live as the grassroots class.

A lot of students returned home from Waseda University become politicians. Thi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pecialized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but also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t that time. As we all know, Chen Duxiu, Li Dazhao, Peng Pai, and Liao Chengzhi joining the communist movement graduated from Waseda University. The others, such as Yang Du, Zhang Ji, and Feng Ziyu were very famous in China's political arena. These student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involved in a lot of departments; they were members of Congress, as well as finance, justice, transport,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ials, serving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Some of them even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ese students also emerg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uch as Jian Yi Nian, Ren Kennan, who had deeply influenced o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y.

These students also succeeded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where Su Manshu and Du Guoyang were well known. Four out of the "Five Stars", namely, Huang Kan, Wang Dong, Qian Xuantong and Zhu Xizu, also graduated from Waseda University.

There are still some students engaged in the liberal professions, such as reporters and lawyers. Lin Baishui was one of the best reporters, known 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vernacular newspaper, the master of the popularization". Tang Bao'e may be regarded as the leader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He is not only a well-known barrister in Tianjin, the founder of China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itiator of Chinese Bar Association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Law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These titles prove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lawyer field in China.

It is also worthy to mention that some of the students were also engaged in the industry.

China has a vast terri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va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turned student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developed areas. However, the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who come to the backward areas also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areas.

For example, Guizhou is a backward area. Wang Peifen, returned from Waseda University,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new school there. On the one hand, as the backbone, she taught in Guizhou School, the predecessor of the Guizhou University; on the other hand, she founded Guiyang County Middle School. Some people said that a number of personnels in Guizhou Province engaged in military,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her students.

From the case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Waseda Universi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hinese students received modern education in Waseda University after their return would apply the new knowledge, new ideas into the society, that is, studying abroad is an important form to exchange and disseminate knowledge, and the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nnels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knowledge. However, not all universities can play such role, or the roles differ. The Waseda University case can prove that the role depends on at least two conditions: one is the high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he other i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unning the university.

When researching on the particular role of studying abroad, i.e. the exchange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past we usually paid attention to a few elites, but neglected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In fact, at the grassroots or local level, students disregarded the fame and worked quietly. Because they have seen various aspects of society and accepted higher education, they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ocal, and form the basis of the society.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on them can reflect the real situation of social change. Of course, the research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we must collect information almost with no clues.

In addition, there is also a problem in study approach to be solved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students. So far, the approach mostly adopted is to introduce their experience of studying abroad and the activities after the return. This approach has a loophole, i.e. whether there is a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 if so, where did it reflect? Previous approaches are simplistic. In the future, in-depth studies on the educ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ir thinking, and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ir activities in China are required to make a proper 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students.

1930년대 이후 渡日留學生과 민족운동

■ 朴 贊 勝 (漢陽大學校) ■

1930년대 이후 渡日留學生과 민족운동

朴 贊 勝 (漢陽大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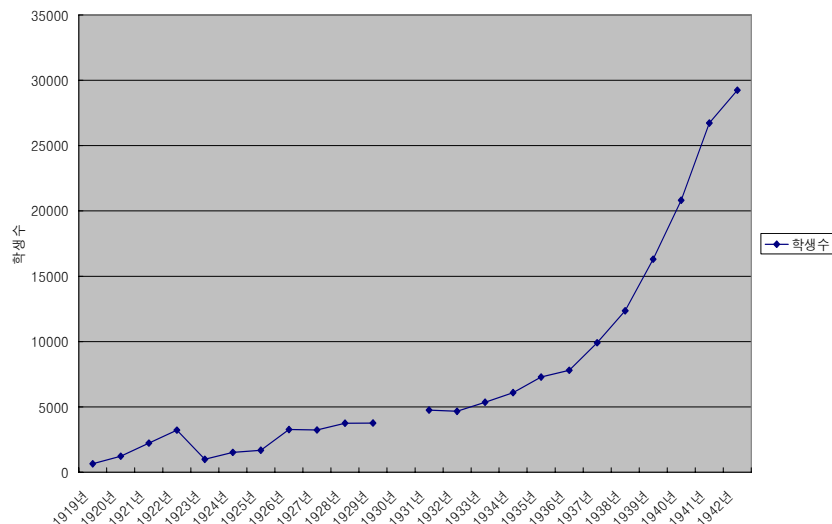
〈목 차〉

- I. 머리말
- II. 1930년대 전반 渡日留學生과 민족운동
- III. 1930년대 후반-1940년대 전반의 渡日留學生과 민족운동
- IV. 맺음말

I. 머리말

식민지시기 일본에 건너가 유학한 조선인 학생의 수를 그래프로 보면 〈그림 1〉과 같다. 그림에서 보듯이 1910년대에는 1천 명 미만이던 유학생 수는 1920년을 고비로 1천 명을 넘어섰고, 1923년 관동대지진 때 잠시 줄었다가 다시 늘어 1926년에는 3천 명을 넘었으며, 1930년대 이후 급증하기 시작하여 1933년에는 5천 명을 넘어섰다. 그리고 1938년에는 1만 명을 넘어섰으며, 1940년에는 2만 명을 넘었다. 그리고 1942년 유학생 수는 거의 3만 명에 육박하였다. 이처럼 조선인 渡日留學生 수는 식민지시기 말기로 갈수록 가파르게 늘어나고 있었다. 이렇게 식민지 말기로 갈수록 유학생 수가 급증한 원인은 어디에 있었을까. 이 글에서는 우선 이 점에 대해 밝혀보기로 한다.

식민지시기 渡日留學生들은 민족주의와 사회주의로 무장하고 민족주의 운동이나 사회주의 운동에 뛰어든 경우가 많았다. 유학생들의 민족운동, 사회운동 참여가 가장 활발했던 것은 1920년대였다. 1930년대 이후 유학생들의 동향은 어떠하였을까. 이 글에서는 이 점에 대해서도 밝혀보기로 한다.



〈그림 1〉 식민지시기 渡日 조선인 유학생 수의 변화

II. 1930년대 전반 渡日留學生과 민족운동

1930년대 전반 조선인 유학생의 수는 아래 <표 1>과 같다. 전체적으로는 증가추세였지만 1932년에 일시 줄어드는 형세를 보였는데, 이는 당시 조선의 쌀값이 크게 떨어지고 금융이 경색되는 등 공황의 여파로 인해 경제사정이 극도로 악화되고 있었던 것과 관련이 있었다.¹⁾

<표 1> 1930년대 전반 渡日留學生의 수

(단위:명)

연도	1931년	1932년	1933년	1934년	1935년
학생수	4,762	4,664	5,369	6,093	7,292

자료 : 내무성, 『사회운동의 상황』 각년판 (『독립운동사자료집』 13, 1127쪽)

1934년 조선총독부 경무국의 조사에 의하면 동경에 건너가 유학하고 있는 학생은 모두 4,533명이었으며, 구미 각국에 건너간 유학생 수는 291명이었다고 한다. 이를 통해 보면 당시 일본 유학의 비중이 압도적으로 컸음을 알 수 있다.

그러면 이들 학생들은 어떤 학교에 재학 중이었을까. <표 2>에서 보면 1926년 대학에 재학 중인 자는 전체의 5.4%, 전문학교와 대학예과 전문부에 재학 중인 자는 38.0%로, 대학과 전문학교 등 고등교육기관에 재학 중인 자가 43.4%에 달하는 높은 수치를 기록하고 있음이 주목된다. 그리고 이 숫자와 비중은 갈수록 늘어갔다. 1930년에는 51.4%, 1934년에는 50.1% 등으로 과반수를 차지하기에 이르렀던 것이다. 반면에 각종 학교에 재학 중인 학생들은 1926년 38.2%, 1930년 11.0%, 1934년 16.3%로 크게 줄었다. 그것은 1922년의 조선교육령의 개정으로 조선의 학제가 일본의 학제와 같아지게 됨으로써 예비학교의 성격을 띤 각종 학교에 다닐 이유가 그만큼 줄어들었기 때문이다. 또 하나 여기서 주목되는 것은 중학교(고등여학교 포함)에 재학 중인 학생들의 수가 10.8%에서 17.5%, 19.8%로 계속 늘어가고 있었다는 점이다. 이는 조선 내에서 보통학교 졸업생 수는 어느 정도 늘었지만 중등교육기관인 고등보통학교의 숫자는 여전히 작아 중등학교에 진학하고자 하는 학생들의 욕구를 충족시켜 주지 못하고 있었던 것과 관련이 있었다.

<표 2> 渡日留學生의 학교 종류별 재학생 수

학교 종류별	1926년		1930년		1934년	
	학생수(명)	%	학생수(명)	%	학생수(명)	%
대 학	214	5.4	423	11.2	539	11.5
전문학교(대학예과 전문부포함)	1,499	38.0	1,536	40.2	1,743	38.6
사범학교	91	2.3	8	0.2	5	0.1
중학교(고등여학교 포함)	424	10.8	662	17.5	897	19.8
실업학교	207	5.3	744	19.6	644	14.3
각종 학교	1,510	38.2	1,418	11.0	735	16.3
계	3,945	100.0	3,793	100.0	4,519	100.0

자료 : 조선교육회 장학부, 『재일본조선학생상황조』 각년판

1) 이여성·김세용, 『數字朝鮮研究』 제4집, 1933, 세광사, 124쪽

〈표 3〉 1930년 渡日留學生의 전공 상황

전공분야	인 수	%
법 학	667	30.7
경제학	290	13.3
상 학	215	9.9
문 학	433	19.9
이공학	138	6.3
농림·수산학	148	6.8
의·약학	103	4.7
사 범	95	4.4
예 술	56	2.6
가 정	30	1.4
계	2,175	100.0

자료 : 조선교육회 장학부, 『재일본조선학생상황조』

〈표 3〉에서 보듯이 법학과 경제학, 문학 등이 여전히 수위를 차지하고 있다. 그러나 이는 1910년대의 상황과 비교해보면 법학과 경제학 전공자의 비중은 상대적으로 많이 줄어든 것이었다. 반면에 이공학, 농림수산학, 의약학, 사범계 등의 전공 비중은 다소간 늘어난 모습을 보여주고 있다. 그만큼 관료지향적인 성향이 약화되고, 실용적인 학문에 대한 관심이 높아졌다는 표시일 것이다.

1930년대 전반의 일본유학계는 1920년대와는 사뭇 다른 분위기를 안고 있었다. 그것은 1929~30년 조선에서 발생한 전국적인 항일학생운동의 결과 제명된 학생들이 대거 일본유학을 왔기 때문이다. 특히 교토의 사립 兩洋中學校에서는 이 학생들을 수용하기 위하여 조선 각지에서 학생들 모집하였기 때문에 이 학교에 종래 조선인 학생은 10명에 불과하였으나, 일약 백수십 명으로 늘어났다. 1930년 이 학교의 조선인 학생 161명 가운데 광주학생운동 관련자는 81명에 달하였다.²⁾

1930년대 초 일본유학생 사회의 분위기는 1920년대 후반과는 크게 달라졌다. 이를 상징적으로 보여주는 것은 1930년 12월 사회주의계열 학생들의 주도에 의한 재동경조선유학생 학우회의 해체 결의였다. 이는 물론 당시 신간회해소론 등을 제기했던 사회주의운동계열의 좌편향적인 전술 채택과 관련이 있는 것이었다. 1931년 2월 1일자 학우회의 해체 성명서는 다음과 같이 주장하고 있었다.

학우회는 과거 역사적 과정 또는 현단계의 사회적 조건에도 불필요하며 구성분자의 비계급성을 여지없이 폭로하였음은 물론, 프롤레타리아의 공동적인 자본주의에 대해서도 하등 반항하지 않았다. 이와 같이 투쟁의 목표와 입장이 명확하지 않고 구성분자까지도 비계급

2) 독립운동사편찬위원회, 『독립운동사자료집』 13, 1132쪽

적인 집단은 반동이 아니면 개량적으로 화한다. 우리는 이같은 비계급적인 집단은 단연 용인할 수 없다. 우리는 현단계에 있어서 어떠한 운동이라도 계급적 입장을 망각한 운동은 참된 운동이 아니라고 단언한다.³⁾

재대판조선유학생학우회, 재경도조선유학생학우회도 1931년경 해소파와 비해소파로 나뉘어 갈등을 겪었다. 당시 해소반대파, 곧 민족주의계열의 학생들은 “민족적 차별대우를 이탈하는 데에는 민족 공동의 힘에 의하지 않으면 안 된다. 극좌분자가 주장하는 것과 같은 계급적 대립을 근본 사상으로 하는 혁명적 운동에는 찬성할 수 없다”고 맞섰다.⁴⁾ 결국 지역단위의 유학생학우회는 대부분 해체되고, 이후에는 각 대학별 동창회가 이를 대신하게 되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1932년 말 각 대학별 유학생 단체의 수는 34개가 파악되고 있고, 그밖에도 출신지역별 향우회가 상당수 있었던 것으로 파악된다.⁵⁾

한편 고학생들을 중심으로 공산주의계열의 운동에 참여한 학생들은 이 시기 주로 「전협」(全協) 계열의 노동운동단체에 참여하여 활동하기도 하였고, 당시 조선공산당 일본총국 및 고려공산청년회 일본부가 해체되고 일본에서의 조선인 공산주의운동이 일본공산당의 지휘아래 들어가게 되었기 때문에 일본공산청년회의 세포조직에 들어가 활동하기도 하였다. 1931년에 있었던 법정대학공청세포사건은 그 한 예였다. 치안유지법위반으로 구속된 학생은 1933년 96명, 1934년 134명에 달하고 있었다. 이 두 해 동안 일본당국의 사회주의운동에 대한 집중적인 탄압은 유학생들의 사회주의운동에도 커다란 타격을 안겨주어 이후 운동은 새로운 방향을 모색하지 않으면 안 되었다. 1935년 치안유지법위반으로 구속된 학생은 29명으로 줄어들고 있었다.

III. 1930년대 후반-1940년대 전반의 渡日留學生과 민족운동

1930년대 후반 이후 해방이 될 때까지도 일본유학의 길을 떠난 학생들은 줄어들지 않고 계속 늘어만 갔다. 아래 <표 4>는 이를 잘 보여준다.

<표 4> 1930년대 후반 이후 渡日留學生의 수

(단위 : 명)

연도	1936년	1937년	1938년	1939년	1940년	1941년	1942년
학생수	7,810	9,914	12,356	16,304	20,824	26,727	29,247

자료 : 내무성, 『사회운동의 상황』 각년판(『독립운동사자료집』13, 1127쪽 전제)

이 시기는 주지하듯이 중일전쟁, 태평양전쟁으로 일본의 대륙침략, 동남아시아침략이 본

3) 같은 책, 1139-1141쪽

4) 같은 책, 1142쪽

5) 예를 들어 해주학우회, 영흥학우회, 광주유학생학우회, 서천학우회, 제주학우회, 밀양학우회 등. 같은 책, 1146쪽

격적으로 전개되던 ‘戰時’였다. 이 시기에도 조선유학생들은 꾸준히 늘어 1936년에 7천8백여 명에 불과하던 유학생 수는 1942년에 이르러 2만9천여 명에 달하였다. 불과 5년 사이에 4배 가까이 불어난 것이다. 이를 다시 각급 학교별로 구분하여 보면 다음과 같다.

〈표 5〉 각급 학교별 유학생의 추이 (1936-1942)

연도	관공립대학	사립대학	고등전문학교	중등학교	합계
1936년	121(1.5)	1,880(24.0)	1,066(13.6)	4,743(60.7)	7,810(100)
1937년	128(1.3)	1,610(16.2)	1,983(18.5)	6,193(62.5)	9,914(100)
1938년	152(1.2)	2,296(18.6)	2,183(17.7)	7,725(62.5)	12,356(100)
1939년	214(1.3)	1,382(8.5)	3,934(24.1)	10,774(66.0)	16,304(100)
1940년	261(1.3)	2,044(9.8)	3,624(17.4)	14,895(71.5)	20,824(100)
1941년	242(0.9)	2,931(11.0)	4,400(16.5)	19,154(71.7)	26,727(100)
1942년	299(1.0)	2,498(8.5)	4,595(15.7)	22,044(75.4)	29,247(100)

자료 : 『독립운동사자료집』13, 1127쪽
괄호안은 백분비

〈표 5〉에서 보면, 대학, 특히 사립대학에 재학중인 학생수의 비율은 갈수록 줄어들고 있었다. 반면에 중등학교에 재학중인 학생수의 비율은 1936년 60.7%에서 1942년에는 75.4%로 급증하였다. 중등학교 입학에 위해 일본에 유학한 학생들의 비중은 그만큼 늘어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당시 신문들은 “그래도 전문대학을 찾아서 멀리 간다는 것은 그다지 무리한 일이라고 할 수 없으나 중등학교에 입학하기 위하여 멀리 수학의 길을 떠난다는 것은 일종의 기현상” 이 라면서, “더구나 그들이 재학하는 학교는 동경, 경도, 구주 등지에서도 그다지 우수한 학교 가 못되고 설비와 기타가 오히려 조선 내 학교만도 못한 것이 대부분” 이라고 지적하였다. 그리고 이같이 중등학생들의 유학이 급증하자 구주 등지의 각종 학교에서는 일부러 조선에 와서 학생들을 모집하는 일도 나타났고, 수업료와 월사금 등을 비싸게 받아 교육보다는 학교 유지에 힘쓰는 학교도 있다고 지적하였다.⁶⁾

그러면 중등학생들의 유학이 왜 이같이 급증하였던 것일까. 당시 언론들은 “이들 중에는 일부러 좀 더 좋은 곳과 좋은 학교를 찾아간 사람도 있으나 그 대부분은 조선내 각 중등학교에서 입학을 하지 못하고 그대로 있을 수 없어서 막대한 학자금과 여러 가지 불편을 참아가면서 멀리 학교를 찾아갔으며, 혹은 중학 졸업의 자격증을 얻기 위하여 비교적 입학이 쉬운 중등학교를 찾아간 것” 이라고 분석하였다.⁷⁾ 따라서 이와 같은 중등학생들의 渡日 유학 붐이라는 기현상을 막기 위해서는 조선 내 중등교육 시설을 확충하는 것이 급선무라는 지적들이 나왔다.

〈표 6〉에서 보듯이 1920년대 이후 보통학교의 숫자가 늘어나면서 보통학교 졸업자수도 그 상승폭이 완만하나마 꾸준히 늘어났다. 하지만 고등보통학교의 숫자는 거의 늘어나지

6) 『동아일보』 1939년 3월 8일 「교육조선에 중대과제, 현해건너 중학 재학자 물경 4천6백여명」

7) 위와 같음.

않았다. 1920년 보통학교가 641개교이던 것이 1935년 2,274개교로 늘어난 데 반해 고등보통학교는 1920년 23개교에서 1935년 45개교로 늘어나는데 그쳤던 것이다. 이에 따라 보통학교 졸업생들의 고등보통학교 진학률도 크게 낮아졌다. 1920년 28.6%, 1923년 18.6%, 1926년 10.0%, 1930년 8.1%, 1935년 5.8%로 진학률은 갈수록 낮아졌다. 보통학교 졸업생들이 중등학교 진학을 위해 일본으로 대거 유학을 떠난 것은 바로 이 때문이었다.

〈표 6〉 보통학교 졸업생과 고등보통학교 입학생의 비율

연도	공립보통학교		사립보통학교		공립고등보통학교		사립고등보통학교		사립여자고등보통학교		공립여자고등보통학교		A+B/C+D+E+F (%)
	학교수	졸업생 수(A)	학교 수	졸업생 수(B)	학교 수	입학생 수(C)	학교 수	입학생 수(D)	학교 수	입학생 수(E)	학교 수	입학생 수(F)	
1914	382	7,038	20	223	2	352	2	171	2	98	2	89	9.8
1915	410	8,218	17	170	2	367	2	182	2	71	2	121	8.8
1916	426	9,249	19	167	3	462	4	500	2	73	2	121	12.3
1917	435	10,003	24	222	3	458	6	1,522	2	52	2	133	21.2
1918	469	11,463	36	340	4	708	6	1,034	4	297	2	116	21.0
1919	535	11,897	33	365	5	619	7	609	4	97	2	89	11.5
1920	641	8,792	38	481	7	659	9	1,421	5	399	2	171	28.6
1921	755	9,521	36	395	11	842	10	4,128(?)	5	439	2	202	56.6(?)
1922	900	13,295	44	470	12	1,402	8	2,064	5	353	2	209	29.3
1923	1,040	21,112	56	916	14	1,632	8	1,858	5	390	2	208	18.6
1924	1,152	31,693	63	1,153	15	1,710	8	1,714	5	434	2	210	12.4
1925	1,242	39,894	73	1,832	15	2,068	8	1,645	8	676	2	217	11.0
1926	1,309	48,160	81	2,126	15	1,893	9	1,755	9	915	4	441	10.0
1927	1,395	59,261	81	2,263	15	1,922	9	1,747	9	921	6	573	8.4
1928	1,463	61,500	81	2,953	15	1,973	9	1,901	9	945	6	527	8.3
1929	1,620	60,947	78	3,008	15	1,942	9	1,664	9	935	6	530	7.9
1930	1,750	61,220	79	2,970	15	1,949	9	1,730	10	1,041	6	505	8.1
1931	1,860	63,248	80	2,912	15	1,922	11	2,060	10	1,070	6	521	8.4
1932	1,980	66,954	82	3,202	15	1,871	11	2,183	10	1,010	7	608	8.1
1933	2,020	73,713	83	3,670	15	1,838	11	1,939	10	1,151	7	607	7.2
1934	2,133	82,462	86	4,183	15	1,888	11	1,804	10	1,254	7	609	6.4
1935	2,274	93,595	87	4,632	15	2,063	11	1,679	10	1,279	9	724	5.8
1936	2,417	105,778	85	5,182	15	2,141	11	1,450	10	1,206	10	855	5.1
1937	2,503	116,823	92	6,331	16	2,199	11	1,748	10	1,298	11	975	5.1
1938	2,599	127,733	100	7,019	20	2,803	13	2,030	10	1,258	11	1,194	5.4
1939	2,727	139,182	117	10,058	40	3,030	13	2,049	10	1,249	47	1,742	5.4
1940	2,851	151,601	134	10,513	44	3,408	13	2,064	13	1,604	51	2,164	5.7

자료 : 『조선총독부통계연보』 (각 년판)

비고 : 1) 1938년 공립고등보통학교는 공립중학교로 바뀌었으며, 따라서 1939년 이후의 학교수는 일본인과 공학하는 학교로서 크게 늘어난 것이다. 다만 입학생수는 조선인만을 계산한 것이다. 공립여자고등보통학교도 1939년 이후의 통계는 일본인들과 공학하는 학교수로서 크게 늘어난 것이다.

2) 위 통계에는 실업학교, 각종 학교 등은 포함되지 않았다.

3) 사립보통학교의 1921년 입학자가 4,128명으로 급증한 것은 오기인 것으로 보인다.

유학생의 수가 크게 늘어나면서 유학생들 가운데 고학생이 차지하는 비중도 더욱 커졌다. 일본 경찰의 보고에 의하면, “이들 학생들 가운데 부형으로부터 학비의 지급을 받아서 전심 공부하는 자는 비교적 적고, 그 대다수는 신문배달, 잡업 등에 종사하는 고학자들”이었다.⁸⁾

이같이 유학생이 크게 늘어나자 총독부와 일본 정부 당국은 이들 학생의 지도와 감독 문제에 대한 비상 대책을 세우지 않을 수 없었다. 예를 들어 1940년 총독부 학무국장은 동경에 출장하여 문부성, 내무성, 척식성 등과 대책을 협의하였고, 척부대신은 관하에 각지의 조선인 학생지도대책을 세우도록 지시하였고, 또 문부성 학무국장은 동경부 내에서 5백 명 이상의 조선유학생을 수용하고 있던 5개 대학에 특별히 주의를 환기하여 조선인 학생지도에 유의할 것을 지시하기도 하였다.⁹⁾ 그 직후 미나미 총독은 총독부 국장회의에서 도항노동자 문제와 유학생 증가 문제는 조선내의 국부적인 문제가 아니라 국책 상 중대 안건으로 등장하였다고 강조하고, 총독부와 본국 정부 간의 유기적인 연락을 위한 위원회 같은 것의 설치가 필요하다고 지적하기도 하였다.

이어서 1941년 2월 총독부는 그동안 유학생을 위탁 감독해오던 조선교육회 장학부를 ‘조선장학회’로 개조하였다. 이 장학회는 규정 제1조에서 “본회는 조선장학회라 칭하여 중등학교 이상의 학교에서 수학하는 조선인 학생 생도에게 지도 보호를 가하여 忠良 有爲한 신민이 되게 함을 목적함”이라고 하여, 이 감독기관의 목적이 무엇인지 명확히 하였다. 조선장학회는 또 총독부의 감독 하에 내무성, 문부성, 후생성 등 관계 관청의 협력을 얻어 진학 지도와 재학 중의 지도, 그리고 졸업 후의 취직 알선에 이르기까지 유학생의 모든 행동을 규제할 것을 목표로 하고 있었다.¹⁰⁾ 이만규는 『조선교육사』에서 “이 회(조선장학회)의 추천이 아니면 일본학교에 입학도 못하였고, 이 회의 소개가 아니면 조선에서 허가받는 직장에는 취직도 어려운 제도를 세워 장학이라는 미명만 가지고 제재와 감독을 심하게 하였었다. (중략) 이따금 간담회 형식으로 유학생을 모으고 사상을 감시하며 훈련시키려 하였으나 역시 유학생들은 잘 나가지 아니 하였다”고 기록하였다.¹¹⁾

한편 유학생들의 민족운동, 사회운동에 대한 관심도 여전하였다. 1920년대 후반 이후 민족주의계열의 운동은 부진한 상태에 있었다. 그러던 중 1936년 일본 정부의 취약성을 드러낸 2·26사건과 조선인인 손기정의 베를린마라톤 제패가 조선민족에게 큰 충격을 주면서 유학생들 내부에서 민족주의운동이 다시 고개를 들기 시작하였다. 각 대학 유학생 학우회의 활동도 활발해지고, 재동경유학생 학우회를 재건하자는 기운이 일어나기 시작하였다. 그 결과 6월 25일 17명의 학생들이 참석한 가운데 ‘조선유학생연학회’가 창립되었다. 학생들은 이후 정기총회에서 “본회는 다만 학술연구회이다. 학생들의 인격향상을 도모할 것을 목적으로 한 조직임에도 불구하고 걸핏하면 본회의 목적이 다른 데에 있는 것처럼 비판하는 것은 유감”이라고 말하였지만, 일본 경찰당국은 이 단체는 “재경유학생들을 규합하여 민족의식의 양양의 조직기관으로 인정된다”고 보고 있었다.¹²⁾ 유학생연학회에는 메이지대의

8) 『독립운동사자료집』13, 1168쪽

9) 『동아일보』 1940년 6월 16일, 「1만 수천 동경학생 지도, 취체의 방책을 총독부와 관계 각 성간 절충」

10) 『독립운동사자료집』13, 1129쪽

11) 이만규, 『조선교육사』(하), 을유문화사, 1949, 392~393쪽

12) 『昭和特高彈壓史』상, 157-158쪽

朴容七, 禹三興, 徐載喆, 박치문, 와세다대의 강대성, 조사달, 일본대의 張載性, 金容吉 등 30여명이 참여하였다.¹³⁾ 그리고 이들은 민족주의와 공산주의의식의 고양을 위한 좌담회, 강연회 등의 활동을 전개하였다. 그러나 1938년 1월 본국에서 박용칠, 서재철, 장재성 등이 검거되는 등 일본당국의 탄압이 가중되자 2월 연학회는 해산하지 않을 수 없었다. 또 나머지 회원 10여명도 그해 5월 동경에서 치안유지법 위반으로 검거되었다.

유학생연학회사건으로 학생들이 검거되었을 때, 일제 경찰당국은 주요 회원 중의 하나인 우삼흥으로부터 “1) 연학회는 조선이 일본제국으로부터 이탈, 독립시킬 것을 목적으로 하고, 2) 그 목적 달성을 위해서는 분산된 조선학생들의 모든 세력을 반일본제국주의 사상 밑에 조직하여 전선을 통일하고, 3) 이렇게 하여 신 운동방침인 인민전선 형태로써, 자본주의의 붕괴와 국제적 위기라고 말하는 사회정세에 따라서 목적 달성의 준비 활동을 하고 있었다”는 진술을 받아냈다고 한다.¹⁴⁾ 이를 보면, 유학생연학회는 민족주의계열과 공산주의계열의 학생들이 이른바 인민전선 전술의 방침에 부응하여 연합조직으로 만든 것이 아닌가 여겨진다.

한편 교토의 조선유학생 학우회도 이즈음 재건되어 집회 시 일본 당국의 조선어사용 금지에 대해 강력히 저항하고 있었다. 이들은 경도부청을 직접 방문하기도 하였고, 내무대신 앞으로 진정서를 보내기도 하였다.¹⁵⁾ 이 문제는 재일본 조선유학생 단체들의 공통적인 불만사항이었다. 1938년 1월에는 동경기독교 여자청년회관에서 연합송별회가 열렸는데, 경찰당국은 미리 조선어를 사용하지 말도록 주의하였지만, 일부 학생들은 이를 무시하고 조선어를 사용하여 2명이 현장에서 검속되는 사건도 있었다.¹⁶⁾

1939년 조선인 유학생 단체는 무려 108개, 회원도 1만 6백여 명이 달하였다. 그리고 일제 경찰당국은 이들은 모두 조선인유학생회라는 명칭을 사용하고 일본에 대해 자신들은 외국인인 것처럼 행세하고 있다고 쓰고 있었다.¹⁷⁾ 이들 유학생들은 1937년 중일전쟁이 발발한 뒤에는 “결국 일본은 국제적 고립 및 재정의 취약성에 의해 마침내 패전에 빠지고 일본제국주의는 붕괴하리라 보고, 이 기회에 일거에 조선의 독립을 이루어야 한다고 보고 있었다 한다.”¹⁸⁾

이에 따라 민족주의적 운동도 급격히 활발해져 1937년에는 동경 농업대학 학생들을 중심으로 한 민족주의 비밀결사인 ‘평안그룹’이 조직되어 활동하다가 1938년 발각되었다. 김두혁, 김태훈, 김운하 등을 중심으로 한 이들은 강령으로서 1) 조선으로 하여금 일본제국의 기반으로부터 이탈시켜 독립을 기도하고 조선 안에 민주공화국을 건설하여 조선 고유의 문화를 발양하고 세계문화의 교류로써 조선민족의 행복을 증진할 것, 2) 공산주의를 배격하고 조선민족의 의식 양양을 기도하며, 민족의 일치단결에 의한 조선해방운동을 전개할 것, 3) 농민계몽운동에 중점을 두어 既設 교육기관에 들어가거나 또는 계몽기관을 창설하여 교육훈련에 노력할 것 등을 정하였다고 한다.¹⁹⁾

13) 조선연학회는 총무부, 연구부(정경반, 법률반, 사학반, 문예반), 재정부 등이 있었으며, 총무는 박용칠이 맡았다(『동아일보』 1936년 6월 29일 「동경유학생 연구회 조직」).

14) 『昭和特高彈壓史』 상, 227쪽

15) 『독립운동사자료집』 13, 1166쪽

16) 같은 책, 1176쪽

17) 같은 책, 1179쪽

18) 같은 책, 1180쪽

19) 『소화특고탄압사』 중, 69-74쪽

또 청산학원 신학부의 박윤옥 등을 중심으로 6명의 학생들이 1936년 계몽운동을 목적으로 일맥회를 조직하였다가, 1937년 민족운동을 위한 비밀결사로서 熱血會로 개편하여 활동하다가 발각되어 검속된 사건이 있었다. 이들은 평양 사립승인학교 동창생들로서 귀국하여 평양부근에 농민도장을 개설하고 농촌청소년들을 규합하여 훈련 지도하고, 농사개혁에 노력하여 실력양성과 민족의식의 양양을 도모하여 궁극적으로는 조선의 독립을 기도하였다는 것이다.²⁰⁾

1940년에는 고오베현의 北神상업학교 학생 배상권을 중심으로 한 유학생회가 민족주의운동을 한 혐의로 일본 경찰에 의해 적발되었다. 배상권은 1938년 7월 같은 학교 학생인 최창현·조정규 등에 대해 하와이·상해 등지에서 조선독립을 기도하는 단체의 활동상황을 설명하고, “우리는 이들 해외에서 조선독립을 기도하는 단체들과 제휴하여 조선민족의 단결을 강고히 하고, 이들 단체 및 조선인 목사 다수를 포용하고 있는 조선기독교의 신앙을 통하여 영, 미 등 외국의 군사 및 경제상의 원조를 받아 이번 지나사변(중일전쟁)의 장기화에 의하여 일본이 경제적으로 파탄을 낳고 패전하기에 이른 호기를 타서 일제히 봉기하여 조선독립을 기도하여야 한다. 우리는 미리 이러한 경우에 대비하여 일반 조선인 대중을 설득 지도할 수 있는 중심세력을 결성해둘 필요가 있으므로 북신상업학교 재학 중인 조선인 유학생들을 결집하여 표면상으로는 학술 연찬 및 상호부조, 친목의 이름을 빙자하고, 실제로는 조선독립을 궁극의 목적으로 하는 유학생회를 결성하자”고 제의하였다고 한다. 이러한 논의에 따라 같은 해 10월 이들은 북신상업학교유학생회를 조직하여 배상권이 회장이 되어, 회원들의 민족정신, 독립의식 고취에 노력하였다는 것이다.²¹⁾

1930년대 말-1940년대 초 들어 민족주의계열의 학생 비밀결사의 수는 더 늘어났다. 기옥중학의 자숙회, 오사카 학생들의 비밀결사인 계림동창회, 야마구치현의 山口고등학교 학생들의 麗友會 등은 그 대표적인 것들이었다.

민족주의계열의 결사만이 아니라 맑스주의계열의 결사도 다수 만들어졌다. 1940년 6월에는 맑스주의 연구회를 조직한 方産禹範(法大專經卒)외 2명(일본대 법대생 포함)이 검거되었다. 이들은 내외 정세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이 인식하고 있었다 한다.

- 1) 중일전쟁은 국제적 제국주의 금융자본가단의 중국 분할쟁패전의 하나로서, 일본이 자본주의, 제국주의의 내재적 모순을 완화하는 최후적 수단으로서 택한 것이다.
- 2) 중일전쟁은 결국 미·영·소·불 등의 원조를 받는 중국측의 장기항전이 성공하고, 일본이 패전에 빠지게 될 것이다.
- 3) 현재 일본 경제의 취약성은 점차 붕괴의 길에 들어서고 있다.
- 4) 현재 조선사회는 모든 문물이 전시체제에 동원되어 민중은 극히 비참한 상태에 있다.²²⁾

이러한 인식위에서 이들은 1) 전쟁 중 민중의 경제핍박에 따른 불평불만을 교묘히 이용할 것, 2) 조선사회의 문화와 민중의 계몽을 위하여 프로문학을 이용할 것, 3) 일본의 공산

20) 같은 책, 41-44쪽

21) 같은 책, 46-54쪽

22) 『소화특고탄압사』 중, 78-79쪽

주의운동과 제휴하여 현하 혁명의 호기에 대처할 것 등을 구체적인 목표로 정하였다고 한다.²³⁾

1940년 10월 일본 경찰은 교토의 조선인학생 공산주의자 10여명을 검거하여, 그 가운데 임두성 외 8명을 치안유지법 위반으로 기소한 사건이 있었다. 경찰에 의하면 박화영과 임두성은 1934년 佐賀고등학교에 입학한 뒤 교사와 선배들로부터 영향을 받아 공산주의에 공명하게 되었으며, 조선을 일본으로부터 해방시키기 위해서는 공산주의사회를 실현해야 한다는 사상을 갖게 되었다고 한다. 이들은 1936년경 이 학교에 재학 중인 다른 조선인 학생들을 동지로 만들고, 선배 이유호와 山口正之 등의 지도를 받아 맑스주의연구회를 조직하였다. 이들은 고등학교를 졸업하고 경도제대 등에 진학한 뒤에는 동지사대학의 김옥균 등과 제3고등학교의 최상업 등을 동지로 획득하고 협의회를 계속하였다고 한다. 이들은 협의회에서 자신들의 운동 방침으로서, 1) 조선민족해방운동에 헌신함은 조선인테리의 사명이며, 2) 공산주의이론의 파악에 정진하고, 3) 일반 조선인 대중의 민족, 공산주의적 계몽에 주력하고, 4) 조선어·조선문화의 유지에 노력하며, 5) 교토에 있는 조선인 학생 학우회를 지도하며, 6) 동지 획득에 노력할 것 등을 정하였다고 한다.²⁴⁾

일본제국주의는 1941년 12월 8일 태평양전쟁을 시작하면서 다음날인 9일 아침 일본 전역에서 일제히 조선인 민족주의자와 공산주의자들을 검거를 단행하여 그 수는 124명에 달하였다.²⁵⁾ 뿐만 아니라 경찰당국은 이후 재일 조선인들의 언동을 엄밀히 조사하여 다수의 조선인들을 유언비어 유포혐의로 검속하였고, 또 조그마한 조직적 움직임만 있어도 역시 치안유지법 위반혐의로 검속하였다.

조직적 움직임으로서는 오사카의 독립혈맹그룹과 조선독립청년당, 동경 고등공과학교생들의 明光會, 동경의 동맹회, 동북제국대학생들의 그룹 등이 있었다. 이 가운데 동북제국대학생들의 생각을 살펴보면, 이들은 “조선인의 참된 자유와 행복을 위해서는 조선을 일본으로부터 해방시키는 길밖에 없다. 현재의 일본은 사상적, 경제적으로 붕괴하고 있다. 이러한 기회를 타고 우리 민족은 봉기할 수 있다. 우리는 이에 대비하여 각자의 인식을 높임과 함께, 민중을 지도 계몽해야 한다” 는 데 의견을 같이하고 있었다.

또 이들은 운동의 방침으로서 다음과 같은 생각을 갖고 있었다.

- 1) 조선독립을 희구하는 조선인 학생의 동지적 단결을 강화하고, 그 지도자로서 조선민중을 지도, 계몽하기 위하여 자기의 문화수준의 향상에 노력함과 함께 그 목적달성을 위해 실력을 양성하는 방법으로서 맑스주의를 채택하고, 이 주의의 사상을 연구해야 한다.
- 2) 조선은 일본의 철저한 탄압에 의하여 민족 멸망의 위기에 직면하고 있다. 우리 학생은 이 비참한 민족을 해방시키기 위하여 헌신적 노력을 할 책무가 있다. 그렇지만 당국의 탄압하에서는 적극적 운동은 불가능하므로 당면의 임무로서는 조선 민족에 대하여 민족적 의식의 고양, 문화적 지도 계몽에 노력하는 등 점진적 운동 방법을 채택할 수밖에 없다. 우리는 학적 실력 양성에 노력하고, 특히 맑스주의경제학은 식민지 해방정책을 강조하고 있으므로 이를 연구하는 데 노력해야 한다.

23) 같은 책, 79쪽

24) 같은 책, 102-103쪽

25) 같은 책, 174쪽

- 3) 병역의무제의 실시에 의하여 조선민족의 대결점인 단체적, 희생적 감투정신을 함양할 수 있다면 그 실시의 축진을 도모하고, 봉기의 때에 逆用하여 이를 제1선으로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 4) 언문의 폐지, 조선어의 사용 금지에 의하여 조선문화는 더욱 쇠퇴의 길을 걷고 있음은 실로 탄식할 일이다. 문화를 가지지 못한 민족은 민족이라 할 수 없다. 이러한 일본 당국의 탄압, 식민지정책에 대해서는 우리는 최대한 투쟁하여 조선민중문화를 지도해야 한다.
- 5) 학생에 대한 군사교련의 강화는 일본 팻쇼문화의 一證左이다. 우리 조선인 학생은 어떠한 이유가 있어도 이에 절대 출석해서는 안된다.(나머지 조항들은 생략-필자)²⁶⁾

이들의 조직은 맑스주의연구회 수준으로서, 이들은 맑스주의로써 대중을 지도 계몽할 수 있는 실력을 갖추자는 생각을 가졌고, 또 민족문화를 고수해야 한다는 의식도 상당히 강하였음을 알 수 있다. 또 조선인에 대한 징병제가 실시되는 경우, 이를 역이용하자는 구상도 가지고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하지만 조선인에 대한 징병제 실시에 대해서는 당시 재일본 유학생들 내부에서도 찬반양론이 있어, 이를 극력 반대해야 한다는 주장도 만만치 않았다.

1942, 43년경에 들어서서 유학생들은 일제의 패망이 다가왔음을 예견하고, 이 기회를 어떻게 이용할 것인가 하는 논의들이 많았던 것으로 보인다. 동경성전음악학교에 재학 중이던 박봉은은 유언비어 유포혐의로 체포되었는데, 그는 “1) 조선독립의 시기는 가까운 장래 미국과 영국의 본격적인 일본 공습과 함께 올 것이며, 소련은 우선 만주를 석권하고 조선을 거쳐 일본공격을 할 것을 필지의 사실이다. 이 기회를 잡아 조선민중은 봉기할 수 있다. 2) 당면의 활동 방침은 이러한 시기에 대비하여 조선의용대를 조직하고, 소련과 협력하여 우선 조선에 있는 일본인들을 살육하고, 중요 관청, 공장 등을 점령하고 일본을 항복시켜, 미국과 영국의 원조를 얻어 독립을 완수해야 한다” 고 말하였다 한다.²⁷⁾ 1943년 치안유지법 위반혐의로 체포된 일본대 예술학부의 張元世永은 같은 조선인 유학생들과 누차 회합을 갖고, “1)대동아전쟁 하에서 조선 청년이 총궐기할 호기가 반드시 올 것이다. 2) 당면의 임무는 경성을 본거지로 하여 잡지사를 경영하고, 문화운동으로써 조선민중을 지도하는 것이다. 3) 일-소 개전은 금년(1943년) 가을쯤으로 판단되므로, 소련군이 만주국으로부터 북조선에 침입하여 일본을 공격할 때에는 내외의 조선인들이 일제히 봉기할 수 있다. 4) 소련에는 독립운동자에 의한 군대가 있고, 또 미국·영국·소련의 원조를 받을 수 있기 때문에 무기의 입수는 용이하다. 5) 일본교사로 위장하여 몽고에 들어가 소련 재주 독립운동자와 연락을 취하고, 소련을 경유하여 돌아오는 것이 양책이다. 6) 미국에 있는 독립운동자와 서로 호응하여 동경의 조선인 학생 동지와 함께 歸鮮하여, 戰局의 일본에 불리한 기회를 타서 봉기해야 할 것이다” 는 의견들을 나누었다고 한다.²⁸⁾

그런데 재일 유학생들이 모두 이같이 반일적인 사고를 갖고 있었던 것은 아니었다. 예를 들어 1938년 조선인 지원병제도의 실시에 대하여 일부 유학생들은 조선인에 대하여 여전히 징병제가 실시되지 않고 있는 데 대하여 불만을 표시하는 경우도 있었고, 일부 입대자들은

26) 같은 책, 226-228쪽

27) 『소화특고탄압사』 하, 87-88쪽

28) 같은 책, 203쪽

자신이 입대하여 비로소 황국신민의 대우를 받게 된 것에 대해 감격해하는 경우도 있었다. 교토의 제국대학 조교수로 있던 李泰圭는 조선에도 의무교육을 실시하고, 아울러 징병제도 실시하라고 촉구하였다.²⁹⁾

IV. 맺음말

이상 1930~45년 사이 渡日 유학생들의 유학과정, 사상과 운동을 살펴보았다. 渡日留學生의 수는 1930년대 초 4천여 명이던 것이 1940년대 초 약 3만 명으로 크게 늘어났다. 그리고 그 구성원 가운데 고학생의 비중이 크게 늘어났다. 1930년대 초에는 광주학생독립운동에 관계했던 학생들이 대거 일본에 유학하였으며, 전문학교 이상의 학교에 유학하는 학생의 수도 크게 늘어났다. 한편 30년대 중반이후에는 중등학교에 진학하기 위한 일본유학이 크게 늘어났다. 이는 보통학교 졸업자는 크게 늘었으나 식민지 조선 내에 중등학교의 시설이 크게 부족하였기 때문에 일어난 현상이었다.

주지하듯이 1920년대 중반 이후 일본과 조선에서 활발하게 전개되던 공산주의운동의 영향을 받아 유학생들 사이에서도 사회주의적인 성향을 띤 학생들이 나타났고, 이들은 학생시절부터 사회주의운동에 뛰어든 경우가 많았다. 1930년대 초 사회주의적 성향의 유학생들은 더욱 좌편향적인 성향을 띠었다. 이는 코민테른의 지침을 받은 일본과 조선의 사회주의운동의 전체적인 경향이 그러했기 때문이다. 그러나 중일전쟁 이후 일제가 전시체제를 강화하면서 각종 사회주의운동을 탄압하는 가운데, 비밀결사 혹은 유학생회 등을 이용한 민족주의 계열의 운동이 다소 활발해지기 시작하였다. 그리고 소규모의 맑스주의 연구회 모임도 여전히 이어졌다. 그리고 1935년 이후 코민테른의 이른바 인민전선 전술의 영향에 의하여 민족주의계열과 사회주의계열 학생들의 합작이 나타나기도 하였다. 태평양전쟁 발발 이후에는 일제의 패망을 예견하면서 유학생 내부의 민족의식과 사회의식의 고취를 목적으로 한 민족주의계열의 비밀결사와 맑스주의 비밀결사가 계속되었지만, 규모는 점차 작아졌고 표면적인 활동도 거의 하지 못하였다.

이러한 사상적 동향은 유학생 단체의 운동에도 그대로 반영되었다. 1930년 재동경조선인 유학생학우회는 해체되었으며, 사회주의계열의 학생들은 일본공산주의운동에 합류하여 활동을 전개하였다. 그러나 1935년 코민테른의 인민전선 방침이 발표되면서 조선인유학생 사회에서도 다시 학우회를 부활시키려는 운동이 일어나 1936년 조선유학생연학회가 구성되기도 하였으나 일제의 탄압으로 해산당하고 말았다. 그러나 유학생들은 이에 굴하지 않고 각종 비밀결사 등을 구성하여 일제에 대한 저항의식을 가다듬으면서 해방의 날을 기다리고 있었다.

29) 『소화특고탄압사』 중, 195-198쪽

Korean Students who went to Japan since the 1930s and Their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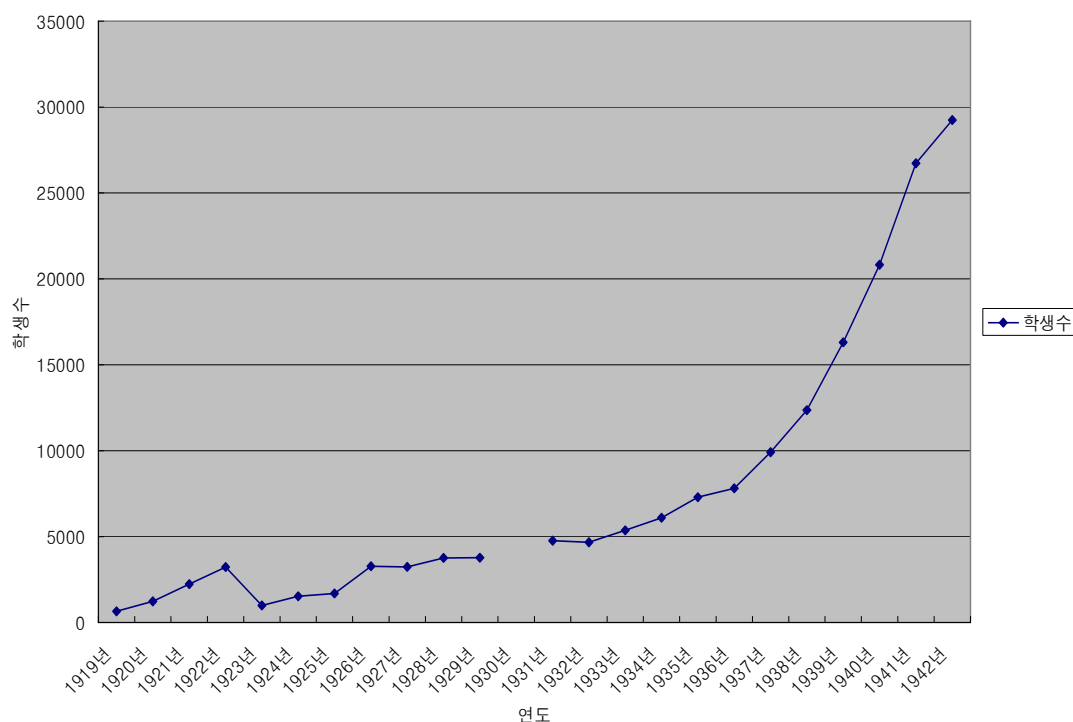
PARK Chanseung

1. Introduction

Picture 1 shows a graph of the Korean students who went to Jap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s the diagram depicts, the number of the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was less than 1,000 in the 1910s. But, it began to increase in 1920 and surpassed 1,000. It slightly reduced in 1923 when Japan was struck by the Great 1923 Kanto earthquake. Soon, it started growing and exceeded 3,000 in 1926. Since the 1930s, the number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o 5,000 in 1933. Then, it passed the 10,000 mark in 1938 and the 20,000 mark in 1940. It finally reached 30,000 in 1942. As such, the number of the Korean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kept increasing dramatically. What was the cause of the dramatic increase?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is question.

Moreover, many of them studied the nationalism and the socialism and joined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or the socialist movement. Their participation into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peaked during the 1920s. Then, how was their activities since the 1930s? This article will also deal with this issue.

<Table 1>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2. Korean students who went to Jap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30s and their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Table 1 shows the number of Korean students who went to Japan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30s. The figure was on an upward trend overall, but it showed a decrease temporarily in 1932. The sudden decrease was relevant to the worsening conditions in the economy of Joseon Korea where the prices of rice plunged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 was squeezed by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Table 1> The number of Korean students who went to Jap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30s

Year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Number of students	4,762	4,664	5,369	6,093	7,292

Source: The Home Ministry of Japan, the yearly edition of the Situations of the Social Movement (page 1127 in “the Source Book of History of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collected by the police department of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in 1934, as many as 4,533 Korean students stayed in Tokyo, Japan, to study, while 291 chose the US. That clearly demonstrates Korean students overwhelmingly selected Japan as a destination for study.

Then, what kind of schools did they select? In 1926, Korean students going to universities account for 5.4% while those going to colleges or preparatory courses of universities took 38%.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ose students going to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formed 43.4% of the overall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And, the number and the rate increased as times passed by. They passed the half, showing 51.4% in 1930 and 50.1% in 1934. On the contrar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going to non-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decreased from 38.2% in 1926 to 11% in 1930 and 16.3% in 1934. This is because the school system in Joseon Korea had restructured to be the same as the one in Japan since the revision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in Joseon Korea in 1922. Therefore, Korean students did not have to go to Japan for non-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hich usually provided pre-college courses. Interestingly, however, the ratio of students going to middle schools including women's high schools continued to increase to 10.8%, 17.5% and 19.8%. It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 of secondary institutions was far below the growing number of elementary school graduates in Joseon Korea so that students who wanted to go to secondary schools could not fulfill their ne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30s, the community of the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was in a different atmosphere compared to the 1920s. There had been a series of student-led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Joseon Korea between 1929 and 1930. Those students who had been dismissed from schools due to their participation into the movement went to Japan and joined the community. Furthermore, a private middle school in Kyoto, Japan, called the Yangyang Middle School, opened its door to these students

from all over Joseon Korea.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the Korean students in the school dramatically increased from 10 to more than a hundred. In 1930, out of 161 Korean students in the school, as many as 81 had been involved with the Student-led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Gwangju, Korea.

In the early 1930s, the atmosphere of the Korean student community in Japan was different from the late 1920s. There was a symbolic incident demonstrating the change of the atmosphere. In December, 1930, the club of the Korean students in Tokyo announced its resolution to dissolve itself. The dissolution was led by its members keen on socialism. Of course, they were affected by the leftists of the socialist independence movement group in Joseon Korea who had raised their voices ov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joint organization with the nationalist group for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called the Shinkan Union.

Such a dispute in Joseon Korea also took place in the Korean student communities in Osaka and Kyoto. In 1931,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ose for dissolution and against dissolution. At that time, students against dissolution, mostly keen on nationalism, insisted that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to break down the differential treatments for the Korean people should be conducted by the united power of the Korean people. They said that they could not agree o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riginated from the theory of class conflict that the leftists had supported. As a result, most of the Korean student communities at a local level were broken down so that alumni associations of universities took over the role for gathering. It has been recognized that the number of Korean student organizations was 34 in the end of 1932 and that there were some clubs for Korean students from the same hometown.

Meanwhile, some students, particularly those standing on their feet who joined the leftist group, also took part in labor movements led by the national union. Also, they joined the cell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Japan as the Korean communist group in Japan was affected by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local operations of the Joseon Kore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Joseon Korea were disassembled. There is an incident which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leftist Korean students joine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group. In 1931, the Japanese police authority arrested the cell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group in the Hosei University. It captured 96 members in 1933 and 134 members in 1934 for the violation of the Public Security Maintenance Law. In these two year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nhanced law enforcement against the communist group, affecting socialist movements led by the Korean students. Therefore, they had to find new ways to continue their movements.

3. Korean students who went to Japa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30s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40s and their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30s to the Independence Day, the number of Korean students going to Japan never went down but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is period was a war time. Japan accelerated its invasion to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Pacific War. Eve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number of Korean students going to Japan continued to rise. In 1936,

there were about 7,800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But, the figure reached 29,000 in 1942, a four time increase in just five years. The following is the number of Korean students in each institution.

<Table 5>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Korean students in eac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1936-1942)

Year	National University	Private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Total
1936	121(1.5)	1,880(24.0)	1,066(13.6)	4,743(60.7)	7,810(100)
1937	128(1.3)	1,610(16.2)	1,983(18.5)	6,193(62.5)	9,914(100)
1938	152(1.2)	2,296(18.6)	2,183(17.7)	7,725(62.5)	12,356(100)
1939	214(1.3)	1,382(8.5)	3,934(24.1)	10,774(66.0)	16,304(100)
1940	261(1.3)	2,044(9.8)	3,624(17.4)	14,895(71.5)	20,824(100)
1941	242(0.9)	2,931(11.0)	4,400(16.5)	19,154(71.7)	26,727(100)
1942	299(1.0)	2,498(8.5)	4,595(15.7)	22,044(75.4)	29,247(100)

Source: Page 1127, History of Independence Movement Volume 13

The figures in brackets are percentage.

As Table 5 shows, the rate of the students going to private universities went down gradually. On the contrary, the rate of the students going to secondary school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from 60.7% in 1936 to 75.4% in 1942. The increase represents that more and more students came to Japan to go to secondary schools.

Then, why does the rate show a sharp increase? The answer can be found in the media reports at that time saying that some chose Japan for better schools while most of them went to Japan despite inconvenient conditions and expensive tuition fees since they had failed to go to secondary school in Joseon Korea. The reports added that these students had chosen Japanese secondary schools as these schools had relatively easier admission requirements. Therefore, some raised voices in Joseon Korea that more secondary school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Joseon Korea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boom of going to Japan for secondary education.

Since the 1920s, the number of elementary school graduates gradually had increased as more and more elementary schools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Joseon Korea. But, the number of secondary schools remained unchanged. In 1920, there were 641 elementary schools in Joseon Korea. The figure increased to 2,274 in 1935. But, in the case of secondary schools, the figure only rose from 23 in 1920 to 45 in 1935. As a result, the ratio of students going to secondary schools fell down significantly. It recorded 28.6% in 1920, but it kept going down to 18.6% in 1923, 10% in 1926, 8.1% in 1930 and 5.8% in 1935. That's why many elementary school graduates chose Japan to go to secondary school.

As the number of the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increased, the ratio of students who supported themselves also ros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then Japanese police agency, the Korean students whose parents supported tuition fees accounted for less amount while a lion's share of the Korean students had to deliver newspapers or do part-time jobs to stand on their feet.

With these students growing,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as well a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to prepare urgent measures to guide and supervise them. For example, in 1940, the head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went back to Japan to discuss the issue with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he Home Minis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Ministry. After the meeting, the head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Education Ministry ordered five universities in Japan which had more than 500 Korean students to carefully guide and manage them.

Then, in February, 1941,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restructured the school commission department of the Joseon Korea Education Organization, the supervising body for the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to the Joseon Korea Education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clearly displayed its purpose in the first clause of its constitution, saying “The name of the Commission is the Joseon Korea Education Commission and its purpose is to offer the guiding protection to the Korean students who go to secondary institutions and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m to become loyal citizens.”

Meanwhile, the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we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20s,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was frozen. But, there were incidents which broke the ice: the February 26 incident, an attempted coup launched by the radical ultranationalist fraction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which revealed vulnerability i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Sohn Kee-chung’s winning the gold medal in the Marathon at the 1936 Berlin Olympics. These two incidents spurred the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to take part in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Organizations of the Korean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accelerated their activities and some students tried to rebuild the Korean student community in Tokyo. As a result, on June 25, a group of 17 Korean students found the so-called Joseon Korean Students Association. In their regular meetings, they insisted, “This organization is established to conduct academic researches. It is lamentable that it is criticized as if it has another purpose other than the improvement of personality of its members.” However, the Japanese police authority reported that the organization can be recognized as committed to gathering the Korean students to boost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among them.” The association consisted of 30 members including Park Yong-chil, Woo Sam-hueng, Suh Jae-gil and Park Chi-moon from the Meiji University; Kang Dae-sung and Cho Sa-dal from the Waseda University; Chang Jae-sung and Kim Yong-gil from the Nihon University. They held lecture meetings and round-table talks in order to promote nationalism as well as communism among the Korean students. However, in January, 1938, Park Yong-chil, Suh Jae-chul and Chang Jae-sung were arrested in Korea a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nhanced suppression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Consequentially, the association had to be dismissed in February.

When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were arrested, the Japanese police authority was able to receive a statement from Woo Sam-heung, one of the key members, saying that the association had been committed to the independence of Joseon Korea from Imperial Japan, that it had tried to unite Korean students under the anti-Japanese Imperialism to achieve the independence and that it had prepared strif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people’s front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like th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The statement reflects that the association was a joint organization between the communist students and the nationalist students as they agreed on the theory of the people's front.

In 1939, there were 108 Korean students organizations in Japan and the number of their members reached 10,600. The police authority reported that they all called themselves as the Joseon Korean Students Union and acted as foreigners in Japan. Whe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began in 1937, they believed that Japan would lose the war due to the isola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vulnerability in the finance and consequentially break down. They were reported to believe that they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war to achieve the independence of Joseon Korea.

Therefore, the nationalist activities were accelerated. In 1937, Korean students in the Toky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rganized their secret nationalist group, called the Pyeongan Group, in 1937, but it was disclosed in 1938. The group was led by Kim Doo-hyuk, Kim Tae-hoon and Kim Woon-ha who said in their constitution that they were committed to the independence of Joseon Korea from Imperial Japa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public Joseon Korea to advance its own culture and exchange with other cultur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appiness of the Joseon Korean people and that they were against communism and committed to improving awareness of the Joseon Korean people and promoting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based on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Also, a group of 6 students including Park Yoon-ok, a theological student in the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organized a group, called the Ilmac Union, for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1936. The group was restructured as a secret group for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called the Hot-Blooded Union, in 1937. But, it was disclosed soon and the members were arrested. They all were alumni of the Soongin School, a secondary school in Pyeongyang. They were reported that they had come back to Korea and opened an institution for farmers in rural area near Pyeongyang to train youngsters and reform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By doing so,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police authority, they had tried to develop capabilities of farmers and improve their awareness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

When it waged the Pacific War on December 8, 1941, Imperial Japan rounded up the Korean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across Japan in the morning of the next day. The number of arrested people reached 124. In addition, it began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Korean expatriates in Japan and arrested most of them for spreading a rumor. Any organizational activity was subject to the arrest for the violation of the Security Maintenance Law.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several organizations which maintained their activities for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such as the Blood Alliance and the Joseon Korean Youth Party for Independence in Osaka;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Union led by Korean students in the Senior Engineering School in Tokyo, the Alliance Union and the group of students in the East North Imperial University in Tokyo. Among them, those students in the East North Imperial University believed that Joseon should be independent from Imperial Japan to make the Joseon Korean people enjoy freedom and happiness. They also believed that Imperial Japan's ideas and economy were breaking down and therefore the Joseon Korean

peopl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o rise against it. They agreed that their members should be prepared by improving their awareness to enlighten the public in Joseon Korea.

In 1942 and 1943, the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got a hint that Imperial Japan would face its end. It seems that there were many discussions over how to utilize the defeat of Imperial Japan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Joseon Korea. Park Bong-eun, a student in a music school in Tokyo, was arrested for spreading a rumor. Park is told to say,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 would come as the US and the UK began an air raid on Japan. Also, it is definitely true th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take Manchuria first and go down to Japan through Joseon Korea to attack. By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he Joseon Korean people can rise up against Imperial Japan.”

However, it is not true that all Korean students in Japan were against Imperial Japan. For example, in 1938, when the Japanese authority began the volunteer system for military service, some Korean students claimed that the draft system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Joseon Korean people. Also, those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military expressed appreciation for being a real citizen of Imperial Japan.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 对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政策研究

■ 徐 志 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 ■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政策研究

徐志民(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

〈目次〉

I. 前言	IV. 利己管理及其政策
II. 积极接受及其目的	V. 结语
III. 消极教育及其措施	

I. 前言

在近代中国人留日运动史上,留日军事学生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颇为引人瞩目。一方面,他们学习了时人极为羡慕的热门专业——军事科;另一方面,其中不少人回国后曾手握重兵、逐鹿政坛、叱咤风云,或为军事名将,或为一代枭雄,或成党国领袖等,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诚如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所言:“二十年来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底姓名,几十之九可以从明治四十(1907年)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界可谓大矣。”¹⁾感慨留日军事学生在近代中国军政界的地位和影响。

目前,近代中国留日军事学生问题仍是中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并发表了一些极富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学者主要研究了人数较多和产生重量级政界、军界人物的留日士官生群体,重点论述了他们与袁世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关系,以及留日士官生群体的兴衰历史和对军事现代化的影响。²⁾元青与王建明主要考释了近代中国海军留日教育的基本情况,论述了海军留日学生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参与近代海军的教育训练和战略战术的建设等积极作用。³⁾2001年,靳明全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喻,出版了《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军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介绍这些留日军事学生的留学情况、回国后的活动,以及对中国政治、军事及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学者则非常关注在陆军士官学校、成城学校和振武学校等军事院校的中国留日学生,主要论述了他们的学习、生活、训练及对日俄战争的态度和反应,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⁴⁾

但是,在近代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关于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和就读于陆军经理学校、炮工学校、东斌学堂等军事院校的中国留日学生的论著甚少,尤其是至今未见系统地研究日本对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接受、教育和管理政策的成果。故而,拟就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留日军

1)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64页。

2) 王建华:《袁世凯与留日士官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吴达德:《留日士官生与云南陆军讲武堂》,《自贡师专学报:综合版》1996年第3期;郭风宏:《留日士官生的兴衰》,《军事史林》2000年第2、3期;张瑞安的硕士学位论文《留日士官生与清末民初军事现代化成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3年。

3) 元青、王建明:《近代中国海军留日教育及其影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 田久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该校中国留学生》,《辽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中村义:《成城学校与中国人留学生》,载《中国近现代史论集: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汲古书院1985年;小林共明:《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中国留学生》,《びとりから》第6集,1985年11月,及其《振武学校与留日清国陆军学生》,载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汲古书院1985年。

事学生的相关政策做些初步探讨，分析日本政府和军部招收与教育中国军事学生的复杂心态、目的和战略意图，以及与对华政策的关系。

II. 积极接受及其目的

日本政府和军部接受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政策，从清末至九一八事变经历了较大规模的调整 and 变化。甲午战后，出于改善日中关系的客观需要和借机延伸、扩大日本在华权益，日本政府和军部主动劝诱清政府向日本派遣陆军留学生，而对接受海军留学生则相对消极。北洋时期，分别接受中国各地军阀、实力派团体及个人派遣的留日军事学生，同时暗中支持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在日本创办军事院校，以招收革命分子和流亡志士。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继续坚持分别接受的既定政策，对国民政府交涉统一留日军事学生选派权问题推诿拖延，拒不同意。

面对甲午战后复杂的东亚国际局势，日本政府和军部希望通过培养清政府选派的陆军留学生，增强双方的互信和缓和甲午以来的敌对关系，并谋求借此巩固和扩大在华的长远权益。1895年俄国联合法、德两国，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试图阻断日本向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扩张的道路。随后，英、法、德等国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6年6月，日本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指出开发中国乃是日本对清经营的最紧急的任务，计划先说服张之洞、刘坤一等清廷权臣，使其从日本聘用军事顾问，再怂恿其派遣学生赴日留学，以此建立日清两国长远且巩固的结合关系⁵⁾，即从文化教育入手谋取长远的在华利益。1897年12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翌年1月升任参谋总长)派遣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畅“言今日武备最要，嘱派人到彼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⁶⁾建议清政府派人赴日留学。1898年1月18日，张之洞电告总理衙门，称：“日本人力劝华人入彼学习，拟明春派学生赴东洋，入武备农工各学堂。”⁷⁾主张响应日方的邀请，派人赴日留学。日本军部以邀请留学的名义投石问路和清政府开明派的自强自存需求开始了最初的结合。

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还迫不及待地于1898年5月7日亲自到总理衙门发出了日本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并提供相关教育费用的邀请。他宣称：“今闻清政府开设文武专科，变通武备，因之亟续拔擢人才。盖造就人才在于教育学生，清政府若有派遣学生去日本之意，日本政府愿接受多数之学生，为之提供费用，施以教育。”⁸⁾14日，他在提交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机密报告中，赤裸裸地揭示了招收中国军事留学生三大好处：一、有助于改善甲午战后恶化的日清关系，博取中国官民的信赖。他断言“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依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二、有助于索取福建省内铁路铺设权。三、有助于向大陆扩张势力。因为军事留学生“从于武事者，不仅限于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器械等亦必仰给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勿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⁹⁾坦白了积极接受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真实目的。

矢野文雄的建议受到了继任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赞赏和肯定。1899年2月17日，青木外务大臣致信驻英公使加藤高明，指示：“根据矢野公使协商的旨趣，帝国政府立即接受、训练清国派遣的武官学

5) 外務省文書別冊：《小村外交史》(上)，新聞月鑑社1953年版，第103頁。

6) 《张文襄公全集》卷79，电奏7，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5486頁。

7) 《张文襄公全集》卷154，电牍33，第11044頁。

8) 《清国留学生招聘策》，《近代史资料》第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頁。

9) 《清国留学生招聘策》，第95—96頁。

生。请将此意旨通知南北两通商大臣及湖广总督，立即向清国提出派遣学生。”¹⁰⁾表明了日本政府乐于接受中国军事留学生的态度。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亲自出面，获得了清政府保证继续执行已有留日政策的承诺¹¹⁾，为张之洞实施此前与日本达成派遣100名军校及普通学生留日的计划铺路。¹²⁾ 1899年1月13日，青木周藏致函陆军大臣桂太郎，通报了“清国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本国派遣该国武官留学生二十名之议已于本月10日附机密送第一号及照会先后送至。南洋大臣奉该国政府之命亦决定执行前述决议，同时派遣武官留学生。由湖北及南京派遣的该国留学生合计33名，于明日(14日)从上海搭乘萨摩丸向神户方向出发。在上海的小田切代理总领事来电请求在这批留学生登陆后，按照前述照会给予其军事研究上提供方便。”¹³⁾获得了陆军省的同意。

日本政府和军部采取相对积极的接受政策，极大地吸引了欲整军兴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国青年学生，不少人纷纷选择学习军事科。清政府担心自费留学生学习军事可能威胁其统治，故规定：“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¹⁴⁾但留日学生的“军事热”很快冲击了这一限制。1902年7月，因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保送9名自费留学生入学成城学校，导致了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包围驻日公使馆的事件。

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不愿在日俄战前得罪清政府，乃与清政府新任公使杨枢达成协议，成立了专门从事清国军事留学生预备教育的机构——振武学校。1903年7月，日本军部在东京牛込河西町开设了振武学校，把成城学校的学生全部转到该校，规定凡申请入学振武学校者，必须年龄在16岁以上，具备适当学历，通过清政府派驻东京留学生总监督将清国各省负责官员之咨文、驻京留日学生总监督之保证、学生东渡前后之履历及入学申请书，呈交清国学生监理委员长，¹⁵⁾经审查合格后，方准许入学。据此，1904年5月19日，清政府制定了《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规定凡欲学习军事的学生，必须先由各省督抚咨送练兵处，经练兵处考选合格后，方能被派遣，¹⁶⁾从国内就切断了自费生学习军事的途径。

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和部分军官乃暗中鼓励和支持寺尾亨博士创办私立军事院校——东斌学堂，¹⁷⁾专门收容被振武学校拒诸门外而有革命思想拟习军事的自费中国青年，从中培养反清革命志士和亲日军事人才，同时也解决了自费生就读军事院校的问题。如此，日本政府虽大体按照协议仅接受清政府选派的官费留日陆军学生，但在实际执行中也不尽然。

与积极接受中国留日陆军学生相比，日本海军省对中国海军尚存戒心，不太愿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直至1905年日本海军击败强大的俄国舰队，方勉强同意接受少数中国海军学生留学。¹⁸⁾ 1905年清政府选派管轮毕业生封燮臣、王孝慕、李承曾、胡思浩、薛君谦等5人赴日学习新式机炉制造技术¹⁹⁾，成为近代中国海军学生留日的开始。此后从1906年至1909夏，清政府先后共选派海军留日学生100多人。²⁰⁾清末海军留日学生人数极少的现象在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少。据统

10) 小林共明：《初期中国对日留学生派遣について：戊戌政变期を中心として》，《辛亥革命研究》第4集，1984年5月，第8-9页。

11) 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12) 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国秘录》，原书房1977年版，第45-46页。

13) 《清国留学生に関する件》，《壹大日記》明治32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3568400。

14) 《张文襄公全集》卷61，奏议61，第4180页。

15) 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81年増補版，第70-71页。

16) 《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上，“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北洋洋务局光绪31年，第46-52页。

17) 《東斌学堂設立に関する件》，《壹大日記》明治38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047800。

18)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5年刊，第43-44页。

19) 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61页。

20)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45页。

计, 北洋政府海军部于1914、1918、1920、1925年分别派遣了25、4、6、4名海军学生留日, 共计39人; 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 仅选派了8名海军学生留日。²¹⁾ 照此估算, 中国政府在1931年前选派留日海军学生总数很难超过200人。

民国时期, 日本政府和军部利用中国内乱的机会, 打破了主要接受中央政府选派陆军留日学生的惯例, 分别接受中国各种势力选送的留日军事学生。二次革命失败后, 日本政府和军部在接受北洋政府派遣军事留学生的同时, 暗中协助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日本创办军事学校, 接受大批留日学生和革命青年入学, 以培养革命人才。1913年12月1日, 孙中山等人在东京郊外创办了专门从事军事教育的浩然庐, 而负责该校军事教学任务的主要是日本的预备役军人, 其中有预备役骑兵大尉青柳胜敏、一濑斧太郎, 预备役步兵大尉中村又雄, 中尉杉山良哉, 预备役轻重特务曹长门马福之进, 预备役炮兵特务曹长可儿五三郎、江口良三郎、海原宏文、西川德三郎等日军军官。²²⁾ 教授的科目有战术学、应用战斗、野外要务令、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交通学等; 术科有体操、柔道、剑术三门。另外, 还学日语和经济学。日本政府非但不干涉, 反而任由陆军大学教官到浩然庐义务授课。

袁世凯死后, 中国各地军阀混战加剧, 留日军事学生因派遣的政治军事集团或资助者不同, 拉帮结伙, 派系林立, 相互倾轧, 而日本政府和军部非常乐意接受各派军阀选送的军事留学生, 通过挑唆各派留日学生的内讧, 为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添柴加火。据1926年赴日管理东北留日学生财务的荆有岩回忆: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分为三大派系: 第一, 以同泽俱乐部为代表的奉系军政及自费留学生, 比较团结。其次为蒋介石所属国民党派系, 以东京神田区的中国青年会为聚点, 人数较多, 但很分散。第三为冯玉祥国民军派系。”²³⁾ 这三派之间彼此对立, 相互争斗, 实为国内混战在日本的延续。1926年初, 张学良准备选派一批军人留日, “经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联系, 并有大仓喜八郎支持, 为时不久即得日本陆军省同意。这次办理手续快而且未限名额,”²⁴⁾ 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热情。日本驻上海的重藤中佐, 获知马伯援于1927年10月31日带领冯玉祥派遣的留日学生37名, 唐生智派遣的留日学生17名及杨森派遣的留日学生3名, 一起乘上海丸赴日,²⁵⁾ 立即报告参谋次长, 请国内及时注意接应。日本政府和军部积极关注, 并接受由中国各地实力派选送的留日学生, 其目的恰如荆有岩所说 “原因是一方想扩大日本的影响, 一方在增强中国军阀内讧的力量。”²⁶⁾ 制造中国分裂割据和混战内乱的局面, 以便其浑水摸鱼, 从中谋利。

1928年底, 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 一方面着手编制军队, 统一军权, 包括统一留日军事学生的派遣权, 以削弱其他军阀派系的实力; 另一方面是避免因日本的挑唆而引发内战的隐患, 遂命驻日公使汪荣宝与日本政府交涉统一留日军事学生派遣权问题。1928年12月15日, 驻日公使汪荣宝致函外务大臣田中义一, 表示 “查敝国派遣贵国留学陆军学生向由公使馆保送, 惟近年以来办法颇不一致, 有由各省行政长官、各军军长直接保送者, 亦有个人自行直接向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参谋本部报考者, 此种行为有妨事权统一, 为此函商贵大臣请烦转牒陆军省参谋本部, 今后凡属志愿陆海空军中国学生, 一律须经公使馆保送方准报考, 以归统一而免分歧。”²⁷⁾ 请日本外务省与陆军参谋本

21) 杨志本:《中华民国海军史料(上)》, 海洋出版社1987版, 第418页; 陈书麟、陈贞寿:《中华民国海军通史》, 海潮出版社1993版, 第308—309页。

22) 俞辛焞等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628—629页。

23) 荆有岩:《奉系派遣军事留学生简介》,《辽宁文史资料》第六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84页。

24) 荆有岩:《奉系派遣军事留学生简介》, 第84页。

25) 《馮玉祥派遣留日学生》,《在本邦中国留学生關係雜件》,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4011358000。

26) 荆有岩:《奉系派遣军事留学生简介》, 第84页。

27)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学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大日記甲輯昭和06年》,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1001226700。

部协商，规定今后报考日本陆海军学校的中国学生必须经中国驻日公使馆统一保送，从而统一留日军事学生的派遣权。

日本政府和军部毫不理会汪荣宝的外交照会，仍旧接受各种不遵守中国政府规章的报考者。汪荣宝公使又先后于1928年12月27日和1929年1月15日、2月9日、11月29日等多次照会日本外务大臣，请其转告陆军省停止招收没有公使馆正式公文介绍者。同时，希望日本政府修改《陆军士官学校入学希望者须知》的第一条第三项及第三条。因为该“须知”的第一条第三项规定招收“有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或督办省长及具有同等以上地位的地方官宪等推荐保送者。”第三条规定“不便经由驻本国民国公使馆提交前述文件(推荐材料——笔者注)，可通过比较方便的地方所驻帝国领事官直接提交日本外务省。”²⁸⁾这些规定与国民政府统一留日军事学生派遣权的规定明显抵触，所以请求日本政府修改这两处规定。

日本外务省在汪公使的多次催促下，方咨询陆军省对其处理意见。1929年1月22日，外务次官吉田茂致函陆军次官阿部信行《关于中国陆海空军派遣留学生的入学手续件》，通报了汪荣宝的请求，询问军方的应对意见。2月12日，阿部陆军次官回复吉田外务次官，请其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军方的态度，即“为了中国武官或学生的学习，在清朝时期答应仅接受清政府保送者，入学我陆军军队或学校。民国以后，中国政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已无法执行前述手续。鉴于中国地方长官希望派遣学生赴日留学，日本答应接受前述地方长官保送者，设立了准其修学的特例，目前已实行十几年之久，作为惯例众所周知。我陆军对昭和四年度(1929年)的陆军士官学校入学申请者，无法拒绝执行前述惯例。但是，关于统一留学生保送手续，帝国陆军与汪公使的希望是一致的，今后着手研究修改保送手续及其他事项。”²⁹⁾以接受中国地方长官派遣陆军留学生已成惯例，不便改动为由，拒绝了由中国公使馆统一保送的要求。同年12月21日，阿部陆军次官再次致函吉田外务次官，声称：“实行如此紧急的修改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帝国陆军无法在昭和五年度(1930年)拒绝实施久已成型的习惯，明年度暂取现行制度。在观望中国政局发展的同时，可告诉中国公使正研究修改本手续。”³⁰⁾不惜以谎言搪塞、敷衍，再次拒绝了国民政府的修改要求。

日本政府和军部坚持接受各地方军政长官和实力派人士派遣的军事留学生，既是前述地方军政官员的请求，也是日本军方刻意为之，其目的既非方便中国军官的学习，亦非维护久已形成的惯例，而是希望通过接受各派留日军事学生，密切与中国各地军阀势力的联系，制造中国地方对抗中央的割据局面，又可以趁机拉拢各派系投靠日本，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和傀儡。因此，尽管国民政府多次照会、交涉，但日本政府和军部置若罔闻，拒不放弃旧有的招收方案。

III. 消极教育及其措施

近代日本通过富国强兵等政策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深谙军事在近代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和军队虽然希望通过培养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改善中日关系和借机扩大在华权益，但也非常担心获得日本军事技术、理论的中国留学生成为其向大陆扩张的潜在威胁，危及日本的在华特权和

28)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学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1001226700。

29)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学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1001226700。

30)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学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1001226700。

独霸中国的阴谋，所以在教育过程中加征教育补助费，限制他们接受高等军事教育、推行知识封闭和教学保密等歧视性政策，导致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很难学到真正的、完整的现代军事技能和先进的军事理论，不少人因此愤而回国。

日本军事院校和联队教育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主要内容分为术科与学科两大类，术科包括野外演习、射击、銃剑术、器械体操和部队操练，其中部队操练又分为分队、小队、中队操练；学科包括操典、射击教范、陆军礼式、军队内务书等项。³¹⁾ 留日军事学生在联队或士官学校期间，分别由联队长或士官学校校长记录在队或在校的学习成绩，并上报陆军大臣。坦率地说，中国留日军事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新式的军事技术、理论，接触了新知，开阔了视野，回国后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军事改革，促进了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日本军事院校在接受清政府派遣军事留学生时，竟以提供教官津贴或其他名目变相征收教育补助费，在留日军事学生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限制了日本留学教育的正面影响。清政府在1904年公布的《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中，规定：“振武学校教习，应由中国筹给津贴；其余各学校教习，应于每班学生毕业后，由中国给予优奖。其津贴数目，及奖励规条，应由驻日大臣与日本在事各官商酌办理”，证明了清政府必须支付日本教官津贴的事实。³²⁾ 显然，日本军方也感觉由清政府提供津贴之名不好听，希望用其他名称代替，³³⁾ 但并未取消该项资金。1909年6月，日本军部颁布的《清国陆军学生管理规程》规定：入学陆军士官学校和宪兵练习所的中国军事留学生，其“被服费……按照陆军给与令第八表被服费的月额应加50%，……粮食……购买费按陆军给与令第九表增加50%作为定额；……暖室炉薪炭费……为陆军给与令细则第十二表的倍额；……演习要支付特别费用。”³⁴⁾ 只有图书及其他特别应给与物品的代价按实际费用支付，其他多项被加价征收，高于日本学生二分之一或一倍。另外，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操练所需的“武器弹药器具材料及马匹应从各队定数内贷与或支給，居室应从与本国士官候补生同样的场所贷与，床及寝具应从其预备品中贷与。”³⁵⁾ 并为此支付相应的租借费用。其中，阵营用具的租借费以陆军给与令细则第十五表的月额为定额，弹药费及兵器修理手续等所需费用支付方法以一年志愿兵所用的新办法为标准。³⁶⁾ 这种“借鸡下蛋”式的留学教育政策，很难取得预期的教育效果，也不利于真正的中日文化交流。

日本政府和军方还对中国军事留学生，保持高度警惕，唯恐中国军队成为潜在威胁，在教育中处处设防，表现得既自大又不自信。日本军部接受清政府派遣的陆军留学生主要分为四种：第一种为各兵科留学生；第二种为宪兵留学生；第三种为经理部留学生；第四种为陆地测量师留学生。其中，陆地测量师留学生于每年12月入学陆地测量部修技所进行为期三年的陆地测量师必要教育，经理部留学生于每年9月1日入学陆军经理学校进行为期1年9个月的经理部将校教育，前两种留学生分别进入士官学校、宪兵练习所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学校教育。³⁷⁾ 以士官学校留学生教育为例，他们首先进入成城学校(1903年后为振武学校)接受为期十五个月(后延至三年)的预备军事教育，然后被分配到联队实习半年，实习结束后多数能升入培养中下级军官的陆军士官学校，而在士官学校毕业后能升入

31) 《清国陸軍學生入隊並入校の件》，《壹大日記》明治36年12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3939900。

32) 该章程内容详见《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上，北洋洋务局光绪31年，第46-52页。

33) 《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九期，教育，第215页。

34) 《清、韓學生教育の件》，《壹大日記》明治42年6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35) 《清国陸軍學生入隊並入校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3939900。

36) 《清、韓學生教育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37) 《清、韓學生教育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培养中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者极少。这就是说中国陆军学生在日本基本上接受的是初、中级军事教育，很少接受高等军事教育。

日本军队和学校在教育中国陆军留学生的过程中，经常取消重要的军事内容，或者是遇到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就要求他们“退堂”。1903年12月，日本军部颁布《清国陆军学生在队期间管理须知》的第二条规定：“属于军事机密事项由各该队长对其酌量加以取消，”³⁸⁾明令各部队对中国留学生取消属于军事机密的内容。1909年6月，在日本军部颁布的《清国陆军学生管理规程》“附则”中规定：“一、对学生不得教授军事机密事项。二、在教授学生必须涉及军事机密事项时，应由联队长或学校长确定其程度及细节，并请示主任将校。”³⁹⁾建立了严格的教学保密制度。本来中日学生同堂授课的士官学校，因1904年第三期中国学生蒋百里考取步兵科第一名，由天皇亲自赐刀，使日本士官学校领导非常尴尬，也令很多日本同学耿耿于怀。所以，从第四期起，就把中日同学分开授课，以免中国学生再次夺冠。⁴⁰⁾日本军部还限制中国留学生入学户山军事学校、炮工学校、骑兵实施学校、野战炮兵射击学校、陆军大学，避免中国人掌握专门或高等军事技术、理论。后经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多次交涉，日本军部方同意在个别高等军事学校接受少量的中国军事留学生，但约定讲课之际，凡涉及日本军队的机密时，中国学生一律被谢绝听讲，或者暂时退出课堂。⁴¹⁾据此，从1910年开始，清国陆军部每年派遣6人进入户山学校、6人入学炮工学校、3人就读骑兵实施学校、3人到野战炮兵射击学校学习，自清朝覆亡后，该协议亦烟消云散。⁴²⁾这时第一届学生尚未毕业，可见清末留日陆军学生几乎没有接受完备的高等军事教育。

日本军部为防止军事泄密，还严令各师团长训令所属部队军官加强对留日学生的监控。1909年4月22日，日本陆军省军事课发出《各师团长的内训案》，找出两个所谓的借口：一、清国军方奖励在日本军队和学校留学的学生侦探日军军事机密，二、在第九师团的某清国留学生窃取其所属部队保管的机密图书数册，企图带回本国。遂要求各师团长责令所属的各相关队长“一定要自觉地加强警戒，对清国留学生保持严厉的态度，不要因为是留学生就亲近他们。在教育上要特别戒备和谨慎，监视其日常生活和行动，务必保证使其探查不到任何军事机密。”⁴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生很难学到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理论，而且处于监视之中，限制人身活动自由。根据《清国陆军学生管理规程》第十六条规定：“学生中有因伤痍或疾病需要住院者，应送到卫戍医院疗养。”⁴⁴⁾即使就医疗养都必须到指定的卫戍医院方可。

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战绩不显，加之对中国海军固有的戒备和敌视，使其在接受和教育中国留日海军学生时表现得更加不自信，对他们的限制条件也就更加苛刻。张之洞通过汉口领事向日本政府多次疏通，海军省勉强同意接受为数极少的海军留学生，且规定清国留日海军学生必须先到通信省所辖的商船学校接受一般教育，然后方能进入海军省所辖的练习所接受专业教育。⁴⁵⁾根据1909年颁布的《在帝国海军清国学生教育规程》和《清国学生管理规程》⁴⁶⁾规定，不管是否已有海军知识或技

38) 《清国陸軍学生入隊並入校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3939900。

39) 《清、韓学生教育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40) 陶菊隐：《蒋百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页；又见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5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1, volume 1, pp.313.

41) 興亜院政務部：《日本留学中華民人名調》，東京，1940年，第707—715页。

42)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40—41页。

43) 《第5号 軍事課 清国陸軍学生取締に関する件》，《壹大日記》明治42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3022955900。

44) 《清、韓学生教育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45) 《清国海軍留学生商船学校へ入校に関する件》，《在本邦清国留学生関係雜纂 海軍学生之部》第2册，請求番号：3-10-5-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术, 清国留日海军学生都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阶段, 方可乘舰实地演习。首先, 海军省将毕业于商船学校的清国学生, 分为航海科与机关科。其次, 航海科和机关科的留学生分别进入海军炮术学校、海军工机学校接受半年的技术教育。再次, 这些留学生集中在海军炮术学校接受一段时间的銃队(射击训练)教育, 获得海军少尉候补生或海军机关候补生的资格。最后, 才能乘舰进行为期半年的实地演习。即使如此, 还常常在乘舰训练问题歧视清国海军学生, 使其无法学到实用的知识和技术, 致使很多海军学生不愿去日本留学, 或者是入校后就自动退学。例如在1908年入学者61人中, 而退学者竟有36人⁴⁷⁾, 几乎达到60%的退学率。因此, 清政府从1905年5、6月间开始派遣留日海军学生, 到1909年夏天驻日公使胡惟德照会日本政府, 以各省甄选海军学生及格者甚少为由, 从明年起不再派遣学生,⁴⁸⁾ 主动提出了停派留日海军学生。海军省对留日海军学生的苛刻条件, 使中国人 “知难而退”。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G.E.Morrison)在1916年对日本政府的留日学生教育评论道: “中国人在日本所受的教育是差一等的。不让中国人同外界多接触, 几乎可以说隔离了他们。讲授给他们的知识, 尤其是军事学校, 也同讲授给日本人的知识, 实质上大不相同。”⁴⁹⁾ 反映了日本军事院校对中国留日学生严格的知识封闭和学业限制, 使很多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不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或者学非所用。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我心中结下了很深的芥蒂, 很难形成对日本的良好感情。

1927年1月3日, 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 不堪忍受日本教官的教学歧视, 愤而退学。1月20日, 他们发表了《留日士官学校华学生退学宣言》, 解释了被迫退学的三点原因: 一、日本士官学校对中国留日学生保留知识, 重要科目皆秘而不授。中国留日学生在退学宣言中指责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于中国留日学生)平日稍关重要之学科, 胥皆秘不教授。” 二、日本教官擅自更改教授科目。宣言指出: “上月二十日午前科目, 照课程表中规定者, 为步兵炮演习。届时该科教员今井中尉, 籍故不肯教授, 而欲临时变更为步枪演习。” 三、侮辱中国留日学生人格、国格。今井氏在课堂上竟大骂: “支那人乃一忘恩负义之人种, 中日即不亲善, 又将如何? 余实不知有亲善之必要也。尔辈须知现在尔辈所着之军服, 乃我国陆军省可怜尔辈, 方行赐给者。尔辈若着支那式军服, 而往来于日本地方者, 吾知必遭吾日人之殴辱也。” 肆意辱骂中国留日学生。当中国留日学生诉之校方, 学监 “不审曲直, 且谓今井骂中国人乃属善意的教训, 更以不守校规之名义加诸同人, 迫于本月三日全体退学”。⁵⁰⁾ 实为中国留日军事学生长期遭受教学歧视和侮辱而积蓄的反日感情的大爆发。

进入20世纪30年代, 随着中日关系的日益紧张, 日本军事院校对中国留日军事生的教学保密愈加严格。1930年3月12日, 《江声报》上发表了题为《留学日本何为——军事学更读不得, 各校皆授以平凡之知识, 重要课程一概不准听讲》一文, 指责 “官立学校对我国学生限定名额, 考试甚为严厉……及至进校, 仍授以平泛之知识, 凡重要课程, 则不准我国学生听讲, 有时且或专为我国学生放假, 以免参与上课云。”⁵¹⁾ 日本学校不惜专门为中国留日学生放假, 以免他们掌握重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技能。这种保守的留学教育心态, 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不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愤而退学, 宣称: “同人等留学敌邦, 仰教他人, 深知谋我

46) 《帝国海軍に於ける清国学生教育規定》、《清国学生取扱規定》、《在本邦清国留学生留学生關係雜纂海軍学生之部》第2册, 請求番号: 3-10-5-3-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7)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 第44页 “肄业商船学校中国学生异动表”。

48)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 第43-45页。

49) (澳)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海: 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第545页。

50) “杂讯”, 《留日士官学校华学生退学宣言》, 《教育杂志》第19卷第1号, 1927年1月20日。

51) 《留学日本何为——军事学更读不得, 各校皆授以平凡之知识, 重要课程一概不准听讲》, 《江声报》1930年3月12日。

者不惠我，制人者常骄人，已觉留非其地，学难有成。”⁵²⁾ 遂集体退学回国，再次揭露了日本当局不肯真心教授中国留日学生的实际情况。

尽管日本政府和军部在教育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过程中存在保留、防备、限制与监视，但是，近代中国人通过赴日学习军事，毕竟在客观上对中国军事近代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实藤惠秀对此评论道：“中国的确从日本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日本人能因此而感到自豪吗？不，绝对不能。因为日本人大体上没有真心诚意地教导中国学生。留日学生是一面忍受着日本人的歧视，一面发愤自学成功的。”⁵³⁾ 肯定了自制力较强的中国学生借助日本这一留学平台获得了近代新知和对中国近代化的客观作用，揭露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狭隘的留学教育心态，这在其管理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政策中表现的更加明显。

IV. 利己管理及其政策

随着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不断增多和留日学生事务管理往往牵涉两国关系的敏感性，日本政府和军队在大体按照本国同类学生标准管理的同时，还有其特殊的留日军事学生管理政策。如为避免与留日军事学生的冲突，将大部分管理事务推给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同时，制定各项政策，规范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行为和活动；另外，拉拢和收买部分意志薄弱者，对各派系的留日军事学生分而治之，配合其对华各项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

中国军事学生赴日留学之初，日本政府和军部并没有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而是由接受留学生各校直接与中国负责留日学生事务的代表联系，处理他们的接受、教育和管理事宜。1898年6月下旬，萧星垣、段兰芳、徐方谦、谭兴沛等4名军事学生入学日本成城学校，拉开了近代中国人赴日学习军事的序幕。⁵⁴⁾ 1899年1月14日，又有中国南洋武备学堂14人和湖北武备学堂19人，共计33人入该校。此后，留日军事学生人数日益增多。1899年9月，青木外务大臣经与陆军大臣桂太郎协商，命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各校在遇到留日学生事务时，应与清政府派遣的留日学生监督夏偕复和负责湖北南洋两处留日学生事务的钱恂协商处理。⁵⁵⁾ 如此，在留日学生看来是清政府管理他们，凡事应与本国政府有关；而在清政府看来，日本政府此举不仅尊重自己的主权，而且配合自己的管理政策；日本政府却能因此置身由留日学生管理而导致冲突的事外。

果不其然，在1902年7月发生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中，日本政府和军部得以置身事外，并受该事件启发，决定建议清政府成立留日学生监管机构，使自身长期避免卷入留日学生冲突的不必要麻烦之中。于是，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建议负责查办成城学校入学事件的载振贝勒选拔博学爱才之人充任留日学生总监督，驻扎东京，专司其事，以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向清政府外务部“皆述游学生各节，望中国派员监督，妥定章程，俾各学生不误方向，学业有成，以备将来任用。”⁵⁶⁾ 希望清政府设置驻日留学生监督机构。清政府遂于1902年10月正式委派汪大燮赴日组建留学生监督处，负责留日学生的接见、入学、考勤、奖惩以及与日本政府的沟通等事务。此后至清末，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基本上由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兼管。北洋时期，国

52) 《留日士官生退学救国团消息》，《申报》1931年10月22日。

53) 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519—520页。

54) 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6页。

55) 《在本邦清国学生监督者派遣の件》，《壹大日記》明治32年9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3633600。

56)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6，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38页。

内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混战，留日军事学生的派遣自然是权出多门，中央政府、各地政治军事集团迭送的留日军事学生分别由其派遣的留日学生监督(或中央经理员)和各地的经理员管理。南京政府则派遣或从留日陆军学生中选拔陆军留学生管理员，负责留日军事学生的相关事务。如此，日本政府在管理留日学生过程中，可避免成为各派系留日学生斗争的牵涉对象，从而在各派留日军事学生及其背后的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左右逢源，牟取最大的利益。

成成学校事件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亦鉴于管理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重要性和敏感度，决定颁布相应的约束政策，以作为他们在日本军队或军校中的行为规范。日本政府相继于1903年颁布了《清国陆军学生在队期间管理须知》⁵⁷⁾和1909年颁布了《在帝国海军清国学生教育规程》、《清国陆军学生管理规程》⁵⁸⁾等章程，分别规定“对清国陆军学生应按照本国士官候补生的标准管理”，“管理学生前项诸条的规定应大致按照士官候补生、主计候补生及其他在校学生的管理标准”。这些规定在民国时期继续沿用。如，1918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入学希望者须知》⁵⁹⁾中，亦规定“学生不管在民国担任何种官职，从分配到日本帝国军队到士官学校毕业期间，按照日本帝国士官候补生的标准管理，该等学生应遵守日本帝国诸法规，服从教育及管理的相关命令。”总之，在近代日本政府和军部管理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政策中，至少表面规定了以本国同类学生的标准进行管理。

这些规程作为管理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重要依据，主要规定了针对他们的惩罚处分、执勤实习、费用交纳、假期制度、服装配饰等内容，涉及留日军事学生在校或在队期间的诸多方面。第一，对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惩罚和处分规定。针对清朝的留日军事学生，日本政府和军部规定凡属下列事项之一者给予开除处分，即一、触犯刑法及陆军刑法者；二、紊乱军纪或屡犯法则或者品行不正屡教不改者；三、因伤病或疾病无法修学者；四、入队或入校延误十四日以上者。联队长或学校长将违反规定者除名后，应将大体情况直接报告陆军大臣。其中，留日军事学生在触犯刑法而犯罪时，其处理程序是将其犯罪的经过报告陆军大臣，请求处分。⁶⁰⁾民国时期，日本政府和军部规定中国留日军事学生“除了疾病及其他不得以的情况外，不得中途退队或退学，在入队后不得变更兵科，但有不良行为或学术成绩不良，难以实现学习目的者，将给予退队或退学处分。”⁶¹⁾但没有规定是否上报陆军大臣，似乎扩大了军事院校直接处罚中国学生的权力。

第二，规定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无论在学校或是在联队都必须承担执勤的义务。无论是晚清时期或是民国时期的留日军事学生，都必须在所属院校或军队实习半年左右的队伍执勤，而且规定留日军事学生教育单位“负有为学学生实习勤务提供机会的责任。”⁶²⁾

第三，规定每月按时上交留学的各项费用。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每月经费主要包括津贴、被服费、粮食费、消耗用品费、学习用品费、器械租借费、武器弹药费、演习费以及药费、入院费、邮费、汇兑手续费等各项杂费，在民国时期大约每月70元左右。晚清时期，清政府统一负担公费留日军事学生的各项费用，及至民国时期全部自费留学生和公费留学生，则需将前述经费额分为一次或数次

57) 《清国陸軍学生入隊並入校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3939900。

58) 《帝国海軍に於ける清国学生教育規定》，《在本邦清国留学生關係雜纂 海軍学生之部》第2册，請求番号：3-10-5-3-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清、韓学生教育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59)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学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1001226700。

60) 《清国陸軍学生入隊並入校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3939900；《清、韓学生教育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61)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学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1001226700。

62) 《清、韓学生教育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在指定的日期前，缴到附设在日本帝国陆军省军事课内的民国学生学费管理委员会。

第四，规定了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休假制度。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大体上按照士官候补生、主计候补生及其他在校学生的标准休假，另外根据中国的情况在万寿节及阴历正月一日也放假。如果请假必须出具中国陆军留学生的承认书，方能获得许可，而且规定“在队期间或在校期间，请假时间(含往返日期)为每次为六周以内。请假时间超过前述规定，应将请假条与所在联队长或学校长是否允许的意见书一起呈报陆军大臣，听候指令。”⁶³⁾可见，请假制度和假期时间控制的非常严格。

第五，对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服饰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在《清国陆军学生在队期间管理须知》中附有《清国陆军学生帽及襟章》，上面有中国留日陆军学生的衣服、肩章、帽子的具体规定和样式图纸。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在校的兵科“士官候补生与主计候补生相同：一、衣襟上附有星章及队号，其两端龙爪章(如别纸附图)各附一个；二、帽及肩章所附的星章以龙爪章(如另纸附图)换之；三、入队近卫师团者除了前述两项外，在帽的前面章上还附有樱枝；四、第二种学生在入学宪兵练习所后除前述各号外，衣襟所附的龙爪章应置于八瓣黑绒圆座之上，且配用32年式军刀(乙)；第四种学生的制服由陆地测量部长与清国陆军学生监理委员长协商定之。”⁶⁴⁾详细地规定了中国留日各类军事学生的制服、佩戴的肩章、帽徽、军刀等日式装扮的具体样式。这种装扮对近代中国军队的服装甚至国民的服饰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各项规程主要针对就读日本陆军省、海军省等官立军事院校或联队的中国留日学生而言，至于在私立院校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则不在此管理范围内，而归所属院校管理。另外，这几项管理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规程虽然颁布时间不一，但其内容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变化并不太大，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当然，日本政府和军部在实际执行中并非与管理日本同类军事学生完全一致，对频繁发生的歧视和侮辱中国留日学生人格与国格之事或熟视无睹，或偏袒己方，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1903年4月26日，成城学校召开春季运动会，会场内悬挂着参赛留学生各国的国旗，唯独不见大清国的黄龙旗，中国留日学生找到赛事主办者询问此事并要求补挂。赛事主办者竟扬言：“凡世界独立国皆可于此地悬旗。中国已降为各国保护国矣，安得悬旗与各国平等乎？”⁶⁵⁾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怒而退席，虽然事后补挂中国国旗，但留日学生仍拒绝出席，以抗议日方的轻辱。

不久，又发生了西乡隆盛之子侮辱四川留日学生刘某而致成城学校中国学生退学抗议事件。1903年5月27日，《苏报》以《成城学校学生退学》为题报道了西乡隆盛之子侮辱四川留日学生刘某一事。该事件大致经过如下：在两天前的晚上，成城学校留日学生刘某遭到与其在同一联队的西乡隆盛之子的言语侮辱和鸡奸威胁，遂愤而转告成城学校中国同学，大家首先集体报告校长，请求革西乡隆盛之子的职务，并令其向刘谢罪。校长非但不处罚西乡隆盛之子，还以开除恫吓留日学生。于是，诸人上诉于参谋本部，参谋本部也袒护西乡隆盛之子，请让他们不要再闹了。⁶⁶⁾留日学生蒙受不白之冤，还无处申述，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学生欺负中国留日学生的气焰，以致于经常会有人因此退学归国，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满。1909年6月，日本军部颁布了《清国陆军学生管理规程》，规定“联队长及学校长应该注意一般部下与学生之间的和谐交往，虽是学生军事教育相关事项，除主任将校外，应避免干预。”⁶⁷⁾但仍无惩罚欺压中国留学生者的相应措施，只是提醒各军事院校注意此事而已。

63) 《清、韓学生教育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64) 《清、韓学生教育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65) 《成城学校留学生罢运动会》，《湖北学生界》第4期，第119页。

66) 《成城学校学生退学》，《苏报》1903年5月27日；另见《成城学校在学清国留学生に関する新聞記事の件》，《壹大日記》明治36年7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3904500。

同时，日本政府和军部还监视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动静。如前所述，军事院校在教育过程中严密监视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以防止泄密。一旦风吹草动，更是对他们不放心。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1年10月31日，海军次官财部彪致函外务次官石井菊次郎，陈述了在海军炮术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不稳定状态，很多人准备回国参加革命，应谋求对策。⁶⁸⁾ 调查和监控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动向及其相关情报，在中国国内局势不明、国际上列强尚在观望时，成为外务省制定对华政策及留日学生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为窥探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动静，挑拨各派留日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培养尽早掌握中国军政实权的代理人，收买侵华行动的内奸，以及刺探中国军事情报等，或以经济引诱，或许以高官厚禄，千方百计地拉拢和收买部分意志薄弱的中国留日军事学生为其所用。如日军参谋本部极力反对《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中，给予毕业回国留学生千总、把总的地位，认为军事毕业生在日军中所授之职，已与清政府的守备相等，岂可降为千、把总，⁶⁹⁾ 期望留日军事学生能较快获得军政实权，以便利用其在日本留学的特殊关系，获得更大的好处。为此，1911年6月10日，日本外务大臣受海军大臣委托，照会清政府外交部，亲自为谢刚哲等7名留学日本海军学校的毕业生谋求官职，赞扬所有各生品学兼优，“归国以后，甚望该管衙门任以相当之官职，不负其数年勤学，并使研究前途发展之道。不胜盼望之至，请即转达。”⁷⁰⁾ 希望中国海军部能委任他们较高的职位。此外，据留日士官生揭露，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每一期中国留日学生中，都不择手段地收买几名留日学生，“以帝国主义之掩护，予以升官发财之机会，一旦培养功成，则卖国工作即随安富尊荣而倍增矣。”⁷¹⁾ 于是，日本军方或以女色引诱，或以升官发财吸引等方式，诱使部分留日学生为其服务。日本教官、学生则利用与留日学生频频接触的机会，刺探中国情报。某留日士官生曾惭愧地说：“该校上自学生队长，下自区队长，皆素谙中国地理、军事、语言”，“彼辈侦探之资，得自吾人等实多。”⁷²⁾ 既反省本身在留学过程中不慎泄漏情报的愧疚，也反映了日本教官、学生在与留日学生的交往过程中，不少人怀有侦探中国情报的特殊目的。

V. 结 语

近代日本政府和军部从主要接受清政府统一选派军事留学生到民国时期分别接受各派政治军事集团派遣军事留学生，从留学教育中推行防备、保密和限制政策到强化留日军事学生的监管和收买部分军事留学生为其所用，既体现了其希望接受中国留日军事学生以培养亲日势力，又担忧他们成长为潜在威胁的矛盾心态。虽然我们不可否认留日军事教育对促进中国军事近代化的积极作用，但更要认清隐藏其后的根本目的——通过培养留日军事学生，增强日本对华军事影响力和扩大在华权益，并配合其各项对华政策。当然，这种狭隘的留学教育心态终究不利于科学文化技术的交流与发展，更难以实现留学国政府的教育目的。

67) 《清、韓学生教育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4502700。

68) 《清国革命動乱の際在本邦同国留學生の動靜調一件 陸海外の部》，請求番号：3-10-5-1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9) 《东方杂志》 第一年第九期，教育，第215页。

70) 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27页。

71) 《留日士官生退学救国团消息》，《申报》 1931年10月22日。

72) 《留日士官生退学救国团消息》，《申报》 1931年10月22日。

9·18사변 이전 일본의 중국군사유학생 정책에 대한 연구

徐 志 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

〈목 차〉

- I. 머리말
- II. 적극적인 수용과 그 목적
- III. 소극적인 교육과 그 조치
- IV. 이기적인 관리와 그 정책
- V. 맺음말

I. 머리말

근대 중국의 일본유학운동사(留日運動史)에서 군사유학생의 지위와 작용, 영향력에 관한 연구주제는 자못 많은 사람들의 주목을 받아왔다. 그들은 당대 사람들이 선망해 마지않던 높은 경쟁률의 군사과에서 공부했고, 유학에서 돌아온 후에는 많은 이들이 군정계를 장악하고 급변하는 정세를 질타하며 군사 명장이나 한 시대의 효웅으로, 또 당국의 지도자로서 중국근대사의 발전과정에 영향을 미쳤다. 쉬신청(舒新城)은 『근대중국유학사(近代中國留學史)』에서 “20년래 중국 군사계의 중요인물들의 이름 중에 거의 9할을 명치(明治) 20년(1907년) 『진무학교일람(振武學校一覽)』의 학생 명부에서 찾아볼 수 있으니, 중국 군정계에 미친 그들의 영향이 가히 크다.”¹⁾고 지적하면서 일본에서 유학한 군사유학생들이 근대중국의 군정계에서 차지한 위치와 그 영향력을 감개하고 있다.

오늘날 근대중국의 군사유학생이라는 주제는 여전히 중외 학계의 주목을 받고 있다. 이에 객관적인 지식과 명철한 견해가 풍부하게 반영된 일련의 연구 성과들이 발표되었다. 중국학자들의 경우를 살펴보면, 주로 인원수가 비교적 많고 중량급의 정계·군사계 인물들을 배출시킨 사관생 단체를 연구해, 그들과 위안스카이(袁世凱), 운남육군강무당(雲南陸軍講武堂)과의 관계, 사관생 단체의 흥망사와 중국의 군사근대화에 미친 영향을 중점적으로 논하였다.²⁾ 위안칭(元靑)과 왕젠밍(王建明)은 근대중국의 해군유학생의 기본 정황들을 고찰하면서, 해군유학생들이 신해혁명에 적극 참여했던 것과 해군의 근대적 교육훈련과 전략전술의 발전에 미친 영향에 대해 서술하였다.³⁾ 2001년, 진명취안(靳明全)은 “다른 산의 돌로 나의 옥을 갈 수 있다”는 비유를 사용해 『공옥론 : 20세기 초 중국 군사계의 일본 유학생에 관한 연구(功

1) 舒新城, 『近代中國留學史』, 上海: 中華書局, 1927年, 64쪽.

2) 王建华, 「袁世凱与留日士官生」,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 第1期; 吴达德, 「留日士官生与云南陆军讲武堂」, 『自贡师专学报: 综合版』, 1996年 第3期; 郭凤宏, 「留日士官生的兴衰」, 『军事史林』, 2000年 第2·3期; 张瑞安, 『留日士官生与清末民初军事现代化成败』,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2003年.

3) 元靑·王建明, 「近代中国海军留日教育及其影响」,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 第1期.

玉論：關於20世紀期中國軍界留日生的研究』(중경출판사(重慶出版社))를 출판하여, 이들 군사유학생들의 유학 상황, 귀국 후의 활동과 중국 정치·군사 및 중일관계에 미친 영향을 소개하였다. 일본학자들의 경우는 육군사관학교(陸軍士官學校), 성성학교(成城學校)와 진무학교(振武學校) 등 군사대학의 중국유학생들에 주목하면서, 주로 그들의 학습·생활·훈련과 러일전쟁에 대한 태도와 반응을 분석하여 주목할 만한 연구 성과를 얻어냈다.⁴⁾

그러나 근대중국의 군사유학생들에 대한 관련 연구 성과 가운데, 해군유학생과 육군경리학교(陸軍經理學校), 포공학교(炮工學校), 동빈학당(東斌學堂) 등의 군사대학에 다녔던 중국유학생에 관한 논저는 매우 적은 편이다. 더욱이 일본의 중국인 군사유학생에 대한 수용, 교육과 관리정책을 체계적으로 연구한 성과는 보이지 않는다. 이에 본고에서는 9·18사변 이전까지의 일본의 중국군사유학생에 대한 관련 정책을 초보적이거나 검토해보면서, 일본 정부와 군부가 중국군사학생들을 모집하고 교육하는 과정에서 드러난 복잡한 심리상태, 그리고 그들의 목적과 전략, 의도 및 대 중국정책과의 관계에 대해 살펴보고자 한다.

II. 적극적인 수용과 그 목적

일본 정부와 군부가 취한 중국군사유학생에 대한 정책은 청 말부터 9·18사변에 이르기까지 상당한 규모의 조정과 변화를 겪게 된다. 청일전쟁 후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중일관계의 개선이라는 객관적 필요성과 함께 이 기회를 틈타 중국에서의 권익을 확대하기 위한 의도에서, 청 정부로 하여금 일본에 육군유학생을 파견할 것을 적극적으로 권유하게 된다. 반면, 해군유학생을 받아들이는 것에 대해서는 상대적으로 소극적인 태도를 취했다. 북양 시기에는 중국 각지의 군벌, 실력과 단체 및 개인이 파견한 군사유학생들을 각각 받아들이는 한편, 쑨중산(孫中山), 황싱(黃興) 등 혁명파가 일본에 군사대학을 설립해 혁명가들과 망명인사들을 불러들이는 것을 은밀히 후원하였다. 남경정부 성립 후,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유학생들을 각각 받아들였던 기존의 정책을 계속 고수하고, 국민정부가 군사유학생의 선발 파견권을 통일화하려는 교섭을 해오자 핑계를 대고 지연시키다가 거절했다.

청일전쟁 이후의 복잡한 동아시아 국제 정세 속에서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청 정부가 선발하여 파견한 육군유학생을 육성시킴으로써, 쌍방 간의 상호 신뢰를 증진시키고 청일전쟁 이래의 적대적 관계를 개선하려는 동시에 그 기회를 틈타 중국에서의 오랜 권익을 공고히 다지고 자신의 세력을 더욱 확대시키기를 바랐다. 1895년, 러시아는 프랑스·독일 양국과 연합해 일본에 요동반도를 ‘반환’ 할 것을 요구하여 일본이 조선반도와 중국 동북으로 확장하려던 계획을 저지하려 했다. 바로 뒤이어, 영국, 프랑스, 독일 등의 열강들이 잇따라 중국에서 조차지를 강점하고 중국을 자신들의 세력 범위대로 과분하려는 높은 기세를 떨치게 된다. 1896년 6월, 일본 외무차관 고무라 주타로(小村壽太郎)는 중국을 개발하는 것은 여전

4) 田久則,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該校中國留學生』, 『遼寧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2年 第2期; 中村義, 『成城學校與中國人留學生』, 『中國近現代史論集: 菊池貴晴先生追悼論集』, 汲古書院, 1985年; 小林共明,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中國留學生』, 『びとりから』 第6集, 1985年 11月과 『振武學校與留日清國陸軍學生』, 載辛亥革命研究會編, 『中國近現代史論集: 菊池貴晴先生追悼論集』, 汲古書院, 1985年.

히 일본이 중국을 경영하기 위한 가장 긴급한 임무라고 지적하고, 먼저 장즈둥(張之洞), 류쑤이(劉坤一) 등 청 조정의 권신들에 대한 설득 작업을 계획해 그들로 하여금 일본의 군사 고문을 초빙해 임용하고 학생들을 일본에 유학 보내도록 종용했다. 이로써 일본과 청 양국이 공고한 결합 관계를 맺을 수 있도록 하는⁵⁾, 다시 말해, 문화 교육을 통해 중국에서의 장구한 이익을 도모하려는 작업에 착수했던 것이다. 1897년 12월 30일, 일본 참모본부 차장가와카미 소로쿠(川上操六)(다음해 1월에 참모총장으로 승직)는 육군 소좌 우쓰노미야 다로(宇都宮太郎)를 파견해 호광총독(湖廣總督) 장즈둥을 예방하게 하여, “오늘날에는 군비가 가장 중요하다고 하니, 사람들을 일본으로 파견해 군비 및 각종학당에 들어가게 하기를 청하옵니다. 가까워 비용이 절약됩니다. 저 나라는 반드시 그들을 특별대우하고 정성스럽게 가르칠 것입니다.”⁶⁾라고 말하고, 청 정부에 학생들을 일본에 보내 유학하게 할 것을 건의했다. 1898년 1월 18일, 장즈둥은 총리아문에 전보를 보내 보고하길 “일본인이 중국인(華人)에게 일본으로 가 공부하는 것을 힘써 권하고 있으니, 내년 봄에 학생들을 동양으로 파견해 무비농공(武備農工) 각 학당에 입학시키고자 하는 계획을 갖고 있습니다.”⁷⁾라고 보고하고, 일본 측의 요청에 호응하여 일본에 유학을 보내자고 주장했다. 이렇듯 유학이라는 명목으로 미끼를 던져 더 큰 일을 해결하기 위해 속내를 떠 보고 있었던 일본 군부와 중국의 자강자존을 바라던 청 정부 개명파의 요구가 처음으로 결합되기 시작했던 것이다.

주화공사(駐華公使) 야노 후미오(矢野文雄)는 한시의 지체도 없이 1898년 5월 7일에 직접 총리아문(總理衙門)으로 가서, 일본 정부가 중국의 군사유학생을 받고자 하며 관련 교육비용을 제공할 것이라는 초청 사안을 발표했다. 그는 “지금 청 정부가 문무(文武) 전문과목을 개설하고 군비를 변통하기 위해 인재들을 급히 발탁한다는 소식을 들었습니다. 대개 인재를 육성한다는 것은 학생을 교육시키는 데 있으니, 청 정부가 만약 학생들을 일본에 파견하고자 하는 뜻이 있다면 일본 정부는 많은 학생들을 받아들이고 유학에 드는 비용을 제공하여 그들을 교육시키기를 원합니다.”⁸⁾라고 말했다. 14일, 그는 외무대신 니시 도쿠지로(西德二郎)에게 제출한 기밀 보고서에서 중국의 군사유학생들을 모집하는 일의 3대 장점을 다음과 같이 적나라하게 밝혔다. 첫째, 청일전쟁 후 악화된 청일관계를 개선시키고 중국 관민의 신뢰를 얻는 데 도움이 된다는 것이다. 그는 “지금 청의 관민이 내게 가지는 신뢰의 정도 지금보다 열 배 이상 높아질 것”이라고 단언했다. 둘째, 푸젠성(福建省) 내 철도 부설권을 얻어내는 데 도움이 되고, 셋째, 대륙으로 세력을 확장하는 데 도움이 된다고 말했다. 왜냐하면 군사유학생은 “군사에 종사하는 자들로, 일본의 병제를 모방하려 할 뿐 아니라 군용기계 등에 대해서도 우리를 우러러보며, 군관 등으로 임용된 사람들도 장차 일본에서 구하려 들 것이다. 청의 군사의 대부분이 장차 일본화될 것임은 의심할 바 없다.……만약 이렇게 된다면 우리의 세력이 대륙에 미치게 될 것이니 (그것이 어느 정도일지는) 지금은 가늠할 수가 없”⁹⁾기 때문에 적극적으로 중국의 군사유학생들을 받아들여야 한다고 말하면

5) 外務省文書別冊, 『小村外交史』(上), 新聞月鑑社, 1953年, 103쪽.

6) 『张文襄公全集』卷79, 电奏7, 文海出版社, 1970年, 5486쪽.

7) 『张文襄公全集』卷154, 电牒33, 11044쪽.

8) 「清国留学生招聘策」, 『近代史資料』第74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96쪽.

9) 「清国留学生招聘策」, 95~96쪽.

서 일본의 진짜 속내를 솔직하게 털어놓았다.

야노 후미오의 건의는 후임 외무대신 아오키 슈조(青木周藏)에게 긍정적인 평가를 받았다. 1899년 2월 17일, 아오키 외무대신은 주영공사(駐英公使) 가토 다카아키(加藤高明)에게 서신을 보내, “야노 공사의 협상 취지에 근거해, 제국정부는 청국이 파견한 무관 학생들을 즉시 받아들이고 훈련시킬 것이다. 이러한 취지를 남북의 양 통상대신 및 호광총독에게 통지하고, 즉시 청국에 학생들을 파견할 것을 요청하라.”¹⁰⁾고 지시하면서, 일본 정부가 기꺼이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을 수용할 것이라는 태도를 표했다. 무술정변 후, 일본 정부는 직접 청 정부가 기존의 유학생 정책을 계속 집행할 것이라는 승낙을 얻어내고,¹¹⁾ 장즈둥에게 이전에 일본과 100명을 군사학교 및 보통학교에 파견해 유학을 보낸다고 했던 계획에 도달할 수 있을 방법을 마련하도록 했다.¹²⁾ 1899년 1월 13일, 아오키 슈조는 육군대신 가쓰라 다로(桂太郞)에게 서한을 보내, “청국의 호광총독 장즈둥이 본국에 중국의 무관유학생 20명을 파견한다는 뜻을 담아 이미 이번 달 10일에 기밀에 붙여 보낸 제1호와 각서들을 잇따라 보내왔다. 남양대신은 중국 정부의 명령을 받들어 전술한 결의를 집행하여 무관유학생들을 파견할 것을 결정했다. 후베이(湖北) 및 난징(南京)에서 파견된 중국인 유학생 총 33명이 내일(14일) 상하이(上海)에서 살마환(薩摩丸)을 타고 고베(神戸)를 향해 출발할 것이다. 상하이의 오다 기리(小田切) 대리총영사가 전보를 보내, 전술한 각서에 따라 이 유학생들이 상륙한 후 그 군사 학습에 편의를 제공하게 할 것을 요청해왔다.”¹³⁾고 통보하고, 육군성의 동의를 얻었다.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적극적인 수용 정책을 취하여 군대를 정비하고 무력을 강화시켜 민족을 생사존망의 위기에서 구하고자 했던 중국청년학생들을 최대한 유인해냈고, 이에 많은 사람들이 계속해서 군사과를 선택했다. 청 정부는 자비 유학생들의 군사 학습이 자칫 통치에 위협을 줄 것을 우려하여 “군비 과목은 관에서 파견한 학생 이외에는 추천을 불허한다.”¹⁴⁾고 규정하였으나, 일본으로 간 유학생들의 ‘군사열’은 곧 이러한 청 정부의 제한에 타격을 주었다. 1902년 7월, 주일공사 차이쥔(蔡鈞)이 성성학교에 입학하려 했던 9명의 자비유학생들에 대한 추천을 거절한 일로 인해 중국유학생들이 주일공사관을 포위하는 사건이 발생했던 것이다.

성성학교 입학사건이 발생한 후 일본 군부는 러일전쟁 이전에 청 정부의 노여움을 사는 것을 원치 않아, 청 정부의 신임 공사 양수(陽樞)와 협의하여 청국 군사유학생들의 예비교육을 전문적으로 담당하는 기구인 진무학교를 세웠다. 1903년 7월, 일본 군부는 도쿄(東京) 우시고메 카사이마치(牛込河西町)에 진무학교를 세워 성성학교의 학생 전체를 이 학교로 옮겼다. 또한, 진무학교에 입학 신청을 한 모든 사람들은 반드시 16세 이상의 연령이 되어야 하고, 적절한 학력을 갖추어야 하며, 청 정부가 파견한 주동경유학생총감독(駐東京留學生總監督)이 청국 각 성의 책임관리의 공문, 주경유일학생총감독(駐京留日學生總監督)의 보증서, 학생이 일본에 오기 전후의 이력 및 입학 신청서를 청국학생감리위원장(淸國學生監

10) 小林共明, 「初期の中国対日留学生派遣について：戊戌政変期を中心として」, 『辛亥革命研究』 第4集, 1984년 5월, 8~9쪽.

11) 任达著·李仲贤译,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 1898~1912』,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년, 56쪽.

12) 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国秘録』, 原書房, 1977년, 45~46쪽.

13) 「淸国留学生に関する件」, 『壹大日記』明治32年,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3568400.

14) 『张文襄公全集』卷61, 奏議61, 4180쪽.

理委員長)에게 제출하고¹⁵⁾ 합격 여부를 심사한 후에 입학할 허가한다고 규정했다. 이에 따라, 1904년 5월 19일, 청 정부는 「선발과견한 육군학생의 분반유학장정」을 제정해, 군사를 공부하고자 하는 학생들은 반드시 먼저 각 성의 독무(督撫)가 연병처(練兵處)에 공문을 보내 연병처의 선발 시험을 거친 후에 파견될 수 있다고 규정하여¹⁶⁾ 국내의 자비생들이 일본으로 가 군사를 배우는 길을 차단해버렸다.

육군대신 데라우치 마사타케(寺內正毅)와 일부 군관들은 암암리에 데라오 토오루(寺尾亨) 박사가 사립군사학교인 동빈학당을 창설하는 것을 격려하고 지원했다.¹⁷⁾ 이를 통해 진무학교 입학을 거절당했으나 혁명사상을 품고 군사를 배우고자 하는 중국의 자비 유학생들을 전문적으로 수용해 그곳에서 반청혁명 인사와 친일적인 군사인재들을 육성할 수 있었다. 동시에 자비생이 군사학교에 다니는 문제도 해결할 수 있게 된 셈이었다. 이처럼 일본 정부는 공식적으로는 협의에 의해 청 정부의 선발을 거쳐 파견된 관비 육군유학생들을 받아들인다고 했지만 실제 집행 과정에서는 반드시 그렇게 하지는 않았던 것이다.

이렇게 중국의 육군유학생들을 적극적으로 받아들인 것에 비해, 일본 해군성은 중국 해군에 대해 여전히 경계심을 품고 해군유학생들을 받아들이기를 꺼려했다. 그러다 1905년에 일본 해군이 강대한 러시아 함대를 격파하고서야 억지로 소수의 중국 해군학생들의 유학을 받아들여지게 된다.¹⁸⁾ 1905년, 청 정부는 기관사 졸업생 핑세천(封燮臣), 왕샤오무(王孝慕), 이청청(李承曾), 후쓰하오(胡思浩), 비권첸(薛君謙) 등 5명을 일본에 선발 파견해 신식 기로(機爐) 제조기술을 배우도록 했는데¹⁹⁾ 이것이 근대 중국에서 일본에 파견한 해군유학생의 시작이었다. 이후 1906년에서 1909년 여름까지, 청 정부는 계속해서 해군유학생 100여 명을 파견했다.²⁰⁾ 이처럼 청 말에 일본으로 간 해군유학생의 수가 매우 적었던 현상은 민국시기에도 크게 변하지 않았고 그 수가 오히려 점차 더 적어졌다. 통계에 따르면, 북양정부 해군부는 1914, 1918, 1920, 1925년에 각각 25, 4, 6, 4명 총 39명의 해군유학생을 일본에 파견했다. 남경정부는 9·18사변 전까지 단지 8명의 해군유학생을 보내는 데 그쳤다.²¹⁾ 이렇게 중국 정부가 1931년 이전까지 일본에 해군유학생으로 파견한 총 인원은 200명을 채 넘기기 어렵다.

민국시기,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중국 내란의 기회를 틈타 중앙정부가 선발하여 파견한 군사유학생들을 받아들였던 관례를 깨고 중국의 각 세력들이 보낸 학생들도 받기 시작했다. 2차혁명이 실패한 후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북양정부가 파견한 군사유학생을 받아들이는 동시에, 쑨중산, 황싱 등 혁명가들이 일본에서 군사학교를 설립하는 것을 암암리에 협조해 대규모의 유학생들과 혁명청년들을 혁명 인재로 육성시킬 수 있도록 했다. 1913년 12월 1일, 쑨중산 등은 도쿄 교외에 전문적으로 군사교육을 담당하는 학교를 창설하였는데, 이 학교의 군사교육을 담당하던 이들은 주로 일본의 예비역 군인들로 채워졌다. 그 중에는 예비역

15) 実藤惠秀,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1981年, 70~71쪽.

16) 『約章成案匯覽』乙篇, 卷三十二上, “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 北洋洋务局, 光緒31年, 46~52쪽.

17) 「東斌学堂設立に関する件」, 『壹大日記』明治38年,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4047800.

18) 黄福庆, 『清末留日学生』,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75年, 43~44쪽.

19) 姜鸣,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 三联书店, 1994年, 261쪽.

20) 黄福庆, 『清末留日学生』, 45쪽.

21) 杨志本,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上)』, 海洋出版社, 1987, 418쪽; 陈书麟·陈贞寿, 『中华民国海军通史』, 海潮出版社, 1993, 308~309쪽.

기병대위 아오야기 카츄토시(靑柳勝敏), 이체노세 오노타로(一瀬斧太郎), 예비역 부병대위 나카무라 마타오(中村又雄), 중위 스기야마 료사이(杉山良哉), 예비역 경중특무조장 몬마 후쿠노신(門馬福之進), 예비역 포병특무조장 가니 고로사부로(可兒五三郎), 에쿠치 료자부로(江口郎三郎), 우나바라 히로후미(海原宏文), 니시가와 도쿠사부로(西川徳三郎) 등의 일본 군 군관들이 포함되었다.²²⁾ 강의 과목으로는 전술학, 응용전투, 야외요무령(野外要務令), 병기학, 축성학, 지형학, 교통학 등을 가르쳤고, 실기 과목으로는 체육, 유도, 검술이 있었다. 그밖에 일본어와 경제학 수업도 있었다. 일본 정부는 간섭을 하지 않았던 것이 아니라 오히려 육군대학의 교관을 그 학교로 보내 의무 교과를 맡겼다.

위안스카이가 죽은 후 중국 각지에서 활거한 군벌들의 혼전이 더욱 격화되었다. 마찬가지로 군사유학생들은 자신들을 파견한 정치 군사 집단들이나 자금을 지원한 자가 서로 달라, 각자 파벌을 형성하고 알력 다툼을 했다. 하지만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각파 군벌들이 선발해 보낸 이들 군사유학생들을 흔쾌히 받아들였고, 이들 중국유학생들의 내분을 부추겨 중국 국내의 군벌 혼전 양상을 더욱 악화시켰다. 1926년 일본으로 건너가 동북 지역 유학생들의 재무를 관리했던 징여우옌(荊有岩)은 “당시 일본의 중국 유학생은 3대 파벌로 나뉘었다. 첫째는, 동택구락부(同澤俱樂部)를 대표로 하는 봉계(奉系) 군정 및 자비유학생으로, 비교적 단결력이 있었다. 다음으로 장제스(蔣介石)의 국민당 파벌로, 도쿄 닛타구(新田區)의 중국청년회를 거점으로 삼았고, 인원수는 많았지만 분산적이었다. 셋째로, 평위샹(馮玉祥) 국민군파벌이었다.”²³⁾라고 회고하였다. 세 파벌 간의 대립과 투쟁은 실로 중국 국내에서 벌어지고 있던 혼전 양상이 일본에서 이어진 셈이었다. 1926년 초, 장쉐량(張學良)은 한 무리의 군인유학생들의 파견을 준비하면서, “일본 고문 반자이 리하치로(坂西利八郎)와 연락했고 오쿠라 기하치로(大倉喜八郎)의 지지를 얻었으니, 오래지 않아 일본 육군성의 동의가 얻게 될 것이다. 이번 처리 속도는 빨랐고 또 정원에 제한을 받지 않았다.”²⁴⁾면서 높은 정치적 열정을 표현했다. 주상해영사관의 시게토(重藤) 중좌는 마바이위안(馬伯援)이 1927년 10월 31일에 평위샹이 파견한 유학생 37명, 탕성즈(唐生智)가 파견한 유학생 17명, 양썬(楊森)이 파견한 유학생 3명을 인솔한 무리가 상하이에서 출발해 일본에 도착할 것이라는 소식을 듣고는,²⁵⁾ 즉시 참모차장에게 보고하여 시간에 맞춰 그들을 맞이하라고 요청했다. 이처럼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중국 각지의 실력파가 파견한 유학생들에게 적극적인 관심을 표하면서 이들을 수용했다. 그 목적은 바로 징여우옌이 “한편으로는 일본의 영향력을 확대하고, 또 한편으로는 중국 군벌의 내분을 더욱 부추기고자 하는 데에 있었다.”²⁶⁾고 지적인 바와 같았다. 다시 말해, 일본은 중국의 분열할거와 혼전, 내란의 국면을 조성하여 그 혼란한 틈을 타 자신의 이익을 꾀하려 한 것이었다.

1928년 말, 장제스는 전국을 통일한 후 한편으로는 군대 편제, 군권 통일 작업에 착수하고 그 일환으로 군사유학생들의 파견권을 통일시켜 다른 군벌들의 세력을 약화시키고자 했

22) 俞辛焞等编译, 『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年, 628~629쪽.

23) 荊有岩, 「奉系派遣军事留学生简介」, 『辽宁文史资料』第六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年, 84쪽.

24) 荊有岩, 「奉系派遣军事留学生简介」, 84쪽.

25) 「馮玉祥派遣留日学生」, 『在本邦中国留学生関係雑件』,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4011358000.

26) 荊有岩, 「奉系派遣军事留学生简介」, 84쪽.

다. 또한 일본의 충동으로 야기된 잠복해 있던 내전의 폐해를 없애고자 곧 주일공사 왕룽바오(汪榮寶)에게, 일본 정부와 군사유학생 파견권을 통일시키는 문제를 교섭하라고 명령했다. 1928년 12월 15일, 주일공사 왕룽바오는 외무대신 다나카 기이치(田中義一)에게 서한을 보내 “저희나라가 귀국에 육군학생을 유학 보내던 것은 종래 공사관이 파견하던 것이었는데, 요 몇 해 사이 방법이 일치되지 않아 각 성의 행정장관, 각 군의 군장들이 직접 파견하거나 개인이 직접 일본외무성, 육군성 참모본부에 보고하는 사례도 발생하고 있습니다. 이러한 행위들은 직권의 통일을 해치니, 이런 까닭으로 대신에게 서신을 보내, 이후 육해공군에 지원하고자 하는 모든 학생들은 일률적으로 공사관의 보증 추천을 거쳐야 비로소 시험에 응시할 수 있도록 통일시켜 어긋남을 면하도록, 육군성 참모본부에 공문을 보내는 번거로움을 청하는 것입니다.” 라고 설명했다.²⁷⁾ 다시 말해, 그는 일본외무성이 육군참모본부와의 협상을 통해 이후 일본의 육해군학교에 입학하려는 중국 학생들은 반드시 일률적으로 중국주일공사관의 보증과 추천을 거쳐야 한다고 규정해 일본으로의 군사유학생들의 파견권을 통일시킬 것을 요청했던 것이다.

하지만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왕룽바오의 외교 문서를 전혀 거들떠보지도 않은 채 중국정부의 규정을 준수하지 않은 입학 응시자들을 받아들였다. 왕룽바오 공사는 뒤이어 1928년 12월 27일과 1929년 1월 15일, 2월 9일, 11월 29일 등 여러 번 일본 외무대신에 외교문서를 보내 육군성이 공사관의 정식 공문이 없는 자를 모집하는 것을 중지해 달라는 요청서를 전달했다. 또한 일본 정부가 「육군사관학교 입학희망자 준칙」의 제1조 제3항 및 제3조를 고쳐줄 것을 요구했다. 왜냐하면 이 「육군사관학교 입학희망자 준칙」의 제1조 제3항은 “중화민국 중앙정부나 독판성장 및 동등 이상의 지위를 가진 지방관헌 등이 추천한 자”를 모집한다고 규정되어 있었고, 제3조에는 “본국에 주재하고 있는 민국공사관으로부터 전술한 문건(추천자료—필자 주)을 제출받는 것이 불편하면 이용하기 편리한 지방의 영사관을 통해 일본 외무성에 제출할 수 있다”²⁸⁾고 규정하고 있었기 때문이다. 이러한 규정은 국민정부가 군사유학생 파견권을 통일하려는 의도와 명확히 저촉되는 것이었기 때문에 일본 정부에게 이 두 곳의 규정을 수정해 줄 것을 요청한 것이었다.

일본외무성은 왕 공사의 여러 차례의 독촉을 받은 끝에 이 문제의 처리에 대한 의견을 육군성에 자문했다. 1929년 1월 22일, 외무차관 요시다 기세루(吉田茂)는 육군차관 아베 노부유키(阿部信行)에게 「중국육해공군 파견유학생의 입학수속에 관한 문건」을 보내 왕룽바오의 요구 사항을 통보하고 군 측의 대응 의견을 자문했다. 2월 12일, 아베 육군차관은 요시다 외무차관에게 회답을 보내 중국 정부에게 일본군의 입장을 전달해 줄 것을 요청했다. 그 내용은, “중국의 무관이나 학생들의 학습을 위해 청조 때에 응한 것은 청 정부가 선발해 파견한 자만을 받아 우리 육군군대나 학교에 입학시키는 것이었습니다. 그런데 민국 이후 중국의 정세에 큰 변화가 생겨 전술한 절차를 집행할 수 없게 되었습니다. 중국의 지방장관이 학생들을 일본에 파견해 유학을 보내고자 희망했고, 이에 일본이 지방장관이 파견한

27)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學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 『大日記甲輯昭和06年』,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1001226700.

28)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學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1001226700

자들을 받아들이겠다고 답하고 수학을 허용하는 특례를 만들었던 것이 오늘날 이미 10여 년이라는 오랜 기간 동안 실행되어 모든 사람들이 알고 있는 관례가 되었던 것입니다. 우리 육군은 소화 4년(1929년)의 육군사관학교 입학신청자에 대해 전술한 관례대로 집행하는 것을 거절할 수 없었습니다. 그러나 유학생의 선발과 파견 절차를 통일하려는 것에 대한 제국 육군과 왕 공사의 희망은 일치된 것으로, 이후 선발 파견의 수속 및 기타 사항들을 수정하기 위한 검토에 착수할 것입니다.”²⁹⁾라는 것이었다. 다시 말해, 일본 군부는 중국의 지방장관이 파견한 육군유학생을 받아들이는 것이 이미 관례가 되어 그것을 변경하는 것이 여의치 않다는 것을 이유로 중국공사관이 제출한 선발파견권의 통일 요구를 거절했던 것이다. 같은 해 12월 21일, 아베 육군차관은 재차 요시다 외무차관에게 서한을 보내 “이렇게 급하게 수정을 하는 것은 매우 곤란한 일입니다. 제국 육군은 소화 5년도(1930년)에 이미 실행되어오던 관례를 시행하지 못하게 할 수는 없고, 내년에 현행 제도를 임시로 시행하고자 합니다. (이렇게 하면) 중국 정국의 변화를 관망할 수 있는 동시에 중국공사에게 지금 절차 수정을 검토하고 있다고 알릴 수 있을 것입니다.”³⁰⁾라고 말했다. 이처럼 일본은 이 문제를 거짓말로 대강 얼버무려 처리하려고 하면서 재차 국민정부의 수정 요구를 거절했다.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각 지방의 군정장관과 실력과 인사들이 파견한 군사유학생을 계속 받았다. 이것은 앞서 언급했던 것처럼 지방 군정 관리들의 요구이자 일본군 측의 고심이 반영된 결과로, 그 실질적인 목적은 중국 군관의 학습을 편하게 하기 위한 것이거나 오랫동안 이미 실행되어 온 관례를 그대로 유지시키려는 데 있었던 것이 아니었다. 일본 측은 각 파의 군사유학생들을 받아들임으로써 중국 각지의 군벌세력과의 연계를 공고히 다지고 중국 지방이 중앙에 대항하는 할거 국면을 조성하는 가운데, 기회를 틈타 각 파벌을 끌어들이고 일본에 의존하게 만들어 일본의 중국 침략 정책의 도구와 괴뢰로 만들고자 했다. 바로 이 때문에 국민정부가 여러 차례 외교문서를 보내 교섭을 시도했으나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들은 체 만 체 하면서 기존의 모집 방안을 결코 포기하지 않았던 것이다.

III. 소극적인 교육과 그 조치

근대 일본은 부국강병 정책을 통해 대외 침략의 길로 나아갔고, 국제 경쟁에서 군사가 갖는 중요성을 잘 알고 있었다.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중국군사유학생의 양성을 통해 중일관계를 개선하고 이것을 빌미로 중국에서의 권익을 확대시키고자 했지만, 동시에 일본의 군사기술과 이론을 배운 중국 유학생들이 일본의 대륙 확장에 잠재적인 위협 세력이 되어 중국에서의 특권과 중국을 독패하려는 음모를 위태롭게 할 것을 염려했다. 그리하여 일본은 교육 과정에서 교육보조비를 더 징수하고, 지식 봉쇄와 보안 유지를 위해 고등군사교육을 받는 것을 제한하는 등의 차별 정책을 시행했다. 그 때문에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이 진정한 그리고 완전한 근대적 군사기술과 선진적인 군사이론을 배우는 데에는 어려움이 따랐고, 많

29)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學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1001226700

30)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學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1001226700

은 유학생들이 이것을 분개하며 귀국하기도 했다.

일본의 군사학교와 연대에서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이 배웠던 주요 내용은 크게 실기과목과 이론과목으로 나뉘었다. 실기과목은 야외연습, 사격, 총검술, 기계체육과 부대조련이 포함되었고, 그중에서 부대조련은 또 분대·소대·중대조련으로 구분되었다. 이론과목에는 조전(操典), 사격교범, 육군예식, 군대내무서 등이 있었다.³¹⁾ 군사유학생들은 군대나 사관학교에 있을 동안 각각 연대장이나 사관학교 교장으로부터 부대 혹은 학교에서의 학업 성적을 기록받고 육군대신에게 보고해야 했다. 사실상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은 이러한 신식의 군사기술과 이론의 학습을 통해 새로운 지식을 접하면서 시야를 넓힐 수 있었고, 귀국 후에 근대 중국의 군사개혁을 추진시키고 군사교육과 훈련의 발전을 촉진시켰던 것이 사실이다.

그러나 일본의 군사학교가 청 정부가 파견한 군사유학생들을 받아들일 때 교관 수당이나 기타 명목으로 그 형태를 바꾸어 교육보조비를 징수했던 것은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에게 좋지 않은 인상을 남겼고, 일본유학교육의 긍정적 영향력을 제한시켰다. 청 정부는 1904년에 공포한 「선발 파견한 육군학생의 분반유학 장정」에서 “진무학교의 교원은 반드시 중국이 그 수당을 조달해야 한다. 나머지 학교들의 교원은 모든 반의 학생들이 졸업한 후 중국이 격려금을 줘야 한다. 그 수당의 금액 및 장려 조항은 반드시 주일대신이 일본의 관리와 협의해 처리해야 한다”고 규정하였는데, 이는 청 정부가 반드시 일본 교관의 수당을 지불해야 했던 사실을 알려준다.³²⁾ 분명히 일본군 측에서도 청 정부가 수당을 지급한다는 명목이 듣기 좋지는 않았을 것이고 다른 명칭으로 대체하기를 바랐을 것이나³³⁾ 결코 그 자금을 취소시키지는 않았다. 1909년 6월, 일본 군부가 반포한 「청국육군학생 관리규정」에 따르면, 육군사관학교와 헌병연습소에 입학한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은 “피복비……는 육군급여령 제8표 피복비의 월액에 근거하여 50%를 증가시키고, ……양식의……구매비는 육군급여령 제9표에 의거해 50%를 더한 것을 정액으로 삼고……연료비는……는 육군급여령 세칙 제12표의 두 배 금액으로 한다.……군사 훈련에는 특별비용을 지불해야 한다.”³⁴⁾고 규정되어 있었다. 오로지 도서 및 기타 특별응급과 물품의 물건 값만이 실제 비용으로 지불되었고, 다른 많은 항목들은 값을 올려 징수되어 일본 학생들이 내는 돈보다 2분의 1 내지 1배가 높았다. 그 밖에, 중국 군사유학생들이 훈련할 때 필요한 “무기 탄약 기구 재료 및 말은 각 부대의 정액 내에서 빌려주거나 지급하고, 주택은 반드시 본국의 사관후보생과 같은 장소에서 대여해야 하며, 침대와 침구는 여비품 중에서 대여해야 했고”³⁵⁾ 이에 상응하는 차용 비용을 따로 지불해야 했다. 그중 진영 내 용구의 차용비는 육군급여령 세칙 제15표의 월액을 정액으로 하고, 탕약비와 병기 수리 수속 등에 필요한 비용의 지불 방법은 1년 지원병이 사용하는 새로운 방법을 표준으로 삼았다.³⁶⁾ 이러한 ‘값을 빌려 알을 낳게 하는’ 식의 유학교

31) 「清国陸軍学生入隊並入校の件」, 『壹大日記』明治36年12月,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3939900.

32) 이 보장에 대한 상세한 내용은 『約章成案匯覽』乙篇, 卷32上, 北洋洋務局 光緒31年, 46~52쪽을 참고.

33) 『東方雑誌』第一年 第九期, 教育, 215쪽.

34) 「清・韓学生教育の件」, 『壹大日記』明治42年6月,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4502700.

35) 「清国陸軍学生入隊並入校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3939900.

36) 「清, 韓学生教育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레ファレン스코드: C04014502700.

육정책으로는 예기한 교육효과를 얻기 어려웠을 뿐 아니라 진정한 중일문화교류에도 도움이 되지 못했다.

일본 정부와 군은 중국군사유학생에 대해 고도의 경계심을 유지하고, 중국 군대가 잠재적인 위협이 될 것을 두려워하여 교육 중에 곳곳에 방어진을 쳤으니, 잘난 체하는 것 같으면서도 자신이 없는 듯 보였다. 일본 군부가 수용했던 청 정부로부터 파견된 육군유학생들은 크게 네 범주가 있었는데, 각 병과(兵科) 유학생, 헌병 유학생, 경리부 유학생, 육지측량사(陸地測量士) 유학생이 그것이었다. 그중 육지측량사 유학생은 매년 12월 육지측량부수기소(陸地測量部修技所)에 입학해 3년 기간의 육지측량사 필수 교육을 받았고, 경리부 유학생은 매년 9월 1일에 육군경리학교에 입학해 1년 9개월의 경리부 장교 교육을 받았는데, 이 두 종류의 유학생들은 각각 사관학교, 헌병연습소에 들어가 1년 반의 학교교육을 받아야 했다.³⁷⁾ 사관학교 유학생들의 교육을 예로 들면, 그들은 먼저 성성학교(1903년에 진무학교가 됨)에 들어가 15개월(후에 3년으로 늘어남)의 예비 군사교육을 받은 후 연대로 배치되어 반 년 동안 실습했고, 실습이 끝난 후 다수는 중하급 군관을 양성하는 육군사관학교에 진학했다. 반면, 사관학교 졸업 후 중고급 군관을 육성하는 육군대학에 진학할 수 있는 자는 극히 적었다. 이는 바로 중국의 육군유학생들이 일본에서 받은 교육은 기본적으로 초급·중급 군사교육이었으며 극소수만이 고등 군사교육을 받았음을 의미한다.

일본 군대와 학교는 중국인 육군유학생들을 교육시키는 과정에서 종종 중요한 군사 수업을 취소시키거나 중국과 관련된 문제에 맞닥트리면 ‘퇴학’을 요구했다. 1903년 12월, 일본 군부가 반포한 「청국육군학생 재대기간 관리준칙」 제2조에는 “군사기밀사항에 속하는 것은 각 부대장들이 그것을 가늠하여 취소시킬 수 있다”³⁸⁾고 규정하여, 각 부대가 중국 유학생에 대해 군사기밀에 속하는 내용의 수업을 취소할 수 있음을 명문화하여 공포했다. 1909년 6월, 일본 군부가 반포한 「청국육군학생관리규정」의 ‘부칙’에는 “① 학생에게 군사기밀사항을 가르쳐서는 안된다. ② 학생에게 가르치는 내용이 군사기밀사항과 관련될 때에는 반드시 연대장이나 학교장으로부터 그 정도와 세부사항을 확정 받고 주임장교의 지시를 구해야 한다.”³⁹⁾라고 규정하여 엄격한 교학 안보제도를 만들었다. 본래 사관학교에서는 중국학생과 일본학생이 같은 교실에서 수업을 받았는데, 1904년 제3기 중국학생인 장바이리(蔣百里)가 보병과 1등으로 시험에 합격하여 천황으로부터 친히 칼을 하사받는 일이 발생했다. 이 일은 일본 사관학교 지도자들을 매우 곤혹스럽게 만들었고 또 많은 일본 동학들을 근심스럽게 했다. 그 결과, 4기부터는 중국인과 일본인을 분리해 수업을 받게 해 중국 학생이 다시는 일등을 빼앗지 못하도록 조치되었다.⁴⁰⁾ 일본 군부는 또한 중국 유학생들이 호산군사학교(戶山軍事學校), 포공학교(炮工學校), 기병실시학교(騎兵實施學校), 야전포병사격학교(野戰炮兵射擊學校), 육군대학(陸軍大學)에 입학하는 것을 제한시키고, 중국인이 전문고등 군사기술과 군사이론을 장악하지 못하도록 했다. 후에 주일공사와 일본 정부 간의 몇 차례

37) 「清, 韓學生教育の件」, 아시아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레ファ런스코드: C04014502700.

38) 「清國陸軍學生入隊並入校の件」, 아시아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레ファ런스코드: C04013939900.

39) 「清, 韓學生教育の件」, 아시아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레ファ런스코드: C04014502700.

40) 陶菊隱, 『蔣百里傳』,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年, 10쪽;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5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1. volume1, 313쪽.

의 교섭을 거쳐, 일본 군부 측은 개별 고등군사학교에서 소수의 중국 군사유학생을 받아들이는 것에 동의했다. 하지만 강의 중에 일본 군대의 기밀 사항을 다룰 때에는 중국 학생들로 하여금 일률적으로 강의를 듣지 못하도록 하거나 잠시 교실에서 나가있어야 한다는 점도 약속했다.⁴¹⁾ 이에 의거해, 1910년부터 청국 육군부는 매년 6명을 호산학교에, 6명을 포공학교에, 3명을 기병실시학교에, 또 3명을 야전포병사격학교에 입학시켜 공부할 수 있도록 했다. 그러나 청조가 멸망한 후에는 해당 협의 또한 종적 없이 사라졌다.⁴²⁾ 이 때 제1기 학생들조차 아직 졸업하지 못했다는 사실에서 잘 드러나듯이 청 말의 육군유학생들은 대부분 완비된 고등군사교육을 받지 못했다.

또한 일본 군부는 군사 기밀이 새어 나가는 것을 방지하기 위해 각 사단장에게 소속 부대 군관들에게 훈령하여 중국유학생들에 대한 감독을 더욱 강화시킬 것을 명령했다. 1909년 4월 22일, 일본 육군성 군사과는 「각 사단장의 내훈안」을 발표하면서 두 가지의 평계거리를 찾았다. 첫째로 청국군 측이 일본 군대와 학교에 유학한 학생들이 일본군의 군사 기밀을 정탐하는 것을 장려하고 있다는 것이고, 둘째, 제9사단의 모 청국 유학생이 그 소속부대가 보관하고 있던 기밀도서 여러 권을 훔쳐 본국에 가지고 돌아가려고 기도했다는 것이다. 그리하여 각 사단장은 산하의 각 대장들에게 책임지고 “자각적으로 경계를 강화하고, 청국 유학생에 대해 엄격한 태도를 유지하며, 유학생이 그들과 친밀해 지지 못하도록 하라. 각별히 교육에 경계와 신중을 기하고, 그 일상생활과 행동들을 감시하며, 어떠한 군사 기밀도 정탐하지 못하도록 하라.”⁴³⁾고 강조했다. 중국 학생들은 이러한 환경 속에서 선진적인 군사 기술과 이론을 배우기가 어려웠을 뿐만 아니라 철저한 감시 속에서 인신 활동의 자유를 제한받았다. 「청국육군학생 관리규정」 제16조의 규정에 따르면, “학생 중에 부상이나 질병으로 병원에 입원해야 하는 자는 반드시 위술의원(衛戍醫院)에 가서 치료받아야 한다.”⁴⁴⁾고 규정하여 있었는데, 아파서 병을 치료하는 일도 반드시 지정된 병원에서만 가능하게 했다.

청일해전 때에 일본해군의 전적이 뚜렷하지 않았던 것에 더해, 원래부터 중국 해군에 대해 가지고 있던 경계와 적시는 일본이 중국의 해군유학생을 받아들이는 것을 더욱 자신 없게 만들었다. 그에 따라 입학자격 조건을 너무 지나치게 높게 설정하는 방식으로 그것을 제한하고자 했다. 장즈둥이 한커우(漢口)영사를 통해 일본 정부에 여러 차례 수용 의사를 타진하자 해군성은 어쩔 수 없이 극소수의 해군 유학생을 받아들이는 데 동의하고, 반드시 먼저 통신성(通信省) 관할 하의 상선학교(商船學校)에서 일반 교육을 받은 후에 해군성 관할 연습소에 들어가 전문 교육을 받을 수 있도록 조치했다.⁴⁵⁾ 1909년에 반포된 「제국해군의 청국학생교육규정」과 「청국학생관리규정」⁴⁶⁾에는 이미 해군지식이나 기술을 가지고 있는지 여부에 관계없이, 청국의 해군유학생들은 모두 일련의 번거로운 단계들을 통과해야

41) 興亜院政務部, 『日本留学中華人名調』, 東京, 1940年, 707~715쪽.

42) 黄福庆, 『清末留日学生』, 40~41쪽.

43) 「第5号 軍事課 清国陸軍学生取締に関する件」, 『壹大日記』 明治42年,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3022955900.

44) 「清, 韓学生教育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4502700.

45) 「清国海軍留學生商船學校へ入校に関する件」, 『在本邦清国留學生關係雜纂 海軍學生之部』第2冊, 請求番号: 3-10-5-3-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6) 「帝国海軍に於ける清国学生教育規定」·「清国学生取扱規定」, 『在本邦清国留學生留學生關係雜纂 海軍學生之部』第2冊, 請求番号: 3-10-5-3-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비로소 군함에 올라 현장 훈련을 받을 수 있도록 규정해 놓았다. 먼저, 해군성은 상선학교를 졸업한 청국 학생들을 항해과와 기관과로 나눈다. 다음으로, 항해과와 기관과의 유학생은 각각 해군포술학교(海軍炮術學校), 해군공기학교(海軍工機學校)에서 반년의 기술교육을 받는다. 다시 이들 유학생들은 해군포술학교에 모여 일정한 기간의 총대(사격훈련)교육을 받고 해군소위후보생이나 해군기관후보생의 자격을 얻는다. 마지막으로, 비로소 군함에 올라 반년 간의 현장 훈련을 할 수 있었다. 그러나 이렇게 규정되어 있었다고 하더라도, 종종 승함 훈련 과정에서 청국의 해군학생들을 차별시켜 실용지식과 기술을 배울 수 없도록 하는 일이 발생했다. 이 때문에 많은 해군학생들이 일본으로 유학을 가지 않으려 하거나 입학한 후에 자발적으로 퇴학하는 일이 발생하기도 했다. 예를 들어, 1908년에 입학한 61명 중 퇴학한 자는 36명⁴⁷⁾으로 퇴학률이 거의 60%에 달했다. 이로 인해 1905년 5, 6월부터 해군유학생을 일본에 파견하기 시작했던 청 정부는 1909년 여름, 주일공사 후웨이더(胡惟德)로 하여금 일본 정부를 조회하게 해, 각 성이 선발한 해군 학생 합격자가 너무 적다는 것을 이유로 내년부터는 학생들을 파견하지 않겠다는 뜻을 전달했다.⁴⁸⁾ 다시 말해 청 정부가 적극적으로 일본에 해군유학생을 파견하는 것을 중단한다는 의사를 밝혔던 것이다. 일본 해군성이 해군유학생들에게 요구한 가혹한 조건들은 중국인들로 하여금 ‘곤란한 것을 알고 물러서게’끔 했던 것이다.

영국 『타임즈(The Times)』 베이징 주재기자이자 위안스카이의 정치 고문이었던 모리스(G. E. Morrison)은 1916년에 일본 정부의 중국 유학생 교육에 대해, “중국인이 일본에서 받은 교육은 차별적이다. 중국인들을 바깥 세계와 접촉하지 못하고 하고, 대개는 그들을 격리시키고 있다고 말할 수 있다. 그들에게 가르치는 지식도, 더욱이 군사학교의 경우, 일본인에게 가르치는 것과 실질적으로 너무도 다르다.”⁴⁹⁾라고 평론했다. 이러한 그의 지적은, 일본 군사학교의 중국 유학생들에 대한 엄격한 지식 봉쇄와 학업 제한으로 많은 중국 유학생들이 일본에서 진짜 유용한 지식을 배우지 못했거나 소용없는 것들을 배워야 했던 상황을 잘 반영하고 있다.

1927년 1월 3일, 일본 사관학교의 중국 유학생들이 본 교관의 교육 차별을 참지 못하고 분개하면서 학교를 그만두는 사건이 발생했다. 1월 20일, 그들은 「일본사관학교 중국유학생들의 퇴학선언(留日士官學校華學生退學宣言)」을 발표해 퇴학을 강요받은 세 가지 원인을 언급했다. 첫째, 일본사관학교는 중국 유학생들에게 지식을 보류하고 중요 과목들은 숨겨 가르치지 않는다는 것이었다. 이들은 퇴학선언에서 “일본육군사관학교는……(중국 유학생들에 대해) 평상시에 중요한 교과목들은 모두 비밀로 해 가르치지 않는다.”고 언급했다. 둘째로, 일본 교관은 제멋대로 교수 과목을 변경한다는 것이었다. 그들은 선언에서 “지난 달 20일 오전 과목은 교과과정표에 의하면 보병포 훈련이었다. 수업시간이 되었는데, 이 과목의 교원인 이마이(今井) 중위는 이것을 원래는 가르치지 않았다는 핑계를 대면서 보창 훈련으로 임시 변경하려 했다.”고 적고 있다. 셋째, 중국 유학생의 인격과 국가의 존엄을 능멸했다는 것이다. 이마이는 교실에서 중국 학생을 크게 혼내면서 “지나인 너희들은 배은망

47) 黄福庆, 『清末留日学生』, 44쪽, “肄业商船学校中国学生异动表”.

48) 黄福庆, 『清末留日学生』, 43~45쪽.

49) (澳)骆惠敏编,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海: 知识出版社, 1986年, 545쪽.

덕한 사람들인데, 중일이 친선하지 않다는 것이 또한 어떠하겠는가? 나는 실로 친선할 필요를 모르겠다. 너희들은 현재 너희들이 입은 군복이 우리나라 육군성이 너희를 가엽게 여겨 베풀어준 것이라는 것을 알아야 한다. 너희들이 만약 중국식 군복을 입고 일본의 지방에 간다면 반드시 우리 일본인들에게 구타와 욕설을 당하게 될 것이다.” 라고 하면서 중국 유학생들에게 마구 욕설을 퍼부었다. 중국 유학생이 그것을 학교 측에 하소연했으나, 학감은 오히려 “시비가 상세하지 않을 뿐더러 이마이가 중국인을 꾸짖은 것은 선의의 교훈에 속하는 것이다. 더욱이 모든 동인들이 학교 교칙을 지키지 않았으므로 이번 달 3일에 모두 퇴학시키겠다.”⁵⁰⁾고 했다는 것이다. 이는 실로 중국 군사유학생들이 장기간 차별과 모욕을 당하면서 쌓였던 반일 감정이 폭발했던 사건이었던 것이다.

1930년대에 들어서면서 중일관계는 긴장을 더해 갔고, 일본의 군사학교들은 중국군사유학생에 대한 교학 안보를 더욱 엄격하게 관리했다. 1930년 3월 12일, 『강성보(江聲報)』에는 「일본 유학에서 어째서 군사학은 더 배울 수가 없고 각 학교들은 모두 평범한 지식을 가르치며 중요한 과정들은 모두 들을 수 없게 하는 것인가」라는 제목의 기사가 실렸다. 이 기사는 “관립 학교는 우리나라 학생들의 정원을 제한하고, 입학시험은 너무 어렵고……학교에 들어가서는 여전히 평범한 지식을 배우고, 모든 중요한 교육 과정은 우리나라 학생들이 듣지 못하도록 한다. 때로는 우리나라 학생들만 쉬게 하여 수업에 참여하지 못하도록 한다.”⁵¹⁾고 언급했다. 또한 일본의 학교가 일부러 중국 유학생들에게만 아낌없이 방학을 주는 것은 중국 유학생들로 하여금 중요한 과학 문화 지식과 군사이론·기능들을 파악하지 못하게 하기 위해서라는 점을 지적했다. 일본 학교들의 이러한 보수적 교육 태도는 중국 유학생들의 엄청난 불만을 초래했다. 9·18사변이 폭발한 뒤 일본사관학교에서 공부하던 중국 유학생은 “동지들이 적국으로 유학을 왔으면 다른 사람을 우러러 가르쳐야 하는데도, 나를 이끄는 자들은 나를 존중하지 않고 다른 사람을 통제하는 자들은 항상 거만하게 구니, 이 땅이 더 이상 머무를 곳이 아니고 배운다 해도 성과를 얻기 어렵다.”⁵²⁾라고 분개하며 퇴학을 선언했다. 마침내 중국 유학생들이 단체로 퇴학하여 중국으로 돌아왔던 이 사건은 일본 당국이 중국 유학생들을 진정으로 가르치려 하지 않았던 실제 상황을 재차 폭로했다.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중국의 군사유학생들을 교육하면서 지식을 유보시키고 인신을 제한하고 감시했지만, 그럼에도 근대 중국인들은 일본으로 건너가 군사를 학습하면서 객관적으로 중국의 군사 근대화에 긍정적인 영향력을 미쳤다. 이와 관련하여, 사네토 게이슈(實藤惠秀)는 “중국은 확실히 일본에서 적지 않은 것들을 배웠다. 그러나 일본인들은 이로 인해 자부심을 느낄 수 있는가? 아니다. 절대 아니다. 대체로 일본인들은 중국학생들을 성심성의껏 가르치지 않았기 때문이다. 중국유학생들은 한편으로 일본인의 차별을 인내하면서 또 한편으로 발분하여 독학하였다.”⁵³⁾고 평론한 바 있다. 그는 자제력이 강한 중국학생들이 일본에서의 이러한 교육 상황에서도 근대적인 신지식을 배우고 중국의 근대화를 추동시켰음을 긍정적으로 평가하고 있다. 이것은 다름 아닌 일본 정부와 군부의 협소한 교육 태도를

50) “杂讯”, 「留日士官学校华学生退学宣言」, 『教育杂志』第19卷 第1号, 1927年1月20日.

51) 「留学日本何为一军事学更读不得, 各校皆授以平凡之知识, 重要课程一概不准听讲」, 『江声报』1930年3月12日.

52) 「留日士官生退学救国团消息」, 『申报』1931年10月22日.

53) 実藤惠秀,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 519~520쪽.

폭로한 것이기도 하다. 이 점은 다음 절에서 살펴볼 중국 군사유학생에 대한 관리 정책에서 더욱 명확히 드러난다.

IV. 이기적인 관리와 그 정책

중국 군사유학생들의 부단한 증가에 따라 유학생들에 대한 관리 사무는 종종 양국에 민감한 문제를 야기했다. 중국의 군사유학생들에 대해 일본 정부와 군대는 대체로 일본 본국에서의 군사학생의 표준에 따라 관리하는 동시에 특수한 군사유학생 관리정책을 시행하기도 했다. 예컨대, 군사유학생들과의 충돌을 피하기 위해 대부분의 관리 업무를 중국주일유학생감독처(中國駐日留學生監督處)에 떠맡겼다. 그리고 여러 정책들을 제정하여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의 행위와 활동을 규범화했다. 또한, 일부 의지박약자들을 회유하고, 각 파벌의 군사유학생들을 나누어 다스렸으며, 군사유학생 문제를 중국에 대한 정치, 군사, 외교정책들과 연계시켰다.

중국의 군사학생들이 일본에 유학을 갔던 초반에는 일본 정부와 군부가 상응하는 관리 정책을 제정하지 않은 상태였고, 대신 유학생을 받는 각 학교가 직접 중국유학생 사무를 책임지는 대표와 연계하여 접수와 교육, 관리 업무를 처리했다. 1898년 6월 하순, 샤오싱위안(蕭星垣), 단란팡(段蘭芳), 쉬팡첸(徐方謙), 탄싱페이(譚興沛) 등 네 명의 군사학생들이 일본 성성학교에 입학하면서 근대 중국인이 일본에 건너가 군사를 배우는 길이 처음 열리게 되었다.⁵⁴⁾ 그리고 1899년 1월 13일, 남양무비학당(南洋武備學堂)의 14명과 호북무비학당(湖北武備學堂)의 19명 총 33명의 학생들이 그 학교에 입학했다. 그 후 군사유학생들의 인원은 나날이 증가했다. 1899년 9월, 아오키 외무대신은 육군대신 가쓰라 다로와의 협상을 거쳐, 중국유학생들을 받는 각 학교가 유학생 사무를 처리할 때에는 반드시 청 정부가 파견한 중국유학생 감독 샤세푸(夏偕復)와 호북 남양 두 곳의 유학생 사무를 책임지는 첸쑤(錢恂)과의 협상을 거쳐야 한다고 명령했다.⁵⁵⁾ 이처럼 중국유학생의 입장에서 관련 사무는 청 정부가 관리하는 것이었고 모든 일은 본국 정부와 관련되어야 하는 것이었이다. 청 정부가 볼 때는, 일본 정부의 이러한 제안은 자기의 주권을 존중하는 것일 뿐 아니라 청의 관리정책과도 맞아떨어지는 것이었다. 결과적으로 일본 정부는 중국유학생을 관리하면서 초래될 수 있는 충돌을 피할 수 있었다.

아니나 다를까 1902년 7월에 발생한 성성학교 입학사건에서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슬쩍 발을 뺄 수 있었다. 일본은 이 사건을 계기로 청 정부에게 유학생에 대한 관리감독 기구를 만들 것을 건의하고, 자신은 유학생과의 충돌과 같은 불필요하고 번거로운 일들에서 오랫동안 벗어날 수 있었다. 그리하여 외무대신 고무라 주타로는 성성학교 입학사건의 조사, 처리에 대한 책임을 유일학생총감독에게 담당시키고, 그를 도쿄에 주재시켜 일을 전담케

54) 吕顺长, 『清末浙江与日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24~26쪽.

55) 「在本邦清国学生監督者派遣の件」, 『壹大日記』明治32年9月,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3633600.

해 유사한 사건의 재발을 막을 것을 건의했다. 주화공사 우치다 고사이(内田康哉)와 도쿄고등사범학교 교장 가노 지고로(嘉納治五郎)는 청 정부 외무부를 향해 “유학생들의 세부 사항들을 전부 파악하고, 바라건대 중국이 관원을 파견해 장정을 주도면밀하게 만들고 학생들이 잘못된 방향으로 나아가지 않고 학업에만 전념할 수 있도록 감독하여 장래의 임용에 대비할 수 있도록 하십시오.”⁵⁶⁾라고 말하고 청 정부가 중국유학생을 관리하는 감독기구를 설치할 것을 희망했다. 청 정부는 마침내 1902년 10월에 정식으로 왕다세(汪大燮)를 일본에 위임 파견하여 유학생감독처를 세우고, 유학생의 접견, 입학, 출석일 조사, 상벌 및 일본 정부와의 교류 등의 사무를 책임지게 했다. 그 후 청 말에 이르기까지 중국 군사유학생들은 기본적으로 일본주재 유학생감독처에서 겸하여 관리했다. 북양 시기, 국내 정국이 혼란해지고 군벌 할거의 혼전 양상이 초래되자 군사유학생들의 파견 역시 자연히 여러 세력으로 다분화되었다. 중앙정부와 각지의 정치 군사집단이 선발해 보낸 군사유학생들은 각각 파견된 유일학생감독(혹은 중앙경리원)과 각지의 경리원으로부터 관리되었다. 남경정부는 관리원을 직접 파견하거나 육군유학생 중에서 관리원을 선발하여 군사유학생들의 관련 업무를 책임지게 했다. 이러한 조치를 통해 일본 정부는 중국유학생들을 관리하는 과정에서 유학생들 간의 파벌 투쟁에 연관되는 것을 피할 수 있었고 그 속에서 최대의 이익을 얻었다.

성성학교 입학사건이 발생한 후 일본 정부와 군부 또한 중국군사유학생 관리의 중요성과 민감도에 비추어 상응하는 제한 정책을 반포하기로 결정하고, 그들을 일본 군대나 군교에서의 행동 규범으로 삼았다. 일본 정부는 1903년 「청국육군학생 재대기간 관리준칙」⁵⁷⁾과 1909년 「제국해군의 청국학생 교육규정」, 「청국육군학생 관리규정」⁵⁸⁾ 등의 장정을 잇달아 반포하고, 각각 “청국 육군학생은 본국의 사관후보생의 표준에 따라 관리한다”, “학생을 관리하는 데 있어서의 모든 조항의 규정은 대체로 사관후보생(士官候補生), 주계후보생(主計候補生) 및 기타 학교에서의 학생 관리 표준에 따라야 한다.” 고 규정했다. 이러한 규정들은 민국시기에도 계속 연용되었다. 예를 들어, 1918년 일본 정부는 「대일본제국육군사관학교 입학희망자준칙」⁵⁹⁾에서 “학생이 민국에서 어떤 관직을 맡았던지 간에, 일본제국 군대에 배치되어 사관학교를 졸업할 때까지의 기간 동안은 일본제국 사관후보생의 기준에 따라 관리하고, 그 학생들은 반드시 일본제국의 제 법률을 준수하고 교육 및 관리의 상관 명령에 복종해야 한다.” 라고 규정해 놓았다. 정리하자면,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중국 군사유학생 정책을 관리함에 있어 최소한 표면적으로는 본국의 동류의 학생을 기준으로 삼아 관리한다고 규정했던 것이다.

이러한 규정은 중국 군사유학생들을 관리하는 중요 근거가 되어 주로 징별 처분, 집근 실습, 비용 납부, 휴가 제도, 복장 등의 내용을 정했고, 군사유학생들이 학교나 부대에 있는 기간 동안 여러 방면에 영향을 미쳤다. 첫째, 중국 군사유학생에 대한 징별과 처분 규정이다. 청조의 군사유학생들에 대해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이하의 항목 중에 하나라도 속하는

56) 『清光緒朝中日交渉史料』卷66, 故宮博物院, 1932年, 38쪽.

57) 「清国陸軍學生入隊並入校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3939900.

58) 「帝国海軍に於ける清国學生教育規定」, 『在本邦清国留學生關係雜纂 海軍學生之部』第2冊, 請求番号: 3-10-5-3-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清, 韓學生教育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레ファレン스코드: C04014502700.

59)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學生入学手續に関する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레ファレン스코드: C01001226700

자는 제명 처분을 한다고 규정했는데, 즉, ① 형법 및 육군형법을 위반한 자 ② 군기를 문란케 하거나, 누차 법을 어기는 등 품행이 방정하지 않고 여러 번 지도했으나 고치지 않는 자 ③ 부상이나 질병으로 수학할 수 없는 자 ④ 입대 혹은 입교의 시기를 14일 이상 지연시킨 자이다. 연대장이나 학교장은 규정을 위반한 자를 제명시킨 후 대략적인 상황을 직접 육군대신에게 보고해야 한다. 그중, 군사유학생이 형법을 어겨 범죄했을 때는 그 범죄의 경과를 육군대신에게 보고하고 처분을 구해야 했다.⁶⁰⁾ 민국시기,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중국 군사유학생이 "질병이나 기타 부득이한 사정 외에는 중도에 부대나 학교에서 나올 수 없고 입대 후에는 병과(兵科)를 변경할 수 없으나, 행위가 불량하거나 학업 성적이 불량하여 학습 목적을 달성하기 어려운 자는 퇴대 혹은 퇴학 처분을 한다"라고 규정했다.⁶¹⁾ 그러나 육군대신에 보고해야 하는지 여부는 규정되어 있지 않았는데 이는 군사학교가 중국학생을 직접 처벌할 수 있는 권력을 확대시키기 위해서인 듯 했다.

둘째, 중국 군사유학생들이 학교에서나 연대에서나 모두 집근(執勤)을 담당해야 할 의무가 있다고 규정했다. 만청 시기나 민국기 할 것 없이, 중국 군사유학생들은 반드시 소속 학교나 군대에서 반년 정도의 대오 집근을 실습해야 하고, 또 군사유학생 교육 단위가 "학생의 집근 실습을 할 수 있는 기회를 제공할 책임을 진다"고 규정했다.⁶²⁾

셋째, 매월 정해진 시간에 유학에 드는 각종 비용을 상납해야 한다고 규정했다. 중국 군사유학생들의 매월 경비는 주로 수당, 피복비, 양식비, 소모용품비, 학습용품비, 기계대여비, 무기탄약비, 실습비와 약품비, 입원비, 우편비, 환어음수속비 등 잡비를 포함했는데, 민국시기에는 대략 매월 70원 정도였다. 청말에는 청 정부가 공비 군사유학생들의 비용을 일률적으로 부담했고, 민국시기에 이르러서는 모든 자비유학생과 공비유학생은 전술한 경비를 1차 혹은 수차례로 나누어 지정한 날짜 이전에 일본제국 육군성 군사과 안에 부설되어 있는 민국학생학비관리위원회에 납부해야 했다.

넷째, 중국군사유학생의 휴가 제도를 규정했다. 군사유학생들은 대체로 사관후보생, 주계 후보생 및 다른 학교에서의 학생의 표준에 따라 휴가를 받았고, 그 외에는 중국의 상황에 맞게 만수절과 음력 정월 1일에도 휴가를 받았다. 만약 휴가를 신청하려면 반드시 중국육군유학생의 승인서를 작성해야 허가를 얻을 수 있었다. 또한 "부대나 학교에 있는 동안의 휴가 신청 기간은(왕복 기간을 포함) 매번 6주 이내로 한다. 휴가 신청 기간이 전술한 규정을 초과할 때에는 반드시 휴가증을 소속된 곳의 연대장이나 학교장의 허락 여부가 담긴 의견서와 함께 육군대신에게 보고하고 지령을 기다려야 한다."⁶³⁾라고 규정한 데에서 알 수 있듯이 휴가 제도와 휴일에 대한 통제가 매우 엄격했다.

다섯째, 중국군사유학생의 복식에 대해서도 명확한 규정이 있었다. 「청국육군학생 재대기간 관리준칙」에 첨부되어 있는 「청국육군학생의 모자 및 금장」의 윗부분에는 중국육군유학생의 의복, 견장, 모자에 관한 구체적 규정과 양식의 도면이 적혀 있다. 중국군사유학

60) 「清国陸軍学生入隊並入校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3939900; 「清, 韓学生教育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4502700.

61) 「支那陸海空軍派遣学生入学手続に関する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1001226700.

62) 「清・韓学生教育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4502700.

63) 「清・韓学生教育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레ファレン스코드: C04014502700.

생들은 각 학교의 병과에서 “사관후보생은 주계후보생과 서로 같다. ① 옷섶 위에는 성장(星章)과 대호(隊號)를 붙이고, 그 양 단에는 용과장(龍瓜章)을 (별지의 부도와 같이) 각각 하나씩 붙인다. ② 모자와 견장에 붙이는 성장은 (별지에 부도와 같이) 용과장으로 바꾼다. ③ 근위사단에 입대한 자는 전술한 두 가지 사항 외에, 모자의 앞면에 앵지(櫻枝)를 붙인다. ④ 제2종 학생은 헌병연습소에 입학한 후 전술한 규정 외에, 옷섶에 붙이는 용과장은 팔판의 흑용 원좌(八瓣黑絨圓座) 위에 붙여야 하고, 32년식 군도(乙)를 차야 한다. 제4종 학생의 제복은 육지측량부장과 청국육군학생감리위원장이 협의하여 결정한다.”⁶⁴⁾라고 하여, 상세하게 각 종류의 군사유학생들의 의복, 몸에 다는 견장, 모자 휘장, 군도 등 일본식 장식의 구체적 양식들을 규정해 놓았다. 이러한 장식들은 근대 중국군대의 복장에 영향을 미쳤을 뿐 아니라 심지어 국민의 복식에도 일정한 영향을 주었다.

여기에서 염두에 둘 것은, 전술한 각항의 규정들은 주요하게 일본육군성·해군성 등 관립군사학교나 연대에서 공부하고 있던 중국유학생들을 대상으로 한 것으로, 사립학교에서 군사를 공부하는 중국유학생들은 이러한 관리 범위 밖에 있었다는 점이다. 그 밖에, 이러한 중국군사유학생에 대한 몇 가지 관리 규정들은 비록 공포된 시간이 같지는 않았으나 그것의 내용이 청말에서 민국기까지 내용상의 변화는 그다지 크지 않았고 양자 간에는 명확한 계승성과 연속성을 보였다.

물론 일본 정부와 군부가 실제 집행 과정에서 중국군사유학생을 일본인 군사유학생을 관리할 때와 같이 동등하게 대우했던 것은 당연히 아니었다. 빈번하게 차별이 발생했고, 중국유학생들의 인격과 국가의 존엄을 우롱하는 일에 대해서도 이를 보고도 묵과하거나 자기 쪽을 편들면서 중국유학생들의 감정에 상처를 입혔다. 1903년 4월 26일, 성성학교가 춘계운동회를 개최해 회장 내에 경기에 참여하는 유학생 각국의 국기가 내걸렸는데, 여기에 대청국의 황룡기(黃龍旗)만이 보이지 않았다. 이에 중국유학생들은 경기 운영자를 찾아가 이 일을 자문하고 고쳐 달 것을 요구했다. 그런데 경기 운영자는 오히려 큰소리치면서 “무릇 세계의 독립국만이 여기에서 국기를 걸 수 있다. 중국은 이미 각국의 보호국으로 떨어졌는데 어찌 다른 나라들과 동등하게 국기를 걸 수 있겠느냐?”⁶⁵⁾라고 말했던 것이다. 주최 측의 이러한 행동은 중국유학생들의 엄청난 분노를 초래했고, 중국유학생들은 분개하며 자리를 떴다. 비록 사후에 중국 국기를 고쳐 걸었으나 중국유학생들은 여전히 출석을 거부하고 일본 측의 경솔함과 모욕에 항의했다.

그로부터 오래지 않아 사이고 다카모리(西郷隆盛)의 아들이 쓰촨(四川)의 유학생 류(劉)씨를 모욕해 성성학교 중국학생들이 퇴학한 항의 사건이 또 발생했다. 1903년 5월 27일, 『소보(蘇報)』는 「성성학교학생퇴학」이라는 제목으로 사이고 다카모리의 아들이 쓰촨의 유학생인 류 모군을 모욕했던 일을 보도했다. 이 사건의 경과는 대략 다음과 같았다. 이틀 전 저녁, 성성학교의 중국유학생 류 모씨가 그와 같은 연대에 있는 사이고 다카모리의 아들에게 언어 모욕과 계간(鷄姦)의 위협을 받고는 화가 나 성성학교의 중국 동학들에게 이 사실을 알렸다. 이들은 먼저 단체로 교장에게 보고를 하고, 사이고 다카모리의 아들의 직무를 면직시킬 것

64) 「清・韓學生教育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4502700.

65) 「成城學校留學生罷运动会」, 『湖北學生界』第4期, 119쪽.

과 류에게 사죄할 것을 요구했다. 그런데 교장은 사이고 다카모리의 아들을 처벌하지 않고 오히려 중국유학생을 제명한다고 협박했다. 중국유학생들 여럿은 다시 참모본부에 이 문제를 상소했으나 참모본부 역시 사이고 다카모리의 아들을 비호하면서 그들에게 다시는 소란을 피우지 말라고 했다는 것이다.⁶⁶⁾ 이처럼 중국유학생은 억울한 누명을 쓰고도 마땅히 하소연할 곳이 없었고, 이는 일본학생이 중국유학생을 업신여기는 분위기를 더욱 조장했다. 이런 일들로 중국유학생들은 종종 퇴학하여 중국으로 돌아갔고 이를 전해들은 청 정부의 불만을 야기했던 것이다. 1909년 6월, 일본 군부는 「청국육군학생관리규정」을 반포해 “연대장 및 학교장은 반드시 일반 부하와 학생 간의 화목한 교제에 관심을 가져야 하며, 학생군사교육과 관련된 사항일지라도 주임장교 이외에는 간여하지 말아야 한다.”⁶⁷⁾고 규정했다. 하지만 중국유학생들을 위압하려는 일본인을 실제로 징벌할 수 있는 상응 조치가 취해지지 않았고, 단지 각 군사학교가 이 일에 주의해야 한다는 점만을 환기시켰을 뿐이다.

또한,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의 동정을 감시하기도 했다. 앞서 서술한 것처럼, 군사학교에서는 교육 과정 중 중국유학생들의 활동을 엄밀히 감시해 군사 기밀이 새어 나가는 것을 방지하고자 했다. 아주 작은 일이라도 일어날라치면 더욱 더 그들에 대해 마음을 놓지 않았다. 신해혁명이 발발한 후인 1911년 10월 31일, 해군차관 다카라베 다케시(財部彪)는 외무차관 이시이 기쿠지로(石井菊次郎)에게 서한을 보내 해군포술학교에서 공부하는 중국유학생의 불안정한 상태를 진술하면서, 많은 사람들이 귀국해서 혁명에 참가하려고 하고 있으니 대책을 강구해야 한다고 역설했다.⁶⁸⁾ 이렇듯 중국 국내의 상황이 좋지 않고 열강들은 아직 이를 관망하고 있을 때,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의 동향 및 그 관련 정보에 대한 조사와 감시는 일본 외무성이 중국정책 및 중국유학생 정책을 수립할 때 참고할 수 있는 중요한 자료로 활용되었던 것이다.

일본은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의 동정을 살피기 위해 유학생 파벌 간의 모순과 투쟁을 충동질했고, 그들을 중국 군정의 실권을 장악할 수 있는 일본의 대리인을 조속히 육성시키고자 했다. 다시 말해, 중국유학생들을 중국 침략을 위한 내부 간첩으로 포섭하여 중국의 군사정보 등을 정탐하게 하고, 경제적인 대우나 높은 봉급을 받는 고관의 자리 등 온갖 방법과 계략으로 꾀어 일부의 의지박약한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을 자신의 편으로 끌어들이고자 했던 것이다. 예를 들어 일본군 참모본부는 「선발 파견한 육군학생의 분반유학규정」을 극력 반대하면서, 청이 졸업 후 귀국한 유학생에게 천총(千總), 파총(把總)의 지위를 준다고 하는데, 군사 졸업생이 일본군에서 받은 직위가 이미 청 정부의 수비(守備)에 해당하는데 어떻게 천총, 파총으로 떨어뜨릴 수 있겠느냐고 생각하고는,⁶⁹⁾ 군사유학생들이 빨리 군정 실권을 얻어 일본 유학을 통해 형성된 특수한 관계를 더 편리하게 이용할 수 있도록 만들어 일본이 더 큰 이익을 얻을 수 있게 되기를 기대했다. 이것을 위해 1911년 6월 10일 일본 외무대신은 해군대신의 위탁을 받아 청 정부의 외무부를 조회하고, 일본의 해군학교로 유학을 갔던 세강테(謝

66) 「成城学校学生退学」, 『苏报』1903年5月27日; 「成城学校在学清国留学生に関する新聞記事の件」, 『壹大日記』明治36年7月,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3904500.

67) 「清・韓学生教育の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4014502700.

68) 「清国革命動乱の際在本邦同国留学生の動静調一件 陸海外の部」, 請求番号: 3-10-5-19,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9) 『东方杂志』第一年 第九期, 教育, 215쪽.

剛鐵) 등 7명의 졸업생을 위해 직접 그들의 관직을 모색했다. 그는 모든 학생들의 성품과 학문이 두루 우수하다고 칭찬하면서 “귀국 후에 해당 아문(衙門)이 그들을 적합한 관직으로 임용시켜, 수년 동안 부지런히 배운 것을 저버리지 않고 앞날의 발전의 길을 고려할 수 있게 되기를 몹시 바랍니다.”⁷⁰⁾라고 말하면서 중국 해군부가 그들을 높은 직위에 임용하게 되기를 희망했다. 그 외에, 일본에서 유학을 했던 어떤 사관생의 폭로에 따르면, 일본육군사관학교는 온갖 수단을 가리지 않고 매 기수의 중국유학생들 중에 몇 명을 매수하면서 “제국주의의 엄호를 받으며 승관하고 재산을 모을 수 있는 기회를 줄 것이며, 양성이 성공하기만 하면 매국 공작은 편안하고 부유하고 존귀하고 영화로운 생활에 따라 갑절로 늘 것이다.”⁷¹⁾라고 했다고 한다. 그리하여 일본군 측은 여색으로 유혹하거나 승관, 재물로 유인하는 방법으로 일부 유학생들을 일본을 위해 일하도록 꺾어냈다. 일본 교관과 학생들은 중국유학생과 빈번히 접촉하는 기회를 이용해 중국의 정보를 정탐했다. 어떤 중국사관생은 “그 학교는 위로는 학생 대장으로부터 아래로는 구대장까지 모두 중국의 지리, 군사, 언어를 잘 알고 있었다.”, “그들 무리가 정탐한 자료들은 우리들로부터 얻은 것이 매우 많았다.”⁷²⁾고 고백하면서, 자신이 일본에서의 유학 기간 동안 신중하지 못하게 정보를 누설했던 데에 양심의 가책을 느끼고 반성했다. 이러한 사실은 일본 교관과 학생들이 중국유학생과의 교류 과정에서 중국의 정보를 정탐하려고 하는 특수한 목적을 가지고 있었음을 잘 보여준다.

V. 맺음말

일본 정부와 군부는 청 정부가 일률적으로 선발 파견한 군사유학생들을 주로 받아들였던 때로부터 민국시기에 각 정치군사집단의 파벌들이 파견한 군사유학생을 각각 받아들였을 때까지, 그리고 중국학생들에 대한 유학교육을 진행하면서 기밀안보와 제한정책을 취한 것에서부터 군사유학생들에 대한 관리감독을 강화하고 일부 학생들을 매수하여 자신의 편으로 만드는 데까지, 중국의 군사유학생들을 받아들여 친일세력을 육성하는 동시에 그들이 잠재적인 위협세력이 될 것을 걱정하는 모순된 심리상태를 드러냈다. 비록 일본에 유학한 군사유학생들의 경험은 중국의 군사 근대화를 촉진하는 데 적극적인 작용을 했음을 부인할 수는 없지만, 우리는 그 뒤에 숨겨진 일본의 근본적인 목적을 명확히 인식해야 한다. 즉, 일본은 중국군사유학생들을 양성시킴으로써 일본의 중국에 대한 군사 영향력을 강화하고 중국에서의 권익을 확대하며 그것을 대 중국 정책과 맞물리게 하려 했던 것이다. 당연히 일본의 이러한 협소한 유학교육 태도는 결국 양국 간의 과학, 문화, 기술의 교류와 발전에 결코 이롭지 않았고, 유학국 정부가 자신의 교육 목적을 실현하는 것을 더욱더 어렵게 만들었다.

70) 张侠等合编, 『清末海军史料』, 海洋出版社, 1982年, 427쪽.

71) 「留日士官生退学救国团消息」, 『申报』1931年10月22日.

72) 「留日士官生退学救国团消息」, 『申报』1931年10月22日.

【Abstract】

The Study on Japanese Policies to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before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XU Zhimin

In moder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tudying abroad,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were so conspicuous for their position, importance and effect. Many of them became famous generals and senior executives, government ministers even national leaders later. They have changed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n some extent.

In now days, the subject of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in modern history is still concentrat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Chinese scholars mainly studied the sergeants, which has the larger quantity and has more the big shots, scholars make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ortant military students and Yuan Shikai, they told us the history of their development and their affects to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Yuan Qing and Wang Jianming mainly studied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navies' education in Japan, the students of Chinese navy took an active part in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education trainings of modern Chinese navy, which had great aff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2001, Ji Mingquan published the Study on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in Early 20th Century, which told u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students, their activitie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the effect to Chinese politics and milita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another hand, the Japanese scholars paid much attention on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military academies, for example, sergeant Military school (陸軍士官学校), Seijyou school (成城学校), Shinbun school (振武学校) and so on. They has also made quite a number of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study, living, training and their attitude to Russo-Japanese War.

So far, no one has had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accepting,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policies about Japanese Government to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So I'd lik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policies and try my best to analys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Army Headquarters' complicated emotions, purpose and strategic intent in accepting and educating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trying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Japanese policies toward China.

一. Positive Acception and the Purpos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had big adjustment and changes from the later Qing Dynasty to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order to improv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to stretch Japanes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Army Headquarters persued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send military students. The Japanese Minister in China Yano Benyo (矢野文雄) extended his sincere invitation, he even said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ould provide the education fund. Yano Benyo's suggestion was appreciated by his successor Aoki Syuzou (青木周蔵). Japanese Government gained the Qing Government's promise to continue the policies above and provided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with some conveniences. Otherwise, the Japanese Naval Headquarters didn't like accepting the Chinese students very much until Japanese navy defeated the powerful Russian fleet in 1905.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arlords Regim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broke the rule of mainly accepting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who were sen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y began to accept the students from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of China.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helped Sun Yat-sen and Huang Xing to create the military schools for educate more revolutioners while accept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sent by central government. After Yuan Shih-kai's death, the warlords fighting among themselves. The country was torn by warlordism, with each warlord dominating a region.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have no hesitation about accept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from different warlord forces. They tried to expand the military students' contradictions from different forces. In this way they would like to keep the country into civil war forever.

At the end of 1928, Chiang Kai-shek re-united whole China formally, he unified the right of sending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to reduce the strength of the other warlords. In order to avoid the civil war, Nanjing Government sent the Chinese Minister in Japan Wang Baorong to talk about the unified authority of sending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insisted the policy of accept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from the regional power group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ried to make the disagreement of the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o make more rivalries of different cliques by control the different factions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In order to invade China,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oped the various factions in its puppets and tools. Though notes and representations made by Nanjing Government on many occasion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turned a deaf ear to them and refused to abandon the old enrollment schemes.

二. Negative Education and Measures

The modern Japan knew the importance of military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ecause it took to the road of foreign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by strengthening military. Thoug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army wanted to improve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enlarge Japanes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by educat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in another way, they were worried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who had the modern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ories. Maybe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would become Japanese potential menace one day, so the Japanese side took the

discrimination measures, policies, actions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To be concret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polici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llected the capitation grant when the Japanese military schools enrolled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sent by Qing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the Japanese side often cancelled the important military contents, or asked them to go out when met the things about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s were imposed the stringent restrictions on accepting the advanced military education. More act of modifying and conditions of being modified were given to the naval students. In order to keep the military secrets, Japanese Government asked the officers to reinforce the monitoring management to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Many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went back to China because of the Japanese discrimination policies and actions. It's hard for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to learn the real modern military technology or theories. For example, on January 3rd 1927,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ese Sergeant Military School(陸軍士官学校) quitted school because the Japanese discrimination teaching was more than they could bear. In the thirties of 20 Century, the Sino-Japanese contradictions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ute, the Japanese military colleges' teaching secrets measures were strengthened. With the broken of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ll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ese sergeant school(陸軍士官学校) quitted school in ang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were preserved, limited and surveillant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Otherwise,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modern Chines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hinese military's modernization by learning in Japan. Saitou Keisyou (実藤恵秀) remarked: "The Chinese learnt a lot indeed in Japan. But would the Japanese be proud of it? No, never. Because the Japanese hadn't taught the Chinese students by heart.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worked hard and succeeded in teaching themselves while they were bearing the discrimination." The words above praised the Chinese students' objective function in learning the advanced knowledge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w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narrow attitude of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三. Selfish Management and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went to Jap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didn't make the suitable government policy. The schools that accepted the Chinese students contacted directly with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nd arranged the students' accepting,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thought everything was relat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were mastered by Qing Government. In the opinion of Qing Governm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not only respected its rights but also cooperated to its government polic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were enlightened by the Seijyou school(成城学校) Entering Incident, they suggested the Qing Dynasty create the management authority to master th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as glad to be out of any

conflict.

After the Seijyou school(成城学校) Enterning Incid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knew the importance and sensitivity about manag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so they dicided to made the suitable restrained policy and made them rules of conduct in the army or military schools.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sued many rules in 1903 and 1909, which concluded the punishment,practice,funds,clothing,vocation,and so on.The rules were considered as the important basises in manag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To our surprise,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turned a blind eye to the bad behaviour of Japanese military pupils,they often discriminated and insulted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g the Army Headquaretrs wanted to train the agents who mas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ey tried their best to tempt some weak will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with offering of high rank,position or wealth. They were always spying into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affairs ,poisioning the ra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factions.The strategy of “devide and rule” for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was matched with the Japanese political,military and foreign policies to China.

The modern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Headquarters mainly accepted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 sent by Qing Government at first and then accepted the students from vareis different fac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y practised the secret and restrict policy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then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and bought over the Chinese students. Though we can't deny the Japanese military education's positive effects to the Chinese military's modernization, whatever happens, from the contradicte attitudes and actions above we should ge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Japan's basic aim behind it---- strengthening Japanese military affects and enlarging Japan's rights in China, matching with Japanese policies to China by train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Japan.This kind of narrow education attitude can never be goo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culture and technology,it's also hardly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 aim of the countries that sent th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